魂飘重霄九

苏区「肃反」大纪实

「左」倾痛史

刘秉荣

下卷

花山文艺出版社

魂飘重霄九

苏区「肃反」大纪实

(冀)新登字 00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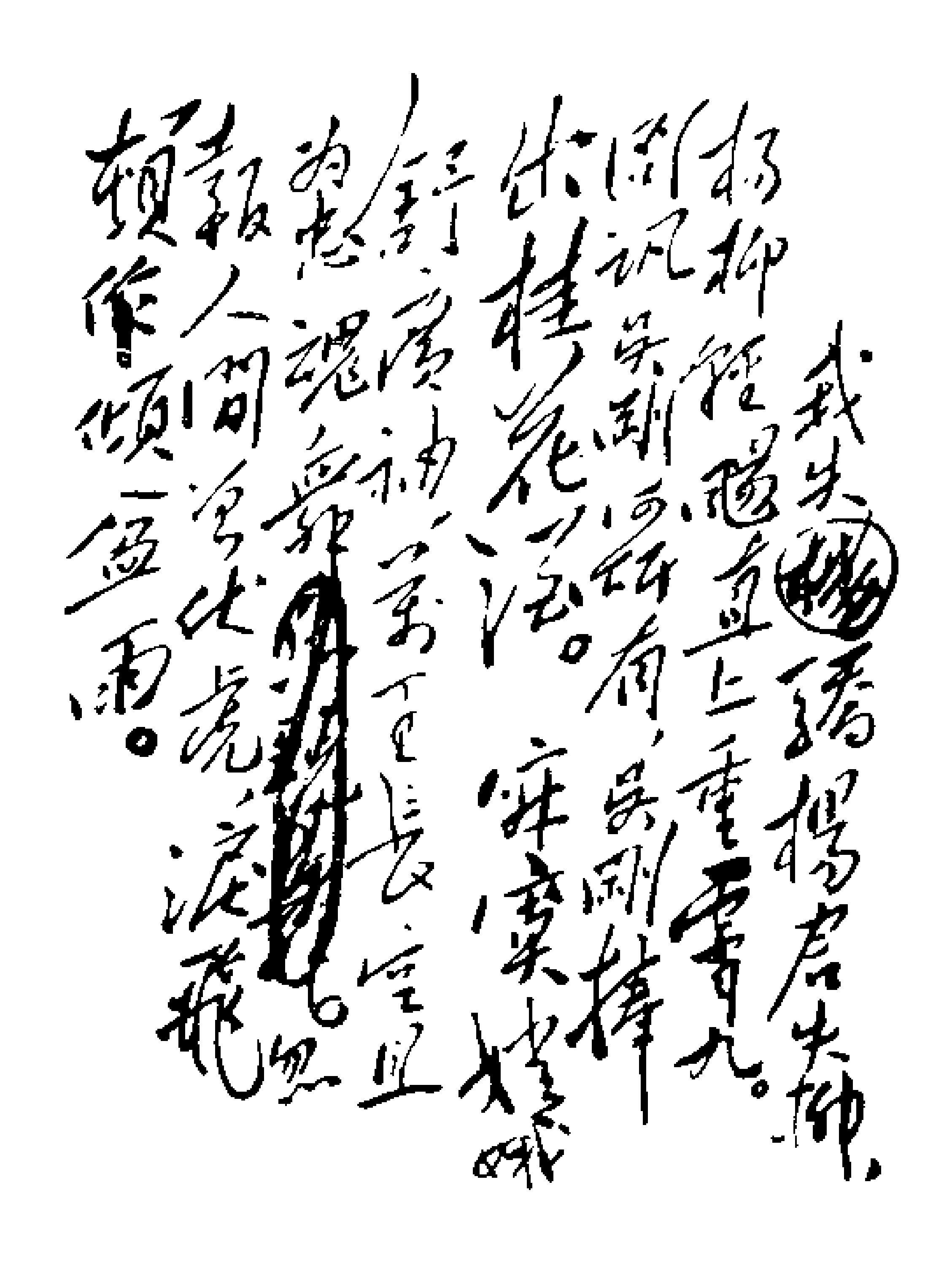
魂飘重霄九

——苏区"肃反"大纪实

刘秉荣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28.5 印张 732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0 定价:23.80 元
ISBN 7—80505—094—5/I·94
(全两册)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主席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1957年5月11日)

负笈长沙时，已聆君盛名。及我至穗城，
鸿文启心灵。坚贞斥汪、蒋，不畏刀斧横。
直言伸正义，何惧独秀狞。我在湘赣边，
心疑“左”势凌。大祸从天降，蒙诬被罪刑。
君独能兼听，广纳同志评。对人持慎重，
刀下始留情。我既调基层，罹疾身削形。
君竟远路来，探望复叮咛。关怀与帮助，
温暖长心萦。延安重聚首，情深更固凝。
全国庆解放，斗争不少停。重病仍工作，
奋疾并力行。吾党丧栋梁，惜君才壮龄。
我痛失师友，心悲泪涕零。哀思情切切，
终夜不能眠。



（王首道于痛悼任弼时时写的斥“大肃反”诗）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同志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



红军时期的关向应同志



红军时期的任弼时同志

柳直荀烈士和李淑一同志订婚合影(1924 年夏于长沙)



周逸群烈士



段德昌烈士


红军将领许继慎


红军将领曾中生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演说"暴动"



邓中夏烈士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同志



邝继勋烈士



夏　曦



张国焘



王明（陈绍禹）



陈昌浩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肃反工作中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致使一些人被无辜错杀。在这些被错杀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党的好干部、好战士和工农积极分子，有的甚至是党政军的领导同志。他们被错杀，是革命的重大损失。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切经过调查确系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根据这一决议，建国前，特别是建国初期，各地为解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错杀人员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大多数人已得到平反昭雪。至于是否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的问题，内务部根据各地的反映，报请中央同意，于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发出了《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者及其家属处理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对确无反革命行为而被错杀者应予平反昭雪，……

（引自1983年5月26日《国务院批转的民政部关于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的处理意见》）

谨以此书献给
那并非死于敌人屠刀下的烈士们

段德昌	万　涛	瞿秋白	何孟雄
周逸群	邓中夏	柳直荀	潘家辰
戴补天	彭国材	孙德清	刘革非
候蔚文	刘鸣先	胡慎己	戴君实
李剑如	张宗理	张昆弟	栩　栩
张应南	彭之玉	段玉林	赵　奇
尉士均	周小康	王炳南	王一鸣
陈协平	唐赤英	宋盘铭	谷大姐
覃伯卿	叶光吉	盛联均	覃　苏
周子服	张应南	汤慕禹	周荣光
曾中生	高敬亭	胡　怫	吴凤卿
邝继勋	许继慎	熊受暄	周维炯
庞永俊	潘皈佛	吴云三	高建斗
王则先	肖　方	魏孟贤	曹光南
封　俊	江子英	袁皋甫	吴精赤
刘性成	郑新民	王宏学	雷绍全
刘纪云	徐朋人	曹学楷	戴克敏
陈定侯	王秀松	戴季伦	李梯云
方　英	余笃三	越箴吾	王振华
徐永华	杨　白	吴　展	闻盛也
陈少卿	李春霖	王占金	舒玉章
张逸民	杨　珊	刘　杞	关淑衣
柯柏园	罗炳刚	查子清	李奚石
戴亢若	黄　刚	王长先	王　明

任　难	王培吾	姜镜堂	廖业旗
陈静宜	罗成立	方永乐	余　雄
徐诚基	高开文	罗作坏	陈守信
吴光禄	郑定国	张家胜	刘荣炳
雷长友	雷书浩	郑一民	郑新民
潘恩善	李庆林	徐其虚	陈慕尧
廖炳国	吴靖宇	徐子明	曾昭如
易敬若	易登鲁	易少春	李自由
李云福	叶孝清	李保鲁	孙光头
胡玉书	晏六泉	冯　静	许世申
潘崇禹	高渐图	毛正初	姜镜望
张宇平	廖业祺	薛卓漠	李荣桂
何伯园	林育南	朱亚伦	范　陀
程绍山	占梦雨	漆雨元	李求实
李溪石	胡明正	袁汉民	丁　超
陈　奇	伍超然	陈品三	陈锦辉
卢肇西	曾牧村	张涤正	段奋夫
李　真	何登南	丘子庭	罗寿春
谢汉昌	刘　敌	李白芳	曾炳春
肖大鹏	刘铁超	袁德生	于兆龙
马　铭	王　怀	甘步衢	刘任武
刘其凡	刘炎松	刘秉常	朱昌偕
朱映华	朱裕农	李春香	李孟弼
李瑞娥	杜亚文	肖伍仔	陈　韶
陈介福	周道益	罗日光	胡　波
胡竹清	曾道一	曾毅之	彭桂峰
谢月高	谢露生	谭牛山	朱勉之

……

序

李振军

刘秉荣同志呕心沥血十年之久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魂飘重霄九》(——苏区"肃反"大纪实)一书就要出版了，他请我作序，读罢这部长达六十余万字的书稿，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南昌起义，从此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先后举行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湘南暴动，在全国其他各地，也相继举行了大大小小的暴动，从而建立了工农武装、建立了革命政权。其中，毛泽东、朱德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暴动、湘南暴动的人马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贺龙、段德昌、柳直荀、周逸群等赴湘鄂西、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曾中生等在鄂豫皖，领导和发展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发展红军和创建苏区的过程中，那许许多多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怀着推翻腐败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决心，不怕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前扑后继，英勇奋斗，使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形成了烈火燎原之势。

但是，由于从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

主义和王明的更加"左"倾的路线，先后统治了全党达数年之久，结果，给中国的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期，在党内进行扩大化的"肃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使段德昌、周逸群、柳直荀、万涛、潘家辰、宋盘铭、王炳南、孙德清、曾中生、邝继勋、许继慎等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被错杀，造成了千古恨事，"左"倾路线的恶果，使得红军丧失了战斗力，使得日益发展的红色政权丢失，最后，只得进行万里长征。

这是一部即充满着革命激情，又回荡着悲壮深沉之气的著作，读后使人掩卷深思：中国的革命，必须依照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必须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革命的力量才能发展、革命的事业，才能壮大。右的路线会给革命带来损失，而"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更为严重。

毛泽东老人家曾教导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回顾我党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加深对"左"倾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的了解和认识，尤为必要。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告诫全党，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象越'左'越革命"。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江泽民同志报告中对"左"的警惕的提出，都一针见血的指出"左"的危险及其恶果，告诫了全党："现在明确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住段德昌、曾中生、柳直荀等烈士用鲜血写成的苏区创建史上的悲壮一页吧！

目　录

第一部

第 二 部

第　三　部

第 一 部



楔　　子

我失娇杨君失柳，
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为毛泽东同志1957年5月11日所写。李淑一系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词中的“杨”为毛泽东

的发妻杨开慧烈士,“柳”乃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烈士。杨开慧烈士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杀,柳直荀烈士之殁呢?在有关《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注释中,历来均为“1932年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这注释,掩盖了历史的真实。柳直荀烈士的遇难,非死于敌人的枪弹之下,而是死在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统治者之手中。

这是悲惨而又沉痛的一页历史,这页历史的真实被掩盖了多年。

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拂去了那一页历史的尘埃,将历史大白于天下。

要写清这段历史,必须先从一个写起,此人是谁?就是工人运动的领袖李立三。为何要从李立三写起,读者往下看就会明白。

第一章　铁树开花时出生的人

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生于湖南醴陵县城郊阳三石芋园府李昌圭秀才家。其出生之日，适逢李家后院的一株百龄凤尾焦开了花。凤尾蕉又称铁树，开花极难，民间有“千年铁树才开花”之说，李立三于铁树开花时出生，全家人都感到此子生的不凡，因而，都十分高兴。为其起乳名“凤生”，又怕其大命立不住（即活不长），又为其取了个贱名——狗妹子。启蒙之际，其父据李家的辈份，为其起了个学名“隆郅”。

李立三人很聪明，少时读书甚为用功，中学时到了长沙长郡中学就读。结交了浏阳来的罗章龙，又经罗章龙的介绍，认识了毛泽东。李、毛二人相谈，甚为投缘。1917年，李立三中学毕业后，回乡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师。因其揭露了县教育会的首脑叶沛棠的循私舞弊而遭到了打击。李立三为此愤然出走，参加了革命军。走前，他留诗一首：

浩气横斗牛，如焚痛国仇，
读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

李立三到了衡山程潜的护国军中当了兵，由于他有文化，又能干，很快当了差遣。一次去程潜司令部办事，看到程潜正与人恋棋，眼看程潜败局已定，李立三忍不住指点了一下，程潜棋转败为胜。程甚为高兴，便与李攀谈，得知李与己系同乡，而李之父与己还是同年，甚为高兴，便不要李立三再当兵了，给了他一些钱，要他到北京大学深造。1919 年春，李立三到了北京，由于钞票贬值，李立三交不起学费，进不了大学，正值他走头无路时，发现了留法勤工俭学这个门路，便报了名，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于是年秋，李立三同四十名赴法学生乘坐美轮沃隆号，从上海起锚出海了。船小浪大，学生们晕船呕吐十分严重，李立三从新加坡寄回的家信中附诗道：

今朝呕尽心头血，添得海涛万丈深，
大陆神州被洗尽，蓬瀛三岛水烟沉。

李立三经巴黎转蒙达尼，进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自此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新的生活使李立三顿觉一切都很新鲜。他写诗道：

我是一个断梗的浮萍，
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
也到过黄浦江头，
也到过潇湘水滨，
也到过幽燕，
也到过洞庭，
今又吹我到西天来了，

呼吸那自由的空气，
瞻仰那自由的女神。
我还要唱那自由之歌，
撞那自由之钟，
唤醒可怜的同胞，
惊起他们的酣梦，
鼓荡雄风，
振作精神，
造一个自由的新世界，
作一个幸福的新国民。

李立三在学校补习了一个时期的法文后，就到了三侠孟的一家工厂做工，边工边读。1920年秋，大批留法勤工俭学生到达了法国，这时，战后法国发生经济恐慌，学生寻找工作十分困难，华法教育会又要断绝对勤工俭学的接济，学生们陷于极大的困境之中。12月31日，李立三、赵世炎、陈公培等二十二人，联名写信给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建议开办工业予备班和引导学生入工厂当徒工，学得技术，以便克服找工作的困难。

1921年1月，蔡和森发表了《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号召勤工俭学生掀起一个争取"生存权"和"读书权"的运动。在蔡和森和其他领导的"工学世界社"的推动下，数百名勤工俭学学生，在2月28日发生了对中国驻法使馆的示威运动，要求中国驻法公使出来接见并答应学生的条件。这一运动遭到了与中国公使勾结的法国警察的镇压。

在"二·二八"示威遭到法国警察镇压后，为使勤工俭学学生迅速团结起来，成立了勤工俭学学会。李立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都是学生会的领导成员。之后，李立三带领一百多学生到华工集中的克鲁校史乃德工厂做工。他在这里深深地体验了工人阶

级的艰苦劳动生活，克鲁校有华工二千多人，李立三和赵世炎首先在华工中建立了“华工俱乐部”，创办了《华工周报》，在华工中宣传马列主义，同工人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1 年秋，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人，以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在国内募得大批捐款，并取得了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筹办了里昂中法大学。但在学校建成后，他们专收国内有钱有势人物的子弟入学，不准勤工俭学的学生入学。李立三和赵世炎便在克鲁校工厂勤工俭学学生中，发表了争回里大的宣言和通告，动员学生团结起来，争回里大的入学权。之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人分头发动组织成了一百二十多人的先锋队，赶在“贵族学生”到来之前，于 9 月 21 日到了里昂，驻进了“里大”。此举亦遭到了法国警察的镇压，没收了这一百多学生的护照，并全部被关到了芒特吕克炮台的军营里。李立三、蔡和森等又领导学生进行了绝食斗争，以示抗议。法国当局和中国公使馆商定，把这些学生押送回国。李立三等闻讯后，彼此一商议，认为国内革命斗争正需要人，被送回也是好事，便决定留下赵世炎，继续做学生的领导工作，余都回去。1921 年底，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陈毅等一百零四人，被法国警察强行押上轮船遣送回国。

一路艰辛，不必多说。这一百零四名学生到达上海后，李立三怀着投身革命的激情，由上海到了湖南。在长沙，他见到了湘区党组织负责人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欢迎李立三回来参加革命。时湘区党组织正按照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决议，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希望李立三到安源去开展工运。李立三欣然应允。

安源地处湘赣边界，1918 年开办的安源煤矿和随后修建的株（州）萍（乡）铁路，是官僚买办企业“汉（汉阳铁厂）冶（大冶铁厂）萍（萍乡煤矿）公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万七千多路矿工人在德、日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压迫下，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悲惨生活，这里工人富于革命传统，是工人

运动能很快开展起来的地方。

毛泽东对李立三说："安源产业很重要，工人集中，受剥削压迫最重，一经发动，很快觉悟。"

李立三很激动地说："我一定把那里工作搞好，不负重托。"

毛泽东说："也不要过急，要想开展好工作，要先找一个合法的职业做掩护，以便公开活动，接近群众。"

李立三听着毛泽东的话，不住的点头。

1921 年的 11 月底，李立三手持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给萍乡县知事的介绍信，以教员身份，来到安源。到了安源后，李立三就着手办平民学校，他与毛泽东介绍的株萍铁路工人李涤生、周镜会等人取得了联系，又通过他们结识了萍乡湖南商会中的一个开明绅士，通过他的疏通，李立三见到了萍乡县知事范子宣。李立三事先得知这位知事是秀才出身，喜爱古文，就用"四六体"写了篇呈文。文中说明办平民学校是为了帮助工人增加知识，发扬德性，请求备案。范子宣见了李立三西装革履，加之文敏笔畅的散文，又是留法归国的学生，当天就批准了李立三办学的要求。知事一高兴，还在呈文上加了几句话，把这呈文做为布告，贴在街头。表示了县衙的支持。

办学合法后，李立三就在安源王福斋巷租了一间房子，作为校舍，挂起了平民小学校的牌子。学校是办起来了，可来上学的人并不多，李立三就挨家挨户的动员，说来说去的，动员了三十多名工人子弟来上学，老百姓见李立三为动员学生，挨家挨户的游说，都笑眯眯地叫他"游学先生"。学校开学后，李立三白天教学，晚上深入到工人区里，继续动员学生入学。经他努力，平民小学很快猛增到五六十人，李立三也同许多工人交成了朋友。1922 年 1 月，李立三又办了安源第一所工人夜校，这时候，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又派了蒋先云和蔡增准两同志来到了安源，帮助李立三工作，他们白天教工人子弟，晚上教工人，李立三讲的课通俗易懂，工人们很爱

听，他说："工人的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子，说明工人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是最先革命的阶级。当他听工人称他为先生时，便在黑板上写了个"牛"字，然后在"牛"下划一横，告诉学员说："这就是先生的'生'子，先生不过是'牛'坐板凳。"这通俗幽默的解释，引得工人们哈哈大笑。

工人们听了李立三讲的课后，回到工棚就向其他工友讲听课的内容，立时又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这样，一传俩，俩传仨的，来上课的人越来越多。李立三就把来听课的路矿工人按程度之高下分为两个组。公开用的是平民学校的课本，实际采用的是"长沙粤汉铁路工人学校的讲义"。后来，李立三干脆自己编教材、刻油印，向工人讲"阶级斗争"、"劳工神圣"、"军阀混战"、"社会主义"等等。总之，他所宣传的都是"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关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决压迫之可能"。李立三还为工人编了一首《工农联盟歌》，配上了旧谱子，教工人们唱：

"我们工人创造人类衣食住，不工作的资产阶级把我们欺。起来！起来！齐心努力巩固我团体。努力奋斗，最后胜利是工农的！"

直到现在，安源的老工人还能唱这首激动人心的战歌。

李立三在对工人教育的基础上，吸收了八名先进觉悟的工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成了安源的第一个团支部。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考验，从中发展朱少连、周镜全等六名党员，建立了安源党支部，李立三任党支部书记。这是江西产业工人中最早的党支部。

这时候，夜校也扩大了，经费多由湖南、上海方面热心工人教育的人募捐的，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也拨款资助。后来，组成了俱乐部，夜校改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经费由工人

俱乐部供给。

安源自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群龙有首，对工人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为了尽快地把铁路、煤矿两局的工人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团体，李立三着手组织安源工人俱乐部，李立三用一支筷子能折断，而一把筷子难以折断的生动比喻，来启发工友，说明团结起来的重大作用。1922 年 3 月 16 日，李立三在工人夜校召集了五名筹备委员，筹备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为筹备会主任。4 月 1 日，李立三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

成立俱乐部，必须经官方批准。李立三又写了呈文，文中把"联络感情，涵养德性，团结互助，共得幸福"写进了俱乐部的宗旨。呈文上送了县衙，由于县知事很欣赏李立三的才华，宗旨也没出格的地方，很快就被批准了。这样，工人俱乐部便合法化了。

4 月 16 日，筹备会召开了第三次会议，经统计，申请人部的工人达三百多，公推李立三为俱乐部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之后，李立三赶到长沙，在毛泽东主持的湘区委员会议上，李立三会报了安源工人俱乐部筹备的经过。毛泽东听了，当即指示，立即成立安源铁路工人俱乐部。

1922 年 5 月 1 日，安源牛角坡的 52 号，装饰的如同过盛大节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大字牌匾挂了起来，里里外外都是人，有来开会的，看热闹的，十分热闹。下午 1 时，成立大会开始，同时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会场四周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标语令人振奋，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劳工神圣！""工人俱乐部万岁！""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等等。大会开始，李立三发表演说，他激动地挥着双臂说道："今天是我们劳动人民的节日，在这喜庆时刻，我郑重地宣布，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了！"接着，李立三从安源工人的苦难生活，讲到团结起来的重要，从工人的眼前利益讲到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还讲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情况。李立三的讲演，激起了几百名听众热烈的欢呼。会后，开始游行，时大雨如

注，工人们情绪依然很高涨，冒雨游行，一路高呼口号。雨稍住，便散发传单，许多围观者亦加入，到了下午6时游行队伍返回时，部员们衣履尽湿，但个个精神焕发。大呼三声“俱乐部万岁！”，始行散去。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影响极大，许多报刊都发表了消息。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党国际的报告中，也提到了“长沙方面，已组织了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

俱乐部成立之后，入部的工人却不多。李立三想到西欧工运的经验，根据党的“二大”附加决议案件的“工人消费合作是工人利益自己的组织，共产党应该注意和活动此种组织”的意见。倡议创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使加入俱乐部的工人都能买到较便宜的生活日用品，由他担任首届总经理。为办好消费合作社，李立三细致地做了筹划，从长沙文化书社等处筹得股本，7日，合作社在牛角坡工人俱乐部的前屋开张营业。合作社除经营油、盐、米、茶及其它日用品外，还兼营银元与铜元的兑换。特别是银元与铜元的兑换业务，是当时工人最为恼怒的事情，工人们每发了工资，用手中的银元兑换成铜元时，那些奸商们便从中盘剥，使工人吃了很大的亏。而消费合作社的兑换，公平合理，这么一来，许多工人看到俱乐部比哥老会、同乡会不知要好多少倍，便纷纷加入。俱乐部的部员立时扩大，很快，入部工人即达七百多。

7月，汉阳铁路工厂罢工胜利的消息传来，给安源工人极大的鼓舞，群情激奋。时李立三等每天分几处讲演，宣传全国各地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并明确宣布俱乐部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俱乐部迅速发展，工人斗争的情绪也日益高涨。8月，李立三又到了长沙，把安源工人组织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认为安源工人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时长沙正举行泥木工人的罢工），李立三便暂留下，协助长沙党组织领导泥木工人罢工运动。

在李立三离开安源不久，安源煤矿矿长李镜澄，见工人俱乐部已威胁到自己，便进行了破坏活动。李镜澄，祖籍山西闻喜，其生于江苏扬州大桥镇。1898年任安源煤矿机矿处长，后升任为矿长，其为人奸诈。李与株萍铁路局局长王学晶等勾结一起，开始对工人俱乐部下毒手。先令手下爪牙放恐吓风，言李立三等俱乐部的领导如不速离开安源，将要对他们下毒手。蒋先云等根本没把这恐吓放到心上。李、王等见此招不灵，又拟重金收买部领导，亦被蒋先云等拒绝。李、王等正无计可施时，适逢萍乡镇守使调换，路矿当局又联名具禀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谓俱乐部为乱党机关，当以力封锁。并向镇守使送了重金，要求用官威，训令俱乐部自行停闭。这一消息传出，激起工人们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起来斗争，以保卫工人的利益，时安源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

就在这重要时刻，毛泽东来到了安源。当即召开了党组织会议。他听取了蒋先云、朱少连的汇报之后，作出了罢工的决定，并派人送信至长沙，要李立三速返安源，领导罢工斗争。毛泽东又对罢工做了许多具体指示。之后，返回了长沙。9月9日，李立三回到了安源，他了解到了路矿当局的恐吓，当即向工人表示：誓死不离安源，坚决与安源工人一起，同路矿当局斗争到底。

为加强即将举行的罢工斗争领导，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劳动组织书记部，又派了刘少奇来到了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大罢工。

9月11日，俱乐部鉴于路矿当局向镇守使和县衙的联名具呈，即向全国发出了快邮代电，揭露路矿当局破坏俱乐部的罪行，发表致萍乡矿长函。向路矿当局发出通告，提出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二百元；七日内偿还积欠工人工资的三项要求，并限当局在十二时内做出满意答复，否则，就举行罢工。

9月12日，路矿两局局长在机务处设宴面会李立三，作了使李立三极不满意的答复。适有火车将开赴萍乡，工人疑路矿两局阴

谋挟李立三到萍乡去，一声呼喊，立即有数千工人将机务处围住，由众寻出李立三，送回了俱乐部。路矿两局长见状，都慌了手脚。

当晚，李立三秘密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讨论了罢工的具体问题，决定成立罢工指挥部，由李立三为罢工总指挥。时资方已明里暗里多次扬言要对李立三等领导人下毒手，总指挥部决定设立保卫组，负责李立三等领导人安全。并要他尽量不露面，另选派一人为全权代表。在选人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立三提议由刘少奇担任，混进工人队伍里的"小鲨鱼"余江涛等人，看到这是个出头露面、捞取资本的好机会，便对李立三的提议极力反对，说刘少奇不了解安源的情况，是知识分子，代表不了工人，等等。李立三毫不退让，坚决地说："刘少奇是党派来的人，罢工是党领导的，应该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再有，刘少奇到过俄国学习，又领导过粤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一定能胜任。"

在李立三的力争之下，刘少奇为全权代表，总指挥李立三秘密策应。这时，毛泽东又写来了信，指出了"哀兵必胜"，要使罢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立三和刘少奇等研究，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

时工人中加入帮会组织的人很多，为避免这些人捣乱，9 月 13 日，李立三提着一只公鸡和两瓶酒，会见了当地红帮头子于大脑袋。于大脑袋此时也深知俱乐部主任的厉害，乐意结交。李立三说明来意后，于大脑袋拍着胸脯说："李主任请放心，一定帮忙。"

当下，两人喝了雄鸡血酒。李立三提出要在工人罢工期间，一关闭鸦片馆，二收拢赌摊，三不发生抢劫案。于大脑袋拍着胸膛保证说："李主任，第一点我包了，第二点我包了，第三点我包了！"

李立三鼓掌道："痛快，我李立三就喜欢结交这样的人。"

9 月 13 日，路矿两局对俱乐部提出的要求仍没有作出圆满的答复，时工人皆怒不可遏，已无心做工，人人相遇，即聚谈罢工。李立三、刘少奇见时机已成熟，断然将罢工命令发出，定为 1922 年 9

月13日午夜12时。

13日午夜12时，铁路工人停了火车，鸣放汽笛，煤矿工人砍断电线，发出罢工信号，倾刻，工人们像潮水一样，从矿井、工棚、机房等处冲了出来。震动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了。

罢工开始后，李立三即由工人秘密护送到三合桥的一个工人家中，躲藏起来，暗中策应。

大罢工爆发后，路矿两局和官方当局，惊恐万状，赣镇守使肖安国即派旅长李鸿程带了军队到安源，意欲镇压。军队士兵见工人愤怒异常，未敢乱动。李立三、刘少奇亲到现场，说服士兵，唤起士兵的同情。经工作，士兵皆不上前。时有报纸云：

> 军队见工人举动极文明，亦表同情，所以此次未有流血发生。

矿上反动工头们见军队不出力，又出一计。出高价收买一些他们的"亲朋好友"，入窿破坏罢工。因工人监察严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这时，煤矿总监工王鸿卿见诸招不灵，即密遣暗探，许其如刺得李立三，给大洋六百元。工人闻讯大愤，宣言李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当局全体死在安源。一方面不许李立三外出，严加警卫，如李立三外出偶有接洽，不出二十分钟，即有数百人围其所入之房屋，不许人出人。

路矿两局头头为瓦解工人意志，又思一计，买通当时官方报纸，登了一则消息，言李立三为罢工事至长沙，为湘省督军赵恒惕部所擒，腰斩于长沙市小北门外。

这一招果然有用，报纸到了安源，立时在罢工工人内引起了震惊，恰好当时李立三秘密躲起，许多人都找不到他，更对报上所言，信以为真，一时间人心混乱，李立三得知此情，当即露面，安定了工

人之心，揭破了路矿当局这一阴谋。

但是，这张报纸的消息却不径而走，漂洋过海，到了法国，传到了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耳内。大家对报纸上这些消息很相信，因为都知道国内的斗争很复杂。于是，旅欧党团员和勤工俭学的学生集合在巴黎郊外的戈隆勃、卡纳莱、浦安特衙三十九号的华侨协社内，由周恩来主持、为李立三举行了追悼会，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第三期上，还登载了一篇用黑框圈起的报道文章，题为《一个悲壮的报告》，文章后而，发表了一篇评论。谓："这个事实本是从间接方面传来的，确否尚未可知。不过，我们深知此举出自勇敢有为的朋友李隆郅，乃在意中，故我们郑重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个哀耗。"

安源大罢工坚持到最后时刻，路矿当局终于妥协了。煤矿矿长李寿铨在1922年9月17日记载：

> 李能至云：条件无可让步，允则开工，不允则离开安源，听凭工人所为等语，即是听其暴动……事急如此，恐有暴动，千数百万之产业、即不能保，我何以对公司？惟有始订条件，开工以息其风，容图一善后之策。一面报告公司，请董事会派员来矿妥筹办法，舌烂唇焦，始克定仪，派代表与李能至订条约。

18日晨，三方代表在路局机务处签订了正式条约十三条，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18日下午，工人俱乐部在大操场召开了庆祝大会，到会工友达一万余人。据朱少连在1923年8月10日撰写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载：

> 下午2时，数百名工友手持小旗拥着李能至来了。李

到场时，掌声雷动，万余人执帽呼跃以欢迎之。李能至登台演说，宣布条件毕道："我们这一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因为我们工友痛苦很多，一次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现在虽说胜利了，但所得的幸福究竟不多，所以这次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留着以后再来解决，终究我们是最后胜利的，望各位且安心上工，保持着今日热度去上工。"讲演毕，共呼"劳工万岁"者三。随即数十人燃爆竹，李主任前导，群众后随，旗帜蔽天，爆竹震地，由安源新街旧街大游行一次，返至俱乐部摄影而散。

大罢工至此胜利结束。

第二章　从右到“左”
——中共两“舵手”

1927年，正当国共两党北伐之际，蒋介石于“四·一二”在上海举刀屠杀中共党员。面对蒋氏屠刀，中共领袖陈独秀一再容忍妥协，不准对国民党使用武力。结果，到了7月，武汉汪精卫政府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协手，宁汉复合流。7月15日，汪精卫于武汉分共。至此，中共到了极其危急的地步。而中共首脑陈独秀，面对险恶局势，却不知所措，秘密躲在了武昌一偏僻的工人住室内，不再参与中共的活动。

7月17日，也就是汪精卫分共的第三天，在武昌城中蛇山脚下啸楼巷内的一间房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四名常委李立三、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四人又在会上作了分工，由李立三火速赴庐山，向正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报告起义事宜，张国焘、周恩来留在武汉，继续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在中共紧急关头，鲍罗廷和瞿秋白怎么上了庐山呢?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 不知道是初几，老鲍(指鲍罗廷——引者注)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常委。自此独秀不视事。

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又躲起“不视事”。自此，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就这样不光彩地下台了。

中共中央临时常委，是于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所产生的。其中张国焘、李维汉是中共“五大”时当选的，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是新增的。

7月12日，鲍罗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宣布了新组成的中常委后，即在瞿秋白陪同下上了庐山。

鲍罗廷，1884年生于沙皇俄国。学生时代就参加了犹太人的社会党。1903年，他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此，专门在加里活动。1905年12月，他参加了塔墨尔福斯党的会议，自此接近布尔什维克。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后，他移居波士顿，接着去了芝加哥。在那里，他参加了美国社会党。回到俄国之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为俄国共产党(布)工作。共产国际组成，鲍罗廷化名“布兰特温”，成为它的派往美国的第一个密使。1920年2月他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此后，经柏林返回莫斯科，继续工作于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1921年，鲍罗廷是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1922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时，他是英国委员会委员。3月，再次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此后，他化名乔治・布朗，作为密使派往英国。1923年8月，他在格斯哥被捕，并判处六个月苦工。1923年9月，他既是共

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密使，又是派驻孙中山身边的苏联代表。自此，鲍罗廷在中共同国民党联盟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鲍罗廷为何同瞿秋白上庐山呢？

自国共两党分道扬镳之后，蒋介石宣布开除鲍的顾问职务并下令通辑他。鲍打算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国民党人，组成国民党新的左派，对付摇摆不定的汪派。没想到汪精卫突然靠向南京，邓演达一气之下离开武汉，陈独秀闭门不出，而汪精卫也解除了他的顾问合同，并要缉捕他。鲍见孙中山三大政策已成泡影，中共也到了极其危难地步，而更使他痛心的，是共产国际把中共的失败，蒋、汪的叛变革命，都归罪于他的领导无能。他本想回国，可他妻子范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他不愿孤身而回。正当他万分焦急之际，7 月 12 日，他从苏联驻华使馆的电报中，得知范娅被释放，这才使他的心情略平静些。之后，他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冷静一下头脑，思考一下中共的失败的原因，于是，选中了庐山。他便带着瞿秋白，一起上了庐山。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1899 年 1 月 29 日出生常州城东南角一小巷——青果巷八桂堂瞿家。其初名“懋淼”，乳名“阿双”，五岁入学时名瞿双，后自改为“爽”“霜”，更后改为“秋白”，秋白意为秋天之霜，像秋天霜后，草木凋零，田野即一片白。秋白五岁入塾学，一年后转入冠英小学。毕业后入常州府中学堂预科。其成绩优秀。然因家境贫寒，两年后缀学。后辗转至北京，于民国六年(1917 年)考入不收学费和膳费的俄文专修馆。“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和郑振铎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宣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就在此时，他参加了李大钊等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 年初，瞿秋白以《晨报》特邀记者身份，抵苏俄考察。他不仅考察了苏俄社会生活，并出席了共产国际会议，见过列宁。次年，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以记者身份，抵苏俄考察。他不仅考察了苏俄社会生活，并出席了共产国际会议，见过列宁。次年，经张太雷介

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瞿秋白很快成为中共的一支笔，他写了《赤都心史》等大量反映苏联人民生活的著作和报道。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23年6月，他参加了中共“三大”，主持起草了党纲，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负责中央宣传工作。同年12月，瞿受中共组织委派，到广州参与帮助孙中山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并担任《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1925年，在中共的“四大”上，瞿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在苏联呆了三年，不仅对苏联了解，也与共产国际关系不错。在国共两党分道扬镳之际，瞿反对陈独秀的立场非常坚定。由于当选的中共领袖，在当时首先要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所以鲍罗廷挑来选去，认为瞿秋白最合适，所以要瞿秋白同自己一起上庐山。

鲍、瞿上了庐山后，在庐山讨论了中国革命的问题。时鲍罗廷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但这个责任问题要有个交待，中共的失败，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如果这样，对莫斯科的威信影响太大。责任要谁负呢？鲍罗廷认为应由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要挺身负起这个责任。

瞿秋白自然同意鲍的意见。

7月21日，鲍、瞿又密秘回到武汉，当天，鲍便宣布：瞿秋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当时，中共中央计有六名常委，鲍虽然没有确定以谁为“龙头”，而事实上，瞿从庐山回到武汉，就成为了中共的第二任领袖。

7月23日，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新代表罗明那兹秘密抵武汉。7月27日，原先的共产国际三位代表奉调回去。结果，这三个人回去后都遭了厄运。斯大林拒绝见鲍罗廷，后又将其逮捕，1951年5月29日，他惨死在其流放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时年六十七岁；罗易是印度人，共产国际将其开除，后遣返回国，1954

年 1 月 25 日病逝；维经斯基也于 1953 年病逝莫斯科。

新任的共产国际代表一到武汉，即同瞿秋白、张国焘长谈。罗明那兹时年二十九岁，细高挑个儿，高鼻子，蓝眼睛，远远一看，象根细黄瓜。他还有两个助手，一个是个俄国女人，叫洛蜀莫娃。另一个是个 25 岁的小伙子，德国人，名叫纽曼，是德国共产党员，为德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因其曾领导过德国的暴动，故有“暴动专家”之称。

罗明那兹于 1898 年出生于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1917 年加入俄共(布)，1926 年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其来武汉，是来执行共产国际在中共全权代表的使命的。

罗明那兹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尼古拉”，在文件中用他的名字英文开头字母“N”作为他的代称。罗明那兹是个少壮派，根本没把瞿秋白放在眼内。他对瞿秋白说：“我现在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全权代表，奉命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还有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上所犯的错误。同时，来指导中共的工作。”罗明那兹滔滔不绝地说：“由于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国际的指示，现在，共产国际决定要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再任书记，甚至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如果你们两人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罗明那兹又说：“中共中央的主要错误，是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义的理解。”

罗明那兹的话，瞿秋白听得很不入耳，暗道：“这罗明那兹哪里像个共产国际的代表？简单是沙俄时代的钦差大臣。下车伊始，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就夸夸其谈。”因为是国际代表，又初次见面，瞿秋白也没和他争辩，而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南昌暴动——时中共已决定发动南昌暴动，却已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只差一声令下。瞿秋白说：“当前有一个紧急的情况，需要我们立即讨论，不久前，新的中央作出决定，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目前，暴动正按计划进行准备，我们很需要苏联方面对暴动给予支持。”

瞿秋白一说完，罗明那兹的脸就拉长了，他那淡蓝色的眼珠儿滴溜溜地转着说："这是大事，要请示莫斯科后才能决定。"

张国焘认为罗明那兹听到暴动二字，一定高兴的眉飞色舞，见瞿秋白还没把话说完，罗的脸就拉长了，没敢再开口。这时候，瞿秋白见罗明那兹不支持起义，急了，说："罗代表，事情已迫在眉睫，不能再拖了。"

罗明那兹用质问的语气说："为什么一定要举行暴动？我今早会见张发奎的顾问加仑将军。据他讲，他前天曾同张发奎讨论过军事的问题，张将军同意加仑将军的意见，将他的部队集结在南浔线上，不再东进，向南转移，回到广东。"罗明那兹又说："加仑将军认为，张发奎如果同意回师广东，而且不强迫叶挺等人退出共产党，我们就可以同张发奎一起回师广东。这样做，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果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在优势敌军阻击下，恐难取胜。"

罗明那兹说完之后，张国焘没有开口，瞿秋白却急了。他不由得站了起来，说道："我们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张发奎身上，从目前种种迹象看，张发奎和汪精卫已形影不离，张汪协谋已成定局，并在庐山开了诱编叶、贺的黑会。并指示人炸毁涂家埠铁路大桥，妄图阻叶、贺两部南下，所以说，南昌起义，势在必行。"

瞿秋白这么一讲，罗明那兹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这么办吧，我请示一下共产国际。"

当下，罗明那兹给共产国际发了电报，很快，共产国际回了电，电报写道："南昌起义，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必举行。"

共产国际这封电报，实在是个瞎子算命两头堵的电报，就是说：起义如果胜利了，是执行了电报指示；失败了，是没有执行电报指示。说穿了，共产国际在南昌暴动的态度上，是狗皮袜子——里外有里（理）。

既然共产国际有电报指示，就得讨论如何执行。当下，瞿秋白立即组织召开了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罗迈（即

李维汉——作者注)、张太雷、张国焘都参加了。罗明那兹和他的两个助手洛蜀莫娃、纽曼也参加了。会上讨论了共产国际的电报，瞿秋白、罗迈、张太雷态度十分明确，坚决地主张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瞿秋白说："共产国际在电报里用了'毫无'二字，目前看，南昌暴动，不是毫无把报，而是成功的把握很大。"

张国焘没有发言，而是在一旁默默地吸烟。罗明那兹见他不开口，问道："国焘，你的意见呢？"

张国焘看了看罗明那兹，又慢慢地吸了口烟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这时候，那个"暴动专家"纽曼大讲了一番暴动的理论，众人只好耐着性子听下去。纽曼讲完了，罗明那兹指着纽曼说："他来中国，就是指导中国今后的暴动的。"

瞿秋白见众人都同意南昌暴动，说："要迅速派人到南昌，向南昌的同志们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谁去好呢？"

罗明那兹看了看张国焘，说："是不是由国焘同志去传达？"

张国焘听了，没有表示同意与否，罗明那兹又问了一句："国焘同志，可以吗？"

张国焘实在不愿去，便迟疑了一下说："武汉要处理的事情还很多，是不是派王若飞去。"

罗明那兹说："王若飞是什么人？"

瞿秋白说："王若飞是中央秘书处的秘书长。"

罗明那兹摆摆手："不要换人了，即使王若飞能干，可他还要了解我们会议的精神，要完成这样的使命，仓促之间，很难办到。"

张国焘见罗明那兹一定要他去，便说："好吧，我就动身了。"

当天，张国焘便乘船直奔九江。

1927年8月1日，中共于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接着，暴动队伍南下直奔广东潮汕。

8月7日，中共"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由于参加会议的

代表不齐，中共六常委中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三人在前线，留在武汉的瞿秋白、罗迈、张太雷参加。因此，这会议无法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而，称作“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罗迈、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此外还有湖南、湖北代表，军委代表、共青团代表陆定一、彭公达、邓小平、王一飞等，罗明那兹、纽曼、洛蜀莫娃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罗迈主持。由于环境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中心议题有三项。一是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与议定告全党党员书；二是临时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报告与讨论通过会议决议案；三是改组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罗明那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邓中夏、蔡和森、毛泽东、罗亦农、任弼时等人都先后在会上发了言。纷纷批判揭发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政权问题、武装问题上的错误。罗明那兹的报告，经过大会的讨论，后稍作修改，即以《中央“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发出。

陈独秀右倾路线对中共的统治于此结束。

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九人，为：向忠发、顾顺章、王荷波、彭湃、瞿秋白、苏兆征、罗迈、任弼时、罗亦农；候补委员计七人，为：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邓中夏、毛泽东、张国焘、彭公达。

8 月 9 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会上，选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常委。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兼任党报总编辑，罗迈兼管组织部、秘书厅，苏兆征兼管工委，周恩来负责军事部。

8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组织人选及任务。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组成，以张国焘为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由蔡和森、王荷波、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组成。王荷波为书记。

这次会议，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蔡和森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瞿秋白就此作了说明，他说："陈独秀，还有谭平山是机会主义者，应受到严肃的处理，谭平山可能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党籍可以保留，党内职务一律撤销，张国焘同志曾袒护过机会主义，反对过共产主义。湖北总工会的领导错误，应由李立三负责，解散工人纠察队，应由周恩来负责，中央的许多文件，是蔡和森经办的，有机会主义错误。农民协会方面的不少荒谬的训令，是毛泽东经办的，他要负责。所以，张国焘等同志离开政治局。"

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武汉陆续迁往上海。

罗明那兹一面批评中共路线上的右倾，一面极力主张搞暴动——这在他来华时便已有此打算，他带来的德国"暴动专家"就足以说明他的立场。瞿秋白对罗明那兹的主张唯命是从。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是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召开的。自此，瞿秋白的"左"倾路线在中共全党全面推开。会上作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内称：

> 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于是，瞿秋白这位中共的“舵手”，把中共这条航船一下由右拨向了“左”。全党的中心集中到了“暴动”上。暴动成了革命与不革命、反革命的分界岭。中共由右突然至“左”，有主观亦有客观原因，李维汉后来回忆道：

“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党内‘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

除了这种‘左’倾情绪外，还有一个认识问题，即所谓‘左’比右好，‘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当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舆论，而‘左’倾情绪和‘左’倾认识(理智)结合起来，就成为盲动主义发展动力。……于是，盲动主义代替了投降主义。”

中共历史证明，矫枉极易过正。

暴动成为盲动。也为中共以后接二连三的盲动主义的错误种下了根苗。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对谭平山等人作出开除党籍、除名、罢免的处分。其政治纲纪整饬案称：

一、谭平山任国府农业部长，脱离党而自由行动，联络邓演达组织第三党，反对中共中央，未得中央许可。向汪精卫请假，与汪代表陈慕圃谈话时攻击本党政策。党派其赴俄，不遵守命令而赴九江、南昌，宣传第三党，对于清算土豪及没收土地政策尤为反对，应予开除党籍。

二、张国焘受中常会之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违反中央政

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影响，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要均予除名。

三、此次前敌委员会犯了重大错误，所有委员一律予以警告。……南方局广东省委指导农民暴动的错误，在于不了解标语，不发动群众，只知道用军事行动，应全体予以警告。湖南省委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取消现任省委资格，彭公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资格取消，并予以半年之监视，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之后，奉派至湖南改组党部及指导秋收暴动。事实上他就是湖南省党委的中心，所以湖南省党的错误，毛泽东应负重大责任，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予以罢免。

四、鄂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全体予以警告。陆沉时任特别委员会的书记，而其主张行动均出自军事投机的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的工作，应取消其中央委员的资格。

五、鄂南行动委员会傅同志应予半年的监视。

六、王若飞指导错误，应予警告。

七、杨鲍安取销中央监察委员会资格。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使中共的暴动成了家常饭，任何行为离开了暴动，就好像是机会主义。其暴动政策也走到了"儿戏暴动"、"强迫暴动"、"命令暴动"的道路上。结果，暴动不仅不能推翻敌人，反而把自己的地下力量暴露，实在是一种"自杀行为"。

盲目暴动在城市的损失更大。时中共中央常常令几个或十几个同志，在某家工厂或散工的时候，混在工人中，突然喊几句武装暴动的口号，结果暴露了身份，遭敌人逮捕而被杀害。

农村中暴动要好一些，一些组织农村暴动的领导人，凭着自己的才干，在国民党势力较弱的地方举行了暴动，取得成功，因而保

存了一些实力，后来散布在各边远地区的苏维埃区域，就是以这些保留下来的实力为基础的。

时瞿秋白认为在陈独秀任总书记间的重要领导干部，都有着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遗毒，这种机会主义遗毒，应当在暴动中清洗，因而，使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在冒险的行动中丧生。

与项英、刘少奇齐名的、曾任过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等职的许白昊，瞿秋白认为他机会主义思想严重，指派他去干下层的艰苦工作，说是能洗涤他过去的机会主义作风。不久，许在一次有十几个工人的街头集会中被捕，不久被杀害。

12月11日，中共发动的广州暴动，是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个最重要的表演。当广州暴动胜利的时候，瞿秋白欢喜的几乎跳起来，结果，不到三天，暴动失败，中共广东共委书记、暴动总指挥张太雷阵亡。其余暴动者，仅有少数逃出城外，余皆阵亡。

广州暴动的惨败使中共内部震动。尽管瞿秋白一再称广州暴动是布尔什维克的壮举，但许多人都认为广州暴动是机会主义的冒险行为。

李立三随即派往广州，接替了张太雷的职务。

武汉暴动、长沙暴动、上海暴动、北方顺直暴动以及其他各地的大小暴动，都遭到了惨败。

暴动的一次次惨败，使中共的力量遭到巨大损失。瞿秋白这位中共的第二位“舵手”也因此威信扫地，陷入困境。

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中共造成了新的混乱，引起了中共内部许多人的批评和抵制。到了1928年初，各地的暴动都相继停止。同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中共的“左”倾错误。否定了罗明那兹对于中国革命的“左”的主张。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均批评了罗明那兹的极“左”主张。

罗明那兹很快奉调回国，不久，即被调离共产国际，前往高加索。1930年12月，又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1934年，罗经不住打击，自杀身亡。其自杀后，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党。

4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周恩来及邓中夏、项英等，在上海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中，讨论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共产国际的决议案，明确地反对中共的盲目暴动。

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即“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内称：

>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国际执委二月会议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后，接受这一决议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间，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决议案必要的具体步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过去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之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国际的决议亦就是指导我们努力继续战胜这些盲动主义以及青年团之先锋主义倾向，在艰苦斗争之中锻炼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彻底肃清机会主义的流毒。

会议之后，瞿秋白即动身赴莫斯科。5月1日，周恩来、邓颖超离沪赴俄，接着，众多的中共领导人都赴俄，参加中共“六大”。罗迈、任弼时、罗登贤留在国内主持工作。

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德镇银光别墅中召开。

大会按照斯大林的调子，重点批判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瞿秋白亦于会上作了深刻检查。大会议决案中称：

> 十一月扩大会议在议决案上，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不正确地采用了“不断革命”的名词，于是就解释革命是不断高涨着，由此就得到不正确的策略。同时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武装起义策略观念很久是模糊的，于是有不正确的估量和策略，以及过于忽视敌人力量的观念，——这些都可以成为盲动倾向底根据，因此，没有严厉地防止当时党内已经发现的盲动主义的倾向（这种极左派的倾向正是有害的）。

大会取消了瞿秋白的中共“舵手”地位，但仍保留其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由于两名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舵手”把握的航向出了偏差，使中共这条航船先右后“左”，因而，共产国际决定中共第三位“舵手”，应由工人成分的人担当。于是，选中了向忠发。

第三章　中共的第三位“舵手”主政之际

向忠发其人

共产国际何以选中向忠发？

向忠发，1880年出生于湖北汉川。其青年时期在汉阳兵工厂当学徒。后当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曾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1926年后，历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个偶然的机遇，向忠发被推到中共“舵手”地位。

那是“八七”会议结束不久，共产国际电示中共，称苏联的十月

革命纪念日将至，此系十年大庆，非比寻常，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派团朝贺，中共亦当派团前往。

对于莫斯科的电文，瞿秋白等不敢怠慢，遂组成了一个“中国工农代表团”前往朝贺。既然是工农代表团，自然要工农出身的人带队，这样，便选中了向忠发，又派李震瀛为向的副手。李震瀛，又名李宝森，天津人，1921 年加入中共。一直从事工人运动，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也是“八七”会议的与会者之一。

向忠发和李震瀛于 1927 年 10 月来到了莫斯科，向时年四十七岁，一副老工人模样。这时共产国际正打算在中共中物色一名工人出身的领袖，向忠发的出现，使共产国际找到了理想的对象。于是，当向忠发和李震瀛参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后，共产国际就又派他们到德国和比利时，出席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扩大会议。向忠发不仅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还参加了组建在“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领导下的“反对中国白色委员会”。1928 年 2 月 9 日至 25 日，向、李又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接见了向忠发和李震瀛，听取了向、李关于中国革命的汇报，接着，又以联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这个决议案，就是前文述过的那个否定瞿秋白、罗明那兹暴动再暴动的决议案。

由于向忠发得到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接见，又得到共产国际的高看，顿时身价倍增。于是，在中共“六大”会上，当选为中共的第三位“舵手”。

对于中共的屡次失误，共产国际自身也进行了反省，最后，认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还是不派代表为好，因为派了鲍罗廷，使中共犯了右倾错误，派了罗明那兹，又使中共犯了“左”倾错误，便决定不派代表，而是要中共派两名代表于莫斯科，经过这两名代表指导中共的工作。布哈林对此指出：

> 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不是个个都经过考试的，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派代表比派那些犯错误的代表好些。

这样，张国焘、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邓中夏、余飞、陆定一、王若飞也以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的身份，留驻莫斯科，中共的这些代表，组成了中共代表团。

共产国际声称不再往中共派驻代表，事实上没有做到，而且事隔不久，即又派了米夫前往，此为后话。

向忠发担任了中共"舵手"，而实权却落在了李立三手中，并导致了中共继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之后更加"左"倾的路线，向忠发的大权缘何旁落的呢?而当时的李立三即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政治局委员，而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说来其中也有戏剧性。

中共"六大"之后，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一起先后回国，周恩来、项英、苏兆征因事留在了莫斯科。

前文说过，向忠发是个已年近五十的老工人，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差，本不适宜担此重职，完全是共产国际捧上去的。因而，只能是聋子耳朵——摆设。这样，中共的实权开始落在了蔡和森手中。

蔡和森，1895 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学名蔡林彬，"蔡林"是双姓，缘为蔡和森的九世祖姓林，福建莆田人。在康熙十年过继与蔡姓舅父为子后，迁居永丰，改姓氏蔡林，后简姓蔡。蔡和森 1913 年秋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改名蔡林彬。和森为其笔名，但后来人皆呼其笔名而不用其学名。1918 年蔡和森与毛泽东建立新民学

会，创办《湘江评论》。"五四"运动后率领一批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组织工学互助社，因其在留法间曾依靠一本字典的帮助，勤奋钻研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得到了"小马克思"的誉称。1921年，其在法国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驱逐回国。年底于上海加入中共，中共"二大"至"六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后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1925年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同年冬，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委第六次扩大会议。1927年回国，中共"五大"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蔡氏具备领袖之才，不料他时运不济，回国后不到半月，即被顺直省委的一些问题所牵扯。接着，他的旧病复发，只得离开中央养病，此后不久，他又被指责为右倾而被撤销了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宣传部长职，后来，到了1929年1月，他奉调至莫斯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如此一来，中共的实权就落在了已被开过三次追悼会的李立三身上。

开过三次追悼会的人掌了中共实权

李立三缘何开过三次追悼会？

前文述过，李立三在组织安源工人大罢工时，路矿两局头头为瓦解工人意志，买通了当时的官方报纸，登了一则消息，言李立三为罢工事至长沙，为湘省督军赵恒惕部所擒，腰斩于长沙市北小门外。此消息传到法国，旅欧的党团员们即在巴黎郊外的戈隆勃·卡纳莱·浦安特街三十九号的华侨协社内，为李立三举行了追悼会，此为第一次。

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李立三是总指挥，"五卅"运动遭

到了上海买办阶级头子虞洽卿的破坏后，帝 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便撒开逮捕李立三的阴谋网，8 月的一天，李立三正在上海总工会办公，一个被开除会籍的工贼带着一群流氓打手，冲进了总工会，李立三从楼顶跳到了邻家屋脊，躲到一位老大娘家，在这位老人家掩护下才脱离危险，之后，李立三由上海到了武汉。当时武汉的吴佩孚政权为谋杀他，雇用了江湖上飞檐走壁的刺客刺杀他。这刺客见李立三日夜与穷苦劳工谈话，知他是个正义好人，为他的行为所感，便将吴佩孚要自己刺杀他的阴谋相告，使李立三得以迅速转移。那刺客也极聪明，为骗吴佩孚，编了一个李立三被刺死的谎话。吴信以为真，第二天便在报上登出消息。报上这么一登，工人们听说李立三遇难了，无不悲痛万分，纷纷举行追悼会，悼念这位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是李立三第二次被追悼。

第三次追悼会是在南昌起义的途中。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暴动之后，李立三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任政治保卫处长、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政治保卫处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派，负责筹款和运输等。保卫处里设两个科，有一个连的兵力。直属起义军总指挥部。

起义军南下之后，时值 8 月天气，南方 8 月，天气异常炎热，酷暑难当，起义军每人要背步枪、子弹、背包、军毯、水壶、饭匣、洋镐、铁锹等武器和用品，计有六十多斤，且每天要走百十里山路。而那山路崎岖，十分难行。这条行军路线的沿途，大革命的风浪尚未波及，加之反对派的宣传，百姓们早已望风而逃。使得起义军找不到民夫，机关枪大炮都由士兵自己来扛，食物和饮料也买不到。由于喝田沟里的水，士兵们得病的极多。行军到瑞金壬田寺时，突与敌军三个团遭遇，当即一场激战。激战三个小时，始将敌军消灭，义军亦伤亡六百余人。

壬田寺一战后，起义军又在会昌与敌钱大钧部一场激战，击溃钱大钧部。起义军在瑞金城中休息了数天，改变了原定的从寻邬下

广东梅县的计划，转道长汀、上杭，直奔广东的潮汕。

起义军入闽之后，分路行进，第1路是叶挺、贺龙主力；第2路为谭平山率领的革命委员会机关；第三路由李立三指挥上千名大脚妇女和青壮年男子抬担架运伤病员；第4路由周士第率全部人马做后卫。数天之后，起义军浩浩荡荡地开到了长汀。

这一天，周恩来处理完事务，正与刘伯承、叶挺、贺龙等将领商谈南下的军事计划。突然，张国焘推门而进。周恩来抬头一瞅，见张国焘脸上显出了很悲痛的表情，不由得惊问道："国焘，出了什么事了？"

张国焘难过地说："李立三牺牲了。"

周恩来又追问了一句："谁见到了？"

张国焘说："他的贴身勤务兵，刚才赶到汀州，亲口对我讲的。"

周恩来立即对门外的一个勤务兵说："把李立三的勤务兵找来。"

工夫不大，李立三的勤务兵来了，这是个二十左右的小伙子，长得虎头虎脑。很机灵，名叫于柱儿。周恩来平心静气地问他："小于，你们李处长怎么了？"

于柱儿眼含热泪说："我们李处长被人打死了。"

周恩来问："是你亲眼所见吗？"

于柱儿说："是我亲眼看到的。"

于柱儿擦了下眼泪，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经过是这样：李立三不是保卫着伤病员行军吗？从瑞金到汀州，全是山路，而且沿途人烟稀少，到处是野草荒坡。这伤病员队伍，行动起来，格外的缓慢，一天也行不了四五十里路。

李立三是保卫处长，既要负责行军事宜，又要负责转移中伤病员的安全。行军第四天，赶到一个叫黄蜂岭的地方，李立三接到报告，说有一个重伤员要牺牲了，想见见他。李立三急忙赶到这个重伤员身边，一看，这个伤员他认识，名叫王长发，原是武汉汉阳兵工

厂的工人，起义时是个连长，作战非常勇敢。李立三握着王长发的手，眼看这位勇敢的战友将要离去，他心里十分难过。过了一刻，王长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微微睁开了眼，嘴唇动了动。李立三连忙伏在他耳边，难过地问："长发同志，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王长发声音十分微弱，他用力颤动着双唇，李立三隐约听到他说："采些野果带着……伤员们吃……"

李立三明白了，因为喝田沟水，伤员们生病的太多，山里行军，有时连水也喝不上，采野果能救急啊！他流着泪，感激地朝王长发点了点头。王长发已经说不出话了，他轻轻晃了晃头，就慢慢合上双眼，李立三和同志们一起，将烈士的遗体抬到了路边的一个小树林里掩埋。安排好这一切，李立三和小于便追赶前头部队去了。

他俩走到一个山嘴的时候，李立三看到山坡树丛中，露出了一串串红红的山果子，王长发的话仿佛又在耳畔响起，他便停住了脚步，招呼小于说："咱们采点山果子带着吧。"

小于拉住他，要自己去。

李立三说："你脚上满是泡，坐路边等我，歇下吧。"说着就向山坡上的树丛中走去。

小于坐在路边，等了一会儿，不见李立三回来。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李立三的影子，他有些着急了，刚要起身去找，忽然听到李立三去的那个方向响起了枪声，小于知道有了情况，他急了，三脚两步地朝那个山坡跑去。刚走几步，突然惊住了，原来，他看见李立三倒在了山坡上。小于一边喊着，不顾一切地奔去，可是，当他到了那里一瞅，只见那红红的野果，散乱地撒在地上，地上还有一摊血迹，再一看，人不见了。这时候，掩埋烈士的那些勤务兵也都赶到了，大家听说李立三出了事，都很焦急，便顺着血迹寻找。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悬崖绝壁，没了路，再往下一看，只见从悬崖壁上生长出一棵树来，那树上挂着一具尸体。几个人站在悬崖顶上，看了半天，由于那树距岩顶二十多米，只能模糊糊地看出是个人。有心把

尸体拉上来吧，这悬崖又如刀切的一般，根本无法下去。大家望了一会儿，越看越难过，特别是小于，哭得更是伤心，老觉得自己没有起到保卫李立三处长的责任。既然李立三已死，这几个人就只好奔向汀州。

小于把情况讲完，周恩来紧皱眉头问道："小于，这么说，李处长是什么人杀害的，还不知道。"

小于点了下头说："没看见。"

贺龙说："不用问了，八成是遇到土匪民团，或是敌人的散兵游勇。"

贺龙讲完，大家都不说话了。好一会儿，周恩来用沉重的语气说："我们党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啊。"他叹息了一声，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开个追悼会吧，你来准备一下会场。"

张国焘感慨地说："立三拣了多少条命呀，那么多险情都一个个过去了，没想到竟这么窝窝囊囊地死掉了。"

这一天，追悼会在长汀城中正德中学操场举行，除悼念李立三之外，还悼念南昌起义以来牺牲病故的同志。由于一时也找不到李立三等受悼者的照片，便在围着黑纱的镜框里写上了英雄们的名字，李立三的名字居于正中。会场摆着许多花圈，都是党政军各界送的。那花圈有的写"英名垂千古，丹心照汗青"；有的写"忧国身先殉，游仙梦不回"；有的写"人间未遂青云志，天上先成白玉楼"。周恩来送的花圈写道："死者瞑目戍边尚多英雄汉，烈士安息革命自有后来人"。汀州城中各界父老也送了挽联，那挽联写道："秉赤心照日月道范当年传梓里，驾青云骑白鹤灵魂此日赴蓬山"。

追悼会开始后，大家想起烈士们的感人之处，无不纷纷落泪。正当大家悲痛之中，不知谁惊喊了一声："李处长回来了！"

大家一瞅，果然是李立三走进追悼会会场。只见他又黑又瘦，身后还带了十几个人，这些人都是老百姓打扮。周恩来一看李立三，激动地迎了上去，抱住他的双肩，高兴地说道："立三，以为你牺

牲了，正为你开追悼会呢！”

李立三哈哈大笑道：“我到阎王爷那儿报了个到，阎王爷说南昌起义正需要你，你要立即赶回，我就又回来啦。”

当下，贺龙、刘伯承等人都围了过来，向他问长问短，问他是怎样的遇了险。李立三笑着说出了一段故事。

原来，李立三正在摘采野果子之时，忽然从树林丛中窜出个人来，一下将他拦腰抱住，李立三自小学过武术，就势一背，将那人摔倒在地，接着，掏出手枪就朝那人开了一枪，没等他子弹再上膛，又过来几个人，一下就把他架走了，其中两个见中弹的那个还在喘息，便抬着中弹人一起往深山里逃。当他们走到悬崖不远的小路时，中弹人已断了气，那几个一合计，就将这中弹者的尸首顺悬崖扔了下去。

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呢？是土匪。领头的就是被李立三打死的那个人。这个家伙姓孙名英，人送外号“金毛狮子”。这金毛狮子带着十几个土匪，在黄蜂岭一带打家劫舍。黄蜂岭属江西地界，为武夷山中的一个山头。这赣东的土匪，分别占着武夷山顶大小四十二个山头，统归武夷山主峰玉华峰山主紫面昆仑张道然统领。这张道然平常是个老道打扮。干的却是土匪勾当。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队伍向赣南开拔，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手下第一号谋士江开远，就在朱培德耳边出了个主意：“主席，共产党要南下广东，途中必经武夷山，卑职愿凭三寸不烂之舌，给他共产党下道绊马索，虽不能给他个全军覆灭，也能搅它个鸡犬不宁。”

朱培德往鼻子里抹了一撮鼻烟儿，说：“开远，你有什么法儿？能给叶、贺叛军设绊马索？”

江开远说：“武夷山玉华峰三清观中老道张道然，是我的磕头兄弟。张道然手下管着武夷山四十二峰的大小寨主，只要他发个帖儿，这些大小寨主就是刀山火海也敢闯。叶、贺叛军恰恰走的是这条路。我让张道然下个帖儿，命令他手下四十二峰的山大王，抓叶、

贺叛军中的头头儿，回头按捉拿的官儿大小给赏钱，官儿越大，给的钱就越多。古语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些山中土匪，地形熟悉，又在暗中，定把叶，贺叛军搅个人心惶惶。”

朱培德听了，很高兴，他又抹了撮鼻烟儿，痛痛快快地打几个喷嚏，就命江开远去了玉华峰。

江开远很快见到了张道然，两个一说就妥了，张道然立时就下了一道绿林帖子，要各处山主，捉拿共产党的官儿，而后按抓到的官儿大小给赏钱。也算是吉人天相吧，会昌之战以后，起义军改了行军的路线，由瑞金转向东，奔了福建地而。这路上只经过一个黄蜂岭。那黄蜂岭的山大王金毛狮子，打听到起义军走黄蜂岭，就带着几个喽罗，埋伏在路上，想抓几个共产党的大官儿发发财。大部队经过时，他们见人多不敢动手，到李立三带领的伤病员队路过时，这些土匪见大脚的妇女们抬着伤病员过走，他们断定不会是大官儿，也没动手。偏偏李立三同勤务兵于柱儿单独地走来。金毛狮子瞅李立三的模样、派头，就断定是个官儿。偏偏这两个人还停了下来。金毛狮子刚要动手，又见李立三要去摘野果儿，勤务兵小于还脆生生了地喊了句“处长”。金毛狮子乐了，他对手下的喽罗说：“要把这个抓住。”说着，便悄悄地往路边儿移动。李立三却朝着他走来，而且竟走到了金毛狮子跟前，金毛狮子开始吓了一跳，以为李立三发现了他。后来他见李立三是摘野果子的，高兴了，趁李立三不备之时，也没和身后的喽罗打招呼，就一下扑了上去。他万没想到李立三也练过武功，结果呢，就是前边讲的，反被李立三摔在地，李立三又趁势一枪打中金毛狮子前胸。李立三开枪之后，怕有人暗算他，立即翻身倒地，小子听到了的枪声，就是李立三打的，他见到的李立三倒地，也正是这一刻。这时候，那些喽罗见山主被打中，便一拥而上，促住了李立三，他们怕起义军大部队追了过来，架着李立三，抬着金毛狮子就往深山里跑，后来见金毛狮子没了气，就顺手扔下了悬崖，没想到金毛狮子的尸体被树枝托住。小于看到

的血迹和尸体，就是金毛狮子的。

李立三被这些喽罗带到一座山神庙里后，喽罗们将他捆起，李立三觉得口渴得厉害，便跟喽罗们要水喝。一个二十出头的的小喽罗给他端来了一碗水。李立三喝过之后，觉得心里痛快了许多。这时天已黑了，那几个喽罗倒头睡了觉，由给李立三送水的小喽罗站岗。李立三就和他慢慢地谈了起来。谈着谈着，小喽罗便把肚里的话都端了出来。原来这些人也都是庄稼地里的受苦人，实在活不下去了，才上山当土匪。李立三听了，暗自点头。

第二天，几个喽罗又押着李立三在山里的小道上走。歇息的时候，李立三问道："各位兄弟，请问你们要把我押到哪里去呢？"

其中一个大个子说："这你就不要问了，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李立三叹了口气说："可惜，实在可惜。"

那大个子说："你有什么可惜的呢？"

李立三说："我手中有一大笔财产，只是，我一离开，这财产就全完了。"

李立三这么一说，那几个喽罗都站住了脚，说："你说的这财产在哪里呢？"

李立三说："就在汀州城里。"

大个子上下打量了一下李立三，说："你跟我们说实话，你在共产党里究竟是多大的官儿？"

李立三笑道："要说小也不算小，要说大也不算大，万两黄金从我手中过，百万兵马我指挥。可在穷苦人面前，我又是条老黄牛。"

几个喽罗眨巴着眼说："你说句痛快话吧，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李立三说："和你们一样，是个受苦人，在家里种过田，后来被财主们逼得活不下了，才逃了出来，投了这共产党的队伍。"

那几个人听了，问道："敢情你是到了共产党的队伍里，才发了财呀？"

李立三说："共产党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专打土豪劣绅，杀富济贫，为穷人撑腰出气。"

大个子想了下说："共产党的队伍，能要我们吗？"

李立三明白他们的意思，便说："如果各位愿意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我来引荐。如果各位要光洋，到了汀州，别的不敢说，五千元可以奉送。"

李立三这么一讲，几个喽罗都动了心。那个大个子同其他几个商议了一下后，说："我们也都是穷人，是逼到山上当匪的，在这山中为匪，也不知何年何月才是出头之日。不如同你一起，一刀一枪地干个事业，我们愿跟你到共产党队伍里干功名。"

李立三说："那没说的，我一定引荐。"

当下，几个人给李立三松了绑。之后，便随李立三一起直奔汀州。一路上，李立三给他们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直讲得这些人连连点头，对参加共产党的队伍，劲头更足了，经过两天的赶路，终于到了汀州。李立三没想到众人正开他的追悼会。

李立三讲罢这段危险的经历，大家都为他庆幸。之后，李立三将那几个随他来的人编入了叶挺的部队里。

李立三三次大难不死，人们都说他必有后福，向忠发也很迷信，认为李立三命大，便把一切权利都让与李立三，自己只当个空名而已。

就这样，李立三掌握了中共的实权。但是，到了是年 11 月上旬，周恩来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这样，中共的实际领导是周恩来。11 月 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新的中央的工作计划。从这时起到 1933 年的 3 月初，中共中央的许多通告、文件，皆出自周恩来之手。李立三只为周的副手。向忠发依然是名义领袖。周恩来的思想比较温和。因而，在中共"六大"后的近两年的时间内，中国的革命力量是长足发展的。说明周恩来把握的中共

这条航船的航向是正确的，是有成绩的。到了1930年3月初，周恩来赴莫斯科汇报工作，周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急于革命求成，一下就把中共推向了比瞿秋白盲动主义还"左"的航向。

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发生，也与中共"六大"的路线有直接关系。中共"六大"的路线，总的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

> "六大"的路线，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中共"六大"的缺点和错误又和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分不开的。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苏联党内的斗争，促使中共"六大"发展了缺点和错误。1929年的春天，联共党内"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公开化，而且越来越尖锐。于是，共产国际一系列会议和决议以及对中国的指示一再强调反右倾斗争的重要意义。指出：无论在国际上和在中共党内，右倾都是主要危险倾向。共产国际并批评中共的"六大"决议是犯了"联合富农"的错误，指示中共必须执行反富农的政策。1929年的夏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十次会议上，米夫提出："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阵地巩固起来，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涨，证明工人阶级中意志消沉的状况开始消除，证明失败的最低点已成过去，工人阶级又大显身手了。到了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更明确地指示：

> 事态的发展方向是近期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席卷全中国，无论如何也会波及到许多关键性省分……必须集中

精力组织和加强红军，以期将来根据军事和政治形势，去夺取一个或数个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党的任务是要同时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要反对右倾，因为右倾对于顺利执行党所面临的各项任务来说，是一个主要危险。

从1928年到1930年，在中国国内，新老军阀混战不断，蒋介石虽然率领国民革命军完成了第二次北伐，东北易帜南京，北洋系统的老军阀们被赶出了政治舞台，但新军阀又开始了往来拼杀，先是蒋桂之战，接着是蒋唐之战、蒋唐石之战、蒋冯之战，到了1930年，终于爆发了中原大战。军阀们频繁的混战，无暇顾及中共，如果中共能正确的估计和利用新老军阀混战的形势，可以大大地发展革命力量，但是，以李立三为实际领导的中共首领们，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夸大了革命力量，错误地判断了反动统治危机，结果，形成了冒险主义路线，把中共自"八七"会议以来产生的"左"倾思想和情绪，推向了高峰。

从1930年3、4月开始、李立三的"左"倾思想倾向就日益膨胀。3月26日，李立三撰写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在《红旗》上发表，内称：

……就全国范围内看来，革命的群众斗争，工人、农民、士兵、红军，确实是一个普遍发展的形势。从哈尔滨、唐山、天津以至武汉、上海、厦门、广州、香港都是平衡地向前发展。……在这样形势下，怎样去建立革命政权将要成为策略路线的中心问题。……革命政权或许不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而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虽然不是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但他已经是有了全国范围内之革命高潮。

之后，在两月之内，李立三又连续写了五篇文章，为：《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条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这些文章，均发表在《红旗》杂志上。文章反复强调城市武装的重要性，是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主要手段。

李立三在数月之内所撰写的六篇文章，是他提出"左"倾政治路线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个基本思想，4 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接着又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两个会上，李立三布署了一系列的"左"倾政策。6 月 1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内称：

> 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一般的说来，尚没有形成可以完全支配全国产业的经济中心，而且在几个与帝国主义通商的商业经济中心，而且在几个与帝国主义通商的商业中心支配下（如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大连），造成政治上军阀割据的局面。因此，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形势是一样，动摇崩溃的程度却有差别。所以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与全国革命高潮不可分离，"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六次大会决议案）……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

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革命的急剧发展，伟大的革命巨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争斗，以促进这一革命巨潮更快的爆发；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的总路线。……红军的战略与战术，不只是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根本改变他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在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总的计划之下，有配合的，有组织的实现他的军事作战任务。这一任务的总的目标，便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去。……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障碍，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对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党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前提。系统的取消主义思想的取消派，已经在事实上，从党内的反对派发展成为阶级的敌人，需要党在党内特别在群众中更坚决的斗争。可是暗藏在党内的右倾思想，因为他表面赞成党的路线，而在每个实际的策略上都发生怀疑、动摇、怠工、不积极执行，的确同样的成为目前莫大的危害。不克服一切右倾的思想，党的路线与策略决不能充分的执行……如果因组织上的弱点而怀疑现在革命形势，怀疑党的路线，是极严重的右倾观念……

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左”倾错误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曾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瞿秋白，在莫斯科看了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文章，摇头叹道：“李立三发疯了。”

中共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何孟雄、林育南等，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一开始就进行了抵制和反对，何孟雄反对的尤为激烈。

何孟雄，湖南酃县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1925年创建京绥铁路工会。1926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年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书记。何为中共党内一位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人，他有较强的分辩大事大非的能力。他在实践工作中感到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危害，遂于1929年11月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于1930年5月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6月的江苏省委会议上，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判。

7月9日，李立三再次主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讨论会，讨论进一步贯彻6月1日中央政治局会上他所做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达到在全党扫除阻力，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会上李立三作报告，反复强调，说工人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只要有领导，会一呼百应，罢工就会罢起来。李立三说完，何孟雄第一个激烈地反对，接着，博古，王明，王稼祥先后站起来反对。尤其是王明，发言慷慨激昂，他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一省与几省的政权问题和反右

倾的问题，对李立三的《报告》和6月11日的《决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王明说："你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和物！"

发言批评李立三《报告》的还有何子述、林育南等人。李立三见大家都反对他，遂拍案怒道："政治局里有争论，国际代表反对，这都不足为奇，等南京打下来，让事实讲话吧！"

时共产国际代表也不支持李立三。国际代表此时为罗伯特。其对李立三的"左"倾暴动计划有看法，认为不适宜中国革命的实际，不同意下发《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李立三见罗伯特反对暴动计划，立即暴跳如雷，认为罗伯特思想右倾。如今他见何孟雄、王明、博古等人与罗伯特唱一个调调，所以更火冒三丈，拍案大怒，盛怒之下，把罗伯特也大骂了一顿。

7月9日会议之后，李立三为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立即给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小组织者"大帽子，向忠发还宣布撤销王明中宣部秘书职（王明于6月被调任中宣部秘书），并给王明、博古党内6个月的处分。撤销了何孟雄江苏省委书记的职务，调任上海沪中区委任书记。王明不服，于7月10日写了意见书，向中共中央重申了他的意见。何孟雄更加激烈地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他在8月上海区委和产委党团书记会上，沪中区委会议上，市政委会上，在9月1日上海区委和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判。但是，直言的何孟雄却遭到了李立三的无情的政治打击。9月4日，江苏总行动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实际上是李立三的意见，撤销了何孟雄沪中区委书记的职务。9月8日，何孟雄愤怒地向江苏总行委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何孟雄政治意见书》，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并从十二个方面陈述了和李立三及中央的分歧所在，系统的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错误。指出了“中央路线行不通”。

对于何孟雄的《政治意见书》,李立三见后更是暴跳如雷,指示江苏总行委对何进行批判。9月10日,江苏总行委召开了上海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对何开展了批判。会后,《红旗日报》又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公开批何,并掀起了一个批何的高潮。

从1930年的6月开始,立三路线即在中共全党全面推开。按李立三的部署,6月主要是思想动员和向下部署阶段;7月重点部署南京、上海、武汉三个中心城市的暴动,同时调动红军进改大城市,8月,立三路线达到了高潮。李立三制定了一个全盘革命计划,即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暴动暴动再暴动”的极“左”口号,命令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大连、青岛、天津、哈尔滨等城市举行罢工、起义。同时,又不顾红军的实力,提出“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的口号。命令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长沙、武汉、南昌、九江等地,要求“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8月初,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指导全国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很快,“总行委”举行成立大会,向忠发、李立三都在会上做了报告。李立三在会上说:“帝国主义的机关报已经公开承认‘武汉落入共产党之手,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假如在适当配合中,我们有极大的可能举行武汉暴动,与红军配合起来夺取武汉。”

会上,李立三提出,为了更迅速、更敏捷、更权威地领导各地的暴动,立即打破各地的各级党团工会等组织,合并于各级行动委员会中。李立三于会上要求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省委等都要成立总行动委员会。一切服从于准备武装起义,一切工作都以暴动为中心。时彭德怀率红3军团一度攻占了长沙,李立三更加得意忘形,更加肆无忌惮。为实现他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暴动计划,李立三手持中共大权,滥施威风,他今儿往甲地游击区派一司令,明儿往乙地根据地颁发一个师或军的番号,其实,这些地方的军或

师也只有数百人，甚至有的仅百余人。对一些打入国民党部队的中共党员，他不管条件成熟与否，便下兵变的指示。

李立三坐镇中央，纸上谈兵，他今儿下令红军进攻这个城市，明儿又下令红军攻那个城市。为了实现他的计划，他命令曾中生率学生营举行南京兵变，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占领南京。时曾中生所领导仅有一个学生营，以一营之众在南京暴动，无异于以卵击石。曾中生遂向李立三据实报告。李大怒，斥曾右倾。遂于中共政治局作了《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强调南京兵变必须以占领南京为目的，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谁反对这个计划谁就是右倾逃跑主义，必须予以党纪制裁。

李立三为推行其路线，在中共党内实行了家长制，一言堂，凡反对他的人，都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进行打击和排斥。

正当立三路线发展到顶峰时，一度攻进长沙的红 3 军团在强敌之下退了出来，李立三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和红 3 军团此举是犯了“右倾错误”。下令红 1 军团火速西进，会合红 3 军团，组成红 1 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二次攻打长沙。

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罗伯特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后，李立三即以罗伯特思想右倾，妨碍和干扰中共的领导工作为由，以中共中央政局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击抗议，要共产国际将罗伯特撤走。时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几个月的工作，形成了一个决议，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表示了正面的意见。比较含蓄地批评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错误，也批评了中共对远东的态度。

李立三对远东的批评十分恼火，他再次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并进行辩解。接着，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写信、打电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虚夸中共的革命力量、革命形势和所取得的战绩。李立三要求苏联放弃五年

计划，准备战争，命令蒙古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等言语，要求共产国际批准中共在全国建立苏维埃和在全国武装起义的计划，请求共产国际和苏联发起世界保护、援助中国的革命运动。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公然反对共产国际的驻中国的代表、拒不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对苏联、对共产国际的要求，大吃一惊，遂发电于中共，命令中共立即停止各地的冒险暴动行为，同时派了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要求李立三速至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随之，共产国际的态度愈发严厉，停发了给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

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瞿秋白

8月下旬，周恩来、瞿秋白动身回国。瞿、周回到国内后，当即向李立三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李立三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帮助之下，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所认识。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电于共产国际，内称：

> 中政局完全同意来电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坚决的执行转变。长沙两次进攻，更加证明国际的指示以及反对武汉南京暴动是绝对正确的。对帝国主义的策略确需要。坚强红军，建立根据地与苏维埃政府是第一等工作。城市工作要有更实际发动群众以代替空喊的冒险。中央即开扩大会，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在这一转变中，右倾机会分子已利用之作反中央的活动，将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对立起来。中央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

执行策略的转变，坚决反右派及调和派的斗争，立三同□（原电字缺——引者注）坚决，因此，政治局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请立三暂不来国际，可否准许盼复。

中央局

9月24日，在瞿秋白、周恩来领导之下，中共中央于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幢洋楼里，秘密召开了第六次扩大的三中全会。中央委员到会者十四人，审查委员二人，出席会议的还有北方局、南方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C·Y及全总党团代表二十人。议事日程计四项：第一项，接受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1930年7月23日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第二项，组织问题，同时一并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于中国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三项，职工问题；第四项，补选中央委员及选举政治局。总书记向忠发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向忠发于报告中对冒险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的精神。而后，周恩来说："国际主义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近三个月来，立三同志的冒险主义已经给革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立三同志在思想上应多负责任一些，但也不能说形成了李立三主义，在检查工作中，应以集体精神来执行自我批评。"

会上，与会者以血的事实、惨重的代价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行了指责，损失是无法挽回的，他们例举了如下的事实——

7月1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强调南京兵变必须以占领南京为目的，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谁反对这个布署谁就是右倾逃跑主义，必须予以党纪制裁。为此，江苏省委、南京市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在南京发动暴动，先举行了群众游行示威，结果使地下党的组织暴露，中共南京市委遭敌多次搜查，近百名中共党员牺牲。发动兵变的党团

员也因身份暴露，有四十余人被捕后惨遭杀害。继南京暴动失败之后，各大城市举行的暴动都相继失败，许多中共党团员遭杀害。仅上海地区，地下党员就由两千人减少到六百人。红10军奉中共中央之命攻打九江，结果红军大败，使两万人减到三千人；红7军奉命北上孤军攻打桂林，结果六千人伤亡四千人之多，还丧失了右江根据地；红2军团奉命过江攻打武汉，结果大败于杨林寺，三停人马失去二停，洪湖根据地亦为敌所占。

在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内，李立三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全局性的重大损失。

与会者激烈的批评，血的代价，使李立三的心灵受到震颤。他难过地说："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中央的许多政策和决定，大都是我起草的，如今，中央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我应负更多的责任。"

三中全会作出了题为《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其副标为："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议"。决议指出：

> 中央全体会议认为必须指出：中央政治局最近期间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在许多重要问题之中，有模糊而不正确的地方——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总起来说——就是中央委员会政治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现在的事实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力量，还没有平衡，还没有汇合，农民战争之中还缺乏充分的无产阶级领导和组织作用；政治局亦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目前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削弱完全破产；于是对于帝国主义反革命统治崩溃的形势和可能，对于革命势力的现状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都有过分的估量。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在一般的正

确路线之下，就已经有这种估量上的错误——认为“城市工人尚未走到‘客观革命的形势’的主要原因，只是由于白色恐怖的镇压”。而忽略共产党在群众之中的组织作用的还不充分，亦是这种情形的一种重要原因；甚至于认为“只要在产业区域和政治中心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客观革命的形势”。这种估量是不清楚而不正确的，一定可以，而且已经引起策略上的错误。

这种估量之中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一)现在大城市的产业中心里，还缺少更加广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发动；(二)各地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发展扩大，还需要领导的加强和集中，需要建立巩固的阵地，去迎接更加残酷巨大的决定胜负的战斗。因此，政治局过去的策略上，就有个别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的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所以冒险倾向的轻易暴动的布置，代替了切实创造武装暴动前提的斗争。

为着更加坚决的彻底执行国际和中国党一致的路线起见，必须遵照国际执委的指示，立刻完全纠正这些错误，而在一般策略和工作上，实行必要的转变。

报告中还指出了“左倾”的错误，称：

因为必须坚决的领导罢工斗争，尽量发展农民的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的关系，除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机之外，又发现了盲动主义关门主义倾向的错误——就是往往不去争取群众，不能估计群众，不能估计群众的力量而只有脱离群众的发动计划等等。同志之中发现“不理黄色工会”“凡是不是雇农，一律都应当开除出党”“杀尽

富农”“只要领导十亩以下的贫农去抗税抗租”等类口号的提议。并且已经有放弃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忽视组织上巩固党的影响和群众团体等的现象。甚至于借口“群众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的论调，而实际上走到极有害的机会主义的消极。群众之中的这种情绪，只是以表示群众对于国民党统治的毒恨的增长，以及群众力量组织的需要的增加。如果因此就不会领导群众日常斗争，那就成了等待暴动。别方面，这一类的“左倾”情绪，在革命战争之中，往往会引导到表面是“坚决向前进攻”，实际是继续“没有后防和作战”方式；在苏维埃区域里，就是不会适用于帝国主义的应付政策，脱离农民群众的“左倾”幼稚政策，反对富农而不会团结中农于自己的周围；以及一般的不会在政治上解除改组派取消派黄色工会富农等等的武装，而反对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

“左倾”的错误，是在于只看到先进分子的情绪，而不去切实艰苦的去争取群众，因此，脱离广大群众而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急进主义。“左倾”的错误，事实上是巩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所以一定亦坚决的反对一切“左倾”，不应当有任何的调和的态度。

三中全会改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补选了中央委员，李立三被撤销了中央常委和兼任的宣传部长、秘书长工作，但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实际上是离开了中共中央的要职。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中共全党转变了“左”倾政策，但是，不可改变“六大”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左”的理论和政策，因而，在纠正李立三错误方面，自然也不能彻底，不仅如此，对于执正确意见的同志，亦予以无情的打击。如何孟雄，其意见本是正确的，

他最激烈的反对“立三路线”，但由于三中全会的基础还是“左”，所以何的思想与三中全会的精神发生了矛盾与对立。何遭到李立三路线的无情打击，而在三中全会之后，继续遭到打击。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内称：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陈独秀托洛茨基的取消派，虽然已经肃清出党，然而他们的残余仍旧有些留在党内暗中活动。右倾机会主义不但有个别的实际工作上的表现，甚至于形成整个的路线，来反对共产国际和党的正确路线。这种形成整个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不管代表这个路线的同志，主观上是怎样的想法，可是，客观上不能成为取消派埋伏在党里面的奸细。关于这一点，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已经详细的指示，这里不再重复叙说。总之，代表这种路线的同志，例如江苏的何孟雄，事实上是根本否认中国革命的新的高潮，根本否认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和组织革命战争的路线。这些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六九月间，党开始反对陈独秀取消主义的初期，他们对陈独秀主义就是采取调和的态度。现在，他们借口中央的策略上的个别错误，就说中央领导完全破产，中央路线完全错误。他们宣传这种说法，还带着鼓动无原则的个人纠纷，企图把中央政治局里的个人和整个领导机关对立起来。尤其表示他们政治上的外交手腕的，是他们企图说自己是“拥护”共产国际路线来反对中央的路线。这里，很明显的是：他们企图曲解共产国际和中国党的路线，而来进攻中央。他们事实上是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事实上是要破坏中国的党的。他们的活动，更是显然的客观上帮助取消派帮助统治阶级，来扰乱无产阶级先锋的队伍。他们的路线是：在中国工农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

渡时机，来阻碍这个过渡，阻碍斗争的前进和深入，要使工人斗争停顿在经济的小的范围之内(反对政治罢工)，根本否认农民战争的作用(说长沙战争是部落式的暴动，没有前途)，投降帝国主义(说中国工农对于列强的机关枪大炮是没有办法抵御的)，取消中国的和世界革命前途(说"国际无产阶级赞助中国革命是空话")。

这样，我们应当明白：为什么右倾是党内主要的危险了。所以全党同志，必须坚决实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加紧反对右倾和加强右倾立场的"左倾"，集中火力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

何孟雄被点名批判之后，其江苏省委候补执行委员的资格也被撤销。由于何在党内屡遭批判，其身份也得不到保护，遂于1931年1月在上海被敌方所捕，何在狱中表现的甚为坚强。2月7日被敌人杀害于龙华。时年33岁。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判了何孟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

受到残酷打击的李立三

李立三被撤销了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重要职务之后，心情很沉闷。11月的一天，他到了上海的四马路瞿秋白的住处，去看望

瞿秋白。李立三进门之后，瞿秋白见了他，不仅没说话，却神情异样。李立三是快人快语，忍不住问道："秋白，出了什么事了。"

瞿秋白召呼李立三坐下，而后长叹一声，说："共产国际来电了。"

李立三立即问："有什么新的指示？"

瞿秋白又叹了口气说："共产国际指责你的错误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还批评了三中全会对你的路线采取了调和态度，没有坚决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李立三听了，犹如冷水浇头，坐在那里，半晌无语。瞿秋白又说："立三，你要有精神准备，中央准备马上开会，研究共产国际的电令，你的错误性质看来要升级了。"

李立三难过的说："我犯了错误，给党造成了损失，可我决没有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动机。"

瞿秋白说："总而言之，你要勇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

共产国际于10月份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信中指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批判不力，全会的调子温和，对李立三持"保护态度"。信中斥责了李立三的路线，称其：

> 用虚伪的左派空谈，来遮盖了自己的消极心理。……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公然运用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所爱用的，而且已被打碎了的理论，就是说共产国际不知道的情形，说中国的情形是例外的，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公然敢于把共产国际的忠实态度和对中国革命的忠实态度对立起来。

11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补充决议》的会

议，李立三在会上被迫接受“错误路线”的上纲。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政治局讨论过国际来信之后，决定：

一、完全同意国际执委的这一封信。

二、认为：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之上也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斯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亦还没有对立三同志路线的影响占着优势的时期里面政治局的工作，给以正确的估量。——立三同志的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掩盖对于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掩盖对于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的机会主度消极态度，而在实行上领导党走上盲动冒险主义的道路。

三、认为：这种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在过去，这种调和态度帮助了立三同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使执行国际路线的主要任务，没有能彻底解决。

四、这种情形，就使三中全会对于立三同志的各个反对列宁主义的论调，没有受到必须的充分的批评，例如对于立三同志对于策略转变问题的半托洛斯基主义的理论，只批评他是机械的。

五、认为必须根据三中全会的议决案，根据政治局的本次决议，根据国际执委的来信，对于全党党员解释立三同志半托洛斯基路线的实质，解释这种路线是和共产国际路线互相对立的——公布上述的材料和特别发一告同

志书。

六、认为现在要集中全力反对党内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和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这种情形(是)立三同志半托洛斯基主义理论的基础，现在"左倾"空谈的掩盖去掉之后，这种情形就特别的暴露出来。同时党应加强反对托派的斗争，因为有些托派分子现在企图回到党内加紧破坏的工作。

七、这次决议是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认为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反对露骨的机会主义的曲解的企图——就是想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以及这次纠正立三同志的路线，解释成为改换党的路线——变成了退却的路线。同样，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的企图。

八、立三同志以及赞成他的同志已经承认错误，党的领导机关完全和共产国际执委同意，这些事实使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这种"讨论"只能使党的力量离开不可迟缓的很重要的实际任务，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解释工作之中，仍旧是须要各同志的详细的讨论)。

九、认为团的三中全会在少共国际和党的领导之下已经一般的接受了国际的正确路线，同时，团的三中全会的决议之中，有些地方的措词是和少共国际来信不同的(对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彻底揭发，对于取消团的主张，没有认清是反对列宁主义的路线问题)。政治局认为团的中央必须把过去的错误路线，遵照着这次决议和少共国际来信彻底的纠正。

十、这次决议是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所以用通信方法询问所有的中央委员，是否同意。并且把这一决议报告

国际执委。

一九三〇年十一、廿五

12 月 9 日，中央政治局再次作出决议，内称：

最近在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的来信的指导之下，政治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决议指出三中全会的错误，并且开始进行解释立三路线的工作。现在，在这解释工作的初步所表现的许多事实，使政治局认为必须根据国际来信发展十一月五日的决议，更加彻底明白的指出：

一、六月十一日议决案是立三路线。六月十一议决案前后——三中会全之前的最后一(时)期，立三路线是领导了政治局的工作。所以对于这一时期政治局工作的正确估量应当是：当时政治局的路线是和共产国际路线不一致的，是不正确的。

二、三中全会却承认这一时期中央的路线仍旧是和国际一致的，承认六月十一议决案是一般正确的，因此，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是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的，——就是对于立三同志的整个路线，取了调和态度，并且替这一路线辩护——这就把互相矛盾互相对立而不能并存的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混淆起来(恰如国际来信所说)，这就不能彻底解决执行国际路线的任务，因此，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就不正确了。

三、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就不能够充分正确和明了的遵照国际路线去规定新的策略和任务，更不能够使全党明白的了解了共产国际路线之下的策略与任务，是与立三路线的策略与任务，原则上完全不同的，这

样，即使三中全会了解到必须实行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整个转变，但这个转变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了。而且实际上正如国际来信所说又正在重复这些错误。

四、三中全会有了这种调和主义的立场，自然对于立三同志的各个反对列宁主义的理论，也不能够给以必须的和充分的批评和指斥。现在党却正需要从解释工作中领导这一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的斗争，反对一切调和主义的错误，执行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以根本肃清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存在以及其领导的影响。

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议决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而彻底明确的完全遵照国际路线来规定党的任务和策略。这样才能保障路线上的转变的完成，保障反对和肃清立三路线斗争的彻底，消灭一切调和主义的错误，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任务，得到完全的解决。……（删节号是原有的——引者注）

共产国际为甚咬住李立三不松嘴呢？是因为李立三在执政期间，没把共产国际放在眼里，不仅不尊重共产国际，甚至与共产国际"对抗"，公然反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并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的情况。尤其是他竟胆敢"指挥"斯大林，要斯大林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等等言行，使斯大林这"龙颜"大怒。尤其是1930年6月1日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之后，李立三竟不顾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的反对，不等共产国际的批准，就擅自将6月11日决议公布。李立三的种种对抗共产国际的行为，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愤怒。因而，对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处理不满。同时，也由此对瞿秋白和周恩来产生了不信任，感到需要用共产国际培养的信任的人来更换中共的领导人。于是，便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给《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

信》

共产国际紧紧咬住李立三不松嘴，李立三可倒了霉啦，他必须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待"问题。而共产国际命令他立即动身去莫斯科。时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不会回还，遂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的12月5日，李立三洒泪告别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匆匆奔赴苏联。

李立三走后不久，其妻生下一个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嘱，将这女孩送给了与党有密切联系的老工人谢庆斋，李崇善不久被捕入狱。后来，李立三四下寻找那个女孩，却一直没有找到，直到1982年才由党组织帮助找到，这女孩今叫谢志佩，在上海某大学工作。

李立三到了莫斯科后，即受到了"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没完没了地检查了七年，到了1938年，斯大林发疯地在苏联大搞肃反扩大化，李立三被捕了，此后，受尽了肉刑，先后被转移了几个监狱，监狱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一年零九个月后，李立三无罪释放。因他没有户口和工作，只得求助于共产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李立三以普通居民身份参加了卫国战争，参加挖战壕，参加防空警戒。一直到了1945年8月，历尽了艰辛的李立三才得以回国。他在苏联整整呆了15年。全国解放后，李立三常对共同过来的老同志说："我曾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对待过那些不同意见的同志们。等我离开领导岗位，决心重新学习，从头做起的时候，王明却把这个办法用在我身上，使我吃尽了苦头，我犯错误时间不到半年，他们却叫我在苏联没完没了地检查了七年，那时，我就象小媳妇一样，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这种办法不好，使人丧失信心，不准人起来革命。"

李立三没能躲过"初一"，更没躲过"十五"，文化大革命中，他

被戴上了“三反分子”、“老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他受到了比在苏联还难挨的残酷批斗和无情的折磨，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于 1967 年 6 月 22 日下午，吞服安眠药而含冤去世。他在写给毛泽东的遗书中称：

> 我现在走上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是求是的结论。

李立三推行“左”倾盲动冒险主义路线，而他又饱受“左”倾的折磨，最后竟死在极“左”路线之下，真是令人感叹！

第四章　王明爬上了中共的高位

初出茅庐的王明

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指责，对李立三的愤怒，对瞿秋白和周恩来的“调和主义”的不满，却美坏了一个人，这人是谁？就是王明。

这里，把王明其人作个介绍。

王明，原名陈绍禹，后改为陈绍禹，字露清。其后来所用的笔名有韶玉、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王明等。其化名有泰山、风康、石绍禹、绍玉、绍虞、WM 等，此外还有不少俄译化名，如波波维奇、马马维奇、克劳白夫等。

王明于1904年4月9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其祖父陈毓亭,乃私塾先生。其父陈嘉谓,号聘之,字秉森,先在金家寨开醋酱坊,后办"陈龙昌"行店,经营竹木生意。陈嘉谓有两子三女,长子即王明,次子陈绍炜,亦为中共党员,曾先后于家乡、延安、西柏坡、北戴河、北京等地工作。其三个女儿均为共产党员。陈因子女参加革命,亦多次遭国民党逮捕入狱。王明之母喻淑连,因受陈家影响,思想进步,在陈家祠堂开设了一所女子学校。

王明天资聪敏,六岁上学,八岁就能写对联出卖赚钱。后王明又随毛树棠、漆陶庵等先生读私塾。王明在随漆先生读塾书时,曾作一首七律《霜初重雁横空》,内有"羽毛更益三分雪,骨骼初经九月霜"之句,漆先生颇为欣赏,遂于诗句旁批了"聪明"二字。

王明聪敏过人,但很高傲。1919年,金家寨名流李少山先生作了一副上联,征人作下联,其上联为:

山海关虎啸龙吟,漫道风云难际会;

时应征者数十人皆对不上下联,王明见了,不加思索,即挥笔而就,为:

子午谷乌飞兔走,须知日月易蹉跎。

李先生见了,连连拍案叫绝,遂设宴请王明。

王明虽有才气,但因其家境艰难,无力再升学读书,时有地主晁三,见王明非等闲之人,便认王明为干儿,供其上学。王明得晁三老爷资助,十六岁时来到了当时属于河南省固始县远东南区的陈淋志诚小学读书。

时学校中有国文教师詹谷堂,其学识渊博,思想激进。于1914年受聘至志诚小学。他在志诚小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

1923年6月，詹谷堂入了共产党，并担任了金寨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王明虽然于1920年即离开志诚小学，但詹谷堂的进步思想对王明影响很大。

1920年夏天，王明考入了安徽省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三农”学校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左派、民革创建人之一的朱蕴山创办的。朱乃六安县人。“三农”学校校址即设在六安。

“三农”为一所新型学校。时进步人士桂月峰、钱杏邨等(即阿英——作者注)，均在此校任教，因而学校进步空气浓郁。

“五四”运动的巨浪也冲进了“三农”校园，时学校通过旅外同乡和芜湖科学图书社，购进了不少进步书刊，如《新青所》、《共产主义A、B、C、》、《赤都心史》等。钱杏邨在课堂上公开宣传十月革命，介绍列宁、高尔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学校里还成立了“读书会”的组织，组织学生们读进步书刊。并成立了爱国剧社，师生们演文明戏，宣传爱国主义，打倒封建，打倒军阀的思想。

王明学习刻苦，加之聪明，因而学习成绩优异。学校的新潮思想、民主空气，对其思想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1921年的6月2日，安徽省城发生了“六·二”惨案。时安徽督军为倪嗣冲，其挪用教育公款作为省议会三届选举之用。此事引起了省教职工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愤怒，遂推选代表到省议会请愿，结果省议会议长马联军下令军警开枪，当场打死打伤学生五十余人。军阀的行径引起了全省教职工和学生及民众的愤怒。遂举行了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向省长聂宪藩提出抗议。当时，省学联以许继慎、舒传贤为核心，使斗争迅速发展，并得到了京、津、沪及各省学联的声援。后经北京教育部的出面调停，“六·二”事件才平息下来。

“六·二”运动之后，安徽省进行三届省议会选举。军阀倪嗣冲为使其侄儿倪道烺当上省长，进行贿选。时选举法中有一条规定，即全省中若某一县选举无效，这一届选举就全部无效。时省教职工

联合会和省学联便利用这一规定，派朱蕴山在六安县进行活动，争取六安县选举无效。经朱蕴山等人的努力，六安和无为两县的选举都达到了无效的目的，迫使安徽省政府只得宣布第三届省议员选举无效。此举给皖系军阀倪嗣冲以重大打击。之后，“三农”学生又参加了驱逐县知事骆通运动和打倒胡子派等斗争。

王明虽然参加了这一系列的斗争，但其均不甚积极，处于温和之态。在斗争中，学校逐渐分成了保守与激进的两派，王明属于“骑墙派”。

由于“三农”学校在全省以民主激进而闻了名。安徽省教育厅秉承皖系军阀旨令，撤换了“三农”校长沈子修的职务，并迫使学监桂月峰，教师钱杏邨等离开学校。任命思想保守的刘先黎来当校长。刘到“三农”后，即拉拢社会上的土豪劣绅，打击压制学校进步势力，同时以小恩小惠拉拢学生。对激进的学生使用了开除的逮捕的手段。刘的行径，引起了进步学生的愤怒，与前来逮捕学生的军警发生了冲突。而后刘先黎开除了一百八十名学生。王明在这场驱刘斗争中，站在了刘先黎的一边，表露出他那“唯书”、“唯上”、贪虚荣、求名利的心态。

1924 年夏，王明于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其成绩居六安县第一名。

投靠米夫的王明

“商大”虽为公费，但王明因家境贫寒，其去武昌的路费和入学时的学费家中均无力承担，几经筹借，其母又卖了出嫁时的手饰，凑了七块银元，王明才得以入学。

武汉自 1911 年辛亥首义于此爆发以来，进步的、民主的政治空气一直很浓厚，也是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1920 年秋，董必

武、张国恩、陈潭秋、刘伯承、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七人，在武昌抚院街的一间斗室内，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支部，选举包惠僧为支部书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武汉支部有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等五人参加大会。从1921年冬至1924年初，武汉党支部又吸收了林育南、李求实、许白昊、李书渠、林育英、廖乾五、项英、施洋、林祥谦、李之龙、夏之栩等人为中共党员，使武汉支部党员达五十多人。到了1924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汉口和武昌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分别由包惠僧和董必武任委员长。

武汉的党组织通过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党团组织，使武汉的革命力量大增。

浓厚的政治气氛自然也涌进商业大学这高等的学府。时"商大"内有一批进步教师，还有共产党员，如共产党员李汉俊、危浩生都在这校内任教。这些党员和进步教师在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对学生们产生很大影响。王明入学不久，即和同学詹禹生一起发起成立了豫皖青年学会，王明被推举为这个学会的事务部主任。时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梁仲明，亦参加了这个学会，梁与王明为同班同学，他向王明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联的情况，介绍马列主义的书刊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梁仲明的思想对王明的影响很大。王明后来回忆说："使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耳目为之一新，思想为之大变。"1924年10，王明为感激梁仲明的帮助，他写了一首《喜闻道》的诗，谓"感而以诗谢之"。其诗写道：

塾窗十载又中学，舍我韶华逝水过。
聆教一朝开眼界，得书百读喜心窝。
儒知世事仁风少，佛识人生苦味多。
惟有马恩新意境，列宁实现首苏俄。

这期间，王明还与同学一起到工厂农村访贫问苦，初步的运用阶级观点去看待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他写了两首七律，表达了他对工农的态度，为《偕友访大智门车站述同感》和《访农家》。《偕友访大智门车站述同感》谓：

工人开动火车头，地动天惊震九州。
南北东西成一体，农工商学尽同仇。
推翻军阀为民主，打倒帝强好自由。
我辈青年无量勇，献生革命变全球。

《访农家》七律诗谓：

茅屋三间聊御寒，布衣百补褰增衫。
年年送稻愁无稻，代代耕田盼有田。
雨水下多愁地涝，阳光晒久怕天干。
穷人总有出头日，家家户户盼变天。

时"商大"校长为湖北省议会议长屈培兰，其为守旧派，思想保守且顽固，因其与军阀关系密切，可以为学校搞到钱，迷信他万能，所以师生们对他还敢怒而不敢言。后发现他不但无能力增加校款，反而侵吞校款。于是，学校的进步师生掀起了革新运动，宣布屈氏罪状，公决驱屈出校。王明投身于斗争之中，并在《商大周刊》上发表了四篇文章，其首篇为《革新运动中所得之经验》，二篇为《三种不同之面目》，三篇为《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四篇为《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在第四篇文章中，内称：

社会问题就是社会的病理学。……如同生物病理学

一样，除却找出病源外，还要想出个救济的法子来；生物病的治疗法，有应急的和根本的两种，所以社会的救济法，也分成治标、治本的不同。……就是用慈善事业以及教育事业类方法来救济社会弊病的方法。所谓治本的救济法，就是主张将现在社会组织根本破坏，另以一种完全新的组织来代替的方法。……前者是改良，称为社会政策，或社会改良主义，后者是改造，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病态社会的根本救济法；其本质即一切生产机关（即矿山、森林、土地、工厂、机器、原料品半制品及交通机关等类……）归社会共有；只容衣服、家具之类物件归个人所有；并且一切生产品的产额及交换都有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准私人投机经营。……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生产的机会，生产机关共有，谁也不能籍私有生产机关收取利益；可以救济现代生产方法的第一大缺点，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有公共机关统计调节；私人不得投机经营，避免形成生产过剩的恐慌；可以救济现代生产方法的第二大缺点……

王明撰写的这篇《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文章，虽然对马列主义的理论理解还很肤浅，对马列主义的学习还刚刚开始，但说明他已向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的道路上大步迈进了。

1925年5月1日，王明在安徽籍同学会的会刊第一卷第一期上，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为《安徽的学生》，第二篇为《反对和免除贵族专利的现代学校教育》，第三篇为《恋爱真缔》。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时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反击帝国主义的屠杀。消息传到武汉后，湖

北共产党组织以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等公开团体的名义，号召和组织武汉市学校罢课，声援上海。6月1日，“商大”学生开会研究罢课问题时，王明出席了会议。会上，有个别学生代表和教师不同意罢课，王明很激动地站起发言，批驳了不同意罢课的言论。时每所学校要选出两名代表出席武昌学生代表会议。由于王明表现的积极，被师生们推选为“商大”的代表之一。

当晚，武昌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大会在商大召开。时有师范大学违反规定，派了八名代表参加，而且这八人均为国家主义分子，他们极力反对罢工、罢课、罢市，并故意扰乱会场。王明和与会各校的代表对这八人的行径十分愤怒，他们高呼着“打倒国家主义派！”、“打倒汉奸分子！”的口号，将这八人驱逐出会场。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三罢”。

6月2日，武汉的学生举行了罢课，并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上海的学生和工人运动。王明于激动之中，赋诗一首：

> 五卅惨案动青年，集会游行斥帝奸。
> 胸对刀枪忘生死，面临兵警勇宣传。
> 工人响应流鲜血，军阀恐慌暴厚颜。
> 放假提前何用耶？回乡同样闹翻天。

原来，当局为怕事态闹大，提前宣布各学校放假，故王明诗有“放假提前何用耶”之句。

王明回乡之后，又组织豫皖青年学会的部分会员在其家乡金家寨的大王庙内举行会议，追悼上海、汉口、青岛、广州各大城市的死难同胞。王明写的挽联为：

> 四百兆同胞放声大哭；
> 五千年历史特写奇冤。

由于王明在学潮表现得突出，暑假后学校一开学，王明即被吸收为共青团，一月后，由许凌青(即许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老百姓有句俗话，叫"运气未至金变土，时来运转土变金"，1926 年 10 月 7 日，王明的造化来了，而且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这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中山大学成立。由汪精卫、谭延闿、古应芬组成选拔委员会，首批招收三百名学生。时以去苏联留学为时髦，因而蒋介石、冯玉祥、邵力子、于右任、叶楚伧等国民党要人，都纷纷将子女送往莫斯科留学。这样一来，分到各地的名额就很少了。当时，分给湖北的仅十人。十人当中，有伍修权、胡彦彬、贝云峰、梁仲民、高衡、濮世铎、熊效远、黄励、杜琳、宋伟等。王明没在其内。

此时的王明，满脑子装的都是唯有读有高，他觉得要能到苏联上学，是个出人头地的天机，天机不可错过。但湖北名额已满，他无奈跑到江西南昌，找到入党介绍入许凌青，请许通融，但江西名额也都占满。王明思来想去，决定去上海，直接找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

时办理去苏留学事宜者为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姜长林，办公处在法租界房志路的平安大旅馆内。王明通过已来上海的湖北省党部负责人找到了姜长林，恳请姜批准自己去苏俄。姜回说名额已满。王明又磨湖北省党部负责人，请这人再向姜恳言。这位负责人找到姜，说明了王明的一番诚意。姜说："湖北的名额已满，不能超出指标，陈绍禹不能去。"

那位负责人只好将姜之语告诉了王明，王明听了，如同一桶冷水浇头，他激怒地跑到房志路平安大旅馆，见到了姜长林，气呼呼地说："如果你们不让我去，我就到巡捕房报告，让你们一个也去不成！"

姜长林说："你去报告吧，巡捕先把你抓起，因为你是积极去苏俄的。巡捕们能饶你吗？"

王明听了，不吭声了。他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哭涕涕的向姜恳求，几乎要给姜下跪。姜见王的样子挺可怜，就答应向上反映反映。王明这才破涕为笑。

姜长林把王明的情况向中共江浙区委报告了，区委表示不能突破名额，王明不能去。

姜长林把区委的态度告诉了王明，王明又放声大哭，而且蹲在姜的办公室门前不走，一坐就是一天。姜无奈，又把王明的情况向江浙区委反映。最后，区委同意如果别的省有空名额，就让王去。姜查了查，还真有空名额，便批准王明去了苏联。姜原以为办了件好事，哪知此举，使得那：

中山大学进"白虎"，共产党里添"黑煞"。

"白虎""黑煞"都是阴阳五行命理学中的凶神，到后来，王明这凶神挡路，使得中共党内，万千人头落地。

王明得到批准去苏联的消息，真是欣喜若狂。1925 年 10 月 28 日，他同沈泽民、张琴秋、伍修权、蔡和森、孙冶方、王稼祥、乌兰夫、张闻天、李培之等六十余人，从上海乘轮船到海参崴，于 11 月 28 日，到达了大雪纷飞的莫斯科。

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近郊的沃尔洪卡大街 16 号，其学制为两年，课程设置主要有俄语、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苏联革命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军事学。斯大林对这所大学十分关心，并亲自到学校讲课和解答问题。

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是卡尔·拉狄克，副校长是巴维尔·米夫。学校的党组织称为"支部局"，局书记由俄国人担任，委员大都由中国人担任。

王明入学后编入了第一班。时中国学生都不懂俄语。于是，校方决定办一个速成班，培养一批俄语翻译，由于王明记忆力强，又有英语基础，故加入了速成班。时入速成班的还有庄东晓、俞秀松、董亦湘、西门宗华、刘少文、李培之、傅胜芝等十多人。时王明为自己起了个俄国名字，叫"克劳白夫"，即鸟的意思。副校长米夫担任这个班的列宁主义课程。

米夫，原名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福尔图，1901年8月3日生于俄国赫尔松省阿列克谢夫卡村的一个小职员家。其中学毕业后，虽年仅十六岁，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自此用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的名字。两年后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当时苏联国内正进行革命战争，米夫遂两次参加红军。1920年，他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翌年毕业，留校任研究员，研究远东的革命问题，研读马克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1924年，他在乌克兰做党和苏维埃的工作，1925年调回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米夫担任了副校长，时年仅廿四岁。比王明大三岁。

米夫少年得志，可谓年轻气盛。

王明学习很用功，尤其对俄语和列宁的著作的学习，更加刻苦，其俄语学的很快，半年内就达到能说会读的程度。每当米夫上课讲列宁主义时，王明都抢着第一个发言，他滔滔不绝地背诵着列宁的论述，对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也讲得头头是道。王明的言行，博得了米夫的欢心和青睐。由于王明的俄语学得快，发音准确，同米夫交谈起来也方便，这样，二人的交流逐渐深了，感情也愈发密切了。米夫对王明也愈发喜欢。

米夫和王明的关系进一步的密切是王明对待中共旅莫支部的一事上。

中山大学开学之后，到这里学习的中共党团员与原来的组织关系中断了，中山大学内虽然有苏联共产党支部局，但中共党员学

生没有入苏共的党籍。为了使中共党团员学生过好组织生活，便仿照旅欧留学的中共学生成立的旅欧支部，也成立了“旅莫支部”，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为任卓宣。

任卓宣(即叶青)后来叛变了革命，但当时他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资格老，因而当了支部的负责人。

任卓宣在支部实行的是家长制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他照搬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经验，反对学生学俄语和马列主义理论，他制定了一个《训练工作指导纲要》，其中规定：

> 我们必须完全摒除那种认为应该在学习理论之前先学俄语的错误观；我们必须避免学院式的学习——学院式的学习否认理论来源于实践；每个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按照互相监督的关系去批评和监督其他同志。

按照这个《纲要》的规定，共产党员学生都不敢学俄语和马列主义理论了，而是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个个都搞得谨小慎微。

旅莫支部这种做法，自然起米夫等校方不满，也引起了党团员学生的不满。1926年春天，米夫在学生中挑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会开了四天。许多党员学生对旅莫支部脱离实际的工作指导方针和官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辩论会后期的议题转成中山大学党组织应该归谁领导。在这个辩论会上，王明锋芒毕露，一马当先地斥责任卓宣，充分表现了他那能言善辩的才能。王明为甚这么做呢?因为他摸透了米夫肚里的虫虫儿，知道米夫早就讨厌任卓宣了，早就想从任卓宣手中夺回中山大学党支部的权了。因而，王明在大会上亮出了他的想法：中山大学党支部归联共莫斯科市中大所在区的区委领导。理由是共产党员不分国界。旅居别国的共产党员，理所当然的要归当地共产党组织领导。王明的发言，得到了米夫的称赞和重视。

大会激烈地进行了四天之后，由校长拉狄克作结论，拉狄克当场拍案：旅莫支部解散，"中大"党组织归莫斯科市一个区委领导。

时"中大"有个学生组织，叫"学生公社"，相当于今天的学生会。在1926年9月初举行了"学生公社"改造大会上，王明一跃而成为"学生公社"的主席。在当时的旅莫学生有三百多人，资历深者、威望高者大有其人，如中共早期党员马骏，有声望的学者张闻天，沈泽民等，还有曾旅欧的学生邓小平等，这些人从思想水平，工作能力，实际工作经验，都要高于王明，因王明善于揣摸米夫的心理，善于拍米夫的马屁，使他得到了"学生公社"主席的宝座，这个主席虽然是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但却为王明的出风头提供了方便之路，也使他更方便的拍米夫了。

王明真正的把米夫拍舒服的时候，是米夫来华间。

1927年元月，正值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国共密切合作间，米夫以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华访问。米夫在动身来华之际，配了四个翻译，都是米夫亲自挑选的，为王明、潘克鲁(即潘家辰)、刘少文、庄东晓。时庄东晓已和潘家辰结了婚。不料临行之前，庄东晓突然患传染病，不能成行，只好改为严家骏。代表团的成员有库狄莫夫、卡列尼扬、独更、拉斯诺夫，还有米夫的妻子。

本来，米夫要潘家辰为贴身的翻译，王明岂肯放过这个拍米夫的机会？遂不断在米夫面前拨弄是非，一会说潘家辰惦记妻子，一会儿说潘家辰翻译的水平不行，米夫本是个吃拍的人，最喜欢人拍他，经王明这么一拍一拨弄，米夫把王明当做了贴身翻译，直把个王明乐得嘴都合不住了，小马屁也拍得更欢了。

米夫一行元月起程，两个月后到达广州。途经海参崴等地时，王明赋诗一首，谓：

革命心雄藐险危，海洋绕道一船飞。
不因风浪迷趋向，自有磁针辨旨归。

封帝勾连狼狈恶，中苏联合海山摧。
烟波浩渺无涯际，遥见广东笼翠微。

米夫一行到达广州后，适逢北伐军占领了上海，国民政府也迁都武汉。米夫一行便抵达上海，而后又经水路抵武汉。在武汉，米夫夫妇住在了德国人罗德太太在汉口开的一家公寓。时王明形影不离米夫左右。

米夫一面考察中国革命的情况，一面帮助中共筹办中央党校，一面介绍联共(布)党务工作及宣传工作经验。

米夫抵武汉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运动，在上海屠杀中共党员。4月27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代表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和魏金斯基出席了大会，米夫作为联共(布)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上年11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对如何争夺领导权，大会却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办法。大会选出的中共委员会，继续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

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也列席了会议。他虽然没有发言权，但于会上认识了许多中共要人，了解了中共内里的许多情况，这些均为他日后登上中共的高位，铺了一层台阶。

米夫在武汉间，与陈独秀多次会面。米夫向陈独秀力荐王明，要陈独秀批准王明担当中共宣传方面的要职，但陈独秀见王明是个还没毕业的学生，不仅党内资历浅，且没有参加过实际斗争，因此，没有点头，却又奈于情面，便让王明在宣传部当了个干事，不久又兼任宣传部的秘书长。时宣传部长为蔡和森。办公处设在汉口的和春马路。王明对陈独秀不批准他当宣传部长，心甚恨之。

当时在中共高层中两派斗争很激烈，一派主张共产党立即制定决策，发动工农群众，拿起武器，以暴动对付暴力，一派主张委屈求和，同国民党左派搞好关系。时蔡和森和李立三等均为主战派，陈独秀、鲍罗廷、鲁易都是主和派。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蔡和森、李立三等人又与陈独秀、鲍罗廷、鲁易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鲍罗廷大声道："蒋介石成了反革命，但不是所有国民党都是反革命，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好的么，问题出在中共把工农运动搞过了火，才使得国民党右派与中共的矛盾激化。中共必须向国民党让步，若与国民党决裂，中国的革命就会完全的失败！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团体都要发表宣言，拥护国民党中央最近公布的取缔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

罗易接着发言，他完全同意鲍罗廷的意见。

陈独秀亦赞成鲍之语，他说："我们和国民党所争的，向国民党所要的，实际上是个领导权。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与国民党决裂，一条是放弃争夺领导权。我曾在政治局会上两次提出退出国民党，而会上多数人仍以沉默之态度回答了我。"

陈独秀说完，蔡和森站起身大声说："国民党已处处表现出反动，如今我们都要把一切罪过归结于工农运动过火，要我们去拥护去骂民众运动，这还有什么原则吗？我们不能拿刀任反革命分子宰割了！"

对于中共高层的争论，王明自然站在权势大的鲍罗廷、罗易、陈独秀一面，他写了《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同陈独秀唱一个调调儿。文章内称：

> 南京国民党右派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从它们的政府成分一切政纲和一切行动看来，显然是两个不同阶级性的东西；前者是国际帝国主义国内军阀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及他们影响下的群众的政治组织，后者是向

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政权道路上走的政权，它俩各有各的武力、政治、社会其他，它俩是不能永远共存的，在它俩激烈斗争的过程中必有一个被他一个消灭。……现在我们既已认清目前是革命两个前途加紧斗争的时期，并且知道这种斗争由两个政权形式表现出来；摆在我们面前的责任，不能不是怎样使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得到保障，换言之，就是怎样扩大和巩固革命的政权——武汉政权，进言之，就是怎样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就在这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于5月18日至30日举行了第八次全会。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而后于5月底向中共发出了紧急指示，此指示史称“五月紧急指示”。指示中要求中共“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指示的核心思想是要中共迅速进行武装斗争。而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罗易，得到了这个指示后，不但不在中共党内传达，反而送给了汪精卫，以讨汪的欢心。

米夫知道了这个指示的内容后，心里有了底，他于6月16日去见陈独秀，与陈独秀进行了一番长谈，由王明作翻译。米夫向陈独秀提了许多问题，如为什么不让共产党员当县长等.陈独秀向米夫讲了其“二次革命论”的论述。

这时的王明，因为在苏联呆了两年，对苏联的各方情况，尤其是苏联的政策和共产国际方面的情况，比国内的中共领导人了解的要深层的多，当他对国际和国内方方面的情况也了解之后，又开始露锋芒了。他又写了文章批驳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核心思想是：

中国革命只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民革命”，即

> “资产阶级革命”；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在第一阶段共产党不能领导革命，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政府和武装力量应该交给资产阶级。在这个阶段，如果共产党员领导军队，他就会成为军阀；如果他当政府首脑，他就会变成官僚。

陈独秀向米夫讲这套理论，王明作翻译时，他不住地冲陈独秀点头，表示赞同。当他见共产国际的指示与陈独秀的理论相悖时，立即写文章批驳陈的理论，表示了自己支持国际主义路线。

6 月 5 日，汪精卫解除了鲍罗廷的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接着，朱培德、唐生智“礼送”共产党出境。冯玉祥亦公开支持蒋介石“清共”。时武汉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在这种情势下，鲍罗廷秘密回国。1927 年 7 月 12 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13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撤退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时局势异常险恶。贪生怕死的王明见国内凶多吉少，加之其对陈独秀给他的宣传干事职务不满，趁米夫回苏之机，也随着米夫去了苏联，时为 1927 年 7 月初。到了 7 月 15 日汪精卫“分共”时，王明已离开了险地。8 月初，他同米夫一起到达了莫斯科。而这时，国内的共产党人正在举行八一南昌暴动，同敌人于血火中拼杀。

王明回到中山大学的时候，正是“中大”内“教务派”和“党务派”激烈斗争之际。教务派和党务派是怎么回事？情况是这样的。1927 年的夏天，校长拉狄克因为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被解除了校长职务，副校长米夫当时在中国，遂由教务长阿古尔接任了校长职，但没正式任命，仅为代理校长。时“中大”支部局书记为谢德尼可夫，谢与米夫关系甚好，米夫在去中国前，“中大”的一切工作都靠谢。当时，阿古尔同米夫有矛盾，米夫为孤立阿古尔，同谢关系就

更好了。阿古尔和米夫以及谢德尼可夫为争得中国学生的支持，都千方百计地拉拢学生。阿古尔依靠了在中国学生中最有影响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尤其是俞秀松，为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因为阿古尔是教务主任，负责学校的教务工作，故其依靠的学生为“教务派”，谢德尼可夫依靠的学生有张闻天、沈泽民等，因其抓党务的，故称“党务派”。由于米夫和谢德尼可夫二人不睦，却在学校的许多问题上各执已见，因而，使得教务派和党务派的双方对立情绪很大。在1927年6月底学期的总结会上，两派双方就学校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持续了七天。双方不相上下。时有一些学生于此感到厌倦，便退出了双方的争吵，遂成了第三派。

就在双方争论的难解难分之际，王明回到了“中大”，他一见这架势，眼珠一转，断定这是替米夫扫除官场障碍，推倒阿古尔的极好时机。于是，王明向米夫献计，要米夫拉拢住中间派力量，这样便抓住了大多数，从而搞垮阿古尔和教务派。

米夫依了王明之计，果然成功。阿古尔被撤职，离开了中山大学。夫米稳稳地荣登了中山大学校长的宝座。这样一来，米夫对王明可高看了。原来米夫还只认为王明聪明，背马列词句头头是道，如今发现了王明在政治斗争中，手挽灵活，有头脑。时共产国际在分析中共革命失败的原因中，认为中共的领袖们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太低，需要培养马列水平高，且又能听共产国际话的领袖。王明的这一手，使米夫发现了王明是棵人参苗子，决定对王明下力培养，不久，王明就当了支部局的宣传干事。

王明献计把阿古尔搞下台，不仅在米夫面前得了宠，而且击败了他的几个竞争对手。这对手主要是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特别是俞秀松，不仅文化比王明高，理论造诣比王明深，且工作经验，党内的资历，学生中的威望，都大大地高于王明。王明一直把俞看成是自己前进路上的障碍，王明用计搞垮了教务派，使俞秀松受到

了压抑，他王明也去了块心病。

教务派搞垮之后，王明便开始编织自己的小宗派了，并逐渐地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一个小团体。对于王明的行为，“中大”的不少学生表示反感，王明听到耳内，看在眼内，便寻机对与己意见不一者进行打击。

磨道里没有找不见的驴蹄印，机会终于让他找到了。

自中国革命失败后，苏共内托洛茨基派便以此指责斯大材错误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并掀起反斯大林的声势。5 月 26 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八十四人联名上书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状告斯大林，说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和同英国断交等事件中，执行了一条对外政策方面的“左倾”错误路线，使苏联面临一场新的反苏战争的境地。斯大林不是吃素的，他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权，主持召开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将托洛茨基和季洛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1 月 7 日，是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托洛茨基派的一些人散发攻击斯大林的传单，在游行时，中国学生也参加了，而且有的学生还喊口号支持托洛茨基。11 月 14，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党籍。之后，斯大林指示米夫对中国学生拥护托洛茨基事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告联共(布)，这下子，王明可算逮住了有把的烧饼了，他别提多积极了，披挂上阵，冲锋在前。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查出了一些学生，最后，安福等十多人被遣送回国，还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被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有的受到了处分。

“中大”的激烈派系之争

王明投靠了米夫，上下一折腾，使他的地位更加巩固，他成了米夫面前的第一大红人，在这场反托派斗争中，凡与他意见不合

者，都被他当成了托派分子而排挤掉，他那小宗派的根子也在“中大”扎深了，一些投机分子，如后来成了叛徒的盛岳、李竹声、王云程、孙标明、汪盛荻当时都是王明小团体的骨干，抱着王明、米夫的粗腿，捞取政治资本。

王明的小宗派和中共党内后来出现的宗派基本一样，即：顺者昌，逆者亡，任人唯亲，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排斥异已。由于王明等小宗派对马列主义书本下功夫深，专门在背诵词句上下功夫，张口马克思、闭口马克思，对马列经典背得滚瓜烂熟，深得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加之又得到米夫的赏识，因而，王明成了共产国际要培养的中国真正的布什维克的理想的领导人。王明拉着米夫和共产国际的虎皮，成了“中大”的“无冕之王”，支配了全校同学的命运。

但是，“中大”的学生大都有思想，他们之中，仍有不少人对王明和米夫的行径进行抵制。中共“八七”会议，11 月临时中央的会议，支部没有传达。同学们对此很有意见，时同学们对校方的教学及生活方面也有不少意见。但王明站在了校方一面，极力为校当局辩护，这样一来，一些同学与校方的矛盾更为加剧。

王明为了进一步打击反对自己者，又寻找“磨道里的驴蹄印儿”，寻来找去，“驴蹄印儿”又被他找到了。

在当时“中大”毕业的中国学生，除了回国的之外，留下的有的升到其他学校，有的留在“中大”工作，还有的分配到其他学校工作。被王明击垮的教务派的学生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于 1927 年 11 月离开了“中大”，进入了列宁学院。但他们仍时常来“中大”，在“中大”同学影响也深，王明对他们恨之入骨。

时分配工作的学生，有的待遇好，有的待遇差。分配到军校学习工作的，因为按士兵待遇，津贴就特别少，而到各大学作翻译的，工资待遇就高。时有去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綦树功、云泽（即乌兰夫）的工资就高。

这一年暑假将过，就要开学时，左权、董亦湘、陈启礼分别由军事学院和列宁学院来到了东方大学孙冶方的住处，来这里的还有初级军校的肖劲光、蒋经国、李卓然等，俞秀松后来也赶到，这些人来敲孙冶方的"竹杠"，要孙买肉买菜做中国饭吃。孙冶方只得依从。正当众人热闹之际，有学生会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屋里有江苏、浙江口音的学生在说话，且人不少，心里一动，有了主意。这王长熙极善打小报告，拍王明的马屁，他见孙冶方屋中这么多人，便跑到了王明那里，说俞秀松、董亦湘等在搞"江浙同乡会"，又加油添醋地说了一遍，说这个同乡会焚香歃血为盟，要对付王明和米夫。

王明正在为如何将俞秀松、董亦湘打倒而犯愁，孙长熙的小报告可把他乐坏了，他立即向米夫报告，说江浙同乡会是个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的非法组织。米夫听了，也像抓了个有把地烧饼。王明向米夫建议：彻底调查些组织情况，严肃处理。米夫接受了王明建议，请来了苏联格别乌(K·P·V)人员参加调查。因为王明和米夫都是"中大"的要人，格别乌人员对王明和米夫的话都十分相信，草草的了解了一下就下了结论，认为"江浙同乡会"确实存在，并进行了非法活动，要严加惩处。

王明见苏方下了这样的结论，十分高兴，为把俞秀松等彻底搞垮，他觉得必须让中共要人了解此事，借中共要人之口，把他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拔掉。

刚好这时中共"六大"筹备工作在莫斯科举行，王明就通过米夫，向来莫斯科筹备"六大"的向忠发报告了此事，向忠发是个头脑极其简单的人，又没有文化，他听了米夫之言，便怒冲冲地来到了"中大"，发了一通演说，给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定了性，并说这个"江浙同乡会"与蒋介石有勾结，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其发展的结果是走向邓演达的第三党，甚至投到蒋介石的怀抱。"江浙同乡会"不仅有中央组织，还在各地有组织，是个十足的反党团体。这个

组织必须消灭，其核心人物必须严厉处制，对随从或开除党籍或开除学籍。

向忠发这么一说，中国的留苏学生可就乱了。苏联的校方依据中共领导人的发言，其处理手段升级，决定开除十二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并有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遭到株连。俞秀松被打成了托派。

因为“江浙同乡会”是凭空捏造的，受打击和受株连的学生自然不干。中共“六大”期间和之后，愤怒的同学们纷纷向中共中央、中央代表团申诉。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为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茂怀、王若飞，负责人为瞿秋白。瞿秋白见学生反映强烈，遂派邓中夏、余茂怀到中山大学调查真相，由于米夫和王明控制的支部局不与合作。邓、余很是生气。瞿秋白又经共产国际秘书长柏别斯的同意，派人前往格别乌机关查阅“江浙同乡会”的有关材料，但格别乌对中共的来人也不予理睬。瞿秋白只得亲自前往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江浙同乡会”的组织不予存在。1928 年 8 月 15 日，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给联共(布)政治局写了意见，同时写信于中共中央，报告了调查结果。

是年秋，共产国际监委，联共(布)监委，中共代表团组成了联合调查组，经过了一番调查之后，否定“江浙同乡会”的组织。周恩来到中山大学召开了全体师生会，予以公开否定。

由于中共代表团公开的支持与王明对立面的学生，王明便把矛头对准了中共驻国际代表团。

瞿秋白二次出任中共首脑

在中共“六大”期间，王明担任了“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他虽然不是大会的正式代表，但通过中共中央指定的中山大学、东方

大学参加大会的学生全部给予发言权的机会，他在会上夸夸其谈，背诵马列主义词句。同时，王明在会上还拍向忠发的马屁，博得了向忠发的好感。但瞿秋白、邓中夏等人对王明的夸夸其谈甚为反感，遂在会上建议：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被指定参加大会的学生发言不要只重复理论，其发言有时间就讲，没时间就不要讲。

"六大"会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然主张中共的任务是准备暴动。提出"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要中共必须坚持"城市中心论"。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这个指导思，于 1928 年 2 月 9 日至 25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即明确提出，王明遂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写了一本《武装暴动》的小册子，其长达万字的序言发表在当年 4 月 1 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上。"六大"间，王明把这个小册子塞到供代表们阅读的材料中。

在中共的"六大"上，米夫和王明一唱一和，后来周恩来回忆道：

> 米夫起的重要作用是：一、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指米夫—引者注)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拔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反中共驻国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二，造成了工学界限。例如他(指米夫—引者注)对向忠发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

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一般地说，代表们对米夫印象不好。三，在组织上起了影响些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例如，在“六大”工作人员的人选上，东方部的人员多，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

由于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的反对，王明在“六大”中没有爬上来，自此，他对瞿秋白、邓中夏等暗眼于心头。当“江浙同乡会”案被瞿秋白、邓中夏等中共代表团推翻后，王明对瞿秋白、邓中夏等更恨了。特别当他得知瞿秋白向共产国际负责人库西宁建议撤销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的职务后，对瞿简直恨之入骨。王明深知，瞿秋白有知识，有实际斗争经验，在党内外有极高的威信，是他夺权的极大障碍。王明决心斗倒瞿秋白。于是，他又制造了“第二条路线联盟”，矛头直指瞿秋白。

“第二条路线”是个甚？用王明的话说他和米夫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第一条路线，瞿秋白联合了中山大学内的“江浙同乡会”、“江浙同乡会残余”、“工人反对派”、“先锋主义派”、“托洛茨基派”等各种派别，组成了“第二条路线联盟”，反对以支部局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这里把王明制造的所谓“工人反对派”和“先锋主义派”介绍一下。

在中共于1927年惨败之后，中山大学召收学生的宗旨发生了变化，为了给中共培养有实际斗争经验的骨干，决定从工人阶级中招收骨干到中山大学学习。这样，有一批在大革命中表现突出的工人来到了中山大学。其中，有参加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工运骨干李剑如，武汉工运骨干余笃三、上海工运骨干吴福海等。这些人思想单纯，是非分明，斗争性强，他们对米夫、王明搞小宗派团体、打击诬陷不同意见的学生很是不满，因此，公开反对支部局，由于他们出身好，成分好，米夫一伙不敢对他们过分的打击。李剑如等公开

反对米夫等，而对瞿秋白、邓中夏等却又非常尊敬和爱戴。他们公开的画漫画攻击米夫是官僚主义者，对王明的批评也毫不掩饰。王明对他们又气又恨，就把一顶“工人反对派”帽子送给了这些人，谓其等反对支部局，反对米夫的正确路线和反领导。

“先锋主义派”是怎么回事呢？“先锋”即团员的代称，因为共青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中山大学内的团员中，有一部分人对王明的团团伙伙甚为反感，这些人中，尤以西门宗华、高承烈、林其涛等对王明最为反对。当时，西门宗华担任中山大学团的宣传长。一次，西门宗华召开团的宣传会议，并请一位苏联人来讲演，一切都准备好时，王明突然决定不让开了，说党组织有活动。因为一切都准备好了，并请了苏联人，所以西门宗华就没有照王明指示办，继续开会，这下子更惹恼了王明，王明本来就对西门宗华等人恼恨于心，如今西门宗华胆敢如此，他王明岂能善罢干休，遂将一顶“先锋主义派”的帽子不大不小的扣在了西门宗华等人头上，说他们是先锋主义，不遵守党的决定，与支部局对抗，不久，支部局以“先锋主义”的罪名将西门宗华等人开除团籍，送回国，高承烈、林其涛等被送到西伯利亚当苦工。

王明等明反“工人反对派”、“先锋主义”、“江浙同乡会残余”等，暗中把矛头对准瞿秋白为领导的中共负责人，时王明与瞿秋白间产生的原则分歧为：一是中间派是不是最危险的敌人；二是对中农的态度；三是对赤色工会的态度；四为“左”倾是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是主要危险。“六大”之后，王明在米夫的安排下，又参加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翻译工作，并兼做中国交通局的中国交通工作。不久，王明害了病，病愈之后，其被安排回到国内，时为 1929 年 3 月。这一年，王明仅廿五岁。

对于王明回国，米夫可谓尽遏全力地推荐，其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中共中央对王明要妥善安排。时王明怀抱一腔冲霄状志，要大显身手了。其赋诗《抵上海》一首，表

示其胸中的抱负。诗中写道：

> 方酣春意独还乡，别意离怀万里长。
> 西闻天鹰歌织女，东听河鼓笑牛郎。
> 域中乡市争红白，沪上风光夺暗光。
> 到此一心为战斗，冲霄壮志正昂扬，正昂扬！

王明的这首诗，前半部情意绵绵，怀念在中山大学的女学生孟庆树，孟长得很漂亮，是王明追逐的目标，但孟对王明没有好感，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直到王明回国，孟还没有点头同意，所以王明于诗中露思念孟之情。

王明回国时，正值李立三掌握中共大权之际。由于王明从校门到校门，没有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米夫电示中共要对王明重用，然李立三仍然只安排王明担任了上海沪西区委作宣传工作。7月后，周恩来又将其调到中共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作《红旗》报通讯员。

时沪东区委书记是何孟雄。前文述过，何乃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早期党员，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大革命失败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1929年4月由沪西区委书记调到沪东来。何对王明寄希望很大，对王明各方面都很关心，鼓励王明深入基层，但王明擅长的是笔杆子，他对深入基层极不感兴趣。对中共中央的安排极为不满，他认为中共对他是有才不用，因此，他对李立三等十分恼恨。后来，他通过"后门"——向他在"中大"的同学、当时担任中宣部秘书的潘文郁求救，才调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红旗》报担任了编辑和采访员。时李立三兼任中宣部部长。

王明从1929年9月到《红旗》报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他先后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红旗》报上以"韶玉""石""慕石"的笔名发表了三十五篇文章。文章的思想，几乎都来自

共产国际，用共产国际的思想，来评论国内政治斗争。其文章所宣传的思想，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其错误方面，主要是鼓吹"城市中心论"、"武装保卫苏联"等不切实际的工人武装暴动，强调中国革命的危险是右倾，不是"左"倾，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0 年 1 月 12 日，王明在参加上海工联于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一次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上被捕，被关在提兰桥监狱。时王明打扮成工人模样，巡捕没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但暗示他有钱便可以放出。这样，王明便写了个地址，让监狱看守按地址去索钱。这个地址是《红旗》报的秘密机关，幸亏看守只索钱，才没造成更大损失，但《红旗》报机关只得转移，王明于 12 月 18 日上午出狱。

王明出狱后，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中共中央，信中对自己暴露机关地址的错误躲躲闪闪，避重就轻。一封信写给米夫，说他回国之后，中共不拿他当人看，让他到危险的斗争前沿，被捕后遭毒打，但自己表现的很勇敢等等。米夫见信后大发雷霆，一面夸讲王明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典范，一面斥责李立三对王明不重用。在四中全会前，米夫给李立三写信，向李立三陈明他的态度。

但中共中央在查明事实真相后，依然于 1930 年 3 月 16 日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并希望他能够接受批评，勇于改正错误。与此同时，中央将王明调离《红旗》报社，让他到全国总工会工作，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时全总委员长是项英、秘书长罗章龙，和王明同来的还有博古。

王明到了全总之后，他找到罗章龙，说："我很想和你谈谈。"

罗章龙，原名敖阶，又名纵宇、景云等，湖南浏阳人。其在北大文科院哲学系学习时，于 1920 年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 10 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共内资历较深的党的领导人之一。罗章龙遂与王明进行了长谈。王明说了他在中山大学的情况后，哭丧着脸说："东方部派我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

的，是要我做领导工作的。这一点，你要认识。"没等罗章龙开口，王明又说："中国的共产党自建立以来，不懂马列，非常幼稚。一贯右倾，这个党需要从上到下加以改造。"

罗章龙见王明口出狂言，甚为反感，遂批评他要虚心。王明强辩说："这话不是我的意思，是共产国际的。"

罗章龙说："无论是谁，不管他权势多大，职位多高，都要尊重中国的实际。"

王明提出要在全总向大家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看法，罗章龙不仅不从，他还把王明的狂言告诉了全总其他人员，全总的工作人员对王明都很反感。王明见自己官场上失意，前途渺茫，心甚苦闷。时有王凤飞者，与王明很谈得来，1930 年 3 月的一天，二人到了一起，发了阵牢骚，犯了阵自由主义，骂了阵中央，时王凤飞给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召开"七大"，王明也告诉王凤飞说他与共产国际有联系。二人的牢骚被人得知，报告了有关方面，王明和王凤飞都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自此，王明更加消极。连文章也懒得写了。

也是他时来运转。1930 年 5 月，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四个新军阀发动了中原大战，而在这时，李立三于 6 月 11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通过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使其"左"倾冒险主义占了统治地位。李立三的思想，正与王明的思想吻合，王明遂又抖擞精神，披挂上阵，写了一篇又一篇鼓吹暴动的文章，为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摇旗呐喊。时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了《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王明立即亦步亦趋，遂以"韶玉"的笔名，发表了《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的文章，与李立三的文章观点完全一致，内称：

反对军阀制度与军阀战争的浪潮，卷进千百万亿的群众。全国主要城市的工人斗争，已经走到政治同盟罢工

> 和直接武装冲突的形式；农民运动在南中国各省表现出显著的高潮，苏维埃区域已蔓延八九省的地域，工农红军迅速在七八省范围内建立和扩大；兵士成营成团成旅的哗变，很多投到革命群众方面去；要饭吃、要和平、反捐税的斗争，在贫民群众中益普遍和深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积极起来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并且其中一部分深切同情于工农革命运动。不仅共产党和总工会正在号召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不仅共产党正在领导、准备和布置全中国的武装暴动，不仅共产党及工农群众正在准备在武汉区域开始建立苏维埃政府，即统治阶级本身也深切地感到"赤化"全中国和红军占领武汉的危险已经迫在目前。帝国主义与整个统治阶级都一齐在革命的怒潮之前发抖！

时李立三正张口"进攻"、闭口"暴动"，王明也起劲地喊"进攻"、"暴动"、"罢工"，并在文章中反复强调："即使暴动，罢工失败但仍不失政治上伟大胜利的意义。"

由于王明积极地追随李立三，拼命拍李立三的马屁，李立三又对王明有了好感，遂将其又调到中宣部任秘书。

前文述过，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形成前后，遭到了中共党内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对此王明不放在心上，而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罗伯特的反对，特别是共产国际对李立三主持制定的《决议》迟迟不批准，使王明决心调转了枪口，他把矛头又对准了李立三。

这天，王明得知李立三要于7月9日召开政治讨论会，讨论《决议》执行的事宜，遂与"中大"回国的同学王稼祥、何子述、博古等一起，私下里开了碰头会，彼此交换看法，四人不谋而合决定于政治讨论会上对李立三发难。

对于7月9日的政治讨论会，前文已述过，这里再略作介绍，此会由李立三主持。会议一开始，李立三便讲了会议的宗旨，讲了如何贯彻决议事宜。李立三话音刚落，何孟雄便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反对李立三的发言和《决议》。何的发言，使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何发言后，王明向博古一使眼神，博古便起身发言，发表了反对《决议》的意见。接着，王稼祥、何子述也向李立三开了火。轮到王明时，王明舞臂挥手，引经据典，一条一条地对《决议》进行批驳，并当场把马列著作拿了出来，与李立三、向忠发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李立三、向忠发虽为中共最高首脑，但谈起马列主义理论，却远不如王明等，自然不肯向王明等人让步低头，争论不过，李、向羞恼成臊，遂动用手中的权力，用家长作风，把"右倾"、"小组织者"的帽子扣到了王明、博古等人的头上。向忠发还当场宣布撤销王明中宣部秘书的职务。

王明因为知道共产国际不支持李立三，便没把李立三、向忠发放在眼内，于次日又写信于中共中央，再次陈述其反对《决议》的意见。信中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

王明的"万言上书"，使李立三、向忠发更加恼火，遂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王明六个月的留党察看的处分。同时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以严重警告的处分。之后，将王明调到了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何子述调天津，王稼祥调香港，只有博古暂留机关。

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是李维汉，宣传部长夏采曦，秘书是李初梨。王明被分配到李初梨手下当干事。为了进一步打击王明的气焰，李立三还专门到了江苏省委，向李维汉、李初梨等交待要对王明思想进行帮助，王明对来这里工作自然气恼，然他心里有数，自谓"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

前文述过，7月16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召开了扩大会议，

吸收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等人参加，讨论中国的问题，于23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会上批评了中共犯了严重的错误。并指派周恩来、瞿秋白迅速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错误。周、瞿回国后，即于9月24日至28日，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上一面批评“立三路线”，一面又对何孟雄点名批判。

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批判，王明自然举双手拥护，出了他胸中一口闷气。但是，他对会议的主持瞿秋白，却耿耿于怀。因为在中山大学时，王明同瞿秋白便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有分歧，瞿秋白对王明搞小宗派行为，曾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支持“中大”的大多数学生反对他小宗派，因此，王明对瞿秋白十分恼恨，如今瞿秋白回国主持召开三中全会，主持了中共的工作，这对于王明来说，真不亚如晴天霹雳。尤其使王明生气的是，王明因反立三路线受了处分，如今应当是英雄了，可瞿秋白不仅对他不加以褒奖和重用，且连李立三给他的处分都没撤掉。

王明对瞿秋白简直恨之入骨了。

时中共中央决定王明到江西苏区工作。王明更是气恼于心，正当叹自己时运不至、要动身前往苏区之时，夏曦、沈泽民、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人回到了国内，这些人给王明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喜讯：共产国际在收到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之后，很不满意，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三中全会“抹煞两条路线原则上的区别”。批评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犯了“调和错误”。是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写了《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十月来信”。但共产国际的信还没到中共中央时，沈泽民、夏曦、凯丰等人从米夫那里得知，这些人回国后，没向中共中央报告，却暗里告诉了王明，王明听了，真是欢喜异常，如同将溺水即死的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他马上气盛起来，他不仅拒绝去江西苏区，而且与博古一起，于11月13日，联

名向中共中央写了信。内称：

> 我们认为这些错误(指三中全会而言—引者注)不是偶然的，而是过去李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的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起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位)。……但是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是对于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差误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方法(各种会议、党报上的解释等)迅速地传达国际路线到下级干部中去。

11月17日，王明和博古再次联名写信于中共中央，内称：

> 立三同志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的文章发表……不是简单的个别错误，而是有一贯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在这种总路线下产生的策略路线、组织任务和工作方式与方法将都要形成“左”倾与右倾的机会主义错误。……不顾立三同志对我们的威吓，依然提出自己的列宁主义的意见。……我们为顾全中央及立三同志的个人威信和免因残酷争论引起工作损失起见，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我们只提出我们自己的正确意见……相信共产国际的来信一定能够证实到底哪种路线是符合于

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哪种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路线。

在信的最后，王明、博古提出：

一、正式公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二、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三、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王明决定不去江西苏区后，就擅自离开了江苏省委，搬到了斗鸡桥去住。

前文述过了中共中央接到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后，十分重视，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五天的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十一月补充决议"。决议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但是，中央对王明等知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却不向中央报告，而是采取向中央突然发难的作法，进行了批评。

瞿秋白在其报告中指出：

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他们知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惊奇与发生其他倾向……使同志们惊慌不明。……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政治局的扩大会上也讨论了王明、博古的两封信，认为王明、博古同李立三的立场基本一致，分歧很小。王、博要求将他们与立

三的争论公布于党，是算旧帐的方式，是从个人成见出发，与国际来信的意思没有相同之处。因此，会议否决了王、博等人要在党内挑起争论的要求。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上对王明、博古等拒不服从组织分配，违反组织原则，在党内犯自由主义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周的报告指出：

> 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们的超组织的活动，在过去与伯山（即李立三——引者注）同志争论的四个同志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问题上是对的，但陈韶玉（即王明—引者注）、秦邦宪（即博古—引者注）等同志则借此扩大发展他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应当的。在韶玉同志"开始在主要几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问题"的文章上面"夺取武汉这一可能的前途，成为不远将来的事实"，"夺取武汉的胜利，有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并且是中国现阶段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始。"他这样的观点与伯山同志是同样错误的。这证明韶玉同志对于这些问题也没有弄清楚。

王明倚仗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对瞿秋白、周恩来及中央的批评，毫不放在心上。他继续摇动反六届三中全会的大旗。12月14日，王明在《实话》上发表了《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文章，再次攻击三中全会。在王明、博古的摇旗呐喊中，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江苏省委的干部、罗章龙、徐锡根等全总和上海工联的干部及工人，纷纷卷入反三中全会的浪潮中。这股狂浪，使中共中央的领导威望急剧下降。

这时候，王明又向中共中央上送了《两条路线》的意见书。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这意见书是王明于

11 月间突击写成的。成稿后，由反立三路线的几十个人看过，王明根据这些人的提议而进行了修改。其内容主要认为“立三路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与实际”、“托陈取消派从‘左方’来取消革命，李立三同志从右方来取消革命”。李立三的路线本是使“八七”会议开始的“左”倾冒险主义达到了顶峰，而王明却认为“立三路线”右倾。足见王明宣扬的路线“左”到何等地步。中共“七大”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

……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 1929 年以来就存在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的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

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份”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在王明、博古、何孟雄、罗章龙等方方面面起劲攻击六届三中全会间，中共中央面对共产国际的压力和王明等人的一片反对声浪，只得接受王明等人的意见。于12月11日，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并决定将这《决议》和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等四个文件下发全党。但王明等仍然不依不饶，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说要“从根本上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

米夫的高压之策

就在三中全会风波趋于平和之时，米夫来华了，米夫的来华，又顿使中共内部，风浪大作，沉渣浮起，几将中共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米夫是1930年12月10日左右由德国秘密来到中国的。其身分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共的工作。

米夫对中共对王明的使用一直不满，加之对王明的处分和“打击”，对中共就更加不满了。因此，他到了中国之后，不是去见中共的高层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人，向瞿、周了解情况，调解中共内部方方面面的矛盾，而是首先见王明。王明见了米夫，真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般，又好像他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抱着米夫就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得别提多伤心了，而后，又加油添醋地向米夫讲了他受到的种种“迫害”。米夫少不了安慰了他一番。并暗暗告诉王明，他此来的目的是赶瞿秋白下台，要王明做好“登基”的准备。接着，米夫又在王明的安排下，接见了罗章龙、徐锡根等反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方方面面的人，唯有何孟雄，米夫拒不接见。米夫说何的思想右倾，几与陈独秀的思想同出一辙。

米夫了解了中共内部各方争斗的情况后，对王明提出的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持否定，他决定亲自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便把王明推上台。米夫决心下过之后，这才同瞿秋白等人晤面。一见面，米夫就提出召开四中全会。

瞿秋白对米夫深有了解。对米夫来华后不先与中共领导人会面，而是先找王明等人，瞿已知晓，但因米夫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为中共的“太上皇”，瞿秋白虽然一肚子不高兴，也只有吞在肚内，米夫说甚就是甚了。

12月16日，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此为米夫大树特树王明形象的第一步。《决议》内称：

> 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中，韶玉等四同志反对此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认为韶玉等四同志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韶玉等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罪名，给韶玉同志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其他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

同日的会议上，亦做出了《关于何孟雄问题的决议》，宣布取消对何的处分，并决定公开何的意见书。

在这个会上，瞿秋白在米夫的高压之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讨，直到把三中全会说的一无是处，并同意公开向全党承认、检讨自己犯了"调和主义"严重错误，米夫才松了嘴，周恩来也本着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原则，同意米夫的主张。

在这个会上，在米夫的高压下，中共中央被迫发出了《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其副标为"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内容不仅夸大立三路线的为害，还把三中全会说的一无是处。因为米夫代表着共产国际，是中共的太上皇，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虽然众人不服，也只得屈从。

米夫对瞿秋白、周恩来等实行高压手段，而对向忠发却另眼高看。

米夫为何对向忠发高看呢?因为在米夫的脑子里，装的完全是斯大林的"左"倾杂货，认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能代表工人阶级，所以，他决定留用向忠发，另一点，米夫也看到向忠发是个傀儡书记，能为王明所利用。

米夫三捧两吹的，就把王明捧成了"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的英雄"。12 月 25 日，也就是米夫到达中国后不到十天，就把王明提拔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即江苏省委，三中全会后改为江南省委--作者注)、博古被提拔为团中央宣传部长。江南省委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数省。原江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被派到苏联学习。时江南省委委员有何孟雄、夏采曦、许畏三、沈先定、陈资平、蒋云。

米夫的支持，使王明的腰板硬了，气也粗了。时江南省委，不仅是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而对中共来说，其党员的人数，所能领导的产业工人的人数，也为全国之首，因而江南省对于中共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米夫把年仅廿六岁的王明放到这里，真是中共的悲剧。

王明到了江南省委委员的位置之后，第一个打击的对象就是何孟雄。前文述过，何孟雄在中共内资历深，有见解，尤其在江南省委内有很高的威望、王明知道，自己要在江南省委内称王称霸，必须搞垮何孟雄，何孟雄搞垮了，其他不服自己的人也就都服了。

如何打倒何孟雄?王明眼珠转了一番，想出个主意，决定在贯彻中央九十六号紧急通告会上对何发难。

12 月 30 日，王明以讨论九十六号通知为名，召开了扩大的上海产业和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开会之前，王明把他的心腹都召集到一起，暗授机宜，要他们于会上向何发难，将何搞垮。会议开始之后，由王明首先做报告，王明在报告里大讲了他那"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而奋斗"的思想，大骂李立三，同时指桑骂槐地骂何孟雄和罗章龙等，说他们是假的拥护共产国际者，自己才是真正的拥护

共产国际者。说罗章龙分裂党、何孟雄进行反党。说李立三、何孟雄、罗章龙、瞿秋白统统都是反共产国际的，自己同何、罗、李、瞿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自己是真正的英雄。

王明发言之后，他那小宗派内的人相继发言，这些人起劲地吹捧王明，攻击何孟雄是在"反立三路线的掩盖下发挥自己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发言一个比一个激烈，一个王明的亲信竟破口大骂何孟雄是"右派"，是中共的败类。何孟雄几次要发言，都被主持会议的王明所阻止。最后，何忍无可忍，向王明提出了强烈抗议，王明这才让何发言。何孟雄摆了江苏和上海在立三路线下受到的巨大损失的事实，批评王明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和王的发言是"新的立三路线"，并严斥了王明一伙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的小宗派行为。何的发言有理有节，直说的与会者心服口服，一些跟王明跑的人都不吭声了。王明见势不妙，急急地下令休会。休会之后，王明便将其小宗派的骨干纠集到一起，进行了密谋策划，商量了如何对付何孟雄。一番策划之后，继续开会。会议一开始，便展开了对何孟雄更疯狂地攻击。并不准何发言，何气得拂袖而退。王明即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告会议结束，并以组织纪律来压制不同意见者。

罗章龙也起劲地反对中共中央。他对九十六号通告仍采取否定的态度，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领导。1931 年的 1 月 1 日，罗章龙主持制定了《全总党团决议案》，"决议案"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向忠发、项英、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决议案"内称：

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

就在这时，米夫出来讲话了。

米夫为了将王明扶上台，思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将王明扶上中共最高领导的宝座。当米夫将他这决定告诉王明时，王明乐得嘴都合不住了，真恨不得趴在地上给米夫叩头，喊米夫几声亲爹。米夫对王明说："要搞个写作班子，把四中全会的决议准备好。"

王明吸了吸嘴唇说："写作的事好说，可我还有我的那些志同道合的人都不是中委和代表，不能参加会议，我们写了决议，那些反对我们的通不过怎么办？"王明稍停又说："我断定了，在这会上，何孟雄、罗章龙一定公然反对，瞿秋白么，虽然不敢公开反对，暗里也会使反劲儿。"

米夫说："你说该怎么办？"

王明说："你要设法让我们这些人参加会，并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再有、对罗、何这些人的支持者，尽最大可能不让他们参加会。"

米夫点头。王明又说："会议时间不可开的过长，时间越长越麻烦。"

米夫把手一挥说："就开一天的时间，目的么，一是通过决议，二是选你掌权。"

王明听了，连连说好。

1931 年 1 月 7 日，米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址选在了上海武定路修德场 6 号(现在的武定路 930 弄 14 号)。时出席会议的代表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二人外，还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团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以及白区党的基层组织代表，共三十七人。这些代表中，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关向应、罗登贤、贺昌、顾顺章、罗章龙、陈云等。另有康生等二人作记录。为使王明入选，米夫也事先找中委、候补中委们，一个个地谈话，要他们选王明荣升高位。

虽然如此，米夫还不放心，因王明的资历太浅了，更要命的是，王明既不是中委，又不是代表，是没有资格参加四中全会的。米夫遂又采用高压手段，强迫中共中央增加了十五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这十五人是：王明、博古、沈泽民、夏曦、王稼祥、陈原道、何孟雄、韩连会、肖道德、袁乃祥、沈先定、许畏三、邱泮林、顾作霖、柯庆施。

有人问了；何孟雄是坚决反王明的，怎么也在十五人之列？这是米夫有意安排的。米夫想到这十五人若都是清一色的王明派，会引起到会者的反对，遂又增加了何孟雄，还有罗章龙派的邱泮林等。对于坚决反对王明小宗派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米夫采取了尽力不通知他们参加会的策略。尤其是罗章龙派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大都被米夫拒绝在外，非参加不可者，米夫采取事先不打招呼的做法。使与会者到会亦不知开甚会，令其思想上没任何准备。更有许多代表在开会前的几十分钟才接到通知。有的代表走进会场还不知开的什么会，有的代表被告知是召开紧急会议。

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列席代表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米夫则利用其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力，强行决定：王明等十五名列席代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米夫此举，开创了中共党内组织原则凭借手中权力可以随意捏弄的先例。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向忠发发言，他说："今天召开的会议，是六届四中全会。"向忠发的话音一落，那些不知内情的代表都吃惊地睁大眼睛，心说："这么重要的会怎么事先不通知一声。"这时，向忠发接着说："为了安全起见，这次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通知到所有中委和候补中委，因为中央已于最近召开了会议，发布了第九十六号中央紧急通告，所以，这次六届四中全会只开一天，这也是从安全起见。会议的议题么……"

向忠发刚说到这儿。韩连会马上站起来说："四中全会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有许多问题应当在这会上解决，应当在做好充分的准备后才能召开，大家连开什么会都不知道，就宣布召开四中全

会，这怎么能行？”

韩连会话音没落，王凤飞发言道：“开这么重要的会议，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一天内开完。六届二中全会开了六天，三中全会也开了五天，一天的会能解决什么问题？”

这时，又有一些代表要发言。米夫见势不好，他面孔一沉，站起身说：“四中全会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无论有多少问题，只要用共产国际的尺子去量，一切矛盾都会迎刃而解，就是说，共产国际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

米夫把共产国际的虎皮一扯，众人都不说话了，向忠发遂宣布开会议程，他说：“这次会议议题共八项，一、宣布开会；二、追悼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三、推选主席团；四、向忠发作政治报告；五、讨论；六、国际代表结论；七、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造政治局；八、闭会。”

向忠发刚刚说完，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徐兰芝突然闯进会场，他进门后即满面怒容地质问向忠发说：“你们是开什么会？”

时有人替向忠发说：“四中全会。”

徐兰芝听了，拍着桌子大声质问向忠发说：“我是中央候补委员，召开四中全会，为什么不通知我参加？”

原来，徐兰芝是支持罗章龙观点的人，米夫故意不通知他来开会，徐偶然得知了开会事宜，他很气愤，遂闯进了会场，一番质问，使向忠发张口结舌。

这时，余飞也站起身大声说：“这个会要改期，今天的会可作为紧急会议。”

王凤飞又起身发言，支持余飞的意见。王凤飞、余飞都是罗章龙派，徐、王、余三人发言后，罗章龙亦起身发言，质问向忠发，主张立即停止四中全会，改组中共领导。

罗章龙乃为一派之首领，罗的发言有一定号召力，他这一讲，会场上就乱了，又有不少人指责向忠发搞突然袭击，弄得向忠发不

知如何是好。米夫见状，急忙起身，他大声说："都嚷什么？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批准，并要马上召开的！谁反对四中全会召开，就是反共产国际！"

米夫话音一落，王明、夏曦、博古、沈泽民等都发言支持米夫。还有不少拍马屁的委员们也都表态支持米夫。米夫见状，遂决定进行表决，自然支持米夫的人多，会议遂决定继续进行。但是，余飞、韩连会等又提出四中全会应增加议定的日程，要把组织问题、军事工作、妇女青年问题等列入会议议题，会议日期延长三——四天。

余、韩建议，又遭到米夫等人的拒绝。

余、韩、还有史文彬、王凤飞、罗章龙都表示保留召开紧急会议的权利，何孟雄等也支持罗章龙派的意见。

米夫的高压使会议按原计划进行。于是，向忠发代表中央向会议提出了主席团名单，为：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

经表决，主席团经多数票通过。

接着，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这个报告是在米夫操纵下而成的，向忠发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报告共讲了十个问题，一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如何来指导中国党；二是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三是立三路线是怎么形成的，其理论系统是什么；四是立三路线的结果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态度；五是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是不是执行了坚决地转变；六是对共产国际的代表的不尊重；七是三中全会后中央与各地工作是否真正转变；八是共产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的转变；九是中共如何认识执行国际路线的责任；十是解决中共内各种反共产国际的思想。向忠发在报告中称：

> 六次大会后，中央的路线本是一般的正确的，党的坚定性和布尔塞维克化，也"都有很大的成绩"。可是，同时都又犯了一些个别的严重的错误，尤其在七十号通告后，

经过鄂代会、苏代会，立三路线逐渐形成，到了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立三路线便成为政治局的路线。尤其是正在中国革命高潮生长的紧要时期，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竟走到冒险盲动主义路线上去。……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别的，不是偶然的。这些错误是联系许多实质上根本上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布朗克主义，陈独秀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成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未肃清，六次大会后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之不正确的分析，联合富农及在黄色工会中的错误策略，对改组派的不正确的估量，都给立三路线以机会主义的基础，而组织上孙中山陈独秀的家长制度的复活，更保证着立三路线的发展与统治。……因为有这样一贯的反共产国际的方针，就不能不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态度。国际在纠正路线和克服中央一切错误中，是有绝对作用的。可是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立三同志及赞助他的同志，竟不顾国际代表的反对，而径行发表。六七月国际屡次来电指示，政治局表现着迟疑与反抗，并曾有几个抗议的电报发出。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立三同志竟敢用共产主义"左"右叛徒说过的话，来说国际不懂得中国情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这种反共产国际的斗争，不服从国际纪律，在当时竟得到政治局全体的同意；这种绝对不能容许的态度，便成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后到八月这一期间的中央反列宁主义路线的主要前提。……共产国际要中国党完全揭露立三同志的"理论"，完全克服他在实行上的一切反共产国际的方针，而走到国际的指示和决议的轨道上来。三中全会是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之

上来接受国际决议案，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成为调和路线，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的态度，是不可容许的。三中全会前，已经违反着国际纪律。三中全会时，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始终不同意当时国际代表的意见。……这和意见，国际代表屡次提出，然而政治局终是反对，因此没有加入三中全会决议案，而且这种问题又没有清楚报告，以致国际代表不能及时的纠正中央政治局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因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与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最主要的责任是要秋白同志负的。……三中会全后中央与各地工作有没有真正转变呢？我们回答是没有的。很明显的因为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造成的结果。……三中全会后，各局各省委的扩大会，也都是继续着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有的地方如顺直，还更加扩大起来，使立三路线得以完全继续。这样，对于执行国际路线的真正转变，自然做不到了。……中央政治局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补充决议，是完全同意了国际的来信，指出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这样，又向着转变到国际路线方向走了一步。可是因为这决议又说三中全会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的路线，所以这个决议案的意义，始终是模糊了，而不能不说还有调和主义的错误。……九十六号通告是将调和路线放弃了，回到国际路线上来，纠正了政治局的错误和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的错误。但是，这个通告还有其他的错误可以批评：一、这个通告没有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反而说到党的危机。……二、通告上说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已经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不正确的。这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面前，解除了党的武装，就是说，党将没有根据来反对掩盖在反立三路线之下的右倾分子的活

动。三、这个通告对于中央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的解释一字不提，只说中央一直到最近只在继续立三路线，这是不正确的，而且也不合事实。……现在国民党军阀调动二十五师以上的兵力，动员一切反动统治的阶级力量，从各方面向革命进攻。……革命势力能否冲破敌人的包围，击退反革命的进攻，主要的要看全党有没有决心去执行国际的决议。如果全党的布尔塞维克像一个人一样团结来，一致的实行国际的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一定能领导群众，去冲破敌人的"围剿"，走向革命的伟大胜利。

为着实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和决议，中央政治局特向扩大的四中全会，提出下列不可迟缓的任务：

接着，向忠发又讲了八点任务。这八点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继续在全党内批判立三路线和克服调和主义的错误，取消三中全会补选的李立三的中央委员，引进在反立三主义斗争中拥护国际路线的人，并重新审查政治的成分。说穿了，就是引进王明一伙小宗派的人掌握中共中央大权。另一点是继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向忠发说："党要反对'左'倾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关门主义，尤其在立三路线揭发之后，更加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富农路线，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党必须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去进行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斗争，要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反对由这一斗争所产生的各种偏向，如极端民主化与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等等，尤其要反对的还是以各种形式来掩藏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错误的企图。同时更要绝对的反对托陈取消派破坏中国党中国革命的阴谋，这对于革命的领导是最大的危害。"

向忠发于报告中的两点，说来说去一是冠冕堂皇地扶王明等

亲共产国际的上台，一是把与共产国际意见不同者统统打下去。

向忠发报告完了，那些与王明意见不和的人立时听出这报告不对味儿。工人出身的张金保第一个发言，她虽是个女同志，但说话很利索。她说："四中全会开的太突然，忠发同志的报告，与许多提法，需要认真的讨论，而只一天的时间，这怎么行？如何从立三路线中接受教训，只有亲身参加实践的同志才有真正的了解，而我们的会扩大的列席代表，都是念书的出身。"她指着王明说："你们读书写文章行，真刀真枪的干革命差远啦！"

张金保讲话时，米夫听着味儿不对，他不认识张，便向身边人了解张的情况。张金保发言后，王明马上起身说："我的关于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理论与实际的意见书（即《两条路线》小册子——作者注），今天没有拿来，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对于意见书的内容，不多讲了，希望同志们详细看看就是了。"王明提高了嗓门儿："立三路线的错误是什么呢？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这在每个问题上都表现得极为明显。"王明稍停又说："在长沙占领后，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头脑热得发晕了，他们大声喊着：得了！得了！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已经来了！再不暴动，更待何时！？于是便决定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王明挥着手，唾沫纷飞地说："他李立三根据所谓'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这一断定，便无常识地来否认列宁的资本主义发展没有什么不平衡；因此，他便一方而否认苏联可以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对苏联抱悲观失望的心理；另方面，他否认中国革命在现在世界革命高潮生长的基础上，在国内几万万劳苦群众力量的基础上，可以首先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他只看到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只看到中国半殖民地革命这一特点，便感到没有办法，而看不到中国革命的优点，因此，他不相信苏联的力量，不相信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力量，不相信中国几万万劳苦群众的力量，以为中国革命只可

以爆发，而不能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他李立三以为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他在没有办法时，想出了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在全世界革命大爆发中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一齐战胜帝国主义的胜利。在全世界革命同时一齐胜利的'左'倾空谈之下否认中国革命可以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持续的可能，他是在全国革命同时一齐胜利的'左'倾词句之下，来否认和取消中国革命在全国新高潮之下有一个或几个主要省区省先胜利的可能！"王明说到这里，他把桌子一拍："他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指导思想不正确，他组织自由大同盟去争取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分子，他公开主张联合富农或至少是不反对不兼半封建的富农，他李立三不了解中国革命在现在革命阶段中已经存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内容和意义。"王明讲到这儿，把话锋一转，又对准瞿秋白，他盛气凌人地说："瞿秋白同志本来是奉共产国际之命来解决立三路问题的，但他采取了调和的态度，曲解了国际决议，说明他的思想上与李立三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他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王明骂了阵瞿秋白，又指鸡骂狗地把罗章龙、何孟雄等反对他的人骂了一番，他提出要改造中共，要改造中共就要在党内展开政治斗争，而且要使这种政治斗争不断发展。王明大声说："我们的党要在斗争中发展新干部！要在斗争中取代旧干部！"

——四中全会，拉开了中共内部残酷斗争的序幕。直到文化大革命，使残酷斗争达到了顶峰。

王明的发言，完全是共产国际对中共问题批评和指令的翻版，成为共产国际的代言人。王明的发言，米夫听着十分入耳，他不时的点头，表示对王明发言观点的赞同。

由于王明的发言很长，占了会议的不少时间，其他代表已无有多少发言的时间了，米夫看了下表，当即宣布，发言时间要短，会议必须在晚上10时前结束。

米夫讲完之后，又有十几个人发言，大都是王明小宗派内的人，这些人的发言自然是随帮唱影，鹦鹉学舌，跟着王明、米夫的舌头转，而且使别人插不上嘴，这时，何孟雄忍不住了，他抢着发言说："应当让政治局的同志们先发言，听听他们是否改正了错误。"

何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接着周恩来起身发言。他说："立三路线错了这已成为事实，但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的，若都被划成了立三路线的人，这就不对了。李立三对错误应负主要的责任，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下面的同志，认识到立三路线的错误就行了。目前我们党正处在困难时期，而立三路线涣散了我们党，现在的任务是加紧将它恢复与健全起来。若把凡与立三同志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说成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周恩来稍停又说："解决立三路线问题，应从维护全党的利益出发，不能从小派别的观念出发，如果站在派别观念上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所允许的。"

周恩来发言之后，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顾作霖等相继发言。接着，何孟雄又起身发言，时瞿秋白在发言中很诚恳地检讨了自己，何说："秋白同志已找到了他思想上的根源，这说明他已进步了。"

接着，何孟雄又批评了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错误，要求改组中央领导。之后，王稼祥发言，王稼祥对立三路线和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进行了严励地批评之后，对王明等人搞小宗派的活动，也进行了批评。王稼祥说："王明同志，我们四人受到了立三的中央处分之后，尽管这个处分是错误的，可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党员个人，思想上可以保留意见，行动上却必须坚决服从。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党的组织原则。王明同志，你可不是这样，你拒不服从党的决定，不接受新分配的工作，还不断和一些同志发泄不满，我认为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应当引起党、特别是你本人的注意。"

王稼祥的发言，使王明大为不满，他的脸一红一白的，待王稼祥发言之后，王明要发作，米夫向他使了个眼色，王明才没开口，可脸色仍憋得像鸡下蛋似的。——会后，米夫对王明说，他所以没让王明发作，是因为在中共之内，像王稼祥这样的理论家不多，以后还要不断地用他，应当拉住才是。米夫的话对王明来说，如同圣旨，他心中虽然怒气不息，也还是忍住了。

王稼祥发言之后，罗章龙发言。罗坚决地要求解散中央，重新改组中共。这时时已到了晚上。米夫看了下怀表说："已经有十八个同志发了言，意见大多谈出，时间很紧，重复的话不要再说，发言的每人限定五分钟。"

接着，罗章龙派的王克全等发言。继尔又有几人发言，之后，米夫即不再让与会者发言了，米夫说："现在宣布会议讨论结束，请同志们原谅，在四中全会之前，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共同致信国际，保证扩大的四中全会安全举行，但白色恐怖不允许我们开会时间过长，今晚10时半必须结束会议，这是我们的责任，廖山同志来迟，要求发言，但我们不能因此动摇了我们会议的时间，动摇了对国际的保证，另约时间再与他会谈。结论只说三个问题，一是李立三主义，二是调和主义，三是四中全会和党以后应该如何去工作。"米夫停了下继续说："为什么中央的一切同志都无条件的服从立三主义？全总在取消工会时，没有反抗？C·Y·在取消青年团时，也没有反抗，主要是同志们被立三路线的'左'倾的词句抓住了，如秋白、恩来也是如此，被'左'倾的词句抓住，结果使立三路线来与国际路线反抗。在六七月间，我们如果如立三路线一样的认为当时已经是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的确将使党受到损失更为厉害。如果我们清楚的认识立三路线是退却的，是与真正进攻的路线不相容的，即不会发生调和主义。调和主义的发生，根本没有认识立三路线的根本性，同志们只以为他是夸大的，只说他是热血的革命家，这样估量是不对的，他的路线，与真正的、革命的路线是不相容的，是反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于暴动的前提也是不相容的，立三路线使党、青年团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受到了大大的损害。我们要明显的认识，国际批评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热血的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盲动主义的英雄，——一个披着冒险主义外套的颓丧的小资产阶级，所以在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时期，我们要彻底的打击和肃清立三主义……甚么是政治局对立三政策取妥协的调和态度以及发生许多动摇的原因呢？无疑是没有明显认识清楚立三主义的根本性质。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却认为：立三主义并不怎么险恶啊，立三只是过分估计了现在的形势，所以要举行暴动，他是个过于热血的革命家。"米夫讲到这里时，他斥责了这种认识。为了使读者看着明白，笔者把米夫在四中全会所做的结论的讲话纪录稿，摘录于下：

> 立三主义这种估计对于党是错误和不幸的，它的理论及实际与进攻路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义内）是绝不相容的，它与有系统的组织及领导革命，与有系统的建立暴动底前提无丝毫相同之处，立三主义的系统是领导党及群众走向失败，解体及解散的系统。在对于党这样严重的三个月（六月、七月、八月）中无疑的还无有直接革命形势；即使已经有了这样的形势，立三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亦必会使党破产。
>
> 应该绝对的了解，共产国际之所以严厉的批评立三路线，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太热心的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冒险辞句的英雄，因为他不是革命的组织者。站在全国暴动与中国革命胜利的观点上我们△△集（原文如此——引者注）中火力反对消灭党而不能使革命胜利的立三路线。为了在城市中能真正有力的组织与领导群众罢工，我们应（批评）立三对于总罢工的空谈。为了真正的获

得与保持中心城市，我们应批评立（三）在武汉与南京的冒险政策。从暴动的观点上我们应批评立三这种冒险的机会主义。

从六月到八月间的形势是怎样的呢？毫无怀疑的我们当时是在剧烈的形势与运动高涨的时期中。军阀战争与革命化的形势普及到更多的省份中，农民暴动一天天的蔓延，苏维埃区域渐次广大起来，红军有伟大的成绩。国民党军队士兵群众逞（呈）现不安的情绪，时常发生兵变。小资产阶级亦日益急进化，在城市中还无有广大的群众运动——这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无有广大的群众运动——这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无力量领导与组织工人群众——但是罢工的浪潮是增涨的。……在这种很顺利的形势下党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可以扩大他在工农及士兵群众的影响。如果党当时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党无疑的在对于群众的领导中可获得伟大的进步。共产国际当时曾这样警告党的领导：不要落在运动后面，不要冒险。

党本应根据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执行真正的进攻政策（在这个名词的真正的字义下），而立三却领导着党反对国际，并且采用了叛徒们所用的辞句："或者忠于共产国际的纪律，或者忠于中国革命。"

……

立三的第二步是六月十一号的政治决议。他自觉的将这个决议当作反共产国际的斗争纲领发给各级党部。这个决议是完成了所谓的立三主义的整个理论与实际。他反对共产国际的立场——集中苏维埃区域，建立铁的红军，创立苏维埃根据地与苏维埃中央政府。他反对我们发展与领导工人罢工以及在一切日常斗争中组织与领导工人的观点。他说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更不能保持此

胜利。

这是最无耻的机会主义与最卑鄙的悲观主义。他根本怀疑为革命争取工人群众，所以在他的暴动理论中工人是无作用的。……

在他对于苏维埃根据地问题的态度中亦明显的表现出这种机会主义与悲观主义：把苏维埃区域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全国革命的立时胜利，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不可能的，无有世界暴动与世界战争，全国革命胜利亦是不可能的。

……

但是立三在公开反对国际与执行他的冒险政策时：他有系统地解散了党，取消了青年团与群众组织。这是怎样的一个热血青年啊！党及赤色工会对于群众及工人斗争的关系再没有比政治局在立三领导下决定全中国暴动的时期那样削弱的了。

立三并且从托洛茨基那里借来了"左"倾的辞句。这不是进攻的路线。这个路线与列宁主义根本无有关系，他是原则上与共产国际的革命政策根本相对立的路线。

不承认错误是一个政治的危险。不把党彻底的从立三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中解放出来，党是不会向前进的。为甚么三中全会在党的真正转变中无有效果呢？为什么政治局在三中全会以后无有真正的实际结果呢？为甚么我们还不能改善工会的工作，不能加强我们的领导与扩大罢工的工作，不能在苏区内执行我们的政策以及加强我们士兵群众中的工作呢，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不能真正的在实际中执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呢？三中全会接受了这个决议的呵。

他的原因很明显的是，三中全会以及政治局的政策

不能造成在党内执行真正转变的前提。

……

现在讲到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问题。

三中全会为什么不能作出成绩来，他接受国际路线，决定扩大赤色工会，加紧农民运动，加强党与群众的关系，结果都是无效。因为他接受了立三路线的指示，谁要组织罢工，便是右倾。他一方面接受国际路线，一方面又接受立三路线……他一只手拿着立三路线，一只手拿着国际路线。这不是国际路线不对，而是三中全会将国际路线隐藏在立三路线后面，使党的力量涣散削弱，这是政治局同志应当负责的，尤其是秋白同志。

三中全会党的领导很聪明的，他一方面向共产国际行鞠躬礼，另一方面向立三主义行鞠躬礼，这样行鞠躬礼的时候，将国际路线推到立三路线的后面去了。

……

调和主义的中央政治局，不仅继续了立三路线，并且扩大了立三路线，给他一保障，涂改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秋白的文章，不仅没有揭破立三路线的根源，而且他一句不讲，比三中全会的决议还退后。在组织上三中全会是执行了斗争的，但不是反立三同志，而是反对那些反对立三同志的同志，如陈绍玉、沈泽民，这些同志是立三同志反对的，三中全会政治局仍是继续立三这一意见来反对。他们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这里记起立三同志说有同志送到莫斯科学习结果就没有希望了，但现在证明这些同志将他们所学习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的先执行国际路线，这样错误，政治局也是应当负责的。

共产国际的信到后，政治局同志才开始懂得三中全

会是作了一种混乱的工作，他的决议是使同志混乱起来。三中全会后，党的组织不能加强，红军不能健强，……这都说明三中全会必然的结果。在这时候，中央开始明了而渐转变到国际路线方面，此地可以看出国际来信之绝对的作用。……十一月二十五号决议是渐渐的转变向国际路线进了一步，九十六号通告是更进了第二步。同志说九十六号通告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是不正确的。在上面有许多错误，他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说清楚，没有指出实际工作联系，及说党的危机，但不是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继续。

今天差不多有三十余同志讲话，有些同志尽了他全部的力量来反对四中全会，赞成紧急会议，同志们请你们等一等，让我来解释，现在党到了一个混乱状态，敌人用尽一切力量来向我们进攻，我们应该作什么事呢？我们马上召集紧急会议是事实上不可能的。我们要在这混乱的状态中开四中全会来算算总帐，用斗争的力量来消灭他，进行真正的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坚决执行国际路线。这里并不是要几个派别来围着国际路线转，而是说要全党如一个人一样的一致在国际路线之下来斗争。如果召集紧急会议，能从工厂支部中选出代表来参加，但这决不是目前马上能作到的，须四五月后才能作到，这样的会议我赞成，但他不叫紧急会议而是七次代表大会，所以七次大会在七八月中秘密条件允许之下，可以举行。……我们不要空口去反立三路线，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反立三路线，四中全会是对这一工作的开始，今天（以）后我们来进到这样的进种中去吧（原文如此—引者注）！

同时在今天会议上每个同志要清醒的纠正自己的错误，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

> 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我们听到同志们讲话很惊奇的，投降派，什么叫投降派？如果立三同志在半年前投降国际，政治局三月以前投降国际，则党的状况更加加强了。如果这样是投降，我愿大家都来投降，这样提出派别是无有意义的。……锡根、于飞、章龙，反对立三路线是对的，但不能掩饰自己的错误，不能说我几个以前如何别个的反立三路线，在整个的立三路线之下，大家都有错误的。我们不要空喊反对立三路线，如果大家要撕裂党大家去发展好了，否则大家都要投降到国际来好了，如果全总党团再继续下去，那将要可以成为一个小组织。

米夫讲到这里，提高嗓门说："我再讲讲改造机关，改造机关主要完成国际与党的纪律，自然，应该吸引下层工人干部，但说要他们滚旦这是不负责的话。"米夫看了一眼向忠发，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一致而斗争，如忠发、锡根、向荣应、温裕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可我们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米夫又看了看周恩来，而后说："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米夫稍停又大声说："在今天的讨论中，我听到许多同志说了许多危险的话，如说党破产了，革命破产了，这是反革命的陈独秀取消派及托洛茨基派的意见，我们不是傻子，党没有破产，而是立三路线破产了。"米夫讲到这儿，很激动地把手一挥："同志们！反对立三路线，只有站在国际路线之下进行反对才是正确的。如蒋介石也是反对的，托陈派也是反对的。在党内，也发生了右倾的理论，如郭妙根的言论，即是托陈派的代言人，目前，中共党内的危险主要是右倾，我们要集中力量反对右倾，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立三路线中同时反对右倾路线。"米夫看了一眼何孟雄说："何孟雄

同志在发言中说现在没有右倾，这是错误的，这想法的本身就是右倾，是反国际路线的！”

接着，米夫又把王明吹捧了一番。

米夫讲完话后，便进行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夫于会前就把名单拟好了，他打算一宣布了事。这名单中，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黄苏、徐畏三、曾炳春九人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王明、陈郁、卢福坦、王克金、刘少奇五人为新的政治局候选人。三中全会时补选的中央委员罗迈、贺昌退出；李立三、瞿秋白、罗迈退出政治局。米夫要周恩来宣布这份名单，周恩来宣布后，米夫作了解释，他说这份名单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共同提议的名单。

名单一公布，会场上就乱了，首先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坚决的反对。罗章龙说：“政治局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立三路线执行者，应当彻底改造！”

时罗派的骨干韩连会提出了另一份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为：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顾顺章、王克全、韩连会、唐宏经、徐炳根、许畏三、将云等。

史文彬也随及提出了一份名单，为：刘成章、吴雨铭、李振瀛、袁乃祥、孟宪章等。这份名单将原中央政治局的人一律打倒。

何孟雄对米夫所提的名单进行了抨击。尤其对名单中的王明，批评的更为剧烈，要王明在会上说清他被捕和暴露机关一事。

由于几方对名单的人选争执不下，会场秩序顿时乱了。米夫当即宣布表决。罗章龙马上质问：“都哪些人有表决权？”

米夫说：“所有参加会的都有表决权。”

罗章龙听了，非常生气，说：“这不符合党的纪律。”说完，要拂袖退场，后经人拉住才算罢了。

米夫见状说：“章龙同志，应当安静的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

罗章龙怒气尚未退，袁乃祥听了米夫之语，气得拍案咆哮，结果被米夫勒令退出。

在米夫的压迫下，四中全会终于选举结束，通过了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补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政治局的委员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陈郁、任弼时；候补政治局委员七人：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

在表决中，有人提出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由于争执不下，对周进行了单独的表决，表决结果，多数人不同意周退出，这样，周恩来才继续留在政治局内。

时周恩来提出，既然王明等进入政治局，是否可让其他不同观点的同志也进入政治局，如何孟雄等。对于周恩来的建议，米夫坚决不同意。他再次强调，通过的这份名单是"国际名单"，只有执行权，没有修改权。其实，米夫的用意十分明显，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王明扶上台。而他终于借国际之威达到了目的，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成了屎克螂变知了——一步登天，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此后不久，其又成了政治局常委。

由于时间太紧和争论激烈，使得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没来得及通过，米夫说："时间来不及了，决议案由我们与政治局组织委员会审查。"

于是，会议执行主席徐锡根提出了一个"修改决议案委员会的名单"，为：王明、温裕成、周恩来、罗章龙、徐锡根五人。责成这个委员会在会后进行修改工作。

四中全会决议案于1931年1月24日在《实话》杂志发表。决议案无非是骂李立三反共产国际、中共全体党员该如何听从共产国际之语等等。

对于四中全会的结果，米夫是非常满意，而且认为是他的"得意之作"。他后来在他撰写的《英雄的中国》一书中写道：

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的斗争，在陈绍禹（王明）领导下，在党的上海支部开始了。为了正确路线而进行的斗争相当成功，陈绍禹同志把全党最优秀的力量团结到自己身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的最有才华的领导人陈绍禹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沈泽民和陈原道一起两面作战，使列宁、斯大林主张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得到了承认。

通过四中全会，王明终于爬上了中共的高位。

第五章　王明决心排除异已

康生其人

在中共四中全会上，有一个人，他虽然没有发言权，虽然不是代表，但他把中共内部的争斗，看得清清楚楚，此人就是担任会议记录的、后来成为中共党内专以整人而出名的康生。

康生于1898年冬一个风雪交加之日出生在山东胶县利民区大台庄一大地主之家，其排行老四。其曾祖父乃清代贡生，入京师国子监读过书。其祖父张葆元，亦饱读孔孟之书。其父张发祥，是个禀生。时清代规定，禀生由府、州和县按时发给银饷，以补助生活，其堂号"南树德堂"。

张家乃胶县闻名的祖传大地主，家大业大，仅地就有数千亩，出租于穷人，坐等收租。因此，张家成了胶县首屈一指的富户。

康生出生之后，其父为其起名张旺，意思是家中人丁兴旺。张旺八岁时，其父为其请了塾师，为其启蒙。张旺人很聪明，读书又用心，其父甚喜，盼其成龙。

张旺十三岁时，辛亥武昌首义，三百年的大清国被推翻。一时间，维新四起，县城里开办了新式学堂。由于张家是个封闭式家庭，对许多新的事物，看不上眼，老是怀念皇恩浩荡，因此，张旺虽十三岁了，其家中仍不要他去县里新式学校读书。

时有张旺的好友陈舜庭向张发祥为张旺求情，说张旺绝顶聪明，若出外读书，他年定成大器。张发祥见儿子呆在家中，游手好闲也不是长久之计，遂送其到青岛礼贤中学读书，自此，张旺改名张宗可。

礼贤中学为德国同善教会牧师理查德·卫立姆于1900年所创办。甚有名望，一般寒家子弟不可及。该学校的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宗可于礼贤中学学了数年，学得了不少在私塾中学不到的东西。1917年，张宗可于礼贤中学毕业了，时年十九岁。其雄心勃勃地想干番事业，然其时运不至，无论政界还是军界，就连生意场上，他都没有谋得一席之地，只得怏怏回府，于家中闲逛。颇有怀才不遇之感。

就在这时，张家突遭土匪抢劫，其兄被土匪打死。张宗可遂鼓动其父，将全家搬到诸城县城。于诸城的繁华之处建了座张公馆。张宗可亦更名为张裕先，又进了诸城教师讲习所。一年后，张裕先在讲习所毕业，即在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教书。就在这一年，“五四”运动暴发，张裕先亦被卷入洪流之中。

1924年夏天，张裕先又更名张耘，进了上海大学读书，校长于右任，但于仅挂了个空名，掌握实权的，是总务长邓中夏、教务长瞿

秋白。

这所学校是1923年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在原东南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联合创办的。张耘在“上大”读的是社会科学系，系主任为瞿秋白。“上大”系中共为自己培养干部的一个学校。张耘于此结识了中共的许多要人。1925年元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2月，上海爆发了闻名世界的“二月罢工”，张耘参加了这次大罢工。罢工中，表现出了他非凡的领导才能。

1926年10月23日深夜，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爆发，时张耘任上海大学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他积极组织学生，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接着，上海又连续爆发了二次、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后不久，张耘担任了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就在这时，蒋介石于“四·一二”叛变了革命，举刀屠杀中共党员。

时张耘分析了一番国内外形势，认为中国的革命不可逆转，大势所趋，遂迎风而上。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陈独秀下了台，向忠发为中共中央书记。张耘打听了一下向忠发的情况，知道他是工人出身，肚里没多水墨水，也就没把他放在心上。后来，他看到中共大权旁落在李立三手中，见李立三是个了不起的人，就开始拍李立三了，在李立三鞍前马后的伺侯，李立三很喜欢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很激动地说：“李立三同志担任中共领导工作以来，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很多人作了无谓的牺牲，很令人痛心。这种局面再也不能下去了！”

张耘听了，立即起身反驳说：“李立三同志担任中央领导以来，全国的革命形势非常好，到处是暴动，到处燃烧着革命的烈火，这烈火将陈独秀时期的党的暮气都烧掉了。”他说着拍着胸脯说：“李立三同志是我们党的最好的领袖，谁反对李立三，谁就反党，我坚决地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

张耘的发言，很快传到了李立三的耳内，李立三听后很舒服，

他把张耘调到中央组织部，让其担任了秘书长，张耘很是得意，遂更名赵容。这年底，与曹轶欧结婚。他更美了。

就在赵容美的像个刚出水的鲫瓜儿鱼之时，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李立三倒台了。瞿秋白、周恩来由莫斯科回国主持中共大政。赵容一见大势不好，立即调转枪口，拍瞿秋白的马屁，把枪口对准了李立三。赵容在上海大学时即与瞿秋白很熟悉，这次见瞿秋白得了势，在瞿的面前，张一个"老师"，闭口一个"老师"，叫得别提多亲热了。瞿秋白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被赵容叫得麻苏苏的，一高兴，就让赵容担任了中央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于是，赵容更起劲地批李立三路线，直把个李立三骂得一文不值。在批判李立三的会上，赵容挥拳舞膊地说："你李立三搞得'左'倾冒险主义这套，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你成为历史不可饶恕的罪人！你主持中央工作，家长作风，独断专行，唯我独尊，夜郎自大，你的罪行。当全党共诛之！"

赵容臭骂了李立三，向瞿秋白表了忠心，不仅在中共中央站住了脚，反而当上了中共中央审查委员。心中暗暗得意。谁知风浪又起，共产国际视瞿秋白为眼中之钉，内中之刺，共产国际要把瞿秋白赶下台，把王明抬上来。这下子张耘可耗子爬花椒树——麻了爪了。因为在李立三主政给王明的处分时，赵容对给王明的处分最为热心，而且是他的主谋，李立三听了他的话才下决心给王明处分的，如今王明要得势了，他赵容能不着急吗？但他赵容毕竟不同寻常，他立即决定改换门庭，效忠王明。一天深夜，赵容敲开了王明的住处，王明正在室内写文章。赵容见了王明，诚恳地对王明说："绍玉同志，我来向你赔礼道歉了。"

王明对赵容没甚好感。特别是李立三当政之时，赵容紧跟李立三，如今赵容虽然来道歉了，可他对赵容的反感并没减。赵容见王明不热情，可仍然继续歉疚地说："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给了你处分，这都是我水平不够，看不出山高水低来，通过这段

时间对自己的反省，我认识到自己错了，使你受到了冤枉。”他话头一转，又说：“给你处分那当儿，我也想不通，可李立三大权在握、金口玉言，我也没办法呀。”接着，赵容又把自己臭骂了一顿。

当时的王明，虽然对赵容反感，可他正想扩大自己势力，便摆出了大人不把小人怪的姿态，用好言语安慰了赵容一番，最后说：“过去的事过去就算了，我这人有嘴无心，从来不计旧怨。”

赵容见王明饶了自己，很高兴。接着赵容起劲地拍王明，他把道听途说的各方消息和方方面面人员对王明的评价，都告诉了王明，有的还是他自己编造的。王明听了很高兴，也更对赵容有好感。在四中全会召开时，王明让赵容作会议记录。赵容虽不是代表，可也够荣耀的了。赵容除了巴结王明，对王明身边的人也进行了拉拢。他看到王稼祥受到米夫的尝识，就向王稼祥套近乎。王稼祥与赵容曾同在上海大学读过书，是同学，当时王稼祥不起眼，赵容也就没把王稼祥放在眼内，如今王稼祥今非昔比，赵容就向王套近乎了。

这天，在一条小路上，赵容笑眯眯地迎着王稼祥走去，到了近前，他用山东话说：“老弟，你怎么硬（认）不得我了？我还是你的学兄呢！”他见王稼祥仍然想不起来，又自我介绍说：“我叫赵容，当年在上海大学读过书，那时叫张耘。”

赵容这么一说，王稼祥才依稀的记起这个张耘来了，不由得惊奇地问：“你怎么连姓都改啦？”

赵容说：“干革命脑袋都可以不要，换个名字又算啥？”

王稼祥当时也没说甚，也没把这个赵容放在心上，谁料想，就是这个赵容，后来又几次改名换名，易装换色，像条游蛇一样缠着王稼祥，最后，连生命都被此人缠死。这个赵容就是于1933年又更名的康生。

王明对赵容好感之后，将其由中组部秘书长晋升为组部部长。赵容——后来的康生自此大权在握，渐露出了其峥嵘之相。

何孟雄之死

米夫凭借手中的权力，将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做地下工作，年仅廿七岁的王明扶上了中共领导层的高位，向忠发虽然是总书记，因其文化低、头脑简单，不过是个聋子耳朵——摆设。向素讲江湖义气，四中全会上，瞿秋白等被罢官，而米夫却将其留下，使向对米夫感激涕零，这样，向对米夫和王明之语，更是言听计从。

但是，中共的领袖们，并非都是向忠发之流。从四中全会开始，反对米夫、王明及王明小宗派的浪头就接踵而来。缘为米夫破坏了中共内的民主，用高压手段抬王明，压制了不同意见。

六届四中全会闭会不久，海总党团即发表了反四中全会的决议案。接着，全总党团、江苏省委外县委员会、苏准会全体工作人员、济总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沪中区委等都先后发表了反四中全会决议案和声明。

反对四中全会最激烈者，仍为何孟雄与罗章龙。1月8日，即四中全会闭会的第二天，何孟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徐畏三、王凤飞、史文彬、韩连会、张金保、袁乃祥、徐兰芝、邱泮林、沈先定、李震瀛等参加四中全会的代表，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内称：

正当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生长时期中，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进程是愈加重了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幸，在这个时候党的中央立三路线发生了根本原则上的完全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共产国际的路线，造

成党中央领导的破产、革命的巨大损失！

……

因此，每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在今天应该有一种严重的责任，为肃清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勇敢坚决为着国际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

（一）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是完全破产了。……

（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比立三路线更加危险。……

（三）三中全会后有系统地重复做着许多错误继续行立三路线反对国际路线。……

（四）紧急会议是执行国际路线建立党的正确领导保证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步骤。……

（五）为紧急会议而斗争。……

（六）立三路线派及投降分子破坏紧急会议。……

（七）四中全会的经过。

四中全会的召集，原则上与党员群众们所提议的紧急会议完全两样。第一，参加会议的成分是由中央政治局自由指定的，主要的分子是中央政治局本身三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罗迈贺昌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长江北方南方各局的书记，这些都是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积极分子，他们占列席总人数的多数。第二，四中会议的举行，除上述诸分子之外，中央对其他被召列席的坚决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及群众的干部同志是全守秘密的，他们在赴会之前是完全不知道会议的性质及会议的内容的，因此，引起各列会的群众中干部同志的愤怒与严重质问，并一致声明保留其对于紧急会议的意见。第三，

会议与讨论时间是非常短促的，全部会议以时间规定仅仅十五小时，每人发言不得十五分钟，因此有些同志因时间限制连第一次发言都没有允许，这完全表现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

（八）四中全会是没有解决党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主要任务，并且保证立三派的继续领导。

四中全会做了些什么呢？第一，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中拒绝同志们提议在肃清立三路线原则之下讨论党的总任务及诸项重要工作问题，这些不可再迟延的重要议事日程是被调和主义的政治局始终忽略认为不足轻重的和不需要的。第二，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明明是用调和主义的观点说“三中全会一般接受了国际路线”，但是四中全会不敢明白指出，反说“二十五日决议又向国际路线走了一步”（紧急通告已宣布为除三中全会及二十五日决议，四中全会连这一点都不肯承认）。第三，及九十六号通告中央站在离开领导的立场，只是消极的承认错误，忘却了目前党的迫切的紧急实际任务，同时在分析立三主义来源上，在指出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在估量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等等地方，都犯着严重的原则上的错误。这些错误都是从调和主义来的，但是四中全会对于九十六号通告都认为完全站在国际路线的基础上是正确的。第四，正因为上述这些原故，所以四中全会对于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及组织路线实际上是赞助的，在决议案中虽然表示过要取消三中全会的补选，但结果三中全会的补选除罗迈贺昌之外，其余多数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分子更加了一重保证，并且在四中全会上公开拥护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积极分子，把最高指导机关的中央解释成为教育错误同志，试验那些几年以来从陈

独秀到现在一贯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地方，因此周恩来向忠发项英任弼时等仍旧继续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李立三瞿秋白仍使其隐藏中央委员会之内，对于毫无工作经验同样犯有立三路线的陈绍禹等使其加入政治局负领导重责。第五，在会场上很明显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从属的上层机关调和主义分子的主张是一方面，坚决反立三路线的中央委员及下层群众干部尤其工人干部分子的意见是另一方面（几乎没一个例外）。中央是有计划的指定列席成分造成自己的多数，实际取消会场的民主，垄断选举并加反对者以种种罪名（如“反国际”“右倾”“取消派”“暗探”“小组织倾向”“无原则派别纠纷”等等）。

（九）反对四中全会要求在共产国际正确领导之下召集紧急会议。

四中全会的结果，政治上是调和主义的继续，我们认为不是国际路线而是米夫曲解国际路线，并且米夫自己站在派别观念上故意制造派别，造成党的纠纷。……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展，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实际上阻碍了国际路线的正确执行及反立三路线运动的进行。因此，我们应站在国际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立即推翻他们的全部决议，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并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要求国际正确的代表领导坚决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成立临时中央，主持全国紧急会议，解决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迫切问题。只有在紧急会议中产生新的中央，由他召集和主持第七次代表大会，才能保证第七次大会的真正胜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产出的调和主义的中央的领导，反对他们召集和包办的第七次全国大会。

（十）拥护共产国际要求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

现在立三派及投降分子陈绍禹等小组织是到处继续造谣诬蔑恐胁欺骗那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四中全会的同志，他们最主要的借口便是说“四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反四中全会便是反国际”，这种说法正如李立三及其党徒在三中全会时对于当时反对三中全会同志的诬蔑同一口吻。我们知道当时国际代表领导三中全会犯有错误，他曾经反对“把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对立”，又说“党的路线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没有两条路线”。我们是曾经反抗过这样错误的，并且现在已经证明我们这种反抗正是为忠实国际路线而斗争。这次米夫领导的四中全会是其在六次大会时附和右派布哈林调和主义的立场及其私人派别的成见，完全抹杀党员群众的意见，重复着做出严重错误，显然是违反共产国际的原则，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只有坚决的要求国际撤换他的职务，纠正他的错误，才能使肃清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障碍彻底解决。

（十一）号召全国团的同志为反四中全会召集紧急会议而斗争。……

（十二）反对斗争中的不正确的倾向。……

随后，“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又发出《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内称：

中央包办四中全会的行为，是污辱了党的光荣历史，是比三中全会更糟糕的会议。四中全会是拒绝了同志的提议，是抹煞党员群众的意见，保障着三中全会及其后的补充决议，九十六号通告的错误，是用委派命令制度，造

成立三派调和派自己的多数。四中全会是专为巩固立三路线调和主义领导而召集的。

米夫原想他用高压手段可将中共内部不满者压下，哪知不服者甚众。罗章龙、何孟雄等公布了“报告大纲”后，米夫为平息众怒，遂于会后，立即召集了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开会。米夫也无非吹王明如何如何好，在中共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最高，要何、罗等人尊重王明，支持四中全会。何、罗等自然不依，米夫见何、罗固执己见，大怒，怒挑双眉道：“自此之后，谁反对四中全会，谁反对陈绍禹同志，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应受到处分，以至开除党籍。”

会议双方不欢而散，米夫为使王明稳坐中共高位，击垮各方反对势力，又借共产国际虎皮。米夫立即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况，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共产国际很快回电，表示对扩大的四中全会坚决的支持，这下子，米夫和王明都神气了，因为这样一来，反四中全会即是反党反共产国际的。

1 月 10 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中央常委。

接着，王明即在江南省委向何孟雄发难。他凭借手中之权，将忠于自己的陈昌浩、李竹声、殷鉴、朱阿根、潘向友、焦明之、夏采曦调到江南省委；凡不听自己调遣的，都调走或撤职。时陈昌浩到沪东区委、朱阿根到沪西区委、殷鉴到沪中区委、焦明之到闸北区委，夏采曦到沪南区委。王明采取的另一个手段是，凡不听自己话的，一律停止发给生活费，这样迫使一些人屈首服从。1 月 11 日，王明召开了江南省委扩大会议，米夫亦参加。会议开始，米夫首先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四中全会的肯定。接着，王明发言，王明那小白脸一沉，尖着嗓门说：“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在伟大的米夫同

志领导下召开的，米夫同志高瞻远瞩，排除了'左'右的干扰，尤其是右的干扰，使大会开的十分成功。但是，以何孟雄、罗章龙为首的右派分子，对党、对米夫同志、对共产国际，怀有成见，公开的、私下地反对四中全会，发表了什么什么决议，这是他们长期对党不满的暴发，是个人野心的恶性膨胀。何孟雄与罗章龙同流合污，他们是一对老机会主义者，尤其是何孟雄，已成了江南省委发展的一大障碍。"王明说到这儿，提高嗓门道："我现在宣布，何孟雄及其团伙的一切活动，都是非法的。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同何孟雄的非法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接着，王明又宣布：凡是参加何孟雄组织的活动的党员，要立即退出，并进行检查，否则一律开除出党；对何孟雄等正在使用的一些机关和宿舍，省委就此撒手不管，并另外建立机关，不与何发生关系；江南省委立即停发何孟雄等一切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对于何孟雄，王明采取了"穷追猛打"的手段。1 月 13 日，王明又召开了第二次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会前王明即以安排停当，会上，仍由王明作报告，内容无非是骂何孟雄是一贯的右倾，是老机会主义分子，要对何的反党进行揭发，尤其揭发何与罗章龙的关系。王明于会上大骂何与罗是一丘之貉。在这个会上，通过了王明起草的拥护四中全会，反对何孟雄的决议。

1 月 15 日，米夫、王明向中央全党发出了《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内称：

全党同志们！

在敌人燃烧我们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烈火中，在国民党军阀与帝国主义积极进攻苏联的准备中，党经过了共产国际的同意，召集扩大的四中全会，整顿了党的斗争行列。

扩大的四中全会一致的接受共产国际的观点，这个

观点认为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的革命政策是根本不相容的。在无情的自我批评精神之下，指斥了三中全会用外交手腕掩护着立三路线的企图。四中全会严格地指斥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的延缓与阻碍党走向健全道路的一切动摇与调和。现在党的领导机关已经改造了，新旧干部中最好的成分与许多新的工人同志吸引到党的领导中来；这样，在组织上来创立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保证。四中全会已决定愈快愈好的妥当的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扩大的四中全会严厉地反对郭（葛）妙根、何孟雄、彭泽湖等同志利用反立三路线斗争，来拥护右倾机会主义或无原则派别斗争的企图。在这里，扩大的四中全会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只要我们无刻不要忘记右倾危险，不要忘记公开的暗藏的取消派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主要危险的时候，我们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才能更有效果。

……

扩大的四中全会号召全党，反对肃清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但同时要用一切力量反对机会主义者与取消派，他们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只是一句空话，只是企图把党送到右倾的泥坑中去。

全党同志们！

在对于共产国际铁一般的忠实中，密切的坚强的巩固我们的队伍。对于只是口头上反对立三路线，而实际上继续机会主义与消极的人们，不要再容忍下去了。我们要揭露掩护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下的努力右倾活动的企图。

……

反动势力强横的向党进攻，“左”右倾取消派采用分

裂的企图与混淆的手段来反对党，来拥护反动势力的进攻，但是中国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是能够打破这些进攻与勇敢的前进的。……要立刻检阅与改善党的一切组织的动员群众的能力！在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中，肃清一切派别倾向，彻底克服立三路线以及对于他的调和态度！

对于共产国际，要铁一般的忠实！

王明向中共全党发出了《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后，对何孟雄的"斗争"仍不罢手。王明把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召到一起开会。王明说："要打倒何孟雄，必须揭发何与罗章龙的关系，这样才能打中何的要害，才能将何打倒。"说到与何观点相同的人时，王明把牙一咬，恨恨地说："蔡博真他们几个老资格的区委书记，同何孟雄穿一条裤子，而且屡教不改，要将他们清除出党。"

米夫、王明对何孟雄等持不同政见者的"穷追猛打"，欲置死地而后快的做法，何孟雄等人非常气愤。遂不断开会，商讨如何与王明小宗派作斗争事宜。1月17日，何孟雄于东方旅社31号房间内召集部分反王明宗派的干部开会。时参加会议的有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人。叛徒唐虞（王掘夫）向敌人告了密。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奉命化装成茶房走进房间，接着七八个持枪便衣涌入室内，将何孟雄等所有开会的人当场逮捕。之后，暗探们又于此处埋伏了数天，又逮捕了一些人。何孟雄等人先被拘留在老闸捕房，很快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公安总局，数日后又转移到淞沪龙华警备司令部。

在何孟雄等被捕之前，中共中央特科即得到了敌人要对何孟雄等下手的消息。

中央特科是怎个机构？原来，中共中央在1927年于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在白区建立秘密党的组织系统和工作关系的基本原则。10月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汉口迁到了上海。时

上海华洋杂处，政出多门，市区人口复杂，住房容易找到。然上海又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云集之处，租界里巡捕、包探遍地，捕房林立，统治森严。在国民党统治的华界，又驻有大批军队、宪兵、警察，设有特务机关，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就成为这些军警宪捕捉的最大目标。

1927年11月，周恩来于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来到了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军委工作，他根据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需要，建立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是中共中央的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机关。其下设总务、情报、行动、无线电通讯四个科。由周恩来、顾顺章、向忠发领导。其活动范围，主要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同时兼及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所在地天津、香港、武汉等重要城市。其主要任务是选派忠诚、坚定、机智、果敢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及时了解敌情，侦知敌人的行动计划，组织营救被捕人员，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惩处罪恶昭彰的叛徒、特务。

话转回头。在叛徒唐虞告密、租界巡捕还没动手抓何孟雄等人时，中央特科已获情报，遂急报王明。王明得知后，却不准特科人员去通知何孟雄等立即中止会议，迅速转移，而是阴笑了一声，随后对左右说："告诉中央特科的同志，不要去东方旅社，既然敌人已经发现了何孟雄他们，特科若再去人，也会被敌人抓走。"

当何孟雄等被敌人抓捕，消息传到王明那儿时，王明正主持召开中共江南省委会议。到会者听了，无不惊得目瞪口呆，王明却冷笑一声说："天闹有雨，人闹有祸，闹吧，如今闹到了监狱里，看他们还再闹什么。"王明眉毛一挑，恶狠狠地说："何孟雄如此结果，是早在预料之中的，是他们反党反中央反国际搞分裂的必然，是咎由自取！"王明说到这儿，把桌子一拍，大声说："何孟雄等一伙是在进行反党活动中被捕的，这与其他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当天，王明又下令将何孟雄等人开除了党籍。

何孟雄在狱中仍坚定自若，坚决反对分裂党的错误行径，并同林育南、李求实联名给共产国际写信，揭露王明的宗派主义活动。还嘱告狱外同志说，坚持党内斗争，待以时日，不要分裂，这是最要紧的事。时龙华看守所的中共秘密党支部按照王明的指示，拒绝接受何孟雄等人党的关系，不让他们参加支部活动。何等对此，气愤异常。

2月7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殷夫、柔石、胡也频、李求实、欧阳立安等二十六人(一说二十四人)被秘密枪杀。时何孟雄年仅三十三岁。

何孟雄等被敌杀害使王明去了块心病，然其对何的批判仍没放过。其对左右说："何孟雄等虽然死了，但这些人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还要彻底清算。让全党同志从何孟雄等被捕牺牲中得到教训！"

接着，王明给何孟雄罗织了若干条错误，并指示省委宣传部根据何的"错误"，组织人写批判文章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与此同时，王明还下令不准为何等人开追悼会。也许是王明怕何等人阴魂不饶他，又于1931年写了一首七绝："悼'二七'龙华死难烈士"，标题是：《而今"二七"》。其诗曰：

二六英雄同遇难；
而今"二七"更怆然。
育南师辈孟雄友，
泪洒春风泣杜鹃。

在诗的第三句，王明还写了注，为：此处指林育南与何孟雄二同志以及其他同志。仅此一斑，王明为人之阴险，足可见矣。

直到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何孟雄等才得到平反。决议内称：

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的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组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慨，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何孟雄等人的遗骨，直到全国解放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从一个掘墓人那里，打听到何等人遗骨埋藏的地点。为了纪念这些死去的烈士，遂在龙华的草坪上，建了一座烈士纪念塔，将遗骸移葬于此。何等人的姓名，均刻于碑文上。时有欧阳立安的母亲陶承，含泪写诗一首，悼念其子与何孟雄等。其诗为：

烈士牺牲二十秋，
永垂不朽精神留，
英雄姓名二十六，
忠肝义胆耀人寰。

我儿英勇最少年，
才离母怀便战斗。
聪明似父气如虹，
誓忠阶级不惜身。
匪帮不敢见天日，
半夜囚车出囚室。
枪声歌声震龙华，
热血滋养自由花。
血凝滴滴雪花碧，
骨列根根如剑戟。
墓园他日来凭吊，
我心痛亦我心喜。

罗章龙被开除党籍

前文述过，四中全会之后，何孟雄同罗章龙坚决反对四中全会决议，反对米夫和王明，罗于13日召开了有十三人参加的“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发出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通过了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在这个会上，推选了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王凤飞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干事会，即“中央非常委员会”，也就是后来人们通称的“第二中央”。

罗章龙乃湖南浏阳人，1896年生。1917年毕业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次年冬参加发起新民学会，后入北大哲学系。参加发起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为北大支部负责人，中共北方区委员会的组织和领导成员之一，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部的主任。在此期间，罗常去天津开展运动，参加领导了滦五矿

工人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央秘书和宣传部长。中共“四大”为候补委员，“五大”为中央委员，“六大”又为候补委员。负责中央工委和全总党团活动。罗早年曾用“文虎”名写文章。北大时学名为“罗敷阶”。在长沙一师就读时，曾用“纵宇一郎”名与毛泽东通信。1920 年先后用“无我”笔名，1928、1929 年常用“沧海”、“沧的”笔名，在中共内的化名为“柏格森”、“晕云”。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时，用“彼得罗夫”的化名。而其最常用的笔名是“章龙”，故人皆呼之为“罗章龙”。

罗章龙等开罢反对四中全会的代表会议之后，即将其主持起草的“报告大纲”铅印成小册子，通过其所掌握的全国总工会系统下发到全国各省总工会所辖之地。时王克全正拟成立第二江苏省委，因而这小册子发的更广泛，连在国民常军队内的地下支部都收到了。与此同时，罗章龙派了张金刃(张慕陶)、韩连会、王仲一等到顺直，唐宏经到满洲，李震瀛到香港等。王克全、徐畏三等带人强占江苏省委机关，未果，遂宣布成立第二江苏省委。罗章龙所派出的人，四处串联，加紧分裂中共的活动。周恩来奉王明把持的中央之命，找到罗章龙、王克全、同他们进行谈话。周要他们停止反对四中全会和分裂的活动。罗章龙哼了一声说：“王明没有罢你的官，你就来作说客，来和稀泥了。”说罢，把手一挥，怒道：“我不和你谈。”

这时，王克全亦一脸怒容，大骂周恩来是两面派，没有党性，没有原则。周恩来对罗、王二人说：“你们何去何从，五日之内向中央表明态度。”说罢，扭身而走。

周恩来遂把罗、王的态度，向米夫、王明做了汇报。米、王大怒。五日后，罗、王对中共中央不予理睬。1 月 27 日，即何孟雄等被捕十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并决定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其“决议”内称：

在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全总党团及江苏省委决议等发表后，右派小组织以罗章龙为领袖的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并且公开的发表反党的小册子——《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个问题更加严重，特成立以下决定：

一、这一反党的小册子，是右派小组织反国际的整个纲领之最具体的表现，而为罗章龙所主持的。罗章龙在这小册子上，学尽取消派反党反国际的口吻；第一，他是公开地"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所以他说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展，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而继续"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成立临时中央，主持紧急会议"。但是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下，在国际代表领导之下而为国际所批准召集的。四中全会的结果，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所以，反四中全会即是反党反国际的；并有罗章龙所继续号召的紧急会议与主张成立临时中央，更是露骨的分裂党的第二党的主张。这样，他便进一步的反对国际代表，"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国际代表，但是，国际代表百分之百的执行国际路线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所以反国际代表实际上即是反国际——这是陈独秀以及一切反共产主义"左"右叛徒所惯用的把戏。第二，他更等于向敌人公开告密，说四中全会是国际代表等等领导；这简直是反革命的行动，因为这种宣传，除掉便利于敌人的巡捕房、警察局外，再没有其他意义。第三，……他说"中央的威信是丧失的干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早已完全破产"，恶骂中央"暗中秘密布置四中全会……证明中央所采用的方法是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贼

同其性质"，所以他主张"立即停止中央行使职权"，"根本改造政治局"(即是全部撤换)。……他认为中国党六次大会是在右派布哈林领导之下采取了调和立场的；……

二、这一反革命小册子的印行，完全是罗章龙把持全总党团机关用以进行其反党的右派的小组织之最具体的产物。同样，在一月以后，罗章龙主持的全总党团，除掉成立1月1日的右倾决议案外，并在1月17日公开号召与领导全总党团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实际上就是反对国际；在组织上派遣被他煽动的同志到各省(如满洲、河北、山东、广东等省)去进行反党的右派小组织活动，最后他还抵抗中央政治局1月20日决议的执行，丝毫不改变他的反党行动，而且还鼓动全总党团同志拒绝移交全总党团的工作。这一切都表示他没有丝毫诚意来在全总党团执行国际路线，而是在假的反立三路线旗帜之下，利用全总机关作为进行第二党的组织与活动的大本营。

三、罗章龙这种反党反国际反六次大会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他远在六次大会前陈独秀时代和两湖秋收暴动时候，就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四中全会上，他领导了少数同志，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国际路线，并声明退席。会后，他又在四中全会决议案修改委员会上举手反对四中全会决议案，所以他结果使拥护与取消派一类而已被开除的王仲一来参加紧急会议。……

四、根据以上这一切反党反国际反六次大会之反革命的行动，罗章龙是一刻不能停在党内与无产阶级队伍中了。中央政治局特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与永远的开除罗章龙的党籍，并报告共产国际请求批准。

五、中央政治局特要求全党同志在深刻的认识罗章龙这一类反党的行动中，必须坚决的与罗章龙右派小组织作无情的斗争。要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完全与他分开。并且与他完全隔离起来。中央政治局更号召被罗章龙右派小组织所欺骗所蒙蔽的同志，应立即醒悟与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而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并且要向全党公开声明这一右派小组织的一切活动的经过与罪恶。

六、这一决议一直发到支部去。……

中共中央在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同时，亦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凤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数日后，又将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唐宏经、韩连会、沈先定等开除党籍。中央各省、市、各区委也纷纷开除李震瀛、吴雨铭、钱静安、鲁铁成等人党籍。

2 月 13 日，上海沪中区委会议作出决定，将蔡博真、彭泽湘、王福环、徐松明、小刘、王伯堂、周舫、小张(交通)、丘队影、刘建等十一人开除党籍。

经王明、米夫的一气打击，罗派的成员多纷纷发表声明书，宣布退出罗的"中央非常委员会"。

罗章龙被撤销了中共党员的职务之后，由女工出身的中共党员张金保接任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主席之职。张随即召开了会议，通过了《非常委员会致中共中央信》，内称：

中共非常委员会经 2 月 13 日全体会议决定宣布解散。特此通知，希望即派人前来接受。

张金保也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致信中共中央，表示了悔过。

然王明决心将罗派人物置死地而后快，他不允许这些人悔过自新，将张金保亦开除了党籍。并说张金保的"悔过声明"，是向党发起的新的进攻。

2月22日，米夫、王明正式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了四中全会的经过。报告分两个部分，共讲了十二个问题。第一部分中，把个王明夸了个天花乱坠，说王明是伟大的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同李立三作斗争的首屈一指的英雄。是中共的希望。在第二部分中，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一个半月中"关于实际工作的布置"，也无非是讲斗垮了瞿秋白、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对派，取得了斗争的"伟大胜利"。

3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十一次全会，执委会主席曼努伊尔斯基在执行中称：

> 在中国，革命危机加深的实际表现是，在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这是当前中国革命高涨的决定因素，它使中国站到整个殖民地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前列。……依靠动员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极其广泛的新阶层，在深入和扩大革命高潮方面取得了成就，这对落后国家的工人运动，正在起着并且将继续起着越来越大的革命化影响。

到了8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再次发表决议，对四中全会，全盘进行了肯定。内称：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扩大全会，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击退了右倾分裂派和取消派的进攻（因为这些人企图利用一部分工人干部对李立三的错误和对其他错误的调和

> 态度的不满情绪，来达到反党的目的），同时沉重地打击了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观点以及对其观点的调和态度。四中全会在党的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中前进了一大步，修正了政治路线，更新了党的领导，从而使党的全部工作开始有了转折，这有利于实际而彻底解决党所面临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党在四中全会期间和四中全会以后立即采取一些组织措施（改造政治局、开除罗章龙及其两名同伙出党，因为他们出版反党小册子并进行分裂活动），以期保证贯彻党的路线和团结党的队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这些措施是必要的。

数十年后，罗章龙在谈到关于分裂中共和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事宜时说：“因为我们都是受过处分、开除党籍的人，当革命工作停顿，大家很着急，为了把工作进行下去，才成立了临时中央非常委员会的。”

罗章龙被中共开除党籍之后，便不再问政治。嗣后去河南大学、西北大学任教。解放后，又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任教。

瞿秋白之死

米夫、王明利用把持的中共中央大权，“借刀”将何孟雄等置于死地，将罗章龙等开除中共，与此同时，亦对瞿秋白进行了无情的打击。

前文述过，王明与瞿秋白，早在莫斯科时，就已做了仇。而且瞿秋白对米夫也看不上眼。当王明与李立三作对头后，瞿秋白虽然批评了李立三，但对王明，依然如故，所以，王明对瞿秋白的恨，不次

于对李立三之恨，而且是宿恨新怨。

四中全会上，王明、米夫对瞿秋白采取了决不相容的态度，撤销了瞿党内的职务。四中全会之后，何孟雄、林育南、罗章龙等坚决反对王明上台，这些人也找瞿秋白，欲拉瞿加人反对四中全会的势力中去。虽然瞿秋白没为何、罗所动，但王明仍得到了消息，并为此疑神疑鬼，老是寻思瞿要同何、罗站在一起，反对自己。

时瞿秋白身患肺病，心力交瘁，已无力再与王明、米夫争个高低上下，遂于1月17日写了《声明书》，书中把自己骂了一番。《声明书》是写给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虽然如此，王明、米夫犹觉不够，在开除罗章龙党籍的当天，亦作出了决议，警告瞿秋白"必须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要瞿秋白"须写声明书表明积极反右派与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

瞿秋白已看透了米夫和王明，一个是中共内的"小人"，一个是"洋小人"，自己虽有与其争斗之心，奈重病缠身，只得长叹一声，于1月28日，再次违心写了份《声明书》。在这份声明书中，再次往自己脸上抹黑，说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支持反王明的"中大"学生李剑如等，回国后也没把王明看在眼内，这更是绝大的错误，表示：

> 今后一定要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来为党为革命而奋斗。

时瞿秋白在《声明书》中称自己是"一个在病中不能多写的人"。他再反复表态之后，又于《声明书》中称：

> 一、我完全抛弃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离开国际路线的政治立场——三中全会至四中全会间之调和主义立场，而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之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来为党为革命而奋斗。二、反对立三

> 路线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反对罗章龙等右派小组织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揭破并打碎立三主义者和右倾小组织的联合企图，是现在为着党的布尔什维克及真正执行国际路线所万分必须的。三、我的调和主义的错误，是在莫斯科代表团对于"学生问题"的错误相联系的。当时对于莫斯科学生中反对"中大"支部局的李剑如等同志，对于这个小组织，我采取了保护的态度，以至不但不能反对派别斗争，反而自己陷于派别斗争的泥坑。

王明、米夫都是心毒手黑的小人，虽然瞿秋白已向他们讨饶，但二人已将瞿视为肉中之钉，眼中之刺，自然饶不过他，继续进行无情的打击。2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专门作出了《关于 1929～1930 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内称：

> 当着中共代表团还在国际的时候，秋白同志曾以"中大"学生中反支部局的派别行动来影响过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的领导之下，对于陈绍禹等四同志所施的压迫制度，完全是站在代表团多数的派别观念上做成的错误。"……秋白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对国际路线的两面派态度，对国际代表的极不尊重的态度，决不是偶然的，和他的以右倾政治意见有密切关系。

王明、米夫一伙在政治上将瞿秋白打倒，又在经济上卡瞿秋白，时瞿重病缠身，王明等却停发了他的生活费，每月仅象征的给十几元钱。为上海工人最低的工资。这些钱瞿仅能糊口，无法治病。然瞿对共产主义信仰仍坚定。身体稍愈，即抱病投入文化战线斗争，与矛盾、冯雪峰、鲁迅等人战斗在一起。时瞿主要翻译苏联的文

学作品。住在了冯雪峰的好友谢澹如家中。谢爱好文学，亦同情革命，其在一钱庄做事。瞿秋白同妻子杨文华就住在这里——上海南市紫露路68号。在这里，瞿秋白不仅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及许多重要的论文和杂文，还同"左联"发生了联系，并与鲁迅先生建立了亲密的战斗友谊。"左联"为三十年代于上海兴起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继承和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成立于1930年3月2日。瞿秋白以"史铁儿"等笔名于"左联"办的《大众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提出了革命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谓：

> 现在决不是简单的笼统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而是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这是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无产阶级的五四"。

1932年11月间，瞿秋白和妻子杨文华住在鲁迅家中。其在鲁迅家中住了不久，由于敌特追踪甚紧，瞿不敢多停，又转移了数处。然瞿与鲁迅二人关系，愈发密切。杨文华在后来撰写的《忆秋白》中称：

> 由于鲁迅的关怀和帮助，秋白在被通缉的上海没有被捕，在逃难时不受饥饿。鲁迅亲自替秋白找房子，送书籍文具，最令秋白感动和喜欢的，就是从鲁迅那里获得外国文艺作品，其中有些是曹靖华同志要鲁迅转秋白的。《海上述林》译文的原著，是鲁迅送他的礼物，鲁迅自己的作品，也给予秋白极大的安慰，但由于反动的国民党的压迫，使秋白连看书的自由都没有，往往使他最宝贵的书来不及从敌人破获的住所中拿出来，一批又一批地失去。

后来，到了1934年1月间，瞿秋白奉王明主持的中央之命，由上海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2月抵达瑞金。时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人民教育委员，即教育部长，同时，亦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是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因王明"左"倾路线的指挥大败，万般无奈，只得离开江西的根据地，向西败走。瞿秋白要求随队西行，时王明在中共内的代理人博古、李德坚决不同意，瞿不得成行，而是被留在了江西。红军主力撤走之后，国民政府即派顾祝同、蒋鼎文率本部人马十万，向中共中央苏区实行全面"清剿"，鉴于形势之紧张，时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接受陈毅建议，决定疏散干部，决定瞿秋白回上海治病。1935年2月，瞿秋白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宋希廉部所俘，杀害于福建长汀。此等后话，不再重提。

王明的"左"倾理论出笼

王明得到米夫的支持，将何孟雄、罗章龙、瞿秋白等劲敌打垮之后，其终于控制了中共大权。时中共领导机关组成人员为：

中共中央总书记　向忠发

中共政治局兼江南省委书记　王明

中央宣传部部长　沈泽民（到了1934年4月，由张闻天继任）。

中央组织部部长　康生

中央军事部部长　周恩来

中央职工部部长　卢福坦

中央妇女部部长　周秀珠

中央农民部部长　张闻天（1931年5月重建）

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　王稼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林育英

团中央书记　博古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罗登贤

向忠发虽为总书记，不过是聋子耳朵——配搭，中共的真正领导大权，自此旁落于王明手中。王明还继续恢复和发展了李立三的"左"倾政策，而且比李立三之"左"倾更甚之。其从"左"倾立场出发，向中共全党发出了第一号令，即《中央通告第　　号(原件没有时间——引者注)(四中全会后第一号)——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内称：

> 目前的事实：在国民党统治和帝国主义残酷侵略的条件之下，全国的经济政治危机只有日益深刻，工农劳苦群众只有更加贫困，一切改良主义的口号都将成为欺骗，而新的军阀战争，也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革命的群众斗争是高涨的，尤其是农民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将向前发展，而苏区与红军的存在也将更加推动着革命运动的前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这不仅能击破"围剿"，破坏反革命的武装势力，保持住已得的胜利，而且还可以更加扩展苏维埃运动。

王明错误地判断了中共所处的险恶。王明上台之时，正是蒋介石春风得意之际。1930年5月爆发的蒋、桂、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阎锡山逃到大连，冯玉祥隐居山西，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桂系逃到了广西。蒋介石掌握了国民政府大权后，即下令向各地红军发动了攻击。1930年12月，蒋介石以十一个师，十几万兵力，向各地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围剿"。1931年1月2日，蒋介石又令军政部长何应钦重组"陆海空军总司令南

昌行营”，由何任主任兼总司令，组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蒋氏动用了二十万大军，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策，分四路大举进攻。亏得王明“左”倾路线还没完全控制红军，使蒋氏的“围剿”落空。到后来，当王明“左”倾路线完全控制红军时，红军彻底失败，此为后语，暂且不提。

王明等错误地估计了国民党力量之后，在其“左”倾理论上，气焰更盛，其写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成为其“左”倾路线的政治纲领。在这政治纲领中，王明提出了一系列错误观点，主要为：

一、在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提出“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

二、在革命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问题上，认为“直接的革命形势”，是很快在一省或几个省内成功，主张中共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采取“进攻路线”，看不到蒋介石的政权已经巩固。

三、轻视农村革命和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一味追求在大城市中搞武装起义。反对游击战争，强调红军要正规化。

王明的“左”倾理论出笼了，可要在中共全党内贯彻，必须有一大批、甚至所有的中共干部都要伏伏贴贴听王明指挥才行，正当王明思考如何培植自己的宗派势力时，这日，康生——此时仍为赵容，来到了王明住所。王明见了赵容，很高兴地说：“赵容，我正要找你。”

王明和赵容的一段相处，由于赵容很会投王明所好，不仅使王明改变了对赵容的印象，还对他特别好感。二人坐下之后，王明说：“赵容，如今大局已定，和我做对的已死走逃亡，可我总觉得，在中共内部，还会有人反对我，何孟雄死了，还会有张孟雄、李孟雄，罗章龙除名了，赵章龙、钱章龙还没除名，瞿秋白降职了，周秋白、吴

秋白并没降职,你说怎么为好?"

赵容说:"绍禹同志,我也正为此事而来。你若要掌握党的大权,必须把党内的有头脑的人搞垮,说穿了,就是不让那些有知识的人掌握党的要害,要搞'领导机关工人化',要突击吸收工人入党。"

赵容的主张,王明非常赞同,因为他王明已经尝到了甜头,向忠发当了中共总书记,而实权落在他王明手中,此法完全可以上行下效。

当下,王明同赵容经过一番计议,拟定了一份文件,这文件的核心是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大都提拔工人当主官,而由王明的小宗派中人当"秘书长"。很快,中共中央的各级文件在提拔使用干部上,都冠以"社会成分"、"工人出身",家庭出身越苦越吃香,越没文化越得到重用——到了1966年起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比这时更甚了。

与此同时,赵容这个"狗头军师",又给王明出主意,要王改造各级领导机关。说白了,就是对中共各级领导"大换血",凡不属王明小宗派团体内的,都撤职或调离,换成他王明的人。赵容、王明、还有米夫,三人商量来商量去,从1931年3月开始,便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送中央代表。赵容还向王明、米夫献策,对亲立三路线者,何孟雄派,罗章龙派、调和主义派打击不能手软。不仅在政治、组织上进行打击,还要在生活上制裁。王明、米夫均认为赵容的办法很好。当即下令,凡亲立三路线者,凡何孟雄派、罗章龙派,调和主义派的成员,不发或少发生活费。这样一来,使得许多人生活陷于极困难的境地。不少人只好靠典当活命,有的卖光了屋内东西,晚上睡在水泥地上,白天到难民救济处讨碗稀粥。有的到街头摆小摊。张金保后来的回忆当时情形说:

在无法生活情况下,有的同志把妻儿送回老家,有的

走头无路，竟想到山中落草，劫富济贫，当政治土匪。

唐宏经后来回忆说：

> 哈尔滨特委的两名成员，国为反对王明上台，虽然写了两次检讨书，承认所谓的错误，还是不给工作，停发了生活费。有一个青年学生，是一般党员，因为对四中全会有意见，写了三次检讨书。在交了第三次检讨书后，有人代表组织问他：“你是真悔过还是假悔过?”他说“真悔过。”代表组织人说：‘你要是真悔过，就去卸警察的枪，以表明你确悔过了。”这位青年同志结果去卸枪被抓走了。

对此种做法，赵容谓之“借刀杀人”之策。接着，赵容又向王明献了加强中央权力之策。并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3 月 5 日下发了《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不久又下发了《中央关于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三个文件。

从 3 月开始，王明、米夫便有计划地向全国各地派送中央代表，让这些代表做为钦差大臣，去执行他王明的“左”倾路线。派了夏曦去湘鄂西中央分局任书记；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为中央代表团到中央根据地；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任分局书记；派曾洪易到赣东北。满洲、顺直、山西、青岛、河南、武汉等地，王明也都派了自己人去“换血”。对上海和江苏，王明连“毛细血管”都换了。这里把夏曦、张国焘情况作个介绍。

夏曦其人

夏曦，字蔓伯（也作蔓白），曾化名芳侠。1901 年 8 月 17 日，出

生于湖南益阳县桃江镇。其父为晚年得子，因此，对夏曦很娇，便给他起名蔓伯，寓意是蔓草难除，愿他长命百岁。夏曦父为一私塾先生。夏幼时随父读书。十四岁时考入了益阳县立龙洲高等小学。因其聪颖好学，曾多次被评为优等生，两年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学术空气浓厚，聚集着一群胸襟豁达的有志青年。当时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都在这所学校读书，并成立了“新民学会”。

夏曦受新文化熏陶和新民学会的影响，痛恨军阀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日趋进步。“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长沙后，夏曦热情勇敢地走向了社会群众斗争之中。他先后参加了第一师范学生组织的“救国十人团”，维护国货，调查日货。时毛泽东和新民学会联合各界，发动了驱除张敬尧的群众运动，组织了驱张代表团，分赴省内各地和北京、上海、武汉等处进行宣传和请愿。夏曦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并和柳直荀等被委派在长沙组织通讯团。柳直荀十四岁时，即到长沙广益中学读书，住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师杨怀中家，杨怀中乃杨开慧之父。柳、杨两家为世交，可谓“交情三日久，春色两家分”。杨先生思想进步，毛泽东、蔡和森等常在其家中，因此，柳直荀与毛泽东等关系很密切。由于毛泽东等同夏曦很好，柳直荀对夏曦也很尊敬。时夏曦在驱除张敬尧的斗争中，还和何叔衡先后前往衡阳，进行驱张活动。如此，夏曦被张敬尧视为“过激党”分子之一而遭到通缉。1919 下半年，夏曦加入了新民学会。1920 年 9 月，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成立，夏曦是该会重要成员之一。是年 10 月，毛泽东等在长沙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夏曦成为湖南的早期的团员之一。1921 年秋，毛泽东等回湘建党，于同年 10 月 10 日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夏曦同郭亮在这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底，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经毛泽东选拔，夏曦为湖南参加会议的代表之一。1922 年春，夏曦在第一师范组织了“崇新学社”，提倡研究

马克思主义，并经常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上发表演说。不久，夏曦担任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干事部主任。毛泽东和夏明翰也分别担任学联的庶务和编辑。在此期间，夏曦主编了学联的机关刊物《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1923 年 3 月，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召开全国学生大会，夏曦代表湖南学联，前往参加，他长于写作和宣传，在从事青年学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的实际斗争中，还在《新民周报》、《救国周刊》等报刊上，发表了文章三十余篇。

全国学生大会开罢不久，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夏曦经林伯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为湖南省国民党党部湖南筹备处负责人。1924 年，夏曦担任中共湖南省区委员会委员。1926 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夏曦和毛泽东被选为后补中央执行委员。北伐军攻克长沙后，夏曦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共"五大"以后，中 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调中央工作，夏曦继任省委书记。不久，长沙发生了许克祥兵变，即"马日事变"，在紧急关头，夏曦扔下省委而逃跑了。亏得柳直荀、郭亮等省委其他负责人的支撑，才使事变损失减小。中共"八·一"南昌暴动时，夏曦亦参加了起义。起义失败后，夏曦被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夏曦参加了中共"六大"。他开始入学时，是反对米夫和王明的，后来见米夫王明势大，遂投到了米夫、王明的怀抱。成了"二十八宿"之一。"二十八宿"是指"中大"中所谓的二十八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即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等二十八个留学生，其中亦有夏曦，对于"二十八宿"，亦有"二十八个半"之说，谓当时在"中大"真正支持王明、米夫的人，共计二十八个半，还有一个年纪最小、个子最矮、观点又很动摇的共青团员，只算半个，故称之为"二十八个半"。对于夏曦的这段历史，杨尚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称："夏曦开始还和王明等作斗争的，但后来王明一伙攻他，把他压服了。"

夏曦于1930年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往江苏省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因他“效忠”米夫和王明，次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同年3月，夏曦被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派往湘鄂西苏区，成立了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临时省委。夏曦在接到王明的指令后，当即同妻子谭国南一起，动身赴洪湖苏区，也就是湘鄂西苏区，夏到洪湖又如何？此为后话，暂且不提。

张国焘其人

这里再把张国焘的情况，详细做个介绍。

张国焘，字恺荫，又名特立，1897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上栗市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祖父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有“功名”的，其父为清末最后一届省试录取的拔贡，民初毕业于浙江法政学校，出任浙江象山县知事。

张国焘幼时于萍乡县上栗市读私塾。少年时就读于萍乡县小学，时为1908年春。萍乡小学堂乃为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成立的，教师思想较新，张国焘从这些教师口中，知道了世界上有过拿破仑、华盛顿、瓦特、牛顿、卢骚等人。知道了地球是球形的。

辛亥革命之后，张国焘考入了萍乡县立中学。时县立中学由维新派主持。两年后，张又抵南昌，于心远中学继续读书。心远中学为教育家熊有锡所创办，熊与严复为好友，因而严先生之《天演论》，成了张国焘最用心读的一本书。

1916年7月，张在其父支持之下，赴北京投考北京大学。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陈独秀、鲁迅、胡适、沈尹默、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高君武等著名人物，都荟聚于北大。张国焘以优异成绩被录取。翌年春，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主编《新青年》月刊。张国焘受其影响很大，成为北大同学中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张国

焘在理工预科读了两年后，于1918年转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学习。

1919年1月，在李大钊指导下，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癸、高尚德、许德珩等人组织了“国民杂志社”。同年3月，邓中夏等又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当时的北大，成为各种新旧思潮汇集和激烈斗争的场所。张国焘忽而赞同科学民主，忽而表示信仰社会主义，忽而又狂热地追求无政府主义。而其尤热衷于搞社交活动。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五四”运动。张国焘被时代潮流卷入，由他主持北大的讲演部，向市民们宣传爱国主义。6月2日，其与十几名学生在天安门讲演被当局所捕，两天后被释放。

1920年秋，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发起建立共产党，与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等组织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张国焘亦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邓中夏等到长辛店搞工运，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工人俱乐部，张国焘经常到这里的子弟学校讲课，同时宣传进步思想。

1921年7月，张国焘以北京共产党小组的身份，到上海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参加大会的有王烬美、邓恩铭、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毛泽东、何叔衡、周佛海、陈公博、刘仁静、李达等十二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亦参加了大会。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会议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期间，根据马林的建议，选举了由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等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起草共产党的纲领和大会决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陈为中央局书记，李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会后，张留在了上海，于中共首脑机关工作。

这年秋天，中共于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出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不久，其赴俄国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张国焘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其成为中共的中委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四个月

后，张回到了国内，相继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7月16日，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上海召开，时出席会议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张太雷、高君宇、邓中夏、施存统、王烬美、邓恩铭、向警予(女)、项英等十二人，代表全国一百九十五名党员。张国焘于会上作了关于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中夏、李达、向警予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委员、蔡和森为宣传委员、向警予为中央妇女部部长。

1923年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决定2月1日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出席指导。2月4日，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张国焘成为这次罢工的最高指导者。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张国焘受中共中央之命，再次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二七”大罢工的经过。在莫斯科，张国焘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沙发洛夫、远东部主任威金斯基、赤色职工国际主席罗卓夫斯基等人报告了“二七”罢工的实况。三个星期后，张国焘又匆匆回国。

1923年5月，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其携有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特别训令，训令要求中共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提议迅速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接纳了共产国际的要求。当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名代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坚持“左”倾关门主义，坚决反对国共合作。在中共“二大”之后于杭州西湖召开的会议上，当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张即反对国共合作。这次，张又持反对意见。张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

张之思想，其实是当时的"左"倾关门主义思潮的反映。

中共"三大"经过几天的激烈争论，大会正式决定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内称：

> 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具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张国焘于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

> 我是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中央的正统，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就因在西湖会议上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此由正统派要人降为反对派的首脑。机会主义者、反共产国际派和右派等帽子都戴到了我的头上。这事确是我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关键。

中共"三大"间，张国焘由于坚持己见，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其在中共首脑机关无法工作了，遂被分配到北方做铁路工人运动。1924年2月7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张国焘担任总干事，是实际负责人。5月21日，由于叛徒出卖，直系军阀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派侦察队查抄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会所，张国焘及妻子杨子烈、范体仁等五人被抓。时上海《申报》云：

> 张国焘住黄化门内腊库门牌某号，是日早四时，有侦

缉队数排闼直入，时张与杨子烈女士正在睡梦中，侦缉队立促之起，谓现在有事，请跟我走，遂挟张杨二人上汽车，直驶鹞儿胡同侦缉队，是时被捕者尚有三人，惟此三人者全系工人（张杨均系学生），且并未与张杨同居，张杨现被捕，尚留侦缉队五六人，在某室中大搜特搜，倾箱倒柜，及文稿函件一概拿去，其余有许多出版物，如《政治生活》，《响导周报》，《新民国》等，皆积累满堂，侦察队临行时，遂查封张之居室，并派警察一人，在此看守，此张国焘案被捕时之情形也。

北京《晨报》亦云：

……据某方传出消息：谓张等之所以被捕，系鄂省当局有电至京，请政府缉拿。其原因由于鄂当局近来严防工人，在汉口某工会中搜出某种名册，认该册与工人运动颇有关系，而张杨等五人名字，适在册中，故有电请政府捕拿之举。

5月28日，《申报》又载：

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惟并无若何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闻在张室中搜出之文件等，侦缉队认为关系重大者颇多，中且有派人赴俄护照一纸，上有加拉罕签字，侦缉队对此追究颇严，谓此护照究系俄国何人接洽得来，然关于此局尚无结果也。

张国焘于狱内关了四个多月后，适逢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赶走了曹锟，中共于此时机，将张国焘等救出狱中。

张出狱不久，孙中山应段祺瑞等北方军阀之约北上。对于孙先生北上，时中共内许多人士反对孙此举。如中共北京区委会书记赵世炎就认为孙段张的三角联盟，是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无异是抛弃了国共合作的革命政策，转而与军阀实力派图谋妥协。赵组织了近百个民众团体，高举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旗帜。张国焘对赵世炎等反孙先生之举，表示反对。时张被中共斥为右倾。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的方针上，揭示"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方针，陈、张在对国民党合作的态度上，步调一致了。

1925 年 12 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予定在广州召开。时陈独秀、张国焘正在上海，同广东国民党方面戴季陶、孙科等人谈判，商定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机关内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12 月 20 日，孙科等发表了经与陈、张商定后的致国民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内称：

> 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虽然他负着为工农阶级斗争的特别使命，可是中国此时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计，为无产阶级的初步利益计，也就毅然决然的自愿在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一致进行国民革命的工作。

时毛泽东等要在大会上打击国民党右派，团结其左派，争取中共的位置应占绝对优势。陈独秀不从，便派张国焘去广州，一方面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方面宣传对国民党让步的主张。会议结果，在选出的六十个中央执委中，共产党员占了十四名。

大会不久，即发生了"三·二〇"事件。蒋介石突然派出军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

党员李之龙，扣押了国民革命军第1军中五十多名中共党员。时张国焘正在上海，便奉陈独秀之命，回到广州，处理此事变。张国焘后来回忆说：

> 在中共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上，我曾报告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介石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我的这种建议获得了他们一致的支持。
>
> 接着，我由周恩来陪同去看蒋介石将军，与他直接谈判。……蒋氏很客气的接待我，我们一面谈话，一面共进午餐。

5月底，张国焘回到上海，向陈独秀报告了面蒋的情况。6月4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书，同时，陈独秀还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希望能与蒋氏精诚合作。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中共广东区委的负责同志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在北伐中对蒋介石采取何种态度？由张国焘出面主持召开会议，张提出的方针是："反对蒋介石，也不反对蒋介石"。

8月初，张国焘交卸了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委的职责，由李立三接替，其专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1926年9月6日，北伐军攻占武昌之际，张国焘率中共中央军事部人马赶到汉口，不久，周恩来接替了张的军事部部长职，张以中央代表名义坐镇湖北。其任务是：指导湖北区委、发展工农势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北伐胜利等。武汉三镇被北伐军攻克后，中共湖北区委会成为中共在武汉一切活动的中枢，区委书记是彭泽湘，因经验不足，张国焘常起而代庖。时武汉有三大势力，一为邓演达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一为唐生智湘军；一为中共。张周游三者之间的关系。到了11

月，其又兼任了湖北区委书记之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反共，屠杀了大批中共党员，与此同时，张作霖亦于北京杀害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国共两党关系陡然紧张。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于武昌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张国焘出席了大会，并于大会上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常委仅四人：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还有张国焘。

中共"五大"闭幕不久，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陈独秀依然采取"让步"之策，张国焘亦支持陈的右倾主张。5月31日，张在汉口向国民党记者发表公开谈话，称：

> 现在的形势很险恶，这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应该负责任的，民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了我们主观的力量与客观的要求，弄得不易驾驭，又引起当局的反感，现在不能不采取退却的步骤，不退却、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昨天中央已经决定将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的武装自动交出一部分来，以后，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实一些。据我看来，武汉的局面，可以因为我们的退却而稳定下去。

前文述过，7月15日，汪精卫宣布"分共"，国共两党合作至此彻底决裂。面对如此形势，中共摒弃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成立了由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张国焘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7月29日，张国焘奉命传达共产国际对暴动的指示。暴动之后，张国焘担任了农工委员会主任。张在起草土地政纲时，提出了"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的条例。8月19日，前委于瑞金开会，否定了张的主张，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

南昌暴动人马于潮汕大败之后，张国焘同李立三、贺昌一起，

由甲子港搭了一条帆船，到了上海。

对于张国焘借共产国际指令，到南昌阻止暴动的行径，张太雷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上，强烈要求中央对张严肃处理。张国焘闻知此情后，于 11 月 8 日给临时中央写信，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

11 月 9 日至 10 日，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认为：

> 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

会上，决定开除张国焘中共中央委员之职。

1928 年 5 月，邓中夏通知张国焘，说中共“六大”要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要张国焘出席会议。并告诉张，说张和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还有他邓中夏五人是共产国际特邀的。

张国焘遂动身赴苏，经过两个星期的行程，他抵达莫斯科。在“六大”召开之前，张国焘向布哈林陈述了自己反对瞿秋白盲动主义的态度，陈述了南昌暴动中所蒙受的委屈。布哈林听后，认为张国焘的述说有道理。遂改变了对张国焘的不好印象，张亦于布哈林处与王明相识，中共“六大”会议间，米夫找到了张国焘，说：“国焘同志，你和秋白都是中共党内的老同志了，共产国际希望你和瞿秋白同志能化除成见，互相合作。”

张国焘说：“只要秋白能纠正错误，合作不成问题。”

米夫进而探询问：“这种合作是否有勉强性质？”

张国焘略想了一下，指着案上磁杯说：“诸如这个杯子，若被打成碎片，虽然可以补起来，但究竟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

米夫听了，不高兴地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比喻呢？共产党不是个杯子。"又说："共产国际自信有力量来领导中央。"说罢拂袖而起。张深知自己失言，遂后悔不迭，自此对米夫接近，恭恭敬敬，不敢多语。

中共"六大"中央委员的人选，由共产国际圈定，米夫为了拉张国焘，将张列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米夫又提议，要张国焘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于此感激涕零，遂向米夫靠拢。

中共"六大"之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会间，俄共内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的纷争日趋激烈，虽没公开，然已露端倪。王明遂将此情暗暗告诉张国焘，说布哈林右倾，不能代表斯大林、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张国焘听了，想到布哈林对自己的印象不错，并对自己的汇报持肯定态度，不免心惊。见米夫旗帜鲜明地站在斯大林一面，便更向米夫靠拢。其又见王明是米夫的"宠儿"，也不顾自己身份了，虽然王明在中共内仍是个雏儿，他张国焘是老资格，但仍向王明递笑脸。

张国焘留在共产国际出任中共代表后，他首先了解了方方面面的情况，用句中国老百姓的俗话说，看看哪头炕热。

前文述过，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系著名的托洛斯基派，副校长米夫，以斯大林派自居。当斯大林以铁的手腕搞掉托洛斯基后，拉狄克倒台，米夫成了校长。同时，由于鲍罗廷、威金斯基、罗明那兹、鲁易门、荷兰人马林、印度人鲁易等中国问题的专家们都因中国革命失败而倒下，米夫一跃成了共产国际东方部下的中国部部长、中国问题的权威。张国焘就更紧拍米夫了。

当瞿秋白和米夫在中山大学学生问题产生不同看法时，张国焘坚决地站在了米夫一边。张国焘后来回忆说：

> 当时各校的中国学生，颇有不安于学习的心理，常要求改良学习状况，或要求派遣回国工作。米夫等有时只好

请我去向学生解释，我认为使学生安心学习是一件应做的事，因此，也乐于接受这种邀请。我常常在晚间被送到郊外的军事学校，向中国学生们演说。

从 1928 年下半年起，俄共内反布哈林右派的斗争日甚一日，斯大林在反布哈林中，大搞个人迷信，使俄共党内民主窒息。张国焘一面洗刷自己同布哈林的关系，小心从事，一面对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甚感兴趣。时在中共内，李立三模仿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的举动，将持有不同意见的蔡和森送往莫斯科，谓蔡犯有右倾错误。莫斯科默认了蔡和森事件。接着，李立三又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中共中央的这些动作，使张国焘愈加胆寒。后来，李立三遭到米夫和王明的攻击，张国焘见自己显山露水的时机已到，遂决定回国。

1931 年 1 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十天后，张国焘回到了国内。这时王明已掌握了中共实权。张虽然看不起王明，可他还要捧王明。2 月 7 日，张即在党内刊物《实话》第九期上，发表《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一文，内称：

……它彻底批评了立三战线，指斥了秋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外交手腕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反对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革新了党的指导机关，指出了党当前任务，要求全党在实际工中揭发立三路线和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

3 月 5 日，张国焘又在《实话》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了《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一文，内称：

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一些人借反对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

张向王明投之以桃，王明即向张报之以李。王明遂将张国焘任命为“钦差大臣”，派往鄂豫皖苏区，同时还派了陈昌浩。

陈昌浩，湖北汉阳人。1906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关系甚好。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是年冬回国，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王明掌握中共大权后，旋即派其同张国焘一起赴鄂豫皖苏区。

第六章 “三人团”

前文述过，王明执政后，派张国焘、陈昌浩去了鄂豫皖苏区，派夏曦去了湘鄂西苏区，又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为中央代表团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这里把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作一介绍。

先说说任弼时。

在湖南省湘阴县境内，有个叫新屋的村子，1904年4月30日，任弼时出生在一个教书先生的家中，其父任振声，见得一子，甚为高兴，取奶名为二南，二南天资聪敏，四岁时就在父亲指导下，悬臂练写柳公权的字帖，抄写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等古典文章。二南七岁时，适逢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他父亲送他到本乡的作民小学读书，起学名培国。培国成绩优异，跳班至序贤初等小学三年级。这所小学是新式教育。由任振声讲国文，任先生慷慨激昂地向学生们讲了国耻，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讲满清政府的腐败。这些教育，在任培国幼小心灵中，激起爱国之情。

1915年，任培国在序贤初等小学毕业，之后，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初等小学。这所学校，在当时是湖南的一所比较有名的学校，校址位于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和长沙第一师范联在一起，规模很大。任培国在此大开了眼界。

长沙第一师范有个学生自治会，这是个传播新思想，提倡新社会的进步组织，经常组织学生开展讲演活动。进行讲演者很多，毛泽东就是这个自治会的成员，他经常讲演，任培国特别喜欢听他的讲演。有一天，任培国和两个同学到学生阅报室里看报纸，正巧有几个学生自治会的高年级学生在谈论国家大事。任培国看见了毛泽东也在这里，就上前自我介绍说："我们是高山部的，想参加你们的活动，不知行不行？"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道："好哇，欢迎你们。"接着，毛泽东便热情地向这三位低年级的同学介绍了自治会的情况，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为民族争光，改造中国，自此之后，任培国便经常向毛泽东请教。

在学校里，任培国还选择了拳术、美术做为自修科目。并认识了一位英语教师，此人名叫肖三，任培国经常得到他的教诲，受益匪浅。

辛亥革命后的长沙，正是军阀官僚政客为非做歹之时，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骨。任培国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 呜呼！一缕之帛，出女工之勤，一粒之粟，出农夫之劳，致之不易，尽人知之。吾观乎，今之从政者，则不然，私心滔滔，且妻且妾，花天酒地，淫佚骄奢，纵姿挥霍，不顾份量，甚或任某省之督军省长，彼送此迎，耗费金钱，不可胜计。嗟呼！此非我国之金钱耶，亦非我国民之脂膏耶，痛矣哉！时愈极，而日用愈奢，生穷愈蹙而糜费愈大，以此治国，不亡何待？彼乘国钧者，其盍图之。节用之一端，关

系于国家人命匪浅鲜美，可不注意哉！

1920年，时任培国已十六岁，再有一个学期就要高中毕业了。同学之间，不勉互相探问，那些公子哥儿，毕业后也无须找甚工作，仍能继续过纸醉金迷的日子。穷学生都觉前途暗淡，有的托人，有的找路，以便毕业后有碗饭吃。任培国呢？当时已绘得一手好画，同学大都羡慕他，至少他毕业后可以卖画糊口。就在这当儿，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在湖南，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人都去了。任培国的校友李富春也去了。一日，任培国收到李富春的来信，信中述说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要他也去。这一晚，任培国手握这信，久久不能入睡，他真想去勤工俭学，求得更多的知识，可他想到家中父母年迈，三个妹妹年岁又小，不忍远离。正好他的叔父经商到长沙，知他欲远涉重洋，便立加劝阻。任培国虽心动一时，最后终没去成。不久，又有一批同学去了法国，任培国心又动了。

这天，任培国与同学肖劲光同来岳麓山下。二人谈起毕业之后事，任培国说："劲光，我们国家如同一支破船，正在风浪中寻觅方向，我辈热血青年，应担此重任，岂能把眼光放在一碗饭上？"

肖劲光说："培国，你说的很对，我辈当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高翔。"

任培国说："去法国勤工俭学已错过了时机，可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到世界各地走走，古人还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呢。"

肖劲光皱着眉头说："我们到哪里去呢？"

任培国眼睛一亮说："咱们去找毛泽东吧，他是个有办法的人。"

当下，二人便找到毛泽东，把想法一说，毛泽东笑笑说："上海有一批青年要到俄国去留学，如果你们愿去，我可以写信介绍你们，同他们一起去。"

任、肖二人听后，都高兴地说："好哇，我们一定去。法国没去成，我们去俄国。"

毛泽东取来了地图，把俄国的位置指给了他们看，任、肖在地图上看到了这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北方大国的位置，接着，毛泽东给他们讲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讲到了列宁。任培国和肖劲光越听越兴奋，他们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到俄国留学。

毛泽东见这两名青年向上劲头如此之足，也很高兴，当即写信与上海联系，数日之后，上海方面回信答复，可以启程。

1920 年 11 月，正是桔子洲头看万山红遍之际，任培国同肖劲光一起，乘江轮东下至上海，任培国因此次之行，未告父母，到上海之后，才给家中写了一封书信，但为了保密，措词比较隐晦。他和肖劲光住在了上海贝勒路的一家湖南人开的小旅馆。在这里，任培国、肖劲光结识了张太雷、恽代英等革命青年。这些青年，当时已是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了。和这些人交往，使任、肖二人大开眼界。

任培国在上海做赴俄准备的时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 年的初春一天，任培国同肖劲光等青年一起，从黄埔港搭乘了一艘日本客轮，前往海参崴，踏上了奔向十月革命故乡的漫漫征途。当时，去俄国的道路是很艰险的，为了安全起见，这些赴俄青年都化了装，装做彼此不认识的模样。任弼时装成个剃头的，提着个剃头包儿，身穿破旧的衣衫，头戴着一顶挂满油泥的毡帽。当时，任培国患有高血压病，轮船在海上行驶，少不了风狂浪急，颠簸摇晃，直搞得任培国呕吐不止。那一番难受的滋味儿，真是无法形容。

非止一日，到了海参崴。这里是俄国远东的港口。任培国等人下了船，在海参崴换了火车，开往伯力。当时，俄国国内的革命战争还没结束，远东一带，有许多地方为白匪盘踞。这天，在通过赤白交

界处时，火车突然停下，一些白匪军荷枪实弹地上了车，勒令旅客下车接受检查，名义上是检查鼠疫，实际上是勒索财物，任培国被带到了一间木头造的房子里。一个兰眼睛、大个子，高鼻子的家伙将刀对准任培国的胸膛，说："干什么的？"

任培国来之前已经学了些简单的俄语，听出了话中之意，便把手中剃头的家伙交给大鼻子。大鼻子瞅了瞅，又令任培国举起双臂，而后，在他身上搜起来，把任培国身上的钱都搜光了，又拳打脚踢一顿，将他放了。任培国被放出来后，火车早以开走了。他与大家失去了联系。在这异国他乡，孤身一人，且身无分文，言语不通，环境不熟，且莫斯科甚远。真是身在天涯为异客。培国把牙一咬，便沿着铁路线，一边讨要，一边行走，两天之后，到了伯力，这个地方，是紧靠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一座城市，原是中国领地，十九世纪中叶被沙皇夺去了，因此，这里尚有许多中国居民。任培国在此听到了中国语言，很高兴。他正在街上走时，听到有人喊他名字，回身一看，竟是肖劲光。任培国一下就把肖劲光抱住。这对同学，虽然分开仅两天，却似分开两年一般。这时，其他青年也来了，大家重逢后的高兴，难以描述。

第二天，这一群青年，又乘火车东进，终于到达了莫斯科。

莫斯科城中的一条大街，有座环境优美的校园，校园距斯特拉斯特纳广场不远，这座校园便是著名的东方大学，其全称为"斯大林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所大学，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列宁关怀下办起来的，任务是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干部，任培国和肖劲光等均为这所大学的一期学生。1921年秋天，东方大学在列宁和俄国共产党关怀之下，正式开学，大学里设有中国班，任培国便为中国班的一名学生。在这个班中，除有他的同学好友肖劲光外，还有罗亦农、柯庆施、王一飞、任岳等等。计四十多人。到了此时，任培国将自己的学名培国取消，改名"弼时"。

任弼时入东方大学学习之后，十分刻苦，他学的主要课程，有

哲学、政治经济学、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西方革命史，还有中国的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农民斗争史。任弼时除了学习这些主要课程外，还读了许多在国内读不到的书，由于读书刻苦，政治觉悟迅速提高。1922年初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时年尚不满十八岁。

弹指间，三年的学习生活过去了，三年之中，又有许多优秀青年来到了这里，王若飞、陈延年、肖三、赵世炎等人，也都来到了东方大学学习。大家见面，真有说不出的亲热。1924年，在任弼时学业将满时，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逝世，一时间，在世界上空，哀声回荡。任弼时含着悲痛的泪水，向这位导师的遗体告别。

这当儿，在国内，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正熊熊燃烧。中国共产党已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和《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等决议案。工农革命运动在蓬勃发展。任弼时决定回国，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

1924年秋，任弼时从俄国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庆云路的一所大学内，任弼时见到了邓中夏。这所大学名曰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办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在邓中夏的办公室里，邓中夏握着任弼时的手高兴地说："弼时同志，你来的正好，学校里正缺俄文教员，你来担任吧。"

任弼时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时恽代英也在坐，他正主办《中国青年》，热情地邀请任弼时写些文章，任弼时也立即答应，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决定要任弼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5年，中国共产党和团组织为了培养基层干部，在上海成立了三十几个干部训练班，任弼时领导了这项工作。他亲自抓了曹家渡纯善里52号的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由当时的沪西区振华纱厂、绢纱一厂、二厂、公大纱厂、中华工业厂、爱迪生灯炮厂等工厂的团干部组成，校址设在一个狭窄的里弄里，约一百多人，在任弼时的

动员下，训练班女工占了一半儿。这些训练班培养的干部，后来有的搞工人运动，有的搞农民运动，有的搞军事斗争，都成了革命的骨干。

1926 年，任弼时托王一飞把未婚妻陈琮英从家乡带到上海，陈琮英同任弼时是在患难中结下的友谊，在一个亭子间里，他们结婚了。在这之前，有人要在上海给任弼时介绍对象，被任弼时拒绝了，任何力量也动摇不了任弼时和陈琮英患难中结下的爱情。婚后，陈琮英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夫妻双双投入了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

就在他们结婚不久，也就是 1926 年的 10 月，任弼时二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他告别了陈琮英，离开了上海。

任弼时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会间，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上，正是风云急剧变幻之时，先是北伐军势如破竹，革命的激浪一浪高过一浪，继而蒋介石反共野心暴露，在南方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张作霖也在北方屠杀了李大钊。汪精卫这当儿回了国，摆出了一副十分革命的嘴脸，在武汉大骂蒋介石，接着便是宁汉分裂，“马日事变”，中共召开“五大”会议，汪精卫、冯玉祥在郑州会谈。冯玉祥投蒋，武汉挥师东征讨蒋，这急剧的政治风云，且万变不离其宗，国民党把屠刀放在了共产党的脖子上，血雨腥风，笼罩着武汉上空。而中共内部对时局看法也各持已见，众说纷纭，四分五裂。就在这时候，任弼时回到了国内。任弼时一到武汉，立即嗅出了风声不对。

这天，他来到了武昌都府堤 41 号，这里住的是毛泽东。任弼时进门之后，夏明翰、蔡和森、方志敏、彭湃、毛泽民、毛泽东都在，正在互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一个个慷慨激昂，指责陈独秀要把中国共产党推向了火坑。大家见任弼时进来，都起身让坐，任弼时没有坐下，他把手中的一张撕碎的《民国时报》往桌上一扔，满面怒容地说：“看看吧，这张报纸是一个国民革命军官在大街上撕的，那军官

边撕边骂，这上边登了些什么？登了鄂南农民组织农会，斗争恶霸地主的新闻，一个小小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没有人撑腰，敢这么大胆吗？任弼时又把在手中的一份材料往桌上一放说："这是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致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只看了几眼，见其中提到了武装斗争，当场就把这意见书撕了。还怒冲冲地对我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任弼时手指发抖地说："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看着任人宰割吗？"

蔡和森为任弼时倒了碗水，任弼时喝了一口，又问道："共产国际来了指示，你们知道是什么内容吗？"

众人齐说不知道。任弼时说："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斯大林 5 月 13 日到了苏联中山大学，接见了中国学生，斯大林对蒋之举很愤慨，他痛斥了蒋，谈了武汉政府和土地革命的问题，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发来了致中共的电报。"

蔡和森愤愤地说："既然有电报，为甚不在党内公开？"

任弼时拧着双眉说："我去找陈独秀问个明白。"

毛泽东拉住他说："弼时，今天下午开党中央扩大会议，会上去问。"

任弼时说："也好。"

1927 年 6 月 23 日，在武昌的一座房子里，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张太雷等党团领导人都来了，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时局，陈独秀首先发了言。自然又重弹他那老调，要向前看，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语言。陈独秀发言刚完，任弼时便起身问道："独秀同志，共产国际的指示，你为甚不在党内公布？"

任弼时这么一问，到会的许多人都愣了，都不知任弼时的话从何而言. 吴玉章问张太雷："共产国际来了什么指示？"

张太雷说："我也刚刚听说，还不知内容。"

这时候，陈独秀的脸色，由红变黄，又由黄变白，由白变青。而

后喊道："任弼时，这指示不须要你知道，你不必多问！"

任弼时以极大的耐力克制了感情上的冲动。散会之后，他仰天叹道："如此下去，我等将无葬身之地！"

接着，任弼时参加了中共中央于 8 月 7 日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之后，他先到鄂南指导鄂南农民暴动，后奔赴湖南考察秋收起义情况。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湖南省委所在地——作者注），任弼时见到了彭公达、夏明翰、谢觉哉等省委领导人。任弼时主持召开了省常委会议。当时，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在长沙举行暴动，会上的气氛很热烈，不少同志磨拳擦掌，要与敌人决斗。任弼时遂问道："长沙城内有敌多少？"

有人粗算了一下，说："九千。"

任弼时又问："枪支呢？"

答："七千多。"

问："我们的队伍呢？"

答："有三千多。"

任弼时一问到底，结果的情况是，战士三千名中，包括起义后拉过来的两千名，实际上只有一千多。任弼时说："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

有人说："这可是党中央的决定啊。"

任弼时毫不犹豫地说："问题我去反映，长沙暴动必须停止。"

就在这时候，任弼时被调到了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到上海不久，他便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到安徽省检查工作。

这当儿，安徽党的工作已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恢复各级党的组织任务刻不容缓。这天，任弼时按约定来到南陵县公园开会，他穿着件长衫，戴着眼镜，脚蹬一双平底布鞋，手中拿着一本书，跟大学读书的学生一般，公园不大，且竹木繁盛，三三两两的游人不断，任弼时坐在了一个亭子里，把长袍一撩，读起书来。这是本《论语》。一本《论语》读完了，不见约定人来。任弼时正想为甚之际，见几个

人走进园中，一边走一边四下张望，任弼时见了。心说："不好，这里要出事。"他想着，起身要走，还没抬腿，有两个人来到他面前，这人三十多岁，青布裤褂儿，十三太保扣儿一个不拉，两袖口儿都露着半截白边儿，脚下是带云子背儿的洒鞋。任弼时一看这人的气质，就断定不是个好人，起身要走，那人把两臂一伸，笑道："先生再坐会儿嘿，干甚忙着要走哇，你看看这古亭子多好哇。"

任弼时说："古亭再好，不是久居之地呀。"说着就往外走。

那人笑道："你等的同志还没来，怎么就走了呢？"

任弼时听了这话，心头猛地一跳，暗道：这人说的话，分明来者不善。便镇定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人取出一支香烟，在手指盖上戳了戳，吸着后，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很清楚。"

任弼时把身子一转，要大步下亭，那人却到了任弼时面前，说："怎么，想走，走不了啦。警备司令部的板凳还等着你去坐呢。"说着，露出了腰中手枪。

这当儿，从树丛之中，又钻出几个人来，一个个都似凶神恶煞一般，任弼时心中明白，一定是出了叛徒了。他愤怒地对眼前这人道："你们要做什么？"

那几个人中，有个斜眼子的对说："把他扣起来，少跟他罗嗦。"

斜眼子话音儿没落，过来两个人，哗啦抖开手中链子，将任弼时锁上，而后说道："朋友，没说的，跟我们走一趟吧。"说着，就把任弼时带出公园。

往公园外走的时候，任弼时看到同时被捕的，还有好些是他压根儿不认识的人。他暗想：敌人为甚要抓许多普通老百姓呢？一定是情报不确凿，捕风捉影。想到这里，他打定了主意：决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任弼时等被捕之人在南陵县被关了一夜，第二天，他们被押到了安庆警备司令部。从南陵到安庆要走水路。为防止这些人逃跑，

便将他们放在船头，这是条民船，船上还有其他客人。那些乘客听说船上押了“赤脑党”，许多人都过来看热闹。

押在船头的任弼时无意抬头一看，忽然见一张面孔，十分熟悉。再定睛看时，认出此人是家乡的彭佑亭。彭佑亭是任弼时老家不远镇子上的一个小商人，这人为人厚道，且素有正义之感，尤喜帮人解难。彭佑亭也看到了任弼时，正要说话，任弼时一使眼色，彭不开口了。这当儿，过来个持枪的士兵，对围观的众旅客说：“都走，都走！几个红脑壳壳，有什么好看的！”

任弼时见彭佑亭要离开，使大声喊道：“我不是红脑壳，我叫胡文甫！”

那士兵回身冲任弼时喊道：“喊什么？再喊老子枪毙了你！”

任弼时继续大声喊道：“谁不知我胡文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徒弟了，我是来买货的，不信你们去问我媳妇，她叫陈琮英，在上海霞飞路276号，她在工厂做工。”

任弼时为甚这样讲呢？他这是给彭佑亭递话，意思暗说，你快去告诉我爱人吧，让她去保我，我现在叫胡文甫，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徒弟。

船到了安庆码头之后，任弼时一行被押往警备司令部．彭佑亭看准后，就急急忙忙奔向上海，要将此情况告诉陈琮英。

任弼时被押到安庆警备司令部后，立即受审，一个小个子军官恶狠狠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任弼时不慌不忙地回答：“胡文甫。”

小个子瞪着眼继续问：“哪里人，做什么的，老老实实地交待，胆敢胡说，老子撕烂你的嘴。”

任弼时说：“长沙陈岳云纸铺的学徒工。”

小个子又紧问了一句：“到南陵县做甚？”

任弼时依然不慌不忙地答道：“替老板买货。”

小个子眼珠子转了转，又问道：“既然买货，为什么又去公园开

会?”

任弼时装做糊涂的样子说:“我去公园是玩儿的。”

小个子哼了一声说:“看来不动刑你是不招的。”说着走上前,“啪啪”左右开弓的打了任弼时几个耳光,直打得任弼时嘴角流血,而后,小个子倒背着手问道:“到哪家货店买货?”

任弼时装做害怕的样子,呜呜哭着说:“我还没有去买呢,就被你们抓来了。”

小个子见任弼时对答如流,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工夫,走过一个帮审,在小个子耳边嘀咕了几句,小个子点了下头。那帮审说什么呢?他说真共产党骨头都是硬的,不狠打不行。

当下,小个子令人将任弼时上了大刑,先是跪铁链子,接着压杠子、顶砖头。任弼时被死去活来地折腾了一天,可他始终不改口供。敌人无法,又把他扔进了牢中。这时候,任弼时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好肉,可他心里明白,只要不改口供,敌人就发现不了自己身份。

再说彭佑亭,来到了上海,在霞飞路 276 号找到了陈琮英,他把任弼时被捕和在船上偶遇的情况讲了一遍,陈琮英听了,脸色立时变了。她急忙抱起小女儿苏明,来到了上海党组织所在地,向党组织做了汇报,接着又准备去长沙。当她到了上海火车站时,火车刚刚开走。陈琮英咬咬牙,爬上了一辆敞棚的运煤车。母子俩冒着长夜寒风,赶到了长沙,找到了陈岳云。原来,陈岳云是陈琮英的五哥,他在长沙开了一个伟纶纸庄。她把任弼时被捕和任弼时捎过的话说了一遍。兄妹俩研究了一番,统一了口径。陈琮英又返回上海,将情况报告了党组织。几天后,一个姓何的律师从长沙来到了安庆。他买通警备司令部的人,把案子由警备司令部转到了安庆法院,之后,何律师又把几卷光洋暗中递了过去,法院里假模假样的过了下堂,就把任弼时放了。

这个何律师是党组织派去的营救之人。当任弼时拖着虚弱的

身子回到了上海家中，见到了陈琮英时，陈琮英一下扑在他身上哭了起来。任弼时又四下看看，说："我那爱女苏明呢？"

陈琮英哭的更厉害了。她哭着告诉任弼时，说他们的女儿小苏明，在随陈琮英去长沙时，坐运煤火车受了风寒得了重病，几天前死去了。任弼时听了，好一阵才悲痛地说："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任弼时出狱之后，中共中央安排他做巡视工作，并安排他任江苏省委常务委员。这时的江苏省委，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东地区革命斗争中的重要组织之一，省委书记是李维汉。由彭湃负责抓军事工作，斗争很复杂，时陈独秀与苏联托派联系在一起，在党内，彭述之、江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与陈独秀勾扯，一起向党攻击，任弼时同李维汉、彭湃等同这些托派进行了斗争，最后，省委于 1929 年做出了决议，将彭、江、冯、蔡四人开除出党。

斗争此起彼伏。一天晚上，任弼时正同陈琮英一起刻印文件，忽听门响，从敲门声中，他断定了来者为自己人，任弼时开门后，见进来的果然是从浦东回来的交通员，任弼时很关心浦东的情况。因不久前，浦东曾举行了一次暴动。结果失败了。任弼时忙问交通员："那里情况怎样？"

交通员说："浦东来了人。他们准备再大干一场，举行一次新的暴动。"

任弼时拉交通坐下，他认真地听了交通介绍的情况，而后说："还有吗？"

交通员搔搔头皮说："就这么多了，只要省委点头，那里就动手，工人们劲头儿足着呢。"

任弼时没说什么，而是吸着烟，在屋内走了一阵，突然问道："浦东来的同志住在了哪里？"

交通一听，立时明白，任弼时要亲自找浦东来人了解情况，他连忙说道："这，你不能去，那里不安全。"

任弼时却已起身，穿上了大衣，说："亲自谈谈，情况更熟，决心才好下呀。"

当下，任弼时便同交通一起出门，来到了浦东区负责人刘晓住的旅馆。

这天晚上，在刘晓屋中，任弼时同他一直悄声谈到深夜，任弼时全面的了解了浦东的情况，认为目前进行武装暴动条件不成熟，决定取消这次暴动的计划。

刘晓听说任弼时决定取消暴动，大吃一惊，说："弼时同志，……"

任弼时望着刘晓，语重心长地说："刘晓同志，我们都是负责同志，任何一个决定，都牵涉到好多同志的性命啊。"

刘晓紧紧地握住任弼时的手说："弼时同志，你的话我明白了。"

任弼时回到家中，已经深夜两点多了。陈琮英还没有休息。他见任弼时回来了，一边帮他脱下大衣一边说："弼时，今晚的行动，你太冒险了。"

任弼时说："为了同志们少流血，我只得冒这险哪。我们党内许多好同志牺牲了，都是因为一些领导者不负责任的乱下决心所致。"

后人谈到此事时，有人叹曰：

暴动声声复声声，处处流血处处红，
不是弼时心底正，浦东同志又牺牲。

这年9月，上海秋雨连绵。这天早起，那雨越下越大，街里的水几乎成了河。吃过早饭，任弼时对陈琮英说："12点回来吃午饭，下午还要参加一个会。"说完，冒雨出了家门。

任弼时走后，陈琮英到街里买了十个铜板的面，又买了两个铜

板的雪里红，回到家中，便做起了午饭，午饭做好了，看看到了12点，任弼时没回来，到了下午1点、2点、3点……直到第二天清晨，任弼时还没回来，陈琮英立时焦了急，猜想凶多吉少。赶忙到江苏省委书记罗迈同志哪里打听消息。这才知道任弼时同志被捕了，陈琮英听了，眼前一黑，差点儿栽倒地上。

任弼时怎么被捕的呢？原来，任弼时冒雨来到了开会的地点，他把门刚推开一半，见院中有陌生人探头探脑，他立时感到情况不对头，刚要转身离开，这时，过来两个满脸横肉的大汉，将他双膊拧住，他想挣脱已来不及了。两个大汉把他推到了院内一间房中，房子里有个女同志，任弼时认识，知道这人是房东，亦是中央机关内负责联络的同志，敌人指着任弼时，问那女同志认不认识他。女同志摇摇头说："不认识。"

任弼时也争说自己走错了门。就在这当儿，女同志身边的三岁小孩见到了任弼时，马上跑了过去，抱住了任弼时的腿，喊："任伯伯。"

敌人一见此情，再不由任弼时分说，就给他戴上了镣铐，推上了囚车。任弼时趁敌不备，把衣袋中一页秘密文件吞进了肚内。

这次抓捕任弼时的，是英租界的巡捕房。英巡捕把他押到了西牢后，便进行了搜身，结果，只搜出了一张月票，月票上有任弼时的照片和详细地址，敌人拿照片同任弼时对照了一下，果然不差。又按照月票上提供的地址去核查门牌号码，根本没有这所房屋，这所房屋早已在一次大火中被烧掉了。这样一来，任弼时的身份更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了，敌人立即动用严刑拷打他，问他是什么人。任弼时说："我叫胡长吉，从湖南来上海做生意。"

一个洋巡捕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问："家住上海哪里？"

任弼时说："生意人，行踪不定，住处不定。"

没等任弼时说完，"啪啪啪"的几个耳光又打了过来。打完之后，又有几个洋巡捕举鞭子向任弼时身上乱抽，任弼时因为刚刚出

狱不久，身体还很虚弱，又适逢发着高烧。敌人在用刑中，他眼前不由得一阵发昏，但是，他咬定牙关，再不开口。巡捕们见他不开口，便用绳子将他口勒开，面对敌人的暴行，任弼时异常愤怒，当一个巡捕举起皮鞭朝他身上抽打的时候，他猛地扬起手臂朝那巡捕胳膊打去，使鞭子一下打到一旁站立的怒目横眉的法官身上。这样一来，更把敌人激怒了，皮鞭、电刑一起上，登时把任弼时打昏过去。

任弼时昏过之后，法官令人取来冷水，将任弼时浇醒。任弼时刚刚睁眼，法官又问他口供。任弼时一口咬定自己姓胡名长吉，湖南人，来上海做桐油生意。法官见状，又令人用电刑。这是当时从西方新引进的刑具。能使受刑人痛苦到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的状态。使身心受到极大的损伤，神经系统陷于混乱，从而达到透露真情的目的。当巡警们把任弼时的手脚和后背都绑好导线，大鼻子黄头发的法官合上电闸时，任弼时周身的肌肉都跳动起来，像有无数钢针在刺，他脑壳发胀，眼球外突，天旋地转，房倒屋倾……但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抵住了敌人酷刑的逼供。法官见任弼时仍然不说，立时加大了电流，直到任弼时又昏死过去，才算罢手，待任弼时醒过之后，敌人再用电刑，使他再次昏厥。如此反复用刑，两个电极把他后背上烙出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老远就能闻到皮肉烧焦的气味。

无论敌人怎样用刑，任弼时只是不改口供，敌人无奈，只好将其投监入狱。

任弼时被捕的消息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周恩来指示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组织营救，陈赓接受了任务后，立即通过关系，探明了案情，知道了任弼时在敌人严刑之下，只说自己叫胡长吉，湖南人，来上海做桐油生意，敌人因抓不到任弼时的其它证据，只好把他投监入狱。

情况弄明之后，陈赓便找到了陈琮英，把组织要他营救的话告诉了她，并要陈琮英配合营救。陈琮英眼含着泪说："陈赓同志，该怎么办，你就说吧，为了救弼时，我入刀山火海都行。"

陈赓说："敌人现在还没抓到弼时的任何证据，特科在德培里给你找了间阁房子，那里还住了个姓杜的老太太，待有人来查问时，老太太权做你的女佣人，你是闻讯从湖南长沙来此救夫的。"

陈琮英边听边点头。当即同陈赓一起来到了德培里，陈琮英同杜老太太接上了头。这杜老太太也是个革命的老妈妈。她对陈琮英说："孩子，放心吧，他们特科的同志本事可大哩，准能救出弼时。"

陈琮英说："这我知道。"

陈赓安排好陈琮英，又通过关系把外面情况告诉了任弼时，之后，让陈琮英出面，在巡捕房上下打点，由于使了钱，加之巡捕们也没有抓到任弼时的任何口供和证据，对任弼时的审问也就放松了。但也不放过他，只把他关在洋牢里。陈赓又去找国民党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杨登瀛时已完全热心为中共服务，他听了陈赓介绍的情况后，当天，便在英租界里一家大酒楼摆了一桌盛宴，宴请英巡捕房的头子兰普逊。席间，杨登瀛说："我有个亲戚从湖南来上海做买卖，被你们的手下人抓走了，关进了监牢。"

兰普逊同杨登瀛过从甚密，听了杨的话后，说："是你的亲戚，那好说，回头把他放了就是了。"

酒席宴罢，第三天，任弼时就被放了出来，当他同陈琮英见面时，虽然仅分手不到月余，已形同两人，只见任弼时面容憔悴，如同生了一场大病，后背被电击成的洞，用手一按，冒着黑血水，陈琮英见到这情形，抱住了任弼时，泪珠儿不由得滚了下来。

任弼时出狱后不久，中共中央又派他到了武汉，任长江局委员，他不顾身体尚未恢复，在一个浓雾弥漫的清晨，登上了开往武汉的江轮，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说罢任弼时，再说说王稼祥。

王稼祥。原名王嘉祥，又名王稼蔷。1906 年生于安徽泾县西乡

厚岸村的一个小地主兼小商人之家。其父王承祖，开着小店铺。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王稼祥七岁入本村柳溪小学读书，毕业后又进了村中私塾。三年后，入一所教会办的乐育中学读初中。其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免试升入教会办的芜湖圣雅各中学高中部。

在圣雅各中学，王稼祥看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使他思想有了新的升华。时学校英文教师查文梅先生对王稼祥甚为喜爱，意欲将女儿许王。其父甚为满意，王稼祥虽经反抗，然终在父母强制之下结了婚。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圣雅各中学举行追悼大会，学生们公推王稼祥为学生代表之一，王稼祥写的悼词，深为师生惊异和叹服，大家好象突然发现了一个出众之才。

1925 年 4 月 24 日，芜湖各界人士在湖南会馆联合举行了追悼孙中山先生的大会。王稼祥参加了大会，会上，中共党员、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表恽代英发表了演说。恽代英的讲演，使王稼祥受到了鼓舞和启发。

圣雅各学校由于是教会办的，因此，学生们要按时做礼拜和作祈祷。在全国反帝反封的浪潮中，圣雅各学校的学生也“造反”了，他们向学校当局提出做礼拜和作祈祷时学生可自由参加，将圣经课改为自由选学课。但校方不从，于是学生罢了课，王稼祥成为学生领袖，为此，他被开除学籍。

王稼祥回到家中后，顿遭其父的谩骂，逼其随己做买卖。王稼祥不愿听父的怒斥，也不愿见与己无有感情的妻子。心甚苦闷。

这年 5 月，王稼祥听说由共产党办的上海大学招生，任教的是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沈雁冰、周建人等，决计去投考。然其父不从。其母怕王稼祥憋出病来，偷偷给了王稼祥一些钱，要他去上海散散心。

王稼祥背着父亲到了上海，考上了“上大”附中。时“上大”一片革命生机，王稼祥顿觉大开眼界。其与好友王柳华信中云：

（我）来沪即入上大附中，人地生疏乏善可述。……上大为革命大本营，对于革命事业颇为努力，余既入斯校，自当随诸先觉之后，而为革命奋斗也。

王稼祥入"上大"附中仅一个月，学校的共青团组织见他是个苗子，决定吸收他为共青团员，王稼祥也愿入，这样，他的入团申请很快得到批准。

1925年10月的一天，"上大"附中校长、共产党员侯绍裘找到王稼祥，问他愿否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王稼祥当即表示同意。10月28日，他和一些同学作为第一批"中大"学生动身赴莫斯科。

入学之后，王稼祥因在教会学校读过书，有英语基础，便与张闻天、沈泽民、吴亮平一起，编入只有十一人的英文特设班。

王稼祥刻苦地学习着，感受着苏联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他在1926年1月19日，曾给其挚友王柳华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信中说：

祖国一别，瞬已数月了，我于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暇时，把我在赤都的生活，和苏俄的情形，大概的报告你们吧！……赤旗盈空，雪天万里，把中国的革命青年，置身于斯，自然增加了不少革命勇气。苏俄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现在正一步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工农的生活，非常平安，普通工人每月可得薪水四五十元，而官厅最高官员月薪亦不过二百元，这可见苏俄人民之平等了。

苏俄人民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极其注意，尤其是对于中国革命青年，表示出十二分的热烈欢迎，我曾参加过俄国工人庆祝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纪念会，在谈话中，在讲演中，都表白他们十分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来日与苏俄

携着手，共同去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

王稼祥在俄国为自己起了个俄文名字叫做“康莫纳尔”，意思是“共产党人”或“公社党人”。他决心为共产主义去奋斗了。蒋介石“四·一二”屠杀共产党员的消息传到苏俄时，“中大”不少学生对革命前途失望了。王稼祥对同学说：“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信心，更可怕的是不接受经验教训。”

1927年底，王稼祥由米夫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来苏俄上学前，曾加入过中国国民党。但以后没有任何联系。到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康生就此事将王整的死去活来。

前文述过，中山大学的支部局到后来由王明等人把持，王明为扩大自己的势力，紧拉王稼祥。王稼祥对于米夫和王明的态度，在其于“浩劫”中交待的材料内写道：

原来的旅莫（斯科）支部是直属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同联共是平行的。……奈因旅莫支部与中国党中央联系困难，党中央的文件收到不多，无法联系，于是实际上把注意力中心变成思想意识锻炼，由于都是学生，每天的生活总是那些事，于是开小组会讨论的尽是大家的生活小节，由于旅莫支部开会很多，常常在上课时开会，于是旅莫支部与学校当局发生了矛盾，学校当局提出解散旅莫支部，把旅莫支部编入联共组织，这当然是当时联共和共产国际的意见。我当时是赞同解散旅莫支部的意见的。……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对中国党丧失了信心，认为他们不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陈独秀主义，就是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而对斯大林和当时联共和共产国际则推崇备至，认为他们是把革命搞成功的

人。由于斯大林本人在讲演中曾提到了米夫，因此当时便错误地对米夫也产生了尊敬的感觉。

在王明等人操纵支部局反对瞿秋白等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时，我当时虽未参加“六大”，未参加支部局，但是是拥护支部局的，而对中国党当时在莫斯科的代表团(是)不太信任的。

王稼祥被列为中山大学的“二十八宿”之一。也正是如此，使其背上了一个终生来能完全解脱的沉重的十字架，在后来中共内部矛盾纷争之中，特别是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在莫斯科的五年生活，竟成了他所有“错误”以至罪恶之源，他因此而被定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小宗派”的成员，被指为“二十八个半”之一。他几乎用尽毕生的努力，也没洗清这些罪名，直到含恨离去。

王稼祥被视为“左”倾小宗派成员，然亦亡在“左”倾之中，此为中共“左”倾之恶矣！

1930年3月，王稼祥回到国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和《实话报》。此后，在反李立三路线中，王稼祥受到了党内处分，被派到香港作党报记者。

数月后，米夫到了中国，“二十八个半”内的沈泽民、陈昌浩、凯丰、夏曦诸人都回国，米夫、王明掌了中共大权。王稼祥回到了上海，并被撤销了处分。接着，王稼祥被王明、米夫以中央代表身分，派往江西中央苏区。

说罢王稼祥，这里再把顾作霖略作介绍。

顾作霖，1908年生于上海嘉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参加五卅运动。后入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学习。1926年初任共青团杨

浦部委书记。同年 11 月任中共江浙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共青团江浙区委组织部部长。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 年 6 月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山东，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兼团省委书记。7 月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领导恢复山东团的组织。1929 年 4 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团省委书记。同年 11 月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30 年 5 月任中共江苏省行动委员会组织部部长。8 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不久，任长江局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负责组织兼青年秘书处工作。同年底回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王明、米夫对顾的印象甚佳，故派顾作为中央代表，同任弼时、王稼祥一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七章　“富田事变”始末

“温和派”项英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作为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苏区，由任弼时为团长，他们三人的任务，说穿了就是王明、米夫对毛泽东、朱德等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不放心，不信任，派他们三人控制中央苏区。

这里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情况略作介绍。

中央革命根据地简称“中央苏区”，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秋收起义后，赣南、闽西地区就出现了小块的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后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编成红4军，离开了井冈山，转战于赣南、闽西之间，在这些小块革

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先后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

与此同时，在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间，赖经邦、李文林、古柏等人领导赣南地区的武装起义，也先后开创了东固、桥头等小块根据地。1928年，成立了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李文林任团长兼政委。翌年9月，又成立了江西红军独立团。

1929年1月中旬，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4军到达瑞金城北的大柏地，与当地红军会师。随后，离东固入闽西。3月，回师赣南，4月1日到达瑞金，与从井冈山突围而来的红5师会师。4月中旬以后，红4军先后占领了兴国、宁都、于都三个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5月上旬，赣南特委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建立赣南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罗炳辉率领吉安"八乡联防靖卫队"起义，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5团。同月，正式成立了东固区苏维埃政府，不久又成立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1930年初，江西红军独立2、3、4、5团合并，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后改称第3军；黄公略任军长。与此同时，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成赣西特委。1930年2月，红4军在吉安陂头召开了红4军前委和赣西特委及红5、红6军委联席会议。会上组成了红4、红5、红6和赣西、赣南、湘赣边界党的共同前委，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将赣西、赣南、湘赣边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由刘少奇任书记。2月下旬，红4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政权，发展地方武装，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展。3月，在吉安富田召开了赣西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由曾山任主席。

南昌起义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曾率部进入福建上杭、永定，领导闽西党组织开展工作，先后在长汀、龙岩、上杭、永定、平和等县成立党的县委。1928年3月和6月，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了闽西武装起义，建立了一个营的游击队，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1929年3月，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主力从赣西

南入闽西，击溃福建土著军阀郭凤鸣旅，进占了长汀县城。下旬，建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5月下旬，红4军三次打下龙岩城。全歼敌陈田辉部。接着占领了永定县城。先后成立了永定、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永定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邓子恢任龙岩县革命委员会主席。7月21日，在上杭蛟洋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闽西特委，邓子恢任特委书记，张鼎丞任军委书记。到了8月间，红4军在闽西先后占有了长汀、上杭、连城、永定、龙岩、武平6个县。1930年春，长汀等6个县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同年3月18日，在龙岩县城召开了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由邓子恢任主席。闽西各县赤卫队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后改称第12军)，由邓毅刚任军长、邓子恢任政委。

1930年6月中旬，前委在长汀召开扩大会议。会后，红4军与赣南红3军，闽西红12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随后红20军、红22军亦编入红1军团。同年8月，红1军团与红3军团合编为红1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

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宁都的小布宣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为全国苏区党的最高机构。

对于苏区中央局的成立，在1930年的8月29日，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在湘鄂赣三省成立苏区中央局给长江局的信》中即明示：

> 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的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当着有些区域还没联成一片时，则由长江局、南方局或省委管。

时中共中央派关向应前往红1方面军组织中央局。当关抵长

沙附近时，正值红1方面军二打长沙，战区阻隔，无法通过，只得又回中央。9月初，中共中央又指派长江局军委负责人西一(即周以粟——作者注)前往，组织中央局。周在袁州追上从长沙撤退的红1方面军，后因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迫在眉睫，成立中央局事又放下了。9月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提出组织中央局事。在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谓：

> 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当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权建立起来后，苏区的中央局应经过党团在政权中起领导作用。

10月底，中央派江钧(即项英——作者注)前往红1方面军主持建立中央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致信毛泽东等，谓：

> 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未到达之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同志代书记。委员名单另附。

1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内中又指出：

> 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各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

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的这些规定，与李立三时的中央的规定所不同之处，是改变了将中央局和中央政权设在中心城市。而主张将中央局设在农村。

时项英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其9月到上海参加四届三中全会，会后又返回武汉。于1931年1月上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

项英抵后，即向红1方面军总前委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时正值第一次反"围剿"间，中央局未能立即成立，1931年的1月15日才正式宣告成立。同时发表了第一号通告。谓其：

> 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定的工作。

中共中央拟定的名单，中共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CY中央一人，共九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因当时周恩来在上海党中央任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兼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人，一时不能来苏区，中央局书记由项英代任。任弼时、余飞亦未能来苏区。河西（赣江西）交通阻隔，湘赣边特委也不能来人。故中央局成立时，在苏区的中央局成员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曾山四人，按照中央计划，全国各苏区划分为七个特委；赣西南、湘鄂赣、闽粤赣、赣东北、赣鄂边、鄂豫皖、左右江，均归苏区中央局领导。而随后成立的鄂豫皖分局，湘鄂西分局，均是苏区中央局的分局。由于交通阻隔，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和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况，中共苏区中央局开始均无从知道。3月中旬，出席全国总工会代表会的赣西南代表肖道德、胡家玲、戴辰生三人由上海回来，他们只带回共产国际关于批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来信，并无四中全文件。

"富田事变"的经过

苏区中央局成立后，首先解决了"富田事变"。富田事变是怎样

一回事？说来话长。

富田位于江西的吉安、永丰、兴国三县交界处，属于吉安县管辖的一个村庄，这里山清水秀，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的基础很好，曾一度是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之地。

1930年10月，红军攻克吉安城，在清理敌人文件时，发现了一张条子与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的家属有牵连。这样，李文林立即成为重要的特嫌，被红军总前委在黄陂扣留。李文林，1900年生，江西吉水人。原名周金堂，又名周郁文。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期在南昌从事学生爱国运动。1927年春在朱德军官教育团任军事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同年11月领导路口山区失散武装，成立工农革命军第9纵队。1928年1月指挥部队配合延福党支部领导农民武装攻打阜田获胜，不久任赣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同年7月、11月领导组建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第4团，任第2团团长兼两个团的政治委员。曾率部攻克吉水、峡江、乐安、兴国等县城。创建了以东固、延福、桥头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成为红4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支撑点和策应地。毛泽东称其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1930年初成立赣南红6军，任第1旅党代表。2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党务委员兼军委书记。3月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中共党团书记。6月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即去上海，向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会议。李为东固地区江西省红军独立2团与4团的创建人，曾以党绝对领导军队而受到毛泽东极口赞誉的英雄人物。他任赣西南特委常委时，曾是当地抓AB团的带头人，特委决议中甚至有“实行赤色恐怖”的口号。时李为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12月，李文林被定为AB团首要人物而逮捕。

李文林被捕之后，红1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以特派员身份，带领红军一个连队由东固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进行肃反。

李韶九是江西雩都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省立吉安第

七师范学校学生。1925年参加革命活动，后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6军中任政治指导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返回老家组织农民武装，参加了雩都农民暴动。1928年初任赣南第9纵队纵队长。1929年任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团长。1930年2月任红6军1纵队政治委员。6月任中共红1军团前委秘书长，9月任红1方面军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文林事出后，李韶九立即到了富田。

李韶九到富田后，把红1方面军总前委的一封指示信交给了曾山和陈正人。时曾山为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正人为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宣传部长、代理书记。总前委的指示信中说，江西省委秘书李白芳、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都是"AB团"，要免除他们的职务，监视他们的行动，中共江西省委见了前委的指示，不敢怠慢，立即将上述人免除职务，并进行监视审查。接着，总前委又派了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到中共江西省委和红20军中协助进行肃反工作。李、古二人，大搞逼供信，把红20军中大批久经战争考验的领导和骨干，大部分被认为是"AB团"分子。

这里把"AB团"的情况作介绍。

在三十年代初，红色区域内大肃反时，AB团、改组派、第三党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对于AB团，当时的一份宣传大纲，对AB团作了如下解释，为使读者明了，现抄录于下，这份宣传大纲是1930年6月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制的。全文为：

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

一、什么是改组派、AB团

1、改组派——改组派是国民党挂羊头卖狗肉的反革

命者，他们本是国民党左派，如汪精卫、陈公博等，同时他们又称为国民党的正统派，后来因为蒋介石以军治党把汪精卫赶下台，于是汪精卫便主张国民党要改组，所以就称他们为改组派，这一反革命派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实在已投降帝国主义，变成了中国反动营垒中最严重的阶级敌人。

2、AB团——AB团是江西豪绅地主的封建组织，是江西地主豪绅的集合场，他们没有什么反革命主张，只是一味的争权夺利，升官发财为主义，这反动组织是在前几年北伐军克复江西以后，1927年产生的，当时江西的新豪绅如段锡朋、周利生等为要提取江西政权，巩固他们的饭碗，御承蒋介石鼻息，于是形成了这一反动组织。最近两年来，因为AB团内部自己权利分得不均，于是引起冲突，现在他们有左派与大同盟之分，这是狗争骨头狗咬狗的把戏，就是AB团死亡的象征，我们要认清AB团是江西豪绅地主的代表，是江西工农劳苦群众最严重的敌人。总之，上面二个反革命东西虽是各个不同，然而他们反对工农阶级摧残工农革命是一样的。工农群众必须认清这些阶级敌人，把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应该针对着改组派AB团勇猛的杀去！

二、改组派、AB团的反革命罪恶

工农群众认识了这些残酷恶兽——改组派、AB团，我们现在再要把他们的反革命罪状宣布如下：

1、解散工农会，缴工农革命武装——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就是改组派、AB团公开背叛革命的时候。这些反革命因为看见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工农群众

伟大的力量。恐怕工农群众夺取政权对他不利。于是1927年始向革命势力反攻,把革命的工会农会解散。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枪械缴去。建立豪绅地主的靖卫队。自此以后,工人农民开会的权也没有了。到处总是捉工人农民共产党员。这是他们第一件罪恶。

2、屠杀工人农民共产党员——自民国十六年国共分家以后,这些残忍的改组派、AB团,便积级高唱铲共口号。把过去加入了工会农会的工人农民捉到下狱。并无情的屠杀,张发奎曾在广州用水机关枪剿过工人农民一死数百,捉到革命妇女割破奶胸,杀革命同志的家属,如安福革命的李精同志以及许多革命同志不是被他们屠杀了吗?经这些反革命东西到现在对付革命群众还是采取屠杀政策一贯的大反其革命(原文如此——引者注)。

3、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受了大革命打击,他的基础已动摇了,中国工农早已经有解放的机会,可是这些反革命改组派AB团生怕帝国主义塌台,自民国十六年起就禁止工人农民反帝国主义运动,说工人农民不要过火,一切外交听中央解决,可是他们实际就投降了帝国主义,认帝国主义为主人翁,最近陈公博主张联美,汪精卫拜见英相麦克唐纳尔就是他们投降帝国主义的事实证明。

4. 助长军阀混战,加重劳苦工农的痛苦——中国军阀战争的延长以至现在全国混乱局面,与军阀战争所造成全国苛捐杂税民不安生的凄惨状况完全是改组派、AB团助长的结果,今年安福许多人被捕流离失所。田不能耕、夜不能眠的同志及一切群众痛苦,何尝不是改组派、AB团所造成的哩!亲爱的群众们,他们反革命的罪恶,是难以说尽的啊!

三、为什么要反对改组派、AB团

改组派、AB团的真面目已在面前暴露了，他们反革命罪恶已经告诉大家了，现在我们再要说明为什么要反对改组派AB团，我们要知道现在是革命高潮时期，这时期是工农革命斗争激烈，反动统治阶级快要崩溃的时期，我们的敌人现在正欲与我们作最后挣扎，敌人与我们已非常接近了，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我们只有下最后决心，用极大努力一致鼓勇消灭敌人，现在据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通报赣西各县改组派正在活动，潜伏在赤色区域内假借共产党的口号，如分田抗债等来欺骗群众，引诱群众入圈套。他们的阴谋是要破坏工人农民的苏维埃政府，破坏分田，陷工农于九重地狱，好让土豪地主来占世界。他们最近并借军阀淫威用烧杀政策，威胁群众入守望队。指示工农杀工农，造成不安生的局面。他们的居心是何等的险毒啊，我们赶快明白，为要保持我们的苏维埃政府，为要保持我们已经分得的土地，为要求得革命的民众安全，为要达到现时社会攻吉安以至于湘鄂赣三省政权的目的，就必须要下决心来看清躲在赤色势力下的改组派、AB团分子。这些分子是赤色区域下奸细，是我们最近的敌人，大家一致的起来，肃清改组派鸭比团(AB团——引者注)

四、怎样去肃清改组派、AB团呢

我们要肃清改组派、AB团，就必须实行下面的几个办法，而且要努力做到：

1.扩大对改组派、AB团的宣传，使革命民众个个都

晓得改组派、AB 团是我们的敌人,凡是口头上喊革命,实际上不帮助工农杀豪绅,分田地,建立苏维埃的人,群众应监视他们,否则就要受他们的欺骗。工农群众应该认清,只有共产党才是革命的,只有共产党才会实行分田,帮助工农取得一切的实际利益。要使每个公民都能认清改组派、AB 团的真面目。

2、严密革命群众组织——过去改组派、AB 团能够在赤色区域下秘密活动,主要的原因就是革命群众组织不够严密。以后,凡赤色区域内政权机关都要管理群众,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该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人经过赤色区域时,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至于政权机关办事人更不容许有富农分子及反动形迹潜伏苏维埃政府,其委员主席必须要贫苦工农革命分子。各地赤卫队亦应其组织严密。班长应时常管理所属的一班人一切行动,队长应管理全队人一切行动。同时,革命的群众还要注意的,是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及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他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只有这样,才能肃清红旗下的奸细——改组派、AB 团。

3、实行赤色清乡——为要实现肃清红旗下的奸细,更快地促进反动统治的崩溃,安福必须实行赤色清乡——宣布戒严,加紧步哨,检查行人,断绝交通,挨户检查,登记人口,自赤色清乡以后,各地须有不至发生反动事件。苏维埃政府应注意实际的管理群众。

4、实行赤色恐怖——改组派其所以敢大胆活动,就是因为苏维埃政府对反动派的无意有意的优容,现在各

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

亲爱的群众们！上面是肃清改组派、AB团的办法，望大家一致努力实行呵！

当时，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亦印发了《为肃清AB团告革命群众书》，内称：

贫苦的工人、农民、贫民们！
劳苦的妇女们！
痛苦的青年们！

AB团是豪绅地主阶级的集团，是破坏工农革命的反动组织，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的刽子手，它(AB团)用尽一切卑污的手段，毒辣的行动，以进行其反革命的阴谋、破坏革命、所以AB团是中国革命的严重敌人之一，彻底肃清AB团是革命群众刻不容缓的责任，应有的使命。

在赣西南革命斗争日益剧烈，土地革命深入的时候，统治阶级除了躲在吉安赣州坐以待毙以外，虽然没有力量来向革命势力各极地进攻，可是他们潜伏苏维埃区域内，混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里面，作种种反革命的行为，企图作最后的挣扎，以苟延其残喘，这是革命斗争深入的必有的现象，不是一件偶然的怪事，最近整个赣西南都破获了AB团的组织，捕杀了许多AB团的首领，供出了AB团的捣乱计划。赣西南的AB团经过这一次致命的打击，我们相信可以把他们肃清了！

革命的群众们！东路AB团的组织，亦有很多，现正

在着手进行破获AB团的工作，拘捕AB团的分子。你们不要恐慌，不必害怕，我们只杀AB团的负责人，被胁迫而受蒙蔽的贫苦工农，只要能痛改前非，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决不会杀头的，共产党始终是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的，革命群众一致的起来，在本党领导之下，来彻底肃清AB团，使AB团再无存在的余地，活动的可能！也只有革命群众的一致力量，才能达到肃清AB团的目的，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们的口号：

一、革命群众一致起来肃清AB团！

二、革命群众一致起来消灭封建势力！

三、只杀AB团的首领，不杀被胁迫加入AB团的工农！

四、肃清AB团，保障土地革命胜利！

五、欢迎被压迫加入AB团的工农回头革命！

六、消灭AB团，完成赣西南地方暴动！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六日

究竟红色区域内有无"AB团"、"改组派"，"第三党"？回答是肯定的，所谓的AB团、改组派、第三党，纯系子虚乌有。只是在历史上，也确有AB团、第三党、改组派这三个组织。

先说说改组派。

"改组派"由"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化而得名。它是国民党的一个派系。1927年，武汉汪精卫政府于"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合流，之后，国民党大权仍操纵在蒋介石手中。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对蒋之专权十分不满，遂酿成了蒋汪之间的派系斗争。1928年间，汪派骨干分子陈公博、顾孟余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后人

皆呼“改组派”。1929年3月改组派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央设总部、各省市及海外设支部。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和江苏、湖北等省及海外法、日等都成立了支部，1930年为改组派最盛时期，时全国成员达万人以上。

改组派反对蒋介石专权独裁，亦仇视共产党，仇视工农革命运动。他们打着恢复国民党“1924年改组精神”的旗号，倡导重新改组国民党。然其真正的意图是借改组之名，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正统之位。说白了，改组派只是反蒋在野派。其所代表的利益与蒋氏相同。1931年，汪精卫在香港宣布解散了“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同年12月，汪、陈、顾等在国民党中央内终争得一席之地。

“AB团”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新右派的一个反共组织，其全称为“AB反赤团”。AB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为了破坏江西的工农革命军运动，夺取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通过其党羽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派段锡朋、郑异来、洪轨等到江西，以“庐陵同乡”、“北大同学”的关系，网罗党羽，于1927年1月秘密组织了专门从事反共活动的反革命团体——AB团。AB团的宗旨是“反对联共、联俄、农工等政策，取消民主主义”。其建立不到三个月，即遭到江西革命人民的打击，于1927年4月2日国共尚未分道扬镳时，即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四·二”大暴动，一举推翻。从此AB团彻底解体。

到了1931年4月，曾经是AB团头子的段锡朋说：“AB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的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开始清党，AB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反赤团因已无形解散，并将其经过情形呈报中央，即在中央党务刊物，亦曾正式备载其事。”

段锡明的讲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说苏区内有AB团，

完全是子虚乌有。

“第三党”是指1930年8月邓演达等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由谭平山、章伯钧等1928年春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来的。“临时行动委员会”以邓演达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郑太朴、章伯钧、黄琪翔、李进璋等分任组织、宣传、军事、青年委员会主任。下设中央、上海、北平、香港四个直属的区干部和江苏、浙江、河北等省地方干部会，出版《革命行动》等刊物。“临时行动委员会”既反蒋，但也不赞成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企图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外，成为独占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故人称之为“第三党”。

第三党虽然在思想上不同意共产党的做法，幻想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一条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间道路，但他们的政治主张的主要方面是坚持反帝、反封、反蒋的。因而，第三党还是具有很大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1930年12月，第三党首领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第三党受到沉重打击。到了1935年，该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为爱国民主党派之一。

话转回头。据史载，中共在所领导的红色区域内抓AB团，是从赣西南地区开始的。从1929年下半年，赣西南的一些地方就在肃反中抓AB团了。

在肃整AB团的过程中，赣西南苏区把AB团说成南京有总部、各地有分部、并已大量打入中共内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

到了1930年“二·七”陂头会议后，抓AB团即扩大到军队，红1方面军在打AB团的过程中，从所抓的“AB团分子”刘天岳、曾昭义、龙超清、梁鼎元、江克宽、周赤等的口供中，说省行委内有江西AB团的总团部，这样，抓AB团又扩大到了省行委。

红1方面军总前委在1931年10月14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

> 赣西南党、团、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机关，多数为AB团所充塞。

10月26日，红1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又发出指示，称：

> 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AB团)……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赣西南的党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此后，打击所谓AB团的活动即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对所抓的"AB团分子"，采取的是逼供信的手段。在1930年9月24日赣西南特委印发的第20号《紧急通告》中，在题为"最近破获赣西南AB团的经过"的文内有这样一段记载。称：

> 团特委发行科朱家诰，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万安县委破获，AB团告朱是团员，写信告知特委，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织，组织赣西南的AB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当即把谢兆元及总团部的一切人员全部捉拿，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党团特委和赣西南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

《紧急通告》中还说明了"彻底肃清 AB 团的具体方法",称:

> AB 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供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地严刑审问,找出线索,跟踪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的 AB 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事实上,AB 团就是在"苦打成招"中出来的。

"富田事变"即在赣西南和江西省委大抓 AB 团时发生的。

话转回头,继续说"富田事变"经过。

李韶九、古柏二人到了红 20 军后,见到了军长刘铁超、政治委员曾炳青,向二人讲了总前委的指示,二人不由分说,即在红 20 军中抓起了 AB 团。

从 1930 年 10 月 4 日红军占领吉安发现那张与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家属有牵连的条子时起,到 12 月,仅两个多月的时间,李韶九和古柏即以 AB 团名义,在军队和地方上抓捕了四千多名干部。在红军中杀了几十个"AB 团总团长",约占红 1 方面军和湘赣红军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侥幸没被挖出的"AB 团"的干部,不少也被当右倾分子受到打击。最后,连 20 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也逮捕了。

时红 20 军 147 团政委名刘敌,与李韶九是同乡,都是湖南嘉禾人。刘敌本在李韶九的被抓名单之内,因系老乡,留了个面子。李找刘谈话,说:"刘敌,不少 AB 团分子都供出了你。"

刘敌惊了一身汗,说:"我是不是 AB 团分子,你还不清楚吗?"

李韶九说:"可供你的人很多,我看有甚你就说罢,免受皮肉之苦。"

刘敌说:"容我想想。"

李韶九答应了。刘敌回团之后,立即和营长张兴,教导员梁学

贻紧急商议，刘敌说："李韶九是个反革命分子，他抓了许多干部，把我们政治部主任也抓了，还要捉我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不能让反革命分子阴谋得逞。"

张、梁都同意刘敌意见。于是，刘敌集合一营人进行了动员。战士们听说李韶九是反革命分子，都很气愤。于是刘敌带着这一营战士，包围了军部，捉住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李韶九当时恰好没在军部，他闻讯之后，慌忙逃走。红20军政委曾炳春当时也没在军部，他听说军长被捉，吓得不敢回队，而是躲到了家乡。谢汉昌便带着红20军进攻富田镇，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缴了省警卫连的械，释放了被关押的"AB团分子"——被捕的省苏维埃和省行委的一百多人。李韶九逃走的时候被捉住。古柏、曾山闻枪声连夜逃跑，战斗中，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亦被误捉——战士们疑其是李韶九的人。

事变之后，刘敌等即喊出"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这就是历史所说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军总前委紧急指示陈毅前往东固解围。时陈毅为红12军军长。他立即率一连人前往东固调解处理，救出了被刘敌等扣押的人，其中包括被扣押的李韶九。不久，陈毅被任命为赣西南特区委书记。

"富田事变"中的两种态度

事变发生后，刘敌等即率领红20军越过赣江、到永新、永阳一带，脱离了红1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与此同时，刘敌等又制造了一封挑拨离间的假信，派人送与彭德怀、朱德。信是伪毛泽东之笔迹、毛泽东之口气写的。给彭德怀的信内称：

古柏同志：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共产党英文字母缩写——引者注)，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勒令招出朱、黄、滕、彭系红军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拼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三人，任何人不得告知。

毛泽东

时红3军团指挥部驻在于都的东山坝。彭德怀接到了信，看后大吃一惊，即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等找来，将信与他们，众将看后，滕代远说："这封信有诈，毛泽东不会写给古柏这样的信，其中定有阴谋。"

袁国平沉吟了一会说："这是封挑拨离间的信。"

彭德怀说："富田发生的情况，我们不了解，但谢汉昌等提出的反对毛泽东，我们不赞成，我们红3军团服从前委指挥。"

邓萍等也都表态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这时，谢汉昌也写信与彭等，拉彭等反毛泽东，彭等仍坚持拥毛。并由彭起草一信，讲了拥毛之意，派人送毛。当下，接着彭德怀又起草了一个"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领导"的宣言。随后，红3军团指挥部移驻小布，这儿离总前委所在地黄陂只有七公里多。彭德怀、滕代远到总前委请毛泽东到了军团，为军团干部讲了话，说明了情况。使干部们了解了富田发生情况的真相。

在彭德怀、滕代远等接到谢汉昌信的同时，朱德、黄公略也接到了谢汉昌等人的间离信。朱、黄看后，也认为信的内容是对毛泽东的诽谤。当下，朱德将黄公略、彭德怀等召集到一起，起草了《为富田事变宣言》，而后于12月17日由朱、黄、彭三人联名发出。18

日，三人又发表了《给曾炳春等一封公开信》。宣言和公开信都表明了态度。呼吁苏区工农群众，红20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1方面军总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遂作决议，内称：

> 实行挑拨离间，竟不惜一面说出要勒招朱彭黄滕的罪状捕杀朱彭黄滕，一面企图挑拨朱彭等来杀毛周（指周以栗——引者注），竟如此毒辣，陷害同志……我们问为什么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呢？是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问题？决不是，如果是毛泽东同志个人问题，为什么还要捉起周以栗同志呢？纵令退一万步，以栗同志刚到江西，使了什么政治手腕？捉了哪一个？打了哪一个？AB团取消派还得敢造谣吧。那么为什么要打倒毛泽东同志呢？正因为毛同志，代表正确的革命路线，目前实际在领导斗争，推动中国革命。AB团取消派企图破坏中国革命，所以就要打倒毛泽东。正因为以栗同志代表中央正确路线，所以同样要捉起。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给一个打倒。同志们，当此阶级决战紧急，蒋介石在外面大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线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20军在河西一带活动期间，没有与敌人联系，亦没有任何人投降敌人，却大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将游击队编为175团，并准备攻打吉安。他们把事变经过向赣西特委书记王怀仁汇报了一遍，王怀仁听后，认为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而是路线分歧。最初，总前委将其定为反革命暴动，而后发出通告。项英主持中央局工作后，作出了决定，通告称：

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

在“通告”发出的同时，项英又以中央局的名义，通知赣西特委和红20军党委，要他们立即停止党内攻击，听候处理。并责成曾炳春到永新一带，把红20军带到河东，并通知赣西特委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都到宁都黄陂苏区中央局开会，以党内会议方法解决分歧。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都遵照指示，到达了黄陂，参加了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等人都在会上认真地检讨了自己。项英认为检讨的不错。而后，派了段良弼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富田事变情况。

“三人团”下车伊始

段良弼到了上海后，中共四中全会已开完，王明等已掌了中共大权，由于富田事变当事人大都是赣西南拥护立三路线的，所以王明等对富田事变甚为恼火。于是，中共中央向红军第1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发出《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通知内称：

蒋介石最近又增加了十万兵力，重新规定第二次的“剿共”计划，在计划中最中心的问题是：集中兵力，徐图红军内变，以便一举而歼之。所以蒋介石政府现在不仅调动武力，并且调动一切反革命的社会力量，不仅动员后方，并且动员苏区内部反革命的力量，来进行破坏苏区与捣乱红军的阴谋。苏区内部的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是反

革命必然要动员的力量，AB团、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更是反革命最得力的组织工具。而党内立三路线的领导和影响，更给了AB团富农分子以莫大的帮助，他们可以利用一刻不停留的去打南昌武汉，集中一切农民武装到红军中来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之盲动冒险主义的策略（原文如此——引者注），来便利他们在后方捣乱，有时他们更要夸大他们的力量来恐吓革命，故意散布谣言与污蔑，来动摇革命战线，来忧乱群众视听。真正的布尔塞克维，老练的革命党员，在这种地方便要首先稳定自己的阶级立场与政治路线，认清自己的斗争任务，来确立行动的方针。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先，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中央代表团到达以后，中央局立即组织起来，各地党的组织与红军必须统一于这一指导之下，应绝对服从中央局关于这一事变的解决。

同志们！阶级决战是你们斗争的任务！不仅在战场上要拼命的一致的与蒋介石的军队肉博，并且要在苏区内部与一切阶级敌人——地主、豪绅、富农、官僚、资本家、改组派、AB团、取消派、第三党作残酷的斗争，这首先便须肃清党内的立三路线。敌人越从外部进攻，内部的阶

级斗争便越发尖锐。不统一指挥不能巩固战线；不巩固战线，不能肃清内部的反动；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同志们！这是战斗的任务！中央深信这一指示到达各地党部后，一切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战士，都将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一起，为着共产国际路线与中央的决议而斗争。一切的阶级敌人，都将在革命团结的力量面前失败、死亡和消灭。

中央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富田事变再次作出决议。内称：

中央政治局在详细的研究赣西富田事变的已有材料之后，更根据目前事变的发展，特对此事变成立以下的决定：

（一）红军二十军一部分暴动，红军学校之被缴械，在AB团影响下省行委分子之释放，中央特派员易尔士之被捕以及"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的提出；——这些行动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AB团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他们企图消灭党与红军的队伍，破坏党与红军的领导，他们的目的是帮助着南京政府来进攻和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

在阶级敌人的这种行动中，一部分党员与二十军一部分队伍是受了AB团的欺骗与迷惑，但这种情形绝不能减轻此次事变的反革命的实质。

（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

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总前委（现在的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应用一切可能与力量吸引广大的劳动群众——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民参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组织与一切反动分子的斗争。红军内以及红军外的一切指挥机关应格外注意反对反革命的斗争。

富田事变指证出：反革命势力在苏区内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他的基础建筑在各种剥削分子——地主、豪绅、富农、大商人以及旧官僚的身上，在南京政府与白色区域鼓舞之下，极力发展他们的积极性，并且很巧妙地进行他们的工作。他们更侵入我们的党、团、红军、苏维埃和工会中进行他的破坏工作，以援助南京政府向革命的进攻。同时这些反革命分子凭借着苏区内富农的领导，更利用立三路线上的“左”的以及极右的口号，来破坏工农的联合，来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与葬送红军的主力。这种反动势力不是在个别的活动，而是有组织的有严密计划的在做工作。AB团的存在与发展就是很好的证据。同时福建的社会民主党，湘鄂西的硬肚会、北极会，各苏区的改组派、取消派、以及最近从党内分化出去的罗章龙右派小组织，都必然是江西AB团的第二，而且有些地方，他们已经进行了反革命的暴动（如闽西的傅柏翠等）。这些反革命的组织对于我们苏维埃运动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绝对不应轻视这种危险。同时，过分的估量反革命的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战胜阶级敌人的坚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它将增加党员中群众中不自信的恐慌，并助长立三路线揭发后的悲观，失望，消极，逃跑等等右倾情绪，闽西在傅柏翠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暴动后，一部分群众中失败情绪的增长，便是主要的例证。

因此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要严格的执行以下的任务:(1)严厉的消灭AB团与一切反革命组织,一直使他们在苏区内无法抬头与进行他们的反革命活动;(2)立时将一切反动分子与剥削分子,由党、团苏维埃、工会以及一切群众组织中清洗出去,特别是旧官僚分子;(3)建立严密的苏区,肃清苏区内一切反动的武装来武装农民,并打碎苏区内反革命的集群——这是我们还未实现的最主要的军事任务;(4)在城市与农村中组织与扩大阶级斗争,要认识"杀尽一切富农"的口号是不正确和有害的。农村中有组织的贫苦群众,应执行反富农的斗争。用"杀尽一切富农"的错误口号从上面打击富农来代替贫苦群众有组织的反富农的斗争,只有吓退中农与加强反动势力。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到处组织贫农团与雇农工会,在一切地方发展反富农与一切剥削分子的群众斗争。

(三)永阳省行委(这次反革命事变的指导者)应立时解散。立时停止它的一切活动,与永阳省行委执行同样行动的其他党部,亦应受同样的制裁,如果他们不执行此要求时,应以适合革命利益的无情的斗争来回答他们。

在未举行江西省代表大会以前,由总前委所成立的河东省委是全权的省委,他应在总前委(现在的苏区中央局)的指导之下准备召集省代表大会。赣江以西的各县地方党部和永新、莲花、宁冈、遂川、泰和等在未与河东省委打通以前,得暂归湘东南省委管辖。

(四)红军二十军的指挥部,应使全军回到整个红军的系统中来,并须毫无抵抗的执行红军总司令部的一切命令。他如果不这样办,应无情地与他作武装斗争,同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要用一切可能将二十军挽回到自己

的监督下来，不允许以后我们任何队伍重演这种行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对军事组织中的分裂负责。

……

（六）二十军暴动的事实告诉我们：红军中的各级党部还没有了解和执行党与中央指示给他的任务和责任。红军中各级党部的重要任务是保持和加强红军的革命纪律与战斗力。因此执行上级机关，指挥员与政治委员的命令是每一个党员团员第一步的基本任务。不执行命令，批评这种命令和行动计划，批评上级指挥员的战略，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各级政治委员，不但有权力停止队伍中党部所通过的削弱红军战斗力与纪律的决议，并且有权力解散该支部以及开除支部中个别同志的党籍。即红军以外的党部，亦不容许在公开会议或公开文件中批评红军指挥部的行动计划和策略。

……

富田事变他方面又指出，二十军中一部分党员受了AB团捣乱的欺骗和迷惑，他们认为可以用分裂军队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争执，因而走上了分裂二十军以及用武装斗争反对苏维埃机关与其他红军的道路。

中央坚决的指出，在红军问题中，在党的组织问题、经济政策以及土地革命问题中，没有任何党的争执应该引起分裂和破坏红军的行动的，而且绝不容许拒绝执行上级军事机关的命令和破坏军事纪律，我们军队中的党员，对于这种拒绝执行基本任务的行动，应采取最严厉的制裁。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被王明把持的中央指定为中央代表团后，由任弼时为团长，即动身由上海直奔福建。同去的还有叶剑英、欧阳钦等。一路上风餐露宿，非止一日，到达了中共闽西省永定的虎冈——后来人称任弼时等三人的中央代表团为"三人团"。在这里，任弼时见到了闽粤赣省军区参谋长肖劲光。前文述过，任与肖为老同学，当年两人曾一起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肖于1930年夏天回国后赴苏区的，二人今日于此相遇，分外高兴。

任弼时等三人在虎冈召开了"虎冈会议"，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稍事停留，便到了江西宁都县的青塘。在这里，任等与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会面。时朱、毛正策划如何反国民党部队的第二次"围剿"，并为此召开了中央局会议。会上对如何反"围剿"争论不休。缘由是有人于会上提出了斯大林的指示，说斯大林曾讲过，四川将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斯大林是国际共运的领袖，他的话系"金口玉言"，因而，这些人主张放弃江西苏区，转移到四川，到那里建设苏区。有人提出仍在江西努力。会议一连开了三天，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得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罗炳辉、罗荣桓、林彪都参加了会议，这些将领，都同意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针。正在这时，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到了青塘。由于他们是中央代表团，又带来了四中全会的文件，于是，中央局的扩大会议继续召开。

继续的扩大会议上首先由中央代表团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及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中央代表团发表了关于富田事变的意见。大会通过了五个决议，为：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土地问题的决议；关于1、3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CY工作的决议。

决议的中心思想是批评苏区中央局是在立三路线之下成立的，成立之后的路线上，又执行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因此，对苏区中央局要实行改造。会后，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发出了会议的决

议第一号:《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内称:

> 中央局扩大会议,听了关于立三路线及四中全会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的决议。……扩大会特别指出四中全会的伟大意义,他深刻地批评了上述时期中央局的错误路线,痛斥了当时中央对国际指示,以及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
>
> 江西党的路线大体可分为三时期说明:
>
> 第一,是1930年二七会议(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五、六两军委的联席会议——引者注)前的时期,这是机会主义的路线继续统治的时期,主要是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
>
> 第二,是二七会议到二全会议(赣西南特委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引者注),这一时期……没有从组织上肃清机会主义分子,而在后半期,在政治上就接受了立三路线的影响,使苏区忽视了巩固工作。
>
> 第三,是二全会议到富田事变。二全会议,就是立三路线领导的会议,实际上是AB团操纵向党进攻。二全会议后立三路线便完全统治了江西的党,动摇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把地方武装集中到二十军、卅五军,抛弃苏区的巩固工作,冒进地攻打中心城市,攻赣。对于一方面军前委的批评,"是同时扩大,同时深入,是十足的农民意识。""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立三路线这样的发狂,结果做了AB团一面好旗子,造成了反革命的富田事变。
>
> 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
>
> 再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中央局的

通告说："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这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没有认清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的参加的反革命暴动，而用"党内派别斗争"来解释这个事变。这种解释是非常错误的，脱离阶级立场的，这种解释是放松了反AB团的斗争，使AB团能够在这种错误的解决之下，能继续活动，继续发展他们的组织，所以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在目前这种形势之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

二、立刻规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

三、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不仅要洗刷地主豪绅的子弟富农流氓等等，还要建立苏维埃的经常工作，要在工作中去获得群众的更高信仰。

……

六、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

中央局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朱德等去了前方，中央局由项英、王稼祥、任弼时三人主持工作，任弼时、顾作霖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分任中央局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王稼祥为政治保卫处处长。这时，富田事变的性质变成了敌我矛盾，成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参加富田事变的人全部被逮捕，并以"AB团"的罪名而处决。对于7月间回到于都县平头寨的红20军副排以上的干部，也一律作为AB团骨干缴械关押，并大部处决。

最后，连为教育红 20 军作出贡献的政委曾炳春、军长刘铁军、后任的军长肖大鹏，也未能幸免。红 20 军所剩的战士，编入了红 7 军。

是年 5 月，中央局会议责备项英在解决“富田事变”中“完全错误”，革命立场不坚定，报请中共中央，撤销其代书记职，由毛泽东为代书记，报请中央批准。并成立苏区中共江西省临时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项英派往省委工作。毛泽东在前方时，中央局由王稼祥负责。王稼祥并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之职。

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将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事件性质后，即将这一处理的决议发到了全国各苏区。使各苏区内肃反扩大化之火，迅速点燃，特别是那些热衷“左”倾的人，头脑愈发热了，便以为苏区内到处是 AB 团、改组派了，因此，到处乱抓乱捕，各级肃反委员会也相继成立。在江西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于 1931 年达到了高潮。

在中共的历史上，平反了许多沉年的冤假错案。但对富田事变，一直没有个说法。一直认定其是反革命事变，其根据有两点：一是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二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和苏区的中央局都明确宣布它是反革命暴动。

近年来，许多党史研究工作者经过多方论证，许多老红军同志也提出：富田事变被处理为反革命事件，是一件冤假错案。肖克老将军于 1982 年在谈到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时说：

> “富田事变性质是反革命政变。当时有个布告，前两句是：‘段谢刘李诸逆，叛变起于富田，打起红旗反水，AB 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连，……’，这是红军政治部布告，代表了我们的政治态度。对富田事变，曾山同志回忆最清楚，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有个决议。
>
> 关于李文林，我也有些看法，他建立 2、4 团最有功，比李韶九功劳大，但后来当作 AB 团杀了。他是土生土长

的领袖，而李韶九是南昌省委派来的。东固地区的革命武装，最后的起根发苗是李文林搞的2、4团。李韶九在肃反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他任保卫局局长，搞肃反扩大化，做了许多坏事。李韶九同我是一个县的人，我认识他，江西老干部一讲到他就伤脑筋。说他很坏。他把我一个最好的连(12军警卫连——引者注)调到江西省苏维埃当警卫连，结果说我这个最好的连全是AB团。如果是这样说，我这个师长是怎么当的？他如果没有死的话，我是无法投他的票的。

在革命战争中难免不犯错误，后来毛泽东同志得出一个经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泰和梁鼎元在毛泽东同志办公室当秘书，调到地方工作，到了赣东特委，也当AB团杀了。那是我认识的人。李韶九确实干了许多坏事，但你说他是反革命也不好说。此人是大革命过来的。当时根据地反革命确实有，到底反革命到了什么程度，确实要研究。反革命是有的，但是不是那么多？下层受骗的是不是作AB团？我认为不能那样看。"

富田事变以来，认为其是错案的依据有如下几点：一是把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性质的依据是严刑逼供，不是凭事实，而是李韶九乱捕乱刑讯促使矛盾激化；二是20军的一些人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而当时的毛泽东还不是中共中央的首脑人物，其地位与朱、彭、黄地位相等，在这种条件下，提出反对谁拥护谁，固然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不能作为"AB团头子"和"反革命暴乱"的依据；三是红20军暴动之后，部队拉到了永新、安福、茶陵一带，没有一个班投降敌人，仍然坚持红军的一切宗旨，以后又根据苏区中央局的精神，回到中央局开会，并于会上承认错误，做出诚恳的自我批评。这些行动说明红20军指战员，拥护党中央

的领导，是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四是红20军同AB团毫无任何关系——而苏区中的AB团组织事实上也是子虚乌有；五是富田事变后，红20军没有杀被他们所抓之人，这一点，到目前止，尚没发现任何一点资料来证实；六是当时的红1方面军总前委，对红20军中被抓起的同志，以酷刑和杀人为儿戏，促成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事变后，红20军领导人诚心实意地回到会议桌上，却被当做反革命公审处决，对此，红军总前委和王明的中央要负责任；七、富田事变中红20军喊出的口号是"反对毛泽东"，而毛泽东后来成了"神"，因而，对这一事变，也就无人敢碰了，因此，对这一冤案错案，直到现在尚没有给予平反。近期，笔者同一些搞党史研究的同志提起富田事变，据他们讲，富田事变要有个"说法"了。是的，历史终究是历史，是不能依人的意志去转移的。

第八章　闽西苏区的疯狂肃“社党”

大“肃反”前的闽西苏区

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富田事变以前，各地肃反工作开展的比较慎重，虽然提出了“AB团”、改组派、第三党等所谓反革命的名称，但被指控为“AB团”、改组派等罪名者，名单都由内部掌握，对嫌疑犯的审讯和定案也很认真地进行核实。因此，被关、被杀的人不多，仅肃清了一些隐藏在红色政权内部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富田事变发生后，那些头脑发热的人脑袋膨胀起来，开始乱捕乱杀。特别是各县的肃反委员会成立后，便不分阶级、不分真假，甚至将被迫供出来的人都当做“AB团”分子被捕押。这样，便使肃反更加简单化、扩大化，导至了“赤色恐怖”的出

现，并在1931年达到了高潮。此后，各级党的领导才逐渐有了觉察，开始怀疑中央的肃反政策，并自觉地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立即停止处决，允许所谓的“AB团”工农分子自新等等。在审查的时候，也较注意阶级分析，重视个人的全部经历和一贯表现。同时，省、县都建立起裁判部，规定杀人须经过裁判部批准等等。但这已是肃反运动的第三阶段了。

这里把中央苏区内所属的闽西苏区大“肃反”情况，作个介绍。

闽西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南方建立较早而比较巩固的苏区，后来与赣西南苏区连结成为中央苏区。

闽西位于福建省的闽西地区，包括有龙岩、上杭、永定、长汀、连城、武平、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漳平、宁洋十一个县，西接赣南，南邻粤东，境内山岭耸峙，丘陵起伏，物产丰富。但闽西地区交通闭塞，贫穷荒僻。

民国之后，军阀称雄割据，混战杀伐，闽西一带、战火绵延近两年，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921年，进步青年邓子恢、陈少微、章独奇、林仙亭、张觉觉等，在龙岩组织了“奇山书社”，吸引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一时间，达二百人之多。他们在一番彷徨之后，逐渐向往马克思主义。1923年，他们创办了《岩声》进步刊物，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邓子恢为《岩声》的主要撰稿人和发行者。在《岩声》创办一年之后，在厦门集美学校读书的李觉民等一批闽西籍学生，又创办了《新龙岩季刊》，谓：“凡是合理的，光明的，我们都竭力颂扬他；不公道的，鬼昧的，装上炮弹，猛烈攻击。”

1925年，邱织云、罗大准等又创办了《幻灯》、《虹痕》，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闽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都是当地到外地求学的青年，大致来自厦门、广州及其他三个地区。在外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共产党，尔后返乡。如林心尧、阮山、陈正、郭滴人、李联星、温加

福、张赤男等。1926年4月，中共厦门干事会书记阮山和林心尧先后回到永定。阮山到达家乡湖雷乡以后，与先期返乡的赖玉珊、赖秋实、熊一鸥等建立了中共永定支部。由阮山任书记。这是闽西的第一个中共组织。

1926年夏，北伐军占领了闽西后，以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闽西各县国民党县党部先后成立。时共产党员林心尧、张旭高、阮山、陈庆隆、张鼎丞、郭滴人等均为骨干，在闽西各地组织农协会，深入发动群众。使闽西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

1927年"四·一二"后，"福建拥蒋护党执行委员会"下令通缉邓子恢、郭滴人等十三人。与此同时，上杭国民党右派与豪绅地主相互勾结，用巨款贿赂和策动当地驻军蓝玉田部参谋长、黄埔系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刘炳坤，于5月7日发动了事变。以一营兵力和全城警察，于当晚9时分别包围了汀属政治监察署、县党部、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和汀属八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这突然的事变，使上杭革命运动受到严重损失。林心尧等中共党员被杀害。

事变发生后，闽南特委负责人罗明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党组织转移到农村。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经闽西时，周恩来和朱德于上杭会见了罗明及闽西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为其留下一批武器，以便闽西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八七"会议之后，闽西各县党组织在张鼎丞、阮山、卢肇西、罗明等人领导下，相继举行暴动，形成了闽西土地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浪潮。时有邓子恢、罗怀盛、陈品三组织领导的龙岩后田暴动；傅柏翠领导的上杭蛟洋暴动；阮山、熊振声领导的永定暴动；朱积垒等领导的平和暴动。

是年7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决定在永定成立中共闽西特别委员会。由郭柏屏任特委书记、张鼎丞为组织部长、邓子恢为宣传部长。又将各县暴动武装编成红军第55、56、57三个团，由王海萍

为总指挥，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为副总指挥。在“左”倾路线影响之下，闽西各地的暴动相继失败，所成立的武装也分成若干小队伍，化整为零。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入闽西，打垮了长汀守敌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并将郭击毙。各地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中共福建省委决定恢复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暴动委员会，领导闽西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时以邓子恢为书记、谢汉秋为特派员。

3个月后，红4军又二次入闽，进一步促进了闽西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到了1929年7月前后，闽西特委已辖有九个县级党委，即永定、龙岩、上杭、武平、连城、长汀六个县委和杭岩连边界、汀武杭边界两个特区委、红4军第4纵队党委，共有党员三千多人。时由李任予为军委主席。

7月11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选举了新的特委。其中常委五人，为：邓子恢(书记)、蔡协民(组织科长)、蓝鸿祥(宣传科长)、雷时标、戴树兴。另外十名执委为：军委书记张鼎丞、军委委员谭震林、青年科长卢其中、龙岩书记郭滴人、武平书记练文澜、连城临时书记官钦玖，还有张用心、苏阿德、郑潮海、郑金文。此外，另选江华为特委秘书长，傅柏翠、卢肇西为军委委员。

闽西代表大会之后，蒋介石指令赣军金汉鼎师、闽军张贞师、粤军蒋光鼐师对闽西进行“会剿”。闽西特委组织力量配合红4军击退了国民党三省“会剿”人马。

10月15日至18日，中共闽西特委在上杭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指导下，着重讨论了军阀混战形势下闽西党的任务，研究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来得及讨论的组织、宣传、职工等三个问题。检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

大会之后，虽然由于红 4 军主力奉命出击东江，赣南之敌金汉鼎部进逼闽西，使得在上杭筹建闽西苏维埃政府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中共闽西特委于会议中提出的各项决议与任务，特别是关于向汀江两岸及长汀一带发展，以及扩充地方红军的计划，则是得到了圆满的成功。

1929 年 8 月，两广军阀爆发了战争，广东西北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福建省委指示朱德、毛泽东率所部立即开到东江。并指出："红军向东江出发，应以闽西之上杭、永定等地为后防。……以上杭、永定为中心，积极向外发展。"省委并派遣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谢汉秋携带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信，从厦门赶赴上杭传达。

10 月 15 日，红 4 军第 1、2、3 纵队依照前委的命令，从各自活动地区陆续向粤边境进发。10 月 22 日，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红 4 军前委书记陈毅从上海经香港回到前委机关，带来了中央给红 4 军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信中对红 4 军在东江的行动作了明确的指示。即运用游击战术，发动东江和闽粤赣边区的群众斗争，建立与扩大粤东地区的赤色区域。23 日，陈毅、朱德率所部攻下梅县城，敌集中兵力反扑，红军只得退出。由于两广军阀混战已暂停，而红军不察，结果大败。造成了红 4 军自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损失。11 月中旬，红 4 军只得重返闽西，挺进武平。继尔攻取高梧，11 月 23 日，红 4 军再次攻克汀州。

12 月 15 日，敌卢新铭率部进占汀州。红 4 军退至上杭古田镇。12 月 28 日，在古田溪背村旁的曙光小学，召开了红 4 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形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会上选举了新的前委，为：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等十一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杨岳彬、熊寿祺、李长寿为候补委员。

红 4 军在古田召开会议之际，国民党积极部署对闽西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由其 31 军军长金汉鼎为总指挥。金指挥闽粤赣三省

的十二个团的兵力，分七路向闽西苏区进攻。朱德和毛泽东见敌来势凶猛，遂率队转移，使"会剿"之敌失去了作战的目标。不久、闽北之国民党人马内讧，闽西地方红军配合红4军，趁此机夺取永定城，继而收复龙岩。上杭地方红军也一举收复上杭——此为1930年1月之事。至此，闽西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

1930年3月18日至24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在龙岩召开，会议指出了闽西苏区的十三项任务，选举了邓子恢、张鼎丞、卢肇西、郭滴人、陈正等三十五人为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推选邓子恢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时恽代英为中央代表，赴闽西视察后，对闽西苏区予以高度评价，谓："闽西八十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表现了伟大的成绩。……他们的政治影响在全福建乃至东江赣南工农群众中间都有普遍的扩大。"

当时闽西苏区，有五个县苏维埃，五十七个区苏维埃，三百五十七个乡苏维埃。据《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情况及各项文件》载，当时的闽西苏区"包括龙岩、永定、上杭、长汀及平和、武平、连城之一部分，龙岩、永定的县城都在苏维埃统治之下"。此时为闽西苏区开创以来最强盛的时期。是年3月的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将各县赤卫队改编成红9军，辖六个团，军长邓伟，政委高静山。4月，中央又将红9军改为红12军。5月，闽西又组建了红20军，军长胡少海、6月，根据中央命令，红4军、红12军和赣南红6军合编为红军第1军团，接着，又成立了红21军，军长胡少海、政委邓子恢、政治部主任陈正。

1930年，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间，无暇对付红军，使闽西苏区得到很大发展。邓子恢于1930年9月2日的《政府工作报告大纲》中写道："红军壮大，漳州震动，汀杭连也有发展。"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于1930年发出第七十号通告，在对形势的估量和对党的任务、路线、策略等方面表现了明显的"左"倾偏

向，要求红军脱离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战略上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

1930年3月1日，福建省委发出了第一号通告，谓：

> 福建全省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目前群众斗争的开展在走向全省总暴动的前途。

3月11日，中共中央致信福建省委，谓：

> 因此我们在红军的配比上在全国范围内是向着武汉与广东的两个中心发展，争取这两个中心省份的首先胜利。如果这个形势开始了，即是全国直接革命的开始。

4月2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信福建省委和闽南特委，谓：

> 红12军发展的方向是东江，是争取广州。……在直接争取广东的时期，福建所有的红军，都应全部集中推向东江腹地前进。

5月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为扩大斗争告闽西群众书》

> 闽西苏维埃政府坚决的号召你们起来，下个铁一般的决心，向外扩大斗争，打到潮汕广州去！

5月13日，红12军分三路直入广东大埔境内。在高陂，与粤敌香翰屏师作战时大败，而闽西苏区亦因为红12军离开，周围团匪趁机进攻，龙岩失守，闽西特委和苏维埃政府机关被迫撤往小

池。直到6月，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回师闽西，闽西局势才稳定。在长汀的南阳，朱毛与邓子恢等闽西特委领导会合，于此召开了前委与特委联席会议。并于此将红4军、红12军、红6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后改为第1军团。6月下旬从汀州出发，向南昌、长沙远征。

就在这当儿，1930年的6月11日，李立三在其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一决议的精神，于6月底由中央巡视员涂振农、福建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王海萍、前往上海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的闽西代表郭滴人带回，随及进行传达贯彻。使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从此在闽西推开。

7月8日至20日，闽西特委在龙岩召开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由王海萍作报告，其谓：

> 闽西党的总任务是：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扩大斗争到广东去，首先夺取闽粤桂三省政权，争取全国革命胜利。

对于大会的决定，邓子恢、张鼎丞等提出了看法，他们鉴于红12军攻打东江的教训，认为应集中新成立的红21军消灭苏区内的土匪，巩固苏区，然后逐步向漳州、厦门等大城市发展。然邓、张的建议不仅没被采纳，反被立三路线的坚决拥护者扣上"新右倾"的帽子，接着，邓又在7月15日召开的闽西苏维埃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上，被免去了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中共闽西特委书记及红21军政委的职务。分别由郭滴人任闽西特委书记、张鼎丞任闽西政府主席、李任予任红21军政委。

8月6日，福建省总行动委员会成立，随及发出了一号通告，批示各地分别成立行动委员会。9月上旬，闽西的党团组织根据这一决定，取消了党团的组织机构，合并成立了闽西总行委。10月上

旬，又成立了闽西工农革命委员会，由施简为主席。如此，闽西苏区全面贯彻了李立三的"右"倾路线，红21军于8月9日由龙岩出发，第二次攻打东江。在平和一地与闽南之敌交火、红军大败，9月10日，红21军被迫撤回闽西苏区。

就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到达闽西。中央巡视员召开了闽西总行委与红21军军委联席会议。会上，中央巡视员不仅不总结教训，反而继续批评闽西总行委右倾，保守，再次压制和打击正确意见。会上决定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闽西红军，委员会由红21军政委兼军委书记李任予、红12军军长伍中豪、东江红11军军长古大存、红21军纵队司令员卢肇西、闽西特委书记郭滴人、红21军参谋长邓毅刚等十一人组成。

会议结束后，红21军即向上杭攻击，结果又大败。此次大败，使士气急剧低落。1930年10月22日军政治部主任陈正在《向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的报告》中写道：

> 大部队长及大队政治委员都要开小差，士兵开小差者日必数百，攻杭失利连纵队司令官都想开小差了。

红21军由二千人锐减至四百人。

与此同时，闽西苏区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李立三的否认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上的"左"倾错误。一系列的过"左"的错误，使闽西苏区的局面陷于困境。

10月1日，施简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达闽西工作，施简了解情况后，即召开闽西苏维埃政府第5次常委会议。10月7日，又召开了闽西总行委、红21军军委和红军军官学校校委联席会议。会议虽然总结了出击东江失败的教训，但在给南方局和中央的报告中，仍坚持"总的路线是向东江发展"。

10月20日，左权奉中共中央之命抵闽西，任新12军军长兼

红军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左权与施简一起向中央和南方局如实报告了闽西苏区的困难。提出暂停进攻东江，改向漳州进攻。事实上，向漳州进攻也是不实际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中央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纠正的精神，也只能如此了。结果，攻打漳州一仗红军大败，一千四百多兵跑了八百多，士气非常低落。

就在此时，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到了福建，福建省委发出通告，指示各地撤销行委，恢复各级党团组织。11月1日，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陈舜仪抵闽西巡视。于龙岩召开了闽西特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撤销闽西总行委，恢复闽西党团特委。由李明光、郭滴人、刘瑞生、高大宗为常委，蒋大川、林炳泉、张念仁、谢凤莲、谢献政为执行委员。11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十一号通告，通告正确分析了形势，对斗争策略做了纠正。1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由南方局到达龙岩，进一步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精神。12月3日，刘伯坚从上海抵龙岩，带来了中央三中全会的一切密件。时项英的任务是经闽西前往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在闽西停留间，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将赣南、闽西、东江合并成立闽粤赣特区的指示。12月7日，闽、粤、赣三区域苏维埃代表在龙岩召开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闽粤赣边特区苏维埃筹备委员会成立宣言》等文件，选举成立闽粤赣特区苏维埃筹备委员会。

1931年1月21日，闽粤赣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由邓发任书记。

就在闽粤赣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取得了胜利，遂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并令其驻福建的各部向闽西苏区推进，主力为张贞的第49师。特委紧急部署兵力，苏区人民紧急行动。时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党团特委及各县党团县委信中指出：

我们不必和他们硬战，要找到敌人的弱点·先部分的打击敌人的部队，推动群众斗争的情绪，扩大和充实我们的力量。

闽西红军按照省委战略部署，集中了优势兵力，向分散与弱小之敌实行反攻。永定一仗，红军取得了胜利，到了2月，敌对闽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悄然收场。

5月，南京政府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命令独立14旅周志群部、独立第32旅卢兴邦部、第49师张贞部、第62师香翰屏部，向闽西苏区发动了进攻。中共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进行紧急动员，召开了各种会议进行了具体部署，扩充新12军，动员广大青壮年参军参战，保卫家乡和苏维埃政权。由于国民党军主战场在赣西南，加之两广军阀同南京方面矛盾激化，蒋介石的第二次向中央苏区及闽西苏区的“围剿”草草收场。

不久，南京政府又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其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星夜由上海抵闽，谓“专为主持剿匪军事”。遂动用了数师兵力，向闽西苏区展开“围剿”。红新12军根据闽粤赣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向薄弱的汀州、连城发展、击溃新编第26师。继尔乘胜前进，在十天中四战四捷。击溃了敌卢新铭旅，打破了敌人对闽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虽然第三次反“围剿”使龙岩大部和永定一部分苏维埃区域失掉，但西北方向却得到了发展，完全打通了与江西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形成了一个整体。

就在闽西红军与国民政府军血战之际，在闽西苏维埃党政军内，开始了“肃反”运动，而且愈演愈烈。

闽西的肃反是从军队内开始的。前文述过，由于闽西红军不顾主客观力量，接连出击东江而失利，红军指战员大批逃离部队，根据地迅速缩小，军队内存在着严重的失败情绪和对领导的不满情

绪。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方面加紧挑拨宣传，苏区内外反革命分子也互相勾结，造谣生事。其实，红军军事上的失败，根据地的丢失，主要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但是闽粤赣特委的主要负责人邓发，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混淆敌我界限，不加分析地把革命队伍内的思想问题同对敌斗争的政治立场等同起来，把干部群众中出现的不良行为和思想混乱，全部归咎于地主、豪绅、阶级异己分子混进我党政军组织的破坏——到后来，邓发在肃反工作中又偏听偏信于肃反委员会负责人、道德品质极端恶劣的林一株，并放任其逼供信，结果，使闽粤赣苏区内的肃反运动愈演愈烈，此为后语。

傅柏翠事件始末

1931 年 1 月，闽西的红 12 军召开了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会上，有人呼出了“社会民主党万岁”、“拥护第二国际”等口号。

第二国际于 1889 年 7 月由恩格斯领导在巴黎建立。成立大会召开之际，有二十二个国家的三百三十九名代表参加。成为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但是，第二国际从一开始就暴露了他的弱点，其组织非常庞杂和松弛，没有正式的规章和明确的共同纲领，没有总的机关刊物。参加第二国际的各个组织也没有统一的名称。甚至在 1900 年以前第二国际也没有常设的中央领导机构。后来，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第二国际领袖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在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展开了斗争，后来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

对于第二国际的复杂情况，一些年轻军人事实上不怎么了解，一时感情冲动，喊出了这种口号，不足为奇，而新 12 军领导和闽西

党组织的一些人却吓坏了，他们认为此举是有潜伏在军队和苏区内的反革命组织或派别作怪。于是，当场抓了十几名红军指战员。随后对这些人进行严刑拷打，这些人受不住酷刑，胡乱招供，说他们的组织是“社会民主党”，他们都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这样一来，闽西的肃“社党”开始了。

第一个被开刀的是新 12 军的一个团政委林梅汀。林时年 24 岁，被指控为“社党闽西特委宣传部长”，与此同时，还有六十多名党政军骨干被捕。其中一些人被指控为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部长、特派员、青委书记等。当时，正值江西苏区内抓 AB 团、第三党、改组派，并发生了富田事变。于是，闽西各县裁判肃反委员会于 1931 年 2 月 14 日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发布了《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十九号(裁字第一号)》的通告。内称：

> 最近各县各地苏维埃区域以内及红军发现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的暗藏活动。……应加紧健全肃反组织，担负迅速肃清苏维埃区域内的各种反动派别的迫切任务。……如果我们不能根本肃清内部反动势力，即无法巩固苏维埃政权，更说不上巩固全苏维埃根据地，猛烈地向外发展，完成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任务。各地应严密地清查这些暗藏活动的反动派，迅速消灭这些最危险的敌人。

联席会上，决定由林一株任闽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

在闽西苏维埃发布裁字第一号通告当天，又同时发布了裁字第二号通告，通告要求各县将捕获的社会民主党的首领押到闽西苏维埃政府审理，一般则由当地政府审理。

接着闽西苏维埃政府又发布了《反动政治犯自首条例》的公告。公告中称：

凡是半月内自首者，不论其职位高低，概行免予处罚。

就在这当儿，发生了傅柏翠率武力与闽粤赣特委对立事件。傅乃福建上杭人。1927年8月加入中共，早年亦参加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日本东京政治大学毕业。回国后在上杭县当律师。1926年任国民党上杭县党部秘书兼代理常务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上杭县北四区支部书记、区委组织部长。1928年6月参与领导上杭蛟洋地区农民武装暴动；7月任闽西暴动总指挥，8月任中共闽西特委军委委员；1929年5月任闽西红军第59团团长，6月任红4军4纵队司令员，7月被选为中共红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0月改任红4军4纵队党代表兼上杭县赤卫总队总队长、红4军肃反委员会主任；1930年春任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部部长。因与闽西特委领导对党内问题有不同看法，拒不接受特委分配给他的工作，而特委又不做耐心教育，而是采取了惩办主义，将他开除党籍。并致信于他，向他要枪，傅遂致信于邓子恢，内称：

子恢先生：迭次接到闽西政府和特委的来信，都是向我要枪，我是一个闽西政府统治下的小百姓，而且又晓得"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层道理的黄老学者，同时所处的环境，又好象樊笼里待罪的囚徒，明知朝一抗命，夕即身首异处，怎么敢不遵从意旨，马上把那获罪得来的祸种（枪）尽数缴上，以求干脆哩？不过我还有几点苦衷，不得不向你陈述。

1. 我过去是一个公开做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勾当，不知干了多少，到处皆有我的敌人，就是党里也还埋伏不少，我的性命，不消说是非常危险，所以我日常把枪带在身边以备不测，虽说革命人不应该怕死，但是我现在

已因一时离开战线，被宣告了政治死刑，徒死是没有价值了。

2. 的确乡里从前本置有一批好枪，用来保护群众的猪牛谷物的，可是近两年来，却被我这个怪物把它悉数送掉了，弄得连耕牛农具都失了保障，而不敢放手购置，农业也就因之日就衰败。同时还把地方弄成了敌人的大目标，邻区的反动派势力，又还没有肃清，而且邻区党的干部和群众都因过去在反革命时代和我处结下了重大仇隙，时思报复，以此吾乡的前途，真是岌岌可危，群众方面都有痛怪我的意思，故我为安慰群众起见，已宣言向四军要求将这几杆枪，拨归地方应用，同时已将快枪二支于去年交与区委转交政府发配了，我觉得不好再对群众失信。

3. 我手里所拿的枪，只有三八一支，六五一支，八八式二支，并没有三八式四支，其中八八式二支早已交与区委赤卫队去了，驳壳二支是我在闽西暴动前数年所买，一支是我把四区的两杆手枪换来，与我相伴已久，我在前委四纵委特委(全部家财只有这点)均有声明，除非把我杀了以后才能和他相离，你是知道的，现在上级是否已准备宣告我的肉体死刑了呢？如果这样，就请你告诉我，我是自己会执行，不用他人执行亦不必假手敌人执行的，但是我又要声明，如果确是因为怀枪获罪，那么我就要效蔺相如执璧的故事与枪同归于尽，而不愿使那个祸种留在人间贻害后人。以上三点不过略说大概，还有许多苦衷，不能一一详陈、将来有机会时当面诉。我予料你阅了我的信后，必然不能见谅，而且要大发其怒，或者我的死因也就从此种下，但是我是个直性的人，这样想了便是这样说出，直言贾祸，虽死无怨，倘蒙曲谅，乞示复数行为感！此致敬礼！

侍罪傅柏翠启

邓子恢收到傅柏翠信后，以中共闽西特委名义，于1930年4月27日，致信于傅。内称：

柏翠同志：特委自去年冬间以来，即发现汝在政治路线上和组织路线上有不少的错误，曾托毛泽东同志向汝说明，不料汝至今没有纠正，而且日益严重起来，特委认为你这种错误如不纠正过来，将来会走到更危险的道路上去，因此，第135次常委扩大会为纠正你的错误和维持党的纪律起见，特对你予以严重的警告。兹将你的错误，逐一指示出来：

（一）特委从各种事实的观察，觉得你的政治路线，从过去到现在一直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你在去年闽西党代表会中，已接受了批评，但你只是表面的接受，实际上你心里还是坚持成见，你去年12月间对陈毅同志及子恢同志谈的话，便可证明。

（二）……去年特委……曾调你为4纵队司令官，嗣改党代表，兼上杭赤卫队总队长职，但汝屡次消极怠工，并屡次反抗4纵队之扩大与训练，最后借口回里，竟一去不来。……

（三）……第二次扩大会，特委连续五次去信要你参加你都不来，而且连半字都不回复，接着党团县书联席会，又一连三次信要你前来，汝能亲往巫杭，却不来苏家坡出席。……

……

（六）你由4纵队带回来的四把快枪两把驳壳，特委

因为要健强闽西政府保卫队。屡次去信通知汝，并要汝连人带枪来，汝有什么意见，尽可写信来说明，不料你竟一字不回。

（七）汝信里"说除非把我杀了，才能和他（枪）离，"又说"那么我就……与枪同归于尽"，特委仅仅只和你商量交出几杆枪，你就要如此威吓，如果你做了军长或者总司令，那么你便怎么样呢？这是一个什么共产党员？什么牺牲精神？

……

（十）总观汝信里所说的话，都是些无理由的理由，客观上只是个人和有观念英雄思想的表现，同时又是负气攻击的俏皮话，虽然你这信是写给"子恢先生"个人的，但屡次写给你的信是特委署名，当然要特委负责，汝这样热嘲冷刺把特委看成什么东西？这在组织上也是极大错误。

根据上述各种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委认为你的政治前途有很大危险，故予以严重的警告，并要你将所存枪支马上交来，希望你接到这一警告后，有深切的觉悟和纠正，特委诚恳地希望汝能够从错误的泥坑中自拔起来，重新走上布尔什维克的战线！同时，兰玉田、谢秉琼写给汝的信，也望你有公开的表示！末了，致以斗争的敬礼！

中共闽西特委

一九三〇年廿七日

由于特委对傅柏翠的说服教育缺乏耐心，采取了惩办主义，不仅将其开除党籍，又派重兵围攻其家乡上杭县古蛟地区，傅柏翠一怒之下，于 1931 年 3 月，率部分地方武装而起，走上了与特委公开对抗之路。

子虚乌有的“社党”

傅柏翠的举动，使得闽府苏区的要人断定其为社会民主党的首领。遂于3月6日发布了第二十三号通告，宣布傅柏翠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首领，其家乡古蛟区是社会民主党的巢穴。

傅柏翠事件发生之后，将闽西的肃反更推上了一个高峰。裁判部部长林一株，本来就是个思想品质很坏的人，其地主出身，心狠手毒。其任裁判部长后即刑讯逼供，傅柏翠事件后，其更是滥用酷刑，加之王明“左”倾路线凌势，使这个子虚乌有的“社会民主党”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就被夸张的无孔不入。

时永定县委负责人谢献球、曾牧村等对大抓“社党”有看法，尤其是特委将拘捕永定县“社党”的名单发到县委后，谢、曾等人认为名单中所列之人，都不是什么“社党”，因而犹豫不决，也执行不力。特委对永定县委的作法大为光火，认为他们也是“社党”分子，遂一并抓起，并加严刑。

3月2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永定虎岗召开了“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大会”。主审为闽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林一株。各县乡军队的工农兵代表数千人参加了大会。当林一株宣布将林梅汀等“社会民主党党魁”押上来时，一群持枪的士兵将三十四名五花大绑的“社党”首领押了上来。时林梅汀等均被酷刑搞得浑身伤痕累累。这些“社党”魁首被押上之后，林一株即宣布这些人的罪状，并说从军队到社党的组织，已大部破获，但仍有隐藏者，继续搞破坏，林号召各地代表回去之后，继续破坏未被发觉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和机关。接着，林一株以主审的身份，宣布将林梅汀等处死。话音未落，一群彪形大汉，将林梅汀、曾牧村、谢献球等十七名“社党”的“党魁”，拉到会场一角，一顿乱棍打死。这些

人临刑之时，仍高喊着"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社会民主党！"之口号，含冤而死。

林梅汀等"社党党魁"被处死后，林一株横着眉说："对社党分子的惩处，有三条，第一条，对已捕获的'社党分子'，凡出身不好的，要处以死刑；第二条，在'社党'内负有重大责任的，要处以死刑；第三条，潜藏在党政军机关内的，要处以死刑！"

这次审判大会，使闽西苏区的肃反更加扩大化了。掀起了一股抓"社党分子"的狂热。偏这时红军在反"围剿"中接连失利，闽西苏府要人更加认为是"社党分子"作怪，更加疯狂地刑讯逼供，草菅人命。3月4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第二十三号通告，即《裁字第三号》，内称：

> 半个月来迭次破获该反动组织政党的各县组织，捕获很多的反革命首领。这事实表明，闽西苏区的社会民主党与赣西南的AB团同样严重，……对于这一工作如果还采取姑息态度，而不能坚决积极的执行领导群众一致动员肃反，这是非常错误的危险倾向。

3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又发布了第二十五号通告，即《裁字第四号》，内称：

> 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

如此一来，闽西苏区内的大小组织，全都有权抓"社党"，而且有权处决。直搞得人人自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少被怀疑追捕的"社党分子"无路可去，只好投到傅柏翠处。这样一来，使闽西苏府要人更坚信傅柏翠是社党首领，更加紧大抓"社党"了。

“三人团”火上浇油

是年 3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等“三人团”到达永定虎岗，闽粤赣苏区特委在虎岗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即虎岗会议——作者注），会上，传达贯彻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左”倾决议，确定“肃反”是苏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4 月 4 日，《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闽粤赣目前形势和任务》中称：

> 敌人积极从各方面来向苏区红军进攻，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的打入到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 AB 团以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等），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肃清内部的——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当前，右倾在党内在群众中看成是主要的危险，对一切消沉、悲观、保守、失望、逃跑等等观念要给予无情的打击。

“虎岗会议”的召开和中共中央指示信传到闽粤赣苏区后，使闽西苏区抓“社党”运动如同火上浇油，迅速升级。竟然连工作上有些不同看法者，李立三路线时期工作积极者，均视为“社党”，而林一株等人把持的肃反委员会，为所欲为，独断专行，一切决定，全不征求特委党组织的意见，要抓谁就抓谁、要杀谁就杀谁。时永定县委因为曾对抗过肃反委员会的决定，故为肃清“社党”的重点。4 月 28 日，永定县委召集各机关及革命团体党团开了联席大会，讨论肃清“社党”的具体办法。会上，县委负责人谈了永定县是“社党”活动的“重点区”，说经过斗争，大部分“社党分子”都已被破获，但在

永定区，金丰一区等还没破获，“社党分子”还有非常活动。“社党分子”之所以没以查清，其原因是县委过去对肃清“社党”不了解，没有引起全党同志注意肃清“社党”的严重问题，因此出现了不坚决执行上级的决议，甚至表示出怀疑态度，这是非常错误的。会议作出了决议，内称：

> 一、首先要了解社会民主党是反革命的政党，是军阀团匪的走狗，代表豪绅的地主资本家谋利益的，他的组织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富农流氓及一切消极怠工动摇腐化分子的集团，他们的阴谋是取消革命，倾复苏维埃、瓦解红军、破坏土地革命，组织暗杀队准备屠杀我们的负责人，他的凶残同国民党军阀团匪没有丝毫差别的。
>
> 二、每个布尔什维克党员团员要有十二万分的精神加紧反对社会民主党，同时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同党内外的社党作残酷的理论斗争，特别要互相观察同志的行动言论，才能根本肃清社会民主党。
>
> ……
>
> 四、各机关内有社党嫌疑的分子应毫不犹豫地[马]上执行逮捕起来严格审问，以完全破获其组织。
>
> ……
>
> 六、过去我们党在立三路线统治下的时代犯了许多的错误，特别党组织非常松懈，以至社党很容易混进党内来活动，目前反社党的工作，须特别注意社党以党内立三路线的错误来企图活动。
>
> 七、加紧反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每个同志都要深入群众中作广泛宣传，将一般自首的社党党徒使其向群众宣传，揭破社党的阴谋罪恶，同时要将捕获来的社党分子，号召广大群众公开审问，但执行这一工作中要联系到

巩固党巩固苏维埃冲破敌人进攻的斗争。

大会将黄瘦梅、张觉先、张启义、赖新发、曾献犹、郑世明、熊在乾、坤祺、应祺、河光、绍南、耀唐、阮边十三名县委干部，以“社党分子”或工作消极而逮捕或开除党籍、团籍。

5 月 15 日，杭武县第五区举行了公审大会，以“社党武特委书记”罪名将伍超然处决，同时处决的还有其他十人，多为 20 左右岁的青年，最小的仅 16 岁。

闽西苏区肃反高峰时，各处都几乎天天抓人，天天杀人。由于各地肃反委员会滥施酷刑，被抓者受刑不过乱石乱咬，结果使“社党分子”越抓越多。如此恶性循环，使得苏区内到处都是“社党分子”和机关。据 1931 年 6 月 1 日杭武县苏肃反委员会当时编印的《革命法庭》记载，截止到 1931 年 5 月，闽西特委两次破获“社党闽西青委”，四次破获“社党龙岩县委”，两次破获“社党永定县委”，两次破获“社党新 12 军军委”。在少先队、儿童团中也多次破获“社党”组织。

被整肃的对象，军队内主要是连排以上的干部，地方政府主要是区以上干部。尤其是闽西苏府和军队中的高级干部，肃整的更为厉害。据《中共闽粤赣省委写给中央报告(第九号)》内称，闽西苏府内三十五名执委与候补执委中，有半数以上先后以“社党”罪名受害。至 5 月中旬，就逮捕“社党分子”多达一千六百七十多人，且其中的七百余人被处决。而百分之八十是党员和干部，尤其是闽西苏区的创始人如张涤心、段奋夫、陈品三、陈锦辉等都被作“社党党魁”而杀害。共青团闽西特委于 7 月 12 日写给苏区团中央局的报告中称：

经过六月份积极肃清社党工作，及最近两星期来，赤裸裸地现出闽西团内社党分子堆塞着，团依然是极严重

的状态。……旧的团员大部分不是我们的团员了，龙岩全县可说没有团员了，其他各地可以说每个支部都有社党分子，有的甚至于全支部都是。干部方面上下层团的干部都是社党分子，部分在改组时是社党分子，经手提拔的也是社党分子。……团的教育工作、组织生活及执行中心任务，发生活动能力上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新干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头绪。

据史料载，当时闽西苏区的三十个区委中，仅有一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

肃反的扩大化在军队内也相当严重，据中共闽粤赣特委在5月1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称：

新12军在整肃后，内部的确是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兵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

在当时曾担任闽粤赣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肖劲光后来回忆说：

“1931年3、4月间，闽粤赣省委在永定虎岗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一月份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会议之后，苏区中央局根据闽西的报告，对闽西肃反工作做了‘左’的指示，要求对‘社会民主党’采用最严厉的手段镇压，同时要求在肃反中反对右倾。这样，闽西肃反一跃而为当时的‘中心工作’，12军也从前线调回虎岗集中进行肃反。对于这样肃反，开始我并没有想到是路线错误，认为有反革命当然应当肃清。所以，肃

反委员会拿来名单，从军队中捉人，让军队去捉人，我也执行了。后来，随着肃反的面越来越大，打击、杀害的人越来越多，领导之间也不团结，互相猜疑，自己便逐渐产生了疑问，哪有这样多的'社会民主党'啊？对林一株搞的那一套刑讯逼供的做法，也很看不惯，便采取了消极态度。记得有一次，在行军的路上，偶遇彭杨学校的一个学员在领导面前哭辩，一问，才知他不慎把套筒枪搞坏了，领导硬说他是故意破坏武器，是'社会民主党'分子，可见肃反搞得之荒谬。我批评了那个干部，同时教育那战士要爱惜武器。在那样的形势下，谁也不敢提意见，谁提了意见就是同情'社会民主党'，就可能被立即打入另册，甚至遭杀身之祸。后来听说张鼎丞、郭滴人同志都有了问题，大家人人自危，不敢往来。不久，我也莫名其妙地有了'问题'。有一段时间，林一株用肃反委员会的名义派了一个大肚子女人来守我的电话，监视我的行动。有一天，省委领导卢德光来我处，看见了这个女人，就问我她是干什么的。我很奇怪，我想派这样一个女人来我这里做这种监视工作，总是经过省委同意的，谁知省委并不知道。可见当时肃反委员会的权力之大。党内政治生活已到了极不正常的地步。以后，没有任何交待又把这女人调走了，其中究竟有什么鬼也不知道。总之大家都互相猜疑，也互不敢随便问个究竟。虎岗会议以后的那一段军事工作遭到严重挫折，是与当时肃反为中心的错误分不开的。肃反中，军队里大批革命同志被杀，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肃反引起领导之间的不团结，同志之间互相猜疑，党群之间隔阂日深，在敌人大举进行反革命'围剿'之时，我们的同志不是集中力量对付敌人，却在自己内部杀了大批好同志，使亲者痛，仇者快。这是何等惨痛的教训啊！"

错误的肃"社党"直搞得闽西苏区内几乎人人自危，不知什么时候，厄运降临。逼得不少人被迫逃亡，有的隐藏于山中，有的逃到他乡，甚至有的漂洋过海逃往异国。终于激起一部分人进行武力对抗。1931 年 5 月 27 日，在杭武县第三区，发生了"杭口事变"。

其经过是这样的。

杭武县第三区区委书记叫何登南，县直属的第三大队政委叫陈锦玉。这二人和区机关及 3 大队的指战员近二百人，被做为"社党分子"抓起，分别关押在一个叫杭口的村子和县苏维埃所在地白砂村内。肃反委员会对这些人刑讯逼供，要他们供"社党"内情，并扬言不供即杀。时第 3 大队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对他们的战友非常了解，知道这些人决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他们对肃反委员会的作法十分气愤。5 月 27 日，闽西苏府秘书长罗寿春到第三区检查工作，李真等遂将罗扣押，迫其写手令释放关押在杭口、白砂两地的"社党分子"。罗无奈，只好写了手令。当天，李真率第 3 大队指战员，包围了区苏维埃政府，将关押的何登南、陈锦玉等人释放，与此同时，又派人持罗寿春的手令将关押在白砂的"社党分子"带回第三区释放。

闽粤赣省委得知这一消息，省委负责人立即认定这是"社党分子"进行的反革命暴乱，当即调军队前往镇压。双方激战，第 3 大队少数侥幸逃亡外，余皆被抓。李真、何南登等区委领导、第 3 大队的领导全部被当做反革命分子处决。罗寿春也被当做"社党"的"闽西特委组织部长"而被处死。

杭口事件发生后，中共闽粤赣省委对"社党"的整肃更加严厉。如此，苏区军民与省委、政府的对立情绪更大。6 月 1 日，杭武县第 2 区的干部群众与地方武装，又发生了事变。此后，永定溪南和虎岗也相继发生事变。

这些事变连续的发生，使省委更加错误地感到"社党"活动严重，中共中央亦非常重视。7 月 15 日，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撤销了

原来的肃反委员会，另行成立了以郭滴人为处长、林一株为副处长的闽西苏维埃政治保卫处。但是，中共中央对闽西的肃反仍认为不够，1931年8月29日，致信于闽粤赣省委，内称：

> 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从你们的一切报告和决议以及来人的谈话中，我们知道已成为闽西苏区很严重的问题，据第十号报告说：自从今年2月破获以来，到现在已经拘捕3千多人，其次又说到杭口事变，杭武事变，永定汀连社会党的阴谋，以及红军中社会党的破获，这些事实都值得我们深刻的注意。经中央仔细考虑和分析之后，认为你们对于社会党还只是知道他严重，而未能回答为什么苏区阶级斗争唯一表现在社会党身上，为什么社会党如此严重不见其他各种反革命分子的举动，为什么他们能够居然能广泛的深入我们的党团和红军中去，经迭次破获和逮捕之后，仍然时常发现他们在我们组织中活动，为什么一部分被欺骗的群众抱着观望的态度不能自动的自首，甚至于恐怕加入共产党，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从你们的一切文件中找不到这些问题最圆满的回答。固然，你们认为"革命形势日益发展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统治阶级……派人去苏区中进行反革命活动，同时苏维埃区内豪绅地主的存在，以及党内阶级基础薄弱，组织的松懈，这便是使这些反革命分子可以乘机活动（见五月十四日特委关于澈底肃清社会民主党AB团的决议）"，这种分析是对的，可是只能说明地主富农及一切阶级异己分子，要利用一切机会，要加倍进攻苏区，还不能充分解释以上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因此，中央认为你们坚决反对社会党是对的，但你们对社会党的认识和处置是不够而且有许多的错误；第一，你们把苏区内部的阶级

斗争和肃反工作的对象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从你们的文件和工作中可以看出），这显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试问这样你们把反对富农、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以及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如雇农反对富农，学徒反对店东师傅等）放到什么地方去了？虽然你们在文件上亦常提到这些名词，可是事实上你们把一切斗争都看作与社会党的斗争，无怪乎你们把社会党组织看着无微不入神妙不可测了。其实中央坚决相信，如果你们能够切实的分析以上各种派别的斗争与影响，以及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发现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一定会觉到与上面这些派别作斗争和发展苏区内部的斗争，也是非常急迫和需要的。不但如此，你们照这样切实斗争的结果，一定比现在的肃反成绩更大。

中共中央的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对闽西苏区的肃反扩大化非但不制止，而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闽西苏区的肃反仅仅限于抓社会民主党，没有抓 AB 团、第三党、改组派等“反动”组织，如此一来，闽西苏区的肃反更加“轰轰烈烈”了。到了 9 月 29 日，连林一株也被作为“社党”分子抓起。在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了第九十七号通告中，宣布林一株为闽西“社党”特委书记，同时还宣布文化部长张丹川、劳动监察部长熊炳华等八名闽西苏府的领导干部为“社党上层成员”，分别处以死刑。

肃反扩大化给闽西苏区的发展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恶果。1931 年 11 月，张鼎丞在瑞金参加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时，向毛泽东汇报了闽西肃反的严重情况。毛泽东听后指示要立即纠正这一错误。

1931 年 12 月 13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了第六号训令，内称：

过去当揭破反革命的组织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时候，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很坚决的逮捕审讯，处置了许多反革命分子，给这些反革命以致命打击，使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这种工作的主要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在过去的肃反工作中，不是没有错误的，临时中央政府严重的告诉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各地过去的肃反工作，有许多地方是做的不对的。例如听到某个或某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口供，没有充分的证据，未经过调查的工作，就进行捉人，审问的时候，偏用肉刑，苦打成招的事，时常发现，处置犯人的时候，不分阶级成份，不分首要与附和，以致应当轻办的，却把他重办了。这些错误在苏区好些地方，好些时候都发现了，……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告诉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坚决的迅速的建立革命秩序，使革命群众的生命权利和一切法律上应得的权利，得到完全的保障，同时对于反革命的组织和活动，要给他以彻底的消灭。

"训令"对各地苏维埃政府的肃反提出了九条具体要求。强调对反革命案件的审讯，处理，要由国家司法机关审讯和判决。要废除肉刑，重证据。

"训令"对闽西苏区的肃反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12月初，周恩来由上海经闽西赴瑞金，他在闽西目睹了"肃反"给闽西苏区带来的严重恶果。12月18日，周恩来由永定赴长汀的途中致信中央，内称：

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已见到闽西解决社

党所得的恶果非常严重。……他们处理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示的殆过之无不及。

周恩来的信，对纠正闽西苏区"肃反"的错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向闽粤赣省委发了指示信，即《中共中央致闽西省委信——肃反问题》，内称：

……是在于肃清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不但没有造成广大工农群众对于社党的仇恨，对于共产党的热烈拥护，而且反使群众惧怕共产党，使群众对共产党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这种错误的继续和存在。……要最彻底的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上，明显的指出省委过去在肃反问题上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

2月19日，苏区中央局关于肃反错误的纠正，再次致信闽粤赣省委，内称：

根据苏区党大会后闽西工作的情形，根据伍豪(周恩来——引者注)同志经过闽西时的考察和这次李明光同志来中央的报告，闽西在肃反中犯有严重的错误。

中共中央在信中要求闽西省委坚决按照中央指示，纠正错误。1932年3月，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对肃反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检讨。3月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会上亦对闽西抓"社党"运动进行了沉痛的检查。并于决议中写进了向全苏区军民作公开检讨的内容。

"社党"事件前后历时一年零三个月，但其恶果无法估量，制造

了无数冤魂。时闽西苏区总人口仅百万，而后来查明“社党”事件中被处死者即达六千余人。若加上受株连和逃亡者，就更为严重了。曾任闽粤赣特委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发于1945年2月23日，在闽西党史座谈会谈道：“今天看来，不仅当时全国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连傅柏翠本人是不是也难说。”

全国解放后，傅柏翠在谈到闽西“社党”情况时说：“我不但不是‘社党’的头目，而且‘社党’这个组织是否存在，我本人也是怀疑。”

数千名屈死的冤魂最终平反了，但这沉痛的教训又告了我们什么呢？到了十年浩劫中，不是又出现了大抓子虚乌有的所谓的各种“反动”组织嘛？

闽西苏区在大抓“社党”之后不久，又因反“罗明路线”，使大批干部遭到了清洗。反“罗明路线”是怎么回事？

第九章　罗明路线的始末

因为罗明说了真话办了实事

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由上海迁至瑞金后，博古、洛甫便于中央苏区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这对苏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瑞金位于贡水上游，地处赣、闽、粤要道。唐朝时即称瑞金，五代南朝时设县。明时属江西赣州府。清时属江西宁都州。相传这里曾盛产过黄金，故得名为瑞金。临时中央抵后，即更名为“瑞京”。

博古、洛甫都是“左”的可怕的人，其宗旨是悠悠万事，唯“左”为大。他们进入中央苏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批所谓的“罗明路线”。谓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在福建省内推行了一条机会主义路线。

1933年2月15日，博古等以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宣布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2月20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又作出了《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议》。2月26日，在博古亲自出席参加的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学生中全体党员、团员及连一级以上干部的党员、团员大会上，又作出决议：建议中央局立即停止罗明及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党的负责工作。

几天后，罗明奉命至瑞金作检查。临时中央的总书记博古亲自同罗明谈话，他警告罗明：罗若不承认路线错误，即开除罗的党籍，撤销罗党内外一切职务。

罗明于瑞金间，住在叶坪中央局的一房间内，进出不自由，在中央局召开的批判罗明会上，不少人喊出"枪毙罗明"的口号。

2月24日，在中央局代表的直接领导下，湘粤赣省委党的临时代表大会召开，首先在省级机关主要干部中开展反罗明路线。接着，自上而下，由地方到部队，由后方到前线，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反"罗明路线"运动。

"左"倾路线掌权者因何对罗明大动肝火？

罗明，又名罗善培，福建龙岩人。1895年生，1925年加入中共。长期在福建西部地区进行建党和组织农民斗争工作。1927年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罗明即开始在闽西从事武装斗争。1928年上半年，在闽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和赤卫队，毛泽东于此给予了肯定。1928年11月，罗明赴莫斯科出席了中共"六大"，归国后，即在闽西上杭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3月，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三下闽西，并于闽西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朱、毛帮助之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下令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命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时罗明写信于中央，不同意此种作法，遂被李立三指

责为"右倾保守"，

1931年1月，罗明奉命前往上海，听候中央分配工作，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刚刚开完，王明等老"左"们掌了权。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同罗明谈了话，沈仍指责罗明犯了"右倾"错误。但此时没提出"罗明路线"。

罗明路线的提出是1932年的9月。起因是这样的：1932年4月，主力红军攻占了漳州后，罗明到了前线，当时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国民党的19路军由漳州向闽西进犯，并先后占据了龙岩全县和永定坎市、虎岗；广东陈济棠部也向上杭县的庐丰、茶地、白砂等苏区重要基点进犯。而苏区内没有主力红军，只有地方武装、总兵力不过五千人，根本无法与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19路军作战。形势十分严峻。这当儿，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撤了职，于是，毛泽东在汀州傅连璋主持的福音医院住院，罗明也住院，毛泽东遂要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罗明翌日出院后即召开会议，对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传达，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郭滴人、谭震林、刘晓等，大家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派罗明以省委特派员的身分到前方领导游击战争。罗明到了前方，即按照毛泽东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经验，领导着苏区军民开展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并在政策上也采取了灵活性，这些作法，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罗明的做法受到了中央政府参加闽粤赣省苏维埃扩大会的代表项英的责难。扩大会于1932年9月26日至28日举行。项英批评罗明未能在闽西苏区向敌人"全线出击"，没有起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邻近几省首先胜利"的紧急任务。认为闽西党和苏维埃政府犯了严重错误。会后，省苏维埃政府据此作出了《关于政治及省苏工作报告决议》。于10月20日呈报了中央政府。

正在这时，毛泽东于宁都会议上被撤了职，"左"倾的中央政府对这一报告如获至宝，遂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专程到长汀，

出席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会议。10月31日，中央政府发出了《中央执委委员会给福建省苏主席团的指示信》，信中对闽粤赣省苏领导工作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时省委书记罗明和省苏主席张鼎丞，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但实际工作仍从实际出发。

1月21日，罗明在连城新泉根据斗争的发展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四点建议。这建议仍表达了他的认识。意见书内称：

省委：

依据敌人在大举中央区中对福建方面进攻的形势，与依据我们总的工作布置，我认为我们目前应特别注意下列的紧急工作：

第一、要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联成一片；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联接起来向永定方面发展。……我向震林同志提过几次，要依照这点来布置军事的工作。党和政府工作也要找到这一重心。……

第二……

第三、关于地方武装方面，我以为目前最中心迫切的工作，是先造成基干部队，去实践参加作战，从作战中来锻炼。在边县边区的地方武装，要向外推进，抓到团匪来打击，对白军，采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要从打小战中来锻炼，要从打仗中胜利中来提高他们的勇气和斗争情绪，学习战争的经验。……

第四、关于各区县的工作。……过去党和政府领导的方式太机械了，各县区一般的方法，一般的计划，这是不好的。特别忽视边区、边县和新区、新县的工作，这是不能

巩固的向白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边区边县以至新区新县，千篇一律的在上下层讨论，一项一条就是扩大红军，分配人数，……第二条，就是简单的政治动员，这样的动员不能照计划做到我们应做的工作，而且会妨害我们的工作。

省委在过去计划上，都机械地规定永定要扩大多少红军，这是不好的。

我认为目前在永定以至上杭许多边区边乡，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推动强大游击队、赤卫军和建立白区工作，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一定要地方武装不断的在胜利中来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使群众更相信地方武装力量，才能打破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

……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于新泉

罗明写好意见书后即到了上杭县。在上杭县，他领导干部群众，运用游击战术，打退了进犯白砂之敌。就在这时——1933 年 1 月底，临时中央在上海不能立足了，只好迁往江西瑞金。博古、洛甫等在赴瑞金的途中经上杭白砂时，与罗明等见了面。博古一见罗明，立即斥责道："你是个省委书记，你不领导全省的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

罗明遂把与毛泽东会面的情形和省委决定他来杭、永、岩开展重点游击战争的情形说了一遍。

博古问："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

罗明说："我还没听到传达。"

罗明说完，博古很不高兴，遂又要罗明谈谈当前斗争情况。罗明说："据我切身体会，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政府和军委会去年 4 月 14 日提出的抗日、

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条件，同各党派、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罗明还没说完，博古就不耐烦地说：“算了算了，不要讲了，吃饭吧。”

罗明等见博古这些中央领导这个态度，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博古等走后，罗明等人对照中央领导的指示进行了检讨，仍感到工作中没什么错误。几天后，罗明即接到临时中央的指示，指示下令江西、福建猛烈扩大红军。罗明只得执行、遂把各县的独立团、各区的独立连、乡独立排都送到了正规部队，由于地方武装走了，敌人趁机向边区大举进攻，结果使苏区遭受很大损失。而上杭、永定、龙岩三县受损失更大。罗明只好又改变策略，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遂召集了上杭县委方方、伍洪祥等一起开会，研究总结了数月来游击战的经验和当前斗争形势与任务。认为边区对敌斗争，必须按毛泽东的游击战打法，不能照搬苏区根据地的作法。会上，几个人都认为应当把游击战的经验提供给连城、新泉、武平和其他边县边区。当夜，罗明赶写了关于上杭、永定游击战争的情况报告给省委。

在《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中，他如实地写道：

> 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因此开会、集中武装等等都很难动员……有些群众说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了，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争，这样下去怎样得了呢？……有许多群众说，我迫得十分不得已了，不得不暂时妥协屈服，我的心还是红的，我也相信整个革命是要胜利的，我也希望红军能够胜利。……

罗明在报告中又尖锐地写道：

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罗明的报告写的淋漓痛快，一针见血，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人张鼎丞、谭震林、郭滴人、刘晓、李明光、李坚真等人的支持。也受到了基层干部的拥护。

继罗明的报告和意见书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致信省委，提出了和罗明认识相同的意见，内称：

过去一切的工作计划完全是党代替政权(如扩大红军、地方武装、土地问题等等)，因此党对于发动群众斗争，即减少其注意力，(我意关于行政上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应由政府计划……而使党更多注意领导群众斗争方式上的研究，……)反帝同盟拥苏大联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众团体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余种组织可加入。下层同志确听到头晕，找头绪不到，因此，这些组织不能健全起来而是一种空招牌，我觉得必须尽可能的减少或合并。……各处地方武装在数量上是不少，但在实际的集中训练是极差的……边区工作应注意工作分配与计划，不能与中心区一样，特别是扩大红军问题……

罗明和杨文仲的意见，报告和信，在组织上是合法的，是党章所允许的，行为上是光明磊落的，但由于他们没把博古等"武大郎"当成神仙，对临时中央局的意见不以为然，所以，惹恼了那些"小神爷"。博古等人见了报告后，大发雷霆，当即派出了中央特派员到闽

粤赣省委检查工作。特派员到省委后，不做调查研究，便按中央精神定调子，断定省代表的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

接着，反"罗明路线"斗争即在闽粤赣省开始了。

中央特派员到了福建省委时，罗明正在前线，他对此一点不知道。一天，他在上杭从《斗争报》上才得知自己犯了错误。几天后，他接到省委的通知，要他速回汀州。

罗明往汀州赶时，途中遇到了从汀州而来的张鼎丞，罗明即问张："鼎丞，我犯了什么错误呀？"

张鼎丞说："他们说你犯了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说你不扩大红军，只打游击战争。"

罗明发急地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若有路线错误，第三次反'围剿'怎么会取得胜利？根据地怎么能这样快的扩大？"稍停又说："我们并没有反对扩大主力红军，只是要求对中心区和边区应有所区别，这也是从实际出发么。就是在杭、永、岩边区也没有说不能扩大主力红军，这怎么会是路线错误呢？"

张鼎丞听了，只是叹息，二人对坐无言，均十分愤激。

罗明到了汀州，又接到了赶往瑞金的通知，到了瑞金，将其安排在叶坪中央局的一间房内，门外有人站岗，不能自由出入，实为软禁。

第二天，有中央局的几个干部同其谈话，要他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接着，一位中央负责人找他谈话，说他去边区是"退却逃跑"。罗明遂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汇报和解释，他说："到杭、永、岩边区工作是我提出并得到省委同意的。那里是省苏区内最艰苦的地方，我到那里是参加游击战争的，怎么能说是'退却逃跑'呢？"

那位负责人说："这要用辩证法看问题，事物都是发展的，例如游击战争，过去是需要的，现在红军主力强大了，再提就是游击主义了。"说罢那人问："你在边县边区为什么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

红军？”

罗明说：“在边县边区面临着随时同敌人作战的局面，随时都要进行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进攻。所以不能和中心区一样，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采取三分之一的方法，逐步地分批地扩大红军。……”

那位负责人打断罗明的话说：“你这样做是‘富农路线’，你说听群众的呼声，就是这么听吗？”

罗明也激动地站起身说：“这是永定金沙乡贫农会议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罗明说到这儿，大声道：“列宁说过，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家压迫的真正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个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博古亲自找罗明谈话了。他劈头就问：“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我问你，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博古嗓门一挑，说：“还有比你更高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当天晚上，在叶坪附近召开了一个有数百名机关干部参加的批判“罗明路线”的大会，大会气氛很紧张，有不少人愤怒地喊着口号，还有人把木棒拿到会场，说要打死罗明，罗明被架到主席台上，被两个彪形大汉倒剪双膊。直到中央局的杨尚昆做了解释，会场的气氛才平了下来。

批判会罢，罗明又反复检查交待问题，最后，博古再次找罗明谈话，要他回省委，在省代会上，彻底坦白交待问题。

2 月 15 日，张鼎丞、刘晓等省委负责人被召到瑞金。二人亦受到了中央局领导人最严厉的批评。当天，中央局作出了《苏区中央

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内称：

中央局检阅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认为在杭永岩苏区内群众的革命斗争已经低落，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已经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明显的例子是新泉县委杨文仲给省委的信）。这一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虽然遭到了以代理书记刘晓同志为首的省委大多数同志的部分的反对与批评，但这一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开展起来，这一斗争只限制在省委机关之内，而且只是停止在个别的问题上。省委大多数同志没有得到了解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坚决站在党中央与中央局的进攻路线上而斗争到底，省委大多数同志在这一斗争中表示了他们的不坚定与机会主义的动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也犯了许多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中央局决定：

一、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指出这一路线的露骨的表现是以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为代表的取消主义。

二、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

三、立即召集省的临时代表会议，尽量吸收中心支部的工人雇农同志参加，成立新的省委。

四、在临时代表会议召集之前决定以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等同志为临时常委，处理一切工作。

五、派中央局同志出席这一会议做报告并领导这一

会议顺利进行。

六、立即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

在中央局这个决定作出之后的第二天起，中央局领导人博古、洛甫、任弼时、王盛荣等即在《斗争》、《青年实话》等苏区主要理论刊物上发表文章，对罗明、杨文仲的观点加以批驳。《斗争》杂志上曾刊了博古的文章，文章写了中央局与罗明路线的分歧。为使读者看着明白，特抄录如下：

党的决议写着："在这决战中间，我们有着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二月八日决议）"

而机会主义者认为这是可疑的，以为"两军主力双方决战，牺牲必大"。所以提出下命令要"二、四军团立即回师湘鄂西与鄂豫皖"。更进一步，那当然是调赴中央苏区，配合一方面军行动了。这不禁令人想起李立三同志过去要苏联出兵蒙古，红军出动响应的提议了，不过右倾机会主义者更懦弱一些而已！

党主张："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中国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

机会主义者说："第一，扩大红军边区应该例外，边区是不能扩大红军的；第二扩大三百主力红军还不如扩大一百地方武装；第三党不应管扩大红军的事，这完全是党代替了政权。"

党主张："号召所有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及"每个工农分子应该武装起来加入红军。"

机会主义者说："各处地方武装在数量不见得少"，而且多了反难组织好训练好，"不但不能配合主力红军作

战，而且还会扰乱主力红军的行动，或给以坏的影响，这是无益的。"所以"关于地方武装方面目前最中心的迫切工作，是先造成基干部队"(见罗明信)。

党主张："独立师团等等应该积极的进攻，牵制敌人、扰乱敌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路线，……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在边区要进行最有力的运动防御战。"

机会主义者说："因为地方武装(包括独立师在内——古注)过于软弱，一打就坍"。所以他们只能用来去打连南汀东南的团匪，这一带的团匪力量很弱，目前还没有白军配合，很容易消灭他，并在消灭这一带的团匪中，可以锻练地方武装战争力……以后很快能与白匪打仗"(均见罗明信)，关于组织强有力的运动防御战，那更可不必，只要向北发展，军区指挥向北一迁，那就"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了。"这样，不但不会防害闽西的巩固，相反的，只有如此才能配合闽西的斗争，才能不使杭永孤立"。

党主张：最广大的动员全苏区工农民众，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用一切力量使反帝拥苏同盟变为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工农的群众组织。

机会主义者说："反帝同盟，拥苏同盟及青年部，革命群众团体名目太多……必须尽可能减少或"'合并'。"其实李立三的行动委员会又简单又少麻烦，或许更合杨文仲同志的胃口吧!

党主张：应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革命的胜利。

机会主义者主张：党应该从领导国内战争——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中脱离出来，而去研究各种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这就是要党从领导胜利的苏维埃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的党，回到从前那种学究主义的研究性的小组织去。

同志们！难道还不明白么？这里清清楚楚的放着两条路线，一条是党的布尔塞维克的攻进路线，一条是机会主义的走向取消主义的退却逃跑的路线。

2月中旬的一天，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召开了毕业生的党团员大会，会上，博古作了《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报告。

博古在会上挥着拳头，尖着嗓门喊道："同志们！切不要看轻罗明同志，他似乎比列宁还稍为高明些呢！他想出了锦囊妙计，这就是进攻路线此路不通，还是以左右散开向后转为是，这样罗明、杨文仲等便把自己的退却路线与党的总路线对抗起来。这个路线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罗明同志到新泉之后，新泉县委书记为此写给省委的政纲式的信。"博古最后说道："为着动员我们一切力量，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克服我们面前的困难，那只有一种方法：便是开展在各方面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这首先要粉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动摇，把他们隔绝起来，因为他们妨害我们的进攻，惊惶失措，悲观失望，将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胜利的思想。布尔塞维克的不调和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将是保证我们胜利的先决条件！"博古在大会上严厉地批评了闽粤赣省委的主要领导。博古以手击桌，大声道："对于两个原则不同的路线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很可惜，我们闽粤赣省委的另一部分同志正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他们只是多少感觉到罗明、杨文仲的错误，多少温和地批评了他们，批评也是东一点西一点的，缺乏拥护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澈底性与坚定性，因此，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犯着许多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博古讲到这里时，不断地挥动着双手，声音嘶哑地喊道："同志们！我们目前正处在胜利的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的面前！我们有着取得这次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也有着许多困难，只有机会主义者在敌人大举

进攻面前悲观失望，在困难面前投降屈服。每个中国的布尔塞维克应该团结在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的周围，用十倍努力，十倍坚定，十倍积极，勇敢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实现我们面前历史的史命！"

2月24日，闽粤赣省在汀州召开了省临时代表会议，中央局派人参加，省委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刘晓、郭滴人、方方、李坚贞等。会议内容是批判"罗明路线"。首先由罗明做检查，罗明只得给自己"上纲上线"一番。接着，与会代表对罗明路线展开了批判。那些"风派人物"都鹦鹉学舌地顺着中央的定的调子把罗明骂了一番，也有"骨头硬"的迎风而上。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说："新泉是罗明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才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进攻，不然新泉根据地不能巩固。"

上杭、永定等县的区乡代表多为工农干部，头脑不那么繁杂，敢说真话，他们说了罗明领导的开展游击战的许多好处。还说若各区乡都这样做，能给敌人很大伤亡。当这些代表在发言中说到每当对敌人进攻，由于敌人的地点、兵力等都估计的很准、因此每仗必胜时，中央代表极不高兴地插话说："这都是一般参谋人员的事情，不是你们区乡干部的工作。"

代表大会越开气氛越紧张，到后来，竟用谩骂和讽刺的方式对待罗明及其支持者。中央代表指着张鼎丞说："中央对你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你仍然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

在会上，罗明、张鼎丞、刘晓等人，被迫于大会上做检查，但中央代表和一部分"风派人物"仍对罗明等人的检查很不满意。据1933年3月15日出版的《斗争》载：

> 罗明同志、张鼎丞同志等对自己错误的承认还是不充分的。……大会很正当的要求这些同志不但在口头上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在实际工作中表示他们对于党的

忠实与党的进攻路线执行的坚决。

临时代表大会由中央代表作总结，他宣布了补选省委委员的名单和撤销杨文仲职务的决定，并宣布杨文仲是“罗明路线”的代表者之一。这次会议改组了省委。由陈昌寿担任省委书记。会后不久。罗明和杨文仲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刘晓调往江西，张鼎丞被撤销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从江西调钟循仁接任。

人人心惊，个个肉跳

临时代表大会之后，新的省委作出了《对〈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决议》，内称：

> 临时省委讨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后全部同意，一致的认为中央局对闽粤赣省委的估计，对过去省委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以刘晓同志为代表的对罗明路线的腐朽自由主义态度的指斥，以及对过去省委的处置是非常正确的。

临时代表大会之后，闽粤赣省批判“罗明路线”达到了一个高潮，当时，闽粤赣苏区抓“社党”的恐怖阴影还在笼罩，反“罗明路线”运动又起，一时间，直搞得人人心惊，个个肉跳。许多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也不敢说真话，怕引火烧身。但也有的县依然从实际出发，不买博古把持的临时中央的账。永定县委即是一例。他们消极地对待中央和省委的决定与指示。4月1日，省委做出了《中共闽粤赣省委对永定工作的决定》，内称：

党的临时代表大会及团的扩大会议，严厉的打击罗明路线及对罗明路线的自由主义者，号召闽粤赣党和团全体同志团结一致，在敌人积极进攻闽西苏区中坚决的执行党的进攻路线斗争到底。但我们检查永定党、团县委的工作，绝对看不出任何转变趋向，相反的，在对群众的估计上，完全是继着罗明路线的错误，……在敌人大举进攻中，表现最无气节的懦惰和动摇。……因此，省委为彻底转变永定党和团的工作在派遣工作团出发的时候，特有以下规定：

一、立刻开展在永定党和团内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将永定党和团的执行罗明路线的错误充分揭发出来。

二、立即召集永定党和团的县委扩大会议，提拔为进攻路线坚决斗争的工农分子，成立新的县委。

……

省委此决定，无疑是杀一儆百，如此，在闽粤赣省，再也没有敢说真话的人，人们是敢怒不敢言，甚至连怒都不敢。这场运动的结果，不仅使闽粤赣省的主要干部和老干部都遭到了打击，甚至地方所有的区、军队所有连以上干部都斗过。而且打击一个提拔一个。继罗明等被撤职后，省委常委、军区司令谭震林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省委常委郭滴人被撤职后强迫去修工事，团省委书记陈荣、省财政部长邓子恢、省军事部长游瑞轩、土地部长范乐春、省军区的杨海如、霍步青、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等都被扩成"罗明路线"干将而被撤销职务。一时间，"罗明路线"帽子满天飞。把个闽西的干部斗得晕头转向，在肃"社党"中幸存下来的一点点老干部，都遭到了打击和排挤。造成了党群之间、上下之间，干群之间的严重隔阂。造成了党内恐惧心理和社会不安现象。

各级干部在肃"社党"时的恐怖心理，此时又起，时不少人认为

"罗明路线"即是"反革命"，罗明即是反革命分子。许多与罗明相熟的人不敢与其来往，也不敢同犯了"罗明路线"的人来往。反"罗明路线"一直到主力红军长征才缓和下来，但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到了1950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杨尚昆见到了一个五十多岁的高个子，很面熟，但想不起是谁，那人见状，遂上前握住杨尚昆的手说："我就是罗明啊！"

杨尚昆听了，哈哈大笑说："哦，罗明同志，我记起了，那时候，你头上顶着顶大帽子，谁敢和你的名字连在一起呀。"

第十章 “谢古邓毛剩小平”

博古等在闽粤赣省大反“罗明路线”的同时，于江西省开展反“邓、毛、谢、古”，即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

“邓、毛、谢、古”为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人。时邓小平为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湖南湘潭人。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在湖南自修大学学习，1923年10月加入中共。曾于湖南常宁水口山和长沙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1929年参加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江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红军独立师长等职。1932年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维俊系湖南耒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共。先后在安源、水口山、岳北等地从事工农运动。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先后任红4军28团1营、2营党代表。1929年

任红 4 军 2 纵队政治部主任。1931 年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历任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赣西南特委委员，时为江西军区 2 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 5 师师长。古柏为江西寻乌人。1925 年加入中共，1926 年参加梅县东山中学暴动失败，脱险回寻乌，创办中山学校，进行秘密活动。1928 年领导寻乌"三·二五"暴动，而后转入农村，坚持武装斗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发展到一千多人枪，正式组成红军第 21 纵队，任政委。1930 年 4 月，调任寻乌县委书记，1931 年调瑞金工作，先任红 1 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粮食部长。

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后，即在中央苏区推行了一条更"左"倾的路线。这时正是第四次反"围剿"间，广东军阀向寻乌县发动进攻，邓小平见敌来势猛烈，为避免损失，遂及时的组织了退却。寻乌为广东之敌占。"左"倾冒险主义者即抓住了这一条，指责邓小平执行了"纯粹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退却逃跑主义"，"把寻乌整个送给了敌人"，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者。

2 月 28 日，江西省委对会、寻、安三县中心县委发了指示信，信中批评了中心县委、称：

> 会、寻、安的党所犯的纯粹的防御路线之来源，与罗明路线相同的。……把军事工作与群众的基本动员工作分割开来，……更进一步的确立了纯粹防御路线的基础。……防御路线的结果，必然走到罗明退却路线的前途。

对于江西省委的这一指示信，中央局很不满意，认为这信中所包含的错误，首先在省委指示信中没有明确的指示会、寻、安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

1933 年 3 月底，中央局派了洛甫前往会、寻、安三县，撇开了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召开了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揭发"会、

寻、安的罗明路线”。3 月 31 日，在洛甫的主持下，强行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极积分子会议决议》，内称：

一、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局代表洛甫同志的政治报告与结论。

二、大会认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

五、大会在中央局领导之下，要指出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的不深入，省委也应负一部分重大的责任，在省委二月二十八日给会寻安三县的指示信上，虽是指出了纯粹防御路线的严重错误，但省委把这一防御看做是在进攻路线与罗明路线的中间的东西，认为“防御路线的结果必然走到罗明退却路线的前途”，把这一路线主要的看做是军事上的分兵把口，没有明确的指出进攻路线与纯粹防御路线的内容在哪里，对于群众力量也没有完全正确的估计，对于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严重的错误没有应有的批评，最后也没有指出以后会寻安党的中心任务在那里，这种指示信当然没有法子将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

六、大会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决定加强和部分的改造中心县委与会寻安县委之常委，并委托三县新的常委立

> 即开始在正确的民主化和布尔塞维克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召集各级代表及三县党各级领导保证三县工作的彻底转变，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开展这一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

会议之后，洛甫即在《斗争》上发表文章，谓“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最坚决的打击了过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领导”。文章还对江西省委进行了批判，称：

> 省委对于这种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斗争是十分不够的，对于罗明路线的存在，始终没有公开的指示出来……乐宜县的工作，虽然那样严重，但省委的指示在不到几百个字的短信中，可以说一无所有。万太方面则最近又把在会、寻、安犯严重错误的邓小平同志派去代表省委解决那里的问题。……江西省委必须最严格的检查所有边区各县的工作，揭发自己过去对于边区工作的指示的政治错误。

4月16日至22日，江西省委召开了三个月的工作总结会议。会上对邓、毛、谢、古进行了严厉的斗争，把他们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说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罗迈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道：“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罗迈对邓小平进行了揭发，他说：“四中全会时，邓小平在上海，他不仅没有承认过去自己右的错误，而且在两副面孔的掩盖下，散布对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上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他回到苏区，即

与毛、谢等提出机会主义口号，共同进行了反对中央局的活动。这次工作总结会上，谢、毛公开在会场上进行反党活动，而邓小平对此默不作声。这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他一向在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罗迈说到激动处，手击着桌子道：“邓毛谢古为什么一鼻孔出气？是因为他们过去有共同的机会主义观点，后来更有共同的罗明路线的机会主义政纲！”

总结会上，在中央局的压迫下，会议划清了邓毛谢古错误的四条界限。一是对于中国现实苏维埃运动的内容的估计和策略上的结论，邓、毛、谢、古等是与党绝对相反的；关于巩固和发展苏区，把苏区联成一片与扩大红军一百万的任务，邓、毛、谢、古等的主张同样是与党的路线绝对相反的；对于革命动力的认识和党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策略，谢、毛、邓、古又走到与党的路线绝对相反的方面；四、邓、毛、谢、古的领导方式，是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这是罗明路线的组成部分。

在会上，与会的中央领导人强迫邓、毛、谢、古作深刻的检查。邓小平第一次的声明书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古柏的声明书只写了十五页，且内容与“左”倾路线执行者要求甚远。谢、毛声明书中也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左”倾路线执行者立即强迫他们作第二次检查，但检查仍不能过关。罗迈在大会上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大家看看邓小平的声明书吧，省委决议指出：邓小平同志对于自己的错误，没有遇着揭发和压迫，就隐瞒起来，邓小平如何回答省委这一指责呢？他说：‘我觉得，第一我感觉了解是错了，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是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大家听听，这是一套多么好的外交词令？邓小平所以始终不肯诚恳的认识和揭发自己的机会主义，从四中全会以来对于立三路线如此，现在对于罗明路线又如此，很明显，这是他在坚持自己的机会主义。”罗迈稍停又说：“邓小平直到今天还只承认一个抽象的派别观，而对于他所进行的反党的派别活动，却不肯揭发出来。再有，邓

小平在第二次声明书上对于自己如何逃出第7军，如何在去年11月召集会、寻、安三县负责同志计划放弃三县这些可耻的事实，一个字也没提及。他这第二个声明书同第一个一样，除对给省委决议用了些外交词令解答外，什么也没有。”罗迈又把毛泽覃的声明书拿出来，说：“毛泽覃同志这个声明书，承认他有一个机会主义的路线，但是，他认为他这机会主义的政纲只有两条，一是对分配土地上有错误的见解，二是认为红军攻坚有困难。”罗迈讲到这儿高声说：“毛泽覃是怎样揭发他的小组织的行为呢?他说，许多机会主义的意见，不敢向党提出，仅只秘密谈论。他这小组织的行为，就是个秘密谈论。他这是检讨吗？这完全是掩盖自己的错误。”罗迈谈到古柏时，大声说：“再看古柏同志，在这第二次声明中，他写了十五页，这十五页纸除了说自己一些机会主义的观点外，对于反党小组织行为的揭发，则几乎没有说到。谢维俊同志的第二次声明书，依然没有系统地揭发自己的反党路线，而且简单地说了三条新区工作的政纲。对于个人反党的行为有些揭发，而对于小组织的行为，则极少揭发。”罗迈最后说：“必须严重指出，四个同志对于自己的根据特殊政纲而组织的派别和小组织，至今没有给以组织上的揭发，也没有宣布如何解散这种小组织。根据以上事实，很明显，邓、毛、谢、古四个同志是没有解除他们的武装，虽然如今受到了党的严重打击，而表示暂时的投降，但这种投降不能保证他们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因为他的武装还没解除下来。”

由于邓、毛、谢、古两次声明书的检查都没过关，且认为态度不好，于是，江西省委报中央局批准，作出了《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声明书的决议》，决议严厉地批评了邓、毛、谢、古四人，称：

> 对省委的决议和谈话，只是以外交方式接受，他们反党的机会主义政纲和小组织的活动并没有在党的布尔什

> 维克火力前面解除武装，只是在党内残酷思想斗争中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而并没有根本放弃其小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样省委认为四同志是否真正站在党的路线上、组织上成为坚决的先锋战士，现在是没有保证的！……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起经过党大会经过寻安工作直到写二次申明书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的从历史根源起彻底的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式，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决议中要邓等四人写出第三次声明书，即检讨书。

接着，"左"倾中央领导在江西苏区各地全面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到了 9 月 27 日至 10 月 3 日在江西全省党代会上，又一次掀起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高潮。12 月下旬，江西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再次掀起了一个高潮。除继续批判邓、毛、谢、古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外，还批判了省苏维埃财政部副部长、省苏维埃工农检查部副部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省苏维埃教育部部长郭登梅等省委、省苏的主要领导干部，批判了会寻安、永吉泰、宜乐崇、建黎泰等中心县委，石城、于都、永丰、新淦、信丰、崇仁、南广、公略、万泰、吉安、泰和、赣县等县委及陂头、冠朝、元坑、塘上、折桂、冠山、古县、七都、鹿岗等区委。江西省的中心县委和区委，几乎都被打成"罗明路线"者。据当时的中央局理论刊物《斗争》文载：江西省在 1934 年 4 月到 6 月，全省的绝大多数县的县委书记，都因罗明路线而撤了职。又据中共江西省委报告，自全省工作总结会议开展"反罗明路线"和中央局指示改选区委、支部以来，大批干部被清洗。仅广昌县在 1933 年 5

月至8月三个月间，就清洗了县苏、区苏主席、区委书记等主要干部十七人，谢维俊所在的江西二分区清洗干部五十多人。

邓、毛、谢、古四人也被进行了组织处理，均被撤职，调到了基层，有的任巡视员，有的到突击队工作。

在中央的单位也因此而进行了清洗，如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叔衡等，军队内郭天民、梁锡古等。

此时江西苏区正值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时刻，一场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的运动，清洗了大批优秀的中共干部，这无异于使南京国民政府平添了千军万马。红军败离江西，苏区丢失，此为必然矣！

1945年5月3日，博古在中共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心情沉重地说："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1943年，林伯渠在陕北就当年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而吟诗道：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裁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在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罗明路线"平了反。文中写道：

> 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

第十一章　湘赣苏区的大“肃反”

湘赣苏区的“肃反”之初

在福建肃“社党”、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的同时，湘赣省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肃反”运动。

湘赣苏区是以江西永新为中心，东起吉安县永阳赤白交界处，西至茶陵赤白交界处，南到永新关背苏区，北邻萍乡赤白交界处，包括永新、安福、宁冈、吉安、遂川、茶陵、攸县、酃县、萍乡、莲花等县之一部或全部，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中共四中全会后，随着国民党“围剿”规模扩大，尤其是“富田事变”的发生，中共中央遂认为赣西南特委的问题较多，必须加以改组，加之当时的湖南省委已被敌人破坏，为了加强党对湘赣边界斗争的领导，决定成立湘赣省并

建立中共湘赣省委。时中共中央于上海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两个省委，即湘赣省委和湘鄂赣省委，由王首道任湘赣省委书记，张启龙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周恩来与王首道谈了话，之后，王首道、还有甘泗淇等一起由上海动身赴江西。6月到了赣南万安良口，在这里过河时，王、甘二人与张启龙相会。时张启龙与滕代远一起去中央局的。在这里，张启龙把富田事变等情况，告诉了王首道。王首道等便同张启龙、滕代远一起到了中央局。在中央局，几个人见到了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欧阳钦等。接着，中央局召开了会议，听取了王首道传达的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张启龙汇报了工作。会上，中央局负责人强调，要王首道、张启龙等抓紧准备去湘赣边界工作，到那里后的任务，首先抓肃反和扩大红军。尤其要抓紧肃反。特别提出解决富田事变遗留的问题。会上，中央局根据王首道的建议和湘赣省成立后的任务，决定张启龙去湘赣边苏区。几天后，王首道、张启龙、林瑞笙、甘泗淇、谭牛山五人在一个营兵力的护送下，起身赴永新。

王首道等7月份到达永新，随及召开了有湘东南特委和西路、北路分委参加的联席会议。时湘东南特委班子人员都到了，西路分委主要负责人朱昌偕、左娜、马铭、龙贻奎、刘天干也到了。会上，由王首道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内容包括战争问题、土地问题，成立省苏维埃问题，解决富田事变遗留问题。但在这个会上，对富田事变遗留问题的解决，没有传达，由于保密，仅王首道、张启龙等人掌握。公开讲要进一步开展肃反。由王首道任临时省委书记、林瑞笙任组织部长兼保卫局局长、甘泗淇任宣传部长、易心平任少共省委书记、谭牛山任副局长、袁德生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为副主席。

1931年8月1日，湘赣临时省委在永新钱市街成立。

王首道，湖南浏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春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加入共产党。同年9月任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特派员、中共祁阳县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受中共湖南省委派遣，到浏阳恢复中共组织。任中共浏阳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等职。1929年4月，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1930年9月任中共湖南省常委，湘省临时委员会书记等职。

张启龙也是湖南浏阳人。1924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共。1926年7月，任永和农运特派员。不久，任中共永和区委书记。1927年春，任中共浏阳县委工人部长。参加了秋收起义。1928年6月，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同年冬，任红5军第2纵队党代表。1930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4月，任浏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8月，任湘东特委书记。

袁德生亦为湖南浏阳人。1922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任直井五段工人总代表。1923年加入中共。1927年3月当选为江西省农协执行委员。大革命失败后，曾参"八一"南昌暴动和湘赣边秋收起义，后在湘东地区坚持斗争。1928年2月参加组建中共湘东特委，任特委委员。5月至7月曾以中共湖南省委代表身分两次到井冈山指导工作。1930年8月，中共湘东特委重建后，任特委常委兼湘东南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2月，任中共湘东南特委常委兼湘东南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湘赣临时省委组建之初，中央局和临时省委对赣西的干部有看法，因为富田事变发生在赣西，便认为赣西的干部靠不住。

1931年9月20日，湘赣临时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了第一号报告，内称：

中央：

王首道、甘泗淇等同志受中央指派到湘东南传达中央指示及组织新省委指挥湘赣边苏区工作，因石青、宁迪卿之被捕叛变，改道由闽西赣东南，经过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和帮助，于八月一日方到永新县城，成立临时省委，开

始进行工作，到现在一月又二十天，兹将各种情况及请求扼要报告如下：

……

（三）湘赣苏区最严重的现象，就是赣西一带 AB 团（包含豪绅地主官僚流氓富农及知识分子）占据了苏维埃与红军的各级指导机关，湘东南的 AB 团改组派也很多，实行种种阴谋捣乱。自从省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依靠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指导与党的基本群众斗争力量，一个多月工作结果，已发动党内外群众的由整个苏区消沉腐化崩溃的现象转变到积极，进步到广大群众的斗争局面。

……

省委目前的主要工作：

1. 从下而上的改造各级党的组织，从支部起把阶级异己分子洗刷，支部干事会，并召集在省县代表大会，改造各级指导机关。……

（四）请求：

……

4、青年团临时省委没有得力人员负责，中央局指定书记还没过来，代书记不能工作，AB 团还没有开始破获，一切工作还没有转变，请中央转中央局派得力同志来工作。

从这份史料记载，湘赣临时省委对 AB 团看得是很重的。其报告并不长，竟三处提到肃清 AB 团。

前文述过，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开始并没什么大问题，富田事变的发生，把肃反推向了一个高潮。临时省委组建后，便立即按照中央局的部署，展开了肃反工作。后来王首道回忆说：

"当时，'左'倾路线的错误表现在肃反问题上是很突出的。以'左'倾路线为代表的党中央对革命内部隐藏的阶级敌人作了过份夸大的估计，制造了过'左'的肃反政策，并错误地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大批领导干部当作'AB团反革命分子'列入肃反名单，责令我们临时省委审理。那时我们临时省委刚刚成立，对本地区的情况没有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对当时的干部也没有做认真的估计，在方针政策上盲目地接受了党中央的错误指示，在组织上按照当时党中央的规定，设立了脱离党委集体领导，脱离群众监督的肃反机关，在案情审理上又采取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以致使肃反工作发展到乱捕乱杀，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将不少优秀干部当作肃反对象进行了错误处理。"

第一次"肃反"高潮

1931年10月8日至15日，临时省委在江西莲花县花塘村召开了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总结了临时省委工作，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出了湘赣省党和红军今后的任务。大会选举了新的省委成员，由王首道任书记、林瑞笙任组织部长兼保卫局长（后谭牛山接任）、甘泗淇任宣传部长、袁德生、张启龙为省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此外，王震、李孟弼、刘其凡、李朴等为委员，胡番美、李天柱、王豪、刘任武、刘燕玉等为候补委员。王首道、林瑞笙、甘泗淇、袁德生、张启龙五人为常委。

湘赣省委组建后，组建了政治保卫处，各县肃反委员会也都单独建立起来。当时，省委提出了"向AB团、改组派坚决斗争"的口号。省委这一坚决的态度，立即影响了各县。时永新、莲花、吉安、

攸县、宁冈、安福各县都开了公审大会。对“AB团”分子进行了镇压。其实所谓的这些分子，除一些反水的群众，投降敌人的个别士兵等，多数是逼供信搞出来的。采取的是“自首政策”。据当时的有关文件载，认定“AB团”的方法是“从‘AB团分子’中拿住其弱点使他无法解脱而直供出来”。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到1931年底，湘赣全省处决的“AB团分子”达一千二百一十人，大多为地主富农和知识分子，“自首”和释放的贫苦工农分子一千余人，在押的五百余人。

虽然如此，中央局对湘赣省委的肃反认为很不够，在1931年11月21日中央给湘赣苏区和省委的信中称：

> 在肃反工作上，虽然你们已经得到不少的成绩，然而你们这一工作，还没有能够深入下去，你们还没有能够使广大的工农群众了解AB团与改组派的罪恶，积极的起来帮助我们做这一工作。根据你们的报告看来，在各种组织中，还有不少这些反革命的工作。中央认为要使这一工作深入下去，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加紧肃反的工作，把一切腐化官僚主义的异己分子从党与苏维埃等机关中清洗出去。一切和平的状态，是最便利于这些反革分子发生滋长的。
>
> 此外，必须加紧反对AB团、改组派的思想斗争，揭破他们一切欺骗与反革命的罪恶。当然同时政治保卫处的工作也必须加紧(关于这一问题，请参阅中央关于苏区内部反革命派的斗争的决议)。

中央的来信，使省委受到震动，本来肃反已经到了发疯的地步，但省委又检讨了这一工作，认为肃反工作右倾。在1931年12月16日省委第二次执委会决议案《目前政治形势与战斗任务》中

写道：

> 加紧肃反。湘赣苏区内的AB团并没有肃清，此次敌人进攻苏区，AB团卖力不少，特别如永新的黄球等公开到白军散发反革命传单，有些地方因AB团的领导与白匪的压迫，成立挨户团、守望队在苏区内暗通消息，制造谣言进行各种捣乱，破坏红军，这些敌人只要脱露一个都是危害我们，现在肃反工作，并不如两个月前的紧张，这是不能允许的现象。驱逐豪绅地主及反动家属的工作也是或者执行怠工，或者不分阶级采取大批杀戮，如酃县萍乡……有些地方未能发动群众去执行，造成群众恐慌，一直到现在甚至有些地方还对大批反动家属未加处理，党部必须发动群众起来，深入这一斗争，尤其要加紧反对富农，发展苏区内的阶级斗争，消灭各种反动派别，巩固革命政权。

肃反的"加紧"，更进一步把思想问题当成了政治问题，把一般错误当成反革命问题。结果，使党员们已出现的恐怖心理更加恐怖，迫使不少群众弃家逃跑，而且逃跑现象很严重。肃反工作成了各级组织的中心工作。肃反中要求走群众路线，阶级路线，其实也只是个形式。阶级路线就是照顾出身，唯成分论，越穷越吃香。群众路线不过把群众集合起来公布一下。

这当儿，湘鄂赣省委的一些文件到了湘赣省委，湘鄂赣省还有两名代表来到湘赣省委，向湘赣省委报告了湘鄂赣省的一些情况，无论文件还是代表的报告，都把湘鄂赣省的问题说的很严重。认为湘鄂赣省的省委委员多半是地主富农成分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是湘鄂赣的老干部，说他们在执行立三路线中很坚决，执行四中全会不力。说执行不力的表现是对国际和四中全会的文件不认真传达，

虽然文件已到了省委，但省委在全省党的代表大会及扩大会上都没有单独提出讨论，只是简单的报告了一下。还说他们不仅宣传不够，在组织上也不保障四中全会的执行，完全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领导，没有执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转变。究其原因是省委成员思想右倾，像省委委员李宗白、石夫都是地主出身，但他们在平江、浏阳的斗争历史很长，因而也就不怀疑他们是AB团、改组派。虽然湘鄂赣肃反委员会曾经抓了八名改组派要犯，但也没从这八名改组派要犯口供中找到线索，两名代表向湘赣省委报告时，说李宗白、石夫等省委领导成员，虽然到目前还没抓到他们是改组派的线索，但从他们对分配土地、驱逐豪绅地主家属的问题没有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执行上看，他们是有很严重问题的，最后说湘鄂赣省委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被富农把持了，执行的是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路线。

其实，湘鄂赣省委的工作是从实际出发的，因而与四中全会的"左"倾路线不一致，由于湘赣省委唯恐跟不上中央和国际的号子，当听了湘鄂赣省的代表的报告和看了湘鄂赣省的文件后，省委于1931年12月18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报告，认为：

> 我们认为这样退却路线的领导（指湘鄂赣省委一引者注），还要使革命走向更严重的危险。湘鄂赣省的工作坍到如此地步，我们认为并不完全是敌人厉害，客观环境恶劣的问题。而是工作转变与否和应付策略正确与否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坚决真正的执行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决议，是很有可能来恢复整个苏区的前途。……望中央速派得力干部来改造湘鄂赣省党的组织，要坚决取消这个富农路线脱离群众机会主义的省委领导。

湘赣省委写给中央的这个报告，不仅给湘鄂赣省委的肃反扩

大化点了一把火，同时，更以湘鄂赣省委的行动为镜子，对照检查自己，从而，以“肃反为中心”的口号越叫越响，肃反扩大化一发不可收拾。

这时主持湘赣省肃反工作的是林瑞笙。林，字焕然，江西省萍乡芦溪镇人。1924年在安源路矿工作俱乐部担任工人子弟学校教师。1925年加入中共，同年秋到广州政治讲习班学习。1926年参加北伐，中途被留在湖南省茶陵领导工人运动，任中共茶陵特支委员。1927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任中央巡视员。给他当副手的是谭牛山，谭牛山系湖南望城县人，中共党员，曾参加学生运动和大革命运动，1931年春，受中共湖南省委派遣到湘东南苏区工作，先后任湘东南苏维埃政治秘书长，社会保险部长等职。

人们对这两人在肃反中的评价是：磨棚里的驴——听喝；人拉随人转，驴拉跟驴走。但是，面对越抓越多的AB团、改组派分子。张启龙找到王首道，说：“这么多的AB团分子，怎么不把我们杀掉？”

王首道吸着嘴唇说：“是啊，土地革命，工农是得到实际利益的，但为什么还要反对苏维埃，加入AB团呢？”

这时候，保卫局说永新苏维埃主席朱昌偕，还有左娜、龙贻奎等干部是AB团。并将朱昌偕抓起，左娜跑了。保卫局派人去追，王首道知道后说：“不要追了。”又说：“朱昌偕是共产党倒霉时入党的，斗争一贯表现勇敢坚强，我怀疑抓错了。”

王首道这么一讲，保卫局也就没有再派人追左娜，把朱昌偕等人也放了。

博古“龙”颜大怒

1932年2月，袁德生为团长、王震为副团长，率七十余名代表

赴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湘赣省的肃反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中央认为湘赣苏区肃反扩大化了，指示信内称：

> 湘赣省委过去反AB团、反改组派的斗争，是绝对必要和正确的，并且你们已收得相当的成功，给了反革命派以致命的打击，但你们对AB团以及一切反革命派的认识和估量还犯有过去中央区和闽西所有的那种严重错误。从省委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你们对AB团的估量扩大化了，如说三师七团绝大多数是AB团，从团长一直到班长绝大多数的士兵都是；如说青年团上自河西分委下至小组，大多数都是阶级异己分子AB团，这种估量将团内群众、红军兵士最大多数不分被欺骗被胁迫乃至被乱供的都一律当AB团看待，这表示你们对AB团的认识与中央苏区犯有同样的根本错误。……虽然他的恶果还不如中央苏区与闽西苏区那样扩大，但这种错误，这两三个月如果继续发展的，则中央局可断言必已如中央区一样受到这恶果大大的损害。中央关于肃反工作的指示和决议，完全是正确的，尤其是中央局关于此问题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与1月7日的决议案，更可以成为你们正确的进行肃反工作与改正过去的错误的钥匙，你们对此问题必须深刻的去了解群众的不积极和对政权的消极，肃反工作中的错误是有极大影响的。

中央的指示信，对湘赣省委的肃反扩大化起到了遏制作用，并对前段的肃反工作进行了检讨，1932年4月11日，中共湘赣省委在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就肃反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内称：

肃反工作，政治保卫局过去的确也有些“肃反中心论”的精神，以为中心工作就是肃反，事实上没有发展政治斗争，在政治上发动群众积极的从下而上的肃反，工作的重心着重于“命令，逮捕，审讯跟踪追迹”，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教育工作，尤其是下级更把肃反工作简单化扩大化了，甚至北路各县和攸县萍乡等肃反机关为AB团所操纵、利用，来破坏肃反工作，对共产党员和贫苦工农乱打乱杀，北路杀了三十六个AB团犯，内中有大多数是贫苦工农，造成群众逃跑的现象。许多地方把肃反工作代替了党内思想的斗争，只要某个同志表现了消极怠工和不正确的倾向，便简单地认为是AB团，以为除了AB团以外便没有其他反动政治派别和不好的倾向了。这样便造成了党内的恐怖现象。这样恶果虽没有闽西和中央苏区那样严重，但确实阻碍了我们路线的转变和工作的进展。

湘赣苏区的肃反虽然稳定了一下，但由于中央的路线是“左”倾，越“左”越革命，所以，这种稳定只是暂时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首道后来回忆说：

“以后肖克、蔡会文同志来了，又从中央苏区带了些‘左’的气氛来，因此到了1932年下半年，又大搞起来了。”

这时，肃反委员会由刘士杰负责了。人们对于刘士杰的评价，一致认为此人很坏。他是湖南醴陵人，木匠出身，1927年参加工人运动并加入中共。曾任区委书记。1932年4月任湘赣省总工会委员长。10月当选为中共湘赣省委候补常委。此人心黑手狠。他任

省总工会委员长时，就把工人纠察队以AB团搞垮了。工人纠察队原来都是从部队中抽调的、政治上可靠的骨干所组成，但经刘大搞逼供信，结果差不多都成了AB团分子。之后，纠察队又重新抽调一了部分人组建，结果又让他搞掉了。刘士杰出任肃反委员会头头后，首先把朱昌偕搞掉，逼得朱在永新梅花山自杀。

在刘士杰负责肃反委员会不久，苏区中央局发电于湘赣省委，说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是AB团，要逮捕，刘士杰要行动，被王首道制止，缘为王首道不相信袁德生是反革命。

袁德生，1901年生于湖南浏阳。1923年加入中共。时为安源路矿产业工人。1922年参加安源路矿大罢工。1923年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总代表。1924年9月继续被选为直井五段工人总代表，参加最高代表会议。同时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经济委员会委员。1925年后从事农民运动和党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于南昌长沙从事地下工作。1928年2月参加组建湘东特委，任特委委员，5至7月曾以中共湖南省委代表身分两次到井冈山指导工作。1930年8月，中共湘东特委重建后，任特委常委兼湘东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2月，任中共湘东南特委常委兼湘东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8月任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委员，10月当选为湘赣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11月全苏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中共湘赣二全大会中再次当选为省委常委、省苏维埃主席。

对于袁德生这样兢兢业业为革命工作的人，省委内除刘士杰极少数人认为袁是反革命分子外，余皆认为袁决不是反革命分子，只是工作中有错误。

袁德生虽然没有被抓，但湘赣苏区的肃反风又刮了起来，从1932年12月19日《中共湘赣省委的工作报告》中，清楚地记载着当时的省委在肃反问题上，完全是在检讨肃反工作中有“严重的右

倾消极"错误了。

刘士杰早就想夺袁德生的权，他见王首道等不抓袁德生，遂将保卫局长谭牛山抓起，指控谭牛山是AB团。抓谭时，把永新保卫局长李敖也同时捉住。说李也是AB团。接着，刘士杰对谭刑讯逼供，要谭交待袁德生是AB团首脑。谭受刑不过，胡乱招供。刘士杰将谭的口供报告王首道，王首道依然不信。刘士杰怒道："我亲自见袁德生暗示谭牛山翻案。袁不是AB团又是甚？"

省委意见争执不下，遂派刘士杰与中央巡视员冯文彬一起去中央局汇报。刘士杰到了中央，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及有关人员已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刘即向博古讲了袁德生是AB团，有个人野心，想当省委书记，他加油添醋地说了一遍之后，把王首道、甘泗淇、张启龙等也奏了一本，其"本"奏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说王首道、张启龙对AB团取容忍的态度。中华苏维埃政府保卫局电令他们逮捕袁德生、刘其凡、李天柱等，王、张软磨硬泡地不执行。由于他们这些省委主要领导右倾，使赣湘苏区肃反领导不得力，立场动摇；二是打分宜之战中，不仅没打下，还损失了三百多人；三是王首道、张启龙放走了敌人的团长张超。张超是在清江附近被活捉的。彭德怀平江起义时，张超曾在彭的师里任团长，由于怕吃苦，脱离了革命队伍，当了国民政府军中的团长，但仍同情革命，其被俘虏前率部从文家市经过时，对老百姓也没骚扰。当他在分宜被活捉后，被带到了永新的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这是1932年10月左右的事。张超被捉后，王首道、王震、蔡会文几个人一商量，决定罚他一万大洋，还有西药、布匹等，说只要交出一万大洋，就把他放了。张超给其家人写了条子，其家中果真把东西和大洋凑齐了。恰逢张启龙、王首道、甘泗淇在后方。三人一商量，便按诺言把张超放了。张超走的消息被刘士杰等人知道后，刘士杰认为不该放，便派人追赶，在安福把张超扣住了。谁知这天夜里，张超又跑

了。张启龙在后来回忆此事说："就当时讲，放张超不一定有多大错误。"刘士杰攻击王首道等第四个问题是说湘赣"扩红"不力，原由是红军战斗力减少。而实际上红军战斗力减少的原由不是扩红少了，而是红军中出现烂脚病，非战斗减员多，因而影响战斗力。毫无实际经验、又"左"的发狂的临时党中央负责人博古听了刘士杰的汇报，不分清红皂白，一面发电于湘赣省、下令逮捕袁德生等，一面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了关于解决湘赣省委问题的决议。决议内称：

……检查了省委寄来的一些文件，并听了冯、刘两同志口头报告之后，认为省委在最近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湘赣苏区不但没有得到新的发展而且大大缩小了……群众的积极性，在一些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之下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在敌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的面前张惶，进一步退却逃跑与和平保守的情绪表现得非常浓厚。一切这些证明湘赣省委在这一时期内，对于中央与中央局坚决动员群众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进攻路线的执行是动摇的。虽是省委在决议上承认这一路线的正确，这当然由于省委同志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对于苏维埃革命的胜利缺乏信心，以反对于进攻路线缺乏深刻认识所造成的。……中央局认为：

……

五、用一切力量同对于肃反工作的消极做斗争，无情地打击那些对于AB团自首自新分子的容忍与自由主义的态度。在省苏工农检查部领导之下立刻开始阶级异己分子的检举运动，将消极怠工、贪污腐化的异己分子从党、工会、苏维埃领导机关中洗刷出去。省保卫局的工作应该立刻健全起来，大胆提拔最好的工人干部到保卫局

中担任领导工作，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斗争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

……

最后中央局认为，为了要保证中央与中央局路线的坚决执行，现在省委必须改组，中央局决定撤销王首道同志省委书记的工作。指出王首道同志在肃反工作中曾经屡次表现了他对于AB团反革命分子以及AB团自首自新分子那种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中央局决定以刘士杰同志为省委书记、陈洪时任组织、张子意任宣传，以陈洪时、李端娥、张子意、邹德虎及省苏、省工联的党团书记，七人为常委。

中央局责成省委将这一决议公布全党。

罢官王首道、张启龙

一向拨弄是非、品质恶劣的刘士杰，终于掌握了湘赣省委大权。

刘士杰出任省委书记的消息传出后，许多湘赣省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纷纷向中央反映刘士杰的品德不好，不能当书记。中央遂尊从了这些干部的意见，改由陈洪时代表省委书记，于是，陈洪时和保卫部长吴德峰、裁判部长方维夏等几个人动身赴任。

陈洪时的人品也是很差的。他是江西萍乡排上人，萍乡中学毕业后，考入了湖北美术专科学校。不久，派往苏联学习，并加入中共。回国后，历任中共泰和、万泰、乐安县委书记。此人心黑手狠，极喜吹拍拉扯。

陈洪时、吴德峰等一入湘赣边界的碧江洲、牛田一带，就把碧

江洲工委书记龙文打成了“罗明路线”干将。到了永新之后，陈洪时摆出了一副救事主的架势，立即召开中共湘赣省委执委扩大会议。由陈传达了政治形势及中央局关于省委的决议。陈洪时说：“这次中央决定改组省委，有的人说是刘士杰和冯文彬二同志到中央故意把湘赣省委的错误扩大化了，这种认为是错误的，中央的决议，是有根据的，不会单凭一两个人的汇报，就下这样的决心。旧省委应该迅速认识过去的错误，更不能设法掩盖过去的错误。”

参加扩大会的除了省委执委外，还有永新、莲花、吉安、安福、河西道委的书记，及各县委常委、中心区委书记，这些人都是陈洪时等人指定来参加的。会上，这些人都依照陈洪时等定的调子，揭发王首道等旧省委的所谓错误。对于这些人的揭发，王首道等不服而力辩。随陈洪时一起从中央来的陈英夏等人以权势对王首道等进行压制，但王首道等仍不服。时《湘赣省委——红五月工作报告》中内称：

> 在会议中过去省委常委还不能了解过去的错误或者用夸大的报告来企图掩盖过去省委的错误，……后经过由中央区过来的陈英夏诸同志的指示并斗争过，有进一步的了解，但于认识与接受错误仍是万分不够。……在会议上更进一步的揭发了省委的过去错误，详细的讨论了中央局关于湘赣省委决议及反罗明路线的决议。在会议发言中开展了自我批评，许多同志对省委过去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省委的有些同志，在人家指出了他的错误之后，才能敷衍的承认，如王首道同志就是这样。在他起草的有些文件上偷运了托洛斯基主义的私货，如在小传单上写“打倒资本家”的口号。张启龙同志对自己错误的承认，是最差的一个，只说某时我走了或不在场，关于省苏工作的错误也没有坦白的揭发出来。（后经过省

委执委扩大会及全省组织会议的揭发证明省委还更严重，这些都证明了中央局决议的绝对的正确）。

在执委扩大会上，陈洪时宣布解散了旧省委、撤销了王首道的职务，通过了新省委的名单，并选改了各县县委书记。除吉安县委书记没动外，余各县县委书记皆被撤换，换成了新提拔干部。将王首道暂分配在省委帮助工作。张启龙暂分在省苏工作，甘泗淇帮助军区指挥部工作。

陈洪时、吴德峰等在解决旧省委的同时，将袁德生、胡波、李梦弼、刘其凡、于兆龙、朱映华、曾毅之、陈尧进、刘秉常、李天柱等省委、省苏领导干部抓起。抓袁德生是秘密进行的。假说袁到保卫局吃饭。袁一进屋就立即逮捕。对外说袁调到中央工作了。以谭余保为代主席。谭为湖南茶陵人，家贫失学，幼年起便与父母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砍樵采摘，春去秋来，终年劳碌。他精通南路武当拳，行侠仗义，好打不平。常谓"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问诸君，可有不平事"。1927年，谭参加了中共。组织了茶陵起义。到了1930年，谭担任了茶陵县苏维埃主席，湘赣省委苏府组建后，他任省财政部长，后任省苏府副主席，对于谭余保，无论干部战士还是群众，都对他很尊重，对抓AB团，他不仅不坚决，而且很反感。在刘士杰掌了肃反委员会大权后，一天，刘士杰向中央巡视员冯文彬汇报肃反工作，之后，刘士杰拿出一份早以开好的拟抓的"AB团"的名单。谭余保看去，见上面有少共省委书记胡耀邦和王恩茂、谭启龙等人名字。谭余保立即说："这些都是红小鬼，怎么是AB团？"

刘士杰一旁冷笑说："反革命分子还分年龄吗？"

谭余保此时把自己的利害扔到脑后，他双眉一挑，怒道："老子用脑袋担保他们不是AB团！"

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木匠出身

的刘士杰也说不清为什么，在谭余保面前就害怕。他到底没敢抓胡耀邦等人。背后却说："别看他雇农出就卵包子大，老子要搞到他们AB团的证据，照样割掉你的鸡巴。"

对于刘士杰同中央巡视员冯文彬赴中央汇报省委情况，中央改组了湘赣省委，任弼时在1944年10月26日于延安召开的湘赣苏区工作座谈会上总结时说：

> "有同志说，派刘士杰到中央报告是一个错误。我说这也只是相对的正确。刘士杰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事实，但是派别人是不是也会戴一个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回来呢？我可以肯定说一定要戴上。为什么？中央到中央苏区后，为了贯彻自己的路线，采取的办法就是打倒一切，否定过去，把罗明路线的帽子到处戴上。因此我想无论是王震去也好，启龙去也好，都免不了戴一个帽子回来。恰好湘赣那个时候失了上犹苏区，红军有些缩小，那一定会戴上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的。今天我们检讨湘赣历史，我以为应否定那时中央对旧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的估计。因为这不符合事实。随着这个否定，当然改组省委也是错误的，后来打击省委这些人是更不对的。我看不仅仅对湘赣右倾机会主义动摇这个估计不对，就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地区的机会主义的帽子戴的也不对。我想统统应在否定之列。"

王首道、张启龙被撤职后，新省委召开了省党员代表大会和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判旧省委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对王首道等人还搞"同志审判会"。而后，二人均被"发配"到下边。王首道被送到北路分委白露、袁州一带搞基层工作。由于环境艰苦，他手脚生疮，又患了疟疾。由于政治上受到"残酷斗争，无情的打击"，身

体夸台，他度日如年，到了九死一生的地步。

张启龙被撤职后，去做推销公债和“支援红军委员会”工作。他奉命到了永新、莲花、茶陵等地，老百姓对他还很热情，这使张启龙受到了一些安慰。很快，省委又通知他回去。张回到省委后，即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宣布了给他的处分。会上还发了一个材料，材料里说他如何如何右倾，如何犯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如何对AB团反革命分子姑息。要张启龙检查时，张不服，申辩了一番，与会者便齐说张态度不好，是“顽固的机会主义分子”。最后，对张启龙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张更加不服。省委便以张为阶级异已分子而判处其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将其送到“劳动感化院”劳动改造。就在这当儿，任弼时到了湘赣省委，担任了湘赣省委书记。

任弼时到了湘赣省

任弼时缘何来湘赣省?原来，中共临时中央于年初由上海迁至瑞金后，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后改称中共中央局，但许多人仍习称“苏区中央局”。博古为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无正式职务称呼——作者注)。博古等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即全面主持中共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项工作。由于博古毫无对敌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他到了苏区后，一切从十月革命的经验出发，认为中国革命应仿效苏联，在大城市领导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根据地的红军仅仅是配合城市工人起义的力量。同时，全面的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

自从刘士杰向博古报告了湘赣省委情况后，博古决心改组湘赣省委，先派了刘士杰任书记，由于反刘的人太多，博古又改陈洪时为书记。5月，博古又决定任弼时为湘赣省委书记。

任弼时自从到中央苏区后，开始对执行王明“左”倾中央的指

示还坚决，后来在实践中，逐渐感到这条“左”倾路线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不符。但由于王明路线有国际背景，他无法改变，只得于工作中尽最大可能从实际出发，他尤其对肃反扩大化反感，感到这样搞不对头，但也无可奈何，只好于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进行纠正。

博古等由上海到了瑞金，下车伊始，就先批了“罗明路线”，又指责苏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任弼时遂向博古谈了自己对苏区建设上的许多看法，这些看法自然与博古等老“左”们意见不一。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博古见任弼时已同自己话不投机了，遂将其免除组织部长职务，派往湘赣苏区。

任弼时告别瑞金的那熟悉的青山绿水，来到了井冈山下永新县的禾川镇。和他同去的还有刘士杰。刘被任命为副书记。

时省委机关设在了禾川镇。

陈洪时满面笑容的于镇前欢迎任弼时的到来。当晚，任弼时听了陈洪时的汇报。陈洪时主要讲了旧省委的“罪过”，讲了对王首道等人的处理结果。陈洪时讲到最后说：“王首道、张启龙思想极为反动，到现在也不承认错误。”

任弼时吸着烟，没表示态度。

之后，任弼时看了王震、肖克、蔡会文，还有方维夏、张子意等省委、军队内的领导人，分别找他们谈话，了解情况。任弼时经过一番调查后，认为张启龙不仅不是什么 AB 团，而且工作注重实际，若有问题，也是工作上的错误。他亲自到了感化院看了张启龙，同张启龙谈心。由于张启龙的“案子”通天，他几次要放张，均因阻力太大，未能凑效。直到 1934 年 7 月，红 6 军团要西征。任弼时召集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放出张启龙，并安排他去保卫局帮助工作。张不愿去，遂被安排在“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工作。

对王首道，任弼时也予以了保护。王首道后来回忆说：

“我被撤职后，被调到白露、袁州一带搞基层工作，由于环境很苦，我手脚生疮，又患了疟疾。就在这个时候，弼时同志特地叫他的爱人陈琮英同志来看望我，还在经济上给予一点帮助。当时，我算是犯了错误的人，能够得到领导的关怀，得到同志式的帮助，内心感到多么温暖啊！后来，我要求到中央苏区工作，也得到弼时同志的批准。到了中央苏区，我就在毛泽东同志的身边工作，不久就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后来，1950 年的 10 月 27 日，积劳成疾的任弼时不幸辞世，王首道哭道：

“负笈长沙时，已聆君盛名。
及我至穗城，鸿文启心灵。
坚贞斥汪、蒋，不畏刀斧横。
直言伸正义，何惧独秀狞。
我在湘赣边，心疑“左”势凌。
大祸从天降，蒙诬被罪刑。
君独能兼听，广纳同志评。
对人持慎重，刀下始留情。
我既基层调，罹疾身削形。
君遣琮英来，探望复叮咛。
关怀与帮助，温暖长心萦。
延安重聚首，情深更固凝。
全国庆解放，斗争不少停。
重病仍工作，奋疾并力行。
吾党丧栋梁，惜君才壮龄。
我痛失师友，心悲泪涕零。

哀思情切切，终夜不成眠。”

其实，任弼时何止对张启龙、王首道相救，他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就曾救了许多“反革命分子”。有一天，一份材料摆在任弼时面前，这材料写的是万泰地区青年组织负责人张爱萍是AB团青年总团头头，已被逮捕，列入将要处决的名单之内。任弼时看后，对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说：“张爱萍自大革命失败后即到了上海，做党的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入狱。因为他的身分暴露，无法再做秘密工作，被派到红军工作，负伤后，周恩来将他调到中央苏区做青年工作，工作的很好。这样的同志怎么会是AB团？”

顾作霖说：“报上来的材料中说有口供。”

任弼时说：“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的检查来找根据。”

当下，任弼时要顾作霖到万泰地区检查工作。顾作霖到了万泰地区，从少先队到儿童团，又从党到政府军各方面做细致的了解，最后，证明任弼时的判断是正确的，使得张爱萍没受到“左”倾路线的无辜迫害。

这件事，使任弼时进一步看到了肃反扩大化的危害。于是，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湘赣两省组织工作会议，会上，他作了《目前党组织中心工作的报告》。明确指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重证据！要看被审查人的全部工作和全部经历，看斗争中的实际表现。”

会上，任弼时反复强调，肃反之中，“不得随意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

1933年11月，湘赣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在永新召开。到会代表三百多人，由任弼时主持会议。时正值南京国民政府调兵一百万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粉碎国民党的

"围剿",开展查团运动,改组省委,成立新省委。会议期间,开展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刘士杰的发言尤为激烈,他对王首道、张启龙批的最凶。任弼时则尽最大能力对二人进行了保护。大会开了十天,选举了新省委和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大会选举了任弼时为省委书记。

任弼时在大会上所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中说:

> (肃反)……要防止小资产阶级疯狂心理,重复走向简单化、扩大化的危险,造成群众的恐怖状态。……一切"左"的倾向,如轻视敌人的进攻,而放松战争动员工作,消灭富农侵犯中农利益的倾向,同样是危害苏维埃的巩固与战争的动员,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要反对一切口是心非的两面派! ……

任弼时所作的政治报告,由于许多地方说了些真话,因而,受到了苏区中央局的指责。

湘赣苏区的第二次"肃反"高潮

1934 年 1 月 3 日,苏区中央局发出了批评湘赣省委的指示信,内称:

> 听了张子意同志关于湘赣大会的报告,并读了大会关于政治组织和工会工作的决议案,不得不给你们写这个指示信,并且希望你们把这个指示信公开发表。……政治决议案在"四月扩大会后的检阅"一部分估计到半年以

来的工作成绩时，除了“正在开展”、“发动了广大群众”、“进一步改善”、“开始建立”、“相当成绩”、“也较提高”、“相当的提高”……“非常不够”、“还是迟缓”、“还是非常落后”的空洞形容词！

这样的检查工作，请问对于湘赣党有什么意义？大会怎样来“指出这些严重的缺点与错误的原因”呢？……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却不肯具体的分析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教训，不把新的机会主义具体指出来，不来具体分析湘赣党在四次决战中的教训，帮助全党去“深刻的认识”，最后更没有严格的检查出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是）“没有收到必要成绩”的原因。

正因为对于湘赣党在四次与五次“围剿”决战中的教训与经验没有给以布尔什维克的估计，而只有一串空洞的肤浅的形容词，便使大会不能有力的提出湘赣党当前紧急的战斗任务。政治决议关于党的任务写了近十页，一切问题都说到了，好象是一个完满的决议，但实际都是一般的空洞的……是没有战斗性的。

……

湘赣省委在改组以后，一般的回到党的路线上来，曾经进行了反对以王首道为首的机会主义斗争。可是省委在机会主义斗争的领导上，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估计到王首道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曾经在湘赣领导上存在了大半年时期，我们要进行粉碎这种机会主义的斗争，必须切实揭发它在实际工作中的恶果，……但是省委在扩大会后开展这一斗争的成绩，主要的就是从七个县委撤销八个书记，好象所有县委的领导都是机会主义，而对于机会主义的首领王首道、甘泗淇仍然在负领导工作的责任，仍然在为省委甚至为党大会写决议，这是第一……湘赣省委

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去坚决肃清王首道主义的残余；必须把住新的机会主义动摇的具体事实与工作无情的斗争；必须把蔡会文为首的机会主义斗争在全党特别在武装部队开展起来，把主要的火力向着一切两面派和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者。

湘赣省委第三次党代会，虽然对极"左"的倾向有所抵制，但在研究形势、任务的过程中，仍然进一步贯彻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其主要表现为大会认为第二届中共湘赣省委犯了"机会主义动摇"的错误，并于大会上再一次错误地斗争了第二届省委的主要领导人王首道、张启龙等。大会对第五次反"围剿"作了过"左"的分析。认为必须在第五次战争胜利中，实现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必须准备着随时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尽管如此，湘赣省委第三次党代会的决议，还受到了中央局的严厉批评，可见中央局又"左"到了何种地步。

任弼时在后来回忆说：

"临时省委和新省委两个时期都是执行了'左'倾的路线，而且这个路线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左'的。这样的估计是合乎事实的。更确切地说，旧省委执行的是四中全会以后到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前的路线，新省委执行的是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发展得更'左'的路线，包括五中全会。在中央未搬到中央苏区以前，中央虽然派我们去了，后来又派恩来去了，但在博古、洛甫未去苏区以前，极'左'路线还没有完全统治中央苏区。我们去的时候，中央局的书记开始是项英，后来是毛主席。以后恩来同志来了，他当中央局书记时，虽有五月决议案批评了中央苏区的机会主义，提出打赣州，赣州没打开，回来后就再没有

打大城市。临时省委虽然执行了'左'的路线，但也没有充分执行。新省委执行了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路线。中央搬到苏区后，博古、洛甫亲自到苏区执行'左'的路线。这对于苏区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撤销了旧省委，组织了新省委，这个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自然表现要更'左'，但这个新省委是否满足了当时的中央的要求呢？也没有，也没有完全彻底的执行他们的路线，因此，他们说新省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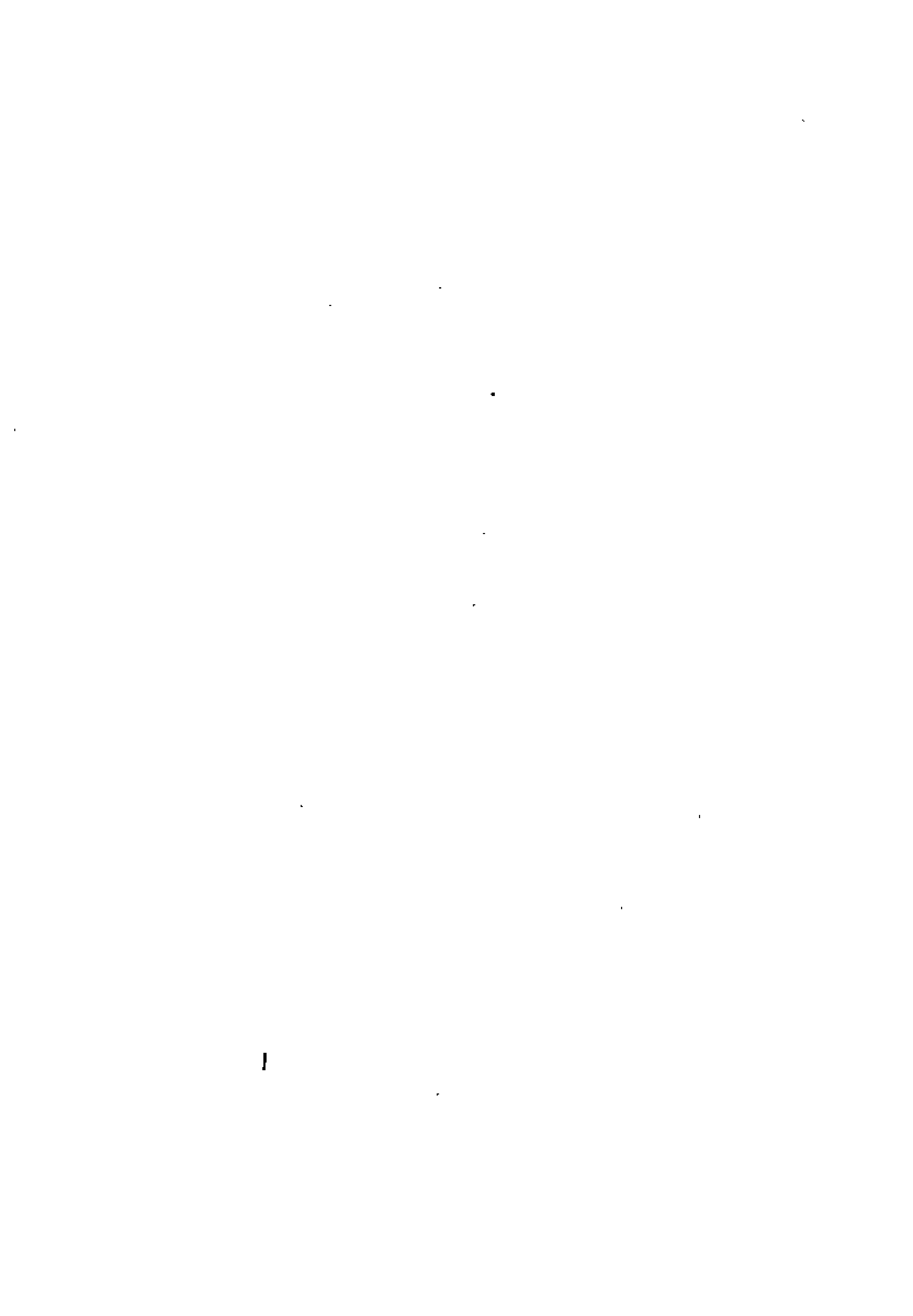
在谈到湘赣省肃反扩大化错误时，任弼时回忆说：

"在肃反问题上，好象有这样一种空气，说吴德峰来了以后湘赣肃反闹得很厉害。在这问题上，也要实事求是。吴德峰来了以后，的确在杀干部中有些是特别重要的，如袁德生、陈邵、胡波、李林弼等等。这是过去省委捉下来不敢杀的。吴德峰来了杀了这一部份重要干部，这是严重错误，是有罪恶的。但是吴过来后捉的人数量并不多，据大家凑起来的能认得的，吴过来后捉的较重要的干部杀了的和病死的共十五个。当然，在这一批捉到的人里面有重要干部和袁德生等。再则，把劳动感化院的一些已经判了徒刑的又杀了，这不是应该的。但吴德峰来了以后的肃反是否比第一次肃反高潮时闹得更厉害更恐慌一些呢？我问了一些同志，他们说在群众中造成恐慌的还是第一次肃反高潮，但第一次干部恐慌情绪少一些。第二次肃反高潮捉的干部多、群众少，在干部中造成恐慌这是可能的。第二次肃反高潮与第一次肃反高潮比较起来，恐慌还是第一次。第一次的肃反也要乱一些，捉的杀的也要多一些，县级干部也不少，而第二次肃反则比较有秩序，捉的

也比较少一些，但其中重要的干部占的数量为多。吴德峰过来之后，捉的人并不多，为什么大家都对吴德峰有很不好的观感呢？这与吴德峰本人作风及保卫局工作作风有关系。过去把保卫局的工作人员搞得很神气，同时吴德峰同志本来作风上也不大好，保卫局有特务作风，所以引起大家的不满。但实际上并不是说吴德峰同志过去搞得大闹天宫，我想这个估计是符合事实的。新、旧省委都是执行'左'的肃反路线，新省委时期表现得更'左'一些的。表现在旧省委还犹豫的，新省委肯定了、杀了。捉杀了一些重要干部如袁德生等。还有一点，这两个时代的省委虽然很'左'，但其中还是有些做实际工作的经验，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在执行'左'的路线，遇到某些困难阻碍之后，有些修正。其它政策方面也是一样，体验做不通的时候，就有些转弯，有些纠正。这也是使我们能在工作中得到成绩的原因。"



第 二 部



第十二章　柳直荀与周逸群

说罢中央苏区的“肃反”，接下来谈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扩大化，用贺龙元帅的话说，比任何一个苏区都严重。其肃反过程说来话长。

1927 年，中共南昌暴动失败后，暴动总指挥贺龙由香港辗转到了上海，在上海霞飞路 22 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他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告诉贺龙，说经过党组织的研究，决定要贺龙、刘伯承、林伯渠等赴苏联学习。贺龙听了，说：“我连中国字还认不得几筐，外国字就更吃不进了。”他请求中央允许他回湘西拖队伍。

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很快同意了贺龙赴湘鄂西拖队伍的意见，并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这五个人，除贺龙外，还有周逸群、郭亮、柳直荀和徐特立。时郭亮尚在武汉。1928 年元旦过后不久，一个阴云低垂，北风凛烈的日子，贺龙、柳直荀、周逸群、徐特立，还有卢冬

生，五个人登上了江轮，逆江水，直奔武汉三镇。

这里把柳直荀，周逸群的情况作一介绍。

柳直荀，又名柳克明，1898年11月3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高桥镇方塘冲的一书香门第，其祖父柳正荣，为清末举人，父柳午亭，也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在长沙教过几年学馆。恪守“厚道载福，和气致祥”的家训，痛恨贪官污吏，希望世人都正直不阿，因而替他取名克明，字“直荀”，其意取荀子“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之意，希望他长大能成正正经经的人。

柳直荀自幼随祖父读书，聪颖好学，祖父常与人言，直荀久后必成大器。柳直荀13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他到高桥镇新办的国民学校读书。次年秋，考入了长沙城里的广益中学，同他大弟柳瑟虎一起，寄住在省立第一师范的伦理学教员杨怀中先生家。这杨怀中就是杨开慧烈士的父亲，从英国留学回归的。杨家与柳家乃三代世交，可谓：“交情三世久，春色两家分”。在杨家寄宿期间，柳直荀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张昆第等进步学生。毛泽东等时均在第一师范读书，他们常到杨家聚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每当这时，柳直荀和杨开慧便坐在一边静听这些大年级学生的海谈阔论。听到得意之处，也不禁眉飞色舞，时杨怀中常对人言：“吾在第一师范有两个最好的学生，一是毛泽东，一是蔡和森，他们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呀！”柳直荀听后，对毛泽东等敬慕之情，更为深切。

柳直荀父柳午亭因愤慨豺狼当道，国家日衰，遂赴日本寻求兴邦之道。留学十载，曾陪同在日本的同乡黄兴会晤了孙中山，导使黄兴办的华兴会和孙中山的兴中会合并为同盟会。辛亥革命第二年，柳午亭回国，他见民国政治腐败，大失所望，便隐居乡间，教书为生。毛泽东从杨怀中先生口中得知柳午亭的学识和为人，便于暑假期间步行到方塘冲拜访。柳直荀恰在家中，父子二人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柳午亭同毛泽东一起探讨了国家大事及文学历史等方面的学问。毛泽东走后，柳午亭对毛泽东赞不绝口，再三对柳直荀

道："毛泽东不比常人，与其交之，以其为榜样，当得大益。"柳直荀又把他平时所知毛泽东洗冷水浴、露宿等"怪事"告诉父亲。说："如今我也像他那样，天天早晨洗冷水澡，晚上露宿阳台，打拳做操，还被同学选为体育会会长了。"柳先生听了，更是赞叹不已。自此，柳直荀同毛泽东建立起更亲密的关系。他经常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各种活动，逐渐树立了"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高尚情怀。

1916 年的寒假后，柳直荀在雅礼大学预科上学。这是一座海外传教会创办的学校，把宣传基督教义当做一项重要内容。柳直荀不信上帝和天国，从毛泽东、蔡和森处借来《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同周围学生一起讨论"有神论"和"无神论"。假期，柳直荀回家乡，适逢一巫婆弄神装鬼，在白果树前摆了神龛，哄骗四乡村民来此磕头上供。柳直荀便把弟弟妹妹们找来，将神龛砸了。人们都说柳家惹神要遭报应。柳午亭闻之，却笑道："直荀做得对。"

柳直荀有个表妹叫肖淑新，是其姑妈的女儿，自幼丧父，和母亲寄居柳家。肖淑新 13 岁时，其母把她许配给一户姓陈的财主家，打算早早将其嫁过去，免得托累柳家。直荀闻之，当即找姑妈，道："如此则害表妹，陈家少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劳而食，必被社会所弃。表妹一手好刺绣，当上职业学校，将来也能寻个职务安身。"并为表妹事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一所半工半读、不收学费并管吃饭的学校，便是王季范先生主办的衡粹女子职业学校。陈家闻之，认为淑新抛头露面是败坏家风，催逼早日完婚。直荀要淑新向陈家提出十二项结婚条件，其中一条系自己要去法国勤工俭学。陈家自然不从，婚事告吹。后来淑新提起自己婚事，总是叹道："我能自立于社会之中，多亏直荀表哥之力。"

1919 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革命风暴很快波及湖南。毛泽东、何叔衡等领导新民学会会员，组织了 5 月 7 日的游行活动，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虽然雅礼大学校方发出不准游行的禁令，当时，担任该校学生会会长的柳直荀仍然鼓励同学们参加了游行。之

后，他又和同学一起，把传单贴在校园的墙上。正贴时，一个叫哈尔辉的洋人怒冲冲地用洋腔尖叫着："这是我们美国人的地方，不准贴！"柳直荀一听，立即把眼一瞪，怒斥道："你们的地方？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土，我们是中国人，愿意在哪贴就在哪儿贴。"就在这时，一个学生偷偷地把一张传单贴在了哈尔辉的后背上，在轰笑声中，哈尔辉红着脸走了。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5月27日，湖南省学联在汹涌澎湃的爱国学生运动中成立了。柳直荀作为雅礼大学的代表参加了省学联，并被选为学联的评议部部长。学联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长沙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柳直荀不辞辛苦，奔波于各校之间，进行组织活动。6月3日，长沙各学校总罢课开始。罢课宣言称："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雅礼大学学监王海圩受洋主子之命向学生宣称："胆敢罢课者，开除！"其淫威使一些学生胆怯了。柳直荀站出来，大声对同学说："学生之求学，以卫国家，国既不存，学有何用？救亡图存，匹夫有责！"坚定了摇摆同学的信心。雅礼大学的广大爱国学生和教职员工，不顾校方威胁，举行了罢课。柳直荀又带着讲演团，到长沙东乡开展宣传活动。他感情激动地教群众唱《国耻歌》：

无公理，灭人道，好河山，将送掉，为奴为仆眼前到！
这国耻，何时消！

学生的爱国运动，引起了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极大恐慌。6月11日，张敬尧发表了一个杀气腾腾的《训令》，接着就对进步学生进行了镇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省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驱张"斗争。柳直荀与同学们一道出版刊物，印发传单，揭露张敬尧政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罪行。张敬尧视他为"激进党"，列入通缉的名单，柳直荀一笑置之，干得更起劲了。在各方力量的压

挤下，1920 年 6 月，张敬尧终于滚出了湖南。

1920 年 7 月，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又创办了文化书社。柳直荀是积极的参加者之一。10 月，毛泽东在湖南组织起社会主义青年团，柳直荀又成为最早的团员之一。1921 年 6 月，毛泽东与何叔衡赴上海参加了党的“一大”。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会议闭幕后，毛泽东被派回湖南任湘区党的书记。湘区的秘密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的一所房子内。柳直荀经常来到这里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和毛泽东、杨开慧一起谈心。在毛泽东亲切关怀和培养下，1924 年 2 月，柳直荀经何叔衡和姜梦周二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两年间，柳直荀获得雅礼大学文学士学位后，参加了徐特立领导的湖南教育工作者协会，任长沙师范总务主任和协均中学校长，以合法身份，从事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工作。长沙城内外大大小小的斗争他都冲杀在第一线：长沙人民抗议赵恒惕杀害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抗议杀害黄静源、汪先宗而举行的两次抬棺大游行；声讨英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而举行的十万人大示威……柳直荀都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勇敢地站在群众斗争最前列。

国民革命军由广州开始北伐，他又改做农运工作。常常在自己家中召开秘密会议。这当儿，经杨开慧介绍，他与李淑一结了婚，便由李淑一在门口做饭，注视着外面的动静。缺经费，他偷着典当了姑妈的田产。他吃住在农民家中，了解农民的疾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北伐军打到了长沙，柳直荀任湖南省国民政府委员和省农协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兼秘书长，发动组织全省的农会会员，全力以赴支援北伐军。省农协成立后，他辞去了每月八十元薪金的协均中学校长的职务，当了代理省农协委员长，每月薪金仅三十元，但他乐此不怨。

柳直荀很重视建立农民武装，通令各县加紧建立农民自卫军，以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有时还亲自带人出去活动。

当时湖南省有个大劣绅名叫罗先闿，原是赵恒惕手下一旅长。1923年湘军改编时，被赵恒惕委为“全省清乡督办”。北伐军抵长沙后，由于罗先闿同谭延闿蒋介石等交往，他辖下的“清乡督办公署”和“长沙县团防局”的虎头牌子，一直不变，并暗中支持各地团防局破坏农民运动，劣迹累累，人怨沸鼎。柳直荀想：罗先闿是全省有名的大劣绅，打掉他的威风，不仅震慑各地土豪劣绅，也是对全省农民群众的支持和鼓舞。他请示了湖南省党部和省政府后，便派了长沙县农协正副委员长去接收。结果二人碰了硬钉子，罗先闿气势汹汹地说：“谁想接收团防局，有胆子就到我督办公署来！”柳直荀得知此情，愤慨异常。时省农协正开筹委例会，柳直荀说：“同志们，罗先闿向我们农协叫阵了，怎么办？”

“那给他点厉害看看。”大家回答。

“好，我同意。我们先礼后兵，明天我偏要闯闯他的阎罗殿，和平接收团防局，不行，再动武的。”

“你不能去，那家伙翻脸不认人。”

“没关系，我自有办法。”第二天，柳直荀和另一同志来到了督办公署，只见督办公署警卫森严。柳直荀理也不理，径直闯进去，见了罗先闿出示省令：“罗督办，我是奉省政府之命前来接收团防局的，请办交接手续吧？”罗先闿听罢，一声冷笑道：“柳直荀，你乃晚辈，怎得无礼？”原来，罗与柳直荀家同乡，且与柳午亭有交谊，想以长辈的资格压人。柳直荀微微一笑：“从乡谊说我是晚辈，可今天办的是公事，我是省府委员来接收的，恕晚辈无礼了，我也是身不由己呀！”“团防局有何罪过，非要你们接收不可？”柳直荀说：“团防局破坏农民运动，反对孙大总统‘扶助工农’政策，阻碍北伐，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有何证据？”柳直荀把手里一大沓子信扬了扬：“这就是下面告你们的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罗先闿还要抗拒，柳直荀指指大门外：“请看看外面。”罗先闿转身一看，门外似乎有不少人正向院里张望，还有带枪的，是不是农民武装把督办公署包围

了？他胆怯了，老老实实把团防局和督办移交了。

长沙市还有一霸叫叶德辉，为前清光绪年间的进士，是个老保皇党，曾做过几任大官。他用搜刮来的人民血汗在长沙南门建了一座大宅院，题名"郋园"，内藏古董珍宝。北伐军打到长沙，蒋介石通过谭延闿介绍与叶德辉勾结上了，蒋请叶德辉吃饭，赠送自己的戎装照片，还亲笔给叶题词："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叶德辉原很惧怕北伐军，见蒋如此敬他，来了神气，和北伐军驻长沙留守团团长许克祥串通一气，干起反革命勾当。他起草了给张作霖、段琪瑞、吴佩孚、蒋介石的所谓湖南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电文，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煽动地主阶级反攻倒算残害农会骨干。为打击土豪劣绅的兴风作浪，镇压反革命的破坏，特别法庭组成了有柳直荀、郭亮等人的主席团，决定第一个要逮捕公审的便是叶德辉。这天，叶德辉正在坡子街一老姘头家中鬼混，守门人送来一张名片，上写"柳午亭"三字。柳午亭是有名望的人，虽然叶与柳二人平素水火不同炉，但叶觉得表面上也不好怠慢，便急忙整衣冠出迎。叶德辉一出门，便被柳直荀带领的农协会员抓走。原来，这是柳直荀用的"诱蛇出洞"之计。当夜，柳直荀、郭亮等审问了叶德辉。第二日便召开万人大会，将叶处决。《湖南民报》载文称："轰动全城，无论远近男妇，络绎不绝，纷往观看，均皆称快"。

农民协会运动蓬勃发展，会员多达六百万之多。1927 年 3 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建立工农自卫军，筹办干训队，柳直荀主持了农民自卫军干训队的工作。队员有六百多名，柳直荀为主任。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5 月 17 日，反动军官夏斗寅在宜昌也发动政变，枪杀共产党十一人。长沙的反革命分子也开始蠢蠢欲动。同日，何键的 35 军驻长沙留守处主任陶柳，逮捕了长沙工人纠察队员三十五人。就在同一天，35 军 33 团团长许克祥唆使伤兵向工人纠察队寻衅闹事。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种种迹象表明，敌人要动手了。5 月中旬，湖南省委三次讨论应变措施，都被

陈独秀“顾全大局”的道道“金牌”给压住了。5月20日，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都得知许克祥的部队已开始堆积沙包，准备巷战。这时候，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已调中央，新任临时省委书记夏曦临事慌乱，21日仓促去中央汇报。关键时刻怎么可以没有领导呢？柳直荀急得直跺脚。他和郭亮、夏明翰一商量：又选了郭亮任临时省委书记。

这时候，长沙城中反共的风声更紧了，柳直荀预感到事情不好。这天，他回到家中，一边收拾党内秘密文件，一边对妻子李淑一说：“淑一，我近一段时间不回家了。”李淑一望着直荀那消瘦的面孔说道：“外面风声紧，省委主要同志都走了，你可要多注意呀。”柳直荀说了声“知道”就告别了妻子。李淑一万没料到，这竟是与柳直荀的最后一别。

5月21日晚，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由于这天电报的代号是“马日”，故史称“马日事变”。许克祥指挥军队包围了农协会。柳直荀带会员们几次冲锋，均因敌火力太猛未得出去。最后他掩护同志们伏瓦越墙才得以突围。时天降大雨，直荀又带队员冒雨出南门，过湘江，到南岸找到郭亮。见到郭亮后，柳直荀提出，他要到长沙周围各县，组织农民武装队伍，反击许克祥。郭亮同意了柳直荀的意见。柳直荀23日到了湘潭，在湘潭成立了农军总指挥部，迅速集合了三千多人，集枪三千多支，并向各县发电号召工农武装进攻长沙，26日又以省工会、省农协名义下了同样的命令。郭亮也赴各县组织农民武装，仅数天，便发动组织了数万（号称十万）农民大军。5月31日，一声号令，杀向省城长沙。长沙城中工人学生亦做内应。就在许克祥急得如热锅蚂蚁之际，陈独秀又来一道“金牌”，下令进攻长沙的农民武装立即撤回。

工农武装解散了，反动势力愈来愈猖狂，整个湖南一片白色恐怖，反动分子天天杀人。柳直荀已不能在湖南立足。他仰天长叹：“数年努力，毁于一旦。”6月中旬的一天，他在亲友帮助下，化装乘

车到了武汉，见到了先来的郭亮，二人又找到了蔡和森，大家谈起局势，都对陈独秀的作法无比激愤。7月初，周恩来秘密从上海到达武汉，交给柳直荀、郭亮新的任务，要他们重新组织被陈独秀强迫缴械的武汉工人纠察队。就在三人刚刚着手工作之时，汪精卫在7月15日发表了"分共"的声明，重建工人纠察队的工作被迫停止。接着，南昌起义枪声响了，柳直荀参加了起义的行列，并成为起义后的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农工委员会成员，随起义军的20军第3师一起南下。9月30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汤坑作战失利，队伍最后被敌打散，郭亮和柳直荀带十七名同志突围。经过苦战，最后仅剩下柳直荀、郭亮、关向应三人。他们绕道抵韩江边，意欲在此乘船去香港，再转道寻找党组织。不料竟遇上了海盗船，将其三人用"蒙汗药"蒙倒，抢走了他们的全部财物，而后胳膊反绑，推到一条小船之上，任其漂荡。小船在海上漂了一天一夜，幸遇到一商船，三人才得救，又辗转到了上海。中共中央即派其同贺龙等一起赴湘西。

再说说周逸群的情况。

贵州省东部的铜仁县城关镇，是个群山环抱、松竹常青、流水涓涓的美丽山城，为人杰地灵之处。

在县城的大公馆路路北，住着一户周姓的大家族，家道殷实，房子磨砖对缝，门上悬挂功名牌匾，两旁联文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1896年6月25日，周家生了个男孩儿，按照家谱，起名逸群。逸群的父亲周志本在城关镇开了个油漆铺和杂货铺，生意甚是红火。逸群出生之后，周志本决心把这个儿子培养成能光宗耀祖的达官显贵。逸群才四岁，周志本就把他送到房下三哥周志炳门下读书。周志炳为逸群起了个号为"立凤"。

周志炳是铜仁县一位德高望重的教书先生，也是一位有爱国思想的老人，对逸群要求甚严。周逸群把那"天地玄黄"等启蒙读物

学得倒背如流，直把个周志炳喜得连称奇童。不到五年，这位周老先生肚里的学问尽教与逸群。

周逸群虽然长在富裕家庭，可自小就喜欢和穷人孩子一起玩耍，而且特别同情穷人。铜仁县城里有个大地主叫郭铁珊，外号“扣心鬼”，盘剥穷人出了名。周逸群就编了顺口溜：

“铜仁有个扣心鬼，外号人称铁算盘，成船大米运江南，绫罗绸缎赚大钱。帮工吃不饱，还要挨皮鞭。一个小钱掉下河，舍着性命摸半天，脑袋就往钱眼里钻！”

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周逸群同小朋友们一起，打着灯笼站在扣心鬼家大门口，一起念他编的顺口溜。扣心鬼认为年三十听到这些顺口溜大不吉利，气得举着棍子跑出来轰。孩子们见他出来，立刻跑开了，又站在远处喊：“扣心鬼，铁算盘……”“扣心鬼，害人虫，头上长疮脚流脓……”把扣心鬼气得眼儿直，头发昏。

1906年，周志炳创办了城南小学，十岁的逸群，插到二班上课。城南小学教的是“新学”，使他大开了眼界。在他家对面巷中有一位柳先生，是清末的秀才，家里藏书很多，逸群常去串门。柳先生很喜欢逸群，时常教他如何读书、作文、习字，给他讲历史。慢慢地逸群便读了《纲鉴易知录》、《王凤洲纲鉴》、《小仓山文集》、《东莱博议》、《四史精华》等许多书，还有《古今图书集成》。

周逸群有个思想进步的叔叔，见侄儿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就给他进步书籍看。高小毕业后，逸群便到了贵阳南明学校中学部。

周逸群的知识越多，对世道认识得就越深刻，对那黑暗的社会越愤恨，恨不得举起利剑将这旧世界劈开。他挥笔写诗道：

南雁北飞，去不思归。
志在苍山，不顾安危。

生不足惜，死不足悲。

头颅热血，不朽永垂。

周逸群在南明学校学习期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已处于危亡关头。当时，师生们最为关心的，是中国向何处去。师生们多数人拥护改良派的观点，也有不少人拥护革命派的主张。周逸群因喜读梁启超的书，便拥护改良派。辛亥革命后的现状使他很失望，那些在清室显赫一时的总督府台们摇身一变，又一个个地挂起了共和的牌子。真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于是，他写了《明太祖以布衣起兵论》的文章，立意新颖，论据精辟，影射了改良派，被学校评为甲等作文第一名。

1919年3月，逸群东渡日本，在东京庆应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日本，留日中国学生开大会，发通电，会刚开就被警察驱散。学生们没有屈服，他们高呼着“誓死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浩浩荡荡地包围中国驻日使馆，周逸群勇敢地加入了游行行列，被军警逮捕。

在监狱里，周逸群结识了留日学生——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彭湃。彭湃很激动地向周逸群讲：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周逸群很赞同彭湃的看法，他写信给亲戚朋友说：“中国要想达到大同世界，就得照苏俄的样子办，把资产阶级体系彻底打碎，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体系。”

对伟大的十月革命一无所知的周逸群，从彭湃处接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知识，感到十分的亲切。出狱后不久，便接到了彭湃寄来的一批书刊，有《解放》、《改造》、《社会问题研究》等。他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了。

1923年春，周逸群从日本回到上海，与好友李侠公同办《贵州青年》旬刊，决心“唤起民众的阶级自觉，以与权力阶级对抗”，得到《中国青年》主编肖楚女的热情支持，受到了青年人的欢迎。他在第

六期上写了一篇《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的文章，揭露了西南军阀投靠北洋军阀的罪行。《贵州青年》像一把利剑，刺向封建军阀，影响西南政局。

1924 年 3 月，周逸群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心情很激动，当即填词一首：

硝烟弥漫中华，
有斑斑血泪，
遍体痕伤。
军阀横行，
列强乱争，
九州怪魔猖狂。

今日宏愿酬，
一生交给党，
斗志昂扬。
愿为工农革命，
洒热血一腔。

1924 年秋，周逸群遵照党的指示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曾挥笔作诗，赋李侠公，以表达自己投笔从戎的志向：

废书学剑走羊城，
只为黎元苦匪兵。
斩伐相争廿四史，
岂无白刃可亡秦？

周逸群在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队学习。他在中共黄埔特别支

部领导下，一面攻读革命理论，学习军事，一面从事青年军人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4年秋，他同共产党员蒋先云、李劳工等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以列宁创办的《火星报》为旗帜，成立了“火星社”。这是黄埔军校成立初期党的革命军人团体。周逸群的名字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视，有两个人还找他谈了话。一是孙中山，一是蒋介石。一天，孙中山来到黄埔军校讲演三民主义。周逸群给孙中山写信，谈了自己对三民主义的认识。没几天，孙中山竟在总统府召见周逸群，十分亲热地进行了交谈。周逸群听说孙中山决意再次北伐，消灭北洋政府，便问道：“总统决意北伐，可目前北洋军阀投靠了帝国主义列强，有这些列强做后台，革命军能胜利吗？”孙中山笑而不答，反问了一句：“你说呢？”周逸群当时就不假思索地说：“据我看，光靠革命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联合工农，武装工农，这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孙中山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告辞时，中山先生亲自送他出总统府，握着他的手说：“立凤啊，看见你这些青年娃娃成长，我很高兴，你们有远见，有卓识，中国有希望。”

蒋介石为什么要见周逸群？他想独霸天下，网罗有用之才。1925年初，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支部改选，周逸群、蒋先云等共产党员当选为特别支部第二届执行委员。当晚，蒋介石用专车把周逸群和蒋先云接到黄埔军校广州办事处。蒋介石表现出了很亲热的样子，询问周逸群和蒋先云的家庭情况后，拍着二人肩头，夸赞了一番，说：“好好干，先云可升为中将教育长，逸群嘛，可到黄埔学生军中当少将师长。”周逸群见蒋介石这样百般拉拢，便说：“为把同学团结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我和先云研究了一下，认为有必要在学生中建立青年军人联合会，不知校长意见怎样？”蒋介石说：“好，好，我同意。”

黄埔军校建校初期，广东革命根据地尚不巩固，军校内部成份复杂。为进一步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在中共特别支部和周恩来的领导下，

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于1925年2月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周逸群担任了主席。他领导“联合会”先后创办了《青年军人》、《中国军人》等刊物，显示出了他的卓越才能和组织才能，被肖楚女称为“黄埔岛上的一颗新星”。

“青年军人联合会”在黄埔军校中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切齿痛恨，蒋介石后悔不迭，暗中指使王柏龄等亲信，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制造摩擦，寻衅肇事，同“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对抗。周逸群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借口“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下令解散了这两个组织。这时候，周逸群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到国民党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工作，担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宣传科科长。他积极地协助周恩来，为北伐军出征，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开始北伐，攻克长沙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成立。周恩来交给了周逸群新的任务，要他担任北伐军左翼宣传队队长。9月10日，周逸群带着由五十三名青年学生组成的左翼宣传队，从长沙出发，到驻常德的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贺龙部队工作。

周逸群同贺龙虽然没有见面，但两年前他们便通了信，而且从未间断。

他们怎么通起了信呢？这里面也有段情由。

贺龙自两把菜刀砍盐局、拉起一支农民武装之后，带着这支队伍，先是随蔡松坡护国讨袁，接着又投入了护法运动。1922年，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讨伐北洋军，派老同盟会员石青阳到川东、湘西收集旧部，湘西王陈渠珍便顺水推舟将贺龙人马送与石青阳。这样，贺龙便随石青阳加入了熊克武领导的四川讨贼联军，与北洋军在四川大战，前后三年，终没打出个结果，贺龙先为讨贼联军混成

旅旅长，后为师长，驻守贵州铜仁，司令部恰好设在周逸群的家中。

一天，贺龙巡哨回来，见堂弟、1旅旅长贺锦斋正满面笑容地等他。没等贺龙开口，便说："常哥(贺龙乳名常常，字文常)，我可发现宝贝了。"贺龙问："什么宝贝?"贺锦斋把手中几本书放在桌上，说："都是宣传共产党和俄国革命的书。"贺龙眼一亮，说："快念给我听听。这个党，那个会的，我参加了不少，就是'红脑壳'我还没接触过。"

贺锦斋便念了起来。贺龙听了一阵，把桌子一拍，说："共产党的章程不错，是为劳苦大众的。"言罢又问："你这书是从哪儿得来的?"贺锦斋说："就你住的周姓这家房东啊。周家有个叫周逸群的青年，是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听说是个共产党员，书都是他寄来的。"贺龙说："文绣，用我的名义给这位周先生写封信，要他给咱们多多寄些'红脑壳'的书。"

就这样，贺锦斋以贺龙的名义给周逸群写了信，不久，周逸群就给贺龙寄了许多进步书籍。贺龙甚为高兴，每天都要贺锦斋为他读。

也就从这时起，贺龙开始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后，广东国民政府又派人到贵阳做贵州军阀袁祖铭的工作。袁祖铭同意加入北伐军序列时，贺属于袁部，便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师，驻守于常德。

就在这当儿，周逸群带着宣传队员，来常德会见贺龙。

贺龙见了周逸群，喜出望外，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笑着说："逸群，我的兵可把你家的粮食吃了。"

周逸群笑道："只怕你吃得不多。"

贺龙说："逸群，我想党，盼党，你来得多好啊。"

周逸群说："我也十分想念你呀。"

这一晚，两人畅谈到金鸡报晓。周逸群向贺龙讲了国内外的形势、共产党的宗旨，讲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贺龙不断地向周

逸群提出各种问题，周逸群为其一一解答。两人只恨相见太晚。

贺龙向周逸群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周逸群说："贺师长，共产党的大门向你敞开着，只要你的条件够了，我来当你的入党介绍人。"后来果然由周逸群介绍贺龙入党。

周逸群被留在1师担任政治部主任。他带来的五十三名宣传队员，也分到了各团营中，担任了职务。

周逸群的到来，使1师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支部队，在贺龙指挥下，北伐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军中不少将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部队更加倾向革命，贺龙也成为国民革命军著名的左派将领。

1927年7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叛变了革命。贺龙在周逸群、谭平山等共产党员的帮助之下，将部队拉到了南昌，参加了南昌暴动。起义军南下至临川，蔡廷锴师叛逃，起义军组成了第3师，由周逸群兼任师长，徐特立为党代表。8月的南方，天气炎热，酷暑难耐。周逸群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使基层官兵甚为感动，齐说："师长尚且如此，我等无任何怨言！"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周逸群率师与敌激战于三河坝，结果部队被打散。他与四名警卫员到了揭阳一带，在与敌人搏斗中摔伤，被一名叫谢山的贫苦农民救起。他在谢山家中住了几天，体力得到了恢复，并得到了主力部队失败的消息，便决定去香港，再转道上海，寻找党的组织。这天，当他上了开往上海的一艘外国客轮，挟着个烂席子摸到货舱，躺下休息时，忽然听到一个看报的人自语："这报上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上就登了出来。"周逸群看到说话人是陈赓，高兴地握着陈赓的手，说笑一阵，两人一起结伴到了上海。随及同贺龙一起赴湘西。

贺龙、周逸群、柳直荀等五人抵武汉之际，武汉的中共要人正准备举行年关暴动，湖北省委遂决定由贺龙出任暴动总指挥。暴动决定在腊月二十三日灶爷升天时、趁鞭炮齐鸣举行。由于为暴动准

备印刷传单的一家印刷厂被敌人破坏，暴动计划落入敌人手中，敌人出动大批军警，搜捕“暴动分子”，贺龙、周逸群、李良耀、卢冬生等，在武汉立不住脚，遂连夜离开了武汉，走水路奔湘西。柳直荀因另有任务没能前往，徐特立也因患肠疾而留下。

第十三章　贺龙苦战湘西

贺龙要枪毙贺锦斋

江轮在长江中逆水西行。时值隆冬，沿江两岸，到处是枯枝败叶，一片萧瑟之景。这一日，到了三江口，就是三国时期周瑜火烧曹营之处。天才近午，船便停了下来，贺龙一问，才知道前边的观音洲有一股土匪，二十余人，常于此江面上白日抢劫，往来的行船只有结伙才敢前行。贺龙闻听，大怒，遂带着卢冬生上岸会了土匪头子混江龙李偏头，趁势下了李偏头的枪，将其打死，余匪闻贺龙之名，皆俯首而降。贺龙等遂得了十六支长短枪，当晚，江轮又继续逆水西进，行了一程，忽然彤云密布，又见大雪纷飞。刹时间：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轮又行了半日，到了沔阳境内。此时，江轮便进入了洪湖腹地。洪湖在夏、商、周各朝，为荆州的云梦地所辖。春秋时为州国。秦分天下三十六郡时，洪湖地属南郡。汉设州陵县。王莽时为江夏县。三国时，为荆州所辖。隋朝初年，改为沔阳县，元为沔阳府，明为沔阳州。清朝顺治二年，沔阳州改属湖广布政使司的安陆府。乾隆二十七年，又从沔阳州划出文泉县，后来，文泉县就没了，怎么没的呢？传说这文泉县旧址，便在今日茫茫湖水中央。那时候，这湖中央是美丽的文泉县城。有这么一天，县官做了个梦，一神人对他讲，说衙门的石头狮子若口吐鲜血时，便要天蹋地陷。县官听了，胆颤心惊，专门派人看着这石头狮子。这事仨传俩，俩传仨的被一屠户知道了，那屠户见县官不为民做主，很是有气，心中说，狮子吐血，先把你狗官陷入地内，他趁看狮人不注意，往狮子嘴里抹了猪血，看狮人突然见狮子口中有血，大惊，忙报县官，县官慌忙骑马逃窜，没走多远，一阵轰鸣，扬子江水骤涌，文泉城也就没了。这文泉城究竟怎样变成湖泊，据后人推测，很可能是地震引起江水流入，自此，成为洪湖。

洪湖区域有大大小小湖泊几十个，主要分布在洪湖、大同湖、大沙湖的周围，每到雨季，这些湖泊便成一片汪洋水域，涸水季节，便又成芦苇荡和荷花淀，洪湖境内河港湖泊交织其间，东西贯通，相互串连。其腹内有荆河、中府河，长江与东荆河环绕其境。因而，这洪湖地区素有水乡之称。这洪湖地带，土地肥美，物产丰富，是鱼米之乡。洪湖虽是水泊之地，而其战略地位，却又十分重要，东近武汉，南逼长沙，西邻川陕。退亦可据水泊之险固守。元朝顺帝时，沔阳渔人陈友谅，就在这水乡泽国领导了沔阳、洪湖一带人民揭竿起义，一时轰轰烈烈，号称“汉王”，至今，在洪湖区域内黄蓬山下，尚有陈友谅墓。三国时的遗迹就更多了，乌林矶与隔江的赤壁相对，

吕蒙口、观阵台、打鼓台，皆是历代兵家相争之时所留遗迹，在此不一一细述。

江轮又走了一程，到了一个去处。这地方，是通荆州、沙市、宜昌的水上咽喉要道，由于地形呈弓形，从长江上往上看，像一个人反着的嘴，故名“反嘴”。这反嘴镇上有几百户人家，商旅店皆全，也算是个小小的热闹去处。看看江轮到了反嘴，只见江边一座茅棚旁，站着一堆人，向江轮摇手，这些人有的还背着枪，这群人这么一喊，江轮上的人都吃了一惊，猜想定又遇到了土匪拦截。可到了这份儿上，江轮不靠岸也不行啊，只好靠向了码头。这时，贺龙、周逸群、李良耀、卢冬生均躲在仓中，透过轮船的窗户向岸上望去，判断着既将发生的事情。忽然间，贺龙一拉周逸群的胳膊，说道：“逸群，你看，那岸上站的不是贺锦斋么？”

周逸群一看，贺锦斋果然站在人群之内，正向江轮张望。只见他，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一件棉布长袍，正在向船上招手。贺龙不见贺锦斋便罢，此时一见贺锦斋，顿时立眉双挑，满面怒容，哗啦一下，将子弹上了膛。周逸群一见贺龙这举动，一把攥住他的胳膊，说道：“文常，你要做甚？”

贺龙两目喷火，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毙了他，是他贺锦斋投降缴械误了共产党的大事。不然，南昌起义不会失败的。”

周逸群说：“文常，不可鲁莽，别忘了，你现在是共产党员了，贺锦斋缴械的问题，自有组织解决，不能只凭感情办事。再说，我们也要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

周逸群这样一说，贺龙的怒气才平缓了许多。这工夫，江轮靠了岸。周逸群拉贺龙出舱与贺锦斋会面。贺龙说：“我不见他，我一见他就有气。”

周逸群笑着一拉贺龙：“你呀，走吧。”

贺龙这才同周逸群一起上了岸，卢冬生、李良耀也随后紧跟。

贺锦斋见到贺龙、周逸群四人，真是悲喜交加，他拉着贺龙的

手说："常兄，你，随你惩处我吧，我给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死而无怨。"

贺龙乃是宽厚之人，本来他对贺锦斋一肚子气，如今贺锦斋这么一检讨自己，那一肚子气立时烟消云散了。贺龙说："锦斋，你怎么到了这里？怎么知道我们从此处经过？"

贺锦斋说："一言难尽，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到了上海，找不见党组织，就来到了这里，拉起了一支队伍，听人说你在观音洲下了混江龙的枪，估计你必由此经过，就来这里迎你。"

贺龙等人同贺锦斋见了面，贺锦斋又把同他一起拖枪的黄鳌、滕树云、朱秉章、刘玉仁等人，向贺龙等作了介绍。黄鳌是这一带的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随后，大家一同到了反嘴镇。进镇之后，贺锦斋把大家领到了一座高大的房子里。这原本是一大户土豪的宅院。众人进屋后刚坐定，有洪湖五子刘绍南求见。

刘绍南是沔阳人，在武汉求学时，加人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天，党组织派他到洪湖地区开展工作。他回到家乡之后，对贫苦的渔民和农民做了宣传和发动工作。并以同学身分与革命青年彭国材、涂位云、贺闯、李德珍喝雄鸡酒，结拜为异姓兄弟，决心跟共产党，革命到底。这五人便成了后来洪湖人民众口称颂的"红五子"。即：刘瘤子、彭鼻子、贺麻子、李矮子，涂长子。刘绍南怎么来此见贺龙的呢？说来话长。原来，洪湖地区自1925年的秋后，中共湖北省委先后派了邓赤中、叶赤五等同志来开展工作。随及，又派了刘绍南等。经过这些同志的努力，一时间，洪湖地区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同土豪劣绅和各种反动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邓、刘诸人领导革命群众，斗争了人称"七虎"的渔霸吴晓光，南林口的大土豪陈观卿、官垱湖劣绅夏西斗，汊河口恶棍李应林等等。恶霸土顽，一个个都威风扫地，贫苦百姓，扬眉吐气，人心大快。那些土豪劣绅个个吓得胆颤心惊，大的跑到了汉口，中等的逃到了沙市，小的躲到了县城。1927年，汪精卫于"七一五"反共后，这些土

豪劣绅们一下又还了阳，纷纷返回，反攻倒算。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刘佐龙的15军，鲁涤平的第2军，李品仙的第8军，李燊的第43军的部分队伍，先后占领了洪湖各地。那些反动势力纷纷组织了什么"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清乡委员会"、"保卫团"、"常练队"，各地的共产党的组织，群众团体，全部被破坏和解散，工农自卫武装被收缴，不少共产党人革命群众惨遭杀害。那些"还乡团"、"铲共队"到处杀人放火，掳掠奸淫，无恶不做。至使得许多群众家败人亡。这时候，湖北省委召集洪湖地区的共产党负责人肖仁鹄、邓赤中、黄国庆、刘绍南等同志，在武昌鸡公山开了会，要他们"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责成他们潜回洪湖各地，组织群众，发展武装斗争。肖仁鹄、邓赤中、刘绍南等回到沔阳，便分头秘密地进行暴动组织发展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1927年旧历八月十五日，在沔阳戴家场陈家垸，召开了五十多名党员大会，决定暴动从此开始。当天夜里，肖仁鹄、邓赤中、刘绍南，还有彭国材等共产党员，带领数百名农民队伍，首先杀死了戴家场恶霸涂老五，接着又杀死了周河湾的地痞周传简、劣绅戴金集、吴旺振。武装暴动如同春雷轰鸣。洪湖地区许多地方的共产党员，也自发地组织暴动队伍，半个月的光景，先后有八十余处土豪劣绅被农民处死。那些没死的土豪劣绅，纷纷逃跑。国民党反动政府，立即派兵镇压。1927年旧历十一月，邓赤中、刘绍南、肖仁鹄、彭国材等人，又领导农民武装，乘沔阳城中反动军队出城之机，奇袭了沔阳城，杀死了伪县长胡金宝，从狱中救出了一批被抓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随后，这支队伍撤出了沔阳，转至沔西，会合了监利县王尚武的暴动队，接着，又在新沟嘴歼灭了监利团防武装七八十人。这时，暴动队发展到三百多人。肖仁鹄为游击队队长，邓赤中、刘绍南、彭国材为副队长，贺闯等战将亦都在这支游击队内。

这时候，鄂西区各县也都发动了规模不等的武装起义。到了1927年底，在这洪湖地区建立的农民游击队，除在监利、沔阳两县

活动的肖仁鹄外，还有石首县的吴仙洲部，公安县的邹资生部，荆江沿岸活动的黄鳌部。此外，还有许多小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都各自为战，彼此尚无联系。就在这时候，贺龙、周逸群、李良耀、卢冬生四人，来到了反嘴镇，刘绍南得知后，即刻来见贺龙等。

贺龙听了刘绍南的一番介绍后，握住刘绍南的手说："绍南同志，认识你我很高兴，你们工作的很有成绩。"当下，大家一番亲热，不必多说。

这时，贺锦斋对贺龙说："常兄，这洪湖地区地下党、群众的基础都很好，十人以上的游击队有好几支，就是缺少统一的指挥，都是各自为政。"

黄鳌插话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各级组织都破坏了，许多地方至今未能恢复，许多党员找不到组织，就自动拉起队伍。少则三五人多则上百人。若把这些游击队组织起来，那力量就大了。"

周逸群说："是应当把这些游击队、地下党组织起来。"

贺锦斋说："我也这么想，有些基层党组织找到我，可我也与党失掉了联系，对如何建党也不清楚，所以，没做这方面的工作，你们来了就好了。"

贺龙一指周逸群，笑道："这些工作，逸群明白。"

周逸群说："是否把各游击队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召开个会议。统一行动，统一指挥。"

周逸群的主张大家都同意，当下，由贺锦斋进行了布置，派人分头通知各游击队负责人，到反嘴镇开会。

两天后，这些游击队负责人都到了，有监沔游击大队队长肖仁鹄、副大队长彭国材、邓赤中，石首县游击队队长吴仙洲、县委书记李兆龙、组织部长刘革非，公安县游击队队长邹资生，华容县游击队队长段玉林，江陵县游击队队长陈香波，安乡县游击队队长史庶元。大家相见，都十分高兴。华容县的段玉林游击队，其实只有十几名队员，段玉林却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第19路军的旗号。人虽少

牌子挺响。贺龙听了汇报，笑道："有这胆量就好，国民党那些龟儿子，就没这份胆量。"

当下，大家一起开了联席会议。决定在洪湖地区组织年关暴动。将肖仁鹄和贺锦斋领导的游击队合在一起，组成"中国共产党湖北沔阳工农革命军第 5 军"，贺锦斋为军长，下辖三个大队，第 1 大队大队长肖仁鹄；第 2 大队大队长滕树云；第 3 大队大队长刘绍南。总指挥贺龙。其余各游击队暂且单独行动。年关暴动主要消灭土匪和团防，因为这些反动武装势力，比国民党正规部队更坏。会毕，大家便都分头行动。5 天之后，肖仁鹄将监沔游击队悄悄带到了反嘴镇。于是，大家安排了年关暴动的行动计划，决定首先消灭荆江两岸的三大处土匪恶豪。哪三处？华容岳老八、监利郭老七、石首张烟灰。这三个家伙，既是土匪，又是劣绅、恶霸，勾结官府，手下各有反动武装数十名，百姓对其恨之入骨。消灭这三霸，达到敲山震虎之目的。英雄们又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在大年三十晚上，杀掉这三个恶霸。而后，将暴动全面推开。

说话的工夫就到了腊月二十七。按乡间之俗，廿七杀年鸡，廿八把面发，有钱人家都忙着过年。到了三十这天，工农革命军三路人马一齐出动。哪三路？贺龙带第一路百余人，直奔石首张烟灰，周逸群带第二路百余人，直奔监利郭老七，贺锦斋带第三路一百五十人，直奔华容岳老八。当夜，将三个恶霸都处死了。这三个恶霸一倒，贺龙的名头一露，那些土豪恶霸小股土匪，立时变老实了。老百姓都奔走相告，说贺龙到了洪湖，活龙得水，要乘云上天。

贺龙、周逸群指挥人马消灭了三个恶霸之后，趁敌慌乱之际，又带队伍攻打监利城。谁知侦察情况不细，攻打了半天，攻打不下，便又撤回到焦山河。

在焦山河，贺龙、周逸群召集各游击队、县委负责同志开了联席会议。研究什么问题呢？因为中共中央给贺龙周逸群的任务是去湘西拖队伍，他们不能在洪湖久留，便决定带贺锦斋、李良耀、卢

冬生，黄鳌去湘西，发展队伍，依山建军。新建立起的工农革命军队伍，交给了石首中心县委，由李兆龙指挥。随后，贺龙等人上路奔湘西。就在贺龙等人走后不久，刚刚组建的工农革命军队伍便出了差儿：肖仁鹄不服李兆龙的调遣，领着其中一支人马独自干了。肖仁鹄这人农民意识很浓，又个人英雄主义严重，对贺龙做领导，他很服气，对李兆龙他就瞧不起了，原来那李兆龙是打野雁的出身。肖仁鹄便不把他放在眼内。肖仁鹄把队伍拉走之后，日子不多，便遭到了恶霸和团防的偷袭，队伍几乎覆灭，肖仁鹄也牺牲了。剩下的少数游击队员，被刘绍南、彭国材、贺闯等人带到了洪湖荒岛中，几个月后，才又逐渐壮大。李兆龙带领的队伍，也遭到了夏斗寅部的围剿，被打散了，后来，洪湖名将段玉林领导的游击队，就在这两支队伍上建立的。

贺龙、周逸群等在洪湖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注意，当贺、周等向湘西行进时，蒋介石子南京发电于湘鄂西"剿共"联防司令夏斗寅。要其捉拿贺龙。夏斗寅闻贺龙回到了湘西，大惊，急电"湘西王"陈渠珍。夏、陈等人急下令各团防务于要道设卡，捉拿贺龙一行。桑植县保安团团长陈策勋遂下了通令，说谁要胆敢窝藏贺龙，九族皆灭，谁要抓住贺龙，他要亲自给这家挂匾。

贺龙等一行凭着机智勇敢和百姓相助，于途中杀了大土匪陈黑，接连闯过了夏斗寅、陈渠珍、陈策勋等设防的数道关卡，回到了贺龙家乡桑植洪家关。

破风水——周矮子率兵挖贺龙家祖坟

贺龙等人同众乡亲见过面之后，又问起桑植大革命时期的情况，众乡亲便七嘴八舌地把情况向贺龙讲述了一遍。

桑植县在 1927 年的 4 月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员达到了五六

千人，受到共产党影响的有好几万人。农协会成立之后，首先把任过湖南省参议员、恶霸县长的朱海农抓起来游街。这朱海农是当年贺龙砍盐局后杀死的第一个县长朱海珊的胞弟。后来，贺龙带兵入了川，这朱海农召集土匪，称霸一乡。赵恒惕任湖南省省长时，朱海农花钱运动了个省参议员、桑植县县长的官儿。这朱海农比朱海珊还坏，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因为朱海农有枪有势，百姓们是敢怒而不敢言。农协会成立后，在农协会领导之下，农友们经过数次械斗，捉住了朱海农，先将他游街，随后，又将他拖到城外河滩，用乱石打死。这下，农协会的名声可就大了，那些大小豪绅，都纷纷逃走。时日不多，“马日事变”发生了，接着，“七·一五”事变，夏斗寅派了周矮子周燮卿，带队伍到了桑植。这周矮子原是贺龙部下的一个营长。1925 年，贺龙败走黔东时，周矮子看贺龙的大势已去，他拉着一些人跑了，先是投到了陈渠珍名下，陈渠珍给了他个营长的官儿做。周矮子嫌低，就又投到了夏斗寅的怀中，夏斗寅给了他个团副当。周矮子便死心蹋地跟上了夏斗寅。夏斗寅要他到桑植镇压农协会，周矮子自然要卖力气了。他到了桑植后，先后杀死了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将县农协会主席谷及峰，大卸十八块，那凄惨之状，使人听了，不禁发指。他又派人挖了贺龙家祖坟，说是破贺龙祖坟风水。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便被反革命分子的屠刀压了回去。

贺龙听了大家的介绍，立时二目圆睁，浓眉高挑。厉声说道：“反动派想用屠刀扑灭革命烈火，是办不到的！”

之后，贺龙等一面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一面着手拉队伍。洪家关及附近的村镇的青年，听说贺龙又树招兵大旗，纷纷前来。几天之后，又有几支人马来投奔贺龙。有梨树垭的李云清、杜家山的谷志龙、红土坪的刘玉阶、五洋关的贺炳南、鱼鳞寨的贺香姑、袁家坪的王炳南。这王炳南，本是桑植县袁家坪人，父王仕杰，系贫苦农民，租佃福音堂九十担谷的田种。王仕杰共生三子，老大王炳南、老二王朝礼、老三王朝盖。因家境贫寒，王炳南只读了两年私塾便被

迫停学。二十岁时，王炳南娶妻另过，妻子朱子姑，也于贫寒人家生长，勤劳贤慧。王炳南耕种了九担谷的佃田，还煮点酒卖，妻子纺纱织布，夫妻俩日夜勤俭，勉强度日。二十四岁时，他们有了个小孩，日子越发困苦。无奈，王炳南便借贷与人合伙做生意，不想头一趟便被土匪抢个精光。正在王炳南走投无路时，贺龙等好汉刀劈盐局，斩枪拖队，夺了县城。王炳南一跺脚，说："不是我要上梁山，是老天逼我上梁山。"遂同妻子洒泪而别，投军于贺龙部下。这王炳南身材高大，打仗勇猛，且办事干练，生性直爽，贺龙甚是喜爱。不久便当了连长。贺龙当澧州镇守使时，王炳南已升为营长。1926年，贺龙率师北伐之时，王炳南为第5团1营营长。南昌起义之后，王炳南为5团团长。起义失败，王炳南同贺龙等人失去联系，也不知贺龙等人死活，便辗转回到了桑植，又拖起了一支队伍。就在此时，王炳南听说贺龙到来，自是高兴异常，当即前来与贺龙等相见。

贺龙在洪家关立起招兵买马大旗，震动了桑植内外八乡，他当年的旧部，各处小股的农民武装，都纷纷来投。不到半个月，便拉起了三千来人的队伍。

贺龙同周逸群一起，将这支队伍整编了一番，建立了工农革命军。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为党代表，黄鳌为参谋长，贺锦斋为第1师师长，王炳南为第2师师长。贺龙的大姐贺英把自己的队伍交给了贺龙后，自己带了少数人回到了一个叫鱼鳞寨的地方。

这天晚上，工农革命军召开了前委会，研究如何开展工作。周逸群说："桑植是僻壤偏乡，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我们初到这里，要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使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有所了解，知道我们拖队伍是做什么的。"

贺龙说："我同意逸群的意见，抓宣传的事，就由逸群来办，我和黄鳌、锦斋抓紧时间整顿队伍，以备敌人的进攻。"

会议开的干净利索。第二天，周逸群挑选了一批青年骨干，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章程讲给他们，由他们去做宣传。周逸群还编了

歌儿，教这些骨干唱。那歌词写道：

农民弟兄们，联合起来啊！
黑地又昏天，压迫数千年。
耐劳苦，忍饥寒，生产供人间。
手胼腹足胝，终岁不空闲。
历尽难中难，才到打谷关。
四六、三七租付齐，衣食不周全。
想来好伤悲，农民真吃亏，
要吃饭，要穿衣，大家打主意。
快快来团结，建立苏维埃，
分土地、铲封建，才得享安逸。

这以后，周逸群又编写了《工农团结歌》、《妇女翻身歌》等歌曲，桑植县群众基础好，贺龙威信又高，群众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随后，建立了工农的革命政权——桑植县委。恰好李良耀赶到了洪家关，李良耀便为县委书记。

这天，风和日丽，春风荡漾，正赶上洪家关赶场。由于工农革命政权的建立，赶场的人特别多。来赶场的人，有的是来看贺龙工农革命军的，有的是探听消息的，有的是来看热闹的。

贺龙来到街上，所过之处，乡亲们都跟他打招呼，他也向乡亲们问侯，走到街心，见那里围着一群人，贺龙过去一看，原来是个盲人，怀抱三弦，边弹边唱：

“自从南昌起了义，澧源更遭匪注意，以为贺龙生其间，定多革命潜伏力，惟恐烈火漫天烧，蒋汪南京施毒计。急调大批强盗军，‘剿赤’‘铲共’更积极。漫山遍野紧搜查，硬将人民当仇敌，从早到晚乱抓人，一杀二绑三关闭。

地上鲜血流成渠，狱中冤囚挤破壁。许多志士不怕死，愿
将肉身抗刀锯。尤有一事更痛心，婴儿也当纸撕碎。妇女
不愿受奸污，悬梁投河甘自缢。眼见澧水八九县，山川改
色人绝迹。灾难实在比水深，欲想排荡无良计，也曾不断
做斗争，结果总是败下去。常从事后追原因，无人领导空
叹息！大家抬眼望贺龙，只有他能吞鬼魅。如今贺龙远归
来，人人雄心高百倍，一齐投入斗争中，不畏生死与艰巨，
群雄到处发吼声，势如风暴卷残絮。估计不到二十年，定
在京沪庆胜利，我今唱了澧水歌，当做一篇讨匪檄。"

那盲人唱完，围观之人无不拍手叫好。贺龙有礼地问道："先生，这是谁教你的？"

没等盲人开口，有人便对盲人说："先生，贺龙跟你说话哩！"

那盲人听说贺龙问他话，赶紧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抓住了贺龙的手说："胡子，你说是谁编的？这是大伙儿心里的话，还用编么？"

这盲人的一番话，只说的贺龙心头滚起了热血，好英雄，握着盲人之手，说道："我贺龙决不负众望。"

贺龙刚说到这里，只见街里一阵大乱，赶场的人纷纷乱跑，贺龙正要问怎么回事，只见钟慎吾急匆匆地走了过来，见到了贺龙，忙说道："胡子，不好了，国民党军来了。"

贺龙问："多少人？"

钟悟吾道："陈策勋和龙裕仁两部，陈策勋还让士兵打着大旗，上写抓你赏洋五万。"

贺龙说："传我命令，队伍拉到后山。"

贺龙命令一下，工农革命军立时撤到后山上，刚刚布置好，龙裕仁、陈策勋两部就杀到了洪家关。双方立时接了火儿。

工农革命军因刚刚凑到一起，武器七拼八凑，弹药又奇缺，抵挡了一下，渐渐不支。团长钟慎吾中弹身亡。这一仗，工农革命军

大败，人马四散。贺龙、黄鳌带着几百人连夜退到一个叫罗裕的地方。周逸群、贺锦斋也跑散了。罗裕镇大地主刘子维，原与贺龙有旧交，今见贺龙兵败，亦反目为仇。与贺龙刀兵相见。贺龙只得又率人马撤到桑植与鹤峰交界的一个叫苦竹坪的地方。

几天后，周逸群、贺锦斋、王炳南等都来了。这天晚上，贺龙拉着周逸群坐在寨子外竹林之内，叹口气道："真没想到，部队召集的容易，垮的也容易。"

周逸群说："文常，我们想的太简单了，行动也太急，打个比方说，这些未改造的旧军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抓起来容易，手一松就散了，要建立工农革命军，必须依靠苦大仇深的工农子弟为骨干才行。你想想，叶挺铁军团的骨干，不都是共产党么。"

贺龙赞同地说："逸群，你说的对，如今，跟我拖枪的人，什么打算的都有，一遇点挫折，就变了卦。队伍不整顿不行。"

周逸群说："除此以外，在打仗的战术上，我们也要改变，北伐时的那一套，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要改变战术。"

贺龙听了，连连点头。周逸群想想又说："文常，我们在焦山河会议上决定的明年 6 月，湘西部队和洪湖部队会师的计划，从目前情况来看，是实现不了啦，我有个想法，回洪湖去，和洪湖的同志们一起，创立洪湖革命根据地，迎接会师。"

贺龙沉吟不语，周逸群看出贺龙不舍之意，便说："文常，你现在已不是几年前的贺龙了，我走了，你也会干好的。我想，洪湖更需要我。"

贺龙一把拉住周逸群的手说："走吧，这边的工作，我会和同志们商量着干的。"

当晚，在这苦竹坪的一间四面透风的房中，周逸群主持召开了会议，会上决定，周逸群再返洪湖，去那里建立革命力量。

第二天早上，周逸群装扮成一教书先生，骑了头大黑驴，登程上路。贺龙等人，送到数里之外，大家这才洒泪而别。周逸群这么

一走，贺龙真的不是滋味儿，想到自己同周逸群相识以来，周逸群对自己的帮助太大了。真是最知心的良师益友，数年之中，朝夕相处，而今一别，自然难过。贺龙的心情，众人都晓得，少不得安慰他一番。

贺龙率部队退到苦竹坪之后，没多久，黔东李鑫部会同龙裕仁、陈策勋、朱疤子、永顺团防周燮卿（周矮子）一起，向苦竹坪的贺龙部发动攻击。贺龙率部迎战，双方激战两仗，工农革命军都失利了，急急退走，陈策勋等部穷追不舍，革命军站不住脚，一直退到湖北西部恩施、利川一带，这地方离桑植已有七百余里，部队败退之时，沿路之上，又有不少人跑掉，退到利川县境时，仅剩下了一百多人，一百多条枪了。

贺锦斋、黄鳌之死

利川县内有个大集镇子，叫汪家营子。这镇子挺热闹，街上铺面很多，人来人往的，很是热闹。镇子上有个团总，此人姓李名青川，因为长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一瘸一拐的，故此人送外号“铁拐李”。这铁拐李手下有二百多人，一百多条枪。铁拐李可不是个好东西，奸淫掠抢，无恶不做。他又是哥老会的头子，因而，在这方园数十里之内，无人敢惹。李青川在大门口上悬挂着一块匾，上书三个大字“镇八方”，那过往的刀客，来到此地，都得登门拜望。不然，这汪家营子就过不去。

贺龙带着一百多人，化装成大商人，拜见铁拐李，趁机将其杀掉，收缴了其人枪，使工农革命军又扩到三百多人。而后，他又带着这支队伍，从深山峡谷之中，转回到了桑植。这一日，走到了湘鄂交

界的桐柘湾，探听到龙裕仁率部回贵州。贺龙便决定在其必经之处葫芦壳打伏击。这一仗，贺龙人马大胜，龙裕仁的一旅人马，除龙裕仁坐滑竿带少数人逃跑外，全旅几乎被消灭，龙裕仁的参谋长宋二麻子也被俘。打扫战场之时，贺龙吩咐将宋二麻子带上来，亲自审问。那宋二麻子一个劲地冲贺龙磕头，连连求饶说："上有八旬老母。"贺锦斋见此状，信口吟诗嘲笑道：

万弩千弓对寇仇，霎时大半变浮鸥，一人怕死真堪笑，跌跪尘埃只磕头。

工农革命军经过葫芦壳一仗，不仅缴获了许多枪械，而军威又重新振作。这天，贺龙同贺锦斋、黄鳌等人正商议部队的下步行动，有中共石门县委派人前来告急，说石门的游击队在陈家桥遭敌包围，情况甚危。葫芦壳距石门八十里路，贺龙遂率人马急急前往相救。这时候，节气已到了旧历七月，正是阴雨绵绵之时。部队走在路上，一步三滑，十分艰难。到了石门仙阳一带，天可就黑了，加上蒙蒙雨雾，几十米外的东西就看不清了。这地方，距那陈家桥尚有二十多里的路程。工农革命军正行走间，突然前面枪声大作，子弹乱飞，有十几名战士当时便中弹牺牲了。人马哗啦一下便都伏在了地上。贺龙一听枪声，立即下了命令："快撤！"

原来贺龙听出枪声不同一般，知道开枪的部队，不是一般的民团，不是土著军阀，而是国民党的主力队伍，只有这种队伍才能装备上等枪械。如今遇到了这敌人，看情形不是偶然遭遇，而是有准备的打援。所以，他才下了撤退令。就在工农革命军刚要后撤之际，贺龙收编的一支土匪队伍反了水，从后边开枪向工农革命军射击。幸亏当时为雨雾天气，加之天黑。贺龙人马都跑散了。贺龙的身边只剩了一个手枪排，他带着这手枪排向西北角冲去。哎呀呀，只见满山遍野到处是敌人的喊捉贺龙之声。贺龙同手枪排七转八移，总

算突了围。到了天光大亮，贺龙收拾部队，人马损失近半，参谋长黄鳌牺牲。贺龙遂带着部队退到了澧县的泥沙镇。在这里，他为牺牲将士开了追悼会，贺锦斋含泪写诗，悼念战友，那诗写道：

层层铁网逼周围，夜集深山湿战襟，为党为民何惧死？英灵从此入青云。

这天夜里，石门县保安团团长罗效之探得贺龙带部队住泥沙镇，便亲率石门保安团和陈嘉佑的两个营，还有澧县保安团，共一千五百人，连夜杀向泥沙镇，要夜袭泥沙，活捉贺龙。贺龙带着大部队向桑植思茅岭方向转移，由贺锦斋率警卫营断后打阻击。这一仗，贺锦斋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桑植县委对贺锦斋烈士的忠骨重新进行了安葬，在烈士墓前，刻有挽联，那挽联是：

澧水歌霞光早以照大地；浪淘沙革命巨浪比天高。

罗效之在泥沙镇打死贺锦斋的消息很快报到了长沙和南京。那两地的报纸都在显赫的位置上登了消息：

共产党的虎将贺锦斋击毙于泥沙……湘西一龙一虎，虎死泥沙，龙入浅滩……

时国民党反动派知道贺龙势孤力单，立即调兵遣将，加紧对工农革命军进行“围剿”，欲将工农革命军一网打尽。这万余虎狼之兵，将桑植各路口关卡，统统封锁，不准百姓通行，妄想把工农革命军困在荒山野岭之内，冻饿而死，不战自亡。

这时候，工农革命军被挤进了湘鄂西边界大山之内。

锁龙洞里“锁”贺龙

湘鄂西边界的农民，本来就饥寒交迫，大山中的农民，更是缺衣少食，哪里还有粮米供工农革命军食用？而深山中村寨，又少土豪，革命军给养无着，贺龙只好带领部队，进入了深山老林，寻找站脚之地。这时节，时值隆冬，朔风吹，雪花飘，部队少粮，只好野菜充饥。没有穿的，只好用茅草结衣御寒。这时节，部队除逃走的、打散的、掉队的，剩下的仅有二百多人了。这二百多人随贺龙在山里转，有时一连十几天吃不上盐巴，吃的是树皮草根，最好的是苞谷糊糊。好多人都得了“鸡蒙眼”，也就是夜盲眼。大山中村寨少，只好住在山洞之中，或露天宿营。那日子实在艰难。

这天，贺龙带部队来到了锁龙山，这锁龙山上有个锁龙洞，这洞四外都是高大的树木、竹丛篙草。洞子很大，二百多人进去，依然空荡荡的。进洞之后，天也就完全黑了。大家点上了松明火把，看了看没有野兽，就寻了些野草，胡乱躺下。由于日夜战斗，爬山越岭，食不饱肚，衣不遮寒，一个个身体十分虚弱，满洞内尽是咳喘之声。贺龙躺在这冰冷的山洞之内，脑子里浮起回湘西后一幕幕事。自年初到洪家关，已近十个月了。十个月中，拉队伍三起三落，黄鳌、贺锦斋、钟慎吾等等许多好战友相继牺牲，虽说也打了胜仗，但终是败仗多，而今被敌兵撵进这深山老林，要吃没吃要喝没喝，风餐露宿。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周逸群走时说要建立以贫苦农民为骨干的队伍，如何组建，自己以前从未搞过，而周逸群又不在。他想着，心中烦闷，便起身来到外边，站在了一株参天松树之下，望着满天眨眼寒星，顿觉嗖嗖冷风钻肉。贺龙不由想起放哨的哨兵，此时一定很冷，便朝哨位走去。到了哨位，他左看右看，不见人影，仔细看时，只见一棵树上，挂着一支枪，哨兵却不见了。贺龙此时心中明

白，那哨兵是受不了苦，放下枪逃走了。贺龙把枪拿起，心中真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因为这些时日，几乎天天有人逃跑。贺龙心中正翻腾的时候，猛听得那锁龙洞内，“叭叭”两声枪响，紧接着，就有几个人从洞内跑了出来，枪声响后，洞里也就一阵大乱。贺龙也不知出了何事，有几个人跑到了贺龙身边。贺龙认出了那跑过来的为首之人，便高喊了一声：“吴云清，跑什么？”

贺龙的话音儿还没落，那吴云清抬手就朝贺龙开了一枪，贺龙把头一偏，子弹擦耳根儿飞过。这时候，从洞里又跑来了一群人，把吴云清和那几个人都抓住了。贺龙借着火光一看，这几个人，都是从桑植跟他出来的。那几个人见贺龙目光盯着他们，都吓坏了。吴云清的裤子都尿了。扑通扑通都给贺龙跪下了。贺龙说：“都起来。”

那几个人谁也没起来，继续跪在那里。事到此时，贺龙已明白这些人下跪不起的原由了。便说道：“我待你们怎么样？”

几个人一起说：“军长待我们恩同父母。”

贺龙又问道：“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要害我？”

一个叫朱炳章的说道：“这……报军长，我们从桑植出来，原想是跟军长发财的，没想到跟了军长十个月，许多兄弟打没了，打来打去，打到了这深山老林之中，要吃没吃，要喝没喝。”朱炳章说到这里，一指吴云清说：“吴云清出的谋，说干掉军长，大家发财。我们就合计好了，趁军长睡下后，打军长的黑枪。吴云清说这里是锁龙洞，军长犯了地名，正好动手。没想到被王炳南发现……”朱炳章说到这儿时，连连磕头说：“望军长刀下留情。”

没等贺龙吭声，王炳南抽出枪，朝吴云清开了火。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王炳南枪响的一刹间，贺龙将他胳膊抬起，那子弹飞空。贺龙问道：“炳南，你要做甚？”

王炳南怒道：“我要毙了他们。”

周围战士们见吴云清等要暗害贺龙，也都火冒三丈，怒喊道：“打死狗日的！”

贺龙大喊一声："都住口。"见众人不言声了，英雄说道："他们跟我出来，原本是想发财的，可我却把他们带到了这深山老林，吃苦受罪，他们不懂为甚吃苦，埋怨自己跟我上了当，想打死我发财，这不怪他们。"说到这儿，贺龙对吴云清等人说："你们都走吧，我贺龙不怪罪你们，你们跟了我几个月，按说，该给你们点钱财，可怜，我贺龙身上连一个铜板也没有了，枪，你们带着，留做路上防身之用。回去之后，务要学好，什么时候想回，我贺龙欢迎。"

贺龙话到这儿时，吴云清等几个人都哭了。这哭声是从心底发出的。吴云清哭道："军长啊，是我们无知，一念之差，几乎害了军长性命。我，我们不回了，死也要跟着军长去死。"

吴云清说完，那几个人坚决地表示不走。贺龙扶起这些人说："你们离家十个月了，家中妻儿老小都惦记着你们，还是回去看看吧。待我贺龙时来运转，率队伍打回桑植之时，你们再找我。"贺龙又对吴云清说："你回桑植后，见到我姐姐，就说我这里一切都好，叫姐姐放心。"

吴云清等人见贺龙一定要他们回去，便再次给贺龙磕了头，而后，含泪下了山。

吴云清等人走后，贺龙又对其余人说："同志们，现在敌人把我们团团围住，又时值隆冬，我们缺衣少食，难以行动，看来这个冬天内，吃野要吃定了，若有愿意离开我的，自愿离去，愿意留的，准备同我继续吃苦。"

贺龙这么一说，大家都表示要跟贺龙同甘共苦。也有一些人，耐不住这艰苦的生活，离开了这支队伍。几天之后，这工农革命军仅剩下了九十二名成员，长短七十二条枪。这支工农革命军，看来人是少了，可这九十二人，一个个都是真心实意地跟贺龙干革命的，一能挡十，十能挡百。到后来，都成了湘鄂西红军的骨干，起到了酵母作用。

工农革命军一番整顿之后，随即离开了锁龙洞，又转移到了一

个新的地方，这地方叫猫耳台，更是山高谷险，林密草深。四外几乎没有人烟。在一石洞旁，部队停了下来，大家扯些茅草御寒，寻些野菜充饥。

就在这天夜里，工农革命军中的十四名共产党员，召开了会议。最后，一致同意由卢冬生下山，寻找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

第二天一早，卢冬生便出发了。临走之时，贺龙把一双草鞋和二十块光洋交到他的手中。卢冬生看着贺龙那吃野菜吃得发灰的脸色，说道："军长，这草鞋我带着，这钱，留下吧，你们更需要。"随及，卢冬生转身大步向山下走去。

贺龙带着这九十名兵将，在深山之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那份苦楚，没法儿细说。一连两个月，大家吃野菜、蕨根儿，没有盐，一个个只觉得浑身发软，四肢无力。贺龙想将部队往山外运动，可大雪纷飞，朔风凛烈，大家破衣露肉，哪里能动？只好等待春暖花开。

这天，天气晴朗。贺龙同几名战士正在套山鸡，一抬眼，只见远远的山谷之中，走来一支马队，有七八匹马、十来个人。贺龙心说，部队转移的地点，只有卢冬生知道，难道他叛变投敌了？"立时，贺龙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一来他知卢冬生是经过考验的，纵然粉身碎骨，也不会投敌，二来若是敌兵"围剿"，不会只十来个人，这时，其它同志也都发现了这个情况，贺龙要大家找地方隐蔽起来，观察山谷中一行人的动静。那队人马渐渐临近。突然，贺龙喊了一声："大姐来了。"

王炳南等人也几乎同时喊出："大姐来了！"大家喊着，一起迎了过去。

来人正是贺英贺香姑。这贺英亲自带着人马，给贺龙的队伍送棉衣银元来了。贺英怎么知道贺龙在这深山之中？原来，卢冬生走出敌人包围圈后，他想到贺龙等在这严寒冬节，缺衣少粮，纵然找到党组织，党组织也无可奈何，莫不如先到鱼鳞寨，把这情况告诉大姐贺英，请香大姐帮忙，解贺龙燃眉之急。于是，卢冬生便又到了

鱼鳞寨，把贺龙的处境向贺香姑诉说了一遍，随后，这才奔常德，去找湘鄂西特委组织。贺英接到了卢冬生的报告后，便将平时积蓄的银元，棉衣，装了几驮子，顺着山谷小路，来寻找贺龙。

贺龙同姐姐相见，见姐姐送来了银元、布匹、子弹，革命军此时有了这些东西，真似雪中送炭，真打心眼儿里感激姐姐。贺英打量着贺龙和战士们，看见一个个面黄饥瘦，忍不住鼻子发酸。可眼里的泪花儿却没落下，而是笑道："常常，你看你这条龙，如今成了猴王啦。"她一指战士们："带着这群猴子兵，如何打仗？"

贺龙笑道："大姐，你可别小看这群猴子兵，这些猴子兵都是猴儿精，若拉出山，能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千变万，变成千千万万猴子兵。"贺龙又说："大姐，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呢？"

贺英便把卢冬生去了鱼鳞寨的情况说了一遍。当下，战士们卸下了贺英送的银元、子弹和布匹。香大姐雪中送炭，使得战士们都心头发热。

贺龙便把部队失利的情况向贺英叙述了一番。贺英问道："常常，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贺龙说："姐姐，我回湘西转眼就一年了，拉起的队伍几起几落，眼下，天寒地冻，缺吃少衣，这都好办，最大的难处，是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心里没了底儿。卢冬生转眼走了快一个月了，也不知他能不能与党组织接上头儿。"

贺英说："常常，过去人家跟你为的是升官发财，如今人家跟你流血卖命，图的是甚？你总要有个东西把人家的心拴住才行啊。"

贺龙说："大姐，我跟上了共产党，为穷苦人流血卖命，才抛掉了荣华富贵、厚禄高官。"

贺英说："对呀，你要把这些道理告诉大家。你和周逸群都给我讲过，队伍里有了 CP、CY(CP、CY 是共产党和共青团外文的缩写——作者注)，队伍就有了骨架儿，你现在这队伍里有多少 CP、CY？又怎么样才使他们当队伍的骨架儿？"

贺龙"唉"了一声说："只怪我入党时间太晚了，对共产党掩军队这一套办法还没弄熟。要是周逸群在就好了。"

贺英说："不熟，你就摸索着来，总不会出大格的吧。"

贺龙说："姐姐，我一定这么做。"

贺英走后，贺龙便将党员都安排到班排连内，成立了党支部，他自己任支部书记。要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转眼春雷响动，冰消雪融，草木发青。这一日清晨，卢冬生回来了，贺龙见了，一下攥住卢冬生的双臂，一时不知说甚是好了。他仔细地打量着卢冬生，只见卢冬生瘦的只剩两只大眼了。贺龙急不可奈地说："冬生，找到党组织了吗？"

这时，王炳南端来一碗热水，卢冬生喝下之后，便把自己下山后的经过简短地说了一遍。说到激动之时，卢冬生竟眉飞色舞。之后，他撕开了衣角，从中取出了一封信。

信是周逸群写给贺龙的，信中介绍了洪湖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传达了半年前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信中还讲了如何建立根据地，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分配土地等指示。

贺龙让卢冬生将信一连念了多遍。随后，卢冬生又把他知道的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形说了一遍。贺龙听了，点头说道："对呀，朱毛做得对，仙鹤还有个滩头，干革命就是要有个山头。"

随及，贺龙召开了党员大会，会上传达了"六大"的精神和特委的指示，吸收了一部分同志入党，研究了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针。按照特委的指示，工农革命军避开敌人主要力量，到敌人势力较弱的鄂西利川、宣恩、恩施一带活动，会合鄂西游击队，发展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给贺龙的指示信

贺龙等九十余人，在深山老林之中，一冬没有露面，朱疤子、罗效子、周矮子一伙人都以为他们冻饿而死，喂了虎狼，“围剿”也就放松了，一个个立功的立功，请赏的请赏，只道完事大吉了。这当儿，贺龙率领经过整顿的九十余人的工农革命军骨中，直奔鄂西。

鄂西就是湖北的西部，有鹤峰、五峰、建始、宣恩、来凤诸县。与四川、贵州、湖南交界。这些地方，是山连山，川连川，山高林密。老百姓生活十分穷苦。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穷人的残酷压迫，更为厉害。这地方的神兵特别多。神兵就是带有迷信色彩的武装。鄂西有名的神兵头子有王大菩萨王锡九，邬阳关神兵头子陈宗瑜，黑洞神兵头子杨大瞎子。在这诸多的神兵之中，也有一支队伍，老百姓也管他们叫神兵。这支队伍的穿戴打扮，什么样的都有，有穿长袍的，有穿马褂的，有戴瓜皮帽的，有戴礼帽的，有穿布鞋的，有穿草鞋的，有用枪的，有拿刀的。这支队伍共有三百多人，领头的姓陈，叫陈协平。陈协平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原在长沙搞工会，马日事变后，回到了家乡恩施县，拉起了这支游击队，活跃在这崇山峻岭之中，壮大着革命力量，湘鄂西特委指示贺龙到鄂西便是同这支队伍会合。

贺龙带着部队行动之后，首先解决了鄂西东山仙人宫大土匪王拔萃。王拔萃是鄂西一带有名的大土匪，手下有三百来条枪，自称司令，盘距在仙人宫中，勾结官府，无恶不做，仙人宫周围的三个县，鹤峰、宣恩、恩施三县的县长，保安团团长，均和他是磕头换帖的兄弟。

解决了王拔萃群匪后，贺龙又带工农革命军，直奔鹤峰，连夜杀死国民党鹤峰县长韩利流，解放了鹤峰县城。老百姓听说贺龙部

队来了，纷纷投奔，很快扩大到五百多人。随后，贺龙打听陈协平游击队的下落，才知这支队伍在两个月前，因叛徒出卖，已被敌兵打散，陈协平也不知到了哪里。

贺龙率革命军解放了鹤峰县城，打了城中土豪，杀了恶霸，打开监狱，放出了关押的穷苦百姓。自此，军威重振。

鹤峰县内，有个邬阳关，邬阳关地处建始、巴东、鹤峰三县交界之处。是巴东、建施通往鹤峰的重要门户。这邬阳关上，有一支神兵，三百多人，领头的父子俩，父亲陈振元，儿子陈宗瑜。这队伍每当打仗之时，人人吞朱砂，喝符水，念咒语。这陈氏父子，效仿水泊梁山好汉，在邬阳关上树了面大旗，上写"替天行道"四个大字，专门打富济贫，因此，还很受老百姓的拥护，由于邬阳关地势险要，官府也奈何他们不得。

陈振元，号海生，四十多岁，曾念过多年私塾，清末府试时未中，便在家教书，农忙时务农。他练得一手好枪法，为人正直，行侠仗义，专抱打不平。长吟"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问众乡亲，可有不平事"。凡遇乡亲中有不平之事，便拍案而起，拔刀相助。陈振元妻子陈玉兰，是猎户家子女，也是枪法精通，胆识过人。

贺龙收编了陈家父子的神兵，随后，他率领着人马，杀向五峰，打垮了五峰县大土匪孙峻峰，得了一大批枪支弹药，粮草钱币。回到鹤峰，他把队伍进行了整编，共分为三个大队，1 大队队长王炳南、2 大队队长卢冬生、3 大队队长陈宗瑜、参谋长陈振元。1929 年 2 月 17 日，宣告了鹤峰县苏维埃成立，召开了庆祝大会，上千名贫苦百姓参加，汪毅夫、陈宗瑜、吴天锡等七人当选为工农兵代表。吴天锡为县苏维埃主席。此后不久，陈协平也带着被打散的数十名游击队员到鹤峰与贺龙会合。贺龙探听到敌人将集重兵向鹤峰进攻，便将队伍拉到了桑植。在罗峪，一举消灭了刘子维部，随后，到了银杏坪、梅子岩、杜家村一带。自此，部队便进行了认真的整编。整编之中，由卢冬生介绍了洪湖地区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情况，介绍了

朱德、毛泽东井冈山斗争的情况，由贺龙传达了半年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红军、建设根据地、分配土地等指示。批判了部队中的拖队思想，军阀作风，发展了党团组织，建立了士兵委员会，成立了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李良耀、张一鸣、汪毅夫、罗统一、陈协平、杨维藩七人为委员，贺龙任前委书记。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工农革命军自此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恽代英虽有任命，并没有到职。将原工农革命军的大队和中队编成团营，王炳南任第1路指挥，张一鸣任党代表，下辖1、4两个团：1团团长贺桂如，党代表龙在前；4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徐锡如。军部警卫营营长廖卓然。此时，全军共六百多人，三百多条枪。整编至1929年3月8日结束。这次整编，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扩大了军队内部的民主，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军心振奋。

之后，贺龙便率兵袭击了桑植县城，桑植保安团团长陈策勋万没想到贺龙的兵马又出现在桑植，不及还手，就丢兵损将的逃跑了。贺龙占了桑植后，宣布成立桑植苏维埃政权。

这时节，湘西王陈渠珍派向子云率一旅之众前往攻打桑植。

贺龙闻知，淡淡一笑，自语道："向子云，他来的正好。省得老子去找他。"说着，来到了街上，又信步出城，不觉到了五里外的赤溪河边。赤溪河乃桑植境内的第二条大河，河水又急又深。当地老百姓有句俗话："放排只怕烂岩壳，摆渡只怕赤溪河"，向子云攻打桑植城，赤溪河乃是必经之地。

贺龙围着赤溪河转了一圈，回到军部，便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一开，大家就议论开了，议论甚？议论这仗如何打。敌人三千多，一色的新枪新炮，而红军只有一千多，武器又旧，这仗如何打得赢？贺龙见大家面有难色，便平静地说道："大家不要焦急，我看这仗能打赢，为甚？原因有三，第一，别看我们只有一千人，而敌三千人，我们一人能抵敌三人，我们红4军，今非昔比，共产党员已经起到了

骨干力量作用；第二，我们现在有县苏维埃政权，有老百姓支持我们；第三呢，就是这个仗如何打。”接着，贺龙便把他的打算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大家听了，无不拍手叫好。会议之后，便各自依贺龙之计而行。

时向子云以其弟向子捷为先锋，人马向桑植杀去。当向子捷率先锋团到达赤溪河的时候，发现渡河的船只均在西岸，河边无兵把守。向子捷愣在那里，不敢前进。两个时辰后，向子云的大部队赶到河边。向子云见其弟令部队停在河边不前，问道："为甚么不过河？"

向子捷说："据侦探兵报告，说桑植的红军都跑了，还跑了许多老百姓，我疑其中有诈。"

向子云坐在马上，半天默然不语，忽然，他说："把侦探兵叫来。"

工夫不大，侦探兵来了，向子云问："贺龙兵马为什么都跑了？"

侦探兵说："听老百姓讲，红军只有六七百人，武器是鸟枪土炮，一听说旅长带大队人马，还有洋枪洋炮，都吓跑了。"

向子云把脸一沉说："都是实话吗？"

侦探兵说："小的若有半句假话旅长可杀我头。"

向子云手捏下颏没有吭气。向子云不信侦探兵的话吗？半信半疑。向子云虽然骄横，可他真的跟贺龙交手，还是动了脑筋的。向子云暗问自己："难道红军真的被吓跑了不成？"正在这时，有人报告，说桑植士绅张老六要见向旅长。张老六是谁？张老六是桑植县头号大恶霸，贺龙一进桑植时，就把他抓了起来，关进了大牢。张老六怎么跑出了呢？原来，桑植城的老百姓和红军往外一撤，被关押的土豪恶霸也都随着往外撤。押张老六的是个小伙子。走到城外，张老六看来来往往的人慌慌的撤退，又听说向子云的兵马要来，张老六十分高兴，他瞅了个冷子，跑到了路边树丛之中，押他的那个战士见他跑了，"砰砰"地打了两枪。直把个张老六吓了个脸皮儿

黄，连尿都出来了，不过那子弹只从他耳边飞过了。他只听那战士喊“抓张老六哇！”这一喊，吓得张老六腿哆嗦的差点儿迈不开步了。这时候，他又听到有人喊：“柱子，别追了，快走吧，贺军长带队伍早跑远啦，向子云的大队人马来了，晚了就走不成了！”

那个战士答着话跑了。这么着，张老六才连滚带爬地到了赤溪河边儿。向子云听了张老六的话，一跺脚说：“运转时气来，一定要发财，我向子云的时气到了。”说着，命令全旅部队渡过赤溪河，直奔桑植。到了桑植，果见城中四门大开，不见红军的影子。那些兵丁立即捶门打户，准备开铺造饭，向子云对部下说：“派快马飞报陈师长，就说我向子云已占了桑植，不日即擒贺龙。”

向子云刚说到这里，忽见桑植城外山头上飘扬着一面红旗。原来，桑植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势险要。红旗便飘扬在最高山头上。红旗一现，有人指给了向子云，向子云举起望远镜正瞅时，突见桑植周围的山上，号炮齐鸣，枪声大作。有数不尽的人马杀下山来，直扑城中心。向子云知中了空城计，急令人马后撤，时只有西门没有红军，向子云的败兵如流水般从西门涌出，慌张张地向西逃去。向部兵丁跑到赤溪河边时，但见河水汹涌奔腾。这时，贺龙兵马又紧追不舍。向部兵丁，只好纷纷跳入河内，这时候，向子云也骑马来到了河边，他的弟弟向子捷大呼道：“哥哥，快下河吧，贺龙追来了！”

向子云抓着马尾巴，跳入了河内，就在这时，河面水位突然高涨，原来上游刚刚下了大雨，山洪下泄，使得河水水位高涨。向子云游到河中间时，一个浪头卷来，向子云被卷入了河中，随后，冒了冒脑袋，就喂王八去了。

这一仗，是贺龙 1928 年 2 月回湘鄂西后，取得最大的一次胜利。缴获的枪支弹药无数。这一仗，震动了湘鄂西。一时间，军威大振，桑植周围各县的土豪劣绅，纷纷逃窜，一些土著武装，也来归顺。至此，红四军又扩大到三千来人。

这天清晨贺龙刚刚起身，有勤务兵报告，说一百姓要见贺龙，贺龙说："请他进来。"

勤务兵答应着走了。工夫不大，带进一个苗族打扮的人，这人有三十多岁，青布盘头。虽然衣服破烂，那一双眼睛里，却透着英气。那人一见贺龙，上前施礼道："军长一向可好。"

贺龙再定睛一看，立即握住来人之手笑道："鸣先，是你。哎呀，真没想到。"

刘鸣先说："军长，我找你们可找苦了，先到了鹤峰，又到了宣恩，得知军长到了桑植，又连夜赶到桑植。"

刘鸣先原是叶挺的副官长。大革命时，便与贺龙认识。他此次做为中央联络员，到湘西向红4军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的。刘鸣先撕开内衣，从中取出了一封信，交给了贺龙。

刘鸣先交给贺龙的信，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给前委和贺龙写的。信中表扬了湘鄂西前委领导下的红军的英勇斗争，并就政治形势，游击战争，党群组织和今后行动方针问题，做了明确的指示。那信中写道：

> 去年年底冬生同志到来，得到了你们的报告，当即进行了研究，并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我党总的政治路线，目前的革命形势以及游击战争主要任务告诉你们。信由卢冬生带去。兹后，又得你们的报告，得悉你们不畏苦难，带领同志及士兵忍饥耐寒地作了英勇的斗争。你们发动了群众，夺取了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消灭了许多反动民团、土匪，这些都是对的，不过游击战争最重要的是要有组织，要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过去各处的游击战争，发生过一些不好的倾向，第一是脱离群众，使群众完全不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是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第二是毁灭城市及大烧、大杀、大抢的倾向。这种倾

向，是妨害党在一般群众中甚至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和发展的。我们在党内必须极力肃清这种不正确的观念。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削弱反动派的力量及建立红军。我们游击队势力所达到的区域，自然必须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群众的组织，推动并帮助群众的斗争，扩大我们的宣传。

周恩来的指示信中，还介绍了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上总结的建军经验，要求前委参考，信中说：

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的，每连建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个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的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

关于红军发展方向，鄂西、湘西发展区域，究竟以何处为最好？原则上说，游击战争的发展，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更为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组织有相当的基础的地方，以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

贺龙接到了党中央的指示，欣喜异常，当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能落实的便认真落实。又根据中央指示的有关精神，对红 4 军再次进行了整顿。整顿之后，红 4 军便成了两路纵队，第 1 路指挥王炳南，下辖 5 个团，第 1 团团长贺贵如、党代表龙在前，第 2 团团长文南甫、党代表吴协平，第 3 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谭秉苏，第 4 团团长伍琴甫，补充团团长胡海云。第 2 路指挥卢冬生，下辖 2 个团，第 5 团团长覃伯勋，第 6 团团长吴成虎，另外，还有补充旅旅长谷志龙、党代表汪毅夫。

为了拔除桑植周围的团防据点，巩固扩大苏区，贺龙在红 4 军整编之后，率主力向大庸和慈利推进。首战击破大庸团防土酋熊相熙部，继而又进击慈利，夺取商业要地江垭，红 4 军所到之处，百姓争先相迎。军中宣传人员，以标语、布告、讲演等形势，开展了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的宣传。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红军。经过两个月的游击战斗，又回转桑植进行了休整。

湘西王陈渠珍，是个遇硬便缩回的人，赤溪河向子云大败身亡，陈渠珍便不再伸头攻打红军，目的不过是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他派了副师长曾从吾，率第 1 旅旅长陈斗南进驻永顺，陈渠珍叮嘱曾从吾，不许与贺龙部交锋，一切以保存实力为上乘。而陈策勋、朱疤子、罗效子、周矮子这些家伙同陈渠珍不一样，他们不服从陈渠珍的命令，坚决与贺龙为敌。陈策勋逃到了慈利后，便以桑、鹤剿匪司令的名义给何键发了电报，要何键发兵，攻打贺龙，并自告奋勇，愿为前驱。何键接到陈策勋的电报，便令驻常德的国民党第 52 军军长吴尚派兵前往"围剿"。吴尚接到何键电令，便派了旅长阎仲儒率其旅会同湘西各团防，"进剿"红 4 军。1929 年 9 月中旬，陈策勋联络了湘西反动杂牌军徐小桐、邢聋子、陈斗南、罗效子、朱疤子、周矮子等部，自大庸、慈利、永顺方向一起向桑植攻来，阎仲儒部亦紧紧跟随。

贺龙接到了敌情报告，立即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避敌锋芒，转移到湘鄂交界处的来凤、龙山一带，伺机歼灭敌军。

当即，由伍琴甫的第 5 团为前部，向来凤、龙山一带进军。孰料伍琴甫暗中反水，勾给周矮子等，于八大公山割耳台伏击了红 4 军。结果红 4 军大败，损失惨重。一直退到了鹤峰的红岩坪，才站定脚。贺龙查点人马死伤达五百余人。数日后，贺龙又率队直取鹤峰——鹤峰城在贺龙率部撤到桑植后，走马坪南关总公所所长王文轩，联合了五峰县团防头子孙俊峰、来凤县团防头子覃国达，进犯了鹤峰，王文轩自封为县长。

在野鸡沟，红 4 军打败了王文轩人马，于鹤峰县第二次成立苏维埃政府。随及招兵买马，贺龙又下令成立了第 5 路纵队，由陈振元为 5 路纵队指挥，刘治武任党代表，下辖三个团，约八百人。

红 4 军在鹤峰建立政权后，前委又决定向五峰、长阳、松滋、澧县、公安一带进发，开辟苏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不一日，红军到了五峰。五峰团防头子孙俊峰率民团仓促迎战，双方战斗不到两个时辰，孙部即跨。孙俊峰落荒而逃。接着，贺龙又率人马克长阳，长阳伪县长仓皇逃命。而后，贺龙再催人马，又一举攻占了松滋、石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鹤峰为中心的，包括五峰、长阳、松滋、石门等苏区在内的湘鄂边苏区。贺龙一方面扩大红军队伍，一方面建立苏维埃政权。妇女、儿童等等组织，也都相继成立。一时间，湘鄂边苏区搞得轰轰烈烈。

转眼间，又爆竹除旧，桃符更新，春风送暖，桃李芬芳。时间到了 1930 年 2 月。这一日，贺龙刚由练兵场上回到屋中，正在歇息吸烟之时，有勤务兵报告，说一人从洪湖面来，要见军长。贺龙听说从洪湖来的人，立即起身相迎。

第十四章　洪湖奠基人

火龙将军——段德昌

贺龙出门一看，见来人三十上下，五短身材，黑眉亮目，面孔清瘦，却十分精神，一副乡下人打扮。那人见到贺龙，也不答话，而是笑挽贺之手，走进屋中。进屋之后，那人反客为主，吩咐勤务员沏茶。也不通报姓名，直搞得贺龙莫名其妙，英雄忍不住问道："贵客尊姓大名？"

那人喝了口茶水，这才从贴身衣袋之内取出一信，贺龙接过信，不看尤可，英雄看罢，把信纸一扔，伸出双臂，将来人紧紧抓住。高兴地说："党代表，可把我想死了。"

此人就是红4军党代表万涛。虽然中共中央军委继恽代英后，

任命万涛为红4军党代表，只因万涛另有任务，一时不能脱身，所以来迟。

当下，贺龙紧紧握住万涛的双手，把万涛上上下下的一番打量。说道："万涛，咱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

万涛笑道："至少有十五年了。"

原来，万涛同贺龙是老相识。其为川东黔江人，当年贺龙赶马时，万涛是黔江城中万家车马歇铺的小伙计。贺龙在这店中住过多次。因此二人相识。后来，万涛参加了革命，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重庆、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时为中共湘鄂西特委委员。

贺龙与万涛相见，老友相逢，分外高兴。万涛说："文常，你们的工作搞得很好哇。"

贺龙吸着烟说："有许多工作，都是摸索，学着井冈山朱、毛的办法，只是学不好。听说周逸群在洪湖搞得不错，我正要派人去学呢。"

万涛也吸着烟说："是搞得不错。鄂西区刚刚召开了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特委也做出了决定，要红4军东进洪湖与红6军会师。"

贺龙听到这里，高兴地说："红6军成立了？"

万涛说："今年6月份正式成立的。洪湖现在真的一片红啦。"

贺龙鼓掌笑道："好，太好啦，万涛，你先歇息一下，回头我把连以上干部集合起来，你这党代表也和大家见见面，再把洪湖、井冈山、乃至全国的革命形势给大家讲讲，让红4军的将士们知道，我们红军队伍，越来越大，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赴洪湖与6军会师。"

接着，万涛把洪湖情况说了一遍。

周逸群自苦竹坪同贺龙分手之后，骑了一头大黑驴，装做教书先生，一步步向洪湖走去。这一日，到了石首县境，他打算找肖仁

鹄、滕树云等人。找了一番，哪里还有这些人的影子？到了石首城中，但见街头巷尾，都贴着“消灭赤匪”的标语。大烟馆、妓女院出出入入的，不是民团就是国民党兵。周逸群不敢久停，走出石首县城，抬眼一看，只见城门楼上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共匪肖仁鹄处以死刑。”周逸群看罢，赶紧离开。将黑驴卖掉，来到了沙市，打算找鄂西特委机关。刚到了街上，只见几辆汽车开了过来，头边的汽车上，有几个兵丁吹着洋号，打着铜鼓，嘀嘀嗒，嗒嗒嘀的开路，第二辆车是架着枪的几队兵丁，第三辆车上押着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五花大绑，每人背上都插着一块死囚牌。上面写着“鄂西共匪”字样，由于车很快过去，周逸群没看清名字。在这刑车的后面，是一队荷枪实弹的兵丁。这三名受刑之人，在刑车之上，大骂蒋介石，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这三名共产党员，周逸群并不认识，可他知道是自己的同志，落入了虎口，他心中不由得一阵难过。情不自禁地尾随刑车，来到了法场。当周逸群赶到法场时，三名共产党员已英勇就义。鲜血把草地染红。周逸群默默地向烈士致哀，面后转身离开。他刚走不远，忽见一棵大树上贴着布告，过去一看，只见那布告上写道：

> 鄂西共匪头子张计绪、曹壮飞，于今春煽动工人暴乱，被一网打尽，另两名匪首万涛、李兆龙潜逃，有知其下落者，通知本会，赏洋五百，捉拿扭送者，赏洋一千，知情不报者，杀！窝藏罪犯者，杀！

周逸群看罢布告，心中说：“万涛、李兆龙还在，若找到他们，湘西特委和石首县委的情况都能知道，可到哪里去找他呢？”他想了想，决定到焦河镇，寻找那里的一个关系。主意一定，便向焦河镇走去。到了一个叫调关的地方，在这里，他遇见了团丁的搜查。从团丁谈话口中，得知长江北有共产党游击队活动，便决定去江北。

第二天，他到了长江大堤上，见盘查甚严，周逸群凭着斯文的派头，很痛快地过了岗哨。又走了一天，到了下车湾。在村口，见柳树上挂着几具尸体，周逸群明白，准是自己的同志遭到杀害。他没进村子，而是顺着堤埝，直奔反嘴。那里群众好，说不定有自己的同志。走着走着，天可就黑了，偏又到旷野之中，前无村，后无店。仔细一看，见湖岸边有一个用芦草搭的小草棚。草棚四周是芦苇。看样是渔民临时住的地方。正这时，忽听到一阵低沉的渔鼓调顺风飘来，虽然唱渔鼓调的人把声音压低，可周逸群还是听得很清楚。他屏住了气，听了下去，渔鼓调唱的是骂国民党的词儿。

周逸群听了，知道唱渔鼓的定是自己人，便甩开大步，朝那草棚走去。周逸群的脚声，惊动了草棚中之人，只见一个大汉闪在草棚一旁，朝周逸群厉声问道："什么人？"

周逸群平和地说："我是走路的，错过了宿头，也迷了方向。"

那大汉见只有周逸群一个人，警惕之心放松了。这时，周逸群走到了那大汉身边，借着草棚的蛤蟆油灯火，突然惊喜地说："贺闯，你怎么在这里？"

这人正是洪湖红五子之一贺闯贺麻子。贺闯也看出了眼前之人是周逸群，一把拉住周逸群的手说："逸群，你，你怎么来到了这里？"说着拉周逸群进了草棚，周逸群就把同贺龙回湘西，贺龙留下继续拉队伍，自己回洪湖，打算同洪湖同志们一起拉队伍的计划简单地说了一遍。随后，他向贺闯问起洪湖的情况。贺闯未曾开口，浓眉双挑，咬牙切齿地说："自从焦山河会后，你和贺龙去了湘西。日子不长湖北清乡督办胡宗铎、会办陶钧、湘鄂西剿区司令夏斗寅，调遣陶钧的第18军到洪湖清剿，游击队里偏又出现了分裂，肖仁鹄要个人英雄，将1大队拉走，在桐梓湖边，中了敌人的埋伏，队伍打垮，肖仁鹄被敌生俘，后处死。2大队长刘绍南在白庙开会时被叛徒出卖，被敌人杀害在戴家场。监利县委书记邓赤中在土地沟牺牲。3大队在小河口与敌遭遇，也损失很大。滕树云牺牲了，李兆

龙逃了出来。”

周逸群急忙问道：“李兆龙现在哪里？”

贺闯说：“李兆龙逃出重围后，到了沙市，在沙市找到了鄂西特委，鄂西特委正组织工人暴动，他也参加了。暴动还没开始，又遭叛徒出卖，几个负责人被抓，李兆龙连夜跑了回来，碰到了刘革非，昨天，他们俩又遇见了我。”

周逸群忙问：“李兆龙和刘革非呢？”

贺闯说：“我安排他俩去找段德昌了。”贺闯又问：“段德昌你知道吧？”

周逸群没有回答，而是急着反问：“段德昌在哪里？”

贺闯又给周逸群倒了杯水，把段德昌的情况说了一遍。

段德昌，湖南南县九都镇人，1904 年出生于一贫寒人家。自幼聪颖过人，少年时便愤慨社会，立救国之志。1925 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进黄埔四期学习。后又进入李富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讲习班学习。毕业时，正值北伐开始，段德昌初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 2 军的一个营长，继而为 6 军 5 团党代表，又为 35 军政治部主任。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 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紧接着，汪精卫于 7 月 15 日公开反对共产党，这时，周恩来秘密到汉口，布置南昌暴动事宜，段德昌被周恩来派到洪湖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段德昌与彭德怀交往甚密，国共两党北伐时期，段德昌在湘军第 1 师政治部工作，常随彭德怀领导的第 1 团行动。1926 年 9 月，第 1 团奉命围困武昌城南门，在围城之日，段德昌常和彭德怀在护城河边观望敌情。一天，二人走到吊桥旁的一株大柳树下，突然有十几名敌兵从城中冲出，包围了彭、段二人，二人面对群敌，无有惧色。分别从敌人手中夺过长短兵器，抖神威与敌肉搏。二人沉着冷静，背靠背，与敌周旋，但见寒光交错，兵刃相磕，直到警卫排赶到，方得脱险。自此以后，彭、段二人，情感愈密。

武昌克后，彭德怀部在汉阳驻数日，即经孝感往当阳行进。这时候，吴佩孚残部急惶惶由宜昌经玉泉山向北逃窜，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周磐，令彭德怀率部追赶，进占玉泉山，截击溃逃之敌，段德昌亦同往。玉泉山就是《三国演义》书中所写关云长显圣之处。山上筑有关帝庙，到处是苍松古柏，流水清泉，风景秀美。彭德怀部赶到玉泉山时，北洋军残兵早于一天前通过。彭部便宿营于山中。是晚，彭、段二人，于关公像前，促膝长谈，段德昌指着关云长像问彭德怀："你以为关云长这人如何？"彭德怀一笑说："关云长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是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无非是忠义二字，没甚意思。"段德昌笑道："你说怎样才有意思？"彭德怀说："我是贫苦人出身，小时候讨饭吃饿昏过，我认为只有为劳苦大众奋斗才有意思。"段德昌又问道："你看国民革命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彭德怀说："现在不是每天都喊打倒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耕者有其田，不应二五减租，只有耕者有其田，才能人民平等，共同富裕。"段德昌摇摇头道："德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应停留在耕者有其田上，应当变生资料私有为公有，由按劳分配发展成为按需分配，消灭剥削阶级，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任务。"彭德怀听到这里时，呼地站起问道："德昌，我加入共产党吧。"段德昌问："你是国民党吗？"彭德怀哼了一声说："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你看国民党里的那些人，抽大烟的，长大疮的，吃斋的，念佛的，这样的党，能为劳苦大众奋斗吗？"段德昌说："德怀，你奋斗吧，共产党的大门是向你开着的。"

后来，彭德怀入了党，入党的介绍人，便是段德昌。所以，段德昌在共产党内，也是个颇有威望的同志。

段德昌到了洪湖后，被鄂西特委派到了公安县，任公安县委书记。这公安县，属湖北地界，位于扬子江畔，到处河沟纵横，芦苇遍地，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之处。段德昌到了公安县，找到了公安县共产党员戴补天、胡方熙。这时，白色恐怖已笼罩了洪湖地区。段

德昌便秘密组织了一支以工农为骨干的百余人赤卫队。打击反动的势力。公安县有个大恶霸，名唤傅祖光，大革命时期跑到了上海躲了起来。蒋汪合流后，傅祖光高兴了，回到了他的家乡公安县涂郭巷，成立了团防，时常借“清乡”为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捉住共产党员和农协干部，惨施酷刑。用湿麻绳抽打，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后，再把干青麻贴在身上，待身上血渍一干，那些青麻也粘在身上，再往下一条条地扯麻绳，被撕扯的人痛苦得呼天嚎地，痛不欲生，死去活来。因此，老百姓都骂傅祖光为“傅阎王”。

段德昌组织起百人游击队后，决定杀掉傅祖光，搞年关暴动。大年三十这天晚上，傅祖光正杀鸡宰羊，治觞祭祖之际，段德昌同赤卫队副队长戴补天带领赤卫队悄悄来到了涂郭巷，趁护院的兵丁们酒足酣睡之机，冲进了涂郭巷，杀死了傅祖光。段德昌用布沾着傅祖光的血，在墙上写下“杀人者，赤卫队也”几个大字。随及解放了涂郭巷，立时，又有不少穷苦百姓加入游击队中。这当儿，贺龙、周逸群等在石首、监利组织年关暴动。段德昌闻讯后，派戴补天去寻找。待戴补天找到后，贺龙、周逸群等已赴湘西，段德昌甚为憾事。此后，他带着公安赤卫队，一打华容、二攻杨厂、三打白龙，神出鬼没，昼伏夜出，把那些有血债的土豪劣绅，一个个地除掉。顿时，公安、华容一带的穷苦老百姓，都扬眉吐气，那些土豪劣绅，撞地嚎天。英雄们的举动，惊得夏斗寅大惊失色，1928 年 4 月，夏斗寅派了两团之兵，对赤卫队进行“围剿”。自此，赤卫队的活动一天天困难起来。这当儿，鄂西特委也遭到了破坏，特委书记张计绪等在沙市被捕。5 月 3 日，段德昌率赤卫队向石首县桃花山转移时，与“清剿”之敌军遭遇，伤亡很大，突围后仅剩下十九名队员了。段德昌带着这十九名队员，转移到孟家溪，又趁夜偷袭了孟家溪团防局，缴了团防局的二十条枪。之后，他采取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赤卫队又渐扩到百十多人。在洪湖荷花怒放的时候，段德昌根据鄂西特委的指示，带队伍到了洪湖，与华容

彭国材领导的赤卫队汇合，成立了“洪湖赤卫队”。段德昌任大队长，彭国材为副大队长。

彭国材，湖北沔阳小沙口镇彭家湾人。世代打渔为生，因家境贫苦，无力读书，便充当沔阳城阖州学堂校役，半工半读。在校间，结识了刘绍南、邓赤中，刘、邓二人向彭国材推荐了许多革命书籍，致使彭国材向往革命。1926 年 3 月，彭国材与刘绍南一起，组织了沔南学生同乡会和沔南渔民同乡会，与城乡的土豪劣绅展开斗争。1926 年 5 月，由邓赤中、刘绍南介绍，彭国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国材便被任命为沔南区委副书记。同年 6 月，彭国材以他天才的组织能力，在洪湖组织了洪湖渔民协会，彭为会长。他带领着数千名渔民协会会员，同渔霸“西霸天”周传简，“南霸天”李生烂、“北霸天”张泽厚，以及洪湖上大小渔霸，展开了斗争。最后，扫掉了渔霸的威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到了 1927 年 3 月，洪湖内七十二村，村村建立了渔民协会，彭国材在渔民内威望极高。

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彭国材带一部分渔民协会干部、骨干，藏在了湖心曾家墩芦林内，自此，开始组织武装力量。这时候，西霸天周传简回到了监利，用五千大洋从夏斗寅处买了个监利县清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团防局团董，他的弟弟周麻子，也当上了常练队的中队长，兄弟二人回到周家湾和剅口以后，对渔协会进行了疯狂的阶级报复。仅周家湾一带，便有三百多渔协会会员和群众惨遭杀害。数百间房屋和船只被烧毁。周霸天在渔行重新开市那天，大摆筵席，冷笑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周氏门中没有草包，我要乾坤扭转，年光倒流！”彭国材便率领赤卫队员，利用九九重阳节，周传简发铳祭铳，强迫渔民下湖打鸭雁之机，将周传简处死，发动了群众暴动，暴动群众又涌到剅口，砸了剅口的清乡委员会。随后，彭国材又率暴动队伍，以雷轰电劈之势，奔三墩屋，枪毙了恶霸“湖天王”戴金荣。再到郭铺，处决了不法地主董本斋；到姚铺，杀了劣绅吴明振。在桐梓湖，火烧顽匪瞿云陶。随及，

鄂中特委在暴动的基础上，成立了水上游击队，彭国材为队长。游击队成立第一仗，便在三百条渔船配合之下，活捉了南霸天李生烂。贺龙、周逸群到洪湖时，彭国材把水上游击队交给了前委指挥。贺、周等人离开洪湖赴湘西后，肖仁鹄、吴仙洲两部都先后遭敌伏击，部队几乎打散，肖、吴二人均牺牲。彭国材部也被打散，他决计回洪湖重整队伍，但沿途到处都张贴着捉拿他的布告，彭国材便化装成卖牛的农民，在新沟嘴一带找到了被打散的三十多名游击队员。彭国材便将这三十余人带到了荒湖陈湾，稍事整编后，彭国材宣布了攻打新沟嘴敌人的决定。当时，三十余人，仅有一支手枪。如何取胜?彭国材思得一计，于夜晚将数千斤鱼投入新沟嘴镇西关帝庙旁的水塘。第二天一早，彭国材率三十名队员趁赶集之日，到了水塘边儿，下去捕鱼，此处乃是团防兵丁上下早操必经之处，那些团丁们见水塘中鱼如此之多，都纷纷放下枪，跳入水中摸鱼。彭国材和游击队员趁势夺得四十多条枪，自此，水上游击队又日渐强大。到了1928年的5月间，便已发展到一百五十余人。就在这时，鄂西特委命令段德昌和彭国材两支游击队合到了一起。

段德昌到洪湖与彭国材会合后，很快发现，游击队虽都是工农骨干，但缺乏训练，这样的队伍，在与强敌作战中，容易吃亏。于是，他将这两支队伍，五百来人，带了到洪湖中的一个荒岛之上，进行大练兵。这就是洪湖革命斗争史上的“段德昌荒岛大练兵”。这五百名骨干，到后来都成为红军最基本的军政干部。

贺闯将段德昌荒岛练兵的情况向周逸群讲过后，道：“我在这里当交通，接应出入湖中的往来人员。”

周逸群笑道：“你成了《水浒传》中梁山泊的朱贵了，专门接应各地的来往好汉。”

贺闯说：“今晚就歇在我这里吧，明早我把你送到荒岛上。”

二人又说了些旁话，便倒头睡下。

第二天一早，当洪湖中升腾着一层朝雾之时，二人跳上一叶小舟，贺闯用篙一点，这叶小舟滴溜溜地向湖心漂去。

荒岛坐落在湖泊之中，方圆不过二里，四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芦苇，岛上面长满着茅草青蒿杂树，野鸟成群，狐兔乱窜。早先，这里也曾有人来过，传说岛上有巨蟒吞人，就没有敢住了。究竟是否有巨蟒？没人去考究，但这岛上一片荒凉，加之四周水中芦苇一望无际，就给人一种神秘和阴森之感。因此，这岛上极少来人。段德昌便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训练洪湖赤卫队。这做法，足以说明他有将帅之才，鸿鹄之志。

周逸群到了岛上，由贺闯带路，穿过数重芦苇，又过几处滩头，早见一面大旗，迎风飘扬。上面写着“洪湖赤卫队”几个大字。大旗下面，一队赤卫队员，正练刺杀，一个个犹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海。在这队伍的一旁，站着一人。

周逸群抬眼一瞅，只见那人长得白净面皮，剑眉虎目，周身上下透着一股英武之气。周逸群再仔细一看，不由得几步上前，紧紧地握住段德昌的双手，说：“德昌同志，你好！”

段德昌望着眼前这位文静之人，先是一愣，接着便惊喜地说道：“逸群，真没想到，你会来到这里。”

说来周段二人，系黄埔同学，在黄埔时彼此见过面，只是不甚熟。二人这里相会，都很激动。当下，二人促膝长谈，从黄埔谈到北伐，从南昌起义谈到湘鄂西再起。彼此对党内外问题的认识，英雄所见略同。周逸群夸奖段德昌岛上练兵做得对。段德昌说：“这都是敌人逼出来的。”

当下，段德昌派人到湖上抓了几条大鱼，并亲自为周逸群做了红烧鲤鱼。饭后，段德昌将周逸群向队员们一一做了介绍。队员们听说周逸群来了，都欢喜无比。周逸群拉着李兆龙的手，激动得竟一时不知说甚是好。

这天晚上，周逸群、段德昌二人坐在湖边草地之中，拢了堆干

蒿，一边熏着蚊蝇，一边谈着洪湖地区革命斗争的形势，周逸群说："德昌，从地理位置上看，华容、公安、石首、江陵、监利、沔阳，处在长江和纵贯南北大铁路的交叉点，又横跨洪湖和洞庭两大水网地域，扼九省水路交通的枢纽，中原的咽喉，东可威胁武汉，西可控制宜沙，南可影响岳阳，所以，这洪湖地区革命形势至关重要。"

段德昌说："逸群，你说的很对呀，洪湖地区群众基础很好，只是党的各级组织破坏得很厉害。鄂中特委机关急需恢复，指导工作，你来了就好了，快把党的各级组织恢复起来吧。"

周逸群说："是要迅速恢复各级党组织，领导工农搞暴动。"他思考地问道："德昌，怎么恢复呢？"

段德昌说："把各县的县委负责同志召集一起，研究确定洪湖地区今后的工作方针。沙市的交通掌握着各县县委的接头地点。"

周逸群说："沙市的交通接头点谁清楚。"

段德昌说："李兆龙知道。"

周逸群说："好，那我和李兆龙去沙市，组织新的鄂中特委。"

段德昌说："你在这岛上休息一下再走。"

周逸群说："我们准备一下就出发。"

当下，周逸群在岛上又准备了几天，一个雨雾蒙蒙的早上，他同李兆龙一起，乘舟出了荒岛，又告别了贺闯，二人直奔沙市。

血染的报告

在沙市城中小南门里，有父子俩，靠焊锡壶、铝盆生活，一间小小的门市房内，摆满着破旧的锡灯蜡钎、铝盆等物件。老汉六十出头儿，名叫李焕文，儿子李如汉。这父子俩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一天，周逸群经李兆龙带领，来到了这间门市房。李焕文正在焊锡壶，抬眼一瞅，见是李兆龙，身后还跟着一个人，又瞅瞅，这人没见

过，连忙起身出了门，左右看看，见无人注意，便把二人让到后屋里。李焕文对李兆龙说："兆龙，你好大的胆子，敌人到处贴告示抓你，你怎么又来沙市？"

李兆龙说："李老爹，干革命总不能不露面呀。"说着，一指周逸群，"这是周逸群同志。"

李焕文听了，上下打量了下周逸群，惊喜地说："逸群，早就听人说到你，你跟贺龙打了张烟灰、郭老七等，洪湖、宜沙两市都轰动了，敌人出十万大洋要你的头哩！"说着，拉过了凳子。

周逸群撩起长袍，坐下后说："大爹，你在这里，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兆龙都跟我讲了。"

李焕文一摆手："我老了，别的干不了，跑跑腿总还是可以的，有什么需要我干的事，你只管吩咐。"

李兆龙低声说："老爹，我们要在你这儿开会，都是沙市附近各县县委负责同志，五六个人。"

李焕文说："行啊。都哪几个县委？"

李兆龙便向李焕文做了番交待。

几天之后，洪湖和白露湖两地周围游击区内的石首、江陵、监利、沔阳、华容、公安几个县的县委负责人，都秘密地来到了李焕文的家中。有监利的马武、石首的屈春阳、公安的唐玉非，江陵的钱定生、沔阳的何金龙、宜昌的郑熾昌。周逸群了解了一下各县的情况，有人叹息，有人激昂。但都说敌人气焰嚣张，致使许多同志遇难，党团组织，农协组织，都遭严重破坏。特别鄂西特委遭敌人的破坏后，各县县委都失去了中心。对特委负责同志张计绪等人的牺牲，大家都很难过。周逸群听了大家的汇报后，当即宣布组织鄂西临时特委，经过大家的讨论，决定由周逸群为鄂西特委书记。随后，讨论了各县成立游击队，组织武装暴动的计划，暴动的目标是处决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以鼓舞民心，振奋士气。周逸群便将这会议情况，向湖北省委和中央详细写了报告，交李焕文的儿子李如意送到武汉

的省委。

这天早上，李如意走后不久，各县县委负责同志也都相继离开了，周逸群和李兆龙正准备动身到监利，组织监利的武装暴动，突然间，一队国民党的兵丁，围住了李家父子的住宅。周逸群、李兆龙一看，知道有了情况。这当儿，李焕文要周逸群、李兆龙速从旁门走脱。原来，李焕文李老爹为防意外，在屋内的墙壁处开了个洞，平时用柜子挡着，从外面看不出。当下，李老爹将柜子移开，要周逸群和李兆龙迅速逃走。周、李自然不干。这时候，门外兵丁用力撞门。时间已不许犹豫，李兆龙用力将李老爹和周逸群推进了洞，李兆龙刚刚把柜子放好，那些兵丁便冲了进来，见到李兆龙，不由分说，将李带走。周逸群在李焕文老爹的带领下，穿房门过小巷，脱离了虎口。李兆龙被国民党兵丁捉住后，当天夜里，便惨遭杀害。

那些兵丁为何围李老爹之门？原来，在散会之后，公安县委负责人唐玉非，在路上被敌人抓捕，又被叛徒认出。那唐玉非本是软蛋，还没等敌人拷问，便屈膝投降。供出了真情。敌人得知周逸群、李兆龙在沙市，立即派军警前往围抓，致使李兆龙牺牲。

周逸群同李焕文李老爹一起逃出虎口后，那小铺自然不能回了。二人又想到李如意尚不知此情，为使其免遭敌毒手，李老爹决定去武汉省委处，寻找李如意，并同周逸群约定了会面的地点。这个地点，便是沔阳排湖南岸的杨家场。当下，二人分手。

周逸群在李老爹走后，便向排湖杨家场走去。

排湖位于沔阳县的北部，东西横跨百余里，湖岸的百姓，多靠打鱼为生。在这排湖两岸，地主豪绅很多，所有土地、渔船、苇荡、差不多都被他们占领。因此，劳苦百姓的日子，十分艰难。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有共产党员何大旁、李西萍、孙锡武等人，由武汉来到了这排湖两岸，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暴动，结果，都遭到了失败。孙锡武全家均被杀害，何大旁、李西萍被敌活捉，还有许多革命群众，被敌挖心割胆。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排湖两岸。

周逸群这天到了杨家场，先到村头一家小酒店儿，同卖水酒的张老爹接上了头，当晚，张老爹便带着周逸群，乘坐一叶放鸭小舟，来到了湖边一片柴林，见到了游击队长何金龙。何金龙本是一渔民，因不忍渔霸压榨，跟着何大旁等共产党员一起，拉起了一支游击队。后来，何大旁等人牺牲了，何金龙便做了游击队的队长，游击队共六十多人。国民党兵将和团防在洪湖地区"围剿"时，这支游击队在村中不能立足，便躲进了排湖内的芦苇荡中。在这苇荡中，铺地盖天，吃野菜，啃树皮，烧鱼虾充饥。后来，这些地方也被敌人发觉，何金龙又带着这支游击队，躲进了柴林。这柴林有五六十里长，三、四十里宽。里面没有人家，到处荆棘丛生，野兽乱撞。

周逸群到这游击队时，时值夏日，烈日当顶。周逸群见队员们躲在闷热的柴林之中，一个个被蚊虫叮咬得皮破眼肿，满身青紫。个个瘦得皮儿包着骨头，有那生病的，走路都打晃儿。一看便知是吃粮不足。

队员们见周逸群来了，像是来了救星一般，都围了过来。周逸群见队员们身体这般差，便对何金龙说："金龙同志，我们不能只躲在这里，让饥饿和病魔帮敌人的忙。要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暴动，扩大红军的力量。"

何金龙抓着周逸群的双臂说："你来了，就好了，咱们这队伍有主心骨儿了。"

当下，周逸群召集了骨干开了个会，他了解了一下排湖两岸的社会情况，最后，大家决定首先端掉彭家墩的彭霸天彭水光。

彭霸天的家在彭家墩，他的宅子修的是高墙大院，养着护院的兵丁，宅子四角都筑有碉楼，一般人难以接近。何金龙也曾想过攻打彭霸天，可总觉得力量单薄，不是彭霸天的对手，所以一直没敢动手。如今，见周逸群提出要攻打彭家墩，虽然内心中不大乐意，知道游击队力量不足，但由于周逸群是临时特委书记，打过大仗，见过世面，所以，没敢阻挡。这天夜里，周逸群、何金龙便带着游击队，

到了彭家墩，要夜袭彭家墩，活捉彭霸天。结果如何？游击队还没接近彭霸天大院，便与护院的兵丁接了火。游击队只有一些破枪，哪里是那些兵丁的对手？这一仗，游击队员损伤过半，何金龙也中弹牺牲。队伍退到柴林后，队员们情绪很低落，周逸群也非常难过。一天没吃东西。他暗暗地检讨自己："这种暴动形式是不是有问题？"时隔不久，各县暴动失败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断断续续地传了过来，又有许多好同志牺牲。石首县委的几名同志组织群众暴动，由于四周均是白色恐怖，群众看不到发展的前程，结果动员不起来。县委这几名同志，又怕上级说他们是机会主义，不敢放弃暴动，只好自己去干，仅凭三把驳壳枪，去攻打敌人，结果六名同志牺牲了一半儿。

一个又一个的沉痛教训，使周逸群由悲愤难过到冷静。周逸群想："为什么暴动都失败了，难道是因为敌人强大么？"这一天，李焕文大爹来了，李大爹又带来了李如意牺牲的消息。原来，李如意将鄂西临时特委的报告送到武汉地下省委后，在回来的途中，遇到了叛徒，当即被捕，押到了湖北省清乡督办，被敌人严刑拷打后，遭到了杀害。省委对鄂中临时特委的指示，均落敌人手中。

暴动连续不断的惨败，使周逸群感到中共中央路线上不对头，他决心做个调查，而后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做个汇报，一方面取得中央的指示精神，一方面汇报自己对中央关于暴动的指示的看法。当下，周逸群到了监利各乡，暗暗地对群众的现状，敌情、社情、经济等等方面，进行了了解和调查。

这天，周逸群正在监利县李家湾渔民张志仁家，向张志仁了解渔民的情况，李焕文来到了这里，告诉他，说省委派人来了，要见他，接头地点在宜昌城中万家药铺，周逸群听说省里来了人，顿时喜出望外，立即乘船来到了宜昌。

在宜昌城东关的万家药铺里，周逸群同万涛会了面。万涛带来了省委的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一是湖北省委对周逸群报告的批

复，同意成立鄂西特委，由周逸群任书记、万涛任副书记，另一份文件是中央致湖北省委并转鄂西临时特委的指示信。信中对由李如意送去的那份鄂西临时特委的报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批评周逸群把暴动重点放在了洪湖地区广大农村，不放在城市，说这种做法和认识，是否认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领导，是要把共产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信中要周逸群迅速转变这种观点。

周逸群看罢中央的指示后，半天没有说话。万涛见周逸群面色很难看，不由得问道："逸群，心里有什么不快的事么？"

周逸群拉万涛坐了下来，长叹一声说："中央这样的指示，不能执行啊，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不都失败了么？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城市暴动，也不都失败了么？多少好同志牺牲了？中央要我们搞城市暴动，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莫说城市，便是农村，也不宜搞暴动了，要做实实在在的工作才行啊。若再搞下去……"周逸群微微摇下头："若再搞暴动，后果难以设想。"

万涛说："工人阶级有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在城市武装起义后才取得胜利的。"

周逸群说："我们的情况，与俄国不同，我们国家的工业很弱，工人同农民比，农民是主力军。我来鄂西三个月了，不要说城市，就在农村的几个县内，暴动也都失败了。"周逸群深情地对万涛说："万涛，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中存在着盲动主义。"

万涛想了想说："逸群，中央的指示，我们不能不贯彻，不能不执行啊。"

周逸群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万涛，我要去中央，反映意见。"

万涛同意。当下，周逸群便起身赴上海。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幢二层楼内，他见到了周恩来。两位战友虽说分别仅数月，却如隔三秋。周恩来拉着周逸群坐下，说："快谈谈下边的情况。"

周逸群点了一支烟，之后，便把他同贺龙一起到武汉，暴动未

成，又到反嘴遇见贺锦斋，举行年关暴动，焦山河会议，去桑植路上“过五关斩六将”，到洪家关后拉起的队伍被敌打垮，自己回洪湖，荒岛上遇段德昌，在沙市召开各县县委负责同志开会，组成鄂西临时特委，彭家墩除霸失败，监利各乡的调查，宜昌城中万家药铺会万涛。见到了中央指示，只身来到上海，要向中央汇报自己的看法、想法的情况，一一述说，周逸群把这些经过说完后，周恩来亲切地对周逸群说：“逸群，你们受苦了。”他给周逸群倒了杯水说：“逸群，你的想法、看法是正确的。”

周逸群接过周恩来递过来的水，喝了一口，继续说：“恩来，经我了解，自桂系军阀占了两湖之后，数次派兵‘清剿’，洪湖地区内许多县的军事组织，已完全瓦解，许多游击队员把枪埋了，沔阳的游击队也躲进了柴林，只有段德昌领导的一支数百人的游击队，还在荒岛上练兵。这洪湖地区内，没有高山掩护，交通便利，敌人调兵遣将容易。大革命失败后，敌人在洪湖地区实行了白色恐怖，群众的革命情绪被压了下去。叛徒、特务、奸细活动得很凶。洪湖地区各县的游击队员，都是渔民、农民。农民的意识很浓厚，掌握政策水平很低，对土豪劣绅，一概烧杀。”周逸群停了下又说：“在桂系军阀部队未到洪湖地区时，国民党大小军阀只顾争夺地盘，腾不出手来为豪绅屠杀民众。豪绅地主的自身，也没有很强的力量可以对付我们，在这个时期，只有我们向豪绅地主进攻。桂系军阀统治了湖北，实行了屠杀政策。沙市以下划入鄂中清乡区，以桂系18军严敬部驻防，沙市以上为鄂西清乡区，以独立5师刘和鼎部驻防。另又以马文德为施鹤清乡司令。这么一来，那些豪绅地主又凶相毕露。无处不组织保安团、清乡队。城市均实行“十家连”制，互相监视。豪绅地主的武装均分为两种，一是保安队，也叫保商队，这在各重要城镇都有，这是商人们豢养的。二是保安团，是在清乡中地主豪绅组织起来的。开始彼此并无联系，现监利已将全县保安团完全集中编为几个清乡队，统一指挥。江陵、石首等许多县也都仿照。”周逸

群稍停一下，又说："在经济方面，鄂西的农村，今年是旱灾，许多地方仅有两三成。公安、石首、监利一带，也不过六、七成，荆门、宜昌各县的农民，相率外出逃荒，哀鸣遍野，农村经济的破产，影响到了城市，许多小商店闭门停业。金融异常混乱，如今除宜昌外，各地的币票已不能兑现，就是宜昌，也低落到六折。反动政府的收入，唯一的是靠苛捐杂税。什么二五税、禁烟税、烟酒税、印花税、井捐、团捐、门牌捐、灯捐、花捐、屠宰税、筵席捐……"周逸群一摆手："真是有名皆捐，无物不税，农村中还有枪捐，田亩捐等等，目前防军增多，民众负担还要加重。"周逸群站起身说："工农已被逼迫得无路可走了。工人方面，工资太低无法维持生活，大批失业者找不到工作。农民方面，一是天旱欠收没饭吃，二是苛捐杂税繁多，三是豪绅地主的压迫，四是清乡团、铲共队的骚扰，五是战时拉夫，尤其是桂系军队，拉夫尤为厉害，六是豪绅地主强迫农民放哨守夜。"说到这儿，周逸群双眉高挑，说："恩来，工农的痛苦已到极点，一腔怒火被白色恐怖笼罩着。但各地的党组织，多残破不整，有的名存实亡，有的没有力量去领导，有的虽然组织了暴动，由于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都以失败而结束。"周逸群目光恳切地望着周恩来说："恩来，中央指示我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组织城市暴动，我们鄂西特委的同志都感到目前组织城市暴动不妥，应当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扎扎实实地在农村中发动群众，扩大游击区，扩大武装力量，健全党团及各种群众组织。"

周恩来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完了周逸群的汇报，他赞扬地说："逸群同志，你们为党受了磨难，了解到了工农中真实的情况。"

周逸群说："受些苦累不打紧，只是……"

周恩来打断他的话，说："只是怕中央的指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对不？"

周逸群点点头。周恩来说："逸群，你刚才谈的意见是对的，南昌暴动以来，我们又组织了广州暴动等大大小小的城市暴动，结果

都失败了。在农村，暴动也遭到了失败。血的教训，使我们要深刻检查中央的路线和方针。”周恩来又说：“鄂西湘西的实际情况我不十分明了，但从你介绍的情况来看，农村中的矛盾与阶级斗争，更为激烈。在原则上，游击战争，应该是党与群众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发展。你回去之后，可派人告诉贺龙，要他在发展革命武装中，注意这个原则。”

当下，周恩来把全国的斗争形势，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说了一遍。周逸群听着很兴奋，将这些话，一一的记在了心中。正是周恩来同志的这次谈话，坚定周逸群依据洪湖地区实际情况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心。后来，周逸群才知道，周恩来同他的这次谈话，成了 1929 年 3 月 17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的基本思想。

周逸群告别了周恩来，满怀喜悦之情离开了上海，回到了洪湖，在石首县的调关，与万涛、段德昌会面。

洪湖赤卫队

周逸群与段德昌、万涛于调关会面后，又来到了刖口。刖口这个地方，三面是水，芦苇丛生，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儿可以进出，恰似水泊梁山一般。那些清乡队、保安团，从来不敢在这里过夜。在这刖口旁边，还有个叫三屋墩的地方。在这里，周逸群又见到了彭国材、段玉林、贺闯等。他把赴上海见到周恩来的经过和周恩来的指示，向大家做了传达。之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和洪湖的实际，将段德昌的游击队、屈春阳的游击队、彭国材的游击队都拉到了三屋墩，进行了整编。在游击队里，建立了党团组织，清除了不纯分子，决定停止盲目的暴动，发动群众，利用洪湖的水泊网地，开展机智灵活的游击战争。游击队改为“洪湖赤卫队”，周逸群任队

长，段德昌任参谋长。这次整编，就是洪湖革命史上有名的"三屋墩整编"。

洪湖赤卫队成立之后，周逸群、万涛又在剅口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会议，纠正了那些不顾客观实际条件的盲目暴动行为。要求领导同志在实际工作中采取认真深入农村，深入群众，进行艰苦的隐蔽斗争。恢复秘密的党团及群众组织，抓住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如解决灾荒带来的痛苦，减免苛捐杂税，等等，发动带政治性的经济斗争。从斗争中锻炼群众，为发展游击队和开辟根据地创造有利的条件。

自此之后，鄂西地区，就停止了盲目暴动，党员们在合法的职业掩护下，展开了秘密的工作。以一串十、十串百的方式，由点到面，逐渐发展党的队伍。建立秘密的农协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各县的游击队也改变了活动方式，队员们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时而分散，时而集中，配合群众斗争，用秘密方式镇压个别罪恶昭彰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击敌人的凶恶气焰。当敌人大举"清乡"时，则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利用有利的地形和群众条件，或隐蔽，或神出鬼没地突击敌人，以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力量。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洪湖地区的革命力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依然稳步地发展起来。到了 1929 年 3 月春回大地之际，洪湖地区二十三个县，党的组织都初步恢复，建立了一批秘密的农协会，扩大了游击队。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阳、公安各县内，相继地出现了若干小块根据地。段德昌率领着洪湖赤卫队，先后袭击了马家寨、观音寺、岑河口等十几处团防，赤卫队人数也扩大到数百人。由于赤卫队员经过荒岛训练和三屋墩整顿，战斗力很强，几仗之后，那些团防们听到赤卫队的名字，无不胆颤心惊。

就在这当儿，在这两湖之地，发生了蒋桂之战。在敌人无力对付革命武装力量之前，洪湖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壮大。当桂系

军阀撤出鄂西之后，蒋介石的军队来到之前，周逸群、段德昌指挥着洪湖赤卫队在群众基础好的石首、监利、沔阳三县，发动了攻击，把各乡镇的团防一扫而光，十七天内作战二十一次，均大获全胜，只吓得那些土豪劣绅，一个个都龟缩在县城和大村镇内，叫苦不迭。

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洪湖赤卫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人数增加到上千人，遂编成了 3 个大队，1 大队队长彭国材、2 大队队长贺闯、3 大队队长段玉林。周逸群仍为总队长、段德昌为参谋长。周、段二人又依照井冈山朱、毛建军的经验，在总队设了政治部，在中队设了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洪湖赤卫队经过整顿后，士气高涨，连续攻下了古丈堤、天心洲、新厂等地，使根据地日益扩大。

时蒋介石下令 50 师师长谭道源率其部赴洪湖"围剿"赤卫队。谭道源选择了吉日，率全师人马由武汉抵沙市。而后，开进洪湖，要与赤卫队决一死战。而赤卫队的战术是你来我走，瞅冷子打一下，咬几口又溜了。转眼三个多月过去，谭道源不但没抓住赤卫队，他的兵丁倒死了不少。蒋介石遂又增派了 34 师岳维峻部。

时洪湖赤卫队二中队副队长王金标为彭霸天收买，使二中队遭到了敌人袭击，二百多名队员，仅数人幸免。队长、洪湖红五子贺闯的头被割下游街示众。

洪湖赤卫队遭此重大损失，湖区的老百姓情绪又低落下来，赤卫队员中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动摇了。觉得还是国军的势大，于是，有些人悄悄的挂枪逃走。

面对此情，段德昌对周逸群说："逸群，敌人的气焰如此嚣张，我们要狠狠地打他一下，以鼓舞群众，压敌凶威。"

周逸群说："是要打，只是不可现在打，现在敌人正为抓不住我们而焦急，谭、岳两敌连同民团加在一起，兵力多我十数倍，我当避其锐气，待他麻痹之时，乘其不备，寻其弱处，狠狠地打他一下。"

就这样，尽管敌人无论怎样在洪湖中横冲直撞，周、段只是按

兵不动，率队员密藏于百里苇荡之中，并令人传出了话，说赤卫队头头周逸群、段德昌慑于岳、谭大军之威，已从洪湖地区逃走。

这消息三传两传的就传到了彭霸天耳内。彭霸天好不得意。一晃数月过去，眼看就要过年了，这天，彭老三坐在彭霸天的身边，说起洪湖赤卫队数月没了踪影的话，彭霸天手中转着保定府的铁球，哈哈大笑道："周、段乃无名鼠辈。只能吓唬常人，爷略施小计，就让他们胆裂魂飞。"说罢，信口吟诗道："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念罢，哈哈大笑道："三头。"

彭老三赶紧起身答道："爷有何吩咐？"

彭霸天把右手一扬："下请帖，请岳、谭二位师长到八仙楼赴宴，过腊月二十三的小年儿。"

彭老三答应着，刚要走，有人急急进来，向彭霸天报告说："大爷，岳、谭二位师长来了。"

彭霸天一听，赶紧整衣冠出迎。这时节，谭道源、岳维峻已进了中门。彭霸天赶紧举手作揖道："正要派人去恭请二位师长，没想到二位师长亲登寒舍，万望恕罪。"

岳维峻笑道："我们是给彭兄贺喜来了，经何成浚何省长批准，彭兄为监、石、公、沔、江五县清乡司令，自此，五县团防，均归彭兄辖管。"

彭霸天继续作揖，满脸是笑的道："多蒙二位提携，此恩小可永世不忘。"说罢，彭霸天将谭、岳二人让到客厅之中。宾主落坐之后，有人献茶。彭霸天继续说道："小可在八仙楼备一便肴，正要派人去请二位师长光临。"说着，彭霸天一扬手："来人那！"

彭霸天的话音儿没落，进来了两个人，每个人手中托着一个铜盘儿，上面各放着十根金条。彭霸天指着金条笑道："二位师长为'剿赤匪'，日夜辛劳，奈荒野之处，没甚物产。这些微礼，算是小可一点心意。启望笑纳。"

谭、岳二人都是见钱眼开之主，如今见了金条，哪有不高兴的？

遂说道："我等来洪湖，已烦彭兄处不少，哪能再受此厚礼？"

彭霸天把手一摇，说："二位师长怎说此话，如若不是二位师长剿匪有功，赤匪哪能胆裂魂飞？小可还要给二位师长树功德碑。二位师长凯旋之日，小可要洪湖百姓，为二位师长送万民伞呢。"

当下，岳、潭二人又略一推辞，便收下了这些礼物。之后，彭霸天和岳维峻、谭道源三人在随从马弁呼拥之下，直奔八仙楼。这天正是集日，彭家墩街里街外人很多。卖货的，买货的，乱烘烘的。三人来到了街上。见一卖唱的，唱得都是吉利词儿，谭、岳二人听了后，都很高兴，岳维峻顺手把一块光洋扔给了卖唱的。于是又往前走，见一堆人围着一个汉子，不住的喝彩，虽是腊月天气，那汉子却赤身露臂，手舞双刀，正耍到热闹之处，只见刀光，不见人影儿。三人看得呆了，岳维峻夸奖说："这人身手不凡，做个保镖的一定合适。"

岳维峻三人正往八仙楼行走时，街心突然响了一枪，顿时街里一阵大乱。赶场人纷纷四窜。彭、岳、谭三人不知发生了何事，正打愣儿张望时，只见一个舞刀卖艺的大汉，一步窜到了彭霸天眼前，手起刀落，彭霸天便身首异处。随及又一刀，向谭道源砍去，谭道源头一歪，那刀顺他左肩劈下，将他左臂砍伤。岳维峻见此状，拔枪要射。就在这时，他身后一赶场之人，抽刀便朝其砍去。岳维峻头一歪，右耳朵被削去半块。谭、岳知道事情不好，慌忙逃走。

彭、谭、岳三人到街上转悠，难道没有随从保护么？这三人均有随从，只因在彭家墩，都想到不会出事，所以几名马弁都四下看热闹了，等到枪响出了事儿，这些马弁还没等动手，都被赶场的人给收拾了。

这工夫，彭家墩街面上可就大乱了，枪声喊声乱成了一锅粥。保卫团也都出动了，可满街里跑的都是赶场之人，到哪里去抓赤匪？不一会儿，只见一股浓烟直冲天际，原来是彭霸天的房子着了火。

大火越烧越旺，只把个彭霸天的一大片房子都烧着了。彭家墩百姓早已对彭霸天恨之入骨，谁还去救火？彭霸天手下之人，见彭霸天已死，也都趁火烧鱼，把彭霸天平日积攒的财宝，抢了不少。彭霸天的宅院很大，到了晚上，那火烧得更欢了，真是火烧连营一般，直直的映红了半趟街。这工夫，谭道源的一个团得到了信儿，飞跑来彭家墩救火，这些兵丁一到，立时挑来了水，大桶小桶地往火上泼。说来也怪，那火不但不灭，反到越烧越旺，连那救火的兵丁也烧伤了许多。到了半夜时分，突然一阵狂风刮来，只见那大火之中，腾起了一条火龙，那火龙张牙舞爪的直奔那救火的兵丁，把那些兵丁烧得抱头鼠窜，边跑边喊："不好了，火龙来了，火龙来了。"有那些跑的慢的被火活活地烧死。

这大火直直地烧了一天一夜，把个彭霸天的一大片宅院，烧了个片瓦无存。这下子，把洪湖的老百姓都震了。纷纷传说赤卫队里有一条火龙，后来，又传出这火龙是赤卫队参谋长段德昌。原由是有人在彭家墩街上看见他卖艺，刀劈了彭霸天，砍伤了谭道源。后来，施法术烧了彭霸天住宅，半夜时，显了火龙的真形，又烧跑谭道源的兵丁。自此，在洪湖便传出了段德昌是"火龙将军"之说。

消灭彭霸天，是赤卫队很早就有的计划。在贺闯等牺牲后，周逸群、段德昌放出风声，说赤卫队头头惧敌逃跑，以此麻痹敌人，暗中却观察着时机，在腊月二十三的头几天，有内线送来信儿，说八仙楼派人到汉口办菜，彭霸天要在二十三祭灶这天，宴请谭道源和岳维峻赴宴。周、段二人知晓后，齐认为这是消灭彭霸天的极好机会，于是，二人便布置了赤卫队员化装成赶场之人，进了彭家墩，段德昌化装成卖艺的，周逸群化装成卖字的。他们原计划在八仙楼动手，谁知那谭、岳三人却逛开了大街。队员们便趁势动了手，砍死彭霸天，砍伤谭道源和岳维峻。

洪湖赤卫队经过这一仗，又威名大振。随后，周、段二人，又率队攻下三官殿、杨树峰、谢家口等地。这工夫，蒋、冯、阎三军阀又酝

酿着一场新的大战，蒋介石为准备这场战斗，急忙忙地将谭、岳两部从洪湖抽走、只留下了岳维峻两个营，这两营兵力怎能与赤卫队交手？便龟缩在大镇子里，再不敢胡作非为。这样一来，洪湖赤卫队又活跃在洪湖广大地区，拔掉了洪湖内许多点，使得赤卫队越发壮大。到了1929年11月，在监利、沔阳、石首等八县内，根据地已联成了一片。

战将邝继勋

鄂西特委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干部和党员的政治水平，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夺取新的胜利，于1929年12月间，在石首县的袁家铺子，召开了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三十五人，代表十二个县的四千多名党员，此外还有旁听代表五十人，湖北省委亦派代表出席指导了大会。会议之前，周、段等鄂西特委领导同志根据中共"六大"和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洪湖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各项工作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各项决议的草案。会上，大会主席团发扬民主，鼓励代表积极总结经验，批评缺点和错误，并组织代表们参加了石首召开的两次群众集会，以便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交流经验，开好大会。大会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了《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等十二个文件，选出了新的特委领导成员。代表大会对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经济工作、兵变问题、宣传鼓动工作都进行了总结。会议决议规定了四个中心县委，即：宜昌、荆门、南县、监利四县，划分了六个巡视区，即：石首、监利、沔阳三县为第一巡视区；荆门、钟祥、潜江、京山、天门、当阳六区为第二巡视区；巴东、兴山、秭归、长阳、五峰、远安六县为第三巡视区；松滋、枝江、宜都为第四巡视区；公安、宜昌、沙市、江

陵为特别区域；南县、华容、安乡为第五巡视区。代表大会根据省委的提名，选举了七名正式委员，两名后补委员，组成了新的特委领导机关。之后，即召开了二届一次特委会。决定由周逸群、众鸣、文化三人组成常委会。周逸群为书记、众鸣为组织部长、文化为宣传部长。为加强鄂西特委和武装力量的领导，中共中央又派了王一鸣、周荣光、周小康等人来到了洪湖。

鄂西党“二大”之后，特委为建立“数县联合政权”的任务，进行了紧张的工作，这时候，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将洪湖赤卫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1师，此时，洪湖赤卫队已发展至五千余人。独立1师下辖三个纵队。师长段德昌，监利、沔阳的红军为1纵队，纵队司令王一鸣，下辖两个大队，有步枪四百余支，连枪二百余支，花机枪两架。石首红军为第2纵队，纵队司令段玉林，下辖两个大队，步枪三百余支，连枪八十余支，花机关枪三架。第3纵队时正筹建，拟由长阳、荆门、钟祥、江陵的红军组成。

1、2两个纵队成立之后，立即分别在监利、沔阳和江陵、石首两地区打击敌人，消灭各种反动势力。使得各方反动势力纷纷逃窜，形势对红军极为有利。

就在此时，湖北省委指示红1师向汉川、汉阳推进，以进攻武汉。时1纵队接到省委的指示后，立即执行。并派人通知2纵队向洪湖集中。

虽然此时蒋冯阎大战正在酝酿，但武汉乃是军事重地，敌人大军云集，红1师若去攻打武汉，无异于以卵击石，必然吃亏无疑。湖北省委的这个指示，分明是错误的，是过高地估计了红1师的力量。就在1纵队做向汉阳推进的准备、2纵队向洪湖靠近的时候，中共中央军事部巡视员柳直荀到达了洪湖。柳直荀听了周逸群和段德昌的汇报，周、段二人齐呼此时攻打汉阳不妥，柳直荀当即以巡视员的身份，取消红1师攻打汉阳的计划，督令2纵队至洪湖与1纵会师。段玉林接到柳直荀的信后，立即带2纵队自石首出发，

先收编熊家河常练队一个中队，继又攻取了普济观和沙岗，获枪五十余支。1930年2月5日，第1、2纵队在监利县的汪家桥胜利会师。

会师后，鄂西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宣布独立1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军长孙德清、政委周逸群、副军长段德昌、参谋长许光达。由于孙德清病重不能赴任，遂由邝继勋担任军长职，邝继勋即和许光达同至洪湖苏区。红6军下辖三个纵队，1纵队司令段德昌兼任，政委王鹤；2纵队司令段玉林，政委周荣光；3纵队正在组建。红6军到此时已发展到七千余人。又组成了新的前委，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三人。委员之中，除有周逸群、段德昌、孙德清、段玉林、许光达等军政领导同志外，还有两名士兵，一名叫张传贤，一名叫徐昌贤。改组后的前委，又整顿了军内的党组织。此时，1纵队有党员六十余人，遂成立了三个支部，二十个党小组，2纵队有党员七十余人，遂成立了三个支部，九个党小组。各纵队设政治部，配备政委和指导员，发挥士兵委员会的积极作用，发扬政治、经济和军事民主。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严禁肉刑，官兵间均以“同志”或“指挥员”、“炊事员”等相称。经济平等，帐目公开。这样，尽管红6军给养困难重重，士兵们生活不好，但也没有怨言。此时的红6军，已形成一支由群众斗争中生长出来的、没有旧式军队中旧习惯的、有阶级觉悟的、能吃苦耐劳的工农武装力量。

这里把孙德清、邝继勋、许光达三人情况略做介绍。

孙德清又名孙一中，安徽寿县人，黄埔一期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李汉魂25师75团任营长。南昌起义时，孙德清将75团骨干力量带走，参加了南昌起义。之后，75团编入了25师内。起义军南下到三河坝。在三河坝激战中，75团紧守笔支尾山，孙德清负了重伤。后经当地农协会员救护，得以脱身，又辗转到了上海。到上海后，时国民党皖系33军柏文蔚要办学兵团，扩充自己的势力，中共中央军委了解此情，便派孙德清到

了安徽。孙德清同柏文蔚系同乡同学，交情很深。孙德清到了安徽，柏文蔚不晓得孙德清是共产党员，知孙德清组织能力、军事素养很强，很是高兴，便委孙德清为学兵团团长。孙便趁此机会安排了南昌起义失败后流散的共产党员到学兵团工作，这当儿，75团11连连长许光达、参谋廖运周，便一起来到了学兵团。许光达又名许德华，湖南长沙县东乡萝卜冲人，出身贫寒。光达自幼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新生第2团，攻读炮兵。1927年5月，宁汉分裂，夏斗寅部在鄂西叛乱，攻打武汉，军校学生奉命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师长为叶挺。许光达遂随叶挺讨伐夏斗寅。到了7月，武汉政治形势逆转，政局动荡，军校将5期草草毕业，许光达被分配到张发奎第4军直属炮兵营任见习排长。不久，东征讨蒋。许光达随4军移防九江。南昌起义时，许光达正在九江。这时候，张发奎发令，凡信奉共产主义者，三日内离开他的部队。于是，许光达便同几名党员，一起秘密离开九江。时南浔铁路中断，许等徒步南下，翻庐山，过赣水，到南昌时，起义部队早已撤离南下。许光达等继续南下追赶。途与匪遭遇，钱物皆被掠一空。虽如此然其志不移。又往前追赶。在宁都，赶上了起义部队后卫25师，许光达便被编入了25师孙德清团3营11排，任排长之职。起义部队至汀州时，11连连长李逸虹他调，许升为11连连长。三河坝激战中，许光达身负重伤，留在了大埔北廿里的茂之前村养伤，一月后，从潮汕登一货轮，于11月底到达上海。许光达在上海正无着时，忽听到孙德清在安徽办学兵团，便同廖运周一起，赶到安徽寿县学兵团驻地，孙德清见是许、廖二人，自然很是高兴。

由于孙德清工作策略上的失误，活动被人发觉。柏文蔚得知孙德清以学兵团之名，暗收共产党员，大怒，亲赴寿县，要逮捕孙德清、许光达等人。孙等诸党员闻讯只得连夜出走，途中，彼此走散。自此，许光达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更名许泛舟，决定北上找党。经北平到了唐山，在唐山矿上以挖煤为生。四处寻觅，到处找

不到党组织，数月之后，许光达又南下找党。历经周折，直到1929年7月，才在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见到了孙德清。红6军成立时，中共中央军委便派二人赴洪湖，并任命孙德清为红6军军长。二人正要起身之时，孙德清突然患病，且病势沉重。中央便派了邝继勋为6军军长，许光达便同邝继勋一起到了洪湖。

邝继勋(有写旷继勋的——作者注)是怎样一个人?邝继勋，号集成，贵州思南人，出身贫寒。父为串乡卖药郎中。因家境艰难，继勋少时只读两三年私塾就帮家中谋生活。因而继勋深知穷人的苦难。辛亥风云时，随友人入川，投川军赖心辉部下当兵。因作战有勇有谋，三年之中，便升任为营长。时"五四"运动起，邝继勋为进步思潮所感染。虽身在军阀队伍内，亦不受其影响。1925年，邝继勋所在旅归四川督理杨森指挥。后杨森为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刘湘的联军击败，邝继勋部又被编为邓锡侯的江防军，邝任团长，驻防彭县一带。邝继勋旅旅长刘丹五，是国民党左派，很支持邝的革命活动。当部队驻彭县时，邝继勋的好友王文鼎从武汉归来，邝从王的口中，得知广东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邝继勋很是高兴，也在全旅内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又派人赴广东与共产党接头。这样，中国共产党便派了曾经赴法勤工俭学并留过苏的共产党员秦青川到达邝部，邝继勋见到秦青川，异常高兴，二人促膝相谈，十分投机，只恨相见之晚。秦青川自此留邝部工作。1926年底，经秦青川、王文鼎介绍，邝继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四·一二"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后，一些意志薄弱者，脱离了共产党，而邝继勋在这白色恐怖面前，却更加坚定沉着。用他的身份，保护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8年秋天，四川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杨子惠组成了"四川同盟军"，攻打盘踞于川东的刘湘。那邓锡侯便派了邝继勋的第7混成旅下川东作战。第7旅下川东后，旅长刘丹五便把旅长职务交给了邝继勋代理，自己回了成都，自此称病不起。刘丹五走时，对手下人说："人情

送到底，随集成去搞吧。"从此，第7混成旅便由邝继勋为代旅长。1929年6月29日邝继勋率第7混成旅四千多官兵，在蓬溪牛角沟举行起义，树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1路军"大旗。邝继勋为总指挥，罗世文为党代表，起义军震动了全川军阀。邓、田、刘诸军阀一起向起义军反扑，双方发生了激战。邝继勋身先士卒，率全旅官转战于南充、营山、梁县、达县，梁平诸县之间，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在梁平县虎城场、猫儿寨地区，遭敌前后夹击而失败。此后，邝继勋便只身来到了上海，中共中央准备要他去苏联学习，因他能双手打枪，且百发百中，便让他临时参加了"打狗队"。前文述过，"打狗也叫"红队"，是专门收拾叛徒的。邝继勋在打狗队里，打死了叛徒、铲共委员会主任白鑫，打伤了青帮头子黄金荣，吓得黄金荣连连写信给共产党机关，表示从此井水不犯河水。到了1929年12月，红6军成立时，孙德清因重病不能到职，中共中央军委便派了邝继勋赴洪湖任红6军军长。邝继勋便同许光达一起，到了监利县王家桥红6军军部。对邝、许二人的到来，周逸群、段德昌等人，自是高兴异常，不必多述。

洪湖水浪打浪

红6军成立之后，又加上中央派来了十数名能干的将领，顿时力量大增。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红6军移师新观寺，召开了纪念"二七"罢工的万人大会，誓师出征。1930年2月上中旬，顺利攻取龙湾、熊口、老新口、张金河等重要集镇。接着，又攻克了监利北部重镇新沟嘴和沔阳的渔洋镇，至此，江陵、石首、监利、潜江、沔阳诸县大体上联成了一片，那千顷波涛之中，飘起了激荡人心的歌声：

洪湖水哟！浪呀么浪打浪呀，
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
清早儿，船儿，去呀么去撒网，
晚上，回来鱼满仓啊——
四处野鸭和菱藕，
秋收满畈稻谷香，
人人都说天堂美，
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洪湖水呀，长呀么长又长啊，
太阳一出闪呀么闪金光啊，
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
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

国民党湖北省主席、清乡督办何成浚，闻知红军在洪湖势力大，一面申报南京，一面调兵遣将赴洪湖"围剿"。国民党第三编遣区主任刘峙，急令夏斗寅部再赴洪湖"剿赤"。但是，这时候，蒋冯阎大战酝酿正急，夏斗寅部也只能抽出两团人马。两团之兵如何能抵抗红军？红6军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1930年2月下旬，集重兵夺取了潜江城，俘敌警察局长、教育局长及土劣多人。3月初，西进再克郝穴，击败夏斗寅部两个营。中旬，段德昌亲率主力一部，再克观音寺，直逼沙市城。沙市之敌畏红6军之势，龟缩城中，不敢越雷池一步。随及，红6军又挥师南下，先后攻克长江南岸的重镇藕池、调弦口、石首城，缴获枪六百余支。此时红军声威，震慑了洪湖地区敌胆。大小土劣，纷纷逃窜。群众的革命斗争情绪，迅速高涨。1930年4月初，鄂西特委在石首的调弦口，召开了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五县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选举了周逸群等人组成主席团，周逸群任主席。五县联县政府成立之后，各县、区、乡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总工会、妇

女会、少先队、儿童团、赤卫队等等群众团体、群众武装，都得到了健全和发展。在苏区之内，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没收了地主豪绅土地，文化教育，卫生机构，亦相继建立和发展，整个苏区，一派生机勃勃。

4月中，段德昌赴上海参加了全国红军军事会议。中央要求贺龙领导的红4军与红6军迅速会合，组成红2军团。以便完成湖北省委的首先争取在湖北省首先胜利的计划。段德昌回到洪湖后，将中央指示精神立即向鄂西特委做了汇报，特委据中央指示，派了万涛赴湘鄂西，一面加强红4军的领导力量，一面传达中央关于4、6两军会师的指示精神。万涛便日夜兼程，到了鹤峰，见到了贺龙，把省委要红4军赴洪湖同红6军会师的指示进行了传达，又把红6军大战洪湖的情况做了介绍。贺龙听了，十分高兴。当即，对桑植、鹤峰苏区工作进行了安排，由汪毅夫代理桑鹤苏区的前委工作，鹤峰由贺英负责，桑植由贺文渊负责。之后，贺龙便秣马厉兵，挥师东下，直奔洪湖。

贺龙率领红4军四千人马，由鹤峰县城出发，经资丘、海洋南，本欲取道长阳、宜都、松滋，再奔洪湖，不料在经长阳的渔洋关时，遇到国民党川军第26师郭汝栋的三个团和五峰、长阳两县的团防拦截。原来，郭军得到了贺龙要挥师东下洪湖之意，便驱部阻挡。贺龙闻知后，避敌主力，首先攻占五峰，消灭五峰团防。郭汝栋见此状，急忙调集人马，直扑五峰。贺龙见郭军势大，如果硬拼，必遭损失。乃率红4军折回鹤峰，筹划改道东进。

贺龙率师回到鹤峰后。依然做东下洪湖的准备，到了5月中旬，得知蒋、冯、阎大战即将爆发，川军郭汝栋部已撤出鄂西，便率红4军二次东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松滋县、刘家场，继尔又占领了松邑、大市镇、磨市、划市、沙道观等地。这时候，松滋、石门、澧县三县团防及各种反动武装，纷纷出动，国民党独立第14旅彭启彪部一个团千余人也向红4军进攻。贺龙便决定集中兵力

首先攻打石门罗效子团防。在土地垭，双方接火，红4军的前卫部队是谷志龙第4团，因红军突然出现，罗效子惊慌失措，本来能够迅速将罗部击溃，而谷志龙却令部队举步不前，其原由是谷志龙与罗效子系结拜兄弟，便给罗效子留了一条生路，罗效子便趁机率团防逃跑，致使红4军失去了消灭石门团防之机。贺龙得知此情后，勃然大怒，要枪毙谷志龙，亏得万涛相劝，贺龙才平息怒火，却把谷志龙臭骂一顿。这谷志龙团多系土匪改编而来。连、营长中有八人系谷志龙的结拜兄弟，外号“八大金刚”。这八大金刚早就对红军艰苦生活不满，此时见谷志龙挨了贺龙怒骂，便纷纷来见谷志龙，鼓捣谷志龙反水。谷志龙是个头脑极简单的人，拍着胸脯说：“他贺龙算个屌，老子有枪有人有兄弟，不受他的屌气。老子带队伍去投川军，到那里弟兄们吃香的喝辣的。”

当下，谷志龙派心腹1营营长赵麻子到了彭启彪处，串通彭启彪，偷袭了红4军。使红4军吃了大亏。贺龙只得带部队又返回鹤峰，对伤员进行了安置，谷志龙及八大金刚没等跑脱，就被贺龙抓住，当即将其九人枪决。并将第4团解散，将谷志龙旧部人员编入其它团内。准备第三次东下洪湖，与红6军会师，就在这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个新军阀，发动了中原大战，都将各自兵力投到了大战上，自然无力对付红军，贺龙便趁此时机，率领红4军第三次东下。其先率部奔五峰，一举消灭了五峰新建团防，继而又攻打石门，时石门仅有罗效子的团防，罗自知不敌，不敢应战，慌忙逃窜。随后，贺龙又指挥红4军在松滋大败彭启彪旅，缴获弹药甚丰。遂又向公安城开进，抵公安县境时，罗效子决堤放水，阻挡红4军。贺龙只得又率部队返回松滋。这时，有侦察员报告，说红6军没有西进迎接4军，而是东进攻打汉阳，贺龙只得将部队留在松滋一带，继续派人打探消息。

红6军为何不前来迎接红4军呢？原来，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之际，也正是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之际，其命令湘赣红军攻打

南昌、九江，然后会攻武汉，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

这时候，湖北省委也相继召开了党代会和各种会议，通过了《湖北省委政治任务决议案》等文件，提出了完成地方暴动，集中红军进攻武汉、宜昌、沙市等中心城市，夺取湖北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当儿，红6军本当向公安、荆沙方向推进，迎接红4军，可湖北省委却在这时命令红6军向汉阳方向发展，配合鄂豫皖的红军进攻武汉。周逸群、段德昌、邝继勋等虽认为红军攻打武汉时机不熟，但命令又不能不执行。便由邝继勋带红6军东进，相继攻克了沔阳的仙桃，天门的岳口，汉川的系马口，汉阳的蔡甸。至此，红6军距汉阳仅数十里，使武汉震惊。此时，因武汉有国民党重兵守卫，围攻武汉的各路红军知道不能攻克，便分头退回。就在这当儿，中共中央又命令红6军迎接正在东下的红4军，使两军力量集中起来，再攻武汉。邝继勋便率红6军自汉阳蔡甸西移。行至沔阳时，红6军进行了改编，将1、2纵队改为16、17两师，由王一鸣和许光达分任师长。王鹤、李剑如分任政委。旋即又挥师南下，经监利的尺八口，渡过长江，分三路攻取了华容，全歼了守城团防武装数百人，接着，占了石首、南县部分集镇，随后转而向西，7月1日攻克公安县。

时贺龙正在松滋县河街子练兵，闻红6军抵公安，遂率红4军人马抵公安，两军胜利会师。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会面后，都分外高兴。

4、6两军公安会师之后，在城外广场上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当地的苏维埃政府送来了许多慰问品，会场上贴着许多红红绿绿的标语。战士们敲锣打鼓，唱歌跳舞，气氛十分热烈。庆祝大会之后，召开了两军联席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红4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2、6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并组成了军团前委会。由贺龙任军团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这时，孙德清已病愈来洪湖苏区，为参谋长。红2军团下辖2、6两军。2军军长由贺龙兼任，政委朱勉之；6军军长邝继勋，

政委柳直荀兼任。前委书记为周逸群。红2军下辖第4师和一个警卫团，4师师长王炳南、政委陈协平。红6军下辖16、17两个师。16师师长王一鸣、政委王鹤；17师师长许光达、政委李剑如。至此，红2军团共一万余人，枪五千余支。

这时候，蒋冯阎大战正酣，驻沔阳、潜江的国民党新5师东调。驻监利、沙市的"剿赤"军也开赴徐州。在鄂西除彭启彪旅和驻宜昌的李云龙旅等少数国民党正规部队外，大多数是保安队、常练队。面对此情，贺龙、周逸群主持召开了鄂西特委和红2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会上，贺龙、周逸群提出趁敌主力撤走之际，用三个月的时间，拔除根据地内部的"白点儿"，红2军拔除荆门、钟祥、潜江、京山、天门各县的"白点儿"；红6军拔除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各县的"白点儿"，而后会师潜江，建立巩固的洪湖根据地，然后，再搞南漳、谷城，与襄北红9军会师。使湘鄂边苏区联成一片。之后，再攻汉阳，与鄂豫皖打通。在谈到这个计划时，贺龙很兴奋地说："我和逸群碰了头，只要一年工夫，我们的计划就能实现，洪湖根据地人口多，粮食多，又有湖泊河网柴林苇荡做倚托，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周逸群、贺龙的意见，大家都拍手同意。谁知，就在这时候，湖北省委来了指示，却要红2军团攻打宜昌、沙市等重镇，完成地方暴动。然后攻打武汉。周逸群在会上将省委指示一传达，开会人都不言语了。段德昌说："不可攻打宜、沙，2、6两军刚刚会师，战术上彼此都不了解，攻打宜、沙这样重镇，恐怕力不从心，另外，敌人虽然'剿共'力量不足，可都龟缩在大小城市之内，加强了防范，我们若去攻打必将事倍功半。当前当务之急，是迅速拔除苏区内白点儿，扫除这些白点儿，对红军来说，犹如以石击卵，事半功倍。"

段德昌说完，贺龙说："德昌之言有理，现在2、6两军虽然合到一起，力量强了，但首要任务，是巩固扩大苏区。省委指示，不符合实际，不应执行，把我们的意见，向省委反映。"

贺龙、段德昌的意见，大家都同意。会毕，贺龙率领2军，一举扫除了龙湾、熊口等白点，然后跨东荆河，解放了潜江县城，迫使残敌退入襄河以北。贺龙复又指挥部队北渡襄河，攻占了天门重镇岳口。段德昌率6军赴沔阳，先后攻克新沟嘴、府场、杨林尾等地，那残敌退至东荆河以北，自此，洪湖苏区的江陵、监利、潜江、沔阳等县联成了一片。一时间，红2军团声威大震。

之后，贺龙、周逸群又指挥红2军团人马消灭了洪湖中最反动的会道门白极会。

湖北省委的道道"金牌"

贺龙、周逸群、邝继勋、段德昌等指挥红2军团人马消灭了洪湖中最反动的会道门白极会后，准备一举拔除监利县城这个"白点"时，湖北省委第三次下了指令，其指令写道：

> 现在前委本身很右倾，当2、6两军会师时，全鄂西反动统治动摇非常，尤其是沙市市面恐慌已极，而当时敌驻军也仅一师，且红军声势浩大，群众斗争情绪异常高涨。此时，红军应立即攻占荆沙，而你们且以声东击西的办法攻监利，监利不克，又提出拔除数县内的"白点儿"，游击于潜、天一带，攻下潜江、岳口后，又经江陵返洪湖。省委两次督促你们进攻荆沙，均不见回信，中央的方针是集中进攻，而你们是只集中不进攻。

贺龙看罢信，口噙烟斗，默然无语。周逸群说："文常，你们的意见呢？"

贺龙把烟斗握在手中，斩钉截铁地说："我的意见，荆、沙重镇

不能打，攻打这样的城市，我军不光缺少重武器，士兵更缺乏攻坚经验。”

周逸群在地上走了两圈儿说：“省委不了解情况，只知发号施令，目前红军攻打沙市，稍有不慎，定遭损失。”周逸群说着，抬眼望着贺龙说：“我们召开前委会，由前委做出决定吧。”

贺龙同意了周逸群的意见。当下，召开了前委会。前委会上，一致认为红2军团不宜攻打沙市、宜昌，而仍以巩固苏区为根本方针，首先应拔除监利之敌。

监利城地处洪湖苏区中心，拔除这一据点儿，对于巩固扩大根据地，关系极大。9月初的一天，大雾弥漫，正好用兵。红2军团大队人马正要开拔，忽然一人飞马而来，直奔军团团部。贺龙正待上马出征，见那人直奔他而来。

来人是中央巡视员、红2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贺龙握着柳直荀的手，见他一身衣服被浓雾打湿，知道赶了许多路，便问道：“直荀，什么事这么急急地赶路？”

柳直荀一指身后之人说：“文常你看谁来了？”

贺龙定睛一看，原来柳直荀身后还有一人，不是别人，正是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贺龙忙上前握住周小康的手。这时，周逸群也来了。大家进屋落坐，周小康开口便问道：“省委的几次指示信你们都收到了吗？”

周逸群说：“都收到了。”

周小康说：“为会么不攻打荆沙？”

周逸群说：“我们召开了前委会，大家一致认为攻打荆沙，红军的力量不够，便决定攻打监利，正要出发。”

周小康听了，脸色沉着说：“部队行动暂停，我们马上召开会议，研究红2军团行动事宜。”

贺龙、周逸群见说，只好命令部队停止军事行动，回原驻地待命。

当下，红2军团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周小康、柳直荀、贺龙、段德昌、邝继勋、段玉林、王炳南、朱勉之、孙德清、许光达、王一鸣、王鹤、陈协平等师以上军政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一开始，周小康便严肃地说："2、6两军会师后，军团前委拒不执行省委攻打荆州、沙市的指示，这是军团主要领导干部思想上的右倾的表现，省委的指示，是中央的精神。中央认为，全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到来，要组织暴动。自中央到各省、各地区，都要成立暴动行动委员会。国际的形势，是帝国主义要武装进攻苏联，我们的军事行动，就是对苏联的支持。国内的形势，军阀正在混战，其结果，必定是两败皆伤，自取灭亡，蚌鹬相争，渔人得利，我们现在要做渔人。中央已命令红3军团攻打武昌，红1军团攻打汉口，我们红2军团，攻下荆沙后，便挥师东下，进攻汉阳，达到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目的。"

周小康讲完，柳直荀说："我和小康前来，就是怕大家思想上右倾，认识不到当前革命的新形势，缩手缩脚，贻误战机，据我们掌握的情况，2、6两军会师之时，鄂省震动，荆沙两城之敌，十分恐慌，若当时一鼓而击之，必获大胜，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用大部队去拔'白点'儿，那些白点儿，赤卫队就能解决，杀鸡焉用牛刀？如今，攻打荆沙，时机尚不为迟，我们当从速决定，落实省委的指示。"

周小康、柳直荀说完，周逸群道："攻打荆沙之事，我们前委反复研究过多次，均觉力不从心，既然中央、省委、特委都这样指示，我们当服从命令，尽全力拿下荆沙两城。"

柳直荀问贺龙道："文常，你的意见呢？"

贺龙说："中央纵观全局，运筹帷幄，要在一省或数省内举行暴动，气魄不小，全局情况，我不了解。至于2军团攻打荆、沙两城，不是不可，只是准备尚不足，2、6两军合到一起，也只有万人，部队远不如我那20军，且武器又落后，此等攻坚之战，部队也没打过。只怕劳而无功。"

贺龙说到这里，段德昌接过话说："据我们侦察，沙市城中，工事坚固，有守军李虎臣一个师，李虎臣是何成浚手下干将，极善防守。自我2、6两军会师后，工事加强。……"

周小康打断段德昌的话说："如果2、6两军会师后立即攻打沙市，使敌措手不及，就不会使敌有喘息之机了。"

段德昌不高兴地说："难道沙市不下，是我等惧敌不成？"

周小康说："至少是思想上右倾。"

这时，邝继勋说了话："既然中央、省委、特委都有决定，我们就执行命令吧。"

贺龙吸了口烟后，手握着烟斗说："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打沙市的作战计划吧，攻打沙市，我意先打下沙洋镇，沙洋镇位于交通要道，是沙市敌之屏障，打下沙洋镇，断敌援退之路，再一举攻克沙市。"

贺龙的意见，大家都赞同。当下，贺龙、周逸群便下了攻打沙洋镇的命令。经过一番准备之后，红2军团分两路攻打沙洋镇，不消半日，沙洋攻克。部队稍事休息，便向沙市发动进攻。红2、6两军约九千人，从黄昏起，在城外东南之栖霞寺附近，双方激战竟夜。红军战士虽然都作战勇敢，冲锋陷阵，个个奋勇当先，只是从未经过较大规模正规战的训练，没有攻打过沙市这样大的城市，与敌接火后，互相动作欠配合。在一个阵地上，这里冲锋，那里撤退，有的攻进去了，反遭到自家人攻打，红6军的一个连好不容易登上了城，却被红2军的炮连轰了下来。双方战斗到第二日上午时，红2军10团团长张一鸣阵亡，有许多营连等干部和战士牺牲。这时候，游弋在长江的日本帝国主义军舰"热海号"，中国炮舰"旗胜号"，从美孚火油公司附近对红军施行猛烈炮击。英帝国主义军舰"列迪巴笃号"在沙市下游六里向左岸之红军开炮射击。贺龙看到攻打不下，便对邝继勋、段德昌说："这吃亏的仗不能再打了。"

段、邝二人也都同意撤退，贺龙便下了撤退的命令，红军遂又

撤到了沙洋镇。这一仗，红军伤亡了上千人。为安置伤员，遂又撤退到了江陵的普济观。攻打沙市的失利，使得部队情绪很低落。

红2军团撤到了普济观后，军团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时，中央和省委又来了指示，要红2军团配合红3军团攻打长沙。贺龙、周逸群、邝继勋、段德昌等人都认为打长沙不妥，依然主张红军在江陵、监利、沔阳、潜江、京山、天门、钟祥、荆门等各县游击，拔钉子，扫除地主反动武装，扩大影响，开辟汉水北岸的根据地。面对实际，周小康、柳直荀也都同意。当下，作出决定，红6军在江、潜、沔、潜一带活动；红2军在京、天、钟、荆一带活动，决议刚刚做出，就在这时，邓中夏来到了红2军团。

第十五章　邓中夏赴洪湖苏区

工 运 领 袖

邓中夏乃湖南宜章县人，原名邓康，又名邓仲澥，字安石，生于1894年。其父乃清末举人，出任过省参议员、县长等职。邓中夏八岁入私塾，以后在县办小学、衡阳中学、郴县中学念书。二十岁考进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1917年，在他二十岁的时候，随父来到了北京，7月间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系。1920年10月，李大钊、邓中夏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发起了北方党的最初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自此，邓中夏便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北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邓中夏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政治性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并与天津

“觉悟社”周恩来等交往，探讨马列主义问题。当时，共产主义小组专门创办了一个指导工人运动的周刊，名叫《劳动者》，邓中夏参加了这个周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为了唤起工人同志的觉悟，邓中夏来到了长辛店铁路工厂，办起了一所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为便于接近群众，邓中夏将自己的名字“仲澥”改为“中夏”。1922 年 5 月，邓中夏被选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同年 7 月，他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任。在邓中夏的组织领导下，1922 年 8 月，长辛店车辆厂三千名工人举行了大罢工，邓中夏挥笔写下了“清操厉冰雪，赤手缚龙蛇”的条幅，挂在了自己的屋中，这幅对联，上联摘自文天祥的《正气歌》，下联引自《孙樵集》。这年 10 月，邓中夏又到了开滦，组织领导了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矛头直指英帝国主义统治，这次罢工，由于准备工作不足，失败了。邓中夏却依然对胜利充满着信心。他吟诗作歌道：

哪有斩不掉的荆棘？
哪有打不死的豺狼？
哪有推不倒的山岳？
你只须奋斗着，
勇猛的奋斗着；
持续着，
永远的持续着；
胜利就是你的了！
胜利就是你的了！

1925 年，由日本帝国主义开办的上海第八纱厂粗纱部全体工人无故被厂方开除，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全厂一致决定罢工，中

共中央为加强罢工的领导，组成了由李立三、邓中夏负责的罢工委员会。邓中夏废寝忘食地做罢工工作。一天，他在苏州河北岸潭子湾召开大会时，上海警察厅派了数百名警察，荷枪实弹地将群众包围，邓中夏面无惧色地站在了一个山头上，振臂高呼："我们被东洋人压迫着，中国人不要压迫中国人！"这次罢工，邓中夏被捕，由于没暴露身份，没有遇害。5月30日，上海各学校两千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在公共租界进行反帝示威，散发"打倒帝国主义"等传单，揭露5月15日帝国主义枪杀上海日本纱厂工人顾正红事件的真相。学生游行队伍行至南京路时，突然遭到巡捕的逮捕与屠杀，造成"五卅"惨案。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气焰，邓中夏同苏兆征、陈延年等于1925年6月，在香港领导了省港工人大罢工，邓中夏担任工人纠察队训育长。他领导纠察队封锁了东起深圳，西抵前山的海口。禁止所有轮船开往香港，切断了香港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使得香港一时间变成了死港、臭港。邓中夏不顾工作辛劳，苦战三个通宵，挥笔疾书，写成了《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阐明了省港罢工经验。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之久，在政治上、经济上给英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支援了北伐。省港大罢工的组织与领导，充分显示了邓中夏的革命才干。在这期间，他担负着中共广东区委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总顾问和党团书记、《工人之路》的主编、党报《人民周刊》的编委等要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共江苏省省委机关被国民党反动派破获，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牺牲。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调邓中夏担任江苏省委书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邓中夏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1930年7月19日，邓中夏回到了上海，中共中央分配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宣传部长。这时候，红2军团在洪

湖地区组成，邓中夏便被派到了洪湖，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2军团的政治委员。8月9日。邓中夏化装成一名教书先生，乘江轮从上海动身，到了武汉，搭上开往洞庭湖的篷船。船到牌州时，篷船又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官差，运给养到岳州。一路之上，亏得邓中夏机警应酬得宜，方安然无事。船至岳州，邓中夏从容离船上岸。适岳阳楼便在岸边。这岳阳楼历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盛誉。邓中夏信步上楼，望着莽莽洞庭之水，不由得百感交际，忍不住吟诗一首：

莽莽洞庭湖，烟波浩渺处，
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路，
问今何为世？豺虎满道路，
禽狝残除之，我行适我素。

莽莽洞庭湖，我今欲飞渡，
秋水含落辉，彩霞如赤炷，
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
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

邓中夏在岳州停留了两日，看看没有人注意自己，便又搭了一条货船，开往洪湖，船行一天，在一个叫白螺叽镇的码头停了下来。邓中夏上岸后，又行了九十里旱路，到了洪湖苏区的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天，到了红2军团后方办事处，邓中夏没有休息，便由办事处同志带队，到了红2军团指挥部。

贺龙、周逸群、柳直荀、邝继勋、段德昌等人，见到了邓中夏，大家都分外高兴，知道邓中夏是党内的老同志，革命斗争经验丰富。

当下，贺龙、周逸群便把军政各方面情况向邓中夏做了汇报，特别提出了不宜攻打长沙的决定，邓中夏听了，没有吭声。

罢官周逸群

在邓中夏由上海动身赴洪湖之时，中共中央要他到红 2 军团后，迅速纠正红 2 军团前委不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右倾态度。并说明攻打长沙，取得一省和数省的胜利，是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所以，邓中夏听了贺龙、周逸群对打长沙的消极态度之后，立时沉默。他思索了一阵说："同志们，你们介绍的情况都是实际情况，红军攻打沙市失利，是要做为教训吸取。但是，我们要把目光放远，不要只盯着洪湖一地，这是狭隘的农民意识作怪，中央和共产国际，高瞻远瞩。中央的指示，我们要坚决地执行。当然，执行中会有困难，攻打沙市的失利，使得我们的士气不振，我们当鼓舞士气，我同意先攻克监利，以便增强部队打长沙的信心。"

邓中夏在党内的资历很深，又刚从苏联回国，并且是中央指令的红 2 军团政委，他的话，贺龙、周逸群等人，自然认真去听。虽然这些人都不同意打长沙，可邓中夏拿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上方宝剑"，也就没人再提不同意见了。于是，前委会做出了决议，决议共两条。内容是：

> (一)、2、6 两军目前中心任务是遵照中央指示，移兵渡江，截断咸宁至岳州之武长铁路，并占领岳州，与 3、4、5、8 军配合行动，首先取得湖南的革命胜利。
>
> (二)、渡江必须迅速，惟渡江之前先攻下监利。攻下监利，鄂西赤色区域不致因红军渡江完全抛弃，可以立足，可以声东击西，乘敌不备的渡江。

当时，监利城以及新堤、沔阳、仙桃等洪湖内重要城镇，均在敌

入手中。唯监利城地处洪湖中心，紧傍长江北岸，是国民党"讨逆军"阻塞洪湖苏区根据地南北通路的最大据点。仅县保安团就有十六个连之多，1928 年以来，红军曾两次攻打监利不克。因此，拔除这一据点儿，对于巩固后方和红军渡江南下，关系重大。

阴历八月初的一个晚上，乌云密布，攻打监利开始，经过一夜战斗，监利被攻克。歼灭了西北军新 3 师龚炳垣教导团和监利县保安团两千余人，缴枪千支。第二天，在城中上清观前空场上，红军前委召开了祝捷大会。

大会之后，红 2 军团前委和鄂西特委召开了联席会议。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决定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邓中夏为特委书记、红 2 军团政委，周逸群被免去了红 2 军团政委职务，改做地方工作，代理湘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免去鄂西特委书记，改任为湘鄂西特委组织部长。邓中夏宣布完任命之后，段德昌冷冷地说："周逸群同志做特委书记，非常合适么，干什么还要用代字？"

贺龙等人都望着邓中夏，邓中夏也从众人目光之中，看出大家对周逸群职务的安排不满。邓中夏也知道周逸群是能文能武的好同志，可中央的决定，邓中夏也不好推翻。邓中夏知道，中央所以要撤掉周逸群之职，就是因为周逸群几次不坚决地执行中央、省委的指示，认为他思想右倾。可这个意思，邓中夏又不便明言。当下，他说："德昌，调逸群到地方工作，是中央从全局的考虑，是为加强洪湖苏区的建设，至于有无代字，无关紧要，都是革命工作么，逸群同志也不会有许多考虑的。"

周逸群微笑地对段德昌说："德昌，中夏说的对，只要是党交给的工作，干什么都可以。目的是要把工作干好。"

周逸群这样一讲，大家都不再说什么了，联席会议再次讨论攻打长沙之事。这时，段德昌将一张汉口出版的《国民日报》拿了出来，说："这是几天前的报纸，报上讲了红 3 军团已于 8 月 3 号撤出了长沙，退到了醴陵。"

邓中夏接过报纸，草草地看了一眼后，问段德昌："你的意思呢？"

段德昌不假思索地说："敌人报纸既然告诉我们红3军团已退出长沙，我们侦察员侦察的情况也与这报上说的一致。我们红2军团，没有必要再远离苏区去攻打长沙，如此孤军深入，其结果怎样，大家都很清楚。"

段德昌的意见，到会者大都赞同。邓中夏见此状，不由得站立起来，面带不悦之色说道："同志们，我们决不可以坐井观天。当然，渡江南征攻打长沙是非同小可之举，可我们依然要渡江作战。不管1、3军团是否退去，我们的决心不变，这是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是我们如今渡江南征作战的任务有所改变。前者任务是截断武长铁路并占领岳州，堵住武汉的白军，好让1、3军团在湘境内消灭所有在湘之敌，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占领岳州，而后长驱直捣长沙，以激起1、3军团对长沙的反攻。"

在当时的红军之中，政委有最后的决定权。既然邓中夏坚持要攻岳州打长沙，大家只好服从。当下，分头去做渡江南征的准备。

邓中夏下令攻长沙

在邓中夏下令红2军团攻打长沙之际，必须把红军1、3军团攻打长沙的情由略述一遍。

红3军团是1930年6月由湘赣的红5军、红8军、红16军组成，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1930年的6月20日前后，红3军团刚刚成立，在大冶、阳新边界的三江口附近休整，这时候，赴上海参加中央军事会议的滕代远回到军团。传达了中央军事会议精神，这精神就是组织全国暴动，实现一省和数省的胜利。中央命令红3军团进攻武昌，配合红

2军团夺取汉阳、汉口，配合红1军团夺取南昌。这时，武昌守敌有6团之众，并有坚固的工事，江面上布满各帝国主义兵舰，长江正是涨潮间，南湖水满，沿江只有一条大堤，若攻武昌，只有沿大堤才能接近城墙。而国民党钱大钧部十二个团正驻岳州，罗霖1师住阳新，红军若攻打武昌，前有坚城，后无退路，侧长江、背南湖，实在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彭德怀听了滕代远传达的任务，立即说："这腹背受敌之仗不能打。"

滕代远说："我也考虑这仗不能打，只是中央一再要我们攻打，这样的命令，不执行怎么行？"

彭德怀思索良久说："这样吧，我们先打下鄂东南六县武装，然后占领岳州。做好攻打武昌的准备。"

彭德怀的意见，滕代远同意。随即，彭、滕二将指挥红3军团消灭了鄂东南六县地主武装。哪六县？鄂城、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而后，彭德怀又以一部分红军进占金牛、鄂城，虚张声势要攻打武昌，敌军中计。把钱大钧两个师，星夜运往武汉。此时，岳州便成了一座空城。彭德怀便趁机率红3军团主力，一举攻克了岳州。缴获了不少弹药及大批军用物资，还有七五野炮和山炮。

红3军团克岳州后，武长路交通断绝，敌惊恐万状，国民党武汉行营即调驻长沙的15师一部，驻咸宁罗林部、钱大钧部向红3军团攻扑。彭、滕二将趁敌兵力尚未集中，便于7月5日，主动撤出岳州，重返平江。这时，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急调第16师危宿钟部，19师陈光中部共四旅之众，分两路进攻平江。双方激战于金井，战斗异常激烈，红3军团在湘鄂赣独立师增援下，一举击溃敌人的防线，歼敌过半，红军乘胜追击，击溃敌之第3梯队。随后，红军强渡榔梨河，继续向长沙猛扑，何键慌忙在长沙外围榔梨市一带，集中陈光中、危宿钟残部及刘建绪等四个旅，阻击红3军团的进攻，双方激战于长沙城东阵地，从中午战至夜半，又从夜半打至天明，拂晓前攻破刘建绪部守军约5团之众的阵地，国民党军败

逃，红3军团遂占领了长沙，自谓“与省市共存亡”之何键，只身逃于湘江西岸。这时候，蒋冯阎大战正酣，何键此时对双方均不表态，而用全部精力来对付红军，反攻长沙。8月5日，何部刘建绪、罗藩瀛两师，自湘潭直扑长沙；国民党中央军罗霖、公秉藩两师自湖北开入湘境汨罗一带；陶广师王东旅由三汊矶渡河逼进长沙。英帝国主义十余艘小型浅水舰也向红军发难。形势顿转严重，彭、滕见长沙不能固守，便指挥部队，主动撤出长沙，转战于平江、浏阳一带。

红3军团撤到浏阳一带后，得知朱德、毛泽东率红1军团到达永和市。彭、滕便率部到永和市与朱毛红军汇合。原来，朱德、毛泽东所指挥的红1军团，也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援助红3军。

红3军团与红1军团会合之后，双方召开了前委联席会议，遵照中央的指示，成立了红1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红1方面军成立之后，中共中央再次下令，命令红1方面军再攻长沙。当时，朱、毛、彭、滕都认为时机不至，一来探知长沙之敌已有准备，二来红军也迫切需要进行短期整训。但是，中央命令，又不能不执行，只好再打长沙。

自从红军主动撤离长沙后，何键下令大肆修筑防御工事。其工事全长数十里。工事共分三道，第一道为巨型鹿砦；第二道为密布的竹钉；第三道是高大的电网。四周碉堡群立，每到晚上，灯光照耀如同白昼。

红1方面军发起二战长沙之役后，首先血战文家市，歼灭了三个整团之敌，而后，以雷霆万钧之势杀向长沙。

由于长沙之敌已有充分的防御准备，红军失去突袭的机会，结果变成了阵地战，双方战斗异常激烈，彼此伤亡很大。旷日持久，红军久战不下，所部弹药和给养日益缺乏，而国民党武汉行营也派了罗霖、公秉藩、钱大钧等数师之众入湘，企图抄红军后路，蔡廷锴、郭汝栋两师兵力也奉蒋介石之命赴湘增援。国民党湘鄂号铁甲车及飞机等现代化武器，均一起用上。英、美、日各帝国主义兵舰也助

桀为虐，在此形势之下，毛泽东说服了众将，决定红军撤离长沙。9月5日，红1方面军分头向株州、浏阳、平江撤退，安全返抵赣南。红1方面军刚刚撤退到赣南。邓中夏便下令红2军取岳州再攻长沙。就在大部队刚刚出发之时，中共中央又派了两名干部，前来加强红2军团的领导力量。这两个人，一个名叫汤慕禹，一个就是刘鸣先。汤慕禹系四川人，黄埔四期学生，后到苏联留学，刚刚回到国内，便被派到洪湖苏区。刘鸣先原在红军中工作一段时间，后调中央，如今中央为加强苏区干部力量，便派刘鸣先同汤慕禹一起到了洪湖。

汤、刘二人到了洪湖时，红2军团已撤到了朱和镇，汤、刘二人至朱河镇，会到了红2军团前委，向邓中夏、贺龙等报告了中央令红2军团停止向长沙进击的指示。

罢官段德昌

既然中央有了停止进击长沙的指示，邓中夏不再坚持己见，这时，中央调邝继勋离开了红2军团，另有任用，前委便在朱河镇上开了会议。会议没开始前，邓中夏私下对贺龙说："段德昌是个炮筒子，打游击还行，指挥一个军我看不能胜任，由汤慕禹取代吧，汤慕禹在苏联学习过军事。我很了解他。"

贺龙听了，立时说道："不可，段德昌有勇有谋，创建洪湖根据地，德昌做出巨大贡献。"

邓中夏吸了吸嘴唇说："中央意见要汤慕禹任军长，段德昌不拿下来，汤慕禹怎么任命？"

原来，汤慕禹跟邓中夏二人私交很好。邓中夏与段德昌几次接触，见段德昌冲撞自己，便对段德昌没甚好感，正好趁此机会将段德昌职务撤换，他怕贺龙在会上阻挡，便先私下与贺龙通通气。贺

龙果然不同意。贺龙见邓中夏坚持要安排汤慕禹，想想说："我不再兼2军军长职，由孙德清任2军军长，汤慕禹代替孙德清的军团参谋长职务。"

贺龙如此一说，邓中夏虽然心中不大乐意，可也不好说别的，这样，便由孙德清任红2军军长，汤慕禹任红2军团参谋长。段德昌为红6军军长。前委会议决定，为了准备随时能渡江配合红1方面军攻打长沙，当迅速攻克新堤。这新堤紧靠江边，不仅能做大部队往来渡长江之处，还可以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俟收复新堤后，若部队不须立时渡江，便可西进攻取沙市。

当下，红2军团首先攻新堤，因新堤地理位置左江右湖，防御坚固，未克。这时，又接到中央的指示，要红2军团迅速渡江，截断武长路，尔后进攻岳州。于是，红2军团前委经过讨论，决定由石首渡长江，进攻南县、华容、公安、澧县、常德、安乡等县，造成湘鄂西赤色区域。

决定做出之后，红2军团在石首南渡过长江，立即兵分两路，段德昌率领6军打华容，贺龙率2军打南县。

红2军打下南县之后，邓中夏要贺龙攻打安乡。贺龙听了，说："安乡现在还打不得。"

邓中夏说："何以见得？"

贺龙说："部队由南县至安乡，途中要经五条大河，如此背水之战，如果打不好，将使部队处于覆灭之地。"

邓中夏听了，很不高兴地说："要是打得好呢？"

贺龙说："冒如此大的危险，不值得。"

邓中夏本是一出色的工人领袖，而对于军事，他确实是不懂。他见贺龙坚持不攻安乡，虽然心中极不快，还是平下气说："云卿，依你之见呢？"

贺龙说："先打津市、澧州。"

邓中夏见贺龙不大尊重自己的意见，虽然表面依从了，但内心

中不是滋味儿，便说："我去 6 军，2 军的事，你决定好了。"说定拂袖而走。

邓中夏走后，贺龙心中也觉得很别扭，便坐在屋中，闷头吸烟。这时，卢冬生走了进来，他见贺龙神色不快，忍不住问道："总指挥，看你似有什么心事?"

贺龙叹了口气说："刚才我与中夏弄了不高兴，他甩手到 6 军去了。中夏是老党员，又是军团政委，在党内外威望很高，我从心中很崇敬他，可他对打仗这一套，确不大懂，刀枪之举，不似写文章，枪炮一响，就要流血，非同儿戏。他一定要打安乡，打安乡是背水之战，实是要冒大险，我不能坐视不理，非不得已才与他争执。"

卢冬生听了，用埋怨的口气说："中央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个不懂军事的人来当军团政委?逸群同志不是很合适么，为什么一定要撤换?"

贺龙长叹一声说："撤换逸群，真似断我臂膀呀!"

这样，贺龙便同孙德清一起，指挥红 2 军连克津市、石门、临澧三地，消灭了川军张英、马坤山等部。在临澧邮电局，孙德清得到不少国民党报纸。从这些报上，知道红 1 方面军已远离长沙，蒋冯阎大战已接束，蒋介石得了手，已乘飞机飞到了南昌，要亲自布置"剿赤"事宜。孙德清便把这些消息说给贺龙，贺龙听了，说道："形势将对红军不利，我们应当立即撤回洪湖根据地内，准备迎击敌兵的'围剿'。若部队继续留在这一带，这里的群众基础薄弱，且四面受敌。"

孙德清说："中夏同志会同意吗?"

贺龙想了一下，把手中烟斗往桌角一磕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传我命令，部队立即撤到河口。我亲自去见中夏，以利害说他。"当下，贺龙便带上报纸，带两名勤务兵，飞马到石门，在石门关帝庙内，贺龙见到了邓中夏。拿出报纸，说道："中夏，这是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上边说蒋介石要坐镇南昌，指挥'围剿'红军事宜。我们

应当立即将部队撤回洪湖苏区，准备反击敌人的'围剿'，时间紧迫，来不及和你商量了，我已把部队带到了河口。"

邓中夏听贺龙说完，很不高兴地说："云卿，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这样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更深一点儿说，是你旧军人的恶习不改。"邓中夏本想说："你眼中还有我这政委吗？"话到嘴边儿又咽了回去。

贺龙见邓中夏面色冰冷，他坐了下来，吸着了烟，抽了一口，这才说道："中夏，你怎么批评我都行，打仗的事儿，我好歹比你多打过几次，蒋介石这个龟儿子，心毒手狠，我们不可儿戏。"

邓中夏把手中报纸往桌上一扔，国民党的报纸，多系造谣，怎能依此为依据。"

这时候，段德昌从外边走了进来，插话道："中夏同志，云卿说的，做的都对。即使敌人报纸满篇都是假话，我们也要返到江北了，要做好巩固苏区的工作，准备迎击敌人的'围剿'，如今，蒋冯阎大战已到了尾声，蒋介石又占了便宜.下一步，势必要进攻苏区了。"

邓中夏本是清高之人，又听不得不同意见，他见贺龙把部队带到了河口，心下已不高兴，这时见段德昌过来支持贺龙，他心中更是不高兴。遂说道："部队的行动，按原计划行事，继续攻打津市澧州，有事我这政委担当。"说完，拂袖而走。

屋子里只剩下贺龙和段德昌，段德昌只气得面色青紫，贺龙也怒眉高挑，忽然，段德昌把桌子一拍，说道："胡子，如此下去，红军必败无疑矣。"

贺龙又装了袋烟，慢慢地吸了几口，那怒挑的双眉渐渐地复回了原位，他走到段德昌身边，说道："德昌，中夏是党内的老同志，革命斗争的经验比我们丰富，也许我们的看法错了。"

段德昌叹了一口气，说："胡子，中夏资历、斗争的经验确比我们丰富，可要论洪湖苏区军队的事，他不如我们了解呀。"段德昌又说，"明明不对，却偏要我们去执行，咳！这样下去，我真为洪湖担

忧，为红军前途担忧。”

贺龙听了段德昌的话，只是闷头吸烟，没再言语。

就在这时候，周逸群和万涛派人送信与前委。值班参谋将信送与贺龙段德昌。贺、段拆信一看，但见信中写道：

邓、贺、汤、段、孙：

假如一、三军团又进攻长沙，则我们应配合这一行动，而今，据各方消息，说明一、三军团已远离长沙，敌大军正在云集，大有“围剿”红军之势，红军当速返苏区，做好保卫苏区的准备。

逸群、万涛、小康

贺、段二人看罢信，找到邓中夏，把周逸群等人的信给邓中夏看了，邓中夏不以为然地说：“周逸群他们也未免小题大作，惊弓之鸟怎能搏击长空？”

既然邓中夏决心攻打津市澧州，贺龙、段德昌只好执行，当下，贺龙带2军攻打澧州，段德昌带6军攻打津市。

驻津市守军为李千峰师。这个师参加了蒋冯阎大战，为蒋氏立了战功，凯旋回汉，又奉命开赴津市，士气正盛。红6军分两路进攻，结果，6军虽夺得津市，但损失很大，参谋长刘仁载中弹阵亡。

澧州守敌为陈渠珍第3师，师长陈运夔与贺龙原有旧交，见贺龙率兵攻城，忙派人送信与贺，信中说道，只要贺龙不攻澧州，他愿与红军友好，彼此互不相侵。贺龙不理，仍发兵攻打。由于城池坚固，澧州急攻不下。而这时，蒋介石任命原鲁系、后改编为蒋部的鄂籍将领徐源泉为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统一指挥第48、34、11、新11、新34师及川军第21军教导师和新2、3、5、7旅，暂编第19旅、湖北警备旅、何键驻湘西的李觉部、李国钧部、周燮卿部、刚刚编入蒋介石第2军的夏斗寅部，分江南江北两路，直扑洪湖和湘西、鄂

西苏区。

时贺龙见澧州战斗旷日持久，不能结束。且敌大军已至，只得撤退。1930年12月9日，红2军团的6军撤到了松滋县境内的杨林寺、街河市一带。2军撤至公安一带。这时候，强敌已占公安城。贺龙遂指挥2军打退入侵公安之敌。之后，命令第12团派兵掩护伤病人员及物资返回洪湖。至此，红2军团渡江南征目的未达，而部队却损失很大。

就在红2军团人马撤到杨林寺一带时，敌军也分路向洪湖苏区大举进犯。因主力停留在公安、松滋一带，监利、华容，潜江相继失守，苏区告急书雪片般飞向红2军团前委。

红2军团撤到杨林寺、公安、街河市一带后，总指挥部便设在了杨林寺西口的一处破药王庙之中。刚刚住下，洪湖苏区派人来送信，信中要邓中夏、贺龙速带红2军团返洪湖。在这药王庙大殿之内，召开了红2军团前委会。开会的有邓中夏、贺龙、孙德清、段德昌、汤慕禹、柳直荀、许光达、王一鸣、王鹤、王炳南。会议一开始，邓中夏说："如今敌人向洪湖苏区发动了大举进攻，刚才，接到了特委的告急信，我们现在就要研究一下军团的行动方针。"

邓中夏话音儿一落，段德昌说："立即回师洪湖，迎击敌人的围剿。"

贺龙、段德昌、孙德清、许光达等当即表示赞成。

邓中夏说："洪湖，不能回去，为什么不能回呢?原因很简单，洪湖系水网地带，河流湖泊太多，打游击是个好地方，而不利于大部队行动，我的意见，部队向松滋、枝江一带发展，创立第二个中央苏区。"

邓中夏刚一说完，段德昌立即说："离开洪湖，我不同意，洪湖人民养育了红军，而今敌人要屠杀洪湖人民时，我们却离开他们，我们怎么对得起洪湖人民?"段德昌平缓了一下语气说："洪湖地区多水泊，这正是我们反击敌人的有利之处，红2军团指战员，大都

转战过洪湖，有许多是洪湖中长大的，熟悉洪湖的草木，而敌人，不熟悉洪湖中的情况。洪湖水泊苇荡不是我们的障碍，是敌军的障碍。”

段德昌发言的时候，邓中夏沉着脸不吭声，段德昌像没看见一样，继续说道：“中夏同志说创第二个中央苏区，此提法我认为不妥，中央苏区只能是一个，我们不能另立中央苏区。”

段德昌说完，贺龙说：“我赞成德昌的意见，红军不能离洪湖，更不能提什么中央苏区。”

这时候，汤慕禹吸了吸嘴唇两声发了言。汤慕禹眼珠儿滴溜溜地转了一圈儿说：“中夏的意见也不无道理，洪湖地区是湖泊之地，大部队行动，确受阻，况且敌人‘围剿’的目标在洪湖，我当避其锋芒。当然，德昌、云卿的意见也有其对的一面，我们红2军团的成员，特别是6军，大都是洪湖人，如今听到敌人进攻洪湖，若不去救，从感情上说不过去，但是，越是这样，越要冷静，这是战争，是流血的，不能以感情用事，那样，我们要犯大错误。”

段德昌火了，他眉毛一挑说：“什么叫感情用事？敌人来了，我们跑了，把苏区人民丢给了敌人，任敌人随意屠杀，我问你，这是什么感情？”

邓中夏说：“德昌，你要冷静，慕禹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应当上山建立根据地，利用山地，同敌人周旋。朱、毛不就是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么？”

贺龙、孙德清、许光达、王炳南依然都主张回师洪湖，认为洪湖群众基础好，大敌当前，群众的这种革命精神尤为可贵。不同意在此时开辟新苏区。邓中夏听了，不高兴地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部队的行动，容我再想一想。”

贺龙说：“中夏，部队已四面受敌，不可在此久留。”

邓中夏像没听到一样，起身离开了这座大殿。邓中夏走后，段德昌拧着眉毛叹了口气。这时候，汤慕禹也起身走了出去。

邓中夏出门之后，来到了庙外。这时，已到了12月的天气，但见彤云密布，冷风中飘着雪花儿。邓中夏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忽然间，有一人将大衣披在他的身上，邓中夏回头一瞅，原来是汤慕禹。邓中夏说了声："慕禹。"

汤慕禹说："中夏，你知道吗，有人议论我们，说我们是吃洋面包的，不懂得打仗，只知啃书本儿。"

邓中夏不高兴地说："这贺龙、段德昌，满脑子个人英雄主义、农民意识。"

汤慕禹说："何止英雄主义，还有封建迷信，你没听说吧，他们两人，一个自诩为水龙将军，一个自诩为火龙将军，说什么龙离不开水，所以都奔洪湖。"

邓中夏道："不光是迷信，还有绿林思想。"

汤慕禹又说："中夏，在这关键时刻，你可不能让步，若让了步，你的威信没了不说，我们红军还要受损失。"汤慕禹见邓中夏听的认真，又说："你别看段德昌咋咋呼呼的，他实际上没有什么本事，不过就是打打游击罢了。"

邓中夏停住脚对汤慕禹说："慕禹，你来当6军军长吧。"

汤慕禹两眼闪着火花说："那，段德昌怎么办？"

邓中夏把脸一沉说："他不是愿意回洪湖吗？就让他回洪湖。"

汤慕禹说："6军让他带走？"

邓中夏说："让他带走伤病员。"

汤慕禹亲切地对邓中夏说："中夏，我会成为你的左膀右臂的。"

邓中夏高兴地握住汤慕禹的手。

红2军团前委会议而未决之后，一连两日，邓中夏不再提开会之事，贺龙找到邓中夏说："中夏，各种情报表明，敌军正在集结，我们不能在此久停了，何去何从，应当机立断。"

邓中夏说："云卿，不要急，部队的行动，我自有考虑。"

当天，湘鄂西特委又派人送信，要邓中夏率红2军团回洪湖，邓中夏遂再次召开前委会。会议一开始，邓中夏说："我经过了几天的考虑，有两点意见，一是将部队拉到松滋的刘家场一带，选择阵地与敌决战，二是我同意德昌同志回洪湖，6军军长职务由汤慕禹同志兼任。德昌同志回洪湖后，组织洪湖地区现有的军事力量，与敌周旋，寻机击溃敌人。"

邓中夏说完之后，贺龙、许光达、孙德清、柳直荀等人都站了起来，贺龙说："中夏的两条意见，我原则上都不同意，第一，敌来势凶猛，我军当避其锋芒，寻其弱处，消灭敌人，不宜打阵地战。第二，段德昌若回洪湖，把6军带走。"

孙德清说："大敌当前，2、6两军不能分开，应全部返洪湖，保卫苏区。"

邓中夏面色沉着说："与敌决战之事，我们再议，德昌同志还是回洪湖为好，那里很需要他。"

贺龙刚要开口，段德昌站起身说："我服从中夏同志的意见。只是不知中夏能给我多少人枪？"

邓中夏沉吟了一下说："德昌同志，部队攻打津市澧州时，伤亡很大，而今又大敌当前，抽不出多少人来，只能带走伤员。"

段德昌听了，登时愣住了，他万没想到，邓中夏是要他只身返回洪湖。他知道，在红2军团南征之时，将洪湖内的地方武装，差不多都带走了，如今自己回去，手中仅老弱残兵，工作如何开展？他又想到洪湖父老，正在敌人血火中熬煎，只觉得一腔热血，直涌脑顶，不由得愤然说道："中夏同志，我向你立军令状，若丢了洪湖，我提首见你。"说到这儿，段德昌目光灼灼地逼视着邓中夏，说："中夏同志，如果2军团遭到损失，如果创建不了武陵山区根据地，你承担什么责任？你敢立军令状吗？"

邓中夏不敢看段德昌那严峻的目光，而是宣布散会。

散会之后，夜色已深，段德昌回到屋内，闷闷地吸烟，心情不能

平静下来。这时候，贺龙推门而入，他对段德昌说："怎么，睡不着了？"

段德昌眼含着泪说："胡子，这是撤我的职啊！"

贺龙将烟斗磕了磕，说："德昌，我明白，想远一点吧，洪湖需要你。再拉起一支队伍么？"

段德昌说："我走后，你的困难更多，邓中夏不懂军事，又目中无人，汤慕禹心地不纯，你要小心。"段德昌吸了口烟又说："如今，我最担心的倒不是洪湖苏区，而是2军团的命运，据侦察员报告，敌十八个团已步步进逼，而我们还在杨林寺徘徊不决，实有被敌吞掉之险那。"

贺龙忽然站起来说："德昌，你说的很对，我现在就去找中夏。明早送你。"

段德昌说："明儿我起大早走了，你不必再送我。"

第二天清晨，四野还黑黑的，段德昌便起身备马，英雄刚走出村口，一人从后边赶来，说道："德昌，我来送你。"

这人正是贺龙，段德昌拉着贺龙的手说："云卿，不必了。"

贺龙说："去吧。"

当下，二人默默地向野外走去，直到十里长亭，二人才洒泪而别。正是：

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
战友之情心里亮，隔山隔水永相望。

送君送到大树下，心里几多知心话，
九死逃生闹革命，枪林弹雨把敌杀。

半闰屋前川水流，革命友谊才开头，
哪有利刀能劈水？哪有利剑能斩愁？

送君送到江水边，知心话儿说不完，
风里浪里你行船，我打胜仗盼君还。

红二军团大败杨林寺

段德昌率伤病员返回洪湖后，邓中夏对红2军团的何去何从，依然举棋不定，正因邓中夏的此举，使得红2军团遇到了一场恶战，遭到大败。

时国民党湖南省主席、清乡督办何键，湘鄂川边清乡督办徐源泉，分头指挥湘鄂两省及各地云集湘鄂两省的"讨逆军"，杀气腾腾地扑向红2军团。而此时邓中夏却举棋不定，部队停留在杨林寺一带，时何键的李觉部、鄂军夏斗寅部、湘西王陈渠珍部，分路从西斋、宝塔市、官桥、石子滩等处，杀向红6军。这时候，红2军还远在数十里路外的公安城。红6军的16师驻杨林寺，17师驻五十里外的街河市。当各部队向驻杨林寺的军团总指挥部告急时，总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贺龙、柳直荀、孙德清、王一鸣等人都主张部队迅速转移。邓中夏却提出在杨林寺与敌决战。汤慕禹也支持邓中夏。

正这时，一发炮弹打了过来，把庙的耳房打着了，大火顿时熊熊地燃烧起来。开会人正惊愕之时，勤务兵急急地跑了进来，慌张张地向贺龙报告说："总指挥，敌人已逼近杨林寺了。"

勤务兵这么一说，开会人都面带急色。邓中夏依然平静地说："大家不要慌忙，敌人是虚张声势。"

贺龙忍不住吼道："中夏同志，你不要再书呆了，这是打仗，是要流血的。"说着起身跨出门，对两名值班参谋说："骑快马速去公安，传我命令，令2军向杨林寺靠拢。"说罢，又对汤慕禹说："命令

16师，迅速抢占杨林寺北山头，阻击敌人前进之路。”

汤慕禹见贺龙目光逼人，又大敌当前，不敢怠慢，立即传下了抢占山头的命令。16师将士终在敌人之前，占领了山头，将进攻杨林寺之敌，阻截于山下。这时候，在街河市的17师，也与敌兵展开了激战，师长许光达，亲赴前沿，带部队与敌拼杀。双方接火之后，便十分的激烈，彼此你冲我杀。阵地上，双方兵力，犬牙交错。从凌晨打到了黄昏，敌兵不退。看看到了半夜，敌人越来越多，贺龙便命令军团指挥部撤离杨林寺，向街河市西的刘家场方向转移。指挥部刚刚行动，突然后面又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众人立时大惊失色。这子夜之中，正不知枪弹从何而来。时邓中夏、汤慕禹、柳直荀、贺龙都一起行走，邓中夏听到枪声，惊问道："敌军如何从我们背后杀了过来？"

贺龙侧着耳朵听了片刻后，说道："这枪声很杂，不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

话音儿刚落，有人跑过来报告，说刚刚收编的土著武装苟七儿队伍反水了。

贺龙当即下令，要卢冬生带领手枪大队，寻找有利地形，阻击苟七儿的反水部队。而后，率军团指挥部，向刘家场方向，且战且走。黑夜之中，但闻四野枪声如同炒豆一般，正不知敌兵多少，看看到了天明，天降大雾。好大的雾，十几步外就不见人影。趁这浓雾，指挥部这才甩开了敌人，查点了一下人数，大多在夜里被敌军冲散，只剩下一些警卫人员。红6军的16师、17师，都遭到了强敌的切割。被打散的部队，趁浓雾未散之机，也纷纷向刘家场方向退去。

红2军军长孙德清，率2军直奔杨林寺，欲解军团总指挥部之围，谁知大部队开拔不久，便与夏斗寅部两个旅遭遇，双方便在水围、网地内拉开了阵势。打来打去，敌兵越来越多。孙德清不敢恋战，指挥部队向杨林寺退去。在一个叫鲇鱼嘴的村子，又与敌一营人遭遇。孙德清命令部队一个冲锋，便将这营敌兵全部解决。从俘

虏口中，孙德清才知杨林寺已被敌军占领，恰在此时，贺龙派的传令兵到了，向孙德清传达了红2军速向刘家场方向撤退的命令。孙德清接到命令，不敢怠慢，立即带部队向西行进。天黑之时，行到街河市，借着镇内灯光，发现街河市也被敌军占领。孙德清刚要下撤退离命令，红2军的行踪被敌尖兵发现，立即，街河市里的敌军都行动起来，刹时枪炮齐鸣。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原来，这街河市的敌军，是夏斗寅部主力。孙德清从敌枪炮声中，知道遇到了劲敌，忙下撤退的命令。这时候，夏斗寅部已将红2军切割了数块，一时间，红2军各师团营连彼此之间，均失去了指挥和联系。孙德清只好带身边人马，急急向刘家场方向退去。部队走了两个多小时，遇到了一个岔道，都不知走哪条道儿好。大家都有些心慌。正在这时，警卫班在路旁一间茅草屋内，见到了一位贫苦农民，经那农民指点，才弄清了方向，一直到了天光大亮，终于甩开了敌人。孙德清查点了一下人数，三停人马失去了两停。由于败仗，部队指战员的情绪都很低落。这时候，又一支人马从后面赶来，顿时，大家一阵紧张，因为经过了一夜的激战，都很疲惫，已无力与敌拼杀。正紧张之时，原来是王炳南部，两支人马合到了一起后，这才又向刘家场方向行进。到了天晚，赶到了刘家场，见到了贺龙，孙德清把部队作战失利的情况简略一遍，贺龙安慰他几句，邓中夏到了此时，后悔不迭。

第二天，又有一些打散的红军陆续赶到，这时，李觉、夏斗寅、陈渠珍三支部队人马又杀向刘家场，贺龙不敢恋战，连忙向五峰、鹤峰方向退走。

“共产军”的冤案

红2军团一直败退到鹤峰境内才收住脚，各师团清理了一下

部队，三停失去了二停人，枪支弹药轻重物资丢失无数，部队士气一下低落了下来。

这一日，红2军团退到了鹤峰走马坪。走马坪是鹤峰县内的一个大寨子。在此之前，贺龙曾带红军两次到过这里。红军那严明的纪律，给村民们留下极深的印象。老百姓像待亲人一般待红军。谁知，当贺龙这次带红军到了寨子之后，寨子的人大部都跑光了，那些没来得及跑的人，也都躲进了屋内，关门闭户，像是躲瘟神一般。贺龙听人报告了此情，甚觉奇怪。经了解，才知道前些天来了一支“共产军”，人马有三千，老百姓把他们当做红军看待，孰料这些人进寨子后，拉夫派款，征粮征草，把老百姓害苦了，闹了七、八天才走，所以，这次红军来了，老百姓以为“共产军”又到了，所以都跑了。

红2军团住下之后，贺龙便打算派人了解这支队伍的真情，正在这时，忽然接到姐姐贺英送来的一封信，这才知道这支“共产军”的原委。

原来，这“共产军”内有三个首领。一个叫覃伯卿，一个叫甘占元，一个叫张轩。覃伯卿，字正树，四川川东忠县石宝寨人。生于1898年，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向往革命。1922年在成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赤心社”等革命组织，随及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四川第一批共产党员。杨森驻守川东时，覃伯卿在杨森部工作，秘密策反。1927年蒋、汪反共之后，覃伯卿时在杨森处，由于隐蔽较好，杨森不但没发现他是共产党员，反而要他做秘书并兼任随营军事政治学校教官，从事兵运。1928年，覃伯卿利用自己在杨森处的身份地位，同雷震寰、周伯仕等革命同志组织兵变。不慎被杨森察觉，兵变失败。覃伯卿遂逃回石宝寨家乡，继续拖队伍，进行武装斗争。先后组织了“平民革命军”、“共产军”，并任四川工农红军第2路游击队副总指挥，带着数百名队员，活动在川东一带。1930年冬，四川军阀刘湘、王陵基、杨森混战之时，川东土著军阀甘占元、

张轩被挤在矛盾之中，有被消灭之险。覃伯卿便以同乡之谊，将这二人团到一起。甘、张二人各有千余人马。这三支队伍合起来人达三千，枪两千余支。挑出了“共产军”的旗号。杨森得知此情后，派兵围剿这支部队。“共产军”见杨森部队来势甚凶，抵敌不住，便退到川东黔江。杨森兵马继续追赶。时至冬日，大雪纷飞，部队在山林中缺衣少食，处境十分困难，开小差的也越来越多。覃伯卿与甘、张二人商量，要将“共产军”拉到湘鄂边，投奔贺龙红军，甘、张二人见杨森兵马围追甚紧，只好点头。这么着，覃伯卿便同甘占元、张轩带着三千余人马，于11月底，到达了湖北宣恩县境沙道沟。住下之后，覃伯卿便打算派人与贺英取得联系。贺英找到鹤峰县委书记汪毅夫说：“既然这支部队自称是共产军，还喊出杀富济贫，打土豪的口号，我们可以派人，去了解清楚他们的底细。”

县委书记汪毅夫也觉得贺英言之有理，便同意了贺英的意见。当下，贺英便选派了她那游击队中的副官、长于交际应酬的魏振清和能言善辩的李占奎，去会这共产军。这二人便骑马来到了沙道沟。

覃伯卿一见是贺英派来的人，很是高兴，便说明共产军是来投奔贺龙红军的，请贺英给搭个桥。之后，覃、甘、张三人又热情地招待了魏、李二人一番。魏、李二人临告别时，覃伯卿说：“若能与贺英大姐相见，是我们共产军官兵之愿。”

魏、李二人当即表示，一定转达。之后，彼此握别。

魏、李二人回到了鹤峰，见到贺英，把覃、甘、张三人欲见她的话学说了一遍。贺英说：“我明天就去。”

大家听说贺英要去会共产军“掌盘子”的人，都劝她不可贸然，免人虎狼之口。贺英说：“不然，不入虎穴，焉知底细。”遂不听大家劝阻。

第二天，贺英带着两名游击队员骑马来到了沙道沟。覃伯卿等听说贺英来了，亲自出迎，像待贵客一样，将贺英让到上房。随及摆

茶敬烟。大家一阵客气之后，覃伯卿便又说了他和共产军意欲投贺龙做红军的打算。贺英见覃伯卿言辞恳切，感情真挚，不似有恶意，但觉得甘占元、张轩二人却目有凶光，心藏不善。贺英待覃伯卿说完，便郑重说道："你们要投红军，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当然欢迎你们。但是，你们的军队首先要爱护百姓，要服从苏维埃政府的命令，听从红军的指挥和调遣。"

覃伯卿说："大姐讲的在理，我们一切都听红军的指挥，听苏维埃政府的指挥。"

当下，贺英又同一些下层的干部见了面，之后，覃伯卿将部队集合起来，要贺英讲话，贺英讲了番苏维埃人民群众欢迎共产军到革命阵营的言语。之后，贺英把情况向县委做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说这支队伍倾向革命，经过教育改造，会成为革命的力量。县委听了贺英的汇报做出了决定，派人给这支队伍送去一批粮食、猪肉、蔬菜等等物资，覃伯卿等见了，很是高兴。随后，覃、甘、张三头领便带着这支队伍，住在鹤峰的走马坪一带。这共产军，除了覃伯卿原来带领的人马纪律稍好外，甘占元、张轩的部队，多系土匪出身，哪里懂得什么群众纪律，住下之后，少不了抓鸡摸狗，连偷带拿，拉夫派差，要粮要草，把所住之村寨，闹了个鸡飞狗跳墙，把老百姓都给吓跑了。事情反映到县委，县委便派了贺英去见覃伯卿、甘占元和张轩。贺英把"共产军"违反群众纪律事一一说，覃伯卿连连说道："大姐，我们这支部队，刚刚合到一起，都不懂得群众纪律，做了不少老百姓不高兴的事。这么吧，我们把人马带到奇峰关一带，等着贺龙军长派人收编。编到贺龙军长队伍之内，这些士兵、官长的土匪恶习，就能改掉了。"

当下，贺英又将覃伯卿的意见报告了县委，县委同意。之后，覃伯卿便将这支队伍，带到了奇峰关一带。

就在这时，邓中夏、贺龙带着红2军团，来到了走马坪。贺英听说红2军团退到了鹤峰，便派人骑快马送来信，向贺龙报告了共产

军欲投红军的情况。

贺龙看了信之后，将信递与邓中夏。邓中夏看罢，沉吟不语，贺龙见状，问道："中夏，你意如何？"

邓中夏说："文常，我等新败，部队疲惫至极，若有战事，必定吃亏。覃、甘、张所部三千人。这三人来投红军，是真心，还是权宜之计，还是另有他谋呢？香大姐信中只讲这支人马来投我们，其它没有提及，若这三人反水，他们三千人马，我们可吃不消哇。"

贺龙说："覃伯卿这人我不熟，甘占元、张轩我知晓。均是川东土著小军阀，曾依附过刘湘、王陵基、杨森等，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

邓中夏眉头拧着说："他们为什么要投红军呢？"

这时，柳直荀、王炳南、孙德清诸将都走了进来。邓中夏把贺英的信给三人看了。三人都说此事宜慎重。柳直荀说："不管这三人是否真心，如今他们既然相投，我们总要以礼相待。可派人送信与覃、甘、张三人，要他们来此相商收编一事，我们也能从中察看他们是否真心。"

柳直荀的话，大家都觉得有理。贺龙想想说："此事是我姐接的头儿，我看还是要她代劳吧。"

贺龙言语，邓中夏等均同意。当下，邓中夏以贺龙口气写了封信，派人送与贺英。贺英接到信后，立即带上两名游击队员，一名赵福，一名赵禄，飞马来到奇峰关。到了关前，有士兵拦挡，贺英说："速去通禀覃司令，就说贺英来拜会。"

那个士兵听了，上下打量了贺英几眼，见贺英气宇不凡，便说了声"请等"，而后飞身入关。

覃伯卿三人，也听说红2军团来到了鹤峰，正要派人去联系，忽听贺英来了，很是高兴，覃伯卿带甘、张二人亲自出关相迎，将贺英让到司令部内，分宾主落坐，有人献茶。贺英便取出贺龙写给覃、甘、张三人的信。覃伯卿接过一看，那信写道：

覃、甘、张各位司令台鉴：

久闻雅名，曷胜佩感。欣悉贵军远道而来，光临敝区，特派员面谒，以慰风霜之苦，并表欢迎之忱。贵军有何需求，希予贺英面商，自当鼎力襄助，幸望各司令约束所部，勿致扰害庶民，为祷。

临书不胜，企盼之至。敬叩。

钧安

贺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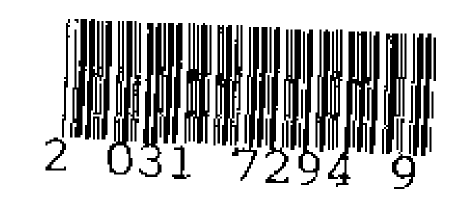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覃伯卿看罢贺龙的信。真是高兴异常，他把信交与甘占元，又对贺英说："大姐，我等盼归贺龙红军，如大旱盼甘露。今日得知贺军长到了，真是喜从天降。请大姐转告贺军长，对于贺军长的关怀，我们从内心中感谢。对于贺军长为改编我军所提的条件，我们全部服从。"

贺英见覃伯卿如此诚恳之态，也很高兴，便说："覃司令的态度，我定转告贺龙。"

当下，双方又谈了些旁话，贺英遂同覃、甘、张三人告别。飞马来到走马坪。到了红2军团司令部驻地。贺英见到了贺龙，姐弟相会，一番别后之情，不必叙述。当下，贺龙又将邓中夏、柳直荀、孙德清、王一鸣、王鹤等2、6两军负责同志，向贺英一一做了介绍，众将都早以闻知贺英英名，今日相见，自然都很高兴。邓中夏说道："大姐，我们有你这样一个革命的好大姐，真是高兴。"

贺英笑道："中夏同志，你过奖了，我若能给党做些事，也是共产党教给我的。"贺英说毕，便将覃伯卿的言语、态度向贺龙、邓中夏说了一番。贺龙听后，问道："姐姐，照你说来，那覃伯卿投我们，是一片诚心了？"



贺英说："覃伯卿态度真诚无疑。只是甘占元、张轩二人眼随心转的，倒要提防。"

柳直荀说："我们下个请帖，把这三人请来，当面谈谈。"

柳直荀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就在这时候。红6军侦察员抓到了一名侦探，从这人身上搜出了一封信。什么信？贺龙、邓中夏一看，是甘占元、张轩私通夏斗寅的信，信中说他们诈降红军，寻机取贺龙之首。贺龙见了大怒，决计席间杀死甘占元等三人。次日，三人到红2军团赴宴间，被红军处死。

到了198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了四川省委组织部为覃伯卿平反的报告，肯定了覃伯卿的革命功绩，覃伯卿之死，属于错杀。因甘占元、张轩投夏斗寅，覃并不知晓。

覃、甘、张被斩首之后，红2军团收编了这三千余人马。1931年元旦，天降大雪。在这大雪之中，在走马坪前坪坝上，红2军团召开了收编大会。贺龙站在了雪地之中，亮着嗓门儿对收编的兵将说道："从今以后，你们就是红军了。不错，我贺龙是红军的军长，可我是有'老板'的，我的老板就是共产党。我们大家要一起听共产党的话，为穷苦人打江山，争天下！"

红2军团在走马坪收编之后，前委便在走马坪召开了扩大会议，做出了依托五峰、鹤峰，进军石门，创造武陵山根据地的决定。元月中旬，红2军团主力出师石门。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魂飘重霄九——苏区“肃反”大纪实　（上册）
作者＝
页数＝４２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Ｖｓｓ号＝８５４３２３１７

魂飘重霄九

「左」倾痛史

苏区「肃反」大纪实

刘秉荣

下卷

花山文艺出版社

魂飘重霄九

苏区「肃反」大纪实

(冀)新登字 003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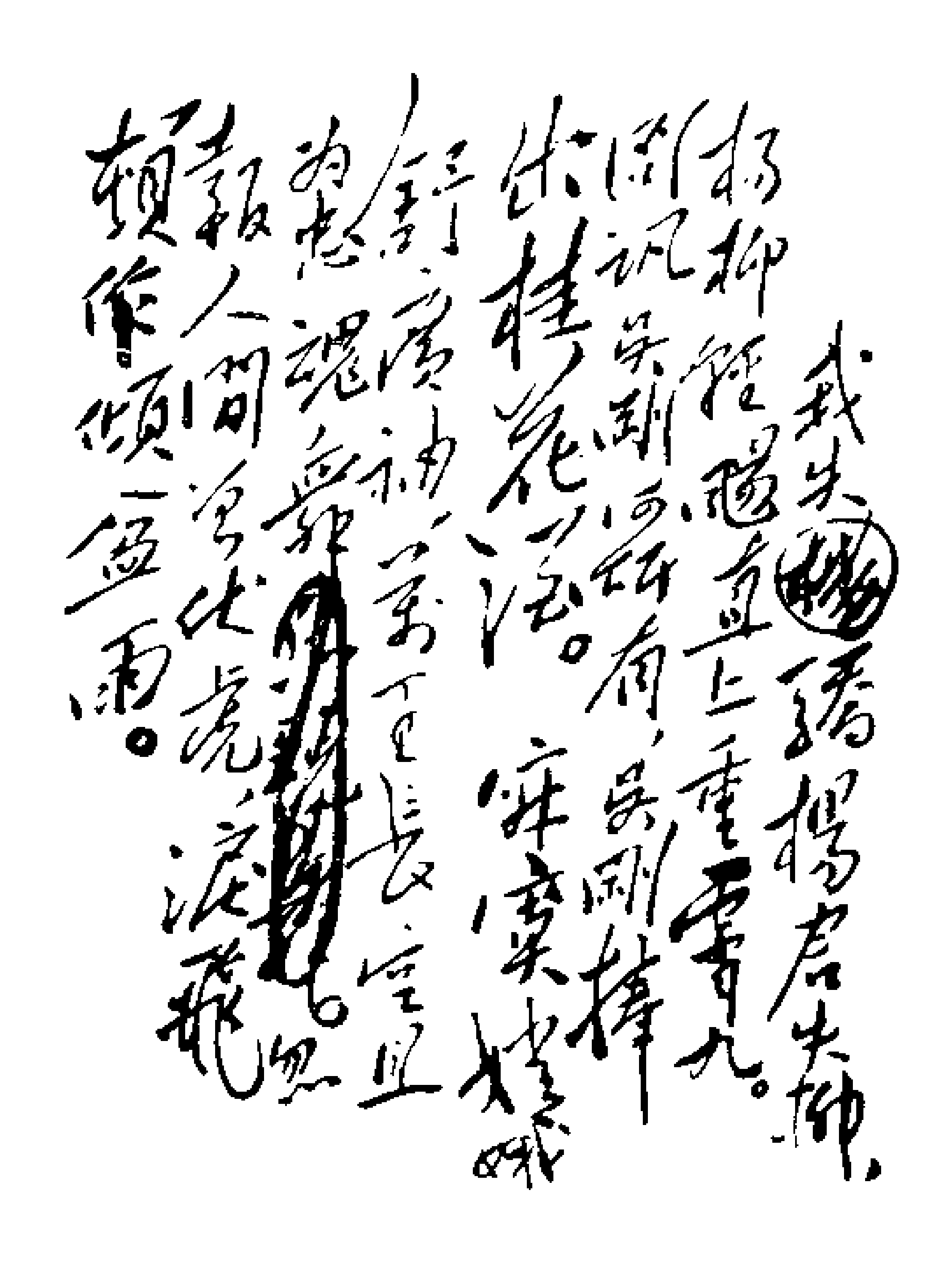
魂飘重霄九

——苏区"肃反"大纪实

刘秉荣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
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1/32　28.5 印张 732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0 定价:23.80 元
ISBN 7—80505—094—5/I·94
(全两册)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毛主席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1957年5月11日）

负笈长沙时，已聆君盛名。及我至穗城，
鸿文启心灵。坚贞斥汪、蒋，不畏刀斧横。
直言伸正义，何惧独秀狞。我在湘赣边，
心疑“左”势凌。大祸从天降，蒙诬被罪刑。
君独能兼听，广纳同志评。对人持慎重，
刀下始留情。我既调基层，罹疾身削形。
君竟远路来，探望复叮咛。关怀与帮助，
温暖长心萦。延安重聚首，情深更固凝。
全国庆解放，斗争不少停。重病仍工作，
奋疾并力行。吾党丧栋梁，惜君才壮龄。
我痛失师友，心悲泪涕零。哀思情切切，
终夜不能眠。



（王首道于痛悼任弼时时写的斥“大肃反”诗）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同志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志



红军时期的关向应同志



红军时期的任弼时同志

柳直荀烈士和李淑一同志订婚合影（1924年夏于长沙）



周逸群烈士



段德昌烈士



红军将领许继慎



红军将领曾中生

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演说"暴动"



邓中夏烈士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同志



邝继勋烈士



夏 曦



张国焘



王明(陈绍禹)



陈昌浩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肃反工作中由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致使一些人被无辜错杀。在这些被错杀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党的好干部、好战士和工农积极分子，有的甚至是党政军的领导同志。他们被错杀，是革命的重大损失。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一切经过调查确系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根据这一决议，建国前，特别是建国初期，各地为解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错杀人员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大多数人已得到平反昭雪。至于是否追认他们为革命烈士的问题，内务部根据各地的反映，报请中央同意，于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发出了《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者及其家属处理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对确无反革命行为而被错杀者应予平反昭雪，……

（引自1983年5月26日《国务院批转的民政部关于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肃反中被错杀人员的处理意见》）

谨以此书献给
那并非死于敌人屠刀下的烈士们

段德昌	万　涛	瞿秋白	何孟雄
周逸群	邓中夏	柳直荀	潘家辰
戴补天	彭国材	孙德清	刘革非
候蔚文	刘鸣先	胡慎己	戴君实
李剑如	张宗理	张昆弟	栩　栩
张应南	彭之玉	段玉林	赵　奇
尉士均	周小康	王炳南	王一鸣
陈协平	唐赤英	宋盘铭	谷大姐
覃伯卿	叶光吉	盛联均	覃　苏
周子服	张应南	汤慕禹	周荣光
曾中生	高敬亭	胡　怫	吴凤卿
邝继勋	许继慎	熊受喧	周维炯
庞永俊	潘皈佛	吴云三	高建斗
王则先	肖　方	魏孟贤	曹光南
封　俊	江子英	袁皋甫	吴精赤
刘性成	郑新民	王宏学	雷绍全
刘纪云	徐朋人	曹学楷	戴克敏
陈定侯	王秀松	戴季伦	李梯云
方　英	余笃三	越箴吾	王振华
徐永华	杨　白	吴　展	闻盛也
陈少卿	李春霖	王占金	舒玉章
张逸民	杨　珊	刘　杞	关淑衣
柯柏园	罗炳刚	查子清	李奚石
戴亢若	黄　刚	王长先	王　明

任　难	王培吾	姜镜堂	廖业旗
陈静宜	罗成立	方永乐	余　雄
徐诚基	高开文	罗作环	陈守信
吴光禄	郑定国	张家胜	刘荣炳
雷长友	雷书浩	郑一民	郑新民
潘恩善	李庆林	徐其虚	陈慕尧
廖炳国	吴靖宇	徐子明	曾昭如
易敬若	易登鲁	易少春	李自由
李云福	叶孝清	李保鲁	孙光头
胡玉书	晏六泉	冯　静	许世申
潘崇禹	高渐图	毛正初	姜镜望
张宇平	廖业祺	薛卓漠	李荣桂
何伯园	林育南	朱亚伦	范　陀
程绍山	占梦雨	漆雨元	李求实
李溪石	胡明正	袁汉民	丁　超
陈　奇	伍超然	陈品三	陈锦辉
卢肇西	曾牧村	张涤正	段奋夫
李　真	何登南	丘子庭	罗寿春
谢汉昌	刘　敌	李白芳	曾炳春
肖大鹏	刘铁超	袁德生	于兆龙
马　铭	王　怀	甘步衢	刘任武
刘其凡	刘炎松	刘秉常	朱昌偕
朱映华	朱裕农	李春香	李孟弼
李瑞娥	杜亚文	肖伍仔	陈　韶
陈介福	周道益	罗日光	胡　波
胡竹清	曾道一	曾毅之	彭桂峰
谢月高	谢露生	谭牛山	朱勉之

……

序

李 振 军

刘秉荣同志呕心沥血十年之久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魂飘重霄九》(——苏区"肃反"大纪实)一书就要出版了，他请我作序，读罢这部长达六十余万字的书稿，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举行了南昌起义，从此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先后举行了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秋收暴动、湘南暴动，在全国其他各地，也相继举行了大大小小的暴动，从而建立了工农武装、建立了革命政权。其中，毛泽东、朱德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和南昌暴动、湘南暴动的人马上了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贺龙、段德昌、柳直荀、周逸群等赴湘鄂西、创建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徐向前、曾中生等在鄂豫皖，领导和发展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在发展红军和创建苏区的过程中，那许许多多的优秀共产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怀着推翻腐败的反动统治阶级的决心，不怕千难万险，不怕流血牺牲，前扑后继，英勇奋斗，使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力量日益发展壮大，形成了烈火燎原之势。

但是，由于从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

主义和王明的更加"左"倾的路线，先后统治了全党达数年之久，结果，给中国的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全党时期，在党内进行扩大化的"肃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使段德昌、周逸群、柳直荀、万涛、潘家辰、宋盘铭、王炳南、孙德清、曾中生、邝继勋、许继慎等一大批优秀的领导干部被错杀，造成了千古恨事，"左"倾路线的恶果，使得红军丧失了战斗力，使得日益发展的红色政权丢失，最后，只得进行万里长征。

这是一部即充满着革命激情，又回荡着悲壮深沉之气的著作，读后使人掩卷深思：中国的革命，必须依照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必须把马列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这样，革命的力量才能发展、革命的事业，才能壮大。右的路线会给革命带来损失，而"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更为严重。

毛泽东老人家曾教导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今天，回顾我党历史的经验教训，尤其加深对"左"倾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的了解和认识，尤为必要。

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告诫全党，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左'的思想根深蒂固，'左'带有革命色彩，拿大帽子吓唬人，好象越'左'越革命"。

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江泽民同志报告中对"左"的警惕的提出，都一针见血的指出"左"的危险及其恶果，告诫了全党："现在明确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记住段德昌、曾中生、柳直荀等烈士用鲜血写成的苏区创建史上的悲壮一页吧！

目　　录

第　一　部

第 二 部

第　三　部

第 一 部



楔　子

我失娇杨君失柳，
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贵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这首《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为毛泽东同志 1957 年 5 月 11 日所写。李淑一系湖南长沙第十中学语文教员，词中的“杨”为毛泽东

的发妻杨开慧烈士，“柳”乃李淑一的丈夫柳直荀烈士。杨开慧烈士为国民党反动派所杀，柳直荀烈士之殁呢？在有关《蝶恋花·答李淑一》的注释中，历来均为“1932年在湖北洪湖战役中牺牲”。这注释，掩盖了历史的真实。柳直荀烈士的遇难，非死于敌人的枪弹之下，而是死在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统治者之手中。

这是悲惨而又沉痛的一页历史，这页历史的真实被掩盖了多年。

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拂去了那一页历史的尘埃，将历史大白于天下。

要写清这段历史，必须先从一个写起，此人是谁？就是工人运动的领袖李立三。为何要从李立三写起，读者往下看就会明白。

第一章　铁树开花时出生的人

李立三，1899年11月18日生于湖南醴陵县城郊阳三石芋园府李昌圭秀才家。其出生之日，适逢李家后院的一株百龄凤尾焦开了花。凤尾蕉又称铁树，开花极难，民间有“千年铁树才开花”之说，李立三于铁树开花时出生，全家人都感到此子生的不凡，因而，都十分高兴。为其起乳名“凤生”，又怕其大命立不住(即活不长)，又为其取了个贱名——狗妹子。启蒙之际，其父按李家的辈份，为其起了个学名“隆郅”。

李立三人很聪明，少时读书甚为用功，中学时到了长沙长郡中学就读。结交了浏阳来的罗章龙，又经罗章龙的介绍，认识了毛泽东。李、毛二人相谈，甚为投缘。1917年，李立三中学毕业后，回乡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师。因其揭露了县教育会的首脑叶沛棠的循私舞弊而遭到了打击。李立三为此愤然出走，参加了革命军。走前，他留诗一首：

浩气横斗牛，如焚痛国仇，
读书从此别，投笔效班侯。

李立三到了衡山程潜的护国军中当了兵，由于他有文化，又能干，很快当了差遣。一次去程潜司令部办事，看到程潜正与人恋棋，眼看程潜败局已定，李立三忍不住指点了一下，程潜棋转败为胜。程甚为高兴，便与李攀谈，得知李与己系同乡，而李之父与己还是同年，甚为高兴，便不要李立三再当兵了，给了他一些钱，要他到北京大学深造。1919年春，李立三到了北京，由于钞票贬值，李立三交不起学费，进不了大学，正值他走头无路时，发现了留法勤工俭学这个门路，便报了名，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于是年秋，李立三同四十名赴法学生乘坐美轮沃隆号，从上海起锚出海了。船小浪大，学生们晕船呕吐十分严重，李立三从新加坡寄回的家信中附诗道：

今朝呕尽心头血，添得海涛万丈深，
大陆神州被洗尽，蓬瀛三岛水烟沉。

李立三经巴黎转蒙达尼，进蒙达尼公学补习法语，自此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新的生活使李立三顿觉一切都很新鲜。他写诗道：

我是一个断梗的浮萍，
随着那风波儿上下飘零。
也到过黄浦江头，
也到过潇湘水滨，
也到过幽燕，
也到过洞庭，
今又吹我到西天来了，

呼吸那自由的空气，
瞻仰那自由的女神。
我还要唱那自由之歌，
撞那自由之钟，
唤醒可怜的同胞，
惊起他们的酣梦，
鼓荡雄风，
振作精神，
造一个自由的新世界，
作一个幸福的新国民。

李立三在学校补习了一个时期的法文后，就到了三侠孟的一家工厂做工，边工边读。1920年秋，大批留法勤工俭学生到达了法国，这时，战后法国发生经济恐慌，学生寻找工作十分困难，华法教育会又要断绝对勤工俭学的接济，学生们陷于极大的困境之中。12月31日，李立三、赵世炎、陈公培等二十二人，联名写信给巴黎华法教育会学生事务部，建议开办工业予备班和引导学生入工厂当徒工，学得技术，以便克服找工作的困难。

1921年1月，蔡和森发表了《蒙达尼勤工俭学同人意见书》，号召勤工俭学生掀起一个争取"生存权"和"读书权"的运动。在蔡和森和其他领导的"工学世界社"的推动下，数百名勤工俭学学生，在2月28日发生了对中国驻法使馆的示威运动，要求中国驻法公使出来接见并答应学生的条件。这一运动遭到了与中国公使勾结的法国警察的镇压。

在"二·二八"示威遭到法国警察镇压后，为使勤工俭学学生迅速团结起来，成立了勤工俭学学会。李立三、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都是学生会的领导成员。之后，李立三带领一百多学生到华工集中的克鲁校史乃德工厂做工。他在这里深深地体验了工人阶

级的艰苦劳动生活，克鲁校有华工二千多人，李立三和赵世炎首先在华工中建立了“华工俱乐部”，创办了《华工周报》，在华工中宣传马列主义，同工人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21年秋，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等人，以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在国内募得大批捐款，并取得了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的一部分，筹办了里昂中法大学。但在学校建成后，他们专收国内有钱有势人物的子弟入学，不准勤工俭学的学生人学。李立三和赵世炎便在克鲁校工厂勤工俭学学生中，发表了争回里大的宣言和通告，动员学生团结起来，争回里大的入学权。之后，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陈毅等人分头发动组织成了一百二十多人的先锋队，赶在“贵族学生”到来之前，子9月21日到了里昂，驻进了“里大”。此举亦遭到了法国警察的镇压，没收了这一百多学生的护照，并全部被关到了芒特吕克炮台的军营里。李立三、蔡和森等又领导学生进行了绝食斗争，以示抗议。法国当局和中国公使馆商定，把这些学生押送回国。李立三等闻讯后，彼此一商议，认为国内革命斗争正需要人，被送回也是好事，便决定留下赵世炎，继续做学生的领导工作，余都回去。1921年底，李立三、蔡和森、陈公培、陈毅等一百零四人，被法国警察强行押上轮船遣送回国。

一路艰辛，不必多说。这一百零四名学生到达上海后，李立三怀着投身革命的激情，由上海到了湖南。在长沙，他见到了湘区党组织负责人毛泽东，毛泽东热情地欢迎李立三回来参加革命。时湘区党组织正按照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决议，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毛泽东希望李立三到安源去开展工运。李立三欣然应允。

安源地处湘赣边界，1918年开办的安源煤矿和随后修建的株(州)萍(乡)铁路，是官僚买办企业“汉(汉阳铁厂)冶(大冶铁厂)萍(萍乡煤矿)公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万七千多路矿工人在德、日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压迫下，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悲惨生活，这里工人富于革命传统，是工人

运动能很快开展起来的地方。

毛泽东对李立三说："安源产业很重要，工人集中，受剥削压迫最重，一经发动，很快觉悟。"

李立三很激动地说："我一定把那里工作搞好，不负重托。"

毛泽东说："也不要过急，要想开展好工作，要先找一个合法的职业做掩护，以便公开活动，接近群众。"

李立三听着毛泽东的话，不住的点头。

1921年的11月底，李立三手持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给萍乡县知事的介绍信，以教员身份，来到安源。到了安源后，李立三就着手办平民学校，他与毛泽东介绍的株萍铁路工人李涤生、周镜会等人取得了联系，又通过他们结识了萍乡湖南商会中的一个开明绅士，通过他的疏通，李立三见到了萍乡县知事范子宣。李立三事先得知这位知事是秀才出身，喜爱古文，就用"四六体"写了篇呈文。文中说明办平民学校是为了帮助工人增加知识，发扬德性，请求备案。范子宣见了李立三西装革履，加之文敏笔畅的散文，又是留法归国的学生，当天就批准了李立三办学的要求。知事一高兴，还在呈文上加了几句话，把这呈文做为布告，贴在街头。表示了县衙的支持。

办学合法后，李立三就在安源王福斋巷租了一间房子，作为校舍，挂起了平民小学校的牌子。学校是办起来了，可来上学的人并不多，李立三就挨家挨户的动员，说来说去的，动员了三十多名工人子弟来上学，老百姓见李立三为动员学生，挨家挨户的游说，都笑眯眯地叫他"游学先生"。学校开学后，李立三白天教学，晚上深入到工人区里，继续动员学生入学。经他努力，平民小学很快猛增到五六十人，李立三也同许多工人交成了朋友。1922年1月，李立三又办了安源第一所工人夜校，这时候，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又派了蒋先云和蔡增准两同志来到了安源，帮助李立三工作，他们白天教工人子弟，晚上教工人，李立三讲的课通俗易懂，工人们很爱

听，他说："工人的两个字连起来就是天子，说明工人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是最先革命的阶级。当他听工人称他为先生时，便在黑板上写了个"牛"字，然后在"牛"下划一横，告诉学员说："这就是先生的'生'子，先生不过是'牛'坐板凳。"这通俗幽默的解释，引得工人们哈哈大笑。

工人们听了李立三讲的课后，回到工棚就向其他工友讲听课的内容，立时又吸引了不少人前来，这样，一传俩，俩传仨的，来上课的人越来越多。李立三就把来听课的路矿工人按程度之高下分为两个组。公开用的是平民学校的课本，实际采用的是"长沙粤汉铁路工人学校的讲义"。后来，李立三干脆自己编教材、刻油印，向工人讲"阶级斗争"、"劳工神圣"、"军阀混战"、"社会主义"等等。总之，他所宣传的都是"工人在世界上之地位及有关联合起来组织团体与资本家奋斗，以减少痛苦解决压迫之可能"。李立三还为工人编了一首《工农联盟歌》，配上了旧谱子，教工人们唱：

"我们工人创造人类衣食住，不工作的资产阶级把我们欺。起来！起来！齐心努力巩固我团体。努力奋斗，最后胜利是工农的！"

直到现在，安源的老工人还能唱这首激动人心的战歌。

李立三在对工人教育的基础上，吸收了八名先进觉悟的工人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组成了安源的第一个团支部。又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考验，从中发展朱少连、周镜全等六名党员、建立了安源党支部，李立三任党支部书记。这是江西产业工人中最早的党支部。

这时候，夜校也扩大了，经费多由湖南、上海方面热心工人教育的人募捐的，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也拨款资助。后来，组成了俱乐部，夜校改名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补习学校，经费由工人

俱乐部供给。

安源自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群龙有首，对工人的组织和宣传工作迅速地开展起来。为了尽快地把铁路、煤矿两局的工人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团体，李立三着手组织安源工人俱乐部，李立三用一支筷子能折断，而一把筷子难以折断的生动比喻，来启发工友，说明团结起来的重大作用。1922 年 3 月 16 日，李立三在工人夜校召集了五名筹备委员，筹备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为筹备会主任。4 月 1 日，李立三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筹备会。

成立俱乐部，必须经官方批准。李立三又写了呈文，文中把"联络感情，涵养德性，团结互助，共得幸福"写进了俱乐部的宗旨。呈文上送了县衙，由于县知事很欣赏李立三的才华，宗旨也没出格的地方，很快就被批准了。这样，工人俱乐部便合法化了。

4 月 16 日，筹备会召开了第三次会议，经统计，申请人部的工人达三百多，公推李立三为俱乐部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之后，李立三赶到长沙，在毛泽东主持的湘区委员会议上，李立三会报了安源工人俱乐部筹备的经过。毛泽东听了，当即指示，立即成立安源铁路工人俱乐部。

1922 年 5 月 1 日，安源牛角坡的 52 号，装饰的如同过盛大节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大字牌匾挂了起来，里里外外都是人，有来开会的，看热闹的，十分热闹。下午 1 时，成立大会开始，同时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会场四周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标语令人振奋，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劳工神圣！""工人俱乐部万岁！""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等等。大会开始，李立三发表演说，他激动地挥着双臂说道："今天是我们劳动人民的节日，在这喜庆时刻，我郑重地宣布，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了！"接着，李立三从安源工人的苦难生活，讲到团结起来的重要，从工人的眼前利益讲到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还讲了俄国的十月革命情况。李立三的讲演，激起了几百名听众热烈的欢呼。会后，开始游行，时大雨如

注，工人们情绪依然很高涨，冒雨游行，一路高呼口号。雨稍住，便散发传单，许多围观者亦加入，到了下午6时游行队伍返回时，部员们衣履尽湿，但个个精神焕发。大呼三声“俱乐部万岁!”，始行散去。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成立，影响极大，许多报刊都发表了消息。192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党国际的报告中，也提到了“长沙方面，已组织了萍乡路矿工人俱乐部”。

俱乐部成立之后，入部的工人却不多。李立三想到西欧工运的经验，根据党的“二大”附加决议案件的“工人消费合作是工人利益自己的组织，共产党应该注意和活动此种组织”的意见。倡议创办了工人消费合作社，使加入俱乐部的工人都能买到较便宜的生活日用品，由他担任首届总经理。为办好消费合作社，李立三细致地做了筹划，从长沙文化书社等处筹得股本，7日，合作社在牛角坡工人俱乐部的前屋开张营业。合作社除经营油、盐、米、茶及其它日用品外，还兼营银元与铜元的兑换。特别是银元与铜元的兑换业务，是当时工人最为恼怒的事情，工人们每发了工资，用手中的银元兑换成铜元时，那些奸商们便从中盘剥，使工人吃了很大的亏。而消费合作社的兑换，公平合理，这么一来，许多工人看到俱乐部比哥老会、同乡会不知要好多少倍，便纷纷加入。俱乐部的部员立时扩大，很快，入部工人即达七百多。

7月，汉阳铁路工厂罢工胜利的消息传来，给安源工人极大的鼓舞，群情激奋。时李立三等每天分几处讲演，宣传全国各地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并明确宣布俱乐部的宗旨是“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俱乐部迅速发展，工人斗争的情绪也日益高涨。8月，李立三又到了长沙，把安源工人组织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的汇报，毛泽东认为安源工人举行罢工的条件已经成熟(时长沙正举行泥木工人的罢工)，李立三便暂留下，协助长沙党组织领导泥木工人罢工运动。

在李立三离开安源不久，安源煤矿矿长李镜澄，见工人俱乐部已威胁到自己，便进行了破坏活动。李镜澄，祖籍山西闻喜，其生于江苏扬州大桥镇。1898年任安源煤矿机矿处长，后升任为矿长，其为人奸诈。李与株萍铁路局局长王学晶等勾结一起，开始对工人俱乐部下毒手。先令手下爪牙放恐吓风，言李立三等俱乐部的领导如不速离开安源，将要对他们下毒手。蒋先云等根本没把这恐吓放到心上。李、王等见此招不灵，又拟重金收买部领导，亦被蒋先云等拒绝。李、王等正无计可施时，适逢萍乡镇守使调换，路矿当局又联名具禀萍乡县署及赣西镇守使署，谓俱乐部为乱党机关，当以力封锁。并向镇守使送了重金，要求用官威，训令俱乐部自行停闭。这一消息传出，激起工人们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起来斗争，以保卫工人的利益，时安源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了。

就在这重要时刻，毛泽东来到了安源。当即召开了党组织会议。他听取了蒋先云、朱少连的汇报之后，作出了罢工的决定，并派人送信至长沙，要李立三速返安源，领导罢工斗争。毛泽东又对罢工做了许多具体指示。之后，返回了长沙。9月9日，李立三回到了安源，他了解到了路矿当局的恐吓，当即向工人表示：誓死不离安源，坚决与安源工人一起，同路矿当局斗争到底。

为加强即将举行的罢工斗争领导，中共湘区委员会和劳动组织书记部，又派了刘少奇来到了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大罢工。

9月11日，俱乐部鉴于路矿当局向镇守使和县衙的联名具呈，即向全国发出了快邮代电，揭露路矿当局破坏俱乐部的罪行，发表致萍乡矿长函。向路矿当局发出通告，提出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二百元；七日内偿还积欠工人工资的三项要求，并限当局在十二时内做出满意答复，否则，就举行罢工。

9月12日，路矿两局局长在机务处设宴面会李立三，作了使李立三极不满意的答复。适有火车将开赴萍乡，工人疑路矿两局阴

谋挟李立三到萍乡去，一声呼喊，立即有数千工人将机务处围住，由众寻出李立三，送回了俱乐部。路矿两局长见状，都慌了手脚。

当晚，李立三秘密召开了党支部会议，讨论了罢工的具体问题，决定成立罢工指挥部，由李立三为罢工总指挥。时资方已明里暗里多次扬言要对李立三等领导人下毒手，总指挥部决定设立保卫组，负责李立三等领导人安全。并要他尽量不露面，另选派一人为全权代表。在选人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立三提议由刘少奇担任，混进工人队伍里的"小鲨鱼"余江涛等人，看到这是个出头露面、捞取资本的好机会，便对李立三的提议极力反对，说刘少奇不了解安源的情况，是知识分子，代表不了工人，等等。李立三毫不退让，坚决地说："刘少奇是党派来的人，罢工是党领导的，应该有充分理由相信他。再有，刘少奇到过俄国学习，又领导过粤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一定能胜任。"

在李立三的力争之下，刘少奇为全权代表，总指挥李立三秘密策应。这时，毛泽东又写来了信，指出了"哀兵必胜"，要使罢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立三和刘少奇等研究，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

时工人中加入帮会组织的人很多，为避免这些人捣乱，9 月 13 日，李立三提着一只公鸡和两瓶酒，会见了当地红帮头子于大脑袋。于大脑袋此时也深知俱乐部主任的厉害，乐意结交。李立三说明来意后，于大脑袋拍着胸脯说："李主任请放心，一定帮忙。"

当下，两人喝了雄鸡血酒。李立三提出要在工人罢工期间，一关闭鸦片馆，二收拢赌摊，三不发生抢劫案。于大脑袋拍着胸膛保证说："李主任，第一点我包了，第二点我包了，第三点我包了！"

李立三鼓掌道："痛快，我李立三就喜欢结交这样的人。"

9 月 13 日，路矿两局对俱乐部提出的要求仍没有作出圆满的答复，时工人皆怒不可遏，已无心做工，人人相遇，即聚谈罢工。李立三、刘少奇见时机已成熟，断然将罢工命令发出，定为 1922 年 9

月13日午夜12时。

13日午夜12时，铁路工人停了火车，鸣放汽笛，煤矿工人砍断电线，发出罢工信号，顷刻，工人们像潮水一样，从矿井、工棚、机房等处冲了出来。震动全国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爆发了。

罢工开始后，李立三即由工人秘密护送到三合桥的一个工人家中，躲藏起来，暗中策应。

大罢工爆发后，路矿两局和官方当局，惊恐万状，赣镇守使肖安国即派旅长李鸿程带了军队到安源，意欲镇压。军队士兵见工人愤怒异常，未敢乱动。李立三、刘少奇亲到现场，说服士兵，唤起士兵的同情。经工作，士兵皆不上前。时有报纸云：

> 军队见工人举动极文明，亦表同情，所以此次未有流血发生。

矿上反动工头们见军队不出力，又出一计。出高价收买一些他们的“亲朋好友”，入窿破坏罢工。因工人监察严密，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

这时，煤矿总监工王鸿卿见诸招不灵，即密遣暗探，许其如刺得李立三，给大洋六百元。工人闻讯大愤，宣言李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当局全体死在安源。一方面不许李立三外出，严加警卫，如李立三外出偶有接洽，不出二十分钟，即有数百人围其所入之房屋，不许人出入。

路矿两局头头为瓦解工人意志，又思一计，买通当时官方报纸，登了一则消息，言李立三为罢工事至长沙，为湘省督军赵恒惕部所擒，腰斩于长沙市小北门外。

这一招果然有用，报纸到了安源，立时在罢工工人内引起了震惊，恰好当时李立三秘密躲起，许多人都找不到他，更对报上所言，信以为真，一时间人心混乱，李立三得知此情，当即露面，安定了工

人之心，揭破了路矿当局这一阴谋。

但是，这张报纸的消息却不径而走，漂洋过海，到了法国，传到了赵世炎、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耳内。大家对报纸上这些消息很相信，因为都知道国内的斗争很复杂。于是，旅欧党团员和勤工俭学的学生集合在巴黎郊外的戈隆勃、卡纳莱、浦安特街三十九号的华侨协社内，由周恩来主持、为李立三举行了追悼会，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第三期上，还登载了一篇用黑框圈起的报道文章，题为《一个悲壮的报告》，文章后而，发表了一篇评论。谓："这个事实本是从间接方面传来的，确否尚未可知。不过，我们深知此举出自勇敢有为的朋友李隆郅，乃在意中，故我们郑重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个哀耗。"

安源大罢工坚持到最后时刻，路矿当局终于妥协了。煤矿矿长李寿铨在1922年9月17日记载：

> 李能至云：条件无可让步，允则开工，不允则离开安源，听凭工人所为等语，即是听其暴动……事急如此，恐有暴动，千数百万之产业、即不能保，我何以对公司？惟有始订条件，开工以息其风，容图一善后之策。一面报告公司，请董事会派员来矿妥筹办法，舌烂唇焦，始克定仪，派代表与李能至订条约。

18日晨，三方代表在路局机务处签订了正式条约十三条，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18日下午，工人俱乐部在大操场召开了庆祝大会，到会工友达一万余人。据朱少连在1923年8月10日撰写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载：

> 下午2时，数百名工友手持小旗拥着李能至来了。李

到场时，掌声雷动，万余人执帽呼跃以欢迎之。李能至登台演说，宣布条件毕道："我们这一胜利，全在各位齐心，希望各位将此种精神永远保持着。因为我们工友痛苦很多，一次是不能完全解决的。现在虽说胜利了，但所得的幸福究竟不多，所以这次不能解决的问题，只有留着以后再来解决，终究我们是最后胜利的，望各位且安心上工，保持着今日热度去上工。"讲演毕，共呼"劳工万岁"者三。随即数十人燃爆竹，李主任前导，群众后随，旗帜蔽天，爆竹震地，由安源新街旧街大游行一次，返至俱乐部摄影而散。

大罢工至此胜利结束。

第二章　从右到“左”
——中共两“舵手”

1927年，正当国共两党北伐之际，蒋介石于“四·一二”在上海举刀屠杀中共党员。面对蒋氏屠刀，中共领袖陈独秀一再容忍妥协，不准对国民党使用武力。结果，到了7月，武汉汪精卫政府与南京国民党政府协手，宁汉复合流。7月15日，汪精卫于武汉分共。至此，中共到了极其危急的地步。而中共首脑陈独秀，面对险恶局势，却不知所措，秘密躲在了武昌一偏僻的工人住室内，不再参与中共的活动。

7月17日，也就是汪精卫分共的第三天，在武昌城中蛇山脚下啸楼巷内的一间房中，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四名常委李立三、张国焘、蔡和森、周恩来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确定在南昌举行武装暴动。四人又在会上作了分工，由李立三火速赴庐山，向正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报告起义事宜，张国焘、周恩来留在武汉，继续主持中共临时中央工作。

在中共紧急关头，鲍罗廷和瞿秋白怎么上了庐山呢?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

> 不知道是初几，老鲍(指鲍罗廷——引者注)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常委。自此独秀不视事。

陈独秀拒绝去莫斯科，又躲起"不视事"。自此，中共的第一任总书记就这样不光彩地下台了。

中共中央临时常委，是于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所产生的。其中张国焘、李维汉是中共"五大"时当选的，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是新增的。

7月12日，鲍罗廷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宣布了新组成的中常委后，即在瞿秋白陪同下上了庐山。

鲍罗廷，1884年生于沙皇俄国。学生时代就参加了犹太人的社会党。1903年，他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此，专门在加里活动。1905年12月，他参加了塔墨尔福斯党的会议，自此接近布尔什维克。1906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后，他移居波士顿，接着去了芝加哥。在那里，他参加了美国社会党。回到俄国之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为俄国共产党(布)工作。共产国际组成，鲍罗廷化名"布兰特温"，成为它的派往美国的第一个密使。1920年2月他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共产国际会议。此后，经柏林返回莫斯科，继续工作于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1921年，鲍罗廷是共产国际的中央机关。1922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一次扩大会议时，他是英国委员会委员。3月，再次参加共产国际会议，此后，他化名乔治·布朗，作为密使派往英国。1923年8月，他在格斯哥被捕，并判处六个月苦工。1923年9月，他既是共

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的密使，又是派驻孙中山身边的苏联代表。自此，鲍罗廷在中共同国民党联盟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鲍罗廷为何同瞿秋白上庐山呢？

自国共两党分道扬镳之后，蒋介石宣布开除鲍的顾问职务并下令通缉他。鲍打算联络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国民党人，组成国民党新的左派，对付摇摆不定的汪派。没想到汪精卫突然靠向南京，邓演达一气之下离开武汉，陈独秀闭门不出，而汪精卫也解除了他的顾问合同，并要缉捕他。鲍见孙中山三大政策已成泡影，中共也到了极其危难地步，而更使他痛心的，是共产国际把中共的失败，蒋、汪的叛变革命，都归罪于他的领导无能。他本想回国，可他妻子范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他不愿孤身而回。正当他万分焦急之际，7 月 12 日，他从苏联驻华使馆的电报中，得知范娅被释放，这才使他的心情略平静些。之后，他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冷静一下头脑，思考一下中共的失败的原因，于是，选中了庐山。他便带着瞿秋白，一起上了庐山。

瞿秋白，江苏常州人。1899 年 1 月 29 日出生常州城东南角一小巷——青果巷八桂堂瞿家。其初名“懋淼”，乳名“阿双”，五岁入学时名瞿双，后自改为“爽”“霜”，更后改为“秋白”，秋白意为秋天之霜，像秋天霜后，草木凋零，田野即一片白。秋白五岁入塾学，一年后转入冠英小学。毕业后入常州府中学堂预科。其成绩优秀。然因家境贫寒，两年后缀学。后辗转至北京，于民国六年(1917 年)考入不收学费和膳费的俄文专修馆。“五四”运动爆发，瞿秋白和郑振铎创办了“新社会”旬刊，宣传“新的信仰、新的人生观”，就在此时，他参加了李大钊等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 年初，瞿秋白以《晨报》特邀记者身份，抵苏俄考察。他不仅考察了苏俄社会生活，并出席了共产国际会议，见过列宁。次年，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以记者身份，抵苏俄考察。他不仅考察了苏俄社会生活，并出席了共产国际会议，见过列宁。次年，经张太雷介

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瞿秋白很快成为中共的一支笔，他写了《赤都心史》等大量反映苏联人民生活的著作和报道。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1923 年 6 月，他参加了中共"三大"，主持起草了党纲，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负责中央宣传工作。同年 12 月，瞿受中共组织委派，到广州参与帮助孙中山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并担任《民国日报》的编辑工作。1925 年，在中共的"四大"上，瞿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五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在苏联呆了三年，不仅对苏联了解，也与共产国际关系不错。在国共两党分道扬镳之际，瞿反对陈独秀的立场非常坚定。由于当选的中共领袖，在当时首先要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所以鲍罗廷挑来选去，认为瞿秋白最合适，所以要瞿秋白同自己一起上庐山。

鲍、瞿上了庐山后，在庐山讨论了中国革命的问题。时鲍罗廷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但这个责任问题要有个交待，中共的失败，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如果这样，对莫斯科的威信影响太大。责任要谁负呢？鲍罗廷认为应由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要挺身负起这个责任。

瞿秋白自然同意鲍的意见。

7 月 21 日，鲍、瞿又密秘回到武汉，当天，鲍便宣布：瞿秋白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当时，中共中央计有六名常委，鲍虽然没有确定以谁为"龙头"，而事实上，瞿从庐山回到武汉，就成为了中共的第二任领袖。

7 月 23 日，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新代表罗明那兹秘密抵武汉。7 月 27 日，原先的共产国际三位代表奉调回去。结果，这三个人回去后都遭了厄运。斯大林拒绝见鲍罗廷，后又将其逮捕，1951 年 5 月 29 日，他惨死在其流放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时年六十七岁；罗易是印度人，共产国际将其开除，后遣返回国，1954

年1月25日病逝；维经斯基也于1953年病逝莫斯科。

新任的共产国际代表一到武汉，即同瞿秋白、张国焘长谈。罗明那兹时年二十九岁，细高挑个儿，高鼻子，蓝眼睛，远远一看，象根细黄瓜。他还有两个助手，一个是个俄国女人，叫洛蜀莫娃。另一个是个25岁的小伙子，德国人，名叫纽曼，是德国共产党员，为德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因其曾领导过德国的暴动，故有"暴动专家"之称。

罗明那兹于1898年出生于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1917年加入俄共(布)，1926年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其来武汉，是来执行共产国际在中共全权代表的使命的。

罗明那兹自我介绍说他名叫"尼古拉"，在文件中用他的名字英文开头字母"N"作为他的代称。罗明那兹是个少壮派，根本没把瞿秋白放在眼内。他对瞿秋白说："我现在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全权代表，奉命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还有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上所犯的错误。同时，来指导中共的工作。"罗明那兹滔滔不绝地说："由于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违反了国际的指示，现在，共产国际决定要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再任书记，甚至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如果你们两人摆脱机会主义，仍可参加中共的领导工作。"罗明那兹又说："中共中央的主要错误，是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义的理解。"

罗明那兹的话，瞿秋白听得很不入耳，暗道："这罗明那兹哪里像个共产国际的代表？简单是沙俄时代的钦差大臣。下车伊始，什么情况都不了解，就夸夸其谈。"因为是国际代表，又初次见面，瞿秋白也没和他争辩，而是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南昌暴动——时中共已决定发动南昌暴动，却已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只差一声令下。瞿秋白说："当前有一个紧急的情况，需要我们立即讨论，不久前，新的中央作出决定，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目前，暴动正按计划进行准备，我们很需要苏联方面对暴动给予支持。"

瞿秋白一说完，罗明那兹的脸就拉长了，他那淡蓝色的眼珠儿滴溜溜地转着说："这是大事，要请示莫斯科后才能决定。"

张国焘认为罗明那兹听到暴动二字，一定高兴的眉飞色舞，见瞿秋白还没把话说完，罗的脸就拉长了，没敢再开口。这时候，瞿秋白见罗明那兹不支持起义，急了，说："罗代表，事情已迫在眉睫，不能再拖了。"

罗明那兹用质问的语气说："为什么一定要举行暴动？我今早会见张发奎的顾问加仑将军。据他讲，他前天曾同张发奎讨论过军事的问题，张将军同意加仑将军的意见，将他的部队集结在南浔线上，不再东进，向南转移，回到广东。"罗明那兹又说："加仑将军认为，张发奎如果同意回师广东，而且不强迫叶挺等人退出共产党，我们就可以同张发奎一起回师广东。这样做，在军事上极为有利，如果在南昌与张氏分家，在优势敌军阻击下，恐难取胜。"

罗明那兹说完之后，张国焘没有开口，瞿秋白却急了。他不由得站了起来，说道："我们不能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张发奎身上，从目前种种迹象看，张发奎和汪精卫已形影不离，张汪协谋已成定局，并在庐山开了诱编叶、贺的黑会。并指示人炸毁涂家埠铁路大桥，妄图阻叶、贺两部南下，所以说，南昌起义，势在必行。"

瞿秋白这么一讲，罗明那兹沉默了，过了一会儿，他说："这么办吧，我请示一下共产国际。"

当下，罗明那兹给共产国际发了电报，很快，共产国际回了电，电报写道："南昌起义，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必举行。"

共产国际这封电报，实在是个瞎子算命两头堵的电报，就是说：起义如果胜利了，是执行了电报指示；失败了，是没有执行电报指示。说穿了，共产国际在南昌暴动的态度上，是狗皮袜子——里外有里(理)。

既然共产国际有电报指示，就得讨论如何执行。当下，瞿秋白立即组织召开了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在武汉的中共领导人罗迈(即

李维汉——作者注)、张太雷、张国焘都参加了。罗明那兹和他的两个助手洛蜀莫娃、纽曼也参加了。会上讨论了共产国际的电报，瞿秋白、罗迈、张太雷态度十分明确，坚决地主张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瞿秋白说:"共产国际在电报里用了'毫无'二字，目前看，南昌暴动，不是毫无把报，而是成功的把握很大。"

张国焘没有发言，而是在一旁默默地吸烟。罗明那兹见他不开口，问道:"国焘，你的意见呢?"

张国焘看了看罗明那兹，又慢慢地吸了口烟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这时候，那个"暴动专家"纽曼大讲了一番暴动的理论，众人只好耐着性子听下去。纽曼讲完了，罗明那兹指着纽曼说:"他来中国，就是指导中国今后的暴动的。"

瞿秋白见众人都同意南昌暴动，说:"要迅速派人到南昌，向南昌的同志们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谁去好呢?"

罗明那兹看了看张国焘，说:"是不是由国焘同志去传达?"

张国焘听了，没有表示同意与否，罗明那兹又问了一句:"国焘同志，可以吗?"

张国焘实在不愿去，便迟疑了一下说:"武汉要处理的事情还很多，是不是派王若飞去。"

罗明那兹说:"王若飞是什么人?"

瞿秋白说:"王若飞是中央秘书处的秘书长。"

罗明那兹摆摆手:"不要换人了，即使王若飞能干，可他还要了解我们会议的精神，要完成这样的使命，仓促之间，很难办到。"

张国焘见罗明那兹一定要他去，便说:"好吧，我就动身了。"

当天，张国焘便乘船直奔九江。

1927 年 8 月 1 日，中共于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接着，暴动队伍南下直奔广东潮汕。

8 月 7 日，中共"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由于参加会议的

代表不齐，中共六常委中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三人在前线，留在武汉的瞿秋白、罗迈、张太雷参加。因此，这会议无法叫“中共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因而，称作“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罗迈、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此外还有湖南、湖北代表，军委代表、共青团代表陆定一、彭公达、邓小平、王一飞等，罗明那兹、纽曼、洛蜀莫娃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罗迈主持。由于环境险恶，会议只开了一天，中心议题有三项。一是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与议定告全党党员书；二是临时中央常委代表瞿秋白报告与讨论通过会议决议案；三是改组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了罗明那兹就召开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报告，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邓中夏、蔡和森、毛泽东、罗亦农、任弼时等人都先后在会上发了言。纷纷批判揭发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问题、农民土地问题、政权问题、武装问题上的错误。罗明那兹的报告，经过大会的讨论，后稍作修改，即以《中央“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发出。

陈独秀右倾路线对中共的统治于此结束。

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九人，为：向忠发、顾顺章、王荷波、彭湃、瞿秋白、苏兆征、罗迈、任弼时、罗亦农；候补委员计七人，为：李立三、周恩来、张太雷、邓中夏、毛泽东、张国焘、彭公达。

8 月 9 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会上，选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常委。瞿秋白兼管农委、宣传部，并兼任党报总编辑，罗迈兼管组织部、秘书厅，苏兆征兼管工委，周恩来负责军事部。

8月11日，中共中央又决定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组织人选及任务。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来、张太雷、彭湃、陈权、恽代英、黄平、张国焘组成，以张国焘为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由蔡和森、王荷波、彭述之、张昆弟、刘伯庄组成。王荷波为书记。

这次会议，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蔡和森被取消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瞿秋白就此作了说明，他说："陈独秀，还有谭平山是机会主义者，应受到严肃的处理，谭平山可能被开除党籍，陈独秀的党籍可以保留，党内职务一律撤销，张国焘同志曾袒护过机会主义，反对过共产主义。湖北总工会的领导错误，应由李立三负责，解散工人纠察队，应由周恩来负责，中央的许多文件，是蔡和森经办的，有机会主义错误。农民协会方面的不少荒谬的训令，是毛泽东经办的，他要负责。所以，张国焘等同志离开政治局。"

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武汉陆续迁往上海。

罗明那兹一面批评中共路线上的右倾，一面极力主张搞暴动——这在他来华时便已有此打算，他带来的德国"暴动专家"就足以说明他的立场。瞿秋白对罗明那兹的主张唯命是从。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召集了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是在南昌暴动失败后召开的。自此，瞿秋白的"左"倾路线在中共全党全面推开。会上作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内称：

> 城市工人暴动的发动是非常之重要，轻视城市工人，仅仅当做一种响应农民的力量，是很错误的，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城市工人的暴动是革命的胜利在巨大暴动内得以巩固而发展的先决条件。

于是，瞿秋白这位中共的“舵手”，把中共这条航船一下由右拨向了“左”。全党的中心集中到了“暴动”上。暴动成了革命与不革命、反革命的分界岭。中共由右突然至“左”，有主观亦有客观原因，李维汉后来回忆道：

> “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革命急性病，使党内‘左’倾情绪很快地发展起来。
>
> 除了这种‘左’倾情绪外，还有一个认识问题，即所谓‘左’比右好，‘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当时在党内（一定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舆论，而‘左’倾情绪和‘左’倾认识（理智）结合起来，就成为盲动主义发展动力。……于是，盲动主义代替了投降主义。”

中共历史证明，矫枉极易过正。

暴动成为盲动。也为中共以后接二连三的盲动主义的错误种下了根苗。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还对谭平山等人作出开除党籍、除名、罢免的处分。其政治纲纪整饬案称：

> 一、谭平山任国府农业部长，脱离党而自由行动，联络邓演达组织第三党，反对中共中央，未得中央许可。向汪精卫请假，与汪代表陈慕圃谈话时攻击本党政策。党派其赴俄，不遵守命令而赴九江、南昌，宣传第三党，对于清算土豪及没收土地政策尤为反对，应予开除党籍。
>
> 二、张国焘受中常会之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违反中央政

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影响，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要均予除名。

三、此次前敌委员会犯了重大错误，所有委员一律予以警告。……南方局广东省委指导农民暴动的错误，在于不了解标语，不发动群众，只知道用军事行动，应全体予以警告。湖南省委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取消现任省委资格，彭公达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之资格取消，并予以半年之监视，毛泽东在"八七"紧急会议之后，奉派至湖南改组党部及指导秋收暴动。事实上他就是湖南省党委的中心，所以湖南省党的错误，毛泽东应负重大责任，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予以罢免。

四、鄂北特别委员会违反中央命令，全体予以警告。陆沉时任特别委员会的书记，而其主张行动均出自军事投机的心理，根本不做农民运动的工作，应取消其中央委员的资格。

五、鄂南行动委员会傅同志应予半年的监视。

六、王若飞指导错误，应予警告。

七、杨鲍安取销中央监察委员会资格。

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使中共的暴动成了家常饭，任何行为离开了暴动，就好像是机会主义。其暴动政策也走到了"儿戏暴动"、"强迫暴动"、"命令暴动"的道路上。结果，暴动不仅不能推翻敌人，反而把自己的地下力量暴露，实在是一种"自杀行为"。

盲目暴动在城市的损失更大。时中共中央常常令几个或十几个同志，在某家工厂或散工的时候，混在工人中，突然喊几句武装暴动的口号，结果暴露了身份，遭敌人逮捕而被杀害。

农村中暴动要好一些，一些组织农村暴动的领导人，凭着自己的才干，在国民党势力较弱的地方举行了暴动，取得成功，因而保

存了一些实力，后来散布在各边远地区的苏维埃区域，就是以这些保留下来的实力为基础的。

时瞿秋白认为在陈独秀任总书记间的重要领导干部，都有着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遗毒，这种机会主义遗毒，应当在暴动中清洗，因而，使一些重要领导干部在冒险的行动中丧生。

与项英、刘少奇齐名的、曾任过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全国总工会委员、湖北全省总工会秘书长等职的许白昊，瞿秋白认为他机会主义思想严重，指派他去干下层的艰苦工作，说是能洗涤他过去的机会主义作风。不久，许在一次有十几个工人的街头集会中被捕，不久被杀害。

12月11日，中共发动的广州暴动，是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个最重要的表演。当广州暴动胜利的时候，瞿秋白欢喜的几乎跳起来，结果，不到三天，暴动失败，中共广东共委书记、暴动总指挥张太雷阵亡。其余暴动者，仅有少数逃出城外，余皆阵亡。

广州暴动的惨败使中共内部震动。尽管瞿秋白一再称广州暴动是布尔什维克的壮举，但许多人都认为广州暴动是机会主义的冒险行为。

李立三随即派往广州，接替了张太雷的职务。

武汉暴动、长沙暴动、上海暴动、北方顺直暴动以及其他各地的大小暴动，都遭到了惨败。

暴动的一次次惨败，使中共的力量遭到巨大损失。瞿秋白这位中共的第二位“舵手”也因此威信扫地，陷入困境。

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给中共造成了新的混乱，引起了中共内部许多人的批评和抵制。到了1928年初，各地的暴动都相继停止。同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也批评了中共的“左”倾错误。否定了罗明那兹对于中国革命的“左”的主张。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均批评了罗明那兹的极“左”主张。

罗明那兹很快奉调回国，不久，即被调离共产国际，前往高加索。1930 年 12 月，又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1934 年，罗经不住打击，自杀身亡。其自杀后，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党。

4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周恩来及邓中夏、项英等，在上海天蟾舞台后面楼上的两间房中，讨论共产国际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

共产国际的决议案，明确地反对中共的盲目暴动。

4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即“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二月会议中国问题议决案的”。内称：

>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讨论国际执委二月会议的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后，接受这一决议案之一般方针，并且认为在最短期间，于本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必须切实执行这决议案必要的具体步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过去的工作，正是一面与机会主义余毒奋斗，一面即尽自己过去的力量指正党内各地所表现出来的盲动主义。——这种盲动主义的倾向，不但表现于无产阶级的工商业中心之玩弄暴动，而且反映着小资产阶级式的农民原始暴动的情绪，如杀烧主义，忽视城市工人阶级的倾向等等。——国际的决议亦就是指导我们努力继续战胜这些盲动主义以及青年团之先锋主义倾向，在艰苦斗争之中锻炼真正布尔什维克的思想，彻底肃清机会主义的流毒。

会议之后，瞿秋白即动身赴莫斯科。5 月 1 日，周恩来、邓颖超离沪赴俄，接着，众多的中共领导人都赴俄，参加中共“六大”。罗迈、任弼时、罗登贤留在国内主持工作。

中共“六大”于 1928 年 6 月 18 日至 7 月 11 日，在莫斯科郊区兹维尼果德镇银光别墅中召开。

大会按照斯大林的调子，重点批判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瞿秋白亦于会上作了深刻检查。大会议决案中称：

> 十一月扩大会议在议决案上，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不正确地采用了“不断革命”的名词，于是就解释革命是不断高涨着，由此就得到不正确的策略。同时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武装起义策略观念很久是模糊的，于是有不正确的估量和策略，以及过于忽视敌人力量的观念，——这些都可以成为盲动倾向底根据，因此，没有严厉地防止当时党内已经发现的盲动主义的倾向（这种极左派的倾向正是有害的）。

大会取消了瞿秋白的中共“舵手”地位，但仍保留其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由于两名知识分子出身的中共“舵手”把握的航向出了偏差，使中共这条航船先右后“左”，因而，共产国际决定中共第三位“舵手”，应由工人成分的人担当。于是，选中了向忠发。

第三章　中共的第三位“舵手”主政之际

向忠发其人

共产国际何以选中向忠发?

向忠发,1880年出生于湖北汉川。其青年时期在汉阳兵工厂当学徒。后当水手、码头工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到湖北省工会工作。曾任汉冶萍总工会副委员长。1926年后,历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武汉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五大”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个偶然的机遇,向忠发被推到中共“舵手”地位。

那是“八七”会议结束不久,共产国际电示中共,称苏联的十月

革命纪念日将至，此系十年大庆，非比寻常，世界各国共产党都派团朝贺，中共亦当派团前往。

对于莫斯科的电文，瞿秋白等不敢怠慢，遂组成了一个“中国工农代表团”前往朝贺。既然是工农代表团，自然要工农出身的人带队，这样，便选中了向忠发，又派李震瀛为向的副手。李震瀛，又名李宝森，天津人，1921 年加入中共。一直从事工人运动，在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也是“八七”会议的与会者之一。

向忠发和李震瀛于 1927 年 10 月来到了莫斯科，向时年四十七岁，一副老工人模样。这时共产国际正打算在中共中物色一名工人出身的领袖，向忠发的出现，使共产国际找到了理想的对象。于是，当向忠发和李震瀛参加了十月革命十周年后，共产国际就又派他们到德国和比利时，出席了“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理事扩大会议。向忠发不仅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还参加了组建在“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领导下的“反对中国白色委员会”。1928 年 2 月 9 日至 25 日，向、李又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斯大林和布哈林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接见了向忠发和李震瀛，听取了向、李关于中国革命的汇报，接着，又以联共代表团和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联合起草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由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全会通过。这个决议案，就是前文述过的那个否定瞿秋白、罗明那兹暴动再暴动的决议案。

由于向忠发得到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接见，又得到共产国际的高看，顿时身价倍增。于是，在中共“六大”会上，当选为中共的第三位“舵手”。

对于中共的屡次失误，共产国际自身也进行了反省，最后，认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还是不派代表为好，因为派了鲍罗廷，使中共犯了右倾错误，派了罗明那兹，又使中共犯了“左”倾错误，便决定不派代表，而是要中共派两名代表于莫斯科，经过这两名代表指导中共的工作。布哈林对此指出：

> 共产国际的代表并不是个个都经过考试的，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他们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共产国际执委会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不派代表比派那些犯错误的代表好些。

这样，张国焘、瞿秋白被留在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邓中夏、余飞、陆定一、王若飞也以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国农会驻农民国际代表、中国共青团驻少共国际代表的身份，留驻莫斯科，中共的这些代表，组成了中共代表团。

共产国际声称不再往中共派驻代表，事实上没有做到，而且事隔不久，即又派了米夫前往，此为后话。

向忠发担任了中共“舵手”，而实权却落在了李立三手中，并导致了中共继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路线之后更加“左”倾的路线，向忠发的大权缘何旁落的呢？而当时的李立三即不是政治局常委，也不是政治局委员，而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说来其中也有戏剧性。

中共“六大”之后，向忠发、蔡和森、李立三，一起先后回国，周恩来、项英、苏兆征因事留在了莫斯科。

前文说过，向忠发是个已年近五十的老工人，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差，本不适宜担此重职，完全是共产国际捧上去的。因而，只能是聋子耳朵——摆设。这样，中共的实权开始落在了蔡和森手中。

蔡和森，1895 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学名蔡林彬，“蔡林”是双姓，缘为蔡和森的九世祖姓林，福建莆田人。在康熙十年过继与蔡姓舅父为子后，迁居永丰，改姓氏蔡林，后简姓蔡。蔡和森 1913 年秋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时，改名蔡林彬。和森为其笔名，但后来人皆呼其笔名而不用其学名。1918 年蔡和森与毛泽东建立新民学

会，创办《湘江评论》。"五四"运动后率领一批青年赴法勤工俭学，并组织工学互助社，因其在留法间曾依靠一本字典的帮助，勤奋钻研攻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得到了"小马克思"的誉称。1921 年，其在法国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冬被法国政府以宣传共产主义的罪名驱逐回国。年底于上海加入中共，中共"二大"至"六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1922 年后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1925 年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同年冬，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委第六次扩大会议。1927 年回国，中共"五大"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蔡氏具备领袖之才，不料他时运不济，回国后不到半月，即被顺直省委的一些问题所牵扯。接着，他的旧病复发，只得离开中央养病，此后不久，他又被指责为右倾而被撤销了政治局常委及中央宣传部长职，后来，到了 1929 年 1 月，他奉调至莫斯科，参加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

如此一来，中共的实权就落在了已被开过三次追悼会的李立三身上。

开过三次追悼会的人掌了中共实权

李立三缘何开过三次追悼会？

前文述过，李立三在组织安源工人大罢工时，路矿两局头头为瓦解工人意志，买通了当时的官方报纸，登了一则消息，言李立三为罢工事至长沙，为湘省督军赵恒惕部所擒，腰斩于长沙市北小门外。此消息传到法国，旅欧的党团员们即在巴黎郊外的戈隆勃·卡纳莱·浦安特街三十九号的华侨协社内，为李立三举行了追悼会，此为第一次。

在 1925 年的"五卅"运动中，李立三是总指挥，"五卅"运动遭

到了上海买办阶级头子虞洽卿的破坏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便撒开逮捕李立三的阴谋网，8月的一天，李立三正在上海总工会办公，一个被开除会籍的工贼带着一群流氓打手，冲进了总工会，李立三从楼顶跳到了邻家屋脊，躲到一位老大娘家，在这位老人家掩护下才脱离危险，之后，李立三由上海到了武汉。当时武汉的吴佩孚政权为谋杀他，雇用了江湖上飞檐走壁的刺客刺杀他。这刺客见李立三日夜与穷苦劳工谈话，知他是个正义好人，为他的行为所感，便将吴佩孚要自己刺杀他的阴谋相告，使李立三得以迅速转移。那刺客也极聪明，为骗吴佩孚，编了一个李立三被刺死的谎话。吴信以为真，第二天便在报上登出消息。报上这么一登，工人们听说李立三遇难了，无不悲痛万分，纷纷举行追悼会，悼念这位工人运动的领袖。这是李立三第二次被追悼。

第三次追悼会是在南昌起义的途中。

1927年8月1日南昌暴动之后，李立三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任政治保卫处长、工农运动委员会委员、战时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政治保卫处的主要任务是镇压反动派，负责筹款和运输等。保卫处里设两个科，有一个连的兵力。直属起义军总指挥部。

起义军南下之后，时值8月天气，南方8月，天气异常炎热，酷暑难当，起义军每人要背步枪、子弹、背包、军毯、水壶、饭匣、洋镐、铁锹等武器和用品，计有六十多斤，且每天要走百十里山路。而那山路崎岖，十分难行。这条行军路线的沿途，大革命的风浪尚未波及，加之反对派的宣传，百姓们早已望风而逃。使得起义军找不到民夫，机关枪大炮都由士兵自己来扛，食物和饮料也买不到。由于喝田沟里的水，士兵们得病的极多。行军到瑞金壬田寺时，突与敌军三个团遭遇，当即一场激战。激战三个小时，始将敌军消灭，义军亦伤亡六百余人。

壬田寺一战后，起义军又在会昌与敌钱大钧部一场激战，击溃钱大钧部。起义军在瑞金城中休息了数天，改变了原定的从寻邬下

广东梅县的计划，转道长汀、上杭，直奔广东的潮汕。

起义军入闽之后，分路行进，第1路是叶挺、贺龙主力；第2路为谭平山率领的革命委员会机关；第三路由李立三指挥上千名大脚妇女和青壮年男子抬担架运伤病员；第4路由周士第率全部人马做后卫。数天之后，起义军浩浩荡荡地开到了长汀。

这一天，周恩来处理完事务，正与刘伯承、叶挺、贺龙等将领商谈南下的军事计划。突然，张国焘推门而进。周恩来抬头一瞅，见张国焘脸上显出了很悲痛的表情，不由得惊问道："国焘，出了什么事了？"

张国焘难过地说："李立三牺牲了。"

周恩来又追问了一句："谁见到了？"

张国焘说："他的贴身勤务兵，刚才赶到汀州，亲口对我讲的。"

周恩来立即对门外的一个勤务兵说："把李立三的勤务兵找来。"

工夫不大，李立三的勤务兵来了，这是个二十左右的小伙子，长得虎头虎脑。很机灵，名叫于柱儿。周恩来平心静气地问他："小于，你们李处长怎么了？"

于柱儿眼含热泪说："我们李处长被人打死了。"

周恩来问："是你亲眼所见吗？"

于柱儿说："是我亲眼看到的。"

于柱儿擦了下眼泪，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经过是这样：李立三不是保卫着伤病员行军吗？从瑞金到汀州，全是山路，而且沿途人烟稀少，到处是野草荒坡。这伤病员队伍，行动起来，格外的缓慢，一天也行不了四五十里路。

李立三是保卫处长，既要负责行军事宜，又要负责转移中伤病员的安全。行军第四天，赶到一个叫黄蜂岭的地方，李立三接到报告，说有一个重伤员要牺牲了，想见见他。李立三急忙赶到这个重伤员身边，一看，这个伤员他认识，名叫王长发，原是武汉汉阳兵工

厂的工人，起义时是个连长，作战非常勇敢。李立三握着王长发的手，眼看这位勇敢的战友将要离去，他心里十分难过。过了一刻，王长发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微微睁开了眼，嘴唇动了动。李立三连忙伏在他耳边，难过地问："长发同志，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王长发声音十分微弱，他用力颤动着双唇，李立三隐约听到他说："采些野果带着……伤员们吃……"

李立三明白了，因为喝田沟水，伤员们生病的太多，山里行军，有时连水也喝不上，采野果能救急啊！他流着泪，感激地朝王长发点了点头。王长发已经说不出话了，他轻轻晃了晃头，就慢慢合上双眼，李立三和同志们一起，将烈士的遗体抬到了路边的一个小树林里掩埋。安排好这一切，李立三和小于便追赶前头部队去了。

他俩走到一个山嘴的时候，李立三看到山坡树丛中，露出了一串串红红的山果子，王长发的话仿佛又在耳畔响起，他便停住了脚步，招呼小于说："咱们采点山果子带着吧。"

小于拉住他，要自己去。

李立三说："你脚上满是泡，坐路边等我，歇下吧。"说着就向山坡上的树丛中走去。

小于坐在路边，等了一会儿，不见李立三回来。又等了一会儿，还是不见李立三的影子，他有些着急了，刚要起身去找，忽然听到李立三去的那个方向响起了枪声，小于知道有了情况，他急了，三脚两步地朝那个山坡跑去。刚走几步，突然惊住了，原来，他看见李立三倒在了山坡上。小于一边喊着，不顾一切地奔去，可是，当他到了那里一瞅，只见那红红的野果，散乱地撒在地上，地上还有一摊血迹，再一看，人不见了。这时候，掩埋烈士的那些勤务兵也都赶到了，大家听说李立三出了事，都很焦急，便顺着血迹寻找。找来找去，找到一个悬崖绝壁，没了路，再往下一看，只见从悬崖壁上生长出一棵树来，那树上挂着一具尸体。几个人站在悬崖顶上，看了半天，由于那树距岩顶二十多米，只能模糊糊地看出是个人。有心把

尸体拉上来吧，这悬崖又如刀切的一般，根本无法下去。大家望了一会儿，越看越难过，特别是小于，哭得更是伤心，老觉得自己没有起到保卫李立三处长的责任。既然李立三已死，这几个人就只好奔向汀州。

小于把情况讲完，周恩来紧皱眉头问道："小于，这么说，李处长是什么人杀害的，还不知道。"

小于点了下头说："没看见。"

贺龙说："不用问了，八成是遇到土匪民团，或是敌人的散兵游勇。"

贺龙讲完，大家都不说话了。好一会儿，周恩来用沉重的语气说："我们党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啊。"他叹息了一声，对张国焘说："国焘同志，开个追悼会吧，你来准备一下会场。"

张国焘感慨地说："立三拣了多少条命呀，那么多险情都一个个过去了，没想到竟这么窝窝囊囊地死掉了。"

这一天，追悼会在长汀城中正德中学操场举行，除悼念李立三之外，还悼念南昌起义以来牺牲病故的同志。由于一时也找不到李立三等受悼者的照片，便在围着黑纱的镜框里写上了英雄们的名字，李立三的名字居于正中。会场摆着许多花圈，都是党政军各界送的。那花圈有的写"英名垂千古，丹心照汗青"；有的写"忧国身先殉，游仙梦不回"；有的写"人间未遂青云志，天上先成白玉楼"。周恩来送的花圈写道："死者瞑目戍边尚多英雄汉，烈士安息革命自有后来人"。汀州城中各界父老也送了挽联，那挽联写道："秉赤心照日月道范当年传梓里，驾青云骑白鹤灵魂此日赴蓬山"。

追悼会开始后，大家想起烈士们的感人之处，无不纷纷落泪。正当大家悲痛之中，不知谁惊喊了一声："李处长回来了！"

大家一瞅，果然是李立三走进追悼会会场。只见他又黑又瘦，身后还带了十几个人，这些人都是老百姓打扮。周恩来一看李立三，激动地迎了上去，抱住他的双肩，高兴地说道："立三，以为你牺

牲了，正为你开追悼会呢！”

李立三哈哈大笑道：“我到阎王爷那儿报了个到，阎王爷说南昌起义正需要你，你要立即赶回，我就又回来啦。”

当下，贺龙、刘伯承等人都围了过来，向他问长问短，问他是怎样的遇了险。李立三笑着说出了一段故事。

原来，李立三正在摘采野果子之时，忽然从树林丛中窜出个人来，一下将他拦腰抱住，李立三自小学过武术，就势一背，将那人摔倒在地，接着，掏出手枪就朝那人开了一枪，没等他子弹再上膛，又过来几个人，一下就把他架走了，其中两个见中弹的那个还在喘息，便抬着中弹人一起往深山里逃。当他们走到悬崖不远的小路时，中弹人已断了气，那几个一合计，就将这中弹者的尸首顺悬崖扔了下去。

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呢？是土匪。领头的就是被李立三打死的那个人。这个家伙姓孙名英，人送外号“金毛狮子”。这金毛狮子带着十几个土匪，在黄蜂岭一带打家劫舍。黄蜂岭属江西地界，为武夷山中的一个山头。这赣东的土匪，分别占着武夷山顶大小四十二个山头，统归武夷山主峰玉华峰山主紫面昆仑张道然统领。这张道然平常是个老道打扮。干的却是土匪勾当。共产党“八一”南昌起义，队伍向赣南开拔，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手下第一号谋士江开远，就在朱培德耳边出了个主意：“主席，共产党要南下广东，途中必经武夷山，卑职愿凭三寸不烂之舌，给他共产党下道绊马索，虽不能给他个全军覆灭，也能搅它个鸡犬不宁。”

朱培德往鼻子里抹了一撮鼻烟儿，说：“开远，你有什么法儿？能给叶、贺叛军设绊马索？”

江开远说：“武夷山玉华峰三清观中老道张道然，是我的磕头兄弟。张道然手下管着武夷山四十二峰的大小寨主，只要他发个帖儿，这些大小寨主就是刀山火海也敢闯。叶、贺叛军恰恰走的是这条路。我让张道然下个帖儿，命令他手下四十二峰的山大王，抓叶、

贺叛军中的头头儿，回头按捉拿的官儿大小给赏钱，官儿越大，给的钱就越多。古语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些山中土匪，地形熟悉，又在暗中，定把叶，贺叛军搅个人心惶惶。”

朱培德听了，很高兴，他又抹了撮鼻烟儿，痛痛快快地打几个喷嚏，就命江开远去了玉华峰。

江开远很快见到了张道然，两个一说就妥了，张道然立时就下了一道绿林帖子，要各处山主，捉拿共产党的官儿，而后按抓到的官儿大小给赏钱。也算是吉人天相吧，会昌之战以后，起义军改了行军的路线，由瑞金转向东，奔了福建地面。这路上只经过一个黄蜂岭。那黄蜂岭的山大王金毛狮子，打听到起义军走黄蜂岭，就带着几个喽罗，埋伏在路上，想抓几个共产党的大官儿发发财。大部队经过时，他们见人多不敢动手，到李立三带领的伤病员队路过时，这些土匪见大脚的妇女们抬着伤病员过走，他们断定不会是大官儿，也没动手。偏偏李立三同勤务兵于柱儿单独地走来。金毛狮子瞅李立三的模样、派头，就断定是个官儿。偏偏这两个人还停了下来。金毛狮子刚要动手，又见李立三要去摘野果儿，勤务兵小于还脆生生了地喊了句“处长”。金毛狮子乐了，他对手下的喽罗说：“要把这个抓住。”说着，便悄悄地往路边儿移动。李立三却朝着他走来，而且竟走到了金毛狮子跟前，金毛狮子开始吓了一跳，以为李立三发现了他。后来他见李立三是摘野果子的，高兴了，趁李立三不备之时，也没和身后的喽罗打招呼，就一下扑了上去。他万没想到李立三也练过武功，结果呢，就是前边讲的，反被李立三摔在地，李立三又趁势一枪打中金毛狮子前胸。李立三开枪之后，怕有人暗算他，立即翻身倒地，小子听到了的枪声，就是李立三打的，他见到的李立三倒地，也正是这一刻。这时候，那些喽罗见山主被打中，便一拥而上，促住了李立三，他们怕起义军大部队追了过来，架着李立三，抬着金毛狮子就往深山里跑，后来见金毛狮子没了气，就顺手扔下了悬崖，没想到金毛狮子的尸体被树枝托住。小于看到

的血迹和尸体，就是金毛狮子的。

李立三被这些喽罗带到一座山神庙里后，喽罗们将他捆起，李立三觉得口渴得厉害，便跟喽罗们要水喝。一个二十出头的的小喽罗给他端来了一碗水。李立三喝过之后，觉得心里痛快了许多。这时天已黑了，那几个喽罗倒头睡了觉，由给李立三送水的小喽罗站岗。李立三就和他慢慢地谈了起来。谈着谈着，小喽罗便把肚里的话都端了出来。原来这些人也都是庄稼地里的受苦人，实在活不下去了，才上山当土匪。李立三听了，暗自点头。

第二天，几个喽罗又押着李立三在山里的小道上走。歇息的时候，李立三问道："各位兄弟，请问你们要把我押到哪里去呢？"

其中一个大个子说："这你就不要问了，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李立三叹了口气说："可惜，实在可惜。"

那大个子说："你有什么可惜的呢？"

李立三说："我手中有一大笔财产，只是，我一离开，这财产就全完了。"

李立三这么一说，那几个喽罗都站住了脚，说："你说的这财产在哪里呢？"

李立三说："就在汀州城里。"

大个子上下打量了一下李立三，说："你跟我们说实话，你在共产党里究竟是多大的官儿？"

李立三笑道："要说小也不算小，要说大也不算大，万两黄金从我手中过，百万兵马我指挥。可在穷苦人面前，我又是条老黄牛。"

几个喽罗眨巴着眼说："你说句痛快话吧，你到底是个什么人？"

李立三说："和你们一样，是个受苦人，在家里种过田，后来被财主们逼得活不下了，才逃了出来，投了这共产党的队伍。"

那几个人听了，问道："敢情你是到了共产党的队伍里，才发了财呀？"

李立三说："共产党的队伍，是穷人的队伍，专打土豪劣绅，杀富济贫，为穷人撑腰出气。"

大个子想了下说："共产党的队伍，能要我们吗？"

李立三明白他们的意思，便说："如果各位愿意参加共产党的队伍，我来引荐。如果各位要光洋，到了汀州，别的不敢说，五千元可以奉送。"

李立三这么一讲，几个喽罗都动了心。那个大个子同其他几个商议了一下后，说："我们也都是穷人，是逼到山上当匪的，在这山中为匪，也不知何年何月才是出头之日。不如同你一起，一刀一枪地干个事业，我们愿跟你到共产党队伍里干功名。"

李立三说："那没说的，我一定引荐。"

当下，几个人给李立三松了绑。之后，便随李立三一起直奔汀州。一路上，李立三给他们讲了许多革命的道理，直讲得这些人连连点头，对参加共产党的队伍，劲头更足了，经过两天的赶路，终于到了汀州。李立三没想到众人正开他的追悼会。

李立三讲罢这段危险的经历，大家都为他庆幸。之后，李立三将那几个随他来的人编入了叶挺的部队里。

李立三三次大难不死，人们都说他必有后福，向忠发也很迷信，认为李立三命大，便把一切权利都让与李立三，自已只当个空名而已。

就这样，李立三掌握了中共的实权。但是，到了是年 11 月上旬，周恩来由莫斯科回到上海，这样，中共的实际领导是周恩来。11 月 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作出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新的中央的工作计划。从这时起到 1933 年的 3 月初，中共中央的许多通告、文件，皆出自周恩来之手。李立三只为周的副手。向忠发依然是名义领袖。周恩来的思想比较温和。因而，在中共"六大"后的近两年的时间内，中国的革命力量是长足发展的。说明周恩来把握的中共

这条航船的航向是正确的，是有成绩的。到了1930年3月初，周恩来赴莫斯科汇报工作，周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急于革命求成，一下就把中共推向了比瞿秋白盲动主义还“左”的航向。

李立三“左”倾路线的发生，也与中共“六大”的路线有直接关系。中共“六大”的路线，总的说是正确的，但是，“六大”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正如毛泽东后来指出的：

> “六大”的路线，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

中共“六大”的缺点和错误又和共产国际的错误领导分不开的。当时的国际形势和苏联党内的斗争，促使中共“六大”发展了缺点和错误。1929年的春天，联共党内“反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公开化，而且越来越尖锐。于是，共产国际一系列会议和决议以及对中国的指示一再强调反右倾斗争的重要意义。指出：无论在国际上和在中共党内，右倾都是主要危险倾向。共产国际并批评中共的“六大”决议是犯了“联合富农”的错误，指示中共必须执行反富农的政策。1929年的夏天，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第十次会议上，米夫提出：“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的阵地巩固起来，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涨，证明工人阶级中意志消沉的状况开始消除，证明失败的最低点已成过去，工人阶级又大显身手了。到了1930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更明确地指示：

> 事态的发展方向是近期革命形势即使不能席卷全中国，无论如何也会波及到许多关键性省分……必须集中

精力组织和加强红军，以期将来根据军事和政治形势，去夺取一个或数个工业中心和行政中心。……党的任务是要同时加强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要反对右倾，因为右倾对于顺利执行党所面临的各项任务来说，是一个主要危险。

从1928年到1930年，在中国国内，新老军阀混战不断，蒋介石虽然率领国民革命军完成了第二次北伐，东北易帜南京，北洋系统的老军阀们被赶出了政治舞台，但新军阀又开始了往来拼杀，先是蒋桂之战，接着是蒋唐之战、蒋唐石之战、蒋冯之战，到了1930年，终于爆发了中原大战。军阀们频繁的混战，无暇顾及中共，如果中共能正确的估计和利用新老军阀混战的形势，可以大大地发展革命力量，但是，以李立三为实际领导的中共首领们，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夸大了革命力量，错误地判断了反动统治危机，结果，形成了冒险主义路线，把中共自“八七”会议以来产生的“左”倾思想和情绪，推向了高峰。

从1930年3、4月开始、李立三的“左”倾思想倾向就日益膨胀。3月26日，李立三撰写了《准备建立革命政权》，在《红旗》上发表，内称：

……就全国范围内看来，革命的群众斗争，工人、农民、士兵、红军，确实是一个普遍发展的形势。从哈尔滨、唐山、天津以至武汉、上海、厦门、广州、香港都是平衡地向前发展。……在这样形势下，怎样去建立革命政权将要成为策略路线的中心问题。……革命政权或许不能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而要首先建立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一省或几省的革命政权，虽然不是全国范围内的革命胜利，但他已经是有了全国范围内之革命高潮。

之后，在两月之内，李立三又连续写了五篇文章，为：《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怎样准备夺取一省与几省政权的胜利条件》、《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论革命高潮》、《建立政权与革命转变》。这些文章，均发表在《红旗》杂志上。文章反复强调城市武装的重要性，是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革命政权的主要手段。

李立三在数月之内所撰写的六篇文章，是他提出"左"倾政治路线的基本思想。按照这个基本思想，4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共湖北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接着又召开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这两个会上，李立三布署了一系列的"左"倾政策。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了会议，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内称：

> 在产业落后的中国，一般的说来，尚没有形成可以完全支配全国产业的经济中心，而且在几个与帝国主义通商的商业经济中心，而且在几个与帝国主义通商的商业中心支配下(如上海、香港、天津、武汉、大连)，造成政治上军阀割据的局面。因此，全国的统治阶级，动摇与崩溃形势是一样，动摇崩溃的程度却有差别。所以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目前的形势看来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客观条件更加成熟)，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目前战略的总方针。……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是与全国革命高潮不可分离，"没有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下，这种胜利没有可能实现"(六次大会决议案)……争取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斗争，是决定胜负的力量，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

省与几省的胜利。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乡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在革命的急剧发展，伟大的革命巨潮已经接近的现在，党不只是要注意到夺取广大群众，组织广大群众的争斗，以促进这一革命巨潮更快的爆发；尤其要注意到革命巨潮爆发时，组织全国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任务。因此，加紧组织群众的政治斗争，加紧宣传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注意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注意武装暴动的组织上和技术上的准备，注意布置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首先胜利，是目前党的策略的总路线。……红军的战略与战术，不只是要坚决进攻打击敌人的主力，向着主要城市与交通道路发展，根本改变他过去的游击战术，而且要在变军阀战争为消灭军阀的革命战争，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总的计划之下，有配合的，有组织的实现他的军事作战任务。这一任务的总的目标，便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过去的游击战术，已经与这一路线绝对不相容，必须根本的改变过去。……执行这一总路线的最大障碍，便是与这一总路线绝对不相容的右倾观念。党必须坚决的与各方面的，一切动摇的右倾观念，特别是尾巴主义的倾向斗争，是执行这一总路线的前提。系统的取消主义思想的取消派，已经在事实上，从党内的反对派发展成为阶级的敌人，需要党在党内特别在群众中更坚决的斗争。可是暗藏在党内的右倾思想，因为他表面赞成党的路线，而在每个实际的策略上都发生怀疑、动摇、怠工、不积极执行，的确同样的成为目前莫大的危害。不克服一切右倾的思想，党的路线与策略决不能充分的执行……如果因组织上的弱点而怀疑现在革命形势，怀疑党的路线，是极严重的右倾观念……

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左”倾错误主张。标志着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曾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瞿秋白，在莫斯科看了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文章，摇头叹道：“李立三发疯了。”

中共党内的一些有识之士，如何孟雄、林育南等，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一开始就进行了抵制和反对，何孟雄反对的尤为激烈。

何孟雄，湖南酃县人，1921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 年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工人大罢工。1925 年创建京绥铁路工会。1926 年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1927 年后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书记。何为中共党内一位具有较深理论修养和丰富实践经验的领导人，他有较强的分辩大事大非的能力。他在实践工作中感到李立三“左”倾错误的危害，遂于 1929 年 11 月中共江苏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于 1930 年 5 月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6 月的江苏省委会议上，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判。

7 月 9 日，李立三再次主持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政治讨论会，讨论进一步贯彻 6 月 1 日中央政治局会上他所做出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达到在全党扫除阻力，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会上李立三作报告，反复强调，说工人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只要有领导，会一呼百应，罢工就会罢起来。李立三说完，何孟雄第一个激烈地反对，接着，博古，王明，王稼祥先后站起来反对。尤其是王明，发言慷慨激昂，他就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问题，高潮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一省与几省的政权问题和反右

倾的问题，对李立三的《报告》和6月11日的《决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王明说："你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和物！"

发言批评李立三《报告》的还有何子述、林育南等人。李立三见大家都反对他，遂拍案怒道："政治局里有争论，国际代表反对，这都不足为奇，等南京打下来，让事实讲话吧！"

时共产国际代表也不支持李立三。国际代表此时为罗伯特。其对李立三的"左"倾暴动计划有看法，认为不适宜中国革命的实际，不同意下发《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李立三见罗伯特反对暴动计划，立即暴跳如雷，认为罗伯特思想右倾。如今他见何孟雄、王明、博古等人与罗伯特唱一个调调，所以更火冒三丈，拍案大怒，盛怒之下，把罗伯特也大骂了一顿。

7月9日会议之后，李立三为推行其"左"倾冒险主义，立即给王明等人扣上"右派"、"小组织者"大帽子，向忠发还宣布撤销王明中宣部秘书职（王明于6月被调任中宣部秘书），并给王明、博古党内6个月的处分。撤销了何孟雄江苏省委书记的职务，调任上海沪中区委任书记。王明不服，于7月10日写了意见书，向中共中央重申了他的意见。何孟雄更加激烈地反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他在8月上海区委和产委党团书记会上，沪中区委会议上，市政委会上，在9月1日上海区委和产委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上，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判。但是，直言的何孟雄却遭到了李立三的无情的政治打击。9月4日，江苏总行动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的意见——实际上是李立三的意见，撤销了何孟雄沪中区委书记的职务。9月8日，何孟雄愤怒地向江苏总行委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何孟雄政治意见书》，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见解，并从十二个方面陈述了和李立三及中央的分歧所在，系统的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

错误。指出了“中央路线行不通”。

对于何孟雄的《政治意见书》,李立三见后更是暴跳如雷,指示江苏总行委对何进行批判。9 月 10 日,江苏总行委召开了上海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对何开展了批判。会后,《红旗日报》又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公开批何,并掀起了一个批何的高潮。

从 1930 年的 6 月开始,立三路线即在中共全党全面推开。按李立三的部署,6 月主要是思想动员和向下部署阶段;7 月重点部署南京、上海、武汉三个中心城市的暴动,同时调动红军进改大城市,8 月,立三路线达到了高潮。李立三制定了一个全盘革命计划,即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暴动暴动再暴动”的极“左”口号,命令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大连、青岛、天津、哈尔滨等城市举行罢工、起义。同时,又不顾红军的实力,提出“进攻、进攻,勇敢地向中心城市进攻”的口号。命令红军离开根据地去攻打长沙、武汉、南昌、九江等地,要求“打下长沙,夺取南昌,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8 月初,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指导全国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很快,“总行委”举行成立大会,向忠发、李立三都在会上做了报告。李立三在会上说:“帝国主义的机关报已经公开承认‘武汉落入共产党之手,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假如在适当配合中,我们有极大的可能举行武汉暴动,与红军配合起来夺取武汉。”

会上,李立三提出,为了更迅速、更敏捷、更权威地领导各地的暴动,立即打破各地的各级党团工会等组织,合并于各级行动委员会中。李立三于会上要求北方局、长江局、南方局、江苏省委等都要成立总行动委员会。一切服从于准备武装起义,一切工作都以暴动为中心。时彭德怀率红 3 军团一度攻占了长沙,李立三更加得意忘形,更加肆无忌惮。为实现他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暴动计划,李立三手持中共大权,滥施威风,他今儿往甲地游击区派一司令,明儿往乙地根据地颁发一个师或军的翻号,其实,这些地方的军或

师也只有数百人，甚至有的仅百余人。对一些打入国民党部队的中共党员，他不管条件成熟与否，便下兵变的指示。

李立三坐镇中央，纸上谈兵，他今儿下令红军进攻这个城市，明儿又下令红军攻那个城市。为了实现他的计划，他命令曾中生率学生营举行南京兵变，攻击国民党中央党部，占领南京。时曾中生所领导仅有一个学生营，以一营之众在南京暴动，无异于以卵击石。曾中生遂向李立三据实报告。李大怒，斥曾右倾。遂于中共政治局作了《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强调南京兵变必须以占领南京为目的，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谁反对这个计划谁就是右倾逃跑主义，必须予以党纪制裁。

李立三为推行其路线，在中共党内实行了家长制，一言堂，凡反对他的人，都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进行打击和排斥。

正当立三路线发展到顶峰时，一度攻进长沙的红 3 军团在强敌之下退了出来，李立三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和红 3 军团此举是犯了“右倾错误”。下令红 1 军团火速西进，会合红 3 军团，组成红 1 方面军，由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二次攻打长沙。

共产国际驻远东代表罗伯特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后，李立三即以罗伯特思想右倾，妨碍和干扰中共的领导工作为由，以中共中央政局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击抗议，要共产国际将罗伯特撤走。时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几个月的工作，形成了一个决议，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问题表示了正面的意见。比较含蓄地批评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错误，也批评了中共对远东的态度。

李立三对远东的批评十分恼火，他再次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抗议，并进行辩解。接着，李立三又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写信、打电报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虚夸中共的革命力量、革命形势和所取得的战绩。李立三要求苏联放弃五年

计划，准备战争，命令蒙古加入中华苏维埃联邦等言语，要求共产国际批准中共在全国建立苏维埃和在全国武装起义的计划，请求共产国际和苏联发起世界保护、援助中国的革命运动。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于中共公然反对共产国际的驻中国的代表、拒不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和对苏联、对共产国际的要求，大吃一惊，遂发电于中共，命令中共立即停止各地的冒险暴动行为，同时派了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要求李立三速至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随之，共产国际的态度愈发严厉，停发了给中共中央的活动经费。

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瞿秋白

8月下旬，周恩来、瞿秋白动身回国。瞿、周回到国内后，当即向李立三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李立三在周恩来、瞿秋白的帮助之下，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有所认识。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电于共产国际，内称：

> 中政局完全同意来电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坚决的执行转变。长沙两次进攻，更加证明国际的指示以及反对武汉南京暴动是绝对正确的。对帝国主义的策略确需要。坚强红军，建立根据地与苏维埃政府是第一等工作。城市工作要有更实际发动群众以代替空喊的冒险。中央即开扩大会，接受国际七月决议与这一电示，将立即恢复党工会团的经常领导机关。在这一转变中，右倾机会分子已利用之作反中央的活动，将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对立起来。中央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

执行策略的转变，坚决反右派及调和派的斗争，立三同□(原电字缺——引者注)坚决，因此，政治局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请立三暂不来国际，可否准许盼复。

中央局

9月24日，在瞿秋白、周恩来领导之下，中共中央于上海麦特赫斯脱路一幢洋楼里，秘密召开了第六次扩大的三中全会。中央委员到会者十四人，审查委员二人，出席会议的还有北方局、南方局、满洲省委、江南省委、C·Y及全总党团代表二十人。议事日程计四项：第一项，接受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1930年7月23日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问题；第二项，组织问题，同时一并讨论共产国际东方部对于中国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三项，职工问题；第四项，补选中央委员及选举政治局。总书记向忠发主持会议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向忠发于报告中对冒险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瞿秋白、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的精神。而后，周恩来说："国际主义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近三个月来，立三同志的冒险主义已经给革命造成了一定的损失，立三同志在思想上应多负责任一些，但也不能说形成了李立三主义，在检查工作中，应以集体精神来执行自我批评。"

会上，与会者以血的事实、惨重的代价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进行了指责，损失是无法挽回的，他们例举了如下的事实——

7月13日，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作《关于南京问题与全国工作布置的报告》，强调南京兵变必须以占领南京为目的，以建立苏维埃政权为中心，谁反对这个布署谁就是右倾逃跑主义，必须予以党纪制裁。为此，江苏省委、南京市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令，在南京发动暴动，先举行了群众游行示威，结果使地下党的组织暴露，中共南京市委遭敌多次搜查，近百名中共党员牺牲。发动兵变的党团

员也因身份暴露，有四十余人被捕后惨遭杀害。继南京暴动失败之后，各大城市举行的暴动都相继失败，许多中共党团员遭杀害。仅上海地区，地下党员就由两千人减少到六百人。红10军奉中共中央之命攻打九江，结果红军大败，使两万人减到三千人；红7军奉命北上孤军攻打桂林，结果六千人伤亡四千人之多，还丧失了右江根据地；红2军团奉命过江攻打武汉，结果大败于杨林寺，三停人马失去二停，洪湖根据地亦为敌所占。

在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内，李立三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受全局性的重大损失。

与会者激烈的批评，血的代价，使李立三的心灵受到震颤。他难过地说："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中央的许多政策和决定，大都是我起草的，如今，中央犯了错误，这些错误，我应负更多的责任。"

三中全会作出了题为《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其副标为："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秘书处一九三〇年七月的中国问题决议案的决议"。决议指出：

> 中央全体会议认为必须指出：中央政治局最近期间对于目前形势的估量，在许多重要问题之中，有模糊而不正确的地方——对于时局有过分的估量，对于不平衡发展的观察不清楚，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总起来说——就是中央委员会政治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现在的事实是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力量，还没有平衡，还没有汇合，农民战争之中还缺乏充分的无产阶级领导和组织作用；政治局亦没有充分的估计到：目前统治阶级还没有完全削弱完全破产；于是对于帝国主义反革命统治崩溃的形势和可能，对于革命势力的现状和革命形势发展的速度，都有过分的估量。中央政治局六月十一(日)的决议案，在一般的正

确路线之下，就已经有这种估量上的错误——认为“城市工人尚未走到‘客观革命的形势’的主要原因，只是由于白色恐怖的镇压”。而忽略共产党在群众之中的组织作用的还不充分，亦是这种情形的一种重要原因；甚至于认为“只要在产业区域和政治中心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客观革命的形势”。这种估量是不清楚而不正确的，一定可以，而且已经引起策略上的错误。

这种估量之中还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一）现在大城市的产业中心里，还缺少更加广大的群众动员和群众发动；（二）各地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发展扩大，还需要领导的加强和集中，需要建立巩固的阵地，去迎接更加残酷巨大的决定胜负的战斗。因此，政治局过去的策略上，就有个别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的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所以冒险倾向的轻易暴动的布置，代替了切实创造武装暴动前提的斗争。

为着更加坚决的彻底执行国际和中国党一致的路线起见，必须遵照国际执委的指示，立刻完全纠正这些错误，而在一般策略和工作上，实行必要的转变。

报告中还指出了“左倾”的错误，称：

因为必须坚决的领导罢工斗争，尽量发展农民的游击战争，和地方暴动的关系，除主要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危机之外，又发现了盲动主义关门主义倾向的错误——就是往往不去争取群众，不能估计群众，不能估计群众的力量而只有脱离群众的发动计划等等。同志之中发现“不理黄色工会”“凡是不是雇农，一律都应当开除出党”“杀尽

富农”“只要领导十亩以下的贫农去抗税抗租”等类口号的提议。并且已经有放弃群众日常斗争的领导，忽视组织上巩固党的影响和群众团体等的现象。甚至于借口“群众只要暴动，不要罢工，只要大干，不要小干”的论调，而实际上走到极有害的机会主义的消极。群众之中的这种情绪，只是以表示群众对于国民党统治的毒恨的增长，以及群众力量组织的需要的增加。如果因此就不会领导群众日常斗争，那就成了等待暴动。别方面，这一类的“左倾”情绪，在革命战争之中，往往会引导到表面是“坚决向前进攻”，实际是继续“没有后防和作战”方式；在苏维埃区域里，就是不会适用于帝国主义的应付政策，脱离农民群众的“左倾”幼稚政策，反对富农而不会团结中农于自己的周围；以及一般的不会在政治上解除改组派取消派黄色工会富农等等的武装，而反对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

“左倾”的错误，是在于只看到先进分子的情绪，而不去切实艰苦的去争取群众，因此，脱离广大群众而落到小资产阶级的急进主义。“左倾”的错误，事实上是巩固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所以一定亦坚决的反对一切“左倾”，不应当有任何的调和的态度。

三中全会改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补选了中央委员，李立三被撤销了中央常委和兼任的宣传部长、秘书长工作，但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实际上是离开了中共中央的要职。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使中共全党转变了“左”倾政策，但是，不可改变“六大”以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一系列“左”的理论和政策，因而，在纠正李立三错误方面，自然也不能彻底，不仅如此，对于执正确意见的同志，亦予以无情的打击。如何孟雄，其意见本是正确的，

他最激烈的反对“立三路线”，但由于三中全会的基础还是“左”，所以何的思想与三中全会的精神发生了矛盾与对立。何遭到李立三路线的无情打击，而在三中全会之后，继续遭到打击。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内称：

尤其应当注意的是：陈独秀托洛茨基的取消派，虽然已经肃清出党，然而他们的残余仍旧有些留在党内暗中活动。右倾机会主义不但有个别的实际工作上的表现，甚至于形成整个的路线，来反对共产国际和党的正确路线。这种形成整个路线的右倾机会主义，不管代表这个路线的同志，主观上是怎样的想法，可是，客观上不能成为取消派埋伏在党里面的奸细。关于这一点，三中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已经详细的指示，这里不再重复叙说。总之，代表这种路线的同志，例如江苏的何孟雄，事实上是根本否认中国革命的新的高潮，根本否认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和组织革命战争的路线。这些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六九月间，党开始反对陈独秀取消主义的初期，他们对陈独秀主义就是采取调和的态度。现在，他们借口中央的策略上的个别错误，就说中央领导完全破产，中央路线完全错误。他们宣传这种说法，还带着鼓动无原则的个人纠纷，企图把中央政治局里的个人和整个领导机关对立起来。尤其表示他们政治上的外交手腕的，是他们企图说自己是“拥护”共产国际路线来反对中央的路线。这里，很明显的是：他们企图曲解共产国际和中国党的路线，而来进攻中央。他们事实上是反对共产国际路线的，事实上是要破坏中国的党的。他们的活动，更是显然的客观上帮助取消派帮助统治阶级，来扰乱无产阶级先锋的队伍。他们的路线是：在中国工农部分的革命行动进到革命的总进攻的过

渡时机，来阻碍这个过渡，阻碍斗争的前进和深入，要使工人斗争停顿在经济的小的范围之内（反对政治罢工），根本否认农民战争的作用（说长沙战争是部落式的暴动，没有前途），投降帝国主义（说中国工农对于列强的机关枪大炮是没有办法抵御的），取消中国的和世界革命前途（说“国际无产阶级赞助中国革命是空话”）。

这样，我们应当明白：为什么右倾是党内主要的危险了。所以全党同志，必须坚决实行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加紧反对右倾和加强右倾立场的“左倾”，集中火力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

何孟雄被点名批判之后，其江苏省委候补执行委员的资格也被撤销。由于何在党内屡遭批判，其身份也得不到保护，遂于1931年1月在上海被敌方所捕，何在狱中表现的甚为坚强。2月7日被敌人杀害于龙华。时年33岁。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判了何孟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

受到残酷打击的李立三

李立三被撤销了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的重要职务之后，心情很沉闷。11月的一天，他到了上海的四马路瞿秋白的住处，去看望

瞿秋白。李立三进门之后，瞿秋白见了他，不仅没说话，却神情异样。李立三是快人快语，忍不住问道："秋白，出了什么事了。"

瞿秋白召呼李立三坐下，而后长叹一声，说："共产国际来电了。"

李立三立即问："有什么新的指示？"

瞿秋白又叹了口气说："共产国际指责你的错误是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路线错误，还批评了三中全会对你的路线采取了调和态度，没有坚决的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李立三听了，犹如冷水浇头，坐在那里，半晌无语。瞿秋白又说："立三，你要有精神准备，中央准备马上开会，研究共产国际的电令，你的错误性质看来要升级了。"

李立三难过的说："我犯了错误，给党造成了损失，可我决没有反共产国际、反马克思主义的动机。"

瞿秋白说："总而言之，你要勇于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

共产国际于10月份给中共中央发来了《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信中指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批判不力，全会的调子温和，对李立三持"保护态度"。信中斥责了李立三的路线，称其：

> 用虚伪的左派空谈，来遮盖了自己的消极心理。……站在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上，产生了他的敌视布尔塞维克主义和敌视共产国际的行为。……公然运用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所爱用的，而且已被打碎了的理论，就是说共产国际不知道的情形，说中国的情形是例外的，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的趋势。公然敢于把共产国际的忠实态度和对中国革命的忠实态度对立起来。

11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补充决议》的会

议，李立三在会上被迫接受“错误路线”的上纲。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政治局讨论过国际来信之后，决定：

一、完全同意国际执委的这一封信。

二、认为：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立三同志在三中全会之上也已经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三中全会没有把和国际路线互相矛盾的立三同志的半托洛斯基路线彻底的揭发出来，亦还没有对立三同志路线的影响占着优势的时期里面政治局的工作，给以正确的估量。——立三同志的路线，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掩盖对于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的机会主义、掩盖对于真正革命的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任务的机会主度消极态度，而在实行上领导党走上盲动冒险主义的道路。

三、认为：这种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在过去，这种调和态度帮助了立三同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因此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同志的路线，这就使执行国际路线的主要任务，没有能彻底解决。

四、这种情形，就使三中全会对于立三同志的各个反对列宁主义的论调，没有受到必须的充分的批评，例如对于立三同志对于策略转变问题的半托洛斯基主义的理论，只批评他是机械的。

五、认为必须根据三中全会的议决案，根据政治局的本次决议，根据国际执委的来信，对于全党党员解释立三同志半托洛斯基路线的实质，解释这种路线是和共产国际路线互相对立的——公布上述的材料和特别发一告同

志书。

六、认为现在要集中全力反对党内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和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这种情形（是）立三同志半托洛斯基主义理论的基础，现在"左倾"空谈的掩盖去掉之后，这种情形就特别的暴露出来。同时党应加强反对托派的斗争，因为有些托派分子现在企图回到党内加紧破坏的工作。

七、这次决议是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认为必须实行坚决的斗争，反对露骨的机会主义的曲解的企图——就是想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以及这次纠正立三同志的路线，解释成为改换党的路线——变成了退却的路线。同样，反对把三中全会和国际路线对立的企图。

八、立三同志以及赞成他的同志已经承认错误，党的领导机关完全和共产国际执委同意，这些事实使政治局认为在党内实行"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这种"讨论"只能使党的力量离开不可迟缓的很重要的实际任务，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解释工作之中，仍旧是须要各同志的详细的讨论）。

九、认为团的三中全会在少共国际和党的领导之下已经一般的接受了国际的正确路线，同时，团的三中全会的决议之中，有些地方的措词是和少共国际来信不同的（对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彻底揭发，对于取消团的主张，没有认清是反对列宁主义的路线问题）。政治局认为团的中央必须把过去的错误路线，遵照着这次决议和少共国际来信彻底的纠正。

十、这次决议是补充三中全会的决议，所以用通信方法询问所有的中央委员，是否同意。并且把这一决议报告

国际执委。

一九三〇年十一、廿五

12 月 9 日，中央政治局再次作出决议，内称：

最近在共产国际关于立三路线的来信的指导之下，政治局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决议指出三中全会的错误，并且开始进行解释立三路线的工作。现在，在这解释工作的初步所表现的许多事实，使政治局认为必须根据国际来信发展十一月五日的决议，更加彻底明白的指出：

一、六月十一日议决案是立三路线。六月十一议决案前后——三中会全之前的最后一(时)期，立三路线是领导了政治局的工作。所以对于这一时期政治局工作的正确估量应当是：当时政治局的路线是和共产国际路线不一致的，是不正确的。

二、三中全会却承认这一时期中央的路线仍旧是和国际一致的，承认六月十一议决案是一般正确的，因此，三中全会虽然一般的接受了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这是在调和主义的立场上去接受的，——就是对于立三同志的整个路线，取了调和态度，并且替这一路线辩护——这就把互相矛盾互相对立而不能并存的国际路线与立三路线混淆起来(恰如国际来信所说)，这就不能彻底解决执行国际路线的任务，因此，三中全会的路线也就不正确了。

三、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就不能够充分正确和明了的遵照国际路线去规定新的策略和任务，更不能够使全党明白的了解了共产国际路线之下的策略与任务，是与立三路线的策略与任务，原则上完全不同的，这

样，即使三中全会了解到必须实行策略上组织上工作上整个转变，但这个转变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了。而且实际上正如国际来信所说又正在重复这些错误。

四、三中全会有了这种调和主义的立场，自然对于立三同志的各个反对列宁主义的理论，也不能够给以必须的和充分的批评和指斥。现在党却正需要从解释工作中领导这一反对与肃清立三路线的斗争，反对一切调和主义的错误，执行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以根本肃清立三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存在以及其领导的影响。

因此，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议决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而彻底明确的完全遵照国际路线来规定党的任务和策略。这样才能保障路线上的转变的完成，保障反对和肃清立三路线斗争的彻底，消灭一切调和主义的错误，保障执行国际路线的任务，得到完全的解决。……(删节号是原有的——引者注)

共产国际为甚咬住李立三不松嘴呢？是因为李立三在执政期间，没把共产国际放在眼里，不仅不尊重共产国际，甚至与共产国际"对抗"，公然反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并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的情况。尤其是他竟胆敢"指挥"斯大林，要斯大林放弃五年计划准备战争等等言行，使斯大林这"龙颜"大怒。尤其是1930年6月1日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之后，李立三竟不顾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罗伯特的反对，不等共产国际的批准，就擅自将6月11日决议公布。李立三的种种对抗共产国际的行为，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愤怒。因而，对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处理不满。同时，也由此对瞿秋白和周恩来产生了不信任，感到需要用共产国际培养的信任的人来更换中共的领导人。于是，便给中共中央发来了给《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

信》

共产国际紧紧咬住李立三不松嘴，李立三可倒了霉啦，他必须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交待"问题。而共产国际命令他立即动身去莫斯科。时李立三的妻子李崇善身怀六甲，李立三料想自己此去凶多吉少，短时不会回还，遂对妻子说："生下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送人吧。"

1930年的12月5日，李立三洒泪告别了妻子和两个女儿，匆匆奔赴苏联。

李立三走后不久，其妻生下一个女孩，遂按李立三之嘱，将这女孩送给了与党有密切联系的老工人谢庆斋，李崇善不久被捕入狱。后来，李立三四下寻找那个女孩，却一直没有找到，直到1982年才由党组织帮助找到，这女孩今叫谢志佩，在上海某大学工作。

李立三到了莫斯科后，即受到了"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没完没了地检查了七年，到了1938年，斯大林发疯地在苏联大搞肃反扩大化，李立三被捕了，此后，受尽了肉刑，先后被转移了几个监狱，监狱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一年零九个月后，李立三无罪释放。因他没有户口和工作，只得求助于共产国际红十字会的救济。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李立三以普通居民身份参加了卫国战争，参加挖战壕，参加防空警戒。一直到了1945年8月，历尽了艰辛的李立三才得以回国。他在苏联整整呆了15年。全国解放后，李立三常对共同过来的老同志说："我曾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对待过那些不同意见的同志们。等我离开领导岗位，决心重新学习，从头做起的时候，王明却把这个办法用在我身上，使我吃尽了苦头，我犯错误时间不到半年，他们却叫我在苏联没完没了地检查了七年，那时，我就象小媳妇一样，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终日提心吊胆，谨小慎微，这种办法不好，使人丧失信心，不准人起来革命。"

李立三没能躲过"初一"，更没躲过"十五"，文化大革命中，他

被戴上了“三反分子”、“老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他受到了比在苏联还难挨的残酷批斗和无情的折磨，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于1967年6月22日下午，吞服安眠药而含冤去世。他在写给毛泽东的遗书中称：

> 我现在走上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是求是的结论。

李立三推行“左”倾盲动冒险主义路线，而他又饱受“左”倾的折磨，最后竟死在极“左”路线之下，真是令人感叹！

第四章　王明爬上了中共的高位

初出茅庐的王明

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指责，对李立三的愤怒，对瞿秋白和周恩来的“调和主义”的不满，却美坏了一个人，这人是谁？就是王明。

这里，把王明其人作个介绍。

王明，原名陈绍禹，后改为陈绍禹，字露清。其后来所用的笔名有韶玉、慕石、兆雨、诏玉、绍玉、玉石、王明等。其化名有泰山、风康、石绍禹、绍玉、绍虞、WM 等，此外还有不少俄译化名，如波波维奇、马马维奇、克劳白夫等。

王明于1904年4月9日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其祖父陈毓亭，乃私塾先生。其父陈嘉谓，号聘之，字秉森，先在金家寨开醋酱坊，后办"陈龙昌"行店，经营竹木生意。陈嘉谓有两子三女，长子即王明，次子陈绍炜，亦为中共党员，曾先后于家乡、延安、西柏坡、北戴河、北京等地工作。其三个女儿均为共产党员。陈因子女参加革命，亦多次遭国民党逮捕入狱。王明之母喻淑连，因受陈家影响，思想进步，在陈家祠堂开设了一所女子学校。

王明天资聪敏，六岁上学，八岁就能写对联出卖赚钱。后王明又随毛树棠、漆陶庵等先生读私塾。王明在随漆先生读塾书时，曾作一首七律《霜初重雁横空》，内有"羽毛更益三分雪，骨骼初经九月霜"之句，漆先生颇为欣赏，遂于诗句旁批了"聪明"二字。

王明聪敏过人，但很高傲。1919年，金家寨名流李少山先生作了一副上联，征人作下联，其上联为：

山海关虎啸龙吟，漫道风云难际会；

时应征者数十人皆对不上下联，王明见了，不加思索，即挥笔而就，为：

子午谷乌飞兔走，须知日月易蹉跎。

李先生见了，连连拍案叫绝，遂设宴请王明。

王明虽有才气，但因其家境艰难，无力再升学读书，时有地主晁三，见王明非等闲之人，便认王明为干儿，供其上学。王明得晁三老爷资助，十六岁时来到了当时属于河南省固始县远东南区的陈淋志诚小学读书。

时学校中有国文教师詹谷堂，其学识渊博，思想激进。于1914年受聘至志诚小学。他在志诚小学成立了"马克思主义读书会"。

1923 年 6 月，詹谷堂入了共产党，并担任了金寨县第一个党支部书记。王明虽然于 1920 年即离开志诚小学，但詹谷堂的进步思想对王明影响很大。

1920 年夏天，王明考入了安徽省第三甲种农业学校。“三农”学校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左派、民革创建人之一的朱蕴山创办的。朱乃六安县人。“三农”学校校址即设在六安。

“三农”为一所新型学校。时进步人士桂月峰、钱杏邨等(即阿英——作者注)，均在此校任教，因而学校进步空气浓郁。

“五四”运动的巨浪也冲进了“三农”校园，时学校通过旅外同乡和芜湖科学图书社，购进了不少进步书刊，如《新青所》、《共产主义 A、B、C、》、《赤都心史》等。钱杏邨在课堂上公开宣传十月革命，介绍列宁、高尔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学校里还成立了“读书会”的组织，组织学生们读进步书刊。并成立了爱国剧社，师生们演文明戏，宣传爱国主义，打倒封建，打倒军阀的思想。

王明学习刻苦，加之聪明，因而学习成绩优异。学校的新潮思想、民主空气，对其思想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1921 年的 6 月 2 日，安徽省城发生了“六·二”惨案。时安徽督军为倪嗣冲，其挪用教育公款作为省议会三届选举之用。此事引起了省教职工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愤怒，遂推选代表到省议会请愿，结果省议会议长马联军下令军警开枪，当场打死打伤学生五十余人。军阀的行径引起了全省教职工和学生及民众的愤怒。遂举行了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向省长聂宪藩提出抗议。当时，省学联以许继慎、舒传贤为核心，使斗争迅速发展，并得到了京、津、沪及各省学联的声援。后经北京教育部的出面调停，“六·二”事件才平息下来。

“六·二”运动之后，安徽省进行三届省议会选举。军阀倪嗣冲为使其侄儿倪道烺当上省长，进行贿选。时选举法中有一条规定，即全省中若某一县选举无效，这一届选举就全部无效。时省教职工

联合会和省学联便利用这一规定，派朱蕴山在六安县进行活动，争取六安县选举无效。经朱蕴山等人的努力，六安和无为两县的选举都达到了无效的目的，迫使安徽省政府只得宣布第三届省议员选举无效。此举给皖系军阀倪嗣冲以重大打击。之后，“三农”学生又参加了驱逐县知事骆通运动和打倒胡子派等斗争。

王明虽然参加了这一系列的斗争，但其均不甚积极，处于温和之态。在斗争中，学校逐渐分成了保守与激进的两派，王明属于“骑墙派”。

由于“三农”学校在全省以民主激进而闻了名。安徽省教育厅秉承皖系军阀旨令，撤换了“三农”校长沈子修的职务，并迫使学监桂月峰，教师钱杏邨等离开学校。任命思想保守的刘先黎来当校长。刘到“三农”后，即拉拢社会上的土豪劣绅，打击压制学校进步势力，同时以小恩小惠拉拢学生。对激进的学生使用了开除的逮捕的手段。刘的行径，引起了进步学生的愤怒，与前来逮捕学生的军警发生了冲突。而后刘先黎开除了一百八十名学生。王明在这场驱刘斗争中，站在了刘先黎的一边，表露出他那“唯书”、“唯上”、贪虚荣、求名利的心态。

1924 年夏，王明于安徽省立第三甲种农业学校毕业后，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其成绩居六安县第一名。

投靠米夫的王明

“商大”虽为公费，但王明因家境贫寒，其去武昌的路费和入学时的学费家中均无力承担，几经筹借，其母又卖了出嫁时的手饰，凑了七块银元，王明才得以入学。

武汉自 1911 年辛亥首义于此爆发以来，进步的、民主的政治空气一直很浓厚，也是产业工人比较集中的地方。1920 年秋，董必

武、张国恩、陈潭秋、刘伯承、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七人，在武昌抚院街的一间斗室内，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支部，选举包惠僧为支部书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武汉支部有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等五人参加大会。从1921年冬至1924年初，武汉党支部又吸收了林育南、李求实、许白昊、李书渠、林育英、廖乾五、项英、施洋、林祥谦、李之龙、夏之栩等人为中共党员，使武汉支部党员达五十多人。到了1924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汉口和武昌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分别由包惠僧和董必武任委员长。

武汉的党组织通过大力宣传马列主义，开展工人运动，发展党团组织，使武汉的革命力量大增。

浓厚的政治气氛自然也涌进商业大学这高等的学府。时“商大”内有一批进步教师，还有共产党员，如共产党员李汉俊、危浩生都在这校内任教。这些党员和进步教师在学生中宣传马列主义，对学生们产生很大影响。王明入学不久，即和同学詹禹生一起发起成立了豫皖青年学会，王明被推举为这个学会的事务部主任。时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梁仲明，亦参加了这个学会，梁与王明为同班同学，他向王明介绍了十月革命和苏联的情况，介绍马列主义的书刊以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梁仲明的思想对王明的影响很大。王明后来回忆说：“使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耳目为之一新，思想为之大变。”1924年10，王明为感激梁仲明的帮助，他写了一首《喜闻道》的诗，谓“感而以诗谢之”。其诗写道：

塾窗十载又中学，舍我韶华逝水过。
聆教一朝开眼界，得书百读喜心窝。
儒知世事仁风少，佛识人生苦味多。
惟有马恩新意境，列宁实现首苏俄。

这期间，王明还与同学一起到工厂农村访贫问苦，初步的运用阶级观点去看待农民阶级、工人阶级。他写了两首七律，表达了他对工农的态度，为《偕友访大智门车站述同感》和《访农家》。《偕友访大智门车站述同感》谓：

工人开动火车头，地动天惊震九州。
南北东西成一体，农工商学尽同仇。
推翻军阀为民主，打倒帝强好自由。
我辈青年无量勇，献生革命变全球。

《访农家》七律诗谓：

茅屋三间聊御寒，布衣百补褰增衫。
年年送稻愁无稻，代代耕田盼有田。
雨水下多愁地涝，阳光晒久怕天干。
穷人总有出头日，家家户户盼变天。

时"商大"校长为湖北省议会议长屈培兰，其为守旧派，思想保守且顽固，因其与军阀关系密切，可以为学校搞到钱，迷信他万能，所以师生们对他还敢怒而不敢言。后发现他不但无能力增加校款，反而侵吞校款。于是，学校的进步师生掀起了革新运动，宣布屈氏罪状，公决驱屈出校。王明投身于斗争之中，并在《商大周刊》上发表了四篇文章，其首篇为《革新运动中所得之经验》，二篇为《三种不同之面目》，三篇为《革新运动后之最近简单希望》、四篇为《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在第四篇文章中，内称：

社会问题就是社会的病理学。……如同生物病理学

一样，除却找出病源外，还要想出个救济的法子来；生物病的治疗法，有应急的和根本的两种，所以社会的救济法，也分成治标、治本的不同。……就是用慈善事业以及教育事业类方法来救济社会弊病的方法。所谓治本的救济法，就是主张将现在社会组织根本破坏，另以一种完全新的组织来代替的方法。……前者是改良，称为社会政策，或社会改良主义，后者是改造，称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病态社会的根本救济法；其本质即一切生产机关（即矿山、森林、土地、工厂、机器、原料品半制品及交通机关等类……）归社会共有；只容衣服、家具之类物件归个人所有；并且一切生产品的产额及交换都有公的机关统计调节或直接经营，务使供求相应，不准私人投机经营。……资本归公，人人都有工作生产的机会，生产机关共有，谁也不能籍私有生产机关收取利益；可以救济现代生产方法的第一大缺点，一切生产品底产额及交换，都有公共机关统计调节；私人不得投机经营，避免形成生产过剩的恐慌；可以救济现代生产方法的第二大缺点……

王明撰写的这篇《社会、社会学、社会科学、社会问题、社会主义底浅释》文章，虽然对马列主义的理论理解还很肤浅，对马列主义的学习还刚刚开始，但说明他已向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的道路上大步迈进了。

1925年5月1日，王明在安徽籍同学会的会刊第一卷第一期上，以陈绍禹的名字，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为《安徽的学生》，第二篇为《反对和免除贵族专利的现代学校教育》，第三篇为《恋爱真缔》。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时中共中央决定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反击帝国主义的屠杀。消息传到武汉后，湖

北共产党组织以中国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等公开团体的名义，号召和组织武汉市学校罢课，声援上海。6月1日，"商大"学生开会研究罢课问题时，王明出席了会议。会上，有个别学生代表和教师不同意罢课，王明很激动地站起发言，批驳了不同意罢课的言论。时每所学校要选出两名代表出席武昌学生代表会议。由于王明表现的积极，被师生们推选为"商大"的代表之一。

当晚，武昌各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大会在商大召开。时有师范大学违反规定，派了八名代表参加，而且这八人均为国家主义分子，他们极力反对罢工、罢课、罢市，并故意扰乱会场。王明和与会各校的代表对这八人的行径十分愤怒，他们高呼着"打倒国家主义派！"、"打倒汉奸分子！"的口号，将这八人驱逐出会场。大会决定第二天举行"三罢"。

6月2日，武汉的学生举行了罢课，并举行示威游行，声援上海的学生和工人运动。王明于激动之中，赋诗一首：

> 五卅惨案动青年，集会游行斥帝奸。
> 胸对刀枪忘生死，面临兵警勇宣传。
> 工人响应流鲜血，军阀恐慌暴厚颜。
> 放假提前何用耶？回乡同样闹翻天。

原来，当局为怕事态闹大，提前宣布各学校放假，故王明诗有"放假提前何用耶"之句。

王明回乡之后，又组织豫皖青年学会的部分会员在其家乡金家寨的大王庙内举行会议，追悼上海、汉口、青岛、广州各大城市的死难同胞。王明写的挽联为：

> 四百兆同胞放声大哭；
> 五千年历史特写奇冤。

由于王明在学潮表现得突出，暑假后学校一开学，王明即被吸收为共青团，一月后，由许凌青(即许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国老百姓有句俗话，叫"运气未至金变土，时来运转土变金"，1926年10月7日，王明的造化来了，而且成了他一生的转折点。这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中山大学成立。由汪精卫、谭延闿、古应芬组成选拔委员会，首批招收三百名学生。时以去苏联留学为时髦，因而蒋介石、冯玉祥、邵力子、于右任、叶楚伧等国民党要人，都纷纷将子女送往莫斯科留学。这样一来，分到各地的名额就很少了。当时，分给湖北的仅十人。十人当中，有伍修权、胡彦彬、贝云峰、梁仲民、高衡、濮世铎、熊效远、黄励、杜琳、宋伟等。王明没在其内。

此时的王明，满脑子装的都是唯有读有高，他觉得要能到苏联上学，是个出人头地的天机，天机不可错过。但湖北名额已满，他无奈跑到江西南昌，找到入党介绍入许凌青，请许通融，但江西名额也都占满。王明思来想去，决定去上海，直接找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

时办理去苏留学事宜者为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姜长林，办公处在法租界房志路的平安大旅馆内。王明通过已来上海的湖北省党部负责人找到了姜长林，恳请姜批准自己去苏俄。姜回说名额已满。王明又磨湖北省党部负责人，请这人再向姜恳言。这位负责人找到姜，说明了王明的一番诚意。姜说："湖北的名额已满，不能超出指标，陈绍禹不能去。"

那位负责人只好将姜之语告诉了王明，王明听了，如同一桶冷水浇头，他激怒地跑到房志路平安大旅馆，见到了姜长林，气呼呼地说："如果你们不让我去，我就到巡捕房报告，让你们一个也去不成！"

姜长林说："你去报告吧，巡捕先把你抓起，因为你是积极去苏俄的。巡捕们能饶你吗？"

王明听了，不吭声了。他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哭涕涕的向姜恳求，几乎要给姜下跪。姜见王的样子挺可怜，就答应向上反映反映。王明这才破涕为笑。

姜长林把王明的情况向中共江浙区委报告了，区委表示不能突破名额，王明不能去。

姜长林把区委的态度告诉了王明，王明又放声大哭，而且蹲在姜的办公室门前不走，一坐就是一天。姜无奈，又把王明的情况向江浙区委反映。最后，区委同意如果别的省有空名额，就让王去。姜查了查，还真有空名额，便批准王明去了苏联。姜原以为办了件好事，哪知此举，使得那：

中山大学进"白虎"，共产党里添"黑煞"。

"白虎""黑煞"都是阴阳五行命理学中的凶神，到后来，王明这凶神挡路，使得中共党内，万千人头落地。

王明得到批准去苏联的消息，真是欣喜若狂。1925年10月28日，他同沈泽民、张琴秋、伍修权、蔡和森、孙冶方、王稼祥、乌兰夫、张闻天、李培之等六十余人，从上海乘轮船到海参崴，于11月28日，到达了大雪纷飞的莫斯科。

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近郊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其学制为两年，课程设置主要有俄语、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苏联革命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军事学。斯大林对这所大学十分关心，并亲自到学校讲课和解答问题。

中山大学第一任校长是卡尔·拉狄克，副校长是巴维尔·米夫。学校的党组织称为"支部局"，局书记由俄国人担任，委员大都由中国人担任。

王明入学后编入了第一班。时中国学生都不懂俄语。于是，校方决定办一个速成班，培养一批俄语翻译，由于王明记忆力强，又有英语基础，故加入了速成班。时入速成班的还有庄东晓、俞秀松、董亦湘、西门宗华、刘少文、李培之、傅胜芝等十多人。时王明为自己起了个俄国名字，叫“克劳白夫”，即鸟的意思。副校长米夫担任这个班的列宁主义课程。

米夫，原名米哈依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福尔图，1901 年 8 月 3 日生于俄国赫尔松省阿列克谢夫卡村的一个小职员家。其中学毕业后，虽年仅十六岁，即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自此用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米夫的名字。两年后入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因当时苏联国内正进行革命战争，米夫遂两次参加红军。1920 年，他进入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翌年毕业，留校任研究员，研究远东的革命问题，研读马克主义经典著作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革命的理论。1924 年，他在乌克兰做党和苏维埃的工作，1925 年调回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后，米夫担任了副校长，时年仅廿四岁。比王明大三岁。

米夫少年得志，可谓年轻气盛。

王明学习很用功，尤其对俄语和列宁的著作的学习，更加刻苦，其俄语学的很快，半年内就达到能说会读的程度。每当米夫上课讲列宁主义时，王明都抢着第一个发言，他滔滔不绝地背诵着列宁的论述，对列宁主义的名词术语，也讲得头头是道。王明的言行，博得了米夫的欢心和青睐。由于王明的俄语学得快，发音准确，同米夫交谈起来也方便，这样，二人的交流逐渐深了，感情也愈发密切了。米夫对王明也愈发喜欢。

米夫和王明的关系进一步的密切是王明对待中共旅莫支部的一事上。

中山大学开学之后，到这里学习的中共党团员与原来的组织关系中断了，中山大学内虽然有苏联共产党支部局，但中共党员学

生没有入苏共的党籍。为了使中共党团员学生过好组织生活，便仿照旅欧留学的中共学生成立的旅欧支部，也成立了“旅莫支部”，全称是“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负责人为任卓宣。

任卓宣（即叶青）后来叛变了革命，但当时他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资格老，因而当了支部的负责人。

任卓宣在支部实行的是家长制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他照搬留法勤工俭学生的经验，反对学生学俄语和马列主义理论，他制定了一个《训练工作指导纲要》，其中规定：

> 我们必须完全摒除那种认为应该在学习理论之前先学俄语的错误观；我们必须避免学院式的学习——学院式的学习否认理论来源于实践；每个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要按照互相监督的关系去批评和监督其他同志。

按照这个《纲要》的规定，共产党员学生都不敢学俄语和马列主义理论了，而是互相监督、互相打小报告，个个都搞得谨小慎微。

旅莫支部这种做法，自然起米夫等校方不满，也引起了党团员学生的不满。1926年春天，米夫在学生中挑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辩论会开了四天。许多党员学生对旅莫支部脱离实际的工作指导方针和官僚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辩论会后期的议题转成中山大学党组织应该归谁领导。在这个辩论会上，王明锋芒毕露，一马当先地斥责任卓宣，充分表现了他那能言善辩的才能。王明为甚这么做呢？因为他摸透了米夫肚里的虫虫儿，知道米夫早就讨厌任卓宣了，早就想从任卓宣手中夺回中山大学党支部的权了。因而，王明在大会上亮出了他的想法：中山大学党支部归联共莫斯科市中大所在区的区委领导。理由是共产党员不分国界。旅居别国的共产党员，理所当然的要归当地共产党组织领导。王明的发言，得到了米夫的称赞和重视。

大会激烈地进行了四天之后，由校长拉狄克作结论，拉狄克当场拍案：旅莫支部解散，“中大”党组织归莫斯科市一个区委领导。

时“中大”有个学生组织，叫“学生公社”，相当于今天的学生会。在1926年9月初举行了“学生公社”改造大会上，王明一跃而成为“学生公社”的主席。在当时的旅莫学生有三百多人，资历深者、威望高者大有其人，如中共早期党员马骏，有声望的学者张闻天，沈泽民等，还有曾旅欧的学生邓小平等，这些人从思想水平，工作能力，实际工作经验，都要高于王明，因王明善于揣摸米夫的心理，善于拍米夫的马屁，使他得到了“学生公社”主席的宝座，这个主席虽然是个群众组织的头头，但却为王明的出风头提供了方便之路，也使他更方便的拍米夫了。

王明真正的把米夫拍舒服的时候，是米夫来华间。

1927年元月，正值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国共密切合作间，米夫以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的身份来华访问。米夫在动身来华之际，配了四个翻译，都是米夫亲自挑选的，为王明、潘克鲁(即潘家辰)、刘少文、庄东晓。时庄东晓已和潘家辰结了婚。不料临行之前，庄东晓突然患传染病，不能成行，只好改为严家骏。代表团的成员有库狄莫夫、卡列尼扬、殉更、拉斯诺夫，还有米夫的妻子。

本来，米夫要潘家辰为贴身的翻译，王明岂肯放过这个拍米夫的机会？遂不断在米夫而前拨弄是非，一会说潘家辰惦记妻子，一会儿说潘家辰翻译的水平不行，米夫本是个吃拍的人，最喜欢人拍他，经王明这么一拍一拨弄，米夫把王明当做了贴身翻译，直把个王明乐得嘴都合不住了，小马屁也拍得更欢了。

米夫一行元月起程，两个月后到达广州。途经海参崴等地时，王明赋诗一首，谓：

革命心雄藐险危，海洋绕道一船飞。
不因风浪迷趋向，自有磁针辨旨归。

封帝勾连狼狈恶，中苏联合海山摧。
烟波浩渺无涯际，遥见广东笼翠微。

米夫一行到达广州后，适逢北伐军占领了上海，国民政府也迁都武汉。米夫一行便抵达上海，而后又经水路抵武汉。在武汉，米夫夫妇住在了德国人罗德太太在汉口开的一家公寓。时王明形影不离米夫左右。

米夫一面考察中国革命的情况，一面帮助中共筹办中央党校，一面介绍联共(布)党务工作及宣传工作经验。

米夫抵武汉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清党运动，在上海屠杀中共党员。4月27日，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代表八十人，代表党员五万七千九百多人。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和魏金斯基出席了大会，米夫作为联共(布)宣传工作者代表团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于上年11月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案，并根据这个决议案的精神，批评陈独秀犯了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对如何争夺领导权，大会却没有提出任何切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办法。大会选出的中共委员会，继续推选陈独秀为总书记。

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也列席了会议。他虽然没有发言权，但于会上认识了许多中共要人，了解了中共内里的许多情况，这些均为他日后登上中共的高位，铺了一层台阶。

米夫在武汉间，与陈独秀多次会面。米夫向陈独秀力荐王明，要陈独秀批准王明担当中共宣传方面的要职，但陈独秀见王明是个还没毕业的学生，不仅党内资历浅，且没有参加过实际斗争，因此，没有点头，却又奈于情面，便让王明在宣传部当了个干事，不久又兼任宣传部的秘书长。时宣传部长为蔡和森。办公处设在汉口的和春马路。王明对陈独秀不批准他当宣传部长，心甚恨之。

当时在中共高层中两派斗争很激烈，一派主张共产党立即制定决策，发动工农群众，拿起武器，以暴动对付暴力，一派主张委屈求和，同国民党左派搞好关系。时蔡和森和李立三等均为主战派，陈独秀、鲍罗廷、鲁易都是主和派。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上，蔡和森、李立三等人又与陈独秀、鲍罗廷、鲁易等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鲍罗廷大声道："蒋介石成了反革命，但不是所有国民党都是反革命，国民党的左派还是好的么，问题出在中共把工农运动搞过了火，才使得国民党右派与中共的矛盾激化。中共必须向国民党让步，若与国民党决裂，中国的革命就会完全的失败！中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团体都要发表宣言，拥护国民党中央最近公布的取缔农民运动过火的命令！"

罗易接着发言，他完全同意鲍罗廷的意见。

陈独秀亦赞成鲍之语，他说："我们和国民党所争的，向国民党所要的，实际上是个领导权。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与国民党决裂，一条是放弃争夺领导权。我曾在政治局会上两次提出退出国民党，而会上多数人仍以沉默之态度回答了我。"

陈独秀说完，蔡和森站起身大声说："国民党已处处表现出反动，如今我们都要把一切罪过归结于工农运动过火，要我们去拥护去骂民众运动，这还有什么原则吗？我们不能拿刀任反革命分子宰割了！"

对于中共高层的争论，王明自然站在权势大的鲍罗廷、罗易、陈独秀一面，他写了《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同陈独秀唱一个调调儿。文章内称：

南京国民党右派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从它们的政府成分一切政纲和一切行动看来，显然是两个不同阶级性的东西；前者是国际帝国主义国内军阀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及他们影响下的群众的政治组织，后者是向

> 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独裁政权道路上走的政权，它俩各有各的武力、政治、社会其他，它俩是不能永远共存的，在它俩激烈斗争的过程中必有一个被他一个消灭。……现在我们既已认清目前是革命两个前途加紧斗争的时期，并且知道这种斗争由两个政权形式表现出来；摆在我们面前的责任，不能不是怎样使中国革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途得到保障，换言之，就是怎样扩大和巩固革命的政权——武汉政权，进言之，就是怎样扩大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就在这时候，共产国际执委会于5月18日至30日举行了第八次全会。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而后于5月底向中共发出了紧急指示，此指示史称“五月紧急指示”。指示中要求中共“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指示的核心思想是要中共迅速进行武装斗争。而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罗易，得到了这个指示后，不但不在中共党内传达，反而送给了汪精卫，以讨汪的欢心。

米夫知道了这个指示的内容后，心里有了底，他于6月16日去见陈独秀，与陈独秀进行了一番长谈，由王明作翻译。米夫向陈独秀提了许多问题，如为什么不让共产党员当县长等，陈独秀向米夫讲了其“二次革命论”的论述。

这时的王明，因为在苏联呆了两年，对苏联的各方情况，尤其是苏联的政策和共产国际方面的情况，比国内的中共领导人了解的要深层的多，当他对国际和国内方方面面的情况也了解之后，又开始露锋芒了。他又写了文章批驳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的核心思想是：

> 中国革命只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国民革命”，即

> “资产阶级革命”；第二阶段是社会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在第一阶段共产党不能领导革命，只有资产阶级才能领导革命。政府和武装力量应该交给资产阶级。在这个阶段，如果共产党员领导军队，他就会成为军阀；如果他当政府首脑，他就会变成官僚。

陈独秀向米夫讲这套理论，王明作翻译时，他不住地冲陈独秀点头，表示赞同。当他见共产国际的指示与陈独秀的理论相悖时，立即写文章批驳陈的理论，表示了自己支持国际主义路线。

6 月 5 日，汪精卫解除了鲍罗廷的国民政府最高顾问的职务。接着，朱培德、唐生智“礼送”共产党出境。冯玉祥亦公开支持蒋介石“清共”。时武汉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在这种情势下，鲍罗廷秘密回国。1927 年 7 月 12 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13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撤退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时局势异常险恶。贪生怕死的王明见国内凶多吉少，加之其对陈独秀给他的宣传干事职务不满，趁米夫回苏之机，也随着米夫去了苏联，时为 1927 年 7 月初。到了 7 月 15 日汪精卫“分共”时，王明已离开了险地。8 月初，他同米夫一起到达了莫斯科。而这时，国内的共产党人正在举行八一南昌暴动，同敌人于血火中拼杀。

王明回到中山大学的时候，正是“中大”内“教务派”和“党务派”激烈斗争之际。教务派和党务派是怎么回事？情况是这样的。1927 年的夏天，校长拉狄克因为参加了托洛茨基反对派被解除了校长职务，副校长米夫当时在中国，遂由教务长阿古尔接任了校长职，但没正式任命，仅为代理校长。时“中大”支部局书记为谢德尼可夫，谢与米夫关系甚好，米夫在去中国前，“中大”的一切工作都靠谢。当时，阿古尔同米夫有矛盾，米夫为孤立阿古尔，同谢关系就

更好了。阿古尔和米夫以及谢德尼可夫为争得中国学生的支持，都千方百计地拉拢学生。阿古尔依靠了在中国学生中最有影响的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尤其是俞秀松，为中共上海党组织的发起人之一。因为阿古尔是教务主任，负责学校的教务工作，故其依靠的学生为"教务派"，谢德尼可夫依靠的学生有张闻天、沈泽民等，因其抓党务的，故称"党务派"。由于米夫和谢德尼可夫二人不睦，却在学校的许多问题上各执己见，因而，使得教务派和党务派的双方对立情绪很大。在1927年6月底学期的总结会上，两派双方就学校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持续了七天。双方不相上下。时有一些学生于此感到厌倦，便退出了双方的争吵，遂成了第三派。

就在双方争论的难解难分之际，王明回到了"中大"，他一见这架势，眼珠一转，断定这是替米夫扫除官场障碍，推倒阿古尔的极好时机。于是，王明向米夫献计，要米夫拉拢住中间派力量，这样便抓住了大多数，从而搞垮阿古尔和教务派。

米夫依了王明之计，果然成功。阿古尔被撤职，离开了中山大学。夫米稳稳地荣登了中山大学校长的宝座。这样一来，米夫对王明可高看了。原来米夫还只认为王明聪明，背马列词句头头是道，如今发现了王明在政治斗争中，手挽灵活，有头脑。时共产国际在分析中共革命失败的原因中，认为中共的领袖们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太低，需要培养马列水平高，且又能听共产国际话的领袖。王明的这一手，使米夫发现了王明是棵人参苗子，决定对王明下力培养，不久，王明就当了支部局的宣传干事。

王明献计把阿古尔搞下台，不仅在米夫面前得了宠，而且击败了他的几个竞争对手。这对手主要是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特别是俞秀松，不仅文化比王明高，理论造诣比王明深，且工作经验，党内的资历，学生中的威望，都大大地高于王明。王明一直把俞看成是自己前进路上的障碍，王明用计搞垮了教务派，使俞秀松受到

了压抑，他王明也去了块心病。

教务派搞垮之后，王明便开始编织自己的小宗派了，并逐渐地形成了以他为首的一个小团体。对于王明的行为，“中大”的不少学生表示反感，王明听到耳内，看在眼内，便寻机对与己意见不一者进行打击。

磨道里没有找不见的驴蹄印，机会终于让他找到了。

自中国革命失败后，苏共内托洛茨基派便以此指责斯大材错误地指导了中国革命，并掀起反斯大林的声势。5月26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八十四人联名上书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状告斯大林，说斯大林在中国革命和同英国断交等事件中，执行了一条对外政策方面的“左倾”错误路线，使苏联面临一场新的反苏战争的境地。斯大林不是吃素的，他利用手中掌握的大权，主持召开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将托洛茨基和季洛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11月7日，是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日，托洛茨基派的一些人散发攻击斯大林的传单，在游行时，中国学生也参加了，而且有的学生还喊口号支持托洛茨基。11月14，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党籍。之后，斯大林指示米夫对中国学生拥护托洛茨基事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报告联共(布)，这下子，王明可算逮住了有把的烧饼了，他别提多积极了，披挂上阵，冲锋在前。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查出了一些学生，最后，安福等十多人被遣送回国，还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被送到工厂农村劳动，有的受到了处分。

“中大”的激烈派系之争

王明投靠了米夫，上下一折腾，使他的地位更加巩固，他成了米夫面前的第一大红人，在这场反托派斗争中，凡与他意见不合

者，都被他当成了托派分子而排挤掉，他那小宗派的根子也在“中大”扎深了，一些投机分子，如后来成了叛徒的盛岳、李竹声、王云程、孙标明、汪盛荻当时都是王明小团体的骨干，抱着王明、米夫的粗腿，捞取政治资本。

王明的小宗派和中共党内后来出现的宗派基本一样，即：顺者昌，逆者亡，任人唯亲，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排斥异已。由于王明等小宗派对马列主义书本下功夫深，专门在背诵词句上下功夫，张口马克思、闭口马克思，对马列经典背得滚瓜烂熟，深得第三国际领导的信任，加之又得到米夫的赏识，因而，王明成了共产国际要培养的中国真正的布什维克的理想的领导人。王明拉着米夫和共产国际的虎皮，成了“中大”的“无冕之王”，支配了全校同学的命运。

但是，“中大”的学生大都有思想，他们之中，仍有不少人对王明和米夫的行径进行抵制。中共“八七”会议，11 月临时中央的会议，支部没有传达。同学们对此很有意见，时同学们对校方的教学及生活方面也有不少意见。但王明站在了校方一面，极力为校当局辩护，这样一来，一些同学与校方的矛盾更为加剧。

王明为了进一步打击反对自己者，又寻找“磨道里的驴蹄印儿”，寻来找去，“驴蹄印儿”又被他找到了。

在当时“中大”毕业的中国学生，除了回国的之外，留下的有的升到其他学校，有的留在“中大”工作，还有的分配到其他学校工作。被王明击垮的教务派的学生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于 1927 年 11 月离开了“中大”，进入了列宁学院。但他们仍时常来“中大”，在“中大”同学影响也深，王明对他们恨之入骨。

时分配工作的学生，有的待遇好，有的待遇差。分配到军校学习工作的，因为按士兵待遇，津贴就特别少，而到各大学作翻译的，工资待遇就高。时有去东方大学当翻译的孙冶方，綦树功、云泽（即乌兰夫）的工资就高。

这一年暑假将过，就要开学时，左权、董亦湘、陈启礼分别由军事学院和列宁学院来到了东方大学孙冶方的住处，来这里的还有初级军校的肖劲光、蒋经国、李卓然等，俞秀松后来也赶到，这些人来敲孙冶方的“竹杠”，要孙买肉买菜做中国饭吃。孙冶方只得依从。正当众人热闹之际，有学生会主任王长熙从窗外经过，听到屋里有江苏、浙江口音的学生在说话，且人不少，心里一动，有了主意。这王长熙极善打小报告，拍王明的马屁，他见孙冶方屋中这么多人，便跑到了王明那里，说俞秀松、董亦湘等在搞“江浙同乡会”，又加油添醋地说了一遍，说这个同乡会焚香歃血为盟，要对付王明和米夫。

王明正在为如何将俞秀松、董亦湘打倒而犯愁，孙长熙的小报告可把他乐坏了，他立即向米夫报告，说江浙同乡会是个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的非法组织。米夫听了，也像抓了个有把地烧饼。王明向米夫建议：彻底调查些组织情况，严肃处理。米夫接受了王明建议，请来了苏联格别乌(K·P·V)人员参加调查。因为王明和米夫都是“中大”的要人，格别乌人员对王明和米夫的话都十分相信，草草的了解了一下就下了结论，认为“江浙同乡会”确实存在，并进行了非法活动，要严加惩处。

王明见苏方下了这样的结论，十分高兴，为把俞秀松等彻底搞垮，他觉得必须让中共要人了解此事，借中共要人之口，把他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拔掉。

刚好这时中共“六大”筹备工作在莫斯科举行，王明就通过米夫，向来莫斯科筹备“六大”的向忠发报告了此事，向忠发是个头脑极其简单的人，又没有文化，他听了米夫之言，便怒冲冲地来到了“中大”，发了一通演说，给所谓的“江浙同乡会”定了性，并说这个“江浙同乡会”与蒋介石有勾结，与日本领事馆有勾结，其发展的结果是走向邓演达的第三党，甚至投到蒋介石的怀抱。“江浙同乡会”不仅有中央组织，还在各地有组织，是个十足的反党团体。这个

组织必须消灭，其核心人物必须严厉处制，对随从或开除党籍或开除学籍。

向忠发这么一说，中国的留苏学生可就乱了。苏联的校方依据中共领导人的发言，其处理手段升级，决定开除十二名中国学生的党籍、团籍，并有四人被逮捕，一批学生遭到株连。俞秀松被打成了托派。

因为"江浙同乡会"是凭空捏造的，受打击和受株连的学生自然不干。中共"六大"期间和之后，愤怒的同学们纷纷向中共中央、中央代表团申诉。时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为瞿秋白、张国焘、邓中夏、余茂怀、王若飞，负责人为瞿秋白。瞿秋白见学生反映强烈，遂派邓中夏、余茂怀到中山大学调查真相，由于米夫和王明控制的支部局不与合作。邓、余很是生气。瞿秋白又经共产国际秘书长柏别斯的同意，派人前往格别乌机关查阅"江浙同乡会"的有关材料，但格别乌对中共的来人也不予理睬。瞿秋白只得亲自前往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江浙同乡会"的组织不予存在。1928 年 8 月 15 日，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给联共(布)政治局写了意见，同时写信于中共中央，报告了调查结果。

是年秋，共产国际监委，联共(布)监委，中共代表团组成了联合调查组，经过了一番调查之后，否定"江浙同乡会"的组织。周恩来到中山大学召开了全体师生会，予以公开否定。

由于中共代表团公开的支持与王明对立面的学生，王明便把矛头对准了中共驻国际代表团。

瞿秋白二次出任中共首脑

在中共"六大"期间，王明担任了"六大"秘书处翻译科主任，他虽然不是大会的正式代表，但通过中共中央指定的中山大学、东方

大学参加大会的学生全部给予发言权的机会，他在会上夸夸其谈，背诵马列主义词句。同时，王明在会上还拍向忠发的马屁，博得了向忠发的好感。但瞿秋白、邓中夏等人对王明的夸夸其谈甚为反感，遂在会上建议：中山大学和东方大学被指定参加大会的学生发言不要只重复理论，其发言有时间就讲，没时间就不要讲。

"六大"会上，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仍然主张中共的任务是准备暴动。提出"必须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反对沉溺于散乱的、不相关联的、必致失败的游击战争"。要中共必须坚持"城市中心论"。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这个指导思，于 1928 年 2 月 9 日至 25 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即明确提出，王明遂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理论，写了一本《武装暴动》的小册子，其长达万字的序言发表在当年 4 月 1 日出版的《布尔塞维克》上。"六大"间，王明把这个小册子塞到供代表们阅读的材料中。

在中共的"六大"上，米夫和王明一唱一和，后来周恩来回忆道：

> 米夫起的重要作用是：一、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指米夫—引者注)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拔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反中共驻国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二，造成了工学界限。例如他(指米夫—引者注)对向忠发极力地捧，利用他放炮，要他反"江浙同乡会"等。在"六大"会后，有的代表没有走，还召集了几个报

告会，王明还报告了反“江浙同乡会”的斗争。一般地说，代表们对米夫印象不好。三，在组织上起了影响些作用。但不是主要的。例如，在“六大”工作人员的人选上，东方部的人员多，这是有宗派的意味的。

由于瞿秋白、邓中夏等人的反对，王明在“六大”中没有爬上来，自此，他对瞿秋白、邓中夏等暗眼于心头。当“江浙同乡会”案被瞿秋白、邓中夏等中共代表团推翻后，王明对瞿秋白、邓中夏等更恨了。特别当他得知瞿秋白向共产国际负责人库西宁建议撤销米夫的东方部副部长的职务后，对瞿简直恨之入骨。王明深知，瞿秋白有知识，有实际斗争经验，在党内外有极高的威信，是他夺权的极大障碍。王明决心斗倒瞿秋白。于是，他又制造了“第二条路线联盟”，矛头直指瞿秋白。

“第二条路线”是个甚？用王明的话说他和米夫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第一条路线，瞿秋白联合了中山大学内的“江浙同乡会”、“江浙同乡会残余”、“工人反对派”、“先锋主义派”、“托洛茨基派”等各种派别，组成了“第二条路线联盟”，反对以支部局为首的“布尔什维克路线”。

这里把王明制造的所谓“工人反对派”和“先锋主义派”介绍一下。

在中共于1927年惨败之后，中山大学召收学生的宗旨发生了变化，为了给中共培养有实际斗争经验的骨干，决定从工人阶级中招收骨干到中山大学学习。这样，有一批在大革命中表现突出的工人来到了中山大学。其中，有参加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工运骨干李剑如，武汉工运骨干余笃三、上海工运骨干吴福海等。这些人思想单纯，是非分明，斗争性强，他们对米夫、王明搞小宗派团体、打击诬陷不同意见的学生很是不满，因此，公开反对支部局，由于他们出身好，成分好，米夫一伙不敢对他们过分的打击。李剑如等公开

反对米夫等，而对瞿秋白、邓中夏等却又非常尊敬和爱戴。他们公开的画漫画攻击米夫是官僚主义者，对王明的批评也毫不掩饰。王明对他们又气又恨，就把一顶“工人反对派”帽子送给了这些人，谓其等反对支部局、反对米夫的正确路线和反领导。

“先锋主义派”是怎么回事呢？“先锋”即团员的代称，因为共青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中山大学内的团员中，有一部分人对王明的团团伙伙甚为反感，这些人中，尤以西门宗华、高承烈、林其涛等对王明最为反对。当时，西门宗华担任中山大学团的宣传长。一次，西门宗华召开团的宣传会议，并请一位苏联人来讲演，一切都准备好时，王明突然决定不让开了，说党组织有活动。因为一切都准备好了，并请了苏联人，所以西门宗华就没有照王明指示办，继续开会，这下子更惹恼了王明，王明本来就对西门宗华等人恼恨于心，如今西门宗华胆敢如此，他王明岂能善罢干休，遂将一顶“先锋主义派”的帽子不大不小的扣在了西门宗华等人头上，说他们是先锋主义，不遵守党的决定，与支部局对抗，不久，支部局以“先锋主义”的罪名将西门宗华等人开除团籍，送回国，高承烈、林其涛等被送到西伯利亚当苦工。

王明等明反“工人反对派”、“先锋主义”、“江浙同乡会残余”等，暗中把矛头对准瞿秋白为领导的中共负责人，时王明与瞿秋白间产生的原则分歧为：一是中间派是不是最危险的敌人；二是对中农的态度；三是对赤色工会的态度；四为“左”倾是主要危险还是右倾是主要危险。“六大”之后，王明在米夫的安排下，又参加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翻译工作，并兼做中国交通局的中国交通工作。不久，王明害了病。病愈之后，其被安排回到国内，时为 1929 年 3 月。这一年，王明仅廿五岁。

对于王明回国，米夫可谓尽遏全力地推荐，其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中共中央对王明要妥善安排。时王明怀抱一腔冲霄状志，要大显身手了。其赋诗《抵上海》一首，表

示其胸中的抱负。诗中写道：

> 方酣春意独还乡，别意离怀万里长。
> 西闻天鹰歌织女，东听河鼓笑牛郎。
> 域中乡市争红白，沪上风光尊暗光。
> 到此一心为战斗，冲霄壮志正昂扬，正昂扬！

王明的这首诗，前半部情意绵绵，怀念在中山大学的女学生孟庆树，孟长得很漂亮，是王明追逐的目标，但孟对王明没有好感，成了剃头挑子——一头热。直到王明回国，孟还没有点头同意，所以王明于诗中露思念孟之情。

王明回国时，正值李立三掌握中共大权之际。由于王明从校门到校门，没有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米夫电示中共要对王明重用，然李立三仍然只安排王明担任了上海沪西区委作宣传工作。7月后，周恩来又将其调到中共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兼作《红旗》报通讯员。

时沪东区委书记是何孟雄。前文述过，何乃北京共产党小组的早期党员，京绥铁路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大革命失败后担任江苏省委书记，1929年4月由沪西区委书记调到沪东来。何对王明寄希望很大，对王明各方面都很关心，鼓励王明深入基层，但王明擅长的是笔杆子，他对深入基层极不感兴趣。对中共中央的安排极为不满，他认为中共对他是有才不用，因此，他对李立三等十分恼恨。后来，他通过"后门"——向他在"中大"的同学、当时担任中宣部秘书的潘文郁求救，才调到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在《红旗》报担任了编辑和采访员。时李立三兼任中宣部部长。

王明从1929年9月到《红旗》报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他先后在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红旗》报上以"韶玉""石""慕石"的笔名发表了三十五篇文章。文章的思想，几乎都来自

共产国际，用共产国际的思想，来评论国内政治斗争。其文章所宣传的思想，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其错误方面，主要是鼓吹“城市中心论”、“武装保卫苏联”等不切实际的工人武装暴动，强调中国革命的危险是右倾，不是“左”倾，对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30 年 1 月 12 日，王明在参加上海工联于英租界垃圾桥附近召开的一次布置年关斗争的会议上被捕，被关在提兰桥监狱。时王明打扮成工人模样，巡捕没发现他的真实身份。但暗示他有钱便可以放出。这样，王明便写了个地址，让监狱看守按地址去索钱。这个地址是《红旗》报的秘密机关，幸亏看守只索钱，才没造成更大损失，但《红旗》报机关只得转移，王明于 12 月 18 日上午出狱。

王明出狱后，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中共中央，信中对自己暴露机关地址的错误躲躲闪闪，避重就轻。一封信写给米夫，说他回国之后，中共不拿他当人看，让他到危险的斗争前沿，被捕后遭毒打，但自己表现的很勇敢等等。米夫见信后大发雷霆，一面夸讲王明是革命英雄主义的典范，一面斥责李立三对王明不重用。在四中全会前，米夫给李立三写信，向李立三陈明他的态度。

但中共中央在查明事实真相后，依然于 1930 年 3 月 16 日给王明以党内警告处分，并希望他能够接受批评，勇于改正错误。与此同时，中央将王明调离《红旗》报社，让他到全国总工会工作，任全总党团秘书和《劳动三日刊》编辑。时全总委员长是项英、秘书长罗章龙，和王明同来的还有博古。

王明到了全总之后，他找到罗章龙，说：“我很想和你谈谈。”

罗章龙，原名璈阶，又名纵宇、景云等，湖南浏阳人。其在北大文科院哲学系学习时，于 1920 年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 10 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共内资历较深的党的领导人之一。罗章龙遂与王明进行了长谈。王明说了他在中山大学的情况后，哭丧着脸说：“东方部派我回国，不是做普通工作

的，是要我做领导工作的。这一点，你要认识。”没等罗章龙开口，王明又说：“中国的共产党自建立以来，不懂马列，非常幼稚。一贯右倾，这个党需要从上到下加以改造。”

罗章龙见王明口出狂言，甚为反感，遂批评他要虚心。王明强辩说：“这话不是我的意思，是共产国际的。”

罗章龙说：“无论是谁，不管他权势多大，职位多高，都要尊重中国的实际。”

王明提出要在全总向大家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看法，罗章龙不仅不从，他还把王明的狂言告诉了全总其他人员，全总的工作人员对王明都很反感。王明见自己官场上失意，前途渺茫，心甚苦闷。时有王凤飞者，与王明很谈得来，1930年3月的一天，二人到了一起，发了阵牢骚，犯了阵自由主义，骂了阵中央，时王凤飞给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召开“七大”，王明也告诉王凤飞说他与共产国际有联系。二人的牢骚被人得知，报告了有关方面，王明和王凤飞都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自此，王明更加消极。连文章也懒得写了。

也是他时来运转。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四个新军阀发动了中原大战，而在这时，李立三于6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主持通过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使其“左”倾冒险主义占了统治地位。李立三的思想，正与王明的思想吻合，王明遂又抖擞精神，披挂上阵，写了一篇又一篇鼓吹暴动的文章，为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摇旗呐喊。时李立三在《红旗》上发表了《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王明立即亦步亦趋，遂以“韶玉”的笔名，发表了《目前军阀战争与党的任务》的文章，与李立三的文章观点完全一致，内称：

反对军阀制度与军阀战争的浪潮，卷进千百万亿的群众。全国主要城市的工人斗争，已经走到政治同盟罢工

和直接武装冲突的形式；农民运动在南中国各省表现出显著的高潮，苏维埃区域已蔓延八九省的地域，工农红军迅速在七八省范围内建立和扩大；兵士成营成团成旅的哗变，很多投到革命群众方面去；要饭吃、要和平、反捐税的斗争，在贫民群众中益普遍和深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积极起来进行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并且其中一部分深切同情于工农革命运动。不仅共产党和总工会正在号召全国苏维埃区代表大会，不仅共产党正在领导、准备和布置全中国的武装暴动，不仅共产党及工农群众正在准备在武汉区域开始建立苏维埃政府，即统治阶级本身也深切地感到“赤化”全中国和红军占领武汉的危险已经迫在目前。帝国主义与整个统治阶级都一齐在革命的怒潮之前发抖！

时李立三正张口“进攻”、闭口“暴动”，王明也起劲地喊“进攻”、“暴动”、“罢工”，并在文章中反复强调：“即使暴动，罢工失败但仍不失政治上伟大胜利的意义。”

由于王明积极地追随李立三，拼命拍李立三的马屁，李立三又对王明有了好感，遂将其又调到中宣部任秘书。

前文述过，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形成前后，遭到了中共党内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对此王明不放在心上，而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的代表罗伯特的反对，特别是共产国际对李立三主持制定的《决议》迟迟不批准，使王明决心调转了枪口，他把矛头又对准了李立三。

这天，王明得知李立三要于 7 月 9 日召开政治讨论会，讨论《决议》执行的事宜，遂与“中大”回国的同学王稼祥、何子述、博古等一起，私下里开了碰头会，彼此交换看法，四人不谋而合决定于政治讨论会上对李立三发难。

对于7月9日的政治讨论会，前文已述过，这里再略作介绍，此会由李立三主持。会议一开始，李立三便讲了会议的宗旨，讲了如何贯彻决议事宜。李立三话音刚落，何孟雄便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反对李立三的发言和《决议》。何的发言，使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何发言后，王明向博古一使眼神，博古便起身发言，发表了反对《决议》的意见。接着，王稼祥、何子述也向李立三开了火。轮到王明时，王明舞臂挥手，引经据典，一条一条地对《决议》进行批驳，并当场把马列著作拿了出来，与李立三、向忠发等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李立三、向忠发虽为中共最高首脑，但谈起马列主义理论，却远不如王明等，自然不肯向王明等人让步低头，争论不过，李、向羞恼成臊，遂动用手中的权力，用家长作风，把"右倾"、"小组织者"的帽子扣到了王明、博古等人的头上。向忠发还当场宣布撤销王明中宣部秘书的职务。

王明因为知道共产国际不支持李立三，便没把李立三、向忠发放在眼内，于次日又写信于中共中央，再次陈述其反对《决议》的意见。信中指责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实质的错误，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

王明的"万言上书"，使李立三、向忠发更加恼火，遂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王明六个月的留党察看的处分。同时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以严重警告的处分。之后，将王明调到了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何子述调天津，王稼祥调香港，只有博古暂留机关。

时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是李维汉，宣传部长夏采曦，秘书是李初梨。王明被分配到李初梨手下当干事。为了进一步打击王明的气焰，李立三还专门到了江苏省委，向李维汉、李初梨等交待要对王明思想进行帮助，王明对来这里工作自然气恼，然他心里有数，自谓"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

前文述过，7月16日，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召开了扩大会议，

吸收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周恩来、瞿秋白、张国焘等人参加，讨论中国的问题，于23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会上批评了中共犯了严重的错误。并指派周恩来、瞿秋白迅速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错误。周、瞿回国后，即于9月24日至28日，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会上一面批评"立三路线"，一面又对何孟雄点名批判。

三中全会对李立三的批判，王明自然举双手拥护，出了他胸中一口闷气。但是，他对会议的主持瞿秋白，却耿耿于怀。因为在中山大学时，王明同瞿秋白便在许多原则问题上有分歧，瞿秋白对王明搞小宗派行为，曾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并支持"中大"的大多数学生反对他小宗派，因此，王明对瞿秋白十分恼恨，如今瞿秋白回国主持召开三中全会，主持了中共的工作，这对于王明来说，真不亚如晴天霹雳。尤其使王明生气的是，王明因反立三路线受了处分，如今应当是英雄了，可瞿秋白不仅对他不加以褒奖和重用，且连李立三给他的处分都没撤掉。

王明对瞿秋白简直恨之入骨了。

时中共中央决定王明到江西苏区工作。王明更是气恼于心，正当叹自己时运不至、要动身前往苏区之时，夏曦、沈泽民、何凯丰、陈昌浩、李竹声等人回到了国内，这些人给王明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喜讯：共产国际在收到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之后，很不满意，认为李立三的错误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瞿秋白、周恩来主持的三中全会"抹煞两条路线原则上的区别"。批评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犯了"调和错误"。是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写了《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即"十月来信"。但共产国际的信还没到中共中央时，沈泽民、夏曦、凯丰等人从米夫那里得知，这些人回国后，没向中共中央报告，却暗里告诉了王明，王明听了，真是欢喜异常，如同将溺水即死的人抓住了救命的稻草，他马上气盛起来，他不仅拒绝去江西苏区，而且与博古一起，于11月13日，联

名向中共中央写了信。内称：

> 我们认为这些错误(指三中全会而言—引者注)不是偶然的，而是过去李立三同志为领导的路线，在某种程度上在某种意义上的继续，立三同志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立三同志的路线和国际路线是不能并容的。立三同志的路线的发展，必然要起到脱离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国际的地位上去。(事实上已经走到了这种地位)。……但是三中全会的最大缺点就是对于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线没有充分的揭露其机会主义实质；没有使全党同志了解过去领导的差误而实行迅速的转变。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的方法(各种会议、党报上的解释等)迅速地传达国际路线到下级干部中去。

11月17日，王明和博古再次联名写信于中共中央，内称：

> 立三同志的《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的文章发表……不是简单的个别错误，而是有一贯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在这种总路线下产生的策略路线、组织任务和工作方式与方法将都要形成“左”倾与右倾的机会主义错误。……不顾立三同志对我们的威吓，依然提出自己的列宁主义的意见。……我们为顾全中央及立三同志的个人威信和免因残酷争论引起工作损失起见，在中央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我们只提出我们自己的正确意见……相信共产国际的来信一定能够证实到底哪种路线是符合于

共产国际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哪种路线是反共产国际的路线。

在信的最后，王明、博古提出：

> 一、正式公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二、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真相，撤销对我们的处罚。三、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王明决定不去江西苏区后，就擅自离开了江苏省委，搬到了斗鸡桥去住。

前文述过了中共中央接到了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后，十分重视，立即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五天的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即“十一月补充决议”。决议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批评。但是，中央对王明等知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的内容却不向中央报告，而是采取向中央突然发难的作法，进行了批评。

瞿秋白在其报告中指出：

> 沈泽民的方式与精神是离开政治局的领导……他们知有国际来信，但不公开说已知国际来信，请求政治局如何办，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可使一般同志很惊奇与发生其他倾向……使同志们惊慌不明。……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政治局的扩大会上也讨论了王明、博古的两封信，认为王明、博古同李立三的立场基本一致，分歧很小。王、博要求将他们与立

三的争论公布于党，是算旧帐的方式，是从个人成见出发，与国际来信的意思没有相同之处。因此，会议否决了王、博等人要在党内挑起争论的要求。

12月1日，周恩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会上对王明、博古等拒不服从组织分配，违反组织原则，在党内犯自由主义的行为进行了批评。周的报告指出：

> 尤其要反对有小组织倾向的同志们的超组织的活动，在过去与伯山（即李立三——引者注）同志争论的四个同志在不平衡革命高潮等问题上是对的，但陈韶玉（即王明—引者注）、秦邦宪（即博古—引者注）等同志则借此扩大发展他拥护国际路线的影响，这是不应当的。在韶玉同志“开始在主要几省甚至一省建立中国苏维埃政府问题”的文章上面“夺取武汉这一可能的前途，成为不远将来的事实”，“夺取武汉的胜利，有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完成，并且是中国现阶段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的正式开始。”他这样的观点与伯山同志是同样错误的。这证明韶玉同志对于这些问题也没有弄清楚。

王明倚仗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对瞿秋白、周恩来及中央的批评，毫不放在心上。他继续摇动反六届三中全会的大旗。12月14日，王明在《实话》上发表了《立三路线与战后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文章，再次攻击三中全会。在王明、博古的摇旗呐喊中，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江苏省委的干部、罗章龙、徐锡根等全总和上海工联的干部及工人，纷纷卷入反三中全会的浪潮中。这股狂浪，使中共中央的领导威望急剧下降。

这时候，王明又向中共中央上送了《两条路线》的意见书。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这意见书是王明于

11月间突击写成的。成稿后，由反立三路线的几十个人看过，王明根据这些人的提议而进行了修改。其内容主要认为“立三路线”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与实际”、“托陈取消派从‘左方’来取消革命，李立三同志从右方来取消革命”。李立三的路线本是使“八七”会议开始的“左”倾冒险主义达到了顶峰，而王明却认为“立三路线”右倾。足见王明宣扬的路线“左”到何等地步。中共“七大”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

……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1929年以来就存在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的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

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份”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在王明、博古、何孟雄、罗章龙等方方面面起劲攻击六届三中全会间，中共中央面对共产国际的压力和王明等人的一片反对声浪，只得接受王明等人的意见。于12月11日，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并决定将这《决议》和共产国际十月来信等四个文件下发全党。但王明等仍然不依不饶，要求召开紧急会议，说要“从根本上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

米夫的高压之策

就在三中全会风波趋于平和之时，米夫来华了，米夫的来华，又顿使中共内部，风浪大作，沉渣浮起，几将中共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米夫是1930年12月10日左右由德国秘密来到中国的。其身分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指导中共的工作。

米夫对中共对王明的使用一直不满，加之对王明的处分和"打击"，对中共就更加不满了。因此，他到了中国之后，不是去见中共的高层领导人瞿秋白，周恩来等人，向瞿、周了解情况，调解中共内部方方面面的矛盾，而是首先见王明。王明见了米夫，真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一般，又好像他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抱着米夫就呜呜地哭了起来，哭得别提多伤心了，而后，又加油添醋地向米夫讲了他受到的种种"迫害"。米夫少不了安慰了他一番。并暗暗告诉王明，他此来的目的是赶瞿秋白下台，要王明做好"登基"的准备。接着，米夫又在王明的安排下，接见了罗章龙、徐锡根等反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方方面面的人，唯有何孟雄，米夫拒不接见。米夫说何的思想右倾，几与陈独秀的思想同出一辙。

米夫了解了中共内部各方争斗的情况后，对王明提出的召开紧急会议的主张持否定，他决定亲自主持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便把王明推上台。米夫决心下过之后，这才同瞿秋白等人晤面。一见面，米夫就提出召开四中全会。

瞿秋白对米夫深有了解。对米夫来华后不先与中共领导人会面，而是先找王明等人，瞿已知晓，但因米夫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为中共的"太上皇"，瞿秋白虽然一肚子不高兴，也只有吞在肚内，米夫说甚就是甚了。

12 月 16 日，米夫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此为米夫大树特树王明形象的第一步。《决议》内称：

> 在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中，韶玉等四同志反对此观点，是合乎国际路线的观点，认为韶玉等四同志的意见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显然是很大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当时因为赞助与执行立三路线的缘故，竟因韶玉等四同志批评中央的路线而妄加他们以小组织罪名，给韶玉同志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其他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这显然是不正确的。……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

同日的会议上，亦做出了《关于何孟雄问题的决议》，宣布取消对何的处分，并决定公开何的意见书。

在这个会上，瞿秋白在米夫的高压之下，一而再、再而三地检讨，直到把三中全会说的一无是处，并同意公开向全党承认、检讨自己犯了"调和主义"严重错误，米夫才松了嘴，周恩来也本着顾全大局，相忍为党的原则，同意米夫的主张。

在这个会上，在米夫的高压下，中共中央被迫发出了《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号》，其副标为"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内容不仅夸大立三路线的为害，还把三中全会说的一无是处。因为米夫代表着共产国际，是中共的太上皇，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虽然众人不服，也只得屈从。

米夫对瞿秋白、周恩来等实行高压手段，而对向忠发却另眼高看。

米夫为何对向忠发高看呢?因为在米夫的脑子里,装的完全是斯大林的"左"倾杂货,认为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能代表工人阶级,所以,他决定留用向忠发,另一点,米夫也看到向忠发是个傀儡书记,能为王明所利用。

米夫三捧两吹的,就把王明捧成了"国际路线的忠实代表,反立三路线的英雄"。12 月 25 日,也就是米夫到达中国后不到十天,就把王明提拔为中共江南省委书记(即江苏省委,三中全会后改为江南省委--作者注)、博古被提拔为团中央宣传部长。江南省委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数省。原江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被派到苏联学习。时江南省委委员有何孟雄、夏采曦、许畏三、沈先定、陈资平、蒋云。

米夫的支持,使王明的腰板硬了,气也粗了。时江南省委,不仅是国民政府的政治中心,而对中共来说,其党员的人数,所能领导的产业工人的人数,也为全国之首,因而江南省对于中共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米夫把年仅廿六岁的王明放到这里,真是中共的悲剧。

王明到了江南省委委员的位置之后,第一个打击的对象就是何孟雄。前文述过,何孟雄在中共内资历深,有见解,尤其在江南省委内有很高的威望、王明知道,自己要在江南省委内称王称霸,必须搞垮何孟雄,何孟雄搞垮了,其他不服自己的人也就都服了。

如何打倒何孟雄?王明眼珠转了一番,想出个主意,决定在贯彻中央九十六号紧急通告会上对何发难。

12 月 30 日,王明以讨论九十六号通知为名,召开了扩大的上海产业和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开会之前,王明把他的心腹都召集到一起,暗授机宜,要他们于会上向何发难,将何搞垮。会议开始之后,由王明首先做报告,王明在报告里大讲了他那"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而奋斗"的思想,大骂李立三,同时指桑骂槐地骂何孟雄和罗章龙等,说他们是假的拥护共产国际者,自己才是真正的拥护

共产国际者。说罗章龙分裂党、何孟雄进行反党。说李立三、何孟雄、罗章龙、瞿秋白统统都是反共产国际的，自己同何、罗、李、瞿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自己是真正的英雄。

王明发言之后，他那小宗派内的人相继发言，这些人起劲地吹捧王明，攻击何孟雄是在"反立三路线的掩盖下发挥自己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发言一个比一个激烈，一个王明的亲信竟破口大骂何孟雄是"右派"，是中共的败类。何孟雄几次要发言，都被主持会议的王明所阻止。最后，何忍无可忍，向王明提出了强烈抗议，王明这才让何发言。何孟雄摆了江苏和上海在立三路线下受到的巨大损失的事实，批评王明的《两条路线》的小册子和王的发言是"新的立三路线"，并严斥了王明一伙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的小宗派行为。何的发言有理有节，直说的与会者心服口服，一些跟王明跑的人都不吭声了。王明见势不妙，急急地下令休会。休会之后，王明便将其小宗派的骨干纠集到一起，进行了密谋策划，商量了如何对付何孟雄。一番策划之后，继续开会。会议一开始，便展开了对何孟雄更疯狂地攻击。并不准何发言，何气得拂袖而退。王明即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告会议结束，并以组织纪律来压制不同意见者。

罗章龙也起劲地反对中共中央。他对九十六号通告仍采取否定的态度，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领导。1931 年的 1 月 1 日，罗章龙主持制定了《全总党团决议案》，"决议案"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的"，向忠发、项英、邓中夏、贺昌、罗登贤等"亦须离开领导机关，施以严重的处罚"。"决议案"内称：

> 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的职权，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

就在这时，米夫出来讲话了。

米夫为了将王明扶上台，思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决定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将王明扶上中共最高领导的宝座。当米夫将他这决定告诉王明时，王明乐得嘴都合不住了，真恨不得趴在地上给米夫叩头，喊米夫几声亲爹。米夫对王明说："要搞个写作班子，把四中全会的决议准备好。"

王明吸了吸嘴唇说："写作的事好说，可我还有我的那些志同道合的人都不是中委和代表，不能参加会议，我们写了决议，那些反对我们的通不过怎么办？"王明稍停又说："我断定了，在这会上，何孟雄、罗章龙一定公然反对，瞿秋白么，虽然不敢公开反对，暗里也会使反劲儿。"

米夫说："你说该怎么办？"

王明说："你要设法让我们这些人参加会，并有选举和被选举权。再有、对罗、何这些人的支持者，尽最大可能不让他们参加会。"

米夫点头。王明又说："会议时间不可开的过长，时间越长越麻烦。"

米夫把手一挥说："就开一天的时间，目的么，一是通过决议，二是选你掌权。"

王明听了，连连说好。

1931 年 1 月 7 日，米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址选在了上海武定路修德场 6 号(现在的武定路 930 弄 14 号)。时出席会议的代表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二十二人外，还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团中央、苏维埃准备委员会以及白区党的基层组织代表，共三十七人。这些代表中，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关向应、罗登贤、贺昌、顾顺章、罗章龙、陈云等。另有康生等二人作记录。为使王明入选，米夫也事先找中委、候补中委们，一个个地谈话，要他们选王明荣升高位。

虽然如此，米夫还不放心，因王明的资历太浅了，更要命的是，王明既不是中委，又不是代表，是没有资格参加四中全会的。米夫遂又采用高压手段，强迫中共中央增加了十五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会，这十五人是：王明、博古、沈泽民、夏曦、王稼祥、陈原道、何孟雄、韩连会、肖道德、袁乃祥、沈先定、许畏三、邱泮林、顾作霖、柯庆施。

有人问了；何孟雄是坚决反王明的，怎么也在十五人之列？这是米夫有意安排的。米夫想到这十五人若都是清一色的王明派，会引起到会者的反对，遂又增加了何孟雄，还有罗章龙派的邱泮林等。对于坚决反对王明小宗派的中委和候补中委，米夫采取了尽力不通知他们参加会的策略。尤其是罗章龙派的中委和候补中委，大都被米夫拒绝在外，非参加不可者，米夫采取事先不打招呼的做法。使与会者到会亦不知开甚会，令其思想上没任何准备。更有许多代表在开会前的几十分钟才接到通知。有的代表走进会场还不知开的什么会，有的代表被告知是召开紧急会议。

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列席代表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米夫则利用其共产国际代表的权力，强行决定：王明等十五名列席代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米夫此举，开创了中共党内组织原则凭借手中权力可以随意揑弄的先例。

会议开始后，首先由向忠发发言，他说："今天召开的会议，是六届四中全会。"向忠发的话音一落，那些不知内情的代表都吃惊地睁大眼睛，心说："这么重要的会怎么事先不通知一声。"这时，向忠发接着说："为了安全起见，这次四中全会的召开，没有通知到所有中委和候补中委，因为中央已于最近召开了会议，发布了第九十六号中央紧急通告，所以，这次六届四中全会只开一天，这也是从安全起见。会议的议题么……"

向忠发刚说到这儿。韩连会马上站起来说："四中全会是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有许多问题应当在这会上解决，应当在做好充分的准备后才能召开，大家连开什么会都不知道，就宣布召开四中全

会，这怎么能行？”

韩连会话音没落，王凤飞发言道：“开这么重要的会议，无论如何也不能在一天内开完。六届二中全会开了六天，三中全会也开了五天，一天的会能解决什么问题？”

这时，又有一些代表要发言。米夫见势不好，他面孔一沉，站起身说：“四中全会是得到共产国际批准的。无论有多少问题，只要用共产国际的尺子去量，一切矛盾都会迎刃而解，就是说，共产国际怎么说的，我们就怎么做。”

米夫把共产国际的虎皮一扯，众人都不说话了，向忠发遂宣布开会议程，他说：“这次会议议题共八项，一、宣布开会；二、追悼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三、推选主席团；四、向忠发作政治报告；五、讨论；六、国际代表结论；七、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造政治局；八、闭会。”

向忠发刚刚说完，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徐兰芝突然闯进会场，他进门后即满面怒容地质问向忠发说：“你们是开什么会？”

时有人替向忠发说：“四中全会。”

徐兰芝听了，拍着桌子大声质问向忠发说：“我是中央候补委员，召开四中全会，为什么不通知我参加？”

原来，徐兰芝是支持罗章龙观点的人，米夫故意不通知他来开会，徐偶然得知了开会事宜，他很气愤，遂闯进了会场，一番质问，使向忠发张口结舌。

这时，余飞也站起身大声说：“这个会要改期，今天的会可作为紧急会议。”

王凤飞又起身发言，支持余飞的意见。王凤飞、余飞都是罗章龙派，徐、王、余三人发言后，罗章龙亦起身发言，质问向忠发，主张立即停止四中全会，改组中共领导。

罗章龙乃为一派之首领，罗的发言有一定号召力，他这一讲，会场上就乱了，又有不少人指责向忠发搞突然袭击，弄得向忠发不

知如何是好。米夫见状，急忙起身，他大声说："都嚷什么？四中全会是共产国际批准，并要马上召开的！谁反对四中全会召开，就是反共产国际！"

米夫话音一落，王明、夏曦、博古、沈泽民等都发言支持米夫。还有不少拍马屁的委员们也都表态支持米夫。米夫见状，遂决定进行表决，自然支持米夫的人多，会议遂决定继续进行。但是，余飞、韩连会等又提出四中全会应增加议定的日程，要把组织问题、军事工作、妇女青年问题等列入会议议题，会议日期延长三——四天。

余、韩建议，又遭到米夫等人的拒绝。

余、韩、还有史文彬、王凤飞、罗章龙都表示保留召开紧急会议的权利，何孟雄等也支持罗章龙派的意见。

米夫的高压使会议按原计划进行。于是，向忠发代表中央向会议提出了主席团名单，为：向忠发、徐锡根、罗登贤、任弼时、陈郁。

经表决，主席团经多数票通过。

接着，向忠发作了《中央政治局报告》，这个报告是在米夫操纵下而成的，向忠发不过是鹦鹉学舌而已。报告共讲了十个问题，一是共产国际的路线如何来指导中国党；二是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造成的结果是什么；三是立三路线是怎么形成的，其理论系统是什么；四是立三路线的结果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态度；五是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是不是执行了坚决地转变；六是对共产国际的代表的不尊重；七是三中全会后中央与各地工作是否真正转变；八是共产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的转变；九是中共如何认识执行国际路线的责任；十是解决中共内各种反共产国际的思想。向忠发在报告中称：

六次大会后，中央的路线本是一般的正确的，党的坚定性和布尔塞维克化，也"都有很大的成绩"。可是，同时都又犯了一些个别的严重的错误，尤其在七十号通告后，

经过鄂代会、苏代会，立三路线逐渐形成，到了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在中央政治局通过，立三路线便成为政治局的路线。尤其是正在中国革命高潮生长的紧要时期，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领导之下，不顾共产国际的这些指示，竟走到冒险盲动主义路线上去。……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别的，不是偶然的。这些错误是联系许多实质上根本上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布朗克主义，陈独秀主义的理论观点，而成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系统。立三路线的历史根源，是在六次大会前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的残余未肃清，六次大会后中央关于军阀战争之不正确的分析，联合富农及在黄色工会中的错误策略，对改组派的不正确的估量，都给立三路线以机会主义的基础，而组织上孙中山陈独秀的家长制度的复活，更保证着立三路线的发展与统治。……因为有这样一贯的反共产国际的方针，就不能不引导到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和态度。国际在纠正路线和克服中央一切错误中，是有绝对作用的。可是六月十一日决议案，立三同志及赞助他的同志，竟不顾国际代表的反对，而径行发表。六七月国际屡次来电指示，政治局表现着迟疑与反抗，并曾有几个抗议的电报发出。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立三同志竟敢用共产主义"左"右叛徒说过的话，来说国际不懂得中国情形，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这种反共产国际的斗争，不服从国际纪律，在当时竟得到政治局全体的同意；这种绝对不能容许的态度，便成为六月十一日决议案后到八月这一期间的中央反列宁主义路线的主要前提。……共产国际要中国党完全揭露立三同志的"理论"，完全克服他在实行上的一切反共产国际的方针，而走到国际的指示和决议的轨道上来。三中全会是没有解决这个任务的。三中全会是站在调和主义立场之

上来接受国际决议案，结果使三中全会的路线成为调和路线，并对立三路线加了一层保障。……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不尊重的态度，是不可容许的。三中全会前，已经违反着国际纪律。三中全会时，政治局的几个同志始终不同意当时国际代表的意见。……这种意见，国际代表屡次提出，然而政治局终是反对，因此没有加入三中全会决议案，而且这种问题又没有清楚报告，以致国际代表不能及时的纠正中央政治局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因此，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的立场，与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最主要的责任是要秋白同志负的。……三中会全后中央与各地工作有没有真正转变呢？我们回答是没有的。很明显的因为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造成的结果。……三中全会后，各局各省委的扩大会，也都是继续着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有的地方如顺直，还更加扩大起来，使立三路线得以完全继续。这样，对于执行国际路线的真正转变，自然做不到了。……中央政治局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补充决议，是完全同意了国际的来信，指出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这样，又向着转变到国际路线方向走了一步。可是因为这决议又说三中全会是一般的接受了国际的路线，所以这个决议案的意义，始终是模糊了，而不能不说还有调和主义的错误。……九十六号通告是将调和路线放弃了，回到国际路线上来，纠正了政治局的错误和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的错误。但是，这个通告还有其他的错误可以批评：一、这个通告没有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反而说到党的危机。……二、通告上说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已经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不正确的。这是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面前，解除了党的武装，就是说，党将没有根据来反对掩盖在反立三路线之下的右倾分子的活

动。三、这个通告对于中央转变到国际路线的过程的解释一字不提，只说中央一直到最近只在继续立三路线，这是不正确的，而且也不合事实。……现在国民党军阀调动二十五师以上的兵力，动员一切反动统治的阶级力量，从各方面向革命进攻。……革命势力能否冲破敌人的包围，击退反革命的进攻，主要的要看全党有没有决心去执行国际的决议。如果全党的布尔塞维克像一个人一样团结来，一致的实行国际的路线，反对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一定能领导群众，去冲破敌人的"围剿"，走向革命的伟大胜利。

为着实行国际的一切指示和决议，中央政治局特向扩大的四中全会，提出下列不可迟缓的任务：

接着，向忠发又讲了八点任务。这八点中，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继续在全党内批判立三路线和克服调和主义的错误，取消三中全会补选的李立三的中央委员，引进在反立三主义斗争中拥护国际路线的人，并重新审查政治的成分。说穿了，就是引进王明一伙小宗派的人掌握中共中央大权。另一点是继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向忠发说："党要反对'左'倾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关门主义，尤其在立三路线揭发之后，更加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尾巴主义，黄色倾向，富农路线，以及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党必须站在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去进行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斗争，要在反立三路线的斗争中，反对由这一斗争所产生的各种偏向，如极端民主化与无原则的派别斗争等等，尤其要反对的还是以各种形式来掩藏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错误的企图。同时更要绝对的反对托陈取消派破坏中国党中国革命的阴谋，这对于革命的领导是最大的危害。"

向忠发于报告中的两点，说来说去一是冠冕堂皇地扶王明等

亲共产国际的上台，一是把与共产国际意见不同者统统打下去。

向忠发报告完了，那些与王明意见不和的人立时听出这报告不对味儿。工人出身的张金保第一个发言，她虽是个女同志，但说话很利索。她说："四中全会开的太突然，忠发同志的报告，与许多提法，需要认真的讨论，而只一天的时间，这怎么行？如何从立三路线中接受教训，只有亲身参加实践的同志才有真正的了解，而我们的会扩大的列席代表，都是念书的出身。"她指着王明说："你们读书写文章行，真刀真枪的干革命差远啦！"

张金保讲话时，米夫听着味儿不对，他不认识张，便向身边人了解张的情况。张金保发言后，王明马上起身说："我的关于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理论与实际的意见书（即《两条路线》小册子——作者注），今天没有拿来，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对于意见书的内容，不多讲了，希望同志们详细看看就是了。"王明提高了嗓门儿："立三路线的错误是什么呢？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这在每个问题上都表现得极为明显。"王明稍停又说："在长沙占领后，以立三为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头脑热得发晕了，他们大声喊着：得了！得了！全国直接革命形势已经来了！再不暴动，更待何时！？于是便决定在全国各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王明挥着手，唾沫纷飞地说："他李立三根据所谓'第三时期是资本主义总危机时期'这一断定，便无常识地来否认列宁的资本主义发展没有什么不平衡；因此，他便一方而否认苏联可以单独建设社会主义，对苏联抱悲观失望的心理；另方面，他否认中国革命在现在世界革命高潮生长的基础上，在国内几万万劳苦群众力量的基础上，可以首先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他只看到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只看到中国半殖民地革命这一特点，便感到没有办法，而看不到中国革命的优点，因此，他不相信苏联的力量，不相信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的力量，不相信中国几万万劳苦群众的力量，以为中国革命只可

以爆发，而不能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的'持续'，他李立三以为没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胜利，决不能保障中国革命胜利的'持续'，他在没有办法时，想出了什么中国革命只有在全世界革命大爆发中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取得一齐战胜帝国主义的胜利。在全世界革命同时一齐胜利的'左'倾空谈之下否认中国革命可以先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胜利和保障这一胜利持续的可能，他是在全国革命同时一齐胜利的'左'倾词句之下，来否认和取消中国革命在全国新高潮之下有一个或几个主要省区省先胜利的可能！"王明说到这里，他把桌子一拍："他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指导思想不正确，他组织自由大同盟去争取一部分自由资产阶级分子，他公开主张联合富农或至少是不反对不兼半封建的富农，他李立三不了解中国革命在现在革命阶段中已经存有社会主义成分的内容和意义。"王明讲到这儿，把话锋一转，又对准瞿秋白，他盛气凌人地说："瞿秋白同志本来是奉共产国际之命来解决立三路问题的，但他采取了调和的态度，曲解了国际决议，说明他的思想上与李立三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他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王明骂了阵瞿秋白，又指鸡骂狗地把罗章龙、何孟雄等反对他的人骂了一番，他提出要改造中共，要改造中共就要在党内展开政治斗争，而且要使这种政治斗争不断发展。王明大声说："我们的党要在斗争中发展新干部！要在斗争中取代旧干部！"

——四中全会，拉开了中共内部残酷斗争的序幕。直到文化大革命，使残酷斗争达到了顶峰。

王明的发言，完全是共产国际对中共问题批评和指令的翻版，成为共产国际的代言人。王明的发言，米夫听着十分入耳，他不时的点头，表示对王明发言观点的赞同。

由于王明的发言很长，占了会议的不少时间，其他代表已无有多少发言的时间了，米夫看了下表，当即宣布，发言时间要短，会议必须在晚上10时前结束。

米夫讲完之后，又有十几个人发言，大都是王明小宗派内的人，这些人的发言自然是随帮唱影，鹦鹉学舌，跟着王明、米夫的舌头转，而且使别人插不上嘴，这时，何孟雄忍不住了，他抢着发言说："应当让政治局的同志们先发言，听听他们是否改正了错误。"

何的发言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接着周恩来起身发言。他说："立三路线错了这已成为事实，但凡是过去坚决执行立三路线的，若都被划成了立三路线的人，这就不对了。李立三对错误应负主要的责任，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也要负一定的责任，下面的同志，认识到立三路线的错误就行了。目前我们党正处在困难时期，而立三路线涣散了我们党，现在的任务是加紧将它恢复与健全起来。若把凡与立三同志有过工作关系的人都说成不堪造就，这依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周恩来稍停又说："解决立三路线问题，应从维护全党的利益出发，不能从小派别的观念出发，如果站在派别观念上解决问题，就一定会离开党的利益而只顾到派别的利益，这不是布尔什维克党所允许的。"

周恩来发言之后，瞿秋白、向忠发、李维汉、顾作霖等相继发言。接着，何孟雄又起身发言，时瞿秋白在发言中很诚恳地检讨了自己，何说："秋白同志已找到了他思想上的根源，这说明他已进步了。"

接着，何孟雄又批评了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错误，要求改组中央领导。之后，王稼祥发言，王稼祥对立三路线和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进行了严励地批评之后，对王明等人搞小宗派的活动，也进行了批评。王稼祥说："王明同志，我们四人受到了立三的中央处分之后，尽管这个处分是错误的，可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党员个人，思想上可以保留意见，行动上却必须坚决服从。个人服从组织，这是党的组织原则。王明同志，你可不是这样，你拒不服从党的决定，不接受新分配的工作，还不断和一些同志发泄不满，我认为这是党性不纯的表现，应当引起党、特别是你本人的注意。"

王稼祥的发言，使王明大为不满，他的脸一红一白的，待王稼祥发言之后，王明要发作，米夫向他使了个眼色，王明才没开口，可脸色仍憋得像鸡下蛋似的。——会后，米夫对王明说，他所以没让王明发作，是因为在中共之内，像王稼祥这样的理论家不多，以后还要不断地用他，应当拉住才是。米夫的话对王明来说，如同圣旨，他心中虽然怒气不息，也还是忍住了。

王稼祥发言之后，罗章龙发言。罗坚决地要求解散中央，重新改组中共。这时时已到了晚上。米夫看了下怀表说："已经有十八个同志发了言，意见大多谈出，时间很紧，重复的话不要再说，发言的每人限定五分钟。"

接着，罗章龙派的王克全等发言。继尔又有几人发言，之后，米夫即不再让与会者发言了，米夫说："现在宣布会议讨论结束，请同志们原谅，在四中全会之前，远东局与中共中央共同致信国际，保证扩大的四中全会安全举行，但白色恐怖不允许我们开会时间过长，今晚 10 时半必须结束会议，这是我们的责任，廖山同志来迟，要求发言，但我们不能因此动摇了我们会议的时间，动摇了对国际的保证，另约时间再与他会谈。结论只说三个问题，一是李立三主义，二是调和主义，三是四中全会和党以后应该如何去工作。"米夫停了下继续说："为什么中央的一切同志都无条件的服从立三主义？全总在取消工会时，没有反抗？C·Y·在取消青年团时，也没有反抗，主要是同志们被立三路线的'左'倾的词句抓住了，如秋白、恩来也是如此，被'左'倾的词句抓住，结果使立三路线来与国际路线反抗。在六七月间，我们如果如立三路线一样的认为当时已经是全国直接革命的形势，的确将使党受到损失更为厉害。如果我们清楚的认识立三路线是退却的，是与真正进攻的路线不相容的，即不会发生调和主义。调和主义的发生，根本没有认识立三路线的根本性，同志们只以为他是夸大的，只说他是热血的革命家，这样估量是不对的，他的路线，与真正的、革命的路线是不相容的，是反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于暴动的前提也是不相容的，立三路线使党、青年团的组织及群众的组织，受到了大大的损害。我们要明显的认识，国际批评他，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热血的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盲动主义的英雄，——一个披着冒险主义外套的颓丧的小资产阶级，所以在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时期，我们要彻底的打击和肃清立三主义……甚么是政治局对立三政策取妥协的调和态度以及发生许多动摇的原因呢？无疑是没有明显认识清楚立三主义的根本性质。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却认为：立三主义并不怎么险恶啊，立三只是过分估计了现在的形势，所以要举行暴动，他是个过于热血的革命家。"米夫讲到这里时，他斥责了这种认识。为了使读者看着明白，笔者把米夫在四中全会所做的结论的讲话纪录稿，摘录于下：

> 立三主义这种估计对于党是错误和不幸的，它的理论及实际与进攻路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义内）是绝不相容的，它与有系统的组织及领导革命，与有系统的建立暴动底前提无丝毫相同之处，立三主义的系统是领导党及群众走向失败，解体及解散的系统。在对于党这样严重的三个月（六月、七月、八月）中无疑的还无有直接革命形势；即使已经有了这样的形势，立三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亦必会使党破产。
>
> 应该绝对的了解，共产国际之所以严厉的批评立三路线，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太热心的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冒险辞句的英雄，因为他不是革命的组织者。站在全国暴动与中国革命胜利的观点上我们△△集（原文如此——引者注）中火力反对消灭党而不能使革命胜利的立三路线。为了在城市中能真正有力的组织与领导群众罢工，我们应（批评）立三对于总罢工的空谈。为了真正的获

得与保持中心城市，我们应批评立（三）在武汉与南京的冒险政策。从暴动的观点上我们应批评立三这种冒险的机会主义。

从六月到八月间的形势是怎样的呢？毫无怀疑的我们当时是在剧烈的形势与运动高涨的时期中。军阀战争与革命化的形势普及到更多的省份中，农民暴动一天天的蔓延，苏维埃区域渐次广大起来，红军有伟大的成绩。国民党军队士兵群众逞（呈）现不安的情绪，时常发生兵变。小资产阶级亦日益急进化，在城市中还无有广大的群众运动——这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无有广大的群众运动——这大部分是因为我们无力量领导与组织工人群众——但是罢工的浪潮是增涨的。……在这种很顺利的形势下党在政治上与组织上可以扩大他在工农及士兵群众的影响。如果党当时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党无疑的在对于群众的领导中可获得伟大的进步。共产国际当时曾这样警告党的领导：不要落在运动后面，不要冒险。

党本应根据着共产国际的指示执行真正的进攻政策（在这个名词的真正的字义下），而立三却领导着党反对国际，并且采用了叛徒们所用的辞句："或者忠于共产国际的纪律，或者忠于中国革命。"

……

立三的第二步是六月十一号的政治决议。他自觉的将这个决议当作反共产国际的斗争纲领发给各级党部。这个决议是完成了所谓的立三主义的整个理论与实际。他反对共产国际的立场——集中苏维埃区域，建立铁的红军，创立苏维埃根据地与苏维埃中央政府。他反对我们发展与领导工人罢工以及在一切日常斗争中组织与领导工人的观点。他说中国革命不能单独胜利更不能保持此

胜利。

这是最无耻的机会主义与最卑鄙的悲观主义。他根本怀疑为革命争取工人群众，所以在他的暴动理论中工人是无作用的。……

在他对于苏维埃根据地问题的态度中亦明显的表现出这种机会主义与悲观主义：把苏维埃区域集中起来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全国革命的立时胜利，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不可能的，无有世界暴动与世界战争，全国革命胜利亦是不可能的。

……

但是立三在公开反对国际与执行他的冒险政策时：他有系统地解散了党，取消了青年团与群众组织。这是怎样的一个热血青年啊！党及赤色工会对于群众及工人斗争的关系再没有比政治局在立三领导下决定全中国暴动的时期那样削弱的了。

立三并且从托洛茨基那里借来了"左"倾的辞句。这不是进攻的路线。这个路线与列宁主义根本无有关系，他是原则上与共产国际的革命政策根本相对立的路线。

不承认错误是一个政治的危险。不把党彻底的从立三主义的理论与实际中解放出来，党是不会向前进的。为甚么三中全会在党的真正转变中无有效果呢？为什么政治局在三中全会以后无有真正的实际结果呢？为甚么我们还不能改善工会的工作，不能加强我们的领导与扩大罢工的工作，不能在苏区内执行我们的政策以及加强我们士兵群众中的工作呢，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不能真正的在实际中执行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呢？三中全会接受了这个决议的啊。

他的原因很明显的是，三中全会以及政治局的政策

不能造成在党内执行真正转变的前提。

……

现在讲到三中全会调和主义的问题。

三中全会为什么不能作出成绩来，他接受国际路线，决定扩大赤色工会，加紧农民运动，加强党与群众的关系，结果都是无效。因为他接受了立三路线的指示，谁要组织罢工，便是右倾。他一方面接受国际路线，一方面又接受立三路线……他一只手拿着立三路线，一只手拿着国际路线。这不是国际路线不对，而是三中全会将国际路线隐藏在立三路线后面，使党的力量涣散削弱，这是政治局同志应当负责的，尤其是秋白同志。

三中全会党的领导很聪明的，他一方面向共产国际行鞠躬礼，另一方面向立三主义行鞠躬礼，这样行鞠躬礼的时候，将国际路线推到立三路线的后面去了。

……

调和主义的中央政治局，不仅继续了立三路线，并且扩大了立三路线，给他一保障，涂改了立三路线的错误，特别是秋白的文章，不仅没有揭破立三路线的根源，而且他一句不讲，比三中全会的决议还退后。在组织上三中全会是执行了斗争的，但不是反立三同志，而是反对那些反对立三同志的同志，如陈绍玉、沈泽民，这些同志是立三同志反对的，三中全会政治局仍是继续立三这一意见来反对。他们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这里记起立三同志说有同志送到莫斯科学习结果就没有希望了，但现在证明这些同志将他们所学习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的先执行国际路线，这样错误，政治局也是应当负责的。

共产国际的信到后，政治局同志才开始懂得三中全

会是作了一种混乱的工作，他的决议是使同志混乱起来。三中全会后，党的组织不能加强，红军不能健强，……这都说明三中全会必然的结果。在这时候，中央开始明了而渐转变到国际路线方面，此地可以看出国际来信之绝对的作用。……十一月二十五号决议是渐渐的转变向国际路线进了一步，九十六号通告是更进了第二步。同志说九十六号通告是立三路线的继续，是不正确的。在上面有许多错误，他对于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说清楚，没有指出实际工作联系，及说党的危机，但不是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的继续。

今天差不多有三十余同志讲话，有些同志尽了他全部的力量来反对四中全会，赞成紧急会议，同志们请你们等一等，让我来解释，现在党到了一个混乱状态，敌人用尽一切力量来向我们进攻，我们应该作什么事呢？我们马上召集紧急会议是事实上不可能的。我们要在这混乱的状态中开四中全会来算算总帐，用斗争的力量来消灭他，进行真正的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坚决执行国际路线。这里并不是要几个派别来围着国际路线转，而是说要全党如一个人一样的一致在国际路线之下来斗争。如果召集紧急会议，能从工厂支部中选出代表来参加，但这决不是目前马上能作到的，须四五月后才能作到，这样的会议我赞成，但他不叫紧急会议而是七次代表大会，所以七次大会在七八月中秘密条件允许之下，可以举行。……我们不要空口去反立三路线，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反立三路线，四中全会是对这一工作的开始，今天(以)后我们来进到这样的进种中去吧(原文如此—引者注)！

同时在今天会议上每个同志要清醒的纠正自己的错误，吸引工人干部，提高他的政治水平，教育他训练他，到

> 指导机关为党工作，这才是真正的反立三路线。我们听到同志们讲话很惊奇的，投降派，什么叫投降派？如果立三同志在半年前投降国际，政治局三月以前投降国际，则党的状况更加加强了。如果这样是投降，我愿大家都来投降，这样提出派别是无有意义的。……锡根、于飞、章龙，反对立三路线是对的，但不能掩饰自己的错误，不能说我几个以前如何别个的反立三路线，在整个的立三路线之下，大家都有错误的。我们不要空喊反对立三路线，如果大家要撕裂党大家去发展好了，否则大家都要投降到国际来好了，如果全总党团再继续下去，那将要可以成为一个小组织。

米夫讲到这里，提高嗓门说："我再讲讲改造机关，改造机关主要完成国际与党的纪律，自然，应该吸引下层工人干部，但说要他们滚旦这是不负责的话。"米夫看了一眼向忠发，说："在改造中，我们要看谁能为党一致而斗争，如忠发、锡根、向荣应、温裕成，他们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可我们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米夫又看了看周恩来，而后说："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米夫稍停又大声说："在今天的讨论中，我听到许多同志说了许多危险的话，如说党破产了，革命破产了，这是反革命的陈独秀取消派及托洛茨基派的意见，我们不是傻子，党没有破产，而是立三路线破产了。"米夫讲到这儿，很激动地把手一挥："同志们！反对立三路线，只有站在国际路线之下进行反对才是正确的。如蒋介石也是反对的，托陈派也是反对的。在党内，也发生了右倾的理论，如郭妙根的言论，即是托陈派的代言人，目前，中共党内的危险主要是右倾，我们要集中力量反对右倾，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即在反立三路线中同时反对右倾路线。"米夫看了一眼何孟雄说："何孟雄

同志在发言中说现在没有右倾，这是错误的，这想法的本身就是右倾，是反国际路线的！”

接着，米夫又把王明吹捧了一番。

米夫讲完话后，便进行选举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米夫于会前就把名单拟好了，他打算一宣布了事。这名单中，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王尽仁、沈先定、黄苏、徐畏三、曾炳春九人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王明、陈郁、卢福坦、王克金、刘少奇五人为新的政治局候选人。三中全会时补选的中央委员罗迈、贺昌退出；李立三、瞿秋白、罗迈退出政治局。米夫要周恩来宣布这份名单，周恩来宣布后，米夫作了解释，他说这份名单是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共同提议的名单。

名单一公布，会场上就乱了，首先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坚决的反对。罗章龙说：“政治局几乎百分之百的都是立三路线执行者，应当彻底改造！”

时罗派的骨干韩连会提出了另一份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为：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顾顺章、王克全、韩连会、唐宏经、徐炳根、许畏三、将云等。

史文彬也随及提出了一份名单，为：刘成章、吴雨铭、李振瀛、袁乃祥、孟宪章等。这份名单将原中央政治局的人一律打倒。

何孟雄对米夫所提的名单进行了抨击。尤其对名单中的王明，批评的更为剧烈，要王明在会上说清他被捕和暴露机关一事。

由于几方对名单的人选争执不下，会场秩序顿时乱了。米夫当即宣布表决。罗章龙马上质问：“都哪些人有表决权？”

米夫说：“所有参加会的都有表决权。”

罗章龙听了，非常生气，说：“这不符合党的纪律。”说完，要拂袖退场，后经人拉住才算罢了。

米夫见状说：“章龙同志，应当安静的解决问题，捣乱会场是不许可的。”

罗章龙怒气尚未退，袁乃祥听了米夫之语，气得拍案咆哮，结果被米夫勒令退出。

在米夫的压迫下，四中全会终于选举结束，通过了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补选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政治局的委员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陈绍禹、陈郁、任弼时；候补政治局委员七人：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

在表决中，有人提出周恩来也应退出政治局。由于争执不下，对周进行了单独的表决，表决结果，多数人不同意周退出，这样，周恩来才继续留在政治局内。

时周恩来提出，既然王明等进人政治局，是否可让其他不同观点的同志也进人政治局，如何孟雄等。对于周恩来的建议，米夫坚决不同意。他再次强调，通过的这份名单是“国际名单”，只有执行权，没有修改权。其实，米夫的用意十分明显，他的目的就是要把王明扶上台。而他终于借国际之威达到了目的，使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成了屎克螂变知了——一步登天，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此后不久，其又成了政治局常委。

由于时间太紧和争论激烈，使得米夫起草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没来得及通过，米夫说：“时间来不及了，决议案由我们与政治局组织委员会审查。”

于是，会议执行主席徐锡根提出了一个“修改决议案委员会的名单”，为：王明、温裕成、周恩来、罗章龙、徐锡根五人。责成这个委员会在会后进行修改工作。

四中全会决议案于1931年1月24日在《实话》杂志发表。决议案无非是骂李立三反共产国际、中共全体党员该如何听从共产国际之语等等。

对于四中全会的结果，米夫是非常满意，而且认为是他的“得意之作”。他后来在他撰写的《英雄的中国》一书中写道：

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的斗争，在陈绍禹(王明)领导下，在党的上海支部开始了。为了正确路线而进行的斗争相当成功，陈绍禹同志把全党最优秀的力量团结到自己身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的最有才华的领导人陈绍禹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沈泽民和陈原道一起两面作战，使列宁、斯大林主张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得到了承认。

通过四中全会，王明终于爬上了中共的高位。

第五章　王明决心排除异已

康 生 其 人

在中共四中全会上，有一个人，他虽然没有发言权，虽然不是代表，但他把中共内部的争斗，看得清清楚楚，此人就是担任会议记录的、后来成为中共党内专以整人而出名的康生。

康生于1898年冬一个风雪交加之日出生在山东胶县利民区大台庄一大地主之家，其排行老四。其曾祖父乃清代贡生，入京师国子监读过书。其祖父张葆元，亦饱读孔孟之书。其父张发祥，是个禀生。时清代规定，禀生由府、州和县按时发给银饷，以补助生活，其堂号"南树德堂"。

张家乃胶县闻名的祖传大地主，家大业大，仅地就有数千亩，出租于穷人，坐等收租。因此，张家成了胶县首屈一指的富户。

康生出生之后，其父为其起名张旺，意思是家中人丁兴旺。张旺八岁时，其父为其请了塾师，为其启蒙。张旺人很聪明，读书又用心，其父甚喜，盼其成龙。

张旺十三岁时，辛亥武昌首义，三百年的大清国被推翻。一时间，维新四起，县城里开办了新式学堂。由于张家是个封闭式家庭，对许多新的事物，看不上眼，老是怀念皇恩浩荡，因此，张旺虽十三岁了，其家中仍不要他去县里新式学校读书。

时有张旺的好友陈舜庭向张发祥为张旺求情，说张旺绝顶聪明，若出外读书，他年定成大器。张发祥见儿子呆在家中，游手好闲也不是长久之计，遂送其到青岛礼贤中学读书，自此，张旺改名张宗可。

礼贤中学为德国同善教会牧师理查德·卫立姆于1900年所创办。甚有名望，一般寒家子弟不可及。该学校的宗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张宗可于礼贤中学学了数年，学得了不少在私塾中学不到的东西。1917年，张宗可于礼贤中学毕业了，时年十九岁。其雄心勃勃地想干番事业，然其时运不至，无论政界还是军界，就连生意场上，他都没有谋得一席之地，只得怏怏回府，于家中闲逛。颇有怀才不遇之感。

就在这时，张家突遭土匪抢劫，其兄被土匪打死。张宗可遂鼓动其父，将全家搬到诸城县城。于诸城的繁华之处建了座张公馆。张宗可亦更名为张裕先，又进了诸城教师讲习所。一年后，张裕先在讲习所毕业，即在诸城县立高等小学教书。就在这一年，“五四”运动暴发，张裕先亦被卷入洪流之中。

1924年夏天，张裕先又更名张耘，进了上海大学读书，校长于右任，但于仅挂了个空名，掌握实权的，是总务长邓中夏、教务长瞿

秋白。

这所学校是1923年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国共两党在原东南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联合创办的。张耘在“上大”读的是社会科学系，系主任为瞿秋白。“上大”系中共为自己培养干部的一个学校。张耘于此结识了中共的许多要人。1925年元月，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年2月，上海爆发了闻名世界的“二月罢工”，张耘参加了这次大罢工。罢工中，表现出了他非凡的领导才能。

1926年10月23日深夜，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爆发，时张耘任上海大学中共特支委员会书记，他积极组织学生，参加了这次武装起义。接着，上海又连续爆发了二次、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后不久，张耘担任了中共沪东区区委书记。就在这时，蒋介石于“四·一二”叛变了革命，举刀屠杀中共党员。

时张耘分析了一番国内外形势，认为中国的革命不可逆转，大势所趋，遂迎风而上。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陈独秀下了台，向忠发为中共中央书记。张耘打听了一下向忠发的情况，知道他是工人出身，肚里没多水墨水，也就没把他放在心上。后来，他看到中共大权旁落在李立三手中，见李立三是个了不起的人，就开始拍李立三了，在李立三鞍前马后的伺侯，李立三很喜欢他。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何孟雄很激动地说：“李立三同志担任中共领导工作以来，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很多人作了无谓的牺牲，很令人痛心。这种局面再也不能下去了！”

张耘听了，立即起身反驳说：“李立三同志担任中央领导以来，全国的革命形势非常好，到处是暴动，到处燃烧着革命的烈火，这烈火将陈独秀时期的党的暮气都烧掉了。”他说着拍着胸脯说：“李立三同志是我们党的最好的领袖，谁反对李立三，谁就反党，我坚决地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

张耘的发言，很快传到了李立三的耳内，李立三听后很舒服，

他把张耘调到中央组织部，让其担任了秘书长，张耘很是得意，遂更名赵容。这年底，与曹轶欧结婚。他更美了。

就在赵容美的像个刚出水的鲫瓜儿鱼之时，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李立三倒台了。瞿秋白、周恩来由莫斯科回国主持中共大政。赵容一见大势不好，立即调转枪口，拍瞿秋白的马屁，把枪口对准了李立三。赵容在上海大学时即与瞿秋白很熟悉，这次见瞿秋白得了势，在瞿的面前，张一个“老师”，闭口一个“老师”，叫得别提多亲热了。瞿秋白是个书生气十足的人，被赵容叫得麻苏苏的，一高兴，就让赵容担任了中央审查委员会的委员。于是，赵容更起劲地批李立三路线，直把个李立三骂得一文不值。在批判李立三的会上，赵容挥拳舞膊地说：“你李立三搞得‘左’倾冒险主义这套，给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你成为历史不可饶恕的罪人！你主持中央工作，家长作风，独断专行，唯我独尊，夜郎自大，你的罪行。当全党共诛之！”

赵容臭骂了李立三，向瞿秋白表了忠心，不仅在中共中央站住了脚，反而当上了中共中央审查委员。心中暗暗得意。谁知风浪又起，共产国际视瞿秋白为眼中之钉，内中之刺，共产国际要把瞿秋白赶下台，把王明抬上来。这下子张耘可耗子爬花椒树——麻了爪了。因为在李立三主政给王明的处分时，赵容对给王明的处分最为热心，而且是他的主谋，李立三听了他的话才下决心给王明处分的，如今王明要得势了，他赵容能不着急吗？但他赵容毕竟不同寻常，他立即决定改换门庭，效忠王明。一天深夜，赵容敲开了王明的住处，王明正在室内写文章。赵容见了王明，诚恳地对王明说：“绍玉同志，我来向你赔礼道歉了。”

王明对赵容没甚好感。特别是李立三当政之时，赵容紧跟李立三，如今赵容虽然来道歉了，可他对赵容的反感并没减。赵容见王明不热情，可仍然继续歉疚地说：“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给了你处分，这都是我水平不够，看不出山高水低来，通过这段

时间对自己的反省，我认识到自己错了，使你受到了冤枉。”他话头一转，又说：“给你处分那当儿，我也想不通，可李立三大权在握、金口玉言，我也没办法呀。”接着，赵容又把自己臭骂了一顿。

当时的王明，虽然对赵容反感，可他正想扩大自己势力，便摆出了大人不把小人怪的姿态，用好言语安慰了赵容一番，最后说：“过去的事过去就算了，我这人有嘴无心，从来不计旧怨。”

赵容见王明饶了自己，很高兴。接着赵容起劲地拍王明，他把道听途说的各方消息和方方面面人员对王明的评价，都告诉了王明，有的还是他自己编造的。王明听了很高兴，也更对赵容有好感。在四中全会召开时，王明让赵容作会议记录。赵容虽不是代表，可也够荣耀的了。赵容除了巴结王明，对王明身边的人也进行了拉拢。他看到王稼祥受到米夫的尝识，就向王稼祥套近乎。王稼祥与赵容曾同在上海大学读过书，是同学，当时王稼祥不起眼，赵容也就没把王稼祥放在眼内，如今王稼祥今非昔比，赵容就向王套近乎了。

这天，在一条小路上，赵容笑眯眯地迎着王稼祥走去，到了近前，他用山东话说：“老弟，你怎么硬(认)不得我了？我还是你的学兄呢！”他见王稼祥仍然想不起来，又自我介绍说：“我叫赵容，当年在上海大学读过书，那时叫张耘。”

赵容这么一说，王稼祥才依稀的记起这个张耘来了，不由得惊奇地问：“你怎么连姓都改啦？”

赵容说：“干革命脑袋都可以不要，换个名字又算啥？”

王稼祥当时也没说甚，也没把这个赵容放在心上，谁料想，就是这个赵容，后来又几次改名换名，易装换色，像条游蛇一样缠着王稼祥，最后，连生命都被此人缠死。这个赵容就是于1933年又更名的康生。

王明对赵容好感之后，将其由中组部秘书长晋升为组部部长。赵容——后来的康生自此大权在握，渐露出了其峥嵘之相。

何孟雄之死

米夫凭借手中的权力，将一不会耕田，二不会做工，三不会打仗，四不会做地下工作，年仅廿七岁的王明扶上了中共领导层的高位，向忠发虽然是总书记，因其文化低、头脑简单，不过是个聋子耳朵——摆设。向素讲江湖义气，四中全会上，瞿秋白等被罢官，而米夫却将其留下，使向对米夫感激涕零，这样，向对米夫和王明之语，更是言听计从。

但是，中共的领袖们，并非都是向忠发之流。从四中全会开始，反对米夫、王明及王明小宗派的浪头就接踵而来。缘为米夫破坏了中共内的民主，用高压手段抬王明，压制了不同意见。

六届四中全会闭会不久，海总党团即发表了反四中全会的决议案。接着，全总党团、江苏省委外县委员会、苏准会全体工作人员、济总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泸中区委等都先后发表了反四中全会决议案和声明。

反对四中全会最激烈者，仍为何孟雄与罗章龙。1月8日，即四中全会闭会的第二天，何孟雄、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徐畏三、王凤飞、史文彬、韩连会、张金保、袁乃祥、徐兰芝、邱泮林、沈先定、李震瀛等参加四中全会的代表，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会上通过了由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内称：

正当中国革命新的高涨的生长时期中，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进程是愈加重了我们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不幸，在这个时候党的中央立三路线发生了根本原则上的完全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共产国际的路线，造

成党中央领导的破产、革命的巨大损失！

……

因此，每一个布尔塞维克的党员，在今天应该有一种严重的责任，为肃清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勇敢坚决为着国际路线而进行布尔塞维克的斗争！

（一）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是完全破产了。……

（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比立三路线更加危险。……

（三）三中全会后有系统地重复做着许多错误继续行立三路线反对国际路线。……

（四）紧急会议是执行国际路线建立党的正确领导保证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必要步骤。……

（五）为紧急会议而斗争。……

（六）立三路线派及投降分子破坏紧急会议。……

（七）四中全会的经过。

四中全会的召集，原则上与党员群众们所提议的紧急会议完全两样。第一，参加会议的成分是由中央政治局自由指定的，主要的分子是中央政治局本身三中全会补选中央委员罗迈贺昌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长江北方南方各局的书记，这些都是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积极分子，他们占列席总人数的多数。第二，四中会议的举行，除上述诸分子之外，中央对其他被召列席的坚决反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及群众的干部同志是全守秘密的，他们在赴会之前是完全不知道会议的性质及会议的内容的，因此，引起各列会的群众中干部同志的愤怒与严重质问，并一致声明保留其对于紧急会议的意见。第三，

会议与讨论时间是非常短促的，全部会议以时间规定仅仅十五小时，每人发言不得十五分钟，因此有些同志因时间限制连第一次发言都没有允许，这完全表现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

（八）四中全会是没有解决党的政治上的组织上的主要任务，并且保证立三派的继续领导。

四中全会做了些什么呢？第一，中央政治局在四中全会中拒绝同志们提议在肃清立三路线原则之下讨论党的总任务及诸项重要工作问题，这些不可再迟延的重要议事日程是被调和主义的政治局始终忽略认为不足轻重的和不需要的。第二，十一月二十五日补充决议明明是用调和主义的观点说"三中全会一般接受了国际路线"，但是四中全会不敢明白指出，反说"二十五日决议又向国际路线走了一步"（紧急通告已宣布为除三中全会及二十五日决议，四中全会连这一点都不肯承认）。第三，及九十六号通告中央站在离开领导的立场，只是消极的承认错误，忘却了目前党的迫切的紧急实际任务，同时在分析立三主义来源上，在指出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上，在估量立三路线与调和主义等等地方，都犯着严重的原则上的错误。这些错误都是从调和主义来的，但是四中全会对于九十六号通告都认为完全站在国际路线的基础上是正确的。第四，正因为上述这些原故，所以四中全会对于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及组织路线实际上是赞助的，在决议案中虽然表示过要取消三中全会的补选，但结果三中全会的补选除罗迈贺昌之外，其余多数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分子更加了一重保证，并且在四中全会上公开拥护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积极分子，把最高指导机关的中央解释成为教育错误同志，试验那些几年以来从陈

独秀到现在一贯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地方，因此周恩来向忠发项英任弼时等仍旧继续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李立三瞿秋白仍使其隐藏中央委员会之内，对于毫无工作经验同样犯有立三路线的陈绍禹等使其加入政治局负领导重责。第五，在会场上很明显的中央政治局及其从属的上层机关调和主义分子的主张是一方面，坚决反立三路线的中央委员及下层群众干部尤其工人干部分子的意见是另一方面(几乎没一个例外)。中央是有计划的指定列席成分造成自己的多数，实际取消会场的民主，垄断选举并加反对者以种种罪名(如"反国际""右倾""取消派""暗探""小组织倾向""无原则派别纠纷"等等)。

(九)反对四中全会要求在共产国际正确领导之下召集紧急会议。

四中全会的结果，政治上是调和主义的继续，我们认为不是国际路线而是米夫曲解国际路线，并且米夫自己站在派别观念上故意制造派别，造成党的纠纷。……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展，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实际上阻碍了国际路线的正确执行及反立三路线运动的进行。因此，我们应站在国际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立即推翻他们的全部决议，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并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要求国际正确的代表领导坚决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成立临时中央，主持全国紧急会议，解决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迫切问题。只有在紧急会议中产生新的中央，由他召集和主持第七次代表大会，才能保证第七次大会的真正胜利。我们反对四中全会产出的调和主义的中央的领导，反对他们召集和包办的第七次全国大会。

（十）拥护共产国际要求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

现在立三派及投降分子陈绍禹等小组织是到处继续造谣诬蔑恐胁欺骗那些积极反立三路线反四中全会的同志，他们最主要的借口便是说“四中全会是国际领导的，反四中全会便是反国际”，这种说法正如李立三及其党徒在三中全会时对于当时反对三中全会同志的诬蔑同一口吻。我们知道当时国际代表领导三中全会犯有错误，他曾经反对“把立三路线和国际路线对立”，又说“党的路线与国际路线相适合的，从来没有两条路线”。我们是曾经反抗过这样错误的，并且现在已经证明我们这种反抗正是为忠实国际路线而斗争。这次米夫领导的四中全会是其在六次大会时附和右派布哈林调和主义的立场及其私人派别的成见，完全抹杀党员群众的意见，重复着做出严重错误，显然是违反共产国际的原则，这是毫无疑义的，因此，只有坚决的要求国际撤换他的职务，纠正他的错误，才能使肃清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障碍彻底解决。

（十一）号召全国团的同志为反四中全会召集紧急会议而斗争。……

（十二）反对斗争中的不正确的倾向。……

随后，“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又发出《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内称：

中央包办四中全会的行为，是污辱了党的光荣历史，是比三中全会更糟糕的会议。四中全会是拒绝了同志的提议，是抹煞党员群众的意见，保障着三中全会及其后的补充决议，九十六号通告的错误，是用委派命令制度，造

成立三派调和派自己的多数。四中全会是专为巩固立三路线调和主义领导而召集的。

米夫原想他用高压手段可将中共内部不满者压下，哪知不服者甚众。罗章龙、何孟雄等公布了“报告大纲”后，米夫为平息众怒，遂于会后，立即召集了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四中全会代表团”成员开会。米夫也无非吹王明如何如何好，在中共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最高，要何、罗等人尊重王明，支持四中全会。何、罗等自然不依，米夫见何、罗固执己见，大怒，怒挑双眉道：“自此之后，谁反对四中全会，谁反对陈绍禹同志，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应受到处分，以至开除党籍。”

会议双方不欢而散，米夫为使王明稳坐中共高位，击垮各方反对势力，又借共产国际虎皮。米夫立即向共产国际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况，以取得共产国际的支持。共产国际很快回电，表示对扩大的四中全会坚决的支持，这下子，米夫和王明都神气了，因为这样一来，反四中全会即是反党反共产国际的。

1月10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中央常委。

接着，王明即在江南省委向何孟雄发难。他凭借手中之权，将忠于自己的陈昌浩、李竹声、殷鉴、朱阿根、潘向友、焦明之、夏采曦调到江南省委；凡不听自己调遣的，都调走或撤职。时陈昌浩到沪东区委、朱阿根到沪西区委、殷鉴到沪中区委、焦明之到闸北区委，夏采曦到沪南区委。王明采取的另一个手段是，凡不听自己话的，一律停止发给生活费，这样迫使一些人屈首服从。1月11日，王明召开了江南省委扩大会议，米夫亦参加。会议开始，米夫首先传达了共产国际对四中全会的肯定。接着，王明发言，王明那小白脸一沉，尖着嗓门说：“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在伟大的米夫同

志领导下召开的，米夫同志高瞻远瞩，排除了'左'右的干扰，尤其是右的干扰，使大会开的十分成功。但是，以何孟雄、罗章龙为首的右派分子，对党、对米夫同志、对共产国际，怀有成见，公开的、私下地反对四中全会，发表了什么什么决议，这是他们长期对党不满的暴发，是个人野心的恶性膨胀。何孟雄与罗章龙同流合污，他们是一对老机会主义者，尤其是何孟雄，已成了江南省委发展的一大障碍。"王明说到这儿，提高嗓门道："我现在宣布，何孟雄及其团伙的一切活动，都是非法的。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同何孟雄的非法活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接着，王明又宣布：凡是参加何孟雄组织的活动的党员，要立即退出，并进行检查，否则一律开除出党；对何孟雄等正在使用的一些机关和宿舍，省委就此撒手不管，并另外建立机关，不与何发生关系；江南省委立即停发何孟雄等一切生活费和工作经费。

对于何孟雄，王明采取了"穷追猛打"的手段。1 月 13 日，王明又召开了第二次扩大的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会前王明即以安排停当，会上，仍由王明作报告，内容无非是骂何孟雄是一贯的右倾，是老机会主义分子，要对何的反党进行揭发，尤其揭发何与罗章龙的关系。王明于会上大骂何与罗是一丘之貉。在这个会上，通过了王明起草的拥护四中全会，反对何孟雄的决议。

1 月 15 日，米夫、王明向中央全党发出了《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内称：

> 全党同志们！
>
> 在敌人燃烧我们苏维埃区域与红军的烈火中，在国民党军阀与帝国主义积极进攻苏联的准备中，党经过了共产国际的同意，召集扩大的四中全会，整顿了党的斗争行列。
>
> 扩大的四中全会一致的接受共产国际的观点，这个

观点认为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的革命政策是根本不相容的。在无情的自我批评精神之下，指斥了三中全会用外交手腕掩护着立三路线的企图。四中全会严格地指斥三中全会后中央政治局的延缓与阻碍党走向健全道路的一切动摇与调和。现在党的领导机关已经改造了，新旧干部中最好的成分与许多新的工人同志吸引到党的领导中来；这样，在组织上来创立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保证。四中全会已决定愈快愈好的妥当的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扩大的四中全会严厉地反对郭(葛)妙根、何孟雄、彭泽湖等同志利用反立三路线斗争，来拥护右倾机会主义或无原则派别斗争的企图。在这里，扩大的四中全会完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只要我们无刻不要忘记右倾危险，不要忘记公开的暗藏的取消派与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主要危险的时候，我们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才能更有效果。

……

扩大的四中全会号召全党，反对肃清立三路线，执行国际路线。但同时要用一切力量反对机会主义者与取消派，他们反立三路线的斗争只是一句空话，只是企图把党送到右倾的泥坑中去。

全党同志们！

在对于共产国际铁一般的忠实中，密切的坚强的巩固我们的队伍。对于只是口头上反对立三路线，而实际上继续机会主义与消极的人们，不要再容忍下去了。我们要揭露掩护在反立三路线斗争下的努力右倾活动的企图。

……

反动势力强横的向党进攻，“左”右倾取消派采用分

裂的企图与混淆的手段来反对党，来拥护反动势力的进攻，但是中国党在共产国际指导之下，是能够打破这些进攻与勇敢的前进的。……要立刻检阅与改善党的一切组织的动员群众的能力！在反对右倾危险的斗争中，肃清一切派别倾向，彻底克服立三路线以及对于他的调和态度！

对于共产国际，要铁一般的忠实！

王明向中共全党发出了《四中全会告全党同志书》后，对何孟雄的"斗争"仍不罢手。王明把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召到一起开会。王明说："要打倒何孟雄，必须揭发何与罗章龙的关系，这样才能打中何的要害，才能将何打倒。"说到与何观点相同的人时，王明把牙一咬，恨恨地说："蔡博真他们几个老资格的区委书记，同何孟雄穿一条裤子，而且屡教不改，要将他们清除出党。"

米夫、王明对何孟雄等持不同政见者的"穷追猛打"，欲置死地而后快的做法，何孟雄等人非常气愤。遂不断开会，商讨如何与王明小宗派作斗争事宜。1月17日，何孟雄于东方旅社31号房间内召集部分反王明宗派的干部开会。时参加会议的有林育南、李求实、欧阳立安、龙大道、冯铿、柔石、殷夫、胡也频等人。叛徒唐虞（王掘夫）向敌人告了密。租界巡捕房的暗探奉命化装成茶房走进房间，接着七八个持枪便衣涌入室内，将何孟雄等所有开会的人当场逮捕。之后，暗探们又于此处埋伏了数天，又逮捕了一些人。何孟雄等人先被拘留在老闸捕房，很快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公安总局，数日后又转移到淞沪龙华警备司令部。

在何孟雄等被捕之前，中共中央特科即得到了敌人要对何孟雄等下手的消息。

中央特科是怎个机构？原来，中共中央在1927年于汉口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确定了在白区建立秘密党的组织系统和工作关系的基本原则。10月初，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汉口迁到了上海。时

上海华洋杂处，政出多门，市区人口复杂，住房容易找到。然上海又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云集之处，租界里巡捕、包探遍地，捕房林立，统治森严。在国民党统治的华界，又驻有大批军队、宪兵、警察，设有特务机关，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就成为这些军警宪捕捉的最大目标。

1927年11月，周恩来于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来到了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军委工作，他根据中共中央首脑机关的需要，建立了中央特科。中央特科是中共中央的情报工作和保卫工作机关。其下设总务、情报、行动、无线电通讯四个科。由周恩来、顾顺章、向忠发领导。其活动范围，主要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同时兼及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所在地天津、香港、武汉等重要城市。其主要任务是选派忠诚、坚定、机智、果敢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及时了解敌情，侦知敌人的行动计划，组织营救被捕人员，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地下工作同志的安全，惩处罪恶昭彰的叛徒、特务。

话转回头。在叛徒唐虞告密、租界巡捕还没动手抓何孟雄等人时，中央特科已获情报，遂急报王明。王明得知后，却不准特科人员去通知何孟雄等立即中止会议，迅速转移，而是阴笑了一声，随后对左右说："告诉中央特科的同志，不要去东方旅社，既然敌人已经发现了何孟雄他们，特科若再去人，也会被敌人抓走。"

当何孟雄等被敌人抓捕，消息传到王明那儿时，王明正主持召开中共江南省委会议。到会者听了，无不惊得目瞪口呆，王明却冷笑一声说："天闹有雨，人闹有祸，闹吧，如今闹到了监狱里，看他们还再闹什么。"王明眉毛一挑，恶狠狠地说："何孟雄如此结果，是早在预料之中的，是他们反党反中央反国际搞分裂的必然，是咎由自取！"王明说到这儿，把桌子一拍，大声说："何孟雄等一伙是在进行反党活动中被捕的，这与其他同志在工作中被捕，性质有所不同。"当天，王明又下令将何孟雄等人开除了党籍。

何孟雄在狱中仍坚定自若，坚决反对分裂党的错误行径，并同林育南、李求实联名给共产国际写信，揭露王明的宗派主义活动。还嘱告狱外同志说，坚持党内斗争，待以时日，不要分裂，这是最要紧的事。时龙华看守所的中共秘密党支部按照王明的指示，拒绝接受何孟雄等人党的关系，不让他们参加支部活动。何等对此，气愤异常。

2 月 7 日晚，何孟雄、林育南、殷夫、柔石、胡也频、李求实、欧阳立安等二十六人（一说二十四人）被秘密枪杀。时何孟雄年仅三十三岁。

何孟雄等被敌杀害使王明去了块心病，然其对何的批判仍没放过。其对左右说："何孟雄等虽然死了，但这些人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还要彻底清算。让全党同志从何孟雄等被捕牺牲中得到教训！"

接着，王明给何孟雄罗织了若干条错误，并指示省委宣传部根据何的"错误"，组织人写批判文章在党内刊物上发表。与此同时，王明还下令不准为何等人开追悼会。也许是王明怕何等人阴魂不饶他，又于 1931 年写了一首七绝："悼'二七'龙华死难烈士"，标题是：《而今"二七"》。其诗曰：

二六英雄同遇难；
而今"二七"更怆然。
育南师辈孟雄友，
泪洒春风泣杜鹃。

在诗的第三句，王明还写了注，为：此处指林育南与何孟雄二同志以及其他同志。仅此一斑，王明为人之阴险，足可见矣。

直到 1945 年 4 月 20 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何孟雄等才得到平反。决议内称：

> 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的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组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的英雄气慨，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

何孟雄等人的遗骨，直到全国解放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从一个掘墓人那里，打听到何等人遗骨埋藏的地点。为了纪念这些死去的烈士，遂在龙华的草坪上，建了一座烈士纪念塔，将遗骸移葬于此。何等人的姓名，均刻于碑文上。时有欧阳立安的母亲陶承，含泪写诗一首，悼念其子与何孟雄等。其诗为：

烈士牺牲二十秋，
永垂不朽精神留，
英雄姓名二十六，
忠肝义胆耀人寰。

我儿英勇最少年，
才离母怀便战斗。
聪明似父气如虹，
誓忠阶级不惜身。
匪帮不敢见天日，
半夜囚车出囚室。
枪声歌声震龙华，
热血滋养自由花。
血凝滴滴雪花碧，
骨列根根如剑戟。
墓园他日来凭吊，
我心痛亦我心喜。

罗章龙被开除党籍

前文述过，四中全会之后，何孟雄同罗章龙坚决反对四中全会决议，反对米夫和王明，罗于13日召开了有十三人参加的"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发出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通过了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在这个会上，推选了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王凤飞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干事会，即"中央非常委员会"，也就是后来人们通称的"第二中央"。

罗章龙乃湖南浏阳人，1896年生。1917年毕业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次年冬参加发起新民学会，后入北大哲学系。参加发起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为北大支部负责人，中共北方区委员会的组织和领导成员之一，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部的主任。在此期间，罗常去天津开展运动，参加领导了滦五矿

工人大罢工和“二七”大罢工。中共“三大”被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央秘书和宣传部长。中共“四大”为候补委员，“五大”为中央委员，“六大”又为候补委员。负责中央工委和全总党团活动。罗早年曾用“文虎”名写文章。北大时学名为“罗璈阶”。在长沙一师就读时，曾用“纵宇一郎”名与毛泽东通信。1920年先后用“无我”笔名，1928、1929年常用“沧海”、“沧的”笔名，在中共内的化名为“柏格森”、“晕云”。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时，用“彼得罗夫”的化名。而其最常用的笔名是“章龙”，故人皆呼之为“罗章龙”。

罗章龙等开罢反对四中全会的代表会议之后，即将其主持起草的“报告大纲”铅印成小册子，通过其所掌握的全国总工会系统下发到全国各省总工会所辖之地。时王克全正拟成立第二江苏省委，因而这小册子发的更广泛，连在国民常军队内的地下支部都收到了。与此同时，罗章龙派了张金刃（张慕陶）、韩连会、王仲一等到顺直，唐宏经到满洲，李震瀛到香港等。王克全、徐畏三等带人强占江苏省委机关，未果，遂宣布成立第二江苏省委。罗章龙所派出的人，四处串联，加紧分裂中共的活动。周恩来奉王明把持的中央之命，找到罗章龙、王克全、同他们进行谈话。周要他们停止反对四中全会和分裂的活动。罗章龙哼了一声说：“王明没有罢你的官，你就来作说客，来和稀泥了。”说罢，把手一挥，怒道：“我不和你谈。”

这时，王克全亦一脸怒容，大骂周恩来是两面派，没有党性，没有原则。周恩来对罗、王二人说：“你们何去何从，五日之内向中央表明态度。”说罢，扭身而走。

周恩来遂把罗、王的态度，向米夫、王明做了汇报。米、王大怒。五日后，罗、王对中共中央不予理睬。1月27日，即何孟雄等被捕十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并决定开除王克全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其“决议”内称：

在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关于全总党团及江苏省委决议等发表后，右派小组织以罗章龙为领袖的活动，不仅没有停止，并且公开的发表反党的小册子——《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中央政治局认为这一个问题更加严重，特成立以下决定：

一、这一反党的小册子，是右派小组织反国际的整个纲领之最具体的表现，而为罗章龙所主持的。罗章龙在这小册子上，学尽取消派反党反国际的口吻；第一，他是公开地"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所以他说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展，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包办式的会议"，而继续"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成立临时中央，主持紧急会议"。但是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下，在国际代表领导之下而为国际所批准召集的。四中全会的结果，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所以，反四中全会即是反党反国际的；并有罗章龙所继续号召的紧急会议与主张成立临时中央，更是露骨的分裂党的第二党的主张。这样，他便进一步的反对国际代表，"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国际代表，但是，国际代表百分之百的执行国际路线来指导中国共产党的，所以反国际代表实际上即是反国际——这是陈独秀以及一切反共产主义"左"右叛徒所惯用的把戏。第二，他更等于向敌人公开告密，说四中全会是国际代表等等领导；这简直是反革命的行动，因为这种宣传，除掉便利于敌人的巡捕房、警察局外，再没有其他意义。第三，……他说"中央的威信是丧失的干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早已完全破产"，恶骂中央"暗中秘密布置四中全会……证明中央所采用的方法是与国民党官僚黄色工贼

同其性质”，所以他主张“立即停止中央行使职权”，“根本改造政治局”(即是全部撤换)。……他认为中国党六次大会是在右派布哈林领导之下采取了调和立场的；……

二、这一反革命小册子的印行，完全是罗章龙把持全总党团机关用以进行其反党的右派的小组织之最具体的产物。同样，在一月以后，罗章龙主持的全总党团，除掉成立1月1日的右倾决议案外，并在1月17日公开号召与领导全总党团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实际上就是反对国际；在组织上派遣被他煽动的同志到各省(如满洲、河北、山东、广东等省)去进行反党的右派小组织活动，最后他还抵抗中央政治局1月20日决议的执行，丝毫不改变他的反党行动，而且还鼓动全总党团同志拒绝移交全总党团的工作。这一切都表示他没有丝毫诚意来在全总党团执行国际路线，而是在假的反立三路线旗帜之下，利用全总机关作为进行第二党的组织与活动的大本营。

三、罗章龙这种反党反国际反六次大会的活动，决不是偶然的；他远在六次大会前陈独秀时代和两湖秋收暴动时候，就犯了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四中全会上，他领导了少数同志，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国际路线，并声明退席。会后，他又在四中全会决议案修改委员会上举手反对四中全会决议案，所以他结果使拥护与取消派一类而已被开除的王仲一来参加紧急会议。……

四、根据以上这一切反党反国际反六次大会之反革命的行动，罗章龙是一刻不能停在党内与无产阶级队伍中了。中央政治局特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与永远的开除罗章龙的党籍，并报告共产国际请求批准。

五、中央政治局特要求全党同志在深刻的认识罗章龙这一类反党的行动中，必须坚决的与罗章龙右派小组织作无情的斗争。要从思想上到组织上完全与他分开。并且与他完全隔离起来。中央政治局更号召被罗章龙右派小组织所欺骗所蒙蔽的同志，应立即醒悟与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而回到党的路线上来，并且要向全党公开声明这一右派小组织的一切活动的经过与罪恶。

六、这一决议一直发到支部去。……

中共中央在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同时，亦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凤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数日后，又将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唐宏经、韩连会、沈先定等开除党籍。中央各省、市、各区委也纷纷开除李震瀛、吴雨铭、钱静安、鲁铁成等人党籍。

2月13日，上海沪中区委会议作出决定，将蔡博真、彭泽湘、王福环、徐松明、小刘、王伯堂、周舫、小张(交通)、丘队影、刘建等十一人开除党籍。

经王明、米夫的一气打击，罗派的成员多纷纷发表声明书，宣布退出罗的"中央非常委员会"。

罗章龙被撤销了中共党员的职务之后，由女工出身的中共党员张金保接任了"中央非常委员会"的主席之职。张随即召开了会议，通过了《非常委员会致中共中央信》，内称：

中共非常委员会经2月13日全体会议决定宣布解散。特此通知，希望即派人前来接受。

张金保也以"非常委员会主席"名义，致信中共中央，表示了悔过。

然王明决心将罗派人物置死地而后快，他不允许这些人悔过自新，将张金保亦开除了党籍。并说张金保的“悔过声明”，是向党发起的新的进攻。

2月22日，米夫、王明正式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了四中全会的经过。报告分两个部分，共讲了十二个问题。第一部分中，把个王明夸了个天花乱坠，说王明是伟大的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同李立三作斗争的首屈一指的英雄。是中共的希望。在第二部分中，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一个半月中“关于实际工作的布置”，也无非是讲斗垮了瞿秋白、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对派，取得了斗争的“伟大胜利”。

3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召开了第十一次全会，执委会主席曼努伊尔斯基在执行中称：

> 在中国，革命危机加深的实际表现是，在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这是当前中国革命高涨的决定因素，它使中国站到整个殖民地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前列。……依靠动员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极其广泛的新阶层，在深入和扩大革命高潮方面取得了成就，这对落后国家的工人运动，正在起着并且将继续起着越来越大的革命化影响。

到了8月2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再次发表决议，对四中全会，全盘进行了肯定。内称：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扩大全会，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击退了右倾分裂派和取消派的进攻(因为这些人企图利用一部分工人干部对李立三的错误和对其他错误的调和

态度的不满情绪，来达到反党的目的)，同时沉重地打击了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观点以及对其观点的调和态度。四中全会在党的进一步布尔什维克化的事业中前进了一大步，修正了政治路线，更新了党的领导，从而使党的全部工作开始有了转折，这有利于实际而彻底解决党所面临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党在四中全会期间和四中全会以后立即采取一些组织措施(改造政治局、开除罗章龙及其两名同伙出党，因为他们出版反党小册子并进行分裂活动)，以期保证贯彻党的路线和团结党的队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认为，这些措施是必要的。

数十年后，罗章龙在谈到关于分裂中共和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事宜时说：“因为我们都是受过处分、开除党籍的人，当革命工作停顿，大家很着急，为了把工作进行下去，才成立了临时中央非常委员会的。”

罗章龙被中共开除党籍之后，便不再问政治。嗣后去河南大学、西北大学任教。解放后，又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任教。

瞿秋白之死

米夫、王明利用把持的中共中央大权，“借刀”将何孟雄等置于死地，将罗章龙等开除中共，与此同时，亦对瞿秋白进行了无情的打击。

前文述过，王明与瞿秋白，早在莫斯科时，就已做了仇。而且瞿秋白对米夫也看不上眼。当王明与李立三作对头后，瞿秋白虽然批评了李立三，但对王明，依然如故，所以，王明对瞿秋白的恨，不次

于对李立三之恨，而且是宿恨新怨。

四中全会上，王明、米夫对瞿秋白采取了决不相容的态度，撤销了瞿党内的职务。四中全会之后，何孟雄、林育南、罗章龙等坚决反对王明上台，这些人也找瞿秋白，欲拉瞿加人反对四中全会的势力中去。虽然瞿秋白没为何、罗所动，但王明仍得到了消息，并为此疑神疑鬼，老是寻思瞿要同何、罗站在一起，反对自己。

时瞿秋白身患肺病，心力交瘁，已无力再与王明、米夫争个高低上下，遂于 1 月 17 日写了《声明书》，书中把自己骂了一番。《声明书》是写给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虽然如此，王明、米夫犹觉不够，在开除罗章龙党籍的当天，亦作出了决议，警告瞿秋白“必须真正认识自己的错误”，要瞿秋白“须写声明书表明积极反右派与立三路线的政治态度”。

瞿秋白已看透了米夫和王明，一个是中共内的“小人”，一个是“洋小人”，自己虽有与其争斗之心，奈重病缠身，只得长叹一声，于 1 月 28 日，再次违心写了份《声明书》。在这份声明书中，再次往自己脸上抹黑，说自己在莫斯科时就支持反王明的“中大”学生李剑如等，回国后也没把王明看在眼内，这更是绝大的错误，表示：

> 今后一定要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来为党为革命而奋斗。

时瞿秋白在《声明书》中称自己是“一个在病中不能多写的人”。他再反复表态之后，又于《声明书》中称：

> 一、我完全抛弃自己的一切错误和离开国际路线的政治立场——三中全会至四中全会间之调和主义立场，而站在共产国际路线的立场之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之下，来为党为革命而奋斗。二、反对立三

路线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反对罗章龙等右派小组织及其调和主义的斗争，揭破并打碎立三主义者和右倾小组织的联合企图，是现在为着党的布尔什维克及真正执行国际路线所万分必须的。三、我的调和主义的错误，是在莫斯科代表团对于"学生问题"的错误相联系的。当时对于莫斯科学生中反对"中大"支部局的李剑如等同志，对于这个小组织，我采取了保护的态度，以至不但不能反对派别斗争，反而自己陷于派别斗争的泥坑。

王明、米夫都是心毒手黑的小人，虽然瞿秋白已向他们讨饶，但二人已将瞿视为肉中之钉，眼中之刺，自然饶不过他，继续进行无情的打击。2 月 2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专门作出了《关于 1929～1930 年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的决议案》，内称：

当着中共代表团还在国际的时候，秋白同志曾以"中大"学生中反支部局的派别行动来影响过去的中央政治局，所以当时中央政治局在立三路线的领导之下，对于陈绍禹等四同志所施的压迫制度，完全是站在代表团多数的派别观念上做成的错误。"……秋白同志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对国际路线的两面派态度，对国际代表的极不尊重的态度，决不是偶然的，和他的以右倾政治意见有密切关系。

王明、米夫一伙在政治上将瞿秋白打倒，又在经济上卡瞿秋白，时瞿重病缠身，王明等却停发了他的生活费，每月仅象征的给十几元钱。为上海工人最低的工资。这些钱瞿仅能糊口，无法治病。然瞿对共产主义信仰仍坚定。身体稍愈，即抱病投入文化战线斗争，与矛盾、冯雪峰、鲁迅等人战斗在一起。时瞿主要翻译苏联的文

学作品。住在了冯雪峰的好友谢澹如家中。谢爱好文学，亦同情革命，其在一钱庄做事。瞿秋白同妻子杨文华就住在这里——上海南市紫露路68号。在这里，瞿秋白不仅翻译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及许多重要的论文和杂文，还同“左联”发生了联系，并与鲁迅先生建立了亲密的战斗友谊。“左联”为三十年代于上海兴起的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继承和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成立于1930年3月2日。瞿秋白以“史铁儿”等笔名于“左联”办的《大众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提出了革命作家要向群众去学习。谓：

> 现在决不是简单的笼统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而是创造革命的大众文艺的问题。这是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无产阶级的五四”。

1932年11月间，瞿秋白和妻子杨文华住在鲁迅家中。其在鲁迅家中住了不久，由于敌特追踪甚紧，瞿不敢多停，又转移了数处。然瞿与鲁迅二人关系，愈发密切。杨文华在后来撰写的《忆秋白》中称：

> 由于鲁迅的关怀和帮助，秋白在被通缉的上海没有被捕，在逃难时不受饥饿。鲁迅亲自替秋白找房子，送书籍文具，最令秋白感动和喜欢的，就是从鲁迅那里获得外国文艺作品，其中有些是曹靖华同志要鲁迅转秋白的。《海上述林》译文的原著，是鲁迅送他的礼物，鲁迅自己的作品，也给予秋白极大的安慰，但由于反动的国民党的压迫，使秋白连看书的自由都没有，往往使他最宝贵的书来不及从敌人破获的住所中拿出来，一批又一批地失去。

后来，到了 1934 年 1 月间，瞿秋白奉王明主持的中央之命，由上海到江西的中央苏区工作。2 月抵达瑞金。时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人民教育委员，即教育部长，同时，亦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是年 10 月，中国工农红军因王明"左"倾路线的指挥大败，万般无奈，只得离开江西的根据地，向西败走。瞿秋白要求随队西行，时王明在中共内的代理人博古、李德坚决不同意，瞿不得成行，而是被留在了江西。红军主力撤走之后，国民政府即派顾祝同、蒋鼎文率本部人马十万，向中共中央苏区实行全面"清剿"，鉴于形势之紧张，时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接受陈毅建议，决定疏散干部，决定瞿秋白回上海治病。1935 年 2 月，瞿秋白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宋希濂部所俘，杀害于福建长汀。此等后话，不再重提。

王明的"左"倾理论出笼

王明得到米夫的支持，将何孟雄、罗章龙、瞿秋白等劲敌打垮之后，其终于控制了中共大权。时中共领导机关组成人员为：

中共中央总书记　向忠发

中共政治局兼江南省委书记　王明

中央宣传部部长　沈泽民(到了 1934 年 4 月，由张闻天继任)。

中央组织部部长　康生

中央军事部部长　周恩来

中央职工部部长　卢福坦

中央妇女部部长　周秀珠

中央农民部部长　张闻天(1931 年 5 月重建)

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　王稼祥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林育英

团中央书记　博古

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　罗登贤

向忠发虽为总书记，不过是聋子耳朵——配搭，中共的真正领导大权，自此旁落于王明手中。王明还继续恢复和发展了李立三的"左"倾政策，而且比李立三之"左"倾更甚之。其从"左"倾立场出发，向中共全党发出了第一号令，即《中央通告第　　号(原件没有时间——引者注)(四中全会后第一号)——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内称：

> 目前的事实：在国民党统治和帝国主义残酷侵略的条件之下，全国的经济政治危机只有日益深刻，工农劳苦群众只有更加贫困，一切改良主义的口号都将成为欺骗，而新的军阀战争，也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革命的群众斗争是高涨的，尤其是农民土地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将向前发展，而苏区与红军的存在也将更加推动着革命运动的前进。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必须坚决执行进攻的路线，这不仅能击破"围剿"，破坏反革命的武装势力，保持住已得的胜利，而且还可以更加扩展苏维埃运动。

王明错误地判断了中共所处的险恶。王明上台之时，正是蒋介石春风得意之际。1930年5月爆发的蒋、桂、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支持下，取得了胜利，阎锡山逃到大连，冯玉祥隐居山西，李宗仁、白崇禧等新桂系逃到了广西。蒋介石掌握了国民政府大权后，即下令向各地红军发动了攻击。1930年12月，蒋介石以十一个师，十几万兵力，向各地红军发动了第一次"围剿"。1931年1月2日，蒋介石又令军政部长何应钦重组"陆海空军总司令南

昌行营”，由何任主任兼总司令，组织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蒋氏动用了二十万大军，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策，分四路大举进攻。亏得王明“左”倾路线还没完全控制红军，使蒋氏的“围剿”落空。到后来，当王明“左”倾路线完全控制红军时，红军彻底失败，此为后语，暂且不提。

王明等错误地估计了国民党力量之后，在其“左”倾理论上，气焰更盛，其写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成为其“左”倾路线的政治纲领。在这政治纲领中，王明提出了一系列错误观点，主要为：

一、在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提出“现在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有在坚决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彻底胜利”。

二、在革命的形势和中共的任务问题上，认为“直接的革命形势”，是很快在一省或几个省内成功，主张中共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采取“进攻路线”，看不到蒋介石的政权已经巩固。

三、轻视农村革命和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一味追求在大城市中搞武装起义。反对游击战争，强调红军要正规化。

王明的“左”倾理论出笼了，可要在中共全党内贯彻，必须有一大批、甚至所有的中共干部都要伏伏贴贴听王明指挥才行，正当王明思考如何培植自己的宗派势力时，这日，康生——此时仍为赵容，来到了王明住所。王明见了赵容，很高兴地说：“赵容，我正要找你。”

王明和赵容的一段相处，由于赵容很会投王明所好，不仅使王明改变了对赵容的印象，还对他特别好感。二人坐下之后，王明说：“赵容，如今大局已定，和我做对的已死走逃亡，可我总觉得，在中共内部，还会有人反对我，何孟雄死了，还会有张孟雄、李孟雄，罗章龙除名了，赵章龙、钱章龙还没除名，瞿秋白降职了，周秋白、吴

秋白并没降职，你说怎么为好？”

赵容说：“绍禹同志，我也正为此事而来。你若要掌握党的大权，必须把党内的有头脑的人搞垮，说穿了，就是不让那些有知识的人掌握党的要害，要搞‘领导机关工人化’，要突击吸收工人入党。”

赵容的主张，王明非常赞同，因为他王明已经尝到了甜头，向忠发当了中共总书记，而实权落在他王明手中，此法完全可以上行下效。

当下，王明同赵容经过一番计议，拟定了一份文件，这文件的核心是在各级领导岗位上，大都提拔工人当主官，而由王明的小宗派中人当“秘书长”。很快，中共中央的各级文件在提拔使用干部上，都冠以“社会成分”、“工人出身”，家庭出身越苦越吃香，越没文化越得到重用——到了1966年起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比这时更甚了。

与此同时，赵容这个“狗头军师”，又给王明出主意，要王改造各级领导机关。说白了，就是对中共各级领导“大换血”，凡不属王明小宗派团体内的，都撤职或调离，换成他王明的人。赵容、王明、还有米夫，三人商量来商量去，从1931年3月开始，便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送中央代表。赵容还向王明、米夫献策，对亲立三路线者，何孟雄派，罗章龙派、调和主义派打击不能手软。不仅在政治、组织上进行打击，还要在生活上制裁。王明、米夫均认为赵容的办法很好。当即下令，凡亲立三路线者，凡何孟雄派、罗章龙派，调和主义派的成员，不发或少发生活费。这样一来，使得许多人生活陷于极困难的境地。不少人只好靠典当活命，有的卖光了屋内东西，晚上睡在水泥地上，白天到难民救济处讨碗稀粥。有的到街头摆小摊。张金保后来的回忆当时情形说：

在无法生活情况下，有的同志把妻儿送回老家，有的

走头无路，竟想到山中落草，劫富济贫，当政治土匪。

唐宏经后来回忆说：

> 哈尔滨特委的两名成员，国为反对王明上台，虽然写了两次检讨书，承认所谓的错误，还是不给工作，停发了生活费。有一个青年学生，是一般党员，因为对四中全会有意见，写了三次检讨书。在交了第三次检讨书后，有人代表组织问他："你是真悔过还是假悔过?"他说"真悔过。"代表组织人说：'你要是真悔过，就去卸警察的枪，以表明你确悔过了。"这位青年同志结果去卸枪被抓走了。

对此种做法，赵容谓之"借刀杀人"之策。接着，赵容又向王明献了加强中央权力之策。并以中共中央文件下发。3 月 5 日下发了《中央关于发展党的组织决议案》，不久又下发了《中央关于全国组织报告的决议》、《中央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三个文件。

从 3 月开始，王明、米夫便有计划地向全国各地派送中央代表，让这些代表做为钦差大臣，去执行他王明的"左"倾路线。派了夏曦去湘鄂西中央分局任书记；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为中央代表团到中央根据地；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任分局书记；派曾洪易到赣东北。满洲、顺直、山西、青岛、河南、武汉等地，王明也都派了自己人去"换血"。对上海和江苏，王明连"毛细血管"都换了。这里把夏曦、张国焘情况作个介绍。

夏 曦 其 人

夏曦，字蔓伯（也作蔓白），曾化名芳侠。1901 年 8 月 17 日，出

生于湖南益阳县桃江镇。其父为晚年得子，因此，对夏曦很娇，便给他起名蔓伯，寓意是蔓草难除，愿他长命百岁。夏曦父为一私塾先生。夏幼时随父读书。十四岁时考入了益阳县立龙洲高等小学。因其聪颖好学，曾多次被评为优等生，两年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学术空气浓厚，聚集着一群胸襟豁达的有志青年。当时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都在这所学校读书，并成立了"新民学会"。

夏曦受新文化熏陶和新民学会的影响，痛恨军阀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思想日趋进步。"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传到长沙后，夏曦热情勇敢地走向了社会群众斗争之中。他先后参加了第一师范学生组织的"救国十人团"，维护国货，调查日货。时毛泽东和新民学会联合各界，发动了驱除张敬尧的群众运动，组织了驱张代表团，分赴省内各地和北京、上海、武汉等处进行宣传和请愿。夏曦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并和柳直荀等被委派在长沙组织通讯团。柳直荀十四岁时，即到长沙广益中学读书，住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教师杨怀中家，杨怀中乃杨开慧之父。柳、杨两家为世交，可谓"交情三日久，春色两家分"。杨先生思想进步，毛泽东、蔡和森等常在其家中，因此，柳直荀与毛泽东等关系很密切。由于毛泽东等同夏曦很好，柳直荀对夏曦也很尊敬。时夏曦在驱除张敬尧的斗争中，还和何叔衡先后前往衡阳，进行驱张活动。如此，夏曦被张敬尧视为"过激党"分子之一而遭到通缉。1919 下半年，夏曦加入了新民学会。1920 年 9 月，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在长沙成立，夏曦是该会重要成员之一。是年 10 月，毛泽东等在长沙筹建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夏曦成为湖南的早期的团员之一。1921 年秋，毛泽东等回湘建党，于同年 10 月 10 日正式成立了中共湖南支部，夏曦同郭亮在这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年底，共产国际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经毛泽东选拔，夏曦为湖南参加会议的代表之一。1922 年春，夏曦在第一师范组织了"崇新学社"，提倡研究

马克思主义，并经常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上发表演说。不久，夏曦担任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干事部主任。毛泽东和夏明翰也分别担任学联的庶务和编辑。在此期间，夏曦主编了学联的机关刊物《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1923 年 3 月，全国学生总会在上海召开全国学生大会，夏曦代表湖南学联，前往参加，他长于写作和宣传，在从事青年学生工作和群众运动的实际斗争中，还在《新民周报》、《救国周刊》等报刊上，发表了文章三十余篇。

全国学生大会开罢不久，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夏曦经林伯渠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为湖南省国民党党部湖南筹备处负责人。1924 年，夏曦担任中共湖南省区委员会委员。1926 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夏曦和毛泽东被选为后补中央执行委员。北伐军攻克长沙后，夏曦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中共"五大"以后，中 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调中央工作，夏曦继任省委书记。不久，长沙发生了许克祥兵变，即"马日事变"，在紧急关头，夏曦扔下省委而逃跑了。亏得柳直荀、郭亮等省委其他负责人的支撑，才使事变损失减小。中共"八·一"南昌暴动时，夏曦亦参加了起义。起义失败后，夏曦被中共中央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夏曦参加了中共"六大"。他开始入学时，是反对米夫和王明的，后来见米夫王明势大，遂投到了米夫、王明的怀抱。成了"二十八宿"之一。"二十八宿"是指"中大"中所谓的二十八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即王明、博古、王稼祥、张闻天等二十八个留学生，其中亦有夏曦，对于"二十八宿"，亦有"二十八个半"之说，谓当时在"中大"真正支持王明、米夫的人，共计二十八个半，还有一个年纪最小、个子最矮、观点又很动摇的共青团员，只算半个，故称之为"二十八个半"。对于夏曦的这段历史，杨尚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称："夏曦开始还和王明等作斗争的，但后来王明一伙攻他，把他压服了。"

夏曦于1930年回国，被中共中央派往江苏省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因他“效忠”米夫和王明，次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共中央委员。同年3月，夏曦被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派往湘鄂西苏区，成立了以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临时省委。夏曦在接到王明的指令后，当即同妻子谭国甫一起，动身赴洪湖苏区，也就是湘鄂西苏区，夏到洪湖又如何？此为后话，暂且不提。

张国焘其人

这里再把张国焘的情况，详细做个介绍。

张国焘，字恺荫，又名特立，1897年出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上栗市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其祖父一辈六兄弟中，有四个是有“功名”的，其父为清末最后一届省试录取的拔贡，民初毕业于浙江法政学校，出任浙江象山县知事。

张国焘幼时于萍乡县上栗市读私塾。少年时就读于萍乡县小学，时为1908年春。萍乡小学堂乃为废科举兴学校之后成立的，教师思想较新，张国焘从这些教师口中，知道了世界上有过拿破仑、华盛顿、瓦特、牛顿、卢骚等人。知道了地球是球形的。

辛亥革命之后，张国焘考入了萍乡县立中学。时县立中学由维新派主持。两年后，张又抵南昌，于心远中学继续读书。心远中学为教育家熊有锡所创办，熊与严复为好友，因而严先生之《天演论》，成了张国焘最用心读的一本书。

1916年7月，张在其父支持之下，赴北京投考北京大学。时蔡元培任北大校长，陈独秀、鲁迅、胡适、沈尹默、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高君武等著名人物，都荟聚于北大。张国焘以优异成绩被录取。翌年春，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主编《新青年》月刊。张国焘受其影响很大，成为北大同学中最先拥护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张国

焘在理工预科读了两年后，于 1918 年转入北京大学理学院学习。

1919 年 1 月，在李大钊指导下，北大学生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许德珩等人组织了“国民杂志社”。同年 3 月，邓中夏等又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当时的北大，成为各种新旧思潮汇集和激烈斗争的场所。张国焘忽而赞同科学民主，忽而表示信仰社会主义，忽而又狂热地追求无政府主义。而其尤热衷于搞社交活动。

1919 年 5 月 4 日，爆发了“五四”运动。张国焘被时代潮流卷入，由他主持北大的讲演部，向市民们宣传爱国主义。6 月 2 日，其与十几名学生在天安门讲演被当局所捕，两天后被释放。

1920 年秋，李大钊、张申府在北京发起建立共产党，与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等组织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张国焘亦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邓中夏等到长辛店搞工运，成立了全国最早的工人俱乐部，张国焘经常到这里的子弟学校讲课，同时宣传进步思想。

1921 年 7 月，张国焘以北京共产党小组的身份，到上海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参加大会的有王烬美、邓恩铭、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毛泽东、何叔衡、周佛海、陈公博、刘仁静、李达等十二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亦参加了大会。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会议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期间，根据马林的建议，选举了由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等人组成的起草委员会，起草共产党的纲领和大会决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局。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陈为中央局书记，李为宣传主任，张国焘为组织主任。会后，张留在了上海，于中共首脑机关工作。

这年秋天，中共于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出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不久，其赴俄国出席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张国焘受到了列宁的接见——其成为中共的中委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四个月

后，张回到了国内，相继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和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7月16日，中共第二次代表大会于上海召开，时出席会议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张太雷、高君宇、邓中夏、施存统、王烬美、邓恩铭、向警予（女）、项英等十二人，代表全国一百九十五名党员。张国焘于会上作了关于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况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邓中夏、李达、向警予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委员、蔡和森为宣传委员、向警予为中央妇女部部长。

1923年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决定2月1日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中共中央派张国焘出席指导。2月4日，京汉铁路大罢工爆发，张国焘成为这次罢工的最高指导者。

"二七"大罢工失败后，张国焘受中共中央之命，再次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二七"大罢工的经过。在莫斯科，张国焘向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沙发洛夫、远东部主任威金斯基、赤色职工国际主席罗卓夫斯基等人报告了"二七"罢工的实况。三个星期后，张国焘又匆匆回国。

1923年5月，马林从莫斯科返回上海。其携有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特别训令，训令要求中共立即扩大与国民党的合作，并提议迅速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中央接纳了共产国际的要求。当年6月，中共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提出了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名代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张国焘坚持"左"倾关门主义，坚决反对国共合作。在中共"二大"之后于杭州西湖召开的会议上，当讨论国共合作问题时，张即反对国共合作。这次，张又持反对意见。张认为国共合作不可能。

张之思想，其实是当时的“左”倾关门主义思潮的反映。

中共“三大”经过几天的激烈争论，大会正式决定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内称：

> 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我们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具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

张国焘于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

> 我是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也是中共中央的正统，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就因在西湖会议上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从此由正统派要人降为反对派的首脑。机会主义者、反共产国际派和右派等帽子都戴到了我的头上。这事确是我政治生涯中一个重要关键。

中共“三大”间，张国焘由于坚持已见，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其在中共首脑机关无法工作了，遂被分配到北方做铁路工人运动。1924年2月7日，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张国焘担任总干事，是实际负责人。5月21日，由于叛徒出卖，直系军阀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派侦察队查抄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秘密会所，张国焘及妻子杨子烈、范体仁等五人被抓。时上海《申报》云：

> 张国焘住黄化门内腊库门牌某号，是日早四时，有侦

缉队数排闼直入，时张与杨子烈女士正在睡梦中，侦缉队立促之起，谓现在有事，请跟我走，遂挟张杨二人上汽车，直驶鹞儿胡同侦缉队，是时被捕者尚有三人，惟此三人者全系工人（张杨均系学生），且并未与张杨同居，张杨现被捕，尚留侦缉队五六人，在某室中大搜特搜，倾箱倒柜，及文稿函件一概拿去，其余有许多出版物，如《政治生活》，《响导周报》，《新民国》等，皆积累满堂，侦察队临行时，遂查封张之居室，并派警察一人，在此看守，此张国焘案被捕时之情形也。

北京《晨报》亦云：

……据某方传出消息：谓张等之所以被捕，系鄂省当局有电至京，请政府缉拿。其原因由于鄂当局近来严防工人，在汉口某工会中搜出某种名册，认该册与工人运动颇有关系，而张杨等五人名字，适在册中，故有电请政府捕拿之举。

5月28日，《申报》又载：

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消息，连日对张等严讯，惟并无若何口供。故自前日起，侦缉队已开始拷讯，且每日拷打三四次之多。闻在张室中搜出之文件等，侦缉队认为关系重大者颇多，中且有派人赴俄护照一纸，上有加拉罕签字，侦缉队对此追究颇严，谓此护照究系俄国何人接洽得来，然关于此局尚无结果也。

张国焘于狱内关了四个多月后，适逢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赶走了曹锟，中共于此时机，将张国焘等救出狱中。

张出狱不久，孙中山应段祺瑞等北方军阀之约北上。对于孙先生北上，时中共内许多人士反对孙此举。如中共北京区委会书记赵世炎就认为孙段张的三角联盟，是标志着国民党政策的重大转变，无异是抛弃了国共合作的革命政策，转而与军阀实力派图谋妥协。赵组织了近百个民众团体，高举反对孙中山北上的旗帜。张国焘对赵世炎等反孙先生之举，表示反对。时张被中共斥为右倾。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的方针上，揭示"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方针，陈、张在对国民党合作的态度上，步调一致了。

1925 年 12 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予定在广州召开。时陈独秀、张国焘正在上海，同广东国民党方面戴季陶、孙科等人谈判，商定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机关内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12 月 20 日，孙科等发表了经与陈、张商定后的致国民党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内称：

> 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政党，虽然他负着为工农阶级斗争的特别使命，可是中国此时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计，为无产阶级的初步利益计，也就毅然决然的自愿在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旗帜之下，一致进行国民革命的工作。

时毛泽东等要在大会上打击国民党右派，团结其左派，争取中共的位置应占绝对优势。陈独秀不从，便派张国焘去广州，一方面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一方面宣传对国民党让步的主张。会议结果，在选出的六十个中央执委中，共产党员占了十四名。

大会不久，即发生了"三・二〇"事件。蒋介石突然派出军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联顾问住所，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

党员李之龙，扣押了国民革命军第1军中五十多名中共党员。时张国焘正在上海，便奉陈独秀之命，回到广州，处理此事变。张国焘后来回忆说：

> 在中共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上，我曾报告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治形势，决定采取妥协的政策：要求同志们一致遵行。对蒋介石表示让步，同志们对外的言论和行动不可再有参差。我的这种建议获得了他们一致的支持。
>
> 接着，我由周恩来陪同去看蒋介石将军，与他直接谈判。……蒋氏很客气的接待我，我们一面谈话，一面共进午餐。

5月底，张国焘回到上海，向陈独秀报告了面蒋的情况。6月4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致中国国民党书，同时，陈独秀还发表了给蒋介石的一封信，希望能与蒋氏精诚合作。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中共广东区委的负责同志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请示：在北伐中对蒋介石采取何种态度？由张国焘出面主持召开会议，张提出的方针是："反对蒋介石，也不反对蒋介石"。

8月初，张国焘交卸了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委的职责，由李立三接替，其专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1926年9月6日，北伐军攻占武昌之际，张国焘率中共中央军事部人马赶到汉口，不久，周恩来接替了张的军事部部长职，张以中央代表名义坐镇湖北。其任务是：指导湖北区委、发展工农势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争取北伐胜利等。武汉三镇被北伐军攻克后，中共湖北区委会成为中共在武汉一切活动的中枢，区委书记是彭泽湘，因经验不足，张国焘常起而代庖。时武汉有三大势力，一为邓演达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一为唐生智湘军；一为中共。张周游三者之间的关系。到了11

月，其又兼任了湖北区委书记之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反共，屠杀了大批中共党员，与此同时，张作霖亦于北京杀害了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国共两党关系陡然紧张。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共于武昌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张国焘出席了大会，并于大会上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常委仅四人：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还有张国焘。

中共“五大”闭幕不久，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陈独秀依然采取“让步”之策，张国焘亦支持陈的右倾主张。5月31日，张在汉口向国民党记者发表公开谈话，称：

> 现在的形势很险恶，这大部分是我们自己应该负责任的，民众运动的发展，超过了我们主观的力量与客观的要求，弄得不易驾驭，又引起当局的反感，现在不能不采取退却的步骤，不退却、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昨天中央已经决定将工人纠察队及农民自卫军的武装自动交出一部分来，以后，我们的工作应该切实一些。据我看来，武汉的局面，可以因为我们的退却而稳定下去。

前文述过，7月15日，汪精卫宣布“分共”，国共两党合作至此彻底决裂。面对如此形势，中共摒弃了陈独秀的右倾路线，成立了由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张国焘五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7月29日，张国焘奉命传达共产国际对暴动的指示。暴动之后，张国焘担任了农工委员会主任。张在起草土地政纲时，提出了“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的土地”的条例。8月19日，前委于瑞金开会，否定了张的主张，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

南昌暴动人马于潮汕大败之后，张国焘同李立三、贺昌一起，

由甲子港搭了一条帆船，到了上海。

对于张国焘借共产国际指令，到南昌阻止暴动的行径，张太雷在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上，强烈要求中央对张严肃处理。张国焘闻知此情后，于 11 月 8 日给临时中央写信，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辩解。

11 月 9 日至 10 日，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议认为：

> 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

会上，决定开除张国焘中共中央委员之职。

1928 年 5 月，邓中夏通知张国焘，说中共“六大”要在莫斯科举行，共产国际要张国焘出席会议。并告诉张，说张和陈独秀、罗章龙、蔡和森还有他邓中夏五人是共产国际特邀的。

张国焘遂动身赴苏，经过两个星期的行程，他抵达莫斯科。在“六大”召开之前，张国焘向布哈林陈述了自己反对瞿秋白盲动主义的态度，陈述了南昌暴动中所蒙受的委屈。布哈林听后，认为张国焘的述说有道理。遂改变了对张国焘的不好印象，张亦于布哈林处与王明相识，中共“六大”会议间，米夫找到了张国焘，说：“国焘同志，你和秋白都是中共党内的老同志了，共产国际希望你和瞿秋白同志能化除成见，互相合作。”

张国焘说：“只要秋白能纠正错误，合作不成问题。”

米夫进而探询问：“这种合作是否有勉强性质？”

张国焘略想了一下，指着案上磁杯说：“诸如这个杯子，若被打成碎片，虽然可以补起来，但究竟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

米夫听了，不高兴地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比喻呢？共产党不是个杯子。"又说："共产国际自信有力量来领导中央。"说罢拂袖而起。张深知自己失言，遂后悔不迭，自此对米夫接近，恭恭敬敬，不敢多语。

中共"六大"中央委员的人选，由共产国际圈定，米夫为了拉张国焘，将张列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米夫又提议，要张国焘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于此感激涕零，遂向米夫靠拢。

中共"六大"之后，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会间，俄共内斯大林派与布哈林派的纷争日趋激烈，虽没公开，然已露端倪。王明遂将此情暗暗告诉张国焘，说布哈林右倾，不能代表斯大林、俄共和共产国际的意见。张国焘听了，想到布哈林对自己的印象不错，并对自己的汇报持肯定态度，不免心惊。见米夫旗帜鲜明地站在斯大林一面，便更向米夫靠拢。其又见王明是米夫的"宠儿"，也不顾自己身份了，虽然王明在中共内仍是个雏儿，他张国焘是老资格，但仍向王明递笑脸。

张国焘留在共产国际出任中共代表后，他首先了解了方方面面的情况，用句中国老百姓的俗话说，看看哪头炕热。

前文述过，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系著名的托洛斯基派，副校长米夫，以斯大林派自居。当斯大林以铁的手腕搞掉托洛斯基后，拉狄克倒台，米夫成了校长。同时，由于鲍罗廷、威金斯基、罗明那兹、鲁易门、荷兰人马林、印度人鲁易等中国问题的专家们都因中国革命失败而倒下，米夫一跃成了共产国际东方部下的中国部部长、中国问题的权威。张国焘就更紧拍米夫了。

当瞿秋白和米夫在中山大学学生问题产生不同看法时，张国焘坚决地站在了米夫一边。张国焘后来回忆说：

> 当时各校的中国学生，颇有不安于学习的心理，常要求改良学习状况，或要求派遣回国工作。米夫等有时只好

请我去向学生解释，我认为使学生安心学习是一件应做的事，因此，也乐于接受这种邀请。我常常在晚间被送到郊外的军事学校，向中国学生们演说。

从 1928 年下半年起，俄共内反布哈林右派的斗争日甚一日，斯大林在反布哈林中，大搞个人迷信，使俄共党内民主窒息。张国焘一面洗刷自己同布哈林的关系，小心从事，一面对斯大林的独裁统治甚感兴趣。时在中共内，李立三模仿莫斯科反布哈林右派的举动，将持有不同意见的蔡和森送往莫斯科，谓蔡犯有右倾错误。莫斯科默认了蔡和森事件。接着，李立三又开除了陈独秀的党籍。中共中央的这些动作，使张国焘愈加胆寒。后来，李立三遭到米夫和王明的攻击，张国焘见自己显山露水的时机已到，遂决定回国。

1931 年 1 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十天后，张国焘回到了国内。这时王明已掌握了中共实权。张虽然看不起王明，可他还要捧王明。2 月 7 日，张即在党内刊物《实话》第九期上，发表《拥护四中全会与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一文，内称：

……它彻底批评了立三战线，指斥了秋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外交手腕和对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反对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革新了党的指导机关，指出了党当前任务，要求全党在实际工中揭发立三路线和在实际工作中执行国际路线。……因此，反对四中全会便是反党反国际的。

3 月 5 日，张国焘又在《实话》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了《执行党的路线与加紧两条路线上的斗争》一文，内称：

陈绍禹同志等是坚决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的同志。一些人借反对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

张向王明投之以桃，王明即向张报之以李。王明遂将张国焘任命为“钦差大臣”，派往鄂豫皖苏区，同时还派了陈昌浩。

陈昌浩，湖北汉阳人。1906年生。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王明关系甚好。1930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是年冬回国，担任共青团中央委员、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王明掌握中共大权后，旋即派其同张国焘一起赴鄂豫皖苏区。

第六章 “三人团”

前文述过，王明执政后，派张国焘、陈昌浩去了鄂豫皖苏区，派夏曦去了湘鄂西苏区，又派了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为中央代表团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这里把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作一介绍。

先说说任弼时。

在湖南省湘阴县境内，有个叫新屋的村子，1904 年 4 月 30 日，任弼时出生在一个教书先生的家中，其父任振声，见得一子，甚为高兴，取奶名为二南，二南天资聪敏，四岁时就在父亲指导下，悬臂练写柳公权的字帖，抄写诸葛亮的《前出师表》等古典文章。二南七岁时，适逢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他父亲送他到本乡的作民小学读书，起学名培国。培国成绩优异，跳班至序贤初等小学三年级。这所小学是新式教育。由任振声讲国文，任先生慷慨激昂地向学生们讲了国耻，讲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讲满清政府的腐败。这些教育，在任培国幼小心灵中，激起爱国之情。

1915年，任培国在序贤初等小学毕业，之后，考入了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初等小学。这所学校，在当时是湖南的一所比较有名的学校，校址位于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下，和长沙第一师范联在一起，规模很大。任培国在此大开了眼界。

长沙第一师范有个学生自治会，这是个传播新思想，提倡新社会的进步组织，经常组织学生开展讲演活动。进行讲演者很多，毛泽东就是这个自治会的成员，他经常讲演，任培国特别喜欢听他的讲演。有一天，任培国和两个同学到学生阅报室里看报纸，正巧有几个学生自治会的高年级学生在谈论国家大事。任培国看见了毛泽东也在这里，就上前自我介绍说："我们是高山部的，想参加你们的活动，不知行不行？"

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道："好哇，欢迎你们。"接着，毛泽东便热情地向这三位低年级的同学介绍了自治会的情况，勉励他们好好学习，好好锻炼身体，为民族争光，改造中国，自此之后，任培国便经常向毛泽东请教。

在学校里，任培国还选择了拳术、美术做为自修科目。并认识了一位英语教师，此人名叫肖三，任培国经常得到他的教诲，受益匪浅。

辛亥革命后的长沙，正是军阀官僚政客为非做歹之时，一面是朱门酒肉臭，一面是路有冻死骨。任培国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 呜呼！一缕之帛，出女工之勤，一粒之粟，出农夫之劳，致之不易，尽人知之。吾观乎，今之从政者，则不然，私心滔滔，且妻且妾，花天酒地，淫佚骄奢，纵姿挥霍，不顾份量，甚或任某省之督军省长，彼送此迎，耗费金钱，不可胜计。嗟呼！此非我国之金钱耶，亦非我国民之脂膏耶，痛矣哉！时愈极，而日用愈奢，生穷愈蹙而糜费愈大，以此治国，不亡何待？彼乘国钧者，其盍图之。节用之一端，关

系于国家人命匪浅鲜美，可不注意哉！

1920年，时任培国已十六岁，再有一个学期就要高中毕业了。同学之间，不勉互相探问，那些公子哥儿，毕业后也无须找甚工作，仍能继续过纸醉金迷的日子。穷学生都觉前途暗淡，有的托人，有的找路，以便毕业后有碗饭吃。任培国呢？当时已绘得一手好画，同学大都羡慕他，至少他毕业后可以卖画糊口。就在这当儿，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赴法勤工俭学的热潮，在湖南，蔡和森、蔡畅、向警予等人都去了。任培国的校友李富春也去了。一日，任培国收到李富春的来信，信中述说了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要他也去。这一晚，任培国手握这信，久久不能入睡，他真想去勤工俭学，求得更多的知识，可他想到家中父母年迈，三个妹妹年岁又小，不忍远离。正好他的叔父经商到长沙，知他欲远涉重洋，便立加劝阻。任培国虽心动一时，最后终没去成。不久，又有一批同学去了法国，任培国心又动了。

这天，任培国与同学肖劲光同来岳麓山下。二人谈起毕业之后事，任培国说："劲光，我们国家如同一支破船，正在风浪中寻觅方向，我辈热血青年，应担此重任，岂能把眼光放在一碗饭上？"

肖劲光说："培国，你说的很对，我辈当弃燕雀之小志，慕鸿鹄而高翔。"

任培国说："去法国勤工俭学已错过了时机，可无论如何，我们也要到世界各地走走，古人还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呢。"

肖劲光皱着眉头说："我们到哪里去呢？"

任培国眼睛一亮说："咱们去找毛泽东吧，他是个有办法的人。"

当下，二人便找到毛泽东，把想法一说，毛泽东笑笑说："上海有一批青年要到俄国去留学，如果你们愿去，我可以写信介绍你们，同他们一起去。"

任、肖二人听后，都高兴地说："好哇，我们一定去。法国没去成，我们去俄国。"

毛泽东取来了地图，把俄国的位置指给了他们看，任、肖在地图上看到了这个横跨欧亚两洲的北方大国的位置，接着，毛泽东给他们讲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讲到了列宁。任培国和肖劲光越听越兴奋，他们终于下了最后的决心，到俄国留学。

毛泽东见这两名青年向上劲头如此之足，也很高兴，当即写信与上海联系，数日之后，上海方面回信答复，可以启程。

1920 年 11 月，正是桔子洲头看万山红遍之际，任培国同肖劲光一起，乘江轮东下至上海，任培国因此次之行，未告父母，到上海之后，才给家中写了一封书信，但为了保密，措词比较隐晦。他和肖劲光住在了上海贝勒路的一家湖南人开的小旅馆。在这里，任培国、肖劲光结识了张太雷、恽代英等革命青年。这些青年，当时已是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负责人了。和这些人交往，使任、肖二人大开眼界。

任培国在上海做赴俄准备的时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 年的初春一天，任培国同肖劲光等青年一起，从黄埔港搭乘了一艘日本客轮，前往海参崴，踏上了奔向十月革命故乡的漫漫征途。当时，去俄国的道路是很艰险的，为了安全起见，这些赴俄青年都化了装，装做彼此不认识的模样。任弼时装成个剃头的，提着个剃头包儿，身穿破旧的衣衫，头戴着一顶挂满油泥的毡帽。当时，任培国患有高血压病，轮船在海上行驶，少不了风狂浪急，颠簸摇晃，直搞得任培国呕吐不止。那一番难受的滋味儿，真是无法形容。

非止一日，到了海参崴。这里是俄国远东的港口。任培国等人下了船，在海参崴换了火车，开往伯力。当时，俄国国内的革命战争还没结束，远东一带，有许多地方为白匪盘踞。这天，在通过赤白交

界处时，火车突然停下，一些白匪军荷枪实弹地上了车，勒令旅客下车接受检查，名义上是检查鼠疫，实际上是勒索财物，任培国被带到了一间木头造的房子里。一个兰眼睛、大个子，高鼻子的家伙将刀对准任培国的胸膛，说："干什么的？"

任培国来之前已经学了些简单的俄语，听出了话中之意，便把手中剃头的家伙交给大鼻子。大鼻子瞅了瞅，又令任培国举起双臂，而后，在他身上搜起来，把任培国身上的钱都搜光了，又拳打脚踢一顿，将他放了。任培国被放出来后，火车早以开走了。他与大家失去了联系。在这异国他乡，孤身一人，且身无分文，言语不通，环境不熟，且莫斯科甚远。真是身在天涯为异客。培国把牙一咬，便沿着铁路线，一边讨要，一边行走，两天之后，到了伯力，这个地方，是紧靠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的一座城市，原是中国领地，十九世纪中叶被沙皇夺去了，因此，这里尚有许多中国居民。任培国在此听到了中国语言，很高兴。他正在街上走时，听到有人喊他名字，回身一看，竟是肖劲光。任培国一下就把肖劲光抱住。这对同学，虽然分开仅两天，却似分开两年一般。这时，其他青年也来了，大家重逢后的高兴，难以描述。

第二天，这一群青年，又乘火车东进，终于到达了莫斯科。

莫斯科城中的一条大街，有座环境优美的校园，校园距斯特拉斯特纳广场不远，这座校园便是著名的东方大学，其全称为"斯大林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这所大学，是俄国十月革命后，在列宁关怀下办起来的，任务是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干部，任培国和肖劲光等均为这所大学的一期学生。1921 年秋天，东方大学在列宁和俄国共产党关怀之下，正式开学，大学里设有中国班，任培国便为中国班的一名学生。在这个班中，除有他的同学好友肖劲光外，还有罗亦农、柯庆施、王一飞、任岳等等。计四十多人。到了此时，任培国将自己的学名培国取消，改名"弼时"。

任弼时入东方大学学习之后，十分刻苦，他学的主要课程，有

哲学、政治经济学、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西方革命史，还有中国的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农民斗争史。任弼时除了学习这些主要课程外，还读了许多在国内读不到的书，由于读书刻苦，政治觉悟迅速提高。1922年初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时年尚不满十八岁。

弹指间，三年的学习生活过去了，三年之中，又有许多优秀青年来到了这里，王若飞、陈延年、肖三、赵世炎等人，也都来到了东方大学学习。大家见面，真有说不出的亲热。1924年，在任弼时学业将满时，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莫斯科附近的哥尔克村逝世，一时间，在世界上空，哀声回荡。任弼时含着悲痛的泪水，向这位导师的遗体告别。

这当儿，在国内，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正熊熊燃烧。中国共产党已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党章和《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等决议案。工农革命运动在蓬勃发展。任弼时决定回国，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

1924年秋，任弼时从俄国回到了上海，在上海庆云路的一所大学内，任弼时见到了邓中夏。这所大学名曰上海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办的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在邓中夏的办公室里，邓中夏握着任弼时的手高兴地说："弼时同志，你来的正好，学校里正缺俄文教员，你来担任吧。"

任弼时很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当时恽代英也在坐，他正主办《中国青年》，热情地邀请任弼时写些文章，任弼时也立即答应，与此同时，党中央还决定要任弼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5年，中国共产党和团组织为了培养基层干部，在上海成立了三十几个干部训练班，任弼时领导了这项工作。他亲自抓了曹家渡纯善里52号的训练班，这个训练班由当时的沪西区振华纱厂、绢纱一厂、二厂、公大纱厂、中华工业厂、爱迪生灯炮厂等工厂的团干部组成，校址设在一个狭窄的里弄里，约一百多人，在任弼时的

动员下，训练班女工占了一半儿。这些训练班培养的干部，后来有的搞工人运动，有的搞农民运动，有的搞军事斗争，都成了革命的骨干。

1926年，任弼时托王一飞把未婚妻陈琮英从家乡带到上海，陈琮英同任弼时是在患难中结下的友谊，在一个亭子间里，他们结婚了。在这之前，有人要在上海给任弼时介绍对象，被任弼时拒绝了，任何力量也动摇不了任弼时和陈琮英患难中结下的爱情。婚后，陈琮英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夫妻双双投入了革命斗争的洪流之中。

就在他们结婚不久，也就是1926年的10月，任弼时二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大会。他告别了陈琮英，离开了上海。

任弼时赴莫斯科参加少共国际代表会间，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上，正是风云急剧变幻之时，先是北伐军势如破竹，革命的激浪一浪高过一浪，继而蒋介石反共野心暴露，在南方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张作霖也在北方屠杀了李大钊。汪精卫这当儿回了国，摆出了一副十分革命的嘴脸，在武汉大骂蒋介石，接着便是宁汉分裂，"马日事变"，中共召开"五大"会议，汪精卫、冯玉祥在郑州会谈。冯玉祥投蒋，武汉挥师东征讨蒋，这急剧的政治风云，且万变不离其宗，国民党把屠刀放在了共产党的脖子上，血雨腥风，笼罩着武汉上空。而中共内部对时局看法也各持已见，众说纷纭，四分五裂。就在这时候，任弼时回到了国内。任弼时一到武汉，立即嗅出了风声不对。

这天，他来到了武昌都府堤41号，这里住的是毛泽东。任弼时进门之后，夏明翰、蔡和森、方志敏、彭湃、毛泽民、毛泽东都在，正在互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一个个慷慨激昂，指责陈独秀要把中国共产党推向了火坑。大家见任弼时进来，都起身让坐，任弼时没有坐下，他把手中的一张撕碎的《民国时报》往桌上一扔，满面怒容地说："看看吧，这张报纸是一个国民革命军官在大街上撕的，那军官

边撕边骂，这上边登了些什么？登了鄂南农民组织农会，斗争恶霸地主的新闻，一个小小的国民革命军军官，没有人撑腰，敢这么大胆吗？任弼时又把在手中的一份材料往桌上一放说："这是共青团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致中央政治意见书》，陈独秀只看了几眼，见其中提到了武装斗争，当场就把这意见书撕了。还怒冲冲地对我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任弼时手指发抖地说："难道我们就这样眼看着任人宰割吗？"

蔡和森为任弼时倒了碗水，任弼时喝了一口，又问道："共产国际来了指示，你们知道是什么内容吗？"

众人齐说不知道。任弼时说："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斯大林5月13日到了苏联中山大学，接见了中国学生，斯大林对蒋之举很愤慨，他痛斥了蒋，谈了武汉政府和土地革命的问题，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发来了致中共的电报。"

蔡和森愤愤地说："既然有电报，为甚不在党内公开？"

任弼时拧着双眉说："我去找陈独秀问个明白。"

毛泽东拉住他说："弼时，今天下午开党中央扩大会议，会上去问。"

任弼时说："也好。"

1927年6月23日，在武昌的一座房子里，中共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张太雷等党团领导人都来了，会议讨论了当前的时局，陈独秀首先发了言。自然又重弹他那老调，要向前看，加强国共两党的团结，小不忍则乱大谋等等语言。陈独秀发言刚完，任弼时便起身问道："独秀同志，共产国际的指示，你为甚不在党内公布？"

任弼时这么一问，到会的许多人都愣了，都不知任弼时的话从何而言。吴玉章问张太雷："共产国际来了什么指示？"

张太雷说："我也刚刚听说，还不知内容。"

这时候，陈独秀的脸色，由红变黄，又由黄变白，由白变青。而

后喊道："任弼时，这指示不须要你知道，你不必多问！"

任弼时以极大的耐力克制了感情上的冲动。散会之后，他仰天叹道："如此下去，我等将无葬身之地！"

接着，任弼时参加了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之后，他先到鄂南指导鄂南农民暴动，后奔赴湖南考察秋收起义情况。在长沙北门外沈家大屋（湖南省委所在地——作者注），任弼时见到了彭公达、夏明翰、谢觉哉等省委领导人。任弼时主持召开了省常委会议。当时，中共中央指示湖南省委，在长沙举行暴动，会上的气氛很热烈，不少同志磨拳擦掌，要与敌人决斗。任弼时遂问道："长沙城内有敌多少？"

有人粗算了一下，说："九千。"

任弼时又问："枪支呢？"

答："七千多。"

问："我们的队伍呢？"

答："有三千多。"

任弼时一问到底，结果的情况是，战士三千名中，包括起义后拉过来的两千名，实际上只有一千多。任弼时说："这样赔本的买卖，我们不能做。"

有人说："这可是党中央的决定啊。"

任弼时毫不犹豫地说："问题我去反映，长沙暴动必须停止。"

就在这时候，任弼时被调到了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到上海不久，他便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到安徽省检查工作。

这当儿，安徽党的工作已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恢复各级党的组织任务刻不容缓。这天，任弼时按约定来到南陵县公园开会，他穿着件长衫，戴着眼镜，脚蹬一双平底布鞋，手中拿着一本书，跟大学读书的学生一般，公园不大，且竹木繁盛，三三两两的游人不断，任弼时坐在了一个亭子里，把长袍一撩，读起书来。这是本《论语》。一本《论语》读完了，不见约定人来。任弼时正想为甚之际，见几个

人走进园中，一边走一边四下张望，任弼时见了。心说："不好，这里要出事。"他想着，起身要走，还没抬腿，有两个人来到他面前，这人三十多岁，青布裤褂儿，十三太保扣儿一个不拉，两袖口儿都露着半截白边儿，脚下是带云子背儿的洒鞋。任弼时一看这人的气质，就断定不是个好人，起身要走，那人把两臂一伸，笑道："先生再坐会儿罢，干甚忙着要走哇，你看看这古亭子多好哇。"

任弼时说："古亭再好，不是久居之地呀。"说着就往外走。

那人笑道："你等的同志还没来，怎么就走了呢？"

任弼时听了这话，心头猛地一跳，暗道：这人说的话，分明来者不善。便镇定地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人取出一支香烟，在手指盖上戳了戳，吸着后，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很清楚。"

任弼时把身子一转，要大步下亭，那人却到了任弼时面前，说："怎么，想走，走不了啦。警备司令部的板凳还等着你去坐呢。"说着，露出了腰中手枪。

这当儿，从树丛之中，又钻出几个人来，一个个都似凶神恶煞一般，任弼时心中明白，一定是出了叛徒了。他愤怒地对眼前这人道："你们要做什么？"

那几个人中，有个斜眼子的对说："把他扣起来，少跟他罗嗦。"

斜眼子话音儿没落，过来两个人，哗啦抖开手中链子，将任弼时锁上，而后说道："朋友，没说的，跟我们走一趟吧。"说着，就把任弼时带出公园。

往公园外走的时候，任弼时看到同时被捕的，还有好些是他压根儿不认识的人。他暗想：敌人为甚要抓许多普通老百姓呢？一定是情报不确凿，捕风捉影。想到这里，他打定了主意：决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

任弼时等被捕之人在南陵县被关了一夜，第二天，他们被押到了安庆警备司令部。从南陵到安庆要走水路。为防止这些人逃跑，

便将他们放在船头，这是条民船，船上还有其他客人。那些乘客听说船上押了“赤脑党”，许多人都过来看热闹。

押在船头的任弼时无意抬头一看，忽然见一张面孔，十分熟悉。再定睛看时，认出此人是家乡的彭佑亭。彭佑亭是任弼时老家不远镇子上的一个小商人，这人为人厚道，且素有正义之感，尤喜帮人解难。彭佑亭也看到了任弼时，正要说话，任弼时一使眼色，彭不开口了。这当儿，过来个持枪的士兵，对围观的众旅客说：“都走，都走！几个红脑壳壳，有什么好看的！”

任弼时见彭佑亭要离开，使大声喊道：“我不是红脑壳，我叫胡文甫！”

那士兵回身冲任弼时喊道：“喊什么？再喊老子枪毙了你！”

任弼时继续大声喊道：“谁不知我胡文甫是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徒弟了，我是来买货的，不信你们去问我媳妇，她叫陈琮英，在上海霞飞路276号，她在工厂做工。”

任弼时为甚这样讲呢？他这是给彭佑亭递话，意思暗说，你快去告诉我爱人吧，让她去保我，我现在叫胡文甫，长沙陈岳云纸店的徒弟。

船到了安庆码头之后，任弼时一行被押往警备司令部.彭佑亭看准后，就急急忙忙奔向上海，要将此情况告诉陈琮英。

任弼时被押到安庆警备司令部后，立即受审，一个小个子军官恶狠狠地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任弼时不慌不忙地回答：“胡文甫。”

小个子瞪着眼继续问：“哪里人，做什么的，老老实实地交待，胆敢胡说，老子撕烂你的嘴。”

任弼时说：“长沙陈岳云纸铺的学徒工。”

小个子又紧问了一句：“到南陵县做甚？”

任弼时依然不慌不忙地答道：“替老板买货。”

小个子眼珠子转了转，又问道：“既然买货，为什么又去公园开

会?"

任弼时装做糊涂的样子说:"我去公园是玩儿的。"

小个子哼了一声说:"看来不动刑你是不招的。"说着走上前,"啪啪"左右开弓的打了任弼时几个耳光,直打得任弼时嘴角流血,而后,小个子倒背着手问道:"到哪家货店买货?"

任弼时装做害怕的样子,呜呜哭着说:"我还没有去买呢,就被你们抓来了。"

小个子见任弼时对答如流,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工夫,走过一个帮审,在小个子耳边嘀咕了几句,小个子点了下头。那帮审说什么呢?他说真共产党骨头都是硬的,不狠打不行。

当下,小个子令人将任弼时上了大刑,先是跪铁链子,接着压杠子、顶砖头。任弼时被死去活来地折腾了一天,可他始终不改口供。敌人无法,又把他扔进了牢中。这时候,任弼时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好肉,可他心里明白,只要不改口供,敌人就发现不了自己身份。

再说彭佑亭,来到了上海,在霞飞路276号找到了陈琮英,他把任弼时被捕和在船上偶遇的情况讲了一遍,陈琮英听了,脸色立时变了。她急忙抱起小女儿苏明,来到了上海党组织所在地,向党组织做了汇报,接着又准备去长沙。当她到了上海火车站时,火车刚刚开走。陈琮英咬咬牙,爬上了一辆敞棚的运煤车。母子俩冒着长夜寒风,赶到了长沙,找到了陈岳云。原来,陈岳云是陈琮英的五哥,他在长沙开了一个伟纶纸庄。她把任弼时被捕和任弼时捎过的话说了一遍。兄妹俩研究了一番,统一了口径。陈琮英又返回上海,将情况报告了党组织。几天后,一个姓何的律师从长沙来到了安庆。他买通警备司令部的人,把案子由警备司令部转到了安庆法院,之后,何律师又把几卷光洋暗中递了过去,法院里假模假样的过了下堂,就把任弼时放了。

这个何律师是党组织派去的营救之人。当任弼时拖着虚弱的

身子回到了上海家中，见到了陈琮英时，陈琮英一下扑在他身上哭了起来。任弼时又四下看看，说："我那爱女苏明呢？"

陈琮英哭的更厉害了。她哭着告诉任弼时，说他们的女儿小苏明，在随陈琮英去长沙时，坐运煤火车受了风寒得了重病，几天前死去了。任弼时听了，好一阵才悲痛地说："革命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任弼时出狱之后，中共中央安排他做巡视工作，并安排他任江苏省委常务委员。这时的江苏省委，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东地区革命斗争中的重要组织之一，省委书记是李维汉。由彭湃负责抓军事工作，斗争很复杂，时陈独秀与苏联托派联系在一起，在党内，彭述之、江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与陈独秀勾扯，一起向党攻击，任弼时同李维汉、彭湃等同这些托派进行了斗争，最后，省委于 1929 年做出了决议，将彭、江、冯、蔡四人开除出党。

斗争此起彼伏。一天晚上，任弼时正同陈琮英一起刻印文件，忽听门响，从敲门声中，他断定了来者为自己人，任弼时开门后，见进来的果然是从浦东回来的交通员，任弼时很关心浦东的情况。因不久前，浦东曾举行了一次暴动。结果失败了。任弼时忙问交通员："那里情况怎样？"

交通员说："浦东来了人。他们准备再大干一场，举行一次新的暴动。"

任弼时拉交通坐下，他认真地听了交通介绍的情况，而后说："还有吗？"

交通员搔搔头皮说："就这么多了，只要省委点头，那里就动手，工人们劲头儿足着呢。"

任弼时没说什么，而是吸着烟，在屋内走了一阵，突然问道："浦东来的同志住在了哪里？"

交通一听，立时明白，任弼时要亲自找浦东来人了解情况，他连忙说道："这，你不能去，那里不安全。"

任弼时却已起身，穿上了大衣，说："亲自谈谈，情况更熟，决心才好下呀。"

当下，任弼时便同交通一起出门，来到了浦东区负责人刘晓住的旅馆。

这天晚上，在刘晓屋中，任弼时同他一直悄声谈到深夜，任弼时全面的了解了浦东的情况，认为目前进行武装暴动条件不成熟，决定取消这次暴动的计划。

刘晓听说任弼时决定取消暴动，大吃一惊，说："弼时同志，……"

任弼时望着刘晓，语重心长地说："刘晓同志，我们都是负责同志，任何一个决定，都牵涉到好多同志的性命啊。"

刘晓紧紧地握住任弼时的手说："弼时同志，你的话我明白了。"

任弼时回到家中，已经深夜两点多了。陈琮英还没有休息。他见任弼时回来了，一边帮他脱下大衣一边说："弼时，今晚的行动，你太冒险了。"

任弼时说："为了同志们少流血，我只得冒这险哪。我们党内许多好同志牺牲了，都是因为一些领导者不负责任的乱下决心所致。"

后人谈到此事时，有人叹曰：

暴动声声复声声，处处流血处处红，
不是弼时心底正，浦东同志又牺牲。

这年9月，上海秋雨连绵。这天早起，那雨越下越大，街里的水几乎成了河。吃过早饭，任弼时对陈琮英说："12点回来吃午饭，下午还要参加一个会。"说完，冒雨出了家门。

任弼时走后，陈琮英到街里买了十个铜板的面，又买了两个铜

板的雪里红，回到家中，便做起了午饭，午饭做好了，看看到了12点，任弼时没回来，到了下午1点、2点、3点……直到第二天清晨，任弼时还没回来，陈琮英立时焦了急，猜想凶多吉少。赶忙到江苏省委书记罗迈同志哪里打听消息。这才知道任弼时同志被捕了，陈琮英听了，眼前一黑，差点儿栽倒地上。

任弼时怎么被捕的呢？原来，任弼时冒雨来到了开会的地点，他把门刚推开一半，见院中有陌生人探头探脑，他立时感到情况不对头，刚要转身离开，这时，过来两个满脸横肉的大汉，将他双膊拧住，他想挣脱已来不及了。两个大汉把他推到了院内一间房中，房子里有个女同志，任弼时认识，知道这人是房东，亦是中央机关内负责联络的同志，敌人指着任弼时，问那女同志认不认识他。女同志摇摇头说："不认识。"

任弼时也争说自己走错了门。就在这当儿，女同志身边的三岁小孩见到了任弼时，马上跑了过去，抱住了任弼时的腿，喊："任伯伯。"

敌人一见此情，再不由任弼时分说，就给他戴上了镣铐，推上了囚车。任弼时趁敌不备，把衣袋中一页秘密文件吞进了肚内。

这次抓捕任弼时的，是英租界的巡捕房。英巡捕把他押到了西牢后，便进行了搜身，结果，只搜出了一张月票，月票上有任弼时的照片和详细地址，敌人拿照片同任弼时对照了一下，果然不差。又按照月票上提供的地址去核查门牌号码，根本没有这所房屋，这所房屋早已在一次大火中被烧掉了。这样一来，任弼时的身份更引起了敌人的怀疑了，敌人立即动用严刑拷打他，问他是什么人。任弼时说："我叫胡长吉，从湖南来上海做生意。"

一个洋巡捕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问："家住上海哪里？"

任弼时说："生意人，行踪不定，住处不定。"

没等任弼时说完，"啪啪啪"的几个耳光又打了过来。打完之后，又有几个洋巡捕举鞭子向任弼时身上乱抽，任弼时因为刚刚出

狱不久，身体还很虚弱，又适逢发着高烧。敌人在用刑中，他眼前不由得一阵发昏，但是，他咬定牙关，再不开口。巡捕们见他不开口，便用绳子将他口勒开，面对敌人的暴行，任弼时异常愤怒，当一个巡捕举起皮鞭朝他身上抽打的时候，他猛地扬起手臂朝那巡捕胳膊打去，使鞭子一下打到一旁站立的怒目横眉的法官身上。这样一来，更把敌人激怒了，皮鞭、电刑一起上，登时把任弼时打昏过去。

任弼时昏过之后，法官令人取来冷水，将任弼时浇醒。任弼时刚刚睁眼，法官又问他口供。任弼时一口咬定自己姓胡名长吉，湖南人，来上海做桐油生意。法官见状，又令人用电刑。这是当时从西方新引进的刑具。能使受刑人痛苦到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的状态。使身心受到极大的损伤，神经系统陷于混乱，从而达到透露真情的目的。当巡警们把任弼时的手脚和后背都绑好导线，大鼻子黄头发的法官合上电闸时，任弼时周身的肌肉都跳动起来，像有无数钢针在刺，他脑壳发胀，眼球外突，天旋地转，房倒屋倾……但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抵住了敌人酷刑的逼供。法官见任弼时仍然不说，立时加大了电流，直到任弼时又昏死过去，才算罢手，待任弼时醒过之后，敌人再用电刑，使他再次昏厥。如此反复用刑，两个电极把他后背上烙出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老远就能闻到皮肉烧焦的气味。

无论敌人怎样用刑，任弼时只是不改口供，敌人无奈，只好将其投监入狱。

任弼时被捕的消息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周恩来指示负责中央特科的陈赓组织营救，陈赓接受了任务后，立即通过关系，探明了案情，知道了任弼时在敌人严刑之下，只说自己叫胡长吉，湖南人，来上海做桐油生意，敌人因抓不到任弼时的其它证据，只好把他投监入狱。

情况弄明之后，陈赓便找到了陈琮英，把组织要他营救的话告诉了她，并要陈琮英配合营救。陈琮英眼含着泪说："陈赓同志，该怎么办，你就说吧，为了救弼时，我入刀山火海都行。"

陈赓说："敌人现在还没抓到弼时的任何证据，特科在德培里给你找了间阁房子，那里还住了个姓杜的老太太，待有人来查问时，老太太权做你的女佣人，你是闻讯从湖南长沙来此救夫的。"

陈琮英边听边点头。当即同陈赓一起来到了德培里，陈琮英同杜老太太接上了头。这杜老太太也是个革命的老妈妈。她对陈琮英说："孩子，放心吧，他们特科的同志本事可大哩，准能救出弼时。"

陈琮英说："这我知道。"

陈赓安排好陈琮英，又通过关系把外面情况告诉了任弼时，之后，让陈琮英出面，在巡捕房上下打点，由于使了钱，加之巡捕们也没有抓到任弼时的任何口供和证据，对任弼时的审问也就放松了。但也不放过他，只把他关在洋牢里。陈赓又去找国民党驻上海特派员杨登瀛。杨登瀛时已完全热心为中共服务，他听了陈赓介绍的情况后，当天，便在英租界里一家大酒楼摆了一桌盛宴，宴请英巡捕房的头子兰普逊。席间，杨登瀛说："我有个亲戚从湖南来上海做买卖，被你们的手下人抓走了，关进了监牢。"

兰普逊同杨登瀛过从甚密，听了杨的话后，说："是你的亲戚，那好说，回头把他放了就是了。"

酒席宴罢，第三天，任弼时就被放了出来，当他同陈琮英见面时，虽然仅分手不到月余，已形同两人，只见任弼时面容憔悴，如同生了一场大病，后背被电击成的洞，用手一按，冒着黑血水，陈琮英见到这情形，抱住了任弼时，泪珠儿不由得滚了下来。

任弼时出狱后不久，中共中央又派他到了武汉，任长江局委员，他不顾身体尚未恢复，在一个浓雾弥漫的清晨，登上了开往武汉的江轮，又踏上了新的征途。

说罢任弼时，再说说王稼祥。

王稼祥。原名王嘉祥，又名王稼蔷。1906 年生于安徽泾县西乡

厚岸村的一个小地主兼小商人之家。其父王承祖，开着小店铺。生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王稼祥七岁入本村柳溪小学读书，毕业后又进了村中私塾。三年后，入一所教会办的乐育中学读初中。其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免试升入教会办的芜湖圣雅各中学高中部。

在圣雅各中学，王稼祥看到《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使他思想有了新的升华。时学校英文教师查文梅先生对王稼祥甚为喜爱，意欲将女儿许王。其父甚为满意，王稼祥虽经反抗，然终在父母强制之下结了婚。

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圣雅各中学举行追悼大会，学生们公推王稼祥为学生代表之一，王稼祥写的悼词，深为师生惊异和叹服，大家好象突然发现了一个出众之才。

1925 年 4 月 24 日，芜湖各界人士在湖南会馆联合举行了追悼孙中山先生的大会。王稼祥参加了大会，会上，中共党员、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表恽代英发表了演说。恽代英的讲演，使王稼祥受到了鼓舞和启发。

圣雅各学校由于是教会办的，因此，学生们要按时做礼拜和作祈祷。在全国反帝反封的浪潮中，圣雅各学校的学生也"造反"了，他们向学校当局提出做礼拜和作祈祷时学生可自由参加，将圣经课改为自由选学课。但校方不从，于是学生罢了课，王稼祥成为学生领袖，为此，他被开除学籍。

王稼祥回到家中后，顿遭其父的谩骂，逼其随己做买卖。王稼祥不愿听父的怒斥，也不愿见与己无有感情的妻子。心甚苦闷。

这年 5 月，王稼祥听说由共产党办的上海大学招生，任教的是瞿秋白、邓中夏、蔡和森、恽代英、沈雁冰、周建人等，决计去投考。然其父不从。其母怕王稼祥憋出病来，偷偷给了王稼祥一些钱，要他去上海散散心。

王稼祥背着父亲到了上海，考上了"上大"附中。时"上大"一片革命生机，王稼祥顿觉大开眼界。其与好友王柳华信中云：

> （我）来沪即入上大附中，人地生疏乏善可述。……上大为革命大本营，对于革命事业颇为努力，余既入斯校，自当随诸先觉之后，而为革命奋斗也。

王稼祥入"上大"附中仅一个月，学校的共青团组织见他是个苗子，决定吸收他为共青团员，王稼祥也愿入，这样，他的入团申请很快得到批准。

1925年10月的一天，"上大"附中校长、共产党员侯绍裘找到王稼祥，问他愿否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王稼祥当即表示同意。10月28日，他和一些同学作为第一批"中大"学生动身赴莫斯科。

入学之后，王稼祥因在教会学校读过书，有英语基础，便与张闻天、沈泽民、吴亮平一起，编入只有十一人的英文特设班。

王稼祥刻苦地学习着，感受着苏联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他在1926年1月19日，曾给其挚友王柳华写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信中说：

> 祖国一别，瞬已数月了，我于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暇时，把我在赤都的生活，和苏俄的情形，大概的报告你们吧！……赤旗盈空，雪天万里，把中国的革命青年，置身于斯，自然增加了不少革命勇气。苏俄是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国家，现在正一步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工农的生活，非常平安，普通工人每月可得薪水四五十元，而官厅最高官员月薪亦不过二百元，这可见苏俄人民之平等了。
>
> 苏俄人民对于中国革命运动极其注意，尤其是对于中国革命青年，表示出十二分的热烈欢迎，我曾参加过俄国工人庆祝一九〇五年革命的纪念会，在谈话中，在讲演中，都表白他们十分希望中国革命早日成功，来日与苏俄

携着手，共同去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的世界。

王稼祥在俄国为自己起了个俄文名字叫做"康莫纳尔"，意思是"共产党人"或"公社党人"。他决心为共产主义去奋斗了。蒋介石"四·一二"屠杀共产党员的消息传到苏俄时，"中大"不少学生对革命前途失望了。王稼祥对同学说："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信心，更可怕的是不接受经验教训。"

1927年底，王稼祥由米夫等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在来苏俄上学前，曾加入过中国国民党。但以后没有任何联系。到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中，康生就此事将王整的死去活来。

前文述过，中山大学的支部局到后来由王明等人把持，王明为扩大自己的势力，紧拉王稼祥。王稼祥对于米夫和王明的态度，在其于"浩劫"中交待的材料内写道：

原来的旅莫（斯科）支部是直属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同联共是平行的。……奈因旅莫支部与中国党中央联系困难，党中央的文件收到不多，无法联系，于是实际上把注意力中心变成思想意识锻炼，由于都是学生，每天的生活总是那些事，于是开小组会讨论的尽是大家的生活小节，由于旅莫支部开会很多，常常在上课时开会，于是旅莫支部与学校当局发生了矛盾，学校当局提出解散旅莫支部，把旅莫支部编入联共组织，这当然是当时联共和共产国际的意见。我当时是赞同解散旅莫支部的意见的。……当时中国大革命失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对中国党丧失了信心，认为他们不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和陈独秀主义，就是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而对斯大林和当时联共和共产国际则推崇备至，认为他们是把革命搞成功的

人。由于斯大林本人在讲演中曾提到了米夫，因此当时便错误地对米夫也产生了尊敬的感觉。

在王明等人操纵支部局反对瞿秋白等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时，我当时虽未参加“六大”，未参加支部局，但是是拥护支部局的，而对中国党当时在莫斯科的代表团(是)不太信任的。

王稼祥被列为中山大学的“二十八宿”之一。也正是如此，使其背上了一个终生来能完全解脱的沉重的十字架，在后来中共内部矛盾纷争之中，特别是几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他在莫斯科的五年生活，竟成了他所有“错误”以至罪恶之源，他因此而被定为“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小宗派”的成员，被指为“二十八个半”之一。他几乎用尽毕生的努力，也没洗清这些罪名，直到含恨离去。

王稼祥被视为“左”倾小宗派成员，然亦亡在“左”倾之中，此为中共“左”倾之恶矣！

1930 年 3 月，王稼祥回到国内，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干事，兼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负责编辑中央机关报《红旗报》和《实话报》。此后，在反李立三路线中，王稼祥受到了党内处分，被派到香港作党报记者。

数月后，米夫到了中国，“二十八个半”内的沈泽民、陈昌浩、凯丰、夏曦诸人都回国，米夫、王明掌了中共大权。王稼祥回到了上海，并被撤销了处分。接着，王稼祥被王明、米夫以中央代表身分，派往江西中央苏区。

说罢王稼祥，这里再把顾作霖略作介绍。

顾作霖，1908 年生于上海嘉定。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员。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学生，参加五卅运动。后入暨南大学、上海大学学习。1926 年初任共青团杨

浦部委书记。同年11月任中共江浙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共青团江浙区委组织部部长。参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6月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山东，任中共山东省委委员兼团省委书记。7月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领导恢复山东团的组织。1929年4月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团省委书记。同年11月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1930年5月任中共江苏省行动委员会组织部部长。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不久，任长江局总行动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负责组织兼青年秘书处工作。同年底回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王明、米夫对顾的印象甚佳，故派顾作为中央代表，同任弼时、王稼祥一起，前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第七章 “富田事变”始末

“温和派”项英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作为中央代表团赴江西苏区，由任弼时为团长，他们三人的任务，说穿了就是王明、米夫对毛泽东、朱德等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不放心，不信任，派他们三人控制中央苏区。

这里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情况略作介绍。

中央革命根据地简称“中央苏区”，位于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秋收起义后，赣南、闽西地区就出现了小块的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后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领导的湘南起义部队编成红4军，离开了井冈山，转战于赣南、闽西之间，在这些小块革

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先后开辟了赣南、闽西根据地。

与此同时，在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间，赖经邦、李文林、古柏等人领导赣南地区的武装起义，也先后开创了东固、桥头等小块根据地。1928年，成立了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李文林任团长兼政委。翌年9月，又成立了江西红军独立团。

1929年1月中旬，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4军到达瑞金城北的大柏地，与当地红军会师。随后，离东固入闽西。3月，回师赣南，4月1日到达瑞金，与从井冈山突围而来的红5师会师。4月中旬以后，红4军先后占领了兴国、宁都、于都三个县，成立了革命委员会。5月上旬，赣南特委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大会提出了建立赣南革命根据地。同年10月，罗炳辉率领吉安"八乡联防靖卫队"起义，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5团。同月，正式成立了东固区苏维埃政府，不久又成立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1930年初，江西红军独立2、3、4、5团合并，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后改称第3军；黄公略任军长。与此同时，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合并成赣西特委。1930年2月，红4军在吉安陂头召开了红4军前委和赣西特委及红5、红6军委联席会议。会上组成了红4、红5、红6和赣西、赣南、湘赣边界党的共同前委，由毛泽东任书记。同时，将赣西、赣南、湘赣边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由刘少奇任书记。2月下旬，红4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政权，发展地方武装，使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发展。3月，在吉安富田召开了赣西南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由曾山任主席。

南昌起义后，周恩来、朱德、贺龙等曾率部进入福建上杭、永定，领导闽西党组织开展工作，先后在长汀、龙岩、上杭、永定、平和等县成立党的县委。1928年3月和6月，郭滴人、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了闽西武装起义，建立了一个营的游击队，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1929年3月，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主力从赣西

南入闽西，击溃福建土著军阀郭凤鸣旅，进占了长汀县城。下旬，建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5月下旬，红4军三次打下龙岩城。全歼敌陈田辉部。接着占领了永定县城。先后成立了永定、龙岩县革命委员会。由张鼎丞任永定县革命委员会主席、邓子恢任龙岩县革命委员会主席。7月21日，在上杭蛟洋召开了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闽西特委，邓子恢任特委书记，张鼎丞任军委书记。到了8月间，红4军在闽西先后占有了长汀、上杭、连城、永定、龙岩、武平6个县。1930年春，长汀等6个县先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同年3月18日，在龙岩县城召开了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由邓子恢任主席。闽西各县赤卫队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9军（后改称第12军），由邓毅刚任军长、邓子恢任政委。

1930年6月中旬，前委在长汀召开扩大会议。会后，红4军与赣南红3军，闽西红12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团，随后红20军、红22军亦编入红1军团。同年8月，红1军团与红3军团合编为红1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

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宁都的小布宣布成立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为全国苏区党的最高机构。

对于苏区中央局的成立，在1930年的8月29日，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在《中央关于在湘鄂赣三省成立苏区中央局给长江局的信》中即明示：

> 中央决定在湘鄂赣三省苏维埃区域中，成立苏维埃的中央局，以指导所有的苏维埃区域中的工作。当着有些区域还没联成一片时，则由长江局、南方局或省委管。

时中共中央派关向应前往红1方面军组织中央局。当关抵长

沙附近时，正值红1方面军二打长沙，战区阻隔，无法通过，只得又回中央。9月初，中共中央又指派长江局军委负责人西一（即周以粟——作者注）前往，组织中央局。周在袁州追上从长沙撤退的红1方面军，后因第一次反"围剿"战争迫在眉睫，成立中央局事又放下了。9月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再次提出组织中央局事。在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中，谓：

> 扩大的三中全会完全同意中央政治局立即在苏维埃建立中央局的办法，以统一各苏区之党的领导。当着苏维埃临时中央政权建立起来后，苏区的中央局应经过党团在政权中起领导作用。

10月底，中央派江钧（即项英——作者注）前往红1方面军主持建立中央局。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致信毛泽东等，谓：

> 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未到达之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毛泽东同志代书记。委员名单另附。

11月，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内中又指出：

> 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各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

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的这些规定，与李立三时的中央的规定所不同之处，是改变了将中央局和中央政权设在中心城市。而主张将中央局设在农村。

时项英为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其9月到上海参加四届三中全会，会后又返回武汉。于1931年1月上旬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

项英抵后，即向红1方面军总前委传达了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时正值第一次反"围剿"间，中央局未能立即成立，1931年的1月15日才正式宣告成立。同时发表了第一号通告。谓其：

> 管理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各级党部，指导全国苏维埃区域内定的工作。

中共中央拟定的名单，中共苏区中央局由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及湘赣边特委一人，CY中央一人，共九人组成，周恩来为书记。因当时周恩来在上海党中央任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兼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人，一时不能来苏区，中央局书记由项英代任。任弼时、余飞亦未能来苏区。河西(赣江西)交通阻隔，湘赣边特委也不能来人。故中央局成立时，在苏区的中央局成员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曾山四人，按照中央计划，全国各苏区划分为七个特委；赣西南、湘鄂赣、闽粤赣、赣东北、赣鄂边、鄂豫皖、左右江，均归苏区中央局领导。而随后成立的鄂豫皖分局，湘鄂西分局，均是苏区中央局的分局。由于交通阻隔，共产国际十月来信和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况，中共苏区中央局开始均无从知道。3月中旬，出席全国总工会代表会的赣西南代表肖道德、胡家玲、戴辰生三人由上海回来，他们只带回共产国际关于批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来信，并无四中全文件。

"富田事变"的经过

苏区中央局成立后，首先解决了"富田事变"。富田事变是怎样

一回事？说来话长。

富田位于江西的吉安、永丰、兴国三县交界处，属于吉安县管辖的一个村庄，这里山清水秀，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的基础很好，曾一度是中共江西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所在之地。

1930 年 10 月，红军攻克吉安城，在清理敌人文件时，发现了一张条子与江西省委书记李文林的家属有牵连。这样，李文林立即成为重要的特嫌，被红军总前委在黄陂扣留。李文林，1900 年生，江西吉水人。原名周金堂，又名周郁文。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期在南昌从事学生爱国运动。1927 年春在朱德军官教育团任军事教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同年 11 月领导路口山区失散武装，成立工农革命军第 9 纵队。1928 年 1 月指挥部队配合延福党支部领导农民武装攻打阜田获胜，不久任赣西特委委员兼秘书长。同年 7 月、11 月领导组建江西红军独立第 2 团、第 4 团，任第 2 团团长兼两个团的政治委员。曾率部攻克吉水、峡江、乐安、兴国等县城。创建了以东固、延福、桥头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成为红 4 军向赣南、闽西进军的支撑点和策应地。毛泽东称其为“李文林式”的根据地。1930 年初成立赣南红 6 军，任第 1 旅党代表。2 月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党务委员兼军委书记。3 月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中共党团书记。6 月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不久即去上海，向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会议。李为东固地区江西省红军独立 2 团与 4 团的创建人，曾以党绝对领导军队而受到毛泽东极口赞誉的英雄人物。他任赣西南特委常委时，曾是当地抓 AB 团的带头人，特委决议中甚至有“实行赤色恐怖”的口号。时李为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书记。12 月，李文林被定为 AB 团首要人物而逮捕。

李文林被捕之后，红 1 方面军总前委派李韶九以特派员身份，带领红军一个连队由东固到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进行肃反。

李韶九是江西雩都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省立吉安第

七师范学校学生。1925年参加革命活动，后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6军中任政治指导员，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后返回老家组织农民武装，参加了雩都农民暴动。1928年初任赣南第9纵队纵队长。1929年任江西红军独立第2团团长。1930年2月任红6军1纵队政治委员。6月任中共红1军团前委秘书长，9月任红1方面军秘书长兼肃反委员会主任。李文林事出后，李韶九立即到了富田。

李韶九到富田后，把红1方面军总前委的一封指示信交给了曾山和陈正人。时曾山为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委员，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陈正人为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宣传部长、代理书记。总前委的指示信中说，江西省委秘书李白芳、省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金万邦、财政部长周冕，都是"AB团"，要免除他们的职务，监视他们的行动，中共江西省委见了前委的指示，不敢怠慢，立即将上述人免除职务，并进行监视审查。接着，总前委又派了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到中共江西省委和红20军中协助进行肃反工作。李、古二人，大搞逼供信，把红20军中大批久经战争考验的领导和骨干，大部分被认为是"AB团"分子。

这里把"AB团"的情况作介绍。

在三十年代初，红色区域内大肃反时，AB团、改组派、第三党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对于AB团，当时的一份宣传大纲，对AB团作了如下解释，为使读者明了，现抄录于下，这份宣传大纲是1930年6月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制的。全文为：

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

一、什么是改组派、AB团

1、改组派——改组派是国民党挂羊头卖狗肉的反革

命者，他们本是国民党左派，如汪精卫、陈公博等，同时他们又称为国民党的正统派，后来因为蒋介石以军治党把汪精卫赶下台，于是汪精卫便主张国民党要改组，所以就称他们为改组派，这一反革命派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利益，实在已投降帝国主义，变成了中国反动营垒中最严重的阶级敌人。

2、AB团——AB团是江西豪绅地主的封建组织，是江西地主豪绅的集合场，他们没有什么反革命主张，只是一味的争权夺利，升官发财为主义，这反动组织是在前几年北伐军克复江西以后，1927年产生的，当时江西的新豪绅如段锡朋、周利生等为要提取江西政权，巩固他们的饭碗，御承蒋介石鼻息，于是形成了这一反动组织。最近两年来，因为AB团内部自己权利分得不均，于是引起冲突，现在他们有左派与大同盟之分，这是狗争骨头狗咬狗的把戏，就是AB团死亡的象征，我们要认清AB团是江西豪绅地主的代表，是江西工农劳苦群众最严重的敌人。总之，上面二个反革命东西虽是各个不同，然而他们反对工农阶级摧残工农革命是一样的。工农群众必须认清这些阶级敌人，把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应该针对着改组派AB团勇猛的杀去!

二、改组派、AB团的反革命罪恶

工农群众认识了这些残酷恶兽——改组派、AB团，我们现在再要把他们的反革命罪状宣布如下：

1、解散工农会，缴工农革命武装——当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时候，就是改组派、AB团公开背叛革命的时候。这些反革命因为看见湖南、湖北、江西、广东等省工农群众

伟大的力量。恐怕工农群众夺取政权对他不利。于是1927年始向革命势力反攻,把革命的工会农会解散。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的枪械缴去。建立豪绅地主的靖卫队。自此以后,工人农民开会的权也没有了。到处总是捉工人农民共产党员。这是他们第一件罪恶。

2、屠杀工人农民共产党员——自民国十六年国共分家以后,这些残忍的改组派、AB团,便积级高唱铲共口号。把过去加入了工会农会的工人农民捉到下狱。并无情的屠杀,张发奎曾在广州用水机关枪剿过工人农民一死数百,捉到革命妇女割破奶胸,杀革命同志的家属,如安福革命的李精同志以及许多革命同志不是被他们屠杀了吗?经这些反革命东西到现在对付革命群众还是采取屠杀政策一贯的大反其革命(原文如此——引者注)。

3、投降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在中国统治受了大革命打击,他的基础已动摇了,中国工农早已经有解放的机会,可是这些反革命改组派AB团生怕帝国主义塌台,自民国十六年起就禁止工人农民反帝国主义运动,说工人农民不要过火,一切外交听中央解决,可是他们实际就投降了帝国主义,认帝国主义为主人翁,最近陈公博主张联美,汪精卫拜见英相麦克唐纳尔就是他们投降帝国主义的事实证明。

4.助长军阀混战,加重劳苦工农的痛苦——中国军阀战争的延长以至现在全国混乱局面,与军阀战争所造成全国苛捐杂税民不安生的凄惨状况完全是改组派、AB团助长的结果,今年安福许多人被捕流离失所。田不能耕、夜不能眠的同志及一切群众痛苦,何尝不是改组派、AB团所造成的哩!亲爱的群众们,他们反革命的罪恶,是难以说尽的啊!

三、为什么要反对改组派、AB 团

改组派、AB 团的真面目已在面前暴露了，他们反革命罪恶已经告诉大家了，现在我们再要说明为什么要反对改组派 AB 团，我们要知道现在是革命高潮时期，这时期是工农革命斗争激烈，反动统治阶级快要崩溃的时期，我们的敌人现在正欲与我们作最后挣扎，敌人与我们已非常接近了，在这样的紧急关头，我们只有下最后决心，用极大努力一致鼓勇消灭敌人，现在据赣西南苏维埃政府通报赣西各县改组派正在活动，潜伏在赤色区域内假借共产党的口号，如分田抗债等来欺骗群众，引诱群众入圈套。他们的阴谋是要破坏工人农民的苏维埃政府，破坏分田，陷工农于九重地狱，好让土豪地主来占世界。他们最近并借军阀淫威用烧杀政策，威胁群众入守望队。指示工农杀工农，造成不安生的局面。他们的居心是何等的险毒啊，我们赶快明白，为要保持我们的苏维埃政府，为要保持我们已经分得的土地，为要求得革命的民众安全，为要达到现时社会攻吉安以至于湘鄂赣三省政权的目的，就必须要下决心来看清躲在赤色势力下的改组派、AB 团分子。这些分子是赤色区域下奸细，是我们最近的敌人，大家一致的起来，肃清改组派鸭比团（AB 团——引者注）

四、怎样去肃清改组派、AB 团呢

我们要肃清改组派、AB 团，就必须实行下面的几个办法，而且要努力做到：

1. 扩大对改组派、AB 团的宣传，使革命民众个个都

晓得改组派、AB团是我们的敌人，凡是口头上喊革命，实际上不帮助工农杀豪绅，分田地，建立苏维埃的人，群众应监视他们，否则就要受他们的欺骗。工农群众应该认清，只有共产党才是革命的，只有共产党才会实行分田，帮助工农取得一切的实际利益。要使每个公民都能认清改组派、AB团的真面目。

2、严密革命群众组织——过去改组派、AB团能够在赤色区域下秘密活动，主要的原因就是革命群众组织不够严密。以后，凡赤色区域内政权机关都要管理群众，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该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人经过赤色区域时，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至于政权机关办事人更不容许有富农分子及反动形迹潜伏苏维埃政府，其委员主席必须要贫苦工农革命分子。各地赤卫队亦应其组织严密。班长应时常管理所属的一班人一切行动，队长应管理全队人一切行动。同时，革命的群众还要注意的，是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及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他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只有这样，才能肃清红旗下的奸细——改组派、AB团。

3、实行赤色清乡——为要实现肃清红旗下的奸细，更快地促进反动统治的崩溃，安福必须实行赤色清乡——宣布戒严，加紧步哨，检查行人，断绝交通，挨户检查，登记人口，自赤色清乡以后，各地须有不至发生反动事件。苏维埃政府应注意实际的管理群众。

4、实行赤色恐怖——改组派其所以敢大胆活动，就是因为苏维埃政府对反动派的无意有意的优容，现在各

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

亲爱的群众们！上面是肃清改组派、AB团的办法，望大家一致努力实行呵！

当时，江西省行动委员会亦印发了《为肃清AB团告革命群众书》，内称：

贫苦的工人、农民、贫民们！
劳苦的妇女们！
痛苦的青年们！

AB团是豪绅地主阶级的集团，是破坏工农革命的反动组织，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的刽子手，它（AB团）用尽一切卑污的手段，毒辣的行动，以进行其反革命的阴谋、破坏革命、所以AB团是中国革命的严重敌人之一，彻底肃清AB团是革命群众刻不容缓的责任，应有的使命。

在赣西南革命斗争日益剧烈，土地革命深入的时候，统治阶级除了躲在吉安赣州坐以待毙以外，虽然没有力量来向革命势力各极地进攻，可是他们潜伏苏维埃区域内，混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里面，作种种反革命的行为，企图作最后的挣扎，以苟延其残喘，这是革命斗争深入的必有的现象，不是一件偶然的怪事，最近整个赣西南都破获了AB团的组织，捕杀了许多AB团的首领，供出了AB团的捣乱计划。赣西南的AB团经过这一次致命的打击，我们相信可以把他们肃清了！

革命的群众们！东路AB团的组织，亦有很多，现正

在着手进行破获AB团的工作，拘捕AB团的分子。你们不要恐慌，不必害怕，我们只杀AB团的负责人，被胁迫而受蒙蔽的贫苦工农，只要能痛改前非，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决不会杀头的，共产党始终是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的，革命群众一致的起来，在本党领导之下，来彻底肃清AB团，使AB团再无存在的余地，活动的可能！也只有革命群众的一致力量，才能达到肃清AB团的目的，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我们的口号：

一、革命群众一致起来肃清AB团！

二、革命群众一致起来消灭封建势力！

三、只杀AB团的首领，不杀被胁迫加入AB团的工农！

四、肃清AB团，保障土地革命胜利！

五、欢迎被压迫加入AB团的工农回头革命！

六、消灭AB团，完成赣西南地方暴动！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六日

究竟红色区域内有无"AB团"、"改组派"，"第三党"？回答是肯定的，所谓的AB团、改组派、第三党，纯系子虚乌有。只是在历史上，也确有AB团、第三党、改组派这三个组织。

先说说改组派。

"改组派"由"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化而得名。它是国民党的一个派系。1927年，武汉汪精卫政府于"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与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合流，之后，国民党大权仍操纵在蒋介石手中。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等对蒋之专权十分不满，遂酿成了蒋汪之间的派系斗争。1928年间，汪派骨干分子陈公博、顾孟余等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后人

皆呼“改组派”。1929 年 3 月改组派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中央设总部、各省市及海外设支部。南京、北平、上海等大城市和江苏、湖北等省及海外法、日等都成立了支部，1930 年为改组派最盛时期，时全国成员达万人以上。

改组派反对蒋介石专权独裁，亦仇视共产党，仇视工农革命运动。他们打着恢复国民党“1924 年改组精神”的旗号，倡导重新改组国民党。然其真正的意图是借改组之名，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正统之位。说白了，改组派只是反蒋在野派。其所代表的利益与蒋氏相同。1931 年，汪精卫在香港宣布解散了“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同年 12 月，汪、陈、顾等在国民党中央内终争得一席之地。

“AB 团”是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新右派的一个反共组织，其全称为“AB 反赤团”。AB 是“反布尔什维克”的英文缩写。北伐军占领南昌后，蒋介石为了破坏江西的工农革命军运动，夺取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江西国民党省党部的领导权，通过其党羽中央党部组织部长陈果夫派段锡朋、郑异来、洪轨等到江西，以“庐陵同乡”、“北大同学”的关系，网罗党羽，于 1927 年 1 月秘密组织了专门从事反共活动的反革命团体——AB 团。AB 团的宗旨是“反对联共、联俄、农工等政策，取消民主主义”。其建立不到三个月，即遭到江西革命人民的打击，于 1927 年 4 月 2 日国共尚未分道扬镳时，即被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领导的“四·二”大暴动，一举推翻。从此 AB 团彻底解体。

到了 1931 年 4 月，曾经是 AB 团头子的段锡朋说：“AB 团在‘四·二’暴动后，一般忠实的同志，纷纷逃避京沪，此时适逢中央开始清党，AB 反赤团之目的已达，非但按诸党纪，党内不得再有组织，即环境之变迁，人事之移易，亦万无可以存在之形势，AB 反赤团因已无形解散，并将其经过情形呈报中央，即在中央党务刊物，亦曾正式备载其事。”

段锡明的讲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因而，说苏区内有 AB 团，

完全是子虚乌有。

“第三党”是指 1930 年 8 月邓演达等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由谭平山、章伯钧等 1928 年春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来的。“临时行动委员会”以邓演达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郑太朴、章伯钧、黄琪翔、李进琫等分任组织、宣传、军事、青年委员会主任。下设中央、上海、北平、香港四个直属的区干部和江苏、浙江、河北等省地方干部会，出版《革命行动》等刊物。“临时行动委员会”既反蒋，但也不赞成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企图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外，成为独占中国革命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故人称之为“第三党”。

第三党虽然在思想上不同意共产党的做法，幻想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找一条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间道路，但他们的政治主张的主要方面是坚持反帝、反封、反蒋的。因而，第三党还是具有很大进步性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政党。

1930 年 12 月，第三党首领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第三党受到沉重打击。到了 1935 年，该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 年后改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成为爱国民主党派之一。

话转回头。据史载，中共在所领导的红色区域内抓 AB 团，是从赣西南地区开始的。从 1929 年下半年，赣西南的一些地方就在肃反中抓 AB 团了。

在肃整 AB 团的过程中，赣西南苏区把 AB 团说成南京有总部、各地有分部、并已大量打入中共内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

到了 1930 年“二·七”陂头会议后，抓 AB 团即扩大到军队，红 1 方面军在打 AB 团的过程中，从所抓的“AB 团分子”刘天岳、曾昭义、龙超清、梁鼎元、江克宽、周赤等的口供中，说省行委内有江西 AB 团的总团部，这样，抓 AB 团又扩大到了省行委。

红1方面军总前委在1931年10月14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

> 赣西南党、团、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机关，多数为AB团所充塞。

10月26日，红1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又发出指示，称：

> 现在赣西南的党内和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AB团)……改造全部党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赣西南的党团内……严厉地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

此后，打击所谓AB团的活动即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对所抓的"AB团分子"，采取的是逼供信的手段。在1930年9月24日赣西南特委印发的第20号《紧急通告》中，在题为"最近破获赣西南AB团的经过"的文内有这样一段记载。称：

> 团特委发行科朱家诰，因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万安县委破获，AB团告朱是团员，写信告知特委，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在初坚决不肯承认，我们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织，组织赣西南的AB团的总团长是谢兆元，当即把谢兆元及总团部的一切人员全部捉拿，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党团特委和赣西南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

《紧急通告》中还说明了“彻底肃清AB团的具体方法”，称：

> 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供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地严刑审问，找出线索，跟踪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的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事实上，AB团就是在“苦打成招”中出来的。

“富田事变”即在赣西南和江西省委大抓AB团时发生的。

话转回头，继续说“富田事变”经过。

李韶九、古柏二人到了红20军后，见到了军长刘铁超、政治委员曾炳青，向二人讲了总前委的指示，二人不由分说，即在红20军中抓起了AB团。

从1930年10月4日红军占领吉安发现那张与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家属有牵连的条子时起，到12月，仅两个多月的时间，李韶九和古柏即以AB团名义，在军队和地方上抓捕了四千多名干部。在红军中杀了几十个“AB团总团长”，约占红1方面军和湘赣红军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侥幸没被挖出的“AB团”的干部，不少也被当右倾分子受到打击。最后，连20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也逮捕了。

时红20军147团政委名刘敌，与李韶九是同乡，都是湖南嘉禾人。刘敌本在李韶九的被抓名单之内，因系老乡，留了个面子。李找刘谈话，说：“刘敌，不少AB团分子都供出了你。”

刘敌惊了一身汗，说：“我是不是AB团分子，你还不清楚吗？”

李韶九说：“可供你的人很多，我看有甚你就说罢，免受皮肉之苦。”

刘敌说：“容我想想。”

李韶九答应了。刘敌回团之后，立即和营长张兴，教导员梁学

贻紧急商议，刘敌说："李韶九是个反革命分子，他抓了许多干部，把我们政治部主任也抓了，还要捉我们，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我们不能让反革命分子阴谋得逞。"

张、梁都同意刘敌意见。于是，刘敌集合一营人进行了动员。战士们听说李韶九是反革命分子，都很气愤。于是刘敌带着这一营战士，包围了军部，捉住了军长刘铁超，释放了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李韶九当时恰好没在军部，他闻讯之后，慌忙逃走。红 20 军政委曾炳春当时也没在军部，他听说军长被捉，吓得不敢回队，而是躲到了家乡。谢汉昌便带着红 20 军进攻富田镇，包围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缴了省警卫连的械，释放了被关押的"AB 团分子"——被捕的省苏维埃和省行委的一百多人。李韶九逃走的时候被捉住。古柏、曾山闻枪声连夜逃跑，战斗中，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亦被误捉——战士们疑其是李韶九的人。

事变之后，刘敌等即喊出"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这就是历史所说的"富田事变"。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军总前委紧急指示陈毅前往东固解围。时陈毅为红 12 军军长。他立即率一连人前往东固调解处理，救出了被刘敌等扣押的人，其中包括被扣押的李韶九。不久，陈毅被任命为赣西南特区委书记。

"富田事变"中的两种态度

事变发生后，刘敌等即率领红 20 军越过赣江、到永新、永阳一带，脱离了红 1 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与此同时，刘敌等又制造了一封挑拨离间的假信，派人送与彭德怀、朱德。信是伪毛泽东之笔迹、毛泽东之口气写的。给彭德怀的信内称：

古柏同志：据目前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方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实现，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共产党英文字母缩写——引者注），与地方CP同时并进，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内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勒令招出朱、黄、滕、彭系红军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拼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三人，任何人不得告知。

毛泽东

时红3军团指挥部驻在于都的东山坝。彭德怀接到了信，看后大吃一惊，即把滕代远，袁国平、邓萍等找来，将信与他们，众将看后，滕代远说："这封信有诈，毛泽东不会写给古柏这样的信，其中定有阴谋。"

袁国平沉吟了一会说："这是封挑拨离间的信。"

彭德怀说："富田发生的情况，我们不了解，但谢汉昌等提出的反对毛泽东，我们不赞成，我们红3军团服从前委指挥。"

邓萍等也都表态支持彭德怀的意见。这时，谢汉昌也写信与彭等，拉彭等反毛泽东，彭等仍坚持拥毛。并由彭起草一信，讲了拥毛之意，派人送毛。当下，接着彭德怀又起草了一个"拥护毛泽东、拥护总前委领导"的宣言。随后，红3军团指挥部移驻小布，这儿离总前委所在地黄陂只有七公里多。彭德怀、滕代远到总前委请毛泽东到了军团，为军团干部讲了话，说明了情况。使干部们了解了富田发生情况的真相。

在彭德怀、滕代远等接到谢汉昌信的同时，朱德、黄公略也接到了谢汉昌等人的间离信。朱、黄看后，也认为信的内容是对毛泽东的诽谤。当下，朱德将黄公略、彭德怀等召集到一起，起草了《为富田事变宣言》，而后于12月17日由朱、黄、彭三人联名发出。18

日，三人又发表了《给曾炳春等一封公开信》。宣言和公开信都表明了态度。呼吁苏区工农群众，红20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共同对敌。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1方面军总前委召开了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合作的叛变，遂作决议，内称：

> 实行挑拨离间，竟不惜一面说出要勒招朱彭黄滕的罪状捕杀朱彭黄滕，一面企图挑拨朱彭等来杀毛周（指周以栗——引者注），竟如此毒辣，陷害同志……我们问为什么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呢？是不是毛泽东同志个人问题？决不是，如果是毛泽东同志个人问题，为什么还要提起周以栗同志呢？纵令退一万步，以栗同志刚到江西，使了什么政治手腕？捉了哪一个？打了哪一个？AB团取消派还得敢造谣吧。那么为什么要打倒毛泽东同志呢？正因为毛同志，代表正确的革命路线，目前实际在领导斗争，推动中国革命。AB团取消派企图破坏中国革命，所以就要打倒毛泽东。正因为以栗同志代表中央正确路线，所以同样要捉起。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给一个打倒。同志们，当此阶级决战紧急，蒋介石在外面大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线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啊！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20军在河西一带活动期间，没有与敌人联系，亦没有任何人投降敌人，却大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将游击队编为175团，并准备攻打吉安。他们把事变经过向赣西特委书记王怀仁汇报了一遍，王怀仁听后，认为富田事变不是反革命暴动，而是路线分歧。最初，总前委将其定为反革命暴动，而后发出通告。项英主持中央局工作后，作出了决定，通告称：

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

在"通告"发出的同时，项英又以中央局的名义，通知赣西特委和红20军党委，要他们立即停止党内攻击，听候处理。并责成曾炳春到永新一带，把红20军带到河东，并通知赣西特委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都到宁都黄陂苏区中央局开会，以党内会议方法解决分歧。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人都遵照指示，到达了黄陂，参加了中央局的会议。谢汉昌等人都在会上认真地检讨了自己。项英认为检讨的不错。而后，派了段良弼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富田事变情况。

"三人团"下车伊始

段良弼到了上海后，中共四中全会已开完，王明等已掌了中共大权，由于富田事变当事人大都是赣西南拥护立三路线的，所以王明等对富田事变甚为恼火。于是，中共中央向红军第1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发出《关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派与富田事变》的通知。通知内称：

蒋介石最近又增加了十万兵力，重新规定第二次的"剿共"计划，在计划中最中心的问题是：集中兵力，徐图红军内变，以便一举而歼之。所以蒋介石政府现在不仅调动武力，并且调动一切反革命的社会力量，不仅动员后方，并且动员苏区内部反革命的力量，来进行破坏苏区与捣乱红军的阴谋。苏区内部的地主残余富农分子都是反

革命必然要动员的力量，AB团、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更是反革命最得力的组织工具。而党内立三路线的领导和影响，更给了AB团富农分子以莫大的帮助，他们可以利用一刻不停留的去打南昌武汉，集中一切农民武装到红军中来的立三路线立三路线之盲动冒险主义的策略（原文如此——引者注），来便利他们在后方捣乱，有时他们更要夸大他们的力量来恐吓革命，故意散布谣言与污蔑，来动摇革命战线，来扰乱群众视听。真正的布尔塞克维，老练的革命党员，在这种地方便要首先稳定自己的阶级立场与政治路线，认清自己的斗争任务，来确立行动的方针。不幸的富田事变，恰恰发生于敌人加紧向我们进攻而红军与群众正在与敌人艰苦作战的当儿，无论如何，总是便利于敌人而削弱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总是给AB团活动的机会而涣散我们自己。现在中央所得的关于富田事变的材料还不能算为齐备，尤其是没有得到总前委的正式报告，因此，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先，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地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中央代表团到达以后，中央局立即组织起来，各地党的组织与红军必须统一于这一指导之下，应绝对服从中央局关于这一事变的解决。

同志们！阶级决战是你们斗争的任务！不仅在战场上要拼命的一致的与蒋介石的军队肉博，并且要在苏区内部与一切阶级敌人——地主、豪绅、富农、官僚、资本家、改组派、AB团、取消派、第三党作残酷的斗争，这首先便须肃清党内的立三路线。敌人越从外部进攻，内部的阶

级斗争便越发尖锐。不统一指挥不能巩固战线；不巩固战线，不能肃清内部的反动；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同志们！这是战斗的任务！中央深信这一指示到达各地党部后，一切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战士，都将如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一起，为着共产国际路线与中央的决议而斗争。一切的阶级敌人，都将在革命团结的力量面前失败、死亡和消灭。

中央

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1931 年 3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富田事变再次作出决议。内称：

中央政治局在详细的研究赣西富田事变的已有材料之后，更根据目前事变的发展，特对此事变成立以下的决定：

（一）红军二十军一部分暴动，红军学校之被缴械，在AB 团影响下省行委分子之释放，中央特派员易尔士之被捕以及“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的提出；——这些行动实质上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敌人以及它的斗争机关AB 团所执行的反革命行动，他们企图消灭党与红军的队伍，破坏党与红军的领导，他们的目的是帮助着南京政府来进攻和消灭红军和苏维埃运动。

在阶级敌人的这种行动中，一部分党员与二十军一部分队伍是受了 AB 团的欺骗与迷惑，但这种情形绝不能减轻此次事变的反革命的实质。

（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总前委坚决反对阶级敌人的路线实质上是正确的。这种坚决与革命敌人斗争的路

线在任何时候都应执行。总前委（现在的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应用一切可能与力量吸引广大的劳动群众——工人、雇农、贫农、中农、城市贫民参与肃清苏区内反革命组织与一切反动分子的斗争。红军内以及红军外的一切指挥机关应格外注意反对反革命的斗争。

富田事变指证出：反革命势力在苏区内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他的基础建筑在各种剥削分子——地主、豪绅、富农、大商人以及旧官僚的身上，在南京政府与白色区域鼓舞之下，极力发展他们的积极性，并且很巧妙地进行他们的工作。他们更侵入我们的党、团、红军、苏维埃和工会中进行他的破坏工作，以援助南京政府向革命的进攻。同时这些反革命分子凭借着苏区内富农的领导，更利用立三路线上的"左"的以及极右的口号，来破坏工农的联合，来削弱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与葬送红军的主力。这种反动势力不是在个别的活动，而是有组织的有严密计划的在做工作。AB团的存在与发展就是很好的证据。同时福建的社会民主党，湘鄂西的硬肚会、北极会，各苏区的改组派、取消派、以及最近从党内分化出去的罗章龙右派小组织，都必然是江西AB团的第二，而且有些地方，他们已经进行了反革命的暴动（如闽西的傅柏翠等）。这些反革命的组织对于我们苏维埃运动是一个很大的危险，绝对不应轻视这种危险。同时，过分的估量反革命的组织力量及它在群众中的欺骗影响，而减弱我们有群众力量有正确路线可以战胜阶级敌人的坚信心，这也是一种危险，它将增加党员中群众中不自信的恐慌，并助长立三路线揭发后的悲观，失望，消极，逃跑等等右倾情绪，闽西在傅柏翠社会民主党的反革命暴动后，一部分群众中失败情绪的增长，便是主要的例证。

因此苏区中央局以及一切党和团的组织要严格的执行以下的任务:(1)严厉的消灭AB团与一切反革命组织,一直使他们在苏区内无法抬头与进行他们的反革命活动;(2)立时将一切反动分子与剥削分子,由党、团苏维埃、工会以及一切群众组织中清洗出去,特别是旧官僚分子;(3)建立严密的苏区,肃清苏区内一切反动的武装来武装农民,并打碎苏区内反革命的集群——这是我们还未实现的最主要的军事任务;(4)在城市与农村中组织与扩大阶级斗争,要认识"杀尽一切富农"的口号是不正确和有害的。农村中有组织的贫苦群众,应执行反富农的斗争。用"杀尽一切富农"的错误口号从上面打击富农来代替贫苦群众有组织的反富农的斗争,只有吓退中农与加强反动势力。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是到处组织贫农团与雇农工会,在一切地方发展反富农与一切剥削分子的群众斗争。

(三)永阳省行委(这次反革命事变的指导者)应立时解散。立时停止它的一切活动,与永阳省行委执行同样行动的其他党部,亦应受同样的制裁,如果他们不执行此要求时,应以适合革命利益的无情的斗争来回答他们。

在未举行江西省代表大会以前,由总前委所成立的河东省委是全权的省委,他应在总前委(现在的苏区中央局)的指导之下准备召集省代表大会。赣江以西的各县地方党部和永新、莲花、宁冈、遂川、泰和等在未与河东省委打通以前,得暂归湘东南省委管辖。

(四)红军二十军的指挥部,应使全军回到整个红军的系统中来,并须毫无抵抗的执行红军总司令部的一切命令。他如果不这样办,应无情地与他作武装斗争,同时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要用一切可能将二十军挽回到自己

的监督下来，不允许以后我们任何队伍重演这种行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对军事组织中的分裂负责。

……

（六）二十军暴动的事实告诉我们：红军中的各级党部还没有了解和执行党与中央指示给他的任务和责任。红军中各级党部的重要任务是保持和加强红军的革命纪律与战斗力。因此执行上级机关，指挥员与政治委员的命令是每一个党员团员第一步的基本任务。不执行命令，批评这种命令和行动计划，批评上级指挥员的战略，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各级政治委员，不但有权力停止队伍中党部所通过的削弱红军战斗力与纪律的决议，并且有权力解散该支部以及开除支部中个别同志的党籍。即红军以外的党部，亦不容许在公开会议或公开文件中批评红军指挥部的行动计划和策略。

……

富田事变他方面又指出，二十军中一部分党员受了AB团捣乱的欺骗和迷惑，他们认为可以用分裂军队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争执，因而走上了分裂二十军以及用武装斗争反对苏维埃机关与其他红军的道路。

中央坚决的指出，在红军问题中，在党的组织问题、经济政策以及土地革命问题中，没有任何党的争执应该引起分裂和破坏红军的行动的，而且绝不容许拒绝执行上级军事机关的命令和破坏军事纪律，我们军队中的党员，对于这种拒绝执行基本任务的行动，应采取最严厉的制裁。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被王明把持的中央指定为中央代表团后，由任弼时为团长，即动身由上海直奔福建。同去的还有叶剑英、欧阳钦等。一路上风餐露宿，非止一日，到达了中共闽西省永定的虎冈——后来人称任弼时等三人的中央代表团为"三人团"。在这里，任弼时见到了闽粤赣省军区参谋长肖劲光。前文述过，任与肖为老同学，当年两人曾一起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肖于1930年夏天回国后赴苏区的，二人今日于此相遇，分外高兴。

任弼时等三人在虎冈召开了"虎冈会议"，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稍事停留，便到了江西宁都县的青塘。在这里，任等与项英、毛泽东、朱德等人会面。时朱、毛正策划如何反国民党部队的第二次"围剿"，并为此召开了中央局会议。会上对如何反"围剿"争论不休。缘由是有人于会上提出了斯大林的指示，说斯大林曾讲过，四川将是中国最理想的革命根据地，斯大林是国际共运的领袖，他的话系"金口玉言"，因而，这些人主张放弃江西苏区，转移到四川，到那里建设苏区。有人提出仍在江西努力。会议一连开了三天，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得召开扩大会议，彭德怀、黄公略、滕代远、罗炳辉、罗荣桓、林彪都参加了会议，这些将领，都同意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在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针。正在这时，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三人到了青塘。由于他们是中央代表团，又带来了四中全会的文件，于是，中央局的扩大会议继续召开。

继续的扩大会议上首先由中央代表团传达了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及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中央代表团发表了关于富田事变的意见。大会通过了五个决议，为：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土地问题的决议；关于1、3军团工作总结的决议；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CY工作的决议。

决议的中心思想是批评苏区中央局是在立三路线之下成立的，成立之后的路线上，又执行了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因此，对苏区中央局要实行改造。会后，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发出了会议的决

议第一号:《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内称:

> 中央局扩大会议,听了关于立三路线及四中全会的报告以后,完全同意国际来信和四中全会的决议。……扩大会特别指出四中全会的伟大意义,他深刻地批评了上述时期中央局的错误路线,痛斥了当时中央对国际指示,以及对国际代表的不尊重。……
>
> 江西党的路线大体可分为三时期说明:
>
> 第一,是1930年二七会议(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五、六两军委的联席会议——引者注)前的时期,这是机会主义的路线继续统治的时期,主要是没有建立苏维埃政权……
>
> 第二,是二七会议到二全会议(赣西南特委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引者注),这一时期……没有从组织上肃清机会主义分子,而在后半期,在政治上就接受了立三路线的影响,使苏区忽视了巩固工作。
>
> 第三,是二全会议到富田事变。二全会议,就是立三路线领导的会议,实际上是AB团操纵向党进攻。二全会议后立三路线便完全统治了江西的党,动摇了平均分配土地的原则,把地方武装集中到二十军、卅五军,抛弃苏区的巩固工作,冒进地攻打中心城市,攻赣。对于一方面军前委的批评,"是同时扩大,同时深入,是十足的农民意识。""先打吉安,后打九江,是断送中国革命高潮。"立三路线这样的发狂,结果做了AB团一面好旗子,造成了反革命的富田事变。
>
> 苏区中央局是在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之下成立的,它的路线,当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路线。……
>
> 再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中央局的

通告说："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取消派的暴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这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没有认清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的参加的反革命暴动，而用"党内派别斗争"来解释这个事变。这种解释是非常错误的，脱离阶级立场的，这种解释是放松了反AB团的斗争，使AB团能够在这种错误的解决之下，能继续活动，继续发展他们的组织，所以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在目前这种形势之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

……

二、立刻规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

三、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不仅要洗刷地主豪绅的子弟富农流氓等等，还要建立苏维埃的经常工作，要在工作中去获得群众的更高信仰。

……

六、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

中央局扩大会议之后，毛泽东、朱德等去了前方，中央局由项英、王稼祥、任弼时三人主持工作，任弼时、顾作霖被任命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分任中央局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王稼祥为政治保卫处处长。这时，富田事变的性质变成了敌我矛盾，成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谢汉昌、刘敌、李白芳等参加富田事变的人全部被逮捕，并以"AB团"的罪名而处决。对于7月间回到于都县平头寨的红20军副排以上的干部，也一律作为AB团骨干缴械关押，并大部处决。

最后，连为教育红 20 军作出贡献的政委曾炳春、军长刘铁军、后任的军长肖大鹏，也未能幸免。红 20 军所剩的战士，编入了红 7 军。

是年 5 月，中央局会议责备项英在解决“富田事变”中“完全错误”，革命立场不坚定，报请中共中央，撤销其代书记职，由毛泽东为代书记，报请中央批准。并成立苏区中共江西省临时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项英派往省委工作。毛泽东在前方时，中央局由王稼祥负责。王稼祥并担任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之职。

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将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事件性质后，即将这一处理的决议发到了全国各苏区。使各苏区内肃反扩大化之火，迅速点燃，特别是那些热衷“左”倾的人，头脑愈发热了，便以为苏区内到处是 AB 团、改组派了，因此，到处乱抓乱捕，各级肃反委员会也相继成立。在江西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于 1931 年达到了高潮。

在中共的历史上，平反了许多沉年的冤假错案。但对富田事变，一直没有个说法。一直认定其是反革命事变，其根据有两点：一是喊出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二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和苏区的中央局都明确宣布它是反革命暴动。

近年来，许多党史研究工作者经过多方论证，许多老红军同志也提出：富田事变被处理为反革命事件，是一件冤假错案。肖克老将军于 1982 年在谈到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运动时说：

> “富田事变性质是反革命政变。当时有个布告，前两句是：‘段谢刘李诸逆，叛变起于富田，打起红旗反水，AB 取消两派，乌龟王八相连，……’，这是红军政治部布告，代表了我们的政治态度。对富田事变，曾山同志回忆最清楚，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有个决议。
>
> 关于李文林，我也有些看法，他建立 2、4 团最有功，比李韶九功劳大，但后来当作 AB 团杀了。他是土生土长

的领袖，而李韶九是南昌省委派来的。东固地区的革命武装，最后的起根发苗是李文林搞的2、4团。李韶九在肃反问题上犯有严重错误。他任保卫局局长，搞肃反扩大化，做了许多坏事。李韶九同我是一个县的人，我认识他，江西老干部一讲到他就伤脑筋。说他很坏。他把我一个最好的连（12军警卫连——引者注）调到江西省苏维埃当警卫连，结果说我这个最好的连全是AB团。如果是这样说，我这个师长是怎么当的？他如果没有死的话，我是无法投他的票的。

在革命战争中难免不犯错误，后来毛泽东同志得出一个经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泰和梁鼎元在毛泽东同志办公室当秘书，调到地方工作，到了赣东特委，也当AB团杀了。那是我认识的人。李韶九确实干了许多坏事，但你说他是反革命也不好说。此人是大革命过来的。当时根据地反革命确实有，到底反革命到了什么程度，确实要研究。反革命是有的，但是不是那么多？下层受骗的是不是作AB团？我认为不能那样看。”

富田事变以来，认为其是错案的依据有如下几点：一是把富田事变定为反革命性质的依据是严刑逼供，不是凭事实，而是李韶九乱捕乱刑讯促使矛盾激化；二是20军的一些人喊出了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而当时的毛泽东还不是中共中央的首脑人物，其地位与朱、彭、黄地位相等，在这种条件下，提出反对谁拥护谁，固然是一种严重的政治错误，但不能作为“AB团头子”和“反革命暴乱”的依据；三是红20军暴动之后，部队拉到了永新、安福、茶陵一带，没有一个班投降敌人，仍然坚持红军的一切宗旨，以后又根据苏区中央局的精神，回到中央局开会，并于会上承认错误，做出诚恳的自我批评。这些行动说明红20军指战员，拥护党中央

的领导，是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四是红 20 军同 AB 团毫无任何关系——而苏区中的 AB 团组织事实上也是子虚乌有；五是富田事变后，红 20 军没有杀被他们所抓之人，这一点，到目前止，尚没发现任何一点资料来证实；六是当时的红 1 方面军总前委，对红 20 军中被抓起的同志，以酷刑和杀人为儿戏，促成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事变后，红 20 军领导人诚心实意地回到会议桌上，却被当做反革命公审处决，对此，红军总前委和王明的中央要负责任；七、富田事变中红 20 军喊出的口号是“反对毛泽东”，而毛泽东后来成了“神”，因而，对这一事变，也就无人敢碰了，因此，对这一冤案错案，直到现在尚没有给予平反。近期，笔者同一些搞党史研究的同志提起富田事变，据他们讲，富田事变要有个“说法”了。是的，历史终究是历史，是不能依人的意志去转移的。

第八章　闽西苏区的疯狂肃"社党"

大"肃反"前的闽西苏区

中央苏区的肃反运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富田事变以前，各地肃反工作开展的比较慎重，虽然提出了"AB团"、改组派、第三党等所谓反革命的名称，但被指控为"AB团"、改组派等罪名者，名单都由内部掌握，对嫌疑犯的审讯和定案也很认真地进行核实。因此，被关、被杀的人不多，仅肃清了一些隐藏在红色政权内部的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富田事变发生后，那些头脑发热的人脑袋膨胀起来，开始乱捕乱杀。特别是各县的肃反委员会成立后，便不分阶级、不分真假，甚至将被迫供出来的人都当做"AB团"分子被捕押。这样，便使肃反更加简单化、扩大化，导至了"赤色恐怖"的出

现，并在1931年达到了高潮。此后，各级党的领导才逐渐有了觉察，开始怀疑中央的肃反政策，并自觉地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如立即停止处决，允许所谓的“AB团”工农分子自新等等。在审查的时候，也较注意阶级分析，重视个人的全部经历和一贯表现。同时，省、县都建立起裁判部，规定杀人须经过裁判部批准等等。但这已是肃反运动的第三阶段了。

这里把中央苏区内所属的闽西苏区大“肃反”情况，作个介绍。

闽西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南方建立较早而比较巩固的苏区，后来与赣西南苏区连结成为中央苏区。

闽西位于福建省的闽西地区，包括有龙岩、上杭、永定、长汀、连城、武平、宁化、清流、归化（今明溪）、漳平、宁洋十一个县，西接赣南，南邻粤东，境内山岭耸峙，丘陵起伏，物产丰富。但闽西地区交通闭塞，贫穷荒僻。

民国之后，军阀称雄割据，混战杀伐，闽西一带、战火绵延近两年，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921年，进步青年邓子恢、陈少微、章独奇、林仙亭、张觉觉等，在龙岩组织了“奇山书社”，吸引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一时间，达二百人之多。他们在一番彷徨之后，逐渐向往马克思主义。1923年，他们创办了《岩声》进步刊物，宣传新思想、新文化。邓子恢为《岩声》的主要撰稿人和发行者。在《岩声》创办一年之后，在厦门集美学校读书的李觉民等一批闽西籍学生，又创办了《新龙岩季刊》，谓：“凡是合理的，光明的，我们都竭力颂扬他；不公道的，鬼昧的，装上炮弹，猛烈攻击。”

1925年，邱织云、罗大准等又创办了《幻灯》、《虹痕》，宣传新思想、新文化。

闽西最早的一批共产党人，都是当地到外地求学的青年，大致来自厦门、广州及其他三个地区。在外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共产党，尔后返乡。如林心尧、阮山、陈正、郭滴人、李联星、温加

福、张赤男等。1926年4月，中共厦门干事会书记阮山和林心尧先后回到永定。阮山到达家乡湖雷乡以后，与先期返乡的赖玉珊、赖秋实、熊一鸥等建立了中共永定支部。由阮山任书记。这是闽西的第一个中共组织。

1926年夏，北伐军占领了闽西后，以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的闽西各县国民党县党部先后成立。时共产党员林心尧、张旭高、阮山、陈庆隆、张鼎丞、郭滴人等均为骨干，在闽西各地组织农协会，深入发动群众。使闽西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

1927年"四·一二"后，"福建拥蒋护党执行委员会"下令通缉邓子恢、郭滴人等十三人。与此同时，上杭国民党右派与豪绅地主相互勾结，用巨款贿赂和策动当地驻军蓝玉田部参谋长、黄埔系孙文主义学会成员刘炳坤，于5月7日发动了事变。以一营兵力和全城警察，于当晚9时分别包围了汀属政治监察署、县党部、县总工会、县农民协会和汀属八县社会运动人员养成所。这突然的事变，使上杭革命运动受到严重损失。林心尧等中共党员被杀害。

事变发生后，闽南特委负责人罗明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党组织转移到农村。

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经闽西时，周恩来和朱德于上杭会见了罗明及闽西各县党组织负责人，为其留下一批武器，以便闽西党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八七"会议之后，闽西各县党组织在张鼎丞、阮山、卢肇西、罗明等人领导下，相继举行暴动，形成了闽西土地革命时期农民运动的第一个浪潮。时有邓子恢、罗怀盛、陈品三组织领导的龙岩后田暴动；傅柏翠领导的上杭蛟洋暴动；阮山、熊振声领导的永定暴动；朱积垒等领导的平和暴动。

是年7月，中共福建临时省委决定在永定成立中共闽西特别委员会。由郭柏屏任特委书记、张鼎丞为组织部长、邓子恢为宣传部长。又将各县暴动武装编成红军第55、56、57三个团，由王海萍

为总指挥，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为副总指挥。在“左”倾路线影响之下，闽西各地的暴动相继失败，所成立的武装也分成若干小队伍，化整为零。

1929年3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4军入闽西，打垮了长汀守敌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并将郭击毙。各地的革命烈火熊熊燃烧起来，中共福建省委决定恢复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暴动委员会，领导闽西的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时以邓子恢为书记、谢汉秋为特派员。

3个月后，红4军又二次入闽，进一步促进了闽西党组织的建设与发展。到了1929年7月前后，闽西特委已辖有九个县级党委，即永定、龙岩、上杭、武平、连城、长汀六个县委和杭岩连边界、汀武杭边界两个特区委、红4军第4纵队党委，共有党员三千多人。时由李任予为军委主席。

7月11日，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选举了新的特委。其中常委五人，为：邓子恢(书记)、蔡协民(组织科长)、蓝鸿祥(宣传科长)、雷时标、戴树兴。另外十名执委为：军委书记张鼎丞、军委委员谭震林、青年科长卢其中、龙岩书记郭滴人、武平书记练文澜、连城临时书记官钦玖，还有张用心、苏阿德、郑潮海、郑金文。此外，另选江华为特委秘书长，傅柏翠、卢肇西为军委委员。

闽西代表大会之后，蒋介石指令赣军金汉鼎师、闽军张贞师、粤军蒋光鼐师对闽西进行“会剿”。闽西特委组织力量配合红4军击退了国民党三省“会剿”人马。

10月15日至18日，中共闽西特委在上杭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在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谢汉秋指导下，着重讨论了军阀混战形势下闽西党的任务，研究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没有来得及讨论的组织、宣传、职工等三个问题。检讨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

大会之后，虽然由于红4军主力奉命出击东江，赣南之敌金汉鼎部进逼闽西，使得在上杭筹建闽西苏维埃政府的计划未能实现，但是，中共闽西特委于会议中提出的各项决议与任务，特别是关于向汀江两岸及长汀一带发展，以及扩充地方红军的计划，则是得到了圆满的成功。

1929年8月，两广军阀爆发了战争，广东西北风云紧迫，东江防地较弱，福建省委指示朱德、毛泽东率所部立即开到东江。并指出："红军向东江出发，应以闽西之上杭、永定等地为后防。……以上杭、永定为中心，积极向外发展。"省委并派遣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长谢汉秋携带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信，从厦门赶赴上杭传达。

10月15日，红4军第1、2、3纵队依照前委的命令，从各自活动地区陆续向粤边境进发。10月22日，前往中央汇报工作的红4军前委书记陈毅从上海经香港回到前委机关，带来了中央给红4军的指示信，即中央"九月来信"。信中对红4军在东江的行动作了明确的指示。即运用游击战术，发动东江和闽粤赣边区的群众斗争，建立与扩大粤东地区的赤色区域。23日，陈毅、朱德率所部攻下梅县城，敌集中兵力反扑，红军只得退出。由于两广军阀混战已暂停，而红军不察，结果大败。造成了红4军自井冈山八月失败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损失。11月中旬，红4军只得重返闽西，挺进武平。继尔攻取高梧，11月23日，红4军再次攻克汀州。

12月15日，敌卢新铭率部进占汀州。红4军退至上杭古田镇。12月28日，在古田溪背村旁的曙光小学，召开了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形成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会上选举了新的前委，为：毛泽东、朱德、陈毅、李任予、黄益善、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宋裕和、田桂祥等十一人为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杨岳彬、熊寿棋、李长寿为候补委员。

红4军在古田召开会议之际，国民党积极部署对闽西苏区的第二次围剿，由其31军军长金汉鼎为总指挥。金指挥闽粤赣三省

的十二个团的兵力，分七路向闽西苏区进攻。朱德和毛泽东见敌来势凶猛，遂率队转移，使“会剿”之敌失去了作战的目标。不久、闽北之国民党人马内讧，闽西地方红军配合红 4 军，趁此机夺取永定城，继而收复龙岩。上杭地方红军也一举收复上杭——此为 1930 年 1 月之事。至此，闽西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

1930 年 3 月 18 日至 24 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在龙岩召开，会议指出了闽西苏区的十三项任务，选举了邓子恢、张鼎丞、卢肇西、郭滴人、陈正等三十五人为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推选邓子恢为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时恽代英为中央代表，赴闽西视察后，对闽西苏区予以高度评价，谓：“闽西八十万工农群众从斗争中建立的苏维埃政权，获得朱毛红军长期游击战争经验的帮助与指导，在政治上确实已表现了伟大的成绩。……他们的政治影响在全福建乃至东江赣南工农群众中间都有普遍的扩大。”

当时闽西苏区，有五个县苏维埃，五十七个区苏维埃，三百五十七个乡苏维埃。据《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情况及各项文件》载，当时的闽西苏区“包括龙岩、永定、上杭、长汀及平和、武平、连城之一部分，龙岩、永定的县城都在苏维埃统治之下”。此时为闽西苏区开创以来最强盛的时期。是年 3 月的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将各县赤卫队改编成红 9 军，辖六个团，军长邓伟，政委高静山。4 月，中央又将红 9 军改为红 12 军。5 月，闽西又组建了红 20 军，军长胡少海、6 月，根据中央命令，红 4 军、红 12 军和赣南红 6 军合编为红军第 1 军团，接着，又成立了红 21 军，军长胡少海、政委邓子恢、政治部主任陈正。

1930 年，正值蒋冯阎中原大战间，无暇对付红军，使闽西苏区得到很大发展。邓子恢于 1930 年 9 月 2 日的《政府工作报告大纲》中写道：“红军壮大，漳州震动，汀杭连也有发展。”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于 1930 年发出第七十号通告，在对形势的估量和对党的任务、路线、策略等方面表现了明显的“左”倾偏

向，要求红军脱离农村革命根据地，在战略上与战术上必须向着交通要道中心城市发展。

1930年3月1日，福建省委发出了第一号通告，谓：

> 福建全省的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快要到来，目前群众斗争的开展在走向全省总暴动的前途。

3月11日，中共中央致信福建省委，谓：

> 因此我们在红军的配比上在全国范围内是向着武汉与广东的两个中心发展，争取这两个中心省份的首先胜利。如果这个形势开始了，即是全国直接革命的开始。

4月2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信福建省委和闽南特委，谓：

> 红12军发展的方向是东江，是争取广州。……在直接争取广东的时期，福建所有的红军，都应全部集中推向东江腹地前进。

5月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为扩大斗争告闽西群众书》

> 闽西苏维埃政府坚决的号召你们起来，下个铁一般的决心，向外扩大斗争，打到潮汕广州去！

5月13日，红12军分三路直入广东大埔境内。在高陂，与粤敌香翰屏师作战时大败，而闽西苏区亦因为红12军离开，周围团匪趁机进攻，龙岩失守，闽西特委和苏维埃政府机关被迫撤往小

池。直到6月，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回师闽西，闽西局势才稳定。在长汀的南阳，朱毛与邓子恢等闽西特委领导会合，于此召开了前委与特委联席会议。并于此将红4军、红12军、红6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路军，后改为第1军团。6月下旬从汀州出发，向南昌、长沙远征。

就在这当儿，1930年的6月11日，李立三在其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这一决议的精神，于6月底由中央巡视员涂振农、福建省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王海萍、前往上海出席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的闽西代表郭滴人带回，随及进行传达贯彻。使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从此在闽西推开。

7月8日至20日，闽西特委在龙岩召开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由王海萍作报告，其谓：

> 闽西党的总任务是：集中一切革命力量，扩大斗争到广东去，首先夺取闽粤桂三省政权，争取全国革命胜利。

对于大会的决定，邓子恢、张鼎丞等提出了看法，他们鉴于红12军攻打东江的教训，认为应集中新成立的红21军消灭苏区内的土匪，巩固苏区，然后逐步向漳州、厦门等大城市发展。然邓、张的建议不仅没被采纳，反被立三路线的坚决拥护者扣上"新右倾"的帽子，接着，邓又在7月15日召开的闽西苏维埃第二次执委扩大会议上，被免去了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职务、中共闽西特委书记及红21军政委的职务。分别由郭滴人任闽西特委书记、张鼎丞任闽西政府主席、李任予任红21军政委。

8月6日，福建省总行动委员会成立，随及发出了一号通告，批示各地分别成立行动委员会。9月上旬，闽西的党团组织根据这一决定，取消了党团的组织机构，合并成立了闽西总行委。10月上

旬，又成立了闽西工农革命委员会，由施简为主席。如此，闽西苏区全面贯彻了李立三的“右”倾路线，红21军于8月9日由龙岩出发，第二次攻打东江。在平和一地与闽南之敌交火、红军大败，9月10日，红21军被迫撤回闽西苏区。

就在这时，中央巡视员到达闽西。中央巡视员召开了闽西总行委与红21军军委联席会议。会上，中央巡视员不仅不总结教训，反而继续批评闽西总行委右倾，保守，再次压制和打击正确意见。会上决定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闽西红军，委员会由红21军政委兼军委书记李任予、红12军军长伍中豪、东江红11军军长古大存、红21军纵队司令员卢肇西、闽西特委书记郭滴人、红21军参谋长邓毅刚等十一人组成。

会议结束后，红21军即向上杭攻击，结果又大败。此次大败，使士气急剧低落。1930年10月22日军政治部主任陈正在《向中央军委南方办事处的报告》中写道：

> 大部队长及大队政治委员都要开小差，士兵开小差者日必数百，攻杭失利连纵队司令官都想开小差了。

红21军由二千人锐减至四百人。

与此同时，闽西苏区在经济政策上，也坚定不移地执行了李立三的否认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界限上的“左”倾错误。一系列的过“左”的错误，使闽西苏区的局面陷于困境。

10月1日，施简奉中共中央之命到达闽西工作，施简了解情况后，即召开闽西苏维埃政府第5次常委会议。10月7日，又召开了闽西总行委、红21军军委和红军军官学校校委联席会议。会议虽然总结了出击东江失败的教训，但在给南方局和中央的报告中，仍坚持“总的路线是向东江发展”。

10月20日，左权奉中共中央之命抵闽西，任新12军军长兼

红军学校第一分校教育长。左权与施简一起向中央和南方局如实报告了闽西苏区的困难。提出暂停进攻东江，改向漳州进攻。事实上，向漳州进攻也是不实际的，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中央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纠正的精神，也只能如此了。结果，攻打漳州一仗红军大败，一千四百多兵跑了八百多，士气非常低落。

就在此时，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到了福建，福建省委发出通告，指示各地撤销行委，恢复各级党团组织。11 月 1 日，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陈舜仪抵闽西巡视。于龙岩召开了闽西特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撤销闽西总行委，恢复闽西党团特委。由李明光、郭滴人、刘瑞生、高大宗为常委，蒋大川、林炳泉、张念仁、谢凤莲、谢献政为执行委员。11 月 18 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第十一号通告，通告正确分析了形势，对斗争策略做了纠正。11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由南方局到达龙岩，进一步传达六届三中全会精神。12 月 3 日，刘伯坚从上海抵龙岩，带来了中央三中全会的一切密件。时项英的任务是经闽西前往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在闽西停留间，传达了中共中央决定将赣南、闽西、东江合并成立闽粤赣特区的指示。12 月 7 日，闽、粤、赣三区域苏维埃代表在龙岩召开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闽粤赣边特区苏维埃筹备委员会成立宣言》等文件，选举成立闽粤赣特区苏维埃筹备委员会。

1931 年 1 月 21 日，闽粤赣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由邓发任书记。

就在闽粤赣苏维埃政府成立不久，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取得了胜利，遂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并令其驻福建的各部向闽西苏区推进，主力为张贞的第 49 师。特委紧急部署兵力，苏区人民紧急行动。时中共福建省委给闽西党团特委及各县党团县委信中指出：

> 我们不必和他们硬战，要找到敌人的弱点·先部分的打击敌人的部队，推动群众斗争的情绪，扩大和充实我们的力量。

闽西红军按照省委战略部署，集中了优势兵力，向分散与弱小之敌实行反攻。永定一仗，红军取得了胜利，到了2月，敌对闽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悄然收场。

5月，南京政府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二次“围剿”，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命令独立14旅周志群部、独立第32旅卢兴邦部、第49师张贞部、第62师香翰屏部，向闽西苏区发动了进攻。中共闽粤赣特委和闽西苏维埃政府进行紧急动员，召开了各种会议进行了具体部署，扩充新12军，动员广大青壮年参军参战，保卫家乡和苏维埃政权。由于国民党军主战场在赣西南，加之两广军阀同南京方面矛盾激化，蒋介石的第二次向中央苏区及闽西苏区的“围剿”草草收场。

不久，南京政府又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其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星夜由上海抵闽，谓“专为主持剿匪军事”。遂动用了数师兵力，向闽西苏区展开“围剿”。红新12军根据闽粤赣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向薄弱的汀州、连城发展、击溃新编第26师。继尔乘胜前进，在十天中四战四捷。击溃了敌卢新铭旅，打破了敌人对闽西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虽然第三次反“围剿”使龙岩大部和永定一部分苏维埃区域失掉，但西北方向却得到了发展，完全打通了与江西苏区的联系，使中央苏区形成了一个整体。

就在闽西红军与国民政府军血战之际，在闽西苏维埃党政军内，开始了“肃反”运动，而且愈演愈烈。

闽西的肃反是从军队内开始的。前文述过，由于闽西红军不顾主客观力量，接连出击东江而失利，红军指战员大批逃离部队，根据地迅速缩小，军队内存在着严重的失败情绪和对领导的不满情

绪。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方面加紧挑拨宣传，苏区内外反革命分子也互相勾结，造谣生事。其实，红军军事上的失败，根据地的丢失，主要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但是闽粤赣特委的主要负责人邓发，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混淆敌我界限，不加分析地把革命队伍内的思想问题同对敌斗争的政治立场等同起来，把干部群众中出现的不良行为和思想混乱，全部归咎于地主、豪绅、阶级异己分子混进我党政军组织的破坏——到后来，邓发在肃反工作中又偏听偏信于肃反委员会负责人、道德品质极端恶劣的林一株，并放任其逼供信，结果，使闽粤赣苏区内的肃反运动愈演愈烈，此为后语。

傅柏翠事件始末

1931年1月，闽西的红12军召开了纪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列宁大会。会上，有人呼出了“社会民主党万岁”、“拥护第二国际”等口号。

第二国际于1889年7月由恩格斯领导在巴黎建立。成立大会召开之际，有二十二个国家的三百三十九名代表参加。成为各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但是，第二国际从一开始就暴露了他的弱点，其组织非常庞杂和松弛，没有正式的规章和明确的共同纲领，没有总的机关刊物。参加第二国际的各个组织也没有统一的名称。甚至在1900年以前第二国际也没有常设的中央领导机构。后来，第二国际堕落为修正主义，第二国际领袖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在同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者展开了斗争，后来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献出了生命。

对于第二国际的复杂情况，一些年轻军人事实上不怎么了解，一时感情冲动，喊出了这种口号，不足为奇，而新12军领导和闽西

党组织的一些人却吓坏了，他们认为此举是有潜伏在军队和苏区内的反革命组织或派别作怪。于是，当场抓了十几名红军指战员。随后对这些人进行严刑拷打，这些人受不住酷刑，胡乱招供，说他们的组织是“社会民主党”，他们都是社会民主党的成员。这样一来，闽西的肃“社党”开始了。

第一个被开刀的是新 12 军的一个团政委林梅汀。林时年 24 岁，被指控为“社党闽西特委宣传部长”，与此同时，还有六十多名党政军骨干被捕。其中一些人被指控为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部长、特派员、青委书记等。当时，正值江西苏区内抓 AB 团、第三党、改组派，并发生了富田事变。于是，闽西各县裁判肃反委员会于 1931 年 2 月 14 日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发布了《闽西苏维埃政府通告第十九号（裁字第一号）》的通告。内称：

> 最近各县各地苏维埃区域以内及红军发现社会民主党、第三党的暗藏活动。……应加紧健全肃反组织，担负迅速肃清苏维埃区域内的各种反动派别的迫切任务。……如果我们不能根本肃清内部反动势力，即无法巩固苏维埃政权，更说不上巩固全苏维埃根据地，猛烈地向外发展，完成一省或数省革命胜利的任务。各地应严密地清查这些暗藏活动的反动派，迅速消灭这些最危险的敌人。

联席会上，决定由林一株任闽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

在闽西苏维埃发布裁字第一号通告当天，又同时发布了裁字第二号通告，通告要求各县将捕获的社会民主党的首领押到闽西苏维埃政府审理，一般则由当地政府审理。

接着闽西苏维埃政府又发布了《反动政治犯自首条例》的公告。公告中称：

凡是半月内自首者，不论其职位高低，概行免予处罚。

就在这当儿，发生了傅柏翠率武力与闽粤赣特委对立事件。傅乃福建上杭人。1927年8月加入中共，早年亦参加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日本东京政治大学毕业。回国后在上杭县当律师。1926年任国民党上杭县党部秘书兼代理常务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上杭县北四区支部书记、区委组织部长。1928年6月参与领导上杭蛟洋地区农民武装暴动；7月任闽西暴动总指挥，8月任中共闽西特委军委委员；1929年5月任闽西红军第59团团长，6月任红4军4纵队司令员，7月被选为中共红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0月改任红4军4纵队党代表兼上杭县赤卫总队总队长、红4军肃反委员会主任；1930年春任闽西苏维埃政府财政经济部部长。因与闽西特委领导对党内问题有不同看法，拒不接受特委分配给他的工作，而特委又不做耐心教育，而是采取了惩办主义，将他开除党籍。并致信于他，向他要枪，傅遂致信于邓子恢，内称：

子恢先生：迭次接到闽西政府和特委的来信，都是向我要枪，我是一个闽西政府统治下的小百姓，而且又晓得“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层道理的黄老学者，同时所处的环境，又好象樊笼里待罪的囚徒，明知朝一抗命，夕即身首异处，怎么敢不遵从意旨，马上把那获罪得来的祸种(枪)尽数缴上，以求干脆哩？不过我还有几点苦衷，不得不向你陈述。

1. 我过去是一个公开做斗争工作的，杀人烧屋的勾当，不知干了多少，到处皆有我的敌人，就是党里也还埋伏不少，我的性命，不消说是非常危险，所以我日常把枪带在身边以备不测，虽说革命人不应该怕死，但是我现在

已因一时离开战线，被宣告了政治死刑，徒死是没有价值了。

2. 的确乡里从前本置有一批好枪，用来保护群众的猪牛谷物的，可是近两年来，却被我这个怪物把它悉数送掉了，弄得连耕牛农具都失了保障，而不敢放手购置，农业也就因之日就衰败。同时还把地方弄成了敌人的大目标，邻区的反动派势力，又还没有肃清，而且邻区党的干部和群众都因过去在反革命时代和我处结下了重大仇隙，时思报复，以此吾乡的前途，真是岌岌可危，群众方面都有痛怪我的意思，故我为安慰群众起见，已宣言向四军要求将这几杆枪，拨归地方应用，同时已将快枪二支于去年交与区委转交政府发配了，我觉得不好再对群众失信。

3. 我手里所拿的枪，只有三八一支，六五一支，八八式二支，并没有三八式四支，其中八八式二支早已交与区委赤卫队去了，驳壳二支是我在闽西暴动前数年所买，一支是我把四区的两杆手枪换来，与我相伴已久，我在前委四纵委特委(全部家财只有这点)均有声明，除非把我杀了以后才能和他相离，你是知道的，现在上级是否已准备宣告我的肉体死刑了呢？如果这样，就请你告诉我，我是自己会执行，不用他人执行亦不必假手敌人执行的，但是我又要声明，如果确是因为怀枪获罪，那么我就要效蔺相如执璧的故事与枪同归于尽，而不愿使那个祸种留在人间贻害后人。以上三点不过略说大概，还有许多苦衷，不能一一详陈、将来有机会时当面诉。我予料你阅了我的信后，必然不能见谅，而且要大发其怒，或者我的死因也就从此种下，但是我是个直性的人，这样想了便是这样说出，直言贾祸，虽死无怨，倘蒙曲谅，乞示复数行为感！此致敬礼！

侍罪傅柏翠启

邓子恢收到傅柏翠信后，以中共闽西特委名义，于1930年4月27日，致信于傅。内称：

柏翠同志：特委自去年冬间以来，即发现汝在政治路线上和组织路线上有不少的错误，曾托毛泽东同志向汝说明，不料汝至今没有纠正，而且日益严重起来，特委认为你这种错误如不纠正过来，将来会走到更危险的道路上去，因此，第135次常委扩大会为纠正你的错误和维持党的纪律起见，特对你予以严重的警告。兹将你的错误，逐一指示出来：

（一）特委从各种事实的观察，觉得你的政治路线，从过去到现在一直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你在去年闽西党代表会中，已接受了批评，但你只是表面的接受，实际上你心里还是坚持成见，你去年12月间对陈毅同志及子恢同志谈的话，便可证明。

（二）……去年特委……曾调你为4纵队司令官，嗣改党代表，兼上杭赤卫队总队长职，但汝屡次消极怠工，并屡次反抗4纵队之扩大与训练，最后借口回里，竟一去不来。……

（三）……第二次扩大会，特委连续五次去信要你参加你都不来，而且连半字都不回复，接着党团县书联席会，又一连三次信要你前来，汝能亲往巫杭，却不来苏家坡出席。……

……

（六）你由4纵队带回来的四把快枪两把驳壳，特委

因为要健强闽西政府保卫队。屡次去信通知汝，并要汝连人带枪来，汝有什么意见，尽可写信来说明，不料你竟一字不回。

（七）汝信里“说除非把我杀了，才能和他（枪）离，”又说“那么我就……与枪同归于尽”，特委仅仅只和你商量交出几杆枪，你就要如此威吓，如果你做了军长或者总司令，那么你便怎么样呢？这是一个什么共产党员？什么牺牲精神？

……

（十）总观汝信里所说的话，都是些无理由的理由，客观上只是个人和有观念英雄思想的表现，同时又是负气攻击的俏皮话，虽然你这信是写给“子恢先生”个人的，但屡次写给你的信是特委署名，当然要特委负责，汝这样热嘲冷刺把特委看成什么东西？这在组织上也是极大错误。

根据上述各种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特委认为你的政治前途有很大危险，故予以严重的警告，并要你将所存枪支马上交来，希望你接到这一警告后，有深切的觉悟和纠正，特委诚恳地希望汝能够从错误的泥坑中自拔起来，重新走上布尔什维克的战线！同时，兰玉田、谢秉琼写给汝的信，也望你有公开的表示！末了，致以斗争的敬礼！

中共闽西特委

一九三〇年廿七日

由于特委对傅柏翠的说服教育缺乏耐心，采取了惩办主义，不仅将其开除党籍，又派重兵围攻其家乡上杭县古蛟地区，傅柏翠一怒之下，于 1931 年 3 月，率部分地方武装而起，走上了与特委公开对抗之路。

子虚乌有的“社党”

傅柏翠的举动，使得闽府苏区的要人断定其为社会民主党的首领。遂于3月6日发布了第二十三号通告，宣布傅柏翠为“闽西社会民主党”的首领，其家乡古蛟区是社会民主党的巢穴。

傅柏翠事件发生之后，将闽西的肃反更推上了一个高峰。裁判部部长林一株，本来就是个思想品质很坏的人，其地主出身，心狠手毒。其任裁判部长后即刑讯逼供，傅柏翠事件后，其更是滥用酷刑，加之王明“左”倾路线凌势，使这个子虚乌有的“社会民主党”在短短的一两个月内，就被夸张的无孔不入。

时永定县委负责人谢献球、曾牧村等对大抓“社党”有看法，尤其是特委将拘捕永定县“社党”的名单发到县委后，谢、曾等人认为名单中所列之人，都不是什么“社党”，因而犹豫不决，也执行不力。特委对永定县委的作法大为光火，认为他们也是“社党”分子，遂一并抓起，并加严刑。

3月2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在永定虎岗召开了“闽西工农兵审判反革命社会民主党分子代表大会”。主审为闽西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林一株。各县乡军队的工农兵代表数千人参加了大会。当林一株宣布将林梅汀等“社会民主党党魁”押上来时，一群持枪的士兵将三十四名五花大绑的“社党”首领押了上来。时林梅汀等均被酷刑搞得浑身伤痕累累。这些“社党”魁首被押上之后，林一株即宣布这些人的罪状，并说从军队到社党的组织，已大部破获，但仍有隐藏者，继续搞破坏，林号召各地代表回去之后，继续破坏未被发觉的社会民主党分子和机关。接着，林一株以主审的身份，宣布将林梅汀等处死。话音未落，一群彪形大汉，将林梅汀、曾牧村、谢献球等十七名“社党”的“党魁”，拉到会场一角，一顿乱棍打死。这些

人临刑之时，仍高喊着“拥护中国共产党！”，“打倒社会民主党！”之口号，含冤而死。

林梅汀等“社党党魁”被处死后，林一株横着眉说：“对社党分子的惩处，有三条，第一条，对已捕获的‘社党分子’，凡出身不好的，要处以死刑；第二条，在‘社党’内负有重大责任的，要处以死刑；第三条，潜藏在党政军机关内的，要处以死刑！”

这次审判大会，使闽西苏区的肃反更加扩大化了。掀起了一股抓“社党分子”的狂热。偏这时红军在反“围剿”中接连失利，闽西苏府要人更加认为是“社党分子”作怪，更加疯狂地刑讯逼供，草菅人命。3月4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第二十三号通告，即《裁字第三号》，内称：

> 半个月来迭次破获该反动组织政党的各县组织，捕获很多的反革命首领。这事实表明，闽西苏区的社会民主党与赣西南的AB团同样严重，……对于这一工作如果还采取姑息态度，而不能坚决积极的执行领导群众一致动员肃反，这是非常错误的危险倾向。

3月18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又发布了第二十五号通告，即《裁字第四号》，内称：

> 如有迫不及待要先处决的，可先执行，再补报到本政府追认。

如此一来，闽西苏区内的大小组织，全都有权抓“社党”，而且有权处决。直搞得人人自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不少被怀疑追捕的“社党分子”无路可去，只好投到傅柏翠处。这样一来，使闽西苏府要人更坚信傅柏翠是社党首领，更加紧大抓“社党”了。

“三人团”火上浇油

是年3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等“三人团”到达永定虎岗，闽粤赣苏区特委在虎岗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即虎岗会议——作者注)，会上，传达贯彻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左”倾决议，确定“肃反”是苏区党的中心任务之一。4月4日，《中央给闽粤赣特委信——闽粤赣目前形势和任务》中称：

> 敌人积极从各方面来向苏区红军进攻，普遍的白色恐怖，积极的打入到党的组织内和红军中来从事破坏(闽西的社会民主党，江西的AB团以及其他地方的改组派等等)，从蒋介石到傅柏翠都有整个的联系和计划的……必须肃清内部的——红军中、政府中、党部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站在阶级立场上以最严厉的手段来镇压。……当前，右倾在党内在群众中看成是主要的危险，对一切消沉、悲观、保守、失望、逃跑等等观念要给予无情的打击。

“虎岗会议”的召开和中共中央指示信传到闽粤赣苏区后，使闽西苏区抓“社党”运动如同火上浇油，迅速升级。竟然连工作上有些不同看法者，李立三路线时期工作积极者，均视为“社党”，而林一株等人把持的肃反委员会，为所欲为，独断专行，一切决定，全不征求特委党组织的意见，要抓谁就抓谁、要杀谁就杀谁。时永定县委因为曾对抗过肃反委员会的决定，故为肃清“社党”的重点。4月28日，永定县委召集各机关及革命团体党团开了联席大会，讨论肃清“社党”的具体办法。会上，县委负责人谈了永定县是“社党”活动的“重点区”，说经过斗争，大部分“社党分子”都已被破获，但在

永定区，金丰一区等还没破获，“社党分子”还有非常活动。“社党分子”之所以没以查清，其原因是县委过去对肃清“社党”不了解，没有引起全党同志注意肃清“社党”的严重问题，因此出现了不坚决执行上级的决议，甚至表示出怀疑态度，这是非常错误的。会议作出了决议，内称：

一、首先要了解社会民主党是反革命的政党，是军阀团匪的走狗，代表豪绅的地主资本家谋利益的，他的组织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富农流氓及一切消极怠工动摇腐化分子的集团，他们的阴谋是取消革命，倾复苏维埃、瓦解红军、破坏土地革命，组织暗杀队准备屠杀我们的负责人，他的凶残同国民党军阀团匪没有丝毫差别的。

二、每个布尔什维克党员团员要有十二万分的精神加紧反对社会民主党，同时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同党内外的社党作残酷的理论斗争，特别要互相观察同志的行动言论，才能根本肃清社会民主党。

……

四、各机关内有社党嫌疑的分子应毫不犹豫地[马]上执行逮捕起来严格审问，以完全破获其组织。

……

六、过去我们党在立三路线统治下的时代犯了许多的错误，特别党组织非常松懈，以至社党很容易混进党内来活动，目前反社党的工作，须特别注意社党以党内立三路线的错误来企图活动。

七、加紧反社会民主党的宣传，每个同志都要深入群众中作广泛宣传，将一般自首的社党党徒使其向群众宣传，揭破社党的阴谋罪恶，同时要将捕获来的社党分子，号召广大群众公开审问，但执行这一工作中要联系到

巩固党巩固苏维埃冲破敌人进攻的斗争。

大会将黄瘦梅、张觉先、张启义、赖新发、曾献犹、郑世明、熊在乾、坤祺、应祺、河光、绍南、耀唐、阮边十三名县委干部，以“社党分子”或工作消极而逮捕或开除党籍、团籍。

5月15日，杭武县第五区举行了公审大会，以“社党武特委书记”罪名将伍超然处决，同时处决的还有其他十人，多为20左右岁的青年，最小的仅16岁。

闽西苏区肃反高峰时，各处都几乎天天抓人，天天杀人。由于各地肃反委员会滥施酷刑，被抓者受刑不过乱石乱咬，结果使“社党分子”越抓越多。如此恶性循环，使得苏区内到处都是“社党分子”和机关。据1931年6月1日杭武县苏肃反委员会当时编印的《革命法庭》记载，截止到1931年5月，闽西特委两次破获“社党闽西青委”，四次破获“社党龙岩县委”，两次破获“社党永定县委”，两次破获“社党新12军军委”。在少先队、儿童团中也多次破获“社党”组织。

被整肃的对象，军队内主要是连排以上的干部，地方政府主要是区以上干部。尤其是闽西苏府和军队中的高级干部，肃整的更为厉害。据《中共闽粤赣省委写给中央报告(第九号)》内称，闽西苏府内三十五名执委与候补执委中，有半数以上先后以“社党”罪名受害。至5月中旬，就逮捕“社党分子”多达一千六百七十多人，且其中的七百余人被处决。而百分之八十是党员和干部，尤其是闽西苏区的创始人如张涤心、段奋夫、陈品三、陈锦辉等都被作“社党党魁”而杀害。共青团闽西特委于7月12日写给苏区团中央局的报告中称：

经过六月份积极肃清社党工作，及最近两星期来，赤裸裸地现出闽西团内社党分子堆塞着，团依然是极严重

的状态。……旧的团员大部分不是我们的团员了，龙岩全县可说没有团员了，其他各地可以说每个支部都有社党分子，有的甚至于全支部都是。干部方面上下层团的干部都是社党分子，部分在改组时是社党分子，经手提拔的也是社党分子。……团的教育工作、组织生活及执行中心任务，发生活动能力上极大的困难，尤其是新干部幼稚，一切工作秩序都错杂无头绪。

据史料载，当时闽西苏区的三十个区委中，仅有一个区委能勉强维持工作。

肃反的扩大化在军队内也相当严重，据中共闽粤赣特委在5月1日给永定县委的信中称：

新12军在整肃后，内部的确是万分成问题，战斗兵的减少，指挥员的缺乏，以及士兵勇气的减低，这决不是东拖一下西拉一下可以解决的。

在当时曾担任闽粤赣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肖劲光后来回忆说：

“1931年3、4月间，闽粤赣省委在永定虎岗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一月份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决议。会议之后，苏区中央局根据闽西的报告，对闽西肃反工作做了‘左’的指示，要求对‘社会民主党’采用最严厉的手段镇压，同时要求在肃反中反对右倾。这样，闽西肃反一跃而为当时的‘中心工作’，12军也从前线调回虎岗集中进行肃反。对于这样肃反，开始我并没有想到是路线错误，认为有反革命当然应当肃清。所以，肃

反委员会拿来名单，从军队中捉人，让军队去捉人，我也执行了。后来，随着肃反的面越来越大，打击、杀害的人越来越多，领导之间也不团结，互相猜疑，自己便逐渐产生了疑问，哪有这样多的'社会民主党'啊？对林一株搞的那一套刑讯逼供的做法，也很看不惯，便采取了消极态度。记得有一次，在行军的路上，偶遇彭杨学校的一个学员在领导面前哭辩，一问，才知他不慎把套筒枪搞坏了，领导硬说他是故意破坏武器，是'社会民主党'分子，可见肃反搞得之荒谬。我批评了那个干部，同时教育那战士要爱惜武器。在那样的形势下，谁也不敢提意见，谁提了意见就是同情'社会民主党'，就可能被立即打入另册，甚至遭杀身之祸。后来听说张鼎丞、郭滴人同志都有了问题，大家人人自危，不敢往来。不久，我也莫名其妙地有了'问题'。有一段时间，林一株用肃反委员会的名义派了一个大肚子女人来守我的电话，监视我的行动。有一天，省委领导卢德光来我处，看见了这个女人，就问我她是干什么的。我很奇怪，我想派这样一个女人来我这里做这种监视工作，总是经过省委同意的，谁知省委并不知道。可见当时肃反委员会的权力之大。党内政治生活已到了极不正常的地步。以后，没有任何交待又把这女人调走了，其中究竟有什么鬼也不知道。总之大家都互相猜疑，也互不敢随便问个究竟。虎岗会议以后的那一段军事工作遭到严重挫折，是与当时肃反为中心的错误分不开的。肃反中，军队里大批革命同志被杀，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肃反引起领导之间的不团结，同志之间互相猜疑，党群之间隔阂日深，在敌人大举进行反革命'围剿'之时，我们的同志不是集中力量对付敌人，却在自己内部杀了大批好同志，使亲者痛，仇者快。这是何等惨痛的教训啊！”

错误的肃“社党”直搞得闽西苏区内几乎人人自危，不知什么时候，厄运降临。逼得不少人被迫逃亡，有的隐藏于山中，有的逃到他乡，甚至有的漂洋过海逃往异国。终于激起一部分人进行武力对抗。1931 年 5 月 27 日，在杭武县第三区，发生了“杭口事变”。

其经过是这样的。

杭武县第三区区委书记叫何登南，县直属的第三大队政委叫陈锦玉。这二人和区机关及 3 大队的指战员近二百人，被做为“社党分子”抓起，分别关押在一个叫杭口的村子和县苏维埃所在地白砂村内。肃反委员会对这些人刑讯逼供，要他们供“社党”内情，并扬言不供即杀。时第 3 大队大队长李真、副政委张纯铭、副大队长丘子庭对他们的战友非常了解，知道这些人决不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他们对肃反委员会的作法十分气愤。5 月 27 日，闽西苏府秘书长罗寿春到第三区检查工作，李真等遂将罗扣押，迫其写手令释放关押在杭口、白砂两地的“社党分子”。罗无奈，只好写了手令。当天，李真率第 3 大队指战员，包围了区苏维埃政府，将关押的何登南、陈锦玉等人释放，与此同时，又派人持罗寿春的手令将关押在白砂的“社党分子”带回第三区释放。

闽粤赣省委得知这一消息，省委负责人立即认定这是“社党分子”进行的反革命暴乱，当即调军队前往镇压。双方激战，第 3 大队少数侥幸逃亡外，余皆被抓。李真、何南登等区委领导、第 3 大队的领导全部被当做反革命分子处决。罗寿春也被当做“社党”的“闽西特委组织部长”而被处死。

杭口事件发生后，中共闽粤赣省委对“社党”的整肃更加严厉。如此，苏区军民与省委、政府的对立情绪更大。6 月 1 日，杭武县第 2 区的干部群众与地方武装，又发生了事变。此后，永定溪南和虎岗也相继发生事变。

这些事变连续的发生，使省委更加错误地感到“社党”活动严重，中共中央亦非常重视。7 月 15 日，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撤销了

原来的肃反委员会，另行成立了以郭滴人为处长、林一株为副处长的闽西苏维埃政治保卫处。但是，中共中央对闽西的肃反仍认为不够，1931年8月29日，致信于闽粤赣省委，内称：

> 关于社会民主党的问题，从你们的一切报告和决议以及来人的谈话中，我们知道已成为闽西苏区很严重的问题，据第十号报告说：自从今年2月破获以来，到现在已经拘捕3千多人，其次又说到杭口事变，杭武事变，永定汀连社会党的阴谋，以及红军中社会党的破获，这些事实都值得我们深刻的注意。经中央仔细考虑和分析之后，认为你们对于社会党还只是知道他严重，而未能回答为什么苏区阶级斗争唯一表现在社会党身上，为什么社会党如此严重不见其他各种反革命分子的举动，为什么他们能够居然能广泛的深入我们的党团和红军中去，经迭次破获和逮捕之后，仍然时常发现他们在我们组织中活动，为什么一部分被欺骗的群众抱着观望的态度不能自动的自首，甚至于恐怕加入共产党，这些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注意，从你们的一切文件中找不到这些问题最圆满的回答。固然，你们认为"革命形势日益发展阶级斗争更加尖锐……统治阶级……派人去苏区中进行反革命活动，同时苏维埃区内豪绅地主的存在，以及党内阶级基础薄弱，组织的松懈，这便是使这些反革命分子可以乘机活动（见五月十四日特委关于澈底肃清社会民主党AB团的决议）"，这种分析是对的，可是只能说明地主富农及一切阶级异己分子，要利用一切机会，要加倍进攻苏区，还不能充分解释以上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因此，中央认为你们坚决反对社会党是对的，但你们对社会党的认识和处置是不够而且有许多的错误；第一，你们把苏区内部的阶级

斗争和肃反工作的对象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从你们的文件和工作中可以看出），这显然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试问这样你们把反对富农、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以及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如雇农反对富农，学徒反对店东师傅等）放到什么地方去了？虽然你们在文件上亦常提到这些名词，可是事实上你们把一切斗争都看作与社会党的斗争，无怪乎你们把社会党组织看着无微不入神妙不可测了。其实中央坚决相信，如果你们能够切实的分析以上各种派别的斗争与影响，以及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发现问题绝不是这样简单，一定会觉到与上面这些派别作斗争和发展苏区内部的斗争，也是非常急迫和需要的。不但如此，你们照这样切实斗争的结果，一定比现在的肃反成绩更大。

中共中央的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对闽西苏区的肃反扩大化非但不制止，而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闽西苏区的肃反仅仅限于抓社会民主党，没有抓 AB 团、第三党、改组派等"反动"组织，如此一来，闽西苏区的肃反更加"轰轰烈烈"了。到了 9 月 29 日，连林一株也被作为"社党"分子抓起。在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出了第九十七号通告中，宣布林一株为闽西"社党"特委书记，同时还宣布文化部长张丹川、劳动监察部长熊炳华等八名闽西苏府的领导干部为"社党上层成员"，分别处以死刑。

肃反扩大化给闽西苏区的发展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恶果。1931 年 11 月，张鼎丞在瑞金参加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时，向毛泽东汇报了闽西肃反的严重情况。毛泽东听后指示要立即纠正这一错误。

1931 年 12 月 13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了第六号训令，内称：

过去当揭破反革命的组织AB团、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时候，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很坚决的逮捕审讯，处置了许多反革命分子，给这些反革命以致命打击，使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这种工作的主要方向，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在过去的肃反工作中，不是没有错误的，临时中央政府严重的告诉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各地过去的肃反工作，有许多地方是做的不对的。例如听到某个或某几个反革命分子的口供，没有充分的证据，未经过调查的工作，就进行捉人，审问的时候，偏用肉刑，苦打成招的事，时常发现，处置犯人的时候，不分阶级成份，不分首要与附和，以致应当轻办的，却把他重办了。这些错误在苏区好些地方，好些时候都发现了，……临时中央政府现在告诉各地各级苏维埃政府，要坚决的迅速的建立革命秩序，使革命群众的生命权利和一切法律上应得的权利，得到完全的保障，同时对于反革命的组织和活动，要给他以彻底的消灭。

"训令"对各地苏维埃政府的肃反提出了九条具体要求。强调对反革命案件的审讯，处理，要由国家司法机关审讯和判决。要废除肉刑，重证据。

"训令"对闽西苏区的肃反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12月初，周恩来由上海经闽西赴瑞金，他在闽西目睹了"肃反"给闽西苏区带来的严重恶果。12月18日，周恩来由永定赴长汀的途中致信中央，内称：

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已见到闽西解决社

党所得的恶果非常严重。……他们处理方法之错误，如中央历次所指示的殆过之无不及。

周恩来的信，对纠正闽西苏区"肃反"的错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32年1月21日，中共中央向闽粤赣省委发了指示信，即《中共中央致闽西省委信——肃反问题》，内称：

……是在于肃清社会民主党的斗争不但没有造成广大工农群众对于社党的仇恨，对于共产党的热烈拥护，而且反使群众惧怕共产党，使群众对共产党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中央一刻也不能容忍这种错误的继续和存在。……要最彻底的站在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上，明显的指出省委过去在肃反问题上所犯的不可宽恕的错误。

2月19日，苏区中央局关于肃反错误的纠正，再次致信闽粤赣省委，内称：

根据苏区党大会后闽西工作的情形，根据伍豪（周恩来——引者注）同志经过闽西时的考察和这次李明光同志来中央的报告，闽西在肃反中犯有严重的错误。

中共中央在信中要求闽西省委坚决按照中央指示，纠正错误。1932年3月，中共闽粤赣苏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对肃反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检讨。3月18日，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长汀召开，会上亦对闽西抓"社党"运动进行了沉痛的检查。并于决议中写进了向全苏区军民作公开检讨的内容。

"社党"事件前后历时一年零三个月，但其恶果无法估量，制造

了无数冤魂。时闽西苏区总人口仅百万，而后来查明“社党”事件中被处死者即达六千余人。若加上受株连和逃亡者，就更为严重了。曾任闽粤赣特委书记、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邓发于1945年2月23日，在闽西党史座谈会谈道：“今天看来，不仅当时全国没有什么社会民主党，连傅柏翠本人是不是也难说。”

全国解放后，傅柏翠在谈到闽西“社党”情况时说：“我不但不是‘社党’的头目，而且‘社党’这个组织是否存在，我本人也是怀疑。”

数千名屈死的冤魂最终平反了，但这沉痛的教训又告了我们什么呢？到了十年浩劫中，不是又出现了大抓子虚乌有的所谓的各种“反动”组织嘛？

闽西苏区在大抓“社党”之后不久，又因反“罗明路线”，使大批干部遭到了清洗。反“罗明路线”是怎么回事？

第九章　罗明路线的始末

因为罗明说了真话办了实事

中共临时中央于1933年1月由上海迁至瑞金后，博古、洛甫便于中央苏区推行王明的极“左”路线，这对苏区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瑞金位于贡水上游，地处赣、闽、粤要道。唐朝时即称瑞金，五代南朝时设县。明时属江西赣州府。清时属江西宁都州。相传这里曾盛产过黄金，故得名为瑞金。临时中央抵后，即更名为“瑞京”。

博古、洛甫都是“左”的可怕的人，其宗旨是悠悠万事，唯“左”为大。他们进入中央苏区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批所谓的“罗明路线”。谓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在福建省内推行了一条机会主义路线。

1933年2月15日，博古等以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名义，宣布撤销罗明的省委代理书记职务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2月20日，少共苏区中央局又作出了《关于开展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决议》。2月26日，在博古亲自出席参加的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学生中全体党员、团员及连一级以上干部的党员、团员大会上，又作出决议：建议中央局立即停止罗明及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党的负责工作。

几天后，罗明奉命至瑞金作检查。临时中央的总书记博古亲自同罗明谈话，他警告罗明：罗若不承认路线错误，即开除罗的党籍，撤销罗党内外一切职务。

罗明于瑞金间，住在叶坪中央局的一房间内，进出不自由，在中央局召开的批判罗明会上，不少人喊出"枪毙罗明"的口号。

2月24日，在中央局代表的直接领导下，湘粤赣省委党的临时代表大会召开，首先在省级机关主要干部中开展反罗明路线。接着，自上而下，由地方到部队，由后方到前线，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反"罗明路线"运动。

"左"倾路线掌权者因何对罗明大动肝火？

罗明，又名罗善培，福建龙岩人。1895年生，1925年加入中共。长期在福建西部地区进行建党和组织农民斗争工作。1927年任中共闽南特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罗明即开始在闽西从事武装斗争。1928年上半年，在闽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地方红军和赤卫队，毛泽东于此给予了肯定。1928年11月，罗明赴莫斯科出席了中共"六大"，归国后，即在闽西上杭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29年3月，朱德、毛泽东率红4军三下闽西，并于闽西上杭古田村召开了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朱、毛帮助之下，闽西正式成立了主力红军。"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下令宣布闽西苏区划归广东，并命令闽西主力红军向广东东江出击。时罗明写信于中央，不同意此种作法，遂被李立三指

责为“右倾保守”，

1931年1月，罗明奉命前往上海，听候中央分配工作，时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刚刚开完，王明等老“左”们掌了权。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同罗明谈了话，沈仍指责罗明犯了“右倾”错误。但此时没提出“罗明路线”。

罗明路线的提出是1932年的9月。起因是这样的：1932年4月，主力红军攻占了漳州后，罗明到了前线，当时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国民党的19路军由漳州向闽西进犯，并先后占据了龙岩全县和永定坎市、虎岗；广东陈济棠部也向上杭县的庐丰、茶地、白砂等苏区重要基点进犯。而苏区内没有主力红军，只有地方武装、总兵力不过五千人，根本无法与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19路军作战。形势十分严峻。这当儿，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撤了职，于是，毛泽东在汀州傅连璋主持的福音医院住院，罗明也住院，毛泽东遂要其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罗明翌日出院后即召开会议，对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传达，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郭滴人、谭震林、刘晓等，大家都表示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派罗明以省委特派员的身分到前方领导游击战争。罗明到了前方，即按照毛泽东在一二三次反“围剿”中的作战经验，领导着苏区军民开展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并在政策上也采取了灵活性，这些作法，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是，罗明的做法受到了中央政府参加闽粤赣省苏维埃扩大会的代表项英的责难。扩大会于1932年9月26日至28日举行。项英批评罗明未能在闽西苏区向敌人“全线出击”，没有起到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在江西邻近几省首先胜利”的紧急任务。认为闽西党和苏维埃政府犯了严重错误。会后，省苏维埃政府据此作出了《关于政治及省苏工作报告决议》。于10月20日呈报了中央政府。

正在这时，毛泽东于宁都会议上被撤了职，“左”倾的中央政府对这一报告如获至宝，遂派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专程到长汀，

出席闽粤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团会议。10月31日，中央政府发出了《中央执委委员会给福建省苏主席团的指示信》，信中对闽粤赣省苏领导工作进行了严厉地批评。

时省委书记罗明和省苏主席张鼎丞，虽然在形式上接受了中央的批评，但实际工作仍从实际出发。

1月21日，罗明在连城新泉根据斗争的发展情况向省委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四点建议。这建议仍表达了他的认识。意见书内称：

省委：

依据敌人在大举中央区中对福建方面进攻的形势，与依据我们总的工作布置，我认为我们目前应特别注意下列的紧急工作：

第一、要用最大的力量迅速的方法与最短的时间赤化连南、汀东南；使新泉与连城、长汀巩固联成一片；同时，要与宁化、清流联接起来向永定方面发展。……我向震林同志提过几次，要依照这点来布置军事的工作。党和政府工作也要找到这一重心。……

第二……

第三、关于地方武装方面，我以为目前最中心迫切的工作，是先造成基干部队，去实践参加作战，从作战中来锻炼。在边县边区的地方武装，要向外推进，抓到团匪来打击，对白军，采用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要从打小战中来锻炼，要从打仗中胜利中来提高他们的勇气和斗争情绪，学习战争的经验。……

第四、关于各区县的工作。……过去党和政府领导的方式太机械了，各县区一般的方法，一般的计划，这是不好的。特别忽视边区、边县和新区、新县的工作，这是不能

巩固的向白区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边区边县以至新区新县，千篇一律的在上下层讨论，一项一条就是扩大红军，分配人数，……第二条，就是简单的政治动员，这样的动员不能照计划做到我们应做的工作，而且会妨害我们的工作。

省委在过去计划上，都机械地规定永定要扩大多少红军，这是不好的。

我认为目前在永定以至上杭许多边区边乡，目前最中心的工作是推动强大游击队、赤卫军和建立白区工作，积极行动，向外游击，打击敌人的进攻，一定要地方武装不断的在胜利中来提高群众斗争的情绪，使群众更相信地方武装力量，才能打破完全依靠主力红军的观点。

……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于新泉

罗明写好意见书后即到了上杭县。在上杭县，他领导干部群众，运用游击战术，打退了进犯白砂之敌。就在这时——1933年1月底，临时中央在上海不能立足了，只好迁往江西瑞金。博古、洛甫等在赴瑞金的途中经上杭白砂时，与罗明等见了面。博古一见罗明，立即斥责道："你是个省委书记，你不领导全省的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

罗明遂把与毛泽东会面的情形和省委决定他来杭、永、岩开展重点游击战争的情形说了一遍。

博古问："你对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见？"

罗明说："我还没听到传达。"

罗明说完，博古很不高兴，遂又要罗明谈谈当前斗争情况。罗明说："据我切身体会，苏区的革命战争，要和白区的抗日斗争结合起来，应根据中央苏区政府和军委会去年4月14日提出的抗日、

民主和停止进攻苏区三条件，同各党派、各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罗明还没说完，博古就不耐烦地说：“算了算了，不要讲了，吃饭吧。”

罗明等见博古这些中央领导这个态度，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博古等走后，罗明等人对照中央领导的指示进行了检讨，仍感到工作中没什么错误。几天后，罗明即接到临时中央的指示，指示下令江西、福建猛烈扩大红军。罗明只得执行，遂把各县的独立团、各区的独立连、乡独立排都送到了正规部队，由于地方武装走了，敌人趁机向边区大举进攻，结果使苏区遭受很大损失。而上杭、永定、龙岩三县受损失更大。罗明只好又改变策略，仍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发动群众，开展广泛的游击战。遂召集了上杭县委方方、伍洪祥等一起开会，研究总结了数月来游击战的经验和当前斗争形势与任务。认为边区对敌斗争，必须按毛泽东的游击战打法，不能照搬苏区根据地的作法。会上，几个人都认为应当把游击战的经验提供给连城、新泉、武平和其他边县边区。当夜，罗明赶写了关于上杭、永定游击战争的情况报告给省委。

在《关于杭永情形给闽粤赣省委的报告》中，他如实地写道：

> 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因此开会、集中武装等等都很难动员……有些群众说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了，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争，这样下去怎样得了呢？……有许多群众说，我迫得十分不得已了，不得不暂时妥协屈服，我的心还是红的，我也相信整个革命是要胜利的，我也希望红军能够胜利。……

罗明在报告中又尖锐地写道：

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一点，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请斯大林同志，或者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已受摧残的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讲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彻底转变群众斗争的情绪！

罗明的报告写的淋漓痛快，一针见血，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人张鼎丞、谭震林、郭滴人、刘晓、李明光、李坚真等人的支持。也受到了基层干部的拥护。

继罗明的报告和意见书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也致信省委，提出了和罗明认识相同的意见，内称：

过去一切的工作计划完全是党代替政权(如扩大红军、地方武装、土地问题等等)，因此党对于发动群众斗争，即减少其注意力，(我意关于行政上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应由政府计划……而使党更多注意领导群众斗争方式上的研究，……)反帝同盟拥苏大联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众团体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余种组织可加入。下层同志确听到头晕，找头绪不到，因此，这些组织不能健全起来而是一种空招牌，我觉得必须尽可能的减少或合并。……各处地方武装在数量上是不少，但在实际的集中训练是极差的……边区工作应注意工作分配与计划，不能与中心区一样，特别是扩大红军问题……

罗明和杨文仲的意见，报告和信，在组织上是合法的，是党章所允许的，行为上是光明磊落的，但由于他们没把博古等“武大郎”当成神仙，对临时中央局的意见不以为然，所以，惹恼了那些“小神爷”。博古等人见了报告后，大发雷霆，当即派出了中央特派员到闽

粤赣省委检查工作。特派员到省委后，不做调查研究，便按中央精神定调子，断定省代表的是一条机会主义路线。

接着，反"罗明路线"斗争即在闽粤赣省开始了。

中央特派员到了福建省委时，罗明正在前线，他对此一点不知道。一天，他在上杭从《斗争报》上才得知自己犯了错误。几天后，他接到省委的通知，要他速回汀州。

罗明往汀州赶时，途中遇到了从汀州而来的张鼎丞，罗明即问张："鼎丞，我犯了什么错误呀？"

张鼎丞说："他们说你犯了机会主义路线错误，说你不扩大红军，只打游击战争。"

罗明发急地说："我工作上可能有错误，但没有路线错误，若有路线错误，第三次反'围剿'怎么会取得胜利？根据地怎么能这样快的扩大？"稍停又说："我们并没有反对扩大主力红军，只是要求对中心区和边区应有所区别，这也是从实际出发么。就是在杭、永、岩边区也没有说不能扩大主力红军，这怎么会是路线错误呢？"

张鼎丞听了，只是叹息，二人对坐无言，均十分愤激。

罗明到了汀州，又接到了赶往瑞金的通知，到了瑞金，将其安排在叶坪中央局的一间房内，门外有人站岗，不能自由出入，实为软禁。

第二天，有中央局的几个干部同其谈话，要他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接着，一位中央负责人找他谈话，说他去边区是"退却逃跑"。罗明遂对自己的工作进行汇报和解释，他说："到杭、永、岩边区工作是我提出并得到省委同意的。那里是省苏区内最艰苦的地方，我到那里是参加游击战争的，怎么能说是'退却逃跑'呢？"

那位负责人说："这要用辩证法看问题，事物都是发展的，例如游击战争，过去是需要的，现在红军主力强大了，再提就是游击主义了。"说罢那人问："你在边县边区为什么不能和中心区一样扩大

红军?”

罗明说:“在边县边区面临着随时同敌人作战的局面,随时都要进行游击战争,打击敌人的进攻。所以不能和中心区一样,干部和群众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提出采取三分之一的方法,逐步地分批地扩大红军。……”

那位负责人打断罗明的话说:“你这样做是‘富农路线’,你说听群众的呼声,就是这么听吗?”

罗明也激动地站起身说:“这是永定金沙乡贫农会议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罗明说到这儿,大声道:“列宁说过,要使真正整个阶级,使被资本家压迫的真正广大劳动群众都站到这个立场上来,仅靠宣传和鼓动是不够的,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这些群众本身的政治经验,这是一切大革命的基本规律……”

博古亲自找罗明谈话了。他劈头就问:“你不承认有路线错误,还引用列宁的话来反驳,我问你,你们山沟里有什么马列主义?你说边区和中心区不能一样扩大主力红军,要采取逐步扩大的办法,是不是说我们不了解边区的实际情况,要我们去调查研究,这是你们狭隘的经验主义。你不承认路线错误就开除你的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博古嗓门一挑,说:“还有比你更高的领导干部,也犯了同样的错误!”

当天晚上,在叶坪附近召开了一个有数百名机关干部参加的批判“罗明路线”的大会,大会气氛很紧张,有不少人愤怒地喊着口号,还有人把木棒拿到会场,说要打死罗明,罗明被架到主席台上,被两个彪形大汉倒剪双膊。直到中央局的杨尚昆做了解释,会场的气氛才平了下来。

批判会罢,罗明又反复检查交待问题,最后,博古再次找罗明谈话,要他回省委,在省代会上,彻底坦白交待问题。

2月15日,张鼎丞、刘晓等省委负责人被召到瑞金。二人亦受到了中央局领导人最严厉的批评。当天,中央局作出了《苏区中央

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内称：

> 中央局检阅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一小部分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认为在杭永岩苏区内群众的革命斗争已经低落，群众对于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政权已经采取了中立的态度。……（明显的例子是新泉县委杨文仲给省委的信）。这一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虽然遭到了以代理书记刘晓同志为首的省委大多数同志的部分的反对与批评，但这一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并没有开展起来，这一斗争只限制在省委机关之内，而且只是停止在个别的问题上。省委大多数同志没有得到了解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坚决站在党中央与中央局的进攻路线上而斗争到底，省委大多数同志在这一斗争中表示了他们的不坚定与机会主义的动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也犯了许多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因此中央局决定：
>
> 一、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指出这一路线的露骨的表现是以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为代表的取消主义。
>
> 二、省委对于这一路线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必须受到最严厉的打击。……
>
> 三、立即召集省的临时代表会议，尽量吸收中心支部的工人雇农同志参加，成立新的省委。
>
> 四、在临时代表会议召集之前决定以陈寿昌、刘晓、钟友勋等同志为临时常委，处理一切工作。
>
> 五、派中央局同志出席这一会议做报告并领导这一

会议顺利进行。

六、立即撤销罗明同志省委代理书记及省委驻杭永岩全权代表工作。

在中央局这个决定作出之后的第二天起，中央局领导人博古、洛甫、任弼时、王盛荣等即在《斗争》、《青年实话》等苏区主要理论刊物上发表文章，对罗明、杨文仲的观点加以批驳。《斗争》杂志上曾刊了博古的文章，文章写了中央局与罗明路线的分歧。为使读者看着明白，特抄录如下：

党的决议写着："在这决战中间，我们有着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二月八日决议）"

而机会主义者认为这是可疑的，以为"两军主力双方决战，牺牲必大"。所以提出下命令要"二、四军团立即回师湘鄂西与鄂豫皖"。更进一步，那当然是调赴中央苏区，配合一方面军行动了。这不禁令人想起李立三同志过去要苏联出兵蒙古，红军出动响应的提议了，不过右倾机会主义者更懦弱一些而已！

党主张："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中国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

机会主义者说："第一，扩大红军边区应该例外，边区是不能扩大红军的；第二扩大三百主力红军还不如扩大一百地方武装；第三党不应管扩大红军的事，这完全是党代替了政权。"

党主张："号召所有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及"每个工农分子应该武装起来加入红军。"

机会主义者说："各处地方武装在数量不见得少"，而且多了反难组织好训练好，"不但不能配合主力红军作

战，而且还会扰乱主力红军的行动，或给以坏的影响，这是无益的。”所以“关于地方武装方面目前最中心的迫切工作，是先造成基干部队”（见罗明信）。

党主张：“独立师团等等应该积极的进攻，牵制敌人、扰乱敌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路线，……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在边区要进行最有力的运动防御战。”

机会主义者说：“因为地方武装（包括独立师在内——古注）过于软弱，一打就垮”。所以他们只能用来去打连南汀东南的团匪，这一带的团匪力量很弱，目前还没有白军配合，很容易消灭他，并在消灭这一带的团匪中，可以锻练地方武装战争力……以后很快能与白匪打仗”（均见罗明信），关于组织强有力的运动防御战，那更可不必，只要向北发展，军区指挥向北一迁，那就“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了。“这样，不但不会防害闽西的巩固，相反的，只有如此才能配合闽西的斗争，才能不使杭永孤立”。

党主张：最广大的动员全苏区工农民众，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用一切力量使反帝拥苏同盟变为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工农的群众组织。

机会主义者说：“反帝同盟，拥苏同盟及青年部，革命群众团体名目太多……必须尽可能减少或“‘合并’。”其实李立三的行动委员会又简单又少麻烦，或许更合杨文仲同志的胃口吧！

党主张：应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革命的胜利。

机会主义者主张：党应该从领导国内战争——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中脱离出来，而去研究各种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这就是要党从领导胜利的苏维埃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的党，回到从前那种学究主义的研究性的小组织去。

> 同志们！难道还不明白么？这里清清楚楚的放着两条路线，一条是党的布尔塞维克的攻进路线，一条是机会主义的走向取消主义的退却逃跑的路线。

2月中旬的一天，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召开了毕业生的党团员大会，会上，博古作了《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的报告。

博古在会上挥着拳头，尖着嗓门喊道："同志们！切不要看轻罗明同志，他似乎比列宁还稍为高明些呢！他想出了锦囊妙计，这就是进攻路线此路不通，还是以左右散开向后转为是，这样罗明、杨文仲等便把自己的退却路线与党的总路线对抗起来。这个路线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罗明同志到新泉之后，新泉县委书记为此写给省委的政纲式的信。"博古最后说道："为着动员我们一切力量，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克服我们面前的困难，那只有一种方法：便是开展在各方面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这首先要粉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动摇，把他们隔绝起来，因为他们妨害我们的进攻，惊惶失措，悲观失望，将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胜利的思想。布尔塞维克的不调和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将是保证我们胜利的先决条件！"博古在大会上严厉地批评了闽粤赣省委的主要领导。博古以手击桌，大声道："对于两个原则不同的路线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很可惜，我们闽粤赣省委的另一部分同志正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他们只是多少感觉到罗明、杨文仲的错误，多少温和地批评了他们，批评也是东一点西一点的，缺乏拥护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布尔塞维克的澈底性与坚定性，因此，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犯着许多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博古讲到这里时，不断地挥动着双手，声音嘶哑地喊道："同志们！我们目前正处在胜利的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的面前！我们有着取得这次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也有着许多困难，只有机会主义者在敌人大举

进攻面前悲观失望，在困难面前投降屈服。每个中国的布尔塞维克应该团结在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的周围，用十倍努力，十倍坚定，十倍积极，勇敢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实现我们面前历史的史命！”

2月24日，闽粤赣省在汀州召开了省临时代表会议，中央局派人参加，省委参加会议的有张鼎丞、刘晓、郭滴人、方方、李坚贞等。会议内容是批判“罗明路线”。首先由罗明做检查，罗明只得给自己“上纲上线”一番。接着，与会代表对罗明路线展开了批判。那些“风派人物”都鹦鹉学舌地顺着中央的定的调子把罗明骂了一番，也有“骨头硬”的迎风而上。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说：“新泉是罗明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才紧急动员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打退了敌人进攻，不然新泉根据地不能巩固。”

上杭、永定等县的区乡代表多为工农干部，头脑不那么繁杂，敢说真话，他们说了罗明领导的开展游击战的许多好处。还说若各区乡都这样做，能给敌人很大伤亡。当这些代表在发言中说到每当对敌人进攻，由于敌人的地点、兵力等都估计的很准、因此每仗必胜时，中央代表极不高兴地插话说：“这都是一般参谋人员的事情，不是你们区乡干部的工作。”

代表大会越开气氛越紧张，到后来，竟用谩骂和讽刺的方式对待罗明及其支持者。中央代表指着张鼎丞说：“中央对你一次又一次地教育，你仍然是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者！”

在会上，罗明、张鼎丞、刘晓等人，被迫于大会上做检查，但中央代表和一部分“风派人物”仍对罗明等人的检查很不满意。据1933年3月15日出版的《斗争》载：

> 罗明同志、张鼎丞同志等对自己错误的承认还是不充分的。……大会很正当的要求这些同志不但在口头上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且在实际工作中表示他们对于党的

忠实与党的进攻路线执行的坚决。

临时代表大会由中央代表作总结，他宣布了补选省委委员的名单和撤销杨文仲职务的决定，并宣布杨文仲是“罗明路线”的代表者之一。这次会议改组了省委。由陈昌寿担任省委书记。会后不久。罗明和杨文仲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刘晓调往江西，张鼎丞被撤销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职，从江西调钟循仁接任。

人人心惊，个个肉跳

临时代表大会之后，新的省委作出了《对〈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的决议》，内称：

> 临时省委讨论了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后全部同意，一致的认为中央局对闽粤赣省委的估计，对过去省委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与以刘晓同志为代表的对罗明路线的腐朽自由主义态度的指斥，以及对过去省委的处置是非常正确的。

临时代表大会之后，闽粤赣省批判“罗明路线”达到了一个高潮，当时，闽粤赣苏区抓“社党”的恐怖阴影还在笼罩，反“罗明路线”运动又起，一时间，直搞得人人心惊，个个肉跳。许多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也不敢说真话，怕引火烧身。但也有的县依然从实际出发，不买博古把持的临时中央的账。永定县委即是一例。他们消极地对待中央和省委的决定与指示。4月1日，省委做出了《中共闽粤赣省委对永定工作的决定》，内称：

党的临时代表大会及团的扩大会议，严厉的打击罗明路线及对罗明路线的自由主义者，号召闽粤赣党和团全体同志团结一致，在敌人积极进攻闽西苏区中坚决的执行党的进攻路线斗争到底。但我们检查永定党、团县委的工作，绝对看不出任何转变趋向，相反的，在对群众的估计上，完全是继着罗明路线的错误，……在敌人大举进攻中，表现最无气节的懦惰和动摇。……因此，省委为彻底转变永定党和团的工作在派遣工作团出发的时候，特有以下规定：

一、立刻开展在永定党和团内反罗明路线的斗争，将永定党和团的执行罗明路线的错误充分揭发出来。

二、立即召集永定党和团的县委扩大会议，提拔为进攻路线坚决斗争的工农分子，成立新的县委。

……

省委此决定，无疑是杀一儆百，如此，在闽粤赣省，再也没有敢说真话的人，人们是敢怒不敢言，甚至连怒都不敢。这场运动的结果，不仅使闽粤赣省的主要干部和老干部都遭到了打击，甚至地方所有的区、军队所有连以上干部都斗过。而且打击一个提拔一个。继罗明等被撤职后，省委常委、军区司令谭震林被撤销了一切职务，省委常委郭滴人被撤职后强迫去修工事，团省委书记陈荣、省财政部长邓子恢、省军事部长游瑞轩、土地部长范乐春、省军区的杨海如、霍步青、长汀县委书记李坚真、上杭中心县委书记方方等都被扩成“罗明路线”干将而被撤销职务。一时间，“罗明路线”帽子满天飞。把个闽西的干部斗得晕头转向，在肃“社党”中幸存下来的一点点老干部，都遭到了打击和排挤。造成了党群之间、上下之间，干群之间的严重隔阂。造成了党内恐惧心理和社会不安现象。

各级干部在肃“社党”时的恐怖心理，此时又起，时不少人认为

“罗明路线”即是“反革命”，罗明即是反革命分子。许多与罗明相熟的人不敢与其来往，也不敢同犯了“罗明路线”的人来往。反“罗明路线”一直到主力红军长征才缓和下来，但造成的巨大损失是无法挽回的。

到了1950年，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杨尚昆见到了一个五十多岁的高个子，很面熟，但想不起是谁，那人见状，遂上前握住杨尚昆的手说：“我就是罗明啊！”

杨尚昆听了，哈哈大笑说：“哦，罗明同志，我记起了，那时候，你头上顶着顶大帽子，谁敢和你的名字连在一起呀。”

第十章 “谢古邓毛剩小平”

博古等在闽粤赣省大反“罗明路线”的同时，于江西省开展反“邓、毛、谢、古”，即所谓的“江西罗明路线”。

“邓、毛、谢、古”为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人。时邓小平为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书记。毛泽覃、湖南湘潭人。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在湖南自修大学学习，1923年10月加入中共。曾于湖南常宁水口山和长沙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运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1929年参加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工作，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东固区委书记、江西永丰、吉安、泰和中心县委书记、红军独立师长等职。1932年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维俊系湖南耒阳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共。先后在安源、水口山、岳北等地从事工农运动。1928年初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到井冈山。先后任红4军28团1营、2营党代表。1929年

任红 4 军 2 纵队政治部主任。1931 年任中共赣东特委书记，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历任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赣西南特委委员，时为江西军区 2 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 5 师师长。古柏为江西寻乌人。1925 年加入中共，1926 年参加梅县东山中学暴动失败，脱险回寻乌，创办中山学校，进行秘密活动。1928 年领导寻乌“三·二五”暴动，而后转入农村，坚持武装斗争，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发展到一千多人枪，正式组成红军第 21 纵队，任政委。1930 年 4 月，调任寻乌县委书记，1931 年调瑞金工作，先任红 1 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粮食部长。

临时中央迁到瑞金后，即在中央苏区推行了一条更“左”倾的路线。这时正是第四次反“围剿”间，广东军阀向寻乌县发动进攻，邓小平见敌来势猛烈，为避免损失，遂及时的组织了退却。寻乌为广东之敌占。“左”倾冒险主义者即抓住了这一条，指责邓小平执行了“纯粹防御路线”，是“可耻的右倾退却逃跑主义”，“把寻乌整个送给了敌人”，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者。

2 月 28 日，江西省委对会、寻、安三县中心县委发了指示信，信中批评了中心县委、称：

> 会、寻、安的党所犯的纯粹的防御路线之来源，与罗明路线相同的。……把军事工作与群众的基本动员工作分割开来，……更进一步的确立了纯粹防御路线的基础。……防御路线的结果，必然走到罗明退却路线的前途。

对于江西省委的这一指示信，中央局很不满意，认为这信中所包含的错误，首先在省委指示信中没有明确的指示会、寻、安的单纯防御路线是会、寻、安的罗明路线。

1933 年 3 月底，中央局派了洛甫前往会、寻、安三县，撇开了中共江西省委，直接领导召开了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揭发“会、

寻、安的罗明路线"。3 月 31 日，在洛甫的主持下，强行通过了《会寻安三县党极积分子会议决议》，内称：

> 一、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局代表洛甫同志的政治报告与结论。
>
> 二、大会认为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致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
> ……
>
> 五、大会在中央局领导之下，要指出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的不深入，省委也应负一部分重大的责任，在省委二月二十八日给会寻安三县的指示信上，虽是指出了纯粹防御路线的严重错误，但省委把这一防御看做是在进攻路线与罗明路线的中间的东西，认为"防御路线的结果必然走到罗明退却路线的前途"，把这一路线主要的看做是军事上的分兵把口，没有明确的指出进攻路线与纯粹防御路线的内容在哪里，对于群众力量也没有完全正确的估计，对于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同志严重的错误没有应有的批评，最后也没有指出以后会寻安党的中心任务在那里，这种指示信当然没有法子将这一反纯粹防御路线的斗争。
>
> 六、大会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决定加强和部分的改造中心县委与会寻安县委之常委，并委托三县新的常委立

> 即开始在正确的民主化和布尔塞维克自我批评的基础上，召集各级代表及三县党各级领导保证三县工作的彻底转变，在中央局领导之下开展这一反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使这一斗争深入到支部中去。

会议之后，洛甫即在《斗争》上发表文章，谓“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最坚决的打击了过去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领导”。文章还对江西省委进行了批判，称：

> 省委对于这种江西的罗明路线的斗争是十分不够的，对于罗明路线的存在，始终没有公开的指示出来……乐宜县的工作，虽然那样严重，但省委的指示在不到几百个字的短信中，可以说一无所有。万太方面则最近又把在会、寻、安犯严重错误的邓小平同志派去代表省委解决那里的问题。……江西省委必须最严格的检查所有边区各县的工作，揭发自己过去对于边区工作的指示的政治错误。

4月16日至22日，江西省委召开了三个月的工作总结会议。会上对邓、毛、谢、古进行了严厉的斗争，把他们当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说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罗迈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道：“江西的罗明路线，是一条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条与党的进攻路线没有丝毫相同而完全相反的路线。这条路线根本不相信党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力量。因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走上了悲观失望的取消主义的道路。”罗迈对邓小平进行了揭发，他说：“四中全会时，邓小平在上海，他不仅没有承认过去自己右的错误，而且在两副面孔的掩盖下，散布对四中全会后中央领导的不信任。实际上就是反对共产国际和四中全会。他回到苏区，即

与毛、谢等提出机会主义口号，共同进行了反对中央局的活动。这次工作总结会上，谢、毛公开在会场上进行反党活动，而邓小平对此默不作声。这不是偶然的，这表明他一向在进行反党派别活动。”罗迈说到激动处，手击着桌子道：“邓毛谢古为什么一鼻孔出气？是因为他们过去有共同的机会主义观点，后来更有共同的罗明路线的机会主义政纲！”

总结会上，在中央局的压迫下，会议划清了邓毛谢古错误的四条界限。一是对于中国现实苏维埃运动的内容的估计和策略上的结论，邓、毛、谢、古等是与党绝对相反的；关于巩固和发展苏区，把苏区联成一片与扩大红军一百万的任务，邓、毛、谢、古等的主张同样是与党的路线绝对相反的；对于革命动力的认识和党组织群众领导群众的策略，谢、毛、邓、古又走到与党的路线绝对相反的方面；四、邓、毛、谢、古的领导方式，是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这是罗明路线的组成部分。

在会上，与会的中央领导人强迫邓、毛、谢、古作深刻的检查。邓小平第一次的声明书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古柏的声明书只写了十五页，且内容与“左”倾路线执行者要求甚远。谢、毛声明书中也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左”倾路线执行者立即强迫他们作第二次检查，但检查仍不能过关。罗迈在大会上做了总结性发言，他说：“大家看看邓小平的声明书吧，省委决议指出：邓小平同志对于自己的错误，没有遇着揭发和压迫，就隐瞒起来，邓小平如何回答省委这一指责呢？他说：‘我觉得，第一我感觉了解是错了，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是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大家听听，这是一套多么好的外交词令？邓小平所以始终不肯诚恳的认识和揭发自己的机会主义，从四中全会以来对于立三路线如此，现在对于罗明路线又如此，很明显，这是他在坚持自己的机会主义。”罗迈稍停又说：“邓小平直到今天还只承认一个抽象的派别观，而对于他所进行的反党的派别活动，却不肯揭发出来。再有，邓

小平在第二次声明书上对于自己如何逃出第7军，如何在去年11月召集会、寻、安三县负责同志计划放弃三县这些可耻的事实，一个字也没提及。他这第二个声明书同第一个一样，除对给省委决议用了些外交词令解答外，什么也没有。”罗迈又把毛泽覃的声明书拿出来，说：“毛泽覃同志这个声明书，承认他有一个机会主义的路线，但是，他认为他这机会主义的政纲只有两条，一是对分配土地上有错误的见解，二是认为红军攻坚有困难。”罗迈讲到这儿高声说：“毛泽覃是怎样揭发他的小组织的行为呢？他说，许多机会主义的意见，不敢向党提出，仅只秘密谈论。他这小组织的行为，就是个秘密谈论。他这是检讨吗？这完全是掩盖自己的错误。”罗迈谈到古柏时，大声说：“再看古柏同志，在这第二次声明中，他写了十五页，这十五页纸除了说自己一些机会主义的观点外，对于反党小组织行为的揭发，则几乎没有说到。谢维俊同志的第二次声明书，依然没有系统地揭发自己的反党路线，而且简单地说了三条新区工作的政纲。对于个人反党的行为有些揭发，而对于小组织的行为，则极少揭发。”罗迈最后说：“必须严重指出，四个同志对于自己的根据特殊政纲而组织的派别和小组织，至今没有给以组织上的揭发，也没有宣布如何解散这种小组织。根据以上事实，很明显，邓、毛、谢、古四个同志是没有解除他们的武装，虽然如今受到了党的严重打击，而表示暂时的投降，但这种投降不能保证他们能成为真正的战士，因为他的武装还没解除下来。”

由于邓、毛、谢、古两次声明书的检查都没过关，且认为态度不好，于是，江西省委报中央局批准，作出了《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四同志二次声明书的决议》，决议严厉地批评了邓、毛、谢、古四人，称：

> 对省委的决议和谈话，只是以外交方式接受，他们反党的机会主义政纲和小组织的活动并没有在党的布尔什

维克火力前面解除武装，只是在党内残酷思想斗争中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而并没有根本放弃其小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这样省委认为四同志是否真正站在党的路线上、组织上成为坚决的先锋战士，现在是没有保证的！……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地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起经过党大会经过寻安工作直到写二次申明书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谢毛古三同志，必须向党忠实的从历史根源起彻底的揭发反党的小组织活动和小组织的形式，以及全部机会主义政纲，同时必须采取必要的办法，宣布小组织的解散。

决议中要邓等四人写出第三次声明书，即检讨书。

接着，“左”倾中央领导在江西苏区各地全面开展了反“江西罗明路线”。到了 9 月 27 日至 10 月 3 日在江西全省党代会上，又一次掀起了反“江西罗明路线”的高潮。12 月下旬，江西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把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再次掀起了一个高潮。除继续批判邓、毛、谢、古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外，还批判了省苏维埃财政部副部长、省苏维埃工农检查部副部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省苏维埃教育部部长郭登梅等省委、省苏的主要领导干部，批判了会寻安、永吉泰、宜乐崇、建黎泰等中心县委，石城、于都、永丰、新淦、信丰、崇仁、南广、公略、万泰、吉安、泰和、赣县等县委及陂头、冠朝、元坑、塘上、折桂、冠山、古县、七都、鹿岗等区委。江西省的中心县委和区委，几乎都被打成“罗明路线”者。据当时的中央局理论刊物《斗争》文载：江西省在 1934 年 4 月到 6 月，全省的绝大多数县的县委书记，都因罗明路线而撤了职。又据中共江西省委报告，自全省工作总结会议开展“反罗明路线”和中央局指示改选区委、支部以来，大批干部被清洗。仅广昌县在 1933 年 5

月至8月三个月间，就清洗了县苏、区苏主席、区委书记等主要干部十七人，谢维俊所在的江西二分区清洗干部五十多人。

邓、毛、谢、古四人也被进行了组织处理，均被撤职，调到了基层，有的任巡视员，有的到突击队工作。

在中央的单位也因此而进行了清洗，如中央工农检查部部长何叔衡等，军队内郭天民、梁锡古等。

此时江西苏区正值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时刻，一场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的运动，清洗了大批优秀的中共干部，这无异于使南京国民政府平添了千军万马。红军败离江西，苏区丢失，此为必然矣！

1945年5月3日，博古在中共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心情沉重地说："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路线的'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1943年，林伯渠在陕北就当年中央苏区反"罗明路线"和反邓、毛、谢、古而吟诗道：

偶忆往事便心惊，谢古邓毛剩小平，
割截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在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罗明路线"平了反。文中写道：

> 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

第十一章　湘赣苏区的大“肃反”

湘赣苏区的“肃反”之初

在福建肃“社党”、反“罗明路线”、江西反“邓、毛、谢、古”的同时，湘赣省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肃反”运动。

湘赣苏区是以江西永新为中心，东起吉安县永阳赤白交界处，西至茶陵赤白交界处，南到永新关背苏区，北邻萍乡赤白交界处，包括永新、安福、宁冈、吉安、遂川、茶陵、攸县、酃县、萍乡、莲花等县之一部或全部，面积约一千平方公里。中共四中全会后，随着国民党“围剿”规模扩大，尤其是“富田事变”的发生，中共中央遂认为赣西南特委的问题较多，必须加以改组，加之当时的湖南省委已被敌人破坏，为了加强党对湘赣边界斗争的领导，决定成立湘赣省并

建立中共湘赣省委。时中共中央于上海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两个省委，即湘赣省委和湘鄂赣省委，由王首道任湘赣省委书记，张启龙任湘鄂赣省委书记。周恩来与王首道谈了话，之后，王首道、还有甘泗淇等一起由上海动身赴江西。6月到了赣南万安良口，在这里过河时，王、甘二人与张启龙相会。时张启龙与滕代远一起去中央局的。在这里，张启龙把富田事变等情况，告诉了王首道。王首道等便同张启龙、滕代远一起到了中央局。在中央局，几个人见到了项英、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欧阳钦等。接着，中央局召开了会议，听取了王首道传达的中共中央的指示，由张启龙汇报了工作。会上，中央局负责人强调，要王首道、张启龙等抓紧准备去湘赣边界工作，到那里后的任务，首先抓肃反和扩大红军。尤其要抓紧肃反。特别提出解决富田事变遗留的问题。会上，中央局根据王首道的建议和湘赣省成立后的任务，决定张启龙去湘赣边苏区。几天后，王首道、张启龙、林瑞笙、甘泗淇、谭牛山五人在一个营兵力的护送下，起身赴永新。

王首道等7月份到达永新，随及召开了有湘东南特委和西路、北路分委参加的联席会议。时湘东南特委班子人员都到了，西路分委主要负责人朱昌偕、左娜、马铭、龙贻奎、刘天干也到了。会上，由王首道传达了中共中央指示，内容包括战争问题、土地问题，成立省苏维埃问题，解决富田事变遗留问题。但在这个会上，对富田事变遗留问题的解决，没有传达，由于保密，仅王首道、张启龙等人掌握。公开讲要进一步开展肃反。由王首道任临时省委书记、林瑞笙任组织部长兼保卫局局长、甘泗淇任宣传部长、易心平任少共省委书记、谭牛山任副局长、袁德生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为副主席。

1931年8月1日，湘赣临时省委在永新钱市街成立。

王首道，湖南浏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春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期间加入共产党。同年9月任

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农民特派员、中共祁阳县支部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受中共湖南省委派遣，到浏阳恢复中共组织。任中共浏阳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等职。1929 年 4 月，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1930 年 9 月任中共湖南省常委，湘省临时委员会书记等职。

张启龙也是湖南浏阳人。1924 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加入中共。1926 年 7 月，任永和农运特派员。不久，任中共永和区委书记。1927 年春，任中共浏阳县委工人部长。参加了秋收起义。1928 年 6 月，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同年冬，任红 5 军第 2 纵队党代表。1930 年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4 月，任浏阳县苏维埃政府主席，8 月，任湘东特委书记。

袁德生亦为湖南浏阳人。1922 年参加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任直井五段工人总代表。1923 年加入中共。1927 年 3 月当选为江西省农协执行委员。大革命失败后，曾参"八一"南昌暴动和湘赣边秋收起义，后在湘东地区坚持斗争。1928 年 2 月参加组建中共湘东特委，任特委委员。5 月至 7 月曾以中共湖南省委代表身分两次到井冈山指导工作。1930 年 8 月，中共湘东特委重建后，任特委常委兼湘东南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 年 2 月，任中共湘东南特委常委兼湘东南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湘赣临时省委组建之初，中央局和临时省委对赣西的干部有看法，因为富田事变发生在赣西，便认为赣西的干部靠不住。

1931 年 9 月 20 日，湘赣临时省委给中共中央写了第一号报告，内称：

中央：

王首道、甘泗淇等同志受中央指派到湘东南传达中央指示及组织新省委指挥湘赣边苏区工作，因石青、宁迪卿之被捕叛变，改道由闽西赣东南，经过苏区中央局的指示和帮助，于八月一日方到永新县城，成立临时省委，开

始进行工作，到现在一月又二十天，兹将各种情况及请求扼要报告如下：

……

（三）湘赣苏区最严重的现象，就是赣西一带 AB 团（包含豪绅地主官僚流氓富农及知识分子）占据了苏维埃与红军的各级指导机关，湘东南的 AB 团改组派也很多，实行种种阴谋捣乱。自从省委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依靠布尔什维克的坚决指导与党的基本群众斗争力量，一个多月工作结果，已发动党内外群众的由整个苏区消沉腐化崩溃的现象转变到积极，进步到广大群众的斗争局面。

……

省委目前的主要工作：

1. 从下而上的改造各级党的组织，从支部起把阶级异己分子洗刷，支部干事会，并召集在省县代表大会，改造各级指导机关。……

（四）请求：

……

4、青年团临时省委没有得力人员负责，中央局指定书记还没过来，代书记不能工作，AB 团还没有开始破获，一切工作还没有转变，请中央转中央局派得力同志来工作。

从这份史料记载，湘赣临时省委对 AB 团看得是很重的。其报告并不长，竟三处提到肃清 AB 团。

前文述过，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开始并没什么大问题，富田事变的发生，把肃反推向了一个高潮。临时省委组建后，便立即按照中央局的部署，展开了肃反工作。后来王首道回忆说：

"当时,'左'倾路线的错误表现在肃反问题上是很突出的。以'左'倾路线为代表的党中央对革命内部隐藏的阶级敌人作了过份夸大的估计,制造了过'左'的肃反政策,并错误地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大批领导干部当作'AB团反革命分子'列入肃反名单,责令我们临时省委审理。那时我们临时省委刚刚成立,对本地区的情况没有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对当时的干部也没有做认真的估计,在方针政策上盲目地接受了党中央的错误指示,在组织上按照当时党中央的规定,设立了脱离党委集体领导,脱离群众监督的肃反机关,在案情审理上又采取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以致使肃反工作发展到乱捕乱杀,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将不少优秀干部当作肃反对象进行了错误处理。"

第一次"肃反"高潮

1931年10月8日至15日,临时省委在江西莲花县花塘村召开了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总结了临时省委工作,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出了湘赣省党和红军今后的任务。大会选举了新的省委成员,由王首道任书记、林瑞笙任组织部长兼保卫局长(后谭牛山接任)、甘泗淇任宣传部长、袁德生、张启龙为省苏维埃政府正副主席。此外,王震、李孟弼、刘其凡、李朴等为委员,胡番美、李天柱、王豪、刘任武、刘燕玉等为候补委员。王首道、林瑞笙、甘泗淇、袁德生、张启龙五人为常委。

湘赣省委组建后,组建了政治保卫处,各县肃反委员会也都单独建立起来。当时,省委提出了"向AB团、改组派坚决斗争"的口号。省委这一坚决的态度,立即影响了各县。时永新、莲花、吉安、

攸县、宁冈、安福各县都开了公审大会。对“AB 团”分子进行了镇压。其实所谓的这些分子，除一些反水的群众，投降敌人的个别士兵等，多数是逼供信搞出来的。采取的是“自首政策”。据当时的有关文件载，认定“AB 团”的方法是“从‘AB 团分子’中拿住其弱点使他无法解脱而直供出来”。据当时不完全的统计，到 1931 年底，湘赣全省处决的“AB 团分子”达一千二百一十人，大多为地主富农和知识分子，“自首”和释放的贫苦工农分子一千余人，在押的五百余人。

虽然如此，中央局对湘赣省委的肃反认为很不够，在 1931 年 11 月 21 日中央给湘赣苏区和省委的信中称：

> 在肃反工作上，虽然你们已经得到不少的成绩，然而你们这一工作，还没有能够深入下去，你们还没有能够使广大的工农群众了解 AB 团与改组派的罪恶，积极的起来帮助我们做这一工作。根据你们的报告看来，在各种组织中，还有不少这些反革命的工作。中央认为要使这一工作深入下去，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发展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加紧肃反的工作，把一切腐化官僚主义的异己分子从党与苏维埃等机关中清洗出去。一切和平的状态，是最便利于这些反革分子发生滋长的。
>
> 此外，必须加紧反对 AB 团、改组派的思想斗争，揭破他们一切欺骗与反革命的罪恶。当然同时政治保卫处的工作也必须加紧（关于这一问题，请参阅中央关于苏区内部反革命派的斗争的决议）。

中央的来信，使省委受到震动，本来肃反已经到了发疯的地步，但省委又检讨了这一工作，认为肃反工作右倾。在 1931 年 12 月 16 日省委第二次执委会决议案《目前政治形势与战斗任务》中

写道：

> 加紧肃反。湘赣苏区内的AB团并没有肃清，此次敌人进攻苏区，AB团卖力不少，特别如永新的黄球等公开到白军散发反革命传单，有些地方因AB团的领导与白匪的压迫，成立挨户团、守望队在苏区内暗通消息，制造谣言进行各种捣乱，破坏红军，这些敌人只要脱露一个都是危害我们，现在肃反工作，并不如两个月前的紧张，这是不能允许的现象。驱逐豪绅地主及反动家属的工作也是或者执行怠工，或者不分阶级采取大批杀戮，如酃县萍乡……有些地方未能发动群众去执行，造成群众恐慌，一直到现在甚至有些地方还对大批反动家属未加处理，党部必须发动群众起来，深入这一斗争，尤其要加紧反对富农，发展苏区内的阶级斗争，消灭各种反动派别，巩固革命政权。

肃反的"加紧"，更进一步把思想问题当成了政治问题，把一般错误当成反革命问题。结果，使党员们已出现的恐怖心理更加恐怖，迫使不少群众弃家逃跑，而且逃跑现象很严重。肃反工作成了各级组织的中心工作。肃反中要求走群众路线，阶级路线，其实也只是个形式。阶级路线就是照顾出身，唯成分论，越穷越吃香。群众路线不过把群众集合起来公布一下。

这当儿，湘鄂赣省委的一些文件到了湘赣省委，湘鄂赣省还有两名代表来到湘赣省委，向湘赣省委报告了湘鄂赣省的一些情况，无论文件还是代表的报告，都把湘鄂赣省的问题说的很严重。认为湘鄂赣省的省委委员多半是地主富农成分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是湘鄂赣的老干部，说他们在执行立三路线中很坚决，执行四中全会不力。说执行不力的表现是对国际和四中全会的文件不认真传达，

虽然文件已到了省委，但省委在全省党的代表大会及扩大会上都没有单独提出讨论，只是简单的报告了一下。还说他们不仅宣传不够，在组织上也不保障四中全会的执行，完全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领导，没有执行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转变。究其原因是省委成员思想右倾，像省委委员李宗白、石夫都是地主出身，但他们在平江、浏阳的斗争历史很长，因而也就不怀疑他们是AB团、改组派。虽然湘鄂赣肃反委员会曾经抓了八名改组派要犯，但也没从这八名改组派要犯口供中找到线索，两名代表向湘赣省委报告时，说李宗白、石夫等省委领导成员，虽然到目前还没抓到他们是改组派的线索，但从他们对分配土地、驱逐豪绅地主家属的问题没有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执行上看，他们是有很严重问题的，最后说湘鄂赣省委和苏维埃的领导机关被富农把持了，执行的是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路线。

其实，湘鄂赣省委的工作是从实际出发的，因而与四中全会的"左"倾路线不一致，由于湘赣省委唯恐跟不上中央和国际的号子，当听了湘鄂赣省的代表的报告和看了湘鄂赣省的文件后，省委于1931年12月18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了报告，认为：

> 我们认为这样退却路线的领导(指湘鄂赣省委—引者注)，还要使革命走向更严重的危险。湘鄂赣省的工作坍到如此地步，我们认为并不完全是敌人厉害，客观环境恶劣的问题。而是工作转变与否和应付策略正确与否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够坚决真正的执行国际路线和四中全会的决议，是很有可能来恢复整个苏区的前途。……望中央速派得力干部来改造湘鄂赣省党的组织，要坚决取消这个富农路线脱离群众机会主义的省委领导。

湘赣省委写给中央的这个报告，不仅给湘鄂赣省委的肃反扩

大化点了一把火，同时，更以湘鄂赣省委的行动为镜子，对照检查自己，从而，以“肃反为中心”的口号越叫越响，肃反扩大化一发不可收拾。

这时主持湘赣省肃反工作的是林瑞笙。林，字焕然，江西省萍乡芦溪镇人。1924年在安源路矿工作俱乐部担任工人子弟学校教师。1925年加入中共，同年秋到广州政治讲习班学习。1926年参加北伐，中途被留在湖南省茶陵领导工人运动，任中共茶陵特支委员。1927年赴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任中央巡视员。给他当副手的是谭牛山，谭牛山系湖南望城县人，中共党员，曾参加学生运动和大革命运动，1931年春，受中共湖南省委派遣到湘东南苏区工作，先后任湘东南苏维埃政治秘书长，社会保险部长等职。

人们对这两人在肃反中的评价是：磨棚里的驴——听喝；人拉随人转，驴拉跟驴走。但是，面对越抓越多的AB团、改组派分子。张启龙找到王首道，说：“这么多的AB团分子，怎么不把我们杀掉？”

王首道吸着嘴唇说：“是啊，土地革命，工农是得到实际利益的，但为什么还要反对苏维埃，加入AB团呢？”

这时候，保卫局说永新苏维埃主席朱昌偕，还有左娜、龙贻奎等干部是AB团。并将朱昌偕抓起，左娜跑了。保卫局派人去追，王首道知道后说：“不要追了。”又说：“朱昌偕是共产党倒霉时入党的，斗争一贯表现勇敢坚强，我怀疑抓错了。”

王首道这么一讲，保卫局也就没有再派人追左娜，把朱昌偕等人也放了。

博古“龙”颜大怒

1932年2月，袁德生为团长、王震为副团长，率七十余名代表

赴瑞金参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会上，湘赣省的肃反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中央认为湘赣苏区肃反扩大化了，指示信内称：

> 湘赣省委过去反AB团、反改组派的斗争，是绝对必要和正确的，并且你们已收得相当的成功，给了反革命派以致命的打击，但你们对AB团以及一切反革命派的认识和估量还犯有过去中央区和闽西所有的那种严重错误。从省委的报告中可以看出你们对AB团的估量扩大化了，如说三师七团绝大多数是AB团，从团长一直到班长绝大多数的士兵都是；如说青年团上自河西分委下至小组，大多数都是阶级异己分子AB团，这种估量将团内群众、红军兵士最大多数不分被欺骗被胁迫乃至被乱供的都一律当AB团看待，这表示你们对AB团的认识与中央苏区犯有同样的根本错误。……虽然他的恶果还不如中央苏区与闽西苏区那样扩大，但这种错误，这两三个月如果继续发展的，则中央局可断言必已如中央区一样受到这恶果大大的损害。中央关于肃反工作的指示和决议，完全是正确的，尤其是中央局关于此问题给各级党部的指示与1月7日的决议案，更可以成为你们正确的进行肃反工作与改正过去的错误的钥匙，你们对此问题必须深刻的去了解群众的不积极和对政权的消极，肃反工作中的错误是有极大影响的。

中央的指示信，对湘赣省委的肃反扩大化起到了遏制作用，并对前段的肃反工作进行了检讨，1932年4月11日，中共湘赣省委在向中央报告工作中，就肃反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内称：

肃反工作，政治保卫局过去的确也有些"肃反中心论"的精神，以为中心工作就是肃反，事实上没有发展政治斗争，在政治上发动群众积极的从下而上的肃反，工作的重心着重于"命令，逮捕，审讯跟踪追迹"，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和充分的群众教育工作，尤其是下级更把肃反工作简单化扩大化了，甚至北路各县和攸县萍乡等肃反机关为AB团所操纵、利用，来破坏肃反工作，对共产党员和贫苦工农乱打乱杀，北路杀了三十六个AB团犯，内中有大多数是贫苦工农，造成群众逃跑的现象。许多地方把肃反工作代替了党内思想的斗争，只要某个同志表现了消极怠工和不正确的倾向，便简单地认为是AB团，以为除了AB团以外便没有其他反动政治派别和不好的倾向了。这样便造成了党内的恐怖现象。这样恶果虽没有闽西和中央苏区那样严重，但确实阻碍了我们路线的转变和工作的进展。

湘赣苏区的肃反虽然稳定了一下，但由于中央的路线是"左"倾，越"左"越革命，所以，这种稳定只是暂时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首道后来回忆说：

"以后肖克、蔡会文同志来了，又从中央苏区带了些'左'的气氛来，因此到了1932年下半年，又大搞起来了。"

这时，肃反委员会由刘士杰负责了。人们对于刘士杰的评价，一致认为此人很坏。他是湖南醴陵人，木匠出身，1927年参加工人运动并加入中共。曾任区委书记。1932年4月任湘赣省总工会委员长。10月当选为中共湘赣省委候补常委。此人心黑手狠。他任

省总工会委员长时，就把工人纠察队以AB团搞垮了。工人纠察队原来都是从部队中抽调的、政治上可靠的骨干所组成，但经刘大搞逼供信，结果差不多都成了AB团分子。之后，纠察队又重新抽调一了部分人组建，结果又让他搞掉了。刘士杰出任肃反委员会头头后，首先把朱昌偕搞掉，逼得朱在永新梅花山自杀。

在刘士杰负责肃反委员会不久，苏区中央局发电于湘赣省委，说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是AB团，要逮捕，刘士杰要行动，被王首道制止，缘为王首道不相信袁德生是反革命。

袁德生，1901年生于湖南浏阳。1923年加入中共。时为安源路矿产业工人。1922年参加安源路矿大罢工。1923年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最高代表会议总代表。1924年9月继续被选为直井五段工人总代表，参加最高代表会议。同时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经济委员会委员。1925年后从事农民运动和党的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后于南昌长沙从事地下工作。1928年2月参加组建湘东特委，任特委委员，5至7月曾以中共湖南省委代表身分两次到井冈山指导工作。1930年8月，中共湘东特委重建后，任特委常委兼湘东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2月，任中共湘东南特委常委兼湘东南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8月任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委员，10月当选为湘赣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在11月全苏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年，中共湘赣二全大会中再次当选为省委常委、省苏维埃主席。

对于袁德生这样兢兢业业为革命工作的人，省委内除刘士杰极少数人认为袁是反革命分子外，余皆认为袁决不是反革命分子，只是工作中有错误。

袁德生虽然没有被抓，但湘赣苏区的肃反风又刮了起来，从1932年12月19日《中共湘赣省委的工作报告》中，清楚地记载着当时的省委在肃反问题上，完全是在检讨肃反工作中有“严重的右

倾消极”错误了。

刘士杰早就想夺袁德生的权，他见王首道等不抓袁德生，遂将保卫局长谭牛山抓起，指控谭牛山是AB团。抓谭时，把永新保卫局长李敖也同时捉住。说李也是AB团。接着，刘士杰对谭刑讯逼供，要谭交待袁德生是AB团首脑。谭受刑不过，胡乱招供。刘士杰将谭的口供报告王首道，王首道依然不信。刘士杰怒道："我亲自见袁德生暗示谭牛山翻案。袁不是AB团又是甚？"

省委意见争执不下，遂派刘士杰与中央巡视员冯文彬一起去中央局汇报。刘士杰到了中央，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及有关人员已被迫由上海迁至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瑞金。刘即向博古讲了袁德生是AB团，有个人野心，想当省委书记，他加油添醋地说了一遍之后，把王首道、甘泗淇、张启龙等也奏了一本，其"本"奏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说王首道、张启龙对AB团取容忍的态度。中华苏维埃政府保卫局电令他们逮捕袁德生、刘其凡、李天柱等，王、张软磨硬泡地不执行。由于他们这些省委主要领导右倾，使赣湘苏区肃反领导不得力，立场动摇；二是打分宜之战中，不仅没打下，还损失了三百多人；三是王首道、张启龙放走了敌人的团长张超。张超是在清江附近被活捉的。彭德怀平江起义时，张超曾在彭的师里任团长，由于怕吃苦，脱离了革命队伍，当了国民政府军中的团长，但仍同情革命，其被俘虏前率部从文家市经过时，对老百姓也没骚扰。当他在分宜被活捉后，被带到了永新的苏维埃政府所在地。这是1932年10月左右的事。张超被捉后，王首道、王震、蔡会文几个人一商量，决定罚他一万大洋，还有西药、布匹等，说只要交出一万大洋，就把他放了。张超给其家人写了条子，其家中果真把东西和大洋凑齐了。恰逢张启龙、王首道、甘泗淇在后方。三人一商量，便按诺言把张超放了。张超走的消息被刘士杰等人知道后，刘士杰认为不该放，便派人追赶，在安福把张超扣住了。谁知这天夜里，张超又跑

了。张启龙在后来回忆此事说："就当时讲，放张超不一定有多大错误。"刘士杰攻击王首道等第四个问题是说湘赣"扩红"不力，原由是红军战斗力减少。而实际上红军战斗力减少的原由不是扩红少了，而是红军中出现烂脚病，非战斗减员多，因而影响战斗力。毫无实际经验、又"左"的发狂的临时党中央负责人博古听了刘士杰的汇报，不分清红皂白，一面发电于湘赣省、下令逮捕袁德生等，一面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了关于解决湘赣省委问题的决议。决议内称：

……检查了省委寄来的一些文件，并听了冯、刘两同志口头报告之后，认为省委在最近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湘赣苏区不但没有得到新的发展而且大大缩小了……群众的积极性，在一些官僚主义与命令主义之下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在敌人大举进攻中央苏区与湘赣苏区的面前张惶，进一步退却逃跑与和平保守的情绪表现得非常浓厚。一切这些证明湘赣省委在这一时期内，对于中央与中央局坚决动员群众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进攻路线的执行是动摇的。虽是省委在决议上承认这一路线的正确，这当然由于省委同志对于目前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对于苏维埃革命的胜利缺乏信心，以及对于进攻路线缺乏深刻认识所造成的。……中央局认为：

……

五、用一切力量同对于肃反工作的消极做斗争，无情地打击那些对于AB团自首自新分子的容忍与自由主义的态度。在省苏工农检查部领导之下立刻开始阶级异己分子的检举运动，将消极怠工、贪污腐化的异己分子从党、工会、苏维埃领导机关中洗刷出去。省保卫局的工作应该立刻健全起来，大胆提拔最好的工人干部到保卫局

中担任领导工作，反对反革命派别的斗争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

……

最后中央局认为，为了要保证中央与中央局路线的坚决执行，现在省委必须改组，中央局决定撤销王首道同志省委书记的工作。指出王首道同志在肃反工作中曾经屡次表现了他对于AB团反革命分子以及AB团自首自新分子那种不能容忍的自由主义的态度。中央局决定以刘士杰同志为省委书记、陈洪时任组织、张子意任宣传，以陈洪时、李端娥、张子意、邹德虎及省苏、省工联的党团书记，七人为常委。

中央局责成省委将这一决议公布全党。

罢官王首道、张启龙

一向拨弄是非、品质恶劣的刘士杰，终于掌握了湘赣省委大权。

刘士杰出任省委书记的消息传出后，许多湘赣省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干部，纷纷向中央反映刘士杰的品德不好，不能当书记。中央遂尊从了这些干部的意见，改由陈洪时代表省委书记，于是，陈洪时和保卫部长吴德峰、裁判部长方维夏等几个人动身赴任。

陈洪时的人品也是很差的。他是江西萍乡排上人，萍乡中学毕业后，考入了湖北美术专科学校。不久，派往苏联学习，并加入中共。回国后，历任中共泰和、万泰、乐安县委书记。此人心黑手狠，极喜吹拍拉扯。

陈洪时、吴德峰等一入湘赣边界的碧江洲、牛田一带，就把碧

江洲工委书记龙文打成了"罗明路线"干将。到了永新之后，陈洪时摆出了一副救事主的架势，立即召开中共湘赣省委执委扩大会议。由陈传达了政治形势及中央局关于省委的决议。陈洪时说："这次中央决定改组省委，有的人说是刘士杰和冯文彬二同志到中央故意把湘赣省委的错误扩大化了，这种认为是错误的，中央的决议，是有根据的，不会单凭一两个人的汇报，就下这样的决心。旧省委应该迅速认识过去的错误，更不能设法掩盖过去的错误。"

参加扩大会的除了省委执委外，还有永新、莲花、吉安、安福、河西道委的书记，及各县委常委、中心区委书记，这些人都是陈洪时等人指定来参加的。会上，这些人都依照陈洪时等定的调子，揭发王首道等旧省委的所谓错误。对于这些人的揭发，王首道等不服而力辩。随陈洪时一起从中央来的陈英夏等人以权势对王首道等进行压制，但王首道等仍不服。时《湘赣省委——红五月工作报告》中内称：

> 在会议中过去省委常委还不能了解过去的错误或者用夸大的报告来企图掩盖过去省委的错误，……后经过由中央区过来的陈英夏诸同志的指示并斗争过，有进一步的了解，但于认识与接受错误仍是万分不够。……在会议上更进一步的揭发了省委的过去错误，详细的讨论了中央局关于湘赣省委决议及反罗明路线的决议。在会议发言中开展了自我批评，许多同志对省委过去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为省委的有些同志，在人家指出了他的错误之后，才能敷衍的承认，如王首道同志就是这样。在他起草的有些文件上偷运了托洛斯基主义的私货，如在小传单上写"打倒资本家"的口号。张启龙同志对自己错误的承认，是最差的一个，只说某时我走了或不在场，关于省苏工作的错误也没有坦白的揭发出来。（后经过省

委执委扩大会及全省组织会议的揭发证明省委还更严重，这些都证明了中央局决议的绝对的正确）。

在执委扩大会上，陈洪时宣布解散了旧省委、撤销了王首道的职务，通过了新省委的名单，并选改了各县县委书记。除吉安县委书记没动外，余各县县委书记皆被撤换，换成了新提拔干部。将王首道暂分配在省委帮助工作。张启龙暂分在省苏工作，甘泗淇帮助军区指挥部工作。

陈洪时、吴德峰等在解决旧省委的同时，将袁德生、胡波、李梦弼、刘其凡、于兆龙、朱映华、曾毅之、陈尧进、刘秉常、李天柱等省委、省苏领导干部抓起。抓袁德生是秘密进行的。假说袁到保卫局吃饭。袁一进屋就立即逮捕。对外说袁调到中央工作了。以谭余保为代主席。谭为湖南茶陵人，家贫失学，幼年起便与父母一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砍樵采摘，春去秋来，终年劳碌。他精通南路武当拳，行侠仗义，好打不平。常谓“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问诸君，可有不平事”。1927年，谭参加了中共。组织了茶陵起义。到了1930年，谭担任了茶陵县苏维埃主席，湘赣省委苏府组建后，他任省财政部长，后任省苏府副主席，对于谭余保，无论干部战士还是群众，都对他很尊重，对抓AB团，他不仅不坚决，而且很反感。在刘士杰掌了肃反委员会大权后，一天，刘士杰向中央巡视员冯文彬汇报肃反工作，之后，刘士杰拿出一份早以开好的拟抓的“AB团”的名单。谭余保看去，见上面有少共省委书记胡耀邦和王恩茂、谭启龙等人名字。谭余保立即说：“这些都是红小鬼，怎么是AB团？”

刘士杰一旁冷笑说：“反革命分子还分年龄吗？”

谭余保此时把自己的利害扔到脑后，他双眉一挑，怒道：“老子用脑袋担保他们不是AB团！”

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木匠出身

的刘士杰也说不清为什么，在谭余保面前就害怕。他到底没敢抓胡耀邦等人。背后却说："别看他雇农出就卵包子大，老子要搞到他们AB团的证据，照样割掉你的鸡巴。"

对于刘士杰同中央巡视员冯文彬赴中央汇报省委情况，中央改组了湘赣省委，任弼时在1944年10月26日于延安召开的湘赣苏区工作座谈会上总结时说：

> "有同志说，派刘士杰到中央报告是一个错误。我说这也只是相对的正确。刘士杰这个人品质不好是事实，但是派别人是不是也会戴一个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回来呢？我可以肯定说一定要戴上。为什么？中央到中央苏区后，为了贯彻自己的路线，采取的办法就是打倒一切，否定过去，把罗明路线的帽子到处戴上。因此我想无论是王震去也好，启龙去也好，都免不了戴一个帽子回来。恰好湘赣那个时候失了上犹苏区，红军有些缩小，那一定会戴上机会主义动摇的帽子的。今天我们检讨湘赣历史，我以为应否定那时中央对旧省委是机会主义动摇的估计。因为这不符合事实。随着这个否定，当然改组省委也是错误的，后来打击省委这些人是更不对的。我看不仅仅对湘赣右倾机会主义动摇这个估计不对，就是'罗明路线'、江西几个地区的机会主义的帽子戴的也不对。我想统统应在否定之列。"

王首道、张启龙被撤职后，新省委召开了省党员代表大会和省苏维埃代表大会，批判旧省委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官僚主义，对王首道等人还搞"同志审判会"。而后，二人均被"发配"到下边。王首道被送到北路分委白露、袁州一带搞基层工作。由于环境艰苦，他手脚生疮，又患了疟疾。由于政治上受到"残酷斗争，无情的打击"，身

体夸台，他度日如年，到了九死一生的地步。

张启龙被撤职后，去做推销公债和“支援红军委员会”工作。他奉命到了永新、莲花、茶陵等地，老百姓对他还很热情，这使张启龙受到了一些安慰。很快，省委又通知他回去。张回到省委后，即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宣布了给他的处分。会上还发了一个材料，材料里说他如何如何右倾，如何犯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如何对AB团反革命分子姑息。要张启龙检查时，张不服，申辩了一番，与会者便齐说张态度不好，是“顽固的机会主义分子”。最后，对张启龙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张更加不服。省委便以张为阶级异己分子而判处其一年零两个月的徒刑。将其送到“劳动感化院”劳动改造。就在这当儿，任弼时到了湘赣省委，担任了湘赣省委书记。

任弼时到了湘赣省

任弼时缘何来湘赣省?原来，中共临时中央于年初由上海迁至瑞金后，与苏区中央局合并，仍称中共苏区中央局，后改称中共中央局，但许多人仍习称“苏区中央局”。博古为中共中央局总负责人，(无正式职务称呼——作者注)。博古等来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后，即全面主持中共的政治、经济、军事、组织等项工作。由于博古毫无对敌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他到了苏区后，一切从十月革命的经验出发，认为中国革命应仿效苏联，在大城市领导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根据地的红军仅仅是配合城市工人起义的力量。同时，全面的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

自从刘士杰向博古报告了湘赣省委情况后，博古决心改组湘赣省委，先派了刘士杰任书记，由于反刘的人太多，博古又改陈洪时为书记。5月，博古又决定任弼时为湘赣省委书记。

任弼时自从到中央苏区后，开始对执行王明“左”倾中央的指

示还坚决，后来在实践中，逐渐感到这条“左”倾路线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不符。但由于王明路线有国际背景，他无法改变，只得于工作中尽最大可能从实际出发，他尤其对肃反扩大化反感，感到这样搞不对头，但也无可奈何，只好于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进行纠正。

博古等由上海到了瑞金，下车伊始，就先批了“罗明路线”，又指责苏区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任弼时遂向博古谈了自己对苏区建设上的许多看法，这些看法自然与博古等老“左”们意见不一。有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博古见任弼时已同自己话不投机了，遂将其免除组织部长职务，派往湘赣苏区。

任弼时告别瑞金的那熟悉的青山绿水，来到了井冈山下永新县的禾川镇。和他同去的还有刘士杰。刘被任命为副书记。

时省委机关设在了禾川镇。

陈洪时满面笑容的于镇前欢迎任弼时的到来。当晚，任弼时听了陈洪时的汇报。陈洪时主要讲了旧省委的“罪过”，讲了对王首道等人的处理结果。陈洪时讲到最后说：“王首道、张启龙思想极为反动，到现在也不承认错误。”

任弼时吸着烟，没表示态度。

之后，任弼时看了王震、肖克、蔡会文，还有方维夏、张子意等省委、军队内的领导人，分别找他们谈话，了解情况。任弼时经过一番调查后，认为张启龙不仅不是什么 AB 团，而且工作注重实际，若有问题，也是工作上的错误。他亲自到了感化院看了张启龙，同张启龙谈心。由于张启龙的“案子”通天，他几次要放张，均因阻力太大，未能凑效。直到 1934 年 7 月，红 6 军团要西征。任弼时召集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放出张启龙，并安排他去保卫局帮助工作。张不愿去，遂被安排在“优待红军家属委员会”工作。

对王首道，任弼时也予以了保护。王首道后来回忆说：

“我被撤职后，被调到白露、袁州一带搞基层工作，由于环境很苦，我手脚生疮，又患了疟疾。就在这个时候，弼时同志特地叫他的爱人陈琮英同志来看望我，还在经济上给予一点帮助。当时，我算是犯了错误的人，能够得到领导的关怀，得到同志式的帮助，内心感到多么温暖啊！后来，我要求到中央苏区工作，也得到弼时同志的批准。到了中央苏区，我就在毛泽东同志的身边工作，不久就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后来，1950年的10月27日，积劳成疾的任弼时不幸辞世，王首道哭道：

“负笈长沙时，已聆君盛名。
及我至穗城，鸿文启心灵。
坚贞斥汪、蒋，不畏刀斧横。
直言伸正义，何惧独秀狞。
我在湘赣边，心疑“左”势凌。
大祸从天降，蒙诬被罪刑。
君独能兼听，广纳同志评。
对人持慎重，刀下始留情。
我既基层调，罹疾身削形。
君遣琮英来，探望复叮咛。
关怀与帮助，温暖长心萦。
延安重聚首，情深更固凝。
全国庆解放，斗争不少停。
重病仍工作，奋疾并力行。
吾党丧栋梁，惜君才壮龄。
我痛失师友，心悲泪涕零。

哀思情切切，终夜不成眠。”

其实，任弼时何止对张启龙、王首道相救，他在中央苏区工作时，就曾救了许多“反革命分子”。有一天，一份材料摆在任弼时面前，这材料写的是万泰地区青年组织负责人张爱萍是AB团青年总团头头，已被逮捕，列入将要处决的名单之内。任弼时看后，对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说：“张爱萍自大革命失败后即到了上海，做党的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入狱。因为他的身分暴露，无法再做秘密工作，被派到红军工作，负伤后，周恩来将他调到中央苏区做青年工作，工作的很好。这样的同志怎么会是AB团？”

顾作霖说：“报上来的材料中说有口供。”

任弼时说：“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的检查来找根据。”

当下，任弼时要顾作霖到万泰地区检查工作。顾作霖到了万泰地区，从少先队到儿童团，又从党到政府军各方面做细致的了解，最后，证明任弼时的判断是正确的，使得张爱萍没受到“左”倾路线的无辜迫害。

这件事，使任弼时进一步看到了肃反扩大化的危害。于是，他亲自主持召开了湘赣两省组织工作会议，会上，他作了《目前党组织中心工作的报告》。明确指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重证据！要看被审查人的全部工作和全部经历，看斗争中的实际表现。”

会上，任弼时反复强调，肃反之中，“不得随意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

1933年11月，湘赣省第三次党代表大会在永新召开。到会代表三百多人，由任弼时主持会议。时正值南京国民政府调兵一百万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如何粉碎国民党的

"围剿",开展查团运动,改组省委,成立新省委。会议期间,开展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刘士杰的发言尤为激烈,他对王首道、张启龙批的最凶。任弼时则尽最大能力对二人进行了保护。大会开了十天,选举了新省委和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大会选举了任弼时为省委书记。

任弼时在大会上所作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政治报告中说:

> (肃反)……要防止小资产阶级疯狂心理,重复走向简单化、扩大化的危险,造成群众的恐怖状态。……一切"左"的倾向,如轻视敌人的进攻,而放松战争动员工作,消灭富农侵犯中农利益的倾向,同样是危害苏维埃的巩固与战争的动员,必须给以严厉的打击!要反对一切口是心非的两面派! ……

任弼时所作的政治报告,由于许多地方说了些真话,因而,受到了苏区中央局的指责。

湘赣苏区的第二次"肃反"高潮

1934 年 1 月 3 日,苏区中央局发出了批评湘赣省委的指示信,内称:

> 听了张子意同志关于湘赣大会的报告,并读了大会关于政治组织和工会工作的决议案,不得不给你们写这个指示信,并且希望你们把这个指示信公开发表。……政治决议案在"四月扩大会后的检阅"一部分估计到半年以

来的工作成绩时，除了“正在开展”、“发动了广大群众”、“进一步改善”、“开始建立”、“相当成绩”、“也较提高”、“相当的提高”……“非常不够”、“还是迟缓”、“还是非常落后”的空洞形容词！

这样的检查工作，请问对于湘赣党有什么意义？大会怎样来“指出这些严重的缺点与错误的原因”呢？……亲爱的同志们，你们却不肯具体的分析反机会主义斗争的教训，不把新的机会主义具体指出来，不来具体分析湘赣党在四次决战中的教训，帮助全党去“深刻的认识”，最后更没有严格的检查出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是)“没有收到必要成绩”的原因。

正因为对于湘赣党在四次与五次“围剿”决战中的教训与经验没有给以布尔什维克的估计，而只有一串空洞的肤浅的形容词，便使大会不能有力的提出湘赣党当前紧急的战斗任务。政治决议关于党的任务写了近十页，一切问题都说到了，好象是一个完满的决议，但实际都是一般的空洞的……是没有战斗性的。

……

湘赣省委在改组以后，一般的回到党的路线上来，曾经进行了反对以王首道为首的机会主义斗争。可是省委在机会主义斗争的领导上，存在着很大的缺点，估计到王首道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曾经在湘赣领导上存在了大半年时期，我们要进行粉碎这种机会主义的斗争，必须切实揭发它在实际工作中的恶果，……但是省委在扩大会后开展这一斗争的成绩，主要的就是从七个县委撤销八个书记，好象所有县委的领导都是机会主义，而对于机会主义的首领王首道、甘泗淇仍然在负领导工作的责任，仍然在为省委甚至为党大会写决议，这是第一……湘赣省委

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去坚决肃清王首道主义的残余；必须把住新的机会主义动摇的具体事实与工作无情的斗争；必须把蔡会文为首的机会主义斗争在全党特别在武装部队开展起来，把主要的火力向着一切两面派和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者。

湘赣省委第三次党代会，虽然对极“左”的倾向有所抵制，但在研究形势、任务的过程中，仍然进一步贯彻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其主要表现为大会认为第二届中共湘赣省委犯了“机会主义动摇”的错误，并于大会上再一次错误地斗争了第二届省委的主要领导人王首道、张启龙等。大会对第五次反“围剿”作了过“左”的分析。认为必须在第五次战争胜利中，实现江西和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必须准备着随时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尽管如此，湘赣省委第三次党代会的决议，还受到了中央局的严厉批评，可见中央局又“左”到了何种地步。

任弼时在后来回忆说：

“临时省委和新省委两个时期都是执行了‘左’倾的路线，而且这个路线是一天比一天更加‘左’的。这样的估计是合乎事实的。更确切地说，旧省委执行的是四中全会以后到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前的路线，新省委执行的是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发展得更‘左’的路线，包括五中全会。在中央未搬到中央苏区以前，中央虽然派我们去了，后来又派恩来去了，但在博古、洛甫未去苏区以前，极‘左’路线还没有完全统治中央苏区。我们去的时候，中央局的书记开始是项英，后来是毛主席。以后恩来同志来了，他当中央局书记时，虽有五月决议案批评了中央苏区的机会主义，提出打赣州，赣州没打开，回来后就再没有

打大城市。临时省委虽然执行了'左'的路线，但也没有充分执行。新省委执行了中央搬到中央苏区以后的路线。中央搬到苏区后，博古、洛甫亲自到苏区执行'左'的路线。这对于苏区就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撤销了旧省委，组织了新省委，这个新省委在思想上、政策上比旧省委自然表现要更'左'，但这个新省委是否满足了当时的中央的要求呢？也没有，也没有完全彻底的执行他们的路线，因此，他们说新省委还有右倾机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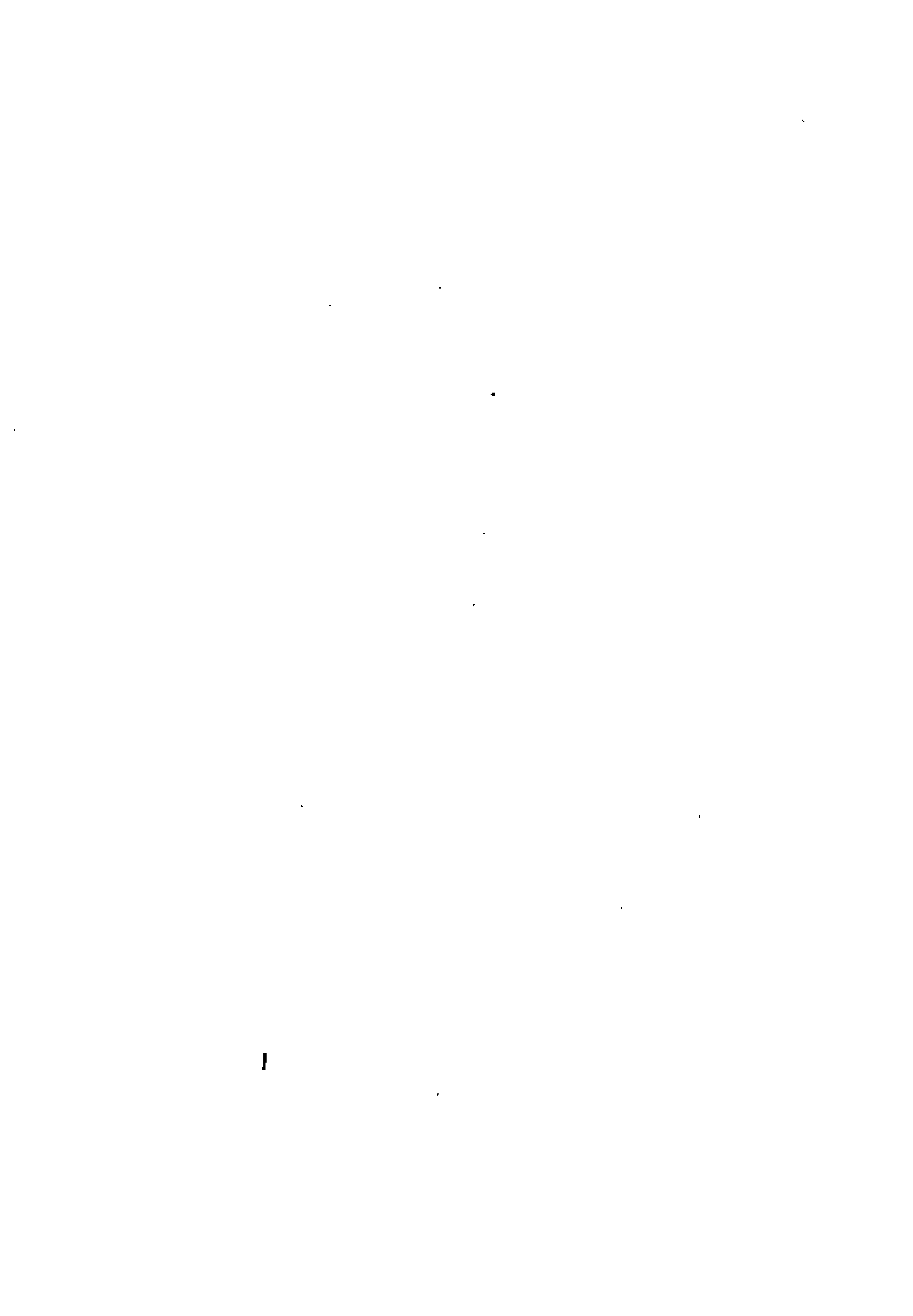
在谈到湘赣省肃反扩大化错误时，任弼时回忆说：

"在肃反问题上，好象有这样一种空气，说吴德峰来了以后湘赣肃反闹得很厉害。在这问题上，也要实事求是。吴德峰来了以后，的确在杀干部中有些是特别重要的，如袁德生、陈邵、胡波、李林弼等等。这是过去省委捉下来不敢杀的。吴德峰来了杀了这一部份重要干部，这是严重错误，是有罪恶的。但是吴过来后捉的人数量并不多，据大家凑起来的能认得的，吴过来后捉的较重要的干部杀了的和病死的共十五个。当然，在这一批捉到的人里面有重要干部和袁德生等。再则，把劳动感化院的一些已经判了徒刑的又杀了，这不是应该的。但吴德峰来了以后的肃反是否比第一次肃反高潮时闹得更厉害更恐慌一些呢？我问了一些同志，他们说在群众中造成恐慌的还是第一次肃反高潮，但第一次干部恐慌情绪少一些。第二次肃反高潮捉的干部多、群众少，在干部中造成恐慌这是可能的。第二次肃反高潮与第一次肃反高潮比较起来，恐慌还是第一次。第一次的肃反也要乱一些，捉的杀的也要多一些，县级干部也不少，而第二次肃反则比较有秩序，捉的

也比较少一些，但其中重要的干部占的数量为多。吴德峰过来之后，捉的人并不多，为什么大家都对吴德峰有很不好的观感呢？这与吴德峰本人作风及保卫局工作作风有关系。过去把保卫局的工作人员搞得很神气，同时吴德峰同志本来作风上也不大好，保卫局有特务作风，所以引起大家的不满。但实际上并不是说吴德峰同志过去搞得大闹天宫，我想这个估计是符合事实的。新、旧省委都是执行'左'的肃反路线，新省委时期表现得更'左'一些的。表现在旧省委还犹豫的，新省委肯定了、杀了。捉杀了一些重要干部如袁德生等。还有一点，这两个时代的省委虽然很'左'，但其中还是有些做实际工作的经验，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们在执行'左'的路线，遇到某些困难阻碍之后，有些修正。其它政策方面也是一样，体验做不通的时候，就有些转弯，有些纠正。这也是使我们能在工作中得到成绩的原因。"



第 二 部



第十二章　柳直荀与周逸群

说罢中央苏区的“肃反”，接下来谈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湘鄂西苏区的肃反扩大化，用贺龙元帅的话说，比任何一个苏区都严重。其肃反过程说来话长。

1927 年，中共南昌暴动失败后，暴动总指挥贺龙由香港辗转到了上海，在上海霞飞路 22 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他见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告诉贺龙，说经过党组织的研究，决定要贺龙、刘伯承、林伯渠等赴苏联学习。贺龙听了，说：“我连中国字还认不得几箩，外国字就更吃不进了。”他请求中央允许他回湘西拖队伍。

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很快同意了贺龙赴湘鄂西拖队伍的意见，并成立了五人领导小组，这五个人，除贺龙外，还有周逸群、郭亮、柳直荀和徐特立。时郭亮尚在武汉。1928 年元旦过后不久，一个阴云低垂，北风凛烈的日子，贺龙、柳直荀、周逸群、徐特立，还有卢冬

生，五个人登上了江轮，逆江水，直奔武汉三镇。

这里把柳直荀，周逸群的情况作一介绍。

柳直荀，又名柳克明，1898 年 11 月 3 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高桥镇方塘冲的一书香门第，其祖父柳正荣，为清末举人，父柳午亭，也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在长沙教过几年学馆。恪守“厚道载福，和气致祥”的家训，痛恨贪官污吏，希望世人都正直不阿，因而替他取名克明，字“直荀”，其意取荀子“蓬生麻中，不扶而直”之意，希望他长大能成正正经经的人。

柳直荀自幼随祖父读书，聪颖好学，祖父常与人言，直荀久后必成大器。柳直荀 13 岁时，辛亥革命爆发。他到高桥镇新办的国民学校读书。次年秋，考入了长沙城里的广益中学，同他大弟柳瑟虎一起，寄住在省立第一师范的伦理学教员杨怀中先生家。这杨怀中就是杨开慧烈士的父亲，从英国留学回归的。杨家与柳家乃三代世交，可谓：“交情三世久，春色两家分”。在杨家寄宿期间，柳直荀结识了毛泽东、蔡和森、张昆第等进步学生。毛泽东等时均在第一师范读书，他们常到杨家聚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每当这时，柳直荀和杨开慧便坐在一边静听这些大年级学生的海谈阔论。听到得意之处，也不禁眉飞色舞，时杨怀中常对人言：“吾在第一师范有两个最好的学生，一是毛泽东，一是蔡和森，他们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呀！”柳直荀听后，对毛泽东等敬慕之情，更为深切。

柳直荀父柳午亭因愤慨豺狼当道，国家日衰，遂赴日本寻求兴邦之道。留学十载，曾陪同在日本的同乡黄兴会晤了孙中山，导使黄兴办的华兴会和孙中山的兴中会合并为同盟会。辛亥革命第二年，柳午亭回国，他见民国政治腐败，大失所望，便隐居乡间，教书为生。毛泽东从杨怀中先生口中得知柳午亭的学识和为人，便于暑假期间步行到方塘冲拜访。柳直荀恰在家中，父子二人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柳午亭同毛泽东一起探讨了国家大事及文学历史等方面的学问。毛泽东走后，柳午亭对毛泽东赞不绝口，再三对柳直荀

道:“毛泽东不比常人,与其交之,以其为榜样,当得大益。”柳直荀又把他平时所知毛泽东洗冷水浴、露宿等“怪事”告诉父亲。说:“如今我也像他那样,天天早晨洗冷水澡,晚上露宿阳台,打拳做操,还被同学选为体育会会长了。”柳先生听了,更是赞叹不已。自此,柳直荀同毛泽东建立起更亲密的关系。他经常参加毛泽东组织的各种活动,逐渐树立了“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高尚情怀。

1916年的寒假后,柳直荀在雅礼大学预科上学。这是一座海外传教会创办的学校,把宣传基督教义当做一项重要内容。柳直荀不信上帝和天国,从毛泽东、蔡和森处借来《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同周围学生一起讨论“有神论”和“无神论”。假期,柳直荀回家乡,适逢一巫婆弄神装鬼,在白果树前摆了神龛,哄骗四乡村民来此磕头上供。柳直荀便把弟弟妹妹们找来,将神龛砸了。人们都说柳家惹神要遭报应。柳午亭闻之,却笑道:“直荀做得对。”

柳直荀有个表妹叫肖淑新,是其姑妈的女儿,自幼丧父,和母亲寄居柳家。肖淑新13岁时,其母把她许配给一户姓陈的财主家,打算早早将其嫁过去,免得托累柳家。直荀闻之,当即找姑妈,道:“如此则害表妹,陈家少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不劳而食,必被社会所弃。表妹一手好刺绣,当上职业学校,将来也能寻个职务安身。”并为表妹事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一所半工半读、不收学费并管吃饭的学校,便是王季范先生主办的衡粹女子职业学校。陈家闻之,认为淑新抛头露面是败坏家风,催逼早日完婚。直荀要淑新向陈家提出十二项结婚条件,其中一条系自己要去法国勤工俭学。陈家自然不从,婚事告吹。后来淑新提起自己婚事,总是叹道:“我能自立于社会之中,多亏直荀表哥之力。”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革命风暴很快波及湖南。毛泽东、何叔衡等领导新民学会会员,组织了5月7日的游行活动,声援北京爱国学生。虽然雅礼大学校方发出不准游行的禁令,当时,担任该校学生会会长的柳直荀仍然鼓励同学们参加了游行。之

后，他又和同学一起，把传单贴在校园的墙上。正贴时，一个叫哈尔辉的洋人怒冲冲地用洋腔尖叫着："这是我们美国人的地方，不准贴！"柳直荀一听，立即把眼一瞪，怒斥道："你们的地方？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土，我们是中国人，愿意在哪贴就在哪儿贴。"就在这时，一个学生偷偷地把一张传单贴在了哈尔辉的后背上，在轰笑声中，哈尔辉红着脸走了。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5 月 27 日，湖南省学联在汹涌澎湃的爱国学生运动中成立了。柳直荀作为雅礼大学的代表参加了省学联，并被选为学联的评议部部长。学联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发动长沙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柳直荀不辞辛苦，奔波于各校之间，进行组织活动。6 月 3 日，长沙各学校总罢课开始。罢课宣言称："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雅礼大学学监王海圩受洋主子之命向学生宣称："胆敢罢课者，开除！"其淫威使一些学生胆怯了。柳直荀站出来，大声对同学说："学生之求学，以卫国家，国既不存，学有何用？救亡图存，匹夫有责！"坚定了摇摆同学的信心。雅礼大学的广大爱国学生和教职员工，不顾校方威胁，举行了罢课。柳直荀又带着讲演团，到长沙东乡开展宣传活动。他感情激动地教群众唱《国耻歌》：

无公理，灭人道，好河山，将送掉，为奴为仆眼前到！
这国耻，何时消！

学生的爱国运动，引起了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的极大恐慌。6 月 11 日，张敬尧发表了一个杀气腾腾的《训令》，接着就对进步学生进行了镇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省开展了一个声势浩大的"驱张"斗争。柳直荀与同学们一道出版刊物，印发传单，揭露张敬尧政府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罪行。张敬尧视他为"激进党"，列入通缉的名单，柳直荀一笑置之，干得更起劲了。在各方力量的压

挤下，1920 年 6 月，张敬尧终于滚出了湖南。

1920 年 7 月，毛泽东从北京回到长沙，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又创办了文化书社。柳直荀是积极的参加者之一。10 月，毛泽东在湖南组织起社会主义青年团，柳直荀又成为最早的团员之一。1921 年 6 月，毛泽东与何叔衡赴上海参加了党的“一大”。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会议闭幕后，毛泽东被派回湖南任湘区党的书记。湘区的秘密机关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的一所房子内。柳直荀经常来到这里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和毛泽东、杨开慧一起谈心。在毛泽东亲切关怀和培养下，1924 年 2 月，柳直荀经何叔衡和姜梦周二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两年间，柳直荀获得雅礼大学文学士学位后，参加了徐特立领导的湖南教育工作者协会，任长沙师范总务主任和协均中学校长，以合法身份，从事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工作。长沙城内外大大小小的斗争他都冲杀在第一线：长沙人民抗议赵恒惕杀害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抗议杀害黄静源、汪先宗而举行的两次抬棺大游行；声讨英帝国主义制造“五卅”惨案而举行的十万人大示威……柳直荀都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勇敢地站在群众斗争最前列。

国民革命军由广州开始北伐，他又改做农运工作。常常在自己家中召开秘密会议。这当儿，经杨开慧介绍，他与李淑一结了婚，便由李淑一在门口做饭，注视着外面的动静。缺经费，他偷着典当了姑妈的田产。他吃住在农民家中，了解农民的疾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北伐军打到了长沙，柳直荀任湖南省国民政府委员和省农协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兼秘书长，发动组织全省的农会会员，全力以赴支援北伐军。省农协成立后，他辞去了每月八十元薪金的协均中学校长的职务，当了代理省农协委员长，每月薪金仅三十元，但他乐此不怨。

柳直荀很重视建立农民武装，通令各县加紧建立农民自卫军，以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攻倒算，有时还亲自带人出去活动。

当时湖南省有个大劣绅名叫罗先闿，原是赵恒惕手下一旅长。1923年湘军改编时，被赵恒惕委为“全省清乡督办”。北伐军抵长沙后，由于罗先闿同谭延闿蒋介石等交往，他辖下的“清乡督办公署”和“长沙县团防局”的虎头牌子，一直不变，并暗中支持各地团防局破坏农民运动，劣迹累累，人怨沸鼎。柳直荀想：罗先闿是全省有名的大劣绅，打掉他的威风，不仅震慑各地土豪劣绅，也是对全省农民群众的支持和鼓舞。他请示了湖南省党部和省政府后，便派了长沙县农协正副委员长去接收。结果二人碰了硬钉子，罗先闿气势汹汹地说：“谁想接收团防局，有胆子就到我督办公署来！”柳直荀得知此情，愤慨异常。时省农协正开筹委例会，柳直荀说：“同志们，罗先闿向我们农协叫阵了，怎么办？”

“那给他点厉害看看。”大家回答。

“好，我同意。我们先礼后兵，明天我偏要闯闯他的阎罗殿，和平接收团防局，不行，再动武的。”

“你不能去，那家伙翻脸不认人。”

“没关系，我自有办法。”第二天，柳直荀和另一同志来到了督办公署，只见督办公署警卫森严。柳直荀理也不理，径直闯进去，见了罗先闿出示省令：“罗督办，我是奉省政府之命前来接收团防局的，请办交接手续吧？”罗先闿听罢，一声冷笑道：“柳直荀，你乃晚辈，怎得无礼？”原来，罗与柳直荀家同乡，且与柳午亭有交谊，想以长辈的资格压人。柳直荀微微一笑：“从乡谊说我是晚辈，可今天办的是公事，我是省府委员来接收的，恕晚辈无礼了，我也是身不由己呀！”“团防局有何罪过，非要你们接收不可？”柳直荀说：“团防局破坏农民运动，反对孙大总统‘扶助工农’政策，阻碍北伐，罪行累累，罄竹难书。”“有何证据？”柳直荀把手里一大沓子信扬了扬：“这就是下面告你们的信，白纸黑字，铁证如山。”罗先闿还要抗拒，柳直荀指指大门外：“请看看外面。”罗先闿转身一看，门外似乎有不少人正向院里张望，还有带枪的，是不是农民武装把督办公署包围

了？他胆怯了，老老实实把团防局和督办移交了。

长沙市还有一霸叫叶德辉，为前清光绪年间的进士，是个老保皇党，曾做过几任大官。他用搜刮来的人民血汗在长沙南门建了一座大宅院，题名"郎园"，内藏古董珍宝。北伐军打到长沙，蒋介石通过谭延闿介绍与叶德辉勾结上了，蒋请叶德辉吃饭，赠送自己的戎装照片，还亲笔给叶题词："道高龙虎伏，德重鬼神钦"。叶德辉原很惧怕北伐军，见蒋如此敬他，来了神气，和北伐军驻长沙留守团团长许克祥串通一气，干起反革命勾当。他起草了给张作霖、段琪瑞、吴佩孚、蒋介石的所谓湖南农民协会十大罪状的电文，诬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煽动地主阶级反攻倒算残害农会骨干。为打击土豪劣绅的兴风作浪，镇压反革命的破坏，特别法庭组成了有柳直荀、郭亮等人的主席团，决定第一个要逮捕公审的便是叶德辉。这天，叶德辉正在坡子街一老姘头家中鬼混，守门人送来一张名片，上写"柳午亭"三字。柳午亭是有名望的人，虽然叶与柳二人平素水火不同炉，但叶觉得表面上也不好怠慢，便急忙整衣冠出迎。叶德辉一出门，便被柳直荀带领的农协会员抓走。原来，这是柳直荀用的"诱蛇出洞"之计。当夜，柳直荀、郭亮等审问了叶德辉。第二日便召开万人大会，将叶处决。《湖南民报》载文称："轰动全城，无论远近男妇，络绎不绝，纷往观看，均皆称快"。

农民协会运动蓬勃发展，会员多达六百万之多。1927 年 3 月，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建立工农自卫军，筹办干训队，柳直荀主持了农民自卫军干训队的工作。队员有六百多名，柳直荀为主任。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5 月 17 日，反动军官夏斗寅在宜昌也发动政变，枪杀共产党十一人。长沙的反革命分子也开始蠢蠢欲动。同日，何键的 35 军驻长沙留守处主任陶柳，逮捕了长沙工人纠察队员三十五人。就在同一天，35 军 33 团团长许克祥唆使伤兵向工人纠察队寻衅闹事。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种种迹象表明，敌人要动手了。5 月中旬，湖南省委三次讨论应变措施，都被

陈独秀“顾全大局”的道道“金牌”给压住了。5 月 20 日，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都得知许克祥的部队已开始堆积沙包，准备巷战。这时候，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李维汉已调中央，新任临时省委书记夏曦临事慌乱，21 日仓促去中央汇报。关键时刻怎么可以没有领导呢？柳直荀急得直跺脚。他和郭亮、夏明翰一商量：又选了郭亮任临时省委书记。

这时候，长沙城中反共的风声更紧了，柳直荀预感到事情不好。这天，他回到家中，一边收拾党内秘密文件，一边对妻子李淑一说：“淑一，我近一段时间不回家了。”李淑一望着直荀那消瘦的面孔说道：“外面风声紧，省委主要同志都走了，你可要多注意呀。”柳直荀说了声“知道”就告别了妻子。李淑一万没料到，这竟是与柳直荀的最后一别。

5 月 21 日晚，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由于这天电报的代号是“马日”，故史称“马日事变”。许克祥指挥军队包围了农协会。柳直荀带会员们几次冲锋，均因敌火力太猛未得出去。最后他掩护同志们伏瓦越墙才得以突围。时天降大雨，直荀又带队员冒雨出南门，过湘江，到南岸找到郭亮。见到郭亮后，柳直荀提出，他要到长沙周围各县，组织农民武装队伍，反击许克祥。郭亮同意了柳直荀的意见。柳直荀 23 日到了湘潭，在湘潭成立了农军总指挥部，迅速集合了三千多人，集枪三千多支，并向各县发电号召工农武装进攻长沙，26 日又以省工会、省农协名义下了同样的命令。郭亮也赴各县组织农民武装，仅数天，便发动组织了数万(号称十万)农民大军。5 月 31 日，一声号令，杀向省城长沙。长沙城中工人学生亦做内应。就在许克祥急得如热锅蚂蚁之际，陈独秀又来一道“金牌”，下令进攻长沙的农民武装立即撤回。

工农武装解散了，反动势力愈来愈猖狂，整个湖南一片白色恐怖，反动分子天天杀人。柳直荀已不能在湖南立足。他仰天长叹：“数年努力，毁于一旦。”6 月中旬的一天，他在亲友帮助下，化装乘

车到了武汉，见到了先来的郭亮，二人又找到了蔡和森，大家谈起局势，都对陈独秀的作法无比激愤。7月初，周恩来秘密从上海到达武汉，交给柳直荀、郭亮新的任务，要他们重新组织被陈独秀强迫缴械的武汉工人纠察队。就在三人刚刚着手工作之时，汪精卫在7月15日发表了“分共”的声明，重建工人纠察队的工作被迫停止。接着，南昌起义枪声响了，柳直荀参加了起义的行列，并成为起义后的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农工委员会成员，随起义军的20军第3师一起南下。9月30日，起义军主力在揭阳、汤坑作战失利，队伍最后被敌打散，郭亮和柳直荀带十七名同志突围。经过苦战，最后仅剩下柳直荀、郭亮、关向应三人。他们绕道抵韩江边，意欲在此乘船去香港，再转道寻找党组织。不料竟遇上了海盗船，将其三人用“蒙汗药”蒙倒，抢走了他们的全部财物，而后胳膊反绑，推到一条小船之上，任其漂荡。小船在海上漂了一天一夜，幸遇到一商船，三人才得救，又辗转到了上海。中共中央即派其同贺龙等一起赴湘西。

再说说周逸群的情况。

贵州省东部的铜仁县城关镇，是个群山环抱、松竹常青、流水涓涓的美丽山城，为人杰地灵之处。

在县城的大公馆路路北，住着一户周姓的大家族，家道殷实，房子磨砖对缝，门上悬挂功名牌匾，两旁联文是：“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

1896年6月25日，周家生了个男孩儿，按照家谱，起名逸群。逸群的父亲周志本在城关镇开了个油漆铺和杂货铺，生意甚是红火。逸群出生之后，周志本决心把这个儿子培养成能光宗耀祖的达官显贵。逸群才四岁，周志本就把他送到房下三哥周志炳门下读书。周志炳为逸群起了个号为“立凤”。

周志炳是铜仁县一位德高望重的教书先生，也是一位有爱国思想的老人，对逸群要求甚严。周逸群把那“天地玄黄”等启蒙读物

学得倒背如流，直把个周志炳喜得连称奇童。不到五年，这位周老先生肚里的学问尽教与逸群。

周逸群虽然长在富裕家庭，可自小就喜欢和穷人孩子一起玩耍，而且特别同情穷人。铜仁县城里有个大地主叫郭铁珊，外号“扣心鬼”，盘剥穷人出了名。周逸群就编了顺口溜：

“铜仁有个扣心鬼，外号人称铁算盘，成船大米运江南，绫罗绸缎赚大钱。帮工吃不饱，还要挨皮鞭。一个小钱掉下河，舍着性命摸半天，脑袋就往钱眼里钻！”

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周逸群同小朋友们一起，打着灯笼站在扣心鬼家大门口，一起念他编的顺口溜。扣心鬼认为年三十听到这些顺口溜大不吉利，气得举着棍子跑出来轰。孩子们见他出来，立刻跑开了，又站在远处喊：“扣心鬼，铁算盘……”“扣心鬼，害人虫，头上长疮脚流脓……”把扣心鬼气得眼儿直，头发昏。

1906 年，周志炳创办了城南小学，十岁的逸群，插到二班上课。城南小学教的是“新学”，使他大开了眼界。在他家对面巷中有一位柳先生，是清末的秀才，家里藏书很多，逸群常去串门。柳先生很喜欢逸群，时常教他如何读书、作文、习字，给他讲历史。慢慢地逸群便读了《纲鉴易知录》、《王凤洲纲鉴》、《小仓山文集》、《东莱博议》、《四史精华》等许多书，还有《古今图书集成》。

周逸群有个思想进步的叔叔，见侄儿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就给他进步书籍看。高小毕业后，逸群便到了贵阳南明学校中学部。

周逸群的知识越多，对世道认识得就越深刻，对那黑暗的社会越愤恨，恨不得举起利剑将这旧世界劈开。他挥笔写诗道：

南雁北飞，去不思归。
志在苍山，不顾安危。

生不足惜，死不足悲。

头颅热血，不朽永垂。

周逸群在南明学校学习期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已处于危亡关头。当时，师生们最为关心的，是中国向何处去。师生们多数人拥护改良派的观点，也有不少人拥护革命派的主张。周逸群因喜读梁启超的书，便拥护改良派。辛亥革命后的现状使他很失望，那些在清室显赫一时的总督府台们摇身一变，又一个个地挂起了共和的牌子。真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于是，他写了《明太祖以布衣起兵论》的文章，立意新颖，论据精辟，影射了改良派，被学校评为甲等作文第一名。

1919 年 3 月，逸群东渡日本，在东京庆应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五四”运动消息传到日本，留日中国学生开大会，发通电，会刚开就被警察驱散。学生们没有屈服，他们高呼着“誓死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浩浩荡荡地包围中国驻日使馆，周逸群勇敢地加入了游行行列，被军警逮捕。

在监狱里，周逸群结识了留日学生——在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彭湃。彭湃很激动地向周逸群讲：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周逸群很赞同彭湃的看法，他写信给亲戚朋友说：“中国要想达到大同世界，就得照苏俄的样子办，把资产阶级体系彻底打碎，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体系。”

对伟大的十月革命一无所知的周逸群，从彭湃处接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知识，感到十分的亲切。出狱后不久，便接到了彭湃寄来的一批书刊，有《解放》、《改造》、《社会问题研究》等。他开始钻研马克思主义了。

1923 年春，周逸群从日本回到上海，与好友李侠公同办《贵州青年》旬刊，决心“唤起民众的阶级自觉，以与权力阶级对抗”，得到《中国青年》主编肖楚女的热情支持，受到了青年人的欢迎。他在第

六期上写了一篇《精神附北与实质附北》的文章，揭露了西南军阀投靠北洋军阀的罪行。《贵州青年》像一把利剑，刺向封建军阀，影响西南政局。

1924年3月，周逸群在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心情很激动，当即填词一首：

硝烟弥漫中华，
有斑斑血泪，
遍体痕伤。
军阀横行，
列强乱争，
九州怪魔猖狂。

今日宏愿酬，
一生交给党，
斗志昂扬。
愿为工农革命，
洒热血一腔。

1924年秋，周逸群遵照党的指示赴广州投考黄埔军校，曾挥笔作诗，赋李侠公，以表达自己投笔从戎的志向：

废书学剑走羊城，
只为黎元苦匪兵。
斩伐相争廿四史，
岂无白刃可亡秦？

周逸群在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队学习。他在中共黄埔特别支

部领导下，一面攻读革命理论，学习军事，一面从事青年军人运动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4年秋，他同共产党员蒋先云、李劳工等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以列宁创办的《火星报》为旗帜，成立了“火星社”。这是黄埔军校成立初期党的革命军人团体。周逸群的名字引起了各界人士的注视，有两个人还找他谈了话。一是孙中山，一是蒋介石。一天，孙中山来到黄埔军校讲演三民主义。周逸群给孙中山写信，谈了自己对三民主义的认识。没几天，孙中山竟在总统府召见周逸群，十分亲热地进行了交谈。周逸群听说孙中山决意再次北伐，消灭北洋政府，便问道：“总统决意北伐，可目前北洋军阀投靠了帝国主义列强，有这些列强做后台，革命军能胜利吗？”孙中山笑而不答，反问了一句：“你说呢？”周逸群当时就不假思索地说：“据我看，光靠革命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联合工农，武装工农，这才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孙中山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告辞时，中山先生亲自送他出总统府，握着他的手说：“立凤啊，看见你这些青年娃娃成长，我很高兴，你们有远见，有卓识，中国有希望。”

蒋介石为什么要见周逸群？他想独霸天下，网罗有用之才。1925年初，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支部改选，周逸群、蒋先云等共产党员当选为特别支部第二届执行委员。当晚，蒋介石用专车把周逸群和蒋先云接到黄埔军校广州办事处。蒋介石表现出了很亲热的样子，询问周逸群和蒋先云的家庭情况后，拍着二人肩头，夸赞了一番，说：“好好干，先云可升为中将教育长，逸群嘛，可到黄埔学生军中当少将师长。”周逸群见蒋介石这样百般拉拢，便说：“为把同学团结在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我和先云研究了一下，认为有必要在学生中建立青年军人联合会，不知校长意见怎样？”蒋介石说：“好，好，我同意。”

黄埔军校建校初期，广东革命根据地尚不巩固，军校内部成份复杂。为进一步宣传革命理论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团结革命力量，打击国民党右派势力，在中共特别支部和周恩来的领导下，

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于 1925 年 2 月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周逸群担任了主席。他领导“联合会”先后创办了《青年军人》、《中国军人》等刊物，显示出了他的卓越才能和组织才能，被肖楚女称为“黄埔岛上的一颗新星”。

“青年军人联合会”在黄埔军校中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势力的切齿痛恨，蒋介石后悔不迭，暗中指使王柏龄等亲信，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制造摩擦，寻衅肇事，同“青年军人联合会”进行对抗。周逸群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6 年“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借口“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斗争有违“亲爱精诚”的校训，下令解散了这两个组织。这时候，周逸群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到国民党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工作，担任军事委员会常委兼宣传科科长。他积极地协助周恩来，为北伐军出征，做了大量的宣传和组织准备工作。

1926 年 7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开始北伐，攻克长沙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成立。周恩来交给了周逸群新的任务，要他担任北伐军左翼宣传队队长。9 月 10 日，周逸群带着由五十三名青年学生组成的左翼宣传队，从长沙出发，到驻常德的国民革命军第 9 军第 1 师贺龙部队工作。

周逸群同贺龙虽然没有见面，但两年前他们便通了信，而且从未间断。

他们怎么通起了信呢？这里面也有段情由。

贺龙自两把菜刀砍盐局、拉起一支农民武装之后，带着这支队伍，先是随蔡松坡护国讨袁，接着又投入了护法运动。1922 年，孙中山在桂林设大本营讨伐北洋军，派老同盟会员石青阳到川东、湘西收集旧部，湘西王陈渠珍便顺水推舟将贺龙人马送与石青阳。这样，贺龙便随石青阳加入了熊克武领导的四川讨贼联军，与北洋军在四川大战，前后三年，终没打出个结果，贺龙先为讨贼联军混成

旅旅长，后为师长，驻守贵州铜仁，司令部恰好设在周逸群的家中。

一天，贺龙巡哨回来，见堂弟、1旅旅长贺锦斋正满面笑容地等他。没等贺龙开口，便说："常哥（贺龙乳名常常，字文常），我可发现宝贝了。"贺龙问："什么宝贝？"贺锦斋把手中几本书放在桌上，说："都是宣传共产党和俄国革命的书。"贺龙眼一亮，说："快念给我听听。这个党，那个会的，我参加了不少，就是'红脑壳'我还没接触过。"

贺锦斋便念了起来。贺龙听了一阵，把桌子一拍，说："共产党的章程不错，是为劳苦大众的。"言罢又问："你这书是从哪儿得来的？"贺锦斋说："就你住的周姓这家房东啊。周家有个叫周逸群的青年，是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听说是个共产党员，书都是他寄来的。"贺龙说："文绣，用我的名义给这位周先生写封信，要他给咱们多多寄些'红脑壳'的书。"

就这样，贺锦斋以贺龙的名义给周逸群写了信，不久，周逸群就给贺龙寄了许多进步书籍。贺龙甚为高兴，每天都要贺锦斋为他读。

也就从这时起，贺龙开始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后，广东国民政府又派人到贵阳做贵州军阀袁祖铭的工作。袁祖铭同意加入北伐军序列时，贺属于袁部，便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师，驻守于常德。

就在这当儿，周逸群带着宣传队员，来常德会见贺龙。

贺龙见了周逸群，喜出望外，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笑着说："逸群，我的兵可把你家的粮食吃了。"

周逸群笑道："只怕你吃得不多。"

贺龙说："逸群，我想党，盼党，你来得多好啊。"

周逸群说："我也十分想念你呀。"

这一晚，两人畅谈到金鸡报晓。周逸群向贺龙讲了国内外的形势、共产党的宗旨，讲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情况。贺龙不断地向周

逸群提出各种问题，周逸群为其一一解答。两人只恨相见太晚。

贺龙向周逸群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周逸群说："贺师长，共产党的大门向你敞开着，只要你的条件够了，我来当你的入党介绍人。"后来果然由周逸群介绍贺龙入党。

周逸群被留在1师担任政治部主任。他带来的五十三名宣传队员，也分到了各团营中，担任了职务。

周逸群的到来，使1师的面貌焕然一新。这支部队，在贺龙指挥下，北伐之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军中不少将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部队更加倾向革命，贺龙也成为国民革命军著名的左派将领。

1927年7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叛变了革命。贺龙在周逸群、谭平山等共产党员的帮助之下，将部队拉到了南昌，参加了南昌暴动。起义军南下至临川，蔡廷锴师叛逃，起义军组成了第3师，由周逸群兼任师长，徐特立为党代表。8月的南方，天气炎热，酷暑难耐。周逸群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使基层官兵甚为感动，齐说："师长尚且如此，我等无任何怨言！"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周逸群率师与敌激战于三河坝，结果部队被打散。他与四名警卫员到了揭阳一带，在与敌人搏斗中摔伤，被一名叫谢山的贫苦农民救起。他在谢山家中住了几天，体力得到了恢复，并得到了主力部队失败的消息，便决定去香港，再转道上海，寻找党的组织。这天，当他上了开往上海的一艘外国客轮，挟着个烂席子摸到货舱，躺下休息时，忽然听到一个看报的人自语："这报上的消息真灵通，周逸群还没上船，报上就登了出来。"周逸群看到说话人是陈赓，高兴地握着陈赓的手，说笑一阵，两人一起结伴到了上海。随及同贺龙一起赴湘西。

贺龙、周逸群、柳直荀等五人抵武汉之际，武汉的中共要人正准备举行年关暴动，湖北省委遂决定由贺龙出任暴动总指挥。暴动决定在腊月二十三日灶爷升天时、趁鞭炮齐鸣举行。由于为暴动准

备印刷传单的一家印刷厂被敌人破坏，暴动计划落入敌人手中，敌人出动大批军警，搜捕“暴动分子”，贺龙、周逸群、李良耀、卢冬生等，在武汉立不住脚，遂连夜离开了武汉，走水路奔湘西。柳直荀因另有任务没能前往，徐特立也因患肠疾而留下。

第十三章　贺龙苦战湘西

贺龙要枪毙贺锦斋

江轮在长江中逆水西行。时值隆冬，沿江两岸，到处是枯枝败叶，一片萧瑟之景。这一日，到了三江口，就是三国时期周瑜火烧曹营之处。天才近午，船便停了下来，贺龙一问，才知道前边的观音洲有一股土匪，二十余人，常于此江面上白日抢劫，往来的行船只有结伙才敢前行。贺龙闻听，大怒，遂带着卢冬生上岸会了土匪头子混江龙李偏头，趁势下了李偏头的枪，将其打死，余匪闻贺龙之名，皆俯首而降。贺龙等遂得了十六支长短枪，当晚，江轮又继续逆水西进，行了一程，忽然彤云密布，又见大雪纷飞。刹时间：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轮又行了半日，到了沔阳境内。此时，江轮便进入了洪湖腹地。洪湖在夏、商、周各朝，为荆州的云梦地所辖。春秋时为州国。秦分天下三十六郡时，洪湖地属南郡。汉设州陵县。王莽时为江夏县。三国时，为荆州所辖。隋朝初年，改为沔阳县，元为沔阳府，明为沔阳州。清朝顺治二年，沔阳州改属湖广布政使司的安陆府。乾隆二十七年，又从沔阳州划出文泉县，后来，文泉县就没了，怎么没的呢？传说这文泉县旧址，便在今日茫茫湖水中央。那时候，这湖中央是美丽的文泉县城。有这么一天，县官做了个梦，一神人对他讲，说衙门的石头狮子若口吐鲜血时，便要天蹋地陷。县官听了，胆颤心惊，专门派人看着这石头狮子。这事仨传俩，俩传仨的被一屠户知道了，那屠户见县官不为民做主，很是有气，心中说，狮子吐血，先把你狗官陷入地内，他趁看狮人不注意，往狮子嘴里抹了猪血，看狮人突然见狮子口中有血，大惊，忙报县官，县官慌忙骑马逃窜，没走多远，一阵轰鸣，扬子江水骤涌，文泉城也就没了。这文泉城究竟怎样变成湖泊，据后人推测，很可能是地震引起江水流入，自此，成为洪湖。

洪湖区域有大大小小湖泊几十个，主要分布在洪湖、大同湖、大沙湖的周围，每到雨季，这些湖泊便成一片汪洋水域，涸水季节，便又成芦苇荡和荷花淀，洪湖境内河港湖泊交织其间，东西贯通，相互串连。其腹内有荆河、中府河，长江与东荆河环绕其境。因而，这洪湖地区素有水乡之称。这洪湖地带，土地肥美，物产丰富，是鱼米之乡。洪湖虽是水泊之地，而其战略地位，却又十分重要，东近武汉，南逼长沙，西邻川陕。退亦可据水泊之险固守。元朝顺帝时，沔阳渔人陈友谅，就在这水乡泽国领导了沔阳、洪湖一带人民揭竿起义，一时轰轰烈烈，号称“汉王”，至今，在洪湖区域内黄蓬山下，尚有陈友谅墓。三国时的遗迹就更多了，乌林矶与隔江的赤壁相对，

吕蒙口、观阵台、打鼓台，皆是历代兵家相争之时所留遗迹，在此不一一细述。

江轮又走了一程，到了一个去处。这地方，是通荆州、沙市、宜昌的水上咽喉要道，由于地形呈弓形，从长江上往上看，像一个人反着的嘴，故名"反嘴"。这反嘴镇上有几百户人家，商旅店皆全，也算是个小小的热闹去处。看看江轮到了反嘴，只见江边一座茅棚旁，站着一堆人，向江轮摇手，这些人有的还背着枪，这群人这么一喊，江轮上的人都吃了一惊，猜想定又遇到了土匪拦截。可到了这份儿上，江轮不靠岸也不行啊，只好靠向了码头。这时，贺龙、周逸群、李良耀、卢冬生均躲在仓中，透过轮船的窗户向岸上望去，判断着既将发生的事情。忽然间，贺龙一拉周逸群的胳膊，说道："逸群，你看，那岸上站的不是贺锦斋么？"

周逸群一看，贺锦斋果然站在人群之内，正向江轮张望。只见他，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一件棉布长袍，正在向船上招手。贺龙不见贺锦斋便罢，此时一见贺锦斋，顿时立眉双挑，满面怒容，哗啦一下，将子弹上了膛。周逸群一见贺龙这举动，一把攥住他的胳膊，说道："文常，你要做甚？"

贺龙两目喷火，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毙了他，是他贺锦斋投降缴械误了共产党的大事。不然，南昌起义不会失败的。"

周逸群说："文常，不可鲁莽，别忘了，你现在是共产党员了，贺锦斋缴械的问题，自有组织解决，不能只凭感情办事。再说，我们也要允许犯错误的人改正错误。"

周逸群这样一说，贺龙的怒气才平缓了许多。这工夫，江轮靠了岸。周逸群拉贺龙出舱与贺锦斋会面。贺龙说："我不见他，我一见他就有气。"

周逸群笑着一拉贺龙："你呀，走吧。"

贺龙这才同周逸群一起上了岸，卢冬生、李良耀也随后紧跟。

贺锦斋见到贺龙、周逸群四人，真是悲喜交加，他拉着贺龙的

手说："常兄，你，随你惩处我吧，我给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死而无怨。"

贺龙乃是宽厚之人，本来他对贺锦斋一肚子气，如今贺锦斋这么一检讨自己，那一肚子气立时烟消云散了。贺龙说："锦斋，你怎么到了这里？怎么知道我们从此处经过？"

贺锦斋说："一言难尽，南昌起义失败后，我到了上海，找不见党组织，就来到了这里，拉起了一支队伍，听人说你在观音洲下了混江龙的枪，估计你必由此经过，就来这里迎你。"

贺龙等人同贺锦斋见了面，贺锦斋又把同他一起拖枪的黄鳌、滕树云、朱秉章、刘玉仁等人，向贺龙等作了介绍。黄鳌是这一带的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随后，大家一同到了反嘴镇。进镇之后，贺锦斋把大家领到了一座高大的房子里。这原本是一大户土豪的宅院。众人进屋后刚坐定，有洪湖五子刘绍南求见。

刘绍南是沔阳人，在武汉求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天，党组织派他到洪湖地区开展工作。他回到家乡之后，对贫苦的渔民和农民做了宣传和发动工作。并以同学身分与革命青年彭国材、涂位云、贺闯、李德珍喝雄鸡酒，结拜为异姓兄弟，决心跟共产党，革命到底。这五人便成了后来洪湖人民众口称颂的"红五子"。即：刘瘤子、彭鼻子、贺麻子、李矮子，涂长子。刘绍南怎么来此见贺龙的呢？说来话长。原来，洪湖地区自1925年的秋后，中共湖北省委先后派了邓赤中、叶赤五等同志来开展工作。随及，又派了刘绍南等。经过这些同志的努力，一时间，洪湖地区的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同土豪劣绅和各种反动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邓、刘诸人领导革命群众，斗争了人称"七虎"的渔霸吴晓光，南林口的大土豪陈观卿、官垱湖劣绅夏西斗，汊河口恶棍李应林等等。恶霸土顽，一个个都威风扫地，贫苦百姓，扬眉吐气，人心大快。那些土豪劣绅个个吓得胆颤心惊，大的跑到了汉口，中等的逃到了沙市，小的躲到了县城。1927年，汪精卫于"七一五"反共后，这些土

豪劣绅们一下又还了阳，纷纷返回，反攻倒算。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刘佐龙的15军，鲁涤平的第2军，李品仙的第8军，李燊的第43军的部分队伍，先后占领了洪湖各地。那些反动势力纷纷组织了什么“国民党改组委员会”、“清乡委员会”、“保卫团”、“常练队”，各地的共产党的组织，群众团体，全部被破坏和解散，工农自卫武装被收缴，不少共产党人革命群众惨遭杀害。那些“还乡团”、“铲共队”到处杀人放火，掳掠奸淫，无恶不做。至使得许多群众家败人亡。这时候，湖北省委召集洪湖地区的共产党负责人肖仁鹄、邓赤中、黄国庆、刘绍南等同志，在武昌鸡公山开了会，要他们“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责成他们潜回洪湖各地，组织群众，发展武装斗争。肖仁鹄、邓赤中、刘绍南等回到沔阳，便分头秘密地进行暴动组织发展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1927年旧历八月十五日，在沔阳戴家场陈家垸，召开了五十多名党员大会，决定暴动从此开始。当天夜里，肖仁鹄、邓赤中、刘绍南，还有彭国材等共产党员，带领数百名农民队伍，首先杀死了戴家场恶霸涂老五，接着又杀死了周河湾的地痞周传简、劣绅戴金集、吴旺振。武装暴动如同春雷轰鸣。洪湖地区许多地方的共产党员，也自发地组织暴动队伍，半个月的光景，先后有八十余处土豪劣绅被农民处死。那些没死的土豪劣绅，纷纷逃跑。国民党反动政府，立即派兵镇压。1927年旧历十一月，邓赤中、刘绍南、肖仁鹄、彭国材等人，又领导农民武装，乘沔阳城中反动军队出城之机，奇袭了沔阳城，杀死了伪县长胡金宝，从狱中救出了一批被抓的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随后，这支队伍撤出了沔阳，转至沔西，会合了监利县王尚武的暴动队，接着，又在新沟嘴歼灭了监利团防武装七八十人。这时，暴动队发展到三百多人。肖仁鹄为游击队队长，邓赤中、刘绍南、彭国材为副队长，贺闯等战将亦都在这支游击队内。

这时候，鄂西区各县也都发动了规模不等的武装起义。到了1927年底，在这洪湖地区建立的农民游击队，除在监利、沔阳两县

活动的肖仁鹄外，还有石首县的吴仙洲部，公安县的邹资生部，荆江沿岸活动的黄鳌部。此外，还有许多小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都各自为战，彼此尚无联系。就在这时候，贺龙、周逸群、李良耀、卢冬生四人，来到了反嘴镇，刘绍南得知后，即刻来见贺龙等。

贺龙听了刘绍南的一番介绍后，握住刘绍南的手说："绍南同志，认识你我很高兴，你们工作的很有成绩。"当下，大家一番亲热，不必多说。

这时，贺锦斋对贺龙说："常兄，这洪湖地区地下党、群众的基础都很好，十人以上的游击队有好几支，就是缺少统一的指挥，都是各自为政。"

黄鳌插话说："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各级组织都破坏了，许多地方至今未能恢复，许多党员找不到组织，就自动拉起队伍。少则三五人多则上百人。若把这些游击队组织起来，那力量就大了。"

周逸群说："是应当把这些游击队、地下党组织起来。"

贺锦斋说："我也这么想，有些基层党组织找到我，可我也与党失掉了联系，对如何建党也不清楚，所以，没做这方面的工作，你们来了就好了。"

贺龙一指周逸群，笑道："这些工作，逸群明白。"

周逸群说："是否把各游击队的负责人召集在一起，召开个会议。统一行动，统一指挥。"

周逸群的主张大家都同意，当下，由贺锦斋进行了布置，派人分头通知各游击队负责人，到反嘴镇开会。

两天后，这些游击队负责人都到了，有监沔游击大队队长肖仁鹄、副大队长彭国材、邓赤中，石首县游击队队长吴仙洲、县委书记李兆龙、组织部长刘革非，公安县游击队队长邹资生，华容县游击队队长段玉林，江陵县游击队队长陈香波，安乡县游击队队长史庶元。大家相见，都十分高兴。华容县的段玉林游击队，其实只有十几名队员，段玉林却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第19路军的旗号。人虽少

牌子挺响。贺龙听了汇报，笑道："有这胆量就好，国民党那些龟儿子，就没这份胆量。"

当下，大家一起开了联席会议。决定在洪湖地区组织年关暴动。将肖仁鹄和贺锦斋领导的游击队合在一起，组成"中国共产党湖北沔阳工农革命军第5军"，贺锦斋为军长，下辖三个大队，第1大队大队长肖仁鹄；第2大队大队长滕树云；第3大队大队长刘绍南。总指挥贺龙。其余各游击队暂且单独行动。年关暴动主要消灭土匪和团防，因为这些反动武装势力，比国民党正规部队更坏。会毕，大家便都分头行动。5天之后，肖仁鹄将监沔游击队悄悄带到了反嘴镇。于是，大家安排了年关暴动的行动计划，决定首先消灭荆江两岸的三大处土匪恶豪。哪三处？华容岳老八、监利郭老七、石首张烟灰。这三个家伙，既是土匪，又是劣绅、恶霸，勾结官府，手下各有反动武装数十名，百姓对其恨之入骨。消灭这三霸，达到敲山震虎之目的。英雄们又经过一番研究，决定在大年三十晚上，杀掉这三个恶霸。而后，将暴动全面推开。

说话的工夫就到了腊月二十七。按乡间之俗，廿七杀年鸡，廿八把面发，有钱人家都忙着过年。到了三十这天，工农革命军三路人马一齐出动。哪三路？贺龙带第一路百余人，直奔石首张烟灰，周逸群带第二路百余人，直奔监利郭老七，贺锦斋带第三路一百五十人，直奔华容岳老八。当夜，将三个恶霸都处死了。这三个恶霸一倒，贺龙的名头一露，那些土豪恶霸小股土匪，立时变老实了。老百姓都奔走相告，说贺龙到了洪湖，活龙得水，要乘云上天。

贺龙、周逸群指挥人马消灭了三个恶霸之后，趁敌慌乱之际，又带队伍攻打监利城。谁知侦察情况不细，攻打了半天，攻打不下，便又撤回到焦山河。

在焦山河，贺龙、周逸群召集各游击队、县委负责同志开了联席会议。研究什么问题呢？因为中共中央给贺龙周逸群的任务是去湘西拖队伍，他们不能在洪湖久留，便决定带贺锦斋、李良耀、卢

冬生，黄鳌去湘西，发展队伍，依山建军。新建立起的工农革命军队伍，交给了石首中心县委，由李兆龙指挥。随后，贺龙等人上路奔湘西。就在贺龙等人走后不久，刚刚组建的工农革命军队伍便出了差儿：肖仁鹄不服李兆龙的调遣，领着其中一支人马独自干了。肖仁鹄这人农民意识很浓，又个人英雄主义严重，对贺龙做领导，他很服气，对李兆龙他就瞧不起了，原来那李兆龙是打野雁的出身。肖仁鹄便不把他放在眼内。肖仁鹄把队伍拉走之后，日子不多，便遭到了恶霸和团防的偷袭，队伍几乎覆灭，肖仁鹄也牺牲了。剩下的少数游击队员，被刘绍南、彭国材、贺闯等人带到了洪湖荒岛中，几个月后，才又逐渐壮大。李兆龙带领的队伍，也遭到了夏斗寅部的围剿，被打散了，后来，洪湖名将段玉林领导的游击队，就在这两支队伍上建立的。

贺龙、周逸群等在洪湖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注意，当贺、周等向湘西行进时，蒋介石于南京发电于湘鄂西“剿共”联防司令夏斗寅。要其捉拿贺龙。夏斗寅闻贺龙回到了湘西，大惊，急电“湘西王”陈渠珍。夏、陈等人急下令各团防务于要道设卡，捉拿贺龙一行。桑植县保安团团长陈策勋遂下了通令，说谁要胆敢窝藏贺龙，九族皆灭，谁要抓住贺龙，他要亲自给这家挂匾。

贺龙等一行凭着机智勇敢和百姓相助，于途中杀了大土匪陈黑，接连闯过了夏斗寅、陈渠珍、陈策勋等设防的数道关卡，回到了贺龙家乡桑植洪家关。

破风水——周矮子率兵挖贺龙家祖坟

贺龙等人同众乡亲见过面之后，又问起桑植大革命时期的情况，众乡亲便七嘴八舌地把情况向贺龙讲述了一遍。

桑植县在 1927 年的 4 月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会员达到了五六

千人，受到共产党影响的有好几万人。农协会成立之后，首先把任过湖南省参议员、恶霸县长的朱海农抓起来游街。这朱海农是当年贺龙砍盐局后杀死的第一个县长朱海珊的胞弟。后来，贺龙带兵入了川，这朱海农召集土匪，称霸一乡。赵恒惕任湖南省省长时，朱海农花钱运动了个省参议员、桑植县县长的官儿。这朱海农比朱海珊还坏，群众对他恨之入骨。因为朱海农有枪有势，百姓们是敢怒而不敢言。农协会成立后，在农协会领导之下，农友们经过数次械斗，捉住了朱海农，先将他游街，随后，又将他拖到城外河滩，用乱石打死。这下，农协会的名声可就大了，那些大小豪绅，都纷纷逃走。时日不多，"马日事变"发生了，接着，"七·一五"事变，夏斗寅派了周矮子周燮卿，带队伍到了桑植。这周矮子原是贺龙部下的一个营长。1925 年，贺龙败走黔东时，周矮子看贺龙的大势已去，他拉着一些人跑了，先是投到了陈渠珍名下，陈渠珍给了他个营长的官儿做。周矮子嫌低，就又投到了夏斗寅的怀中，夏斗寅给了他个团副当。周矮子便死心踢地跟上了夏斗寅。夏斗寅要他到桑植镇压农协会，周矮子自然要卖力气了。他到了桑植后，先后杀死了三百多名共产党员，将县农协会主席谷及峰，大卸十八块，那凄惨之状，使人听了，不禁发指。他又派人挖了贺龙家祖坟，说是破贺龙祖坟风水。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便被反革命分子的屠刀压了回去。

贺龙听了大家的介绍，立时二目圆睁，浓眉高挑。厉声说道："反动派想用屠刀扑灭革命烈火，是办不到的！"

之后，贺龙等一面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一面着手拉队伍。洪家关及附近的村镇的青年，听说贺龙又树招兵大旗，纷纷前来。几天之后，又有几支人马来投奔贺龙。有梨树垭的李云清、杜家山的谷志龙、红土坪的刘玉阶、五洋关的贺炳南、鱼鳞寨的贺香姑、袁家坪的王炳南。这王炳南，本是桑植县袁家坪人，父王仕杰，系贫苦农民，租佃福音堂九十担谷的田种。王仕杰共生三子，老大王炳南、老二王朝礼、老三王朝盖。因家境贫寒，王炳南只读了两年私塾便被

迫停学。二十岁时，王炳南娶妻另过，妻子朱子姑，也于贫寒人家生长，勤劳贤慧。王炳南耕种了九担谷的佃田，还煮点酒卖，妻子纺纱织布，夫妻俩日夜勤俭，勉强度日。二十四岁时，他们有了个小孩，日子越发困苦。无奈，王炳南便借贷与人合伙做生意，不想头一趟便被土匪抢个精光。正在王炳南走投无路时，贺龙等好汉刀劈盐局，斩枪拖队，夺了县城。王炳南一跺脚，说："不是我要上梁山，是老天逼我上梁山。"遂同妻子洒泪而别，投军于贺龙部下。这王炳南身材高大，打仗勇猛，且办事干练，生性直爽，贺龙甚是喜爱。不久便当了连长。贺龙当澧州镇守使时，王炳南已升为营长。1926年，贺龙率师北伐之时，王炳南为第5团1营营长。南昌起义之后，王炳南为5团团长。起义失败，王炳南同贺龙等人失去联系，也不知贺龙等人死活，便辗转回到了桑植，又拖起了一支队伍。就在此时，王炳南听说贺龙到来，自是高兴异常，当即前来与贺龙等相见。

贺龙在洪家关立起招兵买马大旗，震动了桑植内外八乡，他当年的旧部，各处小股的农民武装，都纷纷来投。不到半个月，便拉起了三千来人的队伍。

贺龙同周逸群一起，将这支队伍整编了一番，建立了工农革命军。贺龙为军长，周逸群为党代表，黄鳌为参谋长，贺锦斋为第1师师长，王炳南为第2师师长。贺龙的大姐贺英把自己的队伍交给了贺龙后，自己带了少数人回到了一个叫鱼鳞寨的地方。

这天晚上，工农革命军召开了前委会，研究如何开展工作。周逸群说："桑植是僻壤偏乡，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我们初到这里，要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使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有所了解，知道我们拖队伍是做什么的。"

贺龙说："我同意逸群的意见，抓宣传的事，就由逸群来办，我和黄鳌、锦斋抓紧时间整顿队伍，以备敌人的进攻。"

会议开的干净利索。第二天，周逸群挑选了一批青年骨干，把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章程讲给他们，由他们去做宣传。周逸群还编了

歌儿，教这些骨干唱。那歌词写道：

农民弟兄们，联合起来啊！
黑地又昏天，压迫数千年。
耐劳苦，忍饥寒，生产供人间。
手胼腹足胝，终岁不空闲。
历尽难中难，才到打谷关。
四六、三七租付齐，衣食不周全。
想来好伤悲，农民真吃亏，
要吃饭，要穿衣，大家打主意。
快快来团结，建立苏维埃，
分土地、铲封建，才得享安逸。

这以后，周逸群又编写了《工农团结歌》、《妇女翻身歌》等歌曲，桑植县群众基础好，贺龙威信又高，群众很快就轰轰烈烈地发动起来，随后，建立了工农的革命政权——桑植县委。恰好李良耀赶到了洪家关，李良耀便为县委书记。

这天，风和日丽，春风荡漾，正赶上洪家关赶场。由于工农革命政权的建立，赶场的人特别多。来赶场的人，有的是来看贺龙工农革命军的，有的是探听消息的，有的是来看热闹的。

贺龙来到街上，所过之处，乡亲们都跟他打招呼，他也向乡亲们问侯，走到街心，见那里围着一群人，贺龙过去一看，原来是个盲人，怀抱三弦，边弹边唱：

“自从南昌起了义，澧源更遭匪注意，以为贺龙生其间，定多革命潜伏力，惟恐烈火漫天烧，蒋汪南京施毒计。急调大批强盗军，‘剿赤’‘铲共’更积极。漫山遍野紧搜查，硬将人民当仇敌，从早到晚乱抓人，一杀二绑三关闭。

地上鲜血流成渠，狱中冤囚挤破壁。许多志士不怕死，愿
将肉身抗刀锯。尤有一事更痛心，婴儿也当纸撕碎。妇女
不愿受奸污，悬梁投河甘自缢。眼见澧水八九县，山川改
色人绝迹。灾难实在比水深，欲想排荡无良计，也曾不断
做斗争，结果总是败下去。常从事后追原因，无人领导空
叹息！大家抬眼望贺龙，只有他能吞鬼魅。如今贺龙远归
来，人人雄心高百倍，一齐投入斗争中，不畏生死与艰巨，
群雄到处发吼声，势如风暴卷残絮。估计不到二十年，定
在京沪庆胜利，我今唱了澧水歌，当做一篇讨匪檄。”

那盲人唱完，围观之人无不拍手叫好。贺龙有礼地问道：“先生，这是谁教你的？”

没等盲人开口，有人便对盲人说：“先生，贺龙跟你说话哩！”

那盲人听说贺龙问他话，赶紧颤巍巍地站了起来，抓住了贺龙的手说：“胡子，你说是谁编的？这是大伙儿心里的话，还用编么？”

这盲人的一番话，只说的贺龙心头滚起了热血，好英雄，握着盲人之手，说道：“我贺龙决不负众望。”

贺龙刚说到这里，只见街里一阵大乱，赶场的人纷纷乱跑，贺龙正要问怎么回事，只见钟慎吾急匆匆地走了过来，见到了贺龙，忙说道：“胡子，不好了，国民党军来了。”

贺龙问：“多少人？”

钟悟吾道：“陈策勋和龙裕仁两部，陈策勋还让士兵打着大旗，上写抓你赏洋五万。”

贺龙说：“传我命令，队伍拉到后山。”

贺龙命令一下，工农革命军立时撤到后山上，刚刚布置好，龙裕仁、陈策勋两部就杀到了洪家关。双方立时接了火儿。

工农革命军因刚刚凑到一起，武器七拼八凑，弹药又奇缺，抵挡了一下，渐渐不支。团长钟慎吾中弹身亡。这一仗，工农革命军

大败，人马四散。贺龙、黄鳌带着几百人连夜退到一个叫罗裕的地方。周逸群、贺锦斋也跑散了。罗裕镇大地主刘子维，原与贺龙有旧交，今见贺龙兵败，亦反目为仇。与贺龙刀兵相见。贺龙只得又率人马撤到桑植与鹤峰交界的一个叫苦竹坪的地方。

几天后，周逸群、贺锦斋、王炳南等都来了。这天晚上，贺龙拉着周逸群坐在寨子外竹林之内，叹口气道："真没想到，部队召集的容易，垮的也容易。"

周逸群说："文常，我们想的太简单了，行动也太急，打个比方说，这些未改造的旧军队，就像抓在手里的一把豆子，抓起来容易，手一松就散了，要建立工农革命军，必须依靠苦大仇深的工农子弟为骨干才行。你想想，叶挺铁军团的骨干，不都是共产党么。"

贺龙赞同地说："逸群，你说的对，如今，跟我拖枪的人，什么打算的都有，一遇点挫折，就变了卦。队伍不整顿不行。"

周逸群说："除此以外，在打仗的战术上，我们也要改变，北伐时的那一套，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要改变战术。"

贺龙听了，连连点头。周逸群想想又说："文常，我们在焦山河会议上决定的明年 6 月，湘西部队和洪湖部队会师的计划，从目前情况来看，是实现不了啦，我有个想法，回洪湖去，和洪湖的同志们一起，创立洪湖革命根据地，迎接会师。"

贺龙沉吟不语，周逸群看出贺龙不舍之意，便说："文常，你现在已不是几年前的贺龙了，我走了，你也会干好的。我想，洪湖更需要我。"

贺龙一把拉住周逸群的手说："走吧，这边的工作，我会和同志们商量着干的。"

当晚，在这苦竹坪的一间四面透风的房中，周逸群主持召开了会议，会上决定，周逸群再返洪湖，去那里建立革命力量。

第二天早上，周逸群装扮成一教书先生，骑了头大黑驴，登程上路。贺龙等人，送到数里之外，大家这才洒泪而别。周逸群这么

一走，贺龙真的不是滋味儿，想到自己同周逸群相识以来，周逸群对自己的帮助太大了。真是最知心的良师益友，数年之中，朝夕相处，而今一别，自然难过。贺龙的心情，众人都晓得，少不得安慰他一番。

贺龙率部队退到苦竹坪之后，没多久，黔东李鑫部会同龙裕仁、陈策勋、朱疤子、永顺团防周燮卿（周矮子）一起，向苦竹坪的贺龙部发动攻击。贺龙率部迎战，双方激战两仗，工农革命军都失利了，急急退走，陈策勋等部穷追不舍，革命军站不住脚，一直退到湖北西部恩施、利川一带，这地方离桑植已有七百余里，部队败退之时，沿路之上，又有不少人跑掉，退到利川县境时，仅剩下了一百多人，一百多条枪了。

贺锦斋、黄鳌之死

利川县内有个大集镇子，叫汪家营子。这镇子挺热闹，街上铺面很多，人来人往的，很是热闹。镇子上有个团总，此人姓李名青川，因为长的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一瘸一拐的，故此人送外号“铁拐李”。这铁拐李手下有二百多人，一百多条枪。铁拐李可不是个好东西，奸淫掠抢，无恶不做。他又是哥老会的头子，因而，在这方园数十里之内，无人敢惹。李青川在大门口上悬挂着一块匾，上书三个大字“镇八方”，那过往的刀客，来到此地，都得登门拜望。不然，这汪家营子就过不去。

贺龙带着一百多人，化装成大商人，拜见铁拐李，趁机将其杀掉，收缴了其人枪，使工农革命军又扩到三百多人。而后，他又带着这支队伍，从深山峡谷之中，转回到了桑植。这一日，走到了湘鄂交

界的桐柘湾，探听到龙裕仁率部回贵州。贺龙便决定在其必经之处葫芦壳打伏击。这一仗，贺龙人马大胜，龙裕仁的一旅人马，除龙裕仁坐滑竿带少数人逃跑外，全旅几乎被消灭，龙裕仁的参谋长宋二麻子也被俘。打扫战场之时，贺龙吩咐将宋二麻子带上来，亲自审问。那宋二麻子一个劲地冲贺龙磕头，连连求饶说："上有八旬老母。"贺锦斋见此状，信口吟诗嘲笑道：

万弩千弓对寇仇，霎时大半变浮鸥，一人怕死真堪笑，跌跪尘埃只磕头。

工农革命军经过葫芦壳一仗，不仅缴获了许多枪械，而军威又重新振作。这天，贺龙同贺锦斋、黄鳌等人正商议部队的下步行动，有中共石门县委派人前来告急，说石门的游击队在陈家桥遭敌包围，情况甚危。葫芦壳距石门八十里路，贺龙遂率人马急急前往相救。这时候，节气已到了旧历七月，正是阴雨绵绵之时。部队走在路上，一步三滑，十分艰难。到了石门仙阳一带，天可就黑了，加上蒙蒙雨雾，几十米外的东西就看不清了。这地方，距那陈家桥尚有二十多里的路程。工农革命军正行走间，突然前面枪声大作，子弹乱飞，有十几名战士当时便中弹牺牲了。人马哗啦一下便都伏在了地上。贺龙一听枪声，立即下了命令："快撤！"

原来贺龙听出枪声不同一般，知道开枪的部队，不是一般的民团，不是土著军阀，而是国民党的主力队伍，只有这种队伍才能装备上等枪械。如今遇到了这敌人，看情形不是偶然遭遇，而是有准备的打援。所以，他才下了撤退令。就在工农革命军刚要后撤之际，贺龙收编的一支土匪队伍反了水，从后边开枪向工农革命军射击。幸亏当时为雨雾天气，加之天黑。贺龙人马都跑散了。贺龙的身边只剩了一个手枪排，他带着这手枪排向西北角冲去。哎呀呀，只见满山遍野到处是敌人的喊捉贺龙之声。贺龙同手枪排七转八移，总

算突了围。到了天光大亮，贺龙收拾部队，人马损失近半，参谋长黄鳌牺牲。贺龙遂带着部队退到了澧县的泥沙镇。在这里，他为牺牲将士开了追悼会，贺锦斋含泪写诗，悼念战友，那诗写道：

层层铁网逼周围，夜集深山湿战襟，为党为民何惧死？英灵从此入青云。

这天夜里，石门县保安团团长罗效之探得贺龙带部队住泥沙镇，便亲率石门保安团和陈嘉佑的两个营，还有澧县保安团，共一千五百人，连夜杀向泥沙镇，要夜袭泥沙，活捉贺龙。贺龙带着大部队向桑植思茅岭方向转移，由贺锦斋率警卫营断后打阻击。这一仗，贺锦斋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共桑植县委对贺锦斋烈士的忠骨重新进行了安葬，在烈士墓前，刻有挽联，那挽联是：

澧水歌霞光早以照大地；浪淘沙革命巨浪比天高。

罗效之在泥沙镇打死贺锦斋的消息很快报到了长沙和南京。那两地的报纸都在显赫的位置上登了消息：

共产党的虎将贺锦斋击毙于泥沙……湘西一龙一虎，虎死泥沙，龙入浅滩……

时国民党反动派知道贺龙势孤力单，立即调兵遣将，加紧对工农革命军进行“围剿”，欲将工农革命军一网打尽。这万余虎狼之兵，将桑植各路口关卡，统统封锁，不准百姓通行，妄想把工农革命军困在荒山野岭之内，冻饿而死，不战自亡。

这时候，工农革命军被挤进了湘鄂西边界大山之内。

锁龙洞里“锁”贺龙

湘鄂西边界的农民，本来就饥寒交迫，大山中的农民，更是缺衣少食，哪里还有粮米供工农革命军食用？而深山中村寨，又少土豪，革命军给养无着，贺龙只好带领部队，进入了深山老林，寻找站脚之地。这时节，时值隆冬，朔风吹，雪花飘，部队少粮，只好野菜充饥。没有穿的，只好用茅草结衣御寒。这时节，部队除逃走的、打散的、掉队的，剩下的仅有二百多人了。这二百多人随贺龙在山里转，有时一连十几天吃不上盐巴，吃的是树皮草根，最好的是苞谷糊糊。好多人都得了“鸡蒙眼”，也就是夜盲眼。大山中村寨少，只好住在山洞之中，或露天宿营。那日子实在艰难。

这天，贺龙带部队来到了锁龙山，这锁龙山上有个锁龙洞，这洞四外都是高大的树木、竹丛篙草。洞子很大，二百多入进去，依然空荡荡的。进洞之后，天也就完全黑了。大家点上了松明火把，看了看没有野兽，就寻了些野草，胡乱躺下。由于日夜战斗，爬山越岭，食不饱肚，衣不遮寒，一个个身体十分虚弱，满洞内尽是咳喘之声。贺龙躺在这冰冷的山洞之内，脑子里浮起回湘西后一幕幕事。自年初到洪家关，已近十个月了。十个月中，拉队伍三起三落，黄鳌、贺锦斋、钟慎吾等等许多好战友相继牺牲，虽说也打了胜仗，但终是败仗多，而今被敌兵撵进这深山老林，要吃没吃要喝没喝，风餐露宿。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周逸群走时说要建立以贫苦农民为骨干的队伍，如何组建，自己以前从未搞过，而周逸群又不在。他想着，心中烦闷，便起身来到外边，站在了一株参天松树之下，望着满天眨眼寒星，顿觉嗖嗖冷风钻肉。贺龙不由想起放哨的哨兵，此时一定很冷，便朝哨位走去。到了哨位，他左看右看，不见入影，仔细看时，只见一棵树上，挂着一支枪，哨兵却不见了。贺龙此时心中明

白，那哨兵是受不了苦，放下枪逃走了。贺龙把枪拿起，心中真有股说不出的味道。因为这些时日，几乎天天有人逃跑。贺龙心中正翻腾的时候，猛听得那锁龙洞内，"叭叭"两声枪响，紧接着，就有几个人从洞内跑了出来，枪声响后，洞里也就一阵大乱。贺龙也不知出了何事，有几个人跑到了贺龙身边。贺龙认出了那跑过来的为首之人，便高喊了一声："吴云清，跑什么？"

贺龙的话音儿还没落，那吴云清抬手就朝贺龙开了一枪，贺龙把头一偏，子弹擦耳根儿飞过。这时候，从洞里又跑来了一群人，把吴云清和那几个人都抓住了。贺龙借着火光一看，这几个人，都是从桑植跟他出来的。那几个人见贺龙目光盯着他们，都吓坏了。吴云清的裤子都尿了。扑通扑通都给贺龙跪下了。贺龙说："都起来。"

那几个人谁也没起来，继续跪在那里。事到此时，贺龙已明白这些人下跪不起的原由了。便说道："我待你们怎么样？"

几个人一起说："军长待我们恩同父母。"

贺龙又问道："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要害我？"

一个叫朱炳章的说道："这……报军长，我们从桑植出来，原想是跟军长发财的，没想到跟了军长十个月，许多兄弟打没了，打来打去，打到了这深山老林之中，要吃没吃，要喝没喝。"朱炳章说到这里，一指吴云清说："吴云清出的谋，说干掉军长，大家发财。我们就合计好了，趁军长睡下后，打军长的黑枪。吴云清说这里是锁龙洞，军长犯了地名，正好动手。没想到被王炳南发现……"朱炳章说到这儿时，连连磕头说："望军长刀下留情。"

没等贺龙吭声，王炳南抽出枪，朝吴云清开了火。说时迟，那时快，就在王炳南枪响的一刹间，贺龙将他胳膊抬起，那子弹飞空。贺龙问道："炳南，你要做甚？"

王炳南怒道："我要毙了他们。"

周围战士们见吴云清等要暗害贺龙，也都火冒三丈，怒喊道："打死狗日的！"

贺龙大喊一声："都住口。"见众人不言声了，英雄说道："他们跟我出来，原本是想发财的，可我却把他们带到了这深山老林，吃苦受罪，他们不懂为甚吃苦，埋怨自己跟我上了当，想打死我发财，这不怪他们。"说到这儿，贺龙对吴云清等人说："你们都走吧，我贺龙不怪罪你们，你们跟了我几个月，按说，该给你们点钱财，可怜，我贺龙身上连一个铜板也没有了，枪，你们带着，留做路上防身之用。回去之后，务要学好，什么时候想回，我贺龙欢迎。"

贺龙话到这儿时，吴云清等几个人都哭了。这哭声是从心底发出的。吴云清哭道："军长啊，是我们无知，一念之差，几乎害了军长性命。我，我们不回了，死也要跟着军长去死。"

吴云清说完，那几个人坚决地表示不走。贺龙扶起这些人说："你们离家十个月了，家中妻儿老小都惦记着你们，还是回去看看吧。待我贺龙时来运转，率队伍打回桑植之时，你们再找我。"贺龙又对吴云清说："你回桑植后，见到我姐姐，就说我这里一切都好，叫姐姐放心。"

吴云清等人见贺龙一定要他们回去，便再次给贺龙磕了头，而后，含泪下了山。

吴云清等人走后，贺龙又对其余人说："同志们，现在敌人把我们团团围住，又时值隆冬，我们缺衣少食，难以行动，看来这个冬天内，吃野要吃定了，若有愿意离开我的，自愿离去，愿意留的，准备同我继续吃苦。"

贺龙这么一说，大家都表示要跟贺龙同甘共苦。也有一些人，耐不住这艰苦的生活，离开了这支队伍。几天之后，这工农革命军仅剩下了九十二名成员，长短七十二条枪。这支工农革命军，看来人是少了，可这九十二人，一个个都是真心实意地跟贺龙干革命的，一能挡十，十能挡百。到后来，都成了湘鄂西红军的骨干，起到了酵母作用。

工农革命军一番整顿之后，随即离开了锁龙洞，又转移到了一

个新的地方，这地方叫猫耳台，更是山高谷险，林密草深。四外几乎没有人烟。在一石洞旁，部队停了下来，大家扯些茅草御寒，寻些野菜充饥。

就在这天夜里，工农革命军中的十四名共产党员，召开了会议。最后，一致同意由卢冬生下山，寻找上级党组织，汇报工作。

第二天一早，卢冬生便出发了。临走之时，贺龙把一双草鞋和二十块光洋交到他的手中。卢冬生看着贺龙那吃野菜吃得发灰的脸色，说道："军长，这草鞋我带着，这钱，留下吧，你们更需要。"随及，卢冬生转身大步向山下走去。

贺龙带着这九十名兵将，在深山之中，过着野人般的生活，那份苦楚，没法儿细说。一连两个月，大家吃野菜、蕨根儿，没有盐，一个个只觉得浑身发软，四肢无力。贺龙想将部队往山外运动，可大雪纷飞，朔风凛烈，大家破衣露肉，哪里能动？只好等待春暖花开。

这天，天气晴朗。贺龙同几名战士正在套山鸡，一抬眼，只见远远的山谷之中，走来一支马队，有七八匹马、十来个人。贺龙心说，部队转移的地点，只有卢冬生知道，难道他叛变投敌了？"立时，贺龙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为什么？一来他知卢冬生是经过考验的，纵然粉身碎骨，也不会投敌，二来若是敌兵"围剿"，不会只十来个人，这时，其它同志也都发现了这个情况，贺龙要大家找地方隐蔽起来，观察山谷中一行人的动静。那队人马渐渐临近。突然，贺龙喊了一声："大姐来了。"

王炳南等人也几乎同时喊出："大姐来了！"大家喊着，一起迎了过去。

来人正是贺英贺香姑。这贺英亲自带着人马，给贺龙的队伍送棉衣银元来了。贺英怎么知道贺龙在这深山之中？原来，卢冬生走出敌人包围圈后，他想到贺龙等在这严寒冬节，缺衣少粮，纵然找到党组织，党组织也无可奈何，莫不如先到鱼鳞寨，把这情况告诉大姐贺英，请香大姐帮忙，解贺龙燃眉之急。于是，卢冬生便又到了

鱼鳞寨，把贺龙的处境向贺香姑诉说了一遍，随后，这才奔常德，去找湘鄂西特委组织。贺英接到了卢冬生的报告后，便将平时积蓄的银元，棉衣，装了几驮子，顺着山谷小路，来寻找贺龙。

贺龙同姐姐相见，见姐姐送来了银元、布匹、子弹，革命军此时有了这些东西，真似雪中送炭，真打心眼儿里感激姐姐。贺英打量着贺龙和战士们，看见一个个面黄饥瘦，忍不住鼻子发酸。可眼里的泪花儿却没落下，而是笑道："常常，你看你这条龙，如今成了猴王啦。"她一指战士们："带着这群猴子兵，如何打仗？"

贺龙笑道："大姐，你可别小看这群猴子兵，这些猴子兵都是猴儿精，若拉出山，能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千变万，变成千千万万猴子兵。"贺龙又说："大姐，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呢？"

贺英便把卢冬生去了鱼鳞寨的情况说了一遍。当下，战士们卸下了贺英送的银元、子弹和布匹。香大姐雪中送炭，使得战士们都心头发热。

贺龙便把部队失利的情况向贺英叙述了一番。贺英问道："常常，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贺龙说："姐姐，我回湘西转眼就一年了，拉起的队伍儿起儿落，眼下，天寒地冻，缺吃少衣，这都好办，最大的难处，是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心里没了底儿。卢冬生转眼走了快一个月了，也不知他能不能与党组织接上头儿。"

贺英说："常常，过去人家跟你为的是升官发财，如今人家跟你流血卖命，图的是甚？你总要有个东西把人家的心拴住才行啊。"

贺龙说："大姐，我跟上了共产党，为穷苦人流血卖命，才抛掉了荣华富贵、厚禄高官。"

贺英说："对呀，你要把这些道理告诉大家。你和周逸群都给我讲过，队伍里有了CP、CY（CP、CY是共产党和共青团外文的缩写——作者注），队伍就有了骨架儿，你现在这队伍里有多少CP、CY？又怎么样才使他们当队伍的骨架儿？"

贺龙“唉”了一声说：“只怪我入党时间太晚了，对共产党掩军队这一套办法还没弄熟。要是周逸群在就好了。”

贺英说：“不熟，你就摸索着来，总不会出大格的吧。”

贺龙说：“姐姐，我一定这么做。”

贺英走后，贺龙便将党员都安排到班排连内，成立了党支部，他自己任支部书记。要党员起模范带头作用。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转眼春雷响动，冰消雪融，草木发青。这一日清晨，卢冬生回来了，贺龙见了，一下攥住卢冬生的双臂，一时不知说甚是好了。他仔细地打量着卢冬生，只见卢冬生瘦的只剩两只大眼了。贺龙急不可奈地说：“冬生，找到党组织了吗？”

这时，王炳南端来一碗热水，卢冬生喝下之后，便把自己下山后的经过简短地说了一遍。说到激动之时，卢冬生竟眉飞色舞。之后，他撕开了衣角，从中取出了一封信。

信是周逸群写给贺龙的，信中介绍了洪湖地区开展革命斗争的情况。传达了半年前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信中还讲了如何建立根据地，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分配土地等指示。

贺龙让卢冬生将信一连念了多遍。随后，卢冬生又把他知道的朱德、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会师，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情形说了一遍。贺龙听了，点头说道：“对呀，朱毛做得对，仙鹤还有个滩头，干革命就是要有个山头。”

随及，贺龙召开了党员大会，会上传达了“六大”的精神和特委的指示，吸收了一部分同志入党，研究了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针。按照特委的指示，工农革命军避开敌人主要力量，到敌人势力较弱的鄂西利川、宣恩、恩施一带活动，会合鄂西游击队，发展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给贺龙的指示信

贺龙等九十余人，在深山老林之中，一冬没有露面，朱疤子、罗效子、周矮子一伙人都以为他们冻饿而死，喂了虎狼，“围剿”也就放松了，一个个立功的立功，请赏的请赏，只道完事大吉了。这当儿，贺龙率领经过整顿的九十余人的工农革命军骨中，直奔鄂西。

鄂西就是湖北的西部，有鹤峰、五峰、建始、宣恩、来凤诸县。与四川、贵州、湖南交界。这些地方，是山连山，川连川，山高林密。老百姓生活十分穷苦。那些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对穷人的残酷压迫，更为厉害。这地方的神兵特别多。神兵就是带有迷信色彩的武装。鄂西有名的神兵头子有王大菩萨王锡九，邬阳关神兵头子陈宗瑜，黑洞神兵头子杨大瞎子。在这诸多的神兵之中，也有一支队伍，老百姓也管他们叫神兵。这支队伍的穿戴打扮，什么样的都有，有穿长袍的，有穿马褂的，有戴瓜皮帽的，有戴礼帽的，有穿布鞋的，有穿草鞋的，有用枪的，有拿刀的。这支队伍共有三百多人，领头的姓陈，叫陈协平。陈协平是大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原在长沙搞工会，马日事变后，回到了家乡恩施县，拉起了这支游击队，活跃在这崇山峻岭之中，壮大着革命力量，湘鄂西特委指示贺龙到鄂西便是同这支队伍会合。

贺龙带着部队行动之后，首先解决了鄂西东山仙人宫大土匪王拔萃。王拔萃是鄂西一带有名的大土匪，手下有三百来条枪，自称司令，盘距在仙人宫中，勾结官府，无恶不做，仙人宫周围的三个县，鹤峰、宣恩、恩施三县的县长，保安团团长，均和他是磕头换帖的兄弟。

解决了王拔萃群匪后，贺龙又带工农革命军，直奔鹤峰，连夜杀死国民党鹤峰县长韩利流，解放了鹤峰县城。老百姓听说贺龙部

队来了，纷纷投奔，很快扩大到五百多人。随后，贺龙打听陈协平游击队的下落，才知这支队伍在两个月前，因叛徒出卖，已被敌兵打散，陈协平也不知到了哪里。

贺龙率革命军解放了鹤峰县城，打了城中土豪，杀了恶霸，打开监狱，放出了关押的穷苦百姓。自此，军威重振。

鹤峰县内，有个邬阳关。邬阳关地处建始、巴东、鹤峰三县交界之处。是巴东、建施通往鹤峰的重要门户。这邬阳关上，有一支神兵，三百多人，领头的父子俩，父亲陈振元，儿子陈宗瑜。这队伍每当打仗之时，人人吞朱砂，喝符水，念咒语。这陈氏父子，效仿水泊梁山好汉，在邬阳关上树了面大旗，上写"替天行道"四个大字，专门打富济贫，因此，还很受老百姓的拥护，由于邬阳关地势险要，官府也奈何他们不得。

陈振元，号海生，四十多岁，曾念过多年私塾，清末府试时未中，便在家教书，农忙时务农。他练得一手好枪法，为人正直，行侠仗义，专抱打不平。长吟"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问众乡亲，可有不平事"。凡遇乡亲中有不平之事，便拍案而起，拔刀相助。陈振元妻子陈玉兰，是猎户家子女，也是枪法精通，胆识过人。

贺龙收编了陈家父子的神兵，随后，他率领着人马，杀向五峰，打垮了五峰县大土匪孙峻峰，得了一大批枪支弹药，粮草钱币。回到鹤峰，他把队伍进行了整编，共分为三个大队，1 大队队长王炳南、2 大队队长卢冬生、3 大队队长陈宗瑜、参谋长陈振元。1929 年 2 月 17 日，宣告了鹤峰县苏维埃成立，召开了庆祝大会，上千名贫苦百姓参加，汪毅夫、陈宗瑜、吴天锡等七人当选为工农兵代表。吴天锡为县苏维埃主席。此后不久，陈协平也带着被打散的数十名游击队员到鹤峰与贺龙会合。贺龙探听到敌人将集重兵向鹤峰进攻，便将队伍拉到了桑植。在罗峪，一举消灭了刘子维部，随后，到了银杏坪、梅子岩、杜家村一带。自此，部队便进行了认真的整编。整编之中，由卢冬生介绍了洪湖地区热火朝天的革命斗争情况，介绍了

朱德、毛泽东井冈山斗争的情况，由贺龙传达了半年前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红军、建设根据地、分配土地等指示。批判了部队中的拖队思想，军阀作风，发展了党团组织，建立了士兵委员会，成立了湘鄂西前敌委员会。贺龙、李良耀、张一鸣、汪毅夫、罗统一、陈协平、杨维藩七人为委员，贺龙任前委书记。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工农革命军自此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恽代英虽有任命，并没有到职。将原工农革命军的大队和中队编成团营，王炳南任第1路指挥，张一鸣任党代表，下辖1、4两个团：1团团长贺桂如，党代表龙在前；4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徐锡如。军部警卫营营长廖卓然。此时，全军共六百多人，三百多条枪。整编至1929年3月8日结束。这次整编，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扩大了军队内部的民主，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军心振奋。

之后，贺龙便率兵袭击了桑植县城，桑植保安团团长陈策勋万没想到贺龙的兵马又出现在桑植，不及还手，就丢兵损将的逃跑了。贺龙占了桑植后，宣布成立桑植苏维埃政权。

这时节，湘西王陈渠珍派向子云率一旅之众前往攻打桑植。

贺龙闻知，淡淡一笑，自语道："向子云，他来的正好。省得老子去找他。"说着，来到了街上，又信步出城，不觉到了五里外的赤溪河边。赤溪河乃桑植境内的第二条大河，河水又急又深。当地老百姓有句俗话："放排只怕烂岩壳，摆渡只怕赤溪河"，向子云攻打桑植城，赤溪河乃是必经之地。

贺龙围着赤溪河转了一圈，回到军部，便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一开，大家就议论开了，议论甚？议论这仗如何打。敌人三千多，一色的新枪新炮，而红军只有一千多，武器又旧，这仗如何打得赢？贺龙见大家面有难色，便平静地说道："大家不要焦急，我看这仗能打赢，为甚？原因有三，第一，别看我们只有一千人，而敌三千人，我们一人能抵敌三人，我们红4军，今非昔比，共产党员已经起到了

骨干力量作用；第二，我们现在有县苏维埃政权，有老百姓支持我们；第三呢，就是这个仗如何打。”接着，贺龙便把他的打算如此这般地说了一遍，大家听了，无不拍手叫好。会议之后，便各自依贺龙之计而行。

时向子云以其弟向子捷为先锋，人马向桑植杀去。当向子捷率先锋团到达赤溪河的时候，发现渡河的船只均在西岸，河边无兵把守。向子捷愣在那里，不敢前进。两个时辰后，向子云的大部队赶到河边。向子云见其弟令部队停在河边不前，问道：“为甚么不过河？”

向子捷说：“据侦探兵报告，说桑植的红军都跑了，还跑了许多老百姓，我疑其中有诈。”

向子云坐在马上，半天默然不语，忽然，他说：“把侦探兵叫来。”

工夫不大，侦探兵来了，向子云问：“贺龙兵马为什么都跑了？”

侦探兵说：“听老百姓讲，红军只有六七百人，武器是鸟枪土炮，一听说旅长带大队人马，还有洋枪洋炮，都吓跑了。”

向子云把脸一沉说：“都是实话吗？”

侦探兵说：“小的若有半句假话旅长可杀我头。”

向子云手捏下颏没有吭气。向子云不信侦探兵的话吗？半信半疑。向子云虽然骄横，可他真的跟贺龙交手，还是动了脑筋的。向子云暗问自己：“难道红军真的被吓跑了不成？”正在这时，有人报告，说桑植士绅张老六要见向旅长。张老六是谁？张老六是桑植县头号大恶霸，贺龙一进桑植时，就把他抓了起来，关进了大牢。张老六怎么跑出了呢？原来，桑植城的老百姓和红军往外一撤，被关押的土豪恶霸也都随着往外撤。押张老六的是个小伙子。走到城外，张老六看来来往往的人慌慌的撤退，又听说向子云的兵马要来，张老六十分高兴，他瞅了个冷子，跑到了路边树丛之中，押他的那个战士见他跑了，“砰砰”地打了两枪。直把个张老六吓了个脸皮儿

黄，连尿都出来了，不过那子弹只从他耳边飞过了。他只听那战士喊“抓张老六哇！”这一喊，吓得张老六腿哆嗦的差点儿迈不开步了。这时候，他又听到有人喊：“柱子，别追了，快走吧，贺军长带队伍早跑远啦，向子云的大队人马来了，晚了就走不成了！”

那个战士答着话跑了。这么着，张老六才连滚带爬地到了赤溪河边儿。向子云听了张老六的话，一跺脚说：“运转时气来，一定要发财，我向子云的时气到了。”说着，命令全旅部队渡过赤溪河，直奔桑植。到了桑植，果见城中四门大开，不见红军的影子。那些兵丁立即捶门打户，准备开铺造饭，向子云对部下说：“派快马飞报陈师长，就说我向子云已占了桑植，不日即擒贺龙。”

向子云刚说到这里，忽见桑植城外山头上飘扬着一面红旗。原来，桑植城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势险要。红旗便飘扬在最高山头上。红旗一现，有人指给了向子云，向子云举起望远镜正瞅时，突见桑植周围的山上，号炮齐鸣，枪声大作。有数不尽的人马杀下山来，直扑城中心。向子云知中了空城计，急令人马后撤，时只有西门没有红军，向子云的败兵如流水般从西门涌出，慌张张地向西逃去。向部兵丁跑到赤溪河边时，但见河水汹涌奔腾。这时，贺龙兵马又紧追不舍。向部兵丁，只好纷纷跳入河内，这时候，向子云也骑马来到了河边，他的弟弟向子捷大呼道：“哥哥，快下河吧，贺龙追来了！”

向子云抓着马尾巴，跳入了河内，就在这时，河面水位突然高涨，原来上游刚刚下了大雨，山洪下泄，使得河水水位高涨。向子云游到河中间时，一个浪头卷来，向子云被卷入了河中，随后，冒了冒脑袋，就喂王八去了。

这一仗，是贺龙 1928 年 2 月回湘鄂西后，取得最大的一次胜利。缴获的枪支弹药无数。这一仗，震动了湘鄂西。一时间，军威大振，桑植周围各县的土豪劣绅，纷纷逃窜，一些土著武装，也来归顺。至此，红四军又扩大到三千来人。

这天清晨贺龙刚刚起身，有勤务兵报告，说一百姓要见贺龙，贺龙说："请他进来。"

勤务兵答应着走了。工夫不大，带进一个苗族打扮的人，这人有三十多岁，青布盘头。虽然衣服破烂，那一双眼睛里，却透着英气。那人一见贺龙，上前施礼道："军长一向可好。"

贺龙再定睛一看，立即握住来人之手笑道："鸣先，是你。哎呀，真没想到。"

刘鸣先说："军长，我找你们可找苦了，先到了鹤峰，又到了宣恩，得知军长到了桑植，又连夜赶到桑植。"

刘鸣先原是叶挺的副官长。大革命时，便与贺龙认识。他此次做为中央联络员，到湘西向红4军传达党中央的指示的。刘鸣先撕开内衣，从中取出了一封信，交给了贺龙。

刘鸣先交给贺龙的信，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给前委和贺龙写的。信中表扬了湘鄂西前委领导下的红军的英勇斗争，并就政治形势，游击战争，党群组织和今后行动方针问题，做了明确的指示。那信中写道：

> 去年年底冬生同志到来，得到了你们的报告，当即进行了研究，并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我党总的政治路线，目前的革命形势以及游击战争主要任务告诉你们。信由卢冬生带去。兹后，又得你们的报告，得悉你们不畏苦难，带领同志及士兵忍饥耐寒地作了英勇的斗争。你们发动了群众，夺取了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消灭了许多反动民团、土匪，这些都是对的，不过游击战争最重要的是要有组织，要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过去各处的游击战争，发生过一些不好的倾向，第一是脱离群众，使群众完全不了解游击战争的意义是为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第二是毁灭城市及大烧、大杀、大抢的倾向。这种倾

向，是妨害党在一般群众中甚至工人群众中的影响和发展的。我们在党内必须极力肃清这种不正确的观念。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农民斗争的口号，削弱反动派的力量及建立红军。我们游击队势力所达到的区域，自然必须发展党的组织，扩大群众的组织，推动并帮助群众的斗争，扩大我们的宣传。

周恩来的指示信中，还介绍了毛泽东、朱德在井冈山上总结的建军经验，要求前委参考，信中说：

在朱毛军队中，党的组织是以连为单位的，每连建一个支部，连以下分小组，连以上有营委、团委等组织。因为每个连都有组织，所以在平日及作战时，都有党的指导和帮助，据朱毛处来人说，这样的组织，感觉还好，将来你们部队建党时，这个经验可以备你们参考。

关于红军发展方向，鄂西、湘西发展区域，究竟以何处为最好？原则上说，游击战争的发展，应该是向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更为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组织有相当的基础的地方，以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最宜。

贺龙接到了党中央的指示，欣喜异常，当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传达。能落实的便认真落实。又根据中央指示的有关精神，对红 4 军再次进行了整顿。整顿之后，红 4 军便成了两路纵队，第 1 路指挥王炳南，下辖 5 个团，第 1 团团长贺贵如、党代表龙在前，第 2 团团长文南甫、党代表吴协平，第 3 团团长陈宗瑜、党代表谭秉苏，第 4 团团长伍琴甫，补充团团长胡海云。第 2 路指挥卢冬生，下辖 2 个团，第 5 团团长覃伯勋，第 6 团团长吴成虎，另外，还有补充旅旅长谷志龙、党代表汪毅夫。

为了拔除桑植周围的团防据点，巩固扩大苏区，贺龙在红 4 军整编之后，率主力向大庸和慈利推进。首战击破大庸团防土酋熊相熙部，继而又进击慈利，夺取商业要地江垭，红 4 军所到之处，百姓争先相迎。军中宣传人员，以标语、布告、讲演等形势，开展了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的宣传。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参加红军。经过两个月的游击战斗，又回转桑植进行了休整。

湘西王陈渠珍，是个遇硬便缩回的人，赤溪河向子云大败身亡，陈渠珍便不再伸头攻打红军，目的不过是为保存自己的实力。他派了副师长曾从吾，率第 1 旅旅长陈斗南进驻永顺，陈渠珍叮嘱曾从吾，不许与贺龙部交锋，一切以保存实力为上乘。而陈策勋、朱疤子、罗效子、周矮子这些家伙同陈渠珍不一样，他们不服从陈渠珍的命令，坚决与贺龙为敌。陈策勋逃到了慈利后，便以桑、鹤剿匪司令的名义给何键发了电报，要何键发兵，攻打贺龙，并自告奋勇，愿为前驱。何键接到陈策勋的电报，便令驻常德的国民党第 52 军军长吴尚派兵前往"围剿"。吴尚接到何键电令，便派了旅长阎仲儒率其旅会同湘西各团防，"进剿"红 4 军。1929 年 9 月中旬，陈策勋联络了湘西反动杂牌军徐小桐、邢聋子、陈斗南、罗效子、朱疤子、周矮子等部，自大庸、慈利、永顺方向一起向桑植攻来，阎仲儒部亦紧紧跟随。

贺龙接到了敌情报告，立即召开了前敌委员会，决定避敌锋芒，转移到湘鄂交界处的来凤、龙山一带，伺机歼灭敌军。

当即，由伍琴甫的第 5 团为前部，向来凤、龙山一带进军。孰料伍琴甫暗中反水，勾给周矮子等，于八大公山割耳台伏击了红 4 军。结果红 4 军大败，损失惨重。一直退到了鹤峰的红岩坪，才站定脚。贺龙查点人马死伤达五百余人。数日后，贺龙又率队直取鹤峰——鹤峰城在贺龙率部撤到桑植后，走马坪南关总公所所长王文轩，联合了五峰县团防头子孙俊峰、来凤县团防头子覃国达，进犯了鹤峰，王文轩自封为县长。

在野鸡沟，红 4 军打败了王文轩人马，于鹤峰县第二次成立苏维埃政府。随及招兵买马，贺龙又下令成立了第 5 路纵队，由陈振元为 5 路纵队指挥，刘治武任党代表，下辖三个团，约八百人。

红 4 军在鹤峰建立政权后，前委又决定向五峰、长阳、松滋、澧县、公安一带进发，开辟苏区，建立革命根据地。不一日，红军到了五峰。五峰团防头子孙俊峰率民团仓促迎战，双方战斗不到两个时辰，孙部即跨。孙俊峰落荒而逃。接着，贺龙又率人马克长阳，长阳伪县长仓皇逃命。而后，贺龙再催人马，又一举攻占了松滋、石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鹤峰为中心的，包括五峰、长阳、松滋、石门等苏区在内的湘鄂边苏区。贺龙一方面扩大红军队伍，一方面建立苏维埃政权。妇女、儿童等等组织，也都相继成立。一时间，湘鄂边苏区搞得轰轰烈烈。

转眼间，又爆竹除旧，桃符更新，春风送暖，桃李芬芳。时间到了 1930 年 2 月。这一日，贺龙刚由练兵场上回到屋中，正在歇息吸烟之时，有勤务兵报告，说一人从洪湖面来，要见军长。贺龙听说从洪湖来的人，立即起身相迎。

第十四章　洪湖奠基人

火龙将军——段德昌

贺龙出门一看，见来人三十上下，五短身材，黑眉亮目，面孔清瘦，却十分精神，一副乡下人打扮。那人见到贺龙，也不答话，而是笑挽贺之手，走进屋中。进屋之后，那人反客为主，吩咐勤务员沏茶。也不通报姓名，直搞得贺龙莫名其妙，英雄忍不住问道："贵客尊姓大名？"

那人喝了口茶水，这才从贴身衣袋之内取出一信，贺龙接过信，不看尤可，英雄看罢，把信纸一扔，伸出双臂，将来人紧紧抓住。高兴地说："党代表，可把我想死了。"

此人就是红4军党代表万涛。虽然中共中央军委继恽代英后，

任命万涛为红 4 军党代表，只因万涛另有任务，一时不能脱身，所以来迟。

当下，贺龙紧紧握住万涛的双手，把万涛上上下下的一番打量。说道："万涛，咱们有多少年没见面了？"

万涛笑道："至少有十五年了。"

原来，万涛同贺龙是老相识。其为川东黔江人，当年贺龙赶马时，万涛是黔江城中万家车马歇铺的小伙计。贺龙在这店中住过多次。因此二人相识。后来，万涛参加了革命，于 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重庆、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8 年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长。时为中共湘鄂西特委委员。

贺龙与万涛相见，老友相逢，分外高兴。万涛说："文常，你们的工作搞得很好哇。"

贺龙吸着烟说："有许多工作，都是摸索，学着井冈山朱、毛的办法，只是学不好。听说周逸群在洪湖搞得不错，我正要派人去学呢。"

万涛也吸着烟说："是搞得不错。鄂西区刚刚召开了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特委也做出了决定，要红 4 军东进洪湖与红 6 军会师。"

贺龙听到这里，高兴地说："红 6 军成立了？"

万涛说："今年 6 月份正式成立的。洪湖现在真的一片红啦。"

贺龙鼓掌笑道："好，太好啦，万涛，你先歇息一下，回头我把连以上干部集合起来，你这党代表也和大家见见面，再把洪湖、井冈山、乃至全国的革命形势给大家讲讲，让红 4 军的将士们知道，我们红军队伍，越来越大，我们要以实际行动，赴洪湖与 6 军会师。"

接着，万涛把洪湖情况说了一遍。

周逸群自苦竹坪同贺龙分手之后，骑了一头大黑驴，装做教书先生，一步步向洪湖走去。这一日，到了石首县境，他打算找肖仁

鹄、滕树云等人。找了一番，哪里还有这些人的影子？到了石首城中，但见街头巷尾，都贴着“消灭赤匪”的标语。大烟馆、妓女院出出入入的，不是民团就是国民党兵。周逸群不敢久停，走出石首县城，抬眼一看，只见城门楼上贴着一张告示，上面写着：“共匪肖仁鹄处以死刑。”周逸群看罢，赶紧离开。将黑驴卖掉，来到了沙市，打算找鄂西特委机关。刚到了街上，只见几辆汽车开了过来，头边的汽车上，有几个兵丁吹着洋号，打着铜鼓，嘀嘀嗒，嗒嗒嘀的开路，第二辆车是架着枪的几队兵丁，第三辆车上押着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五花大绑，每人背上都插着一块死囚牌。上面写着“鄂西共匪”字样，由于车很快过去，周逸群没看清名字。在这刑车的后面，是一队荷枪实弹的兵丁。这三名受刑之人，在刑车之上，大骂蒋介石，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这三名共产党员，周逸群并不认识，可他知道是自己的同志，落入了虎口，他心中不由得一阵难过。情不自禁地尾随刑车，来到了法场。当周逸群赶到法场时，三名共产党员已英勇就义。鲜血把草地染红。周逸群默默地向烈士致哀，面后转身离开。他刚走不远，忽见一棵大树上贴着布告，过去一看，只见那布告上写道：

> 鄂西共匪头子张计绪、曹壮飞，于今春煽动工人暴乱，被一网打尽，另两名匪首万涛、李兆龙潜逃，有知其下落者，通知本会，赏洋五百，捉拿扭送者，赏洋一千，知情不报者，杀！窝藏罪犯者，杀！

周逸群看罢布告，心中说：“万涛、李兆龙还在，若找到他们，湘西特委和石首县委的情况都能知道，可到哪里去找他呢？”他想了想，决定到焦河镇，寻找那里的一个关系。主意一定，便向焦河镇走去。到了一个叫调关的地方，在这里，他遇见了团丁的搜查。从团丁谈话口中，得知长江北有共产党游击队活动，便决定去江北。

第二天，他到了长江大堤上，见盘查甚严，周逸群凭着斯文的派头，很痛快地过了岗哨。又走了一天，到了下车湾。在村口，见柳树上挂着几具尸体，周逸群明白，准是自己的同志遭到杀害。他没进村子，而是顺着堤埝，直奔反嘴。那里群众好，说不定有自己的同志。走着走着，天可就黑了，偏又到旷野之中，前无村，后无店。仔细一看，见湖岸边有一个用芦草搭的小草棚。草棚四周是芦苇。看样是渔民临时住的地方。正这时，忽听到一阵低沉的渔鼓调顺风飘来，虽然唱渔鼓调的人把声音压低，可周逸群还是听得很清楚。他屏住了气，听了下去，渔鼓调唱的是骂国民党的词儿。

周逸群听了，知道唱渔鼓的定是自己人，便甩开大步，朝那草棚走去。周逸群的脚声，惊动了草棚中之人，只见一个大汉闪在草棚一旁，朝周逸群厉声问道："什么人？"

周逸群平和地说："我是走路的，错过了宿头，也迷了方向。"

那大汉见只有周逸群一个人，警惕之心放松了。这时，周逸群走到了那大汉身边，借着草棚的蛤蟆油灯火，突然惊喜地说："贺闯，你怎么在这里？"

这人正是洪湖红五子之一贺闯贺麻子。贺闯也看出了眼前之人是周逸群，一把拉住周逸群的手说："逸群，你，你怎么来到了这里？"说着拉周逸群进了草棚，周逸群就把同贺龙回湘西，贺龙留下继续拉队伍，自己回洪湖，打算同洪湖同志们一起拉队伍的计划简单地说了一遍。随后，他向贺闯问起洪湖的情况。贺闯未曾开口，浓眉双挑，咬牙切齿地说："自从焦山河会后，你和贺龙去了湘西。日子不长湖北清乡督办胡宗铎、会办陶钧、湘鄂西剿区司令夏斗寅，调遣陶钧的第18军到洪湖清剿，游击队里偏又出现了分裂，肖仁鹄要个人英雄，将1大队拉走，在桐梓湖边，中了敌人的埋伏，队伍打垮，肖仁鹄被敌生俘，后处死。2大队长刘绍南在白庙开会时被叛徒出卖，被敌人杀害在戴家场。监利县委书记邓赤中在土地沟牺牲。3大队在小河口与敌遭遇，也损失很大。滕树云牺牲了，李兆

龙逃了出来。”

周逸群急忙问道：“李兆龙现在哪里？”

贺闯说：“李兆龙逃出重围后，到了沙市，在沙市找到了鄂西特委，鄂西特委正组织工人暴动，他也参加了。暴动还没开始，又遭叛徒出卖，几个负责人被抓，李兆龙连夜跑了回来，碰到了刘革非，昨天，他们俩又遇见了我。”

周逸群忙问：“李兆龙和刘革非呢？”

贺闯说：“我安排他俩去找段德昌了。”贺闯又问：“段德昌你知道吧？”

周逸群没有回答，而是急着反问：“段德昌在哪里？”

贺闯又给周逸群倒了杯水，把段德昌的情况说了一遍。

段德昌，湖南南县九都镇人，1904年出生于一贫寒人家。自幼聪颖过人，少年时便愤慨社会，立救国之志。1925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进黄埔四期学习。后又进入李富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讲习班学习。毕业时，正值北伐开始，段德昌初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军的一个营长，继而为6军5团党代表，又为35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5月，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紧接着，汪精卫于7月15日公开反对共产党，这时，周恩来秘密到汉口，布置南昌暴动事宜，段德昌被周恩来派到洪湖地区，开展武装斗争。

段德昌与彭德怀交往甚密，国共两党北伐时期，段德昌在湘军第1师政治部工作，常随彭德怀领导的第1团行动。1926年9月，第1团奉命围困武昌城南门，在围城之日，段德昌常和彭德怀在护城河边观望敌情。一天，二人走到吊桥旁的一株大柳树下，突然有十几名敌兵从城中冲出，包围了彭、段二人，二人面对群敌，无有惧色。分别从敌人手中夺过长短兵器，抖神威与敌肉搏。二人沉着冷静，背靠背，与敌周旋，但见寒光交错，兵刃相磕，直到警卫排赶到，方得脱险。自此以后，彭、段二人，情感愈密。

武昌克后，彭德怀部在汉阳驻数日，即经孝感往当阳行进。这时候，吴佩孚残部急惶惶由宜昌经玉泉山向北逃窜，国民革命军第1师师长周磐，令彭德怀率部追赶，进占玉泉山，截击溃逃之敌，段德昌亦同往。玉泉山就是《三国演义》书中所写关云长显圣之处。山上筑有关帝庙，到处是苍松古柏，流水清泉，风景秀美。彭德怀部赶到玉泉山时，北洋军残兵早于一天前通过。彭部便宿营于山中。是晚，彭、段二人，于关公像前，促膝长谈，段德昌指着关云长像问彭德怀："你以为关云长这人如何？"彭德怀一笑说："关云长是封建统治者的工具，现在还是统治阶级利用的工具，无非是忠义二字，没甚意思。"段德昌笑道："你说怎样才有意思？"彭德怀说："我是贫苦人出身，小时候讨饭吃饿昏过，我认为只有为劳苦大众奋斗才有意思。"段德昌又问道："你看国民革命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彭德怀说："现在不是每天都喊打倒军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实行二五减租吗，我认为，应耕者有其田，不应二五减租，只有耕者有其田，才能人民平等，共同富裕。"段德昌摇摇头道："德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应停留在耕者有其田上，应当变生资料私有为公有，由按劳分配发展成为按需分配，消灭剥削阶级，实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任务。"彭德怀听到这里时，呼地站起问道："德昌，我加入共产党吧。"段德昌问："你是国民党吗？"彭德怀哼了一声说："我不打算加入国民党，你看国民党里的那些人，抽大烟的，长大疮的，吃斋的，念佛的，这样的党，能为劳苦大众奋斗吗？"段德昌说："德怀，你奋斗吧，共产党的大门是向你开着的。"

后来，彭德怀入了党，入党的介绍人，便是段德昌。所以，段德昌在共产党内，也是个颇有威望的同志。

段德昌到了洪湖后，被鄂西特委派到了公安县，任公安县委书记。这公安县，属湖北地界，位于扬子江畔，到处河沟纵横，芦苇遍地，是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之处。段德昌到了公安县，找到了公安县共产党员戴补天、胡方熙。这时，白色恐怖已笼罩了洪湖地区。段

德昌便秘密组织了一支以工农为骨干的百余人赤卫队。打击反动的势力。公安县有个大恶霸，名唤傅祖光，大革命时期跑到了上海躲了起来。蒋汪合流后，傅祖光高兴了，回到了他的家乡公安县涂郭巷，成立了团防，时常借"清乡"为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捉住共产党员和农协干部，惨施酷刑。用湿麻绳抽打，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后，再把干青麻贴在身上，待身上血渍一干，那些青麻也粘在身上，再往下一条条地扯麻绳，被撕扯的人痛苦得呼天嚎地，痛不欲生，死去活来。因此，老百姓都骂傅祖光为"傅阎王"。

段德昌组织起百人游击队后，决定杀掉傅祖光，搞年关暴动。大年三十这天晚上，傅祖光正杀鸡宰羊，治觞祭祖之际，段德昌同赤卫队副队长戴补天带领赤卫队悄悄来到了涂郭巷，趁护院的兵丁们酒足酣睡之机，冲进了涂郭巷，杀死了傅祖光。段德昌用布沾着傅祖光的血，在墙上写下"杀人者，赤卫队也"几个大字。随及解放了涂郭巷，立时，又有不少穷苦百姓加人游击队中。这当儿，贺龙、周逸群等在石首、监利组织年关暴动。段德昌闻讯后，派戴补天去寻找。待戴补天找到后，贺龙、周逸群等已赴湘西，段德昌甚为憾事。此后，他带着公安赤卫队，一打华容、二攻杨厂、三打白龙，神出鬼没，昼伏夜出，把那些有血债的土豪劣绅，一个个地除掉。顿时，公安、华容一带的穷苦老百姓，都扬眉吐气，那些土豪劣绅，撞地嚎天。英雄们的举动，惊得夏斗寅大惊失色，1928 年 4 月，夏斗寅派了两团之兵，对赤卫队进行"围剿"。自此，赤卫队的活动一天天困难起来。这当儿，鄂西特委也遭到了破坏，特委书记张计绪等在沙市被捕。5 月 3 日，段德昌率赤卫队向石首县桃花山转移时，与"清剿"之敌军遭遇，伤亡很大，突围后仅剩下十九名队员了。段德昌带着这十九名队员，转移到孟家溪，又趁夜偷袭了孟家溪团防局，缴了团防局的二十条枪。之后，他采取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术，与敌周旋。赤卫队又渐扩到百十多人。在洪湖荷花怒放的时候，段德昌根据鄂西特委的指示，带队伍到了洪湖，与华容

彭国材领导的赤卫队汇合，成立了“洪湖赤卫队”。段德昌任大队长，彭国材为副大队长。

彭国材，湖北沔阳小沙口镇彭家湾人。世代打渔为生，因家境贫苦，无力读书，便充当沔阳城阖州学堂校役，半工半读。在校间，结识了刘绍南、邓赤中，刘、邓二人向彭国材推荐了许多革命书籍，致使彭国材向往革命。1926 年 3 月，彭国材与刘绍南一起，组织了沔南学生同乡会和沔南渔民同乡会，与城乡的土豪劣绅展开斗争。1926 年 5 月，由邓赤中、刘绍南介绍，彭国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国材便被任命为沔南区委副书记。同年 6 月，彭国材以他天才的组织能力，在洪湖组织了洪湖渔民协会，彭为会长。他带领着数千名渔民协会会员，同渔霸“西霸天”周传简，“南霸天”李生烂、“北霸天”张泽厚，以及洪湖上大小渔霸，展开了斗争。最后，扫掉了渔霸的威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到了 1927 年 3 月，洪湖内七十二村，村村建立了渔民协会，彭国材在渔民内威望极高。

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彭国材带一部分渔民协会干部、骨干，藏在了湖心曾家墩芦林内，自此，开始组织武装力量。这时候，西霸天周传简回到了监利，用五千大洋从夏斗寅处买了个监利县清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团防局团董，他的弟弟周麻子，也当上了常练队的中队长，兄弟二人回到周家湾和剅口以后，对渔协会进行了疯狂的阶级报复。仅周家湾一带，便有三百多渔协会会员和群众惨遭杀害。数百间房屋和船只被烧毁。周霸天在渔行重新开市那天，大摆筵席，冷笑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周氏门中没有草包，我要乾坤扭转，年光倒流！”彭国材便率领赤卫队员，利用九九重阳节，周传简发铳祭铳，强迫渔民下湖打鸭雁之机，将周传简处死，发动了群众暴动，暴动群众又涌到剅口，砸了剅口的清乡委员会。随后，彭国材又率暴动队伍，以雷轰电劈之势，奔三墩屋，枪毙了恶霸“湖天王”戴金荣。再到郭铺，处决了不法地主董本斋；到姚铺，杀了劣绅吴明振。在桐梓湖，火烧顽匪瞿云陶。随及，

鄂中特委在暴动的基础上，成立了水上游击队，彭国材为队长。游击队成立第一仗，便在三百条渔船配合之下，活捉了南霸天李生烂。贺龙、周逸群到洪湖时，彭国材把水上游击队交给了前委指挥。贺、周等人离开洪湖赴湘西后，肖仁鹄、吴仙洲两部都先后遭敌伏击，部队几乎打散，肖、吴二人均牺牲。彭国材部也被打散，他决计回洪湖重整队伍，但沿途到处都张贴着捉拿他的布告，彭国材便化装成卖牛的农民，在新沟嘴一带找到了被打散的三十多名游击队员。彭国材便将这三十余人带到了荒湖陈湾，稍事整编后，彭国材宣布了攻打新沟嘴敌人的决定。当时，三十余人，仅有一支手枪。如何取胜？彭国材思得一计，于夜晚将数千斤鱼投入新沟嘴镇西关帝庙旁的水塘。第二天一早，彭国材率三十名队员趁赶集之日，到了水塘边儿，下去捕鱼，此处乃是团防兵丁上下早操必经之处，那些团丁们见水塘中鱼如此之多，都纷纷放下枪，跳入水中摸鱼。彭国材和游击队员趁势夺得四十多条枪，自此，水上游击队又日渐强大。到了1928年的5月间，便已发展到一百五十余人。就在这时，鄂西特委命令段德昌和彭国材两支游击队合到了一起。

段德昌到洪湖与彭国材会合后，很快发现，游击队虽都是工农骨干，但缺乏训练，这样的队伍，在与强敌作战中，容易吃亏。于是，他将这两支队伍，五百来人，带了到洪湖中的一个荒岛之上，进行大练兵。这就是洪湖革命斗争史上的“段德昌荒岛大练兵”。这五百名骨干，到后来都成为红军最基本的军政干部。

贺闯将段德昌荒岛练兵的情况向周逸群讲过后，道：“我在这里当交通，接应出入湖中的往来人员。”

周逸群笑道：“你成了《水浒传》中梁山泊的朱贵了，专门接应各地的来往好汉。”

贺闯说：“今晚就歇在我这里吧，明早我把你送到荒岛上。”

二人又说了些旁话，便倒头睡下。

第二天一早，当洪湖中升腾着一层朝雾之时，二人跳上一叶小舟，贺闯用篙一点，这叶小舟滴溜溜地向湖心漂去。

荒岛坐落在湖泊之中，方圆不过二里，四面全是密密麻麻的芦苇，岛上面长满着茅草青蒿杂树，野鸟成群，狐兔乱窜。早先，这里也曾有人来过，传说岛上有巨蟒吞人，就没有敢住了。究竟是否有巨蟒？没人去考究，但这岛上一片荒凉，加之四周水中芦苇一望无际，就给人一种神秘和阴森之感。因此，这岛上极少来人。段德昌便选择了这样一个地方，训练洪湖赤卫队。这做法，足以说明他有将帅之才，鸿鹄之志。

周逸群到了岛上，由贺闯带路，穿过数重芦苇，又过几处滩头，早见一面大旗，迎风飘扬。上面写着"洪湖赤卫队"几个大字。大旗下面，一队赤卫队员，正练刺杀，一个个犹如猛虎下山，蛟龙出海。在这队伍的一旁，站着一人。

周逸群抬眼一瞅，只见那人长得白净面皮，剑眉虎目，周身上下透着一股英武之气。周逸群再仔细一看，不由得几步上前，紧紧地握住段德昌的双手，说："德昌同志，你好！"

段德昌望着眼前这位文静之人，先是一愣，接着便惊喜地说道："逸群，真没想到，你会来到这里。"

说来周段二人，系黄埔同学，在黄埔时彼此见过面，只是不甚熟。二人这里相会，都很激动。当下，二人促膝长谈，从黄埔谈到北伐，从南昌起义谈到湘鄂西再起。彼此对党内外问题的认识，英雄所见略同。周逸群夸奖段德昌岛上练兵做得对。段德昌说："这都是敌人逼出来的。"

当下，段德昌派人到湖上抓了几条大鱼，并亲自为周逸群做了红烧鲤鱼。饭后，段德昌将周逸群向队员们一一做了介绍。队员们听说周逸群来了，都欢喜无比。周逸群拉着李兆龙的手，激动得竟一时不知说甚是好。

这天晚上，周逸群、段德昌二人坐在湖边草地之中，拢了堆干

蒿，一边熏着蚊蝇，一边谈着洪湖地区革命斗争的形势，周逸群说："德昌，从地理位置上看，华容、公安、石首、江陵、监利、沔阳，处在长江和纵贯南北大铁路的交叉点，又横跨洪湖和洞庭两大水网地域，扼九省水路交通的枢纽，中原的咽喉，东可威胁武汉，西可控制宜沙，南可影响岳阳，所以，这洪湖地区革命形势至关重要。"

段德昌说："逸群，你说的很对呀，洪湖地区群众基础很好，只是党的各级组织破坏得很厉害。鄂中特委机关急需恢复，指导工作，你来了就好了，快把党的各级组织恢复起来吧。"

周逸群说："是要迅速恢复各级党组织，领导工农搞暴动。"他思考地问道："德昌，怎么恢复呢？"

段德昌说："把各县的县委负责同志召集一起，研究确定洪湖地区今后的工作方针。沙市的交通掌握着各县县委的接头地点。"

周逸群说："沙市的交通接头点谁清楚。"

段德昌说："李兆龙知道。"

周逸群说："好，那我和李兆龙去沙市，组织新的鄂中特委。"

段德昌说："你在这岛上休息一下再走。"

周逸群说："我们准备一下就出发。"

当下，周逸群在岛上又准备了几天，一个雨雾蒙蒙的早上，他同李兆龙一起，乘舟出了荒岛，又告别了贺闻，二人直奔沙市。

血染的报告

在沙市城中小南门里，有父子俩，靠焊锡壶、铝盆生活，一间小小的门市房内，摆满着破旧的锡灯蜡钎、铝盆等物件。老汉六十出头儿，名叫李焕文，儿子李如汉。这父子俩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这一天，周逸群经李兆龙带领，来到了这间门市房。李焕文正在焊锡壶，抬眼一瞅，见是李兆龙，身后还跟着一个人，又瞅瞅，这人没见

过，连忙起身出了门，左右看看，见无人注意，便把二人让到后屋里。李焕文对李兆龙说："兆龙，你好大的胆子，敌人到处贴告示抓你，你怎么又来沙市？"

李兆龙说："李老爹，干革命总不能不露面呀。"说着，一指周逸群，"这是周逸群同志。"

李焕文听了，上下打量了下周逸群，惊喜地说："逸群，早就听人说到你，你跟贺龙打了张烟灰、郭老七等，洪湖、宜沙两市都轰动了，敌人出十万大洋要你的头哩！"说着，拉过了凳子。

周逸群撩起长袍，坐下后说："大爹，你在这里，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兆龙都跟我讲了。"

李焕文一摆手："我老了，别的干不了，跑跑腿总还是可以的，有什么需要我干的事，你只管吩咐。"

李兆龙低声说："老爹，我们要在你这儿开会，都是沙市附近各县县委负责同志，五六个人。"

李焕文说："行啊。都哪几个县委？"

李兆龙便向李焕文做了番交待。

几天之后，洪湖和白露湖两地周围游击区内的石首、江陵、监利、沔阳、华容、公安几个县的县委负责人，都秘密地来到了李焕文的家中。有监利的马武、石首的屈春阳、公安的唐玉非，江陵的钱定生、沔阳的何金龙、宜昌的郑爔昌。周逸群了解了一下各县的情况，有人叹息，有人激昂。但都说敌人气焰嚣张，致使许多同志遇难，党团组织，农协组织，都遭严重破坏。特别鄂西特委遭敌人的破坏后，各县县委都失去了中心。对特委负责同志张计绪等人的牺牲，大家都很难过。周逸群听了大家的汇报后，当即宣布组织鄂西临时特委，经过大家的讨论，决定由周逸群为鄂西特委书记。随后，讨论了各县成立游击队，组织武装暴动的计划，暴动的目标是处决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以鼓舞民心，振奋士气。周逸群便将这会议情况，向湖北省委和中央详细写了报告，交李焕文的儿子李如意送到武汉

的省委。

这天早上，李如意走后不久，各县县委负责同志也都相继离开了，周逸群和李兆龙正准备动身到监利，组织监利的武装暴动，突然间，一队国民党的兵丁，围住了李家父子的住宅。周逸群、李兆龙一看，知道有了情况。这当儿，李焕文要周逸群、李兆龙速从旁门走脱。原来，李焕文李老爹为防意外，在屋内的墙壁处开了个洞，平时用柜子挡着，从外面看不出。当下，李老爹将柜子移开，要周逸群和李兆龙迅速逃走。周、李自然不干。这时候，门外兵丁用力撞门。时间已不许犹豫，李兆龙用力将李老爹和周逸群推进了洞，李兆龙刚刚把柜子放好，那些兵丁便冲了进来，见到李兆龙，不由分说，将李带走。周逸群在李焕文老爹的带领下，穿房门过小巷，脱离了虎口。李兆龙被国民党兵丁捉住后，当天夜里，便惨遭杀害。

那些兵丁为何围李老爹之门？原来，在散会之后，公安县委负责人唐玉非，在路上被敌人抓捕，又被叛徒认出。那唐玉非本是软蛋，还没等敌人拷问，便屈膝投降。供出了真情。敌人得知周逸群、李兆龙在沙市，立即派军警前往围抓，致使李兆龙牺牲。

周逸群同李焕文李老爹一起逃出虎口后，那小铺自然不能回了。二人又想到李如意尚不知此情，为使其免遭敌毒手，李老爹决定去武汉省委处，寻找李如意，并同周逸群约定了会面的地点。这个地点，便是沔阳排湖南岸的杨家场。当下，二人分手。

周逸群在李老爹走后，便向排湖杨家场走去。

排湖位于沔阳县的北部，东西横跨百余里，湖岸的百姓，多靠打鱼为生。在这排湖两岸，地主豪绅很多，所有土地、渔船、苇荡、差不多都被他们占领。因此，劳苦百姓的日子，十分艰难。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有共产党员何大旁、李西萍、孙锡武等人，由武汉来到了这排湖两岸，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暴动，结果，都遭到了失败。孙锡武全家均被杀害，何大旁、李西萍被敌活捉，还有许多革命群众，被敌挖心割胆。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排湖两岸。

周逸群这天到了杨家场，先到村头一家小酒店儿，同卖水酒的张老爹接上了头，当晚，张老爹便带着周逸群，乘坐一叶放鸭小舟，来到了湖边一片柴林，见到了游击队长何金龙。何金龙本是一渔民，因不忍渔霸压榨，跟着何大旁等共产党员一起，拉起了一支游击队。后来，何大旁等人牺牲了，何金龙便做了游击队的队长，游击队共六十多人。国民党兵将和团防在洪湖地区"围剿"时，这支游击队在村中不能立足，便躲进了排湖内的芦苇荡中。在这苇荡中，铺地盖天，吃野菜，啃树皮，烧鱼虾充饥。后来，这些地方也被敌人发觉，何金龙又带着这支游击队，躲进了柴林。这柴林有五六十里长，三、四十里宽。里面没有人家，到处荆棘丛生，野兽乱撞。

周逸群到这游击队时，时值夏日，烈日当顶。周逸群见队员们躲在闷热的柴林之中，一个个被蚊虫叮咬得皮破眼肿，满身青紫。个个瘦得皮儿包着骨头，有那生病的，走路都打晃儿。一看便知是吃粮不足。

队员们见周逸群来了，像是来了救星一般，都围了过来。周逸群见队员们身体这般差，便对何金龙说："金龙同志，我们不能只躲在这里，让饥饿和病魔帮敌人的忙。要组织群众，进行武装暴动，扩大红军的力量。"

何金龙抓着周逸群的双臂说："你来了，就好了，咱们这队伍有主心骨儿了。"

当下，周逸群召集了骨干开了个会，他了解了一下排湖两岸的社会情况，最后，大家决定首先端掉彭家墩的彭霸天彭水光。

彭霸天的家在彭家墩，他的宅子修的是高墙大院，养着护院的兵丁，宅子四角都筑有碉楼，一般人难以接近。何金龙也曾想过攻打彭霸天，可总觉得力量单薄，不是彭霸天的对手，所以一直没敢动手。如今，见周逸群提出要攻打彭家墩，虽然内心中不大乐意，知道游击队力量不足，但由于周逸群是临时特委书记，打过大仗，见过世面，所以，没敢阻挡。这天夜里，周逸群、何金龙便带着游击队，

到了彭家墩，要夜袭彭家墩，活捉彭霸天。结果如何？游击队还没接近彭霸天大院，便与护院的兵丁接了火。游击队只有一些破枪，哪里是那些兵丁的对手？这一仗，游击队员损伤过半，何金龙也中弹牺牲。队伍退到柴林后，队员们情绪很低落，周逸群也非常难过。一天没吃东西。他暗暗地检讨自己："这种暴动形式是不是有问题？"时隔不久，各县暴动失败的消息一个接一个地断断续续地传了过来，又有许多好同志牺牲。石首县委的几名同志组织群众暴动，由于四周均是白色恐怖，群众看不到发展的前程，结果动员不起来。县委这几名同志，又怕上级说他们是机会主义，不敢放弃暴动，只好自己去干，仅凭三把驳壳枪，去攻打敌人，结果六名同志牺牲了一半儿。

一个又一个的沉痛教训，使周逸群由悲愤难过到冷静。周逸群想："为什么暴动都失败了，难道是因为敌人强大么？"这一天，李焕文大爹来了，李大爹又带来了李如意牺牲的消息。原来，李如意将鄂西临时特委的报告送到武汉地下省委后，在回来的途中，遇到了叛徒，当即被捕，押到了湖北省清乡督办，被敌人严刑拷打后，遭到了杀害。省委对鄂中临时特委的指示，均落敌人手中。

暴动连续不断的惨败，使周逸群感到中共中央路线上不对头，他决心做个调查，而后赴上海，向中共中央做个汇报，一方面取得中央的指示精神，一方面汇报自己对中央关于暴动的指示的看法。当下，周逸群到了监利各乡，暗暗地对群众的现状，敌情、社情、经济等等方面，进行了了解和调查。

这天，周逸群正在监利县李家湾渔民张志仁家，向张志仁了解渔民的情况，李焕文来到了这里，告诉他，说省委派人来了，要见他，接头地点在宜昌城中万家药铺，周逸群听说省里来了人，顿时喜出望外，立即乘船来到了宜昌。

在宜昌城东关的万家药铺里，周逸群同万涛会了面。万涛带来了省委的两份文件。这两份文件，一是湖北省委对周逸群报告的批

复，同意成立鄂西特委，由周逸群任书记、万涛任副书记，另一份文件是中央致湖北省委并转鄂西临时特委的指示信。信中对由李如意送去的那份鄂西临时特委的报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批评周逸群把暴动重点放在了洪湖地区广大农村，不放在城市，说这种做法和认识，是否认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领导，是要把共产党变成小资产阶级的农民党。信中要周逸群迅速转变这种观点。

周逸群看罢中央的指示后，半天没有说话。万涛见周逸群面色很难看，不由得问道："逸群，心里有什么不快的事么？"

周逸群拉万涛坐了下来，长叹一声说："中央这样的指示，不能执行啊，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不都失败了么？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城市暴动，也不都失败了么？多少好同志牺牲了？中央要我们搞城市暴动，据我了解到的情况，莫说城市，便是农村，也不宜搞暴动了，要做实实在在的工作才行啊。若再搞下去……"周逸群微微摇下头："若再搞暴动，后果难以设想。"

万涛说："工人阶级有着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俄国十月革命，就是在城市武装起义后才取得胜利的。"

周逸群说："我们的情况，与俄国不同，我们国家的工业很弱，工人同农民比，农民是主力军。我来鄂西三个月了，不要说城市，就在农村的几个县内，暴动也都失败了。"周逸群深情地对万涛说："万涛，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中存在着盲动主义。"

万涛想了想说："逸群，中央的指示，我们不能不贯彻，不能不执行啊。"

周逸群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万涛，我要去中央，反映意见。"

万涛同意。当下，周逸群便起身赴上海。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一幢二层楼内，他见到了周恩来。两位战友虽说分别仅数月，却如隔三秋。周恩来拉着周逸群坐下，说："快谈谈下边的情况。"

周逸群点了一支烟，之后，便把他同贺龙一起到武汉，暴动未

成，又到反嘴遇见贺锦斋，举行年关暴动，焦山河会议，去桑植路上“过五关斩六将”，到洪家关后拉起的队伍被敌打垮，自己回洪湖，荒岛上遇段德昌，在沙市召开各县县委负责同志开会，组成鄂西临时特委，彭家墩除霸失败，监利各乡的调查，宜昌城中万家药铺会万涛。见到了中央指示，只身来到上海，要向中央汇报自己的看法、想法的情况，一一述说，周逸群把这些经过说完后，周恩来亲切地对周逸群说："逸群，你们受苦了。"他给周逸群倒了杯水说："逸群，你的想法、看法是正确的。"

周逸群接过周恩来递过来的水，喝了一口，继续说："恩来，经我了解，自桂系军阀占了两湖之后，数次派兵'清剿'，洪湖地区内许多县的军事组织，已完全瓦解，许多游击队员把枪埋了，沔阳的游击队也躲进了柴林，只有段德昌领导的一支数百人的游击队，还在荒岛上练兵。这洪湖地区内，没有高山掩护，交通便利，敌人调兵遣将容易。大革命失败后，敌人在洪湖地区实行了白色恐怖，群众的革命情绪被压了下去。叛徒、特务、奸细活动得很凶。洪湖地区各县的游击队员，都是渔民、农民。农民的意识很浓厚，掌握政策水平很低，对土豪劣绅，一概烧杀。"周逸群停了下又说："在桂系军阀部队未到洪湖地区时，国民党大小军阀只顾争夺地盘，腾不出手来为豪绅屠杀民众。豪绅地主的自身，也没有很强的力量可以对付我们，在这个时期，只有我们向豪绅地主进攻。桂系军阀统治了湖北，实行了屠杀政策。沙市以下划入鄂中清乡区，以桂系18军严敬部驻防，沙市以上为鄂西清乡区，以独立5师刘和鼎部驻防。另又以马文德为施鹤清乡司令。这么一来，那些豪绅地主又凶相毕露。无处不组织保安团、清乡队。城市均实行"十家连"制，互相监视。豪绅地主的武装均分为两种，一是保安队，也叫保商队，这在各重要城镇都有，这是商人们豢养的。二是保安团，是在清乡中地主豪绅组织起来的。开始彼此并无联系，现监利已将全县保安团完全集中编为几个清乡队，统一指挥。江陵、石首等许多县也都仿照。"周逸

群稍停一下，又说："在经济方面，鄂西的农村，今年是旱灾，许多地方仅有两三成。公安、石首、监利一带，也不过六、七成，荆门、宜昌各县的农民，相率外出逃荒，哀鸣遍野，农村经济的破产，影响到了城市，许多小商店闭门停业。金融异常混乱，如今除宜昌外，各地的币票已不能兑现，就是宜昌，也低落到六折。反动政府的收入，唯一的是靠苛捐杂税。什么二五税、禁烟税、烟酒税、印花税、井捐、团捐、门牌捐、灯捐、花捐、屠宰税、筵席捐……"周逸群一摆手："真是有名皆捐，无物不税，农村中还有枪捐，田亩捐等等，目前防军增多，民众负担还要加重。"周逸群站起身说："工农已被逼迫得无路可走了。工人方面，工资太低无法维持生活，大批失业者找不到工作。农民方面，一是天旱欠收没饭吃，二是苛捐杂税繁多，三是豪绅地主的压迫，四是清乡团、铲共队的骚扰，五是战时拉夫，尤其是桂系军队，拉夫尤为厉害，六是豪绅地主强迫农民放哨守夜。"说到这儿，周逸群双眉高挑，说："恩来，工农的痛苦已到极点，一腔怒火被白色恐怖笼罩着。但各地的党组织，多残破不整，有的名存实亡，有的没有力量去领导，有的虽然组织了暴动，由于群众没有真正发动起来，都以失败而结束。"周逸群目光恳切地望着周恩来说："恩来，中央指示我们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组织城市暴动，我们鄂西特委的同志都感到目前组织城市暴动不妥，应当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扎扎实实地在农村中发动群众，扩大游击区，扩大武装力量，健全党团及各种群众组织。"

周恩来怀着极大的兴趣，听完了周逸群的汇报，他赞扬地说："逸群同志，你们为党受了磨难，了解到了工农中真实的情况。"

周逸群说："受些苦累不打紧，只是……"

周恩来打断他的话，说："只是怕中央的指示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对不？"

周逸群点点头。周恩来说："逸群，你刚才谈的意见是对的，南昌暴动以来，我们又组织了广州暴动等大大小小的城市暴动，结果

都失败了。在农村，暴动也遭到了失败。血的教训，使我们要深刻检查中央的路线和方针。”周恩来又说：“鄂西湘西的实际情况我不十分明了，但从你介绍的情况来看，农村中的矛盾与阶级斗争，更为激烈。在原则上，游击战争，应该是党与群众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发展。你回去之后，可派人告诉贺龙，要他在发展革命武装中，注意这个原则。”

当下，周恩来把全国的斗争形势，朱德、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情况说了一遍。周逸群听着很兴奋，将这些话，一一的记在了心中。正是周恩来同志的这次谈话，坚定周逸群依据洪湖地区实际情况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心。后来，周逸群才知道，周恩来同他的这次谈话，成了 1929 年 3 月 17 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贺龙同志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的基本思想。

周逸群告别了周恩来，满怀喜悦之情离开了上海，回到了洪湖，在石首县的调关，与万涛、段德昌会面。

洪湖赤卫队

周逸群与段德昌、万涛于调关会面后，又来到了剅口。剅口这个地方，三面是水，芦苇丛生，只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道儿可以进出，恰似水泊梁山一般。那些清乡队、保安团，从来不敢在这里过夜。在这剅口旁边，还有个叫三屋墩的地方。在这里，周逸群又见到了彭国材、段玉林、贺闯等。他把赴上海见到周恩来的经过和周恩来的指示，向大家做了传达。之后，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和洪湖的实际，将段德昌的游击队、屈春阳的游击队、彭国材的游击队都拉到了三屋墩，进行了整编。在游击队里，建立了党团组织，清除了不纯分子，决定停止盲目的暴动，发动群众，利用洪湖的水泊网地，开展机智灵活的游击战争。游击队改为“洪湖赤卫队”，周逸群任队

长，段德昌任参谋长。这次整编，就是洪湖革命史上有名的“三屋墩整编”。

洪湖赤卫队成立之后，周逸群、万涛又在剅口召开了各县县委书记会议，纠正了那些不顾客观实际条件的盲目暴动行为。要求领导同志在实际工作中采取认真深入农村，深入群众，进行艰苦的隐蔽斗争。恢复秘密的党团及群众组织，抓住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如解决灾荒带来的痛苦，减免苛捐杂税，等等，发动带政治性的经济斗争。从斗争中锻炼群众，为发展游击队和开辟根据地创造有利的条件。

自此之后，鄂西地区，就停止了盲目暴动，党员们在合法的职业掩护下，展开了秘密的工作。以一串十、十串百的方式，由点到面，逐渐发展党的队伍。建立秘密的农协会、妇女会、少先队等组织。各县的游击队也改变了活动方式，队员们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时而分散，时而集中，配合群众斗争，用秘密方式镇压个别罪恶昭彰的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打击敌人的凶恶气焰。当敌人大举“清乡”时，则采取“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的游击战术，利用有利的地形和群众条件，或隐蔽，或神出鬼没地突击敌人，以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力量。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洪湖地区的革命力量，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依然稳步地发展起来。到了 1929 年 3 月春回大地之际，洪湖地区二十三个县，党的组织都初步恢复，建立了一批秘密的农协会，扩大了游击队。在监利、华容、石首、江陵、沔阳、公安各县内，相继地出现了若干小块根据地。段德昌率领着洪湖赤卫队，先后袭击了马家寨、观音寺、岑河口等十几处团防，赤卫队人数也扩大到数百人。由于赤卫队员经过荒岛训练和三屋墩整顿，战斗力很强，几仗之后，那些团防们听到赤卫队的名字，无不胆颤心惊。

就在这当儿，在这两湖之地，发生了蒋桂之战。在敌人无力对付革命武装力量之前，洪湖地区的革命力量得以迅速壮大，当桂系

军阀撤出鄂西之后，蒋介石的军队来到之前，周逸群、段德昌指挥着洪湖赤卫队在群众基础好的石首、监利、沔阳三县，发动了攻击，把各乡镇的团防一扫而光，十七天内作战二十一次，均大获全胜，只吓得那些土豪劣绅，一个个都龟缩在县城和大村镇内，叫苦不迭。

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洪湖赤卫队获得了相当的发展。人数增加到上千人，遂编成了 3 个大队，1 大队队长彭国材、2 大队队长贺闯、3 大队队长段玉林。周逸群仍为总队长、段德昌为参谋长。周、段二人又依照井冈山朱、毛建军的经验，在总队设了政治部，在中队设了党代表和士兵委员会。洪湖赤卫队经过整顿后，士气高涨，连续攻下了古丈堤、天心洲、新厂等地，使根据地日益扩大。

时蒋介石下令 50 师师长谭道源率其部赴洪湖“围剿”赤卫队。谭道源选择了吉日，率全师人马由武汉抵沙市。而后，开进洪湖，要与赤卫队决一死战。而赤卫队的战术是你来我走，瞅冷子打一下，咬几口又溜了。转眼三个多月过去，谭道源不但没抓住赤卫队，他的兵丁倒死了不少。蒋介石遂又增派了 34 师岳维峻部。

时洪湖赤卫队二中队副队长王金标为彭霸天收买，使二中队遭到了敌人袭击，二百多名队员，仅数人幸免。队长、洪湖红五子贺闯的头被割下游街示众。

洪湖赤卫队遭此重大损失，湖区的老百姓情绪又低落下来，赤卫队员中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动摇了。觉得还是国军的势大，于是，有些人悄悄的挂枪逃走。

面对此情，段德昌对周逸群说：“逸群，敌人的气焰如此嚣张，我们要狠狠地打他一下，以鼓舞群众，压敌凶威。”

周逸群说：“是要打，只是不可现在打，现在敌人正为抓不住我们而焦急，谭、岳两敌连同民团加在一起，兵力多我十数倍，我当避其锐气，待他麻痹之时，乘其不备，寻其弱处，狠狠地打他一下。”

就这样，尽管敌人无论怎样在洪湖中横冲直撞，周、段只是按

兵不动，率队员密藏于百里苇荡之中，并令人传出了话，说赤卫队头头周逸群、段德昌慑于岳、谭大军之威，已从洪湖地区逃走。

这消息三传两传的就传到了彭霸天耳内。彭霸天好不得意。一晃数月过去，眼看就要过年了，这天，彭老三坐在彭霸天的身边，说起洪湖赤卫队数月没了踪影的话，彭霸天手中转着保定府的铁球，哈哈大笑道："周、段乃无名鼠辈。只能吓唬常人，爷略施小计，就让他们胆裂魂飞。"说罢，信口吟诗道："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念罢，哈哈大笑道："三头。"

彭老三赶紧起身答道："爷有何吩咐？"

彭霸天把右手一扬："下请帖，请岳、谭二位师长到八仙楼赴宴，过腊月二十三的小年儿。"

彭老三答应着，刚要走，有人急急进来，向彭霸天报告说："大爷，岳、谭二位师长来了。"

彭霸天一听，赶紧整衣冠出迎。这时节，谭道源、岳维峻已进了中门。彭霸天赶紧举手作揖道："正要派人去恭请二位师长，没想到二位师长亲登寒舍，万望恕罪。"

岳维峻笑道："我们是给彭兄贺喜来了，经何成浚何省长批准，彭兄为监、石、公、沔、江五县清乡司令，自此，五县团防，均归彭兄辖管。"

彭霸天继续作揖，满脸是笑的道："多蒙二位提携，此恩小可永世不忘。"说罢，彭霸天将谭、岳二人让到客厅之中。宾主落坐之后，有人献茶。彭霸天继续说道："小可在八仙楼备一便肴，正要派人去请二位师长光临。"说着，彭霸天一扬手："来人那！"

彭霸天的话音儿没落，进来了两个人，每个人手中托着一个铜盘儿，上面各放着十根金条。彭霸天指着金条笑道："二位师长为'剿赤匪'，日夜辛劳，奈荒野之处，没甚物产。这些微礼，算是小可一点心意。启望笑纳。"

谭、岳二人都是见钱眼开之主，如今见了金条，哪有不高兴的？

遂说道："我等来洪湖，已烦彭兄处不少，哪能再受此厚礼？"

彭霸天把手一摇，说："二位师长怎说此话，如若不是二位师长剿匪有功，赤匪哪能胆裂魂飞？小可还要给二位师长树功德碑。二位师长凯旋之日，小可要洪湖百姓，为二位师长送万民伞呢。"

当下，岳、潭二人又略一推辞，便收下了这些礼物。之后，彭霸天和岳维峻、谭道源三人在随从马弁呼拥之下，直奔八仙楼。这天正是集日，彭家墩街里街外人很多。卖货的，买货的，乱烘烘的。三人来到了街上。见一卖唱的，唱得都是吉利词儿，谭、岳二人听了后，都很高兴，岳维峻顺手把一块光洋扔给了卖唱的。于是又往前走，见一堆人围着一个汉子，不住的喝彩，虽是腊月天气，那汉子却赤身露臂，手舞双刀，正耍到热闹之处，只见刀光，不见人影儿。三人看得呆了，岳维峻夸奖说："这人身手不凡，做个保镖的一定合适。"

岳维峻三人正往八仙楼行走时，街心突然响了一枪，顿时街里一阵大乱。赶场人纷纷四窜。彭、岳、谭三人不知发生了何事，正打愣儿张望时，只见一个舞刀卖艺的大汉，一步窜到了彭霸天眼前，手起刀落，彭霸天便身首异处。随及又一刀，向谭道源砍去，谭道源头一歪，那刀顺他左肩劈下，将他左臂砍伤。岳维峻见此状，拔枪要射。就在这时，他身后一赶场之人，抽刀便朝其砍去。岳维峻头一歪，右耳朵被削去半块。谭、岳知道事情不好，慌忙逃走。

彭、谭、岳三人到街上转悠，难道没有随从保护么？这三人均有随从，只因在彭家墩，都想到不会出事，所以几名马弁都四下看热闹了，等到枪响出了事儿，这些马弁还没等动手，都被赶场的人给收拾了。

这工夫，彭家墩街面上可就大乱了，枪声喊声乱成了一锅粥。保卫团也都出动了，可满街里跑的都是赶场之人，到哪里去抓赤匪？不一会儿，只见一股浓烟直冲天际，原来是彭霸天的房子着了火。

大火越烧越旺，只把个彭霸天的一大片房子都烧着了。彭家墩百姓早已对彭霸天恨之入骨，谁还去救火？彭霸天手下之人，见彭霸天已死，也都趁火烧鱼，把彭霸天平日积攒的财宝，抢了不少。彭霸天的宅院很大，到了晚上，那火烧得更欢了，真是火烧连营一般，直直的映红了半趟街。这工夫，谭道源的一个团得到了信儿，飞跑来彭家墩救火，这些兵丁一到，立时挑来了水，大桶小桶地往火上泼。说来也怪，那火不但不灭，反到越烧越旺，连那救火的兵丁也烧伤了许多。到了半夜时分，突然一阵狂风刮来，只见那大火之中，腾起了一条火龙，那火龙张牙舞爪的直奔那救火的兵丁，把那些兵丁烧得抱头鼠窜，边跑边喊："不好了，火龙来了，火龙来了。"有那些跑的慢的被火活活地烧死。

这大火直直地烧了一天一夜，把个彭霸天的一大片宅院，烧了个片瓦无存。这下子，把洪湖的老百姓都震了。纷纷传说赤卫队里有一条火龙，后来，又传出这火龙是赤卫队参谋长段德昌。原由是有人在彭家墩街上看见他卖艺，刀劈了彭霸天，砍伤了谭道源。后来，施法术烧了彭霸天住宅，半夜时，显了火龙的真形，又烧跑谭道源的兵丁。自此，在洪湖便传出了段德昌是"火龙将军"之说。

消灭彭霸天，是赤卫队很早就有的计划。在贺闯等牺牲后，周逸群、段德昌放出风声，说赤卫队头头惧敌逃跑，以此麻痹敌人，暗中却观察着时机，在腊月二十三的头几天，有内线送来信儿，说八仙楼派人到汉口办菜，彭霸天要在二十三祭灶这天，宴请谭道源和岳维峻赴宴。周、段二人知晓后，齐认为这是消灭彭霸天的极好机会，于是，二人便布置了赤卫队员化装成赶场之人，进了彭家墩，段德昌化装成卖艺的，周逸群化装成卖字的。他们原计划在八仙楼动手，谁知那谭、岳三人却逛开了大街。队员们便趁势动了手，砍死彭霸天，砍伤谭道源和岳维峻。

洪湖赤卫队经过这一仗，又威名大振。随后，周、段二人，又率队攻下三官殿、杨树峰、谢家口等地。这工夫，蒋、冯、阎三军阀又酝

酿着一场新的大战，蒋介石为准备这场战斗，急忙忙地将谭、岳两部从洪湖抽走、只留下了岳维峻两个营，这两营兵力怎能与赤卫队交手？便龟缩在大镇子里，再不敢胡作非为。这样一来，洪湖赤卫队又活跃在洪湖广大地区，拔掉了洪湖内许多点，使得赤卫队越发壮大。到了1929年11月，在监利、沔阳、石首等八县内，根据地已联成了一片。

战将邝继勋

鄂西特委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干部和党员的政治水平，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夺取新的胜利，于1929年12月间，在石首县的袁家铺子，召开了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三十五人，代表十二个县的四千多名党员，此外还有旁听代表五十人，湖北省委亦派代表出席指导了大会。会议之前，周、段等鄂西特委领导同志根据中共"六大"和六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洪湖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各项工作进行了讨论，提出了各项决议的草案。会上，大会主席团发扬民主，鼓励代表积极总结经验，批评缺点和错误，并组织代表们参加了石首召开的两次群众集会，以便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交流经验，开好大会。大会对武装斗争、土地革命、苏维埃政权建设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通过了《关于鄂西党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等十二个文件，选出了新的特委领导成员。代表大会对职工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经济工作、兵变问题、宣传鼓动工作都进行了总结。会议决议规定了四个中心县委，即：宜昌、荆门、南县、监利四县，划分了六个巡视区，即：石首、监利、沔阳三县为第一巡视区；荆门、钟祥、潜江、京山、天门、当阳六区为第二巡视区；巴东、兴山、秭归、长阳、五峰、远安六县为第三巡视区；松滋、枝江、宜都为第四巡视区；公安、宜昌、沙市、江

陵为特别区域；南县、华容、安乡为第五巡视区。代表大会根据省委的提名，选举了七名正式委员，两名后补委员，组成了新的特委领导机关。之后，即召开了二届一次特委会。决定由周逸群、众鸣、文化三人组成常委会。周逸群为书记、众鸣为组织部长、文化为宣传部长。为加强鄂西特委和武装力量的领导，中共中央又派了王一鸣、周荣光、周小康等人来到了洪湖。

鄂西党"二大"之后，特委为建立"数县联合政权"的任务，进行了紧张的工作，这时候，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将洪湖赤卫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1师，此时，洪湖赤卫队已发展至五千余人。独立1师下辖三个纵队。师长段德昌，监利、沔阳的红军为1纵队，纵队司令王一鸣，下辖两个大队，有步枪四百余支，连枪二百余支，花机枪两架。石首红军为第2纵队，纵队司令段玉林，下辖两个大队，步枪三百余支，连枪八十余支，花机关枪三架。第3纵队时正筹建，拟由长阳、荆门、钟祥、江陵的红军组成。

1、2两个纵队成立之后，立即分别在监利、沔阳和江陵、石首两地区打击敌人，消灭各种反动势力。使得各方反动势力纷纷逃窜，形势对红军极为有利。

就在此时，湖北省委指示红1师向汉川、汉阳推进，以进攻武汉。时1纵队接到省委的指示后，立即执行。并派人通知2纵队向洪湖集中。

虽然此时蒋冯阎大战正在酝酿，但武汉乃是军事重地，敌人大军云集，红1师若去攻打武汉，无异于以卵击石，必然吃亏无疑。湖北省委的这个指示，分明是错误的，是过高地估计了红1师的力量。就在1纵队做向汉阳推进的准备、2纵队向洪湖靠近的时候，中共中央军事部巡视员柳直荀到达了洪湖。柳直荀听了周逸群和段德昌的汇报，周、段二人齐呼此时攻打汉阳不妥，柳直荀当即以巡视员的身份，取消红1师攻打汉阳的计划，督令2纵队至洪湖与1纵会师。段玉林接到柳直荀的信后，立即带2纵队自石首出发，

先收编熊家河常练队一个中队，继又攻取了普济观和沙岗，获枪五十余支。1930年2月5日，第1、2纵队在监利县的汪家桥胜利会师。

会师后，鄂西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宣布独立1师升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军长孙德清、政委周逸群、副军长段德昌、参谋长许光达。由于孙德清病重不能赴任，遂由邝继勋担任军长职，邝继勋即和许光达同至洪湖苏区。红6军下辖三个纵队，1纵队司令段德昌兼任，政委王鹤；2纵队司令段玉林，政委周荣光；3纵队正在组建。红6军到此时已发展到七千余人。又组成了新的前委，委员七人，候补委员三人。委员之中，除有周逸群、段德昌、孙德清、段玉林、许光达等军政领导同志外，还有两名士兵，一名叫张传贤，一名叫徐昌贤。改组后的前委，又整顿了军内的党组织。此时，1纵队有党员六十余人，遂成立了三个支部，二十个党小组，2纵队有党员七十余人，遂成立了三个支部，九个党小组。各纵队设政治部，配备政委和指导员，发挥士兵委员会的积极作用，发扬政治、经济和军事民主。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严禁肉刑，官兵间均以"同志"或"指挥员"、"炊事员"等相称。经济平等，帐目公开。这样，尽管红6军给养困难重重，士兵们生活不好，但也没有怨言。此时的红6军，已形成一支由群众斗争中生长出来的、没有旧式军队中旧习惯的、有阶级觉悟的、能吃苦耐劳的工农武装力量。

这里把孙德清、邝继勋、许光达三人情况略做介绍。

孙德清又名孙一中，安徽寿县人，黄埔一期毕业。中国共产党党员。北伐时在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李汉魂25师75团任营长。南昌起义时，孙德清将75团骨干力量带走，参加了南昌起义。之后，75团编入了25师内。起义军南下到三河坝。在三河坝激战中，75团紧守笔支尾山，孙德清负了重伤。后经当地农协会员救护，得以脱身，又辗转到了上海。到上海后，时国民党皖系33军柏文蔚要办学兵团，扩充自己的势力，中共中央军委了解此情，便派孙德清到

了安徽。孙德清同柏文蔚系同乡同学，交情很深。孙德清到了安徽，柏文蔚不晓得孙德清是共产党员，知孙德清组织能力、军事素养很强，很是高兴，便委孙德清为学兵团团长。孙便趁此机会安排了南昌起义失败后流散的共产党员到学兵团工作，这当儿，75团11连连长许光达、参谋廖运周，便一起来到了学兵团。许光达又名许德华，湖南长沙县东乡萝卜冲人，出身贫寒。光达自幼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新生第2团，攻读炮兵。1927年5月，宁汉分裂，夏斗寅部在鄂西叛乱，攻打武汉，军校学生奉命改编为中央独立师，师长为叶挺。许光达遂随叶挺讨伐夏斗寅。到了7月，武汉政治形势逆转，政局动荡，军校将5期草草毕业，许光达被分配到张发奎第4军直属炮兵营任见习排长。不久，东征讨蒋。许光达随4军移防九江。南昌起义时，许光达正在九江。这时候，张发奎发令，凡信奉共产主义者，三日内离开他的部队。于是，许光达便同几名党员，一起秘密离开九江。时南浔铁路中断，许等徒步南下，翻庐山，过赣水，到南昌时，起义部队早已撤离南下。许光达等继续南下追赶。途与匪遭遇，钱物皆被掠一空。虽如此然其志不移。又往前追赶。在宁都，赶上了起义部队后卫25师，许光达便被编入了25师孙德清团3营11排，任排长之职。起义部队至汀州时，11连连长李逸虹他调，许升为11连连长。三河坝激战中，许光达身负重伤，留在了大埔北廿里的茂之前村养伤，一月后，从潮汕登一货轮，于11月底到达上海。许光达在上海正无着时，忽听到孙德清在安徽办学兵团，便同廖运周一起，赶到安徽寿县学兵团驻地，孙德清见是许、廖二人，自然很是高兴。

由于孙德清工作策略上的失误，活动被人发觉。柏文蔚得知孙德清以学兵团之名，暗收共产党员，大怒，亲赴寿县，要逮捕孙德清、许光达等人。孙等诸党员闻讯只得连夜出走，途中，彼此走散。自此，许光达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他更名许泛舟，决定北上找党。经北平到了唐山，在唐山矿上以挖煤为生。四处寻觅，到处找

不到党组织，数月之后，许光达又南下找党。历经周折，直到1929年7月，才在上海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并见到了孙德清。红6军成立时，中共中央军委便派二人赴洪湖，并任命孙德清为红6军军长。二人正要起身之时，孙德清突然患病，且病势沉重。中央便派了邝继勋为6军军长，许光达便同邝继勋一起到了洪湖。

邝继勋（有写旷继勋的——作者注）是怎样一个人？邝继勋，号集成，贵州思南人，出身贫寒。父为串乡卖药郎中。因家境艰难，继勋少时只读两三年私塾就帮家中谋生活。因而继勋深知穷人的苦难。辛亥风云时，随友人入川，投川军赖心辉部下当兵。因作战有勇有谋，三年之中，便升任为营长。时“五四”运动起，邝继勋为进步思潮所感染。虽身在军阀队伍内，亦不受其影响。1925年，邝继勋所在旅归四川督理杨森指挥。后杨森为邓锡侯、田颂尧、刘文辉、刘湘的联军击败，邝继勋部又被编为邓锡侯的江防军，邝任团长，驻防彭县一带。邝继勋旅旅长刘丹五，是国民党左派，很支持邝的革命活动。当部队驻彭县时，邝继勋的好友王文鼎从武汉归来，邝从王的口中，得知广东有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邝继勋很是高兴，也在全旅内发起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四川分会”，又派人赴广东与共产党接头。这样，中国共产党便派了曾经赴法勤工俭学并留过苏的共产党员秦青川到达邝部，邝继勋见到秦青川，异常高兴，二人促膝相谈，十分投机，只恨相见之晚。秦青川自此留邝部工作。1926年底，经秦青川、王文鼎介绍，邝继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四·一二”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后，一些意志薄弱者，脱离了共产党，而邝继勋在这白色恐怖面前，却更加坚定沉着。用他的身份，保护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928年秋天，四川军阀邓锡侯、田颂尧、杨子惠组成了“四川同盟军”，攻打盘踞于川东的刘湘。那邓锡侯便派了邝继勋的第7混成旅下川东作战。第7旅下川东后，旅长刘丹五便把旅长职务交给了邝继勋代理，自己回了成都，自此称病不起。刘丹五走时，对手下人说：“人情

送到底，随集成去搞吧。”从此，第7混成旅便由邝继勋为代旅长。1929年6月29日邝继勋率第7混成旅四千多官兵，在蓬溪牛角沟举行起义，树起了“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1路军”大旗。邝继勋为总指挥，罗世文为党代表，起义军震动了全川军阀。邓、田、刘诸军阀一起向起义军反扑，双方发生了激战。邝继勋身先士卒，率全旅官转战于南充、营山、梁县、达县，梁平诸县之间，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在梁平县虎城场、猫儿寨地区，遭敌前后夹击而失败。此后，邝继勋便只身来到了上海，中共中央准备要他去苏联学习，因他能双手打枪，且百发百中，便让他临时参加了“打狗队”。前文述过，“打狗也叫“红队”，是专门收拾叛徒的。邝继勋在打狗队里，打死了叛徒、铲共委员会主任白鑫，打伤了青帮头子黄金荣，吓得黄金荣连连写信给共产党机关，表示从此井水不犯河水。到了1929年12月，红6军成立时，孙德清因重病不能到职，中共中央军委便派了邝继勋赴洪湖任红6军军长。邝继勋便同许光达一起，到了监利县王家桥红6军军部。对邝、许二人的到来，周逸群、段德昌等人，自是高兴异常，不必多述。

洪湖水浪打浪

红6军成立之后，又加上中央派来了十数名能干的将领，顿时力量大增。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红6军移师新观寺，召开了纪念“二七”罢工的万人大会，誓师出征。1930年2月上中旬，顺利攻取龙湾、熊口、老新口、张金河等重要集镇。接着，又攻克了监利北部重镇新沟嘴和沔阳的渔洋镇，至此，江陵、石首、监利、潜江、沔阳诸县大体上联成了一片，那千顷波涛之中，飘起了激荡人心的歌声：

洪湖水哟！浪呀么浪打浪呀，
洪湖岸边是呀么是家乡啊，
清早儿，船儿，去呀么去撒网，
晚上，回来鱼满仓啊——
四处野鸭和菱藕，
秋收满畈稻谷香，
人人都说天堂美，
怎比我洪湖鱼米乡。

洪湖水呀，长呀么长又长啊，
太阳一出闪呀么闪金光啊，
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
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

国民党湖北省主席、清乡督办何成浚，闻知红军在洪湖势力大，一面申报南京，一面调兵遣将赴洪湖"围剿"。国民党第三编遣区主任刘峙，急令夏斗寅部再赴洪湖"剿赤"。但是，这时候，蒋冯阎大战酝酿正急，夏斗寅部也只能抽出两团人马。两团之兵如何能抵抗红军？红 6 军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于 1930 年 2 月下旬，集重兵夺取了潜江城，俘敌警察局长、教育局长及土劣多人。3 月初，西进再克郝穴，击败夏斗寅部两个营。中旬，段德昌亲率主力一部，再克观音寺，直逼沙市城。沙市之敌畏红 6 军之势，龟缩城中，不敢越雷池一步。随及，红 6 军又挥师南下，先后攻克长江南岸的重镇藕池、调弦口、石首城，缴获枪六百余支。此时红军声威，震慑了洪湖地区敌胆。大小土劣，纷纷逃窜。群众的革命斗争情绪，迅速高涨。1930 年 4 月初，鄂西特委在石首的调弦口，召开了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五县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西苏维埃五县联县政府，选举了周逸群等人组成主席团，周逸群任主席。五县联县政府成立之后，各县、区、乡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总工会、妇

女会、少先队、儿童团、赤卫队等等群众团体、群众武装，都得到了健全和发展。在苏区之内，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没收了地主豪绅土地，文化教育，卫生机构，亦相继建立和发展，整个苏区，一派生机勃勃。

4月中，段德昌赴上海参加了全国红军军事会议。中央要求贺龙领导的红4军与红6军迅速会合，组成红2军团。以便完成湖北省委的首先争取在湖北省首先胜利的计划。段德昌回到洪湖后，将中央指示精神立即向鄂西特委做了汇报，特委据中央指示，派了万涛赴湘鄂西，一面加强红4军的领导力量，一面传达中央关于4、6两军会师的指示精神。万涛便日夜兼程，到了鹤峰，见到了贺龙，把省委要红4军赴洪湖同红6军会师的指示进行了传达，又把红6军大战洪湖的情况做了介绍。贺龙听了，十分高兴。当即，对桑植、鹤峰苏区工作进行了安排，由汪毅夫代理桑鹤苏区的前委工作，鹤峰由贺英负责，桑植由贺文渊负责。之后，贺龙便秣马厉兵，挥师东下，直奔洪湖。

贺龙率领红4军四千人马，由鹤峰县城出发，经资丘、海洋南，本欲取道长阳、宜都、松滋，再奔洪湖，不料在经长阳的渔洋关时，遇到国民党川军第26师郭汝栋的三个团和五峰、长阳两县的团防拦截。原来，郭军得到了贺龙要挥师东下洪湖之意，便驱部阻挡。贺龙闻知后，避敌主力，首先攻占五峰，消灭五峰团防。郭汝栋见此状，急忙调集人马，直扑五峰。贺龙见郭军势大，如果硬拼，必遭损失。乃率红4军折回鹤峰，筹划改道东进。

贺龙率师回到鹤峰后。依然做东下洪湖的准备，到了5月中旬，得知蒋、冯、阎大战即将爆发，川军郭汝栋部已撤出鄂西，便率红4军二次东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松滋县、刘家场，继尔又占领了松邑、大市镇、磨市、划市、沙道观等地。这时候，松滋、石门、澧县三县团防及各种反动武装，纷纷出动，国民党独立第14旅彭启彪部一个团千余人也向红4军进攻。贺龙便决定集中兵力

首先攻打石门罗效子团防。在土地垭，双方接火，红4军的前卫部队是谷志龙第4团，因红军突然出现，罗效子惊慌失措，本来能够迅速将罗部击溃，而谷志龙却令部队举步不前，其原由是谷志龙与罗效子系结拜兄弟，便给罗效子留了一条生路，罗效子便趁机率团防逃跑，致使红4军失去了消灭石门团防之机。贺龙得知此情后，勃然大怒，要枪毙谷志龙，亏得万涛相劝，贺龙才平息怒火，却把谷志龙臭骂一顿。这谷志龙团多系土匪改编而来。连、营长中有八人系谷志龙的结拜兄弟，外号“八大金刚”。这八大金刚早就对红军艰苦生活不满，此时见谷志龙挨了贺龙怒骂，便纷纷来见谷志龙，鼓捣谷志龙反水。谷志龙是个头脑极简单的人，拍着胸脯说：“他贺龙算个屌，老子有枪有人有兄弟，不受他的屌气。老子带队伍去投川军，到那里弟兄们吃香的喝辣的。”

当下，谷志龙派心腹1营营长赵麻子到了彭启彪处，串通彭启彪，偷袭了红4军。使红4军吃了大亏。贺龙只得带部队又返回鹤峰，对伤员进行了安置，谷志龙及八大金刚没等跑脱，就被贺龙抓住，当即将其九人枪决。并将第4团解散，将谷志龙旧部人员编入其它团内。准备第三次东下洪湖，与红6军会师，就在这时，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三个新军阀，发动了中原大战，都将各自兵力投到了大战上，自然无力对付红军，贺龙便趁此时机，率领红4军第三次东下。其先率部奔五峰，一举消灭了五峰新建团防，继而又攻打石门，时石门仅有罗效子的团防，罗自知不敌，不敢应战，慌忙逃窜。随后，贺龙又指挥红4军在松滋大败彭启彪旅，缴获弹药甚丰。遂又向公安城开进，抵公安县境时，罗效子决堤放水，阻挡红4军。贺龙只得又率部队返回松滋。这时，有侦察员报告，说红6军没有西进迎接4军，而是东进攻打汉阳，贺龙只得将部队留在松滋一带，继续派人打探消息。

红6军为何不前来迎接红4军呢？原来，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之际，也正是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之际，其命令湘赣红军攻打

南昌、九江，然后会攻武汉，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

这时候，湖北省委也相继召开了党代会和各种会议，通过了《湖北省委政治任务决议案》等文件，提出了完成地方暴动，集中红军进攻武汉、宜昌、沙市等中心城市，夺取湖北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这当儿，红6军本当向公安、荆沙方向推进，迎接红4军，可湖北省委却在这时命令红6军向汉阳方向发展，配合鄂豫皖的红军进攻武汉。周逸群、段德昌、邝继勋等虽认为红军攻打武汉时机不熟，但命令又不能不执行。便由邝继勋带红6军东进，相继攻克了沔阳的仙桃，天门的岳口，汉川的系马口，汉阳的蔡甸。至此，红6军距汉阳仅数十里，使武汉震惊。此时，因武汉有国民党重兵守卫，围攻武汉的各路红军知道不能攻克，便分头退回。就在这当儿，中共中央又命令红6军迎接正在东下的红4军，使两军力量集中起来，再攻武汉。邝继勋便率红6军自汉阳蔡甸西移。行至沔阳时，红6军进行了改编，将1、2纵队改为16、17两师，由王一鸣和许光达分任师长。王鹤、李剑如分任政委。旋即又挥师南下，经监利的尺八口，渡过长江，分三路攻取了华容，全歼了守城团防武装数百人，接着，占了石首、南县部分集镇，随后转而向西，7月1日攻克公安县。

时贺龙正在松滋县河街子练兵，闻红6军抵公安，遂率红4军人马抵公安，两军胜利会师。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会面后，都分外高兴。

4、6两军公安会师之后，在城外广场上召开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当地的苏维埃政府送来了许多慰问品，会场上贴着许多红红绿绿的标语。战士们敲锣打鼓，唱歌跳舞，气氛十分热烈。庆祝大会之后，召开了两军联席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红4军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2、6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并组成了军团前委会。由贺龙任军团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这时，孙德清已病愈来洪湖苏区，为参谋长。红2军团下辖2、6两军。2军军长由贺龙兼任，政委朱勉之；6军军长邝继勋，

政委柳直荀兼任。前委书记为周逸群。红2军下辖第4师和一个警卫团，4师师长王炳南、政委陈协平。红6军下辖16、17两个师。16师师长王一鸣、政委王鹤；17师师长许光达、政委李剑如。至此，红2军团共一万余人，枪五千余支。

这时候，蒋冯阎大战正酣，驻沔阳、潜江的国民党新5师东调。驻监利、沙市的"剿赤"军也开赴徐州。在鄂西除彭启彪旅和驻宜昌的李云龙旅等少数国民党正规部队外，大多数是保安队、常练队。面对此情，贺龙、周逸群主持召开了鄂西特委和红2军团前委联席会议。会上，贺龙、周逸群提出趁敌主力撤走之际，用三个月的时间，拔除根据地内部的"白点儿"，红2军拔除荆门、钟祥、潜江、京山、天门各县的"白点儿"；红6军拔除江陵、石首，监利、沔阳各县的"白点儿"，而后会师潜江，建立巩固的洪湖根据地，然后，再搞南漳、谷城，与襄北红9军会师。使湘鄂边苏区联成一片。之后，再攻汉阳，与鄂豫皖打通。在谈到这个计划时，贺龙很兴奋地说："我和逸群碰了头，只要一年工夫，我们的计划就能实现，洪湖根据地人口多，粮食多，又有湖泊河网柴林苇荡做倚托，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周逸群、贺龙的意见，大家都拍手同意。谁知，就在这时候，湖北省委来了指示，却要红2军团攻打宜昌、沙市等重镇，完成地方暴动。然后攻打武汉。周逸群在会上将省委指示一传达，开会人都不言语了。段德昌说："不可攻打宜、沙，2、6两军刚刚会师，战术上彼此都不了解，攻打宜、沙这样重镇，恐怕力不从心，另外，敌人虽然'剿共'力量不足，可都龟缩在大小城市之内，加强了防范，我们若去攻打必将事倍功半。当前当务之急，是迅速拔除苏区内白点儿，扫除这些白点儿，对红军来说，犹如以石击卵，事半功倍。"

段德昌说完，贺龙说："德昌之言有理，现在2、6两军虽然合到一起，力量强了，但首要任务，是巩固扩大苏区。省委指示，不符合实际，不应执行，把我们的意见，向省委反映。"

贺龙、段德昌的意见，大家都同意。会毕，贺龙率领2军，一举扫除了龙湾、熊口等白点，然后跨东荆河，解放了潜江县城，迫使残敌退入襄河以北。贺龙复又指挥部队北渡襄河，攻占了天门重镇岳口。段德昌率6军赴沔阳，先后攻克新沟嘴、府场、杨林尾等地，那残敌退至东荆河以北，自此，洪湖苏区的江陵、监利、潜江、沔阳等县联成了一片。一时间，红2军团声威大震。

之后，贺龙、周逸群又指挥红2军团人马消灭了洪湖中最反动的会道门白极会。

湖北省委的道道"金牌"

贺龙、周逸群、邝继勋、段德昌等指挥红2军团人马消灭了洪湖中最反动的会道门白极会后，准备一举拔除监利县城这个"白点"时，湖北省委第三次下了指令，其指令写道：

> 现在前委本身很右倾，当2、6两军会师时，全鄂西反动统治动摇非常，尤其是沙市市面恐慌已极，而当时敌驻军也仅一师，且红军声势浩大，群众斗争情绪异常高涨。此时，红军应立即攻占荆沙，而你们且以声东击西的办法攻监利，监利不克，又提出拔除数县内的"白点儿"，游击于潜、天一带，攻下潜江、岳口后，又经江陵返洪湖。省委两次督促你们进攻荆沙，均不见回信，中央的方针是集中进攻，而你们是只集中不进攻。

贺龙看罢信，口噙烟斗，默然无语。周逸群说："文常，你们的意见呢？"

贺龙把烟斗握在手中，斩钉截铁地说："我的意见，荆、沙重镇

不能打，攻打这样的城市，我军不光缺少重武器，士兵更缺乏攻坚经验。”

周逸群在地上走了两圈儿说：“省委不了解情况，只知发号施令，目前红军攻打沙市，稍有不慎，定遭损失。”周逸群说着，抬眼望着贺龙说：“我们召开前委会，由前委做出决定吧。”

贺龙同意了周逸群的意见。当下，召开了前委会。前委会上，一致认为红2军团不宜攻打沙市、宜昌，而仍以巩固苏区为根本方针，首先应拔除监利之敌。

监利城地处洪湖苏区中心，拔除这一据点儿，对于巩固扩大根据地，关系极大。9月初的一天，大雾弥漫，正好用兵。红2军团大队人马正要开拔，忽然一人飞马而来，直奔军团团部。贺龙正待上马出征，见那人直奔他而来。

来人是中央巡视员、红2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贺龙握着柳直荀的手，见他一身衣服被浓雾打湿，知道赶了许多路，便问道：“直荀，什么事这么急急地赶路？”

柳直荀一指身后之人说：“文常你看谁来了？”

贺龙定睛一看，原来柳直荀身后还有一人，不是别人，正是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贺龙忙上前握住周小康的手。这时，周逸群也来了。大家进屋落坐，周小康开口便问道：“省委的几次指示信你们都收到了吗？”

周逸群说：“都收到了。”

周小康说：“为会么不攻打荆沙？”

周逸群说：“我们召开了前委会，大家一致认为攻打荆沙，红军的力量不够，便决定攻打监利，正要出发。”

周小康听了，脸色沉着说：“部队行动暂停，我们马上召开会议，研究红2军团行动事宜。”

贺龙、周逸群见说，只好命令部队停止军事行动，回原驻地待命。

当下，红2军团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周小康、柳直荀、贺龙、段德昌、邝继勋、段玉林、王炳南、朱勉之、孙德清、许光达、王一鸣、王鹤、陈协平等师以上军政干部，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一开始，周小康便严肃地说："2、6两军会师后，军团前委拒不执行省委攻打荆州、沙市的指示，这是军团主要领导干部思想上的右倾的表现，省委的指示，是中央的精神。中央认为，全国的革命形势已经到来，要组织暴动。自中央到各省、各地区，都要成立暴动行动委员会。国际的形势，是帝国主义要武装进攻苏联，我们的军事行动，就是对苏联的支持。国内的形势，军阀正在混战，其结果，必定是两败皆伤，自取灭亡，蚌鹬相争，渔人得利，我们现在要做渔人。中央已命令红3军团攻打武昌，红1军团攻打汉口，我们红2军团，攻下荆沙后，便挥师东下，进攻汉阳，达到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战略目的。"

周小康讲完，柳直荀说："我和小康前来，就是怕大家思想上右倾，认识不到当前革命的新形势，缩手缩脚，贻误战机，据我们掌握的情况，2、6两军会师之时，鄂省震动，荆沙两城之敌，十分恐慌，若当时一鼓而击之，必获大胜，而我们却没有这样做，用大部队去拔'白点'儿，那些白点儿，赤卫队就能解决，杀鸡焉用牛刀？如今，攻打荆沙，时机尚不为迟，我们当从速决定，落实省委的指示。"

周小康、柳直荀说完，周逸群道："攻打荆沙之事，我们前委反复研究过多次，均觉力不从心，既然中央、省委、特委都这样指示，我们当服从命令，尽全力拿下荆沙两城。"

柳直荀问贺龙道："文常，你的意见呢？"

贺龙说："中央纵观全局，运筹帷幄，要在一省或数省内举行暴动，气魄不小，全局情况，我不了解。至于2军团攻打荆、沙两城，不是不可，只是准备尚不足，2、6两军合到一起，也只有万人，部队远不如我那20军，且武器又落后，此等攻坚之战，部队也没打过。只怕劳而无功。"

贺龙说到这里，段德昌接过话说："据我们侦察，沙市城中，工事坚固，有守军李虎臣一个师，李虎臣是何成浚手下干将，极善防守。自我2、6两军会师后，工事加强。……"

周小康打断段德昌的话说："如果2、6两军会师后立即攻打沙市，使敌措手不及，就不会使敌有喘息之机了。"

段德昌不高兴地说："难道沙市不下，是我等惧敌不成？"

周小康说："至少是思想上右倾。"

这时，邝继勋说了话："既然中央、省委、特委都有决定，我们就执行命令吧。"

贺龙吸了口烟后，手握着烟斗说："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打沙市的作战计划吧，攻打沙市，我意先打下沙洋镇，沙洋镇位于交通要道，是沙市敌之屏障，打下沙洋镇，断敌援退之路，再一举攻克沙市。"

贺龙的意见，大家都赞同。当下，贺龙、周逸群便下了攻打沙洋镇的命令。经过一番准备之后，红2军团分两路攻打沙洋镇，不消半日，沙洋攻克。部队稍事休息，便向沙市发动进攻。红2、6两军约九千人，从黄昏起，在城外东南之栖霞寺附近，双方激战竟夜。红军战士虽然都作战勇敢，冲锋陷阵，个个奋勇当先，只是从未经过较大规模正规战的训练，没有攻打过沙市这样大的城市，与敌接火后，互相动作欠配合。在一个阵地上，这里冲锋，那里撤退，有的攻进去了，反遭到自家人攻打，红6军的一个连好不容易登上了城，却被红2军的炮连轰了下来。双方战斗到第二日上午时，红2军10团团长张一鸣阵亡，有许多营连等干部和战士牺牲。这时候，游弋在长江的日本帝国主义军舰"热海号"，中国炮舰"旗胜号"，从美孚火油公司附近对红军施行猛烈炮击。英帝国主义军舰"列迪巴笃号"在沙市下游六里向左岸之红军开炮射击。贺龙看到攻打不下，便对邝继勋、段德昌说："这吃亏的仗不能再打了。"

段、邝二人也都同意撤退，贺龙便下了撤退的命令，红军遂又

撤到了沙洋镇。这一仗，红军伤亡了上千人。为安置伤员，遂又撤退到了江陵的普济观。攻打沙市的失利，使得部队情绪很低落。

红2军团撤到了普济观后，军团前委召开了扩大会议。这时，中央和省委又来了指示，要红2军团配合红3军团攻打长沙。贺龙、周逸群、邝继勋、段德昌等人都认为打长沙不妥，依然主张红军在江陵、监利、沔阳、潜江、京山、天门、钟祥、荆门等各县游击，拔钉子，扫除地主反动武装，扩大影响，开辟汉水北岸的根据地。面对实际，周小康、柳直荀也都同意。当下，作出决定，红6军在江、潜、沔、潜一带活动；红2军在京、天、钟、荆一带活动，决议刚刚做出，就在这时，邓中夏来到了红2军团。

第十五章 邓中夏赴洪湖苏区

工 运 领 袖

邓中夏乃湖南宜章县人，原名邓康，又名邓仲澥，字安石，生于1894年。其父乃清末举人，出任过省参议员、县长等职。邓中夏八岁入私塾，以后在县办小学、衡阳中学、郴县中学念书。二十岁考进长沙湖南高等师范文史专修科。1917年，在他二十岁的时候，随父来到了北京，7月间考进了北京大学文学系。1920年10月，李大钊、邓中夏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之下，发起了北方党的最初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自此，邓中夏便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北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邓中夏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工作，参加了李大钊发起的政治性社团“少年中国学会”，并与天津

“觉悟社”周恩来等交往，探讨马列主义问题。当时，共产主义小组专门创办了一个指导工人运动的周刊，名叫《劳动者》，邓中夏参加了这个周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为了唤起工人同志的觉悟，邓中夏来到了长辛店铁路工厂，办起了一所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为便于接近群众，邓中夏将自己的名字“仲澥”改为“中夏”。1922年5月，邓中夏被选为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代表，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同年7月，他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主任。在邓中夏的组织领导下，1922年8月，长辛店车辆厂三千名工人举行了大罢工，邓中夏挥笔写下了“清操厉冰雪，赤手缚龙蛇”的条幅，挂在了自己的屋中，这幅对联，上联摘自文天祥的《正气歌》，下联引自《孙樵集》。这年10月，邓中夏又到了开滦，组织领导了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矛头直指英帝国主义统治，这次罢工，由于准备工作不足，失败了。邓中夏却依然对胜利充满着信心。他吟诗作歌道：

哪有斩不掉的荆棘？
哪有打不死的豺狼？
哪有推不倒的山岳？
你只须奋斗着，
勇猛的奋斗着；
持续着，
永远的持续着；
胜利就是你的了！
胜利就是你的了！

1925年，由日本帝国主义开办的上海第八纱厂粗纱部全体工人无故被厂方开除，激起了工人们的愤怒。全厂一致决定罢工，中

共中央为加强罢工的领导，组成了由李立三、邓中夏负责的罢工委员会。邓中夏废寝忘食地做罢工工作。一天，他在苏州河北岸潭子湾召开大会时，上海警察厅派了数百名警察，荷枪实弹地将群众包围，邓中夏面无惧色地站在了一个山头上，振臂高呼："我们被东洋人压迫着，中国人不要压迫中国人！"这次罢工，邓中夏被捕，由于没暴露身份，没有遇害。5 月 30 日，上海各学校两千余名学生走上街头，在公共租界进行反帝示威，散发"打倒帝国主义"等传单，揭露 5 月 15 日帝国主义枪杀上海日本纱厂工人顾正红事件的真相。学生游行队伍行至南京路时，突然遭到巡捕的逮捕与屠杀，造成"五卅"惨案。为了打击帝国主义的气焰，邓中夏同苏兆征、陈延年等于 1925 年 6 月，在香港领导了省港工人大罢工，邓中夏担任工人纠察队训育长。他领导纠察队封锁了东起深圳，西抵前山的海口。禁止所有轮船开往香港，切断了香港同外界的一切联系。使得香港一时间变成了死港、臭港。邓中夏不顾工作辛劳，苦战三个通宵，挥笔疾书，写成了《一年来省港罢工的经过》，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阐明了省港罢工经验。大罢工坚持了 16 个月之久，在政治上、经济上给英帝国主义沉重的打击，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发展，支援了北伐。省港大罢工的组织与领导，充分显示了邓中夏的革命才干。在这期间，他担负着中共广东区委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总顾问和党团书记、《工人之路》的主编、党报《人民周刊》的编委等要职。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中共江苏省省委机关被国民党反动派破获，省委书记陈延年被捕牺牲。中共中央经过研究，决定调邓中夏担任江苏省委书记。1928 年 6 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邓中夏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会议。1930 年 7 月 19 日，邓中夏回到了上海，中共中央分配他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宣传部长。这时候，红 2 军团在洪

湖地区组成，邓中夏便被派到了洪湖，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2军团的政治委员。8月9日。邓中夏化装成一名教书先生，乘江轮从上海动身，到了武汉，搭上开往洞庭湖的篷船。船到牌州时，篷船又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官差，运给养到岳州。一路之上，亏得邓中夏机警应酬得宜，方安然无事。船至岳州，邓中夏从容离船上岸。适岳阳楼便在岸边。这岳阳楼历有"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盛誉。邓中夏信步上楼，望着莽莽洞庭之水，不由得百感交际，忍不住吟诗一首：

莽莽洞庭湖，烟波浩渺处，
雪浪拍长空，阴森疑鬼路，
问今何为世？豺虎满道路，
禽狝残除之，我行适我素。

莽莽洞庭湖，我今欲飞渡，
秋水含落辉，彩霞如赤炷，
问将为何世？共产均贫富，
惨淡经营之，我行适我素。

邓中夏在岳州停留了两日，看看没有人注意自己，便又搭了一条货船，开往洪湖，船行一天，在一个叫白螺矶镇的码头停了下来。邓中夏上岸后，又行了九十里旱路，到了洪湖苏区的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天，到了红2军团后方办事处，邓中夏没有休息，便由办事处同志带队，到了红2军团指挥部。

贺龙、周逸群、柳直荀、邝继勋、段德昌等人，见到了邓中夏，大家都分外高兴，知道邓中夏是党内的老同志，革命斗争经验丰富。

当下，贺龙、周逸群便把军政各方面情况向邓中夏做了汇报，特别提出了不宜攻打长沙的决定，邓中夏听了，没有吭声。

罢官周逸群

在邓中夏由上海动身赴洪湖之时，中共中央要他到红2军团后，迅速纠正红2军团前委不坚决执行中央指示的右倾态度。并说明攻打长沙，取得一省和数省的胜利，是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所以，邓中夏听了贺龙、周逸群对打长沙的消极态度之后，立时沉默。他思索了一阵说："同志们，你们介绍的情况都是实际情况，红军攻打沙市失利，是要做为教训吸取。但是，我们要把目光放远，不要只盯着洪湖一地，这是狭隘的农民意识作怪，中央和共产国际，高瞻远瞩。中央的指示，我们要坚决地执行。当然，执行中会有困难，攻打沙市的失利，使得我们的士气不振，我们当鼓舞士气，我同意先攻克监利，以便增强部队打长沙的信心。"

邓中夏在党内的资历很深，又刚从苏联回国，并且是中央指令的红2军团政委，他的话，贺龙、周逸群等人，自然认真去听。虽然这些人都不同意打长沙，可邓中夏拿出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上方宝剑"，也就没人再提不同意见了。于是，前委会做出了决议，决议共两条。内容是：

(一)、2、6两军目前中心任务是遵照中央指示，移兵渡江，截断咸宁至岳州之武长铁路，并占领岳州，与3、4、5、8军配合行动，首先取得湖南的革命胜利。

(二)、渡江必须迅速，惟渡江之前先攻下监利。攻下监利，鄂西赤色区域不致因红军渡江完全抛弃，可以立足，可以声东击西，乘敌不备的渡江。

当时，监利城以及新堤、沔阳、仙桃等洪湖内重要城镇，均在敌

入手中。唯监利城地处洪湖中心，紧傍长江北岸，是国民党“讨逆军”阻塞洪湖苏区根据地南北通路的最大据点。仅县保安团就有十六个连之多，1928年以来，红军曾两次攻打监利不克。因此，拔除这一据点儿，对于巩固后方和红军渡江南下，关系重大。

阴历八月初的一个晚上，乌云密布，攻打监利开始，经过一夜战斗，监利被攻克。歼灭了西北军新3师龚炳垣教导团和监利县保安团两千余人，缴枪千支。第二天，在城中上清观前空场上，红军前委召开了祝捷大会。

大会之后，红2军团前委和鄂西特委召开了联席会议。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会议决定将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邓中夏为特委书记、红2军团政委，周逸群被免去了红2军团政委职务，改做地方工作，代理湘鄂西特委书记，周小康免去鄂西特委书记，改任为湘鄂西特委组织部长。邓中夏宣布完任命之后，段德昌冷冷地说：“周逸群同志做特委书记，非常合适么，干什么还要用代字？”

贺龙等人都望着邓中夏，邓中夏也从众人目光之中，看出大家对周逸群职务的安排不满。邓中夏也知道周逸群是能文能武的好同志，可中央的决定，邓中夏也不好推翻。邓中夏知道，中央所以要撤掉周逸群之职，就是因为周逸群几次不坚决地执行中央、省委的指示，认为他思想右倾。可这个意思，邓中夏又不便明言。当下，他说：“德昌，调逸群到地方工作，是中央从全局的考虑，是为加强洪湖苏区的建设，至于有无代字，无关紧要，都是革命工作么，逸群同志也不会有许多考虑的。”

周逸群微笑地对段德昌说：“德昌，中夏说的对，只要是党交给的工作，干什么都可以。目的是要把工作干好。”

周逸群这样一讲，大家都不再说什么了，联席会议再次讨论攻打长沙之事。这时，段德昌将一张汉口出版的《国民日报》拿了出来，说：“这是几天前的报纸，报上讲了红3军团已于8月3号撤出了长沙，退到了醴陵。”

邓中夏接过报纸，草草地看了一眼后，问段德昌："你的意思呢？"

段德昌不假思索地说："敌人报纸既然告诉我们红3军团已退出长沙，我们侦察员侦察的情况也与这报上说的一致。我们红2军团，没有必要再远离苏区去攻打长沙，如此孤军深入，其结果怎样，大家都很清楚。"

段德昌的意见，到会者大都赞同。邓中夏见此状，不由得站立起来，面带不悦之色说道："同志们，我们决不可以坐井观天。当然，渡江南征攻打长沙是非同小可之举，可我们依然要渡江作战。不管1、3军团是否退去，我们的决心不变，这是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只是我们如今渡江南征作战的任务有所改变。前者任务是截断武长铁路并占领岳州，堵住武汉的白军，好让1、3军团在湘境内消灭所有在湘之敌，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占领岳州，而后长驱直捣长沙，以激起1、3军团对长沙的反攻。"

在当时的红军之中，政委有最后的决定权。既然邓中夏坚持要攻岳州打长沙，大家只好服从。当下，分头去做渡江南征的准备。

邓中夏下令攻长沙

在邓中夏下令红2军团攻打长沙之际，必须把红军1、3军团攻打长沙的情由略述一遍。

红3军团是1930年6月由湘赣的红5军、红8军、红16军组成，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1930年的6月20日前后，红3军团刚刚成立，在大冶、阳新边界的三江口附近休整，这时候，赴上海参加中央军事会议的滕代远回到军团。传达了中央军事会议精神，这精神就是组织全国暴动，实现一省和数省的胜利。中央命令红3军团进攻武昌，配合红

2军团夺取汉阳、汉口，配合红1军团夺取南昌。这时，武昌守敌有6团之众，并有坚固的工事，江面上布满各帝国主义兵舰，长江正是涨潮间，南湖水满，沿江只有一条大堤，若攻武昌，只有沿大堤才能接近城墙。而国民党钱大钧部十二个团正驻岳州，罗霖1师住阳新，红军若攻打武昌，前有坚城，后无退路，侧长江、背南湖，实在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彭德怀听了滕代远传达的任务，立即说："这腹背受敌之仗不能打。"

滕代远说："我也考虑这仗不能打，只是中央一再要我们攻打，这样的命令，不执行怎么行？"

彭德怀思索良久说："这样吧，我们先打下鄂东南六县武装，然后占领岳州。做好攻打武昌的准备。"

彭德怀的意见，滕代远同意。随即，彭、滕二将指挥红3军团消灭了鄂东南六县地主武装。哪六县？鄂城、蒲圻、咸宁、嘉鱼、通城、通山。而后，彭德怀又以一部分红军进占金牛、鄂城，虚张声势要攻打武昌，敌军中计。把钱大钧两个师，星夜运往武汉。此时，岳州便成了一座空城。彭德怀便趁机率红3军团主力，一举攻克了岳州。缴获了不少弹药及大批军用物资，还有七五野炮和山炮。

红3军团克岳州后，武长路交通断绝，敌惊恐万状，国民党武汉行营即调驻长沙的15师一部，驻咸宁罗林部、钱大钧部向红3军团攻扑。彭、滕二将趁敌兵力尚未集中，便于7月5日，主动撤出岳州，重返平江。这时，国民党湖南省主席何键急调第16师危宿钟部，19师陈光中部共四旅之众，分两路进攻平江。双方激战于金井，战斗异常激烈，红3军团在湘鄂赣独立师增援下，一举击溃敌人的防线，歼敌过半，红军乘胜追击，击溃敌之第3梯队。随后，红军强渡榔梨河，继续向长沙猛扑，何键慌忙在长沙外围榔梨市一带，集中陈光中、危宿钟残部及刘建绪等四个旅，阻击红3军团的进攻，双方激战于长沙城东阵地，从中午战至夜半，又从夜半打至天明，拂晓前攻破刘建绪部守军约5团之众的阵地，国民党军败

逃，红3军团遂占领了长沙，自谓“与省市共存亡”之何键，只身逃于湘江西岸。这时候，蒋冯阎大战正酣，何键此时对双方均不表态，而用全部精力来对付红军，反攻长沙。8月5日，何部刘建绪、罗藩瀛两师，自湘潭直扑长沙；国民党中央军罗霖、公秉藩两师自湖北开入湘境汨罗一带；陶广师王东旅由三汊矶渡河逼进长沙。英帝国主义十余艘小型浅水舰也向红军发难。形势顿转严重，彭、滕见长沙不能固守，便指挥部队，主动撤出长沙，转战于平江、浏阳一带。

红3军团撤到浏阳一带后，得知朱德、毛泽东率红1军团到达永和市。彭、滕便率部到永和市与朱毛红军汇合。原来，朱德、毛泽东所指挥的红1军团，也奉中共中央之命，前往援助红3军。

红3军团与红1军团会合之后，双方召开了前委联席会议，遵照中央的指示，成立了红1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红1方面军成立之后，中共中央再次下令，命令红1方面军再攻长沙。当时，朱、毛、彭、滕都认为时机不至，一来探知长沙之敌已有准备，二来红军也迫切需要进行短期整训。但是，中央命令，又不能不执行，只好再打长沙。

自从红军主动撤离长沙后，何键下令大肆修筑防御工事。其工事全长数十里。工事共分三道，第一道为巨型鹿砦；第二道为密布的竹钉；第三道是高大的电网。四周碉堡群立，每到晚上，灯光照耀如同白昼。

红1方面军发起二战长沙之役后，首先血战文家市，歼灭了三个整团之敌，而后，以雷霆万钧之势杀向长沙。

由于长沙之敌已有充分的防御准备，红军失去突袭的机会，结果变成了阵地战，双方战斗异常激烈，彼此伤亡很大。旷日持久，红军久战不下，所部弹药和给养日益缺乏，而国民党武汉行营也派了罗霖、公秉藩、钱大钧等数师之众入湘，企图抄红军后路，蔡廷锴、郭汝栋两师兵力也奉蒋介石之命赴湘增援。国民党湘鄂号铁甲车及飞机等现代化武器，均一起用上。英、美、日各帝国主义兵舰也助

桀为虐。在此形势之下，毛泽东说服了众将，决定红军撤离长沙。9月 5日 红1方面军分头向株州、浏阳、平江撤退，安全返抵赣南。红1方面军刚刚撤退到赣南。邓中夏便下令红2军取岳州再攻长沙。就在大部队刚刚出发之时，中共中央又派了两名干部，前来加强红2军团的领导力量。这两个人，一个名叫汤慕禹，一个就是刘鸣先。汤慕禹系四川人，黄埔四期学生，后到苏联留学，刚刚回到国内，便被派到洪湖苏区。刘鸣先原在红军中工作一段时间，后调中央，如今中央为加强苏区干部力量，便派刘鸣先同汤慕禹一起到了洪湖。

汤、刘二人到了洪湖时，红2军团已撤到了朱和镇，汤、刘二人至朱河镇，会到了红2军团前委，向邓中夏、贺龙等报告了中央令红2军团停止向长沙进击的指示。

罢官段德昌

既然中央有了停止进击长沙的指示，邓中夏不再坚持己见，这时，中央调邝继勋离开了红2军团，另有任用，前委便在朱河镇上开了会议。会议没开始前，邓中夏私下对贺龙说："段德昌是个炮筒子，打游击还行，指挥一个军我看不能胜任，由汤慕禹取代吧，汤慕禹在苏联学习过军事，我很了解他。"

贺龙听了，立时说道："不可，段德昌有勇有谋，创建洪湖根据地，德昌做出巨大贡献。"

邓中夏吸了吸嘴唇说："中央意见要汤慕禹任军长，段德昌不拿下来，汤慕禹怎么任命？"

原来，汤慕禹跟邓中夏二人私交很好。邓中夏与段德昌几次接触，见段德昌冲撞自己，便对段德昌没甚好感，正好趁此机会将段德昌职务撤换，他怕贺龙在会上阻挡，便先私下与贺龙通通气。贺

龙果然不同意。贺龙见邓中夏坚持要安排汤慕禹，想想说："我不再兼2军军长职，由孙德清任2军军长，汤慕禹代替孙德清的军团参谋长职务。"

贺龙如此一说，邓中夏虽然心中不大乐意，可也不好说别的，这样，便由孙德清任红2军军长，汤慕禹任红2军团参谋长。段德昌为红6军军长。前委会议决定，为了准备随时能渡江配合红1方面军攻打长沙，当迅速攻克新堤。这新堤紧靠江边，不仅能做大部队往来渡长江之处，还可以解决部队的经费问题。俟收复新堤后，若部队不须立时渡江，便可西进攻取沙市。

当下，红2军团首先攻新堤，因新堤地理位置左江右湖，防御坚固，未克。这时，又接到中央的指示，要红2军团迅速渡江，截断武长路，尔后进攻岳州。于是，红2军团前委经过讨论，决定由石首渡长江，进攻南县、华容、公安、澧县、常德、安乡等县，造成湘鄂西赤色区域。

决定做出之后，红2军团在石首南渡过长江，立即兵分两路，段德昌率领6军打华容，贺龙率2军打南县。

红2军打下南县之后，邓中夏要贺龙攻打安乡。贺龙听了，说："安乡现在还打不得。"

邓中夏说："何以见得？"

贺龙说："部队由南县至安乡，途中要经五条大河，如此背水之战，如果打不好，将使部队处于覆灭之地。"

邓中夏听了，很不高兴地说："要是打得好呢？"

贺龙说："冒如此大的危险，不值得。"

邓中夏本是一出色的工人领袖，而对于军事，他确实是不懂。他见贺龙坚持不攻安乡，虽然心中极不快，还是平下气说："云卿，依你之见呢？"

贺龙说："先打津市、澧州。"

邓中夏见贺龙不大尊重自己的意见，虽然表面依从了，但内心

中不是滋味儿，便说："我去 6 军，2 军的事，你决定好了。"说定拂袖而走。

邓中夏走后，贺龙心中也觉得很别扭，便坐在屋中，闷头吸烟。这时，卢冬生走了进来，他见贺龙神色不快，忍不住问道："总指挥，看你似有什么心事？"

贺龙叹了口气说："刚才我与中夏弄了不高兴，他甩手到 6 军去了。中夏是老党员，又是军团政委，在党内外威望很高，我从心中很崇敬他，可他对打仗这一套，确不大懂，刀枪之举，不似写文章，枪炮一响，就要流血，非同儿戏。他一定要打安乡，打安乡是背水之战，实是要冒大险，我不能坐视不理，非不得已才与他争执。"

卢冬生听了，用埋怨的口气说："中央为什么要派这样一个不懂军事的人来当军团政委？逸群同志不是很合适么，为什么一定要撤换？"

贺龙长叹一声说："撤换逸群，真似断我臂膀呀！"

这样，贺龙便同孙德清一起，指挥红 2 军连克津市、石门、临澧三地，消灭了川军张英、马坤山等部。在临澧邮电局，孙德清得到不少国民党报纸。从这些报上，知道红 1 方面军已远离长沙，蒋冯阎大战已接束，蒋介石得了手，已乘飞机飞到了南昌，要亲自布置"剿赤"事宜。孙德清便把这些消息说给贺龙，贺龙听了，说道："形势将对红军不利，我们应当立即撤回洪湖根据地内，准备迎击敌兵的'围剿'。若部队继续留在这一带，这里的群众基础薄弱，且四面受敌。"

孙德清说："中夏同志会同意吗？"

贺龙想了一下，把手中烟斗往桌角一磕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传我命令，部队立即撤到河口。我亲自去见中夏，以利害说他。"当下，贺龙便带上报纸，带两名勤务兵，飞马到石门，在石门关帝庙内，贺龙见到了邓中夏。拿出报纸，说道："中夏，这是缴获的国民党报纸，上边说蒋介石要坐镇南昌，指挥'围剿'红军事宜。我们

应当立即将部队撤回洪湖苏区,准备反击敌人的'围剿',时间紧迫,来不及和你商量了,我已把部队带到了河口。"

邓中夏听贺龙说完,很不高兴地说:"云卿,你怎么能这样做呢?你这样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更深一点儿说,是你旧军人的恶习不改。"邓中夏本想说:"你眼中还有我这政委吗?"话到嘴边儿又咽了回去。

贺龙见邓中夏面色冰冷,他坐了下来,吸着了烟,抽了一口,这才说道:"中夏,你怎么批评我都行,打仗的事儿,我好歹比你多打过几次,蒋介石这个龟儿子,心毒手狠,我们不可儿戏。"

邓中夏把手中报纸往桌上一扔,国民党的报纸,多系造谣,怎能依此为依据。"

这时候,段德昌从外边走了进来,插话道:"中夏同志,云卿说的,做的都对。即使敌人报纸满篇都是假话,我们也要返到江北了,要做好巩固苏区的工作,准备迎击敌人的'围剿',如今,蒋冯阎大战已到了尾声,蒋介石又占了便宜.下一步,势必要进攻苏区了。"

邓中夏本是清高之人,又听不得不同意见,他见贺龙把部队带到了河口,心下已不高兴,这时见段德昌过来支持贺龙,他心中更是不高兴。遂说道:"部队的行动,按原计划行事,继续攻打津市澧州,有事我这政委担当。"说完,拂袖而走。

屋子里只剩下贺龙和段德昌,段德昌只气得面色青紫,贺龙也怒眉高挑,忽然,段德昌把桌子一拍,说道:"胡子,如此下去,红军必败无疑矣。"

贺龙又装了袋烟,慢慢地吸了几口,那怒挑的双眉渐渐地复回了原位,他走到段德昌身边,说道:"德昌,中夏是党内的老同志,革命斗争的经验比我们丰富,也许我们的看法错了。"

段德昌叹了一口气,说:"胡子,中夏资历、斗争的经验确比我们丰富,可要论洪湖苏区军队的事,他不如我们了解呀。"段德昌又说,"明明不对,却偏要我们去执行,咳!这样下去,我真为洪湖担

忧，为红军前途担忧。”

贺龙听了段德昌的话，只是闷头吸烟，没再言语。

就在这时候，周逸群和万涛派人送信与前委。值班参谋将信送与贺龙段德昌。贺、段拆信一看，但见信中写道：

> 邓、贺、汤、段、孙：
>
> 假如一、三军团又进攻长沙，则我们应配合这一行动，而今，据各方消息，说明一、三军团已远离长沙，敌大军正在云集，大有“围剿”红军之势，红军当速返苏区，做好保卫苏区的准备。
>
> 逸群、万涛、小康

贺、段二人看罢信，找到邓中夏，把周逸群等人的信给邓中夏看了，邓中夏不以为然地说：“周逸群他们也未免小题大作，惊弓之鸟怎能搏击长空？”

既然邓中夏决心攻打津市澧州，贺龙、段德昌只好执行，当下，贺龙带 2 军攻打澧州，段德昌带 6 军攻打津市。

驻津市守军为李千峰师。这个师参加了蒋冯阎大战，为蒋氏立了战功，凯旋回汉，又奉命开赴津市，士气正盛。红 6 军分两路进攻，结果，6 军虽夺得津市，但损失很大，参谋长刘仁载中弹阵亡。

澧州守敌为陈渠珍第 3 师，师长陈运夔与贺龙原有旧交，见贺龙率兵攻城，忙派人送信与贺，信中说道，只要贺龙不攻澧州，他愿与红军友好，彼此互不相侵。贺龙不理，仍发兵攻打。由于城池坚固，澧州急攻不下。而这时，蒋介石任命原鲁系、后改编为蒋部的鄂籍将领徐源泉为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统一指挥第 48、34、11、新 11、新 34 师及川军第 21 军教导师和新 2、3、5、7 旅，暂编第 19 旅、湖北警备旅、何键驻湘西的李觉部、李国钧部、周燮卿部、刚刚编入蒋介石第 2 军的夏斗寅部，分江南江北两路，直扑洪湖和湘西、鄂

西苏区。

时贺龙见澧州战斗旷日持久，不能结束。且敌大军已至，只得撤退。1930年12月9日，红2军团的6军撤到了松滋县境内的杨林寺、街河市一带。2军撤至公安一带。这时候，强敌已占公安城。贺龙遂指挥2军打退入侵公安之敌。之后，命令第12团派兵掩护伤病人员及物资返回洪湖。至此，红2军团渡江南征目的未达，而部队却损失很大。

就在红2军团人马撤到杨林寺一带时，敌军也分路向洪湖苏区大举进犯。因主力停留在公安、松滋一带，监利、华容，潜江相继失守，苏区告急书雪片般飞向红2军团前委。

红2军团撤到杨林寺、公安、街河市一带后，总指挥部便设在了杨林寺西口的一处破药王庙之中。刚刚住下，洪湖苏区派人来送信，信中要邓中夏、贺龙速带红2军团返洪湖。在这药王庙大殿之内，召开了红2军团前委会。开会的有邓中夏、贺龙、孙德清、段德昌、汤慕禹、柳直荀、许光达、王一鸣、王鹤、王炳南。会议一开始，邓中夏说："如今敌人向洪湖苏区发动了大举进攻，刚才，接到了特委的告急信，我们现在就要研究一下军团的行动方针。"

邓中夏话音儿一落，段德昌说："立即回师洪湖，迎击敌人的围剿。"

贺龙、段德昌、孙德清、许光达等当即表示赞成。

邓中夏说："洪湖，不能回去，为什么不能回呢?原因很简单，洪湖系水网地带，河流湖泊太多，打游击是个好地方，而不利于大部队行动，我的意见，部队向松滋、枝江一带发展，创立第二个中央苏区。"

邓中夏刚一说完，段德昌立即说："离开洪湖，我不同意，洪湖人民养育了红军，而今敌人要屠杀洪湖人民时，我们却离开他们，我们怎么对得起洪湖人民?"段德昌平缓了一下语气说："洪湖地区多水泊，这正是我们反击敌人的有利之处，红2军团指战员，大都

转战过洪湖，有许多是洪湖中长大的，熟悉洪湖的草木，而敌人，不熟悉洪湖中的情况。洪湖水泊苇荡不是我们的障碍，是敌军的障碍。”

段德昌发言的时候，邓中夏沉着脸不吭声，段德昌像没看见一样，继续说道：“中夏同志说创第二个中央苏区，此提法我认为不妥，中央苏区只能是一个，我们不能另立中央苏区。”

段德昌说完，贺龙说：“我赞成德昌的意见，红军不能离洪湖，更不能提什么中央苏区。”

这时候，汤慕禹吸了吸嘴唇两声发了言。汤慕禹眼珠儿滴溜溜地转了一圈儿说：“中夏的意见也不无道理，洪湖地区是湖泊之地，大部队行动，确受阻，况且敌人‘围剿’的目标在洪湖，我当避其锋芒。当然，德昌、云卿的意见也有其对的一面，我们红2军团的成员，特别是6军，大都是洪湖人，如今听到敌人进攻洪湖，若不去救，从感情上说不过去，但是，越是这样，越要冷静，这是战争，是流血的，不能以感情用事，那样，我们要犯大错误。”

段德昌火了，他眉毛一挑说：“什么叫感情用事？敌人来了，我们跑了，把苏区人民丢给了敌人，任敌人随意屠杀，我问你，这是什么感情？”

邓中夏说：“德昌，你要冷静，慕禹的意见，是对的，我们应当上山建立根据地，利用山地，同敌人周旋。朱、毛不就是建立了井冈山根据地么？”

贺龙、孙德清、许光达、王炳南依然都主张回师洪湖，认为洪湖群众基础好，大敌当前，群众的这种革命精神尤为可贵。不同意在此时开辟新苏区。邓中夏听了，不高兴地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部队的行动，容我再想一想。”

贺龙说：“中夏，部队已四面受敌，不可在此久留。”

邓中夏像没听到一样，起身离开了这座大殿。邓中夏走后，段德昌拧着眉毛叹了口气。这时候，汤慕禹也起身走了出去。

邓中夏出门之后，来到了庙外。这时，已到了12月的天气，但见彤云密布，冷风中飘着雪花儿。邓中夏不由得打了个冷颤。忽然间，有一人将大衣披在他的身上，邓中夏回头一瞅，原来是汤慕禹。邓中夏说了声："慕禹。"

汤慕禹说："中夏，你知道吗，有人议论我们，说我们是吃洋面包的，不懂得打仗，只知啃书本儿。"

邓中夏不高兴地说："这贺龙、段德昌，满脑子个人英雄主义、农民意识。"

汤慕禹说："何止英雄主义，还有封建迷信，你没听说吧，他们两人，一个自诩为水龙将军，一个自诩为火龙将军，说什么龙离不开水，所以都奔洪湖。"

邓中夏道："不光是迷信，还有绿林思想。"

汤慕禹又说："中夏，在这关键时刻，你可不能让步，若让了步，你的威信没了不说，我们红军还要受损失。"汤慕禹见邓中夏听的认真，又说："你别看段德昌咋咋呼呼的，他实际上没有什么本事，不过就是打打游击罢了。"

邓中夏停住脚对汤慕禹说："慕禹，你来当6军军长吧。"

汤慕禹两眼闪着火花说："那，段德昌怎么办？"

邓中夏把脸一沉说："他不是愿意回洪湖吗？就让他回洪湖。"

汤慕禹说："6军让他带走？"

邓中夏说："让他带走伤病员。"

汤慕禹亲切地对邓中夏说："中夏，我会成为你的左膀右臂的。"

邓中夏高兴地握住汤慕禹的手。

红2军团前委会议而未决之后，一连两日，邓中夏不再提开会之事，贺龙找到邓中夏说："中夏，各种情报表明，敌军正在集结，我们不能在此久停了，何去何从，应当机立断。"

邓中夏说："云卿，不要急，部队的行动，我自有考虑。"

当天，湘鄂西特委又派人送信，要邓中夏率红2军团回洪湖，邓中夏遂再次召开前委会。会议一开始，邓中夏说："我经过了几天的考虑，有两点意见，一是将部队拉到松滋的刘家场一带，选择阵地与敌决战，二是我同意德昌同志回洪湖，6军军长职务由汤慕禹同志兼任。德昌同志回洪湖后，组织洪湖地区现有的军事力量，与敌周旋，寻机击溃敌人。"

邓中夏说完之后，贺龙、许光达、孙德清、柳直荀等人都站了起来，贺龙说："中夏的两条意见，我原则上都不同意，第一，敌来势凶猛，我军当避其锋芒，寻其弱处，消灭敌人，不宜打阵地战。第二，段德昌若回洪湖，把6军带走。"

孙德清说："大敌当前，2、6两军不能分开，应全部返洪湖，保卫苏区。"

邓中夏面色沉着说："与敌决战之事，我们再议，德昌同志还是回洪湖为好，那里很需要他。"

贺龙刚要开口，段德昌站起身说："我服从中夏同志的意见。只是不知中夏能给我多少人枪？"

邓中夏沉吟了一下说："德昌同志，部队攻打津市澧州时，伤亡很大，而今又大敌当前，抽不出多少人来，只能带走伤员。"

段德昌听了，登时愣住了，他万没想到，邓中夏是要他只身返回洪湖。他知道，在红2军团南征之时，将洪湖内的地方武装，差不多都带走了，如今自己回去，手中仅老弱残兵，工作如何开展？他又想到洪湖父老，正在敌人血火中熬煎，只觉得一腔热血，直涌脑顶，不由得愤然说道："中夏同志，我向你立军令状，若丢了洪湖，我提首见你。"说到这儿，段德昌目光灼灼地逼视着邓中夏，说："中夏同志，如果2军团遭到损失，如果创建不了武陵山区根据地，你承担什么责任？你敢立军令状吗？"

邓中夏不敢看段德昌那严峻的目光，而是宣布散会。

散会之后，夜色已深，段德昌回到屋内，闷闷地吸烟，心情不能

平静下来。这时候，贺龙推门而入，他对段德昌说："怎么，睡不着了？"

段德昌眼含着泪说："胡子，这是撤我的职啊！"

贺龙将烟斗磕了磕，说："德昌，我明白，想远一点吧，洪湖需要你。再拉起一支队伍么？"

段德昌说："我走后，你的困难更多，邓中夏不懂军事，又目中无人，汤慕禹心地不纯，你要小心。"段德昌吸了口烟又说："如今，我最担心的倒不是洪湖苏区，而是2军团的命运，据侦察员报告，敌十八个团已步步进逼，而我们还在杨林寺徘徊不决，实有被敌吞掉之险那。"

贺龙忽然站起来说："德昌，你说的很对，我现在就去找中夏。明早送你。"

段德昌说："明儿我起大早走了，你不必再送我。"

第二天清晨，四野还黑黑的，段德昌便起身备马，英雄刚走出村口，一人从后边赶来，说道："德昌，我来送你。"

这人正是贺龙，段德昌拉着贺龙的手说："云卿，不必了。"

贺龙说："去吧。"

当下，二人默默地向野外走去，直到十里长亭，二人才洒泪而别。正是：

送君送到大路旁，君的恩情永不忘，
战友之情心里亮，隔山隔水永相望。

送君送到大树下，心里几多知心话，
乱世逃生闹革命，枪林弹雨把敌杀。

半间屋前川水流，革命友谊才开头，
哪有利刀能劈水？哪有利剑能斩愁？

送君送到江水边，知心话儿说不完，
凤里浪里你行船，我打胜仗盼君还。

红二军团大败杨林寺

段德昌率伤病员返回洪湖后，邓中夏对红2军团的何去何从，依然举棋不定，正因邓中夏的此举，使得红2军团遇到了一场恶战，遭到大败。

时国民党湖南省主席、清乡督办何键，湘鄂川边清乡督办徐源泉，分头指挥湘鄂两省及各地云集湘鄂两省的“讨逆军”，杀气腾腾地扑向红2军团。而此时邓中夏却举棋不定，部队停留在杨林寺一带，时何键的李觉部、鄂军夏斗寅部、湘西王陈渠珍部，分路从西斋、宝塔市、官桥、石子滩等处，杀向红6军。这时候，红2军还远在数十里路外的公安城。红6军的16师驻杨林寺，17师驻五十里外的街河市。当各部队向驻杨林寺的军团总指挥部告急时，总指挥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贺龙、柳直荀、孙德清、王一鸣等人都主张部队迅速转移。邓中夏却提出在杨林寺与敌决战。汤慕禹也支持邓中夏。

正这时，一发炮弹打了过来，把庙的耳房打着了，大火顿时熊熊地燃烧起来。开会人正惊愕之时，勤务兵急急地跑了进来，慌张张地向贺龙报告说：“总指挥，敌人已逼近杨林寺了。”

勤务兵这么一说，开会人都面带急色。邓中夏依然平静地说：“大家不要慌忙，敌人是虚张声势。”

贺龙忍不住吼道：“中夏同志，你不要再书呆了，这是打仗，是要流血的。”说着起身跨出门，对两名值班参谋说：“骑快马速去公安，传我命令，令2军向杨林寺靠拢。”说罢，又对汤慕禹说：“命令

16师，迅速抢占杨林寺北山头，阻击敌人前进之路。”

汤慕禹见贺龙目光逼人，又大敌当前，不敢怠慢，立即传下了抢占山头的命令。16师将士終在敌人之前，占领了山头，将进攻杨林寺之敌，阻截于山下。这时候，在街河市的17师，也与敌兵展开了激战，师长许光达，亲赴前沿，带部队与敌拼杀。双方接火之后，便十分的激烈，彼此你冲我杀。阵地上，双方兵力，犬牙交错。从凌晨打到了黄昏，敌兵不退。看看到了半夜，敌人越来越多，贺龙便命令军团指挥部撤离杨林寺，向街河市西的刘家场方向转移。指挥部刚刚行动，突然后面又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众人立时大惊失色。这子夜之中，正不知枪弹从何而来。时邓中夏、汤慕禹、柳直荀、贺龙都一起行走，邓中夏听到枪声，惊问道：“敌军如何从我们背后杀了过来?”

贺龙侧着耳朵听了片刻后，说道：“这枪声很杂，不是国民党的正规部队。”

话音儿刚落，有人跑过来报告，说刚刚收编的土著武装苟七儿队伍反水了。

贺龙当即下令，要卢冬生带领手枪大队，寻找有利地形，阻击苟七儿的反水部队。而后，率军团指挥部，向刘家场方向，且战且走。黑夜之中，但闻四野枪声如同炒豆一般，正不知敌兵多少，看看到了天明，天降大雾。好大的雾，十几步外就不见人影。趁这浓雾，指挥部这才甩开了敌人，查点了一下人数，大多在夜里被敌军冲散，只剩下一些警卫人员。红6军的16师、17师，都遭到了强敌的切割。被打散的部队，趁浓雾未散之机，也纷纷向刘家场方向退去。

红2军军长孙德清，率2军直奔杨林寺，欲解军团总指挥部之围，谁知大部队开拔不久，便与夏斗寅部两个旅遭遇，双方便在水围、网地内拉开了阵势。打来打去，敌兵越来越多。孙德清不敢恋战，指挥部队向杨林寺退去。在一个叫鲇鱼嘴的村子，又与敌一营人遭遇。孙德清命令部队一个冲锋，便将这营敌兵全部解决。从俘

虏口中，孙德清才知杨林寺已被敌军占领，恰在此时，贺龙派的传令兵到了，向孙德清传达了红2军速向刘家场方向撤退的命令。孙德清接到命令，不敢怠慢，立即带部队向西行进。天黑之时，行到街河市，借着镇内灯光，发现街河市也被敌军占领。孙德清刚要下撤退离命令，红2军的行踪被敌尖兵发现，立即，街河市里的敌军都行动起来，刹时枪炮齐鸣。双方展开了一场激战。原来，这街河市的敌军，是夏斗寅部主力。孙德清从敌枪炮声中，知道遇到了劲敌，忙下撤退的命令。这时候，夏斗寅部已将红2军切割了数块，一时间，红2军各师团营连彼此之间，均失去了指挥和联系。孙德清只好带身边人马，急急向刘家场方向退去。部队走了两个多小时，遇到了一个岔道，都不知走哪条道儿好。大家都有些心慌。正在这时，警卫班在路旁一间茅草屋内，见到了一位贫苦农民，经那农民指点，才弄清了方向，一直到了天光大亮，终于甩开了敌人。孙德清查点了一下人数，三停人马失去了两停。由于败仗，部队指战员的情绪都很低落。这时候，又一支人马从后面赶来，顿时，大家一阵紧张，因为经过了一夜的激战，都很疲惫，已无力与敌拼杀。正紧张之时，原来是王炳南部，两支人马合到了一起后，这才又向刘家场方向行进。到了天晚，赶到了刘家场，见到了贺龙，孙德清把部队作战失利的情况简略一遍，贺龙安慰他几句，邓中夏到了此时，后悔不迭。

第二天，又有一些打散的红军陆续赶到，这时，李觉、夏斗寅、陈渠珍三支部队人马又杀向刘家场，贺龙不敢恋战，连忙向五峰、鹤峰方向退走。

“共产军”的冤案

红2军团一直败退到鹤峰境内才收住脚，各师团清理了一下

部队，三停失去了二停人，枪支弹药轻重物资丢失无数，部队士气一下低落了下来。

这一日，红 2 军团退到了鹤峰走马坪。走马坪是鹤峰县内的一个大寨子。在此之前，贺龙曾带红军两次到过这里。红军那严明的纪律，给村民们留下极深的印象。老百姓像待亲人一般待红军。谁知，当贺龙这次带红军到了寨子之后，寨子的人大部都跑光了，那些没来得及跑的人，也都躲进了屋内，关门闭户，像是躲瘟神一般。贺龙听人报告了此情，甚觉奇怪。经了解，才知道前些天来了一支"共产军"，人马有三千，老百姓把他们当做红军看待，孰料这些人进寨子后，拉夫派款，征粮征草，把老百姓害苦了，闹了七、八天才走，所以，这次红军来了，老百姓以为"共产军"又到了，所以都跑了。

红 2 军团住下之后，贺龙便打算派人了解这支队伍的真情，正在这时，忽然接到姐姐贺英送来的一封信，这才知道这支"共产军"的原委。

原来，这"共产军"内有三个首领。一个叫覃伯卿，一个叫甘占元，一个叫张轩。覃伯卿，字正树，四川川东忠县石宝寨人。生于 1898 年，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向往革命。1922 年在成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赤心社"等革命组织，随及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四川第一批共产党员。杨森驻守川东时，覃伯卿在杨森部工作，秘密策反。1927 年蒋、汪反共之后，覃伯卿时在杨森处，由于隐蔽较好，杨森不但没发现他是共产党员，反而要他做秘书并兼任随营军事政治学校教官，从事兵运。1928 年，覃伯卿利用自己在杨森处的身份地位，同雷震寰、周伯仕等革命同志组织兵变。不慎被杨森察觉，兵变失败。覃伯卿遂逃回石宝寨家乡，继续拖队伍，进行武装斗争。先后组织了"平民革命军"、"共产军"，并任四川工农红军第 2 路游击队副总指挥，带着数百名队员，活动在川东一带。1930 年冬，四川军阀刘湘、王陵基、杨森混战之时，川东土著军阀甘占元、

张轩被挤在矛盾之中，有被消灭之险。覃伯卿便以同乡之谊，将这二人团到一起。甘、张二人各有千余人马。这三支队伍合起来人达三千，枪两千余支。挑出了"共产军"的旗号。杨森得知此情后，派兵围剿这支部队。"共产军"见杨森部队来势甚凶，抵敌不住，便退到川东黔江。杨森兵马继续追赶。时至冬日，大雪纷飞，部队在山林中缺衣少食，处境十分困难，开小差的也越来越多。覃伯卿与甘、张二人商量，要将"共产军"拉到湘鄂边，投奔贺龙红军，甘、张二人见杨森兵马围追甚紧，只好点头。这么着，覃伯卿便同甘占元、张轩带着三千余人马，于11月底，到达了湖北宣恩县境沙道沟。住下之后，覃伯卿便打算派人与贺英取得联系。贺英找到鹤峰县委书记汪毅夫说："既然这支部队自称是共产军，还喊出杀富济贫，打土豪的口号，我们可以派人，去了解清楚他们的底细。"

县委书记汪毅夫也觉得贺英言之有理，便同意了贺英的意见。当下，贺英便选派了她那游击队中的副官、长于交际应酬的魏振清和能言善辩的李占奎，去会这共产军。这二人便骑马来到了沙道沟。

覃伯卿一见是贺英派来的人，很是高兴，便说明共产军是来投奔贺龙红军的，请贺英给搭个桥。之后，覃、甘、张三人又热情地招待了魏、李二人一番。魏、李二人临告别时，覃伯卿说："若能与贺英大姐相见，是我们共产军官兵之愿。"

魏、李二人当即表示，一定转达。之后，彼此握别。

魏、李二人回到了鹤峰，见到贺英，把覃、甘、张三人欲见她的话学说了一遍。贺英说："我明天就去。"

大家听说贺英要去会共产军"掌盘子"的人，都劝她不可贸然，免入虎狼之口。贺英说："不然，不入虎穴，焉知底细。"遂不听大家劝阻。

第二天，贺英带着两名游击队员骑马来到了沙道沟。覃伯卿等听说贺英来了，亲自出迎，像待贵客一样，将贺英让到上房。随及摆

茶敬烟。大家一阵客气之后，覃伯卿便又说了他和共产军意欲投贺龙做红军的打算。贺英见覃伯卿言辞恳切，感情真挚，不似有恶意，但觉得甘占元、张轩二人却目有凶光，心藏不善。贺英待覃伯卿说完，便郑重说道："你们要投红军，共产党和苏维埃人民当然欢迎你们。但是，你们的军队首先要爱护百姓，要服从苏维埃政府的命令，听从红军的指挥和调遣。"

覃伯卿说："大姐讲的在理，我们一切都听红军的指挥，听苏维埃政府的指挥。"

当下，贺英又同一些下层的干部见了面，之后，覃伯卿将部队集合起来，要贺英讲话，贺英讲了番苏维埃人民群众欢迎共产军到革命阵营的言语。之后，贺英把情况向县委做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说这支队伍倾向革命，经过教育改造，会成为革命的力量。县委听了贺英的汇报做出了决定，派人给这支队伍送去一批粮食、猪肉、蔬菜等等物资，覃伯卿等见了，很是高兴。随后，覃、甘、张三头领便带着这支队伍，住在鹤峰的走马坪一带。这共产军，除了覃伯卿原来带领的人马纪律稍好外，甘占元、张轩的部队，多系土匪出身，哪里懂得什么群众纪律，住下之后，少不了抓鸡摸狗，连偷带拿，拉夫派差，要粮要草，把所住之村寨，闹了个鸡飞狗跳墙，把老百姓都给吓跑了。事情反映到县委，县委便派了贺英去见覃伯卿、甘占元和张轩。贺英把"共产军"违反群众纪律事一一说，覃伯卿连连说道："大姐，我们这支部队，刚刚合到一起，都不懂得群众纪律，做了不少老百姓不高兴的事。这么吧，我们把人马带到奇峰关一带，等着贺龙军长派人收编。编到贺龙军长队伍之内，这些士兵、官长的土匪恶习，就能改掉了。"

当下，贺英又将覃伯卿的意见报告了县委，县委同意。之后，覃伯卿便将这支队伍，带到了奇峰关一带。

就在这时，邓中夏、贺龙带着红2军团，来到了走马坪。贺英听说红2军团退到了鹤峰，便派人骑快马送来信，向贺龙报告了共产

军欲投红军的情况。

贺龙看了信之后，将信递与邓中夏。邓中夏看罢，沉吟不语，贺龙见状，问道："中夏，你意如何？"

邓中夏说："文常，我等新败，部队疲惫至极，若有战事，必定吃亏。覃、甘、张所部三千人。这三人来投红军，是真心，还是权宜之计，还是另有他谋呢？香大姐信中只讲这支人马来投我们，其它没有提及，若这三人反水，他们三千人马，我们可吃不消哇。"

贺龙说："覃伯卿这人我不熟，甘占元、张轩我知晓。均是川东土著小军阀，曾依附过刘湘、王陵基、杨森等，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

邓中夏眉头拧着说："他们为什要投红军呢？"

这时，柳直荀、王炳南、孙德清诸将都走了进来。邓中夏把贺英的信给三人看了。三人都说此事宜慎重。柳直荀说："不管这三人是否真心，如今他们既然相投，我们总要以礼相待。可派人送信与覃、甘、张三人，要他们来此相商收编一事，我们也能从中察看他们是否真心。"

柳直荀的话，大家都觉得有理。贺龙想想说："此事是我姐接的头儿，我看还是要她代劳吧。"

贺龙言语，邓中夏等均同意。当下，邓中夏以贺龙口气写了封信，派人送与贺英。贺英接到信后，立即带上两名游击队员，一名赵福，一名赵禄，飞马来到奇峰关。到了关前，有士兵拦挡，贺英说："速去通禀覃司令，就说贺英来拜会。"

那个士兵听了，上下打量了贺英几眼，见贺英气宇不凡，便说了声"请等"，而后飞身入关。

覃伯卿三人，也听说红 2 军团来到了鹤峰，正要派人去联系，忽听贺英来了，很是高兴，覃伯卿带甘、张二人亲自出关相迎，将贺英让到司令部内，分宾主落坐，有人献茶。贺英便取出贺龙写给覃、甘、张三人的信。覃伯卿接过一看，那信写道：

覃、甘、张各位司令台鉴：

久闻雅名，曷胜佩感。欣悉贵军远道而来，光临敝区，特派员面谒，以慰风霜之苦，并表欢迎之忱。贵军有何需求，希予贺英面商，自当鼎力襄助，幸望各司令约束所部，勿致扰害庶民，为祷。

临书不胜，企盼之至。敬叩。

钧安

贺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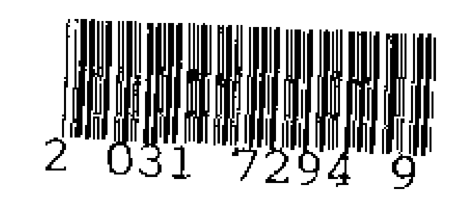
中华民国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覃伯卿看罢贺龙的信。真是高兴异常，他把信交与甘占元，又对贺英说："大姐，我等盼归贺龙红军，如大旱盼甘露。今日得知贺军长到了，真是喜从天降。请大姐转告贺军长，对于贺军长的关怀，我们从内心中感谢。对于贺军长为改编我军所提的条件，我们全部服从。"

贺英见覃伯卿如此诚恳之态，也很高兴，便说："覃司令的态度，我定转告贺龙。"

当下，双方又谈了些旁话，贺英遂同覃、甘、张三人告别。飞马来到走马坪。到了红2军团司令部驻地。贺英见到了贺龙，姐弟相会，一番别后之情，不必叙述。当下，贺龙又将邓中夏、柳直荀、孙德清、王一鸣、王鹤等2、6两军负责同志，向贺英一一做了介绍，众将都早以闻知贺英英名，今日相见，自然都很高兴。邓中夏说道："大姐，我们有你这样一个革命的好大姐，真是高兴。"

贺英笑道："中夏同志，你过奖了，我若能给党做些事，也是共产党教给我的。"贺英说毕，便将覃伯卿的言语、态度向贺龙、邓中夏说了一番。贺龙听后，问道："姐姐，照你说来，那覃伯卿投我们，是一片诚心了？"



贺英说："覃伯卿态度真诚无疑。只是甘占元、张轩二人跟随心转的，倒要提防。"

柳直荀说："我们下个请帖，把这三人请来，当面谈谈。"

柳直荀的意见，大家都同意。就在这时候。红 6 军侦察员抓到了一名侦探，从这人身上搜出了一封信。什么信？贺龙、邓中夏一看，是甘占元、张轩私通夏斗寅的信，信中说他们诈降红军，寻机取贺龙之首。贺龙见了大怒，决计席间杀死甘占元等三人。次日，三人到红 2 军团赴宴间，被红军处死。

到了 1985 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了四川省委组织部为覃伯卿平反的报告，肯定了覃伯卿的革命功绩，覃伯卿之死，属于错杀。因甘占元、张轩投夏斗寅，覃并不知晓。

覃、甘、张被斩首之后，红 2 军团收编了这三千余人马。1931 年元旦，天降大雪。在这大雪之中，在走马坪前坪坝上，红 2 军团召开了收编大会。贺龙站在了雪地之中，亮着嗓门儿对收编的兵将说道："从今以后，你们就是红军了。不错，我贺龙是红军的军长，可我是有'老板'的，我的老板就是共产党。我们大家要一起听共产党的话，为穷苦人打江山，争天下！"

红 2 军团在走马坪收编之后，前委便在走马坪召开了扩大会议，做出了依托五峰、鹤峰，进军石门，创造武陵山根据地的决定。元月中旬，红 2 军团主力出师石门。

第十六章　夏曦赴洪湖

下车伊始

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何键，自杨林寺一战大败红2军团之后，为加强对湘西的控制，将陈渠珍部编为新34师，对其它各土著武装也封官加衔。任命李觉为第1区“剿匪”司令，统一指挥湘西各“清乡”部队。蒋介石并对陈渠珍通令嘉奖。红2军团出师石门之际，正是李觉、陈渠珍得意之时。在石门县境内白沙渡，红6军与陈渠珍的新34师及罗效子保安团接了火，双方激战一日，在红6军与敌激战之时，红2军乘胜占领了石门。国民党李觉、李国钧两部立即从津市、澧州增援，并出动飞机助战。红2、6两军遂与敌激战，双方大战一日，红2军团未能将敌击退，在强敌之下，只得再退鹤

峰、五峰一带。这时候，正值隆冬时节，寒风凛烈，大雪纷飞。红军缺吃少穿，加之连续战斗，不得休整。处境十分艰难。无奈，前委做出了决定，将红2军团开赴枝柘坪，进行了一个月的休整。这一日，大雪纷飞，朔风正紧，邓中夏与贺龙围着炭火谈心，贺龙说："中夏，部队下一步的行动，不知你是如何想的？"

邓中夏说："是啊，我也在考虑。我这样想，天暖之后，我们应当向荆、当、远发展。开辟荆当远根据地，而后，再向武当山发展，建立像井冈山那样的革命根据地。"

贺龙说："中夏，部队的干部战士可都是洪湖人呀，大家都要求打回洪湖。洪湖现在正面临着敌军四面'围剿'的灾难。"

邓中夏摇头说道："云卿，古语云，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你想想，敌人大部队正'围剿'洪湖，如果我们杀向洪湖，恰中敌意，不但解决不了洪湖之困，反有被敌灭我之危险。所以，我们应当上山，而不能下湖。"

贺龙说："中夏，我总觉得我们的行动，是流寇行动。我们应当依靠洪湖苏区的人民，战胜敌人，保卫苏区。"

正在这时，有人报告，说湘鄂西特委派交通送来了信。邓中夏忙把交通让到屋中。交通撕开衣襟，从中取出一封信来，双手交给了邓中夏。邓中夏将信接过来，不看则罢，看过信后，他脸上登时失色。随后，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也把信看了。看后，也是默不做声。

湘鄂西特委送来一封什么信呢，原来，此时李立三已下台，王明的"左"倾中央当政。派夏曦赴洪湖苏区，接替邓中夏的职务。前文述过，1930年3月，王明把夏曦派到了洪湖苏区，要其成立以他夏曦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取代邓中夏的一切职务。并要邓中夏速回中央检查执行立三路线的错误。夏曦到洪湖苏区之后，第一道圣旨就是撤掉邓中夏的职务。按照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指示，将红2军团改为红3军，由唐赤英为红3军政委。随后，便派了交通，将中共中央给湘鄂西特委的信，湘鄂西中央分局给红2军团前

委的信送与红 2 军团前委。信中说：在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期间，反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占据了领导地位而统治着全党，领导全党走上冒险盲动主义的道路。而中央政治局在接受了国际来信后，仍经过对立三路线调和的犹豫。在国际代表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上，才彻底的揭发立三路线和六届三中全会在翟秋白领导下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同时改造了中央政治局，撤销了几个对立三路线主要负责的中央委员及政治委员，增加了中央委员新的成分。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四中全会上不仅反对了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并严厉地指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四中全会，反国际路线、反党的企图。信中又说，湘鄂西党自邓中夏到后，否认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而说中国革命发展走向平衡。没有巩固苏区建立根据地与改造红军的根本认识，而只凭脱离群众的军事行动，来企图取得大城市乃至最大城市。这完完全全是立三路线不要根据地的冒险盲动主义的策略。除带着红 2 军团实行“上山”逃跑主义外，连土地革命的影子都找不到。这是立三路线发展的必然结果。有了前线上脱离群众的军事行动，于是在后方就必然使富农路线继续存在与发展。

中央给湘鄂西分局的这封信中，把个邓中夏说了个一无是处，说他是立三路线在湘鄂西苏区的典型代表。是湘鄂西苏区出现的种种问题的罪魁祸首。湘鄂西中央分局给红 2 军团前委信最后写道：

> 一、兹遵照中央决定，撤消邓中夏同志各种职务，并派唐赤英同志去代理政委工作。全军同志应在云卿、赤英两同志领导之下，坚决执行中央及中央分局的指示，彻底改变红二军团的政治路线。
>
> 二、依照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前委应取消，由总指挥、政委负责全盘工作。在必要时可开军事会议，二军团

改编为红三军，共编两个师，仍以贺龙为军长，赤英代政委，其余负责同志，依次改编。

三、部队东下时须留比较可靠武装，并放得力军事人才，巩固五峰鹤峰政权，决定以周小康为中央分局特派员留在当地指导各县工作。

四、按照中央决定，湘鄂西特区党中央分局已于三月二十七日组织成立。由夏曦同志任分局书记。

邓中夏、贺龙看了中央分局的来信后，彼此默默无语。

罢官邓中夏

贺龙、邓中夏看了中央分局的来信后，彼此默默无语，好一阵，邓中夏对贺龙说："真是不讲理了，我邓中夏到洪湖，所执行的哪一点不是中央路线？哪一点不是国际主义路线？两条路线我都执行了，我有什么错误？"他唉唉两声说："也许王明认为我和立三都是搞工运的，平素关系不错，在莫斯科也情投意合，就把我和立三划成了等号。"

贺龙说："王明是个什么人？"

邓中夏说："二十五六岁的青年。背念马列书有一套。"

贺龙摇头说："二十多岁便进政治局，太嫩了。"

邓中夏点了支烟，吸了两口，抬眼问贺龙，"云卿，我们相处数月了，你看我有什么缺点呢？"

贺龙见邓中夏目光恳切，便说："中夏，你在党内资历很深，为人光明磊落，真诚坦率，这方面，我们就不说了，我觉得，你最大的弱点，是摆老资格，听不得大家的意见。又不看红2军团实际，而是上边怎么说你就怎么干。"

邓中夏听了，默默无语。贺龙说："中夏，如今中央要我们改成3军，派唐赤英来任政委。赤英还没到，便是到了，我看政委还是由你来任吧，我出头向中央请求。"贺龙停了一下又说："一个人有了过错，要允许改正么。"

邓中夏说："还是按中央的指示办吧，是非自有公论。咱们开个前委会，传达中央和分局的指示，把2军团改为3军。"

贺龙说："马上开会我同意，可政委还是由你来任吧。如我们请示后中央还不同意，那再随你意见。"

邓中夏很感激地望着贺龙，没有说话。当下，邓中夏便召开了红2军团前委会，邓中夏宣布了红2军团改成红3军的指示后，会场立时哗然。王一鸣本是个少言寡语之人，第一个发了言，他愤愤不平地说："红2军团南下失败，又远离洪湖到这湘鄂西山区，红军、洪湖苏区蒙受损失，这是中夏同志的逃跑主义的错误，中央把红2军团改变为红3军，这不是对邓中夏同志一人的处分，是对红2军团官兵的处分，这样的处分是不公正的。"

王炳南豹眼圆睁说："队伍拉到洪湖，先把立三路线搞清楚，是谁的错误谁承担！"

邓中夏说："同志们，我邓中夏来湘鄂西后，犯了错误，错误无论多大，全部责任由我负，与同志们无关，我同云卿交换了意见，自我当2军团政委以来，听不得同志们意见，一意孤行，这也是我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在这里，我向因我的错误而受害的同志们道歉，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只管提出。"

邓中夏说的诚诚恳恳，他这么一讲，使得许多工农出身的领导干部，反倒没了话说了。好一会儿，王炳南又接着说："中夏同志，红2军团许多失利之处，责任不能由你一人来负。"

邓中夏把手一摆说："不，责任主要是我。"

邓中夏的为人，从来光明正大，正直无私，他在洪湖苏区和军队的建设上，确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而这错误有主观的，也有客观

的，主观的是他不懂军事，又有个人英雄主义，这使他目空一切，没有注重实际，客观上是李立三的盲动主义路线，促使他犯了这种错误。

邓中夏的态度使前委们都很受感动。当下，会议研究了改编事宜。按照中央的指示，红2军团改编为红3军。军长贺龙，因为唐赤英未到，政委仍由邓中夏担任。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直荀，下辖7、8两个师，7师师长王一鸣、政委李剑如；8师师长许光达、政委王鹤。原来的湘鄂边独立团改为教导第1师，由王炳南任师长、陈协平任政治委员，留在湘鄂边坚持斗争。

部队改编之后，已时至4月，春风千里，柳绿桃红。此时，红3军经过了休整，部队元气已恢复，贺龙、邓中夏经过研究，决定东进洪湖。红3军将士听说打回洪湖，顿时士气大振。个个摩拳擦掌，要为洪湖父老排忧解难。这一日，大军出发，第一天，便拿下了巴东县内野三关，歼灭川军戴天明旅，跟着占了巴东城。这巴东位于长江南岸。因地处大巴山东，所以叫巴东。古属巴国，战国时属楚，东汉末年益州牧刘璋设"巴郡"、"巴东"、"巴西"三郡，隋改巴东县。巴东坐落在巫峡和西陵峡之间，背山临水，是鄂西山区的门户、交通枢纽。红3军占了巴东后，第二天便渡过了长江，7师占兴山，八师占秭归。这兴山秭归均位于长江北岸。秭归是屈原的故乡。在距秭归城一里处，有个屈原沱，岸上有屈原庙，四时香火不断。红3军占兴山、秭归之后。紧接着向东发展，又打下了远安、荆门。红3军克远安之后，贺龙要王一鸣率8师攻沙洋，而后进入洪湖苏区。

邓中夏知此布署后，忙找贺龙，连说不可。贺龙说："中夏，部队进入洪湖，是湘鄂西特委的指示，3军将士也为此呼声甚高，怎么又改变了主意？"

邓中夏说："云卿，我还是原来的那句说过多次的老话，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必死。"他见贺龙不语，又说道："云卿，这不是中央路线之争，是具体的问题，我自信不会错的，你就依了我吧。"

邓中夏如此之说，贺龙心中虽然不赞成，也只好依从了。于是贺龙便按照邓中夏的意见，命令7师攻打当阳。这当儿，夏斗寅部从宜昌、沙市两路向当阳增援，双方激战一天，均伤亡很大，而当阳城也没有攻下。邓中夏急了，便下令王一鸣带8师从荆门出发至当阳，同7师一起，攻打当阳。

红7师撤离远安攻打当阳之后，远安随即被敌占领。这时候，夏斗寅见是红军主力到了，一面电告武汉派兵增援，一面纠集在洪湖"围剿"的各路兵马，"进剿"红3军。贺龙、邓中夏见敌兵云集，只得率部队向敌力量薄弱的北边撤退。一直退到了距荆门、当阳、远安百余里的马良坪一带，才停留下来。这当儿，新任命的湖北清乡督办徐源泉，接到了夏斗寅的告急电报后，立即命令他手下的范石生、赵冠英、郭勋忠各部，计五个团的兵力，分四路向红3军进逼。在马良坪，红3军与敌激战数日，未能将敌击退，只得突围北撤，经歇马河、保康、进入鄂西北地区。红3军自枝柘坪出发以来，转战千里，部队伤亡很大，处境十分困难，贺龙、邓中夏等人，决定以房县、均州为依托，创建鄂西北根据地。

鄂西北这个地方，处于鄂、豫、川、陕边界的武当山区，地形险要，物产丰富。但这个地方群众落后，道教盛行，因而，建设苏区的难度较大。

红3军到了鄂西北地区的崇山峻岭之中，进攻的第一座县城便是均州，这均州位于鄂、豫、陕三省交界，南靠武当，北临汉水，环城是一道三丈六尺高的石砌城墙，当地百姓记忆之中，均州从没有被打开过的先例，因此，均州城素有"铁打的均州"之称。这均州城中住有国民党土著军阀张恒景的一个独立团和八大土豪。红3军经过一夜攻打，均州被攻克。

均州解放第二日，红3军便在城中中山公园开了公审大会，枪毙了八大土豪。并将公园改名红军烈士公园。柳直荀为公园撰写了对联。联文是：

铁打均州被红军所破；
钢铸头颅为工农牺牲。

红3军在均州驻了月余，徐源泉又集重兵围攻，均州不能立足，贺龙遂率部向武当山撤去。

武当山乃是著名的道教圣地。位于均州地界。武当山又名参上山、太和山，山势极其雄伟秀丽，周围四百公里，下临汉江。武当山共有七十二峰，三十六岩，二十四涧，其风景超过五岳，因而明初皇帝封为"太嶽"。到了嘉靖年间，被封为"玄嶽"。远在唐代，便有人在此山中苦心修炼。明朝洪武年间，有个叫张三丰的人，在此山中结庵，这张三丰名叫张全一，又名张君宝，因他衣冠不整，外号"邋遢张"，辽东人。张君宝在武当山中聚徒讲道，行侠仗义。逐渐的被人们传为真仙，称做"通微显化真人"，洪武、永乐两帝均派人去访他，真人只是不见。如此，使得这五当道教声望愈来愈高，终于闻名四海。武当山道教古迹很多，真是五里一宫，十里一殿。主峰紫霄峰，海拔一千六百多公尺，峰顶上有规模宏伟的的紫霄宫。每当太阳一照，紫霄宫金碧辉煌，十分气派。红3军到武当山时，山上尚有万余名老道。五当山周围八百里，都是"庙田"，种地的老百姓全都信道，若不信道，就不得庙田耕种。

红3军到了武当山下，政治部主任柳直荀便主持召开了政工会议，要求各级政工人员，对部队进行教育，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不准毁神像，不准在庙里驻兵。会议之后，各政工人员立即实施。部队果然注意纪律。红军的行动，受到百姓和道士们的拥戴。九十高龄的老道长张妙香闻知红军如此深明大义，派人送下一块匾，上写道：

仁义之师，亘古未有

红3军在武当山下稍事休息，便欲翻山到山南房县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时候，部队里有一批伤病员，需要治疗和休养。这些伤病员随部队一起行动又不便，贺龙、邓中夏、柳直荀、孙德清几个人一合计，便决定同武当山道士相商，把伤病员留在武当山庙中，伤好后再归队。武当道士欣然同意。后来，国民党反动派军队进山搜捕这批伤员，由于道士们的掩护，伤病员都平安无恙。

邓中夏、贺龙在武当山安置了伤病员后，便率红3军翻过五当山，到达山南房县。房县之敌，闻之贺龙部队开了过来，早已望风而逃，红3军兵不血刃地进了房县城。

房县位于湖北省大西北，在大巴、武当两山之间，南北窄，东西宽，最大直径有千里之远，因之，素有"千里房县"之称。这个地方，山峦起伏，水陆罔利，舟车商贾缩迹。红3军到了房县之后，立即和当地的党组织召开了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共鄂西分特委，柳直荀担任了分特委书记并兼任房县县委书记。

红3军到达房县不久，也就是1931的7月，国民党"剿赤"军即兵分两路进攻房县。第一路是国民党鄂军51师李杜中部和32师赵之启部，共五个团，从石花街方向向房县进攻；另一路是张连三、马连生部，从郧县方向进攻。张、马二人均系鄂豫边界惯匪。张连三外号"张牛脸"，马连生外号"马大脚"。这两名惯匪，勾结土豪劣绅，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国民党将其二人收编，都委以师长的官衔，二人接到攻打红3军的命令，摇头摆尾地要为党国"剿共"立功，遂带本部人马，杀向房县。

贺龙亲率人马打败马大脚部。这时候，红8师也将敌兵击退。于是，红3军便在千里房县建起赤色政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运动。查禁毒品买卖，扫荡地痞流氓。建立起十四个区的苏维埃政权。这时候，邓中夏、贺龙、柳直荀、孙德清等负责同志开了会，决定留下柳直荀带一部分兵守房县，邓中夏、贺龙率红3军主力向

外扩展。扩大房县苏区。决定之后，邓、贺二人率部队出房县向东南方向开进。这一日，打到了一个叫青锋镇的地方时，从几个买卖人口中，得知洪湖的红军正沿着襄河北上，已打下了荆门。青锋镇距荆门不过二百多里远。将士闻知此信后，都纷纷的要求部队南下荆门，与洪湖红军会合。邓中夏听了，连连摇头说："部队若返洪湖，刚刚建立的房县根据地，岂不是完了嘛？"

贺龙听了，对邓中夏说："先打南漳吧，打下南漳，再具体相商。"

于是，红 3 军从青锋镇出发，南下一举攻下了南漳。南漳打下后，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这个会上，要求南下荆门与洪湖红军会合的呼声愈烈。邓中夏问贺龙："你的意见呢？"

贺龙说："我的意见，坚决的南下，并速派人与洪湖红军联系。"

邓中夏沉吟了一下说："若是联系不上呢？"

贺龙说："真的找不到，那就再回房县苏区嘛。"

邓中夏拧着眉头，没有言语。正在这时，有一人汗流浃背地走了进来，说了番言语，这人的话音儿刚落，在场之人，无不瞠目结舌，那贺龙听了，竟大叫一声翻身栽倒，晕了过去。

来人说了甚言语，竟引得众将失色？说来话长。

夏曦"锋芒"初露

前文述过，红 2 军团成立之后，邓中夏来到了洪湖苏区，第一个拿周逸群开了刀，撤销了周逸群的职务，要其改做地方工作。虽然红 2 军团许多将士对此不满，而周逸群却毫无怨言，他担任湘鄂西特委代理书记后，便结合湘鄂西的具体情况，领导洪湖及湘鄂边军民，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斗争，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到了 1930 年 11 月，便使得洪湖苏区拥有 11 个县的政权，红色

区域也纵横千余里。此外，还有大片的游击区。

这时节，蒋冯阎中原大战结束，蒋介石第10军军长徐源泉为湘鄂川边区清乡督办，统一指挥第48、34、11、新11、新34师及川军第21军之教导师和新2、3、5、7旅、暂第19旅、湖北警备旅，共计五万敌军分江南江北两路，"围剿"湘鄂西苏区。江南一路之敌与红2军团在津市澧州决战，江北一路之敌，约两师七旅之众，并纠及了各县乡反动武装，大举向江北洪湖苏区内进攻。

敌军先占了监利、再占潜江、沔阳，接着又占了江陵的郝穴、新厂、普济观等地。在徐源泉部大举进攻苏区之前，周逸群便写信与红2军团前委，信中写道："倘1、3军团继续进攻长沙，则理应配合，否则2军团应速返洪湖，准备迎击敌人的'围剿'，以求根据地向外发展。"

时邓中夏正醉心于攻取大城市，哪里把周逸群的意见放在心上。由于红2军团南征之时，将洪湖苏区的地方武装力量也差不多都带走了，所留之枪，好坏仅八十余支。集各地武装，也不过三百人左右，这点点武装，如何与徐源泉部抵抗，周逸群见主力不回师洪湖，无奈，只得将这三百余人队伍转移到赵家河一带芦苇丛中，坚持游击战争。这样，洪湖各苏维埃区县，几乎全部失守。

国民党军队占苏区之后，那些土豪劣绅也都重返洪湖，一个个立时还了阳，对苏区人民，实行了血腥镇压，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干部群众，数以万计。仅汊河口一带，两天之中，共产党员就被屠杀七十二人。在戴家场，杀害群众八千余人。在张家沟，一次就烧毁民房几百间，群众愤怒的唱道：

铡刀下，把话讲，土豪劣绅，一群狗党，休要猖狂，革命人你杀不完，有朝一日，血债定要血来偿！刀放颈上不胆寒，英勇就义——壮！壮！壮！

铡刀下，不变节，要我说党，我决不说，死我一个又若

何？革命者杀不绝。直到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宁死不屈

——烈！烈！烈！

形势越发险恶，周逸群数次派人向红2军团告急，邓中夏都率部队在杨林寺一带徘徊。周逸群无奈，只得率这三百余人与强敌周旋，这时，敌军探得周逸群率游击队在芦苇荡中，便一面对芦苇荡实行包剿封锁，一面在芦林中洒上汽油，点火烧荡。在这生死关头，周逸群将党团员组织起来，冲在前头，趁黑夜突出了重围，转移到江南桃花山一带。

1930年12月底，段德昌被邓中夏撤掉红6军长职务，改任洪湖赤卫队总队长后，带伤员回到了洪湖，在桃花山与周逸群会了面。周逸群见段德昌来了，非常高兴，他紧握着段德昌的手说："德昌，你回来的正好，洪湖人民正需要你哩。"

段德昌叹口气说："可惜同我一起来的，都是老弱残兵。"

周逸群说："有洪湖几十万人民，何愁没有队伍，当初你我拖枪时，也不过是几个人，几条枪，今天，虽强敌压境，终今非昔比，只要我们紧紧依靠苏区人民，队伍很快就会拉起。"

这时候，彭国材、段玉林也一起来见段德昌，原来，红2军南征时，彭国材、段玉林二人所领导的地方武装，都编入了2军团内，他二人被留下做地方工作。敌军大举进攻洪湖后，彭、段二人便同周逸群一起，带领这三百多人游击队与敌周旋。当下，彭国材对段德昌说："老段，保卫洪湖的担子不轻啊。"

段玉林发急地说："为什么主力不返回，解决洪湖危难？"

段德昌愤愤地把邓中夏的决定学说了一遍，周逸群、段玉林、彭国材都气得说不出话来。段德昌用拳头一擂胸膛，说："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没有过不了的火焰山！"

当下，大家研究一下，把伤病员转移到苇荡中隐藏起来。段德昌又把游击队进行了整顿。群众听说段德昌回来了，纷纷把子弟送

到段德昌身边，说跟段军长保卫洪湖。一时间，队伍扩大到到六百多人。

这天，段德昌正同段玉林、彭国材商量工作，周逸群走了进来，他心情沉重地说："老段，刚才接到了松滋县委的报告，2军团在杨林寺作战失利，伤亡重大，部队已向鹤峰、五峰一带转移了。"

段德昌听了，高挑着浓眉，半天没有言语。彭国材也默然无语，过了好一会儿，彭国材说："邓中夏是我们党内的老同志了，革命斗争经验很丰富，怎么竟使人大失所望呢！"

段德昌猛地一拍案子，对周逸群说："主力走了，保卫洪湖苏区的重担，全落在了我们肩上了。我们一定挑起来！"

正说着，段玉林走了进来，说："石首县委来了人，讲了个情况，在杨林寺被敌冲散的6军杨嘉瑞营、陈光明营，还有2军的12团，合计人枪一千多，都到了石首县城北江边上。"

段德昌一听，立时脸放光彩，说："我去接他们。"

周逸群也很高兴，段德昌把工作略做交待就走了。

长话短语。段德昌集合了这些队伍，又将原来的数百人游击队编到了一起，成立了洪湖独立团，段德昌为团长。独立团成立之后，决计对"围剿"洪湖苏区之敌予以惩处，以灭敌之威风，长群众之志气。为打好这一仗，周逸群、段德昌、段玉林、彭国材、陈光明、杨嘉瑞等军政干部，开了军事会议，将敌情进行一番分析。最后，选中了敌徐源泉部48师，这48师是徐源泉的起家部队，装备优良，师长薛伏虎，好大喜功，目中无人，进得洪湖以来，烧杀奸淫，无恶不作，又得知红军主力远离洪湖，更是肆无忌惮。在白庙镇，薛伏虎将十名共产党员捆绑在树上，亲手持牛耳尖刀，将这十人开膛破肚，取其心肝下酒。老百姓闻之此人无不胆寒，呼其为薛老虎。周逸群、段德昌等经过研究，便决定出其不意地收拾48师之敌。

这一天，有侦察员报告，说薛伏虎传了命令，第二天他亲带一旅人马扫荡周家咀。段德昌决定打薛部的一伏击。这天夜黑，段德

昌将独立团带到了一个叫东港口的地方，这东港口是敌必经之路，侧面是东耳湖，有一条丁字河道与湖相连。段德昌便将部队埋伏在丁字形河堤芦苇丛中。天破晓时，薛伏虎带一旅之众来到丁字堤旁，敌军毫无准备。进入伏击圈后，段德昌一声枪响，红军将士从四面出击，杨嘉瑞率骑兵连冲入敌群，战士们挥刀杀来砍去，把满腔仇恨都集中于此刻。彭国材带着两个连偷过西耳湖，截敌后路，段玉林带一营入正面堵击。由于敌军毫无准备，更没想到红军尚有如此强大的部队，还以为是红军主力到了，这一惊一吓，顿时溃不成军。死的死，伤的伤，剩下的都逃入湖中，一部分做了俘虏，一部分被水淹死。薛伏虎逃跑不及，跳入湖中，也被淹死，后被群众从水中捞出，将其尸体点了天灯。

东港口大捷，是段德昌重返洪湖后的一次关键性的胜利，这决定性的胜利，可把敌人吓坏了，纷纷传说老牌子红军回到了洪湖，自此，那“围剿”的敌军，一个个日夜提心吊胆，生怕遭到红军的袭击。这胜利顿时鼓舞了苏区人民。

洪湖独立团大捷之后，军威大震。苏区的青壮年，纷纷加入这支部队。周逸群便召集了湘鄂西特委会议，决定将独立团改为新6军，段德昌为军长、周逸群任政委，下辖江左江右两个师。分别由段玉林、董朗负责。会议的这一决定上报湖北省委后，省委很快批复，同意周逸群的报告。周逸群又号召苏区的党团员，坚决的反对逃跑主义，不怕流血牺牲，领导群众保卫苏维埃政权。于是，周逸群、段德昌同大家一起，协力同心，率领这新6军，依靠洪湖水网、湖泊、堤岸，苇荡、柴林等有利地形，依靠苏区革命群众，同“围剿”之敌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1931年的2月，敌军又集重兵，分四路向苏区进攻，第1路自潜江沿东荆河两岸由北向南进攻；第2路由沔阳向瞿家湾进攻；第3路自螺山向北发展，经朱河向柳家集合围；第4路经监利进占观音寺。有侦察员将敌之行动报告了周、段诸将。周逸群问计于段德

昌。段德昌一拍脑门儿，有了主意，说与周逸群，周逸群听罢，忍不住赞道："德昌真是将才。"

当下，段德昌布置了人马，命段玉林率一部人马在荆江两岸骚扰敌兵，寻敌小股部队以杀之，将敌兵拖住。命董朗带一部人马在监利至观音寺一带苇荡中多设疑兵，将敌牵住。又命杨嘉瑞带一营人马在朱河、汴河一带，伏击敌兵。这三路兵马与敌交战，均要避实就虚，以拖住敌人为主。段德昌亲率新军主力，与敌第 2 路兵马交锋。

敌兵第 2 路，乃是徐源泉手下干将刘培绪部、陈诚的嫡系容景芳部、川军郭勋部，共三个团，这三个团，又分三路，经镇山方向向瞿家湾进攻。

时值腊月，天短夜长。敌兵也一改往日白天进攻的战术，改为夜间进击，趁夜色偷袭所进攻的目标。段德昌针对敌兵这一情况，便在白天动员群众挖渠筑垒，摆出一副要与三面之敌决战的样子。段德昌这一行动果为敌军探子探之。

是夜子时，敌三个团之兵，人下鞍、马下环、悄悄地分路接近了红军阵地。段德昌引得三面之敌开火之后，立即用金蝉脱壳之策暗传命令，使部队悄悄撤走。这黑夜之中，敌军分不清彼此，只听得对方枪响，便疑是红军，又不知红军有多少，不敢冲过去，只有枪炮射击，枪炮越打越烈，这三个团，互相打了多半夜，到了天明，方知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了。看看，彼此人员损失近半，真是哑叭吃黄连，有苦没处诉。这时，段德昌又带大队人马冲杀过来，敌三个团立时土崩瓦解。

段德昌大败敌第 2 路兵马后，又率新 6 军偷袭了第 1 路敌兵，生擒敌新 3 旅旅长李步高。敌兵另外两路，得知红军大胜的消息，又遇红军的日夜骚扰，不敢再继续进攻，悄悄的撤退。暗观时机，不敢贸然。

这时节，已到红梅落地、梨花初开之时，洪湖苏区，也似这时令

一般，寒冬过后，春意盎然，各方面工作，开始复苏。

就在这个时候，王明路线在湘鄂西苏区的代表——夏曦来到了洪湖。

这夏曦与周逸群、段德昌彼此原都认识，大家见面，自是一番高兴，特别是周、段二人，听到中央撤换了李立三的领导，批评了李立三的“盲动主义”错误路线，撤换李立三在各苏区的代理人，十分的高兴，段德昌不由得长出一口气，说：“李立三、邓中夏可把洪湖苏区害苦了。”

周逸群叹口气说：“多少烈士的鲜血，换来了立三路线的教训，这教训是惨痛的。”

夏曦把手一摇，说道：“以后就好了，王明同志已经主持了中央的工作。”

段德昌问周逸群：“逸群，王明同志你认识吗？”

周逸群说：“没见过面，只听说过。”

夏曦接过话道：“王明同志就是陈绍禹，他可不是个简单的人，你别看他才廿五六岁，十分精通马列，是我们党内手屈一指的理论家。王明同志对马列经典，倒背如流。深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赏识。”

段德昌说：“年龄大小，不足为论，姜子牙八十尚辅周朝成天下，周公瑾年少为都督大破曹兵，只要王明同志能领导全党早日完成党的事业就好。”

夏曦笑道：“那自然不成问题。”

段德昌又愤愤地说道：“立三的‘左’倾盲动路线可把我们害苦了。我们每个同志都有切肤之痛。”

段德昌话刚到这儿，夏曦立即说：“德昌，我要纠正你的话，李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左’倾，是右倾，在当前，在我们的党内，右倾依然是主要的危险。”夏曦振振有词地说：“王明同志号召我们，要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共产国际和新的中央号召我

们，要尽早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

夏曦话音儿一落，段德昌立即说道：“我认为我们党内的错误，应当是反‘左’，不是反右，尽快争取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提法不实际，这还是李立三路线的继续！”

夏曦盯了段德昌一眼，而后手指头当当地敲着桌子说道：“德昌，错了，我们党在全国范围内的路线，是进攻的路线。”夏曦几乎喊道：“要进攻，进攻，勇敢的进攻，不断的进攻！坚决的进攻！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已经到来！”

段德昌见夏曦这个样子，还要说什么，周逸群向他丢了个眼色，段德昌才把话咽了回去。可他却激动得眉稍直抖。周逸群说：“夏曦同志，你先休息一下，工作，回头我们详细汇报。”说着，周、段二人离开了夏曦的住处。

出了房门，段德昌便忍不住对周逸群说：“逸群，这夏曦身上的味儿不对。”

周逸群说：“夏曦也是我们党内的老同志了，工作经验丰富，在大革命时期，他与郭亮、毛泽东同志齐名。党中央派他来洪湖，一定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我们要多听听他的意见再表态。这也是对老同志的尊重。”

段德昌哼了一声说：“百万敌兵不可怕，只怕混蛋的领导！”

夏曦同周逸群、段德昌会面之后，又随新6军来到了周家嘴。这一日，周逸群、段德昌向他汇报了洪湖苏区反“围剿”的经过，汇报了苏区建设上的各方面情况，夏曦听了，麻搭着单眼皮儿，紧闭着薄嘴唇儿，不吭气，使得周、段二人，不置可否，猜不透这位中央代表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第二天，夏曦又到周老嘴街上里里外外地转了一趟，找些人扯了扯。晚上，夏曦对周逸群说：“通知各县苏维埃主席，我要开会，传达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

周逸群听了，立即说：“夏曦同志，现在开这样的代表会议，怕

不合适吧。”

夏曦看了周逸群一眼，说：“有什么不合适的？”

周逸群说：“虽然目前敌军大的‘围剿’停止了，可各县委都准备迎接敌人新的‘围剿’，恢复敌人破坏的各种组织，开展各种工作。各县县委机关地址不定，多是‘挎包’县委，一下很难通知，另外，把这许多领导同志集中起来，万一遭到敌人围攻，那损失可就大了，会，能不能分片开呢？”

夏曦听了，不高兴地说：“逸群，你们的思想，就是受立三路线的流毒的影响太深了。如今，共产国际和中央就是要纠正这种思想，我召集会议，就是要纠正洪湖苏区各级负责同志的这种右倾思想。”

周逸群遭到夏曦的一顿抢白，不说话了，夏曦说：“通知各县苏维埃主席，速到周老咀开会，有许多重大问题，我要传达，若分片开会，时间太拖了。”

周逸群见夏曦态度坚决，只得点头。

洪湖苏区自反“围剿”以来，各县苏维埃主席，县委书记都成了“挎包主席”或“挎包书记”，无有固定办公处。或芦苇荡中，或渔舟之内，带领人民群众，与敌周旋。周逸群、段德昌四处派人，才总算把这些同志通知到。于是，这些同志便陆陆续续地来到了周老咀。连湘鄂西特委各级负责人在内，共有四十来人，会议在周老咀村头的破庙里举行。开会的时候，段德昌派了不少侦察员，四处探听消息，以防遭敌突袭。

夏曦三十多岁，白白的脸儿。这些来开会的人，都没见过夏曦，有的只是听过他的名字。周逸群当下介绍说：“夏曦同志早年参加过新民学会和马列主义研究会，在湖南省委做过青年团工作，任过湖南省委委员，在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选为中央委员。”

周逸群说毕，夏曦纠正说：“还任过湖南省委书记。”

夏曦任湖南省委书记的情况，周逸群曾听柳直荀、郭亮等人说

过，许克祥“马日事变”间，正是夏曦任省委书记离职逃跑的时候。周逸群没提夏曦任书记事，是怕夏曦联想到那“走麦城”之事，面子上不好过，所以没讲，没想到夏曦自己讲了，这时候，夏曦又接着说道：“大家怕都不了解我吧，我是1922年的党员，‘五大’的中央委员，‘六大’的后补中央委员。这次呢，王明同志派我做为中央代表，到湘鄂西苏区，组建湘鄂西中央分局，由我任书记。王明同志你们知道吗？年岁不大，精通马列，对马列的经典，倒背如流，无论你们提出马列著作中的哪句话，王明同志不用想，就知道话出自哪篇文章，什么样的版本，多少页数内。像王明同志这样的天才，在我们党内，独一无二，我夏曦是甘拜下风。”夏曦见大家听得认真，继续说道：“共产国际对王明同志印象非常好，说王明是中共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这次我到上海，见到了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米夫，米夫当着大家的面，一个劲儿的夸王明同志，说中国共产党有王明同志主持工作，中国革命前景辉煌。还说共产国际选来选去，才选出这么一个天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夏曦喘了口气，又说：“米夫同志的评价，是很客观的，大家想想，没有天才，哪能对马列主义背得滚瓜烂熟？这一点，我是十分的佩服，佩服得五体投地。甭说别的，就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厚厚的几大本子，我也看过，初时看不进，硬着头皮看了几遍，脑子里也没记住多少。这次在上海见到了王明同志，王明同志和我谈起《资本论》一书，说起了‘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说到这儿，夏曦向来开会的人问道：“你们都是劳动人民出身，知道什么是劳动过程吗？”

这些来开的会人，一个个都惦记着反“围剿”中的各项工作，只想快点儿开罢会，好早些回去，哪里想什么劳动过程，他们此刻也不需要懂什么劳动过程。夏曦见大伙儿不言语，扭头问周逸群：“逸群同志，你知道什么是劳动过程吗？”

周逸群一笑说：“马列主义的书我读的不多，《资本论》我也看过，没有进行更深的研究。”

夏曦摇摇头说："不读马列可不行，尤其是做为领导干部就更不行，这一次，我就差一点儿被王明同志问住，亏得我对劳动过程这一章印象深，才没被考住。王明同志问我时，我知道这是他有意识地考查我这干部是否称职。我当即回答，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的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做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

夏曦滔滔不绝地往下说的时候，段德昌看了一下怀表，快三个小时过去了，可夏曦却还没有扯到正题上，而在周老咀八十里外，就有敌人的"围剿"部队，八十里路，若骑兵行动，三个小时就能赶到，于是，段德昌打断了夏曦的话说："夏书记，请抓紧时间谈正题吧，敌人如果发现了我们在开会，进攻周老咀，就麻烦了。"

夏曦听了，很不高兴地看了段德昌一眼说："正题？我现在谈的就是会议的正题，一个共产党员，不懂马列，怎么能够革命？你们以往革命的失败，就在于不懂马列，我就要改变你们这种作风。"

段德昌遭到一顿抢白，鼓着嘴巴不说话了。夏曦又对开会人说："我给王明同志背了《资本论》中劳动的过程后，王明同志很高兴，拉着我的手说：'夏曦同志，你马列经典学得不错。'连一旁的米夫同志也高兴得直抖肩膀。"

夏曦正说到这儿，只见警卫连长慌慌张张地走进会场，把段德叫了出去，说："军长，敌人骑兵开过来了，再有两个小时就能到周老咀。"

段德昌闻报，不敢怠慢，便走进会场，把情况小声告诉了周逸群，周逸群一听，立即报告了夏曦，夏曦这时候正讲到兴头上，不大相信地问道："情况属实吗？"

段德昌的火一下就上了脑门儿，他几步走到了夏曦面前，几乎喊道："中央代表同志，难道我们的话你也不相信吗？"

夏曦见段德昌怒目圆睁，使劲地看了他一眼，说："请你不要用这样的态度与中央代表谈话。"

周逸群朝段德昌丢了个眼色，意思是让他别开口了，而后小声说道："夏曦同志，为了安全起见，会场还是转移吧。德昌同志早已准备好转移的船只，把船开到苇荡之中，会还可以继续开么。"

夏曦依然用不相信的口气问："敌情真有那么严重？你们不是说敌人的反'围剿'失败了么？"

段德昌眉毛挑起，又要开口，周逸群赶忙接过话头，说："夏曦同志，敌人的反'围剿'是失败了，可这个失败是相对而言，是说他们没能消灭了我们，我们的队伍还在壮大。可苏区的许多地方还都被敌军占领，敌军并没有完全退出洪湖苏区，还占领许多大村镇。所以，我们还必须时时提防敌人的袭击。我们的情报还是准确的。"

夏曦听了，哼了一声说道："造成苏区这样的局面，是立三路线的恶果。如果王明同志早主持中央工作，我们今天就要在武汉的大礼堂里开会了。"

这时，又有人报告，说敌人骑兵距周老咀只三十里路了，骑兵后边还有敌人大部队行动。看来敌人似乎得到了夏曦在这里召集会议的情报。

夏曦听了报告，说："为什么保密工作不做好？在我们的党政机关军队内，一定有敌人的奸细，下一步，我就要好好地查查奸细。"

这时候，代表们都坐不住了，可夏曦不说转移，谁也不好离开。段德昌见此情，一气之下离开了会场。夏曦望着段德昌的背影，很不满意地对周逸群说："段德昌游击习气太严重，无组织无纪律、无政府主义。"又说："怕什么？敌人不是还有三十里路么？身为大将，要能沉得住气，'马日事变'时，敌人围住了省委大院的门，架起了机枪，我们还是不慌不忙地撤走了。"

周逸群听了，心说："那是郭亮，你夏曦早就跑了。"心里想着，嘴上说："是啊，夏曦同志在敌重兵面前沉着机警的佳话，我们早有

耳闻，今天，夏曦同志又给我做出榜样。在敌兵将至时，使人们不慌不忙地离开会场。”

周逸群是很正派的人，他在这里吹捧夏曦，决不是讨夏曦的好，是为使大家速脱险境。开会之人，都听出周逸群话中之意，一个个自是哭笑不得。夏曦听了周逸群的话，却很高兴，他将桌上的材料收起，这才离开了会场，在周逸群、段德昌带领之下，到村头湖边上了船，代表们也都一一上了船。几条渔船刚刚离开周老咀、钻进苇荡之中，敌人大队骑兵就赶到了。若不是事先段德昌有了准备，这洪湖苏区各县苏维埃主席、书记、都将在敌人面前身首异处。开会之人乘坐渔船到了苇荡之中，会继续开，夏曦的话头儿又绕了好大的圈子，才说到了正题之上，夏曦大骂李立三、邓中夏，说李邓执行的是反共产国际的路线，是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继续。给洪湖苏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红2军团南征失败，又在杨林寺大败，而今败退到了鹤峰、五峰，就是邓中夏执行错误路线的结果。夏曦气势汹汹地说：“邓中夏使红2军团遭到这样的惨败，是他那逃跑主义的必然。中央已决定，撤销他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邓中夏在苏联的时候，就因为反对共产国际而犯了错误，回国之后，李立三、瞿秋白又继续让他担任重要的工作，使他犯更大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在湘鄂西，我们对邓中夏的错误，要进行清算。要坚定不移地紧跟王明同志，团结在新的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面斗争，为洪湖早日一片红而努力！”

对于邓中夏到洪湖后所犯的错误，洪湖苏区的党政军各级干部和群众，都有切肤之感，如今撤换邓中夏的职务，大家自然都拥护。夏曦见到会者一个个神色欢快，便又接着说：“王明同志讲，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和红军，我们湘鄂西要做个样板，从今以后，要彻底改造湘鄂西各级党组织，要清算游击主义，清算右倾逃跑主义，要改变军事上的战略方针。有人讲，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敌进我退……”，夏曦说到这儿眨眨眼，

说："还有个什么敌……什么，反正是十六个字口诀，对这十六个字，王明同志讲了，说这不是什么作战的经验，是歌谣、童谣。而我们洪湖，也把这十六字诀当作宝贝，这些游击习气不改变，我们无法取得更大的胜利。"夏曦口沫纷飞地说："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的苏维埃和红军，我们洪湖苏区，可以做个楷模么。"

夏曦刚说到这儿，但见岸上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哭喊之声惨不忍闻。原来敌兵已至周老咀，放火烧房，杀害百姓。开会人不由一惊。这时，又有子弹尖啸着飞向这芦苇荡中，打的苇叶儿哗哗直掉。夏曦吓得急忙爬进船舱之内，脸儿都变白了。结结巴巴地对段德昌说："德昌，快……快开船。"

段德昌见夏曦吓得那样儿，冷冷地说："放心吧，子弹射不到这里，这芦苇荡内，敌人是不敢进来的。"

段德昌说着，还是令人将船撑到了芦荡深处。

枪炮声远了，夏曦这才又接着讲话。就在这个会上，夏曦宣布，新6军改为红3军的第9师，段德昌任师长，陈培荫任政委。

夏曦的会开完了，敌人也走了，周老咀的民房烧了大半儿，男女群众被杀害二十几人。原来，夏曦召集会议的消息走露了，敌人便派大队人马"围剿"了周老嘴，想把苏区负责人一网打尽。亏得段德昌事先做了布置，开会人才得以迅速转移，敌人目的没能达到，而群众却蒙受了损失。

敌人退走后，几条开会用的船才摇出了苇荡，靠到了岸边。上岸之后，段德昌看到周老咀一片劫后余灰，难过地对周逸群说："这都是我们给群众带来的灾难。"周逸群"唉"了一声，没说话，这时夏曦走了过来，他指着被敌人烧毁的房子说："这就是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的结果，如果红3军不败退到鹤峰、五峰，洪湖苏区怎么遭到敌人如此的践踏？"

周逸群没有回答夏曦的话。

由于周老咀被敌人破坏严重，中央分局及特委机关都移到了

瞿家湾一带。

周逸群血洒洞庭

说话到到 1931 年 5 月，时两广又爆发了反蒋事件，国民党新军阀间的矛盾又趋向尖锐，“围剿”洪湖苏区的国民党徐源泉等部相继撤出，驻沔阳的国民党岳维峻部兵变数连。段德昌便乘此时机率红 9 师向敌军发起攻击，先后在江陵的沙岗子一带对撤退之徐源泉部予以打击，接着，在普济观与敌郭勋部激战，大败郭部，经过一系列大小战斗，洪湖苏区的江北区除监利、沔阳、潜江三县县城外，余全部解放。

就在这个时候，夏曦突然以中央分局书记的身份，取消了湘鄂西特委，这样一来，周逸群就没了职务了，夏曦便给他安排了一个巡视员的身份，要他去长江以南的地区内检查工作。夏曦这个做法，实际上是撤了周逸群的职。夏曦为甚这样做？一来是他执行王明路线，“左”得冒了顶，与周逸群、段德昌等人意见分歧越来越大，二是他看到周逸群在苏区党政军民中威信太高，无形中使得自己威望降低。嫉妒之心使得夏曦视周逸群为眼中之钉、肉中之刺。想来想去，便决定撤销湘鄂西特委，这样，周逸群自然就没了职务。夏曦又给他安了个有职无权的巡视员的空名。

周逸群被撤去了特委代书记职务，消息传开，苏区大小干部，无不瞠目结舌，更有许多人愤愤不平。段德昌、段玉林、彭国材、董朗等军队负责同志，当即去找夏曦，问个究竟。夏曦对此早已有了准备，听了段德昌等人不满之语后，很为难地说：“我也不同意这样做，可成立中央分局，撤消特委是中央的指示，我们不能不执行啊。”夏曦又安慰说：“你们别急，逸群同志做巡视员，也很好么。分局人员安排时，再考虑安排逸群的工作。”

段德昌、彭国材都是直人，夏曦这么一说，二人不好再讲甚了，便退了出来，但二人怒气未息。当即，又来到周逸群处。段德昌愤愤地对周逸群说："逸群，我要去中央，当面问问王明，他和夏曦为什么要这样做？"

周逸群一听，立即摆手说："德昌，不可，中央自有中央的部署，我们要服从中央的决定。"

彭国材说："那夏曦整日阴阳怪气的……"

周逸群打断彭国材的话，正色说："国材，不可这样乱猜，夏曦同志固然有缺点，可他是个老党员，而今又是中央派来的人，他的意见，我们要尊重。"

彭国材愤愤地说："对夏曦有看法，不是我彭国材一人，洪湖的干部群众，没几个说他好的。"

周逸群说："如此我们更要起表率。不要忘了，当前苏区随时都面临着强敌的'围剿'，若我们内部将相不和，必为敌人寻机钻空。"

周逸群这么一讲，段德昌、彭国材都不说话了，好一会儿，彭国材说："逸群，你，受委屈了。"

周逸群哈哈笑道："我自废书学剑以来，只为救民于水火，早已将我个人置于度外。入党以后，为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更明，职务上的升降，乃是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只要是党的工作，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周逸群的一番陈词，只说得段、彭二人心头滚着热血。彭国材说："瞿家湾百姓听说你要去江南巡视，准备敲锣打鼓地欢送你。他们说现在不兴送万民伞了，可也要以此表表他们的心意。二来也给夏曦看看，看看民心所归。"

周逸群听了，立即说："断不可这样做，这样张扬出去，更会使敌人钻空子，你要向瞿家湾干部讲清其中的利害。"

彭国材为难地说："群众和干部的情绪很大，只怕讲不清楚。"

周逸群想想说："这样吧，我明儿半夜便悄悄动身。"

段德昌、彭国材只得同意。

这天夜里，西风大作，洪湖内波浪滔天，夜半时分，周逸群乘一小舟，悄悄地离开了瞿家湾，过长江，直奔江南。

这江南苏区，乃是石首、公安、安乡、华容诸县。由于红2军团在杨林寺败走，江南苏区遂为敌军占领。段德昌领导指挥新6军，只能与江北之敌周旋，无力解放江南。到了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发生，日军侵占东北，徐源泉部主力相继撤出鄂西，江北苏区被敌占领的地方大部分被新6军解放。江南留守之敌亦动摇。周逸群就在此时来到了这江南苏区，随及，江右军也开了过来。

周逸群过江之后，先到了调关，又到了焦山镇，再到洋河渡。接着，从五谷庙进入华容的蹋西湖。一路之上，周逸群无刻不怒火满腔。你道怎的？原来，这江南苏区的许多村镇，已被敌人践踏得不成样子，不少群众被杀害，许多房屋被焚毁。江南苏区，虽然头年的收成不错，可家家户户都已被敌荡劫一空。使得这春荒之际，许多穷苦百姓没有饭吃。

周逸群到了蹋西湖后，便找来了江右军副总指挥蔡玉昆，和他商量，决定趁敌不备之际，集兵偷袭石首城，抢回被敌夺走囤积的粮食，以解群众无粮之难。蔡玉昆非常尊重周逸群，对周逸群的安排，他言听计从。当即，便组织江右军，准备攻打石首城。就在这时，在这江南苏区里，发生了一件事，致使得那周逸群，又立时紧皱双眉。

在华容县境内，有个叫鲇鱼须的地方，这里有个大户，大户就是土豪劣绅的代名词儿。石首县内梅山湖村三名党员干部，带着饥民去鲇鱼须吃大户，由于也抢了那里中农的粮食，使得鲇鱼须中农反了水。站到了土豪劣绅一块儿。梅山湖的饥民为甚要抢中农的粮食？这其中也有原由。这原由就是中央分局机关报《红旗报》发表了夏曦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出了富农、中农都是反革命的理论。所以梅山湖的干部就这么做了，结果使得鲇鱼须的中农反了水，杀

害了梅山湖的这三名党员干部。

这三名干部遭到杀害之后，一下就激起了梅山湖和附近各村镇群众的愤怒。纷纷要求集中各村赤卫队，要血洗鲇鱼须，为三名党员干部报仇。周逸群听到这消息后，立即说道："这不行，中农是团结的对象，怎么能派队伍去镇压？"他立即叫人找来《红旗报》的文章，一看，果然夏曦提出了这样的理论。周逸群紧皱眉头对蔡玉昆说："玉昆同志，夏曦这文章简直是胡闹，中农一直是我们党团结的对象，如何能打击？"

蔡玉昆望着周逸群说："逸群同志，怎么办？双方就要械斗了。"

周逸群说："玉昆，我们一起去做工作吧。"

蔡玉昆说："逸群，中央代表为甚要这样做？"

周逸群说："我要找他去谈。"

二人正说着，一人推门而入，周、蔡二人一看，原来是段玉林，在他身后还有一人，是夏曦带到洪湖苏区的，此人姓江名奇，也没甚职务，只在夏曦身边做些文墨差事。周逸群见这二人来了，忙起身相迎道："玉林、江奇，你们来的正好。"

段玉林坐了下来，看样子有话想说，却欲言又止。蔡玉昆给二人倒了一杯水，江奇喝了一口，对段玉林说："老段，把夏书记的指示对老周说说吗。"

段玉林说："还是你说吧。"

江奇见段玉林不愿说，又喝了口水，说："那我就传达了。"他面对周逸群说："老周，夏书记指示，要老段、老蔡集中江右军的力量，血洗鲇鱼须，对那些反水的中农，要狠狠的打击，镇压。夏书记说，鲇鱼须的中农反水，证明了中间一派，也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必须坚决的镇压。我们来时，夏曦书记还要我们告诉你，说在革命和反革命两个营垒之间，中间营垒和第三派是不可能存在的，他们终究会加入反革命的行列。所以，夏书记派我和老段前来，要我们和你等一起，指挥部队，痛击反水中农。对此等镇压，要在整个苏

区内进行宣传，使苏维埃全体人民，知道这中农的危险性。"江奇又对段玉林说："老段，你把夏书记的指示也说说。"

段玉林没有开口，只是略点了下头。周逸群听了，站起来说："血洗鲇鱼须，我不同意。中农，一直是我们革命队伍的团结对象，单我们江右军内，就有百分之四十的战士是中农出身，鲇鱼须的中农反了水，梅田湖的干部有责任，他们遭到了杀害，我们是要严惩凶手，但不是鲇鱼须所有群众都是坏人，我们要去做工作，使反水的中农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当前，我们的任务是迅速从敌人手中夺取粮食，以济苏区饥民之危。"

周逸群话到这儿，段玉林立即说："老周，你说的对，我段玉林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江奇听了，眼珠儿一瞪，对段玉林说："段玉林，你对夏书记指示，阴奉阳违，你有意见，为什么不当面向夏书记说？"

段玉林哼一声说："我为什么当面不说？夏书记这人莫说我的意见，就是逸群、德昌的意见，他也听不进的。"

蔡玉昆说："江奇，派队伍去打中农，那是以火救火，会在苏区造成大乱的。"

江奇听了，手颤抖着："你，你们是想上右倾，你们知道，夏书记对待中农这思想，是王明同志的思想，是党中央的路线，你们这样做，反对王明，反对中央！"

周逸群说："江奇同志，你是来传达夏曦同志指示的，如今已传达了，你的任务完成了，至于如何执行，你就不要管了，错了，责任我会承担的。"

江奇脸色铁青着说："周逸群，你，你这样做要犯错误的。"

周逸群依然平和地说："江奇同志，你知道吗，对待中农，是杀还是拉，一字之差，关系着革命的成败，这更有血的教训呀。"周逸群心情沉重地接着说："洪湖苏区初创时，由于执行了'左'倾盲动主义，实行'一切工厂归工人'，以及乱杀乱烧，才出现了暴动屡次

的失败，使得红军游击到哪里，敌人便追到哪里。血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团结社会各阶层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打击和孤立敌人，革命才能一步步取得胜利，直到最后的胜利。”

江奇冷笑一声说：“周逸群，你有这么高深的理论和实践，那中央为什么不把你调到上边，反而撤了你的职，当了巡视员呢？”

江奇话音一落，段玉林举起拳头吼道：“江奇，你这个混蛋，要不看你是个共产党员，我一拳砸死你，你知道逸群同志在洪湖苏区内有多高的威望吗？中央没调他上用，是他们有眼无珠！老周被撤了职，是夏曦妒贤嫉能！”

江奇听了段玉林一番言语，说：“好好，你们勾搭一起，反夏书记，反中央，你们这是反党的行为，我要将你们的行为，向夏书记报告！”说完，江奇几步跨出了门，上马走了。

江奇这么一走，周、段、蔡三人都说不出话来，好一阵子，段玉林才说：“老周，你走之后，夏曦便找到我，十分热情地对我说：‘玉林，你大概也看出来了，现在我们正在改造湘鄂西根据地各级领导班子，这一次，我们要把忠实执行以王明同志为首的中央路线同志提拔上去，你，我已经了解了，土生土长的洪湖人，和周逸群、段德昌、万涛他们不一样，他们都是黄埔生。所以，他们搞黄埔小团伙，搞封建的地方主义。’”段玉林说到这儿，眼里冒着火说：“我当时就问夏曦，说逸群同志是黔东人，德昌是湖南人，万涛是川东人，他们搞什么封建主义？我这么一说，夏曦那白脸儿立时拉了下来，我想听听他到底想什么，就说：‘夏书记，你说吧，我听你的。’夏曦半信半疑地打量我，好一会儿才说了话，要我随江奇来江南，监视你老周的行动，还说要委以我重任。”

周逸群听罢，感叹一声说：“玉林，我本人如何无所谓，洪湖苏区怕又要有灾难啊！我们要有思想准备。”说到这儿，周逸群一抬手，“先不谈这些吧，革命总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先研究一下攻打石首和做梅田湖、鲇鱼须群众工作的事吧。” —

于是，三人经过研究，又找来了华容和石首两县县委负责人，开了一个联席会议，会上，决定江右军突袭石首县城，从敌人口中夺粮。另外，发动各区、乡在党团组织领导下，发动党员、团员分别找自家的亲戚，邻里做工作，两县县委都组织几个宣传队，到各乡镇宣传党对中农的团结政策，打消中农的对立情绪。会议完毕，军地双方便分头行动。周逸群同段玉林、蔡玉昆指挥江右军，一举攻下石首县城，缴获了大批粮食、弹药。接着，发动各乡镇饥民，将粮运走。这时候，中农的对立情绪，也很快做通。之后，周逸群又着手恢复那些遭敌严重破坏的村镇的党团组织。到洞庭湖渔民之内，发动渔民抗捐抗税。他到江南仅个把月，便在这江南苏区，又恢复发展了二十多个党支部，二十多个渔民协会。他雄心勃勃，决心在这八百里洞庭，造成割据局面，与洪湖成为犄角之势。就在这时，夏曦派人送来了一信，指责周逸群开辟洞庭特区，是“分散兵力”，“要逃跑”，要周逸群速回江北中央分局处汇报工作。接着，夏曦又要宋盘铭到江南催促周逸群返回江北。

宋盘铭何许人？原来，夏曦做为中央代表来到了洪湖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中央又派了徐锡根、团中央派了宋盘铭参加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工作。徐锡根在分局工作不到半月，就又被召回上海，数日后被捕叛变，成为了叛徒。宋盘铭继续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宋盘铭，河南人，曾是汉口桥口申新纺织厂的童工，在做工时参加了革命。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 年被送到苏联学习。1931 年春回国，回国后便被团中央派到湘鄂西分局，夏曦在苏联时便与宋盘铭认识，如今，宋盘铭这个吃过洋面包的人来了，他自是高兴，视为亲信，当即便派到江南苏区，意欲将宋盘铭取代周逸群的工作。

周逸群接到夏曦第一次的信时，正在召集石首、华容、南县三县联席会议。商讨开辟洞庭特区之事。他看了信后，忍住心头的激愤，继续召开会议。这时候，宋盘铭来了。宋盘铭把夏曦要周逸群

回分局汇报工作的指示一讲，周逸群说："好吧，开完会我就去。"

于是，宋盘铭也坐下参加了会议。宋盘铭听了到会人谈开辟洞庭特区的做法，也认为周逸群的做法很正确，又见开辟洞庭特区工作繁多，宋盘铭便建议周逸群不必浪费时间返江北，提议以他和周逸群两人的名义，给夏曦写一信，将联席会议情况报告夏曦，再视夏曦意见而行。

周逸群听了宋盘铭的意见，想了想说："这样吧，这里工作很多，我确没时间返回江北，写封信吧，不过，这信还是以我一人名义为好，免得夏曦对你产生看法。"

宋盘铭一摆手说："我不怕，我们又不是搞宗派，他不会有什么意见！"

周逸群还是坚持以自己名义来写，宋盘铭也只好依他。这样，周逸群便将联席会议讨论的结果，写了下来，派人送到了江北的中央分局。

夏曦接到了周逸群的报告，只看了数眼，眉头便皱到了一起，提笔写下了几个字：逸群同志要速返江北汇报工作。

夏曦的批示很快便到了周逸群的手中。段玉林、蔡玉昆、宋盘铭见到了夏曦的信后，都对夏曦的做法不满意，宋盘铭说："有什么了不起了的事，一定要逸群回江北不可。"

段玉林生气地说："这夏曦，我看是个太上皇。"随即对周逸群说："逸群，不要理他。"

周逸群说："他是分局书记，我们还是要尊重他。我回江北一下也好，把江南的情况，当面向夏曦同志做个汇报。我想，他会同意我们的意见的。"

周逸群这么一说，大家也就不言语了，段玉林说："逸群，你什么时候动身呢？"

周逸群略想了一下说："今天就走吧。"

蔡玉昆说："我去安排船只。"

这下天午，蔡玉昆为周逸群安排了三条“双飞燕”的渔船，并派了一个班的战士，护送周逸群回江北。周逸群又把工作做了下交待，便动身起程。

周逸群上了“双飞燕”渔船，掌舵的战士扯起了风帆，小船儿箭一般地在洞庭湖上飞行，直奔洞庭湖东岸。

三条渔船行了约有 3 个时辰，看看红日西斜，但见湖面之上，渔帆点点，往来如梭。突然间，班长向国良对船上人说道：“有情况！”

周逸群望着浩渺的湖水，惊问道：“有何情况？”

向国良朝远处一指道：“你看，那边有敌情。”

周逸群朝他手指看去，只见一条小渔船，正在张网捕鱼。在这渔船的前边，有几条大船，正向这边开来。向国良说：“逸群同志，我们出发前，段玉林亲自向东洞庭湖党支部做了安排，派出了渔船监视敌人的行动。那条小钩船落帆打鱼，就是向我们发出的有敌情的暗号。”

当下，三条船都下了网，装做打鱼的样儿，谁知那几条大船，径直地朝这三条船开来，船到近前时，向国良望见大船上都架着机枪，他说了声“不好，敌人来势不对”，便挥手命令大家砍断渔网绳。可惜，为时已晚，敌船上枪响了，一排子弹射了过来，队员们立即还击，终因寡不敌众，周逸群和一个班的战士，都负伤被捕，周逸群当晚牺牲在岳阳贾家凉亭，时年 34 岁，后人有诗叹曰：

废书学剑走羊城，昂首高歌唱大风，
只为一身铮铮骨，致使热血洒洞庭。

周逸群的牺牲，震动了洪湖苏区和洞庭特区，男男妇妇，老老幼幼，无不掩面痛哭。后来，苏区人民为了纪念他，将苏区首府瞿家湾的红色书店、红色小学，均命名为“逸群书店”、“逸群小学”。

邓中夏含冤九泉

周逸群的行动为何为敌军所察觉？原来，是夏曦身边的江奇，在酒馆之内喝酒时，无意之中将周逸群即日将返江北的消息露了出来，那酒店的掌柜，是敌军的一个暗探，这样，使周逸群惨遭敌人毒手。

夏曦听到了周逸群牺牲的消息之后，立时瞠目结舌，好半天才摇头叹息道："可惜，可惜他中立三路线流毒太深了，才有今日杀身之祸，实在可惜可叹！"

当即，夏曦找来段德昌，说道："德昌，逸群遇难，实是我党的不幸，我也失去一条臂膀。"

段德昌正为周逸群的牺牲而难过，又为夏曦召其回才遇害而愤恨。今见夏曦难过的样子，一时间，怨恨情绪反倒消了许多。夏曦说完，又道："德昌，逸群遇难，究其原因，正是他受立三右倾路线的毒太深了，他若不去开辟洞庭特区，哪能遭此难？"

段德昌此时心乱如麻，没有言语。夏曦又说道："我们湘鄂西分局干部，都要吸取这个教训。为了进一步贯彻四中全会的精神，我们要召开会议，进一步肃清立三路线流毒，调整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

这天晚上，夏曦向党中央起草了一份电报，电报写道：

> 逸群因往洞庭巡视工作，在贾家凉亭附近被白军惨害，现将洪湖军政校改为逸群军政校以纪念他。
>
> 巧电　　6月18日

1931年6月20日，夏曦主持召开了有各县县委书记参加的

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会上，夏曦宣告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由崔琪任省委书记，万涛、杨光华、彭之玉等为常委。崔琪，字品炎，1899年生于监利朱河崔家长岭。出身寒门，自小为豪绅放鸭，大革命时为洪湖地区农协会负责人之一，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崔琪在洪湖岸边坚持武装斗争。任监利县游击队长。监利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崔琪为监利县委书记。夏曦在组织湘鄂西省委时，挑来选去，将崔琪拿到了省委书记位置上。这时，崔琪身体已十分不好，到职没几天，身体便支持不住了，只得赴上海治病，杨光华便代理省委书记及组织部长的职务。在扩大会议上，又成立了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夏曦任主席，贺龙、万涛为委员。对各地党的组织，也进行了改组，将湘鄂边分特委改为湘鄂边特委，管辖五峰、鹤峰、桑植一带苏区；将宜昌分特委改为宜昌特委，管辖巴东、兴山、秭归和松滋、枝江、宜都各县；成立了南县、华容、安乡中心县委，辖岳阳、临澧、石门及洞庭湖滨一带；成立了汉川中心县委，指导天门、汉川、应城、云梦等县。

大会之后，夏曦对苏区内的工会和农协会等群众组织，亦分别领导召开了会议，成立了省总工会、省农协会，对妇女儿童亦采取了相应措施。在安排人选时，夏曦一个个亲自审定。自此，夏曦在湘鄂西全面推行王明路线正式开始。

1931年的夏天，湖北各地，连降大雨，洪湖苏区地处长江、汉水之间，湖泊河港密布。暴雨之后，江河水位猛涨。时洪湖各处堤垸，多年失修，徐源泉竟然下令在麻布拐、上车湾处掘开了长江大堤，水淹苏区。洪湖一带，地势低洼，素有"沙湖沔阳州，十年九不收"之说，堤垸决后，立时，江水涌入洪湖各处，一时间，到处一片汪洋，如同大海。江北苏区，几被全淹，竟使得灾民近百万。百姓扶老携幼，四处逃荒，洮嚎之声，延绵千里。湖中苇荡芦林，均被水淹。赤卫队、游击队无法掩藏。敌军乘机"清剿"。集中了岳阳何键所部的19师唐伯寅部，驻华容的11师马坤山部，石首调弦口的新7旅及

各地团防、铲共义勇队，向江左江右两苏区大举进攻。抢掠民间粮食财物。到处挖地拆墙，砍树伐木，百姓恨道："唐伯寅铲共，草木遭劫；马坤山清乡，掘地三尺。"敌人趁水灾"围剿"苏区，使得许多游击队、赤卫队都受到了一定的损失。红 9 师因苏区无粮，也站脚不住了。为了减轻洪湖根据地的负担，打破敌之"围剿"，1931 年的 8 月初，中央分局给红 9 师两项任务，一是向襄北发展，开辟潜江、京山、天门等地区；二是与红 3 军汇合，迎接红 3 军南下。夏曦又决定万涛也随军行动，在红 9 师与红 3 军汇合之后，取代邓中夏的职务，改变红 3 军的政治路线。

红 9 师接受任务后，段德昌和万涛立即率领人马北上，首战即歼灭周家矶、黄家场一线敌军，接着再克沙洋，三战克潜江，歼灭国民党新 3 旅徐德佑一个团。红 9 师克潜江后，徐源泉急了，立即命令肖之楚部向潜江反扑。段德昌闻讯后，又将红军埋伏于要道两侧，打敌伏击。肖之楚大败而逃，红军缴获枪械弹药，足可装备一团之兵。当下，段德昌、万涛二人，立即招募红军，并用此装备组建了一个团，取番号为 27 团。

红 9 师在灭徐德佑团、肖之楚部时，从缴获敌之文件中，得到了国民党远安县县长向徐德佑发的告急电报，说贺龙率红军已到南漳，有进窥远安之势。这时候，荆门县委也派人来报告，说荆门的土豪劣绅也纷纷外逃，躲避红军。段德昌，万涛等人见到了此电报，得知了红 3 军的行踪，十分高兴。大家商量了一番，鉴于红 3 军上次打到了荆州而又北上武当，如不及时去联系，难免又折回房县。若将红 3 军接回，两支部队合到一起，集中力量开辟天门东北一带赤区，岂不更好？且夏曦交待 9 师北上的任务中，接回红 3 军是北上任务之一，于是，万涛拍板定案，决定红 9 师北上，挺进荆门，迎接红 3 军，为使行动不落空，段德昌同时派人星夜至南漳，与中共南漳县委一起同红 3 军取得联系。当下，段德昌便率领红 9 师攻打荆门。

红9师派出去与红3军联系的人，走到距南漳县尚有百里之地的刘猴集时，与红3军派来至洪湖的人偶遇，这人叫李士奇。

双方见面，十分高兴，彼此了解了对方部队行动的情况，而后，二人分手各自返回。李士奇又飞马回到南漳时，恰逢邓中夏、贺龙等红3军的领导正在开会，为红军行动方向而争论不休，就在这时候，李士奇汗流满面地走了进来。他把在刘猴集见到红9师派来人的情况述说了一遍，最后，又说出了周逸群遇难之事。听说周逸群牺牲，在场之人，无不目瞪口呆。贺龙想起与周逸群共同战斗的革命情谊，周逸群对自己的帮助，心痛得一声大喊，当场晕了过去。众人一番抢救，贺龙才苏醒来。然泪流满面。真是：英雄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时众人也都感叹不已。邓中夏也流泪痛道："逸群遇难，我之过也。我本想与逸群相会时，当面向他谢罪，没想到他西去了。"

邓中夏、贺龙等红3军各将领得到红9师北上的消息，大家都分外高兴。于是，红3军的领导，统一了红3军南下洪湖的决心。这命令一传达，红3军的将士听说要打回洪湖，无不欢欣雀跃。当下，将柳直荀及一团兵力留在房县，其余兵力，全部开拔南行。这时，段德昌、万涛也率红9师打下荆门，继续北上。1931年的9月28日，红3军的7、8两师，同红9师在宜城县内刘猴集会师。两军将士今又重逢，那一番高兴，无法形容。各自谈起别后之情，得知许多同志战友牺牲，又不免一番伤心难过。

段德昌与贺龙见面之后，二人的的亲热喜悦，不必细表。这时候，段德昌从怀中取出一信说："文常，这是夏曦写给你的。"

贺龙接过了信，认真地看了下去。

夏曦在信里写了些什么？原来，贺龙从香港到上海后，曾与夏曦见过一面，加之贺龙当澧州镇守使时，二人也有过来往，如今，夏曦便在信上顺竿爬了。他信中先说了一大篇颂扬贺龙的话，说贺龙党性最强，在共产党最困难的关头，把自已惨淡经营多年的部队奉

献给共产党，这种精神，真真难得。接着，信中又写了他在上海与贺龙见面之后，便到了苏联，在苏联，不光学习了马列，还结识了王明。信中夸奖了王明如何如何年轻有为，共产国际对王明如何如何赏识等语，简直把王明说成是救世之主，人参之王，又说他在党的“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后补委员，回国之后，中央派他到湘鄂西中央分局任书记，出发之前，王明亲自向他交待的任务。夏曦在信中最后说，他真诚的希望贺龙能同他一起合作。

贺龙看罢信，问段德昌：“夏曦这人怎么样？”

段德昌哼了一下说：“马列主义书看样子倒是读了不少，可都装在了手电筒里，只照别人，不照自己。逸群的牺牲，完全是他一手所为。”

贺龙一听到周逸群三个字，脸上立时变色道：“夏曦这人，我自认识他那天起，就觉得他阴阳怪气的，心术不正。”

段德昌叹了口气说：“胡子，你见面就知了，有些事，真让你哭笑不得。”

贺龙说：“红 3 军回到洪湖，形势会好的。”

段德昌说：“红 3 军的回来，是苏区百姓的洪福。”

红 9 师与红 7、8 两师会合后，当晚便召开了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会上，由万涛传达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传达了中央和中央分局撤消邓中夏职务的指示。红 3 军的政委由万涛担任，柳直荀由于留在了房县改做地方工作，政治部主任为刘鸣先。红 3 军的干部们，早已对邓中夏的所做所为憋了一肚子气，当万涛宣布了撤消邓中夏职务后，当场便给邓中夏提了几十条意见。随后，万涛根据这些干部们提的意见，又结合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将邓中夏的错误归纳了十二条，说邓中夏执行的完全是李立三的路线，完全是右倾逃跑主义，曲解了共产国际关于革命根据地建设的指示，用创造新根据地的“左”的假话，来掩盖右的逃跑主义批评实质。因而，是反国际路线的。

对于同志们提出的批评，邓中夏听着，默不做声。

万涛在会上宣布了撤消邓中夏职务之后，又与贺龙，段德昌、孙德清、刘鸣先等同志开了会，会上，决定立即南下洪湖。1931年10月2日，正是草枯叶黄谷上场，秋风阵阵催人忙之时，贺龙指挥红3军东跨襄河，先打钟祥，又打岳口，再克潜江，至此，红3军又回到了洪湖。军部便设在了潜江县城。大军驻扎之后，夏曦立即赶到，与贺龙等人见了面，自是一番近乎，也不必多说。这夏曦听说红3军干部战士对邓中夏很是不满，特别高兴。于是，夏曦亲自同邓中夏谈了话，要邓中夏作检查，并告诫邓中夏，若检查不彻底，就将邓中夏送到中央。邓中夏对组织上做出的决议，态度很端正，他从党的利益出发，认真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

邓中夏究竟犯了怎样的错误呢？后来的历史已做了结论。邓中夏犯的是李立三的“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这错误，是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的继续。而夏曦、万涛等却用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来看待邓中夏的错误，说他犯了右倾逃跑主义，犯了右倾错误，这样的认识便大错特错了。

夏曦同邓中夏谈话之后，邓中夏极认真地反省了自己，向中共中央写下了八万字的检查。他在检查中写道：

> 洪湖苏区的被摧残，红2军团的削弱，都应该由我负责，我希望党给我以深刻的纠正和教育。按照我所犯的错误的程度，党可以给我任何处罚（开除党籍除外）我都接受。

在这份检查上，他又附了一信。那信写道：

> 中央：
>
> 我已完全遵照中央命令，离开了3军，回到了洪湖。

自我接到中央命令以后，我在3军除同万涛谈过一次话外，未与任何同志谈话，总之，我丝毫没有反抗中央的行为与言论。

关于我在3军的错误，检查中已述清(检查附后)，想中央已大体了解。此次回洪湖，读到了中央文件，更加深切地反省了自己，现在候中央分局审查后，自来中央听最后的审查。

此致

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邓中夏

十月二十五日

邓中夏这样一个同志，虽然在工作中犯有严重的错误，但他毕竟是共产党内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的老同志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对他进行了无情的打击，不但在政治上打击他，而且在经济上打击他。邓中夏撤职后到了上海，中央不分配工作与他。邓中夏生活无着，只靠在工厂当徒工的爱人夏明微薄工资糊口。后来，王明把持的中央将邓中夏分配到上海沪东区当宣传部长。对于邓中夏这样一个在党内外有着极大影响的同志，王明如此大材小用不讲，而使邓中夏完全处于暴露之中。1933年5月的一个晚上，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政治活动家邓中夏同志，第三次被捕。敌人开始没认出他。后来，同他一起被捕的叛徒林素芹，将邓中夏出卖了。正在庐山避暑的蒋介石，听说捉到了邓中夏，立时喜得手舞足蹈，忙派南京宪兵司令谷正伦，将邓中夏从上海押到南京。意欲劝降。哪知英雄一身凛然正气，敌软硬兼施，不得结果。1933年9月2日，这位优秀的共产党员，在南京英勇就义，时年39岁。

夏曦再露"峥嵘"

红3军回到了洪湖后，军政力量都骤然强大。这时候，本当接受以往的许许多多惨痛教训，加强党政军各级干部间的团结，巩固和发展苏区，偏那夏曦独断专行，家长作风严重。这样一来，致使得苏区内党政军各级干部纷纷不满，怨声四起。就在这当儿，中共中央来令，严厉地批评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工作中的问题，并要分局找出原由，写出检查。

中共中央批评了湘鄂西分局什么错误呢？原来，在红9师北上攻打沙洋、荆门，迎接红3军之际，长江以南的石首、华容，安乡、南县等大片苏区，又被国民党"进剿"部队占领。因洪湖苏区内此时已无兵可援，且适值江水泛滥成灾，所以，国民党"剿赤"军没费什么力气就把江南苏区占了。一时间，敌军在苏区内烧杀抢掠，使得党政干部及群众，死伤万人。江南苏区的失落，夏曦开初没敢上报。可纸还能包住火吗？最后，中央还是知道了。便严令湘鄂西中央分局找出原因，追究责任。夏曦看了中央的指示，心里头扑腾了半天。为什么？他是分局书记，苏区丧失，他的责任责无旁贷。夏曦小眼珠儿转了一阵，有了主意，他给中央写了份报告，那报告写道：

中央：

江南苏区的丢失，我们很痛心，在接中央指示之前，我们已经查明原由。经过是这样的。在第九师克潜江后，不经中央分局批准，便突然地改变了军事计划，而冒进地脱离了苏区，北上攻打荆门，又至刘猴集与七、八两师会师。这样一来，洪湖已无兵可守，便使得长江南岸的苏维埃政权，除石首县第七区外，全被摧残。被屠杀的群众达

万数。而红三军此次南下，党将各军师政治部及教导团统留房县，这完全证明，红三军的领导同志，还没有决心来巩固苏维埃政权，这根本表现了红三军的领导脱离苏区，不要后方，不要群众的反国际路线的立三路线。这是在目前国民党帝国主义以全力来进攻苏维埃运动和消灭红军的——国内战争的严重形势下，决不容许的错误。

夏曦的这个报告，把江南苏区丢失的责任，只一笔就推到了万涛和段德昌身上，轻巧巧地把自己开脱出来，还在贺龙等人脸上抹了道黑。

夏曦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究其原由，一来夏曦本是好大喜功，争功诿过之人；二来，夏曦看到了万涛、段德昌等人与己处处二心，便要借中央这把刀，将万涛、段德昌等与己不合之人整倒，搞倒万涛、段德昌，就把那些大大小小与己不和的人都镇住了。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夏曦给中央写了这样的报告，万涛、段德昌能不知道吗？知道了，怎么知道的呢？分局办公室里有个油印刻写员，此人姓范名祥。写得一笔好字。夏曦把报告写好之后，交给了范祥抄写，并叮嘱范祥不可泄露。范祥乃是正直之人，素敬万涛、段德昌的为人，他看了这份报告后，不由得大吃一惊，心说："这样的报告，若送到中央，不是使段德昌、万涛及红3军其他的负责同志，都要蒙受不白之冤吗？"想着，这范祥便悄悄地把报告给段德昌看了。段德昌是属火神爷的，如何受得了这份气？也不和万涛商量一下，便火气冲冲地去找夏曦。这时候，夏曦刚刚派心腹江奇将报告送往上海中央。见段德昌满脸怒气地推门而人。他心中有鬼，遂笑道："德昌，坐下。"又对门外勤务兵喊道："给段师长端杯茶来。"

勤务兵答应着将茶端来，段德昌不坐也不喝茶，而是怒视着夏曦说："夏曦，我现在怀疑你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夏曦见段德昌这神色，这言语，没有发火，而是继续笑眯眯地对段德昌说："老段，坐，坐下，有话慢慢说么。"

段德昌继续怒视着夏曦说："夏曦，你给中央写了什么报告？"

话到了这儿，夏曦已经明白段德昌发火的原由了。他把脸一沉，说："段德昌，我给中央写什么报告，是我分局书记的事，你怕是管不着，也无权去管吧！"

段德昌听了夏曦的话，只气得脑门儿青筋都鼓了起来，他涨红着脸，一扭身走出了夏曦的房门。

段德昌甩手走了，夏曦脸上的肉哆嗦了一阵，他平了平气，闭着嘴略想了一下，心中明白，便对勤务兵喊道："把范祥找来。"

勤务兵答应着走了，工夫不大，范祥 来了，夏曦黑虎着脸说："范祥，你做的好事。"

范祥眨巴着眼，说："夏书记，我，我怎么了？"

夏曦站起身，冷冷地问道："范祥，你把我写给中央的报告内容透给了谁？"

范祥一听，立时明白了夏曦脸上挂色的原由。事情已经明了，范祥心情平静地说："我给段德昌师长看了。"

夏曦听了，"嘭"地朝桌子捶了一拳，吼道："你，你还有组织原则么？"

范祥见夏曦这样儿，扭身走了出去，夏曦望着范祥的背影儿，两眼露着杀气说："范祥，你等着，我饶不了你。"

后来，这范祥果真儿被夏曦杀掉，亏得贺龙相救，才算幸免。

夏曦嫁祸于人的事，一时间传开了。分局党政军干部内都知道了此事。夏曦见事到了这步天地，一不做二不休，召开了分局会议，将那报告的内容公开了。

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一开始就炸了营，众人纷纷指责夏曦。说他不该这样做，段德昌的火气最盛，他挑着眉毛，口沫纷飞地说："夏曦，红 9 师北上，是你亲自向我们交待的任务，任务两项，一是

接3军回洪湖，二是发展襄北，两项任务，我们都完成了。此事才过去几天？9师的干部战士，对这两项任务，没有不知道的。而你却背着我们向中央写报告，说我们违反军委命令，擅自北上，丢了江南苏区。江南苏区的丢失，责任由谁负？我看应由你夏曦负。"

万涛是个内向之人，很少发火，夏曦的做法也使他很生气，段德昌说完，万涛接过话说："夏曦同志，军委会议是8月3日开的，规定9师的任务，是进攻沙洋，打击徐德佑部，而后折入天门，造成襄北天门赤区。同时，如果能与3军联系，便与3军联系，由我取代邓中夏政委的职务。"话到这儿，万涛问夏曦："老夏，事实是不是这样？"

夏曦微闭着眼，既不看也不答。万涛见他不言语，又说："分局给9师的两项任务，基本上都完成了，还扩建了一个团，只是没攻天门，而是打了荆门。9师与3军汇合后，打了钟祥、天门。老夏，我问你，我和德昌怎样违反了军委命令？"万涛稍停一下又说："在决定红9师北上的会上，我记得段德昌曾问过你，说9师北上，会不会犯脱离苏区、逃跑主义的错误，夏曦，你是怎么回答的？你说是开辟新的苏区，把洪湖苏区联成一片。怎么才隔几天，你就把自己说的话忘了？"

夏曦还是微闭着眼，不言语。

这时候，贺龙把手中烟斗一磕说："我说几句，老夏，从周家咀到刘猴集，不过三百里，其中一百八十里是水路，洪湖有情况，你不是可以派人叫9师速回吗？再有，你在报告中说红3军南下回洪湖是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3军攻钟祥，攻岳口，破天门，搞粮食搞给养，有什么错误？留下直荀等同志继续创建房县苏区有什么错误？"

这时候，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说了话。前文述过，潘家辰又名潘克鲁，苏州人，大革命时期入党，后在莫斯科劳动大学及中山大学学习，并兼俄语翻译。在莫斯科间，与王明等不怎么投缘。1930年回国之后，在中共中央工作。王明执政后，1931年的5月，潘家辰

和爱人庄东晓一起，被派到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知道潘家辰同王明关系不亲，就要潘当了省委的巡视员，庄东晓在省委宣传部工作。潘家辰是个老党员，也不计较职务高低。但是，他对夏曦的许多做法不满意，当他在会上听到夏曦将江南失守罪名加到万涛、段德昌头上时，很有意见，几个人发言后，他直言说道："夏曦，你这样做，严格的讲，是个人品问题。我们共产党人，要光明磊落，错就错，对就对。不要文过饰非。是谁的责任，谁就承担。"

无论大家怎么说，夏曦还是闭目不答。段德昌真火了，他拍案而起，冲夏曦吼道："夏曦，你的耳朵眼里塞了驴毛了？大家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夏曦这时才睁开了眼，说："我是分局书记，我说不说是我的权力。"

夏曦这样的态度，会议自然没有结果。散会之后，贺龙对段德昌说："老段，这夏曦足足地闭了一天眼，我看他睁眼就要杀人了。"

段德昌发烦地说："中央也真够呛，先来个邓中夏，把个湘鄂西党政军搅了个一蹋糊涂，如今又来个夏曦，我看这夏曦还不如中夏，中夏是个宽厚人，夏曦为人阴毒。"

贺龙的话还真说着了，这会议虽然散了，可会并没有结果，应该接着开，可夏曦却不再召集会了，他竟以湘鄂西省委的名义，做出了给段德昌、万涛、陈培英三人党内警告处分的决定，陈培英时为红 9 师政委。并将万涛的红 3 军政委职务撤掉，改由唐赤英担任。

有人问了，夏曦一个人能做出这样的决定吗？当时，夏曦大权在握，省委里其他负责同志，如彭之玉、马武、崔琪等等，有些人是看风使舵，一见夏曦这么个劲头儿，跟王明又那么好，硬顶下去，没什么好处，便装聋作哑了，有的两边充好人。在贺龙、段德昌、万涛、潘家辰等人面前，骂夏曦的不是；在夏曦面前，又数说贺龙、段德昌、万涛、潘家辰等人如何如何，拥护夏曦做出的决定。就在这时，

江奇到中央送报告返回，江奇一到，夏曦像看到了亲人一般，二人立即关门闭户，夏曦便把贺龙、万涛、段德昌等人反他的情况，他给段、万、陈处分的情形一说，江奇听了，眼珠儿一转，又在夏曦耳边如此这般地说了个主意。

江奇向夏曦献计说："我观洪湖湘西，有资望之人，贺龙、周逸群、段德昌、段玉林、彭国材、万涛等人。那邓中夏虽在党内居过高职，而今已走'麦城'，不足为虑，周逸群也已身亡。眼前，举大旗者，贺龙、段德昌、万涛、段玉林、彭国材、柳直荀诸人。特别是贺龙、段德昌、万涛，如将这三人击垮，湘鄂西苏区的大大小小干部，都得伏伏贴贴地听您的指挥了。"

夏曦沉吟说："话是这样讲，只是这三个人如何才能除得动？为这报告之事，他们已把我搅得吃睡不宁了。"

江奇说："此事看去颇难，其实容易。古语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观贺、段诸人，在沙场上有勇有谋，而官场之上，都是败将。您如今大权在握，上又有王明撑腰，何愁事不成呢？"江奇又向夏曦耳边凑了凑说："王明博古如今刚刚掌握中央大权，且又年轻，最忌之事是党内元老不服其管。您呢，就暗奏一本，只说贺、段、万等人不服王明领导之语，再派得力之人把本送去。这当儿，您再想借口整编红3军，将贺、段的军权下了，他们没了权，对您意见再大，也没办法。像那万涛，您撤了他的职，他也不是干瞪眼吗？最多喊叫几天，也就没了劲儿了。"

夏曦说："江奇，你说的很有道理，可军队怎么改编才使贺、段没了军权呢？"

江奇说："这个，我已经给您想好了，如今不是由唐赤英当政委吗？他是在苏联学过军事的。我们俩曾聊过天儿，他说苏联的红军编制和我们编制不一样，苏联红军没有军部、师部，军委直接指挥下边各团，如果把红3军改编成团，那贺龙、段德昌不就等于撤了职吗？而这种改编是学苏联，他们就是不愿意，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唐赤英特别推崇苏联红军，您一说，他就干。"

夏曦听了，高兴地对江奇说："江奇，你出的这个点子好。"

江奇见夏曦点头了，又说道："夏书记，既然贺、段等人同您明着摊了牌，您可不能手软了，您要是手软了，他们就要把您收拾了，到那时，悔之将晚。"

夏曦对江奇说："放心吧，我自有主张。"

夏曦本是中央分局书记，他的人品，本不太正，且受到王明的错误路线左右，偏偏身边又有江奇这类人物嘀嘀咕咕，夏曦这书记，能当得好嘛？

当晚，夏曦便给博古修书一封，无非是说贺龙、段德昌、万涛诸众如何如何不尊重中央等语，挑拨博古那心头之火。

接着，夏曦便找到了唐赤英。唐赤英曾在莫斯科吃了不少洋面包，那劲头儿正无处使，听夏讲了把红3军按苏联红军改编，自是鼓掌欢迎。唐赤英一边向夏曦介绍苏联红军情况，一边夸奖夏曦学苏联的做法有胆识。夏曦找到了支持者之后，便又以湘鄂西省委名义，将红3军进行改编。取消了军部、师部，将部队重新编为五个大团，直接归军委领导。这么一来，段德昌、孙德清等人都成了团长，军部没了，贺龙的军长也成了空的了。夏曦这么一搞，红3军里可炸了营，纷纷找贺龙、段德昌，发泄不满之情。这时候，夏曦又下了一道命令，要红3军开赴周家咀进行整编。这天，部队按照夏曦指示开到了周家咀。贺龙由于有事，途中耽搁了些时间，到周家咀时，天也就黑了，进了村子，一找住房，没有他的房子。为甚？因为军部取消了，军部的房子自然也就没有了，贺龙也就没了住处。一见此情，英雄忍着怒气，同勤务兵一起牵着马，在街上转悠，正转时，忽听有人喊道："贺军长！"

贺龙扭颈一看，高兴地说道："剑如，是你。"

原来，这个喊贺龙的人是李剑如，关于李剑如的情况，前文已略述过，其为"中大"学生。江苏人，工人出身，因其勇敢善战，北伐

时，担任了鲍罗廷的卫士长。后赴苏联留学。王明主持中央工作后，为充实自己的力量，便将在苏联学习过的人，都陆续派到了各苏区内。一月前，李剑如来到了这湘鄂西苏区。夏曦便准备要他任红9师政委，接替9师政委陈培英之职。因为夏曦又要改编红3军，取消了师部，李剑如只好等待安排。这李剑如在大革命时期，在武汉同贺龙会过面，彼此还很熟悉。

当下，李剑如走了过来，贺龙握着他的手说："剑如，你啥时来洪湖的？"

李剑如说："来了不到一个月。"又问道："贺军长，你住哪里了，我去看你。"

贺龙一笑说："我现在已没了住房了。"

李剑如发愣说："怎么没了军长的住房？"

贺龙叹道："一言难尽。"

李剑如说："天也不早了，先到我的住处吧。我的住处就在前面。"

当下，贺龙便到了李剑如的房内，李剑如见贺龙没用饭，又招呼人做了饭。饭毕，二人便促膝交谈起来，贺龙便把夏曦近期内的所做所为说了一遍，李剑如说："军长，我正要找你谈谈呢。我来洪湖后，夏曦和我谈了足足一晚，要我识时务。开始我还不明白夏曦话中之意。后来夏曦向我点明了。原来他暗示我在苏联的事。在苏联学习时，我是反对'二十八宿'的。夏曦开始也是反对'二十八宿'的。后来，他看到了共产国际代表支持'二十八宿'，就倒了过去。夏曦谈话的中心意思，是要我做识时务的俊杰，不要再做出苏联留学时不识时务的事。"李剑如说到这儿，很感慨地对贺龙说："贺军长，我总觉得夏曦身上，缺少共产党员的味儿。"

贺龙点头说："是啊，我也察觉到这夏曦身上毛病不少，不过，他总是个老同志了，我们诚心实意地帮助他，他会改过的。"

这一晚，二人一直说到夜静更深，才抵足而眠。

夏曦自决定改编红3军后，下令将红3军由潜江撤到了周家咀，红3军刚离开潜江，国民党李觉部便将潜江占领了。本来改编3军就已经引起了干部战士的不满，潜江丢失，更引起了中央分局和湘鄂西省党政军各级干部的不满。

第十七章 较　量

众怒状告夏曦

当时，对夏曦最为不满的是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等人，他们也不征求夏曦意见，便召集了个会议，把夏曦也请到了这个会上，大家劈头盖脸地又给夏曦提了许多条意见。段德昌发言最烈。潘家辰还列举了夏曦在“马日事变”时动摇逃跑之事。大家的意见提得很尖锐，夏曦坐在那里，如坐针毯，汗流浃背。会上，都要求派干部到中央反映夏曦的问题。最后，省委委员宋盘铭接受了这个任务。宋盘铭便将大家的意见，做了归纳，之后便赴上海向王明主政的中央，汇报夏曦的问题。

这个时候的中共中央由博古掌权，这年6月份，向忠发被捕叛

变，不久，王明到了莫斯科，出任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

博古又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07年生。高等小学毕业后，入苏州工业专门学校，曾任苏州学联主席。1925年同陆定一在无锡出版《无锡评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跟王明团弄到了一块儿，都成为米夫的得意门生。这样，王明虽然到了莫斯科，却依然遥控着国内的中央领导机构，继续发号施令。

宋盘铭走后十数天，便从上海回到了洪湖，带来了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什么精神呢？中央批评了夏曦在具体工作上的错误，肯定了红9师接回红3军的战绩，认为红3军南下是向国际路线走近一步，不同意取消军部和师部，而指示将红3军改编为7、9两师和一个独立团，在这些具体问题上，中央是批评了夏曦，但在总的路线上，中央却极力支持夏曦，说湘鄂西分局成立以来，夏曦坚决地反对了立三路线，正确地执行了中央和国际政治路线，取得了重新分配土地、开展了反富农斗争和改造苏维埃等成就，中央给分局的信中写道：

> 在苏区阶级斗争愈加紧张的形势下，敌人，乃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三主义者，邓中夏信徒，必然会利用中央分局的部分错误来做复仇的斗争。来攻击中央分局的整个路线，以致攻击国际与中央，对这些人，要予以坚决地打击。

中央的指示信，先打了夏曦一个嘴巴，接着又给了一大把糖，夏曦心中一面暗自得意，一面对贺龙、万涛、段德昌、潘家辰等更加耿耿于怀，继续思想报复之策。

贺龙、段德昌、万涛、潘家辰等人，对中央处理夏曦的问题，在

具体问题上否定，原则问题上肯定的态度很不满意，强烈要求再派人赴中央汇报。夏曦初时对大家的要求不予理睬，后见党政军各级干部呼声甚烈，最后，只得答应再派人，夏曦要派江奇，万涛、段德昌等自然不从，最后，派了湘鄂西省委秘书长尉士钧，赴上海向中央再次汇报。

夏曦看到反对自己的呼声愈来愈烈，看那来势不把自己整倒不算罢休，便又与江奇商议对策。江奇说："夏书记，此事我反复想过，好办哪，宋盘铭不是带来了中央的指示信嘛？湘鄂西省不是近期要召开党代表大会嘛？您就在这个会上，把中央指示一传达，就把那些反您的人都镇住了。"

夏曦听了，点头称是。便暗自做了准备，决定在党代表大会上，拉出中央指示信这把"上方宝剑"。

1932 年元月 22 日，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表大会在监利县的周家咀举行。到会代表一百廿七人。大会主席团成员，有贺龙、夏曦、杨光华、杨成林、万涛、崔琪等九人。由夏曦做政治报告。夏曦在这篇政治报告中，先骂邓中夏，后骂红 3 军，把贺龙、万涛、段德昌等反对他的人，都不指名的骂了一遍。而后，大大的颂扬了一番王明为首的中央。又把宋盘铭带来的中央指示信，反反复复地念了几遍，夏曦本想用这个代表会议，用中央指示信这把上方宝剑把代表们镇住。哪知引火烧身，他把报告一做完，在会上便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代表们对夏曦到洪湖半年多来的工作，纷纷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一个个都争先恐后地发言，发言激烈者，竟达八十多人，特别是万涛、段德昌、潘家辰、陈培英、段玉林、彭国材等人，就红 9 师北上，江南失守及红 3 军向襄北发展的责任问题，指出夏曦所犯有错误的性质时，更得到了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会议开到了这步天地，夏曦地位十分孤立，耷拉着个脑袋，像遭了秋霜打过似的，挺不起精神了。

就在这个时候，尉士均回到了洪湖，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

人，这个人就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关向应。关向应系中央派来的解决湘鄂西问题的，就是这关向应的到来，使得：

洪湖波浪连天起，扬子江中水倒流。

原来，尉士均到了上海之后，见到了博古。他便把大家对夏曦的意见如何如何一讲，讲到了夏曦怎样独断专行，怎样使苏区遭到了损失等等，中心意思是只要夏曦在，洪湖苏区不会有好。博古初时还耐着性子往下听，听着听着，脸上神色就变了，他把桌子一拍，问道："反对夏曦的，都是哪些人？"

尉士均一见博古这神色儿，当时可就愣了，觉着博古这劲头儿就不对，见博古问话，只得如实说："有万涛、段德昌、贺龙、段玉林、潘家辰……"

尉士均刚说几句，博古便打断了尉士均的话，站起身，挥着胳膊，瞪着眼说："真是岂有此理，夏曦这个同志，我很了解，他在湘鄂西所执行的路线，正是中央路线，正是国际路线。他的行动，是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你们说他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是错误的政策，我说他的做法是正确的。红 9 师北上，红 3 军南下，都是立三路线的继续，你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到中央告夏曦的状，是打击好同志，是进行反党派别活动。"

博古这几棍子，可把个尉士均给打晕了。原来，宋盘铭到中央汇报夏曦问题时，博古就已经不大耐烦，宋盘铭和博古还有些旧交，都在莫斯科学习过，好歹算是同学，宋说了些夏曦确实有问题之类的话，博古才勉强地批评了夏曦几句。如今尉士均又来告夏曦的状，这时候，博古正春风得意、盛气凌人之时，尉士均等人对他和王明信赖之人，居然三番五次的要打倒，这不是往他们新中央的脸上抹黑吗？打狗还要看看主人呢。所以，博古冲尉士均发了火儿。

尉士均遭了博古一顿狗屁疵，傻了眼，又值上海爆发了"一·

二八”战事，日本兵攻打闸口，整日枪炮不断，人心惶惶，便急急地要返回洪湖，临行时，博古派了关向应做为“钦差大臣”，随他一起前往。

关向应，1904 年生于辽宁金县。原名关致(治)祥。满族。1924 年 4 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 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少年时学徒做工，参加工会活动。1924 年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回国，先后在上海、山东、湖北、湖南等地从事共产党和青年团工作。1927 年 5 月被选为共青团第四届中央委员。参加了南昌暴动。暴动失败后，关向应同柳直荀、郭亮在海上遇见海盗船，几乎遇难。到了西贡，后辗转到了上海。1928 年 6 月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任大会主席团委员，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回国，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30 年春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5 月参与主持召开的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1931 年初在上海工联工作时，不幸被捕，受尽敌之酷刑。经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赓等营救出狱。关向应刚刚出狱，便被派到湘鄂西中央分局，参加分局的领导工作。出发之前，博古同关向应谈了话，博古说：“向应同志，你在武汉期间，可是犯有立三路线的错误啊。”

博古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是在抓着关向应的小辫子往下抡，意思要关向应跟他跑。原来，在李立三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关向应很坚决地执行了李立三的路线，犯了些错误，博古就抓着关向应这根小辫儿不松手了。关向应听了博古的话表态说：“博古同志，我已经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请组织上放心。我会坚决地改正错误，坚定不移地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的。”

博古听了，连连点头说：“好，我们要的就是你这样的态度，你这次去湘鄂西有三个任务，一任红 3 军的政委，二任中央分局的委员，三任军委分会的主席。”

关向应又说了番感激组织培养的话，便同尉士均上路了。

尉士均遭到了博古的一顿臭训，心里头很不痛快。上船便同关向应一起找了避人之处，谈了起来，尉士均就把夏曦到洪湖后，所做的那些不得人心之事说了一遍。最后说："向应同志，错误明明是夏曦的，中央却把这一盆屎尿都扣在了万涛、段德昌我们这些人的身上，这样做太不公道了。"

关向应说："士均，在这些许多问题上，也可能你们是对的，夏曦的错的，但是，中央是从全局来考虑问题的，我们做为一个共产党员，还是以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听从中央的吧。再说，夏曦同志也是老党员了，工作经验丰富，经过了各种考验，据我所知，王明、博古等人对他特别赏识。"

关向应这么一说，尉士均不言语了，就这样，尉士均终于被关向应说通了。

关向应、尉士均二人到了洪湖周家咀时，湘鄂西第四次党代会正开到了火头上。代表们数说着夏曦的错误，一个个越说火气越大，而且都是大问题，什么夏曦的土改政策严重侵犯中农利益，杀地主全家，富农扫地出门，江南失守，红军改编，遣散伤员等等问题。有好些代表说到愤怒之处，竟然拍起了桌子。到后来，万涛、潘家辰等七十七名代表联名写了信，要中央把夏曦调走。贺龙也愤愤地对夏曦说道："夏曦，我不懂得什么高深的道理，也不懂得什么右倾'左'倾，可就一样，你做的错了还是对了，我能感觉到。"他指着夏曦的鼻子说："我是军分会主席、红3军军长，省委作出取消军部、师部的决定，我这个军分会主席、军长竟然不知道，这不是怪事吗？江南失守又是谁的错？处分了段德昌又不通知他，这对吗？红3军南下洪湖又错在哪里？"贺龙越说越气，大声道："你夏曦才来洪湖几天，情况不熟，群众不熟，红军不熟，你今天处分这个明天处分那个，为甚不处分你自己？你说这个党性不强，那个党性不强，你来洪湖办的几件事，哪件事有党性？哪一件事对得起党？"

代表们尖锐的批评，使得夏曦汗流浃背，面如铅灰，无言可答。就在这时候，尉士均、关向应到了。这尉士均一露面儿，万涛等人立时便把尉士均、关向应围住。没容尉士均开口，万涛便把七十七名代表的联名签字信递给了尉士均，说："这是代表们的签字，大家一致要求中央撤换夏曦。"

尉士均接过了签字，略看了一眼，没有回答，而是向万涛介绍了关向应。万涛握着关向应的手，说："向应同志，欢迎你来。"

这时候，贺龙也大步地走了过来，他一把抓住关向应的胳膊说："向应，你好，潮汕一别，就没了你信儿了。"

关向应见是贺龙，极其亲热地说："云卿，听说把我分到你这里，真是高兴啊。"

贺龙笑道："向应，你来的正是时候，听听代表们的意见吧。"

关向应笑笑没有言语，这时候，万涛将贺龙拉到了一旁，激动地说："云卿，刚才士均向我透露，说中央的态度，完全站到了夏曦一面，而且连宋盘铭带回来的指示也否了，错误都扣到了我们头上。"

贺龙听了，皱着眉头说："那，还有什么是非吗？"

万涛叹道："若如此，洪湖将倒霉了。"

贺龙叫过尉士均问道："士均，怎么回事？"

尉士均见贺龙目光逼人，支支吾吾地说："博古……说我们都错了。"

贺龙惊道："真是岂有此理。"他转身叫过关向应，说道："向应，你是中央派来的人，有话快些向代表们传达吧。"

关向应说："云卿，湘鄂西的情况，我半点儿都不清楚，我来传达博古同志的指示，纯属是鹦鹉学舌。"

贺龙说："让你学你就学吧。"

关向应亮出"上方宝剑"

关向应听了贺龙一番言语，便在湘鄂西第四次代表会议上，传达了临时中央对夏曦问题的指示。尉士均做了补充发言。尉士均说："中央认为，江南的失守，是万涛和段德昌的过错，9师北上，是完全错误的行为。红3军南下，更是一贯错误的继续。万涛、段德昌、潘家辰、贺龙等同志向中央反映夏曦同志的问题，出发点是非常错误的，不仅仅是对夏曦同志的人身攻击，是湘鄂西中央分局进行的反党派别活动，是反中央，反国际的小组织活动。夏曦同志在湘鄂西苏区执行了中央正确的路线。"

关向应、尉士均这么一发言，哎呀，代表们一个个都傻了眼，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把个潘家辰气得当场昏了过去。会场秩序一下就乱了。有那善于见风使舵之人，立即调转枪口，向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等人开了火儿。这时候，夏曦坐在了主席台上，依然一言不发。那双小眼儿，却露出了凶光。潘家辰经过呼唤、抢救，渐渐地苏醒过来。他醒来之后，立即朝关向应道："向应，中央的决定是错误的，是官僚主义，我要求中央再派人来，认真地调查了解，解决湘鄂西分局的问题。"

关向应没有回答潘家辰的话，可代表们的情绪，他已经看出来了，而临时中央的精神，他又了解，博古已经明确要他支持夏曦，所以，他没回答。因为他已经犯了立三路线的错误，如今若不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岂不是要再犯错误吗。这样，关向应的态度，还是明朗地站在了夏曦的一边。

就这样，湘鄂西省第四次党员代表会议的内容，急转直下，由批评夏曦，到批评万涛、潘家辰等人。那夏曦举着王明中央给他的上方宝剑，首先恶狠狠地向潘家辰、万涛两人刺去。夏曦首先无中

生有，捕风捉影，夸大事实地列举了潘家辰的罪状，说潘家辰在土地问题上，主张查仓平分，在工会问题上，主张劳资仲裁，在军事问题上，主张分散游击。夏曦还批了潘家辰在经济政策、租佃问题上的许多方面。接着，夏曦便批评万涛同潘家辰什么一贯调和，对自己的错误，竟采取不承认态度。最后，夏曦将万涛和潘家辰对他的态度，归到了反共产国际、反中央的路线问题上。夏曦要求全省党、团员迅速起来，揭露万涛、潘家辰的"右倾机会主义"，"批判万涛"企图用两面派手段和括弧内左的词句，掩盖他右倾的实质"，揭露潘家辰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纲和一贯反对中央正确领导的阴谋。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代表们都看清了，夏曦要对潘、万二人下毒手了，果然，会议开到了后期，夏曦即以中央分局名义，撤销了万涛、潘家辰的职务。代表们无不为此而感叹，后人曾写诗叹道：

> 黑白本来很分明，博古偏偏看不清；一部中共发展史，多少教训在其中。

大会开到了最后，选举了新的湘鄂西省省委。正式委员有：夏曦、贺龙、周小康、崔琪、段德昌、杨光华、杨成林、彭之玉、万涛等十九人；候补委员有张宗理、蓝育才、张孝桂等六人；监察委员有刘革非、马武、鲁易、侯蔚文等九人。1932 年 1 月 29 日，省委第一次全体执委会上分了工，以杨光华、杨成林、万涛、崔琪等同志组成常委，杨光华为书记、万涛为宣传部长、杨成林为组织部长、马武为保卫局局长、关向应为红 3 军政委。

自此，夏曦便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了"左"倾冒险主义在湘鄂西苏区的领导地位，为全面的、深入的贯彻其"左"倾错误制造了条件和声势。

就在这个时候，红 4 方面军在黄安地区取得了歼敌的重大胜利。这个胜利竟影响到了红 3 军的行动。

夏曦的“死打硬拼”

红4方面军是1931年11月7日在鄂豫皖边区黄安县七里坪正式成立的，关于红4方面军的情况，后文有交待，这里不详述。红4方面军成立之后，便取得了黄安、杜傅店、苏家埠等战役的重大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这样一来，敌人大为恐慌，急忙将“围剿”洪湖苏区之敌抽调于平汉路以东地区。贺龙得知敌人这一动向后，找到了段德昌说：“德昌，目前敌之主力集中平汉路东，我当利用此机，以突然行动，将襄北皂市、应城、瓦庙、陈家河、龙王集一线之敌歼灭。”

段德昌听了说：“胡子，是该打个大胜仗了，如今部队的士气，被夏曦搞得很坏，打个胜仗，也好鼓舞士气。只是，这样的军事行动，夏曦能批准吗？”

贺龙说：“不要理他，他是神经病，我是军长，有权指挥部队。”

段德昌攥着拳头说：“胡子，咱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

贺龙还是向夏曦报告了打仗事宜，贺龙向夏曦说明打皂市、陈家河、龙王集一带之敌，是在白区内进行战斗，这一带均是陆地，可以集中兵力，可以发动群众，有利条件多。特别是贺龙说到苏区百姓、军队都面临无粮之难，打仗可从敌人手中夺粮时，夏曦只得点头。因苏区内无粮，他夏曦亦无办法。于是贺龙亲自部署了这场战斗。

应城、皂市、瓦庙均位于汉口至沙市、宜昌的公路之中，为敌人48师所守卫。为保皂市的安全，这48师又分兵在皂市三十里远的龙王集放一个团另两个营的兵力，在陈家河又放两个营的兵力，三处兵力成犄角之势，以掩护应城至皂市之间的运输。

段德昌得到了贺龙的命令，立即率领红9师由泗港渡过襄河，

冒雨突袭皂市。守城之敌大部被歼。余逃窜至应城。段德昌又随即命令5、6两团包围龙王集之敌，命7团包围陈家河之敌。国民党应城县县长蒋作均闻讯后，立即派一营兵力，前往解围。段德昌早以料到敌人必有此举，事先安排了伏兵，结果，这一营兵力，均做了红军伏兵的战利品。龙王集、陈家河两处被围之敌，拼命突围，段德昌却只围不灭，要“垂钩钓鱼”。果然，皂市之敌被歼，龙王集、陈家河之敌被围，武汉震动。武汉绥靖公署主任湖北省主席何成浚，连连发电，要龙王集、陈家河之敌固守待援。随即命令第10军徐源泉部第4师第12旅旅长张联华，由孝感增援。这张联华系少壮派，军中武器精良，尚未与红军交过手，接到了增援命令之后，立即驱动马步三军，顺着汉宜公路，急风火火地赶往陈家河和龙王集。在木匠湾，遭段德昌人马伏击。可怜那张联华的人马，重机枪和迫击炮还没来得及卸下马鞍，便都抛在了路旁。那些兵将，一个个抱头鼠窜。张联华也身首异处。这一仗，红9师全歼敌12旅，生俘敌四千余人，缴获迫击炮二十余门。轻重机枪六十余挺，步枪三千余支，子弹数万发。这一胜利，使苏区军民，欢欣鼓舞。使得红军士气大增，贺龙遂用这些战利品，又补充了三个团。此时，红7师也先后袭击汉阳之黄陵矶与侏儒山，歼灭国民党钱大均部一个营，威逼武汉外围。这当儿，留在房县的柳直荀、汤慕禹，因敌重兵“围剿”，不能立足，奉中央分局之命，也南下洪湖，与红3军独立团合编为第8师，由段玉林为师长、屈建高为政委，在潜江一带抗击敌人。

武汉绥靖公署主任湖北省主席何成浚，闻红军势大，十分慌张，决定集重兵向洪湖苏区进攻。限令10军军长徐源泉在三四个月内肃清湘鄂西红军。徐源泉接到命令后，不敢怠慢，立即动用了十五个团的兵力，杀气腾腾地开赴洪湖，主力直指应城、岳口，其意先收复应城、岳口之交通，后对应、岳公路两侧分区“进剿”，最后再攻洪湖根据地。

贺龙探听到敌分兵进犯洪湖，便召开了前委会，夏曦说："集中7、8、9三个师，与敌决战。"

贺龙听了，连说："不可，敌来势凶猛，我当集中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创敌一部，其余之敌，慑我军威，必不敢再进。"

夏曦说："如果这一仗打不胜呢？"

贺龙反问了一句："如果这一仗胜了呢？"

夏曦不语。贺龙便依己见而行。

这日，有侦察员报告，说敌144旅旅长韩昌俊，率部由应城出发，因连日天降大雨，被困于文家墩、李家场一带。贺龙闻说，对段德昌、段玉林道："雨中作战，正是我军之长，敌军之短，我当趁此突袭该敌，用己之长，击敌之短，集重兵灭韩昌俊部。"

段玉林说："军长之计甚妙，只是韩部两侧均有重兵，若我行动之时，敌兵增援怎么办？"

贺龙说："大雨之中，敌军不便行动，只要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打该敌，两厢之敌，便是发觉，也救援不及，不必忧虑。"

当下，贺龙命红7师在吴堰岭一带钳制敌人，命段德昌带红9师从渔薪河、段玉林带8师从蒋家场，分两路冒雨连夜直扑文家墩。两支部队，于天亮之前，将韩敌包围，遂发起进攻。这时，韩部之兵将尚在梦中。枪响之后，红军将士个个奋勇当先，敌军刹时便溃不成军。韩昌俊残部死命突围，均没得脱，双方由凌晨激战到中午，敌兵142旅冒雨增援，被红7师击退。这时，雨愈下愈大，敌飞机大炮等重火器均失去威力。黄昏时分，韩昌俊部被全歼，韩亦被红军生擒。

这场战斗之后，附近百姓纷纷传说，说大雨之中，水龙贺文常，火龙段德昌，一起现了原身，二龙在文家墩上空，吞云吐雾，行风使雨，因而全歼敌军，这话传到了敌军耳内，敌军将士，个个胆寒。

贺龙指挥红3军，连战连捷，使洪湖苏区，迅速在襄河北扩大，仅数月，所发展之新苏区，超过了原苏区一倍以上，红3军也发展

到一万五千余人。地方武装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消息传到了南京，蒋介石不由在大骂起来，先骂湖南何键，后骂湖北何成浚，再骂江西鲁涤平。直把个湘鄂赣三省的国民党军政要人，骂了个狗血喷头。蒋介石一面发火，一面传令，限令各地"剿赤"军务于两月之内，将红军剿灭干净。何键、鲁涤平、何成浚不敢怠慢，急急布置"剿赤"事宜。

时有川军范绍增师奉命出川攻打洪湖苏区的红军。贺龙接到了敌军从襄北进攻洪湖的敌情后，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与敌周旋，在运动中击敌弱处。夏曦当即反对，连连摇头说："这种打法，就是毛泽东的十六个字，是童谣，我们如今已是大势力的红军了，岂能再用那偷鸡摸狗的打法？如此，岂不遭敌耻笑？"

贺龙说："老夏，红军是强大了，可只能和自己比较，如果同敌人打硬仗，那是要饭花子同龙王爷比宝，敌人巴不得同我们拼呢。这赔本的买卖，咱们可不能去做呀。"

夏曦把脑袋向后一挺，不大高兴地说："文常，你怎么老是灭己威风，长敌人锐气呢？什么叫'比宝'，这是你看不到红军力量的强大。你知道吗？这，就是你头脑中右倾思想的表现，你呀，同邓中夏一起呆的时间太长了，受他的影响太深了。需要好好地清理清理才行。"

夏曦这样鸡皮酸脸，又不凉不酸的话，说得贺龙不做声了，其余人也不开口了，为甚？自打湘鄂西省第四次党代会后，王明的中央态度鲜明地支持夏曦，万涛、潘家辰等人受到降职使用的处分，夏曦一下子就成了湘鄂西分局的太上皇。他的话便成了"金口玉言"，连贺龙也不得不让其三分。如今，夏曦说要与敌硬打，贺龙与其争执了一番，却遭到了夏曦一顿抢白，只好不再说甚了。

按照夏曦的军事部署，红7师在天门县的张截港守卫，以保障襄河两岸的交通。7师的其余兵力，向8、9两师靠拢，准备在汉川的灰埠头、焚进寺一带与敌决战。各路兵马就按照夏曦的部署行

动。谁知，红7师还没到达集中点，便在瓦庙集与强敌遭遇，只得仓促应战。夏曦见此情，又命8、9两师向7师靠拢，这样，双方拉开了阵地战，敌人先后出动了两万多人，并有飞机助战。红军也投人了全部兵力。双方激战了7天7夜，敌人越来越多，红军弹药本来缺乏，这样战斗如何拼得过敌兵，而夏曦却耐着脸皮，不准红军撤退，要红军坚决地顶住。就在这时候，范哈儿率一师之众，在沙市上了岸。随后，便气势汹汹地扑向了洪湖。这当儿，红3军正在襄北一带与敌人展开阵地战，洪湖无兵，范绍增不费力地就占了张金河、龙湾，又跨荆河占了老新口。接着，又占了新沟嘴。

时中央分局、省委机关所在地机关周家嘴，距新沟嘴仅三十多里。只有警卫团一团兵力守卫，双方力量相差悬殊。夏曦一接到敌情，急了，便以十万火急的军情报告贺龙，贺龙接到告急报告，立即命7、8两师，牵制皂市、瓦庙集之敌，又命段德昌率9师火速返回周家嘴，阻击范哈儿(范绍增外号范傻儿、范哈儿——作者注)部。

段德昌接受命令后，立即率领9师，连夜赶到东荆河北岸，时夜间风雨大作，段德昌便命部队冒雨过河，在新沟嘴与周家嘴间与省警卫团会合。双方连夜赶修工事，到了第二天上午，工事全部赶修完毕，段德昌又通过地方政府，向老百姓借了一大批梭标枪。原来，9师经过7天7夜的阵地战后，子弹已经很少，段德昌令人将梭标枪发给部队，要大家准备肉搏。

时范哈儿进攻的部署是：五个团都摆在了正面儿，4个团做为后援。他下了向周家嘴进击之令后，其人马便都一窝峰地从稻田里，堤埝上冲了过来，一边冲还一边喊着："杀呀！冲呀！"

看看敌人都冲上了襄河大堤，挤成了团团时，段德昌下令前沿的几挺机枪同时开火，射向挤成团的敌军。由于射击距离近，敌兵立时倒成一片，没倒的都吓得抱头往回跑。埋伏在工事里的红军战士，也都趁此机跳出了工事，端着梭标杀向敌群。红军枪长，敌兵刺刀短，肉搏战中，敌兵吃了大亏。范哈儿在后面用望远镜看到他的

兵马失利，便下令开炮支援，可惜那些炮弹都飞过了河。范哈儿真急了，又下令那后续的四个团也发起了冲锋，并投入大刀督战队督战。立时，双方展开了一场恶战。

这场混战，直杀得烟尘蔽日、河水倒流。就在这时候，段德昌又命骑兵营抄范哈儿后路杀了过来，那一营骑兵战士，手举战刀，冲进敌阵，刀光闪处，敌人头落地。这支队伍一冲入敌阵，便把敌人阵脚冲乱了。正面迎敌的红军，趁势发起冲锋，首尾夹攻，范哈儿的川军一下就垮了，枪支弹药扔的到处都是，范哈儿屁股上也中了一弹，吓得他滚进了稻田，慌慌忙忙换了身士兵衣服，他那心爱的“黑龙驹”也吓得不知跑到了哪里，范哈儿想跑，可屁股伤痛得不能站起。正焦急之时，恰有两个贴身马弁从老百姓家中抢得一头水牛来，范哈儿连忙骑上水牛，急慌慌地顺苇塘小路跑了，一个师的部队，全垮在了洪湖，只有他和几个贴身马弁逃得了性命。

段德昌指挥红9师，与范绍增部交战，大获全胜。这时，贺龙也率7、8两师、甩掉“进剿”之敌兵，回到了新沟嘴。

第十八章　湘鄂西"肃反"之初

夏曦写给关向应的条子

红 9 师大败范哈儿，使"围剿"洪湖的国民党各部队，都闻之丧胆，不敢轻举妄动，一个个均裹足不前。就在这个时候，红 3 军之中，又出了件大事，正是此事，使得那：

烈士热血无端洒，英雄泪水永不干。

贺龙到了新沟嘴的第二天，正与关向应、段德昌等人谈论事儿。有交通飞马送来一信。什么信呢？是夏曦写给关向应的，要他立即逮捕红 8 师参谋长胡慎已，说胡是"改组派"，是混进红军队伍

内的反革命分子。

关向应一看这信就愣了。可夏曦写的信，他又不能不信。便向贺龙问道："文常，胡慎己的出身你知道吗？"

贺龙说："胡慎己是川军刘季昭部的一个团的参谋长，率全团起义，失败后到了上海，中央又派他到了洪湖。"

关向应又问道："胡慎己这人怎么样？"

贺龙说："打仗很勇敢，也有谋，是个好指挥员。"

贺龙看了关向应一眼，遂问道："你问这怎的？"

关向应说："随便了解了解。"

关向应同贺龙后来成为最亲密的战友，一起并肩战斗十几年。1946年7月，关向应病逝，贺龙时正在晋北兴县蔡家崖晋绥分局驻地，贺龙闻讯后，掩面痛哭，并写下《悼向应》之悼词，那词写得感情真切，闻者无不落泪。而在关向应刚到洪湖时，由于二人彼此都不甚了解，关向应又站在了夏曦一边，因此，对贺龙、段德昌都有戒心，凡夏曦与他的指示，不注明要贺龙看的，他绝不给贺龙等人去看，像这逮捕胡慎己的信，关向应就不敢让贺龙、段德昌过目。当天晚上，关向应命人将胡慎己逮捕。胡慎己刚刚抓起，贺龙便来到关向应住处，劈口问道："向应，慎己因何被捕？"

关向应说："夏曦派人送来的信中，说胡慎己是'改组派'，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

贺龙听了，睁大眼急急问道："改组派是怎么回事？"

关向应说："改组派的情况，我知道一些。"接着，关向应便向贺龙介绍了一番关于改组派的情况。

贺龙听了不解地说："胡慎己怎么成了改组派呢？"

关向应说："这我就不知道了，既然夏曦说胡慎己是改组派，想必是有原由吧。"

贺龙听说，便没有说什么，这样，胡慎己便被带到了后方省政府所在地周家嘴。

有人问了，夏曦因何抓改组派呢？其中有原故。

夏曦的爱人，姓谭名国南，二十八岁。人长得也满漂亮。谭国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同夏曦相好的。两人在苏联结的婚。谭国南的模样儿很周正，可心底却不周正。上学时，便爱挑个是非，传个瞎话，扯个老婆舌的。心眼儿小得像个针眼儿。俗话说："拨弄是非者，本是是非人"。谭国南自打跟夏曦结婚之后，没少给夏曦出馊主意。夏曦本来心缝儿就狭，经谭国南这么一拨弄，就更狭了。古语云，妻贤夫祸少。想那秦桧，加害岳飞之时，还不是多听了老婆的话，最后落了个千古罪人之名?这夏曦就很怕老婆，枕边之风很硬。夏曦到洪湖苏区后，谭国南也从上海到了洪湖。在洪湖，谭国南又给夏曦吹了不少枕边之风。比如，在湘鄂西省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潘家辰、万涛、段德昌等人人严厉地批评了夏曦，夏曦气得肚皮鼓鼓的，吃不下饭，可又无理反驳。谭国南就在他枕边吹了风："曼伯，他们跟你过不去，你就先忍下这口气，日后再想法儿找碴整他们，要整就整个狠的，实在不行，我去趟莫斯科，找米夫，找王明。"

夏曦说："潘家辰同米夫关系也不赖呀。"

谭国南说："米夫这人最爱听好话，你不会对他说，潘家辰在洪湖如何如何地拆他的台，说他的坏话吗？再给他编上几个事儿，米夫准发火儿。"

夏曦说："编几条容易，只是得要米夫相信才行。"

还没容夏曦两口子编好诬陷潘家辰等人的话儿，尉士均和关向应来到了洪湖，给夏曦捧来了王明中央这把"上方宝剑"，当时，夏曦和谭国南就乐坏了，抡着这把"上方宝剑"就向潘家辰等人砍了过去。虽然没把潘家辰的脑袋砍了下来，可也弄得这些人直不起了腰，虽然对夏曦还满肚子火气，可也得伏首听命。要依着夏曦，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整治也就差不多了，可谭国南说："要杀人就得见血。这些人如果反过手来，你可就要倒大霉呀。"

夏曦说:“怎么才能再整他们呢?”

谭国南说:“锯锅的戴眼镜儿,找碴儿罢。古语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正当夏曦两口子瞪眼找万涛、潘家辰诸人的“碴”儿时,张国焘在鄂皖苏区肃反的经验来了,夏曦看了这份经验,回屋里跟谭国南一学说,谭国南拍着巴掌说:“要把万涛、潘家辰一伙儿置于死地,就要在这肃反上做文章。”

夏曦点了支烟,慢慢地吸了一口,又在地上转了一圈儿说:“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儿太损了,好歹他们也是革命者呀!”

谭国南把眼一瞪,说:“你怎么敢断定他们是革命的?我看他们就有问题。你想想,他们为什么这么恨你?还不因为你是分局的书记。他们反你这书记,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

因为谭国南人长得很漂亮,夏曦很喜欢她。又加上夏曦曾有过“桃色”之事,被谭国南抓住了手腕,所以,谭国南的话,夏曦从来是言听计从。当下,谭国南的一番话后,夏曦捏着下颏想了想说:“也是,他们这些人,这样起劲地反对我,说不定就是个反党小集团。我不可轻心。”

当下,夏曦便找到了江奇。夏曦把江奇唤到了密室,说:“江奇,你来看看这份材料。”说完,便把张国焘那个肃反经验给了江奇。

江奇接了过来,小眼珠儿不眨地从上到下这么一看,回头说道:“夏书记,张国焘是个人物。”

夏曦说:“江奇,你有什么想法吗?”

江奇说:“张国焘那里有AB团、改组派,难道洪湖就是一池清水不成?洪湖苏区比起鄂豫皖苏区,是小了点儿,夏书记可别忘了,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江奇瞅了瞅夏曦神色又说:“夏书记,您不拿我当外人,我呢,心里有啥都跟您说,我看您身边不干净,说不定就有‘AB团’之类反革命分子,您呀,需要好好的‘清君侧’。”

夏曦说:“只可惜我抓不到洪湖的改组派呀。”

江奇说："夏书记，您只要想抓，我就一定能抓到，只是，我现在位卑，无权无职则名正言不顺。"

夏曦说："此事我想过，我意欲任命你为省保卫局局长如何？"

江奇眼珠儿一亮说："若如此，夏书记之意，江奇定能办到。"

夏曦说："你打算怎么办呢？"

江奇阴笑道："夏书记，磨道里没有找不见的驴蹄印儿。"

说来说去这个江奇是怎样一个人？此人二十五六，扫帚眉、母狗眼，脸色铁青，肉丝横长，独头蒜般脑袋，上小下大，一双晒骨耳。个头不高，两个脚倒是不小，足有一尺多长。别看江奇其貌不扬，夏曦对他别提多好了。夏曦对江奇为其这么好呢？江奇同夏曦是同乡。说来和夏曦还有点儿拐弯的亲戚。夏曦的表姥姥是江奇的姑奶奶。江奇七岁启蒙，背过些"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之类的书。可他不是"书中之虫"，念了几年没甚长进也就不念了。书不念了，田里的活也不愿干，就成了游手好闲之人，镇子上有个红白喜事的，他准去忙乎。抽烟根儿，喝茶根儿，隔着门缝儿看媳妇儿，都少不了他。有好事的人送给了他一副对联儿：

打灵幡端灵盘风雨不误；看死尸扔死孩年节不停。

横皮是"言不二价"。

这打幡端灵盘都是孝子干的。江奇就常穿孝服，充当死者儿孙，混碗饭吃。后来，江奇跟一个"捅驴屁股"的"牙行"学了些买卖牲畜的生意之道。也无非是"钻牙借腿"，换句平常话说，就算干损阴德之事。江奇捅了阵"驴屁股"，又到了县保安局里背了几天"七斤半"，晃当当的混了副"好下水"。大革命时期，北伐军打到了湖南，共产党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搞农民协会。乡下人胆子小，凡得罪人的事，大都不敢出面。这江奇便混上了个农会会长。在打土豪时，发了点洋财，带着这些钱跑到长沙，想在长沙过几天"舒坦日

子”,没想到半道上碰到了一伙败阵的北洋兵,这些散兵游泳把他的钱财给抢跑了。江奇着实的心疼一番,可也没辙,好在缝在裤兜子里的几个戒指还没被搜去,便继续到了长沙。用这戒指换了点钱,在那些大饭馆子里吃喝了一阵子。这天,江奇正在长沙城中闲逛,碰到了夏曦。这时候,长沙已经解放,夏曦正在省党部里任职。夏曦同江奇从小就一块儿玩,一块儿爬树抓雀蛋,一块儿灌狐狸窝,一块儿比谁尿尿高。这会儿夏曦见到了江奇,问他:“表弟,你这是做甚?”

江奇抬眼一瞅是夏曦,只见那夏曦头戴青呢檐硬壳软顶礼帽,身穿兰色长衫,脚下青缎子面鞋,鼻梁上架着眼镜,干干净净,利利索索。江奇弄不清夏曦正在做甚,遂信口说道:“表兄,别提了,我来长沙做生意,没想到叫北洋兵把本钱都抢走了。”

夏曦说:“你打算怎么办呢?”

江奇唉了一声说:“如今兵荒马乱的,我也不知该怎么办好。”

夏曦说:“表弟,干脆你到我那里去吧,我那里正缺个勤务兵。”

江奇本是无根儿的水,流到哪里算哪里,这样,便当了夏曦的勤务兵。你别看江奇是个混混,可伺候主子不用学。眼随心转,眼到心到手到脚到,直把个夏曦伺候的通身三万六千根毛孔,根根痛快。这么着,夏曦就打心眼里喜欢江奇。“马日事变”的时候,夏曦同江奇跑散了。夏曦没被许克祥抓住,江奇可被抓住了。还没等敌人打他,江奇便把什么都交待了。许克祥见江奇是个软骨头,连夜报告了何键,何键亲自审问了江奇。江奇跪在地上对何键说:“只要爷爷留小的一条狗命,小的再打入共产党里,搅他个天翻地复,立功赎罪。”何键听了,铁青着脸说:“我若杀你,如同捻死一个蚂蚁,你若钻到共产党里,明为共产党,暗为我们办事,我就放了你,将来定会有你的好处。”

就这样,江奇在何键那里打手印宣了誓,愿为何键效劳。何键就把他放了。江奇出来后,又找到了夏曦,在夏曦面前编了套瞎话,

说他在事变时跑到了一工人家躲了起来。对此，夏曦对江奇深信不疑。打这儿之后，江奇便不离夏曦左右，他把从夏曦这里得到的有关共产党内的活动情况，都暗地里告诉了何键的情报机关。后来夏曦到了苏联学习，江奇便和夏曦分了手。这当儿，共产党的机关都转入了地下，江奇便在长沙开了个杂货铺，做为中共湖南省委的一个秘密联络站，江奇便利用这个联络站，又暗中向国民党特务机关提供了一些情报。何键见江奇很能干，便下令特务机关，要保护江奇，使其不得暴露身份，这样，江奇便得以隐藏下来。夏曦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江奇听说了，又穷娘家——凑了过去。夏曦要到洪湖当官儿，问江奇是否愿意去，江奇暗中请示了何键的情报机关，经何键批准，同意江奇到洪湖，这样，江奇便同夏曦一起，到了洪湖，继续在夏曦鞍前马后的伺候。如今，夏曦要江奇当保卫局局长，江奇自然高兴了，就这样，江奇便成了湘鄂西省保卫局局长。

江奇做了保卫局的局长，开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多大注意，因为大家毕竟对江奇都不甚了解，江奇一当了保卫局长，便开始在党政策中寻找“驴蹄印儿”。“驴蹄印儿”还真让他找到了。这一天，红9师特务连在天门县抓到了一名国民党军队派进来的特务。这个特务装成了一个商人，来密会天门县军事部长杨国茂。这个特务叫张锡侯，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营长。与杨国茂是同学。奉徐源泉之命，到天门来游说杨国茂反水。杨国茂警惕性很高，张锡候话头儿一露，杨国茂就将其抓捕，当即送交了红3军军部。这个案子本来很清楚，张锡候也有口供。可江奇看了，对左右说：“张锡侯一案，我要亲自审问。”

这天夜里，张锡侯被倒剪双臂，带到了一个碾房。碾房里点着一盏半明半暗的羊油灯。那青幽幽的灯火一照，使得这碾棚里阴森森的，令人毛骨悚然。这时候，江奇一脸凶杀之气，他站到了张锡候面前，举手“啪啪”的就是两个嘴巴。直打得张锡候转了三个圈儿才停住身子，脸上立时起了大红血印子，两个嘴角儿也都流出了血。

你别看江奇人不起眼儿。他早年练过武功，随即恶狠狠地说："老老实实地交待你的罪行。话说明白了，饶你不死，说不明白，小心你的脑袋！。"

张锡候原本是个养尊处优之人，公子哥儿出身，自逮捕之后，连捆带押的，眼壳儿都蹋陷了。江奇这两个巴掌，直打的他眼冒金星。听见江奇问话，说道："我，我，我都交待完了，是，是奉徐……徐军长之命，来……游说……杨国茂的。"

江奇又恶狠狠地问道："你来过几次了？"

张锡候赶紧摇摇头说："就，就一次，我，我要是说谎，你们枪毙我。"

张锡候的话音儿还没落，"啪啪"！江奇又两个巴掌打了过来。直打得张锡候带着哭音儿说："没，没错儿，我，我就来过这一次。"

张锡候话刚到这儿，江奇又"啪啪啪"地抽了他三个嘴巴，把个张锡候都打懵了。打完后，江奇那母狗眼瞪着说："据我掌握的情况，杨国茂已跟你来往多次，你们在红军内发展了一大批人，老老实实交待，都是哪些人？"

张锡候听了，哆嗦着嘴，刚说了个"不"字，江奇抡起了巴掌，"啪"的一下，又打了张锡候一个嘴巴，把张锡候的牙都打掉了一个儿。痛得张锡候嘴巴直哆嗦。这时候，张锡候赶忙说："是，是，我同杨国茂早有来往。"

江奇遂又厉声问道："你们都发展了哪些人？"

张锡候说："我，我只是跑腿的，详细情况杨国茂不告诉我。"

这时候，江奇从腿叉上里"嗖"地拔出匕首，对准张锡候的胸膛说："你听他说的有谁？"说着，江奇小眼珠儿左右看了看，见四处无人，便压低声音说："有没有万涛？"

张锡候这时候吓得面如土色，忙说："有！有！"

"有没有潘家辰？"

"有！有！"

这时候，张锡侯也明白了，江奇是向他逼供。张锡候明白之后，江奇问他甚他应甚。江奇要他说甚他说甚。随后，江奇令张锡侯将这口供写在了纸上，并签字画押。江奇拿到了这些口供，又对张锡侯说："告诉你，你要是翻供，小心你的脑袋。"说完后，江奇便拿着张锡侯的供词，去见夏曦。

江奇逼张锡侯交待的是什么供词呢？是说潘家辰、万涛等人都是改组派，还是头头儿。

夏曦看了这供词，疑惑惑地问："说万涛、潘家辰是改组派，人们相信吗？"

江奇说："铁证如山，有什么不信的。"

夏曦说："仅张锡侯一人口供不行。这个杨国茂也要审问。"

江奇顺着夏曦的话说："我亲自去审。"

当下，江奇连夜派人将杨国茂逮捕。杨国茂三十出头儿，其父是个商人。杨曾在武汉读书。大革命时期回家乡天门县组织农民协会。后任天门县军事部长。杨国茂被带到保卫局后，江奇坐在他面前，笑着说："杨国茂，张锡侯已把你的情况交待了，说你在汉口时就加入了国民党改组派的组织，你要老老实实的交待。我们宽大处理你。"

杨国茂不解地说："我，我加入什么改组派组织？"

江奇"哼"了一声说："我知道你不会轻易招认的。"说着，上去就是一个嘴巴，直打得杨国茂满嘴流血。杨国茂火了，破口大骂江奇。这时候江奇找来了三名打手将杨按在地上，往嘴里灌辣椒水，直呛得杨国茂口鼻喷血。杨国茂还是骂个不止。江奇又令人用竹竿刺杨国茂的十指。杨国茂疼得当时便昏了过去。江奇用冷水将杨泼醒。再问，杨不答。那江奇又用重刑。直折磨得杨国茂昏来醒去，醒去昏来。

苦打成招的“改组派”

江奇刑逼杨国茂，杨国茂只是不招，江奇便将烙铁烧红，恶狠狠地朝杨国茂胸前烫去，只听“嘶啦”一声，杨国茂胸前皮肉顿时散出一股焦臭之气。杨国茂大叫一声，又昏厥了过去。江奇以冷水泼醒。到了这时，杨国茂实在受刑不过，便按照江奇的诱供，供出了一个人来，谁？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江奇为何暗示杨国茂招出胡慎己呢？原来江奇同胡慎己有点私怨。有一次，江奇同夏曦到红8师，吃饭的时候，江奇要酒喝，胡慎己说：“战士们连饭都吃不上，哪里有酒与你？”遂不把酒与江奇吃，江奇老大不高兴，故意把饭撒在桌子上，胡慎己当着江奇和众人面儿，把这些饭都拣起吃了。弄得江奇很尴尬。自此，江奇便对胡慎己怀恨在心。杨国茂招出了胡慎己后，又胡乱招出了红8师24团政委苏继汉。说胡、苏二人同国民党赴洪湖的“剿赤”部队范石生，刘培义、张振汉、郭勋各部均有密切联系，暗中信使往还。

当下，江奇便把杨国茂的口供交给了夏曦，夏曦看后，提笔便给关向应写了个条子，要关向应将胡慎己逮捕，关向应才来洪湖不久，哪里知道这许多原委，便派人将胡慎己抓起。

胡慎己被抓之后，红8师的将士们都愣了，师长孙德清当即找到了贺龙，问贺龙是怎么回事。贺龙便把关向应告诉他胡慎己是改组派的情况讲了一遍。

孙德清不解地问：“老胡能是改组派吗？”

贺龙说：“我想不会，大概是误解，别人不了解老胡，你我还不了解老胡吗？他决不会是什么改组派的。”

贺龙这么一说，孙德清也不再说甚了。这时候，红8师无论干部还是战士，都断定胡慎己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在众人议论胡慎己

时，红7师的参谋长赵奇、参谋处长朱元成、红9师参谋长张应南、参谋处长童士秀、红8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红9师政治部主任刘鸣先、红7师19团政委刘革非，都先后被捕。被捕的原因是这些人系改组派。大家心中正惶恐之时，27团团长杨嘉瑞、25团团长张杰、20团团长刘庶值、21团团长蔡祝封、27团参谋长李孝侯也相继因系改组派被抓，这下子，红3军中的军心可就乱了。段德昌急了，他找到贺龙问道："胡子，怎么回事？"

贺龙紧皱双眉说："听向应讲，所抓的人，都是夏曦写来的条子，说这些人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要他抓起。"

段德昌瞪着眼说："哪里有这么多改组派？别人不知，刘革非、戴君实这些人我还不清楚吗？为了洪湖苏区，出生入死，怎么会是改组派?那刘鸣先，是叶挺身边的副官，你是十分清楚的，怎么会是改组派呢？带兵的人都抓走了，敌人来了，仗怎么打？"

贺龙说："德昌，你也别急，我就去找夏曦。"

当下，贺龙飞马来到了省委和分局所在地瞿家湾。天黑的时候，贺龙到了村头，他把马交给了勤务兵，便径直地来到了夏曦的住处。一进门，见夏曦正吃螃蟹，鲜嫩的螃蟹，装了一大碗。夏曦抬头见贺龙来了，立即笑道："来，云卿，吃个螃蟹吧，这螃蟹味道很鲜嫩。"说着，挑了个大蟹放到桌上。

贺龙坐在了夏曦的对面，没有取螃蟹，而是满脸怒容地说道："曼伯，怎么军队里抓了这么多领导干部？"

夏曦叹了口气说："云卿，我正要找你谈谈，都是我们的工作不当，使得改组派、AB团、第三党钻到了我们苏区党政军内部，而且窃据了要职，这些反革命分子，已经给苏区建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贺龙刚要开口，夏曦一扬手，说："文常，你听我说，根据改组派的口供来看，江南苏区的丧失，敌人数次大举向江北苏区的进攻，都有改组派作为内应。"夏曦放慢了语气说："这些改组派的出身，目前看，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有些是北伐时的知识分子，小资产

阶级学生,混入无产阶级队伍中来的。最后,都成了改组派、AB团的骨干成员。"

贺龙听了,吃惊地说:"老夏,照你这么说,这些人都是反革命分子啦?"

夏曦咬牙切齿地说:"不是一般的反革命,而是反革命分子中的骨干成员。"

贺龙说:"有口供吗?"

夏曦反问一句,"这些人都身居重职,若没口供,我能轻易地将他们抓起吗?难道我犯了神经病不成?"

贺龙想想说:"把他们的口供给我看看可以吗?"

夏曦便从抽屉里取出了几篇写满字,按着手印的纸说:"你看看吧,这是胡慎己的口供,好些人都是他供出来的。"

贺龙接过口供纸一看说:"怎么这字不是他亲笔写的?"

夏曦说:"不是他写的,可是他亲口交待的,最后由他按指画押。"

贺龙说:"我要亲自审审胡慎己。"

贺龙说到这儿,夏曦站起来怒道:"贺文常,难道你还不信我这中央分局书记吗?难道我会草菅人命吗?"夏曦语气略缓了一下说:"文常,这些干部成了改组派分子,我确实没想到,也很难过,这也说明一个问题,说明我们思想上右倾。中央王明同志多次提醒我们,我们都认识不到,事实面前,才使我头脑清醒。现在,我们对这些改组派分子,正一个个地审查,你放心吧,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冤枉一个坏人。"夏曦又坐了下来,继续说:"文常,你不要大惊小怪,根据目前我初步掌握的情况来看,大个的改组派,还在后头,到那时,你会吓一跳的。"夏曦略停一下又接着说:"国焘同志在鄂豫皖已取得肃反经验,他在那里抓了个许继慎,我们抓了个胡慎己,这又有什么奇怪的?中央不是还出现了富田事变吗?这都说明我们苏区党政军内,有坏人,敌人打我们的主意,我现在正为

改造红3军起草训令，你看看吧。"说着，夏曦将一叠写着字的纸交给了贺龙。

贺龙接过来一看，只见那训令上写道：

> 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鄂豫皖肃反的教训，很严肃的教训了我们，各种反革命派别，如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托洛茨基派、罗章龙右派，他们总想打入红军和破坏红军，因此，大家必须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在部队中的捣乱。……

贺龙看到了这里，起身离开夏曦处。飞马直奔新沟嘴。

贺龙到了新沟嘴，汗尘未洗，便去找关向应。一见面，便说："向应，怎么这许多干部都成了反革命了？"

关向应没有说话。贺龙又说："向应，这些同志，战场上一个个出生入死，视敌如仇，怎么会是反革命呢？"

关向应眼望着贺龙说："文常，你不要焦急，事出总会有因的。我想那夏曦也不会神经错乱，不会平白无故地抓这许多干部，他说所抓的人都有口供。"

贺龙说："我怀疑这些口供。"又说："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这许多干部都是反革命。"说罢，愤然而出。

胡慎己等人真的交待许多改组派吗？不是，胡慎己乃至其他许多被抓起的干部，全是江奇酷刑下逼出的，有的是按江奇之意写下的，有的是胡乱招供的，胡慎己的口供，是江奇写好后，在胡慎己被打昏的情况下，江奇抓着胡的手，按上了胡的指印。

夏曦下令逮捕柳直荀

夏曦自抓了胡慎己等等许多干部后，自以为做了件功德无量的大事，便张罗着成立了肃反委员会，夏曦自任书记，关向应为副书记，江奇、马武、朱勉之、鲁易等十几名分局和省委的干部为委员。朱勉之，四川人，素与夏曦交厚。马武，监利潘河人，系湘鄂西省委常委。鲁易，湖南常德人，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爆发，鲁易毅然弃学回国，投身到"五四"运动之中，1920年，鲁易到了法国进行"勤工俭学"，在巴黎，他加入了勤工俭学学生中的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后，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成立，鲁易转为正式党员。其回国后，正值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遂出任政治部秘书，并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北伐始时，鲁易被派到了国民党右派分子谭曙卿师为党代表。同年，鲁易又兼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三·二〇"事件后，蒋介石借此事件排斥共产党的力量，鲁易被解职。于是，中共中央便派他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鲁易在苏联学习期间，与夏曦相识，二人一见如故，谈吐十分投缘，彼此只恨相见之晚。自此相交甚厚。1928年底，鲁易从苏联回国，在中共中央军委任秘书。1931年春，夏曦被王明派到湘鄂西苏区任中央分局书记，走马上任之前，夏曦找到了王明，要求鲁易随他一起前往。鲁易在苏联时，同王明关系也不错，王明自然满口答应夏曦的要求。这样，鲁易便同夏曦一起到了洪湖，红3军的7、8两师在宜城县刘猴集与红9师会师时，夏曦任命鲁易为红3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1月，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潘家辰、万涛等人坚决地反对夏曦。鲁易的态度不明朗，为甚？因此时鲁易既同意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等人的意见，可又拉不下脸来批评夏曦。鲁易不表示态度，夏曦在当时也就很感激了。后来，尉士

均、关向应来了，为夏曦捧来了王明中央的“上方宝剑”，会议情况陡变，鲁易自然就站在了夏曦一边，批评起万涛等人来。会上选举新省委时，夏曦便要鲁易为监委委员，兼任中国工农红军中央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到了3月，鲁易又被任命为红7师政委。夏曦成立肃反委员会，鲁易自然是夏曦意中之人选了。

肃反委员会成立了没几天，夏曦在瞿家湾又逮捕了万涛。万涛被抓，立时震动了洪湖苏区。这时候，万涛已是湘鄂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被捕后，人们议论纷纷，谁也不相信万涛会是改组派。万涛被捕的当天晚上，潘家辰知道了此信，当即来到了柳直荀的住处，进门之后，潘家辰叹了口气说：“克明，万涛今遭此毒手，我大约也距被捕时间不远了。”

柳直荀站起身，一手按着桌子说道：“夏曦如此抓人，我看这其中有诈。”

潘家辰说：“事情摆的很清楚，夏曦为人小肚鸡肠，阴损毒险，我们在四代会上批评了他，他就记恨于心了。”

柳直荀说：“夏曦这样做，他还有点党性吗？”

潘家辰摆了摆手说：“克明，你和夏曦是老熟人了，凭你们私人交谊，向他进一言，一是对他讲，万涛是好同志，二要他别再这样肃反了，如此下去，苏区将自行灭亡。此乃亲者痛，仇者快之举。”

柳直荀说：“我和夏曦的交情还好，这样吧，明天我就去找他，好好地劝劝他。”

还没等柳直荀来找夏曦，江奇便带人将潘家辰、柳直荀逮捕。江奇在带人抓捕柳直荀时，柳直荀厉声问江奇：“你们为甚捕我？我要去见夏曦。”

江奇冷笑一声道：“柳克明，你放聪明点儿，告诉你，逮捕你的命令，是夏书记批准的。你们改组派的行动也太猖狂了，我们刚刚抓了万涛，你就和潘家辰一起密谋反动计划。”

柳直荀怒斥江奇道：“你简直是胡说八道！”

江奇母狗眼一翻说："你这改组派分子，嘴巴倒是硬。"说着，"啪"地打了柳直荀一个嘴巴，柳直荀没提防江奇这一手，一头撞在了墙上，顿时血流满面，正是：

平生正直坦荡荡，而今却遭小人难。

柳直荀脑袋撞在了墙上后，一下就撞出个洞，鲜血立时涌了出来。当时，便疼的晕了过去。待他醒来之后，已被关在了一座破庙的大殿中。柳直荀睁眼一看，这大殿里还关着许多人。有省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徐彬、省委候补委员侯蔚文、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监利县县委书记朱可庭、沔阳县县委书记徐二，万涛、潘家辰也被绑在一个柱子上。另外还有许多人，有的柳直荀认识，有的不认识。每个人都倒剪双臂，嘴里堵着棉花。柳直荀想说话，才发现自己的嘴里也堵着棉花。他想动，手脚都被捆着，头上的伤口一阵阵的疼。到了此时，柳直荀像是在做梦。柳直荀想："怎么自己一下就给关到这里了？"柳直荀正想时，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材走了进来。他到了柳直荀面前，厉声喝道："柳直荀，走，老老实实地交待你的问题。"说着，就把柳直荀提了出去。柳直荀此时不能说话，但他那双眼睛，却狠狠地盯了彭国材一眼。

彭国材将柳直荀带到了一间屋里，进门之后，彭国材把门关上，他把柳直荀口中的棉花掏出，这才说："直荀，你快跑吧。听夏曦那口气，你、万涛、潘家辰等人，怕都没了命了。"

柳直荀到了此时才明白了彭国材的意图。他很感激地说："国材，难为你了，我不能走，我一走，势必要连累你，再有，"柳直荀眉毛挑起说："难道湘鄂西分局、省委只夏曦一人说了算吗？贺龙，德昌他们岂能视而不见？"

彭国材摇摇头说："夏曦上边有后台，又专横跋扈，贺龙、德昌之语，他岂能听得进去！"

二人正说到这里，“呼啦”进来了几个人。为首的便是江奇。原来，彭国材把柳直荀往外一提，便有耳目报告给江奇，江奇立即带来了人，到了屋前，江奇偷听了彭、柳二人谈话，之后，破门而入，不由分说，将彭、柳二人捆起。自此，彭国材也被列入了改组派内。

潘家辰喊着要拿刀子把心挖出给党看

潘家辰的爱人庄东晓，在潘家辰被捕的当夜，也同时被逮捕。前文述过，庄东晓同潘家辰是莫斯科时的同学，1925 年彼此在莫斯科相识，翌年结婚。婚后，潘家辰回国，庄东晓继续留在莫斯科学习。1929 年，潘家辰又回到了莫斯科，在列宁学院读书。同庄东晓系同班。二人相亲相爱，互帮互勉。1930 年底，二人同时回到国内，又共同分配到湘鄂西苏区工作。潘家辰为省委巡视员，庄东晓在省委机关的宣传部门工作。

庄东晓不仅长的貌好，人品也好，且有志气。她出身于名门贵族之家，十八岁时，父母欲以封建包办的婚姻礼法，将其嫁与一有财有势人家的公子为妻。那公子眠花宿柳，吃喝玩乐。庄东晓得知后，一气之下，逃出家门，跑到了广州，参加了革命。她本名庄淑玉，至此改名庄东晓，意思是东方的中华古国，将东方欲晓。庄东晓工作能力强，又待人热情，因此，大家都很喜欢她。特别是她的演说，通俗易懂，老百姓都很喜欢听。

庄东晓被捕之后，便与潘家辰隔离。庄东晓要见夏曦，看押的人不理她。庄东晓一气之下，绝食反抗，竟七天七夜不进食。到了第七天头上，人已经不行了。夏曦才派了肃反委员会的两个委员鲁易、马武来见她。庄东晓看见了鲁、马二人，遂怒问道：“我有何罪，为甚将我抓起？”

鲁易在莫斯科时便与庄东晓相识。他劝庄东晓说：“东晓，无论

如何你也要吃饭，有话可以慢慢讲嘛，你是不是反革命，事实会弄清楚的。”

庄东晓在鲁易、马武的相劝之下，这才进食，可经过了七天七夜的折磨，身体已不支了，便被送到了医院。到医院之后，庄东晓挣扎着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写给夏曦，一封信托中央分局转中央转共产国际。在这两封信中，庄东晓申明了自己的冤枉。

庄东晓写信之后，又过了数天，身子虽然还很弱，但能勉强挣扎着坐起。这天，她正在床上闭目思事，有个人来到了她的身边，喊了她一声：“东晓！”

庄东晓睁眼一看，忙惊喜地说：“谭大姐，是你。”说着，要挣扎着坐起来。

来的这人是夏曦爱人谭国南，她见庄东晓要起来，便扶住她说：“小庄，坐着说吧，看你，几天没见，就成了这个样子，眼眶儿都踢陷了。”说着，给庄东晓倒了碗水。

庄东晓接过了碗，话没说，泪珠儿便滚了下来，她说：“大姐，我，我怎么会成反革命呢？”

谭国南给庄东晓擦了下眼泪说：“小庄，你写给老夏的信，老夏看到了，他要我找你谈谈。他相信你不是改组派分子，不是反革命，只要你把话说明了，也就算了。”

庄东晓含着泪说：“夏书记要我说甚呢？”

谭国南没马上回答庄东晓的话，而是从怀中取出了一张油印的报纸，说：“小庄，你看看这报纸吧。”

这是一张湘鄂西省委办的《红旗报》，庄东晓打开一看，上面有一篇潘家辰的供词，供词的大意是，在敌人大举进攻江南苏区时，他潘家辰时正在那里。江南苏区失陷后，敌人封锁了江南与江北的通路，潘家辰便绕路到了上海。在上海，他遇见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高衡。高衡便邀他到家中做客。高衡对潘家辰讲，说他正在组织第四国际，要潘家辰参加。潘家辰当场表示愿意加人。之后，

潘家辰又在上海遇到了湘鄂西苏区的交通，这交通正要回转洪湖，潘家辰就同他一起回来了。回到省委之后，他就秘密地做起了反动组织的发展工作。《红旗报》在刊登潘家辰这篇供词时，还加了个按语。按语说潘家辰很狡诈，拒不承认自己的反动罪行，后来，在确凿证据面前，才供出他是陈独秀取消派的首领、罗章龙右派的骨干。

庄东晓看到这里时，一下呆住了，片刻之后，她抓住谭国南的手说："谭大姐，不可能，不可能的！潘家辰回省委后，从没跟我说过他在上海见过高衡，他，他决不是什么取消派！"

谭国南说："小庄，你冷静一下，《红旗报》上的口供，可都是潘家辰自己讲的。"

庄东晓说："潘家辰是目空一切的人，怎肯信服一个区区小高衡的话？怎肯听她的指挥？一定是受刑不过，信口乱供的。"庄东晓说到这儿，她抓住了谭国南的手说："大姐，我要亲自去审问家辰，他要是陈、罗派的骨干，我、我亲手枪毙了他！"

谭国南说："小庄，我们也不是国民党的法庭，怎么会用刑逼供呢？相信大姐的话吧，潘家辰确系反革命，老夏要我和你谈谈，只希望你揭发他的罪行，同他划清界限。"

庄东晓摇着头说："不，不，他一定是受刑不过，才说出这些话的。我，我要给他写信。"

谭国南见庄东晓一定要写信，便取过了纸笔，庄东晓当下给潘家辰写了一信，那信写道：

家辰：

我只几句话，假使你并没那回事，因受刑不过而胡供，那你不是一个男子汉；假使你有那回事而不敢据实供出，那我宣布从此与你脱离关系。如果你彻底坦白了，改过自新了，我还与你保持我们原有的关系。

东晓

庄东晓把信写完之后，递给了谭国南说："大姐，相烦你把这信转给家辰吧。"

谭国南把信收起说："小庄，你还是好好想想，老夏说了，只要你揭发了潘家辰，他会原谅你的。"

庄东晓说："他若有问题，我一定揭发，他若没有问题，我怎么揭发呢？"

谭国南说："他怎么会没有问题呢？他那么坚决地反对老夏，不就是问题嘛？老夏是中央派来的，又坚决地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反对老夏，不就是反对中央嘛？"

庄东晓听了，眼含着泪说："大姐，让我想一想吧。"

谭国南说："好吧，东晓，你冷静地想一想，大姐等你的好信儿。"

庄东晓想了吗？想了。她揭发了潘家辰罪行吗？没有。庄东晓了解潘家辰，知道潘家辰决不会做出反革命的行动的。4天之中，谭国南又找了庄东晓两次，每一次，庄东晓都断言说："潘家辰决不是反革命，如果说他工作中有错误，有缺点，这我承认。"

庄东晓如此态度，谭国南自然不高兴了，第二次与庄东晓会面后，她拂袖而走，谭国南前脚走了，庄东晓随及从医院里押回了瞿家湾，并被捆绑了手脚，关在了村头一家祠堂的东耳房内。这屋子终年不见太阳，阴森潮湿。屋子不算大，却关押着二十几个人。这些人庄东晓大都认识，只是有的她一时叫不上名儿来。庄东晓看看这些人，有的愁苦着脸，有的在流泪，有的叹息，有的满不在乎。坐在她旁边的是红9师政委戴君实。戴君实的双手也被捆着，他趁看押的战士不注意，小声对庄东晓说："东晓，看来我是活不成了，江奇、马武、朱勉之他们用皮鞭打我，打得我实在受不了时，就一个县一个县的，一个团一个团的问我谁是改组派，我便胡乱地供了一些人，有侯蔚文、徐二、朱可庭，还说了谁，我也不知道了。"

庄东晓听了，生气地说："你，你为什么这么乱咬人呢？"

戴君实低着头难过地说："他们打得我实在受不了啦。你不知道吧，郑大庆被抓起来之后，朱勉之一边打他，一边暗示他，叫他供出刘鸣先、潘家辰。郑大庆开始不说，江奇、朱勉之就把他左手打断了。最后，郑大庆受刑不过，胡乱招了供。"

庄东晓愤愤地说："这不是逼供么？"

戴君实说："郑大庆还告诉我，说潘家辰受刑最多，他的胳膊不光被打断，江奇还用烧红的烙铁烫他，听说潘家辰在牢内乱喊乱叫，要拿刀子把心挖出来给党看。"

庄东晓听到了这里，忍不住珠泪双流说："江奇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说着，她突然大声喊道："我要见夏曦！我要见夏曦！"

庄东晓这么一喊，过来两个看押的战士，朝她嘴里堵了块棉花，喝道："反动的改组派，看你还喊，再喊老子毙了你，你们勾引敌人攻打苏区，使我们苏区丧失许多土地。"

庄东晓嘴里被塞上棉花，不能说话，只气得眉竖眼睁。她狠狠地看了看押战士一眼，脑门儿的青筋都鼓了起来。

庄东晓后来回忆说：

"肃反是从部队开始的，首先抓了8师参谋长胡慎己，并扬言反革命分子还多着呢！接着，省、县、区、乡的许多负责干部也相继被关被杀，分局、省委的办公地方，都成了关押犯人的'牢狱'，办公室没人办公。出来吃饭的人也逐渐减少。省委、省苏维埃以及各部门的许多负责人都相继不见了。一天夜里，手电筒照亮了我们的宿舍，潘家辰的自己手枪被缴去了，我们被赶出省委宿舍，住到反帝同盟的一间又黑又湿的小房子里，被变相监视起来，失去了人身自由。出来搞点热水洗洗满身的疥疮都不许。哪知连这被监视的生活也没过上几天。又是一天夜里，我同

潘家辰一起被捕了，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分手时，潘家辰坦然地对我说：'肚子里没病死不了人，放心吧！，问题会弄清楚的。'被捕后，我对一个革命者在苏维埃政权下受'反革命分子'待遇想不通，要求见夏曦，可被拒绝了，一气之下，我七天七夜一点东西也没吃，他们把我当成神经病，送进医院禁闭。在去医院的船上，我弄到纸笔写了封报告，托来人带到党中央，我当时不知中央已被王明把持。在洪湖医院，我说服了医院的党支书，他给了我笔和纸，我偷偷写了信，托他带转中央。后来到了1953年，我在北戴河遇见了张闻天同志，他告诉我曾看到我的信。当即致电夏曦，指示潘家辰、庄东晓的问题，暂缓处理，由中央解决。后联系中断了。我到了洪湖医院，一再声明没病，要求赶快审问，他们只把我转到关犯人旁边的一间房子里。不想一夜之间，同一战壕的阶级兄弟，竟变成万恶不赦非杀不可的敌人。在我被转到'犯人'旁边房子的日子里，每到深夜，听到的'犯人'被打的呼嚎声，都吵得我几乎没有一夜能合眼，只有利用白天来补睡。一天中午，大概看守的人饭后休息去了，我朦胧中见一个满身是伤似人非人的阴影在蠕动，这是谁？我几乎叫出声来，见他频频摇手示意，细看之下，才认出原来是红九师政委戴君实。他上前几步对我说：'庄同志，您大概不要紧的，希望您能按照列宁主义的路线来发展中国党的事业！我是摧残党的，当打得我受不住，他们指着名单叫我认的时候，我那时昏了，我都认了，凡是我知道的和我听说过的名字我都认了。'当我叫他据实向肃反负责人说明时，他连连摇头说：'我承认了，说也没用，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另一个被打断了手的负责军委组织工作的郑大庆，有一天也偷偷地站到我跟前告诉我，说军事法庭负

责人朱勉之怎样暗示他供认军校负责人刘鸣先和潘家辰。潘家辰的右手也被打断了。潘家辰受刑时死不承认，并大声喊叫要他们拿刀子来，割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一次敌机空袭，我被疏散，在一间农民的草房里，我意外地见了潘家辰同志一面，见他用手去拿碗倒水，水未倒成，碗掉在地上打碎了，原来他的手不听使唤了。为了党的利益，免得自相残杀，我向夏曦为首的'革命法庭'反映我所知道的实情，并提示不要逼、供、信的建议，他们当作耳旁风，置若罔闻，逼、供、信的结果，所谓的'改组派'、'第三党'、'托洛斯基派'等帽子满天飞。有几个在一起喝茶，就说是'喝茶会'；在一起散散步，就说是'并肩会'；在一起吃东西，就说是'麻花会'或'好吃会'等等，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在夏曦的眼里，到处都是反革命，他把自己的四个警卫员杀了三个，剩下的一个还是被贺龙的同志救出的。"

乱棍下的冤魂

夏曦自从抓改组派、AB 团、第三党以来，不到一个月的光景，就在党政军各系统内，抓出了一千五百多名，其中改组派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由于抓的人太多了，看押人员不够，只得将卢冬生的手枪大队调来看押。夏曦如此一搞，直把个苏区里里外外，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自危，个个胆寒。比如，几个相好的人在酒馆里喝了回酒，这几个人便成了改组派，原由是几个人在一起就要密谋反革命事儿。两个人如果私下里说了几句话，也立即被说成是改组派。更有许多人是被胡乱咬出后苦打成招的，而后又去乱咬别

人。如此恶性循还，改组派便越抓越多。

这一天，夏曦在瞿家湾召开了公审大会。公审被抓起来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成员。大会会场设在村北的一个打谷场上。在这谷场南端，搭了个坐北朝南的高台，上面悬挂着“革命法庭”四个大字，大字写在白纸上。会场前边牌楼上挂着“湘鄂西省苏维埃公审反革命大会”的横匾。台上，设主审、正审、陪审各座次。台下，设置了纪录席和新闻记者席。高台的前面、左边和右边，都是群众的座位。

到了上午10时左右，各机关团体和群众，均鱼贯而入会场，这样的大会，在苏区成立以来，还是第一次，又是公审苏区党政军的许多重要领导干部，谁敢不去？所以，会场上，黑压压地坐满了人。

大会由江奇主持，他宣布开会之后，便指挥大家唱起了《国际歌》。歌毕，便宣布了夏曦为大会总指挥。尉士均为主审，省委的书记和几名委员坐主审两边，江奇还从群众中挑选了几个不识字的群众为陪审。

主审尉士均首先发了言。报告了开这大会的意义，尉士均是外地口音，唧哩哇啦地讲了半天，结果大伙儿都听不懂，没懂也都瞪着眼看着地。尉士均说了些什么呢？尉士均说的意思是：今天公审大会，是因为保卫局抓了许多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这些反革命分子，钻入了革命队伍中捣乱，破坏苏维埃和红军，破坏土地革命，他们有组织，有领导，而且有许多人还窃据了要职。把他们抓起来后，有好多群众不相信，所以今天开这个公审大会，就是要当众宣布他们的罪恶。使大家知道，苏区的肃反，是多么的必要。在抓捕的许多反革命分子中，有许多是工农分子，受欺骗而加入的，因为他们的出身好，所以，他们醒悟得早，站出来揭发坚决。对这些同志，要从轻判处。尉士均还把什么叫改组派、AB团、第三党解释了一番。

尉士均讲完后，夏曦便亮着嗓门儿开了腔。夏曦说：“革命的同

志们，国民党反动派动用了数以万计的虾兵蟹将，大吹大擂的要把红军消灭，结果呢？我们英勇的红军和广大的工农劳苦群众，将这些虾兵蟹将打了个落花流水。工农红军从他们手中缴获了大批枪弹，使得革命力量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这样，吓破了国民党新军阀的狗胆。于是，他们就变换了手段，动用了社会上的一切反革命势力，什么改组派、AB团、第三党，钻入了我们革命营垒，进行反革命活动，希图破坏革命，做他们临死前的最后挣扎。结果呢，这些反革命的阴谋，在广大劳苦群众的监督之下，无所施其伎俩，把他们的反动阴谋，都一幕幕地揭了出来。最近一个月来，省保卫局就破获了许多钻到我们湘鄂西苏区的反革命分子，为暴露这些反革命分子的嘴脸，并使群众明了肃反的伟大意义，特召集各革命团体，组织这个公审大会。"

夏曦讲完之后，肃反委员会的鲁易发了言，鲁易说："革命的同志们，今天，是公审反革命分子的大会。这个革命的法庭，是我们工农的，是保障工农利益的，保障苏维埃政权的。反革命的法庭，是镇压工农的。我们今天审判的，是改组派、第三党、AB团，这些反革命分子，比蒋介石还坏，他们戴着共产党的红帽子，进行的都是反革命工作。我们的保卫局，捉住了他们，而他们却造谣，说我们乱抓人。我们开这样的大会，就是来宣布这些改组派的罪恶。再有，我们也希望加入改组派的人主动自首，如果不自首，我们一旦抓出，就要严加惩处！"

鲁易讲完了，由各工农群众代表发言，这些代表们多是不识字的，上台说了几句反革命分子应该打倒的话便了事。代表们发言之后，江奇大声喊道："大家注意，下面有国民党特务分子张锡候交待改组派的情况。"

江奇说完，有两个战士把张锡候带到了台上。开会人一听说带上来的是国民党的特务，精力越发集中了，人们都想从这特务口中听听改组派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大家听夏曦等人说了半天，也没

弄清这些被捕之人与改组派的关系，现在由国民党的特务交待了，大家自然十分的注意听了。这时候，张锡候低着头，说："我叫张锡候，是国民党的特务，上头派我来洪湖，是与这里的改组派相联系的。和我直接联系的叫杨国茂，据我所知，洪湖的改组派很多，四川籍的首领是胡慎己，陕西籍的首领是曾大庆，还有马庭山、杨嘉瑞，石首、华容的首领是刘革非、李良耀，江陵的是侯文蔚，天门的首领叫吴凤卿，沔阳的首领叫栩栩，汉川的叫尹锡福，洪湖地区的改组派书记是万涛、组织部长杨成林、宣传部长潘家辰、副书记柳直荀，还有……还有……"说到这儿时，那张锡候干瞪着眼说不下去了。原来，他这些话都是江奇教的。开会之前，张锡候本已背的很熟，可他这人怯场，往台上一站，见人很多，一紧张，说到一半儿时，把后边的话就给忘了。

江奇见张锡候说不下去了，便把他往一旁推了一把，对开会人说："同志们，张锡候紧张了，一时想不起来了，我现在告诉大家，在我们苏区内，混进了许多改组派、AB 团、第三党。有许多还担任了党政军要职。他们组成了联合省委，一开始，我们抓获改组派的省委书记，是医院中的医生罗汉，后来，又发现是曾大庆，再后来，才发现他们的联合省委书记是万涛。他们还有中央办事处，由潘家辰、柳克明组成。书记是柳克明。正当柳克明同潘家辰密商改组派事宜时，被我们抓获。改组派在红军中，设有军委，胡慎己为军委长，下设有师团委支部，还有呢……"

江奇说到这儿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了，那脸竟憋得像鸡下蛋儿似的。夏曦见江奇抓了后脑勺儿，知道他是老和尚摆手——没了咒念了，便起身说："从目前发现的情况看，在我们苏区改组派的组织最老、人数最多，第三党在军内多，地方少。他们的阴谋主张，是在机会主义的掩盖之下，使党和群众受到相当的影响，比如，潘家辰在党内提出的租佃政策，结伙反对四代会，就是他们的反革命行动。"夏曦说着，用眼光扫了下会场，见人们很认真地听他的讲话，

便一手插腰，一手挥动着说："他们发展组织的对象，是地富分子，消极怠工分子，对党不满分子，受到严重的处分的分子。谈话的方法呢？是向这些人宣传蒋介石军队'围剿'的危险，说只要加入他们的组织，就可以保障生命。他们还欺骗下层的工农分子，说现在的分局领导有问题，要改造。再有，就是拿枪威胁，他们动员后，若不加入，就被打死。告密的也被打死。他们还根据人之爱好来做工作。比如，他们见你愿同女人混，就用王八委员会、恋爱委员会拉拢；见你好吃喝，就用吃喝委员会来拉拢。还有呢？"夏曦一拍脑门儿，又接着说："还有什么荷花会、野猫会等等名目繁多的组织及手段，使得那些政治水平低的工农分子，在玩笑中就把他们吸收了，而后嘛，就宣布你参加了改组派，你若不从，便有生命的危险。"夏曦换了口气又说："他们组织的发展，主要是在洪湖的水灾时期，利用党内一些人悲观失望的情绪，从而壮大了他们的组织。"说到这儿，夏曦把嗓门儿一挑，胳膊晃着说："现在我们发现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混入我们苏区党政军内部窃据要职的，有省委常委、省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省委候补委员、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省委监委委员侯蔚文、省苏维埃副主席刘革非、省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银行行长戴补天、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材、省苏维埃经济部长栩栩、红3军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直荀、红7师参谋长赵奇、红8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己、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红9师参谋长张应南、政治部主任刘鸣先、红9师政委李剑如，团以下的改组派这里就不一一说了。"

夏曦将这些改组派一公布，开会的人几乎全都直眼了，为甚？因为这许许多多的改组派中，大多数人他们都十分熟悉，刘革非、段玉林、彭国材、戴补天等等，都是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这许多年来，为解救洪湖百姓与敌人战斗，出生入死，怎么忽然间成了改组派呢？这当儿，人群中出现了一阵骚动，江奇看到会场上群众

的情绪不稳，立即举手呼口号："工农兵联合起来！"

江奇这么一喊，大伙儿也只好都跟着喊。江奇又接着喊："打倒反动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

人们又跟着他喊。江奇喊过几个口号，会场上人们的情绪又平稳了，夏曦走上台来，厉声说："将改组派首恶分子都带上来！"

这时候，有一队战士将万涛、潘家辰、柳直荀、彭国材、孙德清、刘革非、戴补天、刘鸣先等鄂湘西苏区内党、政、军中重要干部，都押了过来。每个人都被倒剪双臂，嘴里堵着棉花，这些人，虽然刑具在身，口不能言，但是，每个人都立眉倒竖，怒眼圆睁。对这一张张愤怒的面孔，前来参加大会之人，都很熟悉。而今，他们忽然间竟成了反革命分子的骨干人物，大家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有些人心里难过，便把头低下，不去看这些人。这时候，夏曦满脸的凶杀之气，他恶狠狠地说："现在宣布，对万涛、潘家辰、刘革非、彭国材、胡慎己、戴君实、戴补天、侯蔚文、张宗理、张昆弟、栩栩、孙德清、刘鸣先、李剑如、彭之玉、段玉林、赵奇、张应南……二十名改组派的首恶分子判处死刑，立……"

这夏曦的"立"字刚一出口，只见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来说："夏书记，不好了，敌人大队人马杀过来了，距这儿不到五十里了。您快跑吧，晚了就跑不了啦。"

夏曦听了，那脸儿刷地就变黄了，这时，江奇走过来说："夏书记，赶快下杀的命令。您下了命令就走吧，这儿我来收拾。"

夏曦听了，舌头根子发硬地说："对……对！"他又面对会场说："刚……刚才接到了敌情报告，说敌人距此不到五十里了，敌人为甚么这会儿突然出现？显然是来救这些改组派的，这说明这些改组派同敌人是一伙的，更说明改组派的可恶。现在，对这些改组派，立即执行死刑！"夏曦说到这儿时，两条腿已经打了颤儿，他对江奇说："你，你来处置吧，我……我走了。"说完，慌慌张张地下了台，撒丫子就跑了。

夏曦前脚走，那江奇后脚就指挥着战士们，将万涛等人押到会场西北角。随即，来了三十名打手，每人手中提着根硬木棍。江奇一声令下，这些打手们便举棍向万涛等人打去。乱棍下过，顿时鲜血四溅，脑浆崩裂，骨肉横飞，那惨叫之声，令人撕心裂肺。闻者无不掩面低头。可怜，这许多英雄，蒋介石出重金皆不能买得其首，而今刹时便亡于乱棍之下，真真令人痛心疾首。谢老谢觉哉对此曾写诗骂夏曦道：

"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
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

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
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

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
姓字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

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
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时谢老谢觉哉正在湘鄂西临时省委任秘书长，主办《工农日报》，本在夏曦欲杀害的黑名单之内，由于在监利剅口左家垸被敌潘善斋旅所俘，夏曦杀害群英时，谢老正在敌营中关押，才幸免一死。

万涛、潘家辰、柳直荀、彭国材、孙德清等等英雄之死，真真的千古奇冤，着实令人伤感不已。1957年，毛泽东主席写信与柳直荀的爱人李淑一，对于英烈忠魂，予以无限感慨与怀念。信中写《蝶恋花·答李淑一》词一首，那词写道：

我失娇杨君失柳，
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柳直荀的爱人李淑一写了《菩萨蛮·惊梦》一词，以表示怀念柳直荀之情，全国解放后，她将此词寄给了毛泽东，其词道：

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了。底事太难堪，惊疑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

又有后人写诗颂柳直荀道：

柳色依依忆汉南，几回摇落怆江潭；
祇今遍地红花发，弥念长条斗雨酣。

洪湖百姓听说这些英雄们被乱棍打死，不敢高声痛哭，个个暗中饮泣。人们在渔舟中、苇荡里，默默地悼念着英雄。在彭国材的家乡，一位无名诗人，用一丈多长的青布，写成了挽词，悼念彭国材，那挽词写道：

洪湖出英雄，国材人人崇。百战经风雨，杀敌建奇勋。

跟随周逸群，风浪自从容。敢与鬼域斗，大风识舵工。心怀共产志，赤胆为工农。一生为革命，死比泰山重。英名垂千古，业绩永随同。加倍把妖除，胜利慰忠魂。

江奇指挥人将万涛等人打死之后，立即宣布散会。接着，他又指挥人，将那些没有死的"改组派"全部转移，已免被敌人抢走。在转移这许多"改组派"时，江奇令人用铁丝从这些人的肩胛骨穿过，而后系在一条长绳上，走时，前后左右都有战士们押着。那些"改组派"，一边走一边滴着鲜血，个个痛苦不堪，有伤病过重走不动者，江奇便命就地处死。被处死者的凄惨之声，令人心颤。这些"改组派分子"走出有十数里远时，有人向江奇报告，说追兵只有几里远了，江奇当即下令，将那些走不快的"改组派分子"全部推人路边湖中，可怜，这些人都被绳子捆住了手脚，结果，活活地被淹死。由于湖中淹死很多"改组派"，吓得渔民们不敢打渔了，因为打涝上来的多是死尸，连湖水都变了颜色。

第十九章　湘鄂西苏区的第二次大“肃反”

可叹一鸣死的屈

来的敌军为国民政府第四次“围剿”苏区的左路军。总司令为国民政府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副司令为徐源泉。时何成浚命令徐源泉率洪湖地区全部鄂军、长江上游王陵基部的川军，加上萧之楚的44师、新编第2旅刘培绪部、湖北警备旅容景芳部、新编第3旅徐德佑部、新编第34师陈渠珍部、暂编第19旅罗启疆部、川军郭勋部、湘军第19师李觉部、第11师张英部、新编第7旅李宗鉴部等等，共二十万大军，杀气腾腾地直奔洪湖苏区而来。除此之外，何成浚还下令对苏区进行了经济封锁，严禁各种生活必需品和可供军用的物资进入苏区，特别是盐、布匹、煤油、药品，尤其严禁输入，违者便以“通匪资敌”论罪。

时徐源泉指挥第10军到了洪湖，先占了沔阳，接着便直插瞿家湾。这时候，夏曦正在主持召开公审改组派大会。在徐源泉部距瞿家湾仅五十里远时，夏曦才得到了信儿，慌慌张张地下了处决万涛等人的命令，而后向江奇略作交待，便飞马逃走，江奇也急急忙忙地指挥战士们将万涛等人乱棍打死，又在逃跑途中将带不走的改组派推到湖中淹死，如果这时候徐源泉挥军掩杀过来，江奇等人是跑不脱的，而湘鄂西省委机关的许多人也都没有跑远，还有许多群众，也是刚刚得信儿，说来也怪，徐源泉部却停下来不动了。原来，南京军队此次"围剿"红军采取的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策，每占一地便停下修筑碉堡。所以，夏曦等得以逃脱。

在敌军大举进攻苏区之际，红3军此时到了哪里呢？在夏曦召开公审改组派大会时，红3军的主力8、9两师，正奉夏曦之命，攻打荆州、沙市两座城市。这荆、沙两城，在洪湖地区，也算得上是大城市了。夏曦为甚要红3军攻打这样的大城市呢？自红3军取得陈家河、龙王集、文家墩、新沟嘴三次战役的胜利之后，夏曦高兴了，把这些胜利都算在了他执行王明中央路线的胜利上，急急忙忙地向中央写报告报功。博古见了这份报告，乐了，当即回信，把个夏曦着着实实地夸奖了一番。这样一来，夏曦更来了神儿了，便命令红3军攻打荆州、沙市，他要夺取大城市，要把省委分局搬到大城市内。贺龙说："荆门、沙市城廓坚固，敌防范甚严，红军两次均未打下，再打这样的仗，是赔本的买卖。"

夏曦正色说："以前之所以没能打下荆、沙，是错误路线所至，如今有王明同志为首的中央正确的领导，荆、沙必指日可下。胜利拿下荆、沙，是我们紧跟王明同志的具体表现。"这时正是夏曦权大气粗之时，他的话在湘鄂西苏区已是说一不二，段德昌背后骂他是金口玉言屁眼子嘴。贺、段虽然不同意打荆沙，可命令还得执行。当即，指挥红8、9两师开往荆、沙两城。这两座城池，本来十分坚固，

又恰逢敌往洪湖增加"围剿"之军，荆、沙两城之中，各增两师之众。时8师攻沙市，9师攻荆州，两师各自攻了数天，部队伤亡都很大，弹药亦消耗许多，结果两城都没攻下。这时，贺龙、段德昌向夏曦提出要撤军，夏曦正抓改组派抓到兴头上，非但不听二人之语，还认为二人思想右倾，不积极指挥，并怀疑两人是否是改组派，并批评了两个人，要他们找查思想上的原因。并派关向应前往督战。关向应到了荆、沙，将夏曦指示传达之后，只气得贺、段二人豹眼圆睁，肝胆生烟。这时，川军王陵基两个旅赶来援荆、沙两城之敌，两城之敌也倾城杀出。夏曦又摇控贺、关、段三人，命令红军与敌开展阵地战，不得撤退。贺段二人只得命令部队构筑工事，与敌抗争。段德昌指着工事对贺龙说："胡子，咱们这是叫花子跟龙王爷比宝啊！"

贺龙拧着双眉，没有说话。

贺龙指挥红3军8、9两师，与敌人又打了数天阵地战，敌人越打越多。红军看看不支，贺龙便对关向应说："向应，再这样下去，红军非垮不可呀。"

关向应说："文常，你说怎么办？"

贺龙说："部队要赶快撤，跳到外围去。"

关向应紧皱眉头说："夏曦没有命令啊。"

贺龙听了，发怒道："夏曦距我们这里有两百多里路，我们打仗，还要他遥控，这仗如何能打好？"

关向应沉吟一下说："胡子，依你呢？"

贺龙说："立即转到外线，到敌人的背后去打。"

关向应听了，想了想道："就依你的意见，部队撤退，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

当即，贺龙向8、9两师下了向襄河北撤退的命令。关向应又连夜派人，去通知夏曦。

不提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率8、9两师向襄河北转移。再说红7师，在8、9两师攻打荆、沙之时，也奉夏曦之命，抗击北面进攻苏

区之敌。敌人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策，压向苏区，7师依照夏曦的分兵堵口、阵地防御的指示，与敌正面交战，结果，损失很大，敌兵一直追到老新口，按兵不动，红7师才算暂时停住脚。

夏曦从瞿家湾打马逃跑后，一直向西北逃去，直到新沟嘴，迎住了红7师，这才收住脚，打听得敌军没有追上来，那颗慌乱之心才算停下，整整衣帽，到了7师师部。这时候，红7师原师长孙德清已被当做改组派处死，新任师长为王一鸣。夏曦在师部见了王一鸣的面后，二话没说，开口便怒气冲冲地问道：“为什么7师败退到老新口？为什么不把敌兵顶住？”

王一鸣解释说：“夏书记，敌人兵力大我数倍，我们虽顶了几次，顶不住哇！”

夏曦眼皮不抬，冷冷地说：“王一鸣，你再把这话学说一遍。”

王一鸣本是老实而又胆小的人，他见夏曦一脸怒气，身上还带着杀人的血腥味儿，赶紧说道：“夏书记，仗怎么打，听您的。”

这个夏曦，压根儿就不懂得军事，更没打过什么仗，可当王一鸣问他时，他不假思索地说：“《三国演义》那书你看过没有，那里有偷营之说，我看可以派一个团去偷袭敌营？”

王一鸣点头答应说：“夏书记，我们今天晚上就去偷袭。”

就在这天夜里，红7师的一个团偷袭了老新口之敌。时老新口内住的是万耀煌的部队。这万耀煌部本是攻打鄂豫皖苏区的，后调到湘鄂西苏区。万耀煌是精通兵法之人，对部队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小心，生怕出差错，因而他的部队驻地周围，戒备森严，岗哨林立。夏曦既不知己，又不知彼，仅凭主观想象就派兵夜袭，哪能成功？红7师的这个团打到老新口后，一下就被敌军团团包围，可怜一团之众，到天明时，所剩无几，有逃出重围的红军士兵，飞跑到新沟嘴报信儿。王一鸣听了，赶快报告夏曦，夏曦气呼呼地说：“把另外两个团也拉上去！”

王一鸣刚说个“这”字，夏曦一挥手：“照我命令执行！”

王一鸣只好执行夏曦的命令，将部队拉了上去，双方一接触，这两个团就遭到了万耀煌部猛烈的火力阻击，部队顿时伤亡了许多。王一鸣又组织部队第二次发动冲锋，结果又被万部火力压回。这当时，徐源泉部 41 师赶到了，与万部会合到了一起，摇旗呐喊地向红 7 师杀来，来势凶猛。红 7 师抵敌不住，大败而退。万、徐乘势追杀。万耀煌部骑兵冲到红军队伍内，19 团政委瞿登高被敌骑兵砍死。这时，红军可就乱了，纷纷四散逃走。王一鸣带着残部，一直退到了分盐村，才算收住脚。查点了一下部队，仅收容了不到一团人，见敌兵尚有继续追赶之势，只好又连夜后撤，一直退到了柳关，才算停住了脚。夏曦见到了王一鸣，怒视着王一鸣，突然吼道：“王一鸣，我看准了，你一定是改组派！”

王一鸣听了，吓得脸色灰黄，他上下牙打着颤说：“夏书记，你．这，这可冤枉我呀。”

夏曦像没听到王一鸣话似的，他命令左右：“把他捆起来。”

夏曦命令一下，立时过来几个彪形大汉，将王一鸣捆起。堵住嘴巴。夏曦集合部队，将王一鸣押到队伍前，夏曦愤愤地大声说：“同志们，我们为什么打了败仗呢？是因为改组派捣乱。这个改组派就是王一鸣。他掌握了红 7 师的大权，使我们 7 师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大家说，对改组派应该怎么办！”

这时候，部队的情绪正坏，听说是因为改组派捣乱而使得部队打了败仗，人群中立时许多人都吼了起来：“打死他！打死他！打死这个改组派！”

夏曦喊道：“对，就是要打死他，对于敌人的走狗，我们要严加惩处。”说完，夏曦便令人将王一鸣处死。

这时过来两个大汉，架起王一鸣就走，王一鸣大声骂道：“夏曦，你是曹操！”

可怜王一鸣，只当了不到一个月的师长，便被当做改组派杀

掉，有人写诗骂夏曦阴险道：

祸首分明是夏曦，眼珠转罢罪过移，自此史书写一笔，可叹一鸣死的屈。

后夏曦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称：

王一鸣带队伍去边界向前走，而不保持后方，类此遂即破获王一鸣的反革命，这大概是九月底的时候。将他逮捕起来，他自己供出是改组派，获得七师中证据甚多。他在后方地方政府中发展了很多改组派的组织。

夏曦杀死了王一鸣，又将失败罪过都推到了王一鸣身上，打散的红军重新进行了整顿，任命叶光吉为红7师师长，将分局警卫团和军警卫营合编到一起，重新组成三个团，恢复为原建制的19、20、21团。这时"剿赤"军分路进攻柳关，夏曦又下令红7师坚决抵抗，时红军中主要领导干部多被杀，部队新败，士气大落，与白军一交手，便败退下来，退到了毛家口，柳关遂为敌所占领。

周小康之死

南京国民政府"剿赤"军进入洪湖后，到处烧杀抢掠，但见被白军所占领的一座座村落，无不腾起浓黑烟柱，那些跑了的白极会首领、土豪劣绅也都返了回来，组织了铲共队，凡是与红军沾上边儿的，同苏维埃有过来往的，都作为铲除之列。那些堤埝、村头的大树

上，挂满了被害者的尸体，许多村子被白军抢光，又放火烧成废墟。湖泊里的渔船，也被敌人烧毁。把男女老幼用绳子捆上，一起赶下湖中淹死。苏区的百姓，有许多人携家带口地随部队转移而逃难。对苏区的学校、工厂、医院，白军占领之后，一番清洗，更是惨不忍闻。

红7师败退到毛家口后，形势极为险恶，其南面是滚滚的江水，东面是洪湖，北面西而是敌军，面洪湖水面，也被敌军封锁。夏曦到了此时，也不提“寸土必争”了，耗子上树——麻了爪儿。叶光吉见夏曦“草鸡”了，便说：“夏书记，我们从柳集与监利两敌之间偷过吧，再向老新口后面转移。”

夏曦脸色腊黄地说：“我已派人去通知贺龙和关向应了，他们必回师救我们。”

叶光吉说：“夏书记，他们现在哪里，尚不清楚，听说他们转移到襄河北了，远水不能解近渴呀，我们只有突围了。”

夏曦听了，双手抖着说：“那就只有突围啦？”

叶光吉说：“只有突围，别的没有办法。”

夏曦说：“那就突围吧。”

当天夜里，夏曦、叶光吉便率领红7师开始向西南方向突围。夏曦不懂军事，且又不愿启齿下问，致使得突围队伍出发时已到了后半夜，突围道路又选择了一条不便大部队行军的水田小路，部队零零乱乱地走到了天明，尚在白军的包围圈之中。夏曦发现此情后，骂道：“奶奶个×，遇见鬼打墙啦？怎么走了半宿，还没绕出敌人的圈子？”

叶光吉这时调来一个骑兵排，对夏曦说：“夏书记，赶快跑吧，晚了就不行了。”

夏曦二话没说，赶紧爬到马背上，跳上马，由骑兵班保护着，向西南方向跑去。这工夫，“剿赤”军发现了红军大部队突围，立时出击。红军已全处于挨打的地位，也没了战斗力，听到了枪响，纷纷乱

跑，丢枪的、丢弹的、丢背包的，兵找不到官，官儿指挥不了兵。“剿赤”军把红军切成了数块儿，到后来，仅一部分红军冲出了敌军重围，这个刚组建起来的红7师，遂又垮掉。

夏曦在一队骑兵保护下向西南方面突围之后，一直跑到了太阳西斜时，这才听不到枪声，夏曦停住马，向左右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方?”

骑兵排长看了看说：“前面就是沙岗。”

夏曦说：“这不是快到沙市了么？我们走了快一百里路了。”

骑兵排长说：“我们骑兵跑得快呀。”

夏曦忽然说道：“不好，沙市系川军所占，我们要遇上川军就完了。”

正说着，只见前面尘土飞扬，有一队人马开了过来，骑兵排长见了，忙对夏曦说：“夏书记，前面有敌军杀过来了。”

夏曦立时惊得面如土色，对骑兵排长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我命完了。”

骑兵排长在马上看了看，说：“夏书记，您别慌，对面来兵，武器七长八短，不像敌军。”

这时候，夏曦也看清了，过来的队伍，是一支百十余人的赤卫队，夏曦立即命令骑兵排长过去看看是哪一部分。骑兵排长答应着，立即飞马过去。

你道这支赤卫队从何而来?要说清这支赤卫队，先得说说这赤卫队长。这赤卫队长，生钱名瑛，乃是位巾帼英雄。钱瑛于1903年生于湖北省咸宁县钱家庄。其父早年离家赴日本东京求学。钱瑛自幼聪颖。虽十九岁才得以入学，但入学之前，在其母亲兄长教导之下，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她的诗在家乡广为传诵，当地早年有位才女名钱六姐，群众便呼钱瑛为“当今钱六姐”。

钱瑛十九岁入潜江县职业女校学习后，成绩优良，毕业后即任教。这时，家中为她包办了亲事，钱瑛不从，愤起抗争，最后竟用剪

刀猛戳自己的喉部，幸被人发觉，才免于一死。母亲见其秉性刚烈，只好依其赴省城求学。

钱瑛的族叔钱亦石，为进步人士，支持钱瑛投考湖北女师。在女师学习期间，钱瑛接触了许多进步书籍，使其思想更加开阔。1927 年初，二十四岁的钱瑛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便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年夏天，党组织派钱瑛到江西省九江市总工会任干事，汪精卫“七一五”反共之后，钱瑛参加了八一南昌暴动。暴动受挫，钱瑛跑到广州，参加了广州暴动。暴动失败，钱瑛在逃出险境时，慌不择路，跳一民船之中，见船中多是愁眉不展的女人，一问，才知是贩卖人口之船，钱瑛不顾一切，跳入水中，几被淹死，幸被渔民救起。之后，又几经磨难，才到达了香港，找到了党组织，在恽代英的领导下工作。

1928 年 7 月，党组织派钱瑛到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秘书处秘书，在此，与谭寿林相识。谭为北京大学文学系高材生，1923 年入党。毕业后，回原籍广西任梧州特委书记。后到广州参加广州暴动。1928 年春到上海，任上海海员工会秘书长。钱、谭在革命征途中，相遇相爱，志同道合，是年结婚。新婚未满三个月，钱瑛被派往苏联学习。在苏学习间，钱瑛因不同意王明等人的空洞教条，被王明当权的支部局给了党内处分。

1931 年春，钱瑛回国，与爱人久别重逢，胜似新婚。但二人不图安逸，要求到革命艰苦地方，党组织便派他们到洪湖苏区。待启程时，谭寿林因工作牵扯，没能与钱瑛同行，谁知数日后，谭寿林便被叛徒出卖而被捕，受尽酷刑，坚贞不屈，5 月 30 日，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一对恩爱夫妻，共同生活，仅半年时间。

钱瑛达洪湖不久，得知谭寿林被害噩耗。她把这巨大悲痛，化为革命力量，积极组织潜江县人民，打土豪、分田地、反渔霸、抗洪水、并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赤卫队。时国民党报纸写道：

匪中贞姑钱瑛，常骑马率共匪冲锋陷阵，与剿匪军做殊死战。匪首贺龙，甚尊敬之，常呼之为钱先生。外传系贺龙之妹，误也。

1961年，湖北省歌剧院创作的歌剧《洪湖赤卫队》其中的韩英，便以钱瑛为模特儿。时钱瑛看完此戏后，回溯当年风雨，慨然挥笔：

回首湖滨三十秋，几番风雨几多愁，
狂飚蒋匪同为敌，鱼米家园两不留。
杀敌抗洪双苦战，红军义士血争流，
英雄智勇贯今古，一曲名扬震五洲。

话转回头。钱瑛在洪湖苏区遭强敌进攻之后，便带领着一百余人的赤卫队，冲出了重围，在这突围途中，遇到了夏曦。夏曦见有了这百十余人队伍、心中略略平稳了些。便要钱瑛和这些赤卫队员，保护他前行。钱瑛自然应允。当下，大家又急急向西南方走，这时，天快黑了。正行走间，突然见迎面尘土飞扬，又有人马杀了过来，夏曦在马上见了，顿时又惊得面如土色，钱瑛忙令游击队员占领有利地形，准备抗击敌人。

正在这时，有几名百姓跑了过来，骑兵排长拦住他们问道："前面是什么部队开过来了？"

那几个百姓说："是红军。"

夏曦在一旁听到后，立即问道："你们知道是红军哪支部队吗？"

几个百姓摇头表示不知，骑兵排长对夏曦说："夏书记，老百姓一般不会了解我们部队番号的。"

夏曦皱着眉头说："会不会是敌人装扮的红军？"

骑兵排长说："夏书记，我先先过去看看。若是敌人，我立即鸣枪，你们迅速逃走。若不是敌人，我立即来接你们。"

夏曦说："那你就去吧。"

骑兵排长打马走了后，不久就又返了回来，高兴地对夏曦说："夏书记，前面的队伍是红军，是王炳南的队伍。"

夏曦一愣说："王炳南他们怎么来了？"

夏曦正说着，只见王炳南、周小康骑飞马跑了过来。王、周二人一见夏曦，立即上前施礼。没等二人说话，夏曦立时黑虎着脸说："你们怎么到了这里？"

周小康唉唉两声，欲言又止，最后才说道："夏书记，湘鄂边苏区失陷了，我们只得把独立团拉了出来。"

夏曦听了，小白脸儿刷地像着了一层霜，他手握着马鞭，恶狠狠地盯了周小康一阵，突然吼道："周小康，湘鄂边苏区失陷，你这书记，要受到军法制裁！"

湘鄂边苏区因何失陷呢？原来，国民党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川军军阀王陵基，接受了蒋介石布置的"剿赤"任务之后，一面派兵配合徐源泉部"围剿"洪湖苏区，一面派其第 21 军第 3 师第 7 旅 19 团团长赵鹤，率部三千人，纠集各地团防数百人，从恩施出发，向鹤峰的麻水、中营等地进攻。这时候，特委书记周小康坚决地执行了夏曦签发的湘鄂西省委"不使一寸土地为敌蹂躏"的指示，命令王炳南与进攻之敌打阻击战。结果，两战均遭失败。赵鹤遂占了鹤峰城。湘鄂边特委和独立团只得转移到桑鹤边界。这当儿，桑鹤游击梯队队长贺沛卿、王湘泉、贺炳南三人，带队伍叛变，杀害了特委委员，桑植县委书记杨英等三十余名干部。桑植苏维埃及游击队的武器均被其缴获，仅特委书记周小康率少数人脱险。后来，独立团掩护特委、联县政府机关，转移到长阳、五峰一带。在此又与赵鹤部作战多次，虽有胜利，而最后渔洋关一战，独立团大败。由于周小

康坚决地执行了夏曦的各项指示，在土改中严重地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使得苏区中间势力倒向敌人。最后，独立团和特委已无法在湘鄂边立足，便绕开了敌人，经石门退向了洪湖，打算同红3军汇合，没料到途中遇到了夏曦。

夏曦当众把周小康臭骂了一顿，周小康虽然不高兴，但自知失职，也只得听之。这时，夏曦见身边有了队伍，心里安然了许多，他略定了下神儿，便命令部队在沙岗一带做短暂停留，以便收容失散的人马，探明敌情。这时候，红7师被打散的人马，陆陆续续地来到了沙岗。夏曦把这些人凑了凑，又编成了两个师，一个是红7师，一个是独立师。独立师师长王炳南，政委卢冬生。

夏曦将这两个师编好后，又立即将周小康逮捕，宣布周小康为改组派。夏曦集合了部队，当众宣布，说湘鄂边区的丧失，就是周小康这改组派搞的鬼。干部战士们听了，立时就炸了窝了。特别是湘鄂边苏区独立团的干部战士，他们还不曾晓得洪湖抓改组派的情况，一听说周小康是反革命，都吼了起来，立时有几个人跑上前来，抓住周小康，抡拳就打。夏曦说："打得好，打死他！对反革命分子，我们决不能手软。"

夏曦这么一说，那些战士们更是火上加油，又是一阵拳打脚踢，把个周小康的眼珠儿都打得冒了出来，登时翻身栽倒，气绝身亡。后人有诗叹周小康曰：

一心一意随王明，夏曦指示铭心中，哪料反遭杀身祸，哑叭服毒说不清。

贺炳炎飞马救夏曦

夏曦杀了周小康，又探明洪湖苏区四处都有敌人重兵涌来，而且“步步为营，步步筑堡”，看看大势已去，不能立足，知红3军主力8、9师在襄河北一带，便命令红7师在前，独立师在后，向襄北方向转移。这时候，卢冬生对夏曦说：“夏书记，苏区的党政机关、工厂、医院、赤卫队、少先队、还有群众数万人，都被敌人围在了瞿家湾、柳集、毛家口一带，我们要不把他们救出来，他们都要遭到敌人杀害。”

夏曦看了看远处腾起的浓黑的烟柱，皱了皱眉头说：“这数万名群众，上千名干部、老幼妇孺，怎么能带得出来呢？若是救他们，说不定连我们都会被敌人消灭。”

卢冬生听了，顿时急了，他一把抓住夏曦的胳膊，瞪着眼睛说：“难道我们就看着群众让敌人屠杀吗？看着苏区尽敌人蹂躏吗？”

夏曦斜看了卢冬生一眼道：“我不是刘备，为取什么仁义，任十万百姓随他，眼看着曹操兵杀来，还日行十里。这种孔夫子的仁义，我不能做。”夏曦说到这儿，冷笑一声：“刘备尽管败退，可他身边还有赵云赵子龙，张飞张翼德。赵子龙能大战长板坡，张翼德能喝断当阳桥，你卢冬生有这本事吗？”

卢冬生听了夏曦这番不凉不酸的话，愤怒地说：“你给我一个团的人马，我一定把被围的群众和干部救了出来。如果救不出来，我甘当军令。”

这时候，夏曦左右这么一看，见周围人都不拿好眼神儿看他，一个个脸上全都挂着怒气，便说：“好，你卢冬生愿立军令，我给你两个营的部队，你若是救不出群众，要军纪处之。”说到这儿，夏曦对王炳南说：“把独立团的两个营交给卢冬生。”

这时，王炳南小声劝卢冬生说："冬生，算了吧，你跟他当书记的顶牛儿，还会有好果子吃吗？"

卢冬生眼睛一瞪说："炳南，你怎么也说起这等话，被围群众、干部，正惨遭敌人杀害，正眼巴巴地望着我们去救，我们若坐视不救，还算红军吗？"

王炳南遭到卢冬生的抢白，满面羞愧，说："好，冬生，把1、2两营交给你，这两个营的战斗力很强。"

当下，卢冬生带着这两个营的部队，杀向了敌阵。夏曦带着红7师和独立师，向襄北转移。

卢冬生带着两个营的红军，急行军到了一个观音寺的地方，从这里再往前走，便是敌人的包围圈。卢冬生将队伍集合起来，说："同志们，你们是从湘鄂边苏区来的，洪湖苏区的兄弟姐妹，也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他们如今遇难，眼巴巴地等着我们解救他们突围呢。"

卢冬生说到这儿时，许多战士们嚷道："卢师长，不要说了，你说怎么打，我们就怎么打。"

卢冬生说："敌人兵多，我们兵少，我们只能以奇取胜。大家现在好好休息，养足精神，到了夜间，我们冲入敌人包围圈。夜里敌人摸不清我们虚实，不敢妄动，我们却能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当下，卢冬生又给这两个营的干部战士讲了下敌人包围圈的地形地物，而后，这才要大家就地休息。

卢冬生要夏曦给他部队去解救群众，夏曦完全可以给他两营洪湖里生长的队伍，这些土生土长的队伍，熟悉敌情，熟悉地形，熟悉群众，可夏曦却偏偏从桑鹤独立团内给他两个营的兵力，这也是夏曦故意与他刁难。

卢冬生带着这个两个营，天黑之后，从敌人包围圈的空隙内插了进去，在剅口村，遇到了两千名群众，还有些伤病员、医生、妇女干部。卢冬生便命令部队掩护这些群众突围。黑夜之中，白军虽然

发现了红军的行动，但摸不清红军的虚实，不敢追赶，只是放放冷枪冷炮。因此，这一夜之中，有数千名群众和苏区党政工作人员突破敌人包围圈。天明之后，卢冬生又命令部队就地休息，第二天夜晚，再次突进敌之包围圈，救出大批群众。如此一连三夜，绝大多数群众和苏区干部，工作人员被救出。有人问了：怎么敌人包围圈不继续缩小呢？说来卢冬生也是借了蒋介石那“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剿匪”战术的光啦。原来，那些“剿赤”军马包围圈撤下后，边造碉堡，边向前推进，所以，使得卢冬生得工夫将遇难群众救出。卢冬生看看把人救得差不多了，便想带部队去找主力，可又不知主力哪里去了，便带着这两个营的部队，在洪湖与十几万白军周旋起来，而且队伍逐渐壮大，不到一年便发展到两个团，当 1933 年红 3 军转移到鹤峰一带时，卢冬生带着这支发展起来的部队与主力会合，而且还带去了几万块白洋和布匹。夏曦与卢冬生分手时，已经存下见面杀害卢冬生的念头，会面后，见卢冬生带这许多人马来了，也只好把杀卢的念头打消，对卢冬生之英勇，后人有诗赞曰：

英勇无比卢冬生，为救群众冲贼营，
百万军中惊敌胆，疑是常山赵子龙。

夏曦带着突围出来的部队向襄北转移。走到一个叫龙湾的地方时，忽然迎面有一支人马杀来，打头的士兵扛着一面大旗，那大旗上写着“讨赤军第 1 路军”几个大字。大旗后面的士兵，一个个都握着鬼头刀，敞胸露腹，满脸凶杀之气。原来是北极会神兵队伍。

这些神兵摇旗呐喊地冲了过来后，红 7 师参谋长鲁易指挥着部队迎敌，这时候的红军指战员，由于连续作战，都已疲惫至极，哪里还能抵得住这些虎狼之徒？一交战，红军便垮了下去。纷纷地向后撤退。夏曦对师长叶光吉喊道：“顶住！”说着，掏出手枪打倒了两个后退的战士。

叶光吉重又组织部队迎战。谁知这时候，又有一股敌军从左边冲了过来。原来这股敌军是王陵基的川军12师5旅3团，团长滕大尹，带着一团“川老鼠子”在洪湖内横冲直撞，左抢右劫，也是夏曦不走时气，先碰上了神兵，又碰上了这伙“川老鼠子”。这群“川老鼠子”往前这么一钻，红军一下就被冲散了，夏曦和小股人马顺着苇荡小路跑去。追赶的敌人见夏曦骑着马，都高声喊道：“抓骑马的！骑马的是大官儿！”

喊声顺风飘来，夏曦吓得魂儿都没了。这时江奇正在他身后，忙说：“夏书记，快把马甩了，我们钻苇荡吧。”

夏曦听了，急忙从马上滚了下来，对身边一红军士兵说：“快，你骑着我的马前边跑，把敌人引开。”那战士听了，二话没说，跳上马急急地向前跑去。这夏曦便和江奇，钻进了苇荡。偏偏这时，敌军又放起了火来，一时间苇荡中火光冲天，夏曦见状，哭丧着脸对江奇说：“我们完了。”

这时节，有几名“剿赤”军扑了过来，夏曦掏出手枪要射击。江奇说：“不可，我们投……”

夏曦把眼一瞪，说：“怎么，你要投降？”

江奇见夏曦瞪着眼珠子，忙说：“不……”言未了，敌人已经过来了，江奇忙把手举起，夏曦先是一愣，接着那拿枪的手垂了下来，手枪落在了地上。这几名白军士兵一下涌了过来，将他俩的枪下了，随即将其二人捆了起来，押着上了大路。夏曦被捆疼了，对那几个白军士兵说：“我受不了啦，快给我松下绑吧。”

言未了，一白军抡起大巴掌，结结实实地朝夏曦脸上打去，硬把个夏曦打倒在地，正好倒在个苇茬子上，把嘴巴给穿了个血洞，疼的夏曦满脑袋冒汗。那个白军士兵又像鹰抓小鸡一样，将夏曦抓起，连踢带打的把夏曦押走了。夏曦和江奇被白军抓走的情形，被躲在苇荡中一水坑内的红军战士看见了，这个红军战士叫王莽头儿，是个做饭的，白军过来时，他把身子藏在了水中，头顶一块荷

叶，所以，白军没有发现他，大火也没烧着他。而他却看到了夏曦被打的情形。白军去后，王莽头急急地从水中爬了出来，他刚上岸，只见一队骑兵飞奔而来。王莽头又吓得急忙躲起。待那队骑兵近前时，王莽头才看见来的是红军，他几步跳出了苇荡，上前拦住，连连喊道："快，夏书记被敌人抓走了！"

这队骑兵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是贺龙派来的骑兵营，前来支援7师的。贺龙、关向应、段德昌率8、9两师从荆沙撤兵，退到襄北的天门一带后，从逃难的群众口中，得知红7师被白军包围，便派了贺炳炎，率领骑兵营前去解救。贺炳炎接受任务后，立即带队伍出发，一路上从逃难群众口中得知红军主力在龙湾一带，便向龙湾冲去。到了龙湾附近，就遇到了被白军打散的红军。知道红7师主力在龙湾东苇荡一带被围，便拍马挥刀过来支援，恰好遇到了王莽头拦队伍报告夏曦被敌抓走的情况。

贺炳炎听人报告，说夏曦被白军抓走了，忙催马走了过来，亲问王莽头："你怎么知道夏书记被抓？"

王莽头说："是我亲眼所见。没错儿，白白的脸儿，白军还狠狠地打了他一个嘴巴。还有江奇江局长，也被白军抓走了。"

贺炳炎又问："白军把夏书记带到了哪里了？"

王莽头说："往西北走了，这会儿也过不去三里地远。"

贺炳炎听了，跳上战马，一挥刀说："追，去救夏书记！"

二百多匹战马立时"哗"地甩开了蹄子，朝西北方向飞去。不到一刻的工夫，果然见到了一队白军。贺炳炎把马一拍就冲了过去，那些白军万没想到这会儿会有红军即兵出现，还没顾得上开枪射击，骑兵战士们已冲进了敌群，怒喊着与敌拼杀。贺炳炎挥着战刀咔喳地向敌人砍去，突然间，他的左臂中了一弹。好英雄，毫不在意，把牙一咬，继续与敌搏斗。这些冲入敌群的红军骑兵战士，一个个抖擞神威，恰似猛虎入羊群一般。不消一刻，白军终于四散，这时候，贺炳炎看到了江奇，捆着双臂，倒在了路旁。贺炳炎不认识江

奇，他见被捆绑者，定是革命同志，便用刺刀挑开捆绑江奇的绳索。问道："看见夏书记了吗？"

江奇带着哭音儿说："被敌军带到了前面了。"

贺炳炎扔下了江奇，又带队打马向前，在一个水塘边儿，贺炳炎见到了一名红军被扔进了塘里，正在那里咕嘟嘟地喝水，只有屁股还露在水面，看样子眼看就要沉下去。贺炳炎勒住马，派人将这水中红军拉了出来，一看，不是别人，正是夏曦，那夏曦早以被水灌了个大肚儿。贺炳炎用手摸了摸鼻孔，还有一丝气息，这时，有两战士走了过来，这两名战士，都是洪湖长大的，对急救溺水者有经验。俩人忙撕了块布，将夏曦的屁股眼子堵上，又把他脸朝下的横放在马背上，不一会，那夏曦哇哇地吐起了黑泥水。足足有半个钟头，夏曦才开始哼哼了，那两个战士高兴地说："夏书记没事儿了。"

这时候，人们都围了过来，看望夏曦。又过了一会儿，夏曦睁开了眼，他声音微弱地说："我，我还活着吗？"

贺炳炎大声说："夏书记，你还活着。"贺炳炎见夏曦张了张口没出声，又说："我是贺炳炎，是贺龙军长、关向应政委派我来支援你们的。"

夏曦听了贺炳炎的话，点着头："贺炳炎，你，你救了我，我忘不了你，敌人还在周围，咱们快走吧。"

贺炳炎点头。夏曦自此又死里逃生。后人写诗对此叹道：

白脸奸诈如曹操，杀人从来有用刀，
炳炎今救夏曦命，多少英儿头颅抛？

“尉士均也是改组派！”

贺炳炎见夏曦已无性命之忧，使下令人马向襄北退去。江奇来到了夏曦身边，扶夏曦上了马。为安全起见，二人行走在队伍当中。行进的途中，一路之上，又收容了许多被打散的人马。在襄河边儿上，遇见了叶光吉。叶光吉带着一团人被白军赶到了这里，双方会合之后，叶光吉赶快来看望夏曦，问候了夏曦之后，说：“夏书记，鲁易同志牺牲了。”

夏曦像没听到到似的，而是瞪眼问道：“那些随军押解的改组派呢？”

原来，还有数百名没有杀掉的改组派，随红7师一起转移，途中，红军与“剿赤”军相遇，红军被“剿赤”军打散了，这些改组派也都趁势跑了，有的人自此远走高飞。有的人跑了后又回来找红军，为甚？原来这些同志均与家乡中土豪劣绅为仇敌，若回去后依然被杀，无路可去，只好再找红军，便是死也愿做红军刀下之鬼。像那杨嘉瑞，一气跑回了陕西老家，直到1936年，贺龙、肖克率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杨嘉瑞才又去找贺龙，继续当红军。

夏曦听叶光吉讲改组派都跑了，气得跺着脚说：“为什么不杀掉，跑到了敌人那里，都是骨干。杀死一个改组派，比杀死一连人敌兵都重要！”

夏曦喊叫了一阵，见没人答腔，只得下令继续转移。

夏曦带部队向襄北转移之时，襄北苏区大片土地均已被“剿赤”军占领，且每占一处，便修碉筑堡，使得红军无法立足，贺龙、关向应只得带8、9两师，继续向北撤退，撤到大洪山一带，才站稳脚。停了下来。十数天后，夏曦也辗转来到了大洪山区，与贺龙队伍会合。这时的红3军，三停已去二停人，许多将士阵亡。至此，湘鄂西

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完全失败。洪湖苏区也就丧失了。这样，省委政治保卫局和政治保卫队也名存实亡了，夏曦便让江奇担任政务处长。此时的江奇，实际上成了夏曦之下、红3军所有人之上的人物，权力极大，他随身带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谁的名字记在本子上。回头跟夏曦一讲，夏曦点了头，他就把这人处决。红3军指战员见了他简直像见了恶神一般。

湖北的大洪山，又名涢山，其地理位置在湖北省中部偏北，隋县之南。方圆三百多里，为汉江和其支流涢水的分水岭。隋县，位于大洪山和桐柏山之间，为涢水上游，邻接河南省，春秋为隋国地，明清为隋州。红3军到了大洪山后，便住了下来，连日不休的行军打仗，使得部队已人疲马劳。红3军军部住在了一个叫白家河的村落，这地方山明水秀，到处长满成片的银杏树。原来，这银杏含高级蛋白，既可入药，又可食用。银杏亦名白果，隋州白果，远近闻名，而隋州白果，又以白家河一带为最佳。

夏曦到了白家河的当天，就派人把关向应叫到了自己的房间。关向应坐下之后，夏曦拿出了一盘银杏，说：“向应，吃吧，刚才房东老大爷送来的，他说这银杏是大补之物。”

关向应剥壳吃了一个，还挺香。于是，二人一边说着话，一边剥着银杏吃起来。夏曦说：“向应，我们这次算是败惨了。洪湖苏区全丢光了，中央一定要大发脾气的。”

关向应说：“是啊，洪湖苏区丢了，湘鄂边丢了，鄂北苏区也丢了。”

夏曦一边剥吃着银杏，一边继续说，“我们应当找原因，要主动向中央反映。向应，你说这原因是什么？”

关向应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看了看夏曦，笑眯眯地说：“老夏，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夏曦说：“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失败，是由于改组派、第三党、

AB团钻进了我们的内部，当他们的反动面目暴露之后，敌人见我们要把这些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时，便大举进攻苏区，急于要救出这些改组派分子。而藏在我们革命队伍内的，还没来得及被我们抓出的改组派，便趁机行事，所以，才使得我们连吃败仗。”

关向应同意不同意夏曦的意见呢？他不大同意，苏区失败的原因，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不是敌人的力量强，而是杀的自己人太多了，伤了元气。再有，不该要红军去打硬仗。同敌人硬拼。关向应这样想的，可他并没有直言，为什么，他内心中也畏惧夏曦，因为夏曦阴狠手毒，万涛、柳直荀、孙德清、周小康等人他都敢杀，难道就不敢杀他关向应吗？惹了夏曦，就像惹了阎王爷一般。现在夏曦问起他来，他又不愿多说违心的话，所以，稍停了下，这才说：“老夏，我来洪湖苏区时间短，可种种的迹象表明，确有反革命分子钻进了我们的内部，这次我们连遭失败，一定是反革命分子捣乱，这也是苏区失败的一个原因。”

夏曦说：“这是一般的原因，不是主要的原因。”他把一颗剥好的白果扔到嘴里，说：“尉士均一定是个改组派。”

关向应吃惊地说：“他……省四代会后，他不是被派到了鄂北苏区么？昨天回来的。”

夏曦哼了一声说：“他回来后就跑到我这里了，说了不少鄂北苏区丢失的原因。”夏曦把嗓门儿一挑说：“什么原因？他是改组派，这是主要的原因！我有责任，没有早识破他，还把他派往鄂北苏区。造成了鄂北苏区的丢失。”

关向应听了，不由得睁大眼道：“省四代会上，尉士均可是态度坚决的保你的。”

夏曦一拨郎脑袋说：“这正是改组派的狡猾之处，他们一见阵营保不住了，就来个丢卒保车。”夏曦一拍桌子：“今天就要把尉士均抓起来。”

关向应迟迟疑疑地问了一句：“有什么证据吗？”

夏曦语气肯定地说："当然有了，潘家辰临死的时候，供出了尉士均。"

潘家辰真的供出了尉士均吗？潘家辰是供出了尉士均。当时，潘家辰身受重刑，痛苦至极，他想到尉士均走了趟中央，就使得夏曦成了洪湖苏区的太上皇，越想越恨，越想越气，就一口咬出尉士均是改组派的头头之一。当时，夏曦还不信，如今，鄂北苏区丢了，夏曦想到了潘家辰的揭发。

鄂北苏区，又叫"襄枣宜"苏区，以襄阳、枣阳、钟祥、宜城四县部分地区为中心。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湖北省委曾领导过襄、枣、宜、钟四个县，举行了秋收暴动。1930 年春，共产党员杨秀阡、程祖武等人拉起了一支队伍，创造了襄枣宜赤区。后来，这支队伍壮大起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红军第 26 师。到了 1930 年 9 月，襄枣宜赤区已发展到 21 个县，成立了特委。自此改为鄂北苏区。苏区的扩大，引起了豫鄂两省之敌的恐慌，自 1930 年冬始，豫鄂两省之敌先后派了 48 师和 51 师进行了三次"会剿"，使红 26 师受到了严重的挫折。正当鄂北苏区处境十分困难时，1931 年的 5、6 月间，红 3 军 7、8 两师，转战至均州、房县一带，鄂北苏区与均州、房县为邻。故红 3 军的出现，使得"围剿"鄂北苏区之敌，被红 3 军牵制，紧接着，红 3 军 9 师北上接 7、8 两师，会合后，3 个师又在鄂北苏区活动了一下，同红 26 师取得了联系，当时，万涛、段德昌帮助了红 26 师壮大了队伍。红 3 军回洪湖后，湘鄂西省委根据万涛的汇报，将鄂北苏区情况，向中央做了汇报，要求将此区划归湘鄂西省委管理，中央同意了这个意见。这样，鄂北苏区就归湘鄂西省委领导，1932 年 1 月，中央派了一个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的沈宗源到此担任书记。4 月初，夏曦又派了尉士均以分局巡视员的身份，来到了这鄂北苏区，尉士均一到了那里，便同沈宗源一起，摽着膀子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在"反右倾的旗帜"下，指挥红军攻打坚固据点儿，大搞肃反。6 月，国民党范石生部进攻鄂北苏

区，尉士均便按照夏曦的御敌之策，命令红军分兵把口，寸土必争。最后，使红26师只剩下了百十条枪。这时候，沈宗源看到红军完全失败了，鄂北苏区全部失陷了，便携款潜逃。尉士均也只身跑回了洪湖。鄂北苏区完全被敌人占领。尉士均向洪湖逃跑时，半路上与贺龙、关向应相遇，知道洪湖危急，便留在了军中，这当儿，夏曦也就到了。

夏曦向关向应讲了尉士均是改组派、并说有潘家辰的供词后，又说："向应，沈宗源携款逃跑，这沈宗源也一定是改组派分子。应当立即把尉士均抓起。"夏曦说着，随手写了个抓尉士均的条子，递给了关向应，说："你去办吧。"

中共中央赞赏夏曦的"肃反"

关向应接过抓尉士均的条子，夏曦又说："向应，中央对我们肃反很重视，认为我们做得很好。"说着，夏曦从挎包里取出一封信，说："这是中央给分局的信，前天，交通追上了我们，你看看吧。"

关向应接过信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

读了你们关于肃反的报告与决议，我们认为湘鄂西党在这次肃反工作中所执行的路线，是正确的，而且，正是因为湘鄂西的党能够坚决地执行国际与中央的指示，能够依靠在湘鄂西苏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热烈的拥护，所以，肃反工作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此致

布尔什维克敬礼！

中央

九月二十日

关向应看罢信，心里可就打开了鼓了，什么鼓？夏曦肃反杀了那么多的干部，特别是湘鄂西的许多领导干部，象柳直荀、潘家辰、万涛、周小康、段玉林等等，一个个出生入死的闹革命，怎么一下就成了反革命呢？他想不通，如今，中央来信，不仅肯定了夏曦的肃反的成绩，而且还用上了伟大胜利的字眼儿，对肃反大加赞扬，这说明自己同中央的路线又相差了很大的距离，所以，他后脊梁冒了汗。关向应在执行立三路线上，由于跟得积极，犯了错误，用今天曾用过的一句时髦词，叫做"心有余悸"。关向应不由得暗暗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向应啊向应，你是不是立三路线的毒还没肃清啊？"他正想着，夏曦又把一个剥开的白果仁吃了进去，说："向应，我只希望你能同我密切协作。"

关向应说："老夏，放心吧，我会坚决地执行中央和国际路线的。"

夏曦点了下头，说："好。"接着，他手指在桌子上一敲，把身子往关向应跟前靠了靠，压低声说："你说贺龙这人是不是改组派？"

夏曦这么一问，关向应立时打了个冷战，为甚？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夏曦会怀疑到贺龙身上。好在夏曦是用怀疑的口气问他，他便随口说句模棱两可的话："不会吧？"

夏曦又吃了几个白果，说："我对贺龙怀疑，也是有根据的。像他这样一个旧军队里过来的人，改组派能不在他身上打主意吗？"

关向应说："老夏，贺龙可是在共产党倒楣的时候，把他的军队交给了共产党的，他也是在共产党最倒楣的时候入党的。"

夏曦说："改组派可是有迷惑人的一面，像那孙德清，不也是与贺龙情况相符吗？难道贺龙就……"

夏曦话刚到这儿，突然眼珠翻白，"咕咚"一声，栽倒在地。嘴里吐起了白沫。关向应一见夏曦这个样子，吓坏了，立即跑出门外，对勤务兵说："快，快去找医生，夏书记得了急病。"

工夫不大，医生来了，看了看夏曦两眼翻白，口吐白沫，手脚冰凉的样子，不知所措，说："是不是中风了？"

关向应说："怎么会无缘无故的中风呢？我们俩说话说得好好的，他突然间出现这个样子。"

关向应同医生的谈话，让旁边一个勤务兵听到了。这个勤务兵对夏曦杀死那么多的干部，早就心中有气，恨的牙根儿都疼，只是不敢说。如今见夏曦忽然不醒人事，便出了屋，悄悄地告诉了另外几名战士，说："夏书记被鬼魂迷住了，听说是万涛的魂、柳直荀的魂、孙德清的魂，都向他索命了。"

这几名战士也恨夏曦恨得咬牙切齿，听这勤务兵一讲，立时就传了出去，不一刻，许多人都知道鬼魂向夏曦索命了。无不暗暗地解气。江奇听了，立时吓得手脚冰凉，慌张张地赶到夏曦的住处，见夏曦面如白纸、口吐白沫、目露白睛，果然不醒人事。军医又是扎针又是灌药的，夏曦只是不醒。江奇爬在夏曦耳边，带哭音儿似的喊道："夏书记，你醒醒！"

关向应见夏曦不醒，急得在屋里来回走着。江奇在夏曦耳边喊了一阵，对关向应说："老关，是不是找个跳大神的跳一跳哇，再买点儿纸烧烧，送送万涛、柳直荀等人的魂吧。"

关向应一见江奇就有气。如今听了江奇的话，怒视他一眼说："别忘了，我们是红军！"

江奇说："老关，我们家那地方就有被鬼魂附了体的，一烧纸，一跳神就好。"

关向应没有理他。江奇也不管关向应同意与否，便去找房东老大爷，做什么，打听附近哪儿有跳大神儿的。房东一听挺奇怪，说："你们共产党还信那玩艺儿？"

江奇说："我们夏书记就是让鬼魂附体，鬼魂向他索命来了。"

房东老大爷半信半疑地走了过来，一看夏曦的病状，又一看地上一大堆银杏皮，忙拍着大腿说："哎呀呀，怎么搞的，这不是中了

银杏的毒么?”

原来，那银杏虽然营养价值高，也好吃，但是，多吃了要中毒。如中毒，煎服银杏壳一两既可解毒。有经验的人在食用银杏时，不剥去硬壳及子仁薄衣，这样吃下去后，便没了毒了。那夏曦哪里懂得这些，平时就嘴馋，如今见了好吃的白果，便没完没了的吃，以致中了毒。当下，房东老大爷取了些银杏壳壳，煎成了汤，给夏曦灌下，工夫不大，夏曦便缓了过来，呻吟着说要出恭，过来两个勤务兵，搀扶着他到了茅房，拉吐了一番，这才又还了阳，后来有人写诗道：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
夏曦中毒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夏曦中毒被救之后，虽躺在床上歇息，却依然想着抓尉士均事。他令人将关向应叫到身边，问关向应是否抓了尉士均。关向应告诉他还没有动手，夏曦那脸马上变得像鸡下蛋儿似的，急扯白赖似的说：“尉士均，要马上抓！”说罢，又要人将他扶起来，当即又开了个条子，条子上写了几个团干部的名字，写完了，夏曦将条子交给了关向应说：“这几个人也是改组派，一起抓。”

关向应接过了条子，看了看，就装了起来。这天夜里，关向应便布置了人，按夏曦在条子上写的名字，一一抓起。

尉士均等人被抓之后，红 3 军上下，人人自危，特别是干部，更是惶惶不安。似有大祸临头一般。有些人看到红军内外乱糟糟的，扔下枪连夜逃跑了。夏曦闻知，更说这些逃跑人是改组派，说红 3 军内改组派还没抓完。

关向应自从听到夏曦怀疑贺龙是改组派的话后，心中像压了块磨盘，沉闷闷的，他想连夜找贺龙谈谈，把夏曦的怀疑偷偷告诉

贺龙，要贺龙有个准备，免得临时措手不及。只是这天夜里布置抓尉士均等人，折腾了半宿，没有顾得上。第二天早上，关向应早饭没吃就去找贺龙。

关向应到了贺龙住的屋子，一瞅，贺龙不在。忙问左右，说贺龙一早就拿着鱼杆出去钓鱼了。原来，贺龙平生最喜钓鱼，经常有鱼杆随身。这钓鱼看起来简单，其实学问很多，不仅有消遣之目的，更有养性之功。有人写"满庭芳"词《钓鱼》一首，那词写道：

> 露湿苔青，烟凝山翠，芰荷出水婷婷。融风乍拂，乳燕学新声。独步池边仄径，朝阳里，石磴凉生。漫寻得小舟一叶，轻飐出前汀。冥冥，遥望见几团绿树，两岸东朱甍。且理就垂丝，钓舟徐横。香饵乍抛波面，却惊起掠水蜻蜓。凝眸处，竿儿不动，默默数浮萍。

关向应出得屋门，按照勤务兵的指引，来到村后一道小河边儿，这小河虽然不宽，水却很深，小河两岸，绿树葱笼。但见那贺龙口噙烟斗，端坐河边，垂钓稳钓。关向应走到贺龙身边，贺龙全然不觉。关向应也没言语，而是默默地站在贺龙身后，突然，浮漂一动，鱼杆起处，一条半尺长的鱼挂在了钩上。贺龙回首从钩上摘鱼之时，这才发现了关向应。遂笑道："向应，你何时来的？"

关向应笑道："我来了一会儿啦，看你钓的那么认真，没敢扰你，怕把鱼惊跑了。"

贺龙将鱼摘下钩，关向应看了看鱼，见鱼四个鳃。背腹缘皆纯圆，口大，倾斜，下颌稍长于上颌，两颌骨及腭骨均具绒毛齿，前鳃盖骨后缘有细锯齿。遂问道："这是什么鱼呀？"

贺龙笑道："向应，这是鲈鱼，为中国四大名鱼，今儿我就给你做鲈鱼吃。"

关向应叹了口气说："鲈鱼味道虽鲜，只怕咽不下去呀。"

贺龙说："是不是为部队打了败仗而苦闷？胜败乃兵家常事么，哪里有常胜将军？"

关向应坐在草地上，说："若只是兵败，我不忧闷，只是……"说到这儿，关向应又长叹了一声："文常，你要多加小心。"

贺龙手持鱼杆，端坐不动地说："向应，难道有人要害我不成？"又道："古话说，一身正气，鬼神难近。想我贺龙堂堂正正，死都不怕，又怕个甚？"

关向应刚要再开口，听到身后有脚步响，扭头一看，顿时脸色变更。遂起身说道："是老夏，你怎么不多歇会儿，身体能行吗？"

贺龙见关向应说话，也回头看去，见来人是夏曦，但尚距他两人有十多步远。关向应向夏曦打招呼，显然是告诉贺龙，夏曦来了。贺龙依然垂钩未动。这时夏曦已到了他们近前。夏曦见贺龙稳坐钓鱼台。遂道："文常，我算是服了你啦。打了败仗还有心思钓鱼？你这钓鱼的兴致也太大了。"

贺龙随口说："听说你病了，我来钓几条鲈鱼给你补补身子。好让你长精神。"

夏曦听说后，笑道："鲈鱼是好鱼呀。《嘉祐本草》上说它能补五脏，益筋骨，和肠胃，治水气。"

贺龙叼起烟斗，吸了口烟说："把你身子补强壮了，咱们好打胜仗，这阵子你太劳累了。看你，眼眶都蹋了。"

夏曦摸了下脸，说："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矣，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咱们要实现共产主义，不受点苦，不受点儿罪怎么行呢？"夏曦又说："你们谈得挺热闹哇。"

关向应笑笑说："我们正谈钓鱼之事呢，文常在钓鱼上，很有学问。"

夏曦一摇头，笑笑说："钓鱼有甚学问？"

贺龙说："钓鱼里的学问大着哩，万年之前，老祖宗们就知道钓

鱼。那时，是用兽皮、兽筋做钩线，没有鱼钩，把蚯蚓绑在钩线子上，鱼吞下蚯蚓，用力拽钩线，鱼便被拽上来。”

夏曦笑笑说：“总而言之，这钓鱼是原始人的活动，我们不谈这些吧。”夏曦说着坐了下来，望着贺龙说：“文常，你在国民党里很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军长的大官，有人说改组派利用你的声望进行活动。”

贺龙手握鱼杆，声色不动地说：“听你这话，我是改组派了？”

夏曦说：“我当然不希望你是改组派了，只是有人这样讲。”

贺龙依然不动声色地说：“有人证物证吗？”

夏曦斜视了贺龙一眼说：“要是有，我就把你抓起来了。”

这时，有一条鱼上了钩。贺龙将鱼甩出水面，摘下鱼，又挂上鱼饵，将鱼钩扔进水内，这才说：“老夏，我看你就可以当证人，我在国民党内当旅长、师长、军长，究竟怎样，只有你最清楚，我带部队驻澧州时，你和郭亮去了我那里，你开口就向我要五万大洋。我那时全师的军饷只有六万大洋，你要五万，我就给了你五万，因为你是代表共产党去要的，我贺龙对共产党如何，你写个证据吧。”

夏曦听了贺龙的这话说：“那是过去的话，别人反映你的问题，是反映你现在。”

贺龙说：“过去我在国民党里，对共产党尚且一心不二，今天我是共产党员，难道还反党不成么？”贺龙说到这儿，把双目一瞪，厉声说道：“夏曦，告诉你，我正怀疑你是个改组派，而且是个大改组派。你杀了那么多的共产党员，那么多的同志，难道他们都是反革命不成？如果是反革命，为什么还出生入死地与敌人拼？”说到这儿，贺龙猛然站起，一把揪住夏曦衣领，怒道：“夏曦，今天你要跟我说明白，你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员？马日事变时，你扔下省委跑了。到了洪湖，你又当上了太上皇。我问你，那柳直荀、孙德清、段玉林、彭国材、刘革非、万涛、周小康，王一鸣……”贺龙一口气数说了许多被做为改组派处死的人名，而后说：“他们，我不信他们会是改组

派。”贺龙又把夏曦狠狠地拽了两下说：“你说，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

这时候，夏曦被贺龙那一双铁掌连拉带拽地已说不出话来了。关向应忙拉开了贺龙的手说：“文常息怒，老夏是共产党员，没错的。对于洪湖苏区的肃反，中央已经肯定了。”

夏曦赶紧说：“文常，是的，中央已经来了信，肯定了我们肃反的成绩。”

贺龙哼了一声说：“中央肯定就没了错了？陈独秀怎么错了？李立三怎么错了？”

夏曦听了，两眼一翻说：“怎么？难道你对王明同志为首的中央有怀疑吗？”

贺龙说：“我怀疑不怀疑，你不是很清楚么？”

关向应见二人越说越动感情，又见时已近午，便说：“快晌午了，文常，你不是还要给老夏做鲈鱼么，咱们回去吧。”

贺龙收拾一下鱼具，对夏曦说：“我请你吃鲈鱼，把你养的肥肥的，养足精神好杀人。”

贺龙的话说得夏曦的嘴巴一下鼓了起来，刚要发作，关向应急忙向他递了个眼神，夏曦这才没动气。

三人进村后，贺龙提着鱼去了伙房。夏曦望着贺龙的背影，发狠地说：“向应，我真想把他抓起来。”

关向应说：“我劝你不要再怀疑贺龙，我敢用党性担保，他不是改组派。再有，他在红军中威信那么高，国民党反动派又那么怕他，你若杀了他，国民党军队攻上来，谁能指挥这千军万马？”

夏曦虽然怀疑贺龙是改组派，虽然恨贺龙，但他迟迟没敢对贺龙下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贺龙的威望在红军内外太高了，又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夏曦是不能比的，所以他不敢对贺龙动手。

第二十章　八千里途中的大"肃反"

夏曦不计较士兵对他的怒骂

红 3 军到了大洪山一带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一时定不下来。这时，洪湖已经完全被敌占领，湘鄂边、巴兴归、鄂北苏区也都失陷了，于是，夏曦主持召开了分局扩大会议。会上，大多数人主张打回洪湖去，少数人主张北上鄂豫皖，同红 4 方面军会师。夏曦同意了少数人的意见。夏曦为甚同意少数人的意见呢？他被"围剿"苏区的敌军吓破了胆，不敢回了。夏曦是分局书记，有最后的决定权，这样，红 3 军便开始向北移动。这一天，到了大洪山北的王店。忽然间发现了红 4 方面军贴在墙上的标语和布告，夏曦不看这布告则已，看了这布告，脸儿刷儿就白了，两腿也哆嗦开了。为甚？这

其中有段原由。原来红4方面已败离鄂豫皖苏区，退到了川北。夏曦本拟前往鄂豫皖，没想到红4方面军已败离。如今红3军前后均有敌人重兵，而将士们又已疲惫不堪，夏曦自然心中着忙。脸色变更。这时候，时令已到金风阵阵，草枯叶黄之时，红3军由于连续的激战，不得休整，给养无源，无论干部还是战士，都像要饭的花子，衣服五颜六色，而且大都破烂不堪。脚上却多无鞋袜，只用破布缠裹。一个个面目黧黑，头发长乱，且生满了虱子、跳蚤。10月大洪山区的夜晚，已寒气逼人，将士们缺少衣被，只好两人合盖一条破旧军毯。那些伤病员更是受罪。洪湖苏区丧失、医院中器械大部分丢掉，医务人员也多被敌所俘或打散。因此，伤病员难以医治，每到夜晚，呻吟之声不绝。

这天晚上，夏曦带着江奇，悄悄地来到了伤兵们的住处。这住处在一庙内的大殿里。铺了些稻草，伤病员都躺在稻草上。夏曦江奇进院后，只觉得一股股臭味儿熏鼻。原来是一些伤员伤口发了臭，加之一些伤员有情绪，便在墙角旯旮大小便，使得这院中，虽系10月的寒夜，仍臭气熏鼻。夏曦捏着鼻子，刚要退出，忽听到大殿内有人大骂，便又停住了脚步，大殿里人骂什么呢？大骂夏曦不是人，是狗娘养的。

江奇一听就火了，掏出手枪就要进殿去抓人。夏曦拦住了他，退出了大庙。

回到了住处，江奇对夏曦说："夏书记，他们骂你，你怎么不让我去抓他们？"

夏曦一摆手说："他们只是一般的士兵，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不是这样公开骂我的。"

江奇说："夏书记，您是大度之人那。"又说："我们将何去何从呢？难道还回洪湖吗？"

夏曦说："洪湖是不能去了，到哪里容我想想。"

第二天上午，夏曦将贺龙、关向应、宋盘铭三人找到了一起，

说："我下了个决心，将部队拉到湘鄂边，那地方么，文常熟悉，容易立足，只是怎样才能把部队拉过去呢?当阳、远安、荆门一带都有敌重兵把守，不能通过。"

宋盘铭说："老夏，我们若将部队拉到湘鄂边，岂不是彻底丢掉洪湖苏区？若中央追问起责任来……"

夏曦把头一摇，不屑一顾地打断宋盘铭的话说："红4方面军可以丢鄂豫皖，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丢洪湖？"

关向应说："到湘鄂边也不算是离开苏区，那里也是苏区的地方么，只是，四周都是敌人重兵，从哪里过去呢？弄不好，就要吃大亏的。"

夏曦站起身，在地上走了几圈儿，抬脸问贺龙，"胡子，你怎么不说话呀？"

贺龙抽出嘴里的烟斗说："你说到哪里吧，部队交给我，我一定带到就是了。"

夏曦说："到湘鄂边，你怎么个走法儿？我想听听。"

贺龙说："部队如今已疲惫得没有战斗力了，要避勉打仗。这样，我们走豫西，过陕南，绕个大圈子。"

夏曦紧问一句："这条路你走过吗？"

贺龙说："没走过。大革命时期，我听4军政治部主任廖干吾说过，他是陕南人。"贺龙见夏曦直皱眉头，便说："怕什么？路是人走的么。"

到了此时，夏曦也是洋车上马路——没了辙了。只好点头同意。

当下，扩大会上做出了决定，红3军走豫西，经陕南，再南下川鄂边，直抵桑植、鹤峰，重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决定之后，部队稍事准备，便出发西进。夏曦又令江奇将尉士均处以死刑，对尉士均之死，人多不惋惜，因为他明知夏曦错误，偏站在夏曦一面。今日之死，也是应该。后人叹尉士均道：

可叹尉士均，紧把夏曦跟，

夏曦一翻掌，身首两离分。

红3军西进当儿，节令已至10月下旬，但见金风萧瑟，落叶凋零，凄雨淅沥。红3军在退出洪湖时，把地图丢了，只有段德昌手中还有巴掌大小的一张地图，是从教科书上撕下的，上面只有几个大的地名。部队行进了两天，便进入了桐柏山区。这时，头一个困难便是吃的问题。山里的粮食本来就紧，又值这一年春旱秋涝和早霜，粮食所收无几。加上兵匪抢掠，老百姓十室九空。部队常常几天吃不上饭，只好吃些树皮野菜、柿子、核桃等东西充饥。有时实在饿得没了办法，就嚼起了高粱秆儿。

这工夫，部队几乎天天行军，除了吃的困难外，天上敌机扫射，后面敌军尾追。本可夜间行军，以避敌机袭扰，奈许多将士因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夜里看不见路。由于敌机骚扰，部队行进的速度大为减缓，尾追红3军的人马，是马鸿逵的部队。在豫西伏牛山西峡口。贺龙令段德昌打开了马家军的埋伏，大败马家军，这才甩掉了追兵。接着，又先后攻破了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荆紫关、武关。

红3军占了武关之后，这时候已时值隆冬。将士们尚穿着单衣单裤，而这些单衣单裤也都破烂不堪。便将缴获的武关之敌衣服，打土豪的衣服都穿起，好歹算是有了御寒之物。红3军在武关稍事休整，继续西进。所过之处，全是层层叠叠的山岳。红3军一连跨过三十六道山谷，翻过七十二座山峰。这一日，到了竹林关。这竹林关，乃是由陕入川的第一道关口。其关地形比武关更为险要。守关之敌为陕军张自祥旅的一个团。段德昌派人找到了当地穷苦百姓，经反复讲明红军宗旨，在穷百姓带领下，抄小路绕到了关后，偷袭了竹林关，张自祥带残兵逃跑。红3军遂占领了竹林关。

红3军占领了竹林关后，从俘虏口中，得知红4方面军正向西

安行进，敌军麇集关中平原，汉水一带敌兵力空虚，前委遂决定由竹林关折而向南。

这竹林关南侧，是一道河谷，河谷两端，一条栈道，架在两边悬崖绝壁之上。河谷下面，是乱石河滩。地形异常险峻，而除此以外，别无他路可通行。红3军将士无奈，只好沿这栈道，徐徐鱼贯而过。这栈道上面，铺着木板，由于年久失修，许多板子已经朽了，部队经过时，人马践踏，窟窿越来越多，有的人因板子折断，掉了下去，从此牺牲。有的马匹，也跌进了深谷，一些大炮不能从栈道上通过，也只得忍痛丢掉。在这荒山野谷之内，在这寒风凛烈之中，这些以草根树皮野菜糠菜为食的红军将士，为了革命，抛掉妻女，抛掉父母，忍受着非人的艰辛，经受着随时献身的考验，他们如此行径，又为的是甚？

红3军跨栈道，过深谷，继续向南行，所过之处无处不是大山。这些地方，虽然有时还与敌军交火，但多是当地的土著部队。那些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多吃了苦头，一个个均裹足不前。

而这时，夏曦江奇更加紧肃反。一位亲身经历过那段沉重历史的老将军回忆说：

> “红三军在八千里大转移中经常日行百里，而且是交替掩护，边打边走。因此，有时逮捕的人多了，来不及处理，夏曦就将这些‘犯人’编成一队，由江奇派人看管。在组队翻越秦岭南脉时，夏曦命令江奇将一百多名‘改组派’用绳索连绑，每个‘犯人’身上还要背上两支枪和其他东西，随部队行军。这些‘改组派分子’每天只能分到两个生白薯充饥，还要负重行军，一个个被折磨得面黄肌瘦，身体非常虚弱。即使这样，夏曦并没有放过他们，一夜之间，只有军部的一位保卫干部和两名年轻的副团长得以幸存，其余一百多‘改组派分子’全部处死。”

这一日，红 3 军从洵阳、安康之间的羊河口过了汉水，又行了数日，到了一个叫旧城的小镇，这个地方，位于大巴山中，是陕西、四川、湖北三省交界处，是个地地道道的三不管的地方。小镇子不大，也有几家杂货铺，两家饭馆。村头一座小土地庙。这时，红 3 军已经完全抛开了敌军的尾追。到了此时，那夏曦才算松了口气。

刺刀挑死唐赤英

这天晚上，夏曦又给关向应写了张条子，干什么？抓人？抓了谁？红 3 军参谋长唐赤英，关向应便按照夏曦的指令，亲自带人去抓唐。

唐赤英，正同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王炳南等人商量工作事宜。就在这时，关向应进了门。唐赤英见是关向应，忙说道："向应，来喝两盅，这天儿够冷的，暖暖身子。"说着，拿起酒坛子，往大碗里倒了半碗。关向应没有答话，而是对唐赤英说："老唐，你出来一下，有点事儿。"

唐赤英听关向应这么一说，便起身随关向应出了屋门。一到院里，立即涌上来几名战士，将唐捆住。又下了他的枪。唐赤英一下急了，冲关向应喊道："关向应，你为甚要捆我？"

关向应说："你问我，我也说不清，这是夏曦的命令。"

几个人院中这么一嚷喊。屋内的人都惊动了，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王炳南都一起走了出来，贺龙见唐赤英被捆起，忙问关向应说："向应，这是怎么回事？"

关向应拿出夏曦写的条子对贺龙说："这是夏曦的手令，说他是改组派。"

贺龙看了下条子，跺着脚骂道："话见他妈的鬼，我去找他夏

曦。"贺龙说着又转身对唐道："不要急，我要当面问问夏曦，部队都到了这个份儿上，他还乱抓改组派。"贺龙大声喊道："要是有改组派，早把他夏曦打死了！"

段德昌也怒骂道："这个夏曦，一天到晚就知道抓人，杀人，红军快让他杀垮了！"

当下，贺龙怒气冲冲地来到夏曦住处。夏曦正面对着墙吸烟，听到身后的脚步声，猛地回过头，见贺龙满面怒容地走了过来，遂看了贺龙一眼，没有吭声。贺龙说："老夏，为什么把唐赤英抓起？"

夏曦不紧不慢地答道："他是改组派呀。"

贺龙说："他是改组派，你有什么证据？"

夏曦说："红 3 军一败洪湖，再败大洪山，一直败退到今日，就是他们搞的。"

贺龙又问："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时间参加的红军？他们为什么又建设红军？他们为什么又壮大红军？红 3 军败退到这个地步，你这分局书记，要负主要责任。"

夏曦认真地说："是呀，我当书记的，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了。而要负首要责任，是我没能及时将改组派清除出苏区党政军机关，使他们达到了破坏红军的目的。夏曦望了眼贺龙说："胡子，你头脑太简单了，改组派建设红军，最终目的是要消灭红军。"

贺龙说："老夏，照你这么说，我贺龙拖队伍建红军，也是改组派了。"

夏曦哼了一声说："你是不是改组派，我不能下这个结论，可你心里最清楚。"

贺龙听了，拍案而起，愤怒说道："你说句痛快的，唐赤英你放不放吧？"

夏曦吸着烟，不吭声，像是没有听到贺龙的话似的。就在这时，段德昌大步走了进来，他怒目横眉地说："胡子，唐赤英被刺刀挑死了。"

贺龙当时就愣了，这功夫，关向应走了进来，贺龙怒视关向应道："你为什么要把唐赤英杀死？"

关向应说："胡子，你别冤枉我了。"他转过脸，怒挑双眉对夏曦说："夏曦，你为什么派江奇把唐赤英杀害？"

夏曦眉头蹙着反问道："你们为什么对改组派这么好感？"

段德昌对夏曦喊道："夏蔓伯，你，你这是草菅人命。"段德昌说着，只气得浑身乱颤。

夏曦这时候，既像聋子，又像哑巴，贺、关、段的话，他像是没有听见，坐在凳子上，当哑巴，不开口。

贺龙指着夏曦脑门儿说："夏曦，我看你是赖死猴！"

有人问了：什么叫赖死猴？赖死猴是旧社会中无赖之徒的代名词儿。这些人帮着官府催差讨款，用"赖"劲儿，对待那些被讨之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贺龙见夏曦一而再再而三地杀党政军干部，便气愤地骂夏曦是"赖死猴"。

贺龙、关向应，段德昌见夏曦不说话，只好愤怒地离开。

夏曦就此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称：

> 二次肃反开始于六房嘴，差不多每天有敌人追击，每天战斗和行军，部队的建制也是破坏了……二次肃反，亦是此时开始。本来第一次肃反，已经粉碎了改组派的组织体系，但是从军校毕业的学生中被充军事政治负责人，特别是李人一、唐赤英、李强、齐素卿等补充到红军中，在军事系统内、政治制度政治机关内和党的组织里，增加了这一部分改组派分子，故这些人又把粉碎了的改组派组织领导恢复起来，在当时最严重的是破坏阶级路线，以及涣散军事组织，是改组派当时的主要阴谋。
>
> 在改组派最狠毒的计划，是王一鸣与宋盘铭计划将七师拖起，这一个计划是王一鸣与宋盘铭共同商议的，改

组派这一计划的未实现，是因为与八、九两师和军部会师才没有实现，二次肃反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的终结……

二次肃反共逮捕二百四十一人，这二百四十一人中有一个师长王一鸣、一个军委参谋长唐赤英，其次即是团长、营长以及第一次肃反中所残余的政治机关人员，连长这一级是很多数的。

对于二次肃反，贺龙回忆说：

“洪湖失败后，夏曦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们仍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那时捉人都是夏曦给关向应一个条子，关即按夏的指示捉人，条子根本不给我看。”

夏曦决心下贺龙的枪

贺龙、段德昌离开夏曦后，天说话就黑了，夏曦让勤务兵点了支洋蜡，恰好这屋内有几本古旧书，夏曦随手拿了一本《薛丁山征西》，借着蜡烛之光看了起来。正看着，忽听到街里有喊叫卖“夜烧”的。原来，这小镇子上的一些店铺和做小卖买的，到了晚上，也还在街头巷尾卖货。夏曦听到了叫卖之声后，对勤务兵说：“外面卖什么的？”

勤务兵眨眨眼说：“是喊叫卖‘夜烧’的。”

夏曦这时肚子正饿，思想这“夜烧”一定是好吃的东西，便对勤务兵说：“买些‘夜烧’来。”

勤务兵答应着走了，工夫不大，便用个筐将‘夜烧’端进了屋，

夏曦往筐里一看，由于屋里光暗，黑呼呼的，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刚要伸手去抓，勤务兵说："夏书记，不要拿了，这是干驴粪蛋。"

夏曦一听，拍着桌子说："驴粪蛋你买它做甚？"

勤务兵见夏曦发了火儿，结结巴巴地说："这……您不是要我买'夜烧'嘛？这就是'夜烧'。"

夏曦瞪着眼说："真是骗人，是驴粪蛋儿为甚叫'夜烧'？"

驴粪蛋儿为甚叫夜烧？又为甚晚上卖呢？原来，那川陕鄂的大山之中，每到冬季，气候严寒，而这里的房屋，又不似北方，全是木板墙，不能御寒。因此，到了冬天的夜晚，家家都要拢盆火，抵御严寒，有烧木炭的，也有烧干牛粪、驴粪的。这干牛、驴粪，直呼其名难听，也不知从何年何月起，这烤火用的干牛、驴粪，起了个官名儿叫做"夜烧"。且又一代一代地传了下来。每到冬季晚间，便有些人背着筐，在这小镇子里卖这干牛、驴粪，叫卖呼喊"夜烧"，当地百姓都知道"夜烧"是甚。夏曦初到此地，自然不懂了。恰逢他腹中饥饿，听到了叫卖"夜烧"，以为是吃的，哪知勤务兵给买来了干驴粪蛋儿。他心中正为红3军败退到此而发烦，如今见了，更是烦中添恼。他书也没心看了。就在这时，江奇进了屋，手中提着一瓶酒。拿着一包肥肠，往桌上一摆，夏曦一见这肥肠，乐了，没等江奇说话，拿起一节便吃，一边吃一边说："真香，真香。"

江奇又给他倒了杯酒。夏曦三盅酒落肚后，问："江奇，有什么情况吗？"

江奇往夏曦跟前凑了凑，说："夏书记，贺龙、关向应二人凑到了一块儿，不知嘀咕什么呢？我派人到窗根底下听了听，好像是要对你下手。"说到这儿，江奇说："夏书记，有句古话，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你可不能太书生了，那贺龙，"江奇压低声音："可不是吃素念佛的人，他是旧军队里混过的人，有野性。"

夏曦本来就对贺龙、段德昌有许多不满，又为买驴粪蛋儿弄了一肚子气。江奇在他耳边这么一嘀咕，夏曦小白脸儿往下这么一

沉，说："派人把贺龙警卫的枪下了，把他俩抓起来再说。"

江奇答应着，抬腿要走，夏曦又喊住他，说："关向应警卫的枪不要下，关么，还听我的话，这贺龙，你告诉他，说我请他。只要贺龙一到我这里，你就派人下他警卫的枪。"江奇刚要走，夏曦又喊住他，低声说："在我房的四周，埋伏下人，看我的眼色行事。"

江奇点头。

贺龙、关向应二人，正在愤论夏曦杀唐赤英之事。贺龙说："向应，我决不相信唐是反革命，他死得冤枉，你为什么那么听夏曦的话呢？"

关向应只是摇头叹息，贺龙又说："立三路线时，你是犯了错误，可也不能犯了这些错，就不分是非，让夏曦牵着鼻子跑了。"

关向应拳头顶着脑门儿，很痛苦地说："胡子，不要再说了，我心里乱极了，说些别的吧。"

于是，二人又说起红3军下一步将会遇到的情况。正说着，江奇走了进来，他满脸是笑地对贺龙说："贺军长，夏书记请你过去合计事。"

贺龙看了下怀表，说："天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要议的？"

江奇说："谁知道呢？看那样儿还挺急的。"

贺龙对关向应说："向应，你先睡吧，我去老夏那里看看。"说完便随江奇来到了夏曦处。进了屋门，夏曦满脸是笑地起身说："胡子，来，喝杯酒吧，天怪冷的。"

贺龙坐在了夏曦对面，夏曦说："江奇搞来瓶酒，我喝了几盅，味道不错，让江奇叫你，喝两杯散散寒气儿。"

贺龙喝了一盅，说："这酒的味道是不错，只是喝不下去。"

夏曦说："胡子，你呀，心眼太好了，你知道吗？那唐赤英、王一鸣，还有朱勉之，早就找碴儿要拿你的头去蒋介石那里发财呢。所以我把他们杀了。"

贺龙说："我只觉得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

夏曦说："这正是改组派狡猾之处，他们以此来蒙蔽人。"

两人正说着，突然，贺龙的一个贴身勤务兵闯进了门，进门便喊："军长，不好了，警卫班的枪被，被江……江局长给下了。"

勤务兵的话刚一出口，夏曦便霍地站起，这时，江奇也撞进了屋。夏曦见到了江奇，狠狠地瞪了他几眼。意思是说："你为甚让勤务兵撞进门来？"这时，贺龙也站了起来，他看了夏曦一眼，伸手掏出身上带的一把白朗宁手枪，往桌子上一放说："老夏，这里还有一支枪，你要不要？"

这时候，夏曦的脸儿像金纸一般，他没有说话。贺龙把脸一沉，把桌子狠狠一拍，说："你想要？你想要我也不给，这支手枪，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都没下去我这支枪，你想要这支枪？瞎了眼！"

夏曦坐在那里，两只眼滴溜溜的乱转。这当儿，关向应进了屋，原来，关向应躺在了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心里像六神无主似的，便又起了身，走到了屋外，好似听到夜空之中有贺龙怒喊声音，便疾步来到了夏曦处，正碰到贺龙同夏曦僵持的场面。当下，关向应将贺龙拉走，这场风波才没有起来。自此，那贺龙同夏曦的关系，愈加疏远了一层。

全国解放以后，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红三军的'肃反'是军部住在吴堰岭时开始的。捉了胡慎己。后方的'肃反'就大规模展开了。不久，卢冬生同志的特务队就被调去到周老嘴专门看'改组派'犯人去了。夏曦之不相信党，早有表现。在文家墩战斗后，他就下令捉孙德清，孙是在与我一同到七师师部时被捉的。同时被捉的还有7师的政治部主任孙之涛。孙是四大文豪之一。那时捉人都是夏曦给关向应一个条了，关即按照夏

的指示捉。

文家墩战斗之后，在红三军中大肆捉人。被捉的人都知道下场不妙，走时武器、皮包等等都作交待。并且走两天白区没有人跑，如果他们是反革命会这样吗？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那时杀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成才活下来的。洪湖失败后，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理由就是因为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红三军从大洪山向湘鄂边转移途中，部队是很苦的，没有东西吃，吃柿子、核桃、高粱杆子，但夏曦同志还不断杀人。对段德昌、王炳南等皆不相信，开会不找他们，并且两次企图下我的手。

一次在王店，夏曦同志企图加害于我，要我写申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了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我说：'你有人证物证没有？'他没有，我说：'你给我写申明书，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分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十万块钱，我请你吃饭，给你开了旅馆钱，还给你五万块钱，这虽然没有收条，但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闹得下不了台，关向应出来调停，说他是共产党员。

另一次他把我和关的警卫员枪皆下了，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卫员枪不下？我把身上带的一支白朗宁手枪，也掏出来放在桌子

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他了。’那时枪皆上了顶门火了，时刻准备着，一是打自己，一是打敌人。以后我两人一直不说话。过了几天，夏才叫我：‘胡子，不要使气嘛！’我说：‘使什么气？你不该这样搞嘛！’”

红3军在旧城停留了约半月左右，便沿着川鄂边境继续南下，在大昌镇歼敌川军一个营、保安团一部。接着，越过了巫山，抢渡了长江，攻克了巴东县城。1932年12月底，红3军到达了巴东县境野三关。这次突围西进，前后历时三个月之久，行程八千余里。一路之中，许多人累死、饿死、战死、被当做改组派杀死。红3军从洪湖突围时有三万多人，到达野三关时，仅剩下数千人，而这数千人也个个枯瘦如柴、体弱多病，有如风中之烛。从此，红3军便离开了洪湖，再没重返，直到1944年底，贺炳炎奉命率数百名干部，赴洪湖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于险恶环境之中，重又打开了洪湖局面，此是后话。

第二十一章　夏曦的第三次“大肃反”

谷大姐之死

贺龙等率红3军到野三关后，稍事休整，又往鹤峰行进，经邬阳关、金鸡口、鸡公坪、燕子坪，直奔鹤峰县城。

时鹤峰县城仅有一团队敌兵，团长叫陆清明。红3军人马突然出现，陆大吃一惊，急忙上马逃走。还没出得城门，即为红3军活捉。鹤峰遂被红3军占领。军部设在了茅坝的一座吊楼上。

这里把湘鄂边苏区的情况介绍一下。

在1932年5月，国民党川军赵鹤部在宣恩、建始、恩施、鹤峰团防配合之下，分两路向鹤峰苏区“进剿”。这时候，由于特委书记周小康坚持了“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屡战失利，最后，特委机关不

得不撤出鹤峰，转到桑植内半县的四门岩。这个地方，山高林密，地旷人稀，敌不敢至。偏在这当儿，桑植游击队队长贺佩卿，副队长王湘泉、贺炳南反了水。这三个人，带着反水分子，在"反共产党不反贺龙"的口号之下，到处杀人放火，要杀特委书记周小康。一时间，弄得桑鹤苏区乌烟瘴气，老百姓也分不清谁是共产党，谁是国民党了。

贺佩卿、王湘泉、贺炳南三人都是拖枪出身，在旧军队里混过，是贺龙的老部下。1928 年初，贺龙、周逸群、贺锦斋等人回到洪家关，重新组织革命武装，这三个人便把自己带的人马，交给了贺龙，并跟着贺龙东征西讨。后来，邓中夏、贺龙率领红 2 军团转战到达鹤峰，并在此将红 2 军团改编为红 3 军时，贺佩卿、王湘泉、贺炳南都留了下来，贺龙要他们在湘鄂边特委领导之下，在桑鹤一带坚持武装斗争。这三个人，虽然加入了革命队伍，只是从家族观念和义气出发，怀着"入股做官"的野心而投身革命。因此旧军人的恶习始终不改，横行霸道，打骂士兵。一次，贺佩卿胳膊负伤上了担架，由于山路高低不平，抬担架人走路颠簸。贺佩卿发火，竟举枪将抬担架之人打伤。贺龙闻知此事后，要枪毙贺佩卿，吓得贺佩卿连连磕头，贺龙这才饶了他。所以，贺佩卿只怕贺龙。在红 3 军离开湘鄂边后，由于湘鄂边特委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政策，使得根据地日益缩小。这时候，贺佩卿等三人一瞅前途渺茫，暗中合计一番，决定反水。这三人先用反奸之计，杀害了谷大姐谷德桃。而后，又跟朱疤子、罗效子和陈渠珍挂上了钩，达成了"互不相打，共同剿共"的协议。这几个人一反水，加之赵鹤部的进攻和周小康对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使得湘鄂边苏区形势越来越糟。这时候，贺佩卿等人扬言，要杀尽从洪湖过来的干部。并带队伍袭击了湘鄂边特委机关，将特委经济处长谷有年打死，将特委其他人员赶得东逃西散。周小康逃跑时把腿摔坏了，只好坐在了一个临时绑的担架上，由警卫员担着走。看看湘鄂边苏区实在站不住了，最后，周小康便

同王炳南带着独立团辗转到了洪湖，夏曦便给他定了个改组派，周小康躲过了贺佩卿等人的追杀，没想到成了夏曦刀下之鬼。

周小康、王炳南带独立团走后，湘鄂边苏区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朱疤子、罗效子见红军已打散，又带兵将贺佩卿、王湘泉、贺炳南的队伍包围。因贺佩卿三人不反贺龙，朱疤子、罗效子对他们不放心，所以，便对贺佩卿等人下了手。双方一场激战之后，贺佩卿、王湘泉、贺炳南部大败，贺炳南见四面被围，无路可走，吞食鸦片自杀。贺佩卿、王湘泉落荒而逃。这时候，在湘鄂边苏区，仅剩下了人数不多、敌人为之胆寒的贺英率领的游击队。贺英又名香姑，当时，贺英将游击队转移到了四门岩。这四门岩，是桑植、鹤峰两县边界上数百里方圆的山区，山高林密谷深，地势险要。

贺英带队伍到四门岩山里之后，朱疤子、罗效子等敌兵岂肯放过，集重兵围攻。贺英便带着游击队，同"围剿"之敌打麻雀战，兜圈子，几乎每天都要行军，每晚都要转移。往常敌人"围剿"，是杀一阵，烧一阵便走，这次"围剿"，用的是长期"驻屯清剿"的办法，占了一个地方之后，便修碉堡、挖壕沟，不分昼夜地搜山。可把贺英和游击队搞苦了，村里不能住，只得经常在老林或野山洼宿营。

在这支游击队中，还有一些家属和小孩。都是红军将士的妻子儿女。有的妇女还怀了孩子，行动艰难万分。大家的鞋子都磨破了，衣服穿烂了，贺英就带着大家打草鞋，身上围兽皮。四门岩山势十分险恶，那梯子岭、千层壳、鸡公嘴等地，尤为险要，此外，还有四十八大岔，十八小岔，三十三条沟，五十五道谷，黑夜行军，稍有不慎，便有掉进山涧的危险。为防敌人发觉，纵然路险，也不敢点火照亮，更怕小孩啼哭，那艰难困苦之状，真是一言难尽。

红 3 军占领了鹤峰后，贺英探知此情，即带着了廖汉生和刘列皇二人去见贺龙。在茅坝，贺英与贺龙会面，姐弟相会，十分高兴。刚好关向应在屋。贺龙介绍说："这是关向应同志，红 3 军的政委，是个老布尔什维克了。"

贺英望着关向应笑道："向应同志，有什么要我们做的，只管吩咐吧。"

大家正说着，夏曦来了，他笑着说："大姐，人未见面，可早就听到大姐的英名了。"

贺英第一次见到夏曦，贺龙便介绍说："大姐，这是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同志。"

这时候，段德昌、王炳南都走了进来，段德昌进门说："大姐，你不认识我吧，我叫段德昌。"

贺英笑道："人没见面，可你火龙将军的大名，大姐早听说过了。"贺英又对王炳南说："炳南，你家里人就在我身边，敌人抓不到她们，放心吧！弟妹很勇敢，有一回，我们转移时与敌人碰上了，弟妹干净利落地用梭标把一个追她的敌人刺死了。"

夏曦笑道："炳南，你有个好内助哇，回头接来，见见面吧。"

这时候，贺英又向贺龙打听邓中夏、柳直荀、卢冬生的下落。

贺英这么一问，屋里人的脸色刷地都变了，夏曦便说："大姐，别问了，邓中夏、柳直荀犯了严重错误，卢冬生被打散了，生死不明。"

贺英不解地惊问道："邓中夏、柳直荀都犯了什么错误？"

夏曦说："大姐，不要再问了，这是我们党的事，柳直荀已经处决了。"

贺英听了，不由得惊道："柳直荀被处决了？"

夏曦说："他是改组派头头。改组派是反革命组织。"

贺英愣了一下，又问："李良耀、陈协平、汪毅夫、周小康都来了吗？"

夏曦说："他们也都是改组派的骨干，都被处决，结束了他们可耻的生命。"

贺英听了，好一会儿才说："真没料到，这些人竟成了反革命。"

夏曦说："一尺深的水能看透，一寸厚的心看不透啊。贺佩卿、

王湘泉、贺炳南他们不也反水了吗？”

贺英没再言语。夏曦走后，大家又坐下互问短长。贺龙猛地想起一个人来，遂问道：“大姐，谷大姐还好吗？”

贺龙不问则罢，这一问，使得这位巾帼英雄，不由得柳眉倒竖，怒眼圆睁，接着，说出了一番言语，贺龙听罢，大叫一声：“气死我也！”

贺龙为甚气成这个样子？这其中自有缘故。

原来，这谷大姐叫谷德桃，在湘鄂边一带，几与贺英齐名。谷大姐出生在洪家关西横路湾村一贫苦农民家中，父亲除租种地主田地外，还会打铁，人皆呼之为“谷铁匠”。谷大姐少时常帮父打铁。十几斤重的铁锤，能抡上个把时辰。这谷大姐还随父练得一身好功夫，马上马下，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尤其是射箭，真是百步穿杨，箭无虚发。还会双手打枪，绿林中人皆呼之为双枪谷大姐。谷大姐侠义肝胆，好打抱不平。二十岁，嫁给了白果垭的邓仁山。这邓仁山也系贫寒之人，家中数代都租种大户叶老鸦的土地。邓仁山苦大仇深，自幼便对财主恨之入骨，也练得一身好功夫。1916年，贺龙两把菜刀打盐局拉队伍，邓仁山便投入了贺龙军中，并与贺龙成为莫逆之交。贺龙受石青阳之邀，带兵入川讨贼时，邓仁山因患病不能相随，便留了下来。病愈之后，因受官府压榨，在白果垭不能立足，便与谷大姐一起，拉起了一支队伍，占山为王。同贺英的人马，遥相呼应。1928年2月，贺龙同周逸群、贺锦斋、卢冬生等回到洪家关，组织工农革命军，邓仁山和谷大姐便将队伍交与贺龙。邓仁山成了贺的保卫队长。工农革命军首战失利，贺龙甩掉一股敌人，当夜躲进了谷大姐家中。谷大姐夫妻在贺龙的住处设下了三道岗哨。头一道，把一条大黑狗放到门外暗处。第二道哨由谷大姐的儿子女儿来站，谷大姐要他们站在家门外大树下，了望情况。第三道哨由谷大姐夫妇担任，他俩亲自守卫在贺龙住房门口。若有敌情，便由谷大姐和邓仁山将贺龙转移至后山。五天过去，搜追贺龙之敌

却越来越多，风声越来越紧。贺龙见敌不退，便与邓仁山和谷大姐商议，征得他们同意，决定转移到白龙泉。这天夜里，天降大雪，贺龙趁风雪骑马离开了白果垭。贺龙走后，谷大姐夫妻二人，迎着风雪用扫帚把马蹄印儿扫掉，一直清扫到五里外的三叉路口，方才住手。

贺龙转移到白龙泉后，邓仁山和谷大姐随后也来到了这里。贺龙隐蔽在山上之后，邓仁山便带队守住山口，防止敌军偷袭。谷大姐便成了贺龙的通讯员，每天都出山进山传情报，同被打散在各处的工农革命军进行联系，向他们传达贺龙的指示和命令。使得被打散的工农革命军，逐渐集合起来。有个原在贺龙手下任过连长叫张善卿的，枪法很好，同邓仁山共同担任外勤警卫。张善卿本是个没根底的人，他见贺龙困在了白龙泉，那七十二颗转轴心眼就转开了。他寻思："奶奶的，如今贺龙龙入浅滩，眼看已不成气候了，我何不趁此时将贺龙首级往南京一送，荣华富贵不就在眼前么？"张善卿就暗暗地与桑植团防陈策勋串通了气儿，要里应外合，捉拿贺龙。

这天晚上，邓仁山同张善卿一起在山口巡逻，张善卿乘邓仁山不备，用斧头将邓砍死。夺走了邓仁山身上的枪支。慌忙往山下走，要带领陈策勋团队，去抓贺龙。张善卿刚走几步，恰逢谷大姐上山给贺龙送信儿，谷大姐见张善卿浑身是血，神色慌张，停脚问道："善卿，你怎么啦？"

张善卿看见了谷大姐，二话没说，抡起手中斧子就朝谷大姐砍来。谷大姐闪身躲过，随后一脚将张善卿手中武器踢飞。张善卿又急忙端枪，可还没容他把子弹上膛，谷大姐那双拳以"豹子掏心"之势，直奔他胸口。张善卿晓得谷大姐的厉害，吓得扭身扔下枪就跑。谷大姐见状，没有追赶，转身急急上山，走了没多远，看到了倒在血泊中的丈夫。这位巾帼英雄，忍着悲痛，飞步上山，见到贺龙，说张善卿定是叛徒无疑。当下，谷大姐保护着贺龙，连夜转移，使得陈策

勋抓捕贺龙的人马扑了空。没多久，贺龙便派人将张善卿处死。

1928年9月，贺龙与敌兵交战又失利，贺龙带一部分被打散的士兵，退到了鹤峰县梅坪的深山老林之中，当时吃穿弹药急需解决，红军家属和伤病员更急需安置。贺龙想到了官地坪的团防头子向虞卿、谷岸松。这二人与贺龙素有旧交。与邓仁山系把兄弟，而且很讲义气，若求助于他们，家属和伤员问题，也可能得到解决。谷大姐和谷岸松是同宗，与向、谷二人都很熟。贺龙叫谷大姐连夜出发到官地坪，与向虞卿和谷岸松联系，将贺龙的一封信交与二人，并晓以利害。向、谷二人齐声说道："不要说文常相求，便是大姐张口，我等也不会有二话。"问题得到了顺利解决。后工农革命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贺龙率部东征，给谷大姐留下了三十个人、二十条枪，并任命她为七朗坪游击队队长，担当起打土豪杀劣绅，组织农协会等艰苦卓绝的斗争任务。

1931年春天，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听信了贺佩卿、王湘泉、贺炳南的诬陷，说谷大姐同桑植团防、地主豪绅有来往。周小康正起劲儿的贯彻夏曦推行的"左"倾路线，不分青红皂白，硬将谷大姐抓捕，投监入狱。并给中央分局写了个请示杀人的报告，夏曦草草看了几眼，连杀的是什么人都没搞清楚，便大笔一挥，批上"杀掉"二字，就这样，谷大姐这位巾帼女英雄，竟成了周小康的刀下之鬼。

贺佩卿等三人用了反间之计，用周小康之手，除掉了障碍他们三人反水的谷大姐，减了心头之患后，立刻反了水。

贺龙听了贺英的话，拍案怒道："真是岂有此理，谷大姐怎么会是反革命？"

贺英劝道："云卿，不要怨了，谷大姐、邓仁山两口子，老百姓不会忘记他们的，红军也不会忘记他们的。"

贺龙叹了口气，又想起什么似的，问道："谷大姐的孩子们呢？"

贺英说："都在我那里呢。"

贺龙说："大姐，和他们谈谈，如果他们愿意，到我这里来吧，他们会成为红军好后代的。"

贺英点头说好。

贺龙遂又问："贺佩卿他们现在做甚?"

贺英说："贺佩卿、王湘泉遭到陈策勋的围剿后，人马打散了，他们现正为难之时，想投敌，敌不信，给我写过信，说是要悔过自新，近日在烧巴岩拉了百十人队伍，又打出了红军旗帜，我要他们等你来湘西再说。"

贺龙思索了一下，说："我写封信，你派人送给他们，我要见见他俩。只要改恶从善，悔过自新，我们是欢迎的。"

当下，贺龙请关向应以自己名义给贺佩卿、王湘泉二人写了封信交给了贺 英，要二人来见自己。当天下午，贺英告别了众位将领，回到了四门岩。

夏曦心疑卢冬生

贺龙送走了贺英之后，夏曦对贺龙、关向应说："我们开个中央分局会议。"

贺龙说："德昌他们刚走，快派人去通知。"

夏曦一摆手说："不必找他们。会议由向应咱们三人来开。"

贺龙不解地问道："为甚? 他们是常委呀。"

夏曦点了支烟说："胡子，如今中央分局和红 3 军里，能信得过的人，只有咱们三个了，其他人……"夏曦说到这儿，看了贺龙一眼，话没再往下讲，可夏曦那意思是别人都信不过了。贺龙心中很不痛快，遂问一句："你看江奇怎么样呢?

夏曦说："江奇自然是个好同志。"

贺龙没好气儿地说："老夏，江奇这人，你清楚，我清楚，红3军的将士们都清楚，你说他是个好同志，我看他是个坏人。"

夏曦听贺龙这么一说，把手一摆："胡子，你别又火往上撞，江奇的根底儿我最清楚，他怎么会是坏人呢？"

贺龙说："老夏，柳直荀的根底儿你不是也很清楚吗？他怎么也成了反革命，成了改组派？"

夏曦说："柳直荀成为改组派，我是有证据的，你说江奇是坏人，你拿出证据来，只要你有证据，我立即杀他。"

贺龙愤愤地说："他江奇当保卫局长，杀了那么多的人，这就是证据。"

夏曦不高兴地说："他杀的人，都是经我批准的，照你这么说，我是反革命了？贺胡子，你也知道，我执行的是王明同志为首的中央指示，难道王明同志错了，米夫同志错了？"

关向应在一旁劝说道："算了算了，话越说越远，老夏，胡子，我们开会吧。"

贺龙不言语了，夏曦说："今天的会，讨论一下如何恢复湘鄂边苏区。"

关向应说："是啊，红3军已从洪湖败退至此，迅速恢复湘鄂边苏区十分重要。我的意见，打下一座县城，占块地盘，干部战士都很好休息一下。"

贺龙把烟斗当当地磕了磕说："还有，要停止肃反，我看这个'反'不能再肃了。"贺龙站起身挥着臂说："洪湖苏区的丧失，不是敌人打垮的，我看是我们自己杀垮的。要再杀下去，红军将不战自亡。"

贺龙的话音儿还没落，夏曦的脸就拉长了，说："洪湖苏区的丢失，正是改组派分子没有肃清。"夏曦说着也站立起来，继续道："肃反不但要搞，而且还要深入。红3军一败再败，根本的原由，就是没肃清的改组派在捣乱。"

贺龙不由得怒火上攻，他猛地一拍桌子，怒道："我看红 3 军内，湘鄂西中央分局内的改组派头子，就是你夏曦！"

这时候，关向应很严肃地说："你不该无缘无故地说老夏是反革命，是改组派，这是很严肃的问题，怎能胡乱说？"

夏曦把双手一摆，说："算了，算了，胡子对我有意见，他愿说甚就说甚？他说我是鬼，我也变不了鬼么。咱们继续讨论问题。"夏曦说着，又点了支烟，坐了下来，吸了一口后说："刚才向应说打个县城，占个地盘休整军队，我同意。红 3 军目前是非整不可了，像那段德昌、王炳南等人，我夏曦是指挥不动了。"夏曦停了下又说："打哪座县城好呢？"

关向应望着贺龙问道："胡子，你的意见呢？"

贺龙说："当然是打桑植了。"

关向应笑道："胡子，据侦察员报告，说桑植城内的大小民团，听说你来了，都吓跑了。"

夏曦笑道："胡子在桑植的声望太高了。"他说着，眼珠儿转了转："胡子，这样可不好哇，应当让党的威望、红军威望高过你贺龙。"

贺龙说："老夏，别忘了，我贺龙是个共产党员，是红军。"

关向应见两人又话不投机，便说："算了算了。"他望了下夏曦，欲言又止，夏曦遂说道："向应，有话你就直说吧，何必吞吞吐吐。"

关向应喝了口水，说："老夏，我讲了你别发急。我觉得，这肃反之事，是应该停止了，不能再往下搞了。"

关向应的话音儿没落地，夏曦的脸就沉了下来，他很不高兴地看了关向应一眼说："向应，我真没想到，你的思想也这样右倾了。"他提高了嗓门儿，道："肃反不搞，难道我们就睁眼看着改组派进行破坏吗？"

关向应见夏曦脸色更变，忙解释说："我不是说不搞了，而是要慎重杀人，把人杀了，若一旦错了，便无法挽救。"

夏曦提高嗓门儿说："宁可错杀一些，也不使改组派漏掉一个。"

关向应遭到夏曦几句抢白，不再说话了。这工夫，天也就快黑了，鹤峰茅坝中央分局的会议就这样开完了。贺龙立即召集段德昌、王炳南商量攻打桑植之事。就在这天夜里，卢冬生带着一支人马来到了这茅坝，贺龙一见卢冬生，真是喜出望外，握着卢冬生的手，忙问他从何而来。

前面讲过，敌兵大队人马"围剿"洪湖之后，卢冬生带着两个营的兵力，杀进了敌人包围圈，救出了数万名群众，之后，便与主力失去了联系，他就带着这一营人马，转战到荆当远地区，在这里坚持游击战争。队伍很快扩大到两千多人，遂整编为两个团，打出了独立师的旗号，他为师长。打了许多胜仗。"剿赤"军认为红 3 军主力尚在，便调集了大批人马来决战。卢冬生避敌锋芒，寻敌弱处，打击敌人。后来，打听到红 3 军已转战到湘鄂边，卢冬生便率领着这支人马，带着缴获的数万块白洋和布匹以及大批弹药、药品，转移到湘鄂边，与红 3 军主力会师。时独立师已达三千余人，且士气旺盛。

卢冬生率这三千余人马到达茅坝，又带来大批的弹药、给养，使得红 3 军上下，都很高兴，贺龙夸奖说："冬生是好样的。"

夏曦看到了卢冬生，对关向应说："向应，对卢冬生的行动，我有许多怀疑之处。"

关向应吃惊地望着夏曦，说："老夏，你怀疑他甚么呢？"

夏曦在地上走了两圈儿，停住脚说："'围剿'洪湖之敌那么多，卢冬生只带两个营的人马，竟从敌重围中救出数万群众，还带回来三千余人的队伍、几万白洋、大批布匹、弹药、药品，你想想，我们红 3 军主力部队两万多人，竟被敌人追赶得无立足之地，屁滚尿流地跑了八千余里，才到了湘鄂边。离洪湖时两万多人，到湘鄂边仅剩下六千人，难道我们这些兵将，还不如他卢冬生？我怀疑卢冬生是个改组派，他带来的那些部队，是敌人安插进来的，对这些人，我们

不可等闲视之。”

关向应说：“老夏，冬生是参加过南昌暴动的，不像是改组派。我们仔细观察他的行动再说吧！”

当天，关向应便把夏曦对卢冬生的怀疑告诉了贺龙，贺龙听了，举手往桌子上一拍，竟把手中的烟斗拍断，他怒挑双眉道：“红3军，早晚要毁在夏曦手中！”

关向应见贺龙又动了气，劝说道：“云卿，你不能这样，夏曦是分局书记，他的意见，我们还是要认真听的。”

贺龙依然挑着双眉说：“他正确的意见我听，不正确的，我不听！”又说：“向应，夏曦对卢冬生的看法，不要再扩散，部队知道了，影响军心。”

关向应说：“这我知道。”

第三天，贺龙便指挥红3军，南下攻打桑植城。驻守桑植城中的团防头子周燮卿周矮子，早已闻讯弃城逃跑，红3军兵不血刃地占了桑植城。桑植城中父老乡亲，听说贺龙人马回来了，无不高兴异常，敲锣打鼓，欢迎红军。

关向应批评贺龙感情用事

红3军占领桑植几天后的一个晚上，贺龙刚刚睡下，有勤务兵报告，说：“军长，有两人要见你，他们手中还拿着你的信。”

贺龙说：“请他们进来。”

勤务兵答应着出了门。工夫不大，便带着两人走了进来。这二人一进屋，见到贺龙，“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咕咚咚地磕起了头。贺龙一瞅，高个儿的是贺佩卿，矮子儿的是王湘泉。贺龙不理，他俩趴在地上，不敢起来，一齐说道：“军长，我俩今日前来，请军长恕罪。我俩反共不反贺，也是被逼迫无奈才那样做的。”

贺龙突然转身，冲二人大声喝道："住口，我贺龙是共产党员，你们反共产党，就是反我贺龙！"

贺佩卿嘟嘟囔囔说："你贺龙是真共产党员，那周小康是假共产党员，他要像你这样，我们就不反了。"

贺龙又厉声喝道："住口，共产党员是不会有假的！"

贺佩卿、王湘泉二人不敢说甚了，只是伏地磕头，任凭贺龙训斥。

贺佩卿、王湘泉如何胆敢来见贺龙？原来，二人反水之后，暗袭了特委机关，但周矮子、朱疤子却没有放过他们，依然对他们进行了围剿，几仗之后，贺炳南自杀，贺佩卿、王湘泉手下人马也只剩下二十几人，二人一商量，打算占山为王，过绿林的打家劫舍生活。时朱疤子、周矮子把他们一直追到了深山老林之中。数月之后，贺佩卿、王湘泉二人都觉得当绿林行不通，还是当红军好。这样，二人又挑起了红军的旗号，这一招还挺灵，因为在那大山之内，交通闭塞，消息难通，哪里能知道这二人是反水之徒。还以为是红军游击队，那些不甘受土豪劣绅压榨的穷苦人，便都来到了这二人队伍内当兵，看看发展到百十多人，便在鹤峰县内的烧巴岩安营扎寨，贺英要教育这二人，使其改邪归正。后又接到贺龙的信，便将贺龙的信送去，贺、王见了贺龙亲笔信，两人的心头立时就敲开了鼓，贺佩卿在地上走了一圈儿说："湘泉，贺胡子要我们去，是凶是吉呀？"

王湘泉说："贺胡子这人讲义气，只要我们负荆请罪，贺胡子会念旧交，宽容我们的，不然，他也就不给我们写信了。"又说："朱疤子、周矮子都不容我们，我们只有投贺胡子这条路了，胡子如今写来了信，我们俩若是不去，胡子恼了，派大军来剿，咱们纵然躲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

贺佩卿见王湘泉说的有理，便同意去见贺龙。当下，两个人安排了一下队伍，每人带了把手枪，便离开了烧巴岩，先到鹤峰，打听到红军占了桑植，二人又赶到了桑植。

贺龙将这二人训斥了一番之后，贺佩卿、王湘泉跪在地上，齐说道："从今以后，一定痛改前非。"

贺龙见状，便叫二人起来说："你们二人，如果真心革命，回到红军之中，将功补过，共产党是能够宽容你们的。若再有三心二意，我要亲手摘下你们的脑壳了。"

贺佩卿、王湘泉听贺龙这么一说，如遇大赦一般，连忙说道："谢军长不杀之恩，我等虽肝脑涂地，不敢再有异心。"

当下，贺龙令勤务兵安排二人休息。

第二天，贺龙找到了夏曦和关向应，把贺佩卿、王湘泉的情况向夏曦、关向应讲了一遍。没等关向应开口，夏曦便冷冷地对贺龙说："贺文常，我看你喝了迷魂汤吧，贺佩卿、王湘泉是革命的罪人，你不杀他们，还要收留他们，贺龙，我问你，你是不是嫌红军里的反革命还少哇。我看你这思想，也已右到一定的程度了。"

贺龙没有动气，而是说道："这两个人固然有错误，可责任也不能完全怨他俩，特委机关在政策的施行上，也有问题，也可以说，是特委把他俩逼到反水道儿上的。他们若不是想真心悔过，怕不会前来见我们的。"

夏曦对一个勤务兵说："命令警卫连长，速带一班人前往军部，将贺佩卿、王湘泉抓获，就地正法。"

贺龙一听急了大声喝道："慢！不能如此草菅人命。"

这时候，在一旁的关向应开了口说："胡子，蔓伯这样处理是正确的，如果我们对这二人不严加处理，恐怕今后还会有此等事发生，你不可感情用事。"

贺龙听罢关向应的话，分辩道："向应，我与贺佩卿、王湘泉虽有旧交，可今日处理二人之事，决非感情用事。"

警卫连长接到了夏曦的命令，立即带一个警卫班到了军部，将贺佩卿、王湘泉二人五花大绑地绑起，二人一见此情，大呼道："快

放开，我们是来当红军的！”

警卫连长怒道：“你们是反革命，我奉命将你们处以极刑。”言罢，令战士们将贺、王二人押到一块草坪之上，两声枪响，二人即被处决。

红三军败走湘鄂边

枪毙了贺佩卿、王湘泉后，夏曦对贺龙说：“胡子，我们开个会吧。”

贺龙看了夏曦一眼，问：“什么会？”

夏曦说：“中央分局扩大会。”他一指关向应：“除了我们三人外，要段德昌、宋盘铭也参加。”

贺龙没有言语。当下，夏曦便吩咐勤务兵，去叫来了宋盘铭和段德昌。大家落坐，夏曦说：“咱们开会。”他朝贺龙、关向应、宋盘铭、段德昌看了一眼，又接着说：“今天分局扩大会，主要讨论一个问题，这问题，我已思考许久，根据中央分局和红3军现状来看，改组派、AB团、第三党还远没有肃清，党的组织表现出严重的不纯，其结果，使红军和苏区都遭到了巨大的损失。虽然我们抓了、杀了改组派的许多领导和骨干，杀了一大批改组派分子，但是，改组派分子在红3军和局机关内，特别是在党内，还有相当的势力，我的意见，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3军的各级党组织，要立即解散，党员么，重新审查。”

夏曦的话刚一说完，贺龙的眼就圆了，他眉毛一挑说：“老夏，解散党组织，我第一个不同意，我贺龙两把菜刀砍盐局以来，参加护国护法和讨贼之役，两次北伐，直到与共产党接上了头，我的奋斗才有了方向，有了目标，浑身才有了使不完的力气。无论环境多么艰苦，因为有了党，我才有了信心。为了入党，我受到了数年的考

验，直到南昌暴动之后，我才入了党。我贺龙找党是多么的不容易，红军和苏维埃是靠共产党领导的，没有共产党，还有什么红军，还有什么苏维埃！"

贺龙话音儿没落，夏曦便说："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我说的解散各级党组织，不是说不要党，是要对每个组织都重新进行审查，把不够格的，清除出去。这是莫斯科的经验。"

贺龙说："我不管是谁的经验，有问题的党员必须清除，可党的各级组织，不能解散。"

段德昌很不满意地对夏曦说："老夏，照你的看法，红3军的党组织，湘鄂西中央分局党组织，全坏了。你呢，是中央分局的书记，是湘鄂西苏区最高的领导人，你要负什么责任？"段德昌停了一下，又说："要清除党员，第一个就先清你！"段德昌说着气往上撞，他站了起来，指着夏曦说："夏曦，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现在又要解散党，我问你，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

这时，宋盘铭开了口，他对夏曦说："老夏，我从小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入的党，这么多年来，我处处都受到党的教育，才有了进步，才明确了革命的方向，解散党，无论如何我不同意。"他停了停又说："不要说我不同意，红3军的干部战士、苏区的干部和人民，也都不会同意的。"

夏曦坐在凳子上，慢慢地吸烟，尽管三人的言语很刺耳，可夏曦的表情没有变化。真是喜怒不形于色。贺龙对关向应说："向应，说说你的意见吧。"

关向应迟疑了一下，说："我么……让我再想一想。"

段德昌斜视他一眼说："向应，有什么好想的，一个共产党员，在是非面前，要敢于亮出自己的观点。"

贺龙一摆手："德昌，不要讲，让向应自己去想吧。什么时想通什么时再说。"

就这样，这五位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3军的领导人，在要不要

解散党的问题上，争论不休。正争论时，有作战参谋送来一封信交给了贺龙，贺龙接过来，仔细看后，交给了夏曦。

信是“湘西王”陈渠珍写来的。信的内容写的挺客气。由于贺龙当年曾任过陈渠珍的部下，且二人交谊甚厚，陈在信中说他时时都想念与贺龙的旧交，如今贺龙的兵马来了，他陈渠珍愿与红军互不侵犯。

贺龙见几个人看完了信，遂对夏曦说：“蔓伯，我看我们可以同陈渠珍达成默契，互不侵犯。我们的部队，几千里的转战，急需休整，养精蓄锐，不宜再战。”

段德昌、宋盘铭也都同意贺龙的意见，关向应看看贺龙，又看了看夏曦脸色，没有发言。夏曦一边卷烟，一边听着贺、段、宋之语，脸拉的老长。三人说完之后，夏曦冷冷地说：“我要批评你们，你们三个人的思想，已极端右倾，陈渠珍是什么人？是湘西王，是土著军阀，是国民党的师长，是革命的敌人，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与陈渠珍是水火不能相容的，怎么能同他达成互不侵犯默契？”

贺龙听了夏曦一番言语，立即说：“部队几个月来的行军打仗，疲惫已极，澡都没时间洗，发都没时间理，草鞋都没空儿打，弹药极缺，不能继续打仗了，应当好好休整。”

夏曦说：“部队疲劳，我很清楚，可我们不能因为疲劳，就不打仗了。”他眼望着贺龙说：“贺胡子，陈渠珍同你当年有旧交情，这不假，可那是当年，如今你和他是水火不能相容的仇敌。他写信的目的，我看是在耍手腕，拖时间，想调动军队攻打我们，我们当趁其兵力尚未集中之机，出其不意地将其击败。”

由于夏曦坚决要打陈渠珍，贺龙只得指挥疲惫致极的红3军，在桃子溪与周矮子人马交锋，结果，红军大败，损失了指战员上千名。

红3军退回桑植后，贺龙见敌兵力强大，自知不敌，便向夏曦建议，说部队连续作战，已疲惫不堪，不宜再战了，退到鄂西，休养

生息。夏曦无奈，只得同意贺龙意见，这样，红3军便主动退出了桑植城，第二天到达鹤峰茅坝。

退到茅坝之后，夏曦一面传令各部队进行休整。一面又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夏曦又旧话重提，还是要解散党的组织，创造新的红军。贺龙、宋盘铭、段德昌、王炳南等人，无不坚决反对。夏曦无奈，只得作罢。因为茅坝地方狭小，红3军军部和中央分局在此住了数日之后，便移到了走马坪。茅坝留7师师长叶光吉驻守。叶光吉系湖北宜都栗树壤叶家湾人，1931年，贺龙率红2军团驻长阳枝柘坪时，叶光吉投奔了红军，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随贺龙纵横转战，后任红7师师长。贺龙在离开茅坝时，叮嘱叶光吉小心敌军偷袭，叶光吉说："军长放心。"

夏曦到了走马坪之后，继续召开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本打算再次讨论解散党的事，哪知道，会议一开始，段德昌便向夏曦提出攻打桃子溪是错误的。对敌我力量都有错误的估计，应当接受陈渠珍的"彼此不相侵犯"的请求，使红军有休养生息的时间。段德昌把话说完，没想到夏曦一反骄横的常态，却点头认错说："红军攻打桃子溪遭到了损失，我有责任。"

夏曦这么一承担责任，段德昌的火气反倒消了许多，他喝了口水说："我愿带9师打回洪湖，收复洪湖根据地。"

夏曦笑道："德昌，这话题以后再说吧。我们先讨论一下眼前的红3军的行动吧。"

会议做出决定：建立鹤峰、宣恩、建始、恩施等县、区、乡革命委员会和苏维埃，实行土地革命；红军主力适当集中休整，以师为单位活动，筹集粮食，发动群众，准备还击敌人；将红3军建制重新整编，分编为7.9两师，叶光吉、盛联均分任7师师长和政委，卢冬生任教导团团长。

夏曦说:“周逸群是最大的改组派!”

走马坪会议之后,中央分局和红 3 军又转移到巴东市的金果坪。红 3 军军部便设在金果坪村中一幢土豪住过的两层吊楼上,贺龙住在了楼上,警卫班住在了楼下。

此时,1933 年的春节已到,除夕这天,段德昌来了,贺龙笑道:“德昌,我正要找你呢。部队可都安置好了?”

段德昌说:“都安置妥当了,师部设在了邬阳关。”

贺龙吸了几口烟,说:“德昌,我想跟你谈谈,往后再开会时,纵有不同意见,也不要给夏曦提了。”

段德昌说:“胡子,我这人你了解,心里有话不说不行啊。我是个共产党员,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

贺龙说:“走马坪开会散会时,我见夏曦望着你的背影,那眼神不对,他很恨你。”

段德昌挑着眉毛说:“难道他能下手杀了我不成?”段德昌又把桌子一拍说:“胡子,这个夏曦真是上天难找,入地难寻之人,中央怎么给湘鄂西苏区派来这么个人。红军、苏区,都要活活地断送在他手中。”

段德昌说到这儿,贺龙忙道:“德昌,此话只能在我这里说,若传到夏曦耳内,他要对你下毒手的。”

段德昌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好吧。”又说:“胡子,能不能给我四十条短枪,让我下洪湖,三年之后,如果洪湖根据地不能恢复,红军队伍没有扩大,我提着头来见你。”

贺龙连忙说道:“德昌,这些话不可再讲,夏曦对你提出的下洪湖已经不满意了,他跟我说了几次,说你不愿爬山,不愿吃苦,想回洪湖重拉队伍,目的是要分裂红军。”

段德昌一拍桌子说："我干革命，不是为他夏曦。他夏曦当分局书记以来，把红3军搞成这个样子，把苏区搞成这个样子……"

贺龙继续劝说道："德昌，你的话不错，我们干革命，不是给他夏曦干的。可他夏曦毕竟是中央分局书记，是中央派来的人，是湘鄂西党的最高领导人，我们都是党员，还是应当尊重他的。"贺龙手握烟斗，继续说："前些天在桑植时，夏曦给我讲了个故事，说有两块木头，一块是较软的楠木，一块是硬的紫檀木，楠木被雕刻匠拿去，雕成了各种佛像，摆放在龛上，人们给他们烧香、上供，享受着人间的香火。那檀木呢，因为硬，被匠人拿斧砍火拷，最后，还打上箍，做为车轴、碾轴、鼓槌等用项。日日受着压挤，还没人爱惜。"

段德昌道："胡子，夏曦这话是什么意思？"

贺龙笑道："很明显，夏曦就是要我们听他的话，别学那硬檀木，硬下去要吃亏的。"

段德昌听到这里，把手中烟袋"咔"地折断，往楼板上一摔说："胡子，他夏曦太欺人了。要软，你去软吧！我，在他手下当不了驯牛！"

贺龙见段德昌气得脸色青紫，浑身哆嗦，拍着他的肩头笑道："德昌，别生气，你我相识也非一年半载，我贺胡子是那软人吗？对夏曦的错误，我不会相让的。"

段德昌抓住贺龙的胳膊说："胡子，我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让我回洪湖吧，我要痛痛快快地干一番事业，决不在夏曦手下当小脚女人了。"

贺龙见段德昌又提出回洪湖，手敲着桌子说："你回洪湖，我个人没意见，可共产党员是不能自由行动的，要服从组织的安排！"

段德昌拧着双眉，望着贺龙说："我已经给夏曦写了报告，要求组织上批准我回洪湖，重新拉队伍去。"

贺龙听了，惊问道："你何时写的报告？"

段德昌说："就是今天，到你这里之前派人送给夏曦的。"

贺龙听了默然无语。他慢慢地吸了几口烟，低头在屋内起了几圈儿说："德昌，你呀，做这决定之前，为什么不和我打个招呼呢？"

段德昌抬眼道："胡子，写个报告，谈谈个人的意见，又有甚了不得的事？"

贺龙说："德昌，我见夏曦这些日子老是拉着脸，心中一定又在打什么算盘。"

段德昌说："难道他又要杀人不成，杀吧，他杀的人不少了，那些冤魂，早晚要向他索命的。"

贺龙道："德昌，不要再乱说。今天是大年三十，在我这里喝点酒吧。我要人去给你做你爱吃的沔阳三蒸。"

段德昌说："胡子，有甚好酒，快些拿来，我今天要痛饮几杯。"

当下，贺龙便吩咐人去做菜，特别指出要炊事班做"沔阳三蒸"。

这"沔阳三蒸"又系何菜？原来，"沔阳三蒸"为鄂省名菜。这三蒸，为粉蒸肉、蒸珍珠丸子、蒸白丸子。沔阳三蒸已有六百余年历史，相传为元朝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陈友谅，在沔阳揭竿起义攻陷县城后，犒赏三军，陈友谅的夫人潘氏亲自掌厨，将肉、鱼、藕，分别拌上大米粉，配以佐料，装碗上甑，猛火蒸熟，味美质溶，兵士们争相投箸，啧啧称赞，从此，沔阳民间，常以三蒸，喜庆佳节，款待贵宾。粉蒸肉是以肉作主料，用旺火猛蒸，蒸熟后，其肉质溶润，肥而不腻；蒸白丸子以瘦猪腿肉和鳝鱼做主料，极讲究火功，其色泽乳黄，白丸软嫩，油润松泡，滋味纯美；蒸珍珠丸子，更是脍炙人口，蒸熟之后，糯米色泽晶莹，洁白透明，犹如粒粒珍珠，肉丸软糯松泡，味道鲜美。段德昌极喜食这沔阳三蒸，一来三蒸味美，二来也是他对洪湖人民感情深厚之故。

贺龙刚刚安排炊事班做饭，这时候，吊楼下来了一群人，都是金果坪的百姓，他们来给贺龙拜年来了。原来，金果坪一带，也多系土家人，土家人过年，大都提前一天纷纷出来拜年。

贺龙将金果坪父老让至室内，又令勤务兵倒茶斟水，贺龙、段德昌便问起群众父老生活，众人齐说："红军来了，我们穷人日子才算抬了头。今年春节，过得很开心呀。"

大家说着话。众父老中一位年长者，将一副大红对联贴在吊楼口处两边柱子上，联文是：

虎贲三千，直扫湘西瘴地；
龙飞九五，重开尧舜之天。

横批是：龙腾虎跃。

贺、段二人少不了谢过大家。就在这时，一队青年男女，跳着舞着，来到军部的吊楼前。

青年们歌舞已毕，贺龙、段德昌又谢过了他们，众父老在楼上坐了一刻，便起身告辞。

说话便红日西沉，土家人历来三十晚上都有守岁习惯，夜幕降临，各家各户都把挑选好的大截硬扎木柴搬进火塘，这称之为"烧年蔸"。年蔸烧的旺，来年的日子就旺。不一刻，全寨的灯烛点燃，木蔸烧旺，爆竹齐鸣。贺龙、段德昌也同警卫员们一起，在吊楼前烧起了"年蔸"。这时候，炊事班前来报告，说"三蒸"已好，晚饭也准备停当，贺龙吩咐炊事班，多备碗筷。接着，贺龙又亲自请来左邻右舍的乡亲，要同大家一起，共度新春佳节。

工夫不大，左邻右舍的父老都请到，贺龙、段德昌要警卫人员也一起上楼。楼上里外摆了五张八仙桌子。大家坐好，炊事员摆上了酒。接着，端上来了"沔阳三蒸"。贺龙、段德昌分别给大家倒满酒。而后，贺龙端起碗。刚要开口，只见军部的李副官走了进来，向贺龙报告说："军长，夏书记派人请军长和段师长去分局，说有要事相商。"

贺龙忙问："什么事这么急？"

李副官说："详情不知。"

众父老见贺龙、段德昌有紧急公务，都要起身告辞，贺龙对李副官说："你陪着乡亲们吃酒。"又对众父老说："贺龙有急事，不能相陪了。"

当下，贺、段二人向众乡亲拱手致歉，下得楼来，直奔中央分局，此一去，竟使得二人：

虎目圆睁肝胆裂，剑眉高挑发冲冠。

中央分局办公处也是一栋吊楼，周围青竹翠柏，甚是幽静，夏曦便住在吊楼之上。

贺龙、段德昌二人来到了夏曦住的木楼。举目一看，只见楼上楼下灯光明亮。这时，有两个勤务兵迎了上来，向贺龙施礼后，报告说："军长，夏书记有命令，只要军长一人先上楼，段师长在此稍候。"

贺龙问："有什么要紧之事，上楼还要分先后？"

勤务兵自然回答不知。段德昌说："胡子，你先上去吧，我在这里等一会儿。"

当下，贺龙便走上了楼。刚到楼梯口，便闻到了酒肉香气。上到二楼，抬头一看，只见楼当中摆着一张八仙桌子，桌上摆满了酒菜，桌子周围坐着三个人，正面坐的是夏曦，左边是关向应，右边是江奇。三人见贺龙来了，都站起了身，夏曦说："云卿，快坐下，就等你了，我们今天要好好庆祝这新春佳节。"

贺龙说："德昌还在下面。"

夏曦说："我自有安排。"说着，他把一杯酒放在了贺龙面前，说："云卿，来，让我们为红 3 军取得新胜利而干杯。"

夏曦说着把杯举起。关向应、江奇也随着举起了杯，贺龙见三人举起了杯，便把酒杯端了起来，刚要说话，忽听楼下一阵大乱，接

着便传来了段德昌的喊声："胡子！胡子！"

贺龙听段德昌的声音不对，急把酒杯放下，惊问道："德昌怎么了？"

夏曦、关向应、江奇三人却神色不变。夏曦依然手举酒杯，笑眯着眼说："云卿，坐下，喝酒。德昌么，我给他安排了个过年的地方。"

贺龙一看夏曦这种神态，又看看江奇和关向应，但见江奇喜形于色，关向应低头不语。知道其中定有名堂。"难道夏曦对德昌下了手？"想着，把酒杯往桌上一蹾，向夏曦问道："老夏，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夏曦看了看贺龙，不慌不忙地说："云卿，既然你一定要问明白，我便告诉你。种种迹象表明，这个段德昌，是个改组派分子，而且是个隐藏得很深的改组派的领导人物。"

没等夏曦的话音落地，贺龙把手中酒杯往地上"啪"地一摔，浓眉高挑道："真是岂有此理，段德昌为革命出生入死，红3军哪个不知？洪湖人哪个不晓？他怎么会是改组派？难道你夏曦瞎了眼不成？"

贺龙话毕，夏曦忽然面目一沉，说："贺文常，别忘了，你现在不是讨贼军的旅长，不是靖国军的师长，不是北伐军的军长，你现在是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的军长，你是个共产党员，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工作的。具体的说，你是在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之下的，逮捕段德昌，是中央分局的决定，你是共产党员，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议！"

夏曦这一番话，说得贺龙没了词了，他突然把酒杯端起，一饮而尽，而后说："夏曦，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懂得要服从党的决议，可是，党组织也要向全体党员说明，说段德昌是改组派，有什么凭证？"

夏曦"哼"了声说："你问凭证么？他段德昌分裂红军。在他的煽动之下，红9师的官兵，都嚷着要打回洪湖，说甚包谷饭不如大

米饭好吃。”

贺龙说：“那包谷饭就是不如大米饭好吃。”

夏曦说：“这次桃子溪打周矮子，红军失利，一定是段德昌暗中与周矮子勾结。”

贺龙问道：“有什么证据说他与敌勾结？”

夏曦哼了哼说：“证据？证据就是他打了败仗。”

贺龙怒道：“打败仗不是他段德昌的责任，我这军长要负主要责任。”

夏曦把眼一瞪说：“贺云卿，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他回身从抽屉里取出几张写满字的纸说：“你看看，这里写的是什么？”

贺龙把纸拿起，展开一看，原来正是段德昌写给中央分局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红3军打回洪湖的建议，或由他带9师，或带数十人打回洪湖，恢复洪湖根据地。贺龙看罢报告，说：“老夏，这报告是段德昌的建议，难道仅凭此就定他为改组派吗？”

夏曦连连拍着桌子说：“你好糊涂哇，这报告是他段德昌耍的手腕儿。”夏曦转身对江奇说：“江奇，你讲讲了解到的情况吧。”

江奇忙道：“贺军长，段德昌表面上给分局写报告，暗里却鼓动从洪湖来的下级官兵，脱离红军，返回洪湖。在他的鼓动之下，那些洪湖来的兵，都嚷嚷着要回去，段德昌这样做，不是扰乱军心吧？”

贺龙说：“洪湖来的官兵，不习惯山地作战，不习惯湘西生活，想回去，这不奇怪。”

江奇说：“段德昌就是利用了官兵们这个情绪，分裂红3军。还扬言，若是夏书记不答应，就把夏书记抓起来杀了，替万涛、柳直荀报仇。”

这时候，夏曦语重心长地对贺龙说：“云卿啊，你不要一天到晚的光知道打仗，要睁开眼看看，阶级斗争复杂着哩，我在莫斯科时，亲眼看到了托派反斯大林的斗争。”稍停一下，夏曦又说道：“云卿，你怕是还不知道，周逸群没有死。”

贺龙听了，立时惊喜地睁大眼说："怎么，逸群没有遇难，他现在哪里？"

夏曦摇摇头说："胡子，我说出来，怕要吓你一跳，周逸群现在国民党那里，知道吗？他是湘鄂西苏区内最大的改组派，他在1929年去上海时，便与改组派中央的负责人邓西禹接上了关系。邓指示他在洪湖苏区内做发展工作，我撤了他的特委书记职务，派他到江南任巡视员后，周逸群误以为我们发现了他，便来了个金蝉脱壳，明着他被国民党'剿赤'军打死了，暗里却躲藏起来了。"

夏曦说到此时，贺龙猛地转身，劈手抓住了夏曦的衣领，吼道："你说周逸群是改组派，这决不可能，周逸群决不是改组派，是他，指引我走上革命的道路；是他，做了我入党的介绍人；是他，领导创造了洪湖苏区，他怎么会是改组派？！"

夏曦见贺龙脸色都变青了，忙说："云卿，你别急，有话慢慢说，不信，你问问向应。"

夏曦这么一说，贺龙松开了手，他转身问关向应："向应，究竟怎么回事？"

一直没开口的关向应见贺龙问自己，说道："云卿，你坐下，蔓伯说段德昌是改组派，自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刚才江奇讲了，段德昌用'打回洪湖'的口号，反对中央分局恢复湘鄂边苏区的正确路线。周逸群的情况是这样了解的。江奇最近抓到了一名国民党特务，从这特务口中，得知周逸群尚在，是改组派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贺龙转身怒视江奇说："江奇，那个国民党特务呢。我要亲自审问。"

江奇说："被处决了。"

贺龙一听，眉毛就立了起来，刚要开口，夏曦把桌子一拍，霍地站起，两只小眼儿露着凶光说："贺文常，我问你，你眼中还有没有党？告诉你，我刚才对你讲的话，不是我个人意见，这是湘鄂西中央

分局党组织的意见！”

夏曦这几句话一说，贺龙不言语了，他坐了下来，好一会儿，才有气无力地说：“既然是党的决议，我服从。”接着又站起：“我的意见我保留。”

夏曦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他又重新端起酒杯，说：“来，让我们为今后的胜利干杯。”

关向应、江奇把酒杯举起，贺龙也把酒杯举起，夏曦一饮而尽，江奇一饮而尽，关向应看了看贺龙，也把酒喝下。贺龙一闭眼，杯到了嘴边儿，又放了下来。夏曦笑笑说。“胡子，喝下去吧，这也是对你党性的一次考验。”

贺龙咬咬牙，眼一闭，将酒喝下。夏曦拿起酒瓶，又重新为贺龙倒满，而后说：“来，让我们再干一杯。”说着举起杯，江奇、关向应也把杯子举起。贺龙看了三人一眼，把杯子慢慢地拿了起来。夏曦端起了酒杯，却没有立即喝，他看着贺龙说：“文常，我还要告诉你，在今天晚上，同时逮捕的改组派分子，还有王炳南和陈协平。”

夏曦的话音儿没落地，贺龙手中的酒杯便“啪”地落在了地上，他两目发直，喃喃自语道：“怎么，王炳南、陈协平也是改组派？”

夏曦把自己的酒杯放到了贺龙面前，望着贺龙说：“把这酒喝下去吧，残酷的阶级斗争，会使你明白一切的。知道吗？正是王炳南和陈协平，同周小康一起，丢失了湘鄂边苏区，如今，他们二人，还在下边攻击分局领导，散布对分局领导的不满言论。所以，中央分局决定将他们逮捕。”

江奇一旁补充说：“他们攻击夏书记无能，还说要向中央反映夏书记的情况。”

贺龙听了，没有再说什么，他微微地摇摇头说：“这几天我太累了，头有些昏，我要去休息。”

夏曦对江奇说：“送军长回去休息。”

贺龙说：“不用，我自己能走。”

夏曦朝关向应一使眼神儿，关向应立即说："云卿，我来送你吧。"

当下，关向应扶着贺龙下了吊楼。二人来到了街上。但见满街的"年蔸"燃的正旺。男女青年们还在欢快地唱着，跳着。贺龙无心看这些，他只觉得胸中如同塞一团乱麻，乱糟糟的，难理头绪。不一会儿，军部住处到了，贺、关二人上得楼来。只见军部左邻右舍的父老乡亲们还在，桌上的菜摆着未动，那三蒸也摆在了那里，依然散着香气。贺龙见了，忙说："怎么，你们没吃呀。"

李副官说："乡亲们说什么也不吃，一定要等着军长和师长。"

贺龙把自己的情绪平稳了一下，随后笑道："大家太客气了，来，我们一起吃吧。"

那些父老们看看没有段德昌，有人问："段师长呢？"

贺龙使劲咽了咽口唾沫，说："他有要事，不能前来奉陪各位乡亲了。"说着，一指关向应："这是关向应关政委。"

众父老立即向关向应拜年，关向应也向大家祝好。当下，贺龙举杯向众乡亲敬酒，并要大家吃"三蒸"。众人尝了"三蒸"，都交口赞好。贺龙到了此时，只得强打笑脸，真是：

可怜战友陷囹圄，佳肴美酒味不甘。

这顿酒饭，一直吃到了三更过后，新年伊始，众父老方起身告辞。贺龙送罢众乡亲，这才拉关向应坐下，说道："向应，我是不是糊涂了？"

关向应说："胡子，你没有糊涂哇。"

贺龙说："向应，难道你相信段德昌是改组派吗？相信王炳南、陈协平是改组派吗？相信周逸群是改组派吗？"

关向应说："文常，我们只能相信中央分局领导。这样想，你就明白了。"

贺龙听了，默不做声了。

贺龙后来回忆说：

"在立三路线时期，关向应是管军委的，代表国际路线的那些人曾想把他从立三那边分化出来，他一直坚持。夏曦一直抓住关向应这个辫子，一直抓到二、六军团会合，关对此最伤心。毛坝会议讨论三个问题：一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军两个小议题；二是打一个县城整理部队休息；三是停止肃反。毛坝会议也可说是分局会议，实际只夏、关和我三人。其他人他都不相信。第二天到桑植又提到整理红军和停止肃反，关向应不做声，我说肃反停一个时期，有了反革命再说么。他不同意。这时我第一次向关提出：'你当书记，我们开会选一下么。'关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批评的很严厉。"

中共第一号烈士段德昌之死

大年初一，夏曦又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有副官把开会的通知告诉贺龙，贺龙皱着眉头说："怎么又开会呀？"

纵然心中不快，可贺龙还是去了。他到了中央分局，夏曦见了他说："云卿，快坐下，这会只等你了。"

贺龙一瞅，来开会的人，除夏曦外，还有关向应、江奇、宋盘铭、叶光吉、盛联均、卢冬生。大家见贺龙来了，都起身让坐。贺龙忙招呼大家坐下，自己坐在了夏曦身边的长凳上。这时，夏曦喝了几口茶，说："今天是大年初一，按说该让大家歇歇，好好地过个节，可不行啊，敌人不让我们歇着，革命工作也不许我们歇着，所以，我们今天还得开会。"夏曦喝了口茶水又继续说："今天开会，有两个重要

内容，一是告诉大家，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这些改组派被抓了。他们的罪恶，是分裂红军队伍，攻击中央分局领导，特别是段德昌，打着什么'山上不能创造苏区'、'包谷饭不好吃'、'山路不好爬'的口号，煽动下级官兵，破坏中央分局的路线，有意在红军中制造分裂。"

夏曦说到这儿时，停了下来，他用眼扫了下开会人的表情，见大家都没有吱声，这些人中，除贺龙外，他们没有不怕夏曦的，只是都拿眼看贺龙。贺龙也没开口，从身上摸出了烟斗，用吸烟压住内心的痛苦，这时夏曦又说："如今抓了改组派上边的头头儿。下边呢，肯定还有人，但是，这三名改组派都很顽固，连夜突击审讯，只是不招。最后，由江奇同志下令用刑，王炳南的一条腿被打断，段德昌昏死数次，陈协平十指打折，依然不招。鉴于此情，为纯洁我们革命队伍，我们只有根据一些干部的平时表现，来判断是否是改组派，凡有嫌疑者，一律抓起，对于顽固不化者，要动大刑。"夏曦说到这儿，咬牙切齿道："对于改组派，我们决不能手软，他们是白骨精，是化装成美女的白骨精，我们要当孙大圣，切不可做唐僧。"

夏曦说完，见到会人不开口，心中很是满意。不开口就表示同意他的意见。接着，夏曦又说："同志们，我现在正总结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肃反以来所取得的成绩，正在为中央写报告。现已查明，在我们湘鄂西中央分局内的改组派首领是周逸群和万涛、第三党的首领是胡慎己和唐赤英、托派首领为刘鸣先和潘家辰、陈独秀派首领为谭蔚文和李剑如、罗章龙派首领为张琨弟和王进之、AB团分子首领为柳直荀。而各派又统统都归周逸群的改组派所领导。事实表明，改组派分子占据了分局党、团组织及红军的政治军事机关，他们的阶级成分，大多数是地主富农，所以，我们同改组派的斗争，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夏曦提高了嗓门儿："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常常成为改组派的有力助手，而且有个别领导，有时竟被改组派利用。

改组派利用他的威望，来干扰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所以，我们要求在座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在大是大非面前，要站稳立场，要擦亮眼睛，要看清改组派的反革命面目！”

夏曦说这话时，两只小眼儿不断地往贺龙身上扫来扫去，见贺龙只是闷头吸烟，别的人都低头不语，便又继续说道：“改组派的阴谋，现在可以看清，共有四个方面，一是企图把共产党腐化转变，改组成国民党；二是企图变苏维埃政权为国民党官僚政权；三是企图把红军变成国民党军阀式的军队；四是千方百计使红军、苏维埃运动脱离根据地，丧失根据地。”说到这儿，夏曦举例道：“周逸群、万涛、唐赤英、王一鸣断送洪湖襄北，尉士均断送鄂北，段德昌、覃苏的荆门失败，周小康、王炳南断送湘鄂边，贺炳南、贺佩卿、王湘泉的公开叛变；改组派的第五个阴谋，便是私通敌军，企图组织反革命的暴乱。这其中，周逸群与何应钦、蒋介石暗中勾结。万涛是国民党在苏区的高级坐探。覃苏暗降川军。王一鸣、唐赤英故意失败。而今，段德昌又妄想把红 9 师拉到洪湖投敌，这些，都是改组派通敌的表现。”

夏曦说这些话时，贺龙只觉得周身的热血，一股一股地往脑海上涌，他以极大的忍耐，紧紧地咬着牙，才没使愤怒的感情暴发出来。

这时候，夏曦又继续说：“改组派分子已经深深地打入了湘鄂西苏区和军队的党团组织之中，在旧的基础上，改造党团组织是无用的了，我们必须解散湘鄂西苏区和红 3 军中的党团各级组织，党团员要重新登记，要发展新的党员，只要公开自首，也可以不开除党籍，但是，自首仅限于连以下干部，营以上干部不允许自首。”

这时，在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 3 军内，上上下下，人人自危，夏曦时已成为太上皇，开口便是圣旨。夏曦见大家都不言语，便说：“解散党团组织的意见通过了。”

当下，夏曦又提出在解散党团组织后，组成七人革命军事委员

会。这七人是：夏曦、贺龙、关向应、宋盘铭、叶光吉、盛联均、卢冬生。

从此，在湘鄂西分局和红3军中，便取消了党团组织，

夏曦在解散了各级党团组织后，紧接着又开展了第三次肃反。比起上两次来，更为甚之。那营、团、区、县以上的干部，只要说过回洪湖的话，只要说过对分局不满的言语，就被当做改组派抓起，这些人又不招，江奇便再动大刑，将其折磨得死去活来，又有那受刑不过的，胡乱供认，如此恶性循环，不上十数天，便抓了三百多人。江奇便令人将这些人十人为一串儿，用铁丝穿透肩胛骨，到各方游街，每到一村寨时，前边打一声锣，这些人便喊道："我是改组派，是反革命，落得今日下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时值2月天气，鄂西山区，尚寒气逼人，这些人游街时，赤着脚，穿着短裤头，一个个几经折磨，都不成人形了，有的在游街途中，便倒下死了，江奇令人将尸首扔到乱葬岗子喂狗。各村寨围观的百姓，听说这些人是反革命，都恨得牙根儿发痒，往这些人身上吐唾沫，扔石头。五峰县苏维埃主席易发琛，只因跟段德昌在一起喝过一次酒，便被抓了起来，江奇用"背火背篓"、"铁牛耕地"等酷刑折磨他，到最后，用铁丝穿透他肩胛骨，派人拉着他各地游乡，游到鄔阳关时，易发琛已奄奄一息，可他依然坚决否认自己是什么改组派。他对围观的群众说："乡亲们，我是真共产党，不是假共产党呀，鹤峰、五峰的人民，都可以为我做证呀。"

围观群众大都了解易发琛，看到他们爱戴的苏维埃主席被折磨成这个样子，都不忍看下去，纷纷离开。江奇见到这情况，手持喇叭筒子喊道："乡亲们，大家不要上当，改组派正是用这些假革命的面孔来欺骗你们，他们比蒋介石还坏，蒋介石办不到的他们办到了。正是他们的所做所为，使得红军不断打败仗，使得苏区被敌人占领。"

江奇这么一喊，一位老婆婆，因她的儿子和媳妇都被"剿赤"军

杀害，她听信了江奇的话，便狠狠地打了易发琛几个嘴巴。有几个小孩子，拿着石块儿往易发琛身上砸。江奇又鼓动他们："用大石头砸。"那些孩子们果然用大石头向易发琛乱砸去，终于使他气绝身亡。

改组派抓多了，一时审查不过来，不好看管，江奇为夏曦出了个点子，各团都成立"改组派连"，将被抓起的人都集中在这个连里，戴着手铐脚镣，吃饭时也不准取下。部队行军时，把枪挂在他们脖子上，稍有反抗，便遭拳打脚踢。走不动的，便当场打死。

正月十五这一天，天色阴沉，黎明时分，又飘起了雪花。贺龙起床后，推开吊楼窗户朝四野一望，但见山峦树木，都被蒙蒙雪雾罩住。不远处传来了几声惨叫，不由得攥起了拳头狠狠地擂在了楼的柱子上。这些天来，这惨叫之声，日夜不绝，不断传到贺龙耳内。而江奇把审讯"改组派分子"的地方，又安排在跟贺龙住处不太远的一间房子内，故意叫贺龙听。

贺龙正闷闷地吸烟，关向应走了过来，指着飘舞的雪花说："云卿，还记得吗，去年的八月十五，是云遮月；今年的正月十五，便雪打灯。老祖宗们留下的话还挺灵验。"

贺龙听了关向应的话，说："是啊，老祖宗留下来的话儿不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话也是有灵验的，古往今来，那些恶贯满盈之人，有几个能有好下场的。"

正说着话，有副官进来报告说："军长、政委，夏书记刚才来了电话，要你们马上赶到邬阳关。"

贺龙把烟斗往兜里一装，对关向应说："向应，这个夏曦，不知又犯了什么神经病了。"

关向应说："他去邬阳关几天了，大概请我们去邬阳关庆元宵佳节吧。"

当下，二人下楼，上马，踏雪直至邬阳关。

邬阳关本是9师驻地，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都被关押在此地。夏曦到邬阳关，是来亲自审问这三个人的，各种酷刑都用尽了，三人被打的皮开肉绽，仍坚决否认那些不实之词。夏曦遂萌杀机。早上醒来见四野瑞雪飘飘，猛然想到，自己已过而立之年，然一事无成，日夜奔跑于群山峻岭之中，此等岁月，何时为了？叹道："革命真是难那。"正在胡思乱想之际，有保卫局的人前来报告，说对段德昌一夜用刑，昏死多次，仍拒不交待。夏曦听了，把牙一咬说："通知各连来代表到邬阳关，也告诉贺龙、关向应、宋盘铭等人，速来邬阳关，我要开公判大会，处决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又通知江奇，将在金果坪关押的"改组派分子"，也都带到邬阳关陪绑。

公审大会会场在邬阳关前的一个坪坝内，到了近午时，各连、各县区苏维埃的代表，都赶到了这里。贺龙、关向应到后，与夏曦见面。夏曦说："段、王、陈三犯，是极顽固的改组派分子，为杀一儆百，我决定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三犯。"

贺龙说："我要见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三人。"

夏曦说："他们都是反革命分子，你见他们做甚？"

贺龙说："我一定要见见。"

夏曦见贺龙一定要见，又猜不透贺龙有甚打算，想了想说："我们一起去看吧。"

当下，贺龙便同夏曦、关向应三人，来到了关押段德昌的屋前，这屋子没有窗户，包着铁皮的门打开了，里面黑洞洞的，贺龙喊了声："德昌。"只听墙角一阵哗啦啦的铁镣手铐响，只见墙角处一人正艰难地扶墙立起，贺龙急步上前，将段德昌扶起，借着从门口射进来的光亮，看到段德昌遍体鳞伤，面容憔悴，仅仅半月不见，已不是人样了，英雄一阵心酸，热泪在眼眶里打转儿，纵有万语千言又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这时，在一旁的夏曦厉声对段德昌说："段德昌，你死在眼前，还有甚话就快说。"

段德昌怒观了夏曦一眼，转脸对贺龙说："胡子，我段德昌一生磊落光明，今遭小人暗算，死而无怨，我别无他求，只求三件事，你务要记住。"

贺龙拉着段德昌的手说："德昌，你说吧，我一定记在心中。"

段德昌说："洪湖人民为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你不可忘记洪湖人民，这是第一；第二件，如今3军子弹极缺，处决我时，不要用子弹，那子弹留给敌人吧，对我，刀砍、火烧都可以；第三，胡子，你派人给我做碗粉蒸肉，你知道，我最喜吃这菜！我生不能回洪湖，死也要去洪湖。"

贺龙听罢，紧紧地握住段德昌之手，泪珠不由得滚滚而落，说："德昌，你说的话，我都记下了。"

当下，贺龙含泪离开了段德昌处，又来到了关押王炳南和陈协平的地方。关押这二人之处，原是个狗窝，四下不通风，人在里面，只能卷曲着身子。狗窝的小门被打开之后，一股臭气冲了出来，贺龙朝洞内喊了几声"炳南"，不见有人答话，又喊了几声"协平"，还不见人答话。他便把手伸到里面，一摸，摸到一个人，软绵绵地倒在了里面，他用尽力气把这人拽了出来，一瞅，正是王炳南，只见王炳南被打的浑身是伤，头肿得老大，眼肿得已睁不开了，一条腿已被打断，伤口化脓发臭了。王炳南此时已昏了过去。贺龙强忍着悲痛，又钻到狗洞之中，拉出了陈协平。陈协平十指已被打断，浑身肉烂，也昏迷过去。见此情形，贺龙怒视夏曦道："老夏，不能这么折磨人呀！"

夏曦横视了贺龙一眼说："这是轻的，对他改组派，还有什么怜悯可言吗？"

贺龙怒视了夏曦一眼，没有吭声。

中午时分，雪花纷纷扬扬地飘了起来。公判段德昌、王炳南、陈协平三人的大会开始了，到会的各连代表有一千多人，夏曦在主席台上下令，将段德昌等二百多名"改组派分子"，都押到了主席台

前。由夏曦宣布了"罪状"之后，便开始行刑，第一个被拉出来的，便是段德昌。段德昌昂首挺胸，面无惧色，他高声喊道："同志们，永别了，祝革命早日成功！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

夏曦见状，连连喊道："快快行刑！"

几名持枪战士推着段德昌离开会场，这时，只听一人高喊："慢！"

大家看时，见是贺龙，只见贺龙手中端一碗粉蒸肉，走到段德昌面前，含泪说道："德昌，吃些吧。"

段德昌抬眼看了看贺龙，几滴英雄泪不由得滚了下来。贺龙喝令左右："快给段师长松绑。"

战士们不敢动手，贺龙便亲自为段德昌解开了绳索。又把粉蒸肉端到段德昌面前，段德昌接过粉蒸肉，拿起筷子，吃了一口，而后，英雄深情地望了贺龙一眼，把筷子交给了贺龙，挺胸走向了刑场，贺龙含泪把身背转了过去，须臾，段德昌遂被砍死。行刑之时，江奇偏又找了把生锈之刀，英雄死时之痛苦，不可言述。

段德昌被砍死之后，第二人便是王炳南，王炳南被处死之后，接着便是陈协平，陈协平时已昏迷不醒，江奇令人用石头将其头颅砸碎。这三位红3军中的优秀指挥员，便这样被杀害了。此时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刹时间，山川树木，一片银妆素裹，恰似痛悼英雄。

段德昌牺牲之时，年仅廿九岁，王炳南也只四十一岁，陈协平卅一岁，正是干一番轰轰烈烈事业之时，便含恨于九泉之下。

段德昌牺牲之后，湘鄂西苏区人民，对英雄无不深深地怀念，人们在他的坟前，偷偷地栽下了二十九棵青松。红9师政委宋盘铭，在一个漆黑之夜，来到了段德昌的坟前，面对英雄墓土，默颂了自己含泪写下的诗篇。诗中有这样几句：

这里挺立着真理的战士，

这里安息着伟大的英灵。

啊，德昌同志不朽，
德昌同志永生，
你仍在为革命站岗，
恰似这二十九棵青松……

段德昌牺牲的恶噩传到了洪湖，洪湖的人民，无不为英雄的牺牲而掩面。纷纷用各种方式，痛悼英灵。在洪湖之中，有一龚家墩，龚家墩上有一姓万叫祖成的大爹，这万大爹自小便在湖中打鱼度日。段德昌在洪湖中闹革命时，万大爹的儿子参加了段德昌的队伍，后随段德昌转战去了湘鄂边，万大爹老伴儿早没了，就剩下一人过光阴，段德昌牺牲的消息传到了老汉耳内，老汉悲痛万分，他想买些祭礼，祭奠英灵，可又买不起，思来想去，难忍心头之悲，便找了块木牌儿，求人在牌上写了“段德昌在此”，而后，恭恭敬敬地摆在了船上，以寄托自己的哀思，望见牌儿，老爹便像见到段德昌一般。

谁料想，打这儿之后，老爹下湖打鱼，网网不空，日日船满。老爹断定了是段德昌烈士英灵保佑着自己。

渔民们本来都对段德昌异常思念，听了万大爹讲的情形后，每条船上都供上了“段德昌在此”的牌位。说来也怪，凡供“牌位”之船，打的鱼都非常多。渔民们更加思念段德昌了。

这事儿传到了渔霸张泽厚的耳内，张泽厚正为段德昌死而念佛。他听说渔民们都供奉段德昌的牌位，立时跟火燎腚眼子似的，跳着脚儿对他儿子说：“立即下湖，把段贼的牌位，都给我搜来，哪个胆大的要胆敢再供奉段贼牌位，抓起来送官府治罪。”

张泽厚的儿子叫张仁贵。他听了他老子的吩咐之后，便带了三十多名乡丁，乘坐一条大船，下到湖中，搜查各渔船上的木牌儿，只一天，就搜满了一船木牌儿。张仁贵很是得意，看看天晚，便令乡丁们调转船头，驶回龚家墩。

那些乡丁们听到主子发了话，急忙把船头调过，向岸上驶去，正行之际，忽然云生西北，雾长东南。那乌云飞马般地席卷过来，云至风至，骤起的狂风将湖水掀起丈高巨浪。刹那之间，这洪湖湖面之上，一片昏暗。张仁贵一见这情形，脸儿刷地便变黄了，大声喊道："不好，来天气了。"

张仁贵的话音儿没落，一道闪电，像要把天劈开似的，接着，又一个炸雷，那雷声响时，带着一团火光，好像一条火龙，直奔张仁贵这条大船，将大船的桅杆劈成两截儿。只吓得张仁贵和乡丁们一个个跪倒在船上，朝天磕头。有个乡丁对张仁贵说："少爷，段德昌是火龙转世，我们收他的牌位，得罪了他，他老人家显圣了。"

张仁贵和众乡丁听了，更是吓得屁滚尿流，连忙朝天磕头，说："段爷爷饶命，小的们有眼无珠，惹恼了你老。"但这时雷电已经烧了大船，大船火势熊熊，刹那间张仁贵和众乡丁都被烧成了糊家雀。那大船也被烧成灰迹。而满船仓写有"段德昌在此"的木牌儿，都被风卷得漂满了湖面。从此，渔民们更认为段德昌是火龙将军了。打这以后，他们又盖了座小庙儿，供上了"火龙将军"的牌位，牌位两旁的木柱上，写了一幅抱柱联，联文是：

生为民死为民为民而死虽死犹生；
爱洪湖战洪湖因湖负屈英魂常在。

湘鄂边内各县群众，听说英雄们遇难，都个个悲痛，也都纷纷立牌位，寄托哀思。正是：

英雄英灵何处寻，江河大地寄忠心，
宏图未展身先死，长使人民泪满襟。

王炳南不光能指挥打仗，还精通兽医。1930年，鹤峰、五峰一

带猪瘟严重流行，王炳南知道后，便利用军务之暇，不辞劳苦，亲赴深山，攀悬崖爬峭壁，采集草药，帮助农民消灭了猪瘟。老百姓十分感激他。王炳南在湘鄂边转战多年，他每到一地，便为群众的牲畜治病。如今王炳南含恨而去，老百姓都深深地怀念他，便用他的名字驱瘟祛邪。许多人家在牛栏、猪舍、鸡窝处都挂上了一块牌子，上写“王炳南在此”。说来也怪，这些挂牌之处的牲畜竟不生病，人们都说王炳南显灵。后来，在鹤峰的下坪、麻水等地，老百姓每遇到虫、水、风、兽、病等难以抗拒的灾害，或逢年过节，都要烧化纸钱，祭酒纳拜，求请王炳南烈士阴灵保佑。

贺龙后来沉痛地回忆说：

“段德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夏就说段德昌要带9师跑。我说他不会跑，要跑他还写信回来。结果还是调回来，在邬阳关调回来，在邬阳关杀了。以后王炳南、宋盘铭都捆了。在麻水我同王炳南谈过一次话，隔了几米就是臭的，身上伤得没一点好地方。我说王炳南没问题，应该放。夏非杀他不可，他把人整成这个样子非杀不行，怕结仇。”

薄一波在其回忆录书中写道：

“这是一次我问他(指贺龙——引者注)在湘鄂西的斗争情形时谈起来的，他说：在苏区‘肃反’中，湘鄂西是搞得最‘左’，损失最惨重的一个。在夏曦的指挥下，前后进行了四次‘肃反’。许多同志被扣上‘改组派’、‘反国际’、‘反革命’的帽子，惨遭杀害。其中师以上的干部就有万涛、柳克明、段德昌等十余人。明明知道他们都是好同志，但就是救不了他们的命。当夏曦以‘改组派’的罪名杀

害段德昌同志时，我实在忍无可忍，拍案而起，同他激烈争辩，可还是无济于事。段德昌同志被害时，他望着我失声痛哭，并高声喊道：'贺胡子，我不反对你，我只反对夏曦！你不要忘记洪湖人民，一定要打回洪湖去。'这个血的教训，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全国解放后，段德昌被追认为第一号烈士。这大概也算对英灵一点慰祭吧。

第二十二章　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大“肃反”

宋盘铭、叶光吉、盛联均之死

夏曦肃反直闹得人心慌慌，个个自危，哪里还有可能建设红军、建设苏区？到了3月初，周矮子率人马攻占了鹤峰县城。贺龙又率7师将周矮子部赶走。到了4月，五峰的团防彭西祖又率人马向鹤峰苏区进犯，亦被贺龙指挥部队打跑。5月，朱际凯朱疤子又进犯鹤峰城，贺龙率7师与其激战一日，朱部遂退。

夏曦见红军士气低落，各县区乡苏维埃的干部工作也躲躲闪闪，心中为此郁闷，整日锁着眉头。这一日闷坐房中，顺手拿起一本石印《水浒传》，看到宋江受招安一节时。夏曦心头猛地一动，暗道：

“如今红军屡遭失败，会不会有人想到招安呢？此种情绪，不可不防，得了解一下。”

夏曦正想着，江奇走了进来。夏曦道：“江奇，我正要找你。”

江奇说：“夏书记，你找我有什么事呀？”

夏曦取出烟袋，江奇赶忙双手捧着火儿为夏曦点着。夏曦说：“江奇，我正在思索个事儿。”他一指《水浒传》说：“当年宋江上了梁山，竖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后来，受了皇帝的招安，去打方腊了，武松单臂擒方腊，灭了梁山一盏灯。如今我们红军面临困境，你说，有没有想受蒋介石招安的人呢？”

江奇一听，眼珠儿滴溜溜一转，往夏曦跟前凑了凑说：“有哇，我今儿找您，就是要说这个事儿，有人就在打招安的主意呢。”

夏曦把眼皮一挑，问道：“谁？”

江奇说：“宋盘铭、叶光吉、盛联均。”

夏曦又问：“我这些日子，也一直琢磨，红军面临困境，那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岂能不打招安的主意？这么着，我就留了神了，也派人暗中查看，还真让我查到了，昨儿，宋盘铭、叶光吉、盛联均三人一起喝酒。密谋说您毁了红军，毁了苏区，要寻机杀您，再杀贺龙、关向应，他们再把这队伍拉到蒋介石那里，做大官儿。”

夏曦望着江奇，问道：“可有证据？”

江奇连忙答道：“有哇，宋盘铭的房东孙斗儿亲耳听到的。”

夏曦说：“你把孙斗儿叫来，我要亲自问他。”

江奇答应着走了，工夫不大，江奇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一个人，这人有三十多岁，长得獐头鼠目，兔腰狐背。见到了夏曦，哈了哈腰儿。夏曦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孙斗儿。”

问：“做什么的？”

答：“邬阳关山货店的伙计。”

问：“到这里来知道做甚吗？”

孙斗儿继续哈着腰儿说："给长官报个事儿。"

夏曦一指凳子，说："你坐下来说吧。"

孙斗儿连忙坐了下来，说："头程子，红军开过来后，我们家的掌柜的害怕红军，跑了，留下了我看着铺面儿。红军来到镇上后，有个当官儿的，就住在了山货店的后楼。后来，我知道了这官儿姓宋，兵士们都叫他宋政委。瞅那样儿，官还不小。我呢，也随帮唱影，跟着叫宋政委，他跟我还挺客气。前两天晚上，又来了两红军的官儿，我从他们勤务兵嘴里，知道了这两个人，一个姓叶，一个姓盛，也都是红军里不小的官儿。三个人在楼上饮酒。宋政委要我给他们炒几个菜。"孙斗儿说到这儿，小脑袋晃着说："不瞒你说，小的炒菜的手艺不错，也是侍候掌柜的练出来的。他们三人边吃边喝边说，小的就侍候他们……"孙斗儿又压低声音说："我把菜炒好后，端了上去，宋政委便要我走开，我出了门，躺在隔壁的床上，那墙有个洞，被一张画盖着，从小洞中只听他们三人说要把什么夏书记、贺龙、还有个叫关什么的都给杀了，而后带着红军去投靠蒋介石。在蒋介石那儿弄个官儿做，享享荣华富贵。我这么一听，吓得浑身的汗毛眼儿都炸开了，觉得这事儿重大，一大早，我就悄悄地跑到金果坪报告。"

夏曦慢慢地吸了口烟，对孙斗儿说："孙同志，你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可这情况，不要再跟别人讲了。"

孙斗儿连连点头说："夏书记，你老放心。"

夏曦笑了笑又问："孙同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

孙斗儿眨巴眨巴眼，支吾说："没……没……"

夏曦对江奇说："给孙同志二十块光洋。"

孙斗儿一听，立时乐得嘴巴咧得像个瓢儿似的。

夏曦听了孙斗儿一番话，心中又恨又喜，恨的是宋盘铭等背后暗算自己，喜的是自己正要抓宋盘铭三人的小辫儿，如今有了证据，此时不下手除掉，更待何时？想到这儿，夏曦站起身，叫江奇立

即通知贺龙、关向应到这里来。

江奇说:“夏书记,您是不是要跟他们商量有关宋盘铭谋反的事?”

夏曦说:“贺龙不是对我有意见吗?说我抓改组派不和他商量,不民主,我今儿要他动手去抓宋盘铭。”

江奇连连摆手说:“夏书记,此事若要贺龙去办,宋盘铭非但抓不成,孙斗儿的性命也不保哇。”

夏曦说:“为甚?”

江奇说:“夏书记,贺龙素与宋盘铭等不错,如今我们说他反叛红军,贺龙必然要证据,如果我们说出孙斗儿来,贺龙必定又要亲自审讯不可。你老想想,宋、叶、盛三人合谋反事,只有孙斗儿一人隔墙听到,若贺龙不信孙斗儿的话,若贺龙掏枪把孙斗儿毙了,回头反说孙斗儿诬陷好人,事到那份儿上,不是麻烦了吗?”

夏曦说:“若依你之见呢?”

江奇说:“依我说,立即将宋、叶、盛三人抓起,如果我们动手晚了,他们抓了您老,好歹给您老安个罪名,您老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哇,这叫胜者王侯败者贼。我们先动了手,将宋、叶、盛三人抓起,再把余党一网打尽,从此,红3军便没甚人敢和您做对头了。”

夏曦说:“和我做对的,还有贺龙啊。”

江奇说:“我们将其羽翼都铲除了,回过头来,再收拾贺龙。”

夏曦说:“怎么抓宋盘铭三人呢?”

江奇说:“不能打草惊蛇,要像抓段德昌一样,派人通知他们到分局开会,而后,把人埋伏在楼上楼下,他们到来,必带勤务兵,我们将勤务兵拦到楼外,宋等人一上楼即抓住,先通知关向应,后通知贺龙。我们当着贺龙的面儿,审问宋盘铭三人!”

夏曦听罢,说道:“江奇,那就由你来安排吧。”

江奇得到了夏曦的“圣旨”,立即安排人,布网抓捕宋盘铭等,同时,又暗中派人将孙斗儿杀死,杀人灭口。

贺龙听说宋盘铭、叶光吉、盛联均三人被抓的消息后，立时浓眉倒立，虎目圆睁，周身三万六千根汗毛，全都立了起来，把桌子一拍，骂道："娘妈的，真是岂有此理，如此下去，红3军的领导干部，岂不是杀绝了么？"骂着，径直地来到了夏曦的住处。夏曦见贺龙一脸怒火，便知道此来不善，忙笑道："云卿，我正要派人找你呢。"

贺龙像没听到一般，劈口问道："夏曦，我问你，那宋盘铭、叶光吉、盛联均，又犯了何罪，你将他们抓起？"

夏曦不慌不忙地取出了烟袋，装好烟，递给了贺龙。然后一本正经地说："他们犯了反革命罪，是改组派。"

贺龙问："有何证据？"

夏曦说："当然有证据了，这个反革命案件，是江奇亲自破获的，证据确凿。"

一提江奇，贺龙更是火上加油，怒道："老夏，这个江奇，不是个好东西，阳奉阴违，挑拨离间。"

夏曦把脸一沉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江奇在肃反斗争中，是立下了大功的。"

夏曦要让贺龙心服口服，便打算安排贺龙亲自审讯孙斗儿，于是派人去找江奇。可一直到了半夜，才把江奇找到。

夏曦见江奇来了，立即对江奇说："江奇，快，把孙斗儿带到这里，军长要亲自审他。"

江奇把大腿一拍说："夏书记，快别提了，孙斗儿被人杀死了。"

夏曦眼珠子一瞪说："这是怎么回事？"

江奇说："一个叫李闯儿的看见孙斗儿身上有几个钱儿，用酒把孙斗儿灌醉，骗到了黑松林中，杀了！"

正在这时，军部的作战参谋突然来找贺龙，报告说龚仁杰、周矮子、朱疤子、陈策勋等，会同湘鄂西各路团防，杀了过来。贺龙听了，对夏曦说："敌人攻过来了，宋、叶等人情况，回头再说。"说完，

转身下了楼。

原来，蒋介石闻知贺龙、夏曦率红3军转战到湘鄂边，立即任命徐源泉为湘鄂边“剿匪”总司令。徐源泉接到了命令之后，探得红3军转战到巴东、建始、鹤峰三县边界地区活动，人已不满三千，且粮草不足，弹药奇缺，士兵们衣不遮体，多以野菜充饥，便决计集结重兵，趁此时机，全歼红3军兵马。当即下令，命亲信张刚为前敌总指挥官，指挥湖北的保安团和独立团、新3旅、48师的142旅、石门保安团、澧县保安团、慈利保安团、桑植保安团、周矮子的第3旅、龚仁杰部，前后共十四个团的兵力，分为数路，直奔红3军而来。

这时候，红3军由于经过了三次肃反和党团组织的解散，已元气大伤，虽然贺龙亲自指挥破敌，奈敌兵人数众多，且又来势凶猛，红军抵敌不住。敌新3旅占领了巴东的龚家垭、建始的官店口、恩施的石灰窑；湖北省保安团侵占了宣恩长潭河一带；五峰、石门、桑植之敌也都深入鹤峰苏区，鹤峰城遂被敌占领。鉴于形势紧急，红3军和中央分局只得向宣恩、鹤峰边界转移，就在这转移之中，江奇得到夏曦的同意，密令人将叶光吉、盛联均、宋盘铭三人，推下山涧摔死。可怜三位英雄，如此饮恨而亡。

对于宋、盛、叶三人之死，夏曦后来向中共中央写的报告中称：

> 当时七师清党负责的是政委盛联均、九师清党负责的是政委宋盘铭，这两人都是改派。盛联均当时就利用清党来提拔改派分子，打击真正的党员。宋盘铭则对清党消极与形式的执行，他把改派组织又恢复起来。对于宋盘铭、陈培荫的错误，我们曾经严重地指出他们是国民党的政治工作方式，帮助了改派反革命，可是没有在群众中公开斗争和撤销他们的要职，所以，当时改派残余又团结起来成立军委，以宋盘铭为书记，到了四次肃反，才暴露出

来。

杨云生等七十余人之死

红 3 军和中央分局在敌人攻势之下，无力抵抗，只得向深山老林和人迹稀少的宣恩、鹤峰边界转移，一直退到了宣恩县烧巴岩一带时，才把敌人甩开。当下，红 3 军军部和中央分局，都住在了烧巴岩。这时，贺龙得知宋盘铭、叶光吉、盛联均等已死，不胜伤感，遂找到夏曦、关向应，提出要卢冬生当 7 师师长。贺龙的提议，夏曦、关向应都赞同。这样，卢冬生便为红 7 师师长。

一日，夏曦又主持召开中央分局会议，这时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 3 军，只有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名党员了，烧巴岩本是深山里的一个穷寨子，会议便在一间茅草房里举行，四人坐定之后，夏曦开口便说："目前，在分局和红军中，恐怖情绪，失败情绪比较严重，这无疑是改组派散布的，说明改组派还在继续活动，我们同改组派的斗争，还要深入进行。实践证明，各级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解散了，是正确的，我们要在这次清党中，大批的吸收新的党员，建立新的党团组织，要从战士中，提拔新的干部。对于改组派欺骗过的群众，要进行教育，只要他们能公开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检举他人。我们就原谅他们。这样，便能从各方面去瓦解改组派的力量，实行彻底的组织上的改造，完全洗涮出地主、富农分子和暗藏的改组派分子，从面达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党团在红 3 军的领导。"

夏曦说到这儿时，贺龙接过话说："老夏，我看肃反差不多了吧，从洪湖第一次肃反到现在，抓改组派差不多有上万了。"

关向应说："是啊，就算还有改组派，也只是个别的了，抓改组

派也不能算是当前主要的任务了。”

贺龙又说：“我们的电台坏了多半年了，同中央失去了联系，中央的情况，国内各方面情况，我们一点也不了解，整日住在这山沟里，就跟瞎子一样，我看我们应当设法同中央取得联系。”

夏曦说：“怎么联系呢？电台坏了，成了一堆废铁，派往中央的交通，已经数月了，没有一点音信。国内的形势，还不就是老样子，蒋介石反动派派重兵‘围剿’红军，土豪劣绅资本家照样压榨劳苦大众。”夏曦说到这儿，把手一摆说：“咱们还是从红3军和中央分局的现状说起吧。”他咳嗽了几声，继续说：“文常和向应说的肃反差不多了，我不赞同，在一、二次肃反时，我就感到，改组派已经把持了党的组织，利用各级党的组织，达到他们的目的，我就产生了清党念头。只是没有果断地下决心。如今看，我的决心下晚了，到了茅坝时我提出了清党，宋盘铭、段德昌都坚决反对。”夏曦一指贺龙、关向应：“你们二人也反对，现在看，段德昌、宋盘铭他们坚决反对清党，是有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秘密开会，要暗杀我们，亏得江奇发现了他们，他们的阴谋才没得逞。宋盘铭等自知罪大恶极，革命法庭不会饶恕他们，便都跳岩自杀了，那些隐藏在军队内的改组派分子，我们还要进一步清查。”

夏曦说完，贺龙、关向应、卢冬生都没言语。夏曦又说：“继续清查改组派余党，大家没有意见，我们论讨一个议题，就是怎样开辟新的苏区？”

关向应说：“要开辟新的苏区，我看要研究一下我们的政策，比如，我们打土豪，应当找民愤大的打，不应当乱打，前一时期，我们就饥不择食了，大小一起打，这样做的结果，是树敌过多。”

关向应这个意见，贺龙表示同意。夏曦不同意，说：“大的土豪有罪，小的土豪就没罪了吗？你们这样认识是错误的，那样做，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路线。”

贺龙说：“我们应该面对事实，我们打土豪分东西给群众，群众

都不敢要，这是为何？”

夏曦说：“那是群众不觉悟。”

贺龙说：“如果群众对恶霸恨之入骨，红军杀了这样的土豪，都会拍手称快的。”没等夏曦插话，贺龙又说：“老夏，我问你，是千家怨好还是一家怨好？”

夏曦不太耐烦地说：“这个事以后再说。”

这一天，四个人从早扯到午，又从午扯到晚，总算做出个决议。这就是后来写入红2方面军战史的《关于巩固发展湘鄂边新苏区，争取革命战争胜利的任务的决定》，这个决定，共提出了三项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清党，继续抓改组派；第二个任务是开辟新苏区，要赤化宣恩全县，组织来凤、龙山、桑植、咸丰一带的农民游击战争；第三，巩固现有的苏区，领导现在的苏区群众，广泛地开展游击战争，号召群众参加武装斗争，武装保护土地革命的利益。在关于开辟新苏区的方法和政策上，贺龙、关向应主张：首先建立若干工作点儿，然后由点到面儿，有步骤地开展工作，发动群众起来斗争，对地主豪绅按其罪恶大小，财产多少，确定打击目标；对反动团防，按其反动程度，区别对待；对神兵武装，则尽力争取和瓦解，尽量不在新苏区内，树敌过多，以给工作造成更多的困难。夏曦对后面意见，虽然不同意，可他见贺龙、关向应、卢冬生三人态度坚决，也只得勉强答应。

烧巴岩会议的决议，实际上是一派空洞的号召，在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解散的情况之下，要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如何可能？红军力量本来就已很弱，而在这个会上，又决定了分散出击，这么一来，就使得红3军力量更加削弱。真是：

屋漏偏遇连阴雨，破船又遇顶头风。

按照烧巴岩会议决定，由贺龙、关向应、汤福林，率领红9师和

教导团，到宣恩、咸丰、利川一带游击，开辟新区；由夏曦率分局机关及卢冬生率领红7师，在鹤峰坚持斗争。会议之后，贺龙将卢冬生叫到自己屋内，说："冬生，你这次出击，要和夏曦搞好关系，记住，遇事不要冒火。多听他的意见，多请示他。"

卢冬生锁着眉头说："我真不愿跟他去。"

贺龙说："要你去是他夏曦指名定的，说明他还信得过你。"

当下，贺龙、卢冬生都加紧做出击的准备工作，夏曦呢，继续同江奇一起进行第四次的肃反。几天之后，又被他们抓了一批改组派，有27团的团长杨云生、25团团长周大本、红3军政治部政务科长谷万春等等近七十余人。夏曦对他们日夜突击审问，没两天，便处死了二十一人。又两天，又有二十八人死在江奇的审讯棍棒之下。数天后，七十余人都无端的死在了"莫须有"罪名之中，贺龙听了也无可奈何，只是暗自伤感一番。

这一日，贺龙正要带红9师出发，前去开辟新的苏区，忽然廖汉生来见，廖汉生人见到贺龙，倒头下拜，接着放声大哭，一边哭着一边告诉贺龙，说贺英被敌人偷袭营寨突围时身亡。贺龙听了，真是悲痛万分。关向应、夏曦等也伤感不已。

贺龙怒骂："一群狗狼养的！"

贺英牺牲恶噩传到红3军，红3军上上下下，无不悲痛万分，都咬牙切齿，要为这位革命的大姐报仇雪恨。两天之后，夏曦率领红7师，贺龙率领红9师，按照烧巴岩中央分局会议的决定，开始了新的军事行动。

7、9两师本来力量已不强了，这一分开行动，力量更弱，结果，都在强敌面前吃了亏。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出击，局面无法打开，最后，到了1933年12月中旬，红3军的7、9两师终于又在施、鹤边

界上的石灰窖会师了。这时，湘鄂西山区，已经冷风嗖嗖了，而红3军的干部战士，还都穿着破烂不堪的单衣，敌人依然占领着湘鄂边，苏区没能恢复，反"围剿"遂归于失败，士气没能振奋。尤为严重的是，同中共中央一直没能够取得联系，部队在这大山之中，消息闭塞，真如瞎子一般。

红7师与红9师在石灰窖会合之后，夏曦就像遭霜打的茄子秧，低头耷拉脑袋，见到了贺龙的头一句话，就是今后该怎么办。

这时候，红3军所剩的人数，已不足三千，苏区的丢失，国民党军队的反复"围剿"，部队东游西转，伤病员无法安排，给养困难，地冻天寒，且党团组织解散，军中失去了骨干力量，不少人感到前途渺茫，每天都有人挂枪逃走，那些没走之人，也无时不在思索红旗还能打多久？

贺龙见夏曦整日愁眉不展，便劝他道："愁甚？现在有三千来人，也不算少么，比起我两把菜刀砍盐局时，比起我在南昌暴动失败后来湘西拉队伍时，胜过百倍。我们开个会，研究一下部队今后的行动吧。"

当下，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3军军部，移到宣恩的大村，召开了中央分局会议，讨论了恢复湘鄂边苏区的失败教训和下步红军任务。关向应首先说："湘鄂边苏区的失败，夏曦同志应负主要责任，一是不该将7、9师分开行动，红3军本来力量就弱，分开之后，力量更弱了。二是不该把游击队和苏区的工作人员，一起编入了7师，取消了地方武装力量，使地方团防恶霸势力猖獗起来。"

卢冬生也给夏曦提了意见，说他主观主义，夏曦接受了大家的意见。

接着，关向应提出了红3军下步行动，应向四川的川东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发展，创造新的根据地。如果鄂敌继续追击，为保存革命力量，便向江西的中央苏区靠拢。大家都觉得向酉、秀、黔、彭发展是对的，但向中央苏区靠拢则不实际，不应疲师远征。到后

来，大家决定红3军向四川川东的酉、秀、黔、彭发展，在川东创造新的根据地，把恢复湘鄂边苏区的口号，改成“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口号。会毕，贺龙、关向应等诸将领，便分头在部队中进行了新的动员。

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四县，乃是川东偏僻去处。到处是险山深谷，密树丛林，乌江下游由此穿过，交通十分不便。而这地区又很富庶，且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

1933年的12月22日，红3军由湖北咸丰属水坝出发，直奔川东黔江县城。

黔江乃川东大县，位于川东南边缘。县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为土家族和苗族群居之处。从南宋绍兴元年至清雍正十三年土家人“改土归流”止，一直实行土司制。民国之后，这里的各族百姓，受着各方反动势力的压迫，难见天日。

驻防黔江之敌为川军周化成部。贺龙指挥人马突然袭击了此城，周化成弃城而逃，红3军遂占了黔江。

四川“剿赤”总司令刘湘闻黔江丢失大惊，急令驻防酉阳、秀山的独二旅田仲毅部、驻彭水的陈万仞第5师出击。贺龙得到敌情后，便与夏曦商议，贺龙说：“敌人来势凶猛，我当避之。”

夏曦遂同意贺龙的意见，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紧急临时会议，决定红3军游击于川鄂湘边。决定之后，第二日，红3军便主动离开了黔江县城，仅留下了特务队长刘汉清数人，负责了秘密留下的伤病员。主力走后，刘汉清等人慢慢地在此发动群众，组织起了一支游击队，后来，发展成了一个独立团。

贺龙率领红3军离开黔江之后，便向鄂西的利川方向游击，在利川的小河，又与“围剿”红军之鄂军相遇，双方接火后，贺龙见鄂军势大，不敢恋战，带部队南下，进入了湘西龙山界内。

红3军退到湘西，进入了龙山县，日夜游击，东挡西杀，甚是疲惫，部队减员，亦不得补充，伤病员没有地方治疗，只能寄放于百姓

家。军队中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解散了，一切都是行政命令。各级司令部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师里只有师长、参谋长和两个文书。一句话，红3军只剩下了红军这面旗帜。湘鄂川黔的山区，冬日特别寒冷，人马走在山路上，一步三滑。干部战士们穿着破烂单衣，打着赤脚，日夜在这山野中钻进钻出，那艰难真是一言难尽。而此时，夏曦还是不断杀人，军心越发浮动，战斗力低下，眼见得一些意志不坚的分子，弃枪逃走，使得红军每日减员。如此，那夏曦脾气越发暴躁，贺龙心中有气，也不愿同夏曦多说话。

就在这时候，蒋介石派了湖南省政府参议员熊贡卿到龙山游说贺龙，招安红军。因为熊当年在贺龙刺杀谭延闿未遂被捕，由熊贡卿救得性命，所以，蒋介石派熊前往，熊亦欣然受命。

熊贡卿水旱兼程赶到恩施，湘鄂边"剿赤"军总指挥张刚为其洗尘。当下，熊贡卿给贺龙写了一信。内称：

云卿惠鉴：

宁乡一别，弹指近十载矣！先闻云卿北伐功勋卓著，瑞龄甚为欢悦，后闻云卿入赤党，行逆道，甚为憾之。今闻云卿龙入浅滩，虎落平川，瑞龄怜卿之才，特在蒋公介石面前，保荐云卿弃暗投明，重步人生。介公甚慕云卿之才，言明以往如烟掠过，并愿以重任委之，想云卿乃深明大义之人，必不负介石公一片苦心，如蒙赏光，瑞龄愿与云卿面会。

熊瑞龄

十二月二十七日

熊贡卿写好信，署上了自己的号（其号瑞龄——作者注），第二天，便派亲信梁素佛乘了滑竿上路，直奔龙山投书。

贺龙率领红3军转移到龙山的茨岩塘。吃过晚饭，阴沉天气又飘起了清雪，屋内冷如冰窖。贺龙叫勤务兵抱来些木炭，在屋内拢了一盆火。大家坐在火盆四周，听关向应讲《水浒传》，就在这时候，有副官送来了梁素佛带来的信。贺龙看了，笑着对关向应说："娘妈的，对我贺龙策反，瞎了狗眼。"一面拿信给关向应看。

关向应也笑道："蒋介石八成又读了《水浒传》，看到宋江最后受了招安，便打起红军的主意了。"

贺龙坐下来，把炭火拨旺，说："向应，我倒有个打算，咱们在这湘鄂川边大山里，同中央又失去了联系，对各苏区、对敌人、对国内外各方面情况，都不了解，我看不妨让熊贡卿来，我们通过他的嘴了解各方面情况，回头再把这家伙毙了，也为民除一大祸害。不是一举两得的事么。"

关向应说："你这打算不错，不过，我们还是向中央分局报告一下，分局批准了，我们再行动。"

贺龙说："好，我现在就去分局。"

贺龙冒着凛冽的寒风，到了分局所在地，见到夏曦，便把情况说了一遍，把熊贡卿写来的信也给夏曦看了，而后谈了自己的打算。

夏曦也正为不知外界情况而犯愁，听了贺龙的意见后，说："胡子，让熊贡卿来吧。"贺龙回来对关向应说夏曦已经同意，关向应便以贺龙名义，给熊贡卿写了回信，请他来龙山。

第二天一早，贺龙便把信交给了梁素佛说道："梁先生，见到瑞龄公，请代贺龙问候。"

梁素佛拱手道别，而后坐上了滑竿，回到施南。

熊贡卿见贺龙应允他前往，十分高兴，次日，便同梁素佛二人分乘三个头的滑竿轿，带着五十名身挎盒子炮的扈从，九副用大红纸封盖的挑箱，十匹骡子驮着包袱，前呼后拥来到龙山境内，行至距红3军驻地茨岩塘有五里之远时，熊贡卿便下了滑竿儿，要步行

至茨岩塘，以示其对贺龙的尊敬。

贺龙这日正同卢冬生等商量工作，接到报告之后，便下楼到了村口，见一干瘦的老头儿，头戴水獭皮帽，身穿青底儿团花长袍，外罩蓝缎子马褂儿，颌下几根黄须，由梁素佛扶着。熊贡卿一见贺龙，立即几步上前，拱手说道："贺军长，宁乡一别，十载不见面了。瑞龄特为云卿军长请安。"

贺龙听了，也拱手道："熊老先生今日前来，文常有失远迎，请熊老先生见谅。"

当下，大家进村，到了一栋木房前，贺龙一伸手请熊贡卿屋中歇息。又叫身边人安排酒宴。

熊贡卿也叫随从将大小箱子和礼物搬到屋中。

熊贡卿随贺龙进入这间很普通的鄂西砖木结构房。屋中火塘里木柴烧得毕毕剥剥的响，烤得屋中暖烘烘的。贺龙说："熊老先生请坐吧。"

熊贡卿不断地打量贺龙神色，见贺龙谈笑很随便，这才一撩长袍，坐了下来。勤务兵送过茶来，贺龙也坐了下来，打火吸烟。熊贡卿喝了口茶说："自与将军宁乡一别，时时挂念，奈将军多年奔驰疆场，小老儿我年事渐高，故不得与将军相见。"

贺龙笑道："熊老先生今日远道而来，文常甚是感激。"

熊贡卿说："小老儿慕将军之德才，才不顾远道而来。此次来鄂西之前，见到了蒋司令，蒋司令对将军甚是厚爱，渴望将军为念黎民百姓涂炭之苦而弃暗投明。"

贺龙说："是啊，古语说，贤臣寻明主而事，良禽择良木而栖。"

熊贡卿鼓掌笑道："对，对，将军说的太对了。"接着，熊贡卿转身说："把蒋司令送给将军的礼物拿来。"

梁素佛答着，便把箱子打开，从箱子里托出一套呢子军服，军服上摆着一副金边红底的肩章，肩章下压着一张委任状。梁素佛把委任状摆开，贺龙一瞅，见上面写道：

委　任　状

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副总指挥。

主席　蒋中正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十二月

贺龙见了，没动声色。梁素佛又从箱子里取出一张钱票，递给了熊贡卿。熊贡卿捧着钱票，笑眯着眼说："这十万大洋，系蒋司令为将军安家之用。"又指着摆着半间屋的大包小箱说："这许多美酒、罐头，都是慰劳众兄弟的。"

贺龙说："熊老先生为红军之事，真是费了一番苦心哪。"

熊贡卿说："哪里哪里？理当理当！"

这时，勤务兵走了进来报告："酒宴已齐备。"

贺龙遂笑着请熊贡卿入席。

大家来到了隔壁房中。见一张八仙桌子上，摆满了酒菜。关向应也过来相陪。大家落坐之后，贺龙举杯说："熊老先生、梁先生为我贺龙、为我红军命运远道而来，贺龙心中高兴，愿与熊老先生对饮一杯。"

熊贡卿连忙把杯举起，笑道："将军盛意，瑞龄不胜感激。"当下，一饮而尽。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熊贡卿的话就多了，贺龙问道："熊老先生，文常在这深山僻壤多日，现山外时局不知有何变化，望先生赐教。"

熊贡卿问道："将军不知想听哪个方面的情况？"

贺龙说："各方情况都想听听。"

熊贡卿说："国内的情况么，日本人占了东三省，那个冯玉祥、宋哲元偏要组织什么抗日军队，跟日本人打仗，蒋主席对他们的行

为恼透了。日本人都是精灵，跟他们打仗，不是拿着鸡蛋撞石头么？”熊贡卿喝了口酒，又说：“蒋主席乃当世雄才，按蒋主席之意，攘外必先安内。就是说，先把内乱平了。从去年9月起，蒋主席便亲自坐镇南昌，指挥一百万大军向江西红军实行‘包剿’，红军敌不住天兵，一败再败。鄂豫皖的红军，也在蒋主席指挥‘包剿’之下，败退到四川，指日可破。为使数万生灵免遭杀害，蒋主席好生之德，已派人去做招安。去川北红军处有四人，去江西的也有数人。”

贺龙笑道：“蒋介石为了红军，也是真费了苦心了。”

接着说：“云卿将军，如今我们都不是外人了，有话就直说啦。蒋公介石为对付红军，可是费了心血啦，除了调兵遣将外，还派了不少得力之心腹，钻进了红军内部呢。”

贺龙听了，心头一震，且故做惊讶道：“有这等事？”

熊贡卿说：“有哇，将军身边就有哇，不然，蒋主席怎么知道将军面临的困境呢。”

贺龙假意笑道：“看来我的脑袋随时都在蒋氏的手中捏着啦。不知这人怎么这么高明，竟躲在我的眼皮子底下，而我竟然不知道。”

熊贡卿笑道：“我说句难听的话，这叫暗算无常死不知。”又道：“敢问将军身边可有个江奇么？”

贺龙忙答：“有个江奇。”

熊贡卿说：“将军怕是没看出来吧；这江奇，便是蒋主席派进来的人，蒋主席对他的工作成绩，十分满意。”

熊贡卿说到这儿时，贺龙的头发根儿都竖了起来，可他依然不动神色，又笑着问道：“请问熊老先生，我身边不知还有何人为蒋主席所派？”

熊贡卿说：“还有何人我就不知了，这江奇么，我也没见过面，临来鄂西之前，蒋主席亲口对我讲，说若将军深明大义，愿弃暗投明，要我可找江奇，说此人是国民党员，已在湘鄂西红军中多时，成

绩颇著，可为我帮忙。今将军已成自己人了，所以，瑞龄才敢明言。”

贺龙笑道：“这江奇果然本领不小，在红军多年，居然能瞒过许多人的耳目，可谓足智多谋。”

熊贡卿说：“将军可否使江奇与瑞龄一见？”

贺龙说：“这个容易。我们今日饮酒，明日，我要江奇来就是了。”

当下，关向应也频频为熊、梁二人倒酒。一边饮酒，熊贡卿又说了许多贺、关不知道的事，像那19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李济深等联合反蒋，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等等事谊，熊贡卿将其所知，一一尽言，贺龙、关向应听了，都记在了心中。

这一顿饭，连吃带喝带谈，一直到了深夜方散。熊贡卿见贺龙、关向应如此热情，很是兴奋。

第二日，贺龙又摆酒，同关向应一起，再与熊贡卿、梁素佛畅谈，贺龙、关向应连着给二人戴高帽儿，美得熊贡卿摇头晃脑，像个刚出水的鲫瓜儿鱼似的。把他所知之事，一古脑儿的倒了出来。几个人整整地谈了一天，谈的实在没甚话说了，贺龙说：“熊老先生这几日辛苦，今日早些歇息吧。”

熊贡卿笑道：“与将军相坐，不知疲倦。”

梁素佛一旁答道：“酒逢知己千杯少嘛。”

关向应笑道：“若是话不投机就半句多喽。”

熊、梁闻言，皆大笑。笑毕，回住处休息。二人走后，贺龙对关向应说：“向应，我看这两个宝贝肚里货抖落的差不多了。”

关向应点头说：“向分局报告一下，把他们处理算了。”

当下，二人来到了分局，见到了夏曦，将熊贡卿所谈之情向夏曦做了汇报，当夏曦听说江奇是打进来的反革命分子后，只惊得目瞪口呆，半晌才握住贺龙的手，连连说：“枪毙，明天就把江奇枪

毙。”

贺龙说：“江奇在红3军和分局内做尽了坏事，他杀害了我们那么多的好同志，要审查清楚，再做处决。”

夏曦坐在了凳子上，长叹一声说：“我怎么让江奇蒙骗了呢？”呆坐了阵之后，对贺、关说：“抓熊贡卿事，你们去办吧。”

当下，贺龙、关向应回到了军部，连夜安排。

这晚，熊贡卿、梁素佛二人，正在坐着升官的美梦。门哗啦开了，二人一下惊醒，梁素佛忙问道：“什么人？”

警卫班长道：“请二位先生起来一下，我们军长有请。”

熊、梁二人刚把衣服穿好，警卫班长一招手，立时过来几个士兵，三下五除二的将二人捆起。熊贡卿大喝道：“不得无礼，我是你们军长的贵客。”

熊、梁二人还要喊叫，战士们用小细麻绳儿把他们的嘴勒起，而后，扔在了屋中一角。就在这同一时间内，随熊而来的五十名扈从，也被缴了械，江奇亦被抓起。正是：

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第二天，红3军开始向桑植方向转移。那熊、梁二人也被押着随军行动。熊贡卿本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之人，哪里能行的了军？走到一个叫七里台地方，熊贡卿爬在地上，死活不走了。人报贺龙，贺龙说：“既然他不想走了，就让他在这地方喂狗吧。”

贺龙说罢，传令部队停了下来，就地召开公审大会，当地的老百姓也被邀请来参加。在这个会上，由贺龙公布了熊贡卿策反的经过，宣读了分局关于逮捕和处决熊、梁的决定。而后，贺龙痛斥了蒋介石、熊贡卿之流的卑鄙伎俩，表示了自己跟党走的决心。接着，关向应、夏曦也讲了话，他们表扬了贺龙的坚定革命立场，号召大家战胜困难，增强革命必胜的信心，历数了熊贡卿、梁素佛的罪恶。这

天，天气很冷，可前来开会之人，心里都很热。红3军的干部战士，无不为贺龙不受高官厚禄利诱而感动。

这时候，熊贡卿早已吓得面如灰土，双腿打颤，把裤子都尿了。

贺龙提高嗓门道："立即执行枪决！"

话音儿没落，几名红军战士便将熊、梁二人押到会场外边。片刻，传出两声枪响，那熊、梁二人便魂游地府了。到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将此情况报告了中共中央。

枪毙熊贡卿、梁素佛，表现了贺龙忠于共产党，忠于人民的革命立场，贫贱不移志的英雄气概。谁料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段历史公案，竟成了打倒贺龙的主要罪状。1968年的5月16日，康生恶狠狠地说："贺龙在历史上就搞投敌叛变，现在不可能没有问题。要把现行和历史综合研究，将其罪状具体落实。"1968年9月18日，审查贺龙的专案组送给贺龙一纸。此时，贺龙正在关押受审，睡的是硬床板儿，床上没有被褥，头顶上大灯泡儿日夜照着他。这天中午，送饭的人推门进来后，便把几张纸扔在了地上，随后，又把掺满沙子和老鼠屎的饭倒在了地上。贺龙看着地上的饭，没有动气，此等事，早已习以为常了。当他拿起地上的纸一看，原来是专案组要他交待熊贡卿赴龙山招安他的"历史罪行"。纸上写的是要他交待怎样通敌，怎样向蒋介石请示改编队伍，怎样同熊贡卿进行谈判，参加谈判的都有哪些人，最后达成个什么协议……贺龙看罢，只气得浑身发抖，把纸扯得粉碎，而后吼道："见他妈的鬼！人都给我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一群狗娘养的！"

第二十三章　“左”倾中央对夏曦的批评

贺龙处决了熊贡卿和梁素佛之后，继续率队向桑植进发。由于湘西王陈渠珍此时与黔军王家烈大战正酣。无暇对付红军，使得红3军在龙、桑边界，竟得以休整半月。

红3军进入了桑植县境，少数团防兵也早已闻风而逃。当下，红3军便在湘西的龙山、桑植、永顺、大庸、慈利数县境内。盲目地流动，夏曦继续清党和抓“改组派”。自从江奇被抓起来之后，夏曦疑心更大了，总说：“江奇是我最信任的人，还是隐藏的敌入，那红3军中改组派，不定还有多少呢？”这么着，夏曦的疑心越大，抓“改组派”也就越起劲。抓得全军上下人心惶惶的，哪里还有心思建设红军和创建苏区？

说话到了1934年的4月初，山山岭岭桃红柳绿，春意盎然。贺龙、夏曦、关向应又带着红3军转到鄂川边游击。这时节，红3军减至2千入左右，创设新的苏区计划不能实现，流浪游击也不是长远

之计。4月上旬的一天，红3军流浪到了利川县的十字坡，贺龙对夏曦说："我们这么流浪不是个法子，野鸡还有个山头，白鹤还有个滩头，红军得有个立脚之地。"

夏曦说："那咱们开个会吧。"

这么着，中央分局便在这十字坡开了会，在这个会上，做出了发展鄂川边苏维埃苏区的决议。计划红军首先攻打川东彭水县，然后向酉阳、秀山、黔江等县发展。部队集合出发之时，处决了江奇，红3军干部战士们听说江奇被处死，无不拍手称快，许多人拥到了江奇尸体前，用脚踏、踢，直把个江奇的尸体，踏成了肉泥。

1934年5月9日，贺龙率红3军经湘鄂边的茅坝、苦竹坪，进入了川东酉阳边境之腰腴、小柏溪等地，大有进取酉阳之势，驻酉阳的川军旅长田仲毅，一面派部队驰赴前方抵御，一面求援于陈万仞师。陈万仞接到了田仲毅的报告，即派陈荣枢、徐耀光两团，星夜驰援。在两团赶到酉阳之时，贺龙却虚晃了一枪，带领红3军，直扑彭水。仅一夜工夫，就到达了彭水，抢占了彭水城。

当天下午，在彭水县府大堂前广场上，召开了群众大会，贺龙以洪亮的声音向群众讲话。大会开得很热烈，许多穷人纷纷要当红军。

这天晚上，中央分局又开了会，贺龙和关向应的意见是：以彭水为中心，把酉阳、秀山、黔江三县拿下，建立新的根据地。夏曦却连说不可，他取来了县志，翻开其中一页说："此处记载，以县城言，背山临水，易攻难守，殊无足取，自来言防堵者，必于南山马倒岩、高颈子、沉坡、关口、卡子等处，固守硐隘，倘此数处有失，则县城不保矣。"夏曦念罢县志，说："彭水面山背水，敌人打来难以应付。"接着，夏曦主张红3军西渡乌江去黔东创建新的根据地。夏曦这么一说，贺龙、关向应也都觉得有理。

川军第5师师长陈万仞接到红3军占了彭水的报告后，当即饬部分三路，分别由丰都、黔江、龙潭起兵，向彭水杀来。这当儿红

3军已弃彭水西渡乌江，陈部遂入彭水。陈万仞又派侦察员探查红军踪迹，很快得知红3军约两师之众，已向担子岩、黄家坝而去。陈万仞取过地图一看，见这些地方已接近黔省，红军大有入黔之意，便派徐耀光之39团守彭水，派13旅旅长达凤岗率两团跟踪追击红军。同时飞电酉阳田旅迅派一团以上兵力抢守龚滩。拂晓，达旅抵黄家坝、河村一带，这时候，红3军已进入黔省后坪一带。后又探得红军分为数路前进，陈万仞觉得红军既已分兵，一时无重大行动，黔境又非川军管辖，遂下令达部回返。

红3军西渡乌江，即进入黔东地区。1934年的5月29日，又向沿河县城推进。31日，到达距沿河县城13公里的粽子岭。当时，贵州军阀蒋丕绪部的傅中恒的一个旅在此，傅中恒得知红军压境，即率主力逃去，留下彭镇瑛一个团驻守沿河县。彭镇瑛闻贺龙兵至，慑于声威，也不战自退，红军随后追赶。彭率兵逃到乌江东岸，红3军遂占了沿河县城，继而乘胜占了沿河县属沙子场。

当时的黔东，仅为乌江两岸、梵净山以北的务川、德江、沿河、印江、松桃一带。贵州历来有“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人无三分银”之说，而黔东一带，人民文化更落后，生活更贫穷。这里山岳连绵，乌江直贯其中。没有公路，没有车道，只有崎岖不平的人行小道。运输全靠人挑肩背，食盐布匹都靠外地运至，农产品外运亦很困难。共产党的基础甚差，神兵却很多，群众对红军不了解，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对这地方也是鞭长莫及，因此，这里没有重兵把守。红3军一入黔东，不光那些团防兵都吓跑了，老百姓也都吓跑了。

红3军占了沿河县城后，6月16日，进驻了沿河县的枫香溪。在这个地方，中共湘鄂西分局召开了红3军发展史上有名的枫香溪会议。部队到达了枫香溪后，红3军的干部战士，都呼吁不能再盲目乱走了。这天晚上，贺龙语重心长地对夏曦说：“我还是那句老话，咱们红军没个根据地怎么行呢？伤病员不能安置，兵源难以补充，部队得不到休整，得不到扩大。”

关向应也对夏曦提出了组织宣传队伍，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的建议。

贺龙又说："蔓伯呀，红 3 军的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要恢复，没有党团组织，没有政治机关，军队就没了主心骨儿。"

关向应接着说："胡子说得对，再有，这里神兵很多，我们要尽量争取，团结神兵到革命队伍中来。"

夏曦默默地听着，他没有像以前似的，听到不入耳的言语，就拧眉毛不耐烦。湘鄂西苏区的丢失，大批干部被杀，红 3 军的战斗力已锐减，军心士气低落，部队东游西转没个立足之地，他也感到了形势的严重。夏曦叹了口气说："就依你们意见，分局召开会议，研究一下下步工作方针。"

1934 年的 6 月 19 日，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在枫香溪的一座木房中召开了。在会上做出了建立黔东特区根据地，恢复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和政治机关，组织干部大队，深入到村寨中发动群众，争取神兵，壮大红军队伍等四项决议。向红 3 军全体干部传达之后，全军振奋。这以后，红 3 军里恢复了政治部，军师团都配备了政治委员。连队配备了指导员。将原来的党团员都重新进行了登记，由于肃反扩大化，许多党团员不敢再登记，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耐心地做这些人的工作。这些同志，才又登记。

红 3 军这时候只有两个师，即第 7 师和第 9 师。贺龙任军长，关向应任政委，黄新远为军政治部主任。7 师师长卢冬生，9 师师长钟炳然。夏曦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关向应很快便组织了几个宣传大队，分头到各地向老百姓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介绍苏区的情况，揭露国民党军阀的罪恶。夏曦又亲自起草了八条纪律，下发到部队，要干部战士坚决执行。为了争取神兵，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四人，以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的名义，联名发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印江各县神坛同志书》的文告，书

中指出了“神兵”英勇斗争而失败的原因，指出了“神兵”的出路是加入红军。

经过广泛地宣传和招募工作，许多“神兵”纷纷投奔红军，其中最大的一支神兵的头子冉水波闻讯，也带“神兵”下山，在枫香溪面会贺龙。贺龙热情相待。那冉水波本有朴素的革命意志，经贺龙一点拨，立即表示，愿带“神兵”加入革命队伍。后来，贺龙便以冉水波这支“神兵”队伍为基础，编成黔东独立师。由贺炳炎任师长，冉水波为副师长。

国民政府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得知红3军入黔，急令其第1旅旅长李成章指挥的第2团、第3团、教导团，开到思南，相机推进，严密防范。又命第3师蒋丕绪所属傅衡中旅，由西进驻沿河一线。命令一下，数路人马，杀气腾腾地直扑向红3军。

红3军自枫香溪会议之后，广大干部战士，积极深入群众之中，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立乡、区、县、特区四级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处决了民愤极大的恶霸，穷人无不拍手称快。1934年的7月21日，在沿河县的铅厂坝，召开了黔东特区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夏曦在会上致词，提出：“要推翻旧的地主豪绅把持的政权，成立苏维埃政府。广大穷苦人民要翻身，决不能再去立神坛，当‘神兵’，要靠自己起来革命。才能打倒地主豪绅，打倒军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代表大会上，提出了实行土地革命、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和苏维埃代表会议、武装工农群众三项任务。提出要组织三万人的自卫队，一万人的游击队，扩红三千。革命委员会的会址设在了沿河县的白石溪土地湾。大会开得十分热烈，自此，红旗便在黔东地区高高飘扬。

就在这当儿，分局派往中央的交通回来了，带来了中央的指示信，其信中主要内容是：因交通断绝，长期没有得到你们的消息。你

们派代表来也未提供充分的材料，信中着重批评了湘鄂西中央分局肃反扩大化和解散党团组织，并批评此举是错误的决定。

夏曦、贺龙、关向应分别把中央指示看完，之后，夏曦连着吸烟，默然无语。这时，交通员又把1934年1月在江西瑞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五中全会决议取出。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临时负责人博古主持的会议，会议错误地断定了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完全胜利的斗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主张和强大的敌人进行决战；在统一战线上，坚持和发展了"左"倾关门主义；在党内斗争上，继续发展宗派主义和过火斗争，打击政策。这次会议，使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尽管如此，中央还是批评夏曦把持的湘鄂西分局肃反过火，可见夏曦"左"的就更厉害了。

当下，中央分局开会讨论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信和六届五中全会的决议，通过了《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1932年1月以来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检查。表示完全接受中央的批评。自此，夏曦对"肃反"和"清党"问题，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

这天晚上，夏曦把贺龙和关向应叫到了屋中，说："我不明白，难道我真的错了？可我执行的，都是中央的指示呀。"

贺龙语重心长地说："是错了，那么多的同志，怎么全是改组派呢？如果是的话，他们为甚不把你杀了呢？为什么那些改组派被抓了还不跑呢？"

夏曦只低头吸着烟说："文常、向应，红3军的事，该怎么办，你们就多拿主意吧，我听你们的。"

贺龙、关向应见夏曦有所觉悟，很是高兴，这一晚，三人谈了许多，谈了黔东的建设，军队的发展。贺龙觉得，这两年多来，同夏曦谈话，还是第一次谈得这么痛快。

红3军在黔东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后，周

围敌人都发了慌。这时候，在黔东苏区的周围，计有李成章旅三个团，铜江驻有柏辉章四个团，酉阳有川军田钟毅两个团，黔江、彭水有达凤岗三个团，印江、沿河原本是黔军廖怀忠的防地。廖本是反王家烈的，遭到红3军打击后，退到了松桃一带，仅有数百人，王家烈亦不给其补充兵源，廖部已无战斗力。

贺龙了解了敌兵的布署之后，采取了对敌各个击破之策。令9师师长钟炳然、沿河独立团团长贺炳炎攻打淇滩，令卢冬生率7师人马用伏兵打击黔军李成章部。红军两路人马得胜后，贺龙又指挥红9师，攻打酉阳的南腰界。一举消灭了南腰界团防冉瑞庭人马，杀了大恶霸冉瑞庭及其子冉崇候。

第三日，适逢8月1日，夏曦同贺龙等相商，决定在南腰界召开军民大会，庆祝"八一"南昌起义七周年。南腰界有个地名叫"翘尾巴"，是个很大的坪坝。大会就在这里召开。头天晚上，战士们便在场上扎好了牌坊，插上了松枝、野花，贴上了红绿标语。坪坝的正面，搭了个台子，两旁插着红旗，一面旗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一面旗上写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黔东特区"。8月1日这天，天气特好，万里无云，红军战士们排着队伍唱着歌儿走到了坪坝中，每人枪口上都插了面用纸做成的三角小红旗儿。南腰界的老百姓，男男女女都来了，四乡寨的穷苦人也都来了，那些做小卖买的，卖凉粉凉面的，都把摊摊儿搬到会场边儿。在台子两边，各有五个号兵，都十五六岁的年纪，铜号擦得亮亮的，垂着长长的漂亮的红穗儿。

到了上午9点多钟的时候，大会开始，十名号兵吹了号，接着，夏曦走上了台。台下的干部战士们鼓掌，老百姓没有鼓掌的习惯，看到战士们鼓掌，也跟着鼓掌。夏曦高声说道："同志们，乡亲们，我们今天召开大会，庆祝南昌起义七周年，庆祝黔东的穷人翻身，庆祝南腰界的解放……"

夏曦本是湖南益阳人，他的话说得又快了些，老百姓大都听不

懂，都直着眼儿望着他。夏曦讲完话，贺龙走上台，他笑着说道："父老乡亲们，刚才这讲话的是夏曦，是我们黔东特区苏维埃主席。他说，要和黔东的穷苦人一起，求翻身，获解放。"贺龙的话老百姓都能听的明白，大家都鼓掌，贺龙又说："你们南腰界，还有黔东各县，老百姓都穷的光光的。穷的连耗都不进屋。为甚穷？是冉瑞庭这些混蛋王八蛋的土豪劣绅压迫的，红军就是帮着穷人解除苦难的。"

贺龙讲完话后，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这天晚上，红军宣传队和群众表演了节目。坪坝的台上挂着两盏明晃晃的汽灯。战士们跳舞唱歌，气氛十分热烈。

第二天，贺龙亲手栽下了一十九棵红花树，以纪念红军解放南腰界。后来，这红花树不但长得很好，而且每年都开花两次，附近百姓都为之称奇。1969 年，贺龙元帅被迫害逝世后，这些"红花"树也于这年内突然相继死去，人们嘴不敢言，心中却感叹不已，暗为英雄含冤而死不平，正是：

只因英雄含冤去，人无情来天有情。

贺龙率红 3 军占了南腰界后，人马稍事休息，又打下了沿河县城。就在这时，有侦察员报告，说红 6 军困在甘溪一带遇险，贺龙听了，急派人马前往营救。

第二十四章　会师后的红二、六军团

红六军团险遭全军覆没

红六军团怎么到了黔东之地呢？原来，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博古等老“左”们指挥下，宣告失败。看看江西立足不住，便令任弼时、肖克、王震率红 6 军团西征，以便打个地盘，使中央苏区有立足之地。1934 年的 7 月 23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向红 6 军团发来了一道紧急电令。电文写道：

> 中央书记处及军委决定，6 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其路线由遂川的蓤塘坳及其附近地域敌军薄弱部分，

自行选择突破地段突围。第一步到达湖南桂东地域，发展游击战争，扩大游击区域；第二步，到达新田、桂阳、零陵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第三步，横渡湘江，向新化、溆浦广大地域发展，并向北与贺龙三军联系。中央军委坚决地指出，绝不允许将这个决定，曲解为放弃湘赣苏区与无计划的退却逃跑。中央与军委责成省委及军政首长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我们队伍中的悲观失望的情绪。准备离开湘赣苏区的部队为十七、十八两师及红校学生、野战医院、制弹修械厂，弼时同志及部分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肖克、王震三人组成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党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

1934年8月7日下午3时，时值夏末秋初，湘赣之地，赤日炎炎，暑气蒸人。这时，红6团九千七百多人，怀着激动的心情，告别了湘赣根据地的亲人，开始从西南全线突围，踏上了新的征途。

红6军团全团人马出发之后，独立第4团为前部先锋。大队人马从新江口地域出发，首先在衙前和五斗江之间，突破了敌刘建绪部的两道封锁线，占领了遂川的藻林。接着，又突破了刘部的遂川至七岭的封锁线。

三道封锁线突破之后，肖克审时度势，不敢犹豫怠慢，他命令各师、团，再接再励，克服酷热、疲劳和饥饿，昼夜兼程，继续向前进击。

这时候，刘建绪等赣、粤之敌，惊悉红6军团已突破了三道封锁线，才如梦方醒。刘建绪断定了红6军团西征的真实意图之后，立即报告了蒋介石，蒋乃急令湘敌第15师和第16师尾追红军主力。令粤敌以六个团的兵力兼程北上，妄图将红6军团包围在桂东、上犹和遂川之间的地区聚歼之。

8月9日，肖克指挥人马占领了左安、高坪，并在猴子岭突破了敌军的最后一道封锁线。于8月11日中午，到达了湖南省桂东县的寨前圩。12日下午，红6军团在寨前圩举行了全军团军人大会，庆祝突围胜利，誓师西征。并正式宣布成立红6军团领导机关，肖克为军团长兼17师师长、王震为军团政委兼17师政委、李达为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为军团政治部主任、龙云为18师师长、甘泗淇为18师政委、谭家述为18师参谋长、方礼明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宣布了以任弼时为主席，由任弼时、肖克、王震三人组成的红6军团军政委员会。誓师大会后，夜幕降临，肖克随即下达了出发命令，在苍茫的夜色中，这支万人大军，以独立4团为前导，浩浩荡荡踏上了西征之路，直奔郴州。时湖南省主席何键急令刘建绪为第4路前敌指挥，驰往衡阳指挥作战，堵截红6军团。红6军团突破八面山之敌重围后，于8月17日，抢占了郴州，接着，又于8月24日攻占了零陵。由于湘江已被敌重点封锁，肖克遂命令部队经阳阴山，绕过敌重兵，占领新田城，经嘉禾西去。

红6军团自西征之后，几乎是天天行军，不得休息，又值雨季，大雨时下时停，许多人走得脚都肿了起来，每天都有许多人掉队。人马过嘉禾后，又经蓝山、道县。在道县以南徒涉了湘江上游的支流潇水。进入湘、桂两省的永安关。守关之敌闻风而逃。

红6军团占领了永安关后，又于当晚抢占了广西灌县的文市。并连夜渡过了灌江，继续向西挺进。9月4日，于界首渡过了湘江。渡江之后，又一鼓作气向兴安县急进。9月8日，抵达车田。这时，接到了中央军委的电报训令，要红6军团沿湘桂边境行动，经绥宁、通道到贵州的锦屏、天柱、玉屏，与红3军取得联系，协同红3军在湘西地区发展苏维埃及游击运动，以吸引更多湘敌于湘西北方面。

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肖克遂率红6军团于9月9日从车田出发，经黄龙、高山地区进入湖南的城步县。这时，红6军团前有敌

八团之众阻挡，后面有两师桂敌紧追。在通道，肖克用伏兵打垮敌一个团，而后进入贵州的黎平县、锦屏县。又经过了剑河县赶到八挂河，因连日大雨，河水猛涨，无法通过，时湘桂之敌又压过来，肖克遂率人马绕过了沅阳河，而后，经过几天几夜的行军，到达了老黄平县城——旧州。

旧州自古以来就是沟通内地与西南边障的交通要道。红军占旧州之后，桂、黔、湘三省之敌又围了过来，肖克见旧州不能久停，便率人马在施秉和黄平间抢渡了大沙河，西进至瓮安县的猴场。在这里，肖克接到中共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

> 桂敌现向南开动，红3军已占印江，6军团应速向印江前进，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

1934年的10月5日，肖克率全军将士，从猴场北进，朝石阡县的甘溪进发。而此时，湘、桂、黔敌也正向甘溪的石阡集结。原来，中央军委的情报有误，湘、桂、黔三省之敌，正布下口袋，等待红6军团，而红6军团丝毫不觉。这重要的敌情，对红6军团的进退存亡，关系极大，而远在江西的中央军委，对敌情全然不知，盲目判断，下达了红6军团北进的命令。结果，使红6军团人马全部陷入重围之中，全团人马被敌切断数处。

这天，任弼时正在发着高烧，躺在担架之上，他听到了四周激烈的枪声，忙问怎么回事，警卫连连长忙说：“政委，前卫部队遇到了敌军抗击。”

任弼时翻身而起，问道：“多少敌军？”

警卫连长答：“情况一时不明。”

任弼时又问：“肖克、王震呢？”

答：“都去指挥战斗了。”

任弼时问：“参谋长呢？”

警卫连长答："被敌人隔断了，联系不上。"

这时候，王震来了，他提着枪，袖子卷着，任弼时见到王震，急问道："胡子，怎么回事？"

王震拧着眉头道："我们撞上敌军主力了。"

正这时，肖克也满身硝烟的走来，他见到王震和任弼时说："我们被湘、桂、黔之敌包围了，部队要迅速突围。"

王震说："部队已被敌兵切断，联络已断，如何突得出去？"

肖克说："能冲出多少是多少，若敌军包围圈完全形成后，我们就出不去了。"

当下，肖克、王震带着身边部队突围。甘溪的四周，全是高山深谷，山势异常险峻。肖克、王震率队打来打去，冲不出敌人的重围。而且人马均被压在了一条山谷之中。说话天色已晚，敌军又于四面山上燃起了火堆。王震对肖克说："部队今夜一定要突围，若待明天，就麻烦了。"

任弼时说："告诉龙云，要他带 52 团，掩护主力突围，突围方向是东北，那里有贺龙的部队，可以得到他们的接应。"

当下，肖克令人叫来龙云，向他交待了任务。之后，龙云带人马向东北方向冲去。结果，52 团陷于敌重围之中，激战三昼夜后，弹尽粮绝，全团官兵大都壮烈牺牲，龙云被敌俘后杀害。红 6 军团主力趁夜色突围，之后，便在石阡、余庆、施秉之间的大山里转悠。这里为梵净山西侧，全是高山峻岭，人烟稀少，物资奇缺，由于山路崎岖难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下。在临近石阡的地方，将士们又因误食桐子油中毒，一个个腹泻不止。

这时候，湘、桂、黔之敌，共二十四个团的兵力，都杀向了红军，肖克、王震率领部队，在这大山中转来转去，只是转不出敌军重围。众人正焦急之际，幸遇一老猎人，带着红 6 军团人马通过一条人迹罕至的谷涧夹沟，才跳出了重围。敌军得知后，都传说红军遇到了山神爷，由山神爷带路，红军才化险为夷。有人向任弼时问起此事。

任弼时笑道："不错，红军是遇到了山神爷，这山神爷就是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红军将寸步难行。"

红6军团主力突围之后，来到了印江的木黄，众将知道这里是黔东苏区的边缘，甚为高兴，便派人四处打听红军的下落。

这当儿，贺龙也派人四下寻找红6军团的主力。10月23日，贺龙率黔东独立师来到了松桃县内的一个叫石梁的地方。人马刚刚住下，有侦察员进来向贺龙报告，说他们听做生意的老百姓讲，印江木黄地方新近来了不少红军，很可能是红6军团的主力。贺龙听了，立即吩咐侦察员，速去木黄侦察，若果真是红6军团主力，马上回来报告。

派去的这两名侦察员，一名赵平，一名赵征。二人接受了任务，请石梁苏维埃的干部张朝泰带路。这工夫，太阳已经西斜。石梁距木黄有三十多里。张朝泰选了一条近路，走在崎岖小路上，天擦黑的时候，三个人就到了木黄。进镇一看，果然有不少红军。他们径直来到了镇内。找到木黄镇上张朝泰的亲戚祝寿康。祝寿康一家人正在吃饭，张朝泰问道："你们镇上来了红军了？"

祝寿康道："是啊，大都是江西人，说话听不大懂。"这时，窗外有两个红军正在墙上贴布告。赵征、赵平一见忙跑出去，看那布告的落款，是"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政治部"。二人一下就抓住贴布告战士的手，说："同志，我们是贺龙部队的侦察员，你们辛苦了。"

这个贴布告的人叫冯柱子，是军团政治部的宣传员。他激动的一下抓住赵征、赵平的手，好半天话才出口："同志，我们可找到你们了。"说着，泪水刷刷地滚了下来。

当下，冯柱子便把赵平、赵征和张朝泰带到了一座庙前。向警卫通报后，出来一位身材魁梧的人，只见这人两道浓眉，一双丹凤眼，炯炯放光。身穿灰布军衣，腰扎皮带、足蹬草鞋、头戴八角帽。冯柱子向他行礼："报告军团长，有两位红3军的同志，要求见你。"

肖克紧紧握住赵征、赵平之手，满面笑容说："谢谢你们，谢谢

红 3 军的同志，谢谢贺龙军长。我们终于到一起了。”肖克又将他们三人介绍给任弼时和王震。任、王二人听说贺龙就在不远处，自然也说不出的高兴。赵征等三人在军团部吃了晚饭，连夜返回报信。

第二天，也就是 1934 年的 10 月 24 日一早，红 6 军团的将士便起身朝石梁与红 3 军会合，一个个都说不出的高兴。往日疲劳，一扫而净。大家行走在山路上，真是快步如飞。

到了石梁村边的圈马河。河两岸，已站满了欢迎的队伍，军号队在前，把铜号吹得震天响。一杆写着：“中国工农红军黔东独立师”的大旗，插在圈马河堤上，大旗迎风招展。田地上站满了欢迎的红军战士，当红 6 军团指战员走到近前时，红 3 军指战员们都热烈地呼起了口号：“热烈欢迎红 6 军团同志们！”“红 6 军团同志们辛苦了！”红 6 军团指战员们也都呼起了口号。一时间，欢呼声，口号声，此起彼落，双方都挥手致意。

这时候，贺龙和黔东独立师的负责同志，见肖克、任弼时、王震等人走了过来，都大步迎了过去。英雄们会面，都紧握双手，一时间，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贺龙拉着任弼时、肖克之手，将众将带到了石梁村边一个平坝子上。

这个平坝子名曰蒋家大田。时值 10 月天气，天高云淡，秋风送爽，刚打完谷子的蒋家大田，时已放干了水，变成了理想的广场。广场上，站满了欢迎的红军干部战士。一面面军旗在秋风中哗哗地飘动。平坝四周，摆满了机枪大炮。主席台是用八仙桌子并排摆起的。肖克、任弼时、王震、贺龙等两军领导人，都站在台上，贺龙挥手大声说：“红 6 军团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不认识我吧，我叫贺龙。国民党反动派咒我是祸龙。我们红军，就是要祸害他们。你们经过长途苦战，来到了贺龙的根据地，你们多么想休息休息，可不行啊，因为我们的根据地在脚板儿上。”

贺龙讲完之后，任弼时、肖克、王震等人也分别讲了话。会场之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建立苏维埃！”“红军万岁！”“红色政权

万岁!”等口号,不断在石梁上空飘荡。正是:

十月里来枫叶红,肖克石梁会贺龙,
双龙从此腾空起,万千红军逞英雄。

任弼时、肖克、王震弹劾夏曦

红6军团与红3军会师之后,当天,任弼时便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电报写道:

二、六军团已在松桃之石梁会师,明日进至酉、秀、印之南腰界,拟在该地休息一短期,六军团之五十二团尚未到,其余编为三个团,总人数约三千二百。士气旺盛,但子弹缺乏。

以目前敌情及二、六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主力由松桃、秀山间,伸向湘西乾城、凤凰地区活动,建立新的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电报发走的第二天,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便带着红6军团主力和黔东独立师,离开了石梁,翻山越岭,来到了川东酉阳境内南腰界。这时,早已得到信儿的夏曦、关向应,还有李达、郭鹏等,带着部队,到三里外迎接。迎接的人们敲锣打鼓,燃鞭放炮,真比庆祝节日还热闹。双方战友拥抱着,述说着革命的情谊。当天,在南腰界的毛洞大田,召开了庆祝2、6两军团会师的大会。

会上，夏曦、贺龙、关向应、任弼时、肖克、王震都讲了话。热烈祝贺这会师的好日子。大会结束时，双方战士都表演了节目。

就在这一天，中央军委给红6军团领导发来了电报，电报却这样写道：

任、肖、王：

A、二、六军团合成一个单位以及一起行动，是绝对错误的。二、六军团应仍单独的按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活动地域发展。各直接受中央及军委的指挥。

B、六军团应速以军委累次电令所规定的地域行，勿在延误。

C、六军团所携带的两个电台，如能修好，望留一部及译电人员给二军团。

军委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任弼时、肖克、王震看了军委的电报后，都觉着两军团在此时无论如何不能分开。当下，任弼时把电报给贺龙、夏曦、关向应看了。贺龙说："还是不分开吧，如今，6军团需要2军团，2军团也离不开6军团。"他沉思了一下又说："我们两支队伍，合成一起，也只有数千人，如今中央军委要我们留黔东，要6军团向乾城、凤凰方向发展。两下分开，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凤凰、乾城那里我很熟悉，那里是陈渠珍的老窝子，反动统治根深蒂固，而凤凰又是全苗区。自清朝苗汉合流以来，那里都是屯田养兵制，每个寨子里都有官田，养有兵勇。民间所藏枪支，据我了解，不下十万支。6军团若进到那里，很难立足。"

肖克听了说："云卿，依你之见呢？"

贺龙说："依我说：我们两个军团还是一起行动，往永顺、桑植

一带发展，那里群众基础好，地理位置好，进可到常德、澧县、沅陵，退可到四川、贵州，且这一带富庶，能养兵马。”

肖克点头说：“云卿言之有理。”

关向应也表态同意贺龙意见。夏曦却没吭声。自打红6军团与红3军会了师，夏曦就有点儿不大自在，因为，对任弼时、肖克、王震等人的本事，他早就有耳闻，如今这些人来了，自己就不能大权独揽了，所以就不说话。贺龙说：“蔓伯，你的意见呢？”

贺龙这么一问，夏曦支吾了一下说：“我，我没意见。”

贺龙不高兴地问：“你对中央军委电报分开的指示没意见呢？还是对两军团合在一起没意见呢？”

夏曦本想说分开好，可他见大家都望着他，只好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

这样，任、贺、夏、关、肖、王诸将领，于10月28日夜11时，联名向中央军委发了电报，电报内容是：

> 军委：
>
> 在敌我力量悬殊条件之下，我们建议二、六军团暂时集中行动，以便消灭敌人，开展新的更有利于两军团将来分开行动的局面。目前分开，敌必取各个击破之策。以一个军团的力量，对敌无必胜把握，集中可打敌任何一个支队，且目前两军在军事、政治上十分迫切要求互相帮助。

翌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了两个军团领导人意见。

这时候，红2、6两军的同志，别提多么的亲密了，时6军团的马匹都丢光了，2军团便为6军团营以上的干部配备了马匹。2军团的许多连队，虽然自己吃不上猪肉，却买了许多猪肉慰劳6军团的指战员，组织人上山去割细软的茅草，送给他们做铺草，拿出自己的草鞋筋子，帮助他们打草鞋。还把四川产的盐巴送给他们。这

些井盐像水晶石一样，6军团的“老俵”们过去从没见过这样的盐，大家回想到在湘赣苏区没有盐之苦，对这些盐，便像宝贝一样小心收起。

任弼时在2、6两军团会师之后，便对红3军的情况进行了了解。他听到了夏曦任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以来，大搞肃反，杀了大批同志，丢失了苏区，解散了党团组织，取消了政治工作，使红军由数万人锐减到三千余人。还了解到夏曦工作作风独断专横，家长作风甚为严重。任弼时便来到了贺龙的住处，二人喝着苦茶，促膝谈心。贺龙说：“红3军自洪湖撤出时，电台不慎丢失后，便与中央失去了联系。”贺龙想起红3军步步失败，许多战友在肃反中被杀掉，心情很为沉重地说：“弼时同志，我不明白，夏曦到洪湖后的言行，明明是错的，怎么中央如此支持他？湘鄂西根据地肃反中，杀了那么多的同志，许多人我很了解，像王炳南、段德昌、柳直荀、宋盘铭等等同志，他们为革命出生入死，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还有，解散党团组织，我从内心里是不同意的。如今在红3军中，提起党、团来，许多人心头还打颤。这次党、团登记，有些人说甚么也不入党。”

任弼时说：“云卿，肃反扩大化，在中央苏区、湘赣苏区，还有其它苏区内，都发生了，许多好同志因而被错杀。湘鄂西分局的肃反扩大化，看来问题更为严重。目前，在红3军中许多错误的方针、政策，必须迅速纠正。不然，红军不能得到发展。”

任弼时同贺龙交换过意见之后，他又找到了关向应、夏曦，分别与这二人进行了交谈。之后，任弼时亲自起草了一道电文，电文写道：

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

夏曦同志领导中央分局，在离开湘鄂西苏区时，执行了退却逃跑的机会主义路线。之后，又执行了取消党团、取消红军中政治组织和苏维埃及群众组织的取消主义，

使得红三军目前只有二百多党员，一些连队无支部，无指导员。在肃反中，十分之九的连以上军政干部，都被当做反革命而拘捕了。由于他的错误领导，使湘鄂西苏区受到很大的损失。在逃出湘鄂西苏区后，夏曦又每日忙于逃命，完全没有创造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心。在湘鄂边，如按敌情和群众条件，均有利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任务，但被夏曦逃跑主义路线而造成了失败。直到现在，夏曦还继续实行退却逃跑路线，在敌进攻黔东苏区时，不去领导红3军及地方武装，动员群众及各方面打击敌人，而是要红军退出苏区。以此引退敌人，放弃打击和消灭敌人的机会，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最近，贺龙率红军到白区迎接六军团时，敌军进入了苏区，夏曦又率兵逃命。以至使新苏区缩小到南北只有六七十里，东西只有三十里之大小。人口仅三万余。地方党的工作，由于夏曦取消主义的错误，经过了几个月的工作，苏区党员还只有五十，团员二十。黔东苏维埃区域和群众工作，没有真正的建立。鉴于夏曦同志错误严重，我们认为，他不能继续担任领导职务，建议中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局军委会主席职务，并提议贺龙为分局军委主席。

任、肖、王

十月二十九日十六时

电报发走了，两天之后，中央书记处和军委回了电。同意任弼时、肖克、王震的意见。并指示2、6两军团，组织新的领导机构，红3军重新恢复红2军团的番号。当下，任弼时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召开了会议，从6军团中，调去了大批干部到2军团内任职，加强了干部的力量。自此，红2军团军团长为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

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原红3军的第7师改为第4师，师长卢冬生、政治委员方理明、参谋长韩克西、政治部主任张平化，辖10团和12团。原第9师改为第6师，师长钟炳然、政委袁任远、副政委廖汉生、参谋长周天明，辖16团和18团。红6军团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时6军团因减员过多，只编三个团，为49、51、53团。又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了红2、6两军团总指挥部，总指挥为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肖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

自此，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将领为首的红2、6军团领导核心已经形成，开始了胜利发展的新时期。

批斗夏曦的丁家溶会议

红2、6军团组成了军团总指挥部，又撤销了夏曦红3军政委和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职务。红3军干部战士们听了，无不拍手称快，像是搬去了压在头上的一座大山一般，精神为之一振。两军团经过整顿之后，八千健儿，真是如虎添翼，战斗力倍增。

就在这时，任弼时、贺龙、肖克接到了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说明中央红军离开了苏区，实行战略转移，正向湖南行进，要2、6军团，策应中央红军的西征。

原来，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对苏区的"围剿"，共调集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以其中五十万兵力重点进攻中央苏区，战术上采取了持久战和堡垒战术，并配合政治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偏那中共中央首脑人物，尽由顾问李德摆布，与敌死打硬拼，排斥与19路军蔡廷锴等的"福建人民政府"的联合。结果，苏区越打越小，兵力越打越少，最后，实在支持不住了，只好离开了苏区，实行

战略转移，打算到湘西，会同2、6军团，建立新的苏区。红军转移开始，蒋介石急布兵马前堵后赶。

任、贺、肖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后，当即进行了研究，贺龙说："黔东苏区虽敌人兵力薄弱，但地瘠民穷，且南北长仅百里，东西长仅六七十里，不宜大兵团作战。乾城、凤凰、永绥一带，是陈渠珍的老窝子，他在那里修筑了一千一百七十多座碉堡，筑了一道长达一百多里的边墙，很难攻破，便是攻破也难以立足，我军当向永顺、保靖、龙山、桑植一带进发，此处群众基础好，且敌军统治兵力薄弱，各派政治势力复杂，建立新的苏区容易。"贺龙稍停又说："打好会师第一仗很重要，是能否迅速建立新苏区的关键。如今，湖南的何键，已被我中央红军吸在了湖南，湖北的徐源泉部，也多散于鄂西南、洞庭湖滨，湘西之敌陈渠珍，数量多于我军，装备也好，但内部派系林立，指挥不一，官无规束，兵无严纪，战斗力不强，我当向永、保、龙、桑一带进军。"

大家都同意贺龙的意见。当下，任弼时留下了黔东特委和一个独立师在黔东坚持斗争。贺龙、肖克便带着八千健儿，从南腰界出发，直奔湘西的永顺、保靖、龙山、桑植一带，接着，乘势占了永顺城。

红2、6军团突然出现在湘西，使陈渠珍慌了手脚，立即于凤凰城召开了紧急"剿匪"会议，成立了"剿共"指挥部，以龚仁杰、周燮卿为正副指挥官，依次以龚仁杰为第一纵队司令，周燮卿为第二纵队司令，杨其昌为第三纵队司令，张德培为第四纵队司令，分四路向永顺进发，要"围剿"红军。

贺龙得知敌四路"进剿"，遂率部撤离永顺城，在龙家寨十万坪的地方设了伏兵，这一仗，大获全胜。共歼敌千余人，俘敌两千余人，并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为两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胜仗。至今，在十万坪地区，尚流传一首歌谣：

龙家寨，十万坪，丛林处处有红军，
满街放的绊马索，白匪跑也跑不成。

1983年12月，年已七旬有余的肖克肖老将军，重返旧战场，满怀激情，挥笔写道：

敢驭黄狮上碧空，青岩列列峻奇雄。
放眼九垓富新气，回首溪州索旧踪。
万坪大捷奠大业，塔卧高碑仰高风。
重别金溪鞍未歇，征途万里仍从容。

十万坪大捷后，红2、6军团重占永顺，继尔攻占了桑植。一时声势大震。旋即乘胜发动了湘西攻势，首先进袭了沅陵。又顺沅江东下，向桃源、常德进军。在浯溪河，击溃徐源泉部罗启疆旅。旋占慈利城。时何键大军将至，贺龙、肖克遂又率队退回大庸、永顺，进行休整。

这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成立，任弼时为书记，贺龙、肖克、王震、关向应、张子意、刘士杰等人为委员。湘鄂川黔边省军区也同时成立，贺龙为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委。此外，还成立了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贺龙任主席，夏曦、朱长清任副主席。省委、省军区、省革命委员会机关，都设在大庸县的永定镇。

省委成立之后，任弼时当即以主要力量，抓紧做好省委的各项工作。建立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各级临时政权，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组织地方武装，广泛进行战斗动员。这时候，6军团由于几个月的连续行军作战，减员很大，且部队相当疲劳，2军团内部由于夏曦错误所造成的恶果，急待清除。任、贺、肖等经过计议，部队进行了休整。

1935年1月27日晚上，大雪纷纷扬扬地下着，不一会儿的功夫，沟沟坎坎，山山岭岭，都被大雪填平，在大庸县的丁家溶村头的一座老爷庙的大殿之中，生了几盆炭火，红2、6军团的领导干部、各团营的代表，都来到了这大殿之内，参加批判夏曦的错误的会议。但见那夏曦，穿着件青布棉袄，头戴一顶旧毡帽，捅着个袖口，坐在关老爷像前，低着头儿，听着大家的发言。任弼时主持了会议，他很严肃地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开会，帮助夏曦同志。夏曦同志自任湘鄂西分局书记、红3军政委以来，所犯的错误十分严重，是对3军指战员和湘鄂西苏区人民犯下了罪的。夏曦同志在肃反中，搞了扩大化，杀害了许多无辜的同志。又擅自解散了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这些后果，起到了毁灭苏区、毁灭红军、帮助国民党反动派的作用。"任弼时停顿了一下，又说："对待夏曦同志的这些错误，不仅是批评教育他本人的问题，还要在部队中彻底消除影响，这方面，我们还要做许多工作。我听说有不少连队在搞党员登纪时，一些党员不敢承认自己入过党、团，他们怕以后再当改组派被抓起来。所以我们要做工作，把这些错误的东西，从我们军队中清除出去。"

任弼时讲完，贺龙面对夏曦说："夏曦同志，你想一想，湘鄂西中央分局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是怎样垮下去的？不是敌人搞垮的，是我们自己搞垮的，你夏曦要负主要责任。你不相信群众，不相信红军的力量，在敌人进攻面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没有决心创造苏维埃根据地，使红军长期过着游荡的生活。你肃反杀人到了发疯的地步，最后，竟连段德昌、王炳南、宋盘铭、叶光吉，甚至连牺牲的周逸群，你都不相信了，竟说他没死，是改组派的主要头头。可怜他壮志未酬，便告别了人世。"贺龙说到这儿时，想起这 些能征惯战的战友，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难过，话堵在喉咙，一下说不出来了。

贺龙的言语，勾起了到会人的无限伤感。特别是2军团的代表，想到夏曦给革命带来的祸害，气都不打一处出。有的战士还拿来了一根大棍子，往地上一扔，接着高声喊道："打死夏曦！"

这时候，夏曦吓得浑身如同筛糠，脸儿一阵白一阵黄，一个劲儿的说："我有罪，我该死。"

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同志都发了言。代表们也都争先恐后发言，这个说夏曦没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那个说夏曦是右倾逃跑主义。夏曦开始不发言，可到了最后，他委屈地说："你们大家说我没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这是不对呀，我是坚决地贯彻执行四中全会路线的。"

夏曦这么一分辩，有人立时喊道："夏曦，你不要诡辩，你就是没有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就是取消红军和苏维埃，再诡辩就打死你！"

又有不少人呼喊道："打死他！打死夏曦！打死这混世魔王！打死这国民党的刽子手！"

红2军团的指战员，可真把夏曦恨透了，可以说是恨的咬牙切齿。他们对夏曦这些年的一意孤行，是敢怒不敢言，甚至是不敢怒不敢言。因为谁要对夏曦稍露不满，夏曦一句话，就可以要命。大家只得把满肚子怒气，压在心底。如今，好不容易盼到了今天，盼到了有人撑腰，才敢吐胸中之气。有个代表叫马全有的，是红2军团中的一个营长。他起身走到夏曦面前，将身上的棉衣脱掉，露出了肩胛骨。只见他那左右肩胛骨上都有很大的疤痕。马全有指着这伤疤说："夏曦，我马全有十七岁就参加了赤卫队，十八岁当红军。立了多少战功，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了。段师长被你杀害了，我说了句段师长不该死，是好人，不知怎么被你知道了，你派人抓了我，把我关进了特别连，用铁丝穿进我的肩胛骨，我这骨肉被穿透化了脓，生了蛆，亏得6军团老大哥部队来了，我才拣了这条命。"马全有说着，眉毛挑起，两眼圆睁，攥着拳头就朝夏曦打去。眼看那拳头就要落在了夏曦的头上，却被一条胳膊挡住了，拳头重重地打在了这人的胳膊上。马全有一瞅，拦住他拳头的是贺龙。马全有咬牙切齿地说："军长，不要拦我，我打死他，给同志们报仇，这夏曦太坏

了，太坏了，我要打死他！"

会场之上，那些红2军团的代表们也都一齐吼道："打死夏曦，给同志们报仇。"

有的人喊着，把砖头朝夏曦扔去，一块砖头打在了夏曦脸上，把夏曦打了个乌眼青。疼的夏曦立时哎哟起来。贺龙、肖克等人见此情景，急忙用身子将夏曦挡住。任弼时挥手道："同志们，大家不要激动，夏曦的问题，组织上会正确处理的，我们是红军，不要搞以牙还牙的江湖式的报仇。我们要从夏曦的错误中找到教训，继续前进。"

任弼时的话，把大家的情绪慢慢地稳了下来，心平气和地为夏曦提意见。会后，任弼时又针对红2军团的实际情况，明确定了红2军团建设的任务。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发展党组织，确定和巩固政治委员制度，健全政治机关，加强连队支部工作；注意培养提拔和使用工农干部，加强部队的阶级教育，提高指战员的军政素养；努力扩大红军队伍，创造新的师团。

丁家溶的会议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还不能认识夏曦犯错误的"左"的实质。夏曦本来忠实地执行了四中全会的错误路线，却用了他反对四中全会的提法，所以，夏曦挨了批评，被撤销了党内外的职务，他自己还一肚子委屈，暗生闷气呢！真可谓：

错误根源在王明，夏曦只是应声虫，
如今夏曦挨批判，满肚委屈说不清。

枪毙刘士杰

任弼时主持开罢批判夏曦错误的会议之后，就到了春节了。红

2、6军团连打胜仗，新苏区创建的局面也已打开，因此，这个春节过得挺热闹。后勤部门搞来些酒肉、会餐时十人围一圈儿。一瓦盆炖猪肉，一盆烩豆腐，每人一大碗米酒，大家吃的都挺高兴。除夕之夜，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坐在了屋中，围着炭火，谈古论今，谈到"九·一八"事变，谈到全国抗战的高潮即将到来，大家不由得热血沸腾，革命决心愈加坚决。这时，有副官带进来一个三十来岁的乡下普通妇女。她衣服上、头上落满了雪花儿。脸上还挂着涔涔的汗水，贺龙起身迎过去笑道："秀姑，这大年三十的晚上，你跑来做甚？"说着，转身对任弼时说："她叫秀姑，是桑植县委的。"

秀姑从怀中取出了一封信说："这是张启龙写来的，要我交给任政委。"

任弼时遂将信接了过来，看罢，不由得怒目圆睁，拍案喝道："真是岂有此理。"张启龙写来的是一封甚信呢？这里有段情由。

前文述过，省委委员刘士杰，本是个心地歹毒之人，一天到晚的老是琢磨着整人，王首道任湘赣苏区省委书记，刘士杰在博古处告了王首道等人的阴状，状告成功，王首道等人均被撤职，刘士杰、陈洪时等掌了湘赣省委大权，正在高兴之际，偏偏此时任弼时来到了湘赣任省委书记。任弼时一身正气，没听刘士杰小人之言，把套在王首道等同志脖子上的枷索给卸开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平了反。刘士杰自然满肚子不高兴，便和陈洪时勾搭一起，整日的暗地里嘀咕如何整治任弼时，还没容他们想好法儿，红6军团西征开始，陈洪时留在了原地，刘士杰随队西行，整日行军打仗的，他也顾不上算计任弼时等人了。红2、6军团会师后，刘士杰一瞅，两个军团里边的人，都是向着任弼时的，想挑拨事儿吧，没人听自己的。任弼时的威信越高，刘士杰就越生气，批夏曦的时候，别人都很激动地发言，刘士杰却没吭声。会后，刘士杰对夏曦说："老夏，他们对你这么批判，也不公道，你有什么错儿呢？你执行的都是四中全会的路线，执行的是中央的指示。如今红军和苏区出了问题，都拿你一

个人开刀，这不公平。你得向中央反映，向共产国际反映。”

夏曦叹了口气说：“士杰，谢谢你的好意，不管怎么着，我也有错误，至少对中央指示精神理解的不够。”

刘士杰见夏曦已是马尾巴拴豆腐，提不起来。便以省委委员名义，到桑植县巡视工作。适逢张启龙也在，虽然刘士杰把张启龙整了，可张启龙并没计较这些，对刘士杰还是那么热情。刘士杰却不大愿意搭理张启龙，一天到晚的阴沉着脸，像是谁欠他钱不还似的。这一天，刘士杰闲着没事儿，翻看国民党出版的报纸。突然，他的眼光落在了一条消息上。这消息说陈洪时当了国民党江西省的招募专员，发表了“弃暗投明”的文章。刘士杰看着报纸，心说：“陈洪时怎么跑过去的呢？这消息是真是假呢？”他小眼珠儿一转，暗道：“没错儿，消息是真的。”

原来，红 6 军团西征之后，在湘赣边区留下了五个独立团的武装力量，约有三千人，加上各县的游击队总共有五千人枪左右。湘赣省委书记为陈洪时。这当儿，进攻湘赣苏区之敌，仍有五个师以上，敌军一面大筑碉堡，步步为营，继续“围剿”；一面大搞“自首自新”，引诱革命队伍内意志不坚定的分子投降。到了 8 月，湘赣苏区的红军，由于处在四面被围的境地，又无主力部队参战，加之敌我力量悬殊，湘赣根据地遂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湘赣省委和省军区一起，转移到了武功山中，继续坚持斗争。这时候，陈洪时一看，中央苏区也丢了，四下里都是国民党的重兵，革命已无指望，说不定哪一天脑袋就丢了，好死不如赖活着，他越想越胆怯，后来，跟老婆一商量，就下了叛变投敌的决心，带着老婆、医生、译电员、特务班长，到了萍乡投敌。他将密电码、军用地图、文件、省委公章，还有枪支弹药等等，全都交给了敌军。还向敌军供述了湘赣省各方面的情况，又带着敌军搜山。蒋介石得知陈洪时投降了，亲自接见了他，委他为“招募专员”，让报纸公开发表陈洪时“弃暗投明”的谈话。

刘士杰从报上看到了陈洪时投靠国民党的消息后，也动了心

了，暗道："干共产党这一套，啥时候才能荣华富贵？再说，我在共产党里也不吃香了，跟着他们受这个罪做甚？我只要到了国民党内，凭着我在共产党里的这个身份，弄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做做，怕是不成问题。"刘士杰主意打定，便琢磨着怎么走，想来想去，想了个主意，当下，他找到了张启龙，跟张启龙说："启龙，这两天，从津市澧州过来的老百姓，都说敌军派来了兵马，要'围剿'红军，我打算带一个连去侦察一番，搞来确切情报，免得我们措手不及。"

张启龙说："派侦察连去吧，你就不必亲自去了。"

刘士杰却坚持一定要去。说要亲自去把敌人"围剿"的企图搞清楚。张启龙见状，也就没再过于阻拦。

当天，刘士杰便带着个侦察连，向津市、澧州方向进发。这个侦察连的连长姓杨叫杨瑞义，二十三岁，精明能干。他是红 6 军团的人，担任连长已三年了。曾数次只身打人敌人内部了解敌情，被誉为侦察英雄。刘士杰为湘赣省委书记时，亲自为杨瑞义挂过红花。如今，杨瑞义听说跟刘士杰一起行动，很是高兴。当天夜里，刘士杰便同杨瑞义和侦察连出发了，走到江垭，侦察连休息时，刘士杰便劝杨瑞义，要杨瑞义和他一起带着侦察连，叛变投敌，去享荣华富贵。刘士杰把这话头一露，杨瑞义可就火了，当时就把刘士杰抓了起来，又连夜返回了桑植，将刘士杰意欲投敌叛变的情况，报告了张启龙。张启龙一听，心说："怪不得你刘士杰一定要亲自去，原来你另有打算呀。"忙修书一封，派了在县委工作的秀姑连夜送到了省委，并叮嘱她要亲手交给任弼时。

话转回头。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诸将领看罢张启龙的信后，都很恼怒，贺龙把烟斗往桌上一磕说道："对待这样的叛徒，两个字，枪毙！"

任弼时表情严峻地说："派人把刘士杰押到这里，我要亲自审问，若事实确凿，就地正法。"

第二天，刘士杰就被押到了大庸县省委所在地，任弼时亲自审

问，刘士杰在铁证面前，只得承认，而且一边说着，一边打自己的嘴巴，哭喊着要任弼时宽恕他。任弼时说："我能宽恕你，可革命不能宽恕你。"随及，任弼时令人将刘士杰押到野地里，执行了枪决。

王首道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

"最主要的是当时党中央犯有极'左'路线的肃反错误。这不是哪一个苏区的问题，当时党中央派去各苏区的领导干部，传达贯彻苏联格别乌（即保卫局）的肃反经验，加上当时斗争环境的险恶，便在全国各苏区都发生各种反革命派问题。首先在福建闽西苏区发生社会民主党问题，在中央苏区发生 AB 团问题，在鄂豫皖和湘鄂赣苏区发生改组派，第三党问题，最后在陕甘宁苏区发生反革命右派问题。革命的实际证明，实际上许多所谓反革命派大都是极'左'路线下的保卫局少数人用逼、供、信方法制造出来的。所以肃反工作的路线错误，不是哪一个苏区，哪一个人的问题。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许多负责人觉悟起来，才能逐渐改正。我个人是受过'左'倾路线处分的，在长征途中我看到许多被怀疑的 AB 团等反革命的人，艰苦跋涉，仍然跟着党闹革命。特别是我的战友张启龙，他被怀疑为反革命，被保卫局监视着，历尽艰辛，仍然跟着红军干革命。当我和王震、张启龙等长征胜利后在延安相见，互相叙谈湘赣苏区历史时，我们都说过刘士杰、陈洪时的先后叛变致死，而我们仍然健在，朝气勃勃，历史公正的考验，是真假革命的最好证明。"

毛泽东不同意罢夏曦的官

按下红2、6军团休整不提。再说何键与徐源泉，自贺龙、肖克率领红军发动湘西攻势之后，这湘鄂两省的国民党的主席，都急急地到了南京，向蒋介石告急求援，蒋介石听罢，也自然是焦急。急命陈诚组织湘鄂川黔四省边区“剿共”总司令部。对湘鄂川黔边境的红军，进行“围剿”。陈诚接了蒋介石的手谕，立即到了武汉，将湘鄂两省的军队，编为两路军、七个纵队。湘军刘建绪部为第1路军，鄂军徐源泉部为第2路军。七个纵队的布署是：陈耀汉纵队由新安、石门向桑植进攻；郭汝栋纵队由慈利沿澧水北岸向大庸进攻；李觉纵队由龙潭河沿澧水北岸进攻；陶广纵队以第62师主力经军大坪、四都坪向大庸进攻；章基亮第16师向永顺进攻；徐源泉纵队和张振汉纵队由来凤、龙山向塔卧进攻，陈渠珍纵队由乾城、凤凰向永顺进攻。这七个纵队合击的目标，第一步就是大庸。包围圈完成之后，便在环形线上，构碉筑堡。碉堡为子碉和母碉。母碉均为砖石砌成，外有宽大沟壕。子碉材料以木料为主，中间筑土，外面涂一层厚厚的泥料，以防火攻。这些做法，都是江西“剿共”的经验，如今搬到这里使用。

就在陈诚指挥湘鄂两路敌兵杀气腾腾地直扑湘鄂西、要与红军决一死战时。1935年的2月11日，任弼时、贺龙、肖克又收到了中央的电报。电报指出：

> 你们应利用湘鄂之敌指挥上的不统一，与何键部队的疲惫，于敌人离开碉堡前进时，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的弱点，不失时机的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的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

> 战，辅助的力量是游击队和群众的武装活动。对敌人需要采取疲惫、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

电报又指出：

> 你们活动的主要地区，是湘西、鄂西，次是川、黔一部分。当必要时，主力可以突破敌人的围攻线，向川黔广大地区活动，甚至渡过乌江，但须在斗争确实有利时，方才采取此种步骤。

电报还写道：

> 夏曦确有错误，但不能说他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夏曦应继续留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

电报最后指示，确定在湘鄂川黔边根据地建立军事上的集体领导。以贺龙为主席，以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夏曦为委员，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

任弼时、贺龙、肖克诸将领看罢电报之后，都愣了，这电报的精神和军委以往的指示，是大不相同。以往是一味的强调红军打阵地战、寸土必争，现在要求打运动战，夏曦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以往定撤职无疑，现在还要任用他，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任弼时吸吸嘴唇对贺龙说："云卿，中央军委这个电报指示精神，突然改变了以往的行动方针，这其中定有缘故。"

肖克想想说："再发个电报，问问中央军委最近有什么变化没

有。”

任弼时同意，当下，便向中央军委发了电，问明原因。中央军委很快就回了电。大家看了电文，都不由欣喜不尽。

原来，一件关系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大事，在中共中央内发生了，这就是遵义会议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凄楚楚的歌声

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在临时中央和李德的错误领导之下，彻底失败了。到了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看看实在保不住了，博古、李德便下令，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也就是万里长征开始。大队人马于10月中旬从瑞金出发。出发之时，那李德又强令部队采取“甬道式”搬家方式，他下令1、3军团为左右前峰。8、9军团在两翼掩护。5军团做后卫压阵。中间是军委总部和中央纵队。除此以外，还把苏区内所有的坛坛罐罐，全部带走，连十几个人才能抬得动的印刷机和制造枪械的笨重机器，也随之转移。红军向西一行动，蒋介石便急急地四下派兵追堵。红军只得边走边打。但是，有那么多笨重的辎重拖着，如何走得脱？因此损失惨重。那些笨重的物品，只得边走边扔，渡湘江之时，连电台发电机，蓄电池和上光机都扔掉了，有的挑夫、战士跑了，加上战斗减员，出发时八万红军，很快失去了五万多。

顾问李德面对这种情况，却老和尚摆手——没咒念了。整天的拉着个脸子，不是唉声叹息，就是训斥骂人。

中央红军进入湖南后，李德和博古要红军开赴湘西，与贺龙部会合。蒋介石发现了红军此意图后，就把二十万大军配置于零陵至祁阳间，同时，分令桂、粤军阀配合，形成了包围圈，想把红军聚歼于兰山、江华地区。面对此险恶之敌情，李德、博古却像没有看到一

般，依然要红军继续前进。眼看三万红军就要进入虎口，就在这时，中共中央军委在湖南通道开了个临时会议，会议吸收了毛泽东参加，毛泽东分析了形势，说中央红军要坚决放弃与2、6团会合的目的，应向贵州进发，去打王家烈。王家烈的军队都抽大烟，战斗力弱。这当儿，大多数与会者也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因屡次遭挫，已束手无策了，也只得同意。这样，中央红军便转向了贵州，把蒋介石布防的重兵，都远远地甩在了后边。之后，中央红军顺利地攻克了黎平、老锦屏，继而占领了剑河县城，1935年1月3日，红军又强渡乌江。1月7日，占领了遵义城。就在这遵义城中，中共中央召开了对中国革命前程具有决定意义的会议，就是遵义会议。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由于红军屡遭失败，大家对李德、博古等人的指挥，已十分的不满。张闻天严肃地批评博古的同敌人硬拼战术，是在断送红军、断送苏区。博古听了，勃然大怒，说张闻天同普烈汉诺夫一样，二人竟争吵起来。李德便过来相劝，张闻天气呼呼地用中国话对李德说："你这李德四六不懂，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事，不能再由你来管！"

遵义会议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召开了，开会的地点在原黔军25师第2师师长柏辉章原来的住宅。

1935年1月15晚上7点半钟会议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总书记秦邦宪，也就是博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陈云、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凯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第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第3

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第5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共产国际派驻中国共产党内的军事顾问李德,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列席了会议,李德的翻译官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

这屋里泡子灯擦得明亮,房内点燃了几个木炭炉,外面雪花纷飞。第一发言的便是博古,他讲得是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博古承认反"围剿"失败了,可不承认是战略方针上的错误,而是强调帝国主义列强通过给蒋介石的大量借款,提供现代化的援助,使得蒋介石建立强有力的军事优势,红军在执行正确的战略上,犯有战术上的错误。接着发言的是周恩来,他显得心情很沉重,说:"同志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我们战略上犯了错误,我们不该同蒋介石打阵地战、打消耗战、打寸土必争战。敌兵数倍于我,我们当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敌人的进攻。另外,在对待蔡廷锴的19路军的策略上,我们也犯了错误,失去了一条膀臂。我是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委,我有一定责任。"

周恩来的发言,大家都感到很诚恳。接着,便是毛泽东的发言。毛泽东一向不喜欢最先发言,毛泽东很严肃地说:"博古同志的发言,我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把手一摆道:"博古把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归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的强大,这是没有看到错误的实质。蒋介石在第五次的'围剿'中,采用了持久战和堡垒战。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战术,应该是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和大部,以便达到各个击破敌之目的。而我们却以单纯防御的路线,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这就使得敌人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毛泽东稍停一下,又说:"我们红军在数量上,是劣势,我们的苏区,在中国也只是一小部分,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及特种武器,我们还处在内线作战的环境,当敌人向我们大举进攻时,我们的战略路线,是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的力量,但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我们在第五次反'围

剿'中为抵御各方面敌人的前进，差不多经常分散兵力，这种分兵的结果，就使我们经常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由于单纯防御的路线，还有李德同志的短促突击的理论，使我们从运动战转为阵地战，这对红军却极端的不利。"毛泽东讲着，会场上很静。每个人都仔细地听着毛泽东的发言。毛泽东继续挥着手说："在持久战与速决战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志的认识上也是错误的。必须看到，中国国内的战争，不是一个短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战争。苏维埃的革命，就是要在不断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利用反革命内部矛盾，也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福建19路军事变，完全可以为我所用，面博古同志却在'左'的空谈之下，失去了这支可借用的力量。再有，在战略突围的行动上，在李德与博古同志的心目之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搬家式的行动。当红军到了湘黔边境，在当时已极不利于我的情况之下，李德同志还是机械地要向2、6军团靠拢，这一错误，虽经政治局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纠正了，而李德等则表现出战略问题上的一贯机会主义倾向。"毛泽东停了一下又说："另外，博古同志，特别是李德同志的领导作风，也很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均由李德包办，把军委集体领导取消，虽然军委内部大多数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出了正确的意见，面且发生过多次的争论，可李德和博古对此漠然置之，完全忽视，而且采取了压制的方法。"毛泽东讲到最后，说："苏区的丢失，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博古同志要负主要的责任。"

毛泽东讲完话后，凯丰马上拍案而起，说道："毛泽东，你张口博古、闭口李德，把他们说的这也不是，那也不是，你应该知道，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博古同志也是吃过洋面包的，我问你，你读过几本马列？不就是读了点孙子兵法，就在这里指手划脚。"

凯丰本名叫何克全，在莫斯科学习时，同王明、博古的关系甚密，自诩为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一向瞧不起毛泽东，认为毛泽东没

到过法国、俄国，眼界不宽，农民意识严重。他刚说完话，王稼祥便挣扎着坐起发言。王稼祥在瑞金时，一次遭到敌机轰炸，负了伤，由于治疗不及时，伤口久久不愈。长征之后，一直坐在担架上，被人抬着。王稼祥以前同王明、博古的关系很好，自打第五次反“围剿”后，王稼祥对博古、李德，乃至在莫斯科遥控的王明，意见越来越大。长征路上，毛泽东患了疟疾，也躺在担架之上，一路行军，二人躺在担架上，不断的进行交谈。毛泽东的一番苦口婆心，终于改变了王稼祥的态度。在红军进遵义之前，王稼祥就提出应该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还同张闻天交换了意见，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的领导职务，改由毛泽东领导。张闻天很同意王稼祥的意见。王稼祥说通了张闻天，又同聂荣臻谈话。时聂荣臻因为脚受伤也坐在担架之上，两人一交换意见，英雄所见略同。这样，红军一占领了遵义，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召开了。

王稼祥听了凯丰的发言，当即坐起，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坚决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王稼祥发言之后，张闻天、朱德、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都相继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朱德竟站起身说：“如果博古、李德继续担任领导，我们不能跟着走下去。”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晚上。博古只是沉着脸听着，李德坐在会议室门口，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伍修权为他不断翻译。伍修权早就对李德的言行不满。这会儿，也不仔细地为他翻。到了第三天晚上，李德发了言。李德说：“我本是个顾问，来中国么，也无非是给你们提提建议，你们中国同志把事情搞坏了，怎么往我身上推？”

李德的发言，大家也没同他做计较。最后，周恩来提议，停止由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的工作。周恩来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拥护。林彪本来是赞成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大家批评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的。在 1934 年 6 月，林彪还写了篇《论短促突击》的文章。他一瞅，会上大家都赞成毛泽东的意见，立

时表了态，支持毛泽东。真个是：

如同墙头草，随风两边倒，哪边根子硬，就往哪边倒。

遵义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一、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三、取消“三人团”，由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指挥者。

会后，常委们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接着，又组织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军队，自此，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

话转回头。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诸将，得知毛泽东担任领导职务，都很高兴，任弼时手拿着电报，长出了一口气说：“早就应该这么做了。”

贺龙吸着烟说：“毛泽东我没见过，可他的许多主张，我觉着都不错，如今由他来做领导，红军前程准错不了。”

肖克说：“贺胡子，毛泽东直接领导过我，他的水平，非常人可比。”

任弼时说：“我们现在就回电，坚决拥护中央的决议。”说完便起草了电报，众人过目之后立即发出。而后，任弼时又提出讨论一下安排夏曦工作的事。

大家讨论了一番后做出决定，夏曦除了任湘鄂川黔省委委员，再担任红6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得知此情况后，不由得热泪盈眶，他握着任弼时的手说：“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如今，党不嫌弃我，我一定干好工作，将功补

过。”

正是：

人非圣贤，岂能无过？知过便改，方为上人。

后来，在红2、6军团长征抵贵州毕节城时，组织上派夏曦去驴头山做土匪胡魁兴弃暗投明工作时，不料胡魁兴反了水，追杀夏曦，夏曦在逃跑中落水而死。红6军团的指战员听说夏曦死了，都很感慨，且很悲痛，有许多人还失声痛哭，缘为夏曦在红6军团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大家都感到他平易近人，态度和蔼，而且很有水平。红2军团的指战员听说夏曦落水而亡，都反应冷漠，特别是经过肃反的人，对夏之亡都有一种解气之感。后人有诗叹夏曦道：

周公恐惧流亡日，王莽谦恭下士时，
夏曦当年若早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夏曦既为革命而死，贺龙派人找来一副土豪的棺材，将夏曦尸体入殓，而后埋在了一面向阳的山坡上。

任弼时等知道了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非常高兴。这当儿，各路侦察员都急报军情，说陈诚在宜昌设指挥部，指挥十万兵马，正向永顺、大庸、桑植杀来。当下，英雄们召开了军事会议，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研究了如何粉碎敌人“围剿”的计划。

按照计划，红2、6军团主动的撤离了大庸县城，开到了后坪，埋伏在鸡公垭的要隘两侧，打算伏击湘军李觉人马。由于守鸡公垭高地的50团没按作战计划行动，结果红军吃了大亏，伤亡了九百余人，只得退到永顺的塔卧一带。时中央军委继续来电，指示红2、6军团继续在湘西一带寻机歼灭红军。这样，任、肖、贺便按照军委

指示，定出了新的行动计划。决定向西北方向走，以求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歼灭敌军。在陈家和，红2、6军团人马与陈耀汉的一旅人马遭遇。双方激战后，红军大胜。接着，偷袭了桃子溪，将陈耀汉一纵队人马几乎全部消灭，仅陈带一连人逃脱。

4月底，肖克、贺龙又指挥人马向东反攻。包围了宣恩，准备围而不打，以宣恩为诱饵，打击援军。时有敌张振汉师由龙山经忠堡解宣恩之围。贺龙得到此情报，即于忠保埋伏了人马，伏击了张振汉师，将该师全歼，并将张俘虏。

忠堡伏击战后，1935年6月23日，贺龙、肖克又指挥红2、6军团，将龙山包围，只一天便将龙山拿下。红2、6军团的连续胜利，吓坏了在湘鄂边"剿赤"的各路人马，一个个均裹足不前。时南京政府又从江西调来了谢彬85师一师人马。谢彬是少壮派，不把红军放在眼内，结果被消灭在板栗园，谢彬也身首异处。8月8日，红2、6军团又在龙山的芭蕉坨，击溃了湘军陶广的1个团。这样一来，敌兵在湘鄂西的攻势，只有防守之功，无有还手之力。红2、6军团遂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当下，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等一番商议，决定以突然之举，突入津市澧州，且速进速退。

1935年8月12日，贺龙、肖克各率本军团人马，经桑植洪家关、走马坪、江垭等地，向津、澧开进。8月23日，卢冬生指挥红4师包围了津市，贺炳炎指挥红6师，逼进了澧州。一番激战后，均将津澧打开。时南京方面大惊，急调重兵前往"围剿"。面对强敌，红2、6两个军团停止了东进，主动撤离了津、澧，回师石门、新安一带休整。

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等等将领，在石门县磨岗隘，召开了红2、6两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就在这当儿，突然接到了周恩来发来的明码电报，询问红2、6军团的情况。接到这个电报，众将都很高兴，两个月之前，红2、6军团同中央军委的联系就

中断，今突接周恩来的电报，当然高兴，但不明白周因何用明码，任弼时当即用密码致电周恩来，寻找中央军委，电报写道：

周：

我们8月27日占领了澧州、津市、石门、临澧。现已退出，正准备粉碎敌人对我们进行新的大举进攻。你们现在何处？久未联络，甚为焦急。请于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十时

有人问了，任弼时所发的这份电报，为甚要对方说明省委委员姓名？这也是他的心细，免出差错。

任弼时将电报发出之后，第二天收到了朱德和张国焘的回电，电文是：

朱德、张国焘复弼时同志：

一、29日来电收到。

二、你们省委为弼时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委员。

三、一、四两方面军于6月中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红军总政委。

四、广播中知蒋敌已在宜昌建立湘鄂川黔行营，刘湘也已调许绍宗师九个团进攻你们。

五、望你们以英勇机智和丰富经验，冲破新敌的围剿。

六、我们今后互相密切联络。

一九三五年九月廿六日二十时

任弼时等接到这份电报，都很高兴，一来同中央联络上了。二来1.4两方向军会了师，革命力量强大了，他们哪里知道此刻张国焘所搞的分裂阴谋?这时，贺龙皱着眉头道："怎么让张国焘当了红军总政委？这个人阴阳怪气的。"

任弼时笑道："文常，人总是不断变化么。"

当下，任弼时找来地图，众将一起从图上寻找到懋功的位置。接着，任弼时便把红2、6军团打算转移到新区，以保卫老区的设想，电告了朱德、张国焘。10月15日，朱、张又回了电，电文道：

朱、张复任、贺、关、肖：

一、请按实际情况，由你们自行决定，必须秘密迅速出敌不意。

二、在现小地区内固守失策，决战防御亦不宜，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原包围线外原有苏区附近，诱敌出堡垒，然后集中全力以击破之？上述意见供参考。

三、我主力仍在川西北活动，当尽量与你们配合。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

接到朱德和张国焘的电报，任弼时、贺龙诸将军，根据敌己双方势态，对于红2、6军团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反反复复的研究。大家认为眼前十倍于己的敌军不断逼近，根据地日益缩小；四周都有敌重兵，固守亦不可能；到敌军包围的外线作战，原有苏区附近的地理条件和敌兵力部署情况，也于己不利。往北发展，有清江和长江之阻；往西敌军兵力又较强，且又修筑了许多碉堡，在乌江沿岸，亦有重兵把守。往东更不行，东面靠近长沙、武汉，敌人布有重兵不说，且湖泊水网地带，大部队兵力无法展开；南边敌兵虽弱，却有澧水、沅水相阻，即使突出，若不远去，也无法立足。若红军长期失去根据地的依托，在强敌面前转来转去，无法发展。1935年11月4

日，任弼时、贺龙、肖克等众将，在桑植县的刘家坪召开了会议，最后确定，红2、6军团，实行战略转移，突破敌人的围攻线，争取在贵州省的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造新的根据地。决心下后，红2、6军团指战员，便开始做转移的准备，扩大红军，安置伤病员，将各地区的游击武装和干部，集中到桑植整编。经过扩红和整编，红军的人马又增加了许多。整编之后，红2军团军团长为贺龙、政委任弼时、副政委关向应、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甘泗淇。下辖三个师，4师师长卢冬生、政委冼恒汉，辖10、11、12三个团；5师师长贺炳炎、政委谭友林，辖13、14、15团；6师师长郭鹏、政委廖汉生，辖16、17、18三个团。红6军团军团长肖克、政委王震、参谋长谭家述、政治部主任夏曦，下辖三个师，即16师师长周保球、政委晏福生，辖46、47、48三个团；第17师师长吴正卿、政委汤祥丰，辖第49、50、51三个团；第18师师长兼政委谢振坤，辖52、53两个团。两军团共六个师，十七个团，近两万人。接着，在刘家坪召开了大会，庆祝红5师和红16师的成立。大会之后，各师团都加紧做转移的准备工作。坚决实行了轻装。每个人都准备了数天的粮食、弹药、几双麻索和布条编成的六根筋草鞋。

这天，贺龙来到了洪家关。看望村中父老乡亲。到了家门，见房门早以被国民党军队烧毁，院内杂草丛生。他又来到了父母坟前。这些坟墓，早被国民党的士兵刨了多次，贺龙的父母的尸骨，早已无存。英雄见状，忍着怒火，向父母墓地，深深地鞠了三个躬。而后上马，没想到他此一走，竟是一生中最后与家乡的诀别。

1935年11月19日，秋风阵阵，落叶纷飞。红2、6两军团的将士，齐集在桑植刘家坪前的干田坝上，举行了出征誓师大会。这时候，四乡八里的百姓，来到了队伍的周围，有的提着葫芦装的包谷酒，有的带着桔叶包的糯米粑，热情往战士们手中送。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姑娘们、媳妇们，拿着做好的结结实实的布鞋，绣着花儿的鞋垫儿，在队伍中寻找自己心上的人。

贺龙站在台上，眼望着这动人的场面，激动的大喊道："同志们，乡亲们，我们一定会回来！"

下午，两万红军健儿，在任弼时、贺龙、肖克诸将领的率领之下，迎着飒飒秋风，踏着落叶，踏上了转移的道路，数不清的乡亲们，扶老携幼，送到了十里长亭之外，眼含泪水，与红军告别。年轻的女子们，低声唱起了《十送红军》的歌儿。

凄凄楚楚的歌声，在秋风中飘荡，直唱得人人落泪，个个心酸，直到红军大队人马看不见了，人们还都站在十里长亭，不忍离去。

红2、6军团转移到贵州的毕节一带后，由于这里为乌蒙山区，便于此创建了苏区。1936年的3月20日，转移到盘县，在这里，任弼时、贺龙、肖克等收到了以张国焘、朱德名义发来的电报，电文是：

一、我们已自动放弃天芦，已进占道孚、炉霍。懋功、丹巴、崇化、绥靖仍在我们手中；

二、13军25军近过黄河，在黄河汾水间活动，26军仍在陕北苏区；

三、刘湘、邓锡候、刘文辉部在天芦灌县到威茂一带防我反攻。孙震、田颂尧部进绵阳、平武、松潘。李家钰约九团在会理、西昌一带及金沙江沿岸阻隔我们两军会合要道。薛岳、周吴部十八团驻雅安、泸定。李韫衍六个团驻康定；

四、因你们善用机动战已将你处敌军陷于严困状态中。李觉部已伤亡过半，早图调回湖南。万纵队受打击正调整。樊纵队亦疲劳，似滇军最积极，敌大部经落在你们五、六天后，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李家钰九团分散甚宽，战斗力亦不强。

五、我们建议在你们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

3月水涨前，设法渡金沙江。建议地点如下：第一处在蒙昭一带渡河，该处渡船多，渡口多，但需将船抢到手。过江后经会理盐源到雅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第二个渡口在绞平渡、鲁车渡渡河，但此处船少。第三个渡口在元谋龙街渡河。若上述三处不能渡河时，直经禄功、武定、元谋、进姚安、大姚、盐丰一带设法渡河。若西上可到邓川、鹤庆、丽江、过维西、中甸、经德荣、定乡、可到巴安与我们会合。

六、此道虽系暑天，亦应多备冬衣。

七、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

朱　张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三日

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五位将领，接到了朱德、张国焘联名发来的电报之后，当即召开了会议。会议在盘县的一个天主教堂内举行。贺龙首先发言道："创造根据地，为什么一定要北渡金沙江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利用江南的广大区域嘛！"

任弼时吸着烟，想了想说："贺胡子说的也有道理，如今红1、红4方面军都在北方，南方也应留下一支战略力量，以策应全国的斗争形势。"

贺龙又说："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敌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军在湘鄂川黔边根据地时，周围一线敌兵部队有一百三十个团，在黔西、大定、毕节时，敌军还有九十个团，现在追堵我们的，只有樊、郝、郭、李等纵队，加上滇军孙渡部，也只有五十多个团。且敌军不能吃苦耐劳。已被我们拖得精疲力尽。"贺龙稍停一下继续说："南北盘江一带，地区偏僻，交通不便，敌人进攻困难，在这一带建立根据地，条件很好。"

贺龙说完，大家讨论了一阵，有同意北上的，也有不同意的，最后，众将决定，再请示朱德、张国焘，由军委来定。任弼时当即起草了电报，电报写道：

朱、张：

电悉。

一、我军自离开毕节后，在彝良、镇雄地区直至进入滇境，因粮食缺乏，气候严寒，居民房屋稀少急行军和多半时间露宿，故部队很疲劳，减员亦颇大。唯近日又在恢复疲劳之中。

二、在目前敌我力量下，於滇黔川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的。

三、我们渡河技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涨之前，不致有多大的困难。

四、最近国际和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及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还是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贺、任、关、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廿四时

3月30日，朱德、张国焘便回了电，命令红2、6军团渡江北上，与红4方面军会合。贺龙、任弼时等看了这个电文，任弼时说："文常，张国焘是红军总政委，朱德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们二人的指示，都是代表中央军委下达的，我们当抓紧时间，做好

准备，北上！”

贺龙等人亦没有意见。北上方针一经决定，红2、6军团上上下下都开始了北上的准备工作。

1936年3月31日，红2、6军团在贺龙、肖克的率领下，主动撤离盘县，踏入滇东，大军西进。他们万没料到，他们所接到的以朱德和张国焘名义发来的电报，完全是张国焘在假传圣旨。张国焘何以能假传圣旨，请看第三部。





第二十五章　黄 麻 暴 动

徐向前奉命赴鄂豫皖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会上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并决定以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省为中心，发动秋收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是年的 11 月 13 日晚，湖北的黄安、麻城起义爆发了。

黄安是董必武的家乡。从 1924 年到 1925 年，董必武、陈潭秋以其创办的武汉中学为基地，为黄、麻两县培养了一批共产党员。如徐希烈、王秀松、戴继伦、蔡济璜、王宏文等。1925 年冬，黄安、麻

城两县分别成立了中央特别支部。1926 年北伐军进到湖北时，黄、麻两县的中共特别支部领导贫苦的农民展开了反豪绅地主的斗争。黄安县紫云区箭厂河乡的农民群众，惩办了大恶霸吴惠存。吴系箭厂河地区的大土豪、大恶霸和大讼棍，并担任了红枪会会首，民团团总等职，横行乡里，无恶不作。吴被打倒，使广大群众深受鼓舞。接着，黄、麻两县的农民又逮捕了李介人等十二个大恶霸，公审后枪毙。如此，阶级矛盾尖锐了。这一时期，黄、麻两县的党团员徐希烈、戴继伦、王文焕、蔡济璜、戴克敏、刘湘民、曹学楷、王秀松、王健、刘建安、汪奠川、桂步蟾、徐子清、李培文、余文治、王文魁、戴季英、刘文蔚、王树声、徐其虚、吴焕先等人，在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下，于两县内开展了推翻旧统治，发展党团组织的斗争，使黄、麻两地成为湖北省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县份。1927 年春，中共黄安县委成立，由余文治、徐希烈、戴继伦、郑位三等担任县委委员。麻城县委随及成立，由蔡济璜、王宏文、刘文蔚等担任县委委员。

正当农民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宁汉合流，蒋汪携手，大革命处于低潮，而这时，黄、麻两县的党团负责人如曹学楷、徐朋人、戴继伦、戴克敏、王志仁、陈定侯、汪奠川、程昭续、郑大开、吴焕先、高建斗、郑友梅、戴雪舫、江竹青、蔡济璜、刘文蔚、王树声、桂步蟾、徐其虚、徐子清等，均主张武装革命。另一部分革命意志不坚者消退了。

7 月 7 日，湖北省委书记郭亮及贺昌，刘镇一派戴季英回黄安工作。指示戴要抓武装，把已经解散的农会恢复起来。

8 月中旬，郭亮又派刘镇一到黄安七里坪传达贯彻中共“八七”会议精神。并传达省委关于在黄、麻举行农民暴动的指示。会议在七里坪的文昌宫一小学教室内举行的。刘镇一向到会人员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央决定举行两湖的秋收起义。黄安、麻城、黄陂要行动，以黄安为中心，组织农民揭竿而起。”刘镇一还说了郭亮提出将黄安、麻城联名为“黄麻”。

之后，参加会议的人对起义进行了讨论。会上决定首先在程卜

畈、长冲、灯龙山、下村庄、古风岭、太平寨至紫云寨一带村庄先搞暴动，然后接着大干。会议还商定，由熊家嘴农民最先动手，由程昭续领导。

9月2日，熊家嘴农民首先起义，接着，程卜畈农民在共产党员程昭续的领导下，也举行了暴动。继尔长冲农民万余人在共产党员徐朋人的领导下，也举行了暴动。紧接着，大斛乡、王潭河、城区北乡农民也都纷纷起义。与此同时，麻城的农民在蔡济璜、王幼安、刘文蔚、郑天文、王树声的领导下，也纷纷揭竿而起。暴动的农民打土豪、捉劣绅，将罪大恶极者处死。由于暴动在9月，故又称此暴动为"九月暴动"。

由于两县的中共党组织缺乏经验，没把起义引向更深人。程卜畈的劣绅程子鹏出面，花重金请来了国民党30军魏益三部一个连，并扬言大部队在后，结果暴动失败了。

九月暴动后，郭亮指示黄麻两县党组织：如果30军打进来，暂避其锋芒，如果不来继续起义。与此同时，省委书记罗亦农又派了符向一到了七里坪，召开黄麻两县的联席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指示。

11月3日，在七里坪的文昌宫召开了两县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吴光浩、曹学楷、戴季英、程昭续、刘文蔚、徐其虚、潘忠汝、余柏平、廖荣坤、汪奠川、高建斗、郑行瑞、熊殿勋、吴焕先、王树声等。由符向一传达了郭亮和罗亦农的指示，当即成立了黄麻起义指挥部，组织了中共黄麻党务委员会。由潘忠汝任总指挥，党务委员会由吴光浩、曹学楷、戴季英、程昭续、刘文蔚、徐其虚组成。总部设在黄安七里坪。

11月9日，中共黄麻农民起义总指挥部在七里坪北门外河滩上举行了宣誓大会，参加会议的有数万人。国民党左派、原黄安县党部委员詹道尊也在大会上讲了话，各县代表都讲了话，一致赞成举行起义。随及成立了自卫军。

11月13日，黄麻工农武装攻城起义开始了。时动员的群众达二十余万，男女老少几乎都出动，配合自卫军攻城的达两万。子夜时分起义队伍包围了黄安县城。

黄安县城有两道城墙，城墙高约两丈，四个城门，城内备有八门土炮，十条抬枪。攻城队伍成立了敢死队，队员吴先恩、吴世安奋勇当先，跃上城墙，北门很快打破。起义队伍潮水般涌入。很快全歼了警备队六十余人，缴枪一百八十余支。

黄麻起义胜利后，湖北省委、中央驻汉代表团即派戴克敏、王志仁二人到黄安重建县委，书记为王志仁，委员有曹学楷、戴克敏、戴继伦、汪奠川、潘忠汝、吴光浩、戴季英、田开寿、程昭续。11月18日，黄安县农民政府、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正式成立。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委员王秀松、吴先筹、陈定侯、戴继伦、田开寿等。

之后，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黄安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1路，麻城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2路。潘忠汝被任命为鄂东军总指挥兼第1路司令、吴光浩为鄂东军副总指挥兼第2路司令、汪奠川为鄂东军参谋长，戴克敏为鄂东军党代表兼第1路党代表、刘文蔚为第2路党代表。

黄麻起义胜利之后，由于起义军领袖没有斗争经验，起义胜利后便在城中驻扎下来，没到乡村广泛开展群众的发动工作。12月5日夜，国民党的第12军教导师向黄安城突袭。双方于城中激战，义军终因寡不敌众，突围出城。转移中，总指挥潘忠汝中弹身亡，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亦中弹牺牲。

国民党军队占领黄安城后，随即烧杀两天两夜，接着进占了县北的七里坪。

时起义军刚刚退到七里坪，国民党军即包剿过来。义军中的农民义勇队被打的七零八落，后人马退到了木城寨。在木城寨，义军的领导人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汪奠川、廖荣坤、徐其虚、江竹青、符向一。会上，大家一致

认为鄂东军不能停留在中心区，要打出圈圈，把敌人撵走，应当向木兰山活动。

由于起义受到了挫折，一些人认为没了前途，洗手不再干了，待腊月初六到达木兰山时，还剩下七十二人，四十二支长枪，九支驳壳枪，两支手枪。

木兰山位于黄陂县北部，山高坡陡，方园六七十里路，山势巍峨，群峰矗立，地势十分险要，是打游击的理想之地。鄂东军所剩的七十二人抵山上后第三日，遂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改番号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7军。军长吴光浩、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汪奠川。部队编成三个分队。各级均建立了党代表，组织领导上成立了委员会。由共产党员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汪奠川五人组成。

1928年1月23日(农历正月初一)，吴光浩指挥第7军攻克了木兰山外围的罗家岗，消灭了民团，打开了罗保元的当铺，把财物分发与穷人。这一仗，使共产党的影响又扩大了。

不久，国民党军又派兵对木兰山的工农革命军"围剿"，革命军站脚不住，于正月十五日，突破了敌之包围，转战至黄冈大崎山、回龙山、罗田三里畈，黄冈磨盘山一带。敌追兵紧急，第7军十分艰苦，常常吃不上饭。后追兵因故调走，第7军遂又返回木兰山。回木兰山不久，又闻知敌军前来"围剿"，第7军几位领导人经过会议，决定改变策略，埋藏长枪，携短枪化装更衣，分小股行动。

到了1928年4月，驻黄麻的桂系18军和西北军第12军发生了内讧，12军撤回了河南，第7军领导人于陈秀冲开了会，会上决定全军离木兰山返回黄安。

第7军返回黄安不久，桂系18军又加紧对工农革命军进行"围剿"，相继控制了七里坪、古风岭、箭厂河一带的大小集镇。工农革命军迫于敌情，只好利用两省军阀行动不一的矛盾，与敌周旋。在转战过程中，革命军领导人逐渐发现光山县的柴山堡一带是敌人统治较弱之处，又地处两省三县的边界，到处为崇山峻岭，地势

极其险要，且群众基础很好。而曹学楷的岳父是柴家垸人，且有一定的势力。于是，第 7 军领导人在清水塘召开了会议，决定开辟柴山堡革命根据地。很快，革命军在柴山堡打开了局面。恢复了各种组织，成立了黄麻县委。由戴季英任书记，王树声、余柏平、张行炳、徐其虚、程昭续为委员。下辖十一个区委。到了 7 月，随着革命力量的发展，第 7 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11 军 31 师。10 月，中共鄂东特委成立，由王秀松任书记，吴光浩、曹学楷、徐朋人、戴克敏、徐其虚、詹才芳、戴季英、王树声等为委员。黄麻起义的烈火终于熊熊地燃烧起来。到了 1962 年 11 月，在纪念黄麻起义三十五周年时，董必武同志感慨赋诗道：

> 廿二年间起伏多，黄麻革命涌洪波，
> 大山三座终移去，党引工农奏凯歌。
> 燎原烈火起星星，烧却江淮腐恶根，
> 英勇斗争成绩夥，山区到处见新村。

1928 年的 12 月，鄂东特委明确提出"学习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到了 1929 年 2 月，鄂东特委同豫南特委举行了联席会议，共同计划在商南发动武装起义。不久，又和皖西的六安、霍山、英山的党组织取得联系。2 月中旬，桂系 18 军出动了两个团分路向柴山堡地区大举进攻。西北军驻豫东部队，也在北面发动攻势。红 31 师在吴光浩指挥下，兵分三路，向南面敌人比较空虚的后方进击。第一路在禹王城歼敌仙居区"清乡团"，缴枪二十八支；第二路全歼高桥河"清乡团"，缴枪二十四支；第三路向东南突进麻城北部地区，歼敌西张店"清乡团"，缴枪六十余支。3 月，蒋桂两个新军阀战起。敌 18 军撤走。吴光浩遂指挥 31 师乘机扩大游击区，先后收复了七里坪、古峰岭、箭厂河等乡镇。武装割据地区逐渐扩大，红 31 师也发展到四百多人。

4 月，鄂东北特委（即原鄂东特委）又召开了黄安、麻城、黄陂、孝感四县县委和红 31 师师委的联席会议。会上选举了徐朋人为特委书记，通过了八个决议案。为：《临时土地政纲》、形势与任务、扩大游击战争、政权建设等等。如此，初步形成了鄂豫边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联席会议之后，游击战争四处开花，使鄂豫边割据地区从北面的柴山堡，向南扩展到黄安的八里湾、桃花和麻城近郊，向东扩展到麻城的黄土岗附近，向西扩展到孝感的汪洋店附近。形成了一个纵横百余里的地区。在这区域内，革命的基层政权的农民委员会普遍成立。就在这时——1929 年的 6 月，徐向前奉命来到了红 31 师。

徐向前，1901 年 11 月 8 日生于山西五台永安村，原名徐象谦，字子敬。少时因家贫失学，到杂货店学徒。后考入山西国民师范学校速成班，参加进步活动。毕业后任小学教员。1924 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排长。1925 年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作战。后到冯玉祥部国民军第 2 军第 6 混成旅，任教导营教官、参谋、团副等职。北伐军占武汉之后，任南湖学兵团指导员。1927 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工农大队大队长。后被派往张发奎部任司令部参谋。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后被派赴广州，任工人赤卫总队第 6 联队队长，参加广州起义。后转到海陆丰地区，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 4 师 10 团党代表，第 4 师参谋长、师长、坚持武装斗争。1929 年 5 月底，徐向前奉命抵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书记杨殷同他谈话，说中央派他和桂步蟾一起去鄂东北，搞武装斗争。6 月上旬，徐向前即和桂步蟾随鄂东北特委派来的何玉琳一起，装成商人模样，从上海至武汉，又乘汽车经黄陂到靠山店，而后步行抵鄂东北黄安的箭厂河。

徐向前、桂步蟾抵根据地时，红 1 军军长兼 31 师师长吴光浩已于 5 月间牺牲。为了怕影响部队和群众的情绪，对于吴光浩牺牲

之消息，特委没有公布。这样一来，徐向前的公开身份是红1军副军长兼31师副师长，而实际上负责全师的军事指挥。师党代表为戴克敏、参谋长曹学楷、政治部主任陈定候。

就在徐向前动身赴鄂东北根据地时，1929年的5月间，商城举行了暴动。

第二十六章　商城暴动前后

暴动经过

商城地处大别山的中段，为鄂、豫、皖三省交界处，乃为鱼米之乡，富庶之地。1923 年，在北平上学的共产党员吴清宇回到老家商城城关，在一小学内任教，期间组织了读书会，秘密发展了教员胡攻非、学生钟启太，邮工马石生等入党，并于 1925 年春建立了商城特支。到了 1927 年 8 月，商城的中共党组织遵照河南省委的指示，选举了蒋镜青为县委书记，并在县城建立女小、县中、县城三个党支部。而后，县委又和大革命失败后从外地回乡的中共党员接上了关系，遂又建立了武桥、南司两个农村党支部。

1928 年正月，县委书记蒋镜青冒着严寒，踏着冰雪，翻山越岭

到了商南老鸹窝，同那里的共产党漆德宗、漆海峰、漆德伟、周维炯接上了关系。经过一段工作，农历二月初三，蒋镜青召集了党员，在老鸹窝的漆德宗家召开了会议，成立了“商城县南邑区委”。由漆德宗任书记、周维炯任团区委书记。蒋镜青于会上传达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而后进行了讨论，到会者都表示坚决贯彻“八七”会议精神，掌握枪杆子，武装起来，打击地主豪绅。

3 月 5 日，豫东南特委委员范易到商城巡视工作，同蒋镜青等商定，决定召开县委扩大会议。

3 月底，扩大会议在商城的七里岗召开。各支部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选出了商城县委。蒋镜青、黄柏劲、马石生、汪涤元、钟启太、李梯云、廖炳国七人组成县委。会上，重申了“八七”会议精神，决定以商南、南司、武桥 为重点，加紧筹备武装暴动。商南区委随即于太平山穿石庙召开了会议，决定除了在南乡农民中发展党的组织外，又派党员打入民团内部，掌握民团的枪支，做好暴动的准备。

商南有个大地主叫吴少群，每年都趁春荒之际，买贫苦农民的青苗，乘人之危盘剥穷人，穷人为此恨得咬牙。1928 年的春天，又值春荒，贫苦人家十有八九揭不开锅。只好又向吴少群买青苗。区委书记周维炯便利用此机会发动农民起来同吴少群为首的地主做斗争。他带着农会干部同吴少群交涉，指出他屯积居奇，逼迫农民卖青苗是犯罪，并以农协会名誉向他借一百担粮食，如果不借，就发动农民聚众上告。吴少群害了怕。连夜将粮食藏于佃户家，周维炯又率农民做佃户的工作。结果没几天，吴少群藏的数百担粮均被农协会借走。贫苦农民见有农协会撑腰，便又向其他一些大户借粮。对一些不借的，周维炯组织人夜里摸这些人的“瓜”，即将其头砍下。如此一来吓得财主都说商南出了“黑杀党”。时商城县县长李鹤鸣是开明人士，只派了几个当差到乡里走走了事。

不久，周维炯为了搞兵运，打入了南乡三大民团之一的杨晋阶

民团内部。由于周精明能干，民团团长杨晋阶对其很喜爱，让他担任丁埠民团中队四班长兼教官，并成为杨手下的大红人。周维炯乃商城南乡楼房村人(今属安徽金寨县)。1924年在笔架山农职学校由詹谷堂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家中甚为贫寒，靠其舅父资助才上了学。1926年其十八岁时考人武汉黄埔分校(后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7年宁汉合流后，周回到了家乡，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农运和兵运工作。周由于革命立场坚定，且有勇有谋，在贫苦农民中威望极高。

周维炯成了民团团总的红人之后，即在民团中秘密发展党的组织。时民团内有不少团丁是贫苦农民出身，这些农民为生计所迫而加入民团，周维炯就做他们的工作，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慢慢的周维炯在民团中树起了威信，大家都呼其为“炯爷”，说炯爷够意思。周维炯见王玉田和严运生基础很好，就先同其二人撮土为香、歃血为盟，结为生死兄弟。

1929年3月1日，周维炯在丁埠蜡台石山顶召开了党员大会，吸收他的磕头弟兄王玉田、严运生，还有徐开膜入党。又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周维炯在民团中发展的党员已有八名，并在当地农民中发展了四名，于是成立了党支部。与此同时，肖方、廖炳国也在农民中建立党的外围组织“兄弟会”。

肖方，原名肖大椿，1905年生于湖北罗田县落梅河肖家冲。早年在黄冈武汉读书间，即接受革命思想，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1926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同年5月，其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遣，和李梯云一起回到罗田开展革命活动。9月下旬，罗田召开县农民代表大会，肖方当选为县农协常务委员会委员长。10月，中共商(城)罗(田)麻(城)特别支部在罗田陈家畈岳庙成立，肖方任特支书记。1927年初，肖方任罗田县县长。他在罗田县城的孔庙、武胜庙、财神庙等处举办“党义研究班”，提出“革政先革德，革命先革心”。大革命失败后，肖方组织了一支百余人的农民自卫军，与敌人展开了

艰苦的斗争。到了1929年2月，鄂东特委为便于领导商南地区武装起义，决定划商城南部、麻城东北部、罗田北部为特别区，并建立特别区委员会，肖方为委员。

在肖方、廖炳国积极开展活动、为暴动做准备时，李梯云、詹谷堂也在南溪、白沙河、二道河、杨山煤矿等地发展了一批工人、农民入党，并建立了党的组织。漆德伟等入也打入了民团内部，并掌握了部分武装。

1929年5月4日，临时县委在平头山穿石庙召开会议，决定定于5月6日立夏节晚上举行暴动，由李梯云负责全盘工作；肖方、徐子清(徐思庶)担任起义总指挥；周维炯负责军事；廖炳国负责联络。

立夏节的头一天，正好轮到周维炯"值星"，他找到民团中队长吴成格、队副张瑞生出主意，说："队长、队副，明天是立夏节，今儿让弟兄们打扫打扫屋里屋外的卫生，明儿好过节。"

吴、张二人同意。周维炯遂利用打扫卫生之由，将枪支弹药都集中一起。第二天立夏节间，周维炯令人安排了丰盛的酒宴，把吴成格和张瑞生两个团队的头头灌醉。当夜，这个中队内的共产党员在周维炯的指挥下，夺取了枪支，举行了暴动。

与此同时，肖方也在牛食畈下了丁家埠民团头子杨云阶的枪，并将其生俘。

武装暴动在这个夜晚迅速的在丁家埠、竹叶庵、南赤溪、斑竹园、禅堂、吴家店等地展开，一时间，捷报频传，立夏节暴动成功。5月9日，各路起义人马，从四面八方涌向了斑竹园，庆祝起义成功，同时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2师，由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下辖97、98两个团，肖方任98团团长。

徐向前是商南起义刚刚胜利之际到达鄂豫边根据地的。时其领导的31师下辖五个队，1队队长晏仲平、党代表王树声；2队队长廖荣坤、党代表江竹溪；3队队长倪志亮、党代表吴先筹；4队队

长林柱中、党代表江子英；5队队长吴心信、党代表郑行瑞。

徐向前到鄂豫边不久，就遇到了国民党人马的“会剿”。

商城县委处决“二徐”

1929年6月底，蒋、桂之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兵不血刃地占了武汉。尔后即令罗霖独立第4师的两个团，由黄陂、黄安出发向北进犯；驻潢川、光山的李克邦部一个营及红枪会五、六千人向南进犯；驻麻城的夏斗寅13师的补充团和黄土岗一带地主武装，也配合“会剿”。

这时，红31师大部在外游击，仅有两个大队在七里坪、紫云两地活动，一百多人枪，面对强敌。徐向前知道不能硬顶，遂率这百余人枪利用地形同敌人兜圈子。在来家河，双方接了火。敌机枪哒哒哒的一声，这些刚组建的红军队伍哪里见过这样阵势？随及都跑了。徐向前心里着急，也无可奈何，心中暗道：“红军队伍必须整顿、加强训练，不然难与强敌匹敌。”遂决定避开强敌，找敌弱处攻打。选择了攻打李克邦的土匪队伍和红枪会。于是，徐向前指挥两个大队和数千名手持长矛土枪的群众队伍，在白沙关一带与敌连续五战，大获全胜，击毙了李克邦部营长以下百余人，还活捉了红枪会的头子戴五爷，顿时士气高涨。罗霖人马见李克邦部吃了亏，也很快退走了。

到了8、9月间，蒋介石令刘峙组织鄂、豫两省的部分兵力和民团，二次向豫东南和鄂豫边两块中共根据地发动攻击。时夏斗寅第13师分两路由南而北、由西而东进攻；李克邦部、商城民团顾敬之部，由北向南堵击；皖西之敌由东向西配合行动。敌来势汹汹。

时商城县委鉴于敌强己弱，且根据地回旋范围狭小，遂决定红32师跳到外线作战。周维炯遂率红32师向光山、麻城一带转移，

豫东南根据地即为敌人占领，随及烧杀，实行阶级报负。商城县党组织创始人之一詹谷堂被捕后遇难。

徐向前指挥的红31师在白沙关、鹅公山等地与敌接了几次火，虽然也取得一些胜利，但在强敌之下，终不能打垮敌人，也跳到外线，向麻城北部转移。在八字门，与周维炯率领的红32师会合。在这里，徐向前同周维炯、肖方等相会，大家见面，分外高兴。徐向前又令军需部门拨了一批子弹给了32师。会合第三天，两个师同来犯之敌打了一仗，双方配合的不错，但战后第二天，周维炯却带32师不辞而别了。徐向前知周维炯等对31师怀有戒心，也就任其而去。

32师为何不辞而别？又因何对31师有戒心？这其中自有缘故。

前文述过，还在1929年正月，豫东南和鄂东北特委在柴山堡南竹园召开了联席会议，讨论商城暴动事宜，由于商城县委遭受了破坏，豫东南特委遂将商南暴动事委托鄂东北特委。鄂东北特委就派了徐思恕(子清)、徐其虚到了商城，协助商城的党组织进行暴动准备工作。在南竹园会议上，还成立了商、罗、麻特别区委，由徐思恕任书记、徐其虚任委员。当商南起义成功后，成立了32师，由徐其虚任党代表。

6月11日，鄂东北特委和信阳中心县委(豫南特委改组)再次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撤销商、罗、麻特别区委，将红32师和商南党组织交给商城县委统一领导，徐思恕和徐其虚参加商城县委工作。

决定之后，信阳中心县委便派了陈孤零和商城县委书记陈慕尧前往商南接收，并准备召开党代表大会。但这时候徐其虚和徐思恕不交权给豫南，认为商、罗、麻特委高于县委，所以不接受联席会议的决议。不仅如此，二人还以个人名义，召开了紧急会议。徐思恕在会上大声说："我们商罗麻特委，是鄂豫皖特委，怎么能听商城县委指挥？我们可以改造商城县委，改造信阳中心县委。"说到这

儿，徐思恕尖着嗓门道："我们甚至可以改造中央！"

徐其虚也大声附和道："豫南的组织简直是反革命的大集团！"

二徐召开紧急会议后，又扣留了陈孤零和陈慕尧。并决定不出席县党代表大会，同时决定对大会实行经济封锁。在二徐做出决定即将施实时，商城县委和信阳中心县委即以迅速之非常手段，将二徐逮捕，接着，依照联席会议的决议，及时解散了商罗麻特委，商城县委接收了特委的工作。接着又召开了临时县委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对二徐的处理意见，讨论后决定，给徐思恕以开除党籍执行枪决的处分，给徐其虚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并于此向上级机关写了报告，内称：

> 一、自中央对于河南组织路线变更以后，商城的工作完全交由豫南边中心县委负责指导，鄂南边中心县委与鄂东北区特委联席会议的决定，商南组织（和乐两区）完全交由商城县委负责（因过去商南军事工作由鄂东北派人来发动的，当时与县委关系不密切，暂为特区，受鄂东北特委领导指挥，后来因交通隔绝，商南与鄂东北关系又不密切，但特区仍不受商委的指挥）。豫南中心县委派人来召集代表会，正式接受收商南特区时，却发生重大变故，原来商南工作因暂受鄂东北指挥，所以称特区，而鄂东北来做工作的同志徐思恕、徐其虚便自组"中国共产党鄂豫皖特区执行委员会"，实际只有商南两区，鄂皖均没有一点工作。商城全县分十区，以为区是超过县委以上的组织，不接受豫南、鄂东北联席会议的决议，不交组织给鄂（豫）南。对于豫南中心县委来接受商南工作的问题，徐思恕、徐其虚以个人的决定，召集鄂豫皖特区紧急会议讨论交组织问题，并且紧急会议所召集的人（约二十人），一大部分都是不负责任的同志和非同志，他们说："我们是

鄂豫皖特区区委，自然不受商城县委的指挥。”又说：“鄂东北的组织十分健全，豫南的组织简直是反革命的大集团，如何能指挥我们，并且我们是鄂豫皖特委，可以改造商城县委，可以改造信阳县委，甚至可以改造中央。”……徐思恕（特区书记）徐其虚（特区委员）发表了很多反动言论，并且扣留团的信阳县委巡视员和鄂豫皖特区的组织，不交商城县委，完全拒绝，不理中心县委派来的人……对全县代表大会完全不出席，不与发生关系，并决定对代表大会给以经济封锁（因会址是在特区内），对商委和特派员给以人的封锁（说是禁止一切负责同志或其他的同志与他们谈话），遇必要时以非常手段对待。

……

二、政治纪律决议。

……徐思恕在事实上证实为主体，应予以开除党籍执行枪决的处分，……对徐其虚亦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商城临时县委

一九二九年七月九日

到了8月，敌夏斗寅进犯商南时，红32师向光山转移，转移途中，恐徐其虚跑掉，将他处决了。

对于二徐的处决，中共中央和河南省委派了巡视员郭树勋进行调查，郭树勋为此写了报告，为：

……

十四，关于商城解决徐思恕、徐其虚的问题。

对商城县委紧急的处分徐思恕、扣留徐其虚的问题，我根据中央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预备往商城调查解决，到信阳以书面通知东北区派来一人同到潢川后，商城县

委书记来参加联席会时，报告商城红军于夏斗寅来压迫时，随同党部同志及赤卫队革命的农民全部退却东光山，临退时，就把扣留着的徐其虚又枪决了，他们的理由是怕他逃跑了。

因为商城红军退却，党也随着跑了，到商城去解决这问题，是不可能的，东光山也在敌人包围中通不过去，所以在联席会议中所组织的特别委员会（由潢、商、固三县委书记）中提出此问题的讨论……

特别委员会同意以下的结论……

总之，非常手段处决徐思恕和不等中央的意见又解决徐其虚是错误的，除了陈孤零因犯有其他错误在联会中给以一年察看的处分外，给商城县委以书面警告，并将此事向党员公布以作教育的材料。

树勋

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二日

党代表戴亢若被秘密处决

徐思恕和徐其虚被商城县委处决后，由戴亢若接任了32师党代表，戴是安徽霍山人，由安徽六安县委派去的。戴任党代表不久即与商城县委在两个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一是对收编的一部分溃兵的处理上。当时32个师收编了一部分溃兵，县委主张对溃兵的枪支马上收缴，而戴认为若马上缴械会使这些士兵产生想法，另外，搞不好会产生兵变。戴这么一说，县委其他人也认为有道理，就遵从了戴的意见。后来，县委一些人又提出，对溃兵的枪支用钱收买过来，而戴又提出将溃兵全部枪决的主张；二是转移的路线上。

面对敌之"包剿",县委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确定了32师往光山转移。孰料到转移的前一天,戴突然提出,说部队不应西向光山方向退却,原由是东、西、北三面都有敌人,而西面没有发现敌人的行动,很平静,很可能有敌人的埋伏,而且西面一向是民团活动的基地。后来证明戴的意见不正确。

32师人马抵光山后,县委随及又召开了会议,会上,有委员王泽渥发现戴亢若用手摸枪,王当即站起,用严厉口气说:"报告主席,党代表在会议上弄枪有危险,请主席立即把他的枪收了。"

委员徐乾也随帮唱影。戴当即将武器交了。会后,戴大哭了一场。而此时县委的一些人对戴产生了怀疑。戴的情绪变的很消极,请求回霍山去。县委未准。县委开会的第二天,又开了一个扩大会,会上决定派孔文彬前往信阳中心县委汇报,请中心县委速派师党代表等军政工作人员,随孔同行的还有胡植,二人离开光山路过潢川县时,正巧信阳中委在潢川召集了东南七县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孔、胡二人便参加了会议。会上决定在光山的商城县县委委员一律取消,32师直接受信阳中心县委领导指挥。胡、孔于会后返回光山,向在光山的商城县委委员们进行了传达,会上,在光山的商城县委委员全部反对中心县委的决定。特别是王泽渥、李梯云、徐乾三人反对更激烈。同时,增加了周维炯参加县委委员。李梯云任师党代表,取代了戴亢若。王泽渥、李梯云、徐乾三个开了个会,做了个决定,将戴亢若秘密枪决。

1929年12月25日,周维炯指挥红32师首次解放商城,时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前往商城调查戴案及督促32师开往光山的游击事宜。

郭述申,原名郭树勋,湖北孝感人,1922年春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8月任中共河南省委秘书、中共中央巡视员。在郭抵商城时,已有郭天民、孔剑午、吴精赤、李荣桂、刘英、王子良、金佛

广等十多人到达商城，意在组织改造商城县委和32师师委。由刘英任师长，孔剑午任县委书记，吴精赤任师党代表，李荣桂任师政治部主任。元月15日，在商城召开了32师和县联席会议。时出席会议的共有一百四五十人，由郭述申代表中央做政治报告，报告中有传达中央的"反富农的指示"。由于郭仅为口头传达，没有中央文件，商城县委书记李梯云对郭的指示产生怀疑。李遂召集秘密会议，说郭等人是第三党，决定对郭等外来的干部加以逮捕。时有士兵委员会常委项弼向孔剑午密报了此情。孔急忙见郭。郭感到情势危及，遂决定连夜走出商城。元月17日，郭述申、郭天民、孔剑午、吴精赤、李荣桂、刘英等连夜赶到潢川。到潢川后，郭述申、刘英给周维炯写了一封信，要周将陷害外来干部派在商城工作的李梯云、王泽渥、徐乾、漆仲甫、徐仲虎等五人处以死刑。

郭述申等逃走后，李梯云等继续开会。会上做了决定，除中央巡视外，其他如刘英等逃走的人，都开除党籍。

郭述申出走之后，即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内称：

> 我们于三十日起程赴南城，今年一日到达……
>
> 为了传达党的政治组织策略的各种路线，为了商城工作，并解决许多党内问题——游击路线，戴案等所召集的师县代表联席会于一月十五日在县城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一百二十余人，指定参加的(师长、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各团的党代表、各群众团体的党员负责人)有二十余人，共计有一百四五十人，主席团由师委书记郭天民、县书孔剑午、CY县委刘和清(吕则孔)、兵士廖业祺、农民廖炳国五同志担任，会议依照下列议程进行：巡视员报告，政治报告，党务报告，师委报告，县委报告，提案审查委员会报告，其它报告，报告后的讨论，组织问题决议案，政治任务决议案等，纪律问题……

政治报告占二小时，党务报告进行了四小时左右……郭天民同志发言说，听了党务报告后，经过讨论，应当作一个听了党务报告后的决议案。郭天民的意见，我亦同意，请主席付表决，并说明了我同意的理由。很奇异的被王泽渥、李梯云等所左右的大会否决了。

到讨论组织问题决议案时，由我报告起草的条文，第一部分是师委与县委的关系。到第六项原文"三十二师在商城时，游击路线由师委与县委共同讨论决定之，倘三十二师游击路线已由特委决定，师委应依照特委的决定执行"时，李梯云首先提出下列修改意见："倘三十二师游击路线已由中特委决定，师委接到命令时，即召集师县联席会议讨论一切问题，并须得到县委的完全同意。'结果只将李梯云修改最后一句的"完全"两字去了。

在第四次会未开以前，刘英、李荣桂、孔剑午、吴精赤、郭天民、王子良各同志都在天民住房里谈第三次会议所表现的情形，……项弼同志——士兵委员会的常委——进来了，他把孔剑午叫出去，等一会儿，金佛广来叫我，孔同志在另一个地方对我说："现在情形非常严重、项弼刚才对我说，他们李梯云、王泽渥、周维炯等已开会几次，说我们都是第三党，信阳中心县委也是第三党，决定马上扣留解决我们，后来又说提求大会解决，你看这怎样办呢？"我说："我的意见，就是设法离开此地。"

同路出走的有：师委书记郭天民、县委书记孔剑午、党代表吴精赤、政治部主任李荣桂、师长刘英，九十八团党代表王子良、九十七团党代表金佛广（李克清）。

连夜走出商城境地，第二日到达潢川。

（五）离开潢川后的各种处置。

我们十七日到潢川，十八日给了商城一信，由师县代

表联席会议主席团负责转商城的革命同志，文中主要内容说明我们离开商城的原因和少数阴谋分子的陷害，并交由周维炯负责将主要陷害由外派往商城工作的阴谋家李梯云、王泽渥、徐乾、漆仲甫、徐仲虎等五人处以死刑，叫他们给我们以答复……

我们走后，仍继续开会，并有许多处分我们的决定，除我们外，将刘英他们都开除党籍。……

二月三日又接到商城临时师委的报告，说明在当时确有这些谋害我们的情形，不过他们仅仅指出一个人，就是王泽渥是主谋，把其余的人都隐讳了，主要的原因，是李梯云和肖方有密切的关系（肖妻是李梯云的妹妹），漆仲甫和参谋长是兄弟，徐乾与周维炯有关系，所以不提他们，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王泽渥身上，因为那几个人是有武人做靠山的，固然王泽渥是主谋中的一个人，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阴谋最毒辣的李梯云和徐乾，他们并为周维炯辩护，本来周是比他们都坦白而且忠实，不过英雄色彩浓厚些，我们对于周维炯的希望是很大的……

树勋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九日

时安徽六安县亦向中央报告了商城县委和32师的问题。内称：

……商城县党的组织是很幼稚的，同志对于党的认识薄弱和政治水平太低。去年他们解决党代表徐其虚、徐思恕（子清）两同志，中央已知道我们派戴亢若同志到他们那里学习工作，二徐解决后，他们叫戴亢若同志担任三十二师党代表，以后他们又把戴亢若秘密解决了。戴同志

被解决后，闻悉我们从别处知道了，同志中有人作非正式地问他们，他们隐讳不宣布，据我们的调查，解决戴同志的是商委王泽渥、李梯云、徐乾三人秘密会议干的。解决后，三十二师师委又把此三人缴械逮捕（实际并没逮捕），呈报中心县委解决此问题，信阳中心县委至今二月没有答复。今年一月间，中央郭巡视员到商城召集三十二师师委和商城县委开师县联席代表大会，大会主席的有百另八人，六安县第六区也有一同志去参加。据六区同志回来报告，在大会上因讨论三十二师受豫鄂特委指挥调遣问题，有少数同志（即李梯云、王泽渥等）主张要开师县委联席会议作为最后决定。他们的意见是惟恐鄂豫特委把红军调跑了。但在组织上说应该要受上级的命令，当时多数同志不明了，也就马马虎虎地通过。自此通过后，下午正要继续开会，而中央派来师长刘英同志、政治部主任李荣桂同志、党代表吴精赤同志、中央巡视员郭同志以及三十二师师委书记郭天民同志等八人不辞而退。以后知道刘同志早走了，仍继续开会。此时师长周维炯率部出发了，副师长漆德玮始终在前方抵御敌人未曾出席。漆闻刘英等走了，并有信给大会说不要闹私人意见。要同心协力抵御等语。在继续开会时，讨论刘英等同志不辞而去，唯有王泽渥、李梯云、徐乾三人发言最多，大意都说他们携械潜逃破坏会场等罪状，要通缉他们，除中央巡视员外，其余的人一律要枪决。后来散会后，刘英同志自潢川给他们信：有人报告××同志主张要解决他们，他们时而不相信，继尔又有人报告他，说周维炯也参与阴谋，所以他们不辞而去等情，据我们六区同志参加者说，周维炯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下午时，由六区麻埠回到商城出席大会，在大会场上讨论问题时，到未发表什么意见，他们去后，周

也随即出发了。又据我们观察，周对党的认识是不清楚，但很忠实、坦白，参与谋害刘英同志等恐非事实。况刘英同志奉中央命令来接师长职权时，周倒没有拒绝的表示，刘英同志等来信说某某主张谋害了他们，据我们事后调查，所指王泽渥（本案主要人）、李梯云、徐乾三人及其不负责的同志二人，周维炯事后和我们谈话，还说他们确有阴谋。由此证明，周维炯并未参与阴谋。

六安县委

一九三〇年二月十八日

在2月5日，信阳县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作了决议案。内称：

……在来到光山以前，李（梯云）、王（泽渥）、徐（乾）等对戴党代表惑疑攻击，疑戴与新收的一部分溃兵有勾结（攻击的理由，因为这一部分溃兵收了以后他们主张马上缴械，戴说我们力量未有他大，并且恐怕于将来的士兵有影响，主张用缓慢的方法技术的缴械），但是后往光山退却缴这部溃兵械的时候，戴的主张比旁人还坚决（这部溃兵他主张全数关起来，全数枪决，怕他们走了以后与我们本身及将来的士兵有影响）。往光山退却的时候，这个路线，原为商委在军事紧急的时候的决定，到执行的前一天夜间戴提出他的意见说：他感觉着往西不如往东，理由是这次敌人，东、南、北三面包围，西方没有动静，但是西方是向来反动民团最基本的地方，平常的时候屡次向我进攻，这一次毫无动静，恐怕敌人在西方有埋伏。但戴发表这个意见后，对他的意见并没有坚决，并且在西去的路上，可以说他一人出力独大，后来证明了戴的意见不确，

他们借此更加了一个反戴的根据。

到光山后的一天召集了一个县委会，在会议上，戴用手摸枪，王泽渥就很严厉地向主席提出说："主席，党代表在会议上弄枪有危险，请主席同志立即把枪收了。"同时即去会议室外也拿出自己的枪，徐乾也随着王泽渥跑出去了，戴即将他的武器交给主席，而且大哭，从此以后戴有些消极，请求准他回霍山去（他是鄂豫皖特区时霍山派来的），这次县委开会的第二天，又开了一个县委扩大会，决定胡植、孔文彬回商，并定孔亲往中委一次，请中委速派大批工作人才（师委书记及党代表）。孔、胡离开光山路过潢川的时候，恰遇信中委在潢召集东南七县县书联席会，即便参加这个会议。在这个会议席上，决定在光的商委委员一律取消，师委直受中委指挥，后来中委亦同意（完全同意）这种决定，但是在光的商委李、王等主张来执行，并且增加周维炯参加县委，继续以商委公室处的名义，指挥三十二师师委，李担任办事处主任兼师委书记。

到八月间自孔、胡及刘和清（中委派的 CY 书记）三人在商北即原非赤色区域，担负商委的工作（中委决定派去参加商委的工作人都还未到），后来不久中委派去参加三十二师师委书记的郭天民同志到了商北，说三十二师已由光回商，并据中委所得报告说内部问题非常严重，并且传说戴党代表已经被他非法枪决，因此当时在商委负责的三个同志即决定郭天民回到赤区。到了赤区第一个先会着的是周维炯，他就报告戴案情形，说戴已被解决，但是此事是李、王、徐及徐仲虎等几个人的少数意见，并未经过正式会议通过，现在还得保守秘密，并且理由一点也不充分。

对商城事件的决定：

一、由中委去信商城要他解释下列各点作一报告：

A、戴案；B、对中央的游击路线指示的不执行；C、巡视员及中委派去的工作同志的出走事变，另外叫他们继续同中委发生关系，中委可负责转报中央。

二、通告东南各县委在商城问题未解决前不要与商城发生关系。

……

信阳县委扩大会议

一九三〇年二月五日

1930年3月18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告商城县全体同志书》，内称：

商城的党和同志们能在艰苦的环境下面积极的奋斗，从分粮抗组的斗争发展到地方暴动，并且在斗争中建立起工农武装的红军队伍，于不久以前还占领敌人反统治的中心，解除了地主阶级许多武装，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这些英勇斗争的事迹和刻苦工作的精神，中央表示无限的欣慰和敬意！

……

你们不仅仅陷于极端错误地地域保守观念中，不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并且有更严重的错误的工作方法，就是对于同志错误的处分，动辄使用非常的恐怖的手段。对于两徐的解决，中央已经向你们指示了这是不对的，你们不但不能纠正过来，反而一错再错。至于党代表戴亢若（元君）的解决，不但没有经过组织讨论，并且用阴谋的暗杀手段，这的确是县委负责的同志们一个极大的错误，中央特别提起你们的注意，号召你们要认识党的纪律的树

立，应当站在教育同志的观点上，同志在工作上犯了错，党只有耐心去教育说服他们，只有从工作的过程中逐渐指出并纠正他们，这样才能锻炼更有经验和更强健的工作干部，这样纪律才有更积极的意义……

你们有一部分同志对于中央派来的同志及信阳中心县委来商的工作同志，发生不应有的怀疑，甚至秘密的集议，准备要扣留解决他们，这的确是你们一贯的错误倾向，沿这种倾向一直发展下去，你们将得不到什么，你们只有(要)离开党的立场，革命的立场，得不到任何的革命帮助……

你们因为没有得到党的经常指导，所以你们发生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虽不是你们自觉的，而是许多客观的原因所形成，但你们必须坚决的站在党的领导下面，大胆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勇敢地改正这些错误，这才是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态度，这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精神。

……

中央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八日

对于商城县委暗杀了"二徐"和戴亢若，赶走了郭述申和刘英等问题，信阳中心县委都做了恰当处理。但后来张国焘到了鄂豫皖后，又旧事重提，并作为"肃反"的罪名和由头。此后话，暂且不提。

第二十七章　六霍暴动

话转回头。徐向前率红31师同32师会面之后，周维炯率人马连夜不辞而别，徐知道周等有戒心，亦可理解，遂率31师跳出敌之包围圈，甩开敌主力南下，于长堰、夏店、黄安的八里湾等地，消灭了这些地方的民团。周维炯也率32师于商城消灭了敌人的一批"编练队"，到了9月下旬，侵入鄂豫边之敌，摸不着红军主力，且后方空虚，不断受到骚扰，无奈之下，收兵回到根据地边沿各据点。至此，敌之"鄂豫会剿"以失败而告终。

10月初，敌徐源泉的第48师的两个团进占了罗山、光山，尔后由北向南压向鄂豫边根据地。夏斗寅的13师由南向北杀来，两路敌兵对根据地又展开了第三次"会剿"，史称为"徐夏会剿"。徐向前接到地方党委的情报，说敌人仅四五百人，徐遂决定打伏击。孰料情报不准，敌人有两团之众，结果31师人马被敌打散，徐向前只身一人躲到山上，靠树林掩护才脱险，2队党代表桂步蟾牺牲了。

徐向前脱险后即率领残部离开天台山向北转移。

正在这当儿，蒋介石同西北军内讧，徐源泉同夏斗寅部都撤出鄂豫边根据地，徐向前趁此时机，遂指挥人马，兵分三路，向长岭岗、柿子树店、姚家集、河口镇等地民团发动攻击，将这一地区的四个民团先后击溃，并打垮了国民党的一个正规连。红 31 师也得到了发展，达七百多人，六百多条枪。

就在这当儿，在皖西又爆发了六安、霍山农民的武装暴动，史称"六霍暴动"。这里把这一情况做一介绍。

六安、霍山两县地处大别山和皖西丘陵的结合部，物产丰富，但百姓在豪绅地主恶霸压榨之下，生活极其贫困。因此，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反抗力。

1927 年国共两党分道后，曾任全国总工会执委和中共安徽省工委书记、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舒传贤，还有在上海等地从事革命工作的周狷之、周范文等都相继回到六安。根据中共安徽省临委的决定，于 8 月在六安城关紫竹村小庙建立了中共六安特区委员会，书记胡苏明。特区委做出了决定，要求党员们深入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作。时驻六安、霍县一带的国民党 33 军军长柏烈武，在国共两党的对立中持中立态度，这样一来，使得革命力量得以发展，并领导了六安县城关工人举行了罢工斗争。到了 10 月，33 军调走，国民党安徽省"清党"委员会成立，有李宏斋、王述雪者来六安主持"清党"。中共六安县委针对白色恐怖的严重形势，遂转入地下，秘密地建立农会，在农会会员中建党。

这当儿，中共安徽临时省委强令特区委在六安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区委经过讨论，认为时机不宜，虽抵制了省委指示。

到了 11 月中旬，中共安徽省临时省委委员兼中共皖中特别指导委员会书记周范文来六安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指示以六安为中心，促成六安、霍山、寿县、英山各县的暴动工作。1928 年的 1 月，六安、霍山、霍丘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南岳庙召开，会上成

立了六安县委，又称六霍县委。书记为王逸常。县委正确的施实了统战政策，解决了当地的黑社会组织——大刀会，使得发展农民协会、组织工农武装的工作进展很快。与此同时，县委又派了党员刘淠西、毛正初、李野樵等打入民团，担任民团的头目。开展敌军士兵运动，策动民团兵变。县委委员周狷之还变卖了庄田，购买枪支。

当时，安徽省临时省委正积极执行李立三的“左”倾盲动路线，强令六安县委立即举行武装暴动。六安县委们认为时机不熟，遂据理力争，最后，问题反映到中共中央军委，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于上海英租界内秘密召见了中共安徽省临时省委书记尹宽（王竞博）、六安县委书记王逸常，还有中共中央直属小组的许继慎、柯庆施。周恩来在听取了各方汇报后，批评了尹宽的盲动主义错误，指出武装斗争必须条件成熟方可行动。

到了 1929 年 1 月，六安县的各级党组织发展很快。并将第五区委单独划出，建立了霍山县委。两县有三十二个支部、党员三百多人。同年 10 月 6 日，六安县委在三区郝家集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会上根据中央指示，六安县委升格为中心县委，舒传贤任书记，周狷之、余道江、吴宝才、吴干才、桂柏炎、朱体仁、杨季昌等任委员。并成立了六霍暴动指挥部。由舒传贤任总指挥，周狷之任政治部主任。

1928 年皖西大旱，导致 1929 年春天粮价飞涨，加之军阀混战，地主奸商乘机囤粮，哄抬粮价，使农民苦不堪言，六安县委时领导农民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春荒斗争。农民们扛着锄头，扁担抢了地主豪绅的粮食。舒传贤带领霍山东北乡的数百农民，一次就扒了倪庄地主和李鸿章的“积善堂”稻子二百多石。春荒斗争的开展，壮大了农协会的力量，为暴动打下了基础。立夏节间，商南暴动成功给六霍县委和群众极大的影响和鼓舞，到中心县委成立的时候，县委已掌握了一百多条枪，三千多名群众，还有一定数量的经过锻炼的干部。而中国工农红军第 32 师又在豫皖边界一带活动，并准备向

东发展，对六、霍两县的革命力量，可以给予有力的支援。中心县委感到暴动条件已经成熟，遂准备进行武装起义。县委机关设在了独山附近龙门冲的一座小庙内。

1929 年 11 月 7 日晚，敌人独山警备营哨兵将一男二女押进独山镇。这男的叫何寿全，是三区二乡农协常委兼秘书，两个女的一叫盛荣秀，一叫李自仙，都是农协会员。三个人在开完会回家的路上，唱了《劝郎当红军》的歌儿，被警备营敌兵听到，说他们宣传赤化，遂将三人抓起，关进禁闭室。尤为严重的是，何的身上带着农会会员的花名册，如果落在敌人手中，敌人必然会依册捕人，起义就会流产。

在危急关头，周狷之连夜于独山镇县立第四高等小学的平民夜校的教室里召开紧急会议，商讨营救之策。最后，由没有暴露身份的地下党员余朝铎和独山豪绅胡丽川出面保释，两个女农协会员获释，但不放何寿全，说要交五千块银元和五支盒子枪才准保释，否则将何寿全解送六安。

面对此情况，周狷之和参加会议的县委中心委员当那决定，提前举行起义。暴动日期定于 11 月 8 日。

11 月 8 日上午，数千名农协会员，举着红旗，手持鱼叉、长矛、大刀、钢枪等武器，在共产党员的带领下，从四乡八村涌向独山镇。

时暴动指挥部设在独山镇县立四高平民夜校内，口令为“得”、“胜”，暴动由三区区委和农协会组织。

暴动队伍的前面是平民夜校的学员，中间是大刀队和手持大锹锄头鱼叉的群众，后面是十支钢枪压阵。暴动的负责人詹少白、江承新、吴贷新等人拉着一些豪绅地主，做出了一副农协会和地主豪绅一起保释何寿全的假象。

暴动到了关押何寿全的马氏祠堂门口，有哨兵阻拦，走在最前面的共产党员董道友取出了保释书，哨兵接过后正看之际，一旁的共产党员董道友手起刀落，将哨兵砍死。另一个哨兵见势不好夺路

要跑，也被群众打死。

警备营兵见状，遂开枪射击，暴动群众纷纷躲藏。警备营的兵急忙上了屋顶，并关上了大门。

警备营的营长叫魏祝三，他上了屋顶一看，见暴动群众里三层外三层的将独山镇围了个水泄不通，心中害了怕，不敢下令开枪。只好令人放了何寿全，并交出了农会会员花名册和十几条枪。然其仍拒不交出全部枪支，但也无法突围。暴动的群众因武器低劣，也无法进攻，双方一直僵持到深夜，警备营在南岳庙敌姚子厚部的增援下，纵火烧房，而后仓皇逃命，连夜逃到苏家埠。暴动的群众遂占领了独山。

暴动胜利后，六安中心县委和三、五区党的负责人召开会议，成立了三区工农革命委员会，下设总指挥部等，任命鲍益三为总指挥。组织了六个游击大队，二千三百余人的赤卫队。

在独山暴动的鼓舞下，六区七邻湾，古碑冲、南庄畈和七区流波疃也相继起义。驻金寨的民团团总汪东阁部和驻流波疃的朱梦功部被摧垮，起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接着，县委书记舒传贤又发动和领导了西镇暴动。

西镇位于霍山县西部深山。包括漫水河、燕子河、闻家店一带。在区委书记刘仁辅和县委委员徐育三积极部署下，在组织武装暴动的关键时刻，有坏人向反动地主密报了起义事。敌人决定在全区大逮捕。区委得知此情报告，决定提前暴动，一面派人向红 32 师求援，一面举行暴动。

11 月 19 日，数百名农民在红 32 师的支援下，先后攻下了闻家店地主余良远庄园，燕子河地主刘佐廷的庄园，将长山冲的敌自卫团大部全部消灭，击毙敌自卫团团长陈先觉，活捉了余良远等，保团总五人。

11 月 25 日，周狷之又领导了六安徐家集、江店子两地民团起义。

六霍暴动后，敌急调重兵"围剿"。对革命群众进行大肆屠杀，仅独山一地就杀了二百多人。中心县委常委吴干才、朱体仁和三区区委书记许希孟当场被杀害。血的教训使县委认识到应立即拉起队伍。1930年1月20日，在中心县委召开的常委会上，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第33师。任命徐百川为师长，姜镜堂为政治部主任，下辖106、107两个团，全师二百余人，长短枪一百四十条支。

2月中旬，红33师在红32师配合下，攻打麻埠，守敌张季荃部不支，弃枪三十余支而逃。33师继尔占领独山。使三区和六区形成了一块纵四十华里、横六十华里的红色区域。

第二十八章　许继慎受屈

1929年9月，中共中央为了统一鄂豫边、豫东南两根据地的领导，成立了鄂豫边特委，辖黄安、麻城、黄陂、罗田、黄岗、商城、光山、罗山八县。由徐朋人为特委书记。六霍暴动之后，即1929年的12月，鄂豫边特委又召开了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了革命委员会，由曹学楷为主席、徐向前为军委会主席。会议认真地总结了根据地的斗争经验，制定了政治任务问题、军事问题、教育宣传、群众运动、青年运动等九个决议案及《革命委员会政纲》、《土地政纲实施细则》等，并提出了游击战术原则。31师党代表戴克敏还提出了游击队员的“八会”，即：跑、打、集、散、进、退、知、疑。徐向前同曹学楷、戴克敏经共同研究，在军事问题决议案里，总结了如下几条。

一、集中作战，分散游击；

二、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

三、敌情不明，不予作战；

四、敌进我退，敌退我进；

五、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

六、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再采取突击的方式。

戴、曹二人虽非军事家，但他们从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对指导鄂豫边红军建设和作战，起到了重大作用。

戴克敏，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4 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武昌第一师范学生，参加过学生运动。1927 年 3 月入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任第 1 大队大队长。结业后回黄安，任中央黄安县委委员兼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参加了黄麻暴动，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成立后，任党代表兼第一路党代表。工农革命军改为第 7 军后，任第 7 军党代表。31 师成立后，任该师的党代表。

曹学楷亦是黄安（今红安）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学习。后辍学回乡自办小学。在家乡建立中共支部和农协会。任中共黄安七里坪区委书记、县农协会和主要负责人。1927 年参与领导黄麻起义。任黄安县农民政府主席。后随起义部队转入木兰山进行游击活动，任工农革命军第 7 军党委委员。31 师成立后，为该师的参谋长。1929 年 10 月被选为鄂东特委委员，12 月被选为鄂豫边革命委员会主席。

黄、戴二人对创建鄂豫边根据地，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0 年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向湖北省委、河南省委、六安中心县委发出指示，决定建立鄂豫皖边特别区委员会，由湖北省委领导。辖湖北的黄安、麻城、黄陂、黄冈、孝感、罗田、应山、安陆；河南

的商城、光山、固始、潢川、息县、罗山；安徽的六安、霍山、英山、霍丘、颖上、寿县、合肥等县。特委委员有郭述申、许继慎、曹大骏、姜镜堂、徐朋人、曹学楷、戴克敏、徐宝珊、王平章、何玉琳、钱文华、戴继伦、戴季英、吴焕先、詹才芳、徐向前、郑位三、王树声、李梯云等，由郭述申任特委书记。

3月18日，中共中央又发出给鄂豫边特委和红31师、红32师、红33师指示信。内称：

> 中央认为在目前要配合湘、鄂、赣等省首先胜利的工作准备，无疑的要把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红军在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原则之下联系起来，将这三个师编成第一军，并且加紧执行扩大第一军的策略。

同时指出：

> 目前边特的军事工作任务，无疑的是根据总的政治任务而决定的，就是扩大红军，发动地方暴动，扩大游击战争，武装工人，武装农民，组织兵变，汇合这些武装斗争，与各方势力联合起来，以争取湘、鄂、赣等省政权先胜利的前途。……第一军发展的方向，无疑是要向武汉发展，主要的是在争取湖北首先胜利的任务下来向外发展的策略。

指示信中还提出红1军成立前敌委员会，从军到连设政治委员，纵队以上设立政治部。规定了“政委在政治上，在党的立场上比军官权限大，即在军事上一切问题亦应得政治委员副署。”

不久，中共中央派的许继慎、曹大骏，熊受暄等相继到达鄂豫皖边区就职。

3 月下旬，赴上海参加中央和中央军委会议的郭述申回到鄂豫皖。在黄安北部箭厂河向特委及红 31 师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央指示。随即组成了中共鄂豫皖边特委和红 1 军前敌委员会。特委书记郭述申，委员何玉琳、王平章、徐朋人等九人组成。军长许继慎、政治委员曹大骏、副军长徐向前、政治部主任熊受暄。红 1 军前敌委员会由红 1 军军政领导及士兵党员二人组成，由曹大骏任书记。

许继慎，又名谨生，安徽六安县土门店人，1901 年出生，家道小康。早年在安庆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参加了五四运动。1923 年秋，他领导学生痛打贿选的省议员而遭当局通缉逃亡到上海，入上海大学旁听。1924 年春至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1 月，许由黄埔军校毕业，被分配到军官教导团担任排长。1925 年参加了两次东征。北伐间，他于叶挺独立团任第 2 营营长，参加了有名的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等战斗，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叶挺铁军中英善战的指挥员。独立团扩编为二十四师后，许任该师 72 团团长。1927 年 5 月，军阀夏斗寅联合杨森趁武汉空虚企图夺取武汉之际，许继慎率部与黄埔军校分校的学生一起，奋勇抵抗，将夏、杨部击退。在战役中，许身负重伤。大革命失败后，许到了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30 年 3 月又调到鄂豫皖根据地。出任了红 1 军军长。

曹大骏，化名曾道润，湖北阳新人，1902 年生。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就读于武昌高等师范。1926 年任中共阳新县委组织部部长、县总工会委员长。1928 年任中共阳新县委宣传部部长。10 月任中共大(冶)阳(新)区委负责人，领导开展武装斗争。1929 年秋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鄂东特委巡视员，参予指导鄂东南的武装斗争。1930 年 4 月调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对于红 31、32、33 师集中起来改编成红 1 军，徐朋人、郑位三等人认为不妥，认为地方武装和主力红军二者发展都很重要，不可只顾主力红军，削弱地方武装。后来的事实证明，徐朋人、郑位三等

少数人的意见是对的。当时组建主力红军而消弱了地方力量，是因为李立三的“左”倾思想统治了中央，并形成了一股势力，因而，郑位三等人的正确意见被排斥。

红1军成立后，红31师改编为红1师，师长徐向前兼政治委员戴克敏；红32师改编为第2师，师长漆德伟、政治委员王培吾。红33师改编为第3师，师长周维炯、副师长肖方、政治委员姜镜堂。在皖西，又组建了中央独立第1师和中央独立第2师，独1师师长徐百川、政治委员王文生。

红1军成立之后，“长江总行动委员会”即给鄂豫皖边区下达了任务；切断平汉路，进逼武汉，再联合湘鄂西的红2军和红6军进攻武汉。时红1军号称一个军，实际上只有两千人。却武器破陋，用这样的人马攻打武汉这样的城市，无异于以卵击石。

然“君命”不能不受，徐向前只得率红1师人马西出平汉路，但他心里明白，武汉不能打。遂在武汉外围打小股的敌军。在杨家寨车站消灭了川军郭汝栋的两个连。接着，又在杨平口伏击了郭汝栋的一个团，取得了鄂豫皖红军成立以来首次歼灭敌一个团的胜利，随后，红1师又扩编了三个团。

在红1师西出平汉路时，红2师和红3师向六安、霍山西部进攻，拔除了根据地的据点。先后打下流波疃、麻埠、金家寨、独山，一度攻占霍山、英山县城，歼灭了大批民团等地方反动武装。红2师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红3师发展到五百多人。

8月20日，国民党戴民权部一旅犯境，徐向前指挥红1师诱敌深人，在罗山以南的四姑墩附近，歼其一部。戴部一旅复以两团人马反击。时红2师和红3师赶到，配合红1师击溃敌军，歼敌一个大团，余敌连夜西逃。敌退之后，红1军三个师遂于四姑墩首次会合。翌日，三师人马向西追逃敌，于小溪河一带又歼敌一部。

就在这当儿，长江总行动委员会再次下了红1军攻打武汉的指示。鄂豫边特委接到指示后，即在黄安的周家楼召开会议，决定

立即组织以“城市为中心的地方暴动”,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的口号,合并了党团、工会组织,成立了“京汉特区行动委员会”。又根据李立三提出的“把一支枪也要集中到红军中去”的口号,进一步取消了各地游击队,组成了红色补充军总指挥部,把根据地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赤卫队统统都集中到了红军之中。少先队中凡十八岁以上的也都收到红军中。还发布了《边界通告第十五号》令,提出“组织黄陂、潢川、宋埠为中心的全区总暴动,以促进与巩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的胜利,争取全区总暴动的胜利。”对于豫东南苏区,要求“在豫东南应加紧组织以潢川为中心的总暴动,与湖北总暴动联系,同时向河南北部发展”。

到了 8 月下旬,红军前敌委员会虽然知道攻打武汉力不从心,还是按照“长江总行动委员会”的指示,集中力量,向平汉路出击,执行切断平汉路的任务。

9 月中旬,许继慎、徐向前指挥红 1 军由四姑墩出发,沿平汉路东侧北上,在广水车站,与守敌接火,因敌火力太强,红 1 军虽经猛攻,仍然不克。22 日,绕过广水继续北上攻打信阳。时信阳乃蒋介石嫡系刘峙及肖之楚、赵观涛人马的后方留守处,屯积着大批弹药和粮草。若破信阳,则影响极大。但敌之人马援军很快沿铁路乘铁甲车赶到,并以猛烈的炮火攻击,红 1 军伤亡很大,大败而退。

许继慎、徐向前等自知红军不能与敌正规军决战,仍转而消灭民团,在信阳以南的陡沟镇,消灭了民团数百人,之后,红军休息了数日即南返。

10 月初,徐向前指挥红 1 师强攻潢川县城未克,许继慎指挥红 2 师、红 3 师,进抵光山县城外围。10 月 6 日黄昏,攻城开始,红军将城东北一段城墙炸开一个缺口,趁烟雾未散冲了进去,与守军展开了巷战。一时后,城南门、北门相继炸开,守军顿时慌乱,四散而逃,守城长官弃城从东门逃走,国民党城防局长李耀东被活捉,光山遂为红军所占。

10月中旬，许、徐二将指挥人马又攻克罗山县城，罗山遂解放。

当下，红1军在光山城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党员代员大会。会议主要解决如何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部队思想建设，并针对各师中存在的严重的本位主义、地方观念、骄傲自满、组织纪律松散的问题，作出了相应决议。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的指示，整编了部队。将三个师对调混编成两个师，徐向前免兼红1师师长、李昂茨任军参谋长、曹大骏兼军政治部主任、熊受暄任前委秘书处长。红1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李荣桂，下辖第1团、第3团；红2师师长孙永康、政治委员王培吾，下辖第4团、6团、军独立旅、黄麻补充营、中央独2师、第2师合编为红1军第3师，肖方为师长。整编之后，全军辖3个师。

光山会议的第二个内容是反对地方主义和不良倾向，内容本来无可非议，但是，由于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依然在会议中占统治时期，内容就偏了。许继慎没有按中共中央"左"倾掌权者的要求进行军事行动，本来是正确的，不仅使红军没有遭到损失，而且在错误的路线下保存、扩充了红1军，这本应是许的功绩，由于会议当中按照"左"倾路线的要求检查"前委"的工作，把红军没有机械地执行切断平汉线的任务，指责为机会主义，因而，会议之中，无视这些事实，一味地追求许继慎个人的"责任"，在改造红1军前委时，将许继慎排斥在外。同时将红2师师长漆德伟调离，要他到上海中央分配工作。漆德伟之所以被调离，是因为他反对部队整编，并对枪毙参谋长漆海峰持消极态度。漆海峰的品质不好，吸食鸦片，与反动亲属关系不清。事实上看，漆德伟对这两个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光山改编打乱了原来的建制，将三个地区成长起来的部队进行混编，是不合适的，因为当时敌强我弱，部队尚许要一定的"山头主义"。混编的结果使指挥员不了解部队，士兵也与指挥员离心。特别对红1师，拆得更厉害，而且将一些干部调到外师降职使用。如

此造成了一些干部战士的思想混乱。漆海峰虽然有错误，但不至于枪毙，所以漆德伟对会议上的这两个问题有看法。结果漆德伟在往上海途中遇害。而红2师中反对枪毙漆德海的人，都被扣上“有叛变党的路线的企图”，被开除了党籍。

第二十九章　邝继勋、曾中生赴鄂豫皖

光山会议之际，正是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六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划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为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时中央给鄂豫皖边特委的指示中谓：

> 鄂豫皖三省边境，东以安徽的六霍、潜山一带与皖省红色区域相接，西以鄂北的应山、枣阳一带与鄂北、鄂西、豫西南襄阳樊城区域相接，南以黄梅、广济与鄂东南以及赣北赣东红色区域相接，这有便于红军的改编与训练的条件，有武装给养的来源，尤其是一面可以控制平汉路，一面可以截据长江交通，有直接威逼武汉进而与全国红色区域打成一片的前途，这完全符合革命根据地的作用，因此，中央特将此区域划为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

同月，中国工农红军15军成立，由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治委员。15军活动于鄂东地区的蕲春、黄梅、广济一带。

12月上旬，南京国民政府以八个师零三个旅近十万人的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就在这时，中共中央派了曾中生任鄂豫皖特委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曾中生，原名曾钟圣，1900年出生于湖南资兴。1925年加入中共。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毕业。1926年秋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总指挥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北伐战争。随军进驻武汉后，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积极参加揭露国民党新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9月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同年冬回国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任参谋科科长。1929年10月负责工农武装工作。1930年夏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曾中生被任命为鄂豫皖特委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后，于11月28日，在地下交通员引导下，来到了鄂豫皖边特委秘书处所在地——湖北孝感小河溪樊家村。

曾中生到达之后，即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七里坪召开了原鄂豫边特委和附近几个县县委负责同志的紧急会议。由于红1军主力尚在数百里外的皖西、商南地区作战，远水不解近渴。曾中生遂与原特委书记郭述申及各县县委负责同志商定退敌之策。会上，曾中生传达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取消"左"倾路线指导下合并党团组织而成立的"行动委员会"，建立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由曾任临时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反"围剿"斗争。曾中生在召开紧急会议的同时，还派人到红1军，传达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并令在黄梅、广济地区活动的红15军突破敌人之包围圈，开往麻城北部福田河，同红1军会合。

徐向前、许继慎军听了传达，认为三中全会的精神对头，都衷心地表示拥护，许继慎因为背了不执行立三路线的"罪名"，这次得

以平反，很是高兴。

七里坪会议决定了反“围剿”的方针，即：集中红军最精锐的力量，突破敌人的弱点，以转变全部的战局，创造新的局面。

会后，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以苏区原有的地方武装六个教导队，以及光山、罗山等六个县的特务队三百余人和红色补充军七个师约二万余人为基础，组织了三路指挥部，各路设指挥委员会，由指挥员、政治委员及当地党的主要领导人组成。领导苏区反“围剿”斗争。

南京政府对苏区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于鄂豫皖根据地投入了八个师三个旅的兵力，计十万余人。

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红军将领，面对敌情，组织了鄂豫皖根据地两万余武装力量分设三路指挥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围剿”斗争。由于曾、许、徐等指挥正确，红军连续取得四次胜仗。尤其是曾中生和许继慎，机智勇敢，处惊不变，终在敌强我弱情况之下，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就在这时，邝继勋赴鄂豫皖。

1931 年 1 月中旬，红 1 军与红 15 军在商南长竹园会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 1 军和红 15 军合编为红 4 军，归鄂豫皖特委直接领导。红 4 军计一万二千余人，编为 10、11 两个师，10 师师长蔡申熙、政治委员陈奇、副师长刘英；11 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余笃三、政治部主任曹大骏。

这里把邝继勋和余笃三的情况略作介绍。

前文述过，邝继勋出任了洪湖苏区的红 6 军军长，不久，即调往上海，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工作。红 4 军组建时，邝调到了鄂豫皖，即任军长职。

余笃三，又名余笃山，1887 年生，湖北人。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共，工人出身，在武汉参加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大革命失败后，被派赴苏联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曾反对王明等“左”倾观点被视为“工

人反对派领袖”。回国后，1930年12月被中共中央派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红4军组建后，任政治委员职。

1931年2月初，鄂豫皖临时特委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组成了鄂豫皖特委和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曾中生任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蔡申熙、郑行瑞任军委副主席。会议批判和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总结了反“围剿”的经验，制定出新的斗争方针。扩大会议还对根据地建设中把面临的各项重大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检讨，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破坏中小商业的“左”倾政策，解散了集体农庄，制定了发展生产、建设根据地的方针和政策。

在这次会上，徐向前同曾中生第一次见面，二人大有恨相见之晚之感。徐向前后来回忆说：“他（指曾中生）对一些问题的深刻分析能力和平易近人的风度，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2月中旬，红4军召开了全军党代表大会，传达贯彻特委扩大会议精神。会议决定，以“飘忽战略，乘敌人的不备突击敌人，使敌人的军事布置处于被动地位，诱敌出阵而消灭之。”

按此战略，红4军于3月1日奔袭了信阳南李家寨车站，5日袭击了柳林车站，继尔向信阳逼近。

时国民党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闻讯，急令第6师主力集结于信阳，并由信阳、罗山向南推进。武汉“绥靖”主任何成峻也令岳维俊第34师由孝感经花园沿平汉路东侧向北推进。岳好大喜功，孤军深入，在双桥镇，被红4军包围，岳部大败，岳维峻亦被活捉。

时红4军军部住在黄安檀树岗附近的一个村庄，岳维峻被连夜提审。

岳乃冯玉祥西北军部队中老牌陕军，当过冯玉祥的河南省府督办。1925年岳任国民2军军长时，徐向前是其所属第6混成旅的参谋、团副。岳身材高大，长形赤红脸，黑眉大眼。审讯在政治部的办公室内进行。房子中间摆着两张方桌，岳维峻和其参谋长、副

师长、秘书长坐在一面，曾中生、徐向前、蔡申熙及军委副主席郑行瑞、总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组织部长石克言，宣传部长梁次冰、总政秘书长程寿民等坐一面。曾中生首先说："岳先生倾师出动，残害我苏区民众，我军民奋起反击，导致你全军覆灭，今先生被俘，应该说是咎由自取。"

岳听罢，良久无语。曾中生又说："我于此奉劝先生，只要先生深明大义，为苏区民众作些有益之事，以赎前衍，我们共产党人可以既往不咎，保先生安全。"

时徐向前也说自己曾是岳维峻的老部下，表示会尽力为岳帮忙。岳维俊听了，长叹一声，说："敝人有辱上命，丧师陷身，已无颜立地。两兵相加，有害民众，我深表忏悔，今蒙多多关照，只要不杀我，我答应你们提出的一切条件。"

在审岳之前，曾中生与徐向前、邝继勋、蔡申熙等已商量过，打算留岳维峻做西北军的统战工作，并通过岳搞一些军用物资。岳维峻表示愿意为红军效劳后，曾中生、徐向前等提出了所要物资的单子，除枪枝子弹外，还有西药、纸张、火柴、布匹等，仅布匹就要能做20万套军装的。岳于此一一答应，这样，曾中生下令将岳部被俘的副师长、参谋长等释放，只留下了岳本人。押在檀树岗。

岳维峻的家属果然没有食言，前后共运送给红军三批物资，1931年3月运来第一批，6月运送第二批，10月运送了第三批。这三批物资除枪枝、弹药外，还有各种纸张、布匹、纱团、油印机、腊纸、油墨、消炎粉、止痛片、阿斯匹林等药品，物资由广水下火车，再经人力运到苏区。

当第一批物资运送给红军后，曾中生、徐向前等正要放岳维峻时，也是岳的时运不济，克星临头，张国焘来到了鄂豫皖苏区。

第三十章　张国焘赴鄂豫皖

张国焘犯了众怒

张国焘是1931年4月由上海动身赴鄂豫皖苏区的，同他前往的还有陈昌浩和沈泽民、张琴秋。由主持中共中央特务部的顾顺章将其护送到汉口，后由鄂豫皖派来的交通接走。此后数天，顾顺章即被捕而叛变。

张国焘等是怀抱着王明的"上方宝剑"而来的，他们到了鄂豫皖苏区后，便横挑鼻子竖挑眼，之后，对党和红军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改组。5月11日，张国焘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了王明的"左"倾中央的指令，接着，宣布了王明"左"倾中央的决定，即：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另行成立鄂豫皖中央分局，直属中央政治局领导，并成

立鄂豫皖省委。分局职权系直接代表中央领导一切。有权否定地方党委的决议或解散地方党委。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兼省委书记、曾中生、邝继勋为军委副主席、陈昌浩为共青团分局书记。分局委员由张国焘、陈昌浩、沈泽民、曾中生、舒传贤、徐宝珊、王平章、蔡申熙等八人组成。郭述申、周纯全、高敬亭等十五人为候补委员。至此，张国焘总揽了鄂豫皖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接着，张国焘又动手对红4军的领导干部做了调整。任命邝继勋为红4军军长、曾中生任政委，下辖10、11、12、13师。10师师长刘英、政治委员康荣生；11师师长周维炯、政治委员余笃三；12师师长许继慎、政治委员庞永俊；13师师长徐向前、政治委员陈奇。继尔又成立了“彭(湃)杨(殷)学校”，由蔡申熙任校长、傅钟任政治部主任、李特任教育长。

5月16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布了第一号通告，宣称：

> 在这一苏区未与江西中央苏区打通以前，中央分局完全直属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系代表中央而高于省委。

5月24日，张国焘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题目是：《关于第二次反“围剿”及其他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虽然也说了曾中生的几句好话，但笔锋一转，又说鄂豫皖苏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能证明党内路线已经是正确的了”，曾中生等“仍然是对立三路线的调和”，“当前的任务是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实际中作彻底的转变。”不仅如此，张国焘还于报告中提出了肃反。内称：

> 在这一苏区(指鄂豫皖苏区——引者注)活动最力的反动组织是改组派，他们的领导人物多半是以前武汉时代国民党省委张国恩和我们的董必武同志等，在武汉时代我们党同国民党右派共同的活动分子。

6月29日，张国焘在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的《政治决议案》中，提出了要“加紧肃清改组派”，明确地把肃反列为鄂豫皖苏区“目前最基本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7月，在鄂豫皖区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专门通过了《肃反决议案》，规定“政治保卫局是肃反的主要组织”，要求“各级苏维埃革命团体，都必须以极大的力量，经常供给保卫局材料，特别要以阶级意识坚决的分子，来担任肃反工作”。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发出了《给皖西特委一封信》，信中特别对皖西的肃反工作作了指示，批评了皖西在肃反上所谓的右倾。指令皖西特委“对一切政治派别及反革命分子应严格逮捕”。

这次会议之后，张国焘把鄂豫皖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扩展到三百多人，并更名为政治保卫总局。接着，张又下令各县都成立政治保卫分局，其任务是对付改组派、AB团和第三党。当红4军领导曾中生等就红4军南下的行动方针与张国焘发生激烈争论之后，心黑手狠的张国焘怀着险恶用心，加快了“肃反”步伐。

红4军领导曾中生等同张国焘发生了怎样的争执呢？

在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后，曾中生等红4军领导人鉴于根据地内粮食紧张，主张集中主力南下蕲黄广地区，一面恢复根据地，一面解决粮食问题，并起到牵制敌人，配合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曾之建议本是正确的，而张却说曾此举是“立三路线的残余”，令其率兵去商城解决顾敬之的反动民团。由于顾大搞坚辟清野，红军所到之处，荒无人烟，不仅粮食搞不到，反不断遭敌的游击袭击，因而一时无法取胜。曾等向张力陈，希张采纳南下建议，而张不仅不从，反谓曾之意见是“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了一个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6月底，分局开会，曾中生、许继慎、余笃三等就南下问题与沈泽民等人又展开了激烈争论。张国焘见众人皆支

持曾中生，也只得同意。到了7月初，军委在商城西南的余家集召开会议，讨论具体行动部署时，张国焘又翻脸，要红4军攻英山、出潜山、太湖、进攻安庆，威胁南京。曾等认为此举是冒险主义，而张一意孤行，部队只得依张而行。在红4军行动之际，张国焘又改组了红4军领导，以徐向前为军长、曾中生为政委。

徐、曾二人合作很好，率军一举攻下英山，但二人考虑依张国焘的意见不妥，遂又率队南下，结果，红军大胜，但此举触怒了张国焘，其下令部队北返。并于8月27日，给徐向前和曾中生发去一信，其内容气势汹汹，谓徐、曾南下是对中央分局"公开的抗拒"，是"原则上路线上分岐！"、"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曾中生等接到张国焘的信后，读后无不大愤，认为红4军行动虽没按张之意图而行，但取得了胜利，决非对抗中央分局。当下，曾中生于英山以南的鸡鸣河召开了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活动分子会议。众皆认为张国焘的信不实事求是。会上，群情激愤，通过了一项申明书，并决定派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回去向中央分局陈述意见。与此同时，徐向前、曾中生、刘士奇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信，申述了红4军南下的理由。内称：

> 在战略上，如果想脱离根据地几百里的阵地，如果我们由英山直取安庆等，不但做不到而且要发生许多不能解决的困难，如果勉强行之，必然成为单纯军事行动，根本忘却了巩固阵地的发展任务了。我们深深认识中央根据地胜利的伟大，就是有了强度群众基础的阵地所致。

红四军中的"赤色恐怖"

徐向前、许继慎、曾中生等将领，原都认为张国焘乃中共党内

的老资格，有修养，万没料到张乃小肚鸡肠的小人。张国焘深知，自己要想成为鄂豫皖苏区的"太上皇"，必须将曾中生等人搞掉。曾中生等在鸡鸣河召开的会议，张认为是曾等公开向自己示威，不下手不行了。但曾、许等将领，无不战功卓著、深孚众望，若搞不好，会把自己搞臭。正在这时，一个天赐之机使张国焘喜不自禁。一封信到了张国焘手中。什么信。说来话要长些。

前文述过，红 4 军于双桥镇活捉了国民政府师长岳维峻，曾中生、徐向前等决定利用其做西北军统战工作，并要其家属送物资与红军，其家属亦按约将物资送到。由于张国焘等人的到来，岳没被放掉。其初起被关押在檀树岗，后移到潭畈河。时岳部被俘受伤的官兵在箭场河红军后方总医院养伤。潭畈河距箭场河二十多里。红军对岳维峻的看管也很严，岳与其部下根本无法接近。到了 8 月中旬，张国焘竟在这个后方医院炮制了一个毫无根据的所谓的 AB 团组织。并立即指使政治保卫局将这个所谓的"AB 团"的组织成员逮捕。这些"AB 团"成员多是岳维峻的旧部。张令连夜加以审讯，经过一番刑讯逼供，这些成员被苦打成招，说准备在 9 月 15 日暴动，炸毁医院，抢走岳维峻。张国焘见了这口供，如获至宝，当即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内称：

> ……八月初，我们破获了一个岳维峻组织的反革命团体，名 AB 团，自成一系统，约一百二十人，决大多数是岳的旧部……岳经常给这一反革命团体之计划和经济，建立苏共内外之交通网及其侦探网，联络赤区一切反革命分子及组织，计划于九月十五日暴动，炸毁医院药房，抢岳维峻出去。……民团、侦探、蒋介石及赤区周围各军队派来之侦探、改组派、AB 团、第三党，在许多实际行动中已充分证明联成一片。

就在张国焘下令抓与岳维峻有关联的“AB团”成员时，就在张国焘日夜盘算如何向许继慎、曾中生等问罪时，又出了这样一件事。当红4军攻占英山后，鄂豫皖军委皖西分会主席兼红4军12师师长许继慎率部于英山留守。时有国民党特务曾扩情，以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派特务钟蜀武到英山，送信与许继慎。诡称许已与敌勾结。钟蜀武，字梅桥，其与许亦相识。曾于信中称：

> 继慎吾兄无恙：
>
> 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幸荷察纳，钦佩无极。比得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奉批照办。匍匐来归之子，父母惟有涕泪加怜，或竟自伤其顾之不周耳，宁忍加责难于其于哉？苍苍者天，于孝行役，分无再见，乃复来归，虽犹千里，心实欢喜。只所须名义防地，钟俊同志赴赣请示校座，自当照给。校座返京，百务待决，故一时未能缕缕呈耳，愿吾兄之勿虑也。西望停云，我心劳结，诸希自珍，以候宠命，并颂戎安。弟曾扩情再拜。

钟梅桥抵红12师后，被师政治部逮捕，许得知此情后，即令人将钟及人、信一并送交红4军军部。军长徐向前和曾中生看罢曾扩情给许继慎的信后，一致认为许为人光明磊落，曾给许的信是反间之计。遂向分局写了报告，尔后连人带信一并送往分局。同时，徐向前和曾中生还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说明了这一情况，内称：

> ……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武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过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钟等我们还在密禁着，将解到中央分局

> 去，由中央分局去处办，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总之，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这里，我们更有严密党的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本是一件很明了的公案，而张国焘却阴心大动，决计从此下手、杀害忠良。其实张国焘对许继慎无有恶意，且想拉许，使许成为自己的左右臂，哪知许不仅不买张的账，反与张的许多主张相悖，张对许顿生恨意，便在许多场合下对许进行指责，说许在许多方面保有军阀土匪的习气，说红4军反中央分局领导的暗流是许挑拨起来的。言语中对许暗含杀机。偏许为人耿直，不把张国焘这武大郎当成神仙，所以张见到这封反间之信，不仅不去澄清，反决心于此大做文章，达到铲除异己之目的。在陈昌浩起程去红4军时，张国焘即将陈昌浩拉进密室，要陈借机动手，将许继慎等以肃反之名义除掉。

陈昌浩对张国焘之用心，心领神会，当即连夜起程，马不停蹄的直抵红4军。时红4军正北上行进至麻埠、斑竹园、余子店一带。13日，陈昌浩抵麻埠，到达红4军军部。陈昌浩一下马，屁股没坐稳，便召开了军领导会议，宣布了中央分局关于免去曾中生红4军政治委员，由他接任红4军政治委员的命令。当晚，陈又下令将红10师参谋主任何柏元、第28团团长潘皈佛、第28团团副丁超、陈新山、红1师师长李荣桂等以反革命罪逮捕。连夜进行了审讯。

陈昌浩在1931年11月23日报告中写道：

> 我十三日赶到麻埠、在十三号就破坏了他们的阴谋与全盘计划，开始逮捕了李荣桂、潘皈佛、陈新山、丁超等二十余人。

李荣桂是安徽寿县人，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原名李安贫，字淑才，又名李坦。其父乃清末秀才。自幼随父读书。1919年入芜湖私立工读学校，参加了声援“五四”运动的游行示威。后转入芜湖公立职业学校，任校学生会秘书。1923年秋因反对反动校长被校方开除，转去上海求学。1923年在家乡创办改良私塾。1924年冬再度去上海，从事革命活动。1926年被派到武汉。不久考入中央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1927年4月参加了讨伐夏斗寅叛变的战斗。宁汉合流后返回寿县，到国民党第33军学兵团任中队副，从事兵运工作。1929年6月同徐向前一起被中共中央派到了鄂豫边，担任红军第1军31师党代表。1930年3月部队改编为红1军1师，担任师政治委员，时师长为徐向前，二人率师向平汉路南段出击，连战皆捷，使苏区和红军队伍得到迅速扩大。同年10月出席了中共红1军“一大”，任中共红1军军委书记。1931年1月红军与红15军合编为红4军，李任第10师政治委员，率所部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反“围剿”作战。李作战勇敢，工作认真，作风深入，为一难得之将才。

陈昌浩对李荣桂等连夜审讯，虽动大刑，但无口供。

张国焘深知撤曾中生职和抓李荣桂等非同小可，遂紧锣密鼓地进行欺骗宣传。他连夜起草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指控曾中生，内称：

> 在中央分局开始工作以来，全部鄂豫皖苏区的党，在路线到处都有转变，唯有四军中这个转变没有开始。这里主要的负责都就是曾中生同志。……在中生同志领导之下，四军中一般同志对于中央分局路线是异常模糊的，对于立三路线错误实质是茫然不解的。中生同志用家长制的方式去领导红军，丝毫不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对于传

达中央分局的政治有系统的怠工，所以至今红军政治路线上的转变还得从头做起。因此，中生同志绝对不能再继续做四军的政治委员，中央分局决定，撤销中生同志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

当时的中共中央，视张国焘等为宠儿，反对张国焘就是反对中央。当中共中央接到了张国焘以分局名义写的罢官曾中生的报告后，于 11 月 3 日给鄂豫皖中央分局发了函，严厉地批评了徐向前、曾中生等人，说他们的举动是“立三路线的重复”。信中对张国焘罢官曾中生的举措甚为赞赏，谓：

中生同志等决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中央分局在重新讨论中生同志问题时，应注意到这一点。

张国焘在以分局名义作决议指控曾中生的同时，又下令将潘皈佛的妻子、李荣桂的妻子等逮捕，进行严刑逼供。陈昌浩也下令逮捕了 36 团团长魏孟贤、35 团团长王明、30 团团长高建斗和政委封俊。并连夜进行拷打逼供，但一无所获。而张国焘于后方对潘皈佛李荣桂等妻子的逼供，却有收效。一些人受刑不过，交待了一个所谓的“举行兵变”，投奔国民党的“反革命”计划，交待了许继慎、熊受暄等所谓的“准备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全盘反革命计划”，还说蒋介石对许等此举，表示了真诚的欢迎，并以青天白日旗为标志，蒋任命许为××军的军长、赏洋十万元等等，这个“反革命计划”中，还有“曾中生等受了那些革命分子的怂恿和蒙蔽”。

后来，在 11 月 25 日张国焘于《鄂豫皖中央分局国焘报告苏区发展经过及肃反胜利原因》中称：

在肃反紧张中，军事委员会之参谋主任李荣桂（他曾在四军中长期工作，做过师政治委员及全军党委书记等要职）日益表现动摇恐惧，企图洗刷自己。其时并有反革命首领潘皈佛之妻确实供出他来，因逮捕李荣桂，没有费半点力气他就供出许继慎、熊受暄及他自己之全盘反革命计划，这样就逮捕了许、熊及周维炯等，而反革命之全盘组织就均陆续破获。

当红 4 军移师商城余子店时，陈昌浩即将许继慎、周维炯、熊受暄、姜镜堂等人逮捕。当天即动用酷刑。许、周挺胸横眉，矢口否认陈的指控。陈昌浩无奈，即将许、周绑缚担架上，用白布蒙盖，押往中央分局所在地新集。徐向前后来回忆说：

"有天，部队走到商城以西的余家集，我正站在路边的山坡上看着队伍行进，陈昌浩也在，队伍里抬着两副担架，上面蒙着白布，我就问他：'谁负伤了，抬的什么人？'他看了我一眼说：'没有谁负伤，那是许继慎、周维炯，反革命，逮捕了！'我大吃一惊。许继慎、周维炯都是师长，也成了反革命啦?!我说：'怎么搞的，把师长抓起来，也不和我说一声！'他知道我不满意，但没再说什么，按照那时的规矩，'肃反'是单线领导，决定权在政治委员，捕人他有这个权力，相反，你要过问，便是越职擅权，不允许的。搬的都是苏联的那一套，有什么办法呀！"

当许继慎、周维炯被押走之后，张国焘传令解职的曾中生也前往新集，说要其参予许案的审理，并对自己的错误有个交待。在陈昌浩先行一步之后，徐向前即率领着红 4 军，撤到了河南光山县白雀园。

这当儿，由于张国焘的舆论宣传，说红4军中有国民党改组派的大人物，使苏区内“肃反”的浪潮一下就掀起，很快就泛滥到各个角落。

张国焘淫威白雀园

红4军抵光山县的白雀园后，张国焘亦亲自于此坐镇，主持红4军的肃反。张亲自组织了临时法庭，亲自审讯许继慎。许于张面前，挺胸而立，怒问张国焘为何非法将己逮捕？要把红4军引到何处？张国焘羞脑成臊，下令对许严刑拷打，对许灌辣椒水，灌凉水，许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仍词严义正，严厉驳斥张加于他的罪名。张国焘见严刑不能撬开许的口供，遂对钟梅桥、任廉洁进行严刑。钟、任受刑不过，按张之暗示画了口供。张国焘依钟、任口供、炮制了一个红4军中存有一个反动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许继慎任主席，委员有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廖业琪、肖方、吴精赤、熊受暄、潘皈佛、姜镜堂。并宣称许继慎、周维炯策划了一个9月15日在武穴暴动的计划。暴动后即投奔国民党。

接着，张国焘又逮捕了军委政治部主任王培吾、秘书长陈翰香、12师政治委员吴荆赤、10师政治部主任关叔衣、10师副师长程绍山、12师副政委庞永俊、10师参谋主任范陀等。张国焘为利用肃反达到排除异已之目的，扩大自己的淫威，于白雀园的火星庙内主持召开了“公审”大会。许继慎被押上来时，已经被打得皮开肉绽，周身上下，血痕道道，因其已不能行走，用担架抬了上来，张国焘喝令其从实招供。许继慎强忍伤痛，怒道：“张国焘，你狼子野心，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我许继慎，对党，对革命问心无愧，我一生经历了几十次战斗，创建了红1军，扩大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这一切，哪个不知？哪个不晓？这都足以证明我许继慎是忠于党！忠于

革命的。是黑的变不了白的，是白的变不了黑的，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

张国焘不容许继慎再说下去。喝令将许捆起鞭打。立时上来几名彪形大汉，将许从担架上拖起，拉到庙外。这庙的门前是曹家河河滩。许继慎被捆在庙前的一棵树上，一阵鞭打之后，张国焘见许还不招，拍着桌子连喝道：“将其绑到马上，拖、拖、拖他！”

立时又有几名打手将许继慎拉到沙滩上，有人牵来一匹高头大马，而后，将许继慎绑在马的两条后腿上。一声鞭响，战马飞奔。仅跑一会儿，许便奄奄一息了。张令人将许拾过，问许招还是不招，许已昏死。张见状，令人将许抬下。接着，又审周维炯。

周被抬上来时，亦满身是伤，头缠绷带。张国焘喝令其从实招供。周怒视张道：“你要我口供？老子告诉你，廿年后还要革命！”

张国焘又喝令动严刑。

公审大会之后，张国焘本欲将许继慎立即处死，但因许在苏区群众中威望大高，没敢动手，只得暂且收监。而后，即大造许反动的舆论，对百姓行骗。他令人画漫画到处张贴，漫画画的是许继慎一手拿大刀，一手拎着人头。并令人编了歌曲《许继慎自叹》，在群众中教唱，苏区内到处贴满打倒许继慎的标语。

许继慎在白雀园被公审之后，又被押回新集，关押于政治局保卫室内。不久，中央交通员陶秉哲由上海来到新集。陶与许于狱中相见。许自知不久将离人世，但在老友面前，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是坦然一笑了之。

陶秉哲来新集，带来了中央 11 月 3 日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信，内称：

> 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 4 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中央分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

张国焘得了中共中央这柄上方宝剑，遂于 11 月中旬，下了手令，将许继慎秘密地勒死在新集政治保卫总局机关的一间房内，时许年仅 30 岁，其夫人王望春，亦被杀害于英山县城关上河摆。在许被害同时，被肃杀的还有周维炯、王培吾、熊受暄、姜镜堂、陈翰香、吴荆赤、肖方、关叔衣、庞永俊、程绍山、范陀、柯柏元、魏孟贤、潘皈佛、李荣桂等一批红 4 军中优秀指挥员。

时张国焘加给周维炯的罪名，除了其为改组派、AB 团的罪名外，还将发生在商城的几个具体问题也加到了周的身上，这就是前文所述的杀了徐其虚和戴亢若事；1930 年元月，中央巡视员郭述申和刘英连夜出走商城事；周维炯打入丁家埠和杨晋阶民团，策动民团武装起义事。张国焘把发生在商城的三件事都做为罪名加在了周身上，说周干革命“脚踏两只船”，“杀了两个党代表”，“赶走了郭、刘两个同志。”

对于许继慎、周维炯等屈死的冤魂，徐向前回忆道：

>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时，曾找到鄂豫皖时期在保卫局看押犯人的一个同志，问他：张国焘为什么要抓这些人，他们有些什么口供！他说：‘周维炯的口供是，老子二十年后还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你看，表现得多么坚决！那个同志还说：‘许继慎的口供是，你们说我是改组派，我就算改组派好啦！’搞了半天，也没办法证实许继慎、周维炯他们是反革命。后来，还是一个叫冷欣的国民党特务说了真话。1942 年陈毅同志到延安的时候告诉我，他在新四军与国民党谈判时，特务冷欣亲口对他说：‘我们略施小计，你们就杀了许继慎。’可见，我们是上了国民党的当了。”

张国焘的帮凶——陈昌浩

张国焘、陈昌浩为表白自己的肃反功绩，把肃反进一步引深，陈昌浩于彭杨学校向学员们作了肃反的经过的报告，陈昌浩说："改组派、AB团、第三党在红军中的发展，同志们都知道了他们来的已有很久的历史。因此他就大肆发展他们的组织，在去年和今年就组织一个领导机关——反革命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共九人：许继慎、周维炯、高建斗、廖业琪、肖方、吴荆赤、熊受暄、潘皈佛、姜镜堂，主席许继慎。是他们九人领袖。再在下面各级团营连发展组织，但如果下面破坏了，很难找到上面关系。我们再举个例子你们看．周维炯是个英雄，他完全是拿共产党的招牌，来替他们打天下，他曾经杀了两个党代表，赶走了中央巡视员一个是郭述申、刘英两个同志。他老早就在商城有了AB团的组织，因此，改组派又更大的发展，尤其是商光路叶集、黎集南下时，更大肆活动，现在从整个肃清改逆中，从4军11师、10师、12师、13师，就可以看出加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两个师长许继慎和周维炯，一个师政委庞永俊，八个团长：潘皈佛、吴云山、高建斗、王泽先、王明；肖方、魏孟贤、曹光南。五个团政委、封俊、江子英、袁皋甫、吴荆赤、刘性成。还有廿五个团以上的营长，三分之二的连指导员，三分之一的排长。两个师政治部主任，十二个团政治主任。各级经理处参谋处副官差不多都是清一色。例如皖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姜镜堂、皖西北四个县委书记都是富农分子。几个党团特委委员都是地富成分。蕲黄广的组织大半都是这样。这证明蒋介石、汪精卫进攻赤区和红军的企图和反革命组织的庞大。这证明过去红4军简直实际上是改组派领导，而红军中主要负责人曾中生竟置若罔闻，还向分局报告说红军健全。这次共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

五六百人。这一千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中计算起来大半是地主、富农、流氓、地痞、青红帮、国民党侦探、黄埔学生、哗变俘虏士兵及开除CPCY分子。在这些分子内部，工农分子不到一百人，并且还是一些富农、司务长。这一千反革命分子里面，有七百多共产党员，同时，可以看出乡土观念、地方观念、感情观念的大结合，如商城六霍乡，黄麻这边的士兵较少。"

彭杨学校是鄂豫皖苏区最高的军政教育机关，原在新集，1932年冬该校从新集迁到了丁家湾，时光山县保卫局也住丁家湾。在红4军肃反的同时，彭杨学校也开展了肃反。曾在光山县保卫局特务营二分队任过队长的周钦平回忆说：

"一天下午，把彭杨学校的连排干部都弄去开会，会上把他们都捆起来了。然后，派保卫局的人去当了一天的连排干部，说是摸清情况，结果夜晚就把彭杨学校的一百七十多人集中在丁李湾祠堂，我们保卫局也去了一百七十多人，一个对一个，把他们全部捉到总保卫局来了。"

对于彭杨学校的肃反，张国焘于一份报告中写道：

彭杨学校是训练连排长和指导员、培养工农干部的场所，开办至今已毕业了两期，第一期快要毕业。以一、二期的成绩来讲，虽不少，但对四军方面的帮助也相当有成效。每期学生由队伍中和地方共同派送，第一、二期人数仅一连人，第三期已扩充至三连人。成份大多数是贫农手工业工人，雇农中农很少，教授方面军政并重。第三期开办时四军尚没发现改组派、AB团、第三党组织，还在许继慎、周维炯笼罩之下，当派了不少反革命的干部混入彭杨学校来，不是来学习而是来活动和发展他们的反革命组

织。就是说到官长方面，因为李荣桂（改组派军委之一）在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当参谋，亦派了好些反革命的官长到本校来抓住一切，并向学生做反革命的活动。例如连长、排长、指导员、教官……中间也混进了反动的改组派。所以在前方的大批破坏反动组织后，彭杨学校也就来了一个清洗。在清洗之前，在士兵中进行广大的讨论，士兵都还能积极发表意见，然后停止了一星期的课程，专门来清洗学校机关，清洗方法完全是采用苏联清党的经验，在全体大会上和各连大会上来详问，结果把有无假造自己成分的分子清洗出来了。例如富农说成贫农，没有参加过暴动，说是民国十六年就参加了暴动，以及隐瞒他过去在反动民团为民团到苏区来烧房屋牵牛，或者是和尚道士分子反动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都清洗出来。该校工作人员有反革命证据和嫌疑的共逮捕十一人，其中有七个是所谓共产党员。学生逮捕的共十二名，都是党团员成分，据他们自己所报告的是贫农占大多数，因此，因为富农而淘汰有八个及其它原因而淘汰的有九人。此次清洗结果。共淘汰工作人员及学生四十九名，其中有两个学生是改组派自首的，因为他们是雇工贫农被欺骗而加入的。现在还正在建立经常的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以继续肃清和防止反动派的混入，同时还要加紧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以免把培养出来的工农干部被欺骗而陷入泥坑的危害。

红四军中的疯狂"肃杀"

红4军的肃反愈演愈烈，据陈昌浩后来回忆说，从1931年9

月13日开始到11月22日仅两个多月，就先后在军内逮捕和杀害排以上干部战士二千五百多人。但据徐向前等人后来的回忆，当时红4军中被杀害时的指战员远比此数多。

1958年11月27日，徐向前元帅在谈到红4军的肃反时，很激动地说："这个问题我看完全是扩大，这完全是王明搬来的，哪里有这些东西（指AB团、改组派、第三党——引者注）？我看没有一个真的，我熟悉的一些人，不过是成分不太好，有文化，有的是作风上不大好，最多是这样一些毛病。现在这些帽子都要去掉。都承认是烈士，许继慎、周维炯这些人哪里是什么反革命？"

中共的"左"倾痛史是用殷红的鲜血写成的。曾在红4军中专搞肃反的政务科科长杨克武对笔者说："刑法是很残酷的，如灌辣椒水，手指头钉竹签子，站火砖，捆绑吊打等等，苦打成招，非要你承认是反革命。还要你说和你说话的也是反革命。譬如，人在一起说过话，一个被抓走了，苦打成招，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这还不饶，非要说另一个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这样又把另一个抓去，如法炮制，株连一些人，然后一一给杀害了。当时的罪名很多，如战士们走路拣石子扔着玩，被抓住了，这些扔石头玩儿的战士罪名是'石头队'。战士们打了地主，在一起吃顿饱饭，抓住了，罪名是'吃喝委员会'。仗没打好，说是对反革命手软，从团长到马夫，都有罪名。总之，肃反中无奇不有，随便安个名堂就可以把人杀了。"

在肃反中曾两次陪绑、侥幸没死的张竞同志对笔者说："白雀园大肃反，主要是杀军队干部。当时，白雀园的河湾、砖桥、新集是杀人地点，一次在白雀园大河湾里杀人，实在杀不过来了，就用机枪扫射。1932年的农历正月初五，商城第三次解放，红军总医院分出一个分院到里罗城，不久，又分出一个分院到城东何店。分院共有八个护士，一个医生，医生姓谢，东北人，是被我们俘虏过来的。这个医生到分院的当天就被杀了。八个护士被杀了七个，我因年纪小没杀，李院长的爱人也没杀，可我陪了两次绑。"

常毅同志对笔者说："张国焘在肃反中呼风唤雨，结果把下边干部的头都刮晕了。1932年的5月中旬，部队行军至安徽叶集时，我们团政委将全团集合，以点名方式进行肃反。团政委手中拿着花名册，说：'谁是改组派、AB团、第三党站出来！'没人站出。因为谁都知道自己不是AB团、第三党、改组派。当时，大家都十分紧张、生怕点到自己头上，若点到自己头上，戴上'帽子'，就要杀头的。团政委见没人站出来，就按册点名，点一个捆一个，就在这一次，全团干部战士被逮捕的就有五十多名。审讯方法更荒唐，被捕的人首先承认自己是改组派、AB团或第三党，然后再供认其他一两个人，或供出已牺牲人的也行，供出了，就可放掉，去抬担架或扛大米袋子，若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也不供认别人，不仅要严刑拷打，还要杀害。"

袁克服同志用很激愤地语气对笔者说："我们那个团，三个营长换了两个，连长与指导员换了三分之二，政治处只剩下俩股长，其他连、排、班长被供出来而没有捉的一百多，清洗掉的八十九人。从这以后，部队中就不敢入党了，因为支书一捉，供说支部的党员都是，当然大家都害怕。1932年春肃反是个高潮，不管思想政治工作如何，有供就捉，富农出身，学生出身的杀得很多。中央派来的冯静也被捕了。正规红军这样搞，把地方也影响了，如耿子英、许世申、潘崇禹、高渐图等都被捉了，其中有些不但老公连老婆也被捉。这些人都是从暴动搞起的，家都不要了，是什么反革命？"

据史料记载，张国焘坐镇白雀园不几天，肃反便从上层波及到下层，不少连队的干部都被抓了。

徐尔珍写的一份材料称："1931年秋，我们团已改编成41团、住在英山县城。一天，张国焘派了刘英到我们团主持肃反。当天，就把连排干部逮了五十多人，当即严刑审讯。把这些干部打成了AB团、改组派、第三党。我那时在团政治处当干事。我们主任叫袁汉民，他受刑不过，招认了三条罪，一是组织反革命暴动，参加过反

革命会议，时间是每晚出去开会；二是搞破坏，准备割电线；三是在英山城里组织‘吃喝委员会’，并担任负责人。不久，刘英把逮捕的五十多人，活埋在距英山城南二里的一个大土坑里。我们政治处当时有十三个人，那一次就活埋了十一人，袁主任也是那次被活埋的。”

另一份史料载：有一个叫张守平的指导员，入伍前是个小学教员，在连里有一定的威望，打仗勇敢。能和战士们打成一片，就因为他有点文化，就被当做改组派抓了。其他连的连长、指导员，也都以改组派的罪名抓了起来。当时，搞得人人自危，个个心悸，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过日子。为甚捉的人越来越多呢？是因为互相“揭发”、互相“检举”造成的。“揭发”、“检举”的作法主要两条，一是诱供，把人捉来后，采取欺骗引诱的手段，说如果揭发出谁是改组派、AB 团，就可以把他放了，这样，张三便供李四、李四供王五、越供越多。有的供出的名字，供者与被供者都不认识，只听别人说过这人，就瞎供。有的全连都点名抓改组派。二是逼供。使用酷刑苦打成招。“揭发”的越多，便说态度好，只要被别人点了名的，不问青红皂白就抓起，诱供、逼供审问，逼供的结果是被逼者又胡乱供人。这样你“咬”我，我“咬”他，恶性循还，改组派，AB 团，第三党就抓不完了。到后来，某某人曾和某某人一起吃过东西，哪怕一起吃了几粒花生米，就说是什么“吃喝委员会”的，立即逮捕。

当时，各团、各营、各连都开展了抓改组派、AB 团、第三党的竞赛，看谁抓的多。有的团把正常的党团活动，也说成是改组派的活动，把参加党团活动者抓起来。

随着肃反的声浪高涨，红军中被抓的人越来越多，赤色的恐怖笼罩着军队。直搞得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互相猜疑。原来的政治空气，民主作风，阶级感情，一点也没有了。在一些连、营里还设立了“政治战士”，团、师里设了“保卫干部”，其形同国民党内的特务组织，起监视各级干部的作用。

从白雀园的肃反开始，张国焘、陈昌浩就不断向中共中央报告。1930 年 10 月 9 日，张国焘以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义写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鄂豫皖苏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报告中，把红军说了个一团漆黑，说“红军干部都极大恐慌”“多半是地主富农分子在红军当干部”。

1931 年 11 月，张国焘在黄安县委及军区党委联席扩大会上作总结，他大声说：“现在，红 4 军中发现大批的改组派、AB 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的活动，这是阶级斗争到了剧烈程度的表现。乃至改组派首领被我们逮捕起来之后，大家才害怕，在未发现以前是不注意的。现在改组派肃清没有？大部分是破获了，但没有肃清。陈昌浩同志说黄安的改组派不多，这话不见得，说比较少点可以，陈定候、陈静宜、江子英不都是改组派吗？不都是黄安人吗？”张国焘稍停又说：“改组派的活动不是偶然的，是有它活动客观原因，过去我们发展党的组织绝对不注意成分，把地主富农也拉进党内来了，只要是我们的朋友、兄弟、老婆、亲戚都介绍到党内来。富农路线，说革命的地方的地主富农也是革命的，说不革命的地方连贫农、雇农也不革命了。加之地方过去送了不少坏分子到红军中去了，苏维埃秘书长专政，其次是司务长专政，开除的共产党员专政，不革命的地主富农坏的分子专政。命令群众，拉蛮要群众抬台子，又不向群众解释，并说你不抬台子就是不革命的话。又不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怎样不发现改组派？怎样不发现第三党、AB 团！？”张国焘提高了嗓门喊道：“就是有一万二万改组派也不奇怪，直到中央分局来后，坚决执行国际及四中全会的路线，才把党从立三路线的泥坑里纠正到正确路线上面来。建立了保卫局，加紧了肃反工作！”

对于红 4 军的肃反恶果，徐深吉回忆说：“

“在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逮捕了，这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余人。例如罗山群

众领袖郑新民。麻城群众领袖王宏学，县委书记雷绍全，孝感县委委员刘纪元，过去特委书记徐朋人，黄安农民政府主席曹学楷，鄂东革命军党代表戴克敏，红31军政治部主任陈定侯，黄安党的发起者王秀松、戴季伦，商城县委书记李梯云及皖西道委书记方英。红军中的一批创造者都被杀得差不多所余无几了。”

徐向前和倪志亮所写的《豫鄂皖苏区红军历史》中，对肃反写道：

在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这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余人。这说明当时在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也是很厉害的，究竟有多少人，当时很少人知道的。……由于这一大肃反的结果，红军中有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几乎被杀完了，鄂豫皖苏区与红军的创造者几乎被杀完了，外来的党的知识分子军政干部被杀的已差不多了，六安兵暴的领导者也捕杀了，这一肃反的危害，不仅捕杀了大批大批的军政党群众的领袖，而且在党内、苏维埃政权内、军队内与地方群众中造成了极端严重的赤色恐怖。未被肃反的同志终日揣揣不安，不知死亡何时将至。由于这一大肃反，使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知识分子有军事知识、战斗经验、勇敢而机智的大批干部被杀害了，使红四军在军事理论上与作战指挥上大大削弱了，部队中的文化程度也一落千丈，使部队中造成极端反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使红军成为一支愚蠢的军队了。

徐向前还回忆说：

“白雀园‘肃反’，都是张国焘亲自审讯。开始还让我参加会议，因为我提了些不同意见，保人，说我刚来鄂豫皖边时廖荣坤同志就是营长、连长，打仗好等，以后张国焘就干脆把我甩到一边，连会也不让参加，甚至暗地里审查我。‘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的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活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年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了防止部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被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就连王树生、倪志亮这些老同志见到我，都不敢说什么，真是一片白色恐怖气氛！

张国焘这人不是没有能力，但品质不好，他是借口肃反，剪除异已，建立个人统治。不仅搞军队，也搞地方。被肃掉的大部是有能力、有战斗经验、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导骨干。最早革命的一些领导人，如徐朋人、戴克敏、曹学楷、陈定候、肖方、周维炯、姜镜堂，以及许继慎、熊受暄、陈奇、王培吾、李荣桂、柯柏园、庞永俊、潘皈佛、罗炳刚、查子清、李奚石、高建斗、封俊、江子英、黄纲、程绍山、王长先、袁皋甫、吴荆赤、王明、魏孟贤、任难、廖业祺等团以上干部，均先后被逮捕、杀害，令人痛心。营以下的干部、战士和地方上的干部、群众不知名的，更不知有多少！部队纪律严格，抓就抓吧，杀就杀吧。地方上把群众搞翻了，黄安五区的人民起来反对保卫局，群众贴标语，喊口号：‘打倒张国焘帝国主义！’群众把张国焘比作杀人不眨

眼的帝国主义，不是没有点道理。像张国焘这种品质不好的人，搞家长制统治的人，根本就不该派来鄂豫当一把手。这是第一条教训。

第二条，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倾幼稚病。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很，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幼稚得很。其实，哪个人的思想百分之百的正确，没有一点毛病呢？有了缺点和错误，有非无产阶级观念，就变成找寻反革命线索、依据，行吗？革命和反革命是有界限的。陈昌浩就更凶喽，捕杀高级干部，有时连口供都不要。这个人干劲十足，但容易狂热。记得围黄安时，有个农民领袖、红军团长叫黄钢，被当作改组派抓起来，他不服，自杀了。陈昌浩回来说：'你看黄钢反革命多么坚决，他剖腹自杀！'认定人家是改组派，没有证据也信以为真。指导思想上'左'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冤死了多少革命好同志噢！

第三条，逼、供、信，确实害死人。逼、供、信这东西，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司空见惯，是剥削阶级司法制度的产物。我们的'肃反'把封建主义的西搬来了，一逼，二供、三相信。捕人、杀人不讲证据，全凭口供。许多刑法骇人听闻。一些基层干部和战士，连AB团、改组派、第三党是什么名堂都不懂，承认了还不行，得说出'同党'来，说吧，无非是些要好的同志、同乡，在一块议论过什么事，便成了'同党'、'反革命组织"。就这样，一株连一片。逼供信，冤假错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一再发生，共产主义运动中也不鲜见，很值得研究。

最后一条，鄂豫皖根据地的'大肃反'，不是孤立的，

那个时候，是教条主义者统治中央的时候。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搅在一起，在全党、在各个根据地，搞‘肃反’，搞扩大化。他们把中央革命根据地挖AB团的经验，推广到鄂豫皖来，又把鄂豫皖、湘鄂西的‘肃反’经验推广到别的根据地去，来回折腾，大搞特搞，造成特别令人痛心的损失。”

据有关史料统计，红4军的肃反，主力4个师共12个团的干部中，仅有倪志亮和王树声幸免，余皆杀掉。在肃反过程中，仅30团就换了三次团长，政治委员和主任也换了三次。有的团换了四次、五次。大批的撤换的干部罪名都是AB团、改组派、第三党。他们被逮捕后，有的就在前方枪毙，有的送到后方保卫局。仅30团在大肃反中被残杀的班以上的干部，估计起来有五百人之多。其他各团，被杀者也不小于这个数。

鄂豫皖省保卫局

张国焘要搞肃反，自然需要一个“专政”的机构，要有一批打手。于是，他下大力气抓了保卫局。

鄂豫皖省保卫总局是1931年7月成立的。当时召开了鄂豫皖第二次工农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省工农民主政府，在这次大会上，同时成立了省保卫总局，局长周纯全。

省保卫总局机关设在新集，于省苏维埃政府对面的曾姓地主家房内。共有三层屋，办公人员住前屋临街，犯人住后边。局里面有两个看守班，局外面有三个看守队，计二百多人。

省保卫总局下设七个分局。一分局在黄安，二分局在陂安南，三分局在光山，四分局在罗山，五分局在麻城，六分局在商城，七分

局在固始。

省保卫总局主要收容下面分局解决不了的案子。当时保卫局的权力非常大，可谓操生杀大权。总局的门前站有双岗，门两边挂着两把大刀，架着机枪，站岗的都是满脸凶杀之气的彪形大汉。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

周纯全，1905年生于湖北黄安。1926年11月加入中共。汉口织布厂工人。1923年参加工人运动，任工人纠察队队员。1926年参加国共合作，任区分部农民委员。不久，被选为八里湾店员工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11月参加黄麻起义，任黄安农民政府候补委员。1928年2月任中共京汉路特委委员兼信阳县委书记。同年秋任安南办事主任兼特务队党代表。1929年5月成立鄂豫边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任委员长。8月任河口指挥部指挥，被选为中共鄂东北特委常务委员。1931年5月被选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务委员，任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

在省保卫总局成立之前，1930年6月，在鄂豫皖特委领导下亦成立了保卫局。保卫局的任务是肃反。当时，保卫局的工作积极而严谨。杀人也重证据。1930年冬天，保卫局抓了四十多人，但证据不足，为查明真正的反革命分子，便安排人打入这四十多名嫌疑犯内部。被安排的人叫吴维敏，麻城箭河人。乡支书肖永先向吴交待，要他速到鄂豫皖特委会。时已到腊月廿九，吴当即到区里办了介绍信，当天即赶到七里坪的王锡九村，向特委机关报了到。郑位三为其办了手续。年初九又叫他到檀树岗。在那里，他又见到了郑位三、周纯全、曾传六等。周纯全对他说准备成立保卫局，随即叫吴等人打扫房子。保卫局设在代世英的祠堂。房子打扫干净后，门口即挂上了“鄂豫皖苏维埃政治保卫局”的牌子。吴维敏回忆当时的情形对笔者说：“我在保卫局没几天，又通知我住党训班，党训班当时在石家湾。几天后，党训班教导主任徐保珊向我交待任务，要我到檀树岗银行当交通。我当即赶到檀树岗银行。当时银行的经理

是曹学秀。我的任务是挑票子。我经常到杨家畈送纸，回来挑票子到银行盖章。两个月后，周纯全又把我叫去，亲自向我交待了任务。要我打入县监狱内装成犯人，还告诉我装成小贩，被抓后如何如何展开工作。我就按照周的指示，挑着给我准备好的茶叶和纸烟，来到县委住地七家畈的东岳庙。在这里，岗哨把我捆了起来，接着，像其他犯人一样，审了四五次，而后，把我投监入狱。在狱中，为了弄清四十多名犯人中间的反革命组织，便一个一个地接触。四十多天过去，我只发现两个说对共产党不满的话的。后来，由于长时间的监狱生活，我身上长满了虱子，生了疥疮。最后，我把所探明的情况向县委书记甘济时做了汇报。那两个发牢骚、对共产党不满的犯人被处死了，其余都放了。"

吴维敏的亲身经历以及史料的各种记载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都说明一个事实，即在张国焘来鄂豫皖之前，在保卫总局成立之前，保卫局的肃反是十分慎重的。

省保卫总局成立后，由于肃反迅速扩大化，工作人员很快增到三百多人。局机关除原有的办公室、执行科、审讯科、保卫科和看守队外，还有特务队。各县的政治保卫局也都是拥有百余人的庞大机关。办公室负责日常的工作，审讯科下设审讯厅。审讯时，有主审陪审和记录。执行科执行处决犯人。审讯厅里摆着各种刑具，对抓来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施实各种刑法。如鞭打、火烧、吊打、坐老虎椅、灌辣椒水等。方忠耀对笔者说："1930年，我调到麻城中官驿和宋埠边界地区，担任团委书记。1931年冬，我们区里的五十八名工作人员除一名炊事员外，都当做改组派抓起，逮到麻城保卫局，当时保卫局设在可新桥。我在可新桥坐了几天牢，又被押到新集省保卫总局。第一次审 我时问我 ：'你参加过么事没有？'我那时年纪还小，听了那人问话，就说：'没有参加过么事。'那人凶着脸说：'你当我跟你说着玩那？你不说就烧死你。'接着就'啪啪'地打了我两个耳刮子。打得我火烧火燎的疼，就放声哭起来。他

们见我不说话，又把我吊起，我更拼命的嚎。他们又把我放了。”

曾经给光山县委当过警卫员的胡斌对笔者说：“逼供信这一招非常厉害，保卫局对抓来的人使用各种酷刑。如吊打，灌辣椒水，坐‘快活椅’，就是老虎凳等。坚决不招的即被活活打死。受不了酷刑的人就乱招乱供。”

省保卫总局当时在张国焘的严密控制之中。保卫总局成立之时，张国焘即清洗了原保卫局中的知识分子和出身不好的人。接着又肃清了对他不满的人。可以说从省保卫总局成立那天起，张国焘就对保卫总局及各分局不断的清洗。如光山县保卫局一次就抓走了四十多人，有许多县的保卫局长也没能幸免。

总局的法西斯行为使各分局纷纷效仿。笔者手头有几分材料，特抄录如下，足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有周钦平者写道：

“我于民国二十年到光山保卫局任特务营二分队的分队长。当时光山县保卫局还住在丁李湾。特务营的人都有短枪，专门抓票。最多的时候抓了几千人，捉人的时候都是局长下达任务。弦南区开了九次党团扩大会选区苏委员，我们到南区捉了九次。他们选一次，我们捉一次，一共捉了三十多人，只剩下一个秘书没捉走。1931年冬的一天下午，光山县保卫局把彭杨学校的连排干部都弄去开会，会上把他们都捆了起来，然后，派保卫局的人去当了一天的连排干部，说是摸清情况，结果夜晚就把彭杨学校的一百七十多人集中在丁李湾祠堂，我们保卫局去了一百多人，一个对一个，把他们全捆起，而后捉到保卫总局。”

有李念生者谈：

“1931年农历七月，我到光山保卫局，就是第三分局当勤务，三分局住新集河街。局长王大鹏，秘书李发声。局下有个保安队，队长卢光和保安队共有三个排，排长有崔世长，还有个姓胡的排副。全局共有一百多人。到了10月初，分局迁到丁李湾。过年后迁徐畈。三分局秘书换成了张宗春，事务长杨世富。在徐畈住约大半年后又迁到浒湾、曹湾、郑店一带，两个月后又迁到麻城的田铺。直到1932年冬。”

有张光漢者谈：

“1933年春，罗山县保卫局在卡房区肃反。局长是吴大麻子。”

有徐家印者谈：

“光山保卫局在徐畈村，局长王大鹏。机关在地主徐帮世的房子，两排十九间屋。大门口挂两把大片刀，还有岗哨，保卫局后面有扣留所，共八十三间房子。扣留所人多时，有一千多人。”

商城乡上石桥乡大平村余店行湾八十岁的农民李青山对笔者说：“我是民国十九年割罢麦子入的党，在村青工会当常委。这年秋天，老五区保卫局主任陶树本，找区委要人，先叫何开三去，因他不是党员，陶不点头，问我叫什么名字，我一一答后，就叫我去了。区保卫局有两个班，十六个人，成立个支部。和区政府一起住在杨堰。保卫局主要是抓案子，杀AB团改组派什么的。有一夜一下子杀了

三个。逮的土匪、反革命、劣绅都除掉。逮的土豪，就是土包财主就要钱，给钱就放人，不给就杀。内部的抓了区委卢××和沈友才。沈友才是南司人，他们两个都是AB团。我们把他俩送到了县保卫局，在那里杀了。当时，保卫局除了主任还有队长，队长叫龚保连，一区的人，后来当了游击队的连长。他走了是沈百宣，是当地人。他走后我就去游击队当排长，这已是民国二十年稻黄的时候了。”

当年曾在保卫局当过战士的张开祥回忆说：“我是1929年7月由郭店冲和陶蛮子介绍入党的。1930年春成立商光边区时，我调到保卫局当战士。保卫局住余集街北头余春芳做生意的地方，现在的学校那时候是革命法庭，老李家卖丝线的屋里是党校，开大会是在老雷家祠堂杉树林里。商光边区保卫局二三十人尽是党员，局长是李木匠，后来也肃杀了。”

种种事实都说明，张国焘把持下的保卫总局和分局在大肃反中，干尽了坏事，成了张国焘的一个得力打手。

“高唱入云”的“肃反声浪”

张国焘坐镇白雀园，在红4军中展开了疯狂的大肃反后，很快这股肃反恶浪波及到鄂豫皖苏区各个角落。

11月25日，张国焘就肃反事宜给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内称：

> 这一苏区整个说来长期执行了非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党内充满了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商人高利贷者。……现在我们可以向中央报告，我们在四军中，在黄麻、皖西党、苏维埃和地方武装中，肃反都已得正确胜利。……现在的确开始了全苏区及红军的一个彻底转变。

这一转变是执行中央路线之中局领导者，工农群众长期斗争过程中所获得的。……这一肃反比“富田事变”所得的经验还大，可以为全党的教训，特别是各个苏区可以利用这一经验。

接着，张国焘以“元芳”、“张特力”等笔名，连续在他主办的《肃反专号》和党、红军的各种刊物上发表文章，到处作报告，下指示；使“肃反”扩大化之风愈刮愈烈。

12月10日，鄂豫皖中央分局监委发出通告，谓：

当党内隐藏了许多资产阶级、豪绅地主的暗探，利用共产党的招牌来作他们反革命的活动，施用其再也残酷不过的阴谋手段的时候，需要我们以坚决的布尔什维克的精神去发动两条战线的斗争，举行广泛的清洗运动，把那些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富农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从我们党内、国内、苏维埃、工会……中清洗出去，这是我们目前最重要中心工作之一。……要继续扩大肃反的胜利，必须学习前方经验利用到后方来，广大的举行清洗运动。

张国焘对于其肃反的功绩是十分欣赏的，他在回忆录中描绘道：

红四军中发现有国民党改组派的大新闻传到了苏区，肃反的浪潮，就跟着泛滥到各个角落。“肃清反革命”、“肃清国民党改组派”的声浪，高唱入云，法兰西大革命时清除贵族反革命的热浪，不期然重新于这个苏区。

残酷的现实决不是张所描绘的那样，肃反的“声浪”，使得许多

人头脑发热。许多群众也弄不清甚么是国民党改组派，甚么是反革命AB团，只要有人指证，谁就要受到这股热浪的冲击。对于嫌疑犯，不问情由，便严加审问。审问的方式多系群众性的，被审问者在群情愤慨之下，几乎无法为自己辩护。

这股"高唱人云"的声浪，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的冤魂。时分局委员舒传贤、皖西特委书记方英、鄂豫皖苏区创始人戴克敏、曹学楷、徐朋人、王秀松、陈定候、戴季伦等都以"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罪名被杀害。仅光山县委、县机关第一次被逮捕的就达一百多人。后来又多次清洗，区乡政权大批优秀干部被杀害。亲身经历肃反的胡斌同志对笔者说："我当时是光山县委书记高敬亭的勤务员。一天夜里，高敬亭，还有指挥长戴季英、保卫局长王大朋、保卫局秘书长张宗春等人都在高的屋里开会。我倒完了茶水，就去参观县委机关召开的'县委红色战士委员会'去了。到会的有干部和工作人员一百来人。到了第二天，我一看，县委机关里除了我和几个炊事员外，全都抓走了。县副指挥沈胡子和郭胡子也都不见了。又一打听，才知都给逮捕了。后来，逮捕的人中除了炊事员、勤务员、通讯员、马夫等十几个人被放出，其他人全不知下落，以后也没听到什么音信。打这以后，县保卫局经常不断地在县委机关里逮人，有的刚到县委不几天就被抓走了。后来，团县委连办团员关系手续的人都没有了，叫我临时代办。我当时还不是团员，又不识字，只好拿着公章，来转关系的人叫我盖在哪儿，我就盖在哪儿。逼供信搞得很厉害，对抓来的人，使用各种酷刑，如吊打、灌辣椒水，坐'快活椅'，就是老虎凳。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受不了酷刑的人就乱招乱供，招供到谁就捕谁，捕了又逼供，供了即杀，杀了又捕。记得1931年腊月，光山保卫局到弦南区去抓人，一次就抓了三十多人。区苏主席刘名榜就是这一次被捉来的。过了春节，县苏又去抓了四十多。大约在1932年4月份左右，搞清队，一下子又抓了五六百人，这些人大多数是中农。除这外，平时到部队和机关里抓十个

八个的也是经常事。就是保卫局和保卫队里面的人也逃脱不了。有一次，保卫局内部就抓了四十多人。被抓来的在徐畈集中审查后，有的被送到保卫总局，有的就由分局直接处置了，有的被清洗回家了。根据我的记忆，光山保卫局从1931年冬至1932年春几个月的时间，就逮捕了五百多人，仅光山县委机关就逮捕了二百多人。”

在周河地区，肃反中杀害的计有百余人。乡苏主席李应寿、区苏会计凌保德、二乡团支部书记鄢恩远、鄢道乡的常委韩家虎、区游击队长傅良太等，都是这一带参加革命最早的，结果都被杀害。据统计，周河一带革命最早的十八人当中，有十四人被肃反杀害。

在光山县乘马区第七乡，先杀了乡苏主席韩家应，后来几任乡苏主席韩家耀、韩家仁、胡立松均被杀。由于滥杀，搞得乡苏主席没人愿干了。该区七乡四村的村干部胡金离、刘锡汉都在数月间被杀。

在乘马区的第九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方敬体、桂恒胜、杨志大、余昌强、杨家梅等五任乡苏主席就连续被杀害。此外，乡苏委员米维记、村苏主席桂家钱，都被杀害。杀到最后，把乡里的党团员都杀光了。有个叫余田龙的农民，邱田铺村人，到福田河买东西，说了句闲话，也被保卫局的人捉起杀掉了。

在八里区的第4乡，乡苏主席程胜桥、委员王光晓、王光胜、王光霞等均被杀害。

在陈店王湾村，肃反中共逮走了十六人，杀害了十三人，他们是：教师王公继、教师王宗于、教师陈宗永、农民王成兵、王公成、王成少、地主王公尝、王成奎、王玉再、王才和的两个叔叔，王公群的继父，都是农民。

在麻城的中官驿和宋埠地区，区里的五十八名工作人员除一名炊事员外，都被逮捕，而后大都杀害于可新桥的西大山脚下响水堰。

在鄂东北道，道委书记罗作环顽固地执行张国焘肃反指令，将

红 4 军后方医院的熊政委（女）及道委秘书杀害，又将红军中伤病员 20 多人杀死。时光麻特委书记张宗杏带两名警卫到道委执行公务，住在晋湾。罗作环即下令将其逮捕，又令人将张杀害于何山周岗。

箭河的曹门吴先海对笔者说："那是 1932 年元月，箭河曹门的吴世恩，因其老表被打成'改组派'，保卫局的人把他和其他的几个人捆在一起往北押送，正好从曹门村前的大河堤上经过，吴世恩在被押的人群中看见了他的老表。他这老表是箭河胡洼人，便上前与这老表说了几句话，晚上吴世恩就被捉去了，说他是反革命，第二天就给处死在曹门的后山上。箭河肖家湾有一个外号叫肖鸦雀的老百姓。平时爱说乐子话。一天，他看见赤卫队打胜仗回来，每人挑两捆枪，就开玩笑说：'嘿嘿，瞧你们挑枪，跟卖甘蔗的一样。'就因为这句话，说他诬蔑红军，被捉去杀了。"

在箭河纪念馆，我见到一份箭河地区部分村庄在肃反时被无辜杀害的名单。特抄录如下

村　名：	被杀害者
杨　丹：	王世保 甘良兴 王书材 王世安
四角曹门：	吴先真 吴维天
先石河：	来显珍 周桂义
段　冲：	张均绪 张均化
磨刀石冲：	程绪右 吴维枝
长　洼：	肖永善 肖志俭
肖　湾：	肖志旺 肖永炎 肖显宗 肖永太 肖志今 肖志义 吴德清
油榨湾：	吴老六 吴立庭 吴行云
张　河：	吴先典 吴行善 吴行典 吴先锡
黄泥塝：	徐仲明 徐进国

王　　边：　吴维平 吴先根

大　　湾：　吴先觉 吴进寿

旧　　湾：　吴维法 吴行南 戴季伦

南　　冲：　方忠景 方宗毛 方思金 方应志

张 各 湾：　赵全德

方 各 湾：　吴世法

石　　岗：　石和元 石和则 石连周 石生才 张顺金 赵基先

在商城，被杀害的党政和地方武装干部有商城县委书记李梯云、商城赤卫军司令陈慕尧、商城县委委员廖炳国、商城县苏维埃秘书兼《红日》社社长及革命法庭庭长吴靖宇、商城赤卫军参谋长徐子明、商城县中心县委妇女部长曾昭如等。时红军总医院设在商城的分院，九个人被杀了七个。

赤南县（从商城一度划出的县）县委机关共四十八名干部，被以改组派罪名杀害的有四十五个。

赤城县仅五区被杀的就有中心乡团支部书记胡玉书及其他干部陈兴朗、易敬若、易登鲁、易少春、李自由、李云福、叶孝清（女）李保鲁、孙光头、晏六泉等。三区赤卫队总指挥吴传胜于 1929 年被红军从商城国民党监狱中救出的，他回家后即拉起一支农民武装，到处打土豪，到了 1931 年时，已发展到一百多人枪，并成立了三个中队，吴为指导员兼总指挥。土豪劣绅为暗害吴，逆用了反间计，写白条子扔在道上，说吴有野心，欲带队伍投国民党。保卫局不问青红，将其父子三人同时杀害。其他赤卫队员的枪也被拿走。

1951 年，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鄂豫皖分团河南分队对商城的调查，做了如下的记录。时为 9 月 11 日，谓：

老根据地概况比较表。

商城：

区数9，老根据地占有数，大部3，一部3，折合区数33.38%……

鄂豫皖老苏区（河南部分）倒灶、肃反，查无音信人数调查表

商城：

倒灶：群众2629户，9381人；军烈属213户，790人。

肃反人数409，

查无音信人数1550人。

卖掉人数374（男孩131，女孩102，妇女141）。

备考：7个区，101个乡的调查。

商城县先后三次大肃反，村苏维埃以上的干部都杀在南溪。亲身经历者张竟对笔者说："我们那里没有一家不参加革命的，没被肃反的很少。白沙河区第一任赤卫队长余品高、彭昌定被肃反杀在南溪。家里人也被肃反杀的有彭的弟弟彭宏银，第三任村苏维埃主席，我父亲此时到区当常委，也被肃反杀害了，我叔父家十几人给杀完了。"

皖西北各县领导干部被杀害的有杨继昌、薛英、豆克难、廖炳国、芦舒等。

郭述申同志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商城的负责同志现在很少，其主要原因就是杀得太多。1933年商城县委书记，我记得是高开文被杀，少共书记是雷金杨也被杀。实际上当时的一些老同志，现在恐怕没有什么了。"

在麻城县苏维埃所在地顺河集湾店，以改组派AB团第三党罪名被杀的更多。时县保卫局住在新桥北的一座庙，庙前不远有一座小山和河坪，有幸存的方忠耀者回忆说：

"当时的小山上、河坪里堆满了死尸，狗吃红了眼。后国民党叫老百姓把这些骨尸都收埋在一个大坑里，并且还堆了好高，群众起名'万骨墩'，虽然没有一万人，也有上千人，这些被杀的人都是乘马、顺河、中宋边区、福田河区、黄土岗区的。这里的区委、区苏一般都有五六十人，大部分被杀，留下只有少数人。我在保卫局时，也亲眼看到每天从各地送到这里的案子就有一百多，有时多达一二百。保卫局白天就一一地审，审了后就送到革命法庭，关了好几间屋，夜晚都送出去杀了。在新集附近有两个杀人的地方，一是响水堰，二是土门坳西面大山脚下的水沟里。其中杀人最多的是响水堰。当时强迫AB团分子在那里挖了像水塘那么大的坑，晚上就把改组派、AB团分子押到这里，一人一刀，就是没有死，也压死了。坑满后，土封起来又挖一个坑。解放后在这里盖农场，挖的全是人骨头，并且这一块到处都是这样。很难找到没有骨头的地方。"

据1932年1月7日英山中心县委给中央的报告称，县属各级领导机关成员几乎都成了反革命。现将报告部分录于此：

皖西北整个特委只剩下方英同志和一二事务员，少共特委、军事委员会分会几乎完全是；英山党团各县如六安、霍山、商城只剩下少数同志，其余全盘都是；英山的苏区八个区委只剩下一个区委书记，非苏区的三个区委完全皆是，党的团的加入第三党的几乎有三分之一。

张国焘在白雀园肃反之后，又把军队这一套当作经验推到地方上，乱捕乱杀，大革命时曾任孝感县农民协会会长、当地有名的

农民领袖、陂孝北县苏维埃主席魏祖圣、陂安南县苏维埃主席陈金台都是使敌闻之丧胆的人物。1927 年黄麻暴动时，破击京汉铁路以配合起义就是魏祖圣带领农协会干的。结果二人都被张国焘肃杀。新集县委书记郭述申，连他的秘书什么时候被抓走的都不知道。时新集是个三千多人的镇子，肃反搞得晚上没有行人，白天不敢一人走路。

在当时，肃反的连锁反应相当严重，如果县委书记有问题，这个县委、县苏机关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跑不掉的，下边的区委，区苏干部也都跑不了。亲身经历过肃反的古广毕对笔者说："如果上头出了问题，就逐级向下牵连，甚至将那一批干部一网打尽，高敬亭在熊家河就是采取这种办法，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就将赤城地方乡级以上，部队里排级以上的干部共抓了二百多人，团、营以上干部都是高敬亭亲自审问，主要负责同志杀了二十多人，我所知道的朱世升、肃新甫同志的确被杀掉了。"

各地的妇联干部也几乎杀光。曾靖华的胞妹、商城县中心县委妇女部长曾昭如被处死。连徐向前的夫人也被肃杀。

徐夫人名程训宣，1911 年出生在黄安县七里坪程伍德村一个贫民家中，没读过书。1928 年吴光浩率红 31 师抵黄麻地区时，程训宣投身革命，从事妇女工作。不久加入中共，为中共党员。后经曹学楷和倪志亮介绍，于 1929 年底同徐向前结婚。其姐弟 5 人，除姐姐幼年夭折外，余都参加了革命，大哥程启光，参加了黄麻暴动。二哥程启宗，在黄麻暴动中牺牲，弟弟程启波也参加了红军。程训宣为人正派、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事事都走在前面。程训宣被捕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对其严刑拷打，逼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要她招供，供出同伙，程至死不说，直到被打死。

徐向前回忆说：

"我和程训宣同志是 1929 年底结婚的，她是黄安人，

家住檀树岗程伍德树，妇女工作干部。我老在前方打仗，她在后方工作，我们难得有见面团聚的机会。1932年反四次‘围剿’时我在七里坪一带打仗，战局很紧张，我无法回家看她，让警卫员把袜子拿给她补一补，好行军作战。警卫员回来悄悄对我说：程训宣被抓走了，人家说她是改组派！她的命运如何，我不得而知，也不便过问，听候组织‘审查’就是了，还是打我的仗。部队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后，我一直打听她的消息，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1937年到延安，才听说她和王树生的妹妹等一批人，都被杀害了。我就问周纯全，为什么把我老婆抓去杀了，她有什么罪过？周说：‘没有什么罪过，抓她就是为了搞你的材料嘛！”她家里兄妹五个，全都参加了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大哥程启光，共产党员，我们的特务队长；二哥当教员，也是共产党员；三哥任过基层的苏维埃主席，被敌人杀害；弟弟在我们司令部当警卫员，以后在红二十五军，也被肃掉了。她被抓走后，究竟受过什么刑罚，我不清楚，听说是打得不成样子，没什么口供，相当坚强。”

共青团和少先队虽然都是没成年的孩子，但张国焘对他们丝毫没有手软。他以CY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名义，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团组织和少先队肃反情况，内称：

这次鄂豫皖和地方红军中发现了大批的改组派、AB团、第三党，团内一个样的发现不少，并且比党内还要更多（分局秘书长、少先队总指挥两个部、分局组织部干事、孝感中委书记、光山县委书记、皖西北特委书记、麻城县委书记），这些书记都是一个月以前撤换了工作的，但是

> 还在领导工作，在县委里面及区委里面发现不少改组派、AB 团的分子，并且陂安南有整个支部都是这些分子，红军中，军区青年团委书记及四军青年团委书记，以及最大多数的师团委书记和团委都是改组派、AB 团、第三党分子，另外，皖西北算最多，现在正在进行大举破获中。

新县田铺乡田铺村李天泰、袁克福对笔者说："我们七乡四村的女干部冯雁华、余孝二人，都被肃杀。乡少先队的分队长方凤谊，还是个女娃，童子团的小队长熊习炳更小，都被肃杀了。"

张国焘还以鄂豫皖区特总党团名义，于 1931 年 12 月 12 日，向中央职工部和全总党团写了报告，内称：

> 工会的领导机关混进了非阶级成份以及反动分子，如特总工会的一个副委员长雷书诰，两个秘书长郑一民、郑新民，两个巡视员潘恩善、李庆林，光山县总工会的委员长、秘书长，事务主任，一个常委都是改组派，新集市（即苏中心）工会委员长是一个裁缝铺老板，家里还雇两三个伙计，以上都是最近发现的，至于隐藏着的现在还不知道。

张国焘亲手制造的鄂豫皖苏区大"肃反"，使苏区成了一座"肉丘坟"。

张国焘的愚民之策

张国焘的赤色恐怖，给鄂豫皖苏区造成了极大的恶果。请读者看如下两份材料，一是 1931 年 10 月 9 日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鄂

豫皖苏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说鄂豫皖苏区因清除改组派、AB 团、第三党，干部甚为缺乏，请中央火速派人。其报告内称：

> 党内斗争发动的速度不快，一切宣传工作缺乏，没有系统，红军几次战斗牺牲在两千以上，又清除三百以上的改组派、AB 团、第三党的干部，多半是地主富农分子在红军当干部，红军干部成为极大恐慌，现在各方面抽调去补充。请中央火速注意帮助。

张国焘向中央写的这份报告，是肃反之初。经过数月的“肃反”后，鄂豫皖省委又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内称：

> 县级工作除红安县以外，其余各县都是党龄极浅或能力极弱的工农同志。支部在停顿状态，支部中的党团员差不多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比较积极的农民，极大多数甚至对党的组织系统都不明白，文件完全不能透到下层去。

张国焘的大“肃反”使苏维埃完全成了一个空架子，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兼黄安县委书记、代主席竟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新集的苏维埃主席也是一个不识字的妇女。张国焘此举是武大郎开店——比自己高的一概不用，由于党员和干部的大批杀害，鄂豫皖苏区党员队伍瘫痪，张国焘遂以中央分局名义，下发了指示信。其文件为《鄂豫皖中央分局为肃反致各县一封指示信》，内称：

> 在淘汰党员之中，同时要大规模吸收新党员入党，这两个运动要一块来做。关于这个可以参考中央分局关于十月革命的一个回信，信内有关于公开吸收党员的方法。

我们要公开征求党员，在群众大会上积极勇敢的向工人雇农分子，不必问他有文化知识，不必问他懂得多少关于党的事，不必问他是否有布置能力，只要真革命，有好的斗争表现，可以自动要求入党，加以个别考察，即可以吸收入党。要为这一征求举行一个运动，作广大的宣传，在你们报纸上登载这些征求的情形，一经入即支配以适当的具体工作，处处诱他学习一切工作。

尽管张国焘大造入党的声势，但许多人不愿当干部，不敢入党。据史料载，一个叫张体学的，当时在交通大队当班长，因为他们的营长被肃杀，要提他当营长，他不愿干，哭了一夜，后来没法只好答应了。30 团机枪连的一个排长，要提他当指导员，他死活不干，就把他捆起来，直到他答应了，才把他放了。

箭河油榨湾的老红军吴行绪回忆说："1930 年春，我们这里进行了土地改革，老百姓都争着拥护红军，参加红军。那时候，能批准当上一名红军或者在后方入了党，当上干部是让人羡慕并让人尊重的事。连姑娘找对象，都要找个党员或干部。张国焘一肃反，情形大变，人们不愿入党，不愿当红军，更不敢当干部。因为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张国焘肃杀的都是这些人。"

箭河肖湾吴维群说："我们这一代之所以没有文化，罪恶祸首是张国焘，他肃反专门杀知识分子，把教师都杀光了。我们张河有个叫吴国际的教书先生，头天还教娃娃们上学，夜里给捉走杀了。那时候，各学校的教员都被杀了，有的学校往往选一个教员，没教两天就不见了。后来教员也没人敢当了，群众也不让孩子们上学了，我们这代人就这样让张国焘给耽误了。"

商城程湾有个老烈属，叫程儒海，他的家弟兄三人都参加了黄麻起义。一个兄弟在黄麻暴动中牺牲了，一个肃反时被张国焘肃杀了。他亲眼见张国焘杀了那么多红军指战员和地方干部，事虽隔多

年，仍然想起就后怕。1965年，公社领导要他儿子程宗宋当大队长，程儒海说啥也不同意。他说："我的儿要在战场上卫国牺牲了我舍得，要当干部被内部人杀了那算个啥?死了还落个不清不白的。"

张国焘的肃反扩大化给鄂豫皖苏区造成的恶果本已显而易见，而"左"倾的中共中央却于1932年2月18日，给鄂豫皖中央分局发去指示，内称：

> 最近鄂豫皖肃反工作的深入（见中央红旗副刊肃反专号），给予敌人在苏区内破坏革命的阴谋以致命的打击，这自然是革命的伟大胜利。……研究和学习鄂豫皖肃反的经验与教训，广泛的在党内党外宣传反革命的一切破坏革命的阴谋与罪恶，要成为你们目前一切工作进行中的不可分离的工作。

张国焘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喜不自胜，更加疯狂地进行肃反。

张国焘率队西逃

1931年11月7日，在黄安的七里坪，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4方面军于这一天成立。其下辖红4军和红25军，共4个师，为10师、11师、12师、73师，原红4军军部改编为方面军总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刘士奇任政治部主任。红4军下辖3个师，10师师长倪志亮，政治委员甘元景，辖第28、29、30团；11师师长王树声，政治委员甘济时，辖第31、32、33团；12师师长陈赓、政治委员刘杞，辖第34、35、36团。彭杨军政干部学校直属方面军总部。25军军长邝继勋、政治委员王平章，辖73师，师长刘

英、政治委员吴焕先，下辖第217、218、219团。

红4方面军组建之际，正是中国政局大动荡之际。1932年1月，日军进攻上海，全国抗日声浪高涨。

南京国民政府面对日军的进攻，被迫迁都洛阳。蒋介石面对日军强敌，只得把"剿赤"脚步放慢。张国焘头脑不由发热，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偏师"说，即此后进攻苏区的主要力量不在是国民党人马，而是日军。国民党军成为进攻苏区的"偏师"。2月27日，鄂豫皖省委在《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决议中，谓：

> 国民党政府的迁都洛阳，一方面表示国民党由于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失败，已经成为帝国主义所斥逐的走狗，或者宁可说是降了级的走狗。不过降级的都是地名，资产阶级所欢迎的，因为从此在进攻苏区与红军的战场上主要的火线将由帝国主义担任，而国民党洛阳政府与其它军阀政府只能担任偏师的任务。

事实上，与红军作战的，没有日军一兵一卒，完全是国民党军队。张国焘把持的鄂豫皖省委提出的"左"的出奇的"偏师"之说，连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临时中央，都感到提法不妥，3月6日，临时中央写信给鄂豫皖中央分局，对"偏师"说进行了批评，谓：

> 若说在进攻鄂豫皖苏区中帝国主义军队已经是主力，而国民党军队是偏师是绝对错误的。

1932年春，蒋介石重新组织力量，并亲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以李济深为副司令，对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进行了第四次的大规模的"围剿"。时"剿匪"总司令部设于武汉，下设左、中、右三路人马，左路军对湘鄂西，由何成浚指挥；中路军由蒋自兼司令

官、刘峙副之，共六个纵队，司令部设在信阳；右路军司令部设六安，李济深兼司令官，计三个纵队。并配有四个航空队，直奔鄂豫皖苏区杀来。南京方面此次之发动，不仅兵力庞大，且三分之一为蒋的嫡系精锐。

面对强敌，张国焘毫不在意。当时，红 4 方面军经过七、八个月的连续作战，已十分疲劳，亟待休整。而这时“左”倾的中共中央又连电张国焘，要其下令红 4 方面军出击歼敌。中央之电，正中张之下怀，张不顾陈昌浩、徐向前的反对，遂下令人马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指示，西出平汉路，进逼罗山，向信阳、广水方面出击。陈、徐无奈，只得执行。打了几仗，红军战果不大。时张国焘、沈泽民赶到军中，在夏店召开中央分局会议。会上，张、沈二人，均要红 4 方面军南下与强敌作战。会上，徐向前、陈昌浩再力陈部队疲劳已极，亟待休整。沈泽民尤其反对。仍认为国民政府军队为“偏师”，张国焘支持沈泽民意见。于是，会上作出部队南下的决定。

时值 7 月，骄阳似火，红 4 方面军指战员喊着“攻下麻城，攻下宋埠、黄陂，打到武汉去！”的口号，向麻城地区开进。时不少指战员患烂脚病，仍头顶烈日，拖着红肿脚板强行军。8 月上旬，红军攻下陡陂山，歼敌一个团。这当儿，蒋介石指挥大队人马从东线、北线、西线向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并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战术。

7 月 7 日，敌东线之徐庭瑶部向霍丘城进犯。红 25 军军长邝继勋率人马与敌血战五昼夜终于失守。邝率少数人突围，霍丘遂失。守城人马大部损失。张国焘闻之大怒，立即下令撤销邝继勋军长之职，改由蔡申熙为军长。

8 月 10 日，敌陈继承纵队向七里坪急进，卫立煌纵队亦抵河口一带，扑向黄安。张国焘见情势严重，便仓皇决定放弃围攻麻城的计划，会红军主力星夜向黄安以西转移，迎击敌主力，试图一举破蒋氏之“围剿”。

蒋氏之人马正欲与红军之主力决战，张国焘之举动恰与敌之意图相合。如此，红 4 方面军完全处于被动之中了。

8月11日，红4方面军第12师在红安城西冯寿二、冯秀驿地区，与南京方面先头李默庵第10师接火，双方激战开始。至晚，红11师赶到，亦投入战斗。敌之第83师亦赶到，与此同时，敌陈继承纵队亦向七里坪迫近。红军迫敌之势，只得后撤，红安失陷。

8月14日，方面军主力与敌在七里坪展开了恶战。方面军投入了五个师的主力，敌人亦投入了六个师，双方势均力敌。然敌兵"围剿"刚刚开始，兵力集中，气焰正盛，而红军已连续8个月没能休整，相当疲劳，且武器装备低劣。此一仗，虽敌受到重创，而红军也受到很大消耗。徐向前后来回忆说：

> "七里坪之役，战斗的激烈程度，实属少见，敌第二师被打垮，六名团长悉数毙命，战场上到处是敌军的死尸和伤号。我等伤亡约两千人，独立一师师长曾中生同志负伤。这次战斗敌我双方都精疲力竭。"

七里坪之战后，红4方面军又与敌陈继承纵队第3师、第80师激战三日。这时，敌卫立煌纵队、张钫纵队分别由南和北向方面军包围。徐向前等见敌重兵相聚，决定撤离豫东南，向皖南根据地转移。新集、商城遂落敌手。转移途中，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内称：

> 敌分路合进，每路约三师人，互相策应，我军已与敌转战一月。在黄安、七里坪两次激战，敌第二、第十、第八十九师受重挫，退回黄安补充。敌第三、八十、八十三三师又取道新集西北，协同五十八师及张钫部进攻，激战三日，敌八、八十两师又受重挫。因敌人分路合进，我军尚未能消灭敌之一路，现正移师皖西，首先消灭进攻金家寨之敌，七里坪、新集已自动放弃。我军最大困难即补充人员

不易；医院中现有近万战斗员，四分之三系烂脚病，生烂脚病者仍在增加，缺医生缺药……我军处在激烈战斗中，当按中央来电坚决斗争下去，请中区及中央紧急动员各区红军及工农群众急起策应我军。望经常告我们以敌军消息。

徐向前、陈昌浩率部抵皖西金家寨后，与红25军会合。时南京方面徐庭瑶纵队西越淠河、独山一线，卫立煌、陈继承两纵队又经沙窝、新店追来。与徐纵队成夹击之势，徐、陈见敌势大，只得又南下英山。行抵燕子河时，消息传来，英山已为“剿赤”军占领。当下，张国焘、沈泽民、徐向前、陈昌浩等于燕子河开会。决定分两路西进。由张国焘和蔡申熙一路，徐向前、陈昌浩一路，于10月上旬抵黄安高桥河一带会合。

在转移中，在冯寿二地区与敌13师遭遇，双方激战中，红11师政委甘济时牺牲，25军军长蔡申熙也负重伤翌日身亡。

10月8日，红4方面军抵红安以西河口地区。“剿赤”军立即从四面压迫而来，使红军处在方圆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四面临敌，到了岌岌可危地步。10日，张国焘于河口以北的黄柴畈召开了紧急会议。时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沈泽民、徐向前、王平章、吴焕先等二十余人。会议有两种意见，一是离开根据地向西转移，与红3军会合，一是留在根据地，分散游击。张国焘同意了前一种意见，并决定留下沈泽民，率74、75两师和独立团坚持斗争。张国焘率红4方面军总部和10、11、12、73师及少共国际团，到平汉路西活动，再视机回根据地。10月11日黄昏，红4方面军主力分左右两路纵队由四姑墩向西进发。12日越过平汉线，继续西进。

“剿赤”军发现红4方面军向西转移，立即前堵后追。10月19日，红军与“剿赤”军在枣阳南八十余里之新集以西地区接了火，一场激战后，红军不支。幸亏此仗“剿赤”军方面没弄清红军的虚实，

只是一般性的进攻，然红军依然伤亡很大，31 团团长林维权、33 团团长吴云山牺牲，师长王宏坤负伤。

战斗之后，红 4 方面军继续西移，在土桥铺，又与敌遭遇，激战后方能得脱。然红 4 方面军已处于“剿赤”军重兵围困之中，完全丧失了从外线打回鄂豫皖根据地的条件。张国焘无奈，只得带人马继续向荒凉贫困的豫西行进。至此，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宣告失败。对于失败之原由，徐向前后来回忆说：

> “第一，错误地估计了客观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头脑发热，盲目轻敌，没有及早进行反‘围剿’准备，丧失了主动地位；第二，在敌人重兵压境的严重形势下，未采取避强击弱、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而是率尔应战、正面硬顶、孤注一掷；第三，王明路线的推行，搞得根据地民穷财尽，毁坏了根据地的坚实基础和抗敌能力。相当一部分群众，脱离了我们，还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只跟着红军‘跑反’，无法形成人民战争的海洋。”

10 月 22 日夜，红 4 方面军人马继续西行。时值晚秋，凄风苦雨，加之所经之地，田园荒芜，庐舍为虚，数十里内渺无人迹，部队忍饥耐寒，昼夜西进，经新野、邓县、淅川，徒涉丹江，于 11 月初到达鄂豫陕交界的南北塘。时“剿赤”军追兵又至。11 月 11 日，红军进至漫川关东康家坪。这当儿，前有陕军占据险隘堵住去路，后“剿赤”军重兵压来，眼看红 4 方面军全军被压迫在康家坪至任岭十余里悬崖峭壁的峡谷中。

面对险恶，张国焘不由得慌了手脚，其意欲令人马分散突围。徐向前见说，忙道：“不可，若如此红军必被各个击破。”遂亲自指挥人马，杀开一条血路，尔后翻越野狐岭、抢占竹林关。又折向西北。红军人马于秦岭山脉中攀岩涉水，兼程急进。途中，不少人走的满

脚血水，病死者许多。11月19日，人马抵商县西五十余里之杨家斜。在此间，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名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

红军在杨家斜稍事休息。即出秦岭入关中。陕军杨虎城急调人马阻击。11月24日，双方于西安以南四十里之王曲镇一带展开激战。红军不支，边战边走，28日进抵盩厔县(今周至县)。

这当儿，中共中央至电张国焘，要红4方面军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迅速与红3军取得联系与行动的呼应。张国焘见关中陕敌势力，决定南进汉中。

11月29日，红军由盩厔县的新口子出发，再次翻越秦岭。时值严冬，而将士们尚衣不遮体，足穿草鞋。白天于崇山峻岭中行进，夜晚宿于老林之中。沿途人烟稀少，无处觅粮，只得以树皮野草为食，且不时大雪纷飞，不少人病饿而死。担任后卫的12师，实无奈，杀死了战马充饥。经过几天艰苦行军，通过了老君岭、厚畛子、佛坪、都督河、黄柏源等地，于12月7日抵秦岭南麓的小河口。至此，红4方面军已完全失去返回鄂豫皖苏区的可能了。

第三十一章　沈泽民与“取消派”

张国焘在率红 4 方面军西逃之际，将红 4 军和红 25 军的建制取消，编成了几个师，直属方面军总部领导。这样，在张国焘率主力西逃之后，鄂豫皖省仅剩了少数游击队武装。为坚持斗争，鄂豫皖省委又于红安三区的檀树岗、杨林岗地区重建了红 25 军。军长为吴焕先、政委王平章，下辖两个师，74 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75 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1933 年 1 月，又成立了红 28 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下辖 82 师。

这时，由于红 4 方面军主力已撤离苏区，南京方面各路人马一齐进攻。面对强敌，顽固地执行“左”倾路线的沈泽民仍坚持王明的“寸土必争”的斗争策略。面又怀疑廖荣坤有问题，是 AB 团，于是，取消了红 28 军编制，将其改编为 25 军 73 师。吴焕先对徐海东说廖有问题，随及将廖逮捕。接着，又抓了 73 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及团职干部何英荣、王正进等。徐海东后来回忆说：

二十五军肃反问题吴焕先要负主要责任。当时吴负责七十三师肃反，七十四师戴季英、七十五师是高敬亭，他们对我有怀疑。他们三人是分工的，我看肃反有宗派、扩大化。

不久，红 25 军在向太平寨转移中，75 师的 223 团因为与敌作战失利，师长姚家方和团长李生和等，亦被作"第三党"而逮捕，姚等被带到皖西北后，即被处以死刑，但事情并没到此结束。由于姚家方是"第三党"，由此而引起肃清第三党的风波，遂又在 75 师蔓延开来，该师的 223 团 5 连，在转战于西北的途中，"打粮"时弄到了一只鹅，被连部几个成员吃了，结果将指导员秦作为抓了起来，以"第三党"分子、"吃喝委员会"的首领，当着全连的面而处死。

不久，在湖北黄安的龙王山，将廖荣坤、程启波等处死。

廖荣坤，1903 年生于湖北麻城，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任麻城县农民自卫军排长。同年 11 月参加黄(安)麻(城)起义，后在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 2 路任排长。1928 年任工农革命军第 7 军队长，红 11 军 31 师 2 大队大队长，参加开辟以光山柴山堡为中心的鄂豫边革命根据地。1930 年任红 1 军 2 师 2 团团长。1931 年任红 4 军 11 师 32 团团长。同年冬任红 4 方面军 25 军 75 师师长。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作战。1932 年 10 月，红 4 方面军主力向西败退后，留在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1933 年 1 月红 28 军成立任军长，到了 4 月，因怀疑其为 AB 团而将 28 军撤了，让其为 25 军副军长兼第 73 师师长。

程启波，湖北黄安人，又称陈启波，1905 年生，在红 1 军、红 4 军中历任指挥员，1932 年 10 月张国焘率军西败后，留在了原地坚持斗争。时红 27 军成立，任 79 师 3 团团长。率部随军从英山向赤南根据地转移。11 月 6 日在淠河东岸黑虎尖，指挥突击队冲击敌

军，保障全军的胜利突围。1933年1月红28军在大畈成立后，任政治部主任。4月上旬红28军撤销改编红25军的75师时，程为政治部主任。

这当儿，王平章也于战斗中牺牲了，时由戴季英为25军政委、徐海东为副军长兼74师师长、周希远为73师师长。军长仍为吴焕先。

由于肃反，红25军在不到5个月的时间，从一万二千人锐减到六千人。

这时，南京方面又集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围剿”。这种困境本来是肃反扩大化带来的，而沈泽民等仍认为是AB团、第三党，改组派没肃清的结果。继续下大力气抓第三党，在1933年4月鄂豫皖省委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称：

> 第三党的发展继续不断，经过一个时期，肃反又发现一大批，从区级甚至县级以至支部又要重换一批，现在非有大规模的教育工作不可，但是无人去执行，办训练班的人材现在只有上述几个同志能任，但是这些同志被当前许多日常工作所堆满，绝对没有时间去办训练班。党的基础是在涣散下。我们望到这个危机，却一时没有力量去进行一个有力的转变。

在省委写给中共中央的又一报告中称：

> 最近肃反虽然仍然在不断的发现第三党、AB团的反动组织，可是这些分子是在四次“包剿”以前加入的，主要的这些人在各处进行与敌人接头，和从各方面破坏革命工作。例如麻城县委书记陈志祖是1931年下半年加入第三党；罗山县委书记徐术凤是1930年加入改组派，去年

上半年到罗山又加入第三党的;红安县委书记高方甫,1931年在兵工厂加入第三党。以及陂孝北、陂安南、河口等县委书记及各区委、区苏中许多反革命派,差不多全是一两年前加入的反动组织的老底子。在四次"包剿"起来以后,好像应当更起极大的动摇,但是实际上发现却非常少。凡一般新起的干部多半是在最近加入共产党。他们对于党的组织系统都不明白。现在这些反动派继续破坏,首领分子逮捕,他们手下的那些分子多半在党的号召下自首了。

1933年4月,鄂豫皖省委又搞出了个所谓的"取消派",说取消派的行动,主要是利用第三党、改组派等组织去工作,他们自己也都加入第三党或改组派,并为第三党的首领分子。并说取消派的理论是:认为第三时期仍然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反富农政策不正确,应当联合富农。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整个的错了。中国革命高潮现在没有,现在是国民党的稳定时期。省委为此向中央写了报告,内称取消派的首领是温玉成。温乃红4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因与张国焘工作上有意见分歧,被调到了皖西北道军区总指挥部任政治部主任。温玉成被以取消派逮捕后,即对其进行严刑拷打,但其不承认,最后,终熬刑不过,但仅承认自己是罗章龙右派,由右派派来苏区活动。准备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夺取鄂豫皖苏区代表之大多数,来推翻中央。1933年4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内称:

对于取消派只承认与苏区及白区一部分取消派分子认识等,所以对他(指温玉成——引者注)的事久延未决。末后在皖西北把张克斌逮捕了,问出了许多材料。张克斌供到温玉成是取消派的首领,并供到中央及其他苏区内

一些取消派分子的活动。因此，我们再审温玉成。因他太狡辩了，所以威吓他要用刑把他捆起来，他就畏刑是××(原件如此——引者注)在三中全会与四中全会的党的斗争中活动他加入取消派的，他和×××同志(原件如此——引者注)都加入取消派，在上海时与汪泽阁、马玉×(原件如此——引者注)都接过头。他说他加入取消派的原因，是由于四中全会将开时党内有形成分裂之象，××(原件如此——引者注)遂就借了团结革命势力的话去影响他，说：如果国际不承认三中全会，又不承认拥护三中全会之中央，则只有脱离国际。但有全国苏区，不×(原件如此—引者注)听旧中央之指挥，不久自知。再说告诉他一脱离国际以后，要和陈独秀联合才可以团结革命的势力。他并供到中央和少共中央及江苏省委，中央苏区及红4方面军内许多重要分子。在苏区内他是取消派的首领，但他自己坚决不承认，说他到苏区后绝对没有活动。

他关于中央内的取消派分子都和张克斌供的完全符合，我们认为是真。只在那材料中，还有温玉成供的一些是张克斌所没有供到的，有张克斌所供的温玉成不知道的，我们一并拿来看，这些供词是可靠的，他关于苏区的取消派所供绝少，这态度是不忠实的，主要的也怕是把实际活动讲多了增大了他的罪恶。如果在苏区巩固条件之下，还可以在监察之下许其自新，慢慢挽救他。但因他不能忠实的供，并因前次敌人进攻怕他逃跑致祸(他几次有逃往宋埠、新集的企图)，不得已将他处决了。他在政治上许多表现，前次报告中讲到，是罪有应得的。关于他的供词另外由泽民亲自密写寄上。

至于取消派在赤区内之活动，据最近所得的材料，亦和以往所得的材料差不得，主要是利用第三党、改组派取

得联合，而在党内夺取领导。当红 4 方面军退出新集时，取消派曾开一次会，欲利用许多党员之不满，推翻现有领导，由取消派来夺取领导机关。并拟以温玉成为省委书记，任×（原件如此—引者注）明潜到上海去，此种阴谋在事实上被肃反工作所逐渐打破。有些跟红四方面军去四川了，有些在鄂豫皖被捕了，有些私自逃跑了。至今尚有黎本益、任炳、黄金仁（都是取消派）不知下落，也许是跟红 4 方面军往四川去了，也许是途中开跑了，取消派的组织在下层也继续发现点，但极少，上层现在差不多肃清了。现在在下层继续发现的依然是第三党的组织，有一半是四次"包剿"以前的，有一半是四次"包剿"中加入的，这多半是由支部败坏所致。

现在我们准备在保卫局的系统下，建立侦探网和界边保卫局。

由于所谓的"取消派"的出现，在鄂豫皖省委和省苏及红 25 军中，在大抓 AB 团、改组派、第三党的同时，又大抓"取消派"。并认为"取消派"分子不少，而且都为外来干部。在抓了温玉成、张克斌之后，又抓了曾郁、陈啸秋、廖仁先、朱郝、龚良炳、朱权平等，金仁（即高晨好，为留苏学生——作者注）和黎本一在红 4 方面军退出英山时失散被敌所俘，也认为此二人是取消派。并说皖西道委书记方英在中央当交通时即加入取消派，后来方英调到赤城工作。方英在赤城间，这里的第三党都归他指挥。红 4 方面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朱光，红 4 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黄超，也被苦打成招者指控为取消派，但因其二入已随红 4 方面军去了四川，只得作罢——其实黄超完全是张国焘的心腹，随张作了许多坏事。"取消派"者供出他，大概也是想"借刀杀人"吧。

经过严刑审讯的连锁恶果，时省委保卫总局使"取消派"一案

愈加深入。认为:温玉成在皖西北间,频频与黎本一等人接近。从其作中共中央代表时起到皖西北工作上,凡经他手提拔的干部,都是取消派分子。他和廖仁先、梅光荣、方英等组成了取消派组织。10师政委康永顺也加入了取消派。

1933年1月5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报告中称:

我们在肃反竭力找求取消派之下层组织,但所发现者甚少。因为每一个取消派分子介绍的多半是加入第三党,直接介绍加入取消派的至今发现的仅廖廖数人。再则这些分子十分之九是从中央派来,全是在上海等地加入取消派,以文化工作者多。这个问题请中央注意。再柯庆施同志据我们所得的材料,他是改组派分子,与舒传贤、李溪石等在反三中全会,进行破坏党的阴谋,这个亦请中央严重注意。根据一年半来肃反的经验,苏区内加入反动派别的人,有一半是中央分局来此以前加入的。那时因为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富农地主反动分子充满党中,欺骗不少工农分子。还有一半是中央分局来此工作以后加入的。一则因为实行土行法令,大部分差不多全体地主富农分子动摇;二则因党内开始斗争,提拔工农干部,在下级执行中间带有不少反动分子倾向,而真正在政治上之教育工作则处处表现进行不够,以致肃反开始半年有余,支部中大都不明了第三党为何物,而第三党又欺骗他们说,这是第三国际下面的秘密党,比共产党要好,因此,而加入者累累;三则为肃反开始,反动派加紧活动。而最主要的原因则为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不正确与党的教育工作的薄弱。……

省委: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王平章、成仿吾、戴季英、高敬亭。　　　　高敬亭签字

红 25 军和鄂豫皖省委继续扩大化的肃反，极大的消弱了党的领导。据史载：由于在肃反中发现的第三党多是党团员，群众由恐惧而不愿加入党团组织，此现象在红军中更甚。时群众对于省委、道委等上级领导人还相信，而对于下级党则普遍的怀疑。鄂东北道青年团道委因肃杀实在没了干部只好不复存在。即使存在的道委其负责干部多半有第三党的嫌疑。红安是当时认为肃整好的县，而自县委至支部的工作人员及领导人多半是妇女和小孩，这些入的政治水平和知识水平极弱。在当时的省委各地的工会许多工作不能进行了，仅虚设个组织，贫农团的组织也无形解体，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若有若无，反帝大同盟、互济会更是同样状态。时除红军和各地游击队在一种不健全状况下工作以外，余各组织皆呈瘫痪之态。

在当时的省委中，干部的缺乏已到了极为困难的地步，省委中仅有沈泽民一人，带病在 25 军和地方两面跑。鄂东也只有徐宝珊一人，且肺病深重不能担负繁重的工作。省苏仅郑位三一人，且兼着总司令工作。省委宣传部长原为成仿吾同志，因其调到红安任县委书记，宣传部工作处于停顿。皖西北方面仅有郭述申一人独挡一面。

在当时的各县，除红安以外，其余各县都是党龄极浅或能力极弱的工农干部，麻城、罗山、光山、陂孝北等县县苏维埃都没有建立，原因是没有能胜任的干部，至于区级的干部能就更弱了。各级支部基本都处于停顿状态。活动着的支部中的党团员，也基本上是名义上的党团员。他们连什么是共产党员也不知道，只不过是比较积极的农民而已。因而，上级的文件基本上贯彻不下去。

到了 1933 年 10 月，鄂豫皖省情势更加危急。刘士奇以反革命罪被处决，沈泽民病死，由徐宝珊担任了省委书记。但徐肺病严重，工作仅勉强支持。而这时，肃反仍继续扩大。徐海东后来回忆说：

“红4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鄂豫皖省委和25军重要领导人在肃反问题上，仍受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坚持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从1932年10月到1934年11月，鄂豫皖苏区还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肃反，大致情况如下：

第一次是1932年11月，由戴季英主持，把74师320团49名连以上干部全部杀害。

第二次是1933年3月，红25军主要领导人分别到73、74、75师进行大规模肃反。73师被捕的有师政治部主任程启波、27团团长王正进、29团团长胡英荣，全师共逮捕三千余人。75师逮捕了一千多人，也把党组织解散了。全区共逮捕了三千九百多人，杀害了二千五百多人。其余名曰自首分子，罚做苦工、伙夫。

第三次是1934年农历四月上旬，省委和军委主要领导人说原25军（指1933年阴历九月上旬由徐海东和郭述申在皖西苏区领导成立的部队——引者注）未经整顿，没有肃反，政治不纯。从此开始肃反，先后把原25军营以上干部全部逮捕起来，除极少数幸免外，全部被杀害。这次被杀的还有82军政委江求顺。

第四次肃反是1934年农历八月，高敬亭一到皖西就大搞肃反，游击司令员吴保才、赤南特委书记高开义、赤南道委书记吴道芬、一路游击司令朱书金、二路游击司令杜昌甫、赤南保卫局长曾昭瑞等负责同志都先后被杀害。”

第三十二章　高敬亭之死

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7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董店镇一贫寒人家。少时于家中读了几年私塾，后因家境困难而辍学。即随父种田，农闲时，做杀猪宰牛生意。1927年，高在陆陈店管帐先生梅光荣等人影响下，投身革命。1929年秋任乡苏维埃政府武装委员。不久任弦东区苏维埃政府武装委员，因其无私无畏，斗争坚决，土豪劣绅打死了他的妻子、幼子，此深仇大恨，使高革命意志更强。黄麻起义失败后，因高参加了起义，敌人又将其家房屋烧毁，将其父打死。1929年3月，高加入中共。参与组建区独立团工作，配合红军主力作战。1930年5月被选为光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年秋，任鄂豫边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3月兼任中共光山县委书记；5月被选为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常委委员，6月被选为中共鄂豫皖临时省委委员、常委委员；7月被选为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1月兼任中共鄂豫皖省委组织部部长。不久

任中共豫东南道委书记(道委相当于地委——作者注)。10月，红4方面军西逃后，高被留在原地斗争。11月重建红25军时，任第75师政治委员。1934年9月任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时鄂豫皖省委召集红25军在光山花寨开了个会议，会议决定，红25军由程子华率部北上，高敬亭留下，坚持在鄂、豫、皖根据地。开会时，高敬亭正在皖西北，没能参加，会后，省委给高敬亭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了花山寨会议的决定。指示高敬亭负责组织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高敬亭聪明机警，办事果断，善于快刀斩乱麻，嫉恶如仇，对部下严格的不近人情，其下级无不怕他。

红25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苏区各道委、县委、区委等组织均残缺不全，国民党集重兵大举向苏区进攻，一时间，人心惶惶。

1935年元旦刚过，鄂豫皖"剿匪"总指挥梁冠英指挥十九个团的兵力向皖西北苏区进攻，高敬亭率部拼杀了三天三夜，才冲出重围。到了金寨县的抱儿山。打算寻找红25军主力，但此时红25军已西征，而高丝毫不知。正在这时，鄂东北道委书记方永乐和鄂东北独立团政委徐成基率领独立团，奉省委之命，突敌重围来寻高敬亭的。他们还带来了省委和红25军领导给高的指示信。

高敬亭看罢信，遂决心按省委指示精神，在大别山坚持斗争。大年三十，他率部转移到太湖县凉亭坳，在这里的金家大屋主持召开会议，宣布将两支部队合编组成了红28军，下辖82师和一个军直属手枪团，高任军政治委员(没设军长)、方永乐任82师政治委员。与此同时，高、方二人又把残缺不全的道委、特委、县委、区委也恢复起来，并首先建立了鄂东北道委。

应该说，高敬亭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对敌斗争是有功绩的，但是，他在一面向中央反映张国焘的"左"倾，一面继续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还在1934年农历八月，高敬亭奉省委命到了皖西检查工作时，即把皖西的工作说的一无是处，说皖西的干部都是反革命，说郭述申虽不是反革命也处在反革命包围中，还有可能是反

革命。这样，省委主要领导人不征求红28军军长徐海东的意见，就决定由高敬亭为皖西道委书记，撤掉了郭述申的省委委员和皖西道委书记的职务，调回红25军工作。省委缘何如此听高敬亭之语？这里也是有原由的，还在1934年1月，省委和红25军的领导人吴焕先就曾写信给当时在皖西苏区的红28军军长徐海东和政委郭述申，指责他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高敬亭一汇报，省委和红25军军长吴焕先就认为郭述申非换不可了，随及任命高敬亭到了皖西。高敬亭到了皖西道委的第二天，就大举"肃反"，先后杀了游击司令吴保才、赤南县委书记高开文、县委书记吴代芬、一路游击司令朱世全、二路游击司令人称杜老虎的杜昌甫、赤南保卫局长曾兆瑞等。

时高敬亭在熊家河肃反采取的是"锁链式"，即军队师长有问题，师部以至下面都必然有问题；县委书记有问题，县委机关人都跑不了，一环套一环，像锁链一样连着。高敬亭在熊家河仅十多天时间，就用这个办法，将赤城地方乡级以上，部队里排级以上的干部抓了二百多人，营以上干部都是高亲自审问，被抓的主要领导干部就杀了二十多人，为朱世升、萧新甫等。

话转回头。红28军重新组建后，高敬亭对肃反依然抓得相当紧。甚至一些士兵丢失一个机枪零件，或写错一条标语都被肃杀，为此，方永乐对高之作法表示异议。认为不能将思想错误和政治错误混同起来，绝不要再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高敬亭正"肃杀"的顺手，他不仅听不得方永乐的意见，反认为方是AB团分子，遂将方逮捕，并逼其写自供书。就在这时，红28军陷入敌重围之中，部队情势甚危。方永乐含着泪对高敬亭说："老高，你让我带部队突出重围，回头你再枪毙我！"

面对险恶敌情，高在万般无奈之中，答应了方永乐的请求。遂由方带人马掩护高等突围。最后高率主力突围成功，而方却身中数弹而牺牲。

方永乐之死，并没有使高敬亭停止肃反，他反到认为正是部队中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没有肃清，才招致部队陷敌重围。方之死，也是敌子弹的误伤。于是，在他一手策划下，红28军又连续进行了三次大肃反。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干部受到牵连和杀害。其中师以上干部被肃杀的除政治委员方永乐外，还有82师师长罗成立、手枪团团长余维、皖西特委书记兼246团政委徐诚基、三路游击师司令朱世升、政治委员吴代芬(兼)、政治部主任肖新甫、皖西游击总司令高开文、中共鄂东特委书记罗作环、陈守信、罗陂孝特委书记吴光禄、郑定国、豫东南特委书记张家胜、赤城县苏主席刘荣炳、保卫局长雷长久。时人说高敬亭在当时是以"肃反为中心，以杀人为动力"。

在高敬亭所肃杀的人中，有些本身就是搞肃杀的"积极分子"，结果又被高敬亭肃杀。其中中共鄂东特委书记罗作环就是一个。罗作环原在鄂东北道委任书记。他在1934年3月间，把一些共产党员和红军伤病员杀了二十多人。还杀了红军后方医院的一女性熊姓政委，杀了道委的秘书。后来，光麻特委书记张宗杏来到道委执行工作，住在晋湾，罗把张和其两个通讯员都肃杀了。没想到他也被高敬亭所杀。

林维先同志在谈那段历史时对笔者说："张国焘的肃反错误，一直影响到沈泽民乱杀人，影响到高敬亭还是乱杀人，这是很严重的。"

高敬亭的肃反明明是大错特错的，而当时的省委和军领导却支持他、赞赏他、甚至称其为"肃反专家"。

高敬亭错杀了大批指战员和地方干部群众，而他也被错杀。

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包括鄂豫皖在内的南方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4军，高敬亭所指挥的"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奉命改编成新4军第4支队。由高任司令员。从1938年5月至10月，仅5个月，高即率

所部与日寇进行了数十次战斗，歼灭日军五百余人，歼灭伪军五千余人，收复了庐江、无为两座城。部队发展到八千余人，成为新4军的一支劲旅。

高敬亭于大别山中坚持了三年游击战，又于抗日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这些功绩也成为他居功自傲的本钱。他眼中没有叶挺、项英的位置，说什么"新4军吃4支队的饭"，并认为自己仅为"支队司令"，官职太小了。

1938年，中共中央从延安、长江局、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派出了一批干部到4支队工作，其中有与高共过事的戴季英和郑位三，戴为支队政治部主任。

戴季英在肃反中是个"肃杀"的著名人物，后来长征到了陕北，还逮捕了陕北的红军领袖刘志丹，亏得毛泽东等率中央红军至此，刘才获救，此为后话。高敬亭对戴季英等人的到来，不仅不欢迎，甚至到反感地步，认为他们是夺自己的权来的，因而双方不断闹别扭。

1939年4月底，以张云逸为指挥的新4军江北指挥部命令高敬亭东进合肥。高不听指挥，按兵不动。叶挺军长直接下了命令，高才勉强执行，当行进在青龙场一带时，叶挺和张云逸到4支队传达中共中央东进命令。但高敬亭又迟迟按兵不动。就在这当儿，高的两名亲信，7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叛变投靠了桂系。叶挺大怒，命令部队进行"反杨、曹斗争"。在戴季英主持下，4支队开展了"反杨、曹斗争"，当即揭发高的一些问题。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4军政委和副军长项英决定在部队中展开反高敬亭斗争，高敬亭遂被逮捕，继尔遭到无情打击。戴季英下令对高施以酷刑，谓其"反党"、"反革命"、"破坏抗日"等，然高拒不承认"罪行"。

这当儿，没有一个人挺身为高说情，一来当时的政治斗争是极残酷的，人们怕引火烧身，二来高骄傲自大，又在肃反中杀人积怒甚重。6月20日，项英以高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之罪名，

同时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别发出要处决高敬亭的电报。中共中央回电，不同意项英的决定，电文内称：

> 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4支队工作，以帮助4支队改造与整理。

南京国民政府方面极力赞同，时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白崇禧在复电中称：

> 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

1939年6月24日7时50分，在肥东县青龙场的空旷之地，举行了宣判高敬亭死刑大会，叶挺以严肃地神情宣布："根据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极刑照准，现将高敬亭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高敬亭听罢，大骂项英、叶挺无耻，然一声枪响，高敬亭这既有功又有过的人物，以悲剧下场结束。

1945年"七大"间，毛泽东忽然想到高敬亭，遂问有关人道："那个高敬亭不杀可不可以？"

全国解放后，高敬亭的妻女一直被作为反革命对待。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女高凤英从一老同志口中听说了毛泽东当年说过的这句话，遂致信毛泽东，请求中央为其父平反昭雪，毛泽东于病中为此作了批示，要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不久，毛泽东又在审查的报告上批示军委讨论高敬亭一案。

1977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1980年4月，高的家属与有关部门在合肥市烈士陵园为高举行了隆重的骨灰安放仪式。

第三十三章　曾中生直言张国焘

张国焘率红 4 方面军在城固县小河口停下之后，由于部队这样转来转去，人心可就乱了，尤其那些早就对张国焘的一意孤行不满的人，如曾中生、邝继勋等，肚里的火再也压不住了。时有曾任红 4 军政治委员的余笃三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干部王振华、朱光三人，气愤之际，要到中央告张国焘的状，告张一意孤行，把红军拖到败地。三人一番商量之后，找到曾中生。

曾中生自被张国焘撤销红 4 军政委职务之后，先是调离部队进行"考察"，继尔又降为黄安独立师师长。黄安独立师是在 1931 年 12 月由黄安独立团改编的。装备差、人员少且新兵多。曾中生没因受打击而灰心。他下大力抓了这支队伍。红 4 方面军西败之后，曾中生随着队伍西行。他在高桥河之战中，脚被打伤，在西败途中的永家河战斗间，臂部又负了伤。他不顾伤痛，一面行军，一面做调查研究。红 4 方面军到了城固县一带时，他感到这里的群众基础

好、地形好，红4方面军不应再盲目流动，应在此建立根据地。正当他考虑如何向张国焘反映时，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朱光、王振华、刘杞等人找到他，向他说了要向中央告张国焘状之事。

曾中生听了，说："向中央反映情况固然好，可江西距此千里迢迢，谈何容易？况中央是否听我们的，也很难说。"他说着，长叹一声："我做丑人做到底吧，由我出面写意见书，向张国焘陈述大家的意见。要求他停止向西北无止境地退却，争取在川陕鄂一带创造新的根据地。"

众人虽对张国焘极其不满，可也惧张之淫威，见曾自愿挑头，也就同意了。随后，众人将对张之愤懑，痛快快地发泄了一回，曾中生依据众人意见，写了份意见书。众人又推张琴秋去做陈昌浩的工作，要陈也反张。缘张琴秋与陈昌浩在莫斯科是同学。张琴秋把众人反张国焘之意见向陈说了之后，陈昌浩表面点头，而当天就将众人之举密报了张国焘。张国焘听了，心甚恨之，可红4方面军已兵败至如此地步，他只好将对众人之恨压下，决心摆出一幅笑脸。

12月8日，张国焘在小河口召开部分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会议一天始，众人的怒火就一起爆发了。曾中生，邝继勋、余笃三、张琴秋、王振华、朱光、刘杞、舒玉章等人即对张国焘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批评他肃反中乱杀人，批评他土改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家分坏田"的"左"倾政策。大家发言一个比一个激烈，有的人甚至站起来，指着张国焘说："张国焘，你今天杀这个，明天杀那个，说这个是反革命，那个是反革命，你是头号的反革命！你丢了根据地，使红军连遭失败。你把红军带到这里，你到底想干什么？"

张国焘耳听着众人的发言，心里恨的牙根儿发痒，可面上却带着笑容，一再的检讨自己。张国焘这个举动，使那些本来一肚子火气的人却没了火了。会议开到最后，众人的批评变成了建议和要求，要求张国焘以后要及时把行动方针报告中央，张国焘极谦恭地接受了众人的意见。他把对曾中生、余笃三、邝继勋等激烈反对他

的人之恨，压在心底，用一副伪善的面孔，将众人之怒火化为乌有。他表示此后决心加强集体领导。会上，他依照众人意见，成立了“前敌委员会”，张国焘并提议由曾中生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由张琴秋任红 4 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12 月 11 日，红 4 方面军南渡汉水，进抵城固县上元观地区，稍事休整后，于 12 月中旬，在西乡县钟家沟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入川，建立以川北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12 月 17 日，红 4 方面军以 73 师 217 团为先遣队，进军川北。25 日占南江。1933 年 1 月 23 日进占巴中，之后，红 4 方面军于此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在 1932 年 12 月 29 日，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在通江成立，由邝继勋任主席。1933 年 2 月中旬，又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由熊国炳任主席。张国焘担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任副主席、曾中生为参谋长，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设红 4 方面军总指挥部，由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就在这当儿，1933 年的 1 月 5 日，留在鄂豫皖苏区的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人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王平章、郑位三、成仿吾、戴季英、高敬亭等，联名向中共中央写了《鄂豫皖省委关于第四次反“围剿”及坚持斗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报告中对张国焘的家长式领导方式和右倾逃跑主义的错误，进行了告发。内称：

他（指张国焘——引者注）不采取集体领导的方式，不发动自我批评，不在适当范围之内发展党内民主，在组织上差不多全是执行委派，以致许多上级负责同志每参加一次会议则感觉不能充分发表意见，且开会无许多兴趣，而两条战线斗争之在下级则恶化成为上级巡视员至下级以审判态度与处罚主义，使多数干部不安于工作，新

提拔分子不愿负责，群众中积极分子不愿入党……此实国焘同志家长制度领导方式的残余之危险，由此而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

红四方面军的这个行动（指离开鄂豫皖——引者注），……我们看来，这种行动是违背了国际指示、中央关于红军的训令和中央局关于运动仗电文等文件所指示的正确路线，而走入了逃跑右倾主义、如出一辙。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之领导负责者，当为国焘同志与昌浩同志，而国焘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者，因为他从南昌暴动一直到现在，以及由于他在苏区所发表的种种观点，实是一贯的倾向。

沈泽民等状告张国焘，满以为中央必然对张国焘采取惩处之行动，哪知博古等中共的"左"倾领导者们，不仅没直接批评张国焘，反把沈泽民等训了一通，3 月 15 日，博古把持的临时中共中央复信鄂豫皖省委，内称：

我们认为你们 10 月 11 日"红军应该暂时离开苏区"的决定是非常大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决定就是红四军团西逃的基础。……省委员会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同志，以及红四军团的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错误的策略，应负全部责任。如果只把责任嫁诸红四军团的领导同志，那是错误的，你们必须从这些错误中去学习。

中共临时中央信中还肯定了张国焘建立和发展川陕根据地的计划，认为：

四川、陕西均是统治阶级最弱的一环，在那里有强大

> 的群众基础，红四军已成了吸引和团结当地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和发动整个西北革命运动的杠杆，这在中国革命在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上，将要引起很大的变化。

中共临时中央的这封复信精神，张国焘很快得知，他一面暗恨沈泽民等告自己的状，一面抓紧川陕边苏区的建设。

第三十四章　张国焘再开杀戒

再次大造"肃反"舆论

张国焘经过一番紧张的工作之后，红4方面军在川陕边苏区站稳了脚。于是，他又凶相毕露，决定再开杀戒，向反对他的人开刀。他首先下令成立了"川陕省总保卫局"，各县也成立了县保卫局，并为其配备了保卫团、营、连或队。省保卫局局长为曾传云、副局长丁选武、秘书长寇庆炎、审讯科郑训纲。下设一团人的保卫队，还有执行科、看守所、侦察科。在红军的军师政治部内设有政务科。保卫局由张国焘直接控制，别人不得染指。为造舆论声势，5月11日，张国焘指令中共川陕省委在《关于保卫赤区运动周决议》中，写了肃反的话，称：

一定要在群众面前揭发改组派、AB 团、第三党、取消派之反革命活动。要号召群众起来监督红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是否他们真正是为穷人谋利益，或者有如此之反革命活动，应由穷人报告与苏维埃，政治部裁判之。

接着，张国焘即把矛头对准小河口会议上向他“发难”的人。1933 年 6 月，他在《干部必读》上发表文章，谓：

红四方面军中托陈派的主要领袖，就是余笃三、赵箴吾（73 师政治部主任）、王振华、杨白（73 师参谋长）等。他们利用红军过铁路西进和此次收紧阵地的机会，大大活动。说什么“红军要垮台”，并且说：“看呀，红军和苏维埃快失败了，到底托洛茨基对，快快开小差，投降国民党。”

张国焘发表这篇文章时，正值四川军阀田颂尧发动三路人马向红 4 方面军“围剿”之际。时田颂尧调动了三十八个团近六万人，分左、中、右三路纵队，杀气腾腾地向通、南、巴根据地实行三路围攻。张国焘见敌势大，原想弃地逃走，后徐向前、曾中生等主张力敌，张国焘勉强从之。双方激战之中，张国焘仍决心清除异己，遂于《干部必读》上发表文章，之后，就下了毒手，第一个被其问罪的就是邝继勋。

邝继勋原本川军起家，于川中影响很大。他受命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后，积极筹备成立川陕省工农民主政府，发动群众，进行土地革命。为了分化瓦解敌人，他向张国焘建议趁当时四川军阀混战、军阀之间矛盾重重的有利时机，同一些军阀搞统战，以击破主要之敌，使红军于川陕根据地站住脚。邝的主张和行动，使张国焘找到了报“小河口会议”的一箭之仇的借口，其谓邝思想右倾，

遂将邝降为通江县军事指挥长。

当红 4 方面军反田颂尧三路围攻最紧张之际，张国焘与川军杨森互派代表，在江口进行互不侵犯的谈判。谈判开始之前，张国焘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他指示邝继勋利用邝与杨森的旧关系，给杨森写信，劝杨与红军互不欺犯。邝信以为真，遂以个人名义给杨森写了封信。信中谈了几句旧宜之语。待邝把信发出之后，张国焘即派人将信劫获。接着，即将邝抓起、说邝勾结杨森，欲叛红军，并以邝给杨森写的信为证据。邝继勋见张国焘如此歹毒，于狱中破口大骂，骂张乃奸诈小人。张国焘闻之大怒，即下令将邝秘密处决于通江洪口场。而后，给邝安了"勾结杨森，准备叛变投敌"、"是国民党改组派"的罪名，于红军中公布。

肖永正在回忆邝继勋被害情景时说：

> "我记得部队到洪口时候，邝继勋同志长须垢面，形同犯人一样走在队伍后面，可是，离开洪口的时候就不见邝继勋了。以后也就再没有见到他。因为，在鄂豫皖根据地，我和邝继勋同志一起，枪林弹雨中度过几个春秋，所以我惦念着这位勇敢无私的指挥员，我总设法探听他的下落。后来才听说，就是在洪口那个地方，一个月黑之夜，张国焘密令他手下的人，用绳了将邝继勋同志勒死，弃尸野外。"

到 1937 年 3 月，毛泽东在批判张国焘的会上义正辞严地说："邝继勋同志是好同志，他被张国焘迫害而死，是革命烈士。"

在邝继勋被逮捕之后，张国焘即令陈昌浩和保卫局以老一套的"肃反"手段，又掀起了大肃反的高潮，大搞逼供信和"自首"运动。张国焘在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恶狠狠地说："在红 4 方面军脱离鄂豫皖赤区过铁路西征的艰苦斗争中，右派就开始形成。他

们在脱离鄂豫皖赤区的艰苦斗争中，惊慌失措起来，结果滚到了右派的怀抱。他们散布'往那里去'这种动摇军心的口号，散布'群众不满领导'，'领导内部不一致'以及种种瓦解红军的口号，来助长悲观失望心理。……右派又与托陈派、改组派、AB团、第三党联合起来，形成了小组织活动。"张国焘拍着桌子说："曾中生以这种立三路线的观点反对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形成小组织式的斗争，结果，助长了改组派、AB团、第三党的嚣张，我们党再不能让这种人来糟蹋，必须执行纪律！"

接着，张国焘拟出了逮捕的"改组派"、"第三党"、"AB团"的名单，上面除邝继勋外，还有余笃三、10师参谋主任吴展、73师217团政治委员闻盛世、218团政治委员陈少卿、73师政治部主任赵箴吾、参谋主任杨白、舒玉章以及红4军总部工作人员李春霖、王振华、王占金等多人和大批中下级干部。余笃三被扣上"托陈派首领"的罪名。逮捕之后，即用严刑，继尔由张下令，统统处死。

张国焘在下令处死余笃三等人后，又将独立师师长任炜章、参谋长张逸民、政治委员刘杞、政治部主任李戴溥逮捕。

独立师是川军任炜璋旅起义后改编而成的。

任玮璋外号"任胡子"，原是杨森军中一名旅长，兼渠县县长，因与杨森不和，将队伍拉到了田颂尧的"防区"，占山为王。在这支队伍里，还有参加过升钟寺暴动的领导人，共产党员张逸民和李戴溥。任胡子经张李二人鼓动，投奔了红军，其所辖两千人编为红军独立师，由任玮璋任师长、张逸民任参谋长、李戴溥任政治部主任。如今田颂尧三路围攻，张国焘对任玮璋的人马不放心，遂派陈昌浩去了南江，将该师拆散混编，并清洗了一部分军官。任炜璋从率部起义参加红军仅四个月即被处死，但这四个月，已足显其英雄本色。他指挥人马与田颂尧部在普济岭之战中，一战成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此从瑞金发来嘉勉电，赞扬任炜章，内称：

任炜璋等同志成立工农红军，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为本阶级——工农阶级的解放与拥护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是中国革命史上光荣的一幕……红独立师向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开火的英勇行为，给予敌人有力的打击，确实是粉碎敌人大举围攻的一支生力军，苏维埃中央政府表示无限的敬意与嘉勉。

就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来电不到一个月，即1933年4月21日，任炜璋被张国焘以“图谋反叛”的罪名投监入狱，而后即严刑拷打，任一再申明，据理力争，均无济于事。6月间，他被杀害于通江城郊。时年四十岁。四年后，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时，任炜璋才得到平反昭雪，列为中国工农红军烈士。

这里，把策反任炜璋后张国焘被屈杀的张逸民和刘杞介绍一下。张逸民、四川南部县人，1929年加入中共，1933年3月，调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刘杞，湖北人，铁路工人出身，曾参加“二七”罢工，1927年加入中共。

对于张国焘又在川陕苏区掀起的大“肃反”，徐向前回忆说：

“反三路围攻开始不久，张国焘即借口部队‘不纯’，令陈昌浩和保卫局进行‘肃反’。老一套的办法，单线领导，任意捕人杀人，军委主席和政治委员说了算。罪名无非是什么‘托陈取消派’、‘右派’、‘通敌’，‘AB团’、‘改组派’等。天晓得！当时，战争异常紧张，部队整天和敌人拼杀，一个人顶好几个人用，有生力量宝贵的很。我在前线听说一些干部、战士被捕的消息，真恼火极了。九军七十二团政委陈海松，年仅二十岁，很能打仗，被列为‘审查’对象，要抓起来。军长何畏跑来找我，我说：他是个小孩

子，有什么问题呀，不能抓！我打电话问了昌浩：‘同志，你们想干什么？我们的部队从鄂豫皖打到四川，是拼命过来的，哪来那么多反革命？现在弄得人心惶惶，仗还打不打？命还要不要呀？’陈昌浩有张国焘撑腰，奉命行事，我的话他当然听不进去，电话里应付了我几句，实际上仍在坚持‘肃反’。”

张国焘不仅借“肃反”之名杀了邝继勋等反对自己的人，对于战斗没能取胜者，也以“改组派”之名杀掉。时73师218团第3营一仗没打好，张国焘即下令将团政委陈少卿当做“改组派”抓起，而且株连了全团排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抓起，有的被监禁，有的被杀，有的被送到运输队里扛大米袋子。

曾中生身陷囹圄

当红4方面军粉碎了田颂尧的三路围攻之后，1933年6月25日，川陕省委在通江新场坝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会议听取了曾中 生代表省委所作的报告：《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党的任务》等决议。接着，便是木门会议。

木门会议是6月底在旺苍县的木门场召的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一百多名红军领导干部。由陈昌浩和徐向前主持会议。会址在木门附近半山腰的 一座破庙里。会议决定将原有的四个师扩编为四个军，总结了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会上，许多人对张国焘的肃反提出了批评，尤其是曾中生，批评的更为尖锐。会场上，发言人无不慷慨激昂，纷纷强烈要求张国焘停止内部的“肃反”。有个师政治部主任，因为追随张国焘搞刑讯逼供，杀人不少，在会上竟挨了批斗。众人的发言，使陈昌浩头脑清醒了许多，他在讲话中承

认错抓了人。张国焘也哼哼唧唧地说了几句，还同意把错抓的人放回。

张国焘在会上采取了守势，而心里对曾中生等人更恨，他决定把会上挑头向他发难的曾中生搞掉，尔后更加紧肃反。

木门会议之后，曾中生一面抓紧部队的扩编工作，一面挤时间写《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他把自己多年来同"剿赤"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写了出来，以便作为部队的军事教材。8月1日这天，他刚刚把这部书稿写完。张国焘的一个亲信带着十几名打手闯进了屋，不由分说地把曾中生捆起。曾中生见状怒道："你们凭何抓我？"

那人冷笑道："你反对张主席，反对张主席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

曾中生说："我给张主席提意见，这是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

没等他说完，那个亲信早已抡圆了巴掌，"啪"地一下打在了曾中生的脸上，嘴里还恶狠狠地说："你们这些反革命分子还讲什么民主？"

这一巴掌打的太重了，血水顺曾中生嘴角流出。接着，曾中生被五花大绑绑走。临出门时，曾中生指着桌子上的书稿对那亲信说："这是用鲜血写成的书，你不可毁掉！"

那亲信不容曾中生多讲，连踢带拽的把曾中生带到了刑讯室。

张国焘亲自审问曾中生。曾中生怒视着张国焘说："我犯了何罪，你如此待我？"

张国焘满脸的横肉紧了紧说："你犯了何罪，你自己很清楚。"他一拍桌子，尖着嗓子说："在鄂豫皖，你和许继慎勾结一起搞我，我容了你，到了小河口，你看红军快完了，看我张某人不值钱了，把托陈派、右派、改组派分子邝继勋一伙人纠集一起反我。"

曾中生说："党的会议上，有什么话都可以说，这是党内民主生活所允许的。"

张国焘说："什么民主？党对牛鬼蛇神没有民主！幸亏我们党是伟大的党，不然，就被你搞垮了，改变了党的路线。"说着，张国焘又一拍桌子："限你五天，写出'自首书'，彻底交待你在鄂豫皖时期和小河口会议攻击我的罪行。"

曾中生听了怒道："张国焘，我曾中生行的正，坐的端，没什么可自首的。你杀了那么多的人，要自首的应该是你！"

张国焘听了曾中生之话，顿时双眉发横，喝令左右："用刑！"

张的话音没落，立时过来七八个兵丁，手持皮鞭，蘸着凉水，将曾中生一顿狠抽，直打得曾浑身是血。停下之后，曾中生怒视张国焘道："张国焘，你这杀人的刽子手。你杀了我曾中生还会有李中生，王中生反对你，血债一定要血还！"

张国焘听了，气得暴跳如雷，又下令将曾中生一顿狠打，直把曾中生打得昏死过去，才被拖进监房。

曾中生在监房中躺了十多天，总算没死，他惦记着没写完的《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一书，便向看押兵丁要来笔纸墨水，在油灯下凭着记忆，又把《与"剿赤"军作战要诀》重新写了一遍，全书计四万字，有论有据，总结了鄂豫皖反"围剿"的经验教训。文中讲了行军、住宿、侦察等，其内容包括纲要、红军与白军在军事上的对比，红军一般注意之原则，行军、驻军、战斗搜索注意之事项。与"剿赤"军作战之要领及战术、特种战术、特种战斗（山地）、河川、森林与居民地、夜间战斗等共十部分。书中又系统地总结了十种反"围剿"战法。为：一、内线作战各个击破法；二、专击敌之联络点法；三、前进包围谷进包围法；四、专于抄袭迂回法；五、声东击西、避实就虚，专以飘忽行动击敌要点法；六、围攻一点、消灭援兵法；七、诱敌深入、集中力量而消灭之法；八、布置大的游击战争网法；九、尽力发挥夜战效果法；十、突出外线攻击法。曾中生还根据历次反"围剿"所遇到的敌情，详细地分解了敌人所采取的围攻、封锁、分进合击，并进长追；重层配备，活动"搜剿"；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等十种

“围剿”的战法。

《与“剿赤”军作战要诀》书稿完成后，即被张国焘的亲信抢走。呈送张国焘。张国焘看后，觉得很好，便提笔勾掉了曾中生的名字，又批示道：

> 此文很有价值，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印发全军。

很快，红 4 方面军指战员都看到了这本书，都感到这书写的好，开始，大家还以为是张国焘所写，后来才弄清为曾中生所写。曾中生的这一著作后来随着转战的红 4 方面军指战员带到了延安，毛泽东见了，拍案叫绝，他在 1936 年撰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时，从中吸取了许多素材，得到了不少启示。曾中生的心血，也融进了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之中。

对曾中生的逮捕，徐以新后来回忆说：

> “那是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曾中生同志和我是同一天被张国焘逮捕起来的。记得那一天，我从前线回来，参加通江阅兵，我是阅兵总指挥。张国焘、陈昌浩都出席了。当天晚上，陈昌浩打电话要我去保卫局，说有重要会议；我去了，才知道是要抓我。陈昌浩对我说：张主席（国焘）让我叫你来的，在四方面军中，你是仅次于曾中生的反对张主席的第二号人物。张主席曾经和你谈过了，你为什么一直不检讨？你是严重地右倾机会主义。不过你和曾中生不同，你还年轻，在保卫局好好反省，还可以快一点出去工作。我听了很气愤，我不服。我过去和陈昌浩在莫斯科是同学，当时就拍桌子和他争吵起来。我问他谁是‘右倾机会主义?’?难道‘右倾机会主义’就要进保卫局吗?陈

昌浩说，你在保卫局的院子里还可以走动走动，但不能出去。我问他：曾中生呢？他说，曾中生也来了。从此，再也没有让我见曾中生同志。我与曾中生是同学，在武汉时期我们就相识。在根据地时，他经常到我那里来谈天。他对我说：同张国焘这个人很难讲原则，他说的话不一定可信，他答应的事不一定兑现。"

曾中生被捕之后，张国焘即在《干部必读》上发表《右派的根本错误》、《托陈取消派之完全破产》等文章，对曾中生大加诬陷。

川陕苏区"肉丘坟"

张国焘在处决了邝继勋、余笃三等人后，又逮捕了曾中生。凡在小河口会议上反他张国焘的人，不是被杀就是被捕，张琴秋也因反张国焘被撤销红4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职。张国焘要张琴秋揭发曾中生等人的所谓"右派"活动，交待与曾等人的关系，写出"申明书"，公开承认错误。张琴秋不屈不挠，拒不认错，认为自己行的正坐的端，其他人也没有错。张国焘大怒，遂将其派至红江县（今通江县谙阳坝）任代理县委书记。后又调任红4方面军总医院任政治部主任。尽管张国焘对其一压再压，而张琴秋始终不低头。张国焘无奈，后将其"发配"到战斗部队，到妇女独立团任政委。

川陕苏区建立之后，中共中央从白区派了一些干部到达这里，中共四川省委也派了干部到川陕苏区。张国焘一心要把川陕根据地建成独立王国，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鼻鼾？遂又以"肃反"之手段，将这些干部几乎全部杀掉。时有全国海员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奉中共中央之命调到川陕苏区，任省总工会秘书长和红4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1934年10月，廖承志在参加川陕根据地第四次党代

表大会时，张国焘喝令将廖抓起，其罪名是廖的父亲廖仲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其母何香凝曾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部长。与此同时，张国焘还下令抓了胡底。胡底也是中共中央派往川陕苏区的干部，他当年曾和李克农、钱壮飞一起在上海保卫过中共中央。胡底被抓起后不久即被张国焘下令秘密杀害。廖承志后来回忆说：

> "中共四川省委为支援根据地的斗争，曾先后派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等二百多人，来根据地参加各级领导工作，其中有不少是曾经留学苏联的知识分子干部，张国焘把这些干部几乎杀尽。当时我和罗世文、朱光同志等，也被张国焘监禁起来。"

时被张国焘杀害的四川干部有省委秘书长戚应风、马步旭、反帝大同盟秘书胡曼石、县委书记赵鲁平等二百多人。中共陕南特委书记杨珊、省苏文化委员会主席张逸民等也被诬害，罗世文被张国焘下令逮捕，长期监禁。

张国焘为搞军阀统治，他容不得其他红军。时有王维舟于1929年4月27日，在川东万源的固军坝，领导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了川东游击军第1支队。由李家俊任指挥员。后此支人马被李立三的"左"倾中央调去进攻武汉，于湖北途中失败。1930年秋，王维舟、李光华等又于梁山县领导农民起义，成立了川东游击军。由李光华任司令、王维舟任副司令。队伍一千余人。在一次战斗中，李光华牺牲。王维舟率部突围，于达县、梁山、开江三县交界地区坚持游击战。是年10月，到了1933年夏天，川东游击队发展到二千多人，是年10月，红4方面军发动了宣达战役，迅速放了宣汉、达县、万源三城及广大地区。川东游击军与主力红军会师。当即在宣汉城举行了有4万多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会上宣布川东游击军正式改建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方面军第33军。以原川东军书记兼游

击军总指挥王维舟任军长，以原梁达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为政治委员，（不久又任命罗南辉为副军长）。下辖三个师，红97师师长为蒋群麟、红98师师长为冉南轩、红99师师长为王波。全军两万余人。为红4方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

红33军因占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因此战斗力很强。他们万没料到，因为力量强大而"震"了张国焘这个"主"。在红33军成立不久，张国焘即寻借口撤了王维舟军长之职。王维舟后来沉痛地回忆说：

> "我同张国焘于1922年曾在苏联列宁所召集的东方和平会议上见过面，在四川这段时间，常与他见面，对他提过很多建议，但他都不采纳，一意孤行。从改编为红33军以后，在这一阶段中，处处受到张国焘的歧视，改编以后我军人多弹少，武器、弹药也缺乏补充，张国焘对我军待遇不一样。最不幸和最令我痛心疾首的，是经过党多年培养出来的三百余青年革命干部遭受了无辜的杀害。这些同志几年来在地下艰苦的环境中，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未遭反动派杀害，却在自己内部，在张国焘叛徒'左'倾路线的毒手下牺牲了。游击军和红4方面军刚会合，张国焘派人在宣汉属双河场以开会名义杀害了地下党的干部百余名，在巴中县，张国焘把我们三十三军的两位师长蒋群麟、冉南轩，从前线调去，也被暗中杀害；又在宣汉属之清溪场冉家凹口，于点验时杀了三个团的团级干部，其罪名是他们过去当过保甲长。又在黄中铺前线正当同敌人在激烈战斗中，把正在火线上指挥作战的军政委杨克明同志撤职调离前方。而我那时正在忆口养病，前方无人指挥。不仅如此，张国焘还下令将排级以上干部五十余人都调到后方，大部分被杀害了，未被害的只有少数

几个人。战士们都是从多年游击战争中锻炼出来的，他们不管张国焘的内部屠杀。坚决相信无产阶级政党总有一天要放出灿烂红光，照耀着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因而，三十三军的全体同志毫不动摇地接受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全军的干部和战士都处于随时有被叛徒张国焘杀害的危险。经过我们的多方教育和解释，全体同志都认为我们是革命的组织，坚信总有一天会弄清是非的。"

川陕苏区"肃反"到顶峰时，以所谓的"斩草除根"和"恐怖"代替明确的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社会肃反，常常不分首恶，不分罪恶大小，均简单地予以杀戮。在川陕省巴中道苏维埃主席联席会上所作的决议中规定："是罪魁、是国民党员、区正、团正、甲长、侦探、坐探一律斩尽杀绝。"与此同时，还提出了"改造苏维埃"的口号。为此，省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余典章、省苏副主席，罗海清、赤江县苏主席谭永寿、南江县苏主席岳冠斗、巴斗县苏主席刘开贤等多人，均惨遭杀害。徐立清于 1933 年 8 月 28 日写的《赤北县工作情形和错误的报告》中称：

赤北县肃反工作不正确，有的不当提的提了，不当放的放了，不当罚的罚了，不当没收的没收了，如将陕南过来的小商杀了三十人，没考察清楚就送到上级，以后就没有人来做生意了。

张国焘的不断肃反，惨酷地杀害各级干部，尤其是知识分子，结果造成了军地干部的文化程度极低。在红 4 军中，除了总部干部如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特、黄超、张琴秋等极少数知识分子外，军以下干部几乎是清一色的工农干部，有些师团干部，斗大的字也认不得几个，受领任务，全凭记忆。一位作战很勇敢的师

长，不会写自已的名字，在签收文件时，只好划圆圈。

张国焘为搞其独裁统治，还提出了个“改造政权”的口号，实际上就是“愚民政策”把那些没知识，没文化的人放到领导岗位，把有文化的干部替换下去。省苏维埃主席熊国炳，是个抬滑竿为生的穷人，大字不识一个，张国焘见他老实，便把他举到省苏主席位上，熊的能力太差，不过是个聋子耳朵——摆设。一切均由张国焘作主。张对此十分满意，认为熊这样的人，能对自己绝对服从。后来，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大败时，熊隐姓埋名躲了起来。张国焘还撤了省工农民主政府内务委员会主席杨克明，换了一个不识字的妇女张廷福；撤了省工农民主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张逸民，换上县儿童团工作的向思爵，向思爵年仅十六岁，只上过二年小学；将省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罗海青撤掉，换上了一个字都不识的、曾在县委机关任过司务长的祝义亭；撤了省工农民主政府的工农监察委员会主席余典章，换上了一个字都不识，更无任何工作能力的人。除此以外，张国焘把省土地、粮食、裁判等委员会的主席，都换上了文盲农民，这些人都很忠厚老实，却实在没有任何工作能力。张国焘之所以这样做，是为建立他的军阀式统治。

张国焘对待知识分子极为仇恨。凡犯错误的知识分子，都要罪加三分。而工农犯罪分子，犯了错误也罪减三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张国焘的“左”倾愚民政策，自然使川陕苏区成为“文盲区”。

第三十五章　张国焘阴算毛泽东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南京国民政府的恐慌。1933年7月，蒋氏任命四川军阀刘湘为四川“剿匪”总司令，指挥二十万人马，率田颂尧、杨森、邓锡侯、李家钰、刘存厚等川中大小军阀，分六路杀向川陕苏区。由于张国焘被红军的前几次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及时转入战略防御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而是继续鼓吹“不停顿的进攻”，命令红4方面军主力分头向开江、开县发动进攻，结果，因进攻路线过远，兵力分散，而陷于被动地位。亏得徐向前等军事家，在大敌当前之际，采取紧收阵地、发动广大群众协助红军作战的策略，在十个月内击退川军的四次总攻，并歼敌数万人。

时蒋介石又组织川军准备对红4方面军发动新的进攻。张国焘面对敌势，不由胆寒，生怕兵败自己身首两分，其谓左右道：“川北已是挤掉汁的柠檬，已无发展前途了。”1934年11月中旬，红4方面军在巴中县的清江渡召开了团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会上张国

焘提出放弃川北，向甘南发展的意见。徐向前等都不同意，认为向甘南发展可以，但不宜丢掉川北苏区，可依托川北，发展甘南。

1935 年 1 月，蒋介石坐镇四川，加紧策划“川陕‘会剿’”，时中央红军已败至遵义。张国焘面对南京方面的“围剿”，十分害怕，决心放弃川陕苏区。他发电于中共中央，内称：

> 东方城口一带，山大，穷困，人口少；西方有嘉陵江、剑阁、碧口之险。再采取决战防御，亦非良策。

时中共中央于遵义召开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地位。1 月 19 日，中央红军离开遵义向川、黔边转移，准备北渡长江，和红 4 方面军会合。1 月 22 日，中共中央电示了张国焘，令红 4 方面军全力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红军作战。电文内称：

>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的发展前途计，决定我军野战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觉不利；西线则田部内讧，邓(锡侯)部即将南调，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兵单力弱，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

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中包围消灭之。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力。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钳制四方面军，而乘野战军立足未稳之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从速决定电复。

张国焘实在不愿意与中央红军会师，那样，他的独立王国将被打破，可中央电令，他又不能不执行，思来想去，对中共中央电令，采取软磨硬抗手段，其令在党政军组织中不认真传达，不积极研究施实方案，并于1月下旬擅自发动了陕南战役。2月攻克宁强、占领沔县、围攻褒城，直达南郑城郊。提出了“打到汉中去，活捉孙蔚如”的口号。结果，先胜后败，人马又退回川陕苏区，不仅如此，还破坏了中共与陕军的统战政策。

在张国焘率部发动陕南之役时，蒋介石已令人马于嘉陵江布重兵，中央红军已无法渡过。张国焘又于3月28日，发动了强渡嘉陵江之役。历时二十四天，共歼敌十二个团之多，达一万余人。红4方面军强渡嘉陵江之后，便下决心放弃川陕苏区。并强令部队“坚壁清野”，把沿途房屋、资财焚烧尽毁。李天焕回忆说：

“我当时非常盲目，一直到过了嘉陵江占领了中坝之后，还不知是脱离川北苏区，我总以是扩大苏区，打运动战，结果后来听一个从后面来的同志说通、南、巴已经没有我们的人了，现在我们的屁股已经转过来了，即嘉陵江东岸不是我们的后方，而变成前线了。”

张国焘如此一来，使红4方面军又陷入游荡的困境，没了根据地。时红4方面军指战员对张之举无不大愤，张见众怒难平，即说是中央的命令，如此众人不敢说甚了。后来，凯丰为此发表了《党中央与国焘的分歧在哪里》的文章。内称：

> 退出通南巴时，恰好是四方面军战胜刘湘之后，中央曾根据这种情形，认为退出通南巴是不应当的，这种估计是正确的，国焘想把退出通南巴的责任放到中央身上，说中央有命令要他退出，这完全是凭空造谣，中央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指示。当中央决定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方针时，曾经要他们向西南发展，配合一方面军，并没有要他们退出通南巴。"

5月12日，红4方面军等向北川西进。张国焘下令将曾中生、廖承志等改组派、AB团、第三党分子押着随军西行。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的地位后，毛泽东见北上与红4方面军会师的路已被"剿赤"军所堵，遂率军南下，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大渡河。渡过大渡河之后，毛泽东决定率中央红军继续北上，经川西的天全、芦山等地，翻过雪山，与红4方面军会师。1935年的6月初，中央红军先后从泸定出发，经化林坪、水子地，沿途击溃了四川军阀部队的阻拦，到达了二郎山附近的抱桐岗。抱桐岗上，全是乌暗茂密的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修篁蔽日，阴暗潮湿，腐叶遍地，阳光照不进，大风吹不透，林中杳无人烟，空气中散着臭气。林中无路可走，无地可宿。干部战士只得在泥泞过膝的湿地里，度过漫长的黑夜，许多年老体弱者就这样倒下了。

全军过了原始森林后，来到了夹金山下。夹金山是邛崃山脉南部的高山，在宝兴的西北，懋功的南面，海拔四千多公尺，山上云雾

缭绕，白雪皑皑，积雪终年不化，当地土民皆呼之为“神山”，说山上有山神，人若过山，触犯了山神，不是被冰雪埋住，就是被风暴卷走。毛泽东听了土民之语，笑道：“神山不可怕，红军有志气，要和神山比一比。”

时已入夏，红军人马一路行来，天天都像在火炉中行进，孰料到了夹金山脚下，气温骤降，红军干部战士都穿着单衣，一时之间，哪里得到那么多御寒之物？每人只得寻一根棍子，作为过雪山的拐杖，谓之“三条腿”。

6 月 12 日，红 4 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理县致电中共中央，详细地报告了敌情和红 4 方面军的各部位置，告知已派了李先念率领红 30 军、9 军一部兵力，进行策应。并表示：

> 四方面军全体同志，正以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路军。

中央军委立即将这电报向各部队传达。并指示各部队注意和红 4 方面军联络。经过数月艰苦转战的广大指战员闻此讯后，无不欢欣鼓舞，精神抖擞地准备攀越夹金山，会合 4 方面军。

6 月中旬，人马起程，在夹金山附近的村落大硗碛集合。这大硗碛，在夹金山的南麓，有二百多户人家。村周围高山环绕，村边山泉流泻。队伍集结之后，便向大雪山爬去。雪山脚下只长了些稀疏的杂草和山松，半山腰便光秃秃的了。没有树木，没有人迹，一片白雪覆盖着重叠起伏的山峦，寒气逼人，冷风刺骨。由于山道崎岖，队伍行进得很慢，待到半山腰时，指战员们已经很疲劳了。然而，山却越来越陡，路却越走越窄，许多人的草鞋被冰磨破，脚冻得失去知觉，而忽然间又狂风四起，雪花纷飞，不少人站脚不住，被刮入了深渊之中。到了山顶，由于空气稀薄，又有不少红军指战员，坐下后就永远起不来了。整整爬了两天，红军前卫部队才到了雪山顶上。翻

过了大雪山，中央红军的前卫部队红 2 师 4 团与红 4 方面军 25 师 74 团会师。立时，两军指战员都激动得欢呼起来。

6 月 14 日下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刘伯承等中共中央领导，来到了夹金山的达维镇，驻守达维镇的是红 4 方面军第 9 军第 25 师，师长韩东山。毛泽东见到了韩东山，问了部队的情况，韩东山一一做了回答。当下，毛泽东说："我们走后，后面部队还要几天过完，你要做好警卫工作，掩护部队安全通过。5 军团的 37 团也归你指挥。"

之后，毛泽东便和朱德、周恩来等来到懋功。懋功，乃是夹金山脚下的一个有数百户人家的小县城，城中居住着藏、回、汉等族人民，周围雪山环抱。在这里，红 4 方面军的 30 军政委李先念，带着人马在此欢迎。李先念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中共中央领导一一见过礼。当晚，两军在一起开了联欢会。一起合唱了《两大主力会合歌》。

联欢会后，毛泽东与李先念做了交谈，他听了李先念的汇报之后，打开了军用地图，指着地图说："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占领了东北三省和华北的大片土地，全国抗日高潮正在到来，整个形势的发展，对我们很有利，红 1、4 方面军，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毛泽东挥着手说："今后，红 1、2 方面军的行动方针，就是北上抗日，建立川陕根据地，促进全国抗日高潮的发展。"

6 月 16 日，毛泽东等领导从 4 方面军干部中了解到了张国焘准备西进新疆，或南下退却的方针后，当即打电报与张国焘，电文内称：

今后红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该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若以懋功为中心的地区，虽纵横千余里，然均是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

两岸，直到峨嵋山附近，情形略同；至于西康，情况更差，均非发展方向。因此，今后红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打击敌人的进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以达到把苏维埃运动的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的目的。为此，坚决地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击破胡宗南部的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

第二天，张国焘便给中共中央发来复电，电文称：

由岷江东打，则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敌已有准备，不易过；沿岷江打松潘，地形粮食绝无。茂县，理番的粮食较懋功更困难；我意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如有困难，暂时向南进攻。

毛泽东等接到了张国焘这个电报，当即开了会，毛泽东指着张国焘的电报对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人说："看来特立(张国焘字为特立)意见和中央指示截然不同啊！"

朱德说："是啊，张国焘这个电报处处跟中央唱反调，中央提出了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他复电中却只字不提；中央提出北打松潘，击破胡宗南的南进，他说北打松潘，地形粮食皆无利，只有向青海、新疆去才是出路；中央主张红军应东进向岷江、嘉陵江之间发展，他说岷江东打不易过，向南进攻较好；中央说为实现北上与东进，红军巩固地占领茂县、北川、威州是关健，他说这些地方给养不利，守不住。"朱德说到这儿，不由的皱起了眉头。

为了说服张国焘，6月18日和20日，中共中央又两次打电报与张国焘，指示：

目前形势须集中火力，首先突破平武，作为向北转移

的枢纽。已过理番的部队，速经马塘绕攻松潘，力求得手。否则红一、四方面军大部队经阿坝与草原游牧区进入甘肃、青海，会遇到更大的困难，甚至不可能。南向雅安、名山、邛崃、大邑等地，即使一时得手，也缺少有力的发展前途，因此，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着，从整个战略形势看，如此胡宗南或田颂尧防线，突破任何一点，均较西移作战为有利。

21日，张国焘又来电，继续重申自己的看法，坚持自己的意见。周恩来对毛泽东说："看来要做通国焘的工作，需要费一番口舌。"

毛泽东轻摇了摇头说："不仅仅是个费口舌的事，我看张国焘有他的打算。"

周恩来说："单凭电报来往，不能解决问题，我看开个会吧。"

毛泽东说："给特立发个电报，要他来懋功大家见个面，也好说话。"

当下，中共中央向张国焘发了电报，要他立即赶懋功的两河口，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以便商决一切。电报发出之后，中共中央便移往懋功的两河口镇。

张国焘为甚要与中共中央的战略方针相顶？

原来，当中央红军在懋功与红4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得知中央红军仅有一万余人，且已疲惫不堪，粮弹缺乏，与红4方面军实力相比有很大差别时，便起了野心，心中暗道："如今中共中央已到穷途末路，投到了我的怀中，我若不趁此时夺得共产党第一把交椅，挟天子以令诸侯，更待何时？"

其实，张国焘想坐这第一把交椅，为时已久了。红4方面军占了茂县地区时，张国焘便于5月18日私自宣布成立了"中共西北特委"，31日，又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自任主席。当时，中央

红军正处于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之际。接到了张国焘的电报后，当即回电，令他取消“西北联邦政府”。张国焘对此置若罔闻。如今，他得知了中央红军兵微将寡，那篡党之野心，立时暴露，所以，当他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电令时，对其心腹秘书长黄超说：“我到要看看，是中央指挥我，还是我来指挥中央。”当即发电，与中共中央电文精神，针锋相对。当中央再来电令时，张国焘又予以反回。这样，毛泽东周恩来等才决定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并发电要张国焘参加。

张国焘接到了党中央的电报后，皱着眉头思索了一阵自语道：“好吧，让你们也看看我张国焘的厉害。”

当下，张国焘便令徐向前，陈昌浩留守茂县，自己带着心腹黄超和十余名卫兵，骑马翻山越岭，赶到了两河口。

两河口位于小金川上游两条河流的汇合处，故名两河口。镇上有数十户人家。藏汉杂居，镇边有一座关帝庙，庙中香火很盛。

张国焘一行到距两河口尚有三里之远时，天下起了毛毛细雨，只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洛甫、刘伯承等中共中央军政高级干部四十余人，均立在路旁迎接。张国焘在坐上见到这些人穿戴破破烂烂，面目黑瘦，不由的一阵得意，心中暗道：“你们今日对我远接奉迎，还不是看我有枪有人吗？”想着，马到近前，张国焘却故意停在马上不下，待朱、毛等人向他走来，到达近前时，他才翻身下马，与毛泽东等握手拥抱。大家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欢悦之情，一时掩盖了那不快之意。

当下，张国焘同毛泽东并肩步向镇内，沿途说说笑笑，互诉别后之情。张国焘进村之后，村中住的中央各机关人员，都出来欢迎。此时，张国焘那肥胖红润的脸膛，肥的滚瓜流油似的马匹，同这些面黄肌瘦的人相比，愈成鲜明对照。欢迎的人向他鼓掌。张国焘微笑着挥手答礼。双方一番别后重逢之情叙过，便在关帝庙内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刘少

奇、博古、王稼祥、凯丰、邓发、刘伯承、李富春、林柏渠、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张国焘等。会议一天始，便由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战略方针、战略行动、战争指挥的问题，作了报告。周恩来说："目前，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向华北逼近，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正要到来。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应该向北发展，在岷山山脉以北地区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据我们掌握的敌情，胡宗南部队正在向松潘一带运动，我们1、4两个方面军，当统一意志，统一指挥，攻战松潘，消灭站脚未稳的胡宗南先头部队。"

周恩来讲完之后，毛泽东起身发言。还在欢迎张国焘时，他已从张的身上嗅到了张的一股凌人盛气。察觉到张没把中共中央放在眼里，遂婉转地说道："关于两军的行动方针，中央已电告过特立。特立亦回电谈了自己的看法。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首先要考虑便利我们作战，因此，在地区的选择上，第一，应力求地域宽大，便于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区虽然大，但多狭路，易被敌封锁，不易反攻。第二是群众条件，要以人口较多的汉族为好。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且又多是草原牧区，军事补充等均极为困难。在陕甘川三省地区，则具有以上优良条件。"毛泽东稍停一下又说："关于红军的战略行动，向南发展，均是险山峻岭，是不可能的，向西北则是广大草原，为不毛之地。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敌人已在岷江东岸集结了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毛泽东用肯定的语气说："红军只有北上才有出路，有发展，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扭转革命所遭到的挫败，才能推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高潮的迅速到来。"

这时，周恩来又提出：军队应由军委集中统一指挥，组织左、中、右三个纵队协同作战。张国焘一边喝着茶水，一边吸着烟，待毛泽东、周恩来说完，他慢条斯理地说道："我们在西北的活动，可能有三个计划，一是以现在我们所占领的地区为起点，向川北、甘南至汉中一带发展，以西康为后方，此举可以名之为川康计划；二是

移到陕甘北部，夺取宁夏为后方，以外蒙为靠背；三是移到兰州以西的河西走廊地带，以新疆为后方，可以名为‘西进计划’。川陕甘康一带边境地区地形险要，军阀实力薄弱，不能行动一致，蒋的嫡系部队不能大量用在这里，敌之飞机大炮威力也不易发挥，4方面军战士对这一带地形亦熟悉，一方面军经长途远征，可以在此休养生息……”

张国焘话到这儿时，刘伯承打断了他的话，刘伯承说：“若情况不利呢，部队只有退到西康了？”

周恩来说：“西康尽是藏族，人口稀少，粮食不足，没有退路。”

张国焘见刘伯承打断了他的话，很不高兴，他白了刘伯承一眼，说：“伯承，你等我把话说完么。”

刘伯承只得说：“特立，你往下说。”

张国焘也白了周恩来一眼，继续说道：“5月间，我们在江油地区，曾制订了一个建立川甘康边新根据地的计划，在政治上，建立了一个西北联邦政府，制订了一个适宜于少数民族的纲领。”

凯丰打断了张国焘的话，说：“国焘同志，你不经中央同意，便成立联邦政府，行为是错误的。”

张国焘在刘伯承打断他的话时，那胖胖的脸上的肉就曾抖了一阵，如今见凯丰又打断了自己的话，愈发显得不高兴了。王稼祥见张国焘要发火儿，忙说：“国焘，往下讲。”

张国焘嘟噜着满脸的肥肉说：“我在宁羌地区时，曾考察过陕甘北部和宁夏一带的情况，从这里去宁夏，愈往北走，愈是毫无掩蔽的黄土荒山，我军极易遭敌机的袭击。再有，陕甘北部地广人稀，粮食情况远不如川陕甘边这一带丰裕。宁夏南有黄河，东西北三面都是大沙漠，我们进到那里，极易被敌封锁，还有黄河的阻隔，所以，北上陕甘宁，是错误的。”

张国焘见大家都认真地听他发言继续振振有词地说：“最为理想的计划，是我刚才提到的第三个计划。据我从情报中得知，苏联

的飞机和军队，曾支持新疆当局盛世才部，帮助盛世才平复了马仲英的叛乱，如此看来，盛世才似有亲苏立场。如果我们移到河西走廊和新疆去，在那里树起苏维埃旗帜，这是最佳的退路。”

张国焘发言之后，朱德、王稼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邓发、彭德怀等都相继发言。张国焘一双眼珠滴溜溜的转着，听着大家的话。他听什么？听哪些人跟自己唱一个调儿，可他听来听去，没有支持他的，张国焘心里很有气。当他听到博古对他提出的南下西进方针是“麻雀钻阴沟”时，他大为恼火，腾地站起来，指着博古说：“你博古说话不要讥讽人。”

博古这个比喻本是无意，他见张国焘发了火，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还是周恩来用好言将张国焘劝住。

两河口会议的结果是，到会的人都不同意张国焘的意见，而同意周恩来、毛泽东提出的两军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首先向甘南发展的方针，反对向新疆退却的主张。张国焘见自己的意见孤立，十分恼火，暗道：“我来开这个会，上了当了，毛、周、朱人多，我孤掌难鸣啊！”张国焘心中虽然恼怒，可也无可奈何。在政治局的扩大会上，正式做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全文如下：

一、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中大量的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泛的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

二、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

三、必须派出一支部队，向兆河、夏河活动，控制这一

地带，使我们能够背靠甘、青、新、宁四省广大地区，有利的向东发展。

四、大小金川流域在军事、政治、经济条件上，均不利于太红军的活动与发展，但必须留下小部分力量，发展游击战争，使这一地区，变为川陕苏区的一部分。

五、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决定”通过后，与会者又严肃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一是张国焘没能集中兵力粉碎敌人对鄂豫皖的第四次围攻，擅自撤离了鄂豫皖根据地；二是张国焘没执行中共中央1月22日给红4方面军的电报指示，派部队南进到泸州一带钳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反而擅自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三是张国焘擅自在茂县、汶川一带成立“西北特委”，并内设政治局，俨如中央组织，并成为西北联邦政府，而且自封“主席”。

这严肃的批评，把张国焘的鼻子都气歪了，他咬牙暗道：“妈的，我要让你们知道知道老子的厉害。”

两河口会议之后的第二天，为了贯彻中央会议决定，中革军委发布了《松潘战役计划》，战役计划规定：红1、4方面军编为左、中、右三个纵队和岷江支队，分别经卓克基、大藏寺、马塘、黑水、芦花等地向北前进，并规定各部队在6月29日到7月2日集结完毕，7月12日前开始行动。

张国焘从两河口返回了茂县，一肚子不高兴，途经下东门时，见到了徐向前，徐向前问起了会见中央领导及两河口会议情况，张国焘哼一声，说：“中央红军很狼狈。”徐向前再问，张国焘皱着眉头，说：“回头我来传达吧。”

徐向前见张国焘不耐烦，也没再开口。

张国焘回到了四方面军总部驻地——杂谷脑，见到了陈昌浩。陈乃是张的心腹，二人见面之后，陈问张："张主席，怎么样？"

张国焘愤愤地说："毛泽东以政治局内多数人压我，哼，我张某要用手中五万人枪来压他。"遂把情况说了一遍。

陈昌浩劝慰说："张主席，不必生气，毛泽东他们现在离不开我们的。我们现在有实力，又何必寄人篱下，受人欺压呢？"

张国焘猛地站起，把桌子一拍说："昌浩，你说的对，我们不能让步，眼前若不把大权掌住，待毛泽东等反过手来，就不会有我们的天下，对两河口会议的决定，我们不同意。"

陈昌浩正色说："张主席，我陈昌浩一定支持你。"

张国焘说："你和张闻天、博古不都是莫斯科的同学吗，你要做做他们的工作，要他们拥护我当中央主席。"

陈昌浩点头。张国焘又说："给毛、周发电，告诉他们，1、4两方面军统一指挥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松潘战役计划，不能实施。"

陈昌浩说："我也以个人名义，向毛、周、朱发电，要求你当军委主席。"

两人计划之后，便由陈昌浩向中共中央发去了电报。

两河口会议后，毛泽东等即率部向会议即定的方向运动，实施松潘战役计划，忽然接到陈昌浩的电报，都吃了一惊，朱德拍着电报愤愤地说："这个陈昌浩，他要做甚？"

毛泽东平静地说："他和张国焘演双簧，向中央，向党要权。"

周恩来皱着眉头说："两军刚刚到达一起，不要把关系搞僵，这样吧，派个慰问团，到杂谷脑，一面慰问4方面军，一面做张国焘的工作。"

周恩来意见，大家都同意。当下，组成了中央慰问团，慰问团有李富春、林柏渠、李维汉、刘伯承诸人组成。组成之后，便动身至杂谷脑。

张国焘自与陈昌浩商定了向中央发报之后，又同陈昌浩一起，商量下步对策，说明了，就是怎样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二人正商量之际，黄超急匆匆进来说："张主席，曾中生从保卫局跑了出来，卫兵把他抓住了，他吵嚷着要去见毛泽东。"

陈昌浩眼一瞪说："胡闹，把他押走，捆起来。"又补充一句："嘴里再塞上棉花。"

陈昌浩话音儿没落，只听屋外有人大声喊："张国焘，你为什么不敢让我见毛泽东？你心里有鬼！"

陈昌浩对身边黄超说："黄超，快去把他嘴堵上。"

黄超答应着就往外走。

这时，电话响了，张国焘拿起电话，边听边嗯嗯地答着，听完之后，他放下听筒，对陈、黄二人说："妈的，李富春、刘伯承带着慰问团来了，还打着中央的旗号。"

陈昌浩问："他们在哪里？"

张国焘说："快到村口了，咱们集合队伍去迎接。"

待张国焘、陈昌浩见到李富春等人时，张笑容满面，十分热情地将代表团迎到了总部。中午，又以丰盛的饭菜欢迎代表团。李富春等见张国焘做了这么多的好饭菜，想到许多干部战士饿肚子，甚不过意。张国焘笑道："你们到此，国焘理当欢迎，这些山中野味，不成敬意。"

张国焘陪着中央代表团吃过饭，又陪着代表团到连队中看望了指战员，而后，便把代表团成员，都安排在打扫干净的房中休息。掌灯之后，陈昌浩来到了李富春和李维汉房中。陈昌浩向李富春讲，要贯彻两河口的会议，需要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否则，将无法顺利灭敌。

李富春一听，心中暗道："你张国焘对中央指示阳奉阴违，这也不行，那也不是，说穿了，是要用你手中的军队，压中央，向中央要

权呀！”李富春虽然心中有气，可为顾全大局，没有表露出不满，只说：“此事定当向中央汇报。”

当下，李富春写了一信，信中谈了陈昌浩之意，派人飞马送往中共中央。时毛泽东、周恩来率队伍行至黑水县的毛儿盖一带。毛泽东接到了李富春的信后，看罢，又与周恩来、朱德诸领导传阅。接着，召开了常委会议。周恩来说：“张国焘之意在我们刚见面时就已露出，四方面军其实只有四万五千人，他却吹嘘说有八万人。以后的表现，处处都想凌架于党中央之上，想让中央随他转。”周恩来话到这儿，略思一下说：“这样吧，为顾全大局起见，我请求不再担任红军的总政委，将这职务让与张国焘。”

周恩来说完，大家一时都没吭声。为甚？红军的处境摆在这里。敌军四面包围，又缺粮草弹药，若内部起争端，岂不是自取灭亡吗？而若不答应张国焘的条件，他是不会执行中央指示的。周恩来见大家不语，起身说道：“就这么定了，向张国焘发报。”说完，亲自起草了一份电报，电文告诉张国焘，由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由他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

张国焘接到了中央的电报后，脸挂奸笑，对陈昌浩说：“有枪就是王，我张国焘要是没枪，老毛他们怎么也不会让我当总政委。”

陈昌浩笑道：“张主席，你比我们想得远，看得深呀。”

就这样，从6月初到8月中旬，由于张国焘向党中央争权，使得红军四十余日按兵不动，结果，大好的战机全都错过了。胡宗南的主力已到松潘集结，川军邓锡侯、刘文辉等部又重新攻占了懋功县，打算把红军困死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的雪山草地。寒冷的季节即将到来，红军处在人烟稀少，粮食缺乏地，若再这样拖下去，就会不战自亡。

这当儿，红军按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攻打松潘的计划已不能实现，进军甘肃南部的大路已被敌军堵死，红军只有经过茫茫的草地

了。后来，在 1943 年抗战间，周恩来见到胡宗南，双方提及此事，胡宗南说："当时我们很困难，如果红军一进攻，我们非垮不可，因在松潘我只有很少部队，是守不住的。"

红军攻打松潘的战机已失，中共中央不得不更变原定的北进路线，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8 月 3 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红军由毛儿盖、哈龙等地北进，入草地向东发展，突破敌人包围线的右侧，占领甘南的夏河、洮河流域，然后依托甘南向东挺进，创造陕甘根据地，为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任命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叶剑英为参谋长，杨尚昆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把 1、4 方面军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分两路齐头北上。右路军由 1 方面军的 1、3 军和 4 方面军的 4 军、30 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部指挥。中央机关及所属中央纵队随右路军前进。从毛儿盖过草地，向班佑、巴西一带推进；左路军由 1 方面军的 5 军团、32 军和 4 方面军的 9 军、31 军、33 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部指挥过草地，经阿坝，再向班佑一带跟进。这样，总司令朱德和参谋长刘伯承便来到了左路军，同张国焘一同行进。

8 月 15 日，左右两路军分头出发，左路军于 19 日攻战查理寺，21 日占领阿坝。

就在这时候，张国焘又出尔反尔了。他召开了左路军的干部会议，提出了单独率部西出阿坝，北占夏河，进而向青海、甘肃偏远地区逃跑的主张。与此同时，张国焘还利用总政委的职权，借口统一指挥，收缴了各军团、各军与党中央直接联系以及相互间联系的电台密码，使各军团、各军只能和红军总司令部联系，不能直接和中央联系。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见张国焘又出尔反尔，无奈于 8 月 20 日，政治局在毛儿盖再次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列席会议的，有李富春、徐向前、林彪、聂荣臻、李先念。当时朱德、张国焘、刘伯承均在左路

军，叶剑英带右路军先头部队已先行，彭德怀率3军团断后，故这些人均没参加会议。

会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说："同志们，我军北进夏河地区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是东向陕西，一是西向青海。我的意见，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而不应向黄河以西。红军北出后，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根据地。这一地区，背靠草地，川敌不易过来。如东进受阻，以黄河以西作战略退却，也是好的。"

毛泽东的意见，到会人都同意。陈昌浩见大家分析的有道理，也表示赞同。最后，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发言为基本内容，作出了《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而后，致电朱德、张国焘，要他们执行会议精神。

张国焘见电无奈，只得表示同意。在朱德和刘伯承劝说之下，摧动人马北进。

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等，率领右路军，从毛儿盖起程，进入了纵横数百里、神秘莫测、人烟稀少的水草地，时由红4团为先锋团。出发之前，毛泽东亲自向团长杨成武布置了任务。毛泽东说："成武啊，你们4团任务很艰巨，前几天，红6团试行过草地，因粮绝和遇敌骑兵袭击，被迫折回。中央决定，不管草地多大困难，先头团必须通过，给红军大部队找出一条北上的路线来。"毛泽东想想又说："据了解，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坐一带集结了四个师，川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追击我们的敌刘文辉部已赶到了懋功，敌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雅州。敌断定我们一定东出四川，不敢横穿草地，北出甘陕。"毛泽东双手一推："敌人判断错了，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北上抗日！"

杨成武坚决表示，一定要完成任务。遂带着部队进入草地。

草地为一片茫茫无边的草原，草原上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不辨东南西北，草丛底下河沟交错，积水泛滥，无法找出道路。红军只能跟着通司的担架，依着通司指出的草根密集的地方，一个跟一

个，艰难地前进。一脚踩错，若陷入泥中，便越陷越深，不少红军战士，就这样牺牲了。越往草地中心走，困难越是严重，草地时风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严寒，红军战士们只能找个稍高的地方，大家挤在一起，背靠着背取暖。由于粮食不足，大家忍饥挨饿，经过六天的艰苦行军。先头团终于到达草地的尽头班佑。

先头团过草地之后，毛泽东即率领右路军踏着先头团走的路，经过了七天七夜的艰苦行军，到达了现今若尔盖县境内的班佑、巴西等地。接着，右路军向右行数十里，占领了巴西。

巴西为松潘县属，居民多系藏族。在巴西东约百余里，便是包座。此处为红军入甘南的必经之处。军委命令红30军和红4军一部来完成这一任务。红30军政委李先念，军长程世才接受任务后，率领着本部人马，直攻包座。经过一场激战，占领包座。

9月1日，毛泽东、徐向前联名致电张国焘，言右路军正等候左路军速来班佑，应乘包座战役胜利后的有利形势，集中右路军和左路军的主力，向甘南岷州一带打出去。这时候，左路军先头部队已经过草地到达阿坝地区东部的噶曲河边。在这关健时刻，张国焘又变了卦，借口噶曲河涨水，草地不易通过。于9月3日，强令已向班佑进发的先头部队退回阿坝。接着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内称：

> 向噶曲河上游侦察七十里，亦不能徒涉和架桥，各部粮食只能吃三天，二十五师只够两天，电台已绝粮，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无向导，痛苦如此，决于明晨分三天全部返回阿坝……上次毛儿盖绝粮，部队受大损失，这次又强向班佑前进，结果如此，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且恐多阻碍。

张国焘按兵不动，中共领导都急了。因为张国焘不转变，直接影响着右路军全军的命运。右路军前敌指挥徐向前、陈昌浩也很焦

急。陈昌浩几乎天天往中共中央驻地跑，想找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一连数日，均无结果。9月8日，陈、徐二人致电张国焘，曰：

> 目前突击南、岷甚易，总的行动究竟如何？一军是否速占罗达？三军是否跟进，敌人是否快打？飞示。再延实令人痛心。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左中南进为下策，万一左路无法北进，只有实行下策。请即明电中央局商议，我们执行。

当天，张国焘便电告徐向前、陈昌浩，要二人率右路南下。二人接到电报，甚是为难。徐向前说："昌浩，这样大事，你我难以决心，向中央报告吧。"

陈昌浩也同意。当下，二人带了电报，找到了张闻天、博古，又一起到了周恩来的住处。时周恩来正患病，见了电报便把毛泽东、王稼祥都找到了一起，大家一番商议之后，以七人名义致电左路军，电文曰：

> 朱、张、刘三同志：
>
> 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这个问题。弟等仔细考虑的结果认为：
>
> 一、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因为：
>
> （甲）地形利于敌封锁，而不利于我攻击，丹巴南千余里，懋功南七百余里均雪山老林隘路。康、口、天、芦、雅、名、邛、大、直至懋抚一带，敌垒已成，我军绝无攻取可能。
>
> （乙）经济条件，绝不能供养大军，大渡河流域千余里间，殊如毛儿盖者，仅一磨西面而已，绥崇人口八千余，粮本极少，懋抚粮已尽，大军此处有绝食之虞。
>
> （丙）阿坝南至冕宁，均为少数民族，我军处此区域，

有消耗无补充，此呈目前已极严重，决难继续下去。

（丁）北面被敌封锁，无战略退路。

二、因此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在阿坝、卓克基补充粮后，改道北进，行军中即有较大之减员，然甘南富庶之区，补充有望。在地形上、经济上、居民上、战略退路上，均有胜利前途。即以往青宁新说，已远胜西康地区。

三、目前胡敌不敢动，周、王两部到达需时，北面仍空虚，弟等拟于右路军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二十六军配合行动，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肃，开展新局面。

以上所陈，纯从大局前途及利害关系上着想，万望兄弟当即立断，则革命之福。

恩来、洛甫、博古、向前
昌浩、泽东、稼祥
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第二日，张国焘便给徐向前、陈昌浩发来了电报，并要二人转中央，电文曰：

（甲）时至今日，请你们平心估计敌力和位置，我军减员、弹药和被服等情形，能否一举破敌，或与敌作持久战而击破之，敌是否有续增可能。

（乙）左路二十五、九十三两师，每团不到千人，每师至多千五百战斗员，内中脚病者占三分之二。再北进，右路经过继续十天行军，左路二十天，减员将在半数以上。

（丙）那时可能有下列情况：

1、向东突出蒙西（原文如此——引者注）封锁线，是否将成无止境的运动战，冬天不停留行军，前途如何？

2、若停夏、洮是否能立稳脚跟？

3、若向东，非停夏、洮不可，再无南返之机。背靠黄河，能不受阻碍否？上三项诸兄熟思明告。

4、川敌弱，不善守碉，山地隘路战为我特长。懋、丹、绥一带地形少岩，不如通、南、巴地形险。南方粮不缺。弟亲详问二十五、九十三等各级干部，均言之甚确。阿坝沿大金川河东岸到松岗，约六天行程，沿途有二千户人家，每日都有房屋宿营。河西四大坝，卓木碉粮、房较多，绥、崇有六千户口，包谷已熟。据可靠向导称：丹巴、甘孜、道孚、天卢均优于洮、夏、邛、大更好。北进，则阿坝以南新病号均需抛弃；南打，尽能照顾。若不图战胜敌人，空言鄙弃少数民族区，亦甚无益。

5、现宜以一部向东北佯动，诱敌北进，我则乘热南下。如此对二、六军团为绝好配合。我看蒋与川敌间矛盾极多，南打又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

6、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自信不会胡说。如何？立候示遵。

陈昌浩看了张国焘的电报之后，马上改变了北进的态度。拿着电报去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毛泽东听了陈昌浩的意见，当即批评他想法是错误的。接着，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曰：

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才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陷于空前未有之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在东出不利时，可以西渡黄河占领甘、青交通新地区，再行向东发展。

当天晚上，毛泽东来到了徐向前的住处，站在院子里问道："向前，你的意见呢？"

徐向前唉了一声，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4方面军如今成两半恐怕不好。"

毛泽东没再说甚，只要徐向前早点休息，遂告辞而别。

第二日，也就是9月10日，张国焘又给陈昌浩发来一机密电文。这时，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正在开大会，陈昌浩正在讲话，机要员就把电报给了一旁正在坐着的前敌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一看这个电文，不由得打了个冷战，急把电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当即把电文抄了下来。

张国焘发与陈昌浩的电报内容是什么呢？原来，张国焘要陈昌浩挟持中共中央同右路军一起南下。

毛泽东抄罢电报，意识到叶剑英的处境危险，便要他赶快去开会，并嘱其沉着冷静，谨慎从事。叶剑英点头，而后急急走了。

毛泽东获悉张国焘密电之后，甚是焦急，正在这时，彭德怀走了进来。彭德怀来此何干？原来，自从张国焘反对北上以来，彭德怀就一直很警觉，右路军在巴西停下来之后，彭德怀遂令杨勇的第十团负责暗中保卫毛泽东等中共领导的安全。张国焘在阿坝按兵不动，彭德怀便寻思这其中有事。9月8日上午，彭德怀在前敌指挥部与陈昌浩交谈，陈与彭谈了北上事宜。午饭后，彭德怀又与陈昌浩相见，陈昌浩的调子忽然变了，不仅不提北上，而且向彭德怀说起南下的好处来了。彭听了没吭声。暗想：陈昌浩调子的改变，一定是张国焘来了什么指示。他考虑到前卫部队1军团已进到了俄界，巴西一带只有三军几个团，而中央领导机关都在前敌指挥部周围，若张国焘暗中下令陈昌浩对中央领导下手，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他来见毛泽东，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泽东见彭德怀来了，甚为高兴，便把张国焘的密电给彭德怀

看了。彭德怀看罢，把拳头往桌子上一擂说："我就想到张国焘又来电了，不然陈昌浩不会改变腔调。"他双眉挑起，又说道："主席，如今我们要坚持北进，陈昌浩要坚持南下，而1军团已经走了两天了，如果陈拥兵解散3军团怎么办?"他把手一挥："为避勉红军打红军，我看把陈昌浩做人质扣起!"

毛泽东听了，连说："不可，不可!"

彭德怀说："主席，如果陈昌浩强制3军团和中央南进，1军团也不能单独北进了。一同南进，张国焘一定采取更阴谋手段。到那时，张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毛泽东说："德怀，你别急，容我仔细考虑考虑。"

当下，毛泽东来到了陈昌浩、徐向前处。陈昌浩一见毛泽东，便说："主席，张政委来了电报，还是要我们南下。"

毛泽东说："既然要南进，中央书记处要开个会，周恩来、王稼祥都病在了军团部，我和张闻天、博古去3军团司令部吧，免得还得用担架抬他们过来。"

陈昌浩没再说什么。

毛泽东离开了前敌总指挥部后，急急奔向红3军团，同正在那里的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王稼祥一起，召开了紧急会议。这个会，就是长征史中写了重要一笔的"巴西会议"。会议决定红3军团以打野为名，连夜赶到俄界镇，同那里的1军团会合，然后迅速北进，脱离险地。决定之后，毛泽东考虑到叶剑英的安全，便给他下了通知，要他来红3军团参加直属队会议，使他离开前敌指挥部。叶剑英正要起身，忽然灵机一动，决定利用张国焘的南下电报，以打粮准备南下的名义，把直属队拉走。

9月10号夜里，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着3军团，悄悄地离开了巴西北上，叶剑英也以打粮为名，将军委直属队拉了出来。拂晓时，在阿西追上了毛泽东、彭德怀等。毛泽东见了叶剑英，甚为高兴，说："剑英同志，你出来了，很好，现在情况紧急，我们不能在此停

留，应立即向俄界前进，与1军团会合。”

正在这时，忽见几个骑马的人飞驰而至，不一刻到了近前，毛泽东、叶剑英看时，是红4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他在马上对正在行进的队伍喊道：“原来4方面军的同志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

李特这么一喊，大家都愣了，毛泽东走了过来，将李特叫下马，又把他拉到一棵大树下，对他进行规劝开导，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李特哪里把毛泽东的话放在心上，他说：“1方面军北上，我们不管，4方面军是张主席的队伍，不能跟机会主义者走！”

毛泽东说：“你们实在要南下也可以，相信以后总会重逢的。”说着，又转身对部队说，“我们都是红军，是一家人，愿意北上的，跟中央走，愿意跟张国焘的，可以回去。”

这样，有一些编入3军团的4方面军的人就回去了。3军团的干部战士见李特盛气凌人，很是生气，要采取行动，毛泽东闻之，急忙制止道：“不可，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就走吧。”

当下，双方分道扬镳了，毛泽东率部队继续北上。

李特返回之后，向陈昌浩报告了情况，陈昌浩听了，拍着桌子，大骂毛泽东不辞而别，要派兵追赶，徐向前立即制止，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

陈昌浩见徐向前说得有理，也就放弃了派兵追赶毛泽东等的念头。

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随3军团到达俄界，与1军团会合后，9月12日，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这就是长征史书上写了重重一笔的“俄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叶剑英、林伯渠、李维汉、杨尚昆、彭德怀、聂荣臻、李德。由毛泽东报告了同张国焘的争论及今后的战略方针，严肃地指明了张国焘、陈昌浩的机会主义方针和军阀主义、

分裂主义的错误和危害。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彭德怀等人主张开除张国焘的党籍。毛泽东说："不可，目前，红军中广大指战员尚不了解真相。如此则引起部队的混乱。这个决定，也暂时发到中央委员一级。"

之后，毛泽东率1、3军团继续北上。1935年的9月9日，到达了甘南的哈达铺。在此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支队"。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兼政委，而后，继续北上，在榜罗镇，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了刘志丹、徐海东在陕北开展土地革命，中共中央这才决定到陕北落脚。终于在10月到达了陕北吴起镇，同红26军、27军会师，胜利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后林伯渠赋诗《巴西阿巴》道：

刚过草地到阿巴，无那西风日未斜，
且喜境界新耳目，不虞粮秣少胡麻，
巨猿解缆技殊巧，野虻射人事可嗟，
前路纵遥知马力，谁予便利敢分家。

第三十六章　曾中生之死

就在毛泽东率 1、3 军团急急脱离险境北上之际，曾中生惨死在张国焘手中。

张国焘怎样杀害曾中生的呢？前文述过，曾中生随红 4 方面军跋涉到川西，一路上，他徒步行军，但双手被捆绑，那艰辛之状，无法描述。红 4 方面军军部驻杂脑谷后，曾中生听说红 4 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非常高兴，便嚷着要见毛泽东。黄超报告了张国焘后，张国焘下令将曾的口用棉花堵上。

曾中生被张国焘逮捕后，虽然身陷囹圄，并知道自己虽随时都可能被张杀害，但仍保持着乐观的精神，尽最大可能地工作，曾负责看押曾中生的陈明义回忆说：

“我当时在川陕省保卫局工作，有机会常接触他。他

经常给我讲述我们党早期的革命活动，讲他在黄埔军校学习期间，聆听周恩来等同志讲课和在农讲所听毛泽东同志关于开展农民运动的报告，讲北伐战争叶挺同志领导的北伐军独立团攻打汀泗桥的战斗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我简直听得着了迷。我深深地为他坚贞无畏，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时刻惦记革命事业的高尚情操所感动。在曾中生同志的教育下，我知道了我党早期的一些革命历史，懂得了红军发展壮大的来之不易。我看到他在昏暗的油灯下刻苦学习、写作《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的时候，心中更是升起了敬佩之情。当时我不识字，曾中生同志就经常利用时间，教我学文化。我清楚的记得，他第一次教我的是'红军三大任务'这几个字。"

1935年6月，红4方面军与红1方面军在川西懋功会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杂脑谷慰问红4方面军指战员。时4方面军机关驻地，敲锣打鼓，燃鞭放炮，热烈欢迎中央代表。负责看押曾中生的陈明义急忙把这一喜讯告诉了曾中生。曾中生听了，非常高兴，认为此次自已有救了。便写了一封密信，要求中共中央查处张国焘的罪行，为自己彻底平反，并托人将此信密送中央代表团。不料此信被截，落入张国焘的手中。张国焘见了，怒挑着双眉说："曾中生死不悔改，老子不杀他、不解心头之恨！"

中央代表团在杂脑谷间，刘伯承等向张国焘问起曾中生的情况。张国焘坦坦然然地说："中生同志在鄂豫皖根据地的战斗中负了重伤，我留下他养伤。伤好了他会回来的。"

中央代表团离开杂谷脑后，张国焘亲自提审了曾中生，他令人鞭打曾中生，边打边怒问道："你还告不告状？你再不老实，老子打死你！"

曾中生怒视张国焘说："只要老子不死，老子就要告你，老子死

了，到阴间也要告你！”

当天，张国焘即密令亲信黄超处死曾中生。黄超令手下人将曾中生带到川西北卓克基的一片密林里，而后对曾中生说：“今天晚上部队要行军，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曾中生不知是计，便坐在了地上，他刚坐下，两名刽子手趁他不备，用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将他活活勒死。接着，连夜将尸体扔进河中，其时年 35 岁。

这天夜里，黄超又令人四下喊：“曾中生逃跑了，快抓呀！”

抓曾中生的人连喊带嚷的闹腾了一夜。第二天，张国焘即在干部会上恶狠狠地说：“曾中生这个右派头子，昨晚逃跑了，这更证明他是反革命分子！”

毛泽东率人马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等耳闻曾中生被张国焘关押，但不知道曾中生已牺牲，便托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电示张国焘，救曾之命。林遂发电于张，内称：

> 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被捕，地方党组织垮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生命安全，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

张国焘读罢林育英的电文，几下把电文扯碎，怒骂道：“老子×你娘，多管闲事！”

1945 年，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为曾中生彻底平反昭雪。到了 1989 年 11 月，中共中央军委确定曾中生为无产阶级军事家。

第三十七章　张国焘软禁朱德、刘伯承

毛泽东等率人马抵陕北后，张国焘闻知，又恨又恼，他冷笑对左右说："毛泽东跑了，跑了也不算完。"

当下，张国焘又找来了秘书长黄超，向他说了番话，黄超答应着走了。

这时候，张国焘已命左路军人马退至了阿坝，在这里按兵不动了。阿坝乃是西康草原的一座名城，素有"藏族成都"之称。阿坝的大喇嘛庙建筑得甚为精致，极为壮观，房屋鳞次栉比。城中买卖店铺，接连不断，阿坝周围为平坦草原，大金川穿流其间，实为一美丽去处。张国焘率兵至此时，庙中喇嘛均已逃跑。只留下空庙一座。张令人查看，但见青稞堆积如山，粗算一下，足够全军人马半年食用。心中甚喜。

9 月 19 日上午，秋风阵阵，落叶飘飘，阿坝喇嘛庙的四周，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凡进出喇嘛庙的人，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查，那气

氛非常严肃和紧张。进入这喇嘛庙的，都是红军营以上干部。在会场旁边的演戏台上，挂着两条横幅标语，左边标语为："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右边标语为："南下创造川康根据地。"主席台正中，端坐着一个人，这人四十多岁，大脸盘，小眼睛，铁青色，横丝肉，两目射着凶光，那凶光在会场上扫来扫去。这人正是张国焘。

到会人一进庙中，一见那悬挂的标语，都愣了。又见张国焘端坐主席台上，人慑其霸，不敢多言，依次坐了下来，这么一来，诺大的会场，竟然鸦雀无声。到了10点钟，张国焘咳嗽了一声，接着，他面目沉着开了口，道："同志们，我告诉大家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等人，蒙蔽了少数红军后，于9月20日夜逃跑了。"

张国焘这么一说，台下的人眼睛都睁大了。张国焘稍沉了一下又说："我不得不向大家提起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这就是，我们的红军，现在只剩下十几万人了，我们应该大胆的承认，长征是失败了，现在虽然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但我们应该想一想，怎么会弄到这个样子？怎么会落到这般地步？现在蒋介石掌握了全国政权，革命是处在两个高潮中间，是总退却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要北上抗日，那简直是开玩笑，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是机会主义，退却逃跑。"张国焘说着，朝台下的红5军团干部一指说："你们中间有没有机会主义啊？你们戴的那顶小五角帽（指红1方面军的军帽），我看就是机会主义的帽子，在这机会主义帽子底下，就没有机会主义脑袋？就没有机会主义思想？我不相信。"张国焘话锋一转，又说："但是，右路军里大多数红军，眼睛是明亮的，他们没有跟毛泽东逃跑，又回到了我们的身边。"张国焘停了一下，接着大声说："为了挽救中国共产党，为了中国革命的成功，我现在宣布，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现在成立！"

张国焘讲到这里，到会之人都惊呆了。这时，黄超带头鼓掌。会场上零零乱乱地响了几下掌声之后，张国焘便宣布了新成立的中

共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自然由张任主席。也给朱德、刘伯承挂了不少头衔。朱德是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接着，张国焘又扯着嗓子道出了“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等人党籍”之语。

张国焘刚一说完，黄超立即举臂高呼道：“反对毛泽东闹分裂！”

一些人也跟着喊了起来。

这时，在一旁的陈昌浩插话说：“同志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巴西不向张总政委打招呼，硬是拖着右路军的同志向北逃跑，这是可耻的分裂行为！”

黄超又振臂高喊道：“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张主席、保卫新的党中央！”

几句口号过后，陈昌浩又说：“毛泽东带着1、3军团连个招呼都不打就跑了，太让人痛心了，他这破坏党纪、军纪的行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都是他那失败主义，游击习气的恶性发展，才堕落到如此程度。”

黄超又带头呼起了口号：

“反对右倾逃跑！”

“拥护张主席！”

“张主席万岁！”

“拥护新的党中央！”

……

听着这些喊声，张国焘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会议开了两天，作出了《阿坝会议决议》，决议把中共中央北上说了个一无是处，自然把他张国焘南下决策说成是美好决策。

阿坝会议之后，红军的思想可就乱了，特别是红1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怎么也转不过转来，但慑于张国焘的淫威，许多人敢怒而不敢言。

红1方面军5军团有个保卫局长叫欧阳毅，阿坝会后第二天，被红4方面军9军团政委曾日三叫去，说："欧阳同志，刚才总部来电话，说一股有组织的反革命队伍，抢老百姓的东西，准备叛乱，都是5军团的人，现在抓住了，你们5军团去人做处理。"

欧阳毅听了，心中暗想：5军团的干部战士，觉悟都很高，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于是，他亲自找到哪些被抓的战士进行了解。他问他们："你们为甚要抢老百姓的东西？"

战士们七嘴八舌委屈地说："我们都是掉队的，正在赶部队之时，被他们抓来了，我们没有抢老百姓的东西啊，他们抓了我们，还硬说我们是反革命。"

战士们的话音儿没落，同欧阳毅一起来的红9军保卫局的局长徐福长"啪"地一拍桌子，吼道："你们就是反革命，老子亲眼看到的！"

被抓的战士们异口同音道："我们都不是一个单位的，怎么会是反革命？"

欧阳毅对此事真情大致已明，便心平气和地对徐福长说："他们都是掉队的，又不是一个单位，肯定不会是反革命组织，至于是否违反群众纪律，我回去查一查，若有时，我们加强教育，人么，我带回去吧。"

欧阳毅说完，徐福长冷笑一声，说："你说的到轻巧，这些人分明是阴谋叛乱分子，他们公然反对张主席，反对新的党中央，你却说他们无罪，你这是何意？难道和他们一样反对张主席吗？"

欧阳毅听了，心里不由一阵哆嗦，暗道："这徐福长话里有话，他们抓这些战士，是有意要制造个事端，告诉红军指战员，谁要反对张国焘，就要当做反革命来处理，看来这些战士要做为杀鸡给猴看的牺牲品了。不行，我得去找朱总司令，救这些战士的性命。"欧阳毅想着，甩手就离开了右路军总部保卫局，来到了中阿坝，到了总部司令部。

右路军总部司令部设在喇嘛庙内。欧阳毅到了门口，警卫人员拉住他，说："你要做甚？"

欧阳毅刚要说去见朱总司令。话到嘴边儿时，脑子里突然转了个念头，他想：张国焘主持召开大会时，朱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怎么没在台上？是不是他们也出了事？他这样一想，话出口时，就变成了："我去张主席那里汇报工作。"

欧阳毅这么一说，卫兵的态度变了，很客气地向他点了下头。欧阳毅便走了进去。他穿过殿堂，到了一座喇嘛的住房内——他知道这是朱德总司令的住处。刚要进门，就听屋内一阵吵嚷声，似是开会争论问题，欧阳毅不由的停住了脚步。

这屋内做甚？果真在开会。都是哪些人呢？有张国焘、陈昌浩、黄超、朱德、刘伯承等左路军领导十几个人。

原来，张国焘在宣布成立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会员之前，跟朱德打了个招呼。张国焘对朱德说："老总啊，老毛带着人跑了，连个招呼都不打，这是他游击习气的结果。现在看，长征是失败了，中国共产党的希望，中国共产党的有生力量，都在我们这里。如今，你我到了一起，也是天赐良缘吧。"张国焘点了一支烟，慢慢地吸了一口后说："我在部队中了解了一下，同志们对老毛的做法都很气愤，大家希望在老毛给我们造成危机的时刻，你我携起手来，共挽狂澜。如何处置老毛给我们造成的危机，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朱德冷冷地说："我不相信毛泽东会逃跑？这里一定有原因。"

张国焘把两手一推说："老总，上有天，下有地，我张国焘说话可不是小孩打哇哇，这可是陈昌浩亲口说的，陈昌浩汇报这情况时，你不是也在场吗？"

这时候，陈昌浩走了进来，张国焘把朱德的话向陈昌浩重复了一遍，陈昌浩说："老总，毛泽东确实是半夜里将 1、3 军团悄悄拉走的，直到第二天上午，我们才得到消息。"

张国焘见朱德面目阴沉，朝陈昌浩使了个眼神儿，说："昌浩，

有事吗？”

陈昌浩坐了下来，从衣袋中拿出一卷纸，说：“这是指战员们写的请愿书，他们听说毛泽东带队伍跑了，都很气愤，都联名上书，不愿再承认那个跟随毛泽东逃跑、已经失去信用的中央了。”

张国焘吸着烟后，说：“他们要求怎么办呢？”

陈昌浩说：“指战员们要求立即成立临时中央。”

张国焘头微晃着，问朱德说：“老总啊，指战员们这么个态度，我们该怎么办呢？”

朱德斩钉截铁地说：“很简单、两个字，北上！”

朱德话一出口，张国焘狠狠地瞪了朱德一眼，片刻，又露出了一副笑脸，说道：“老总，你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不要紧，慢慢地就明白了，你在指战员中威信很高，大家都希望你能挑起革命的重担。”张国焘稍停又说：“我们应当尊重指战员的意见，成立新的党中央。”

张国焘的话音儿还没落，朱德“啪”地一拍桌子，怒挑双眉道：“张国焘，你这做法是篡党篡军行为！”

张国焘笑道：“老总，干吗发这么大的火呀？成立新的中央，正是我们顺应革命的需要。毛泽东从江西逃到了这里，如今又北上逃跑，中央已在全党失去中流砥柱的作用，不彻底改组不能起到领导全党完成革命的任务，所以，我们要成立新的党中央。”张国焘说到这儿，笑眯着眼说：“老总，你是德高望重之人，你要点头，我把第二把交椅给你坐。”

朱德又把桌子“啪”的一拍，怒道：“张国焘，我这做法，想法，是对党的犯罪行为！”

张国焘见说不动朱德，他把面目一沉，说：“朱玉阶，在你面前，摆着两条道儿，一条，你跟我走，一条，你北上找毛泽东，我张国焘放你走。”又说：“我是个君子，不像毛泽东，他是个小人，办事偷偷摸摸。”

朱德注视着张国焘说："张国焘，我留在左路军，是党中央的决定，你张国焘无权决定我的行为。"

张国焘哼了一声说："好哇，你既然不吃敬酒，那就吃罚酒吧。"他说着抬起身，对陈昌浩说："为了老总的安全，在这周围多加岗。"

这样，朱德便被软禁了。张国焘又去游说刘伯承。刘伯承态度同朱老总一样。张国焘讨了个没趣，对朱德，刘伯承愈加恼恨。他真想把这二人收拾了，可这二人威望太高了，他不敢冒然下手。

第二天，张国焘便主持召开了成立新的中共中央的大会，由于朱德、刘伯承坚决反对，他不敢让二人上台。大会之后，张国焘亲自拟了电报稿，又和陈昌浩、黄超一起，来到了朱德住处。他笑吟吟地把电报稿递给朱德，说："玉阶，昨天开了成立临时中央的大会，大会开的很热烈，做出《阿坝会议决议》，我起草了份电报稿，你来鉴个名吧。"说着，把电报递给了朱德。

朱德接过电报一看，见上面写着："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你们应自即日起，以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的名义行文，不得再用中央名义……"朱德看到这里，把电报放下了，装了一袋烟，吸了起来。张国焘见朱德这个态度，也不知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他又笑脸道："老总，说来很简单，你在上面签个字，而后再以你总司令的名义发个声明，一是谴责毛泽东，宣布断绝和他的一切关系；二么，谴责他那个北上的决定；三么，拥护大会成立临时中央的决定。"

朱德将烟锅一磕，愤然站起说："你要让我表态，我现在就可以表。"朱德一字一句地说："第一，你就是把我劈成两半儿，也割不断我同毛泽东的关系；第二，党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它；第三，有红军就有朱毛，连外国人都把朱毛联在一起，人家绝不会相信我朱德反毛泽东！"张国焘刚要开口，朱德把手一抬："别急，容我把话说完。"张国焘不言语了，朱德继续说道："党中央是经过党代表会选举出来了，现在你又要成立一个中央，这是非法的。你就是人再多，枪再多，也要听中央的，这是我们共产党的

规矩。张国焘同志，别忘了，你是个共产党员，你不是新老军阀！”

朱德说到这儿，把个张国焘的鼻子都气歪了。一旁的黄超竟指着朱德骂了起来。他骂朱德是老右倾，老顽固。就在这时，欧阳毅走了进来，张国焘一见欧阳毅进了屋，立时，怒冲冲地问：“你来做甚？”

原来，欧阳毅已在门外听了朱德的言辞，总司令的凛然正气，使他很受感动。黄超等人围骂总司令，他气愤不过，这才推门而门。他听了张国焘的问话，答道：“我来向总司令汇报工作。总部抓了5军团的一些掉队战士，说他们组织叛乱，反对新的中央，经我调查，没有此事。”

朱德说：“抓错了人就应该放出来。”

黄超哼了一声说：“哪有那么容易？反对新的中央，就是反革命行动，就要按反革命罪论处。”

朱德指着张国焘愤愤地说：“那就先把他抓起来，反对党中央的是他。”

张国焘没发火，而是笑着说：“玉阶，今儿，就谈到这里吧，你好好想想。”说完，带着几个人走了。

张国焘走后，欧阳毅上前一步，难过地说了声：“老总。”

朱德说：“欧阳毅同志，不要焦急，张国焘的思想弯子，要慢慢地做才行。”

欧阳毅愤愤地说：“老总，他们不能对你这个态度。”

朱德站起身，说：“我个人受点委屈不算甚，只怕我们红军不团结，那时敌人就要钻空子，回去吧，告诉同志们，要团结，不要分裂，大的问题，中央会解决的。”

欧阳毅走后，朱德坐在凳子上，闷着头吸烟，思索着如何同张国焘斗争。

这天晚上，张国焘客客气气地请朱老总到东厢房进晚餐。朱德进门一看，一张供桌上摆着一盆肉，还热乎乎地冒着香气。张国焘

伸手相让道："玉阶，没甚好招待的，借花献佛了。"

朱德没听明白张国焘话中之意，只是说："哎呀呀，怎么搞这么丰盛啊？"

张国焘正要开口，只见朱德的小勤务员跑了进来，眼里含着泪花对朱德说："老总，大白马……被他们杀了煮肉吃了。"

朱德一听，立时"啊"了一声，心中不由一阵难过。这匹大白马，是他从江西苏区带的，他曾骑着他，转战千里。大白马立下了不少战功。没料到今日竟被张国焘下令宰了，而且煮成了肉，还来给他吃。这肉，他如何能吃得下？他把碗一放，怒视着张国焘说："这是怎么回事？"

张国焘小眼珠儿转了转，一笑说："新的中央成立了，总要庆贺一下呀，你那马已经老了，我让人把他杀了，回头我再令人给你找匹好马。"

朱德听了，只气得浑身发抖，他指着张国焘说："你这是杀马欺主！"

张国焘笑道："玉阶何必发这么大的脾气呢？我给你换匹好马就是了。你要愿意北上去会毛泽东，明儿让你带足食品，骑上好马，快马加鞭，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朱德把脸一沉说："张国焘，我留在左路军，是党中央决定的，党中央没有命令，我不能离开。"

张国焘奸笑了一声，说："好，你要愿意留下，你就留下，只是，你要受点委屈了。"

朱德又怒视了张国焘一眼，没再开口。

从此之后，张国焘便把朱德身边的警卫员撤了，也不再给他马，不仅如此，连粮食也不给他留了。朱德见状，叹了口气，便给32军军长罗炳辉写了信，向罗炳辉要了些粮食。自此，朱德被软禁了。接着，张国焘把刘伯承也软禁了。

张国焘成立了伪中央之后，便建立了伪中央的机关刊物，设立

了“红色中华社”，成立了“中央党校”、“红军学校”，之后，张国焘又率领着南下的右路军，向四川军阀刘文辉、杨森两部发动了进攻。川军望风而逃，张国焘见状，甚为得意。

第三十八章　张国焘机关算尽

廖承志险中逢生

1936年2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向张国焘发起了猛攻，红军不支，一退再退，直退到了甘孜一带，才算停住脚。这时，红军已由八万多人锐减到了四万多人。正在这时，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红2、6军团，到了云南贵州交界处。张国焘眼珠一转，心说："我何不将2、6军团调过来，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主意打定后，便利用他掌握的中央军委使用的密电码，盗用了中央军委的名誉，给贺龙、任弼时发了电示，令红2、6团渡江北上，到甘孜会合。贺龙、任弼时时远在数千里外，1、4方面军会合后发生的一切，自然不知，接到了军委的电示后，贺龙、任弼时即率红2、6军团将

士，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渡过了金沙江，翻越了大雪山，他们满怀着希望，与中央红军会合，与毛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会面。

当张国焘得知红 2、6 军团将士翻过了金沙江，越过了大雪山，又兵分两路，由贺龙、任弼时率 2 军团，肖克、王震率红 6 军团、北上直奔甘孜时，他又喜又忧，喜的是这支人马被自己调来了，忧的是怕贺龙等不听自己指挥。他小眼珠儿转了几转，暗道："贺龙、任弼时资历老，阅历深，要想把他们拉到自己这小团伙里，恐怕要费点儿事，肖克、王震都是二十多岁的人，凭着我这资历，再给他们封官许愿，要拉过来，容易得手。"他想好之后，便叫来了刘型，要他率工作团、随罗炳辉的 32 军，到理塘迎接红 6 军团。

1936 年 6 月，王震率红 6 军团到达了理化以南的甲洼，与前来迎接的红 32 军罗炳辉部见面。大家同住了一家藏民房中。当晚，罗炳辉备了一些酒肉食品，与肖克、王震接风洗尘。四人刚刚坐定，肖克、刘型因事出去。这时，王震向罗炳辉问起毛泽东、朱德诸领导的情况。罗炳辉不由长叹一声，便把张国焘在 1.4 方便军会合后的所做所为，说了一遍，王震听了，不由得拍案而起，怒道："真是岂有此理，中国红军、中国革命，已经到了这步天地，他张国焘还闹个人独立，这不是要把中国革命前程断送了么？"

罗炳辉说："王胡子，你们要提高警惕，张国焘要在你们身上打主意的。"

王震一拍桌子说："瞎了他的眼！谁分裂党，分裂红军也不行。"

二人正谈着，有人报告王震，说张国焘工作团给 6 军团政治送来了许多《干部必读》。王震说："《干部必读》是甚书？"

来人说："是张主席叫人编的。"

王震对罗炳辉说："我去看看。"

王震刚走，肖克和刘型回来了。肖克问："王胡子呢？"

罗炳辉说了王震去向，刘型听了说："我也去看看。"说完走了。

刘型走后，肖克卷一支烟，吸着后，说："炳辉同志，中央发生的

情况看来很严重。”

罗炳辉说：“刘型和你讲了。”

肖克说：“‘略谈了一些。”

当下，罗炳辉便把1、4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况说了一遍。肖克听了，愤然而起说：“张国焘这样做，是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朱总司令现在哪里？伯承同志现在哪里？”

罗炳辉苦笑道：“他们现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张国焘把朱老总和伯承参谋长软禁了，不给他们粮食，不给马骑。前些时，朱老总写了个条子，派人从我这里取走了一些粮食。”罗炳辉拧着眉头说：“老总很可能困在喇嘛庙内。”

肖克听了，拍着桌子说：“真是岂有此理！”又说：“炳辉同志，看来我们同张国焘还要有场斗争哩。”

罗炳辉说：“是啊，张国焘早就对2、6军团打主意了，如果你们不听他的指挥，他肯定要以势压人。”

二人正说着，王震气呼呼地走了进来，一进门，便把手中的几本小册子往桌上一摔，说：“我已通知部队，这些《干部必读》不能下发。”

肖克见王震这么大的火气，拿起了一本《干部必读》看了一下。这书是将字油印在喇嘛庙里的经书背面。第一页就是《阿坝会议决议》，肖克略看了几眼，见其中内容均是反毛周张博的语言，便又向后翻，在“决议”文后，是《红色中华》杂志社论。署名“陈然”。肖克问罗炳辉：“陈然是谁？”

罗炳辉道：“就是郭潜。”

肖克又向后翻，内容是张国焘成立伪中央时的讲话。肖光看了几眼，把书往桌上一摔，对王震说：“胡子，这些小册子决不能下发，集中起来，烧了。”

罗炳辉道：“肖军团长，不发可以，先不要烧，要是烧了，张国焘势必产生抵触情绪，下边的工作，就不好做了，毛泽东曾说，张国焘

是块牛皮糖，工作要慢慢来才行。”

肖克点头，又对王震说：“胡子，给贺、任发个报吧，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他们。”

王震同意。

第二日，红6军团同罗炳辉部队和刘型的工作团一起，起程奔甘孜。6月22日，红6军团抵达甘孜南面的普乙隆，受到了红4方面军和藏民独立军的欢迎。6月30日，红6军团移到一个叫甘海子的地方，部队即停了下来。

贺龙、任弼时率红2军团，从中甸县出发，经得荣、巴塘、白玉等地，6月30日，到达甘孜西面数里远的绒巴岔。与红4方面军的第30军第88师会师。

甘孜位于鸦砻江上游，为康青通商要道，形势上扼北路之中心。此地皆为藏民。县境内有大金和白利两大喇嘛寺，西康的土司，自清未改土归流后，虽名制取消，无直辖地方之权，但其潜在势力依然存在，白利喇嘛寺属子白利土司，大金刚属于朱倭土司。两寺因财产债务关系，屡起争端，民国十五年时，双方引起了一场大的械斗，自此宿怨愈深。在大军行进之时，任弼时便已知此情，于是及时向部队进了教育，要干部战士对两边土司所属之藏民，皆要一事同仁。

贺龙、任弼时率红2军团在绒巴岔停下之后，当天晚上，陈昌浩便带着工作团，来到红2军团指挥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听说陈昌浩来了，都出外相迎。陈昌浩与贺龙系初次见面，与任弼时在莫斯科时便结识了，大家携手入室。坐定之后，贺龙劈口即问：“昌浩同志，听说国焘在这里成立了一个中央。”

陈昌浩打了个愣，接着，便皮笑肉不笑地说：“是这样，毛泽东、周恩来带着人马向北逃跑了。详细情况么，这里有本小册子，上边写得很清楚，张主席指示要把这些小册子发到部队。”说着，从怀里取出了几本《干部必读》，递与贺龙。

贺龙早已从肖克、王震的电报中得知了此情况，他看也没看，而是反问一句："哪个张主席的指示？"

陈昌浩说："就是张国焘主席。"

贺龙把手中的小册子往地上一摔说："张国焘是红军的总政委，谁封他为主席的？"

陈昌浩见贺龙话不投机，遂笑道："贺总指挥，别发火，有话好商议么。"

贺龙面带怒容说："陈昌浩，你告诉张国焘，他的底细，我最清楚，他要胆敢分裂党中央，莫怪我贺龙动'军阀'！"

陈昌浩本来是游说贺龙任弼时的，没料到与贺龙刚一见面，就讨了个没趣。这时，任弼时见气氛紧张，便心平气和地对陈昌浩说："这些小册子里讲的，都是错误的，你我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怎么能趁机分裂党中央呢？"

陈昌浩默然无语，任弼时又说："昌浩，朱总司令现在何处？"

陈昌浩支吾了一下答道："在甘孜。"

任弼时又问："伯承同志呢？"

陈昌浩说："也在。"稍停，陈昌浩说："贺总、弼时、向应同志，张……"他刚想说出"主席"二字，话到嘴边成了："国焘政委对2、6军团的同志很关心，知道你们很辛苦，给你们准备了牛、羊、粮食。"

贺龙说："昌浩同志，谢谢国焘及4方面军的同志们，明天，我们一起去甘孜，会见国焘和朱总司令、伯承诸同志。"

陈昌浩见贺龙这么一说，也不好再说甚了，当下，便回到房中休息。陈昌浩走后，贺龙对任弼时，关向应说："弼时，我们开个会吧。"

任、关同意。当下，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还有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子意五人，一起开了紧急会议我，会上统一了思想，决定：一方面要以热情的态度对待4方面军的指战员，大搞联欢慰问；一方面则坚决反对和禁止一切反对党中央和不利于团结的言

论，并决定由张子意在第二天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将此精神传达下去。

一夜无话。第二天，张子意去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三人便一起骑马直奔甘孜。

时值六月底，正是高原的黄金季节，平川之上，阳光明媚，水草肥美。各种不知名的花儿，争先开放，一群群牛羊，在草丛中追逐游戏，金碧辉煌的喇嘛寺，在阳光下，更显得壮观无比。那藏民，见到红军，都挑起拇指，不停地念着："邪莫邪莫！"贺、任、关等及警卫人员，都挥手致意。

临近甘孜，便到处可见醒目的标语：

"热烈祝贺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向红2、6军团的指战员学习，致敬！"

"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贺龙等远远的看见不少人向他们迎了过来，贺龙眼尖，虽与张国焘分手快十年了，还是从人群中发现了他。贺龙等人下了马，也喜冲冲地走上前。倾刻之间，久别战友相会，大家都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喜悦，不由地热烈地拥抱起来。贺龙左右看了看，不见朱德和刘伯承。忙问道："朱总司令和伯承怎么没来？"

张国焘忙说："他们情况，回头我再告诉你。"说罢，左手拉着贺龙，右手拉着任弼时，向喇嘛寺走去。

正走之间，贺、任见草地之上有些人被绳子栓着，像是放风。贺、任想过去看看。张国焘忙说："有什么看的？都是AB团。"说完命令左右："快把他们收起！"

任弼时听了"AB团"三个字，反而更要过去看看。张国焘无奈，也只得跟了过去。到了这些蓬头污面人面前，任弼时忽然认出了一个小青年。不由得大声说："你不是小廖吗？"

那青年听到任弼时喊他，怔了一下，不由得叫了一声："任叔叔。"话再也就不下去了。

在一旁的张国焘面红耳赤地问道："弼时，你认识他？"

任弼时说："谁不认只他，难道你不认识他？他是廖仲恺先生的儿子廖承志么。"

张国焘略迟疑一下说："那就把他放了吧。"

任弼时说："国焘，不只是放他，凡是AB团都要放掉。中央肃反扩大化了，这已成为我们惨痛的教训。"

张国焘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先进屋休息，这些事回头再论。"

由于任弼时的一句话，廖承志险中逢生。

贺龙骂娘

任弼时见廖承志被放了之后，这才随着张国焘进了喇嘛庙的一间房子内。贺龙一看，这殿房甚为讲究，铺着地毯，当中摆了一张长方形供桌，供桌四周摆了十数把铺着黄缎褥垫的太师椅。紧靠墙壁上，有一张条案，上面放置着各种藏经，墙上画着充满宗教色彩的壁画。在另一面墙上，挂了一张华西大地图。图下靠墙的供桌上，摆好了茶水和干鲜果品，这些果品，在甘孜，算是上等了。贺龙坐了下来，取出了烟斗，张国焘忙递过来香烟。贺龙说："我抽这个习惯了。"

任弼时问："徐向前同志怎么不见呀？"

张国焘说："他在前线指挥部，不敢抽身。"张国焘说着，一指干鲜果品说："弼时，胡子，先随便吃点儿。我已经让人安排饭了，回头肖克、王震来了，我们好好喝两盅，也算给你们接风洗尘吧。"

关向应问张国焘："朱总司令和伯承究竟在哪里？"

张国焘又没有正面回答，而是点着说："向应，你还是十年前的那个样子。"

这时，黄超在一旁又是点烟又是倒水的，见张国焘说完，插话道："张主席，是不是您先把情况介绍一下。"

黄超语音儿没落，贺龙转脸问张国焘："国焘同志，我请教你一个问题，你是个什么主席呀？"

贺龙的问话使张国焘很尴尬，黄超很不满地看了贺龙一眼，说："他是我们临时中央的主席。"

贺龙拧着眉头说："临时中央？我们中国共产党就一个中央，哪里又搞出个中央来？！"

黄超看了一眼张国焘，见张国焘眼里闪着愤怒之神，便冷冷地说："那是因为党中央随着毛泽东逃跑了，搞分裂，已经失去了同志们的信任，大家便选举了以国焘同志为主席的临时中央。"

贺龙"啪"地一拍桌子，暴怒地吼道："岂有此理，简直是反党！"说完，他转过脸来，问陈昌浩道："昌浩同志，当时你在右路军，1、3军团为什么北上，你应该是清楚的。我问你，那天晚上你接到了什么指示，又采取了什么行动……"

贺龙突然地问话，使陈昌浩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他支吾地说："这个么……"

张国焘见状，忙笑着说："哎呀，今天是我们喜庆的日子，何必搞这些不愉快呢，有什么误会，再谈嘛。"

任弼时说："好，再谈是可以的，不过，国焘同志，我要告诉你，你要明白，我们红2、6军团的全体指战员，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有很高的信仰，如果谁要强迫他们反党，可别怪他们翻脸！"

陈昌浩怒视了任弼时一眼，说："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国焘忙摆手说："好了，好了，临时中央取消。"

这时，关向应又问道："国焘同志，朱总，伯承同志现究竟在哪里？自南昌起义以来，一别已近十余年了，大家都很想念他们。"

有人会问：朱德、刘伯承现在究竟在哪里呢？原来，就软禁在这座喇嘛庙内。张国焘是这样打算的，如果能把贺龙、任弼时拉过来，

就让贺龙、任弼时等人做朱、刘二人的工作。到那时，朱、刘二人，必然屈从。如今，张国焘见拉贺、任、关和王震、肖克不动，心中拨开了算盘珠儿。知道如意算盘不好打。见关向应一再追问，便说：、朱、刘也都在忙着，我已派人去请他们啦。”

张国焘这么一讲，贺龙等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正在这时，肖克、王震、甘泗淇都来了。大家见面，自是一番亲热。张国焘说：明天是‘七一’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咱们开个联欢大会吧。一方面，庆祝我们党的生日，二来庆祝我们两支部队会合。”

任弼时说：“好哇。”

当下，大家谈起各自的情况。这时，贺龙站了起来，他要出去小解。到了外边，看了看，但见殿堂房舍密布，只是不见厕所，心想：厕所一定在僻人这处。便向后边走去。他走了几个院子，均没找见。忽见一角门，门虚掩着，推开一瞅，又一个小院，小院很幽静。院内草木繁茂，几株不知名的花儿，开的正盛。贺龙再看时，又见一个角门，门口有两个战士持枪守卫着。贺龙纳闷，便走了过去。向两名战士问道：“这院里是做什么的？”

两个战士不认识贺龙，其中一人说：“这是军事禁地。”

贺龙自语说：“军事禁地……”又问：“里边有什么？”

两个战士不知如何回答，迟疑了一下，一个战士说：“张主席指示，没他的命令，这里谁也不能进。”

贺龙噢了一声说：“这么重要哇。”他对两个战士说：“你们认识我是谁吗？”

两个战士摇摇头，贺龙说：“我是贺龙。”

贺龙的话一出口，两个战士立即惊喜地说：“哎呀，你是贺老总？是两把菜刀起义的贺老总？”说着，“啪”地行了个礼。贺龙还过礼，笑着道：“告诉我，里边有什么军事秘密，不要怕，你们张政委要问起来，有我贺龙呢。”

两战士互相看了一眼，又四外看看没人，小声说：“贺老总，里

边关的是朱德司令。”

两战士说完，贺龙不由得“啊”了一声，他几步上前，双手推开角门，这时，角门内守卫的几名战士呼啦围了一来，贺龙对这几名战士说：“我是贺龙，来看朱总司令的！”

战士们听说是贺龙，都呆住了，并用惊异的目光打量着这位慈祥而又威严的军人。贺龙问：“总司令在哪里？”

一战士指着一间房说：“朱总司令就在那间屋内。”

贺龙立时几步跨地过去，他双手把门推开，定睛一看，见凳子上端坐一人，正在看书，这人年约五十，四方大脸，浓眉、立目、阔口，一副威严之态。此人不是别人，正是朱德总司令。贺龙忍着激动心情，喊了声：“朱总！”

朱德抬起头来，朝贺龙一望，先是一愣神，接着，猛地站起，几步跨了过来，紧紧地抓住了贺龙双手说：“文常，是你，你，什么时候到的？”

贺龙忙说：“朱总，红 2、6 军团都来了。”又说：“朱总，南昌起义一别，我天天盼着见你，没想到在此见到了你呀。”

朱德说：“文常，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贺龙把经过说了一遍，朱德面带怒容说：“张国焘心术不正，一心想当太上皇。”

贺龙说：“朱总，你受委屈了……”

朱德说：“受点委屈算得了啥子呀，如今你们来了就好了，不然，革命事业要受大损失。”

贺龙说：“总司令，下一步该怎么办啊？”

朱德说：“张国焘现在的日子很不好过，南下碰了壁，百丈关一仗，红军损失了三万多人，蒋介石还在调兵遣将，往这里逼进，4 方面军面临着被围困的危险，现在不少同志正在觉醒，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支队伍带出这个可能覆灭的危险地区，北上，去找党中央，离陕北越近越好。”

二人正说着话，张国焘推门进来了。原来，他见贺龙出门久久不归，心中打了鼓，便离开了座位，径直到这个院内。一问看守的战士，知道贺龙果真来此，他心中发毛，急急走进软禁朱德的房中。贺龙一见张国焘，立时话中带刺说："特立，你把朱总关在这里，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

张国焘皮笑肉不笑地说："文常，是这样，朱总身体不好，可他又每天工作到深夜，找他的人又多，为了老总的健康，我不得不这样做。这不，我就是来请老总与你们见面的，没想到你先来这里了。"

贺龙说："特立，你可真会说呀，想那刘伯承也一定被你保护起来啦。"

张国焘说："我已派人请伯承了。"又对朱德说："朱总，弼时他们都在等你哩。"

当下，三人出了门，不一会儿，便走进了欢迎贺、任等人的那间喇嘛大殿。进得殿门，任弼时、关向应、王震、肖克，甘泗淇等诸位英雄，见朱德进来了，都起身相迎，握手问好，大家对朱德那股亲热之情，使张国焘眼红的直咬牙。张国焘趁众人同朱总亲热之际，低声吩咐黄超："快把刘伯承叫来。"

黄超答应着走了。不一会儿，刘伯承来了，原来，刘伯承被软禁在另一院内房舍之中，英雄与大家见面，彼此真有说不出的高兴。重新落坐后，张国焘说："今天我很高兴，文常、弼时、向应我们在南昌起义时就结识了，初次见面的同志，也都早闻大名。当年曹操煮酒论英雄，今天，我这里备了些青稞酒，也算是英雄相会吧。"

当下，张国焘令人取来了青稞酒，每人斟了一大碗。他又对黄超说："把德钦喇嘛请来。"

黄超答应着走了，张国焘面对贺龙，说："文常，波巴依得瓦的意思你知道吗？"

贺龙摇头笑道："你这吃过洋面包的言语，我如何知道？"

张国焘说："这几个字为'番民苏维埃'，是我们新建立起来的政府。"

贺龙摆手说："我看这'番民'二字不好，这对少数民族不尊重。"

张国焘说："文常说的对，咱们不叫番民了。说完，张国焘又道："弼时、文常，我提议开个两军联席会议，就会师后的问题，大家讨论一番。"

任弼时说："开这样的会，由谁来做报告？若发生不同意见，怎样做结论？我的意见，按照中央的指示去办，中央要我们留在这里，我们就留在这里，中央要我们北上，我们就北上。"

张国焘见话不投机，把手一摆说："好了，好了，今天咱们只叙旧情，不谈大事。"

这功夫，菜肴摆了上来。张国焘端起酒杯，小眼珠滴溜溜的转了一阵说："今日是正式会师之日，我建议在座的同志，为我们两大主力会师甘孜而干杯！"

张国焘说完，任弼时马上举杯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我建议为我们党的钢铁般的团结，为党的神圣事业而干杯！"

在座的人都举起了酒杯，正在这时，机要参谋送来了一份电报，交给了张国焘。张国焘看后，迟疑了一下，交给了任弼时，任弼时接过一看，电报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三人联名来的。电文是：

朱、张、任、贺、肖、王、关：

一、欣闻两军会师，值此祝贺。

二、国内及国际的政治形势均取着暴风雨般的姿态向前发展，党的抗日统一阵线策略有第一步的成就，正与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共商抗日大计。目前议事日程上的具体任务是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三、中央决定，从七月一日起，红二、六军团，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由原二军团总指挥部，组成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指挥贺龙、政治委员任弼时、副总指挥肖克、副政治委员关向应，二军团、六军团番号不变，红三十二军编入二方面军建制。原红二军团第五师改编为三十军的九十六师。

四、中央红军将西渡，向陕、甘、宁发展，策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猛烈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

五、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的时机与有利的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在兄等大计决定之后，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一步策应兄等，使蒋军不能拦阻。至于奉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阻拦。

任弼时看罢电报，很是兴奋，当即进行了宣读。大家听了，也都很高兴。贺龙说："明天开两军联欢会时，宣布红 2 方面军成立。"

接着，大家开怀畅饮。虽然有张国焘陈昌浩在座，终因大目标一致，所以，宴会的气氛还是很热烈的。

酒宴之后，任弼时、贺龙等要起身回部队，张国焘说："我与文常分手十年，心中无时不思念，今日文常就留在我这里吧，我要与文常抵足而眠，同叙旧谊。"

当下，大家分手。朱德要去红 2 军团看看，便随任、关走了。刘伯承要去红 6 军团看看，随肖、王、甘走了。

大家走后，张国焘携贺龙之手，来到了自己的房中。贺龙进屋一看，这室内布置的很漂亮，铺着猩红的地毯，器皿都是金镀银包的，床上铺着黄缎子被褥，条案上摆着文房四宝和经卷，还有一尊小佛像，佛像旁挂有佛幛。墙上装饰着甚为美丽的壁画。画中的马、

象、狮虎及身穿甲胄的勇士形象，看那意思是佛经上的某个神话故事。贺龙看了这室内摆设，笑道："特立，你要穿戴起黄袍，就成了喇嘛了。"

张国焘笑道："这原本是大喇嘛的住处，我们成立了番民苏维埃政府，大喇嘛就把这房腾了出来，由我住了。"

二人坐下，张国焘取出烟来，贺龙依然抽出烟斗，张国焘自己点了一支，而后说道："文常，今儿我们俩在一起，有几句心里心里话，我想跟你说说。"

贺龙说："特立，我们相识十二年了，在我入党的那一天，即第一次的党小组会上，我说过这样的话，也许你忘记了！论年龄，你同恩来同志都是我的兄弟，但在政治上、思想上你们是我的兄长、我的先生、我在革命征途上的领路人。"

贺龙这么一说，张国焘连连说道："文常，你这话我是牢牢的记在心中啊。"张国焘到这儿，连连吸了两口烟，说："文常，我非常喜欢你为人的直爽，所以，有些心里话想跟你谈谈。"

张国焘说到这儿，偷看了贺龙一眼，见贺龙不住的吸烟，又继续说道："文常，实话跟你说吧，我心中很烦闷，1、4 方面军会合后，我提议把部队带到新疆去发展，这是从革命前途着眼，避敌锋芒，养精蓄锐，咳！没想到好心没好报，竟落了个分裂党的罪名，文常，你说，这不是冤枉我吗？"没等贺龙开口，张国焘又说："文常，你是我们党的杰出军事家，如今，中央又要我们北出甘陕，你想过没有，北出甘陕，面对的是个茫茫的大草地，要渡过它，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呀。再有，据我所知，陕甘之敌，张学良有廿万，杨虎城有十万，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加在一起，不下十五万，还有马回回的骑兵，毛周张电报说与张学良杨虎城搞了统战，我不相信，反共的总会反共，水火不能相容，怎么能统一呢？"张国焘吸了口烟又说："我们三个方面军加在一起，不过七八万人，蒋介石在陕北现有五十万人，他还可以调几个五十万人来，陕北地瘠民穷，到那时，我们将死

无葬身之地呀!”

贺龙说:“特立,你太悲观了吧。”

张国焘说:“文常,不是我悲观,是毛周张他们的决定太冒险了,在中国、西康、西藏、青海和新疆,再加上四川西北部的甘肃的北半部和西部,整个华西的辽阔土地,大约有五百万平方公里左右,相当于十个法国,二十个英国、十五个日本,我们苏维埃如果在这片土地上取得胜利,那会具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

贺龙说:“特立,你的设想很好,可你别忘了,现在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党一再向全国以至全世界发出抗日的呼吁,我们长征一路行走,都宣传北上抗日,而将至抗日前线时,我们却把红军拉向远离抗战前线的华西,这要遭到全国人民的指责,蒋介石更有借口攻击我们党了。”

张国焘听了贺龙的一番话,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说:“文常,苏维埃的创建,大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啊,想想吧,三大苏区是怎么失掉了?如果还要钻到敌人的腹地去重新开辟,就是创建了新的根据地也会丢失的。”

贺龙说:“三大苏区的丧失,完全是由于王明推行的那一套的结果,就洪湖说,不是敌人打垮了我们,是我们自己搞垮自己的。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不也是这样吗?如今,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地位,我们要拥护这个中央,支持这个中央,团结在这个中央的周围。”

张国焘说:“文常,你对毛泽东怎么那么有感情? 在我的记忆中,你们没有见过面呀,我们呢,总是老战友了!”

贺龙说:“是啊,直到今天,我还没见过毛泽东的面,可是,对他的为人,我听了许多,他宽宏大度。张闻天、博古同志,在宁都会议上那么围斗他,还撤了他在党内和军内的一切职务,可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没有以德报怨。如今,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红军北上抗日,这会得到全国四万万同胞的赞赏,我拥护他毛泽东,是

拥护他的正确领导。你张国焘的言行正确，我贺龙也会听的。”

张国焘苦笑了一声说：“文常，你呀，毕竟是个军人，好吧，我们不谈这些了。”

张国焘留下贺龙谈心，原想凭他三寸不烂之舌把贺龙拉过来，没想到贺龙不上他的圈套，谈了一阵，他觉着没趣儿，也就不愿多谈了。

这一夜，二人虽抵足而眠，却是同床异梦。

第二天，天空晴朗，阳光明媚。红2、6军团的干部，举着红旗，唱着歌儿，来到甘孜喇嘛庙前的草坪上。喇嘛寺的红色墙上高悬着：“向英勇善战的2、6军团致敬！”的大幅标语。会场上早以坐满了红4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有人指挥着唱歌。红2、6军团干部战士人场时，红4方面军的指挥员热烈地欢呼：“欢迎转战湘鄂川黔滇的2、6军团！”“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一些藏族群众，也簇拥在路旁，捧着酥油、糌粑，欢迎红军。红2、6军团指挥战员人场之后，红4方面军指战员唱起了会师歌儿：

看，战胜了一切！
听，震动了全国！
英勇的弟兄们，
伟大的会合，
欢迎二路军，
举旗向前进，
一定要胜利，
杀敌齐努力，
团结抗日反蒋的力量，
推动中华民族的解放，
迎接革命高潮的来到，
大踏步，向前进！

赤化全西北！
要艰苦奋斗，
要钢铁的团结，
赤化全西北，
创造根据地，
为全国的胜利，
为民族的解放，
团结和一致，
奋勇和坚决！
横扫湘鄂川黔的二路军，
纵横无敌的弟兄们，
抗日反蒋主力是我们，
齐团结，齐奋进！
胜利归我们！

歌声此起彼落。这时，贺龙来到主席台上，他挥着手说："同志们，静一静，请朱总司令给我们讲话。"

在雷鸣般掌声中，朱德激动地走上了主席台，他环视了一下会场，用响亮而有力的四川口音开始讲道："同志们，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这个日子有三喜，一，今天是我们党的生日；二，是我们两只部队经过千难万险在今天会合了；第三，经过党中央的批准，红 2、6 军团在今天改称为红 2 方面军！"

朱德说到这儿时，会场上暴发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接着，朱德讲了两军会合后的任务，强调大家搞好团结。会后，红 4 方面军政治部的剧团为大会演出了《迎亲人》歌曲和《红军舞》，这是红 2、6 军团自长征以来，第一次坐下来安安稳稳地观看演出。

会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由 2、4 方面军领导人组成西北局，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委员为：朱德、关向应、贺

龙、徐向前、王震、陈昌浩等，又经朱德提议，任弼时随 4 方面军行动，之后，红 2、4 两个方面军，一起北上。至此，中共在苏区历时数年的大肃反结束。

附录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
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

一

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在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奋斗中，在第一次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的三个历史时期中，我们党始终一贯地领导了广大中国人民，向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人民，将人类最高智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论，创造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以农民为主要群众，以反帝反封建为直接任务而又地广人众、情况极复杂、斗争极困难的半封建半殖民地

的大国，光辉地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学说。由于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向一切与之相反的错误思想作了胜利的斗争，党才在三个时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达到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空前的巩固和统一，发展为今天这样强大的革命力量，有了一百二十余万党员，领导了拥有近一万万人民、近一百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战争和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重心。

二

在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第一个时期中，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特别是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曾经在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伟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同志，在这次大革命中，进行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发展了全国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推进并帮助了国民党的改组和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形成了东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领导了全国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极光荣的一章。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一九二七年叛变了这个革命，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执行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的许多英明指示，拒绝接受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同志的正确意见，以至于当国民党叛变革命，向人民突然袭击的时候，党和人民不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

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至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的十年

间，中国共产党，并且只有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的极端恐怖的统治下，全党团结一致地继续高举着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在这个战斗中，中国共产党创造了红军，建立了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分配了土地给贫苦的农民，抗击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进攻和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的新民主主义的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事业，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全党对于企图分裂党和实行叛党的托洛茨基陈独秀派和罗章龙、张国焘等的反革命行为，也同样团结一致地进行了斗争，使党保证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总原则下的统一。在这十年内，党的这个总方针和为实行这个总方针的英勇奋斗，完全是正确的和必要的。无数党员、无数人民和很多党外革命家，当时在各个战线上轰轰烈烈地进行革命斗争，他们的奋斗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精神和功绩，在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假如没有这一切，则抗日战争即不能实现；即使实现，亦将因为没有一个积蓄了人民战争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骨干，而不能坚持和取得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

尤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们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创造性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革命学说应用于中国条件的工作，在这十年内有了很大发展。我党终于在土地革命战争的最后时期，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和全党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的最大成就，是中国人民获得解放的最大保证。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在这十年内，我党不仅有了伟大的成就，而且在某些时期中也犯过一些错误。其中以从党的一九三一年一月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六届四中全会）到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这个时期内所犯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左"倾错误，最为严重。这个错误，曾经给了我党和中国革命以严重的损失。

为了学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教训，以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使“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对于这十年内若干党内历史问题，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的结论，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三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在党内曾经发生了“左”、右倾的偏向。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小部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这时对于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了取消主义者。他们采取了反动的托洛茨基主义立场，认为一九二七年革命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于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经是所谓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因此他们武断地说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在当时就只能进行所谓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党所进行的各种革命斗争，并污蔑当时的红军运动为所谓“流寇运动”。他们不但不肯接受党的意见，放弃这种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反党观点，而且还同反动的托洛茨基分子相结合，成立了反党的小组织，因而不得不被驱逐出党，接着并堕落为反革命。

另一方面，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和对陈独秀投降主义的愤怒而加强起来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也反映到党内，使

党内的“左”倾情绪也很快地发展起来了。这种“左”倾情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已经开端。八七会议在党的历史上是有功绩的。它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坚决地纠正了和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党和人民群众继续革命的战斗，这些都是正确的，是它的主要方面。但是八七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它在政治上不认识当时应当根据各地不同情况，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有计划地保存革命阵地和收集革命力量，反而容许了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的倾向。它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并造成了党内相当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状态。这种“左”倾情绪在八七会议后继续生长，到了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党中央的扩大会议，就形成为“左”倾的盲动主义（即冒险主义）路线，并使“左”倾路线第一次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这时的盲动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所谓“不断革命”（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是所谓“不断高涨”（否认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因而他们仍然不但不去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命令少数党员和少数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和这种政治上的冒险主义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这个错误路线一开始就引起了毛泽东同志和在白色区域工作的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非难，并在实际工作中招致了许多损失，到了一九二八年初，这个“左”倾路线的执行在许多地方已经停止，而到同年四月（距“左”倾路线的开始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上结束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间召开的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它正确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指出了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因此确定了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发布了民主革命的十大纲领[1]。它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指出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指出了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它进行了两条战线的斗争，批判了右的陈独秀主义和“左”的盲动主义，特别指出了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这些都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第六次大会也有其缺点和错误。它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虽然使得八七会议以来的“左”倾思想未能根本肃清，并被后来的“左”倾思想所片面发展和极端扩大，但仍然不足以掩盖第六次大会的主要方面的正确性。党在这次大会以后一个时期内的工作，是有成绩的。毛泽东同志在这个时期内，不但在实践上发展了第六次大会路线的正确方面，并正确地解决了许多为这次大会所不曾解决或不曾正确地解决的问题，而且在理论上更具体地和更完满地给了中国革命的方向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根据。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之下，红军运动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国内政治的重要因素。党在白色区域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

但是，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上半年间，还在党内存在着的若干“左”倾政策，又有了某些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遇着时局的对革命有利的变动，便发展成为第二次的“左”倾路线。在一九三〇年五月蒋冯阎战争爆发后的国内形势的刺激下，党中央政治局由李立三同志领导，在六月十一日通过了“左”倾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使“左”倾路线第二次统治了中央的领导机关。产生这次错误路线（李立三路线）的原因，是由

于李立三同志等不承认革命需要主观组织力量的充分准备，认为“群众只要大干，不要小干”，因而认为当时不断的军阀战争，加上红军运动的初步发展和白区工作的初步恢复，就已经具备了可以在全国“大干”（武装起义）的条件；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危机在全国各地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中心城市尤其要首先发动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并污蔑毛泽东同志在长期中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以农村来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谓“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由于他们不承认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中国革命的总爆发必将引起世界革命的总爆发，而中国革命又必须在世界革命的总爆发中才能成功；由于他们不承认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并因此规定了若干不适时宜的“左”倾政策。在这些错误认识下，立三路线的领导者定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在这些错误决定的形成和执行过程中，立三同志拒绝了许多同志的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并在党内强调地反对所谓“右倾”，在反“右倾”的口号下错误地打击了党内不同意他的主张的干部，因而又发展了党内的宗派主义。这样，立三路线的形态，就比第一次“左”倾路线更为完备。

但是立三路线在党内的统治时间也很短（不到四个月时间）。因为凡实行立三路线的地方都使党和革命力量受到了损失，广大的干部和党员都要求纠正这一路线。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他不但始终没有赞成立三路线，而且以极大的忍耐心纠正了红一方面军中的“左”倾错误，因而使江西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在这个时期内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利用了当时蒋冯阎战争的有利形势而得到了

发展，并在一九三〇年底至一九三一年初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其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除个别地区外，也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在白区，也有许多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经过党的组织起来反对立三路线。

一九三〇年九月党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停止执行是起了积极作用的。虽然六届三中全会的文件还表现了对立三路线调和妥协的精神（如否认它是路线错误，说它只是"策略上的错误"等），虽然六届三中全会在组织上还继续着宗派主义的错误，但是六届三中全会既然纠正了立三路线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极"左"估计，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工作，因而它就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立三同志本人，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也承认了被指出的错误，接着就离开了中央的领导地位。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又在同年十一月的补充决议和十二月的第九十六号通告中，进一步地指出了立三同志等的路线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当然，无论六届三中全会或其后的中央，对于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都没有加以清算和纠正，因此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一直存在于党内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和六届三中全会后还是浓厚地存在着。但是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既然对于停止立三路线作了上述有积极作用的措施，当时全党同志就应该在这些措施的基础上继续努力，以求反"左"倾错误的贯彻。

但在这时，党内一部分没有实际革命斗争经验的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在陈绍禹（王明）同志的领导之下，却又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帜之下，以一种比立三路线更强烈的宗派主义的立场，起来反抗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了。他们的斗争，并不是在帮助当时的中央彻底清算立三路线的思想实质，

以及党内从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一九二九年以来就存在着而没有受到清算的若干“左”倾思想和“左”倾政策；在当时发表的陈绍禹同志的《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中，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形态下，继续、恢复或发展立三路线和其他“左”倾思想“左”倾政策的新的政治纲领，这样，“左”倾思想在党内就获得了新的滋长，而形成为新的“左”倾路线。

陈绍禹同志领导的新的“左”倾路线虽然也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左”倾错误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但是它的特点，是它主要地反而批评了立三路线的“右”，是它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未加以丝毫揭破和打击”，指责第九十六号通告没有看出“右倾依然是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新的“左”倾路线在中国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夸大中国现阶段革命中反资产阶级斗争、反富农斗争和所谓“社会主义革命成分”的意义，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它继续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范围的“进攻路线”，认为所谓“直接革命形势”很快地即将包括一个或几个有中心城市在内的主要省份。它并从“左”的观点污蔑中国当时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和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特别强调地宣称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是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和“富农路线”。在组织上，这条新的“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违反组织纪律，拒绝党所分配的工作，错误地结合一部分同志进行反中央的宗派活动，错误地在党员中号召成立临时的中央领导机关，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这一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的领导机关”等，因而造成了当时党内的严重危机。这样，虽然新的“左”倾路线并没有主张在中心城市组织起义，在一个时期内也没有主张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但是整个地说来，它却比立三路线的“左”倾更坚决，更“有理论”，气焰更盛，形态也更完备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之下，也在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情势之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的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六届四中全会直接实现了新的“左”倾路线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反对所谓“目前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尽管六届四中全会在形式上还是打着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的旗帜，它的主要政治纲领实质上却是“反右倾”。六届四中全会虽然在它自己的决议上没有作出关于当时政治形势的分析和党的具体政治任务的规定，而只是笼统地反对所谓“右倾”和所谓“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但是在实际上，它是批准了那个代表着当时党内“左”倾思想，即在当时及其以后十多年内还继续被人们认为起过“正确的”“纲领作用”的陈绍禹同志的小册子——《两条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面这个小册子，如前面所分析的，基本上乃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反右倾”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总纲领。在这个纲领下面，六届四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一方面提拔了那些“左”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同志到中央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了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接着就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其实，当时的所谓“右派”，主要地是六届四中全会宗派主义的“反右倾”斗争的产物。这些人中间也有后来成为真正右派并堕落为反革命而被永远驱逐出党的以罗章龙为首的极少数的分裂主义者，对于他们，无疑地是应该坚决反对的；他们之成立并坚持第二党的组织，是党的纪律所绝不容许的。至于林育南[2]、李求实[3]、何孟雄等二十几个党的重要干部，他们为党和人

民做过很多有益的工作，同群众有很好的联系，并且接着不久就被敌人逮捕，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慷慨就义。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瞿秋白同志，是当时党内有威信的领导者之一，他在被打击以后仍继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所有这些同志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对于中央机关的“改造”，同样被推广于各个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组织。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的中央，比六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更着重地更有系统地向全国各地派遣中央代表、中央代表机关或新的领导干部，以此来贯彻其“反右倾”的斗争。

在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不久，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央所发表的决议，表示新的“左”倾路线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和发展。接着，中国连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变。江西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同志的积极努力之下，在六届四中全会后的中央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其错误的路线情况之下，取得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和第三次“围剿”的巨大胜利；其他多数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情况下，也得到了很多的胜利和发展。另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开始的进攻，又激起了全国民族民主运动的新的高涨。新的中央对于这些事变所造成的新形势，一开始就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它过分地夸大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忽视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强调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是要一致地进攻苏联的，各帝国主义和中国各反革命派别甚至中间派别是要一致地进攻中国革命的，并断定中间派别是所谓中国革命的最危险的敌人。因此它继续主张打倒一切，认为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因此它又提出了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和在白区普遍地实行武装工农、各企业总罢工等许多冒

险的主张。这些错误，最先表现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央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敌人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紧急任务决议》，并在后来临时中央的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作出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关于一二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六日）、《在争取中国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中中国共产党内机会主义的动摇》（一九三二年四月四日）、《中央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革命危机的增长与北方党的任务》（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等文件中得到了继续和发挥。

自一九三一年九月间以秦邦宪（博古）同志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止，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继续发展的时期。其间，临时中央因为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的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江西南部根据地，更使他们的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所在的根据地和邻近各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执行。在这以前，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江西南部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一九三二年十月中央区中央局的宁都会议，虽然已经根据六届四中全会的“反右倾”和“改造各级领导机关”的错误纲领，污蔑过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根据地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在临时中央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贯彻到红军中去以前，一九三三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仍然得到了胜利。而在一九三三年秋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极端错误的战略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在其他许多政策上，特别是对于福建事变的政策上，“左”倾路线的错误也得到了完全的贯彻。

一九三四年一月，由临时中央召集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六届五中全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六届五中全会不顾“左”倾路线所造成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挫折和“九一八”“一二八”以来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挫折，盲目地判断“中国的革命危机已到了新的尖锐的阶段——直接革命形势在中国存在着”；判断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说这一斗争将决定中国的“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它又重复立三路线的观点，宣称“在我们已将工农民主革命推广到中国重要部分的时候，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只有在这个基础上，中国才会统一，中国民众才会完成民族的解放”等等。在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和反对“用两面派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对党的路线怠工”等口号之下，它继续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左”倾路线在退出江西和长征的军事行动中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党在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闽浙赣区、鄂豫皖区、湘鄂赣区、湘赣区、湘鄂西区、川陕区）和广大白区的工作，也同样由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统治过鄂豫皖区和川陕区的张国焘路线，则除了一般的“左”倾路线之久，还表现为特别严重的军阀主义和在敌人进攻面前的逃跑主义。

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

犯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们披着“马列主义理论”的外衣，仗着六届四中全会所造成的政治声势和组织声势，使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统治四年之久，使它在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表现得最为充分和完整，在全党影响最深，因而其危害也最大。但是

犯这个路线错误的同志，在很长时期内，却在所谓“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等武断词句下，竭力吹嘘同事实相反的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之“正确性”及其所谓“不朽的成绩”，完全歪曲了党的历史。

在第三次“左”倾路线时期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是同这条“左”倾路线完全对立的。他们不赞成并要求纠正这条“左”倾路线，因而他们在各地的正确领导，也就被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组织或人员所推翻了。但是“左”倾路线，在实际工作中的不断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不断失败，开始在更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面前暴露了这一路线的错误，引起了他们的怀疑和不满。在中央所在地区红军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更加增长，以至有些曾经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这时也开始觉悟，站在反对“左”倾错误的立场上来了。于是广大的反对“左”倾路线的干部和党员，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省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这次会议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也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骨干，胜利地克服了坚持退却逃跑并实行成立第二党的张国焘路线，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正确地领导了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救亡运动[6]，正确地解决了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7]，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神圣的抗日战争的爆发。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政治路线，是完全

正确的。"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被逐渐地克服了。一九四二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全党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和党史学习，更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党的历史上历次"左"倾以及右倾的错误。过去犯过"左"、右倾错误的同志在长期体验中，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过了许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些同志，和其他广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认识上互相团结起来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欣幸地指出：我党经过了自己的各种成功和挫折，终于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第一次达到了现在这样高度的巩固和统一。这是快要胜利了的党，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战胜了的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四

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了解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以利于"惩前毖后"，不在今后工作上重犯这类错误起见，特分别指出它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同正确路线相违抗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

如同斯大林同志所指出[8]和毛泽东同志所详细分析过的，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

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左”倾路线因此在政治上犯了三个主要方面的错误：

第一，各次“左”倾路线首先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还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就不但指出中国现阶段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且特别指出农民的土地斗争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因此对于农民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9]。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他又指出中国所需要的仍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定要经过这样的民权主义革命”，才谈得上社会主义的前途[10]；指出土地革命因为革命在城市的失败有了更大的意义，“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1]；指出大资产阶级叛变革命之后，自由资产阶级仍然和买办资产阶级有区别，要求民主尤其是要求反帝国主义的阶层还是很广泛的，因此必须正确地对待和尽可能地联合或中立各种不同的中间阶级，而在乡村中则必须正确地对待中农和富农（“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同时坚决地团结中农，保护富裕中农，给富农以经济的出路，也给一般地主以生活的出路）[12]。凡此都是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左”倾路线是不了解和反对这些思想的。虽然各次“左”倾路线所规定的革命

任务，许多也还是民主主义的，但是它们都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定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都低估农民反封建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决定作用；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中间营垒和第三派的存在，尤其强调反对富农。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应当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也领导了农民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和武装反抗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进攻，这些任务都是正确的；但是由于上述的"左"倾认识，他们就错误地害怕承认当时的红军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错误地反对所谓"农民特殊革命性"、"农民的资本主义"和所谓"富农路线"，而实行了许多超民主主义的所谓"阶级路线"的政策，例如消灭富农经济及其他过左的经济政策、劳动政策，一切剥削者均无参政权的政权政策，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要兵不要官的兵运工作和过左的肃反政策等，而使当前的革命任务被歪曲，使革命势力被孤立，使红军运动受挫折。同样，应当指出，我党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中，一贯坚持地领导了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领导了工人及其他群众的经济斗争和革命的文化运动，反对了当时国民党政府出卖民族利益和压迫人民的政策；特别是"九一八"以后，我党领导了东北抗日联军，援助了"一二 八 "战争和察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成立了抗日民主的同盟，提出了在三个条件下红军愿同国民党军队联合抗日[13]，在六个条件下愿同各界人民建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14]，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这些也都是正确的。但是在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由于指导政策的错误，不

能在实际上正确地解决问题，以致当时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也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结果，或归于失败。当然，在抗日问题上，在当时还不能预料到代表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要部分的国民党主要统治集团在一九三五年的华北事变[15]尤其是一九三六年的西安事变以后所起的变化，但是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地主集团已经发生了成为抗日同盟者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大党员和人民都已经认识了的，却被第三次“左”倾路线所忽视或否认，形成了自己的严重的关门主义，使自己远落于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之后。这个关门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孤立和落后的状况，在遵义会议以前，基本上是没有改变的。

第二，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也犯了错误。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16]和斯大林同志一样，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即已正确指出，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缺乏民主和工业的不统一的大国，武装斗争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毛泽东同志又指出：广大农民所在的广大乡村，是中国革命必不可少的重要阵地（革命的乡村可以包围城市，而革命的城市不能脱离乡村）；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建立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以为全国胜利（全国的民主统一）的出发点[17]。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由于国共合作建立了联合政府，当时的根据地是以某些大城市为中心的，但是即在那个时期，也必须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军队，并解决乡村土地问题，以巩固根据地的基础。而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于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占据了全国的城市，这时的根据地就只能主要地依靠农民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在反革命统治薄弱的乡村（而不是中心城市）首先建立、发展和巩固起来。毛泽东同志指出这种武装的乡村革命根据地在中国存在的历史条件，是中国的“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

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是由此而来的“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18]。他又指出这种根据地对于中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是“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高潮”[19]。至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群众工作，则应如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刘少奇同志所主张的，采取以防御为主(不是以进攻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而不是拒绝利用合法)，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荫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为其主要方针。因此，直至整个形势重新具有在城市中建立民主政府的条件时为止，中国革命运动应该以乡村工作为主，城市工作为辅；革命在乡村的胜利和在城市的暂时不能胜利，在乡村的进攻和在城市的一般处于防御，以至在这一乡村的胜利及进攻和在另一乡村的失败、退却和防御，就织成了在这一时期中全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相交错的图画，也就铺成了在这一形势下革命由失败到胜利的必经道路。但是各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因为不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不了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不了解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和长期性，就从而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就从而是反对所谓“枪杆子主义”和所谓“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而总是梦想这时城市的工人斗争和其他群众斗争能突然冲破敌人的高压而勃兴，而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而达到所谓“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而形成所谓全国革命高潮和全国胜利，并以这种梦想作为一切工作布置的中心。但是实际上，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阶级力量对比的整个形势下，这种梦想的结果不是别的，首先就是造成了城市工作本身的失败。第一次“左”倾路线这样失

败了，第二次"左"倾路线仍然继续同样的错误；所不同的，是要求红军的配合，因为这时红军已经逐渐地长大了。第二次失败了，第三次"左"倾路线仍然要求在大城市"真正"准备武装起义；所不同的，是主要要求红军的占领，因为这时红军更大，城市工作更小了。这样不以当时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而以当时的乡村工作服从城市工作的结果，就是使城市工作失败以后，乡村工作的绝大部分也遭到失败。应当指出，在一九三二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实际已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主张阵地战，而反对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他们错误地强调所谓"正规化"，而反对红军的所谓"游击主义"；他们不知道适应分散的乡村和长期的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以节省使用根据地的人力物力，和采取其他必要的对策；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等，就是明证。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一时期内乡村工作所应推进、城市工作所应等待的形势变化，现时已经迫近了。只有在现时，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在我党领导的军队已经壮大，并还将更加壮大的时候，将敌占区的城市工作提到和解放区工作并重的地位，积极地准备一切条件，以便里应外合地从中心城市消灭日本侵略者，然后把工作重心转到这些城市去，才是正确的。这一点，对于从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来艰难地将工作重心转入乡村的我党，将是一个新的有历史意义的转变；全党同志都应充

分自觉地准备这一转变，而不再重复“左”倾路线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由城市转入乡村问题上所表现的初则反对、违抗，继则勉强、被迫和不自觉的那种错误。至于国民党统治区域，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在那里，我们现时的任务是无论在乡村或城市，都应放手动员群众，坚决反对内战分裂，力争和平团结，要求加强对日作战，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当敌占城市在人民手中得到了解放，全国统一的民主的联合政府真正的实现了和巩固了的时候，就将是乡村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完成的时候。

第三，各次“左”倾路线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也犯了错误。正确的策略指导，必须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的，需要正确的形势分析（正确地估计阶级力量的对比，判断运动的来潮和退潮），需要由上而来的正确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需要正确的“利用敌人阵营里的每一缝隙，善于自己找寻同盟者”[20]；而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正是一个最好的模范。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正确地指出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在全国范围内敌强于我，冒险的进攻必然要招致失败；但在反动政权内部不断分裂和战争，人民革命要求逐渐恢复和上升的一般条件下，和在群众经过第一次大革命斗争，并有相当力量的红军和有正确政策的共产党的特殊条件下，就可以“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21]。他又指出：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红色政权的发展“可以比较地冒进，用军事发展割据的地方可以比较地广大”；若在统治阶级比较稳定时期，则这种发展“必须是逐渐地推进的。这时在军事上最忌分兵冒进，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地方武装）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22]。即在同一时期，由于敌人的强弱不同，我们的策略也应当不同，所以湘赣边的割据地区就“对统治势力比较强大的湖南取守势，对统治势力比较薄弱的江西取攻势”[23]。湘赣边红军以后进入闽赣边，又提出“争取江西，同时

兼及闽西、浙西"[24]地计划。不同的敌人对革命的不同利害关系，是决定不同策略的重要根据。所以毛泽东同志始终主张"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25]，"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26]。这些"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27]的策略原则的运用，在他所领导的历次反"围剿"战争中，尤其是在遵义会议后的长征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得到了光辉的发展。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刘少奇同志正确地估计到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白区特别是城市敌我力量的悬殊，所以主张有系统地组织退却和防御，"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以"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28]；主张有计划地把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时期的党的公开组织严格地转变为秘密组织，而在群众工作中则"尽可能利用公开合法手段"，以便党的秘密组织能够在这种群众工作中长期地荫蔽力量，深入群众，"聚积与加强群众力量，提高群众的觉悟"[29]。对于群众斗争的领导，刘少奇同志认为应当"根据当时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觉悟的程度，提出群众可能接受的部分的口号、要求和斗争的方式，去发动群众的斗争，并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更高的阶段，或者'适可而止'地暂时结束战斗，以准备下一次更高阶段和更大范围的战斗"。在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和争取暂时的同盟者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推动这些矛盾的爆发，与敌人营垒中可能和我们合作的成分，或者与今天还不是我们主要的敌人，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应该"向那些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同盟者作必要的让步，吸引他们同我们联合，参加共同的行动，再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下层的群众"[30]。一二九运动的成功，证明了白区工作中这些策略原则的正确性。和这种正确的策略指导相反，各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因为不知道客观地考察敌我力量的对比，不知道采取与此相当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承

认或不重视敌人内部的矛盾。这样，他们在应当防御的时候，固然因为盲目地实行所谓“进攻路线”而失败，就在真正应当进攻的时候，也因为不会组织胜利的进攻而失败。他们“估计形势”的方法，是把对他们的观点有利的某些个别的、萌芽的、间接的、片面地和表现的现象，夸大为大量的、严重的、直接的、全面的和本质的东西，而对于不合他们的观点的一切实际（如敌人的强大和暂时胜利，我们的弱小和暂时失败，群众的觉悟不足，敌人的内部矛盾，中间派的进步方面等），则害怕承认，或熟视无睹。他们从不设想到可能的最困难和最复杂的情况，而只是梦想着不可能的最顺利和最简单的情况。在红军运动方面，他们总是把包围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描写为“十分动摇”、“恐慌万状”、“最后死亡”、“加速崩溃”、“总崩溃”等等。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甚至认为红军对于超过自己许多倍的整个的国民党军队还占优势，因此总是要求红军作无条件的甚至不休息的冒进。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要求在北方乡村中普遍地建立红色政权，在北方白色军队中普遍地组织哗变成立红军。他们也否认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的不平衡，错误地反对所谓“罗明路线”。他们拒绝实行必要的退却和防御的步骤，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可能，而继续采取为当时的情况所不允许的进攻的形式，组织庞大的没有掩护的党的机关和各种脱离广大群众的第二党式的所谓赤色群众团体，经常地无条件地号召和组织政治罢工、同盟罢工、罢课、罢市、罢操、罢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以至武装暴动等不易或不能得到群众参加和支持的行动，并曲解这一切行动的失败为“胜利”。总之，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同志们只知道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盲目地认为“斗争高于一切，一切为了斗争”，“不断地扩大和提高斗争”，因而不断地陷于不应有的和本可避免的失

败。

（二）在军事上：

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路线从两个基本观点出发：第一，我们的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第二，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以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从第一个观点出发，红军（现在是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也就是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因此，红军必须反对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红军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因此，红军在军政关系和军民关系上，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31]；在军队的内部，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权威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从第二个观点出发，红军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因

此，红军必须反对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坚持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的速决战；反对战役战术的以少胜多，坚持战役战术的以多胜少。因此，红军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32]；“诱敌深入”[33]；“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34]等项战略战术的原则。各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是同毛泽东同志站在恰恰相反对的方面：第一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都没有完整的体系。具有完整体系的是第三次。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忽略正确的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的教育；要求不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正当的游击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要求阵地战和单纯依靠主力军队的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却逃跑主义”；要求固定的作战线和绝对的集中指挥等；总之是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他们始则实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主张分兵防御，“短促突击”，同敌人“拼消耗”；最后，在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据地时，又变为实行真正的逃跑主义。这些都是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正确的人民战争的结果。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退却和战略相持阶段中，因为敌我强弱相差更甚，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正确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35]强求过多的运动战是错误的。但在将要到来的战略反攻阶段，正如全党的工作重心需要由乡村转到城市一样，在我军获得新式装备的条件下，战略上也需要由以游击战

为主变为以运动战和阵地战为主。对于这个即将到来的转变，也需要全党有充分的自觉来作准备。

（三）在组织上：

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各个时期既然规定了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治路线，同时也就规定了服务于这一政治路线的联系党内党外群众的组织路线。这个工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得到了重要的发展，其集中的表现，便是一九二九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36]。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毛泽东同志又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并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特点，规定了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这样，毛泽东同志就供给了一个坚持真理的原则性和服从组织的纪律性相结合的模范，供给了一个正确的进行党内斗争和正确地保持党内团结的模范。与此相反，在一切错误政治路线统治的同时，也就必然出现了错误的组织路线；这条错误的政治路线统治得愈久，则其错误的组织路线的危害也愈烈。因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次"左"倾路线，不但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政治路线，也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组织路线；不但形成了脱离党外群众的宗派主义（不把党当作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者），也形成

了脱离党内群众的宗派主义（不使党内一部分人的局部利益服从全党利益，不把党的领导机关当作全党意志的集中者）。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为贯彻其意旨起见，在党内曾经把一切因为错误路线不通而对它采取怀疑、不同意、不满意、不积极拥护、不坚决执行的同志，不问其情况如何，一律错误地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而加以"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甚至以对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这种"党内斗争"。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成了领导或执行"左"倾路线的同志们提高其威信、实现其要求和吓唬党员干部的一种经常办法。它破坏了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取消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民主精神，使党内纪律成为机械的纪律，发展了党内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倾向，因而使党内新鲜活泼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之发展，受到打击和阻挠。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相结合的，则是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宗派主义者不把老干部看作党的宝贵资本，大批地打击、处罚和撤换中央和地方一切同他们气味不相投的、不愿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有工作经验并联系群众的老干部。他们也不给新干部以正确的教育，不严肃地对待提拔新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的工作，而是轻率地提拔一切同他们气味相投的、只知盲目服从随声附和的、缺乏工作经验、不联系群众的新干部和外来干部，来代替中央和地方的老干部。这样，他们既打击了老干部，又损害了新干部。很多地区，更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宗派主义纠缠在一起，使大批优秀的同志受到了错误的处理而被诬害，造成了党内极可痛心的损失。这种宗派主义的错误，使党内发生了上下脱节和其他许多不正常现象，极大地削弱了党。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在此宣布：对于一切被错误路线所错误地处罚了的同志，应该根据情形，撤销这种处分或其错误部分。一切经过调查确系因错误处理而被诬害的同志，应该得到昭雪，恢复

党籍，并受到同志的纪念。

（四）在思想上：

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光辉的成果。在中国生活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应该是为了用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实际问题，如同毛泽东同志所做的。但是一切犯“左”倾错误的同志们，在那时，当然是不能了解和接受毛泽东同志的做法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更污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者”；这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根源乃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在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更特别突出地表现为教条主义的缘故。教条主义的特点，是不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策、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他们的领导和群众脱离，他们不是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他们自高自大，夸夸其谈，害怕正确

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就是必然的了。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同它合作并成为它的助手的经验主义的思想，也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经验主义同教条主义的区别，是在于它不是从书本出发，而是从狭隘的经验出发。应当着重指出：最广大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他们的一切有益的经验，是极可宝贵的财产。科学地把这些经验总结起来，作为以后行动中的指导，这完全不是经验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像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原则当做革命行动的指南，而不把它们当做教条，就完全不是教条主义，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样。但是，在一切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中，如果有一些人满足于甚至仅仅满足于他们的局部经验，把它们当做到处可以使用的教条，不懂得而且不愿意承认“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37]和“为着领导，必须预见”[38]的真理，因而轻视从世界革命经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所谓实际主义和无头脑无前途的事务主义，却坐在指挥台上，盲目地称英雄，摆老资格，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样，他们就成为经验主义者了。因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出发点虽然不同，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却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因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就有了许多共同的错误和认识（如错误的城市中心观点，白区工作中心观点，脱离实际情况的“正规”战观点等）。这就是这两部同志能够互相合作的思想根源。虽然因为经验主义者的经验是局部的、狭隘的，他们中的多数对于全面性的问题往往缺乏独立的明确的完整的意见，因此，他们在和教条主义者相结合时，一般地是作为后者的附庸而出现；但是党的历史证明，教条主义者缺乏经验主义者的合作就不易“流

毒全党"，而在教条主义被战胜以后，经验主义更成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我们不但要克服主观主义的教条主义，而且也要克服主观主义的经验主义。必须彻底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作风，才能普及和深入全党。

以上所述政治、军事、组织和思想四方面的错误，实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基本错误。而一切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都是从思想上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而来，都是从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而来。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我们在否定各次"左"倾路线错误时，同时要牢记和实行毛泽东同志"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39]的指示。应当指出：犯了这些错误的同志们的观点中，并不是一切都错了，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还应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间特别长久，所给党和革命的损失特别重大，但是这个时期的党，因为有广大的干部、党员群众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因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在战争中，在军事建设中，在战争动员中，在政权建设中，在白区工作中）。正是由于这种成绩，才能够支持反对敌人进攻的战争至数年之久，给了敌人以重大的打击；仅因错误路线的统治，这些成绩才终于受到了破坏。在各次错误路线统治时期，和党的任何其他历史时期一样，一切为人民利益而壮烈地牺牲了的党内党外的领袖、领导者、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都将永远被党和人民所崇敬。

五

“左”倾路线的上述四方面错误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有很深的社会根源。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思想一样，“左”倾路线则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不但从党外说是处在这个广大阶层的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由于十月革命以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世界的伟大胜利，由于中国现时的社会政治情况，特别是国共两党的历史发展，决定了中国不能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因此就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分子向无产阶级队伍寻求出路，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此外，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有小资产阶级的色彩。因此，小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常常有各色各样的反映，这是必然的，不足为怪的。

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除了农民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以外，城市小资产阶级大多数群众在中国也受到重重压迫，经常迅速大量陷于贫困破产和失业的境地，其经济和政治的民主要求十分迫切，所以在现阶段的革命中，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革命动力之一。但是小资产阶级由于是一个过渡的阶级，它是有两面性的：就其好的、革命的一面说来，是其大多数群众在政治上、组织上以至思想上能够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在目前要求民主革命，并能为此而团结奋斗，在将来也可能和无产阶级共同走向社会主义；而就其坏的、落后的一面说来，则不但有其各种区别于无产阶级的弱点，而且在失去无产阶级的领导时，还往往转而接受自由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们的俘虏。因此，在现阶段

无产阶级及其先进部队——中国共产党，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在坚决地广泛地联合他们的基础上，一方面给以宽大的待遇，在不妨碍对敌斗争和共同的社会生活的条件下，容许其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作风的存在；另一方面则给以适当的教育，以便巩固同他们的联合。

至于小资产阶级出身而自愿抛弃其原有立场、加入无产阶级政党的分子，则是完全另一种情形。党对于他们，和对于党外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应该采取原则上不同的政策。由于他们本来和无产阶级相接近，又自愿地加入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中，他们是可以逐渐在思想上无产阶级化，并给无产阶级队伍以重大利益的；而且在事实上，加入我党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之绝大多数，也都为党和人民作了勇敢的奋斗和牺牲，他们的思想已经进步，很多人并已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了。但是，必须着重指出：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带着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党员，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但是在思想上却还没有入党，或没有完全入党，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49]者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但不能引导中国将来的共产主义运动达到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达到胜利，而且也不能引导中国今天的新民主主义运动达到胜利。如果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和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的旧有思想坚决地分清界限，严肃地、但是恰当地和耐心地进行教育和斗争，则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不能克服，而且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的事业蒙受损失。党外的小资产阶级愈是广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愈是众多，则党便愈须严格地保持自己的

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纯洁性，否则小资产阶级思想向党的进攻必然愈是猛烈，而党所受的损失也必然愈是巨大。我党历史上各次错误路线和正确路线之间的斗争，实质上即是党外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演；而上述"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也即是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首先，在思想方法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基本上表现为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即不从阶级力量对比之客观的全面情况出发，而把自己主观的愿望、感想和空谈当做实际，把片面当成全面，局部当成全体，树木当做森林。脱离实际生产过程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为只有书本知识而缺乏感性知识，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教条主义。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的感性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们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

第二，在政治倾向方面。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倾向，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由此而来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性片面性，一般地容易表现为左右摇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许多代表人物希望革命马上胜利，以求根本改变他们今天所处的地位；因而他们对于革命的长期努力缺乏忍耐心，他们对于"左"的革命词句和口号有很大的兴趣，他们容易发生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和行动。小资产阶级的这种倾向，在党内反映出来，就构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策略指导问题和军事路线问题上的各种错误。

但是，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另外一种情况下，或是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表现悲观失望，表现追随于资产阶级之后的右倾情绪和右倾观点。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土地革命后期的张国焘主义和长征初期的逃跑主

义，都是小资产阶级这种右倾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抗日时期，又曾发生过投降主义的思想。一般地说，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分裂的时期，比较容易发生“左”倾错误（例如土地革命时期“左”倾路线统治党的领导机关至三次之多），而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联合的时期，则比较容易发生右倾错误（例如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和抗日战争初期）。而无论是“左”倾或右倾，都是不利于革命而仅仅利于反革命的。由于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坏的一面的特点。这是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所处的不稳定地位在思想上的反映。

第三，在组织生活方面。由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的限制，特别由于中国的落后的分散的宗法社会和帮口行会的社会环境，小资产阶级在组织生活上的倾向，容易表现为脱离群众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种倾向反映到党内，就造成我们前面所说的“左”倾路线的错误的组织路线。党长期地处在分散的乡村游击战争中的情况，更有利于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倾向，不是自我牺牲地为党和人民工作，而是利用党和人民的力量并破坏党和人民的利益来达到个人和宗派的目的，因此这是同党的联系群众的原则、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纪律不相容的。这种倾向，常常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如官僚主义、家长制度、惩办主义、命令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半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主义、闹独立性、行会主义、山头主义、同乡同学观念、派别纠纷、耍流氓手腕等，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和党内的团结。

这些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三个方面。我们党内历次发生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政治上的“左”、右倾，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等项现象，无论其是否形成了路线，掌握了领导，显然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之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无产阶级的表现。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采取教育方法，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分析和克服，促进其无产阶级化，是完全必要的。

六

由上所述，可见各次尤其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左”倾路线，不是偶然的产物，而是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因此，要克服错误的“左”倾思想或右倾思想，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能操切从事，而必须深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提高全党对于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鉴别能力，并在党内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耐心说服和教育的工作，具体地分析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说明错误之历史的和思想的根源及其改正的办法。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应有态度。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这次全党整风和党史学习中所采取的方针，即“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41]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的模范，因而取得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提高并团结全党的伟大成就。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在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主义和李立三主义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缺点，是没有自觉地作为改造在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步骤，因而没有在思想上彻底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也没有恰当地指出改正的方法，以致易于重犯错误；同时，又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以为对于犯错误的人们一经给以简单的打击，问题就解决了。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今后进行一切党内思想斗争时，应该避免这种缺点，而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应该不存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即使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应该

以恳切的同志的态度，帮助他去了解和改正错误。现在全党对于过去错误路线的认识，已经一致了，全党已经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周围团结起来了。因此，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正像本决议的第二节上所说的："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我们党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一切分析、批判、争论，是应该从团结出发，而又达成团结的，如果违背了这个原则，那就是不正确的。但是鉴于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社会根源的存在以及党所处的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又鉴于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残余还是存在着，尤其是对于经验主义还缺乏足够的批判，又鉴于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虽然基本上已经被克服，而具有宗派主义倾向的山头主义则仍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等项事实，全党应该警觉：要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还需要一个长时期的继续克服错误思想的斗争过程。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等项倾向之目的。

七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我们党和全国广大人民的奋斗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党在抗日战争中所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及其所起的决定作用，就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生动的证明。党在个别时期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对于二十四年来在

我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一些部分的现象。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而且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坚决相信：有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样三次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的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之下，必将使中国革命达到彻底的胜利。

注释：

[1]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32]。

[2]林育南（一八九八——一九三一），湖北黄冈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早期职工和青年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之一。曾经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青年团中央委员、团中央秘书、组织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秘书长等职。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3]李求实（一九〇三——一九三一），湖北武昌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一九二三年和一九二七年青年团的第二、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先后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曾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南方局书记和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主编等职。一九二九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创办党报《上海报》。一九三一年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牺牲于龙华。

[4]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一日至五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又称赣南会议。

[5]一九三五年秋，在陕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贯彻到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工作中去，使执行正确路线的、创造了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刘志丹等遭到排斥。接着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一大批执行正确路线的

干部又被逮捕，从而造成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同年十月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了这个"左"倾错误，将刘志丹等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因而挽救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6]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8]。

[7]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注[1]。

[8]参见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第二部分（《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9—207、259—267页）和《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3—495页）。

[9]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

[10]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井冈山的斗争》一文的《革命性问题》部分。

[11]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3页）。

[12]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

[13]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停战协定，联合抗日。三个条件是：(一)停止进攻革命根据地，(二)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三)武装民众。

[14]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注[17]。

[15]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注[2]。

[16]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7页）。

[17]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8]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9]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98—99页）。

[20]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七部分《战略和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31—147页）和《时间问题简评》第二部分《关于中国》。这里的引语见《时事问题简评》（《斯大林全集》第九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05页）。

[21]见《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57页）。

[22]见《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57—58页）。

[23]见《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59页）。

[24]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05页）。

[25]见《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

版社 1985 年版，第 3－16 页。

[26]见《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92 页)。

[27]见《论政策》(《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764 页)。

[28]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6、28、30 页)。

[29]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信》。

[30]以上三段引文见刘少奇《肃清关门主义冒险主义》(《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6、28、30 页)。

[31]"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毛泽东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中国工农红军制订的纪律，后来成为八路军新四军的纪律，以后又成为人民解放军的纪律。其具体内容在不同时期和不同部队略有出入。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对其内容作了统一规定，并重新颁布。"三大纪律"是：(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是：(一)说话和气；(二)买卖公平；(三)借东西要还；(四)损坏东西要赔；(五)不打人骂人；(六)不损坏庄稼；(七)不调戏妇女；(八)不虐待俘虏。

[32]见《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04 页)。

[33]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五章。

[34]见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关于冲破五次"围剿"的总结》。

[35]见《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500 页)。

[36]即古田会议决议。《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

[37]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见(《列宁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43 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 页)。

[38]见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三日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全会的工作》(《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2 页。

[39]见《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 938 页)。

[40]布朗基主义是指以法国布朗基(一八〇五一一八八一)为代表的一种革命冒险主义思想。布朗基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妄想不依靠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用极少数知识分子的阴谋行动，就可以使人类摆脱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

[41]见《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第 938 页)。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魂飘重霄九——苏区“肃反”大纪实　（下册）
作者＝
页数＝８９７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Ｖｓｓ号＝８５４３２３１７